華夏知青文集選

第三輯《知青文苑》

小说故事（一）

华夏知青网

姥姥已去世许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依旧不时浮现在眼前。

姥爷家原在海参威（现在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地割给俄国后，随太姥爷回到东北。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的姥爷成为中国参战华工到了欧洲，也因此成了十月革命的一员。北伐时孙中山先生要求苏联派遣华人返回加入北伐军，姥爷又成为其中一员。但当他们到达满州里时，却没人理了。于是散伙，姥爷便娶妻生子。我母亲就生于满州里。接着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姥爷一家逃往关内，先回山东老家，日本鬼打来又往南方逃。途中，我的亲姥姥被炸死了。到江西时一位逃难的女士就成了我的姥姥。母亲一家一直逃到广西、贵州交界的小地方，才停止逃难生活。解放后，姥爷返回山东青岛，母亲有了我父亲，便留下了。

1957年暑假，反右派造成学校推迟开学，我们和妈妈到山东姥姥家住了一个多月。和姥姥天天在一起。她总是乐呵呵的，常买些便宜但有营养的晕腥给我们吃。象鸡爪子、海蛰头什么的。那些素菜也劝我们吃的，她说："萝卜上了市，医生没有事。""青菜豆腐保平安，多吃好当官。"她那一口难听的话语，常惹我们发笑。

通常一个省的方言，以省会话最好听，两省交界处最难听。姥姥是湖北黄梅人，隔着长江便是江西九江，东边挨着安徽，那一口湖北话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她小时侯跑到九江，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了点书，不要交学费还管饭。后来学当护士，要不是日本鬼子来，她一定是个好护士，说不定是护士长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想作弄一下姥姥。我说："姥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是什么意思啊？"她笑了，笑得很开心："你呀！逗你姥姥是吧？你这句话只讲了一半，还有一半冒讲。"我急了，忙问那一半是什么。姥姥说："听好了，是这样的：'天上飞着神通广大的九头鸟，地上住着聪明绝顶的湖北佬。'记得了吧。"我不但记住了还记得好几句呢。

姥姥说："家有千金，不如日进一文。"

姥姥说："省着省着，窟窿里等着。"

姥姥说："钱是挣回来的，不是省回来的。"

姥姥说："穷人养娇子，富人养孬子。"

姥姥说："吃不穷，穿不穷，算盘打不到一辈子穷。"

我们回到南方的家，学校也开学了。好几个老师成了右派份子，其中就有我最喜欢的刘老师。他很年轻，教我们图画课。还跟我爸爸说过，说我很有绘画天赋，要认真培养我的。可是一下子就成了右派，老师讲的右派，很坏很坏，就象国民党特务。从美国佬那里拿些玩具，专给我们这样的孩子，一玩就会爆炸。朝鲜就有很多孩子，捡了美国飞机丢的玩具，都被炸死炸伤了。于是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恨死右派份子了。

我给姥姥写了封信，告诉她回来后的情况，还画了一幅青面獠牙的鬼怪画，旁边写着“右派”两个字。就在这几天里，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学校捉迷藏。看见老师们在风雨操场开会，不时还喊着口号。我们好奇地躲在附近，见几个老师低着头站在台前，其中就有刘老师。这是在批斗右派分子，这也是我头一次见到批斗会。散会后没想到就遇见了刘老师，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我也掺和了进去，我们唱着：“右派右派，象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咧背后来破坏……”刘老师突然站住了，其他孩子全吓跑了，我没跑。他走近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还小，以后长大就会明白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神情。回家后我向母亲说了这事，母亲叫我别跟别人说。

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姥姥的回信，里面居然也有“你还小，许多事你还不懂，以后大了才会明白的。”这样的话，还叫我别画那些鬼怪画了，为人要学正派些。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刘老师，听说他被开除并下放到农村去了。再往后，我最要好的同桌跟我告别，他说因为他的爸爸是右派，全家都要到乡下去了。我知道他爸爸，是部队南下的干部，怎么也是右派呢？那时，大人们并不恨右派，倒反有些同情。

到我上中学时，有一天，在海军的二舅给母亲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姥姥上班的渔具社来了几位外调人员，问我姥姥在江西时参加过什么组织。姥姥死不认帐，人家说有证明人的，还找到了原来的档案。姥姥还是不承认，别人又不能明说，只好找到二舅。原来姥姥在江西苏区红军医院当护士时，宣誓加入过共产党。长征前夕老弱病残和女人被疏散了，她也是其中之一。四清才查出来。二舅跟姥姥一说，她哈哈大笑，说：“搞了半天原来是共产党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反动会道门，象是一贯道呢。是有这么回事。”此后她便有了些许补贴，还当了人民代表。

1978年我仍在插队，以做木工维生。姥姥叫我到青岛去做，母亲也去了。我问姥姥当年的事，她说那时谁知道怎么回事，院长去了，大家都跟着去了，那个表叫你填就得填的。谁不填会有麻烦，哪知道是共产党呢？我问，你怎么没长征呢？要不也是女将军了。她哈哈大笑，说傻孩子，除了首长老婆，女人都解散了。你姥姥不漂亮，首长看不上，留给你姥爷了。又说，丑女人好，自古红颜多薄命呀，人家贺子珍，年轻漂亮，能文能武。后来怎么样？人中有人天外有天，你漂亮还有更漂亮的。她想了想，说，也许死了，也许跟别人了，反正不会是你姥姥了。

我当时有些得意，姥爷当过十月革命战士，姥姥又当过红军护士，我们家还该算革命的。这意思不知怎么的，居然给姥姥察觉了。她有意无意地对我说，人要看远一点，你姥爷姥姥都不算个啥，碰巧遇上了，随了一阵大溜。你要学点本事，不是做木工，是要多读点书。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谁敢说世道总不变呢？等机会来了，你没本事还是不行。我突然想起托尔斯泰在《复活》里的那句话：“不要欣羡，不要焦急。人类的前途和你自己的

命运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但你得这样地生活，那就是要对一切有所准备。”别看我姥姥文化不算高，水平还是挺高的。我安慰她说，你放心，我虽然招不了工，也不让考大学，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我已经读完了，还有大学的好几门课呢！不让考大学我自学，都好些年了。去年我辅导的几个回乡知青都考上大学了。姥姥说，那你今年再报名嘛。我笑着告诉她，你外孙是现行反革命，不让考的。她也笑了：你看得开姥姥就放心了。别理他，迟早会平反的。姥姥说对了，1980年我被平反，1982年我考上华南理工大学函授，已是当教授的年龄了，还是学了六年，才得了本科文凭。

姥姥是个极普通的人，“知足者常乐也”简直成了她的秉性。有一天，姥爷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姥姥说不是，应该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俩争起来，接着姥爷把碗给摔了。我妈急着两边劝，没想到姥姥笑呵呵地说“你爹就是这个臭脾气，没事，我跟他吵了一辈子。吵完还得过日子。可惜这只碗，它又没跟你吵架，摔它干啥？老头子，你说是不是？角把钱呐，还得去买。”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我吸烟很凶，母亲为此不知唠叨过多少次。这时她又叫我戒烟。姥姥叫我母亲：“滨子，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老头吸烟，老婆买烟。她买一包烟，就放一包烟钱在罐子里。一年下来，打开罐子，里边有一百多块钱了。她就对老头说：‘你看，这一年你吸掉了一部自行车哩。’老头也心疼了，决心戒烟。又过了一年，老头问：‘老太婆，这一年我们是不是有两部车了？’老婆说：‘你不吸烟了，我也不放钱了，哪来的两部车？’老头说：‘我吸烟还有一部车，戒了烟车没有了钱也不见了。看来是我吸烟吸出一部车来，这烟是戒不得的。’就又吸上了。”我乐得哈哈笑，母亲直怪姥姥。姥姥也乐了：“让他吸吧，‘闲茶闷酒无聊烟’。他一个人还在农村插队，怪无聊的。”

一天烟台老家来了位与我同年的表兄，是母亲堂姐姐的儿子，调进青岛了。闲聊中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哈哈大笑，告知本人的岳母娘可能还没出世。他没听懂。姥姥说：“恩池，你别瞎问了。他不象你，就知道讨老婆。人家还没结婚。”表兄大吃一惊，又说了许多应该结婚生孩子的道理。他走后姥姥问我，生气没有？我告诉她，能惹我生气怕不容易。姥姥说“那就好，‘宰相肚里能撑船’，有肚量才能成大器。”

过了一阵，我停下木工活休息。姥姥坐过来同我聊天。她说：“你记住，女人有两条，一是贪恋食物。这是天性，上帝给的。因为女人要养孩子，没有食物就不能养活孩子，所以女人比男人贪。二是女人喜欢不听话的男人。打老婆的男人没出息，怕老婆的男人更没出息。”我一听就忍俊不禁，问道：“你是不是怕我找不到老婆？”她说：“我才不担心这呢。你今年三十了吧？男人三十一枝花，你姥爷不就三十多岁才结婚嘛！我怕你将来不止一个老婆”我道：“那是犯法的。”她喃喃道：“畜牲知足不知羞，人呐知羞不知足。就怕管不住哩。”姥爷在隔壁听见，骂出声来：“你跟孩子胡说八道些啥？尽是些歪道道，是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还是上帝教你的？”姥姥也不示弱：“基督教怎么啦？基督教跟共产党主张差不多，都信共产主义。臭俄国佬，大鼻子！东正教的恶霸！”姥爷嘟囔了几句俄语，竟然挂起了免战牌。

一天，姥姥回家，拿了三张电影票，叫我和母亲陪她去看场电影。我问，姥爷去吧，我在家干活。姥姥说，你姥爷不看电影，看家。有那盆昙花给他看就够了，姥姥特地买给你看的。后来我们去看电影，是罗马尼亚的《侦察英雄》。看完回家路上，我问姥姥这部片好不好看？姥姥说：“全都是男人，没一个女的。”我仔细一想，真的，这是我所知的唯一一部没有女性的电影片。那时，电视放了部日本片《望乡》；报纸杂志上讨论着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文艺上似暖还寒，国家也似乎如此。天安门事件正吵着平反；右派正在‘改正’；地、富也在摘帽。

三个月时间很快就消失了。我决定回乡下去看看，便告别了姥姥。这是我记事以来，同姥姥处得最久的一次。

2001-06-0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与宙宙是在一个公社插队时交的朋友，亲如兄弟。宙宙的爸爸是留学过美国的总工程师，老伯的亲人在国共两党都是高官，他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同蒋介石排在同一档。49年他坚决与老爹划清界限，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而他的岳父一家，几乎都是中共地下党。当年宙宙大姨的婚礼，延安的头头们全都参加了，包括毛泽东本人。我还见过宙宙小时侯，朱德在中南海里抱着他的照片，那时宙宙还跟着他大姨。只是好景不常，他的大姨夫在高饶事件时被株连了。我知道宙宙的弟弟参军时，就是老伯找肖华上将关照的，否则绝对没门。

后来宙宙招工回郑州，要求我一定常到他家，于是我们一直往来着。我在农村并不安分，那每个工一角多一点的回报，我没放在眼里。靠着修手表、收音机，做木工、油漆，挣钱生活。捎带着搞些投机倒把，收入不比上班的少。每年还有几个月，专事读书。每次到郑州，住在宙宙家，他爹都很高兴，住在他家如同自己家。我跟老伯围棋实力相当，成了忘年棋友。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宙宙的表弟四毛从北京来避难，四毛是独生子，爹妈都是军队的师级干部，在北京三总部工作。我正在郑州给人做家具。8月上旬，干完一批活之后，决定出游一次。于是四毛就跟着我跑到苏、杭。9月初我们上黄山玩了几天。那时的黄山，远不象后来那样人满为患的。从黄山北海宾馆下来那天，我们决定经松谷庵走到太平县，然后坐汽车由贵池上船。到松谷庵的路上，瓢泼大雨把我俩淋个透，好不容易进到庵里，原来竟是个空无一人的废庵。农民们用做炒茶叶的地方了。躲雨时见白墙上涂写了不少诗文，当然大多属涂鸦之类。于是兴起，涂诗一首：“禅佛禅到松谷庵，烟灭佛亡庵也残；山雨无情淋已透，阴霾不散走亦难。听涛门内听流喘，叠嶂峰前叠饥寒；自信浮云难蔽日，且燃篝火待衣干。”爬高些，用柴碳写在墙上。

我们于8日从贵池上了轮船，到武汉去。船很大，叫“东方红十三号”（或九号，因几天前我们从南京过来时也是坐船，哪艘是九号或十三号记不太准。）。

船的每个座舱中间是一条通道，连着船的两弦。通道两边都是床，上下铺。我们的铺位旁边，是几位穿着灰不溜秋的海军服的军官。那时没有军衔，从年龄和言谈举止看，大约都是营、团级的。上船后就见他们在打扑克，说说笑笑。我们的舱位在三层，上一层便是餐厅。伙食决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最便宜的份饭只收两角钱，还不要粮票。

在船舷的走廊上看了两岸的风景，我不由得有些感叹：这么大一条长江，居然没有见几艘船。显得空空荡荡。江风很大，吹得人受不了。就回舱里。几位军官依旧在打牌。我躺在床上，拿了本书看。四毛与军人有一种亲近感，于是看他们打牌，不时还参与进去，建议打这打那。没多久就混得很熟。其他旅客的聊天，基本上在说地震，唐山地震之后，似乎全国都在闹地震。

次日下午3点多，船到九江。要停40分钟。这时广播里不停地广播通知，说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我们都开始议论会广播什么。有一位军官说，可能两报一刊要发表批判文章。另一位马上顶过去："还批判谁？死的死了，倒的倒了，没有批判对象了。"一位旅客接上："宋江批过了，那就批判曹操吧。曹操也是篡党夺权的?"大家都笑起来。但批判文章不可能先预告的，有个旅客说："不会又死了谁吧？"军官接着说："能是谁？刘伯承？不应该有这么大动静。叶剑英？"马上有人接茬："不可能，他躲在颐和园下棋，不会这么隆重。"一位旅客问："你怎么知道他在哪下棋？"那人说："我们那有一个当兵的，给叶老帅当警卫。他探家回来说，叶帅受江青他们的气，毛主席又护着江青。他就跑到颐和园躲起来，平时跟参谋们下棋。输给他就骂你脓包；赢了他就骂你狂妄。心情糟糕得很。"这位问话的说："等老人家千古了，把这帮家伙狠狠地收拾掉！"我说："一小会播一次，会是毛主席吗?"上铺一个声音："我猜是，不敢说。"年纪最大的那军官说："别乱说。万一不是的，那就自找麻烦。"

那个年代，说话最自由的地方就是火车、汽车、轮船上。发发牢骚，讲一些"政治谣言"，发泄一下心中的闷气。反正船到码头车到站，各走各的，谁也不认识谁，不担心被揭发。恰恰是在素不相识的旅客间，往往引起共鸣，而那些"政治谣言"，多数是针对江青一伙的。人人皆知毛就是他们这一伙的后台。这两年又是水灾又是地震，蒋介石、康生、周恩来、朱德都死了，老百姓传说老天爷发难，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人民对没完没了的运动，早就怨声载道；只是如果这些怨言牵连到毛主席，并且被揭发，那就会倒大霉。轻则判重刑，重则杀头，还要株连亲友。现在说到毛主席，毕竟还有些害怕。所以这军官一开口，就立马没人再说什么了。

船不一会儿靠上了码头，我和四毛上九江市走了一段，时间有限，没敢走太远。回到船上，接着听到广播，真的是毛主席死了。人人熟悉的哀乐又一次响起。然后再播一次。又一次哀乐，反复几次。几位军官还是打牌。船开了，下一个码头就是终点武汉，我还在看书。不久广播了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七天的通知，又广播了18日开追悼会的决定。一个军官说："还打不打？"那位年长的军官说："管他呢，打完这把再说。"

过了一阵，船上的广播宣布：为了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旅客排队到四层餐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告别。由船上工作人员带领，请大家按照顺序，听从指挥。军官们的扑克也停下来了。不久，就看见门外排队，由右边弦廊上餐厅，告别完了从左边弦廊下来。四毛问我："老大，我们去不去？"我答："去个屁。""会不会有麻烦？""别让人知道就不会。"

谁知我们这个舱好些人都不动。有一个船员进来："你们怎么还不动？快些。"那边有一位说："我不舒服，晕船，可以请假吧？"那船员说："你们证明，我来喊过你们了。"就走出去了。门外的队伍慢慢移动，看不出这船上有那么多人。我听见一个军官问："这边是回来的吧？"另一个旅客说是的。几个军官立即从左边门出去，加入了告别过回来的队伍里。我立即对四毛说："走，跟上。"于是我们也从左边出门。后边还有几个旅客也跟拧N颐橇┰诤蠹装逡唤强戳嘶岱缇埃　拿　担　饧父鼍　僖膊蝗ジ姹穑　婷幌氲健N椅仕拿　"你爹妈他们发不发牢骚？"他说，也发一点儿。主要是对江青，忒讨厌她。"我妈还骂过她是婊子。你可不能说出去。"另外就是说

过，三支两军把部队搞乱了，威信也搞糟了。我剩“不发毛主席的牢骚吧？”四毛说：“那他们不敢。不过谁知道，关起门来也许会”闲扯一会，回舱。

等大家都回到舱里，七嘴八舌说话。我听清楚他们介绍告别式的场面：毛主席相围上了黑纱，一小堆白纸花，进去每人发一朵，三鞠躬完出门又收回来。拿去发给后边进来的。有位军官小声说：“形式主义。”四毛问：“老大，你说毛主席死了，会不会变天？”我笑了，说：“别做梦了，换药不换汤。就这么回事。不过日子应该会好一点。”旁边一位旅客听见，笑起来：“有意思，挺有意思，换药不换汤。”奇怪的是，直到武汉，船舱里却没有再议论毛主席死后的任何事情。反倒是有一种不甚明白的情绪，大家都等着看。

船到汉口江汉关码头已近中午时分。我们上了岸，我口袋里只有一角钱了。加上不知道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建议，走吧！反正沿着江汉路走，能到我同学的厂里，那厂在江汉路的另一头，新华路，我带路。肚子很饿，路特别长。总算走到了。于修、袁猴两个见到我，高兴地大叫。我们是同学，他们回原籍下乡后，70年就招工了。一说我们还没吃饭就马上到饭堂去，幸好还有饭卖。还给加了个菜。我们俩狼吞虎咽，每人吃了六两大米饭。还聊了一通路上的见闻。四毛说，他下午就要回郑州，问有火车没有。我笑道，没来过武汉，玩一两天再走不行？他说，出来太久了，怕爹妈惦记。又问到哪去买票。于修大叫起来：“买什么票，扒上车就走。到郑州几个钟头，怕什么？”袁猴又说：“老大从来不买票，人都是国家的，算出差。”四毛说他可不敢。我说，借十块钱吧，我们身上都没钱了。谁知四毛说不用，他还藏着十块钱，够了。我笑着大骂他搞阴谋诡计；他倒老实，解释说怕我花光了，留十块应急的。

送走四毛后，我们三个到了于修家，他现在是厂里的汽车队长，管三辆汽车，属于一等公民。买了点菜又来了两个好朋友，买几瓶啤酒，聚了一餐。席间，袁猴说：老头子死了，你也该招工了吧？我说现在我还不想招工了，一个月三、四十块就把自己给卖了，划不来。那位当老师的朋友说：“毛老头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叫学生下乡。全国各地这些小伢儿，千把万人，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一讲就是59年60年，饿死几多人。那叫忆苦思甜嘛？明明就是忆甜思苦！我插队那个地方，农民讲地主还比公社干部好。解放前有点灾，地主还晓得减租。59年饿死人这些干部还要各家各户搜查粮食。几狠心哟。”我告诉他，我插队那个公社书记说：“是政府养不活你们，才叫你们下乡的。让我们养，我们也不想养。”大家哄堂大笑，说这个书记还不错，至少讲点真话。共产党的干部，自彭德怀被打倒，没人敢讲真话了。林彪总结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可算经验之谈。

接着大伙议论天安门事件会不会平反。我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不可能，但总有一天要平反的。于修同意，说全国至少几十万人，不平反才怪。那位朋友认为，反右派也有几十万，还不是没有平反。于修说，现在老头子没有了，没人压得住阵，情况不一样。古时候新皇帝登基，都要搞大赦的，你怕华国锋不搞？不搞他哪里坐得住？接着谈到会不会打内战的问题。都有点担心，军队那帮老将，早就恨死江青了，弄不好真会打起来。

反正，毛泽东的死，远不如周恩来死时那么令人悲痛。那时，全国各地都自发地搞了一些悼念活动，老百姓出自内心的怀念，用各种行动来表达哀思。连毛泽东也知道，这种哀思其实包含着更多对他的施政方针的不满。尤

其是在镇压了“4.5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份总理遗嘱弄得全国都沸沸扬扬。现在却没有这种举动，一切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周恩来去世时，我也到了武汉，街头看到，每辆公共汽车车头、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挂满黑纱、白花，现在却没见到。人们依旧盘算着过日子，并听天由命地等着看政局会怎样。报纸上、电视里、广播电台都是连篇累牍地宣传那些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袁猴说，现在的报纸，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次日晚上，于修开车，我们到了汉阳他的一位朋友家。那里聚着五六个人了，都是下过乡的人。于修介绍说我还在农村插队，大家便有了些同情话。接着那位朋友拿了床毛毯把窗户给遮住，于修喊热，那位说：“巴妈儿的，现在还是停止娱乐活动的，防到些好。”原来这几位都是吉他爱好者，请来一位高手，想学一两手。于是开始弹吉他，间或，也跟着唱。那位确实是高手，吉他弹得棒极了，引得同院的邻居也到门外听。特别是弹到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已经到来，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因为都看过那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竟成了合唱。

院子的门有人敲打，所有人都不出声了。屋主出去开门，原来是居委会的。我听见那妇人说：“现在是非常时候，你们要乐就小声点。小人总还是有的，跑起去告一下，搞出些麻烦就不好了。”屋主陪了些好话，进来关了门，解嘲似的说：“一得意，就忘了形了。注意点。我那个窗子，对到巷子的，挡起也挡不严，外头听到了。”又弹了几首曲子，终不象原先那么无忧，干脆散了。

次日，我习惯性地扒车回到郑州。宙宙上班地点离火车站不远，先到那，他给了家里的钥匙。等他下班回家，进门就说：“你可回来了。四毛回北京了，这几个哥们老问我，老大啥时回来，这不是老毛死了个逑的，大伙想唠唠。”没等我开口，他又说：“我跟你说，最近在这儿可是出了好几个反标。都是为邓小平、还有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有一个标语挺有意思：“批邓很不得人心！”我问：“抓到写标语的了？”“不知道。可能还没有，今天早上单位上还叫大家注意，阶级敌人乘毛主席去世会跳出来，大家要检举可疑线索。谁会去干那缺德事，我师傅说，谁检举，谁生儿子没屁眼儿。”我问：“你爹呢？”“他出差好几天了，明天也许回来。”

晚饭后，我们俩骑车到了二.七大道，到设计院许工程师家。这位许工我也挺熟，夫妻俩都是60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华侨，爱好养鱼。原先为热带鱼过冬头疼，我给出了个主意，把电烙铁芯子放进试管，用环氧树脂封口。扔进水里插上电，解决问题。两口子高兴坏了。谈了一会鱼的事，许工说，他们夫妻俩现在正办着回侨居地的手续。回印尼很难，但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已搞好了进入马来西亚的必要手续，如顺利，年底前就成行。我问，外边的日子是否比国内强？许工说，我们都不关心国内政治，老朋友面前就实说，太恐怖了。你想，国家主席都可以整成那样，普通人又如何保证？没有这种保证，法律的保证，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了。人不是蚂蚁，不是说饿不死就心满意足的。后半生不想在这种毫无自由可言的环境下度过，还是出去好。

他又说，我们都是回国后上的大学，也为国家做了十多年贡献，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良心。他苦笑着说：“当年回国，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就可以去马来西亚，不肯去。现在却费尽气力过去，真是一言难尽。”说着也就自然地转入毛去世后的事情上去了。我认为，毛去世后这种局面会缓解一些。他问理由何在？我答，很简

单，没人可以具备毛的威望，也就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应有的权利。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天安门事件就说明人民已经开始反抗。许工夫人慌忙打岔，说："老大，好了，别再讨论下去了，惹出麻烦来我们的力气就全白费了。"这时我注意到，她在我们来到后就把黑白电视机调大了音量。许工解嘲说，很对不起，我爱人现在胆子很小，吓怕了，生怕大祸临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人嘛，总不能没有思想，但现在却不能有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聊了会，我们告辞。

第二天焦老伯回来，他57年险些成右派，以后就不谈国事了。他除了与我谈论围棋之外，至多偶尔谈一些3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事。这次，打开收音机之后，摆好棋盘，低声问我，毛之后中国会怎样？然后投子。我笑起来："焦伯伯，这么多年您第一次谈政治。"他道：四毛回来说，你讲"换药不换汤"，我感觉这话里面有文章。我反问，您觉得华国锋能坐多久？他道，当然是他当头，毛主席定的嘛！我说，那得看他的能耐，从宣传上看，毛只是为了平衡，强拉他的。如果江青把他拉过去，中国就打内战。如果拉不过去，叶剑英这批老将，手中有军队，他也许会成代言人。你看他这几天讲话，最怕邓小平出山，一个劲的继续批邓。不管谁上台，都会维护共产党的江山，否则他自己的权力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有大变化，这就是换药不换汤。至多不搞运动了，因为除了毛主席本人，没人具有把运动搞下去的威望。他说，只要没有运动了，那就好。这种运动，千万不要再搞了。于是下棋。

在郑州的几天里，原来一块插队的朋友们陆续见过。他们招工以后，基本上忙于恋爱结婚，有的生了孩子，属于混日子之类了。毛泽东的死，似乎吊起一些关心政治的念头。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他们未来生活会如何。我发现，没有哪个感到什么悲痛，反倒都觉得解脱。插友们告诉我，单位上都通知了，追悼会那天不许请假，也不准迟到。还不能穿黑、白色以外的任何衣服。女同志不许穿裙子。等等。毛二不知听到什么消息说，不用再下乡插队了。他感叹道："嘿，他要是早走七八年多好，咱也不用下乡了。"这个人群都是狂热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看来武汉那位仁兄说的，"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有点道理。只是，这个"坏"当另行理解。

还说到一个小道消息：许世友在人大会堂告别遗体时遇到江青，告诉她，毛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毛主席不在了我决不会让你了！这传说很让人解气，老百姓确实恨死江青了，周恩来死时，她不脱帽子，电视机前就有不少人骂出声来。须知，那时看电视还是集体行动，即使谁家有电视，左邻右舍都聚集来看的。还传说她与唐纳的种种流言，以及周总理下令全部买回她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记录那本书。关于电影《创业》、《园丁之歌》，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人们听说后都要互相转告，高兴得很。唯一不解的是：既然毛批评她如此之多，何以她却不降反升？别人是只消毛半点批评，马上垮台！一句话，用怨声载道来形容毛去世前后的民意，是决不夸张的。

郑州火车站旁正兴街一座新建好的过铁路地下通道，原定的通车典礼因毛逝世推延，17日夜，有人在新修的柏油路面上刷了大标语："批邓不得人心！"18日上午我和宙宙骑车前往，只见围观不少人，标语早就用锯末盖上了，现场被封锁。据说那些刷标语的是开着汽车来的，且没有逃走，坐等被抓。我们看看就走了。那条"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大标语则比比皆是。官样文章依旧充斥报纸电台，调子唱得很高，却完全没有百里长街送总理那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追悼大会可谓哀荣备至，也明摆着是一种形式；主席台上一副副貌合神离的面孔，象是一幕滑稽

剧。

第二天，我回乡下，是读书和想问题的时间了。在信阳转汽车时，也见到了一批招工在信阳的插友。同样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朝天子驾崩了，又一朝天子登了基。人们没理由不抱一线希望，希望新天子能比旧天子强些。可大老郭那席话却使人高兴不起来：“你看华国锋那眼，跟奸臣似的，没一点帝王相。这能行？”他居然会相面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批邓，还要把文革进行到底，这些都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

回到乡下，农民们是不谈什么政治的。说的就是：怨不着水灾、地震，原来这些个大人物都要归天。大队部的干部们还不时扯扯，这时遇见永乐生产队的何生有与王某（日记里没记他的名字，现在更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在做“义务工”，即干活不记工分的。原来是要开毛主席追悼大会前，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一个黑纱戴在胳膊上。老社员立即怨声载道，他们实在穷得拿不出这两角钱的，须知，那相当于他们几乎两天的全部劳动所得。何生有在买黑纱时大声说：“我买六个！奶奶的，全都戴上。这回总算是翻身了。”王某说：“什么解放，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干两三天一改善，现在改善个吊。”

恰好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刘家楼在监督卖黑纱，于是他俩被大队专政队抓起来。因为两人都是贫农，公社指示留在大队专政队监督劳动。已经被批斗好几回了，平时便在大队干没任何报酬的活。我问何生有，干啥要说这些话？他道：“日他奶奶，谁个不说？不就是叫刘家楼听见了呗。”我又问他，要是坐劳改咋办？他道：“坐劳改比当老社员还强些。坐劳改孬好一个月还吃45斤粮食，老社员不就一天七大两哩。”于是我也无话可说。孟子云：“哀，莫大于心死。”多少人的心已经死了？

这天，我正在大队部，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在公社广播站干活的崔会友风风火火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落实了以后，刘文才会计一拳砸在桌子上：“你妈也，好！老黄！到围沟里打几条鱼，今晚喝两盅！”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农村干部也会如此激动。老黄笑刘文才：“你不是说华国锋是阿斗么？这回咋样？”刘文才耍赖：“俺没说过。你造谣！”笑呵呵的。

酒到半酣，我问这位部队复员回来的会计：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开心了？他想了一会，说从参军那次起。而大队民兵营长说，从成立互助组开始，就没有开心过。“说是斗地主分田地，你妈耶，庄稼还没收两茬，就搞互助组把田给收了。再就是合作社、高级社、公社，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及一年。这叫啥日子？俺们这些当干部的，孬好强些。老社员那日子，还不抵旧社会。打食堂关到现在，就没吃过饱饭”这营长算我的本家姐夫，抗美援朝复员回来，本来分配到铁路上，可他坚决要回家。我笑他，你要到铁路不就没事了吗？他急得叫起来：“俺们这，老祖辈起，吃不完用不完。比城里还强些。自打这公社一搞起来，全都挪熊！”“食堂关俺差一点饿死。要不是俺战友从信阳给俺寄了二十斤粮票，俺家里少说死一半人！在朝鲜俺救过他一命，瞧着这情况他觉着不妙，主动寄的。上头还把俺查了一通，说俺乱写信，干部职务也免掉了。末了‘搬石头’才恢复的。不信你问他几个。”大伙全都证实这事。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

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一个时代，到此就结束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39年12月爆发于广西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它其实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也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归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指挥的又一战例。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这是一笔浓彩，确实值得后人景仰。

一、日本发动南宁战役的决策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但日本非但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反而遭遇到更顽强的抵抗。日本军部“南进”派即认定：必须切断中国对外最后的交通线，以期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1939年4月15日，日本海军部《情况判断》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 日本决心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抵抗其侵略的最主要补给路线。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14700吨中的12500吨即经此路线，达85％。6月，日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也强调“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谅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38－3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同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对其解除了对苏联威胁的不满。认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援”，现在应“藉欧战发生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2页。）4日，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93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政协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随即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辖

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1军。9月23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命令；10月16日，又发出《大陆命令第375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同日，还发出“大陆指第582号”陆、海军中央协定：“本作战之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沿南宁——龙州敌补给联络路线，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路线之海军航空作战。”并规定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同上书，第499页。）19日，西尾寿造下达作战命令，开始广西作战，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为：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其他配合部队、第五舰队（11月中旬改称第二派遣支舰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其兵力总共约三万人；军舰70余艘；航母2艘、飞机约100架。

日军广西作战的主力第五师团为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号称“钢军”。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坂垣征四郎原为该师团长，他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师团长由今村均中将接任。可见日本方面何等重视这次战役。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完成它对中国的侵略任务。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39页。）

二、中国政府的反抗准备

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威茨认为：“战争是从被进攻一方的抵抗开始的。”如果没有这种抵抗，也就没有战争。而任何侵略都只是针对被侵略国中央政府的。如果该国中央政府“不抵抗”，战争也就结束了。法国政府不抵抗，于是法国没有卫国战争。虽然戴高乐在伦敦组织了流亡政府，也只被称为“抵抗运动”。据此，斯大林坚决否认法国享有“战胜国”地位；只是美、英两国强调法国光复以后的中央政府继续进行了对德战争，这才保住了法国的“战胜国”地位。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二战中抵抗最早因而也是抗战最久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二战的战胜国。

昆仑关战役爆发前，1939年9月，中国军队击退了日本陆军第11军对长沙的进攻。10月，国民政府在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了第一次长沙战役的作战情况，并决策发动新的攻势。29日，蒋介石在会议训词中宣布：“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蒋总统集》第1184页。）会议结束的11月5日，蒋接获了“日本有南犯企图”的情报，美、英军事情报机关也发出情报：“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集结，它说明对南宁的作战已迫在眉睫。”于是蒋立即从衡山直接飞桂林，为迎战日本新攻势作战斗安排。

但中国军队的准备状况确实混乱不堪：守卫两广海防的是原桂系部队第16集团军，辖第46军（军长：何宣）、第31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菘兼）。总司令夏威对他被调往第11集团军任总司令极其不满，借母丧之机躲在容县老家闹别扭。新上任的1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又不敢就任理事，于是有关日军进犯的情报无人处理。桂林行

营主任白崇禧赴重庆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行营参谋长林蔚则奉蒋之命前往容县吊唁夏威母丧并劝慰夏本人，行营成了空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远在广东韶关，没有行营命令也不敢自作主张。这一系列因素使行营、战区、集团军三级首脑机关形同虚设，这对于大战即临的中国无异一场灾难。

第46军的新编第19师（师长：黄固。该师于1938年秋组建，大部为民团转成。）驻防钦县、防城一带；第175师（代师长：秦镇、后任师长：冯璜）驻防合浦、北海一带；第170师（师长：黎行恕）驻防贵县一带。第31军的第131师（师长：副军长贺维珍兼）驻防桂平；第135师（师长：苏祖馨）驻防大湟江口一带；第188师（师长：魏镇）驻防平南。这个军事部署是基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判断日军只可能从广州湾（湛江）登陆北上夺取柳州，不可能冒险夺取南宁而设置的。由于新编第19师是一支刚组建的地方队伍，武器、训练、士气都极差。因此，从钦县到南宁可以说基本上无防御兵力。

更加严重的是，白崇禧见广东开平、阳江、阳春、新兴一片富庶地区既无中央军又无日军，如果桂系控制便掌握了广东南路，还掌握更多的出海港口。于是迫不及待命令第31军加速完成战备，并开进广东上述地区。防线一下子扩大到上千公里，守备实际上非常薄弱，而且没有纵深防御。

三、战役第一阶段：日军入侵和中国军队抵抗

9日，日本全部进攻部队在三亚港集结完毕。第21军司令官安腾利吉中将亲自到三亚指挥。13日，舰队从三亚启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以10余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175师一个营，给予日军以回击。军事当局命令防卫部队彻底炸毁北海市，只是因为指挥北海保卫战的国军第46军175师第524团团长巢威感到日本军并非要在北海登陆，从而避免了北海的彻底破坏。当晚，日舰停止对北海的进攻，转向钦州方向。防城企沙、龙门两地各一个营抵抗一天后败阵，日军登陆。在钦县犁头嘴防守连连长报告新编第19师55团黄廷才团长，他竟然认为这是敌惯常骚扰而已，不必认真。结果毫无战斗准备的新编第19师所属部队溃败，日军顺利登陆。

战至17日，日军占领钦州、防城，并立即分兵北上。18日攻新19师师部所在地小董，师长黄固临阵退缩，竟只身逃跑。（后来该师师长黄固被撤职，黄廷才交军法审判。）所辖军队溃散，日军继续北上。而十万大山区土匪组成许多便衣队为日军先导，致使日军加快北进速度，22日傍晚抵达南宁市邕江南岸。

日军登陆后，16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白崇禧，令其不必再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桂林指挥作战。白要求以桂林行营主任资格全权指挥，不须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插手，各军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蒋批准该项要求，并调其最精锐的第五军等直系部队归白指挥。白立即电令该军代军长杜聿明，立刻率部乘火车从衡阳赴桂南；又电令恢复夏威第16集团军司令职务，原已任命的蔡廷锴待命。16集团军立即集结，副总司令韦云菘及指挥所人员19日抵达南宁，各部分别赶赴日军进军必经之地阻敌北进。

白崇禧本人于19日由重庆飞桂林，21日率部抵达迁江，设立行营指挥所。这样，当日军抵达南宁之时，国军170师22日抵达邕宁、135师两个团23日到达南宁市区、200师第600团24日下午抵达南宁东北的二塘。另外六个军分别从外省向柳州、宾阳集结。由于原来的防卫方向错误，这次集结实在过于匆忙，属亡羊补牢之举。

23日日军第5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邕江，夜晚，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擅自令其所辖404、405两团放弃阵地撤退，韦云菘命令135师师长苏祖馨截回所部，伍宗骏抗命不肯恢复原来的阵地（伍后来被判刑五年），南宁市内正面已无军队防守。24日拂晓，170师在邕宁与日军激战，上午日军第5师团21旅团之21联队从市区渡江，下午南宁全城陷落。25日晨，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对170师和200师两个团阵地猛攻，国军顽强抵抗。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170师师长黎行恕与200师师长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

26日，日本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宣布所有日军组成邕钦兵团，由第5师团长官今村均指挥。安本人则于27日离开钦州回广州。日军于26日起，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高峰隘，国军尽管顽强抵抗，终于不支，于12月1日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接着暂停进攻，调整部署，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该处山岭延绵，无论往北往南，均为平坦地势。昆仑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至少远至宋朝，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

四、第二阶段，昆仑关战役

关北中国军队为白崇禧的桂林行营指挥，参谋长林蔚；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第16集团军，司令夏威。统率：第31军（军长韦云菘；辖131师，师长贺维珍；135师，师长苏祖馨；188师，师长魏镇。）第46军（军长何宣；辖170师，师长黎行恕；175师，师长冯璜；新19师，师长黄固。）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之一部。连同广西教导队独立步兵1-4团，总兵力约六万人。

接着集结来到的除第5军之荣誉第一师（副军长郑洞国兼师长）、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之外，第5军装甲团、骑兵团、炮兵团、工兵团等全部抵达，当时中国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军全员上阵；蔡廷锴的第26集团军；叶肇的第37集团军；邓龙光的第35集团军；以及第5军所在的第38集团军亦陆续集结到位。该集团军司令徐庭瑶，以下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99军（军长傅仲芳）第36军（军长姚纯）；连同辅助部队，共达30万之众。

固守昆仑关及关南的日本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之一部，辖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中将；辖第9旅团，旅团长及川源七少将；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盐田定七少将。）连同海军陆战队（军舰70余艘）、空军（飞机100架）共计约三万人。后期补充抵达的近卫师团；第18师团之一个旅团；兵员总数约10万人，实际参加战斗总兵力只有4.5万人。

还在日军刚占领南宁时，白崇禧即要求立即趁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尚薄弱马上发动反攻。未获蒋批准后，白要求杜聿明向蒋和军委会提出反攻要求，杜赞成，并于12月1日发出要求电报："重庆委员长蒋，军令部长徐。重庆军政部军务司王司长转呈部长何钧鉴：密。目前侵占南宁之敌，其兵力尚不及两师，此次乘我兵力分散虽侥幸成功，但以交通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使用，而补给尤为困难，现我军所处情况则实为相反，故此时我军正宜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12月10日前）反攻，以击破该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用敢不揣冒昧，谨申关于攻击前部署意见如下：（略）以上所陈是否有当，伏维鉴核示遵。 迁江第5军代军长杜聿明东午参一。"（《广西文史资料》第19辑，第12-13页。）

老蒋疑人也用，用人也疑，可见一斑。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白崇禧，屡奏不准便只好求其下属越级上奏，但也未能如愿。老蒋迟疑不决，贻误了最佳战机。所幸日本方面轻敌，在接获汉奸密报，谓南宁昆仑关以北已有十余万国军集结之后，今村均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未予理睬。而更高层则仍希望继续开展"谋略工作"，企图策动桂系反蒋，分裂的中国无疑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

还在八月间，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便派出汉奸做李、白和龙云的策反工作，要求他们倒蒋，日军给予协助。被李、白、龙云拒绝。12月10日，今村均发出《致李、白将军书》的通电，表示尊敬李、白治理广西的业绩；此次进攻南宁仅为切断蒋政权的交通线，希望两位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促进日华提携。如仍执迷不悟夺取南宁，日军南宁驻屯军必胜无疑。最后告知："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殁之将军部下4200余名勇士，我军已予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祭，尚乞安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05页。）

直至12月7日，蒋突然决定反攻。8日白崇禧将此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各部亦开始反攻准备。中旬，国军集结基本完成。蒋又派陈诚、李济深监督白崇禧作战，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也由韶关抵达迁江。15日，白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白崇禧部署如下：

北路军，总指挥徐庭瑶，部第5军主攻昆仑关；第99军第92师绕伶俐圩西进，攻击七塘侧击昆仑关之敌。西路军，总指挥夏威，部第一纵队（司令周祖晃）攻击高峰隘；第二纵队（司令韦云菘）在南宁南部苏圩集结，阻止敌后增援南宁。东路军，总指挥蔡挺锴，部何宣第46军向陆屋、灵山破袭邕钦公路；叶肇的第66军攻击昆仑关则翼之古辣、甘棠敌军。第99军另外两师作为战略预备队。

12月16日杜聿明（此时已任军长）召开第5军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他制定的是"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正面主攻昆仑关；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攻占五塘、六塘，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率两个补充团担任左翼迂回支队，绕甘棠、长安攻击七塘、八塘，则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

军。

昆仑关守敌为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其第42联队及第21联队在九塘至南宁一线。中日两军之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今村均的轻敌再次帮助了中国军队，他同日命令第九旅团长及川源七少将率领数千日军奔袭龙州、镇南关（友谊关），这支部队于17日出发，中国军队总攻击时间定于18日拂晓。

18日凌晨，战斗打响。先是炮战，中国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日本方面除炮兵外，最令中国军人头疼的是上百架飞机的轰炸。炮火延伸后，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仙女山、老毛岭、万福村、罗塘和411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19日中午，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今村均派出第21旅团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抵达昆仑关阵地，并夺回昆仑关。其他阵地也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激烈争夺中。新22师右翼迂回部队占领五塘六塘，其中五塘复被日军夺回，六塘则始终坚守住，在打击日军增援上作用极大，有效地保证了昆仑关战斗。今村均命令台湾混成旅团由南宁增援昆仑关时，被邱清泉亲率主力堵在六塘激战；杜聿明不失时机命令郑洞国派该师郑庭笈第三团从右翼包围九塘，郑团利用黑夜攻占九塘西侧高地。

20日，昆仑关敌渐不支，频频告急。今村均命令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增援昆仑关，但在五塘被邱清泉部堵截，激战两天不能前进。直至22日拂晓，方抵达七塘，又被阻截，中村本人23日上午也受伤。下午1时半，三木大佐告急：“黄昏前旅团如不能到来，第一线难以确保。”

另一边，11日奉今村均命令增援昆仑关的台湾混成旅团林义雄大佐第一联队、渡边信吉大佐第二联队在邕钦路上被175师各部阻击，不能及时赶赴昆仑关。其渡边联队在陆屋遭遇第524团（团长巢威）阻截，激战三日不能通过，渡边大佐被击毙，残敌逃回钦县。20日，今村又命令奔袭龙州、镇南关的第9旅团分出第三大队伊藤部队乘坐105辆汽车返回驰援昆仑关。

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及整个桂南战役进展缓慢极其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反攻南宁战役经过》广西博物馆藏油印本。）此令发出也非无由，18日西路军170师发起高峰隘战斗，19日占领高峰隘附近山头，但当晚即被日军偷袭，20日该处失守，国军败退至葛圩一带。白崇禧亲自作阵地视察，亦无改观，始终无法攻占高峰隘，致使阻击日军援军初衷无法实现。而邕龙路伊藤部则在西长圩被131师截击，22日今村均不得不派南宁仅有的两个中队和两个机枪小队前往援救，又在苏圩附近遭188师阻击。伊藤大队在西长被围整三天之久，却因131师不敢近战而免被歼之命运。最后，在飞机掩护下，这两部日军均得以突围，26日下午返回南宁。

24日，及川支队接到今村均返回南宁的命令，便销毁缴获的大批战略物资，撤离龙州、镇南关。白崇禧得知第一批回窜之敌逃脱，第二批又在返回后，唯恐增援昆仑关导致我军进攻失败，急电西路军总指挥韦云菘：“如再放

过第二批回窜的敌军，影响主力兵团方面的战局，该副总司令应受严惩。”（《广西文史资料》第25辑，第27页。）结果仍被敌军主力逃脱。地方部队习惯于保存实力、互相推委使日军获益。例如冯璜于11月22日接任175师师长时白崇禧对其交代：“现在大敌当前，第16集团军各部队长官间还闹意见，你见他们时，传达我的意思，请他们好好的以大局为重，放弃成见，共同抗日。”而16集团军司令夏威则交代冯璜：“抗战是相当长期的，不可把‘本钱’一下赌光。”（冯璜：《第175师战斗在桂南》，载于《粤桂滇黔抗战》第19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郑庭笈的迂回部队建立了功勋。他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只是没有明确证实是哪一次炮火所击毙。

我军第二次夺取昆仑关阵地。但不久又被日军夺回。

到23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二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六天战斗未获理想战果，而敌军援兵已从各地开来，形势不容乐观。杜聿明分析两得两失的教训，是日军在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致使我军攻击失败。于是决定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从外围攻击各据点，逐渐缩小包围圈。25日，荣一师第二团在团长汪波率领下，步炮协作，攻下罗塘南高地，全歼守敌二百余人。这是很重要的突破，杜聿明传令嘉奖。接着各师、团军心振奋，依次攻克昆仑关周边诸高地。

同日，日军台湾混成旅团之两个联队到达八塘，中村旅团的第42联队更到达九塘。中村正雄被击毙后，第42联队长坂田元一代理21旅团长。经白崇禧批准，杜聿明决定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歼灭这支日本精锐之师。于是除调回第5军全部兵力猛攻昆仑关之外，加配叶肇第37集团军所属之第66军妥魑　茉け付拥牡?9军两个师，将这五个师全部用于打击八塘以南敌人援军。28日，重新部署的陆军第5军加紧攻关，至30日，昆仑关周围敌据点和侧防机关基本肃清，关里的日本精锐之师“钢军”主力第21旅团已成瓮中之鳖！

我们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个攻坚战斗。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敌最坚固的据点。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杜聿明调拨给第200师指挥之郑庭笈荣一师第三团。28日晚该团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郑组织爆破手，以手榴弹塞进敌据点枪眼，该团九个步兵连，七个连长伤亡！郑庭笈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也中弹牺牲，郑庭笈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30日，新编第22师邓军林团胜利攻克昆仑关。

这是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说全歼第21旅团是毫不过分的：除击毙该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之外，还击毙了第42联队长、接任中村的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

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官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等；班长以上军官阵亡85以上；阵亡士兵4000人以上。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数字。（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68页。）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更多，在一万人以上，但基本干部仍健全。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了。

无论整个桂南战役最后失败得如何惨烈，昆仑关攻坚战都是光辉永驻的。中国军队抗击外国侵略军，能全歼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它的全部指挥官，尚无第二例。日军战史称之为："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参阅：《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619-626页。）

五、第三阶段，桂南会战的尾声

第5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并歼灭了第21旅团的两个主力联队之后，本以为可以顺利进军，一举收复南宁。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第21旅团的剩余部队、台湾混成旅团的第一、第二联队仍在九塘至八塘间。1940年1月1日中午，及川支队数千主力抵达八塘，今村均命令及川少将接替被击毙的坂田元一担任前线总指挥。

第5军向南宁方向继续进攻的第一仗便在昆仑关至九塘间的441高地打响。攻打昆仑关时荣一师便攻占了高地北侧，日军顽强守卫这高地的南侧。1日，日军飞机对高地北侧狂轰滥炸，步兵大举进攻。荣一师守卫高地的一个团加一个营，战至仅剩百余人，但仍坚守阵地。2日拂晓，荣一师举全部残余兵力反攻，激战一整天，毫无进展，双方仍旧维持原有阵地。3日，杜聿明调集200师主力及新22师一部协同荣一师继续战斗，战况更为惨烈，双方死伤都极为惨重。入夜，日军抵挡不住败退九塘，战斗结束。

4日，荣一师因伤亡惨重，奉命撤出战斗移师思陇休整。第5军继续进攻。而败退九塘之日军也奉及川源七命令，于4日拂晓放弃九塘撤退至八塘固守。国军新编第22师进驻九塘。第5军继续进攻八塘，日军拼死抵抗，战至12日，毫无进展。而第5军在经过苦战之后，伤亡甚重，人员疲惫，已经不适合战斗，于12日奉命转移至思陇、黄圩、太守等地休整。攻击任务移交姚纯的第36军接替。这样，国军第5军正式退出战斗序列。有人认为这是老蒋保存嫡系部队的举措，其实说不过去。第5军激战经月，伤亡惨重，本应休整。而战场上尚有20万中国军队，但这20万生力军上阵却毫无建树，只因日军固守待援，他们才得以维持原来的阵地。

蒋介石于7日飞桂林，10日亲临迁江，与白崇禧、陈诚、张发奎、徐庭瑶、林蔚等讨论下步作战计划。白提议：乘敌新败，援军未到，倾新到广西的李延年第2军、甘丽初第6军、姚纯第36军、傅仲芳第99军会同第5军等部队，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蒋批准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正当白崇禧发布部署命令准备开战时，返回柳州的蒋致白一封信，推翻头一天的会议上的决定。这样，白崇禧只好发出改变作战部署的新命令，中国军队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日本方面赢得时间从容部署直至发动反攻。

日本军部被中国军队的攻势震撼，派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从东京赶到广州；第21军于12月29日派军副参谋长佐滕贤了、作战主任藤原五，陪同日军参谋本部作战主任荒尾兴功、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宗作等到达南宁，但未能改变第21旅团的失败命运。鉴于今村均企图亲自上阵并以第5师团全力为第21旅团报仇，并打算1月1日与中国军队开始决战，21军军长安藤利吉命令其固守南宁待援："波集团（第21军）企图将有力兵团调至南宁，歼灭聚集于南宁方面的敌军。第5师团仍应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利转用兵团之挺进。"（《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515页。）7日起，调往桂南的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少将）共1.5万人从广州上船。10日日本第21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定于1月下旬在以宾阳以南地区决战。

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临时干预，白崇禧趁敌援军未到，全歼第5师团的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

1月14日，近卫混成旅团第4联队3000余人在钦州登陆。一部千余人于16日在钦县、灵山交界的泗合坳与46军175师524团（团长巢威）激战三昼夜，日军被击毙二百余人，并致使日军整个联队被46军包围。但日军虽伤亡惨重但主力仍由飞机掩护突围而去。顺便说一句，这个团在12月配合昆仑关战役的打援战斗中，指挥果断，士气高昂。该团主动出击，尽管日军有飞机助战，且施放毒气，渡边联队仍被击溃，联队长渡边大佐亦被击毙。残部逃回钦县，未能及时支援昆仑关之战。

另一路日军台湾混成旅之部队也于1月13日与西路军韦云菘部激战于塘报一带。但所有日军部队，基本上实现了在南宁周边的集结。如果执行1月10日乘胜攻击的部署，日军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反攻准备的。老蒋干预下级的军事部署，其后果可见一斑。而且昆仑关战役胜利所激励起来的战斗热情也因半个月的固守云消雾散，直至1月25日，白崇禧才在迁江指挥所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商讨对付日军大反攻的对策。27日，李济深、陈诚、张治中等也抵达迁江。

会议决定的军事部署为：徐庭瑶指挥第2军、第36军、第99军为中路军，固守九塘、昆仑关一带；以甘丽初第6军为右翼军，向三庄岭方向侧击日军；以叶肇第66军为左翼军，在甘棠方向阻敌（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35页）。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部署与10日会议决定的部署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个被蒋介石否定的决策，是个乘敌空虚迅速进攻的决策；现在实施的决策，则是被动挨打的防守决策。以中国军队的实力，灾难已经难免。

更要命的是，白崇禧没有料到日军会采取包抄战术。23日，安藤利吉中将亲临南宁指挥反攻。24日下达反攻命令。27日日军开始反攻：第5师团主力、近卫混成旅团主力、台湾混成旅团主力由今村均指挥沿邕宾公路向昆仑关进攻；第18师团全部和近卫混成旅团一部，由久纳诚一指挥，沿邕江南岸东进，在永淳渡江北上，迂回包抄昆仑关后路。尽管今村均指挥的正面进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但白崇禧发现：日军真正主力在甘棠方向！它极其严重地威胁了昆仑关一带的中国军队。

白崇禧紧急命令刚从广东调来的邓龙光第35集团军之第64军（军长陈公侠）急进甘棠；第46军率其主力175师

由江口北渡郁江，协同阻击进攻日军；另以第6军第49师南下武陵圩，企图阻止敌军北上宾阳。不过，这些措施均已太迟了！日军司令安藤下达命令决定2月1日开始总攻：“此次作战的胜败，即在明日一日之决战，望全体官兵努力奋战，期其必胜。”（《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一分册，第73页。）

蒋介石的错误更严重了，他恰恰在日军开始总攻的这天，即2月1日，命令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接替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临战易帅，此乃古今中外兵家大忌！张上任伊始即命叶肇第66军固守原阵地，并须侧击日军。他还命令所有增援部队向甘棠集结，预定2月2日向日军甘棠部队发动攻击！而此命令尚未传达到各部，日军的总攻就开始了！叶肇擅自命令所部稍微抵抗即向黎塘、陶圩撤退，根本不理会他们的防线背后没有设置预备队！这导致中国军队阵线彻底崩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向宾阳长驱直入，日军飞机又炸毁了设在宾阳的第38集团军总部，通讯中断导致战场一片混乱。2日下午，日军开进宾阳县城。

在九塘、昆仑关防御的第99军、第36军、第2军及第6军，失去集团军指挥各自为战；宾阳失守后路被断致使军心溃散，全都仓皇逃窜，沿山间小路各奔东西。3日，今村均部队顺利夺取九塘、昆仑关等阵地。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郑作民中将在撤往上林时中炮身亡（《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4日，日军占领上林，6日占武鸣，7日占黎塘。可怜第5军将士浴血奋战半个多月才攻占的地盘，顷刻间灰飞烟灭。

2月4日上午，安藤利吉到达宾阳，当晚宣布“宾阳会战已结束，应将兵力集结南宁附近”之命令，到8日，日军各部停止追击，返回南宁。血战过的昆仑关上，日军题大幅标语留念：“我皇军击溃蒋军三十余师，已璧还宾阳、昆仑关各地。”

六、结局

日军于2月14日把第5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台湾混成旅团组合成为第22军，由原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担任军司令官，而该师团则调回广州。于广州新设立华南方面军司令部，安藤利吉任司令官。因为兵力有限，第22军放弃许多地方，仅由第5师团占领南宁市及附近十公里地带；近卫混成旅占领邕江南岸；台湾混成旅占领邕钦公路各要点。

2月21日，蒋介石飞到柳州，下榻于羊角山。即有汉奸密报，当晚日军飞机轰炸羊角山蒋之住处。22日蒋主持检讨会。25日会议结束时，蒋宣布：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政治部长陈诚指导无方，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

第36军军长姚纯撤职查办；

第66军军长陈骥撤职查办；

第99军军长傅仲芳撤职查办；

第36军参谋长郭肃撤职查办；

第49师师长李精一撤职查办；

第160师师长宋士台撤职查办；

第9师师长郑作民已阵亡免究，该师番号取消，改无名师；

第135师师长苏祖馨撤职留任；

第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

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记功一次；

第46军军长何宣记功一次；

第76师师长王凌云记功一次。（根据程思远《政坛回忆》等资料汇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薛岳，外号“老虎崽”，一个农民的儿子。只有10岁便进入黄埔陆军小学，13岁毕业便加入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乱，就是薛岳冒着枪林弹雨救护宋庆龄逃离虎口。1927年“412”之前，他曾建议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当反革命抓起来！”结果他又成为围剿红军的干将。杨成武上将在晚年回忆湘江战役时曾说：“我这把老骨头，差点埋在湘江边上了。”此言非虚，他当年身负重伤，是爬回部队里去的。那一仗，长征的中央红军从八万五千人打成三万，而主攻者即是薛岳。还是杨成武上将，1987年5月在文章中写道：“对他们（指民国将领）的历史坚持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是功绩就讲功绩，是过失就讲过失，一段时间有功就讲一段时间有功，一段时间有过就讲一段时间有过。”

我们说薛岳是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是指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将，仅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曾经是老战友也曾经是死对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则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遗憾的是，许多年来，何谓万家岭大捷，似乎没多少人知 晓了。

按下薛岳在松沪抗战、长沙会战中的战功不表，本帖只谈薛岳在武汉大会战中的战绩。

1938年7月，日本开始进攻武汉外围广大地区。大战总司令为畑俊六大将，投入陆海空三军35万兵力，另以新增调40万大军配合作战。调动飞机500余架，军舰120余艘，作战经费32.5亿日元。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说：“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188号、参谋总长第250号命令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攻占汉口附近地区”；第二，“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日本天皇的命令明确表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国民政府则调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蒋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极其悲壮的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不过他也强调了另一个目标：“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地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战至7月26日，张发奎九江失守。8月1日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奉命指挥九江至南昌以及鄱阳湖周围战事。他把7个军的兵力部署在德安、瑞昌、庐山地区，摆下一个他自称为“反八字阵”的阵势，迎战冈村宁次的

第11军。薛岳说："我这个反八字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左应，犯左则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8月3日，敌106师团沿南浔铁路南下进攻南昌，到达庐山西麓马回岭附近，遭到以金官桥为主阵地的薛岳部队迎头痛击，薛岳命令第70军、第8军、第4军参战部队不许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从事！日军以战车、飞机、大炮配合步兵强攻，兼以施放毒气，硬是不能越雷池半步！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持续到15日，双方均死伤惨重，但106师团已处于薛岳部队包围之中，师团中小队长半数伤亡，敌113联队长田中大佐、145联队长川大佐均阵亡于金官桥前沿。后来缴获的敌军日记记载："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还有一个专科学校毕业的士兵日记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19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困难的。"

第106师团被歼灭半数，达8000人以上！冈村宁次命令第101师团配合海空军，从星子方向沿德安、星子公路进逼德安，企图包围薛岳部队的侧后，切断南浔路。但此计被薛岳识破，他命令王敬九将军率领的第25军两个师，严守星子和隘口镇，迎击伊东正喜中将率领的101师团。薛岳命令王敬九，坚守的时间越长越好，为第1兵团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王将军的25军在星子镇坚守了七天七夜。鉴于星子阵地已被日军全部摧毁，坚守已无意义，薛岳命令王撤退到隘口，而且此前薛岳已命令29军两个师、66军两个师布防隘口。第101师团进攻直到9月底，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联队长饭国五大郎大佐被击毙，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打伤送进医院，师团伤亡过半。冈村宁次只好命令101师团停止进攻，另增派第27师团从瑞昌、武宁方向进攻，以解救第106及101师团。薛岳立即调集部队，并电令各守军指挥官："不能坐以待毙，要组织部队实施反攻。"

我国军队发动反攻，在麒麟岭全歼27师团铃木联队，第160师也在三角尖歼敌800余人。第106师团乘我军调集部队迎击第27师团之机，迂回万家岭，企图解救陷入绝境的第27师团及自己。薛岳又一次料到敌这步险棋，于是命令：

第74军第90师由大小金山向万家岭及其东北之敌攻击；第58师由狮子岩向万家岭、王家山之敌攻击；第142师攻击石堡山之敌；预备第6师攻击王家山靠石堡山方向之敌；第91师一旅迅速肃清头口附近敌人，协助预6师攻击并切断敌人北逃之路；新13师以一个团攻击何家山、凤凰山、石堡山西北之敌。

各部队于7日开始总攻，10日结束战斗。除106师团有千余人逃逸之外，其余日军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俘虏300余人。这是中国军队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而在整个武汉保卫战过程中，日军却未能全歼我军一个师。

薛岳在整个战役进行期间，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他让部下安置一张行军床，疲倦至极就在床上迷糊一下。战事紧张或遇到苦战，他便亲临前线指挥，"硝烟起前，弹雨纷集"，随从们都万分紧张，他依旧"指挥泰然"，全然不顾任何危险。

万家岭战役的前敌总指挥为第九集团军司令吴奇伟。和薛岳一样，吴奇伟也是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有次他正与第四军军长欧震通电话，敌机俯冲扫射，吴奇伟毫不理会，直至敌机把他的电话机打碎。战斗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第74军，万家岭战役打响之前，蒋介石致电薛岳，要他把伤亡惨重的74军调到长沙休整。薛岳回电："调不下来。"蒋二次来电："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薛回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好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势，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时任74军军长的是老蒋的奉化同乡俞济时，俞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便率领第88师重创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进攻，俞被敌子弹穿腹负重伤。刚归属薛岳指挥时，俞也曾有怠慢之举，薛岳正色警告俞："你要敢后退，就军法从事！"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79师。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

万家岭战役中，该军第58师由冯圣法将军率领，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全师几乎伤亡殆尽，冯师长为守住阵地向俞求援，俞只得把军部警卫营派出两个连前往增援。该师终于扼死敌106师团之退路，保证了万家岭合围成功。该军另一个师为王耀武将军第51师，该师在据守岷山阵地的川军不战而逃时，奉薛岳命疾驶堵住缺口，浴血激战7昼夜，使飞机大炮助战的日军不得前进半步！万家岭战役，该师奉命攻占张古山，王耀武观察地形发现，该山易守难攻，却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必须夺占，但势必伤亡巨大。第305团团长张灵甫提议出奇兵从山后绝壁攀援突袭，配合正面进攻。于是亲自带领精兵上阵，果然灵验，很快占领该山。因此阵地对日军突围至关重要，以飞机重炮攻击，51师只得退下，入夜又夺回，经五昼夜反复争夺，张灵甫带伤坚持战斗，终于牢牢控制该阵地。这个争夺战，日军仅遗留阵前尸体就达四千多具！可以说，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

1939年冬天，田汉以此战役编剧演出，激励了无数中国抗日志士。因为此战中第74军打出中国军队的军威，田汉作词、任光谱曲，创作了《74军军歌》："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因战绩辉煌，王耀武提升为74军军长，张灵甫升旅长。年底驻长沙时，在著名的长沙大火中，74军帮助百姓在灰烬中重建家园，张灵甫更是亲自率队伍帮助百姓。

1939年6月，黄埔三期学员王耀武接任74军军长，1941年春74军参加江西上高会战，歼敌15000余人，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罗卓英称之为"抗日铁军"。74军亦获得"飞虎旗"这个军队最高荣誉。张灵甫亦升任58师师长。随后，王、张率部参加了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均取得辉煌战绩。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张灵甫接任74军军长后，1945年初，74军担任主战部队，参加了湘西著名的雪峰山战役，歼敌28174人。如果评价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74军堪称出类拔萃。不过，无论薛岳还是王、张，皆属"外战内行，内战外行"之辈。抗战结束后国共整军时74军改为74师，1947年5月，74师覆灭于山东孟良崮。此乃后话。

薛岳指挥的万家岭战役，取得辉煌胜利。而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大会战期间，虽未能保住武汉地区，但实现了

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彻底粉碎了日寇企图把蒋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阴谋，奠定了持久抗战的基础。日本“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企图再度落空，日军自1937年7月中国抗战至1938年底，共伤亡14万余人，从此不得不陷入蒋介石“持久抗战”的泥沼里不能自拔，直至战败投降。

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蒋介石，盛赞政府及蒋本人之抗日决心与辉煌成就，这封由周恩来带到武汉的信件，未载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故全文刊介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惟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先生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毛泽东此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武汉大会战的伟大意义。而薛岳则是本次会战中战绩最辉煌的大将，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大将军！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本文作于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前。为尽量真实准确，又反复核对了各种文字资料，作了较多的修改和充实。力求准确。但仍难免错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与有兴趣探讨的朋友们共同摸索。欢迎指正。---作者2001.10.25

朝鲜战争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

朝鲜战争爆发五十年了。对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战争，我们从来就是以伟大胜利来庆贺的。美国佬似乎也承认失败；麦克阿瑟被撤职后到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国在朝鲜遭到惨败。"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时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将军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尽管我们的宣传中，把他对美国政府的不满部分省略掉了，但毕竟"没有胜利"仍是事实和他的本意。不过布莱德雷在美国国会为反对麦克阿瑟全面进攻中国的主张而说的一句话："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却被掐掉了前边17个字，张冠李戴地说成是对朝鲜战争的评价，却是断章取义的。

从军事意义上说，除了抗日战争与盟国军队共同取得胜利之外，中国军队在几乎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以劣势的武器，完全靠自己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及陆军打了个平手。尽管我们"动员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力量发起攻击。"（彭德怀语）而美国佬只是"把它定性为一场有限战争"（马歇尔语）。不过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毕竟没有先例，当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凝聚力与自信心。在那场战争中，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用热血与生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是足以"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问题在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政治意义上说，我们从中究竟获得了什么？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值得吗？

于是探讨这场战争的起源及中国参战的意义，近年来成为热门。苏联解体之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特别是叶利钦访问韩国时，把一大批关于朝鲜战争的秘密文件作为礼物交给韩国，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公开了一些与此有关的档案。曾被称为世纪三大战争之谜的朝鲜战争被剥去了许多面纱，渐露端倪。俄罗斯公开档案以后，人们发现，斯大林主义原来竟然是以阴谋和谎言构筑的大厦！无论是对敌人、朋友、同志甚至自己的亲人，全都如此。它的突然坍塌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先生，却鬼迷心窍："一边倒"，也就难怪他自建国以后便一错再错，直至文革。

国内也出版了许多关于此战的专著，本人在关注它的过程中，发觉多数著作依旧在重复过去的故事。作者们似

乎只是为了圆一下因俄罗斯公布档案给我们造成的被动而已。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作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重要情况，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忽略”掉了，这些著作不过是在历史真像大潮面前加修一道防洪堤而已。历史证明，朝鲜战争完全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抗美援朝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个必然举措。与“中国受到威胁”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毛泽东为斯大林火中取栗的行动，是毛为他的“一边倒”所购的门票罢了。

一.谁是傀儡

我们的宣传一直称大韩民国是美国扶起来的傀儡，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的朝鲜依附于中国，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让朝鲜“独立”，日本成为宗主国。而沙皇俄国也乘机渗入，争夺这块领地。朝鲜国王李熙为避免亡国，于1897年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即强迫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国权。1910年日本进一步强迫签订《韩日合并条约》，宣布废除韩国国号，改称朝鲜。成为日本的一个殖民省，派遣官吏，废韩文讲日语，韩人一律改日本姓氏。可见，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定的国名，朝鲜却是日本人强加的国名。

其实，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使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起，如金九、安重根等爱国志士就开始反日活动了。金九刺杀了日军中尉土田，被判死刑，1898年越狱；1907年10月26日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1902年起安昌浩组织的一系列抗日复国组织、行动等等。1919年1月22日，日本殖民当局毒死了李熙，3月1日韩国爱国者发动了“三.一起义”，发布《独立宣言书》宣布独立。在韩国218个府中有203个府举行了1491次示威和暴动，抗日浪潮席卷全国，200多万人参与其中。中国的革命者也积极声援，陈独秀连续著文声援，毛泽东的《湘江评论》亦在声援的行列中。北京学生在5月4日宣言中，盛赞韩国人民“不独立，毋宁死”的爱国精神，各地学生的演讲均以韩国为例，不能“五.四”运动与韩国的“三.一起义”没有关联；甚至不能否认它对“五.四”运动的激励作用。到5月31日，日军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一些主要起义组织领导人流亡到中国。1919年4月11日他们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协商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政府设在马当路304号，并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21号挂牌办公。8－9月韩国境内和海参崴的六个地下政府陆续迁到上海，统合成为一个流亡政府，因为六个政府成立时都委任李承晚任总理或总裁，他被推举为“大统领”。但因无法调解严重的派系之争，1921年6月出走美国。1926年12月，著名的爱国领袖金九出任国务领。这个政府在中国从事抗日复国活动27年。二战中对日宣战；后来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就是淞沪抗战之后，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庆祝天皇生辰典礼上，被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断腿的。此次行动由金九策划。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特务头子河端巳毙命，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村井总领事均受重伤。

这个政府代表了韩国人民的意愿。因此被中国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确认为正统的流亡政府。1941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东方反法西斯大会，金九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积极促

成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议案，周恩来担任中韩文化协会名誉理事；朱德也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临时政府并呼吁其各派系团结。1944年7月4日中共《新华日报》发文称：“韩国临时政府是当前能够代表韩人的惟一的统一的政府；同盟国能够迅速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援助韩国光复军……这是打击日寇当前这种企图的必要措置。”韩国临时议政院第36次会议通过新宪章并选举新临时政府阁员后，《新华日报》发社论给予热烈祝贺：“韩国实现了民主团结，不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发展史上有光辉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的民主浪潮中，在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还设宴招待当选阁员及各部长。1945年11月日本投降临时政府归国前夕，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欢送，并祝愿他们回国后大有作为。金九、金若山、洪震等政府成员全部到场。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私交甚笃，例如《独立宣言书》起草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海公（申冀熙）。海公的儿子王河均（申河均）与郭沫若还是连襟。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特地安排还在上海的王河均夫妇在市政府机构工作。1950年大韩民国“伪议长”海公尚托周恩来劝王河均返回汉城助他竞选总统，周恩来嘱郭沫若动员王河均从父命回韩国，后为韩国议员；其妻、子则因朝战爆发一直留在上海。可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并不曾把韩国看成伪政权的。

至于韩国政府是在美军占领韩国南部之后才回到韩国，并不能成为伪政权的理由。如上边介绍，正是周恩来设宴欢送这个“伪政权”回国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使苏联，也是接受了美国大量援助才得以缓解希特勒的攻势的，这一点就连斯大林也不否认。美军自己还同时在地球两面开战，美军是反法西斯正义之师的主力。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没有美国的参战，打败法西斯、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因为弱小的大韩民国政府随美军返回就成了伪政权，那么，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是伪政权。而东欧国家也是伪政权，他们都是苏军一手炮制的。特别是金日成，“三.一运动”时还穿开裆裤。他本人就是苏军上尉军官，率领数十名苏联籍朝鲜族人随苏军回到北朝鲜。

相反，按照朱德命令：“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这7个支队数千名在中共领导下，身经百战的老资格朝鲜革命战士却被苏联红军禁止进入朝鲜，除少部分人经艰难交涉回国之外，绝大多数人只能留在东北，最后发展中国朝鲜族人成为东北解放军166、164、156师，参加解放战争。直到金日成的王朝组织好之后，为发动朝鲜战争才被接收。后来其中的主要干部基本上被金日成镇压了。

金日成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给的，也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更是不折不扣的伪政权。他莫名其妙地给自己封了一个“首相”的头衔，还用君主制的称谓来安排他的政府。那皇位大约就是留给斯大林的。朝鲜人民军也是苏联红军给组建的；装备由苏联提供，人员更是苏联一手调教的，直到韩战爆发。

二.历史根源

朝鲜战争爆发是有历史根源的。在二战中，1943年12月开罗会议美、英、中三国首脑宣言要使韩国独立。这次会议斯大林以苏、日互不敌对为由拒绝参加。其实，苏、日之间1941年4月签订过《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满洲国”还与“蒙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苏日两国共同宰割中国，并约定互不侵犯。二战期间双方都很守约。这个条约签订时，德国尚未进攻苏联，却使日本得以腾出大量兵力挥师南下，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美国、东南亚诸国。到1945年，日本海、空军和太平洋各地的陆军几乎全被美军消灭；美军攻占了硫磺岛和冲绳，解放了菲律宾；中美英联军攻占仰光；泰国反目向日本宣战；中国政府军展开了反攻；英军也打回了东南亚。日本在1944年便自知败局已定，一直在谋求苏联为其体面投降向美国说情。斯大林很清楚日军早已不堪一击，他只是在选择最佳时机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利益而已。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根据麦克阿瑟为减少美国人的牺牲、劝说苏联出兵的提议，罗斯福力劝斯大林进攻日本。麦克阿瑟一句话道出了美国佬的心态：“俄国参战是受欢迎的……每死一名俄国人就可少死一名本来要战死的美国人。”其实，尼米兹等美军将领认为，日本是个岛国，美国应该进攻台湾、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并打击日本本土；实施海、空军封锁，切断日本在东南亚的战略补给线，就足以迫使日本投降；完全不需请苏军参战。据此他们提出了“铺道”计划。可是麦克阿瑟想独领战败日本头功，并雪清他在菲律宾战败逃亡的耻辱，坚持“跳岛作战”，先进攻菲律宾等南洋岛屿，排挤尼米兹，只把海军当成他的登陆工具。当他领教了“武士道”的顽强，并被美国舆论指责为“挥霍美国青年的生命”之后，便极力主张让苏军参战。

1945年2月10日，莫洛托夫向罗斯福提交了《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这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遮羞布以掩盖他沙俄专制与扩张真面目的大师，不但要求美国必须在6月30日以前提供并运到86万吨粮食、220.6万吨燃油、150万人的武器装备、3000辆坦克、75000辆汽车、500架飞机；并全然不顾列宁早就宣布“把沙皇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都还给中国”的声明，以及他自己同中国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规定，要求从日本割让日俄战争中从沙皇手中得到的原中国领土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继续占踞中国的外蒙古；还要回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所有特权。为拒绝苏军进占北海道，罗斯福不光承诺全部供给援助物资，还慷他人之慨，背着中国让斯大林轻易得回了沙皇在1905年失去的一切；更重要的是，给了斯大林无约束东扩的机遇，为朝鲜战争奠定了基础。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艾森豪威尔再次奉劝杜鲁门不要请苏联对日出兵的意见被否决了，杜鲁门终于获得了斯大林定于8月15日出兵的承诺。但中、美、英对日通牒《波茨坦公告》苏联不愿参与。当8月6日广岛挨了原子弹之后，8月8日苏联急忙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旋即于9日出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貌似强大的关东军，因其主力早已被调往南亚等其他战场（例如山下奉文大将率领的三十万大军，绝大多数就是从东北调来的，包括山下奉文本人。美军菲律宾决战自1945年1月6日开战至9月2日山下奉文投降才结束。共击毙日军59.2万人，是日军所有战例中阵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所谓苏军8月30日歼灭东宁堡日军为“二战最后一战”并非历史真实。），乃至苏军进军东

北时，战斗伤亡还不如喝醉酒驾车伤亡大。而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中共高官、曾协助贺龙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卢冬生将军也被抢劫的苏军士兵杀死。而中共只是“以大局为重”，称他“因公殉职”。毛泽东1949年底到苏联求来三亿美元贷款，还不到苏军在东北抢掠去的30%。不过，正如刘少奇所说：“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作得对的。”中共并不心疼。后来，杜鲁门后悔地说：“假如我们事先知道原子弹的威力，我们就决不会让这头熊出头露面的。”日本天皇裕仁也承认：正是原子弹轰炸使日本同意无条件投降的。

历史常会令人啼笑皆非：1.雅尔塔会议上，美苏都不想要韩国；美国提出美、中、苏共管韩国25年后和平选举政府，斯大林要求加上英国并缩短托管时限，达成四国共管协议。2.如果不是罗斯福坚持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早就投降了。而日本投降的唯一条件与罗斯福的无条件竟都是：保留天皇制！3.广岛的原子弹因为威力太大，炸毁了所有通讯设施。日本高层居然不知道！等到广岛的消息传到东京，长崎又被炸，24小时内日本就决定无条件投降了！4.1945年8月10日美国发布第一号受降令，规定苏军负责北纬38度线以北，美军负责该线以南接受日军投降事务。斯大林8月16日复电同意这道受降令。匆忙中是由美军一个叫查尔斯.H.博尼斯蒂尔的上校军官划出“三八线”来的。他的依据是：多数地图都有这条线。假如他把受降线划在鸭绿江或对马海峡上，人类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了。

三.韩国是如何被分裂的

苏军到达“三八线”时，一开始斯大林并不要求在北朝鲜建立一党专制的制度，因为北朝鲜没有实行这种制度的基础，成立于1925年4月的朝鲜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共产国际被斯大林全部枪决了，朝共留在朝鲜坚持战斗的朴宪永几乎没有什么实力。而且，这与他当时在东欧的步调一致。斯大林当时在欧洲还没有与美、英翻脸，他提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主意，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及金日成一律执行。美、苏、英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托管全韩国五年，然后选举统一政府的协议。

但随即苏联在东欧各国开始了清洗行动，斯大林开始营造大苏维埃帝国，于是不再与美军共管，而是像他正在德国所做的一样，封锁了“三八线”，毫不客气地拒绝任何统一托管和全韩国普选的建议。苏联红军朝鲜支队长金日成以驻朝苏军司令史蒂科夫中将作后台，成了北朝鲜的主宰。金日成以合并为名取消了他曾经加入过的朝共，另成立朝鲜劳动党，在北方推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制度。建立朝鲜革命军，由苏军提供武器装备并进行训练。美国则接回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流亡美国的李承晚。韩国一下子冒出70多个政党，争吵个不停。这样，美苏分别在韩国南北方设军政府。而南韩大多数团体和政党都要求直接独立，反对托管。所不同的是，他们主张普选政府，而金日成要搞专制。

美国在托管不成的情况下，1947年8月干脆把韩国事务踢给联合国。10月18日美、苏联合委员会宣告解散。到11月14日，二届联大通过决议，由不包括美、苏在内的九国组成“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UNTCOK)，监督建立全韩国议会并选举统一的政府。这本是韩国和平统一的良机，但入选该委员会的乌克兰代表却奉斯大林之命拒绝参与。1948年1月，印度代表梅农率联合国委员会赴韩，安排统一选举事务。苏联禁止在北朝鲜进行选举，不允许联合国人员入境，他们只得在汉城考察后返回。

1948年2月26日，联大临时委员会通过决议：“允许朝鲜在尽可能到达的地方继续选举。”事实上只能是南韩。1948年4月22-23日，在苏联的指使下，金日成在平壤召开了南北方抵制联合国主持选举大会，鼓动南方与会的温和派与北方一起抵制选举。5月9-10日韩国人民在许多政党抵制参加选举的情况下，选出大韩民国议会，再经议会选举，李承晚在无强劲对手参选之下被选为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9月9日，金日成宣布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此，韩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选政府的愿望彻底破灭。

1948年美苏商定双方撤军。苏军并不象宣传所说，早在1948年就撤完了。3000余名苏军顾问安插在连以上部队里，指挥各级人民军一直打到釜山，直到美军仁川登陆后才慌忙撤走。而美军在南方的顾问按金日成的说法为500名。我们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文章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上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说明：造成韩国国土分裂、民族骨肉分离的正是斯大林及其豢养的金日成！只因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所以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以意识形态同异作为判定是非的界限，成为我国长期奉行的宗旨。抗美援朝也就是在这个宗旨下施行的。

美军司令霍奇将军把北韩不断加强军力的情报上报了美国政府。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后断定：“朝鲜的战略价值不大。”1948年4月，杜鲁门总统定下国策：“美国不应这样不能自拔地卷入韩国局势，以致于韩国的任何派别，或在韩国的任何别的国家采取的某些行动都会被认为是美国开战的借口。”霍奇将军又建议建立南韩军队使之与北韩军队平衡。麦克阿瑟答复：“我认为在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不应做出最后决定。美国在此刻单方面采取行动会同它向联合国提出的建议不协调一致。”美方没考虑捍卫南韩，对韩国军警力量也不愿加强，以防韩国进攻北方，因为韩国方面叫嚷进攻北方的人也不少，特别是李承晚。但这位狂妄的独裁者并无实力，到1950年6月，韩军八个师只有四个接近满员，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都没有。24架教练机。军人全是些既没打过仗又没经过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三八线”上磨擦不断，金日成的游击队甚至深入南方腹地，从事恐怖活动。

美国佬面对韩国乱七八糟的局势，只想抛开这个包袱。华盛顿甚至指示麦克阿瑟：“一发生动乱就撤出美国平民和军事人员。”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国务卿公开发表美国亚洲政策声明：美国的环形战略防御圈不包括台湾和南韩，甚至说：“事情显然很清楚，没有人能确保这些地区不遭受军事进攻。”艾奇逊这番话后来被美国朝野追究。而他这样说原想给中国一个信号，即解放台湾美国不会干涉。其实麦克阿瑟早在一年前就对英国记者说过同样

的话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诱使毛泽东，期望他不要投入斯大林的怀抱。没想到毛泽东只顾“一边倒”，不予理会，金日成却动真格了。从1950年1月至5月，南韩不断向美国以及联合国告急，强调北方的进攻迫在眉睫，却并无人理会。

四.大苏维埃帝国的扩张野心

而斯大林决定攻打韩国亦非偶然。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斯大林宴请铁托时说：“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二战结束后，欧洲是一片混乱与贫困景象。极少演讲的斯大林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突然发表的公开演讲中宣称：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他预测这将在20世纪50年代爆发，那时美国将会处在另一场经济萧条的深渊中。为此他命“消费品的生产须让位于改进军队装备”。

他的这个演讲震惊全世界，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但在我们的宣传中，从不提这次演讲。接着他对莫洛托夫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我们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结束它。”斯大林随即撕毁了他在雅尔塔的承诺：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国家建立民选政府。他下令杀害了大批东欧各国民主派领导人，以及看不顺眼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东欧扶植起代理人政权。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针对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恰如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从被进攻者的抵抗开始的。”丘吉尔这个演说被称为冷战的开始。1946年5月9日，苏军在英、美的压力下迫撤出伊朗。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也发表了。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欧各国从战后的饥饿与混乱中恢复过来；1948年2月在已经建立了民选多党政府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军帮助捷克共产党发动政变，推翻了合法政府。又指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共产党国家出动“志愿军”帮助希腊、伊朗和土耳其的游击队夺权，只是由于英、美干涉未能如愿。而奥地利的夺权活动也因美、英、法占领军的强硬态度未能成功。斯大林坚决阻挠德国统一选举，并在1948年6月24日，下令苏军全面封锁西柏林，1949年5月柏林封锁失败；《北大西洋公约》匆忙签订，把西方国家绑在一起；而铁托的背离无异后院起火。斯大林预期的大萧条没有发生，美、英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欧洲搞共产主义扩张的打算遭受挫折。美、苏冷战，苏联输了一回合。

1949年9月，苏联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至少提前几年被打破了。就在此时，中国的革命取得了奇迹般进展，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最担心的美国干涉并没发生，美国佬反而灰溜溜地撤走了。莫洛托夫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斯大林站在刚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前说：看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了。波罗的海沿岸现在重归我们所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都集中了。西边一切正常。看看东边，“千岛群岛归我们了，

萨哈林岛也全属于我们了，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他接着用烟斗在中国一带划了一圈，“中国、蒙古-----一切正常。”再接下去，他说：“但是我完全不满意这里的边界。”然后说出了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利比亚……。

五.中苏同盟条约与朝战的关系（关于这一个问题，本人另有“也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一文，可参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斯大林的提议下，提前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毛泽东立即出访苏联。许多文章称，毛访苏时，斯大林不愿签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最后因印度、英国、缅甸要与中国建交，毛泽东于1950年元旦告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后，斯大林改变了态度。

现在有资料表明，此情况不确。

事实上，早在1949年12月9日，周恩来就告知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最近印度、缅甸，可能还有英国，有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代办问：你们是否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周答：是从英国和香港得到的更可靠的消息。该代办立即上报了。在苏联当年的档案里，他上报的日期是：1949年12月9日。而当时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都由斯大林亲自掌握的。葛罗米柯只因人民币与卢布汇率报告没经过斯大林，斯大林就要贬他到英国去当大使。这样可知，如此情况斯大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其次，英国内阁也于12月15日批准了承认新中国并取消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决定。16日缅甸也宣布要与中国建交。此时毛尚未到莫斯科。这些早就不成为秘密，因此，以斯大林获悉英国等要建交就改变态度是说不过去的。

而原来关于斯大林于1950年元旦突然改变态度，主要是毛泽东回忆的。他说：“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他们分别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这一点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毛的回忆与猜想，未必准确。一个例证是，1956年他对苏联大使尤金说到1949年12月24日第二次与斯大林会谈：“我旧话重提，并向斯大林展示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便趁机利用这个建议，把它当作借口，推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可是依据资料写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中，关于此次会谈的记录为：“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而且，毛所说的中共中央21日电报也无任何重订条约的字句，甚至对借款、航空、通商协议都没抱很大希望。

事实上，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给毛的电报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可见，斯大林是想等对日和约签订后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刘少奇7月访苏时，18日电告毛：“斯大林认为，我们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

题。”毛赴苏前多次电报往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到苏联是想订条约的。但斯大林从未同意签订新条约，毛当然不会抱多高的期望。

12月16日他头一次见斯大林，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颇有游子归家的情调。还说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去。现在的舆论，一片声地指毛意为中苏友好条约。其实毛早就知道，斯大林从未同意另订条约，心里很怯；明明“既好看、又好吃”是老毛不敢直说自己的企盼的托词，犹如孩子想吃糖又不敢对大人明说的托词一样。可是中国的御用文人们却在那里恬不知耻地瞎吹“中国人特有的幽默”、“高超的外交技巧”等等。

接下来的会谈，斯大林以1945年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签订的为由，“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只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的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对于周恩来到莫斯科，斯大林只表示“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的舆论称“毛泽东很不满意”。记录显示并非如此。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想不通。毛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18日毛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语气并非不满，反倒显得感觉不错，自称会谈“情意恳切”，解释了原委后称：“请你和恩来同志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定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签订新条约已不在毛的计划之中了。他又于19日致电刘少奇把国内对他访苏的反映摘要电告。倒是刘少奇这边失望更大一些。21日复电中称：“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视毛所称“简单通商协定”不过是“一个声明”而已。

已知的是，科瓦廖夫12月24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他们始终对英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幻想，为了不激怒英、美，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国工会参加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英美势力较大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这份报告的情况是高岗向科瓦廖夫反映的，而高岗曾在同刘少奇访苏回国后，被刘大骂“卖国贼”。

又联系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干部12月13日向苏联报告：中共领导人存在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相信，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无须走苏联或西方走过的路。相当多中国青年认为，苏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也同中国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和大连弄到手。中国一些领导人公开表示应该容忍资本主义存在。

更往前，11月17日，李克农向罗申大使提过，美国有一个有意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共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且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

这些不可能不对斯大林产生影响，他极不希望中国亲近西方国家，并希望中国成为苏联集团之一员。但鉴于铁托的背离，毛泽东是东方铁托的可能性较大，斯大林有顾虑。对于中共要求帮助解放台湾他一再拒绝，惟恐毛泽东会无后顾之忧

从新条约的文件看，对苏联有利的方面恰如苏联学者贡恰洛夫所分析的："苏联和中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这种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而形成的。对于苏联来说，这项条约具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的边界处于安全和友好状态，也保证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与中国结盟的军事战略意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的1950年10月就已显示出来。""我们也不应忽视，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强迫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这项条约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根据秘密协定的条件，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

那么对于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说："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以后毛自己也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

苏联只失去局部利益，却得到战略性的利益，极大地增强了它对美国冷战的力量。何以斯大林却不肯签订呢？此时的斯大林，恰是为铁托集团伤脑筋的时候，他甚至考虑派人去暗杀铁托。因而对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铁托心存疑虑。签不签这个条约，斯大林是费尽脑汁的。他专门叫来国际法专家，探讨签约的负面影响。权衡签与不签的利弊。他其实只有一个疑虑，那就是毛会成为又一个铁托。如果毛是忠诚的，此条约无疑对斯大林是求之不得的。他在欧洲冷战的失利可从亚洲扳回来，特别是美国控制了日本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苏联能在欧洲之外首次获得有实力的盟国，而这对于能与美国抗衡是必不可少的！新约换旧约，失去的是本来就不会永久的旅顺大连，得到的是整个中国结盟。

权衡之后的斯大林，1950年元旦这天傍晚主动派人送来2日就见报的毛《答塔斯社记者问》，明确写上了"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quot;。斯大林一揽子全同意了，这使毛极其意外。后来他说："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就是说，决定签订新的条约是在毛已不抱希望之后，斯大林自己决定的。既没因有人要建交，也不是毛极力要求，而是斯大林觉得用得上毛泽东了。次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起到毛住处，询问关于新条约的意见。毛虽然知道斯大林态度有变，但还不很放心，谨

慎地说了签新条约的好处，也提出另两个不签的做法，这样周恩来就不用来了。莫洛托夫立即说前一个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说：“是的。”于是就自顾自地计算周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所需要的时间了。显然，他是有令在身的。毛当晚极兴奋地把这些情况电告北京。

斯大林为了笼络毛泽东，把科瓦廖夫那个报告以及高岗向他提供的其他情况当面交给了毛。这等于卖了高岗。也促使毛站稳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但其他苏联领导人并不知斯大林的算盘，如1月6日，毛向维辛斯基谈新条约时，维辛斯基就明确表示对此举的担心：会给美英两国造成口实。而毛也明白。为表示他的坚定立场，13日就批准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兵营（当然苏联除外）；接收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而这些物资原来司徒雷登要送给中共被拒绝了的；以及将美原驻华所有领馆全部挤走。

他把此事告知苏联，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境”和“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如果我们再注意到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解放台湾美国不会干涉；艾奇逊1月12日关于把台湾划出美国防御圈，甚至说没人保证它不会受到军事攻击的公开声明。毛此举就明显是向斯大林表示要同美国势不两立、全心全意投靠苏联的决心。而这恰是斯大林要求的。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斯大林是极不想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而毛泽东也心领神会，立即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8月14日起一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文章，宣告与美国誓不两立。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发表文章批判日共中委野坂参三，而野坂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并肩战斗的日本反战同盟领袖。毛还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社论，批判野坂的议会道路言论。并特意让人将此文译成俄文，专门送交斯大林审阅。以表示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

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些东西了。中方虽然提出签新约，但并没抱太大希望，遭拒绝后实际上已经绝望，到20日周恩来抵莫斯科，中方连条约草稿都没有。而苏方1月5日便作出了第一稿，未与中方协商之下到1月16日，已六易其稿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在内，所记载的周恩来起草条约新文本、并加上互助两个字、还得到毛的赞赏的说法都不确。在前苏联档案中，已通过苏共中央批准的第六稿基本与实签条约无大出入，标题与实签条约标题相同。除此之外　辗交古　剂肆硗馐　桓鲂　椴莅浮Ｌ踉济环讯啻罅ζ　　蟹揭惶炷诰屯ü　要?月31日文字最后定稿。而其他附件、协议则费了较多周折。

话题再回到与朝鲜战争有关的内容上来。注意到斯大林1月22日与毛、周的谈话，为免断章取义之嫌，我们把这段话全文照搬。当毛说新条约会否牵扯到雅尔塔协定时，斯大林回答：“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让它见鬼去

吧！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你们觉得哪种方案更合适，我们就采纳哪一种方案。”（重点字是本人特意标出的。）

这段话中重点字体部分说明，此时斯大林已决定要与美国斗争。他不可能不知道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解放台湾美国根本不打算干涉。事实上，他拒绝帮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就已选择了朝鲜，南韩比台湾更能威胁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史蒂科夫1月17日报告金日成要求进攻的电报他已打算同意，只等中苏条约敲定。联系到他于9月11日让葛罗米柯要求驻朝使馆全面估计进攻南韩的可能性及可行性；并在9月23日驳回史蒂科夫关于局部战役的电报中所指出的：“人民军进攻南方可能给美国以借口，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侵略，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同意美国军队进驻南朝鲜。”这证明，后来的进展斯大林早有预料。问题是：1.敢不敢冒同美国对抗的风险。2.由谁来冒这个风险？金日成是不可能的。苏联自己是不能上的，那将冒失去东欧的更大风险。 蠖 用耍 刹豢赡苁顾 虢鹑粘珊掀鹄词砸皇裕?br> 苏联1942--1952年驻华高级外交官、毛访苏的亲历者A.M.列多夫斯基称：“斯大林改变保持1945年条约和协定继续有效的立场，不是因为对日战争已经结束，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斯大林不便透露的原因。”斯大林在下决心签订新条约的同时，也下决心让金日成动手。这当然不能透半点风声给毛泽东，于是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中苏条约敲定后，他马上就给金日成开绿灯。他期待着金日成能速战速决，在美国介入前解决问题。他一再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甚至认为要二十年才能准备好。万一美国还有机会介入，那就要用中国的力量顶上去。这就是要同中国签订新条约的根本原因。结论是：斯大林之所以主动答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是为了使中国成为朝鲜战争的后备力量。

1月30日，中苏条约文字基本润色完成，斯大林立即答复金日成：“我准备帮助他。”这决不是巧合！他从1月17日等到30日，其间尽管1月26日美、韩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美国出兵几乎成必然，他也没后退。等的就是中苏条约。而且，当中苏条约于2月14日签字后，苏联立即竭尽全力加速武装金日成。说明此约正是为了中苏结盟后，可以让中国去同美国作正面斗争而避免苏联与美国迎头相撞才主动同意签订的。况且，由于毛泽东对美国的仇视，这事是可能性极大的。历史证明，他赌赢了。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正是抗美援朝，斯大林才真正相信我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从上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实是斯大林决定签署的。在毛泽东已不抱希望的情况下，他做出决定连毛泽东也出乎意料。而这个决定是连同让金日成进攻南方的决定一同做出的，目的首先是扩大苏维埃帝国的势力，其次是要打击一下美国，第三是考验毛泽东的忠诚。那些所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不得不签订”的奇谈怪论，并非历史事实。2.这个条约及其附件，依旧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正式成为苏联的仆从国，而使整个中国都成为外国的下属。无论是满清，仰或中华民国，都不曾有过。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我们无妨对比一下历史：甲午战败之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收到英国人李摩提太的《中英同盟密约草稿》，称中英结盟后日本便不敢欺辱中国了。李鸿章见到此草稿“面色极为阴沉”，声明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而毛泽东却主动投靠，使中国成为苏联的保护国。即使毛泽东后来又与苏联决裂，那也是由于苏共背弃了斯大林的缘故。这一段历史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耻辱。3.正是这个条约，以及毛泽东“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这样一个荒唐决心，促使美国改变了企图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念头，正式认定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国。并在1950年4月确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决定：“必须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的还是全球性的。”恰恰是在这个文件精神和斯大林的“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的决心指导下，才有朝鲜战争。而正是这个条约，把我们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4.因此，那些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成是“新中国第一个外交胜利”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强词夺理。

六.朝鲜战争的策划过程

我们再看这场战争具体的策划进程。1949年3月5日金日成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进攻韩国的计划。此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美军也尚未撤走，斯大林害怕美国介入，对金日成的实力也没信心，并不敢贸然同意。但他给了金日成两亿卢布贷款并同意人民军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学军事。1949年6月苏联又给金日成军用飞机100架，T-34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大炮230门，枪10000多枝。49年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请示，要求先攻占瓮津半岛及开城地区。葛罗米柯9月11日回电苏使馆代办顿金，要他找金日成探讨进攻南方的可行性。经12日、13日两天讨论，顿金认为局部战役不适宜。15日苏大使史蒂科夫电报却称：金日成与朴宪永认为，进攻可行。23日布尔加宁与葛罗米柯复电，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在当前形势下人民军对朝鲜南方开始全面进攻是不恰当的和不合时宜的。”9月24日苏共中央决议：“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并决定：“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在酒宴后对苏联大使说，在中国完成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人民。斯大林同志说等南方进攻北方时可以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时间长了南朝鲜人民将对他失去信心。要：“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并借酒劲质问史蒂科夫：“为什么不许我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只要三天就可以拿下，如果全面进攻几天就可以拿下汉城。”由于1月22--30日，斯大林与毛泽　枚日兴仗踉迹　泄　摹耙槐叩埂币殉上质担　勾罅值奶　茸　淞恕?月30日斯大林回电：“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情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此后苏联便全力推动金日成开战。

2月4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史蒂科夫会谈，用九吨黄金、四十吨白银及15000吨有色金属矿石换取1.38亿卢布军火，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1951年的贷款提前用于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回电，苏联全部满足要求。2月下旬苏联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直接组织进攻的准备工作。3月9日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1.3亿卢布军事、技术、物资援助。18日斯大林答复："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从中苏条约基本定稿到3月中旬就给了相当于过去两年所给的军备，这决不是偶然的。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访苏与斯大林就进攻南韩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斯大林批准进攻，他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但苏联不能出面。万一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回国。5月12日对史蒂科夫说，他将于5月13日访问北京，但"不再向毛泽东求援了，莫斯科已满足了一切要求，给了足够的援助。"朝鲜人民军到开战时已有十个步兵师，两个半满员师，一个装甲旅；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

七.毛泽东参与了朝鲜开战的策划

5月13日晚金日成向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现在形势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毛听后大吃一惊。1949年10月下旬，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朝鲜同志想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方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还说完全同意中方意见。几个月之后，他改了主意。令许多人困惑的是，斯大林与金日成频繁的往来商讨，事关中国且如此重大，何况其中有两个月，毛泽东就在莫斯科，而恰是这两个月，斯大林转变了态度。他居然对毛泽东一字不漏！苏联给金日成的武器装备，为了不让中国知道，全部走海路。直到最后时刻才由金日成通知中国，但仍把军事情况隐瞒着！非但如此，在同斯大林会谈中毛提到过金日成想进攻南韩，中共已按斯大林的要求将两个师连同武器装备交给金日成。不过现在还不是北方进攻南方的时机，斯大林也表示同意。以后毛也多次说，斯大林把他蒙在鼓里。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已把毛看成下属，但有野心，是东方的铁托，不想使他高出金一头。如果金能解决问题，不但苏联势力扩大，还使金日成可居功制约毛。但万一美国干涉，就必须中国的实力顶上。苏联的底线是决不同美国打，否则将冒失去东欧的风险。中、美一旦打起来，可以牵制甚至削弱美国，苏联就可在欧洲成强势；再者，中美一打就彻底断了中国打美国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靠苏联。为不使毛一气之下翻脸，在木已成舟时"抬举"毛，让金必与毛讨论，使毛的虚荣心得些满足。同时他还必须得到中国在美国万一介入时能顶上去的承诺，才允许金日成开战。

这是斯大林阴险的一招，无论朝何方发展，只要美国不进攻中国，苏联都百利而无一弊，且不会有任何风险。

而他算定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10月5日电报说得非常清楚），但这却使中方进退两难。当晚11：30周恩来亲自前往苏联大使馆要求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说明。14日维辛斯基回电：“毛泽东同志：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表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作出。在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就应该延迟，决定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作出。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斯大林的毒招更进一步，上不上钩取决于毛自己了。当然也是考验毛的忠心。

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让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同意进攻，并认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称：“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他向金日成转达了中共中央同意北朝鲜作战准备计划的意见。之后，毛泽东像上课一样，从政治准备到军事准备，再到战争的具体打法，详细地向金日成作了阐述。”还有资料表明，毛次日对苏联大使说，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由于美国撤军，朝鲜局势有了很大改变。他建议中朝应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才好直接援助朝鲜。之后，毛周等开会。对斯大林与金日成早不通报不商量颇为不满，更何况斯大林对帮助我们解放台湾坚决拒绝，尽管美国总统杜鲁们在1月5日的声明中已明确说不打算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却又支持朝鲜解放南方，而美韩已于1月26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肯定要履行条约的。如果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上，不难看出，斯大林显然不想中国解放台湾后更加强大，且并不能伤害美国。让金日成打南韩，既使金强大起来可制约中国，又能在美国头上动土，居心险恶。我们绝不应该赞同这个计划。但毛一心“一边倒”，只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

更往前，1949年4月，金日成向斯大林报告，称南朝鲜定于6月进攻北方。苏联建议他与北京协商，把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5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递交了求援信，毛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金日成并肩作战（请注意：此时离美军越过三八线还有17个月）。他强调，金日成应当坚定不移地争取实现统一朝鲜的目标，但近期不要行动，因国际形势还不利，且中共尚不宜公开和大规模支持北朝鲜，一旦完成统一中国，情况就不同了。还承诺：布防在东北的两个朝鲜族师可以很快编入人民军。一旦中国战事基本告一段落，解放军中其他朝鲜族官兵也都编入人民军，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实力。从1949年7月到1950年4月，毛泽东把四野朝鲜族部队四万多人整建制拨给朝鲜，这些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成了人民军的主力，占其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使金日成的实力与信心倍增。显然，无论美国介入与否，我们都是要帮助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这就是毛所谓的“国际主义”！

5月15日毛与金会谈，毛不讳言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朝鲜解放南方。但既然斯大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意见。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进攻计划后，毛强调：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能为占领它耽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不过毛也担心美国会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告诉金，如果日军介入，战争进程将延长。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出兵。金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几乎不可能。毛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作不了它的主，准备总是

必要的。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表示感谢，但再一次婉言谢绝。他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作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

金日成其实是怕中国出兵就不撤军，使他成为毛泽东的附庸。5月16日，毛金会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回电金日成，同意毛所提中朝签订互助同盟条约，但“这不应当是在战争发动之前，而应当是在朝鲜成功地统一之后。”金日成开战的具体日期或许并没有告知毛，6月28日，金日成派来一名校级军官通报战况，毛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7月2日周恩来也对苏联大使抱怨：早在五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我们就提出了美国介入的问题，但金日成估计不充分，并且不听我们的意见。现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对的。周恩来此话也说明，毛参与进攻的策划是可信的。

毛无论何种原因是认可了这次进攻的理由还有，“下一次讨论”并没有举行。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次进攻是不可能开始的。至少不会很快开始。并且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电告斯大林：周恩来与他会谈时说：“中国的三个军共12万人已经集结在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这也说明，在同意金开战时我们已作了某种出兵的承诺，现在必须给斯大林明确答复，因为美国已经介入了。周恩来此答复也许还有糊弄斯大林的成分：中国早就调兵了。因为如果朝鲜开战后我军才开始调动，12万部队是不可能在五天内就集结到沈阳的。

斯大林马上回电罗申：我们认为，集中九个师于中朝边境以便于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连志愿军这种形式也是斯大林给安排好的，而我方也服从了，7月7日即决定：一旦参战就“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织”。斯大林10月5日来电进一步说明用“志愿军”这种形式的理由。其实他的本意是：如果以中国军队的名义出兵，万一打不过，美军就有借口进犯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就必须出兵。他依旧不能回避同美国打仗。如果不出兵，又将在全世界面前名声扫地！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在此电中还详细说明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的理由，促使毛快下决心。

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还编造了一个10月份毛主席采纳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把原定的“支援军”改成“志愿军”的故事。其实志愿军已经在朝鲜开战的前一天，即10月24日，周恩来才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向民主党派通报出兵朝鲜的决定。10月2日毛就电告斯大林“中国政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作”了，这个故事不过是欺骗中国老百姓的宣传手段罢了。

以上事实也清楚地说明，早在金日成尚未开始进攻、美国佬还蒙在鼓里之时，毛泽东就承诺出兵了！斯大林迫使中国参与了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谋划，并做出准备出兵的承诺。毛泽东不过听命而已。这不知算哪门子“保家卫国”。许多文章称毛如何有远见，早作打算，真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毛也清楚，从中国的利益来说是不希望朝鲜

爆发战争的，更不应介入。但为执行斯大林的指示，7月7日军委开会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准备变为“志愿军”参战。

另一方面，中国则不断发出警告，希望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这样我国就可以不出兵也能向斯大林交差了。众多为抗美援朝讴歌的文章中，也一致承认我国出兵决策曾经历了多次反复。只是这些讴歌者显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假如真的像你们认为的那样，是中国受到了严重的侵略威胁，战火即将烧到我们头上了；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却犹犹豫豫，为苏联出动空军、提供军援而讨价还价，岂不是往老毛脸上抹黑？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会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忙于向第三国提条件：“你不给军援、不出动空军配合，我就不抵抗侵略”的？
后来，毛泽东多次埋怨斯大林，说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极大的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可笑的是，老毛自己早就悔之不已、并认定“百分之百的错”事，至今还有许多人著文为之歌功颂德。既然决定“是百分之百的错了”，我们却因服从错了的决定而正确，岂不荒唐？御用文人们以不变应万变，以“伟大胜利”为基点，选取立论依据；对一切不利于此的证据统统视而不见。这使我想起，文革时周恩来接见湖南“长高司”时，对他们“誓死捍卫中央‘2.4批示’”的表态：“我们都认错了，你们还捍卫什么？”假如我们没有参与谋划对南韩的进攻，也许确是理直气壮的；可惜的是，无论多么勉强，我们毕竟上了斯大林的当，完全不是依据中国的利益介入了此事，不能不是永远的遗憾。

八.朝战进程与苏、美的关联

金日成的进攻采取了希特勒进攻波兰、斯大林进攻芬兰时的做法，捏造了一个南方全面进攻的谎言：“南朝鲜伪政府的所谓国防军，于6月25日拂晓，在全38度线地区向38度线以北地区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而这个谎言立即被我们大加宣传，尽管我们明知这是谎言。直到2000年印刷的关于朝战的权威著作中，依然重复着这谎言。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既然是正义的事业，又何需撒谎呢？还有的作者明知此谎言已说不过去了，便以含糊的“朝鲜内战爆发”略过去。可是几十年来，我们正是：“美国指使伪政权进攻北方”来支持此战正义的论点的，真像大白后便略过去，总是不能服人的。

正如斯大林早就预料的，朝战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在艾奇逊的要求下召开，并以9：0通过决议，要求北朝鲜军立即撤至“三八线”。苏联代表没有出席。杜鲁门也随之做出了反应：“如果允许共产党人以武力进犯大韩民国而不受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一个小国会有勇气去抵抗强大的共产党邻国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允许这种行为不受到挑战，那么，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完全就像是曾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同样的事件。”况且从罗斯福开始的对苏绥靖政策早就在美国国内沸反盈天了。1950年1月，麦卡锡、尼克松两位参议员在美国已经闹腾开来，追究“丢掉东欧和中国的美国官员”。

靠选票过日子的政客必须看民意行事，艾森豪威尔称：“如果我们不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我们不久就会有一打的朝鲜。”杜鲁门总统明言，“绥靖只会引起进一步侵略并最终导致战争。”美国时间6月25日23：55杜鲁门发表声明：1.命令麦克阿瑟以所有能动用的全部武器弹药供应韩国部队；2.命令立即撤退美军顾问团的家属，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和海军部队给予以掩护和支援；3.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大陆对台湾以及台湾对大陆的任何进攻。但他仍说：“我不想进入战争。”此时美军仍未介入韩战。事实上，鉴于中苏友好条约已经签订，老毛已经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美国在1950年4月就已改变了态度。杜鲁门签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称：“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的还是全球的。”美国终于绝了同中国修好的念头，弃蒋成了保蒋，把中国作为斯大林的帮凶看待，因此时中国已拒绝英、法的建交表示，在越南帮越共打法国了。这是朝战造成对中国的第一个伤害。杜鲁门把台湾问题拉扯进朝战，无论如何都是愚蠢的。此举只有利于斯大林，等于帮他推中国上阵，同自己打仗。

6月27日，人民军攻进汉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立即建议召开了安理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耐人寻味的是，苏联代表依旧不出席，从而再次放弃了行使否决权的机会，造成历史上第一次由世界性组织投票决定以武力制止武力。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下的一次警察行动”的合法地位。杜鲁门下了第一道美国空、海军介入朝鲜战争的命令。

这里有一个插曲：表决原定上午进行，杜鲁门知道苏联代表抵制安理会，以为通过提案没问题就在上午宣布已通过美国提案。谁知因印度代表需等国内答复，改为下午表决。表决前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美国代表格罗斯、苏联代表马立克在一起喝咖啡，赖伊问马立克：“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脸都吓白了，马立克如出席并使用否决权的话，决议通不过杜鲁门必在全世界面前出大洋相！但马立克说：“不，我不去。”

苏联在此时完全了解联合国的动态，却躲起来。许多人弄不清何故。其实很简单，如参会，不行使否决权必遭朝、中以及东欧各国恼火，对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及其领导地位不利；行使的话，又暴露自己与此战有牵连，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躲起来最好！斯大林打定主意不会出兵的（美军飞机轰炸了苏联机场，苏联却不当回事。）让仆从国同美国斗，既可损美国的政治形象，又可损其军事实力。如果能把中国推上前线，效果将更好。

他还认定美国不会打进中国，让朝中两国在朝鲜的土地上同美国拼，这仗打得越大越久越好！他可以坐山观虎斗，看着中、朝两国拖住美国对苏联是最有利的。另有一事可说明斯大林的用心：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以9票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撤军并保证中国的利益受到保护。苏联立即使用否决权否决了该议案。且不论中国是否会接受该议案，苏联使用否决权意味着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许中国退出朝战，而且不屑征求中国的意见。

面对世界的强烈反应，苏联副外长公开声明，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奉行传统的不干涉原则。”苏联这样做无非是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企图摆脱干系。他们另一手就是在向联合国的提案中必要求让中国参加。从表面上看是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此举两个目的：一是因此提案通不过，战争停不下来却可怪罪美国；二是因

此造成中国与朝战相关的印象，脱不了干系。从而迫使中国尽快参战。

但暗地里是另外一套：7月1日斯大林致电史蒂科夫，要求转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同时他也小心谨慎，下令召回前线的军事顾问，派遣到前线司令部的军事顾问一律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派往。他对史蒂科夫下令：“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又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这事是金日成自己干的。”

此时斯大林干的另一件事，就是督促中国尽快出兵。7月2日他答应“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7日英国向苏联提议，希望苏联向北朝鲜施加影响，促使其退回三八线，以利和平解决朝战问题。斯大林马上电告中朝两国：“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理的和不能接受的。”7月8日，斯大林指示罗申：“请转告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已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9日夜，中国外交官奉命紧急进入朝鲜。7月13日斯大林电告罗申转毛：“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且称，这个师及已在上海的另一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在中国飞行员掌握后，都将移交中国方面。此言确实吊起了我军许多高级将领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可以获得这些飞机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时间6月30日凌晨4：47，杜鲁门批准麦克阿瑟调两个师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首次介入。但这些少爷兵从日本的妓院开到朝鲜战场，根本不能阻挡人民军。杜鲁门称：“进攻规模和随后的推进速度，十分明显地说明，这是一直都在策划着的阴谋。”7月29日联合国军地面战术司令沃克下死命令：“不坚守毋宁死”，终于守住了釜山一块最后阵地。战势成胶着状态，北朝鲜军队损失已达40%。解放南韩已很困难。于是，马立克8月1日回到安理会，4日提议就地停火。

在马立克提案尚未表决时，8月28日，斯大林致电金日成：“苏共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会很快地被赶出朝鲜。”“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不要因为推进中进攻受阻，或因某些局部的失败而沮丧。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连续的胜利。”“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坏得多。”“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他的盟友现在和将来都会支持他。”“我们可以补充提供攻击机和歼击机给朝鲜空军。”金日成感激涕零：“我们被您的关注深深地打动，并对您的热情参与和忠告，向您，我亲爱的导师，表示感谢”于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最猛烈的攻势，把敌人赶下海去！可见，斯大林的停火提案是何等虚伪。一项自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光明、最伟大的事业，却全靠谎言、阴谋、阴一套、阳一套

来施行，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

9月1日在金日成的大规模新攻势开始后，安理会否决了马立克的提议。这是预料之中的。金日成大举南侵之初，马立克躲起来。安理会决议停火，无人理会，斯大林反而督促金日成加紧进攻。现在攻不动了、且韩国只剩不足一万平方公里地域提出就地停火，显然不可能。况且在7月13日印度建议停火并由中共进入安理会已遭美国拒绝，现在的提议不过是试探罢了。兼之美、台又在7月31日签订了《防卫协议》，中国受到第二次伤害，把中国推上前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探明美国将扩大介入规模，就只剩如何使毛泽东尽快出兵一件事了。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突然在北朝鲜军的后方开战。金日成的进攻彻底失败了。于是麦克阿瑟全然不顾任何警告，在美政府的批准下，利令智昏地挥师北进企图把金日成干掉。但这个决定显然没有任何准备；而极度自负又使他严重失误，错失了战机。他不是马上切断半岛，而是全力进攻汉城等城市，使北朝鲜军三万余人平安撤到北方。他更莫名其妙地命令第7步兵师和陆战第1师从仁川及釜山登船，绕过朝鲜半岛去元山再搞一次登陆。而这恰恰使这两个大批急需的战斗物资上岸的港口造成壅堵。结果是，10月10日南韩第一军步行占领元山时，这两个师还未登船！这个计划居然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批准了！布莱德雷后来说，这个计划如果是参谋学院某校官提出的话，他将被嘲笑得无地自容。

10月19日，中国军队开进北朝鲜，25日不宣而战，把满以为中国不会介入的麦克阿瑟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可思议的是，11月6日他向布莱德雷报告中国军队已进入朝鲜，并“使我之所属部队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到11月24日却又宣布：“中国人尚未进入朝鲜”，并发动圣诞节攻势，直逼鸭绿江边。终于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确认他面临的是25万久经战火考验的中国军队。于是急忙全线溃退到“三八线”附近，造成北朝鲜大部成了真空地带。12月16日，全部军队撤过“三八线”。莫名其妙的是，他始终严禁中央情报局进入他的地盘，直到他下台。

九.中国出兵决策进程

如果真实行集体领导，这仗未必打得起来。毛泽东说过，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宣传说原定林彪带兵援朝，他怕死装病躲到苏联养病。其实林彪早在辽沈战役就是带病指挥的；1950年3月13日病重得连走路都困难，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离开前线赴京治疗，无疗效才于9月转苏联治疗的。后来揭发，某将军说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给金日成送礼，林彪说：“这个礼也送得太大了！”可见他未必是怕死，而是不同意出兵。也并非只是他有不同意见，东北王高岗开始也是反对派。乔冠华回忆：周恩来曾极力主张避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但毛泽东主席坚持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倾向在朝鲜进行干预，周总理放弃了己见，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张。

1950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紫光阁军委讨论援朝的会议上，粟裕将军认为是朝鲜人未按预定计划行事。后来他也因病未赴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任命。贺龙认为北朝鲜应由苏联负责，为什么要把中国扯进去？叶剑英认为同美国开战，我们的一切建设计划都要成为空谈，只有祖国安全受到威胁才可介入。即使是彭德怀也认为“不可轻举妄

动”。并以苏联援助和出空军为条件。朱德打哈哈：“唇亡齿寒”。这正是毛泽东的理由。其实毛泽东开始也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两次拒绝了金日成的请求。但为向斯大林效忠，他以后还是积极的。此时美国佬并未越过“三八线”，毛已明确告诉莫斯科，照目前的情况，靠北朝鲜自己恐怕是赶不走美国人的，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力量。

即使是彭德怀到沈阳接粟裕任后，13兵团等集结在东北，还是按兵不动。9月27日斯大林主持苏共政治局开会，分析认定金日成已无力扭转战局，请中国人到朝鲜是必要的。电告金向中国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28日金开会讨论斯大林的提议，一致同意求援，但企望苏联援助。29日金又同苏联大使探讨，他仍不太想求中国，万般无奈之中，只得听从斯大林的提议。10月1日凌晨2：50斯大林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请苏联出兵，“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十分钟之后斯大林发电报催促中国出兵。明明是他叫金日成向中国求援的，却谎称“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

金日成的求援信与斯大林的电报同日收到，毛即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开紧急会议，除毛外其他人都很犹豫。决定次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也就是许多文章中讲到的10月2日毛泽东决定15日出兵的电报。其实此电并没有发出去。理由是：1.此电底稿上无杨尚昆等经办人签字，如发电，这是必须的；2.苏方档案里无此电文，却有那份不出兵的电报；3.假如发电出兵，10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一份长电，细说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出兵有利无害。既然毛已定15日出兵，斯大林也不用又是激将又是规劝讲那么多废话了。4.苏联大使报告说中国人变卦了。

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可见直到此时高层仍未提到我国受到威胁，意见还是很多的。毛本人也只是认为“别人危急”，并不是我国受到威胁。于是毛只得停发拟好的出兵电报，真正发出的却是叫苏联大使罗申代发回去一个暂缓出兵的电报：“您1950年10月1日的来电已经收悉。我们原计划当敌人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因此现在最好是忍耐，不出兵，积极积蓄力量，与敌人发生战争时这样做将更为有利。”但他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这份电报斯大林收到并存档。

4日彭德怀到京，表示如“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毛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答，解决得好，空军能掩护我们，可同美军较量一下。毛极高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彭的支持，气氛改变。决定：一方面成立志愿军，作好参战准备。另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已在苏联）去见斯大林，把出兵与否两种利弊，征求斯大林的意

见。

同日苏共政治局开了一天会，确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放弃北朝鲜也要避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这就是斯大林的决心。）并决定，撤出苏联在朝鲜的一切机构和人员。会后，斯大林立即致电毛，劝说中国出兵。他称：美国现在没有打大仗的准备；日本也没有能力帮美国打仗；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调停，从而无法将朝鲜作为他的军事基地；同样，美国就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还将拒绝单独缔结对日和约，使日本不能成为他在远东的跳板，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万一美国向中国宣战，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斯大林这个骗子，苏共刚决定宁可丢掉北朝鲜也决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他一边下令撤出苏联在朝鲜的一切机构和人员，一边天花乱坠地骗中国出兵，自己躲在幕后。问题在于，毛泽东信他，正是这份电报，促使毛坚定了出兵决心！中国文革时，金日成还说过，中国是因斯大林威胁才被迫出兵的。那时，在他的授意下，许多志愿军烈士的陵墓被毁。而还在战争进行中，直至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进朝鲜人民军的朝鲜族高级将领，基本上全部被清洗。如李权武、方虎山等四野猛将。回到朝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郑律成，不得已向周恩来求助，周恩来亲自出面才得以返回中国，逃过一劫。这就：“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真实写照！

其后，10月6日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拿着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方案。但7日毛却自己答复斯大林，同意他来电的观点并确认出兵且增至九个师。同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统一韩国的决议，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此令已明确出兵目的是“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并非认为中国受到威胁。正因此，才坚持要苏联出武器、出空军。假如我国真的受到威胁，高层还有反对出兵的意见；且要苏联出武器、出空军，岂不是开玩笑？！难道那些出生入死打出这片江山的元勋们，还不如这些摇笔杆子的御用文人爱国？

令人失望的是，9日周恩来拉上林彪见斯大林时，他却不打算出动空军恕Ｓ谑侵芏骼匆蛔植惶嶂蟹揭丫龆ǔ霰　　凰道　选２ 1.硎荆喝绻　急覆怀浞郑　秸　┍植幌拢　共蝗绮怀霰　Ａ直敫纱嗵嵋槿媒鹑粘缮仙酱蛴位鳌Ｋ勾罅旨ざ　馗呓校骸澳敲矗　忝堑木龆ń褪遣幌肱删　尤コ　柿耍　　实纳缁嶂饕搴芸炀突岜览Ａ恕！?1日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苏方军援满足，空军至少两个半月才能做好准备。由于斯大林坚决不出空军，12日毛立即

致电彭："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不要出动"。同日，周恩来与斯大林确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流亡到中国去。史蒂科夫传达后，金日成痛苦地表示照办。

10月13日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尽快出兵，但军备要租借、苏联空军必须两个半月内出动。10月14日在得到斯大林答应所给军备可以用信用贷款支付，并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后，毛同日决定19日出兵，但只到平壤、元山以北，"等候苏联空军的到来，然后再打。"15日15时毛致电彭："17日出动"。接着斯大林又变卦，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只到东北不进入朝鲜！17日17时毛急电彭，推迟出兵并立即返京。18日紧急会议终于正式决定19日入朝作战。我们的军队还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极度困难条件下，听从斯大林的指挥，开到朝鲜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同美国佬拼命去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十.中国军队与美军的较量

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一个多月就打："三八线"了。到二次战役结束，我军共歼敌51000人，其中联合国军近三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全部领土。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的国威、军威如日中天！布莱德雷称："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而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米德尔顿则说："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在政治上，这次胜利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

当时彭德怀认为美国不可能退出朝鲜，我们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朝鲜。且我军伤亡也很惨重，仅九兵团就减员四万。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后勤损失严重，几达40%。汽车也严重损失，补给困难。12月8日他致电毛，建议："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如果实施彭的建议，我们将是完胜！

因为美国已识破斯大林的伎俩。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定下的国策是："最大的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那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鼓励北约盟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美国决不可陷入亚洲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并命令："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向朝鲜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如果顶不住就撤出第八集团军去保卫日本。"这个命令说明，美国政府不想玩了。1950年12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一个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战线一旦不保，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1951年1月13日，尽管中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并推进到37度线；杜鲁门依然亲笔写信给麦克阿瑟，强调上述命令，甚至撤到济州岛也不打算增兵了。

这使麦克阿瑟极为愤怒，他最终因反对此令而下台。而如果按照彭德怀12月8日的请示电报，这仗应该不用打了。11月28日伍修权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演说后，12月7日13个亚非国家提议停火。但毛泽东并没有只以恢复北朝鲜为目的，这在他于1951年1月19日批示中已清楚表明了："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

而毛泽东显然是在听斯大林的：12月4日，王稼祥大使回国前问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越过三八线？"葛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

语是十分恰当的。”12月7日斯大林否定了维辛斯基应当停火的意见，苏联政府答复中国政府对停火的请示时，明确指出，目前的停火建议，多半只是美国因美军的失败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在解放汉城之后，再考虑停火问题。而苏联驻朝大使12月中旬则直接指责彭德怀未立即发起新的进攻。斯大林此时极力主张把美国从南朝鲜赶出去，他为驳回彭德怀的建议，主动答应提供2000辆汽车。

12月13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指示后电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彭德怀私下说：“导师被胜利陶醉了。”彭德怀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虽于19日致电毛：“得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却并无行动。12月22日中国拒绝了13国提出的停火提案。经几次往来电报应答，直至12月28日20时的电报中，彭还说：“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毛29日复电再次强调越过“三八线”，并责怪彭：“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他只能接受毛泽东的命令。后来彭德怀挨斗时，这也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12月31日，中国军队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尽管一下子把军力从原来的二十多万增加到135万，并打到37度线附近，终于力不从心。第3、4、5次战役并非什么胜利，而是根本得不偿失！毛泽东企望在朝鲜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六个整师，结果连一个美军整营都没能全歼，反倒是我军180师被全歼。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全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此前牺牲的团以上干部28人，其中师级以上仅58师参谋长胡乾秀一人。此后牺牲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包括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例。我军被俘人员80%是在第五次战役中被俘的。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这样，原本已到手的胜利，就此变成了悲壮。我们可以闭着眼睛说三、四、五次战役都取得伟大胜利，只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难看出，这胜利确实经不起推敲。

十一.“细菌战”风波

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一次很热闹的“细菌战”风波。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在“马、恩、列学会”倡议下开始了“仇美”活动。同年3月5日开始，中国的宣传开始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了毒气战。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发表书面声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

5月8日，朝鲜外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布天花。19、24、25日，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却称美军已使用毒气并正准备使用细菌战，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准

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重复上述指责。几乎同时，苏联操纵的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细菌战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上述舆论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甚至我们自己的舆论工具，也不再提及这一段故事。

到1952年初，苏联顾问警告中朝方面，美国可能在朝鲜使用细菌、化学甚至原子武器。1月28日，志愿军总部报告：美国飞机在朝鲜并偶尔飞越中国青岛，散布天花病菌，这是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立即命令调查取证，还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2月18日，志愿军总指挥聂荣臻致毛周等报告，称美军在朝鲜前线空投蜘蛛、苍蝇、跳蚤传播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疾病，希望获得苏联专家和设备的帮助。毛泽东于21日电告斯大林。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指控；苏联则在联合国指责美国使用化学武器。从此，一个大规模宣传攻势正式展开。中国方面公布：从2月20日至3月9日，朝鲜北部居民有13人被传染了霍乱，其中有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庄有50人患上鼠疫，36人死亡。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作为答复，周恩来声明：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68批、448架次在中国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播带菌昆虫。并宣布：凡俘获美国空军从事细菌战的人员，一律作为战争罪犯处治。中国以及苏联集团各国，立即掀起了抗议浪潮，西方世界也立即沸沸扬扬。（但到最后，美军俘虏“承认”从事了细菌战的二十多名空军人员，却没有一人受到“战争罪犯”的指控，似乎人们已经忘记这回事了。而这些被俘人员回到美国，其中就有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述被迫说谎的经历。）

3月11日，艾奇逊再次否认并直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12日，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红十字会接受请求，并马上向中国、朝鲜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合作。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对此项调查提供必要的帮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愤怒地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而北韩政府进一步宣告，美军在朝鲜散布细菌达800多次，范围达40多个郡。

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如此广大地区、如此频繁地从事细菌战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保密的。而且，作为受害一方，接受国际权威机构调查取证，乃是极为有利的。但直至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各四次分别向中朝呼吁准予入境调查都没有得到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到4月20日仍无答复将被视为拒绝。至30日也无任何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停止这项调查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不认可任何细菌战的指控，这种实际上的否认，是权威性的。

为了使指控具有说服力，一方面中朝双方通过新闻媒介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肆意贬损。如新华社便称：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腴。我们显然忘记了，我们正是求助于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调查，才确认了日本法西斯731部队在中国的野蛮细菌战罪行的！另一方面，则由苏联组织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进行调查。还发表了22名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认罪书”。

这个故事很长，不再细数。直至2000年，权威出版物仍在叙说细菌战的故事。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原苏联存档的、关于“细菌战”的12份绝密文件。现在摘录其中五份：

A. 文件二：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原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1953年4月13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备忘录：“1952年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美国人在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此，他们（中国人）打算发表声明。在北朝鲜政府的坚持下，北朝鲜外交部决定首先发表他们自己的声明。北朝鲜外交部声明的俄语文本，出自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的顾问佩图霍夫之手，是与先前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相符合的。北朝鲜人声称，美国人可能在他们国家的几个地区重复引发了瘟疫和霍乱。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北朝鲜人和我们的助理顾问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1952年6月到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国家安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的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且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 格鲁霍夫。”

B. 文件五：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53年4月21日致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1952年3月，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前夕，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收到格鲁霍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顾问和斯米尔诺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顾问（给杰尼索夫---英文原注）的备忘录。此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在苏联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朝鲜人民军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 伊格纳季耶夫当时没有将这个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给任何人。其结果，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我依据从1953年4月开始收到的报告，在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 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查细节和犯罪当事人做出决定。 贝利亚。”

C. 文件七：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1953年4月24日第六号议定书（节选）：“1.针对擅自采取的，具有挑动性质，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决定）撤消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

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阶并予以起诉。……4.下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提案，提交苏共中央全体大会通过：‘鉴于新的情况所显示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的不正确的和不高尚的、对政府隐瞒大量重要的国家文件的行为，取消伊格纳季耶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D. 文件八：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人民共和国事物负责人祖茨塔夫的信，1953年5月2日。“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 给予的劝诫：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道。 考虑接受下列行动步骤。这个步骤是：中国（北朝鲜）政府在联合国声称，4月23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在中国（朝鲜）领土上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事实的决议不合法，因为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朝鲜）代表的参与。这样做的原因是，（韩战中）没有人使用细菌武器，所以没有理由调查。 以一种策略的方式提出，在国际组织间和联合国机构中不要再继续讨论在中（朝）使用细菌战问题。 参与假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E. 文件九：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莫洛托夫汇报他向毛、周转达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议时的情况。“依照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1953年5月7日第1212 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节顾问瓦茨可夫肩负苏联政府授予的使命被送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零点，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聆听了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希望提早结束揭露美国在中朝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的建议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目前，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将再研究一次。如果发现伪造，那么这些来自下级的报告就不可信了。毛转话题说，在中国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65万人被执行了死刑，（而且）确实，不可能认为所有的死刑都是合法的。其中一定数量的无辜的人显然蒙受了冤屈。 在谈话进程中，毛泽东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紧张，他吸烟很多，碾碎那些烟并喝下许多茶。谈话接近结束时，他大笑和开玩笑，并冷静下来。周恩来的举止显出刻意的严肃和某种程度的局促。 库兹涅佐夫。”

这几份文件已经足够说明“细菌战”究竟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另一份文件是苏联驻朝鲜事务负责人的报告。金日成称病派出他的副手接受传达。他的副手称：当时那样做是有利于反美的共同事业的。这就是出发点。

只是，如果我们至今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究竟算是自欺欺人，还是立场坚定？

十二.停战风云

美方从退到“三八线”以后就开始就寻求停战，用艾奇逊的话说：“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艾奇逊没有撒谎，他先后派人在纽约、巴黎、瑞典分别找苏联外交官试探停战谈判，斯大林看到志愿军正向

南韩挺进，不予理会。艾奇逊再派人到香港试探也没能成功。最后找到前美驻苏大使乔治.凯南。1951年5月31日，尽管美军正在胜利进军，美国外交官凯南仍私下会晤马立克，不理会他的打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quot;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遗憾的是，此前于5月16日开始的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遭到李奇微的防守反击，到月底已成败局。180师就在此役被全歼。假如不是彭德怀果断决定我军后撤，损失将更惨重。现在中国和北朝鲜的秘密档案均未公布，但显然战场局势极其严峻。6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周商量。紧接着战势进一步恶化，毛、金讨论后也只能考虑停战问题。斯大林不想停战，他于6月5日致电毛：″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说，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出了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毛决定派高岗和金日成同赴苏。但到6月10日美军已反攻到了“三八线”以北汶山、金化一线。6月11日，美军攻占铁原、土耳其旅攻占金化；韩国第一军攻克杆城、进逼高城。

6月13日高岗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时，斯大林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至此，美军“绒毛河作战”所有目标均已实现。毛泽东同日致电彭德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可见当时军情紧急的状况。当高岗和金日成一再强调困难之后，他不得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那就试一试吧。”并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此令一下，毛立即决心停战，马上致电高、金与斯大林协商停战的办法：“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到6月15日美军“打桩机行动”完成，夺取了三八线北侧全部预定的有利地形目标。假如不是美国政府下令，而按美军将领的主张，他们一直打到平壤--元山一线并非很难之事。其实在6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电令李奇微：“1.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2.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3.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非朝鲜籍武装部队作好准备。4.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或击退北朝鲜的再度侵略。”李奇微虽然极为不满也只得执行命令，转入战略防御。6月15日以前美军的战斗，不过是为了夺取有利防御的地形目标而已。正因美国政府不许美军继续进攻，才会有克拉克在停战以后的那一席牢骚话。

6月23日奉斯大林之令，马立克在联大演讲中说：“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马立克刚说完，当天下午

杜鲁门即声明：“我们现在准备参加在朝鲜和平解决战争的谈判，就象我们一直准备做的那样”6月25日《人民日报》称：“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中国人民赞成马立克的和平建议”。苏联装成局外人，又立了一回牌坊。

以上情况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我军打得美国不得不同意停战，还是美军把我们打得不得不同意停战？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彭立即复电同意。而半年前无论何方人士提出停战谈判，我们都是一概拒绝的。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而毛所定的边打边谈拖住美国佬，恰是苏联最希望的。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兵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两年多谈不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莫洛托夫马上提出停战备忘录。认为以往有几次停战机会，都不重视，这是一个错误∠衷诘奖匦肓⒓赐Ｖ拐獬≌秸　氖焙蛄恕Ｋ樟　铝斓纪ü　舜吮竿　迹　　⒀鸬男胖赋觯杭绦　葱性　吹穆废摺笆遣徽　返摹保　　鞫　Ｕ健?br＞周恩来奉命于3月21日飞抵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我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及全部遣返战俘，结果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苏共新领导叫让步，金日成也不想再坚持了，提出无论如何都要签停火协议。毛自己后来也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当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以上可见，朝战自始至终，毛泽东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停战也是苏联决定的。所谓毛泽东自主决定抗美援朝，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强词夺理。明摆着的是，一手策动这场战争的苏联，尽管没有达到扩张目的，但成功地把中国推上了反美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不但不费一兵一卒削弱了美国，使中、美从对立变成了仇视；而且要按国际市场价格卖武器给中国，其中甚至有美国援助苏联反抗法西斯的军火，发了一笔横财。甚至由中国支付他们在朝鲜的记者费用；还要扮演局外调停人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唱高调！苏联可算朝鲜战争中唯一的赢家，不用参战的赢家。

十三.根源及成败

其实，中苏论战时，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中，已经道出了中国出兵

朝鲜战争的原委："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这是一个阵营的问题，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使苏联处于第二线"是出兵的实质。我们许多作者却在那里自以为英明地嚷嚷，搞出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论来，甚至有人还称：此仗在朝鲜打要比在中国打要好。确是浅薄得可以！毛泽东要"一边倒"，得给斯大林送点礼。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被承认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为什么不能一边也不倒呢，中华民族不是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国民党倒向美国，共产党就要倒向苏联。国民党倒向美国时，蒋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国阻止英、法重返旧地。同苏联还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国去打苏联。苏联自己也不时同美国拉拉扯扯，我们倒向苏联就一定要同美国势不两立吗？事实上美国抛弃蒋介石比苏联还早，苏联大使馆（而且只有苏联）随国民党搬去广州，美国大使却留在南京等着解放军。为了执行斯大林7月11日"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指示，毛泽东就定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以便"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李涛将军奉命发表声明：拒绝一切美援。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他轰走，接着几篇文章把美国佬骂得体无完肤。压根儿就没打算同美国打交道，这在外交史上确不多见。莫洛托夫说，成功的外交胜过几个集团军。毛泽东根本不知此理，他只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并一心充当反帝急先锋。不错，美国佬扶蒋反共。而苏联曾把大批日军装备交给中共，并限制蒋军进东北，帮了大忙。知恩图报也属情理之中，但打这一仗终归不是为我们自己。"保家卫国"不如叫"保苏卫朝"还更贴切些。而且，正是这个"保家卫国"，一度被金日成利用，说中国出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并非是为了帮助朝鲜。

我们至今没有朝鲜战争牺牲的准确人数，1951年3月1日在我军节节胜利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就说我军已伤亡超过十万人，并打算"今明两年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我们在朝鲜牺牲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现在许多著作上的数字，称我方与美方伤亡比为1：1.7；天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伤者不算，因为我们的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而美国少爷兵擦破点皮就算受伤。朝鲜人不算，包括早调给金日成的4万名四野的朝鲜族将士。仅中国军事博物馆统计，我军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71，669人。美国佬的数字是战死24，965人，失踪12，939人，被俘3，697人。其盟国死2，597人，失踪1，925人。死亡比例为4/1；（2000年五角大楼发现当年统计失踪和阵亡重复了三千多人，本文未予考虑。）如以1：1减去1950年12月底以前的双方死亡数，（许多文载，仅第二次战役就歼灭美军24000人。我军仅九兵团长津湖一役就减员四万人。）即3、4、5次战役及以后，死亡比高达15.5/1！如果再把中国出兵前美国佬的阵亡数减去，这个比例就更不堪入目了。

最惨的还是朝鲜人，家园涂炭不说，同胞相残双方军队战死和失踪共429197人外，仅平民就死了二百多万！但对于独裁者而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坦然地说"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变成统计数字了。"1942年他还告诉丘吉尔，他的红色恐怖时期不象外界所传杀了五百万人，而是"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

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罢了。更有甚者，他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金日成当然也不会为二百多万朝鲜人的死有任何不安，只要他的独裁统治能保住，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宣传说，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幻想，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事实又如何呢？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决议停火时，经斯大林批准，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停战协定开始谈判时，美方拒绝谈政治问题，这几个条件除撤军一条外，其他各条都没有提到谈判桌上；而撤军这一条谈判中也被否决；我方后来提出的“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以及“确定双方释放现在双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也全都落了空。美方出尔反尔坚持的实际控制线代替了我方坚持的“三八线”；美方的自愿遣返代替了我方坚持的全部遣返，14235名志原军战俘拒绝遣返，绝大多数去了台湾。（哭笑不得的是：老美说，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战俘自愿去台湾，也就是回到了中国。遣返回大陆的6670名战俘全都受到迫害，直到1980年9月27?quot;中发（80）74号“文件”后才陆续平反。我们自己用行动证实了美国佬当初“毫无根据的谎言”。）相反，美国的要求却几乎全兑现了。谈判的每一次进展，都是我方让步取得的。毛泽东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难道这就是“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再看经济方面。1951年军费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只占28.7%。1952年军费占32.9%，1953年占34.2%，但绝对数都大于1951年。而1950年军费占41.1%，建设费占25.5%。仅抗美援朝欠下苏联的债，便达34.85亿卢布。占1965年还清苏联债务的61.4%。这些人民的血汗基本上都花在朝鲜战场。更可气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中，竟有相当数量是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

为使后方安定，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镇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杀了一百多万人。这显然也是扩大化了的，也是二十多年不断的“运动”的开始。10月26日又下达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称：“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宣传中所说的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没有经历过那种运动场面的人，是不易体会那种恐怖的。

十四.毛外交的偏激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个荒唐透顶的唯心主义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当然也不存在外交，只有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国当成了大苏区，接下去就是搞世界农村包围城市，就要打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要投靠斯大林。当然需要表现得立场坚定，不共戴天。用鲁迅那句：“叭儿狗比它的主人更严厉”来形容，并不过分。就是斯大林，也只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从不曾要苏联人“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逻辑被狡猾的艾奇逊发现并利用。1951年1月13日，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联合国提案：立即停火，并进一步寻求和平新措施；外国从朝鲜撤军；让朝鲜人民选择政府为朝鲜统一作出安排；建立适当机构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地位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在内；该适当机构由美、英、苏及共产党中国代表组成。也即“五步方案”。

艾奇逊发现此提案对中方极为有利，基本上满足了中共所提出的停火要求。如赞成它将必然在美国造成政府危机；但如反对它又会落下破坏和平的罪名，并使中共被世界认同。他绞尽脑汁制定冒险计划：让中国替美国反对该提案。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侵略。杜鲁门无可奈何批准了该计策。尽管美参议院已对此提案激烈反对，但艾奇逊却布置美驻联合国大使公开称拚庖环桨福 ⒅甘久拦 读嗽蕹善保 垢锰岚冈诘谝晃 被嵋?：6得以通过。塔夫特参议员称之为：“合众国同意的最完全的投”。这消息沸沸扬扬弄得满城风雨，其目的是促使中国反对。

如果按照彭德怀建议赞同此方案，美国将极其被动。赞成它则使中共大获全胜。此时我军已达37度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凯旋；美国国内必然沸反盈天。反对它便落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臭名。美国佬提心吊胆地干等。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但是，过低估计美国的北京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1月17日，彭德怀关于接受此提案的建议被否定。经斯大林批准，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予以同意。”毛泽东的荒唐逻辑终于使他上了艾奇逊的刁当！美国佬如释重负，艾奇逊欣喜若狂，他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紧接着，美国在1月20日向联大提案：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并商讨针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措施。2月1日联大通过了这个提案。虽然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给自己造成

广泛谴责，还帮助美国解脱窘境决不会是外交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此提案远比后来签字“停战协议”强千百倍！

十五.毛泽东报恩斯大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早就敬若神明。所谓斯大林一贯压制毛泽东，完全不是事实。对毛个人在中共党内地位而言，斯大林及其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是关照有加的。1923年共产国际派来中共的代表马林，对毛赞赏不已。因陈独秀等核心人物反对马林“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主张，而毛却积极支持。马林在中共三大上，扳倒张国焘，让毛首次进了中央执委。并兼执委秘书、组织部长，成为三人核心中人物。

1927年5月，斯大林命令中共要搞军队，毛举行了秋收起义。当毛搞湖南农运和秋收起义时，获得苏联给的经费六万元，占1927年中共获得"特别费"的四分之一。布哈林还在国际的大会上，高度评价并发行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乃中共受此殊荣第一人。尔后，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国际公开肯定毛的革命方式，《真理报》称为“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几年中，毛泽东的名字在国际和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六十多次。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根据斯大林内定，毛当了主席。当上海中央迁到江西，毛受到排斥时，莫斯科很不满意，指示：不能把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并驳回中共要毛赴苏养病的提议。当博古企图取消毛的一切职务时，莫斯科批准毛为政治局委员。并电令，严禁对毛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即使是遵义会议，中共选举张闻天为领袖，周恩来为军委书记，毛只进了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搞军事。但莫斯科不理会其他人，只宣传毛。把毛的文章精美印刷成十几种文字发行。还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之后，成共产国际第三号人物，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并以专文介绍毛，结尾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长征结束前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好，纂党夺权、自立中央，甚至威胁毛的生命时（但根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并没有暗害毛泽东的任何阴谋）；共产国际特派员林毓英（张浩，林彪之兄），向张国焘及其“党中央”宣布：共产国际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党的领袖。于是张只好认输，毛因此获胜。中共和红军也避免分裂。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1936年4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表态，要求废止反蒋口号，与之搞统一战线。并对毛组织援款，此可谓雪中送炭。毛感激不尽说要“饮水思源”。当王明回国，乃致威胁毛的领导权时，季米特洛夫在关键时刻代表斯大林表态：中共中央还是应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命令王明不得再与毛争权。这样，1939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此话之后，王明认输，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莫斯科立即转载了此报告，还发表了毛的生平传记。可以说，毛的地位是与斯大林分不开的，他心知肚明。

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舆论一片哗然，连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感觉狼狈，大批党员退党。全世界只有毛泽东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为之辩护。斯大林喜出望外，将此文大量印发。同年斯大林六十大寿，毛在延安为其集会庆贺，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讲话。他后来说，此文是真情流露。他称："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明明斯大林不但不实行列宁关于"把沙皇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垢　泄　钡　男　裕　绦　哉忌郴矢钊ヶ?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还进一步出兵占踞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却颠倒黑白说："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颇为讽刺的是，斯大林趁火打劫，后来更要去了中长路、大连、旅顺等特权！最后是，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国有特权。

关于《日苏中立条约》，明明是苏联急切要求，日本迟迟不肯，毛却说："苏联是否愿意订立……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结果斯大林在此条约中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国"。当然，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经承认蒙古国了，但苏联承认"满洲国"、让日本腾出大量兵力来对付中国难道也"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冲突"吗？稍有眼光，就能看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必将损害中国！事实上，此条约一签订，日本立即挥师南进，放心地向中国扩大进攻，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进攻中实行的。斯大林对中国的掠夺与伤害是最凶残的，并不亚于日本天皇！

此后毛在延安搞整风，让全党学《联共（布）党史》等苏共文件。王明反击，关键时任弼时和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批评，王明撤底垮了。毛的权威空前地立起来了，1944年1月2日，毛致电莫斯科："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到中共七大，毛正式当了党主席。他的9篇讲话，回回大讲特讲苏联和斯大林，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更是空前地帮了大忙。他急令中共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仅苏远东军第39集团军就交付：1565门大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0架飞机、12000挺机枪、2500多辆军车、13000匹战马外加679个仓库物资。其中不少是美国援助给苏联的武器。这使毛提前打败了蒋介石。1949年2月毛对米高扬说，解放军入关时，把苏制武器都留下了，为的是宣传我们的武器都是缴获蒋军的。

只是在1948年6月铁托反目之后，斯大林才开始怀疑毛会是"东方的铁托"。但毛这边却是痴情一片，决心投靠斯大林的。他要求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不准。1949年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

倒”；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斯大林在此前提出并要求各国共产党予以执行的。

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该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令人肉麻的表态，连斯大林也接受不了。他11日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翌日，刘将此答复报告毛。

14日毛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消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quot;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卑躬曲节向一个外国表示臣服的。”毛泽东决心要拿中国的“局部利益”去服从斯大林的“世界利益”，并用实际行动充当斯大林的“一个方面军的司令”。他要报答斯大林，但他也清楚这在全党全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不但不要留文字记录，而且不能“向党内外宣布”。那时正是斯大林在欧洲输出革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于是他的输出革命便成了中国的方针，在这方面毛泽东使我们走得比苏联更远。

十六.毛泽东积极投身世界革命企图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朝战之前，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召集几个民主党领导人就北约成立发表声明，宣布要同苏联阵营携手并进，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11月16日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作得正确的。”“而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要想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公开鼓动别国反政府武装，颠覆别国政府。

他在11月23日向北京各界所作的报告中还宣布：“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这种责任。”这说明，我们已经乐此不疲地投身到世界革命中去了。

1950年1月，对于新中国是关键时刻。英国、法国都表示要同我国建交，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表态把台湾划出美国的防御圈，甚至明说没人能保证它不受军事攻击。这其实是告诉我们，美国想同新中国修好。如果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原则，就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建设独立的中国国家利益需要的外交。

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边倒”能实现，于13日批准中国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当然苏联除外）、接收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把美国驻华使领馆全部挤走。他马上将此决定特意告知苏联，并说明他的目的就是“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况且，当时的蒋介石也陷入恐慌之中。海南岛解放后，蒋介石就试探和谈。由蒋经国召见李次白，叫他当秘使赴大陆。李次白是陈毅哥哥陈孟熙的妻兄，1950年6月韩战爆发前他通过陈孟熙找到陈毅。陈请示中央后答复，我们不急于打台湾。此信息刚传回台湾，朝战爆发，和谈梦断。

事实上，斯大林已一再斩钉截铁地拒绝帮助我们解放台湾。毛求援不成，且于49年10月打金门岛遭惨败，九千余人全军覆没，实际上已放弃了短期内解放台湾。但仍在积极准备自己解放台湾。朝战一开，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尽管我们在宣传上依旧大喊大叫，但在内部指示中已经承认，有美国海军阻拦，此事只能无限期延宕。斯大林1950年10月5日那封电报中全是扯淡。

更有甚者，当美国指责苏联把合并外蒙的办法运用于它所占领的中国北方几个地区时，莫洛托夫要求“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谴责声明，毛同意了。但1月21日苏、蒙外长声明发表时，中国的声明却是新闻署长胡乔木发表的。斯大林专为此事与毛、周会谈，像老子教训儿子一样：中国的声明“是一文不值的”、“各行其是”、“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等等。毛泽东却一言不发地忍着。无论讲究国格、人格都应该拂袖而去，干自己的事了。比如铁托，宁可受到所有共产党围攻，忍着苏联撤消援助的困难，既不靠苏也不投美，领着小小南斯拉夫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之路，令人钦佩！铁托是为了国家利益不顾斯大林主义原则；毛泽东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原则不顾国家利益。

耐人寻味的是，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在1964年5月14日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北村德太郎时说，美国对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演说和艾奇逊白皮书都说要承认中国。所以解放时美国大使和驻北京总领事都没走。50年初美国还说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战的继续，美国不介入。第二阶段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就翻脸了，出动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第三阶段从1964年1月法国建交后，美国改变为一中一台了，本质上是两个中国。1965年4月30日下午3点，周恩来又对加纳外长说，1949年美国大使离华前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对美国友好，美国将承认新中国并提供30至50亿美元贷款。罗隆基到北京时，毛泽东已宣布“一边倒”。罗怕被打成亲美份子不敢说，还写信给司徒雷登，叫他快走，没希望了。也是这段时间，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为何要对外国人说这些话，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以军委名义电令林彪、叶剑英、陈赓等，严控中越边界、调查与胡志明联络的道路等情况。“又越南如派人到广西请求帮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望告。”开始了援越的行动。12月2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等：“关于援越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实际上，1945年9月22日胡志明就要求斯大林承认他刚建立的共和国，斯大林不予理会。46年3月签订《越法初步协定》，7月胡志明访法并与法总理比多会晤，确定了越南成为自由国家并照顾了法国利益。苏联支持这个协定。就在1950年1月，胡志明也到了苏联，再次要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仍不答应，就让中国负责援越。毛泽东受宠若惊并当即决定：不同法国建交也要援越。刘少奇对黄文欢说，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说：“谁叫我们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准则都放到第二位去了。中国如果同英、法建交无疑会极大地改善新中国的外部环境，极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就不会有任何封锁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和平外交能够获得的有利条件，为什么硬要打一仗反而把它丢掉呢？难道这也算是一种“伟大胜利”吗？

1950年1月18日，我们拒绝了法国承认越南，此时包括苏联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尚未承认它。3月13日指示已在越南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对军火帮助，交通运输住织的建立”、“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提出考察意见。4月，我们开始向胡志明的卫国军（后改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并把新兵逐批接到中国来，为其换装及军事训练，使之成为正规的军队。7月陈赓、韦国清带队到越南，指挥越军打仗。我们还说服越南把军队开进了老挝和柬埔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告知越共中央：“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后来我们的军事顾问也开进了老挝。至于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世界革命面前并不重要！须知，此时并没有美国威胁中国的任何事情，甚至法国请求美军派空军协助法军作战也被美国拒绝，反倒是老美向中国频送秋波。

到日内瓦谈判时，越盟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表示，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签约。周恩来反对，称如立即停火则拿不到河内、海防及红河三角洲地区；普选于越共不利。越南本可和平建国，但那样就不是越共的天下了。毛泽东是不顾一切也要帮越共夺得天下的，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

们，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没有这个决心不行。”这也算“保家卫国”吗？“最大的民族牺牲”都要承担了，保谁的家、卫谁的国？！这个决心其实就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宁可拼掉我们自己的一切！

到六十年代，北越并没有被攻占，对我国也无任何威胁。我军照样开到越南，协助胡志明解放南方，牺牲并不亚于朝鲜战争。1966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那时的马来亚、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只要成立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我们的外交成了这样一种姿态：邻居家只要打架，咱一定得去掺和。当然得有一位自称是咱的哥儿们，用周恩来的话说：“这就叫做为朋友两肋插刀！”

十七.朝战对我们的伤害

这样的“外交”使邻国对我们敬而远之：继美、泰于1950年10月签订军事协定之后，11月20日印度军队趁机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同美国签订《美菲联防条约》；9月1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9月8日旧金山和会通过《对日和约》、日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0月1日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5年1月11日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5月15日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这些条约明显都是针对我国的。
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往中国物资的特种许可证，并禁止一切出口管制物资进入中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

如果说，美国占领了北朝鲜，东北将受到威胁，从而国无宁日成为我们出兵的充分理由的话；但抗美援朝换来如此包围及封锁，难道不是自己找来更多的麻烦吗？尤有甚者，只因为苏联否定了斯大林，我们就同它势不两立了。我们“一边倒”还换得了1963年7月《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协定》。直至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及新疆边境武装冲突。难道苏、蒙边界的威胁不是连北京都在内了吗？何以就不可怕了呢？其实无论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的原则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主义才是毛泽东至高无尚的理想。国家民族只不过是他实现这个理想的本钱，为了使这个理想在全世界实现，损失一点本钱是无所谓的。朝鲜战争从头到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宣传说朝鲜进攻韩国是内战，美国不应干涉，这是朝鲜的内政问题。但如上节所说，我们煽动东南亚国家武装夺取政权，并为此提供军事援助，是否干涉内政？1956年匈牙利事件更加只是内政，尚不成内战；苏联原来不打算出兵，恰恰是中共极力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毛泽东也说，是他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苏联才出兵的。我们还指责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苏共领导同我们

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9.6）这与我们自己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好自相矛盾。

而马克思主义正好是反对输出革命的，恩格斯1882年9月就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他的教导果真灵验，斯大林把革命输出到东欧，结果是苏联也解体了。同样，我们出动了几十万人，花了二百亿美元（1950--1978）支撑起来并由我们帮助解放了南方的越南，刚胜利就反华。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除回国的16万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计其数。并宣称中国的援助是施加压力、迫使越南改变路线的工具。接着又在南海和边境挑起领土争端。

更为甚者，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然确定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1979年8月还作为国策写进了宪法！这也算安全的环境吗？至少美国不曾以中国为头号敌人，即便朝战进行中，美国佬也只把我们作为"第二梯队"看待，更别说写进宪法了。

最终越南于1979年2月同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又是我们为支持波尔布特而打的；可连士兵的底裤都是我们供给的波尔布特，曾经拿着中国枪支屠杀了十几万柬埔寨的华人！当时以姚文元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却对双手沾满华人鲜血的波尔布特大加赞赏表示祝贺！对此，哪一个还有良心的中国人，心头能不流血？！

抗美援朝是毛为斯大林输出革命的最大举措，它博得斯大林的好感，（1960年7月，周恩来说："他（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我们终于踏进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也确实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只是，这张门票似乎太贵了！为了它，使得我们同大半个世界对立了二十多年；斯大林1950年10月3日电报所称：出兵将使"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结果正相反，非但美国没放弃台湾，反同台湾签了防卫协议，使台湾问题直拖到现在；还加快同日本缔约，并排除中国。苏联不理会中国的不满，跑去参加旧金山和会，虽因利益受损拒绝签字，但和约依旧通过了。唯一能使毛泽东宽慰的，是蒋介石也被排除在外。日本军国主义因而逃过了彻底清算，我们至今还要认真对付；日本鬼子则趁机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投机取利；中国还成了大半个世界的封锁对象，加剧了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外交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周边国家边境纠葛不断，排华事件此起彼伏；乃至于毛不得不以让地给钱的方式表现天朝大国的风度。1956年12月，周恩来访巴占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坎巨提地区割给巴方。巴基斯坦喜出望外，他们从未奢望过！此举明摆着会得罪印度，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事，天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其后又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的、蒋介石拒不承认的1941年线签订中缅边境条约，割让了数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样，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外蒙古甚至苏联的边境条约，没有一个不是以让地给钱的方式签订的。以此来挽回一个和平的国际形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印边界，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却白送九万平方公里西藏最好的土地给印度，令全世界想不通。这与清政府割地赔款又差得了多少？难怪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时，德斯坦总统也对我们的领土政策感到十分不可理解。

当苏联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时，毛的心态很不平衡，又为斯大林问题与苏联闹翻了，我们不得不两面受敌；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之后，我们只落得两袖清风。无奈之下，毛泽东捡来个不伦不类的"三个世界"理论，企望成为一群小朋友穷国家的头儿，继续在世界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领导世界革命，一会儿“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却以为我们有病！一会儿“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卡斯特罗转过身就跟着苏联骂中国。一会儿又去支援非洲革命，勒紧裤腰带省出钱来给坦、赞修铁路，毛说，宁可我们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到处援助非洲国家，人家拿完钱还是跟着西方跑。比如蒙博托，一来中国老毛就给了两亿无息贷款，人家转过身去立即跟美国套近乎。又比如拼命支持曼德拉，他当上总统后继续亲台，并说：中国人没有理由把自己解决不了的两个政权问题让别人来选择一个。

我们的人民节衣缩食，毛却拿宝贵的外汇援助阿尔巴尼亚，从50年代到1978年共计55亿美圆。即使是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也没中断。结果是1976年阿共七大成了大肆攻击中国的大会，指责6000名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即使是朝鲜，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中国宣布，朝战时期中国援助的全部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送外，再赠送八亿人民币。结果并未能阻止金日成一度反华。早在1950年10月，金日成就以“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罪名整掉了金雄、金武亭等高级将领；同时以“间谍宗派”的罪名，清洗掉朴宪永、李承烨等南方共产党；最终把方虎山等中共调拨给他的四野将领全部整掉，把南侵失败的罪责都归于朝共和中共。重用苏联派人员，实现金家王朝一统天下。

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慷人民之慨，成了最弱智的外交路线。直到1985年，吴学谦外长在全国人大会上宣布：“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重大事件，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对策。”这才算把荒唐的以意识形态定是非的“毛外交”纠正过来。

如果不是那场朝鲜战争，后来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和金钱，去同“第三世界”套近乎，争取早就可以取得的“外交胜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斯大林主义的泥坑里，以列宁、斯大林的接班人自居，沾沾自喜于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的黄粱美梦中。珍宝岛的枪响和林彪的背叛，才使他意识到内外交困的滋味不得已搞出来个“乒乓外交”。“一边倒”的代价何其沉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不再有当年那种“浪遏飞舟”和“还看今朝”的豪气。而以低八度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血雨腥风中交班的绝唱。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外交和内政，都是悲剧。

十八.结束语

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记录片中，我们看到，当停战令下达，中、美两军前线的士兵跨越昨天还在互相厮杀的阵地，拥抱在一起狂欢、畅饮的镜头；敌对双方的士兵在战线上会师，大约也是史无前例。由此，我们知道：人民是不需要战争的！战争从来就是统治者实现欲望的手段。克里姆林宫的教皇挑起了这场讨伐异教的圣战，现代十字

军的东征终于被现代文明的《停战协议》打上了休止符。马克思的《圣经》也翻过了最热闹的章节，逐渐进入尾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文明进程是无可抗拒的。无论何方神圣，也无论他曾拥有多少信徒，扭曲文明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斯大林的马前卒金日成，僵尸还泡在玻璃棺材里，接受着麻木不仁的顶礼膜拜。这项专利属斯大林所有。号称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人们，却在虔诚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着现代的“木乃伊”。是哲理的巧合还是欲念的必然，只好留待后人去评说了。不过，对现代人而言，这却是一项荒唐且不可理喻的举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会对一具僵尸敬若神灵。何况这具僵尸，曾经营造了有史以来最迷信，最封闭，最专制，也是最严酷的国度。

他是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在真像大白之下我们许多文章便不提谁先进攻，而改称朝战为内战。即便如此，金日成至少要负挑起内战的责任。蒋介石挑起内战，算是甲级战犯。金日成发动内战为什么就不是战犯？美国出钱出枪给蒋介石打内战，他成了卖国贼。那么苏联出钱出枪给金日成杀戮自己的同胞，何以就不算卖国贼？如果我们至今依然以意识形态来判断是非，岂不是把自己放到黑手党的地位上去了？老美的大人物倒也坦白，都承认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没有胜利所以就是失败。我们正相反，因为没有失败所以就是胜利。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这里，阿Q没有绿卡！

因为抗美援朝，北朝鲜人民才能沐浴着金太阳的光芒，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甚至饿殍遍野。南朝鲜人民则在“伪政权”的残暴统治下，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人均GNP由1965年的105美元到1995年的10950美元。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我们出兵，就不会有这一切。相反，在北朝鲜的博物馆里，充满了金日成一个人打败美帝的神奇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呆在极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宣传材料中，我们只不过是朝鲜人民军的配角。他们的旅游指南上甚至宣称“我们的确也从中国得到了一点点帮助。”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金家王朝注定是要完蛋的，区别只是完蛋的方式。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欢呼，抗美援朝是何等伟大，何等胜利。问题在于，我们尚不能预料的是，届时朝鲜人民会如何评价抗美援朝？他们会不会怪罪，正是抗美援朝才使他们过了几十年与南方同胞天壤之别的日子？美国佬一贯不顾血本，满世界搜寻官兵遗骸运回国安葬。而我们的烈士大都埋在异乡，他们已经被骚扰过一次了，万一又被骚扰，我们该怎么办？装傻，还是：“雄赳赳，气昂昂”一次？（完）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们公社的张书记

1969年下乡时，我回了原籍。并非选择，而是我们市里的专案组长叫的。我刚被释放，算是宽大处理，诚惶诚恐不敢有任何异议。另一方面，从小就听父亲说，我的家乡是如何如何美，又如何如何富足，早就被称为“河南省的乌克兰”。但又心存疑惑，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家乡饿死了很多人。我的本家中便饿死了十几口，如果不是一位修水利外出的堂兄写信求援，而且我母亲赶紧寄去50斤全国粮票和15元钱，恐怕还要饿死十几口。

而我戴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今生是没希望了，在那样的地方，能过得下去么？为了弄清楚我这顶帽子的分量，查问一通，终于明白：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这个结论，档案里就是这样写的。我跟他们成了同一路货了。连一线光明都失去了，那么还是回老家吧。

回到家乡，我们那个公社已经下了几百名知青。主要是郑州来的。新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我还能不能算知青？其次是算下乡还是回乡知青？这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下乡知青有安置费，一百多块钱不是个小数字，还有一年的商品粮，这马上就决定了我有没有饭吃。甚至还有地位问题，下乡知青是要比回乡知青高一等的，因为我们还处在阶级社会，除了阶级差异之外，尚有阶层问题。即使是革命干部，也有个级别问题，那是马虎不得的，连党中央的文件上，每一份都注明了传达到哪一级的字样“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要差到一个阶层的地步！

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出工了。到了这个地步，还要假积极，也算是“狗改不掉吃屎”了。活儿是挖塘泥，锹是借来的。干到晌午，队长说：“大蛮子！”这是刚获得的外号，社员们因为我从南方来，便命名了。“你还没到公社去，你们该有一些盖房钱。你一个人盖个熊呀，队里拨一间房给你住，队里落俩钱，马上开春了，化肥还没着落呢！”

下午我就到了公社知青办，那儿已经围了一群郑州知青，管知青的蔡干事正跟那些知青们争个不休，言语中我听出来这些知青已经没饭吃了，找公社解决。咱的身份未定，不敢跟人家一样理直气壮，只好怯生生地坐在一边等候。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知青办进来一个干部，鼓泡眼，镶着一颗金牙，胖墩墩的。蔡干事与那伙知青几乎同时叫道“张书记！”所不同的，是蔡干事那毕恭毕敬的神态与知青们就像是抓住了小偷的神态。这位被称为张书记的气派，完全是农村干部：“又没饭吃了是不是？你们这些个小冤家。这样吧，明天上午你们来，让队里给你们记工，开个大会，我出面讲讲。老蔡，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各队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到公社来开会。就这吧！”知青们七嘴八舌一阵，散去了。

他见我还没走，就问：“你还有啥事？”我把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等拿出来，说了我的情况。蔡干事马上答复：“你这算下乡还是回乡，我们要请示县里。”我还没拿定主意是否申辩一下，张书记开口了：“还请示个熊呀？他爹又不是社员，家又不在这，回原籍不算下乡算啥？不给人家安置费他吃啥？就按下乡办，回头跟县里报一下指标不就完了？”转过身对我说：“你到民政室把户口迁移办了，再到这来找小蔡，办手续领安置费，然后去粮管所领粮本。去吧。”没想到这事竟如此顺利，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回到村里，跟队长一说，队长说“你亏着遇见张书记，不然至少得跑几趟。这下俺队里化肥钱不落空了。俺明天叫人把队屋整一间出来，队里派人给支锅、再支张床给你住，得几天工夫。没办法，你只好先住你三老子那。苦一点吧，不是你爹当年寄粮票寄钱来，他也早饿死个逑了，那时他都睡地铺了。现在该对你好一些。”

第二天，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几十名知青挤得满满的。还有一些根本就没进来，赶集去了。老蔡主持，武装部张部长、公社李副书记先说了一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道理，接着宣布给各知青点一些春荒粮指标，自己找钱去买。最后是张书记讲话。他开门见山：“俺不会说多少大道理，跟你们这些个大学生比，只能算文盲。俺们说些实在的。刚才李书记他们说了不少知识青年跟生产队、大队的矛盾，有的还打架了。在这我要批评你们，你们跟大队生产队干部吵啥？他们说是干部，其实不还是老社员哩。一无粮本，二无工资，都是些拿工分的，啥时候不当了，还不是回家。你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按理说，觉悟应当比他们高，你们说说，要是队里有粮食，不给你们吃饱，那是队里的不是。可现在你们都看得见，社员标准一天只有七大两！一多半生产队能达到，其他的还达不到。咋办？俺们原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尽力把你们安排在好一点的生产队。是不是？没有一个知青安排在穷队的。你们自己肯定知道，队里的社员吃些啥。有困难可以反映，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再向上级反映，尽量让你们吃饱，闹啥子，解决不了问题嘛！”

有一位知青站起来：“张书记，你刚才说我们的觉悟比老社员高。请问，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怎么接受？”张书记接着说下去：“你在抓我的辫子。这没啥，毛主席说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们觉悟那么高，毛主席说这话干啥？让你们来，干活干不好，身体又吃不住，吃苦又吃不了。让你们来干啥？说白了，国家有困难，政府养不活你们，让俺们来养。俺们也不愿意养！你们一汽车一汽车地来，我希望你们一汽车一汽车地走！一个都别留下。我们并不欢迎你们，只是毛主席说了：‘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要欢迎他们’，俺没办法，只好欢迎。我说了，信不信由你们，国家松活了，你们都得走，回你们老家去，回到城里去。到那时，俺欢送，真心真意地欢送。”

这时会场里竟然响起了掌声，而且越来越响。知青们其实很喜欢说实话的人。从那以后，张书记挺受知青的欢迎。我后来听说，以前他曾经到一个青年点去，表现一下领导关怀。没想到那个大队书记进门就喊：“快站起来，张书记来看大伙来了。”一位高干子弟问：“哪里的张书记？”大队书记说：“俺们公社党委书记。”那位仁兄躺在床上：“哦，我爹的警卫员还比他官大哩。”翻过身去，把个屁股冲着门口。张书记下不了台，只好把大队书记给熊了一顿。又接着，我知道张书记是老干部。他在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还没开始时就参加了革命，在解放区

搞地方农村工作。硬是学不进文化，也就上不去。“四清”时任县里的工业局长，说了句错话：“俺是个文盲，只会写九个字：毛主席、共产党、张永昌。”结果被人揭发说他把自己和毛主席、共产党摆在一起，有野心。好在他的老上级、老战友都是地委一级干部，知道他的为人放了他一马，就下到公社当书记，68年初调到我们公社来了。但他的工资拿98块，比县委书记还高。多少有点有恃无恐，并不怕什么。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秋天。那一天，大队书记找到我，说公社张书记让去一趟。到公社一看，有一部军吉普停在公社，我知道大事不好。进了办公室，两名军官正和张书记说什么，见我来，张书记开口道：“根据上级指示，你原来在的地方需要你回去协助搞清楚一些问题。你要实事求是，有啥是啥，争取快一些了结。”两名军官也说了些类似的话。就在上汽车前，张书记送两位军官出门，居然过来跟我握手：“没啥，贫下中农的后代嘛，又是红卫兵小将，犯点错，改了就是了。快点回来，我们还欢迎你。”我当时就很感动，可也感到他似乎话中有话，我猜不出来。

这一去就是四年，虽没有挨打，但折磨得也不轻。一个人关在黑房子里，一连13个月我没见过太阳。从黑房子里出来，我的身体很弱。长期低烧，找不出原因。伊红球细胞高出正常值几十倍。撒尿必须扶着墙，不然就尿不出。还有就是，在黑房子里是尿在一个痰盂里的，我发现，只要那尿凉了，就会漂浮着猪油一样的凝块。也查不出原因。走起路来，别人说，风一吹就倒。而且，听父亲说，老家的知青早都走完了。他着实不想让我再回乡下，去求专案组给安排工作，专案组告知，让他下乡已经算便宜他了，还想得寸进尺，这绝对是白日做梦。父亲只得死了这份心。

未已，专案组限定回乡下的前一天，我忽然又得了脉管炎。左腿从股沟处到大脚趾，一条像红珊瑚般的线，弯弯曲曲有枝有杈，每天变一个走向。这条腿碰到任何东西都会疼痛钻心，根本不能走路。医院的外科主任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给找了省级权威专家会诊，用了日本出的红霉素都没法解决。医院甚至说要锯掉这条腿，否则将有可能转化成败血症，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专案组派人了解到这些情况，也就不来催我下乡了。

但我坚决不同意锯腿，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再搞成残疾，宁可死了。反正我的同学中，文革中武斗已经死了九个，另一位同学参军后排哑炮牺牲了，还有一位才子插队时上山砍柴失足坠山而死。我到他们那儿去也不孤单。但我父母亲却急坏了，四出寻医。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了一位民间草医那儿，这位老太婆从床底下弄出几个罐子，把调制好的几味药膏搅合了一下，涂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间，然后贴在我的股沟处。交代要等它自己掉下来才能去掉，并开了三副煎药。真没想到，回家后，第二天一早就不疼了。第三天那“红珊瑚”都消失了。等这片药膏脱落，我已经行走如常，没一点事了。医院的陈主任还专门去找那位草医，老太婆闭口不谈。陈主任对我说，还是住进医院，反正医药费都是专案组负责的，把身体彻底检查一下，什么病都治好再说。我又回了医院。

有这次经历，我父亲决心把我留下，找了不少关系，都没用。他忽然想到：让老家方面拒绝接收我回去。于是给大队书记写了一封信。没多久，大队书记回信了，寄了一张公社的公函，大意是说：本公社知识青年全部已招工，所有知青机构都已撤消，因此无法接收我，让本地另行安排。大队书记的信说，他去找了公社张书记，张书记

积极支持，主动说必须以组织的名义，发公函。否则没用。还说，给我们这份是征求意见的，尽快修改后寄回去，并提供专案组地址，由公社直接寄挂号信。我父亲连夜修改了那份文件，第二天寄给公社张书记亲收，还给他写了一封感激不尽的信。

一切伎俩都落空了。专案组收到了那份公函，复函称：此人户口在河南，这次来只是协助党组织完成政治任务。现已结束，本地不能安排任何外地户口的人员指标，必须回原地安排。如贵地有难处，请向河南省政府请示，由河南省政府向本省政府联络。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折腾，专案组马上行动，先是通知医院立即让我出院，否则不承担任何费用。接着派出所天天晚上来查户口，勒令我尽快离开，否则将按照盲流人员处置。就连我父母的单位、住地居委会也没闲着。这几天，我亲身体验了政权的强大力量。只好乖乖地随着两名专案组人员回老家去了。

回到公社，张书记外出没在家。公社的人见我，也还亲热。我和专案组的两位住在公社惟一一间招待室里。他们找公社干部，谁也管不了，只能等张书记。过了三天，张书记回来了。却没时间，说要传达"批林批孔"的重要精神，还有双抢的许多事，等几天再说。于是每天都由专案组出钱吃饭。公社食堂的老何悄悄告诉我，别理他，好好补补，看你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原来多精神。让他们出钱供养你一阵再说。一天我听见这两个的谈话，说要去打电话请示。原来张书记已经见了他们，要求专案组向他们那边要钱，因为所有的知青点都撤了，现在必须按照知青安置另外拿钱，盖房子、一年的生活费，另外现在正双抢，没法盖房，得等20天以后才能张罗。我在公社招待室住两个月的住宿、伙食费。否则他不接有关材料。

但那时政治运动是不计成本的。他们打过电话以后，款就汇过来了。听公社财政助理老张告诉我，那边连一分钱也没少，总数一千多块。老张说："乖乖，看来你还是个人物哩，要不，你们那都不还价。跟你来的那个姓王的说，要不是周总理保了你一句，早就枪毙了。要是真毙了也就没这么多麻烦。妈的，他们怪恨你哩。"

这天黄昏，专案组的人次日一早就要走，于是在公社小院里，张书记、专案组两位和我，坐在室外水泥的圆台旁，办理交接。张书记说，让你们等了这么久，也没办法。俺们这穷，不象你们要啥有啥。不解决好，大队安排不下去，公社也难办。现在都了了，看你们还有啥要交代的。王副组长把一个大信封，胀鼓鼓的，交给张书记。张书记说，这个我不能接，明天一早，我叫管档案的同志来签收。王组长希望马上签收，因为明天一早班车是六点的，恐怕来不及。张书记就叫来一个公社干部，让他带着去办交接手续。另一位便拿着这玩艺跟他走了。圆台边只剩我们三个。

张书记笑眯眯地问王副组长"你们给他个啥结论？"王回答："基本上维持原来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还有，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如果不行，就可以戴上，作为敌我矛盾。"张书记说："这倒是个新鲜说法。咋叫不行？啥时候戴哩？"王副组长来劲了："这个家伙很反动。他写的文章已经被康生同志定了性，是反革命文章，68年就在全国批判。这次回去，表现很不好，坚持反动立场。你们随时都可以把帽子给他戴上，比方说，现在就可以戴！"张书记的笑容没有了，看着姓王的，一拍台面，声调却并不高："我说王同志，你这是说的啥话！现在就可以戴。你们为啥不给他戴上，让我们来戴？你这不是借刀杀人么？他是俺们贫下中农的后

代，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你不是告诉我，说周总理说他是中学生，是认识问题。你这不是跟周总理唱对台戏吗？你们那边组织上没叫你这样说吧？一点政策水平都没有，我们党好些事就是叫你这样的同志搞糟的！行了，到此结束。”姓王的还想解释，张书记打断他：“不用谈了。从现在起，他就不归你们管了，你已经交差，走吧！”却把我给留下了。

张书记把办公室锁好，对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咱喝两盅。”

到了公社小饭厅，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一会，老何端上来三菜一汤，还上了大半瓶洋河大曲。说道“张书记是好人呐。起68年到俺们公社，上上下下都夸哩。你回来是回对了。”张书记说：“你别给我戴啥高帽子。戴了，我也不会照顾你。”然后斟了酒，说：“上次他们把你弄回去，我才知道你。后来你们大队书记来办不接收你的证明，先声明，不是为了帮你，我是确实不想接收。只是他们找到县里，县里叫我必须接收，所以你还回来了。你不要以为是为你才这样，不是这回事。前几天我到县里，查了你们那儿69年转过来的材料。所以今天请你吃餐饭，跟你聊聊。你还不简单呐，年纪轻轻的，弄出那么大的响动。说说看，你咋就能想起来给你的狗起个名字叫‘黄永胜’的？那会人家可是总参谋长那！”于是边吃边聊。他又问：“那会还是68年，你咋就能说：‘别看林彪摇语录本呼口号那么凶，将来叛变可能就是第一个。’说说看，你根据啥说这句话？”我告诉他，那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看不惯他那些过头话。随便说说，没想到被揭发了。他说：“年轻人敢想敢说，可也容易栽跟头。看看你，江青、康生、张春桥，哪一个你没骂，连毛主席你都敢说什么‘到了斯大林晚期’。那个王同志说的不假，没有周总理保你那句话，枪毙你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林彪垮台了，可别的还在，不能说你就是对的。得改改。”扯了一阵以后，他很认真地说：“今天算是了解你，但你必须面对现实。什么招工了，都别想了。先在公社住一阵，你们大队书记找过我，说了你家祖祖辈辈都是贫下中农，本质还是好的嘛。可以给公社广播站帮帮忙，你不是会无线电么？给小崔传授一些技术，农村很需要你们这样有知识的人的。错误还是要改，改了就好。当一辈子农民也不是不可以的嘛，扎根农村，还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身体要注意，那是革命的本钱。我看你现在不咋样，调养一阵，我帮你跟他们要了两个月的生活费，就住在公社接待室。另外还有一年的补助费，还给你那个生产队要了几百块盖屋的钱。反正铁路局有的是钱，多闹几个以后少些麻烦。你住一阵，然后再回生产队。”说完站起来，握握手，走了。

此后，虽然住在公社，也常见到张书记，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然后回了生产队。大队书记对我说，张书记给他打了招呼，叫大队尽量不要给我安排重活，身体太差了，把身体养好些再说。于是大队那些写写画画、修理钟表扩音机之类的活，都归我干。基本上就没有见过张书记了。

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一直自学，已经完成了如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清华大学的《晶体管电路》，北京铁道学院的《电工学原理》等课程的学习，又有老高三的底子，该不成问题。可是政审却没办法。又只得去找张书记，他表现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答应请示县里再答复。县里的答复很简单：回原来给我做结论的地方办。于是我知道没戏了。这时原来插队在我们公社的几位朋友叫我去帮助复习，我即去了信阳。他们后

来都考上了大学，这使我感到欣慰。1978年依然没过政审关。原来想再找一下张书记，但他已经调到地区任局长，接着离休。原来是照顾性调动。

仔细想想，假如那时没有他的同情和照顾，我会怎样呢？至少没那么多时间自学。

wenjung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怀念我的父亲

要说可怜，我总认为是父亲那一代人。

我父亲出生日，有两个巧合：出生的年份恰好是中共成立的年份，要是做秀的话，便可以称为“党的同龄人了”；而日期又是“二七”大罢工的日子。于是我记事以后，每年父亲过生日都有一个很隆重的纪念仪式，只不过那不是为了他。

父亲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他是六兄弟里的老满。一说到我的故乡，父亲就会神采飞扬，很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意味和自信。但当他好几次说到他吃奶吃到七岁时，我都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据父亲说，他的几个哥哥都读不进书，只有他能上完中学。我开始是不信的，教科书上都说，旧社会贫下中农连饭都吃不饱，给地主做牛做马，能上中学吗？问起来他就是一副尴尬的样子，欲说还休地称我们老家很富。可书上说我们老家河南，当年水、旱、黄、汤灾祸连连；就是新社会，我看到的乞丐，一多半都是河南人。老实说，有一阵我甚至怀疑，爷爷是否漏网地主，要不然我爹怎么能上中学。可是我的两个堂兄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四伯父还在部队里当过团长，似乎又不可能。直到我下乡插队回了原籍，才知道父亲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家在解放前确实“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全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村里的老辈人都说：那时读书并不是难事，就是没人愿意读。书上不长粮食。全村就你爹一个能读书，就他上了中学，在张广中学念书。那年跟他老师跑了，你爷爷奶奶急得不能行！

父亲告诉我，他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开始时，领着他们五个同学，跑到武汉投奔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谁知到了武汉那个办事处已经撤走了，只剩国民党还在坚守武汉。第二天，他们那位老师也不见了，于是五个人各自谋碗饭吃，父亲就在武汉国民党市党部的难民救济所谋到一份登记难民的差事，混得碗饭吃。直到日军进入武汉，这个救济所才最后一批逃出来，也散伙了。父亲还说，他们逃离武汉时，蒋介石夫妇还在汉口，直到日军打进武汉时才坐飞机撤离。这使我燃起强烈的好奇欲，关心起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来。那时父亲只不过17岁。

父亲说到那一段往事，最常说的是一个烧饼吃了五天的故事。他随着逃难大军南下，日本兵在身后追着，身边没钱，只有一个烧饼。饿极了就咬两口，不敢多咬，因为第二天不知道吃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五天。一直走到桂林，费尽周折才在铁路上谋到一份差事，从此就一直在铁路上。但逃难的经历一直延续到贵州边境。

就在这个大山深处，父亲随着铁路上的机构度过整个抗日战争。因为父亲有文化，所以从干粗活的工人变成了会计。后来结识了从满洲里一直逃到这里的我的母亲。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在这里结婚，再以后，我也就在这处大山中来到了人世。父亲始终在修铁路，我们的家也到处迁移。直到铁路局成立，我家也就安定下来。而父亲依旧转战在新建铁路的建设工地上，只有每个月他要到铁路局送报表，能与我们相聚两三天。

我记忆中父亲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戴着“抗美援朝预备队”符号的样子，确实是很“雄赳赳，气昂昂”的。但他终于没有去成朝鲜，这成了他的遗憾。他的另一个遗憾，就是没当上科长，最终绝望时也只是副科长。他的第三个遗憾，该是没有入党。我知道他写了无数申请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是“党的宣传员”，也就是培养对象。但始终因为在武汉的那一阵找不到证明人，也就不断在党的大家庭门口徘徊。特别是，随着历次运动的升级，他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救济所的职务被说成“书记员”，后来竟有人怀疑是“书记”，到“四清”时就成了“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而在武汉那一段全部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升得够快的了。

父亲因此面临着“历史反革命”的结局。父亲的上司王处长，解放前就与父亲同事，但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亮明身份，成了处长。他始终要求外调人员查清楚。结果，1963年终于在兰州找到了父亲的同学，通过他，又找到了另一位同学，证明那只不过是抄写匠，国民党时代可以叫做“书记员”，但父亲只是临时工而已，根本不在编制。所以连“书记员”也算不上。父亲又逃过一劫。其实，谁都能想见，一个农村出来的17岁少年，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官运”。但那个年代就是如此有“敌情观念”。那位王处长是父亲的至交，如果不是他帮着，父亲说，日子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这一段历史还影响到我，若不是一个偶然的见面，我也许将终身遗憾。

那时我在学校就红得发紫，地地道道的“圣人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校团委干部、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当我们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说我父亲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要我与他划清界限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在组织一边。一下子就觉得他面目狰狞了。可我又没办法满足书记的要求，揭发不出他究竟有什么反动的言行。于是只能搜肠刮肚地揭发一点不那么进步的言论。团委书记很不满意，那么大的一个国民党官员，怎么没有一点反动言论？作为一个团干部，就没有最起码的觉悟？我第一次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而且，那时正是阶级路线空前强调的时候，上一届学长高考刚揭晓不久，所有的家长有历史问题的学长们，除一位原我校学生会主席，曾不止一次在团委会上批判过她的右派父亲的，被武汉水电学院农田水利专业录取之外，全部落榜。而且都被送去下乡了。这些学长们我太熟悉，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有几位还是本校的尖子。他们会不会成为我的榜样？于是我面临着生平第一次苦恼。

恰在此时，我父亲从北方出差回来，到我们学校所在地下车，叫我到铁路食堂去吃午饭。他每次上局里来，都是这样做的，买上一份出差人员可以不凭票买的晕菜，看着我吃，自己则吃那五分钱素菜。流露出的满意神情，似乎比自己吃还要香。这回我却不想去了，生怕惹来什么麻烦。请示后团委书记却叫我去，说是要在政治上划清界

限，生活上不必分开。进了那食堂，父亲就站起来招呼我，依旧是那慈祥的笑容，和满怀希望的眼神。他已经买好饭菜在等我了。我觉得很尴尬，慈父？历史反革命？

坐定之后吃饭，父亲发现我的神情不对，问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就干脆问他，究竟在国民党里干了些什么？没想到这回论到他神情不对了。他把武汉市的事跟我讲了，然后说，两年以前单位就告诉他，证明人已经找到，那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怎么你们学校会这样？接着说下午去我们学校，找领导说这事。我觉得不妥，因为书记已交代我不要跟他直说这事的。我建议他去找王处长，由组织上出面好一些。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是那个揭发父亲的人给校党总支写了封信，党总支书记就转给团委书记，他才找我的。父亲说，王处长当着父亲的面，在电话里把我校党总支书记骂了一顿，责怪他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就乱搞，只需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并要求查清那个写信的人，一定要处分。而校总支书记则推说，并没有叫团委书记怎么样，只是他自己小题大做的。

这件事给我太深的印象，那时说的“八分钱，管半年”的厉害，我竟然早早尝到了。我想，假如当时父亲没有及时出差归来，或者不论什么理由再拖上一阵，我会不会给父亲泼脏水呢？或许我从此变成一个邪恶小人，连父亲也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并非易事。而那个写信人的理由，居然只是我父亲长期不提拔、不调走，于是他也接不了这个位置而已。他被处分的后果之一，便是文革时，他狠狠地把我父亲打了一顿，算是出了口鸟气，这是后话。

儿时的印象，父亲是慈祥的。我长这么大，只挨他打过一次，用尺子打手掌三下。原因是我偷吃了邻居家的饼干。那是1960年，这件事在父亲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没想到在他不久于人世之时，竟然会回忆起这件事，说：“我不该打你的。我没办法买饼干给你吃，应该是我的错。”我当时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年代，有几个父亲能给孩子买饼干吃呢？即使是我偷了饼干的那个邻居，也不过是去北京开会，与会人员可以买一盒“香草饼干”，带回来后撕开蜡纸，给他的孩子吃。我乞求他的孩子给我吃一点，他不肯。于是乘着他母亲在厨房的工夫，进他家偷了两片。愚不可及的是，我竟然跑到他面前炫耀：你不给我也有！于是他哭着告诉他妈，那妇人进家一数，少了两片。我就被人赃俱获成了偷儿了。

父亲那执着的“望子成龙”心态，我有太多的体会。那时他是单位的总会计，工资相对而言还算高的。只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一分配就少了。因为他的单位专修铁路，父亲也就常年在外吃食堂。他单位上的同事，几乎都知道，我父亲总是吃五分钱的菜，而且烟、酒、茶都不沾。父亲的徒弟和好朋友陈叔叔就对我说：“你爸爸就像香港片《荣华梦》里的那个人，要是你们不争气，那就太对不起他了。”确实，每次听说父亲回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高兴得如同过节，因为总有好吃的，尽管很少。

父亲没有在文革以前的运动中倒过霉，因为他极谨慎，但也从不整别人。我就听过他的处长批评过他，说他在运动中不够积极，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1957年反右，原来教我们图画课的刘老师成了右派，我和几个孩子曾

跟在他身后辱骂他，他回过头来说：“你们还小，长大了就会知道的。”当时不理解这句话，回家问父亲，他正色警告我：“以后不许这样，欺负弱者是可耻的。”并不许我再提这件事。

但他也并非平安无事。听到过他说起好几个他的熟人、同事，只因在国民党里有职务，“肃反、镇反”时被枪毙、判刑了，脸上仍有惊弓之鸟的余悸。“三反五反”时他在外地查别人的帐，有其他人来我家查他。原因只是我小时候曾经戴过一副金镯子，那是姥爷回青岛时留给我的。母亲解释了许久，还有左邻右舍证明，加上那位王处长本人也知道这回事，遂作罢。母亲气愤地说：“妈的，旧社会哪家没有点金子？这不是故意的才怪！”她要父亲去找领导说明白，用秋菊的话说就是“讨个说法”。父亲劝她算了。

母亲还说过一件往事：解放前夕，一连好几个月没发工资。好不容易上边弄到一批光洋补发工资。原来工资只是由监工领取再发给工人的，父亲听说有的监工把值钱的光洋换成不值钱的金圆券，于是决定亲自发给工人。等都领完了，已过了吃饭时间。母亲把饭送过去，父亲还在算账。这时一个监工来了，他走到父亲身后，忽然拿出一个铁锤，举起来就砸向父亲的后脑，母亲情急之中抓起一个算盘，挡住了铁锤。算盘碎了，父亲的命也保住了。那个监工为了换这批光洋，弄来一大堆金圆券，没想到父亲此举坏了他的事不说，金圆券又贬值了，他反而欠了债。恼羞成怒干出这事来。听到母亲呼救后来了许多人，大家把那监工送去警察局，他骂我父亲吃饱了撑的，父亲则要他将心比心，害别人的事是做不得的。

1958年“放卫星”，报纸上登载了广西鹿寨县日产钢铁20万吨。父亲看着报纸就忍不住说：“不可能。”旁边的人问为什么？父亲给他们算了20万吨钢铁，至少要用40万吨铁矿石；至少同样多的煤。而这些当地都不产。用火车运的话，至少要每天250列车皮。而那个火车站连5列车都接不了。没想到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攻击党报造谣。当时还是王处长给大事化小的，因为他很欣赏父亲的工作能力。不过他也明说：“不能入党是不可能当科长的。”于是我父亲的级别与工资，都是从1956年到1991年去世都没变。原本1979年调资是该变的，只因他为了解决我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就是我排行老大，又招工无门。）1978年办了病退，让我顶职，也就没戏了。

没想到一生都谨小慎微的父亲，却养了个极不安分守己的儿子。我记得他是不怎么看书的，家中除了他的会计业务书之外，只有《毛选》。原来有三卷，后来又出了第四卷。父亲和其他人一样，积极订购。但买回来之后，我就没见他翻过。倒是我还读得多，至今仍记得那书皮是土黄色的，上边有毛泽东的侧面浮雕头像。我只是读它的注释，查着字典读，全都读完了，甚至不止一遍。到小学五年级，我当了铁路局图书馆的业余借书员，如饥似渴地看小说，父亲说我：“不务正业，尽看些杂书。”但我并不能自拔，他也没有深究。这个业余借书员我便一直当到高中毕业。现在回想，这个差事确实令我终身受益。

1965年秋冬，我们上高三时，整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我本来就是热中于哲学、社会科学学习的，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那些“青年人要打倒老年人”、“考试的方法把学生当敌人对

待”等最高指示，极为对我的胃口。很快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1966年的三月份，我和另一位同学便高举义旗，在校内“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比“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要早。结果铁路局就派了工作组，以“四清”名义搞运动了。到文革正式开始，便成了“‘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由科级换成处级，后来工作组被撤，我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聊以自慰的是，我不许斗争老师，反而为工作组整的四位教师平反；也不搞“破四旧”。没几天，人们忽然发现我父亲是会计而不是工人，因此我也不是“红五类”，而是“灰五类”，于是算“右派翻天”，入了另册。

这段时间，父亲的信特别多，告诫我千万不要乱说话，历次运动都是乱说话的挨整。一旦挨上，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并不理会。直到新成立的“红五类”革筹发现，没搞“破四旧”是个原则问题，斗争大方向冲着我来了，连我的被褥、盆、桶都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扔掉，我就爬火车回家。父亲忧心忡忡，仔细问了我在校的情况，要我回学校向组织上承认错误。我不干，坚持要到北京去。那时铁路职工都有因私免票的，于是父亲帮我开了一张到北京的免票，拿了十块钱，跑了。那是66年9月初。

直到国庆检阅之后，靠着在东单体育场交换的回程车票，我跑了青岛、南京、上海、广州、长沙，当然没拉下韶山。再回校领导同学们推翻了“红五类”组成的“校革筹”，煽动全校师生都去串联，并介绍串联的亲身经验，学校就空了。父亲始终忧心忡忡，担心迟早我会出事。不断托人带话，叫我退出运动。直到1967年我已成了全市的核心人物，中央也一再表态支持，周总理也表扬说：“矛头向上，很有劲。”他才将信将疑地给予支持。

1968年7月，恰好我的“二十一大寿”那一天，周恩来领着当时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只差毛、林两位没到场，在人民大会堂宣告了我们这一派的“政治死刑”。针对我的指控有三条：首先是那篇被全国批判的文章；接着有人控告我给自己的狗取名叫“黄永胜”。这是真的。那时我们得了一只小黄狗，正商量取名时恰好宣布那位上将荣任总参谋长，于是大伙就这样给狗取名了。我没有推脱责任。当时台上那位上将先生脸都绿了；再接着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康生立即表态：“看看你们都是些什么人！”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而周总理说我“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也就是这次说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那位揭发人竟然是我从小就玩在一起的“大哥”！他父亲解放初期是我父亲管辖之下的普通工人，病故之后，我父亲为他们孤儿寡母争取到抚恤金，有了生活保障。而当他考不上高中时，又竭力为他找到工作。他那位善良的母亲常到我家，念叨着我父亲的恩德。而我母亲也常到他家，看望那位既没文化、又无工作的小老太婆，不时搞些小恩小惠。没想到这时居然是他在关键时刻造一个谣来为我“雪上加霜”。尽管我很清楚这决不会是他自己的创意，（后来他母亲也向我母亲解释了这一点，恳求原谅。）但我至今也不理他。因为他的“揭发”印入了传达的文件，我父亲被批斗时就成了“中央定性”的“历史反革命”，不知多挨了多少拳脚。而他也借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直至被“处遗”。

转眼到了1968年冬天，我从北京的监狱里押回省会批斗。那天在好几万人的批斗会上，我挂着大铁牌跪在主席台前，忽然发现父亲也挂着牌子站在台下陪斗。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知道，父亲不是当权派，也没参加组织活动，要不是因为我，父亲是决不会遭此厄运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老爸，实在是对不起了。"批斗大会结束后，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父亲，寝食不安。第二天我被转到另一个城市批斗时，完全在想着父亲的往事和现在的处境，禁不住泪流不止。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痛哭，以至于批斗大会都失去了预定的"火药味"。专案组只得把我弄下台来，我依旧说不出话，只是哭。没想到后来专案组竟然把这作为他们的政绩，把这件事说成是"批斗大会狠狠地触及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灵魂"的范例。

1969年9月，我终于被"宽大处理"。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老爸道歉。他笑一笑，很宽容地说："已经过去了，你也没办法的。"这时我才知道，他也被批斗了许多次，还挨打得不轻。现在已经被放到养路工区砸洋镐去了。从来都是父亲连累儿女，这次倒过来，是我连累了父亲。但他毫不见怪，就连母亲有时责怪我，他还要帮着我，叫母亲不要乱说。然后张罗着我回原籍插队所必须的物件，尽其所能，毫不吝惜。

1970年10月，我又被抓回来关在父亲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对"五一六"的清查。这一关就是四年。我的身体虚弱得无以复加。其实林彪事件之后不久，所谓"五一六"的假案便结束了，只是因为专案组还需要体面地下台，多关了我两年。1973年春节前，后来调进专案组外围工作的我家的邻居要回家过年，专案组叫我写一封信回家，还让带一些东西回来。我写好以后，那位姓王的副组长说："这是党对你的关怀，你看，组织上想得多周到。连你没有想到的事也帮你想到了。"我一听此语，立即把信撕掉了，然后告诉他："我不需要什么，有你们组织上的关怀就够了。"没想到春节后，专案组军人彭组长给我送来好几斤腊味，还有别的用品。告知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还有你父亲的一封信，好好看看，然后写一封回信。对了，另外还带给你二十块钱。"

父亲的信凝着一片深情，尽管里边有"好好交代问题"之类，我很明白，那是应景甚至作为条件才写的。只有那些注意身体，来日方长之类才是真心话。关于几个弟弟、妹妹都已招工的消息，无异于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回了信，只有几行，至今记得很清楚的："收到所捎的钱和物品，见到带来的信，想起了唐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天下最亲的还是父母，其他都是假的。"彭组长看了，一言不发。拿过一个信封，让我写上地址，就拿走了。我原以为这封信他们不会给寄的，看来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了。后来问到父亲，他说收到了，并责怪我不该在这信里说那样刺眼的话，"容易给人家抓辫子"。

1974年春节让我回家了，但要在年三十回来。因为他们要安排另一位被关的我的同学回家，不想让我们见面。但我回家后根本不予理会，父亲自然十分担心，不时问会不会带来恶果。但见到我的身体状况，又不好说得太多。结果这个春节，父亲的心情是顾虑重重的。我一直住到年初五不说，还去找了那位同学。交流了清查的情况。当然后来也为此付出一些代价。其后，大约在四月，一切终于结束。允许我回家治病一个月，在铁路医院治疗则由

专案组负担（其实是不必交钱），如果到其他医院治疗则费用自负。然后下乡。

那时我的身体极差。伊红球细胞超过正常值许多倍；皮肤上只要画一下就会鼓起来；撒尿必须扶着墙，否则就尿不出；如果尿在痰盂里，凉了就会凝出些猪油似的漂浮物；腰椎间盘脱出，随时都可能动不了；肝功能除转氨酶正常之外，其余都是阳性。父亲急坏了，铁路医院那些老医生都是父亲的朋友，大多数医生也都是我的派友，只是查不出病因来。在十几次化验之后，化验主任金伯伯终于查出有钩虫，对症下药那伊红球就下来了。理疗加针灸，腰椎也好多了。

父亲则千方百计找关系，想不让我下乡。甚至直接到铁路局的总专案组，乞求他们关照，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时间很快过去，专案组限定了离开的时间。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到期的前一天，我的左腿忽然疼痛起来，从腹沟处到大脚趾，一条红珊瑚似的线清清楚楚，有枝有杈，而且每天变一个走向。父亲的好友、外科陈主任找来了省里最权威的专家，也动用了那时极珍贵的日本红霉素，均无好转迹象。专案组来人送我下乡的，见此情况也没办法。最后陈主任说，看来是脉管炎。这是要锯腿的，不然会引起败血症，那就没救了。

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政治生命已经了结，身体又马上要成为残废。这样活下去就毫无意义了。我坚决拒绝手术，宁可死了拉倒。武斗时我校的同学已经死了九位（高三级的就占七位），后来参军的一位排哑炮牺牲了，他弟弟接着在插队的地方上山砍柴摔死了。我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对于死并不在乎，到阴间也还有许多伙伴。但父亲不这么想，他苦口婆心叫我一定要看远一点，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特别是当我拒绝治疗，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医院回家之后，他更是着急，一遍一遍地劝。当时我的心情很烦躁，无论怎样冲着他发火，他也不生气。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他居然说出了“锯了腿就可以不用下乡”的话来。我对他吼道：“你胡说八道！”他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接着我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说：“我不说了。你千万不要发火，那会加重病情的。”抹去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冷静下来以后，我很后悔对父亲发火。他还有哪一点对不起我呢？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我们养大，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头脑发热，听不进他的话造成的。他受我的连累，挨打挨斗，却无怨言。为了我的工作问题，他不顾老脸，四处求人找关系，低三下四的话说尽。今天说这话也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实情。我是太过分了，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实在是毫无道理。忽然想起中学课文里那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父亲一门心思不想让我下乡，尽管首先怕的是危及我的生命，但把锯腿跟不下乡联系起来，也算是应了那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同时，他和母亲还在四出打听，寻找民间医生和验方。而我的腿开始肿了，一碰就疼得钻心。陈主任也来家中，说并没有确诊，回医院有更好的条件等。终于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带我去一个草医家里，据说她治无名肿毒、毒虫叮咬靠祖传秘方，效果很好。这老太婆住在一个破烂的棚屋里，脏乱的床底下，摆着一排瓦罐。看了我的腿以后，就调了一点药膏，放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心，贴在我的左腿腹沟处。叫不要揭掉，等它自己脱落。奇迹就这样

发生了。第二天醒来，这条腿居然不疼不肿了，“红珊瑚”也消褪了许多。再过一天，就全看不见了。我试着下地，也一切正常。只是还有一点胀胀的感觉而已。

我看到父亲那由衷的高兴。但我的出路依旧是他揪心的牵挂，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操心。这天他绞尽脑汁之后，忽然想起来，可以让老家方面帮忙。于是他就给大队书记写信，意思是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回乡下以后对大队也是个负担。希望大队找公社，出个证明，拒绝让我回去。大队书记回信说，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已经招工走完了，知青点早已不存在。他跟公社书记说了这事，张书记说，只要我们自己要求，公社方面一定给以协助。还寄了个公函草案来，让我们修改后，直接寄到公社去。由公社直接对专案组发公函，并请提供专案组的地址。父亲接到这封信，竟然高兴得唱起来：“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这才知道，父亲原来还会唱歌！

可我更清楚，他是高兴得太早了。如此雕虫小技，是不可能得逞的。我跟那个专案组纠缠了这些年，都已经知己知彼。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一段时间，是以为我已病入膏肓，所以没来打扰，一旦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就会紧锣密鼓行动起来。早在1969年，局专案组大组长就告诉我，省革委主任有话：此人有煽动性，不宜留在本地。那时我还是“认罪态度很好”的。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我自己都认为是“顽固透顶”了，他们怎么会让我留下？在这方面，父亲只是幼儿园水平。

果然，专案组收到公社的公函以后，马上就觉察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两位成员到我家时，我正和另一位好友在后院忙着给人家做柜子。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又锯又刨的，直到一位邻居问他们：“同志，请问你们找谁？”我才发现他们。那位王副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恢复得不错嘛！”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起回农村的事来。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那时父亲早已经被“落实政策”贬到120公里以外的铁路水泥厂当财务主任去了。他们并不怕辛苦，驱车到了父亲的单位。等父亲回家来，果然像被霜打过的柿子，无精打采。这回轮到我来安慰父亲：天无绝人之路，您已经完成了做父亲的使命。我也不是小孩子，没理由老是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等我完成这批活以后再走。谁知父亲厉声说道：“你还说了啥？都二十七岁的人了，怎么一点理智都没有？你想，他们要是告上去，会有什么后果？你惹的事还少吗？”于是我知道，那个姓王的一定告状了。

我当时接下一批柜子的活，共十二个。每个的工钱25元，只做好了六个。我对姓王的说，等一个月，我做完了就跟你们走。他不同意，并威胁说，要强制押送我走。我笑着对他说：“那是你的权力。但我告诉你，狗急了会跳墙的。我只要还活着，总能找到你。我用一条命换你全家，咱们到阴间再斗，总可以吧？”他马上大声吼道：“你敢！”我那位伙计也是插青，他父亲原是北大毕业生，1946年参加革命，后来南下。1957年成了右派，贬到一个县里当教师。1968年被当时的县革委会骗回去“群众专政”杀害了。而且还连累到他不能招工。这时在一旁也凑热闹：“现在就干，我帮忙。”说着一斧头砍在木墩上。姓王的对另一位说：“走！”便离开了。

我对父亲说："不会怎么样的。告上去我就不承认，我成这样全是他害的。13个月没让我放一次风，太阳是方的还是圆的都不知道，一个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我没发疯已经万幸了！铁路局军管会俞主任来视察，我提抗议说：希特勒的集中营也给放风。俞主任责问他为什么不给放风？他说没那回事，每天都放。实际是每天一早从房间到厕所，洗漱兼倒马桶。经过不到十米的内走廊，根本不见天日。这家伙心黑得很，欺软怕硬，你不给他点厉害的，他还会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而且，我的结论是局里下过的。专案组就他们三个，那个解放军来的彭组长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你不必太担心。"

这次，不知何故，专案组通知我父亲，考虑到我的身体需要恢复，并观察旧病会不会复发，同意两个月以后再走。我看着父亲那感激不尽的神态，不由得觉得可怜。他小小年纪离家，就在日寇的铁蹄下逃亡。兵荒马乱的年代过去，代之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运动。战乱还可以逃避，而运动却是无法逃避的。只能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他已经习惯于谨慎，自从那次有惊无险的评论鹿寨炼钢事件之后，更是如此。我从小就发现，只要他跟母亲说什么，总是要关闭门窗，低声说话的。没想到"躲鬼躲进城隍庙"，被我连累挨了斗。对组织上任何怀柔之举，都会感激不尽。根本没有任何自我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他的舔犊之情却十分浓厚，好像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把子女供养出息，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不要说吃好穿好，就连烟、酒、茶都不沾一点边。而子女们的要求，却是无条件地满足。我的一个弟弟在农村给他发电报，让寄80元钱去。他连一分钟都没耽误，马上电汇。然后才写信问他要这钱做什么。80元当时并非小数，几乎顶他一个月的工资。谁知我这老弟只是口袋没钱了而已。后来我把这老弟骂了个狗血喷头。

两个月的限期将尽，父母亲都被他们的单位领导警告，不能让我再拖；居委会也三天两头到家，催促我做好走的准备；更要命的是，派出所不时半夜查户口，威胁说要把我当盲流人员抓走；就连铁路医院也不给挂号了。无产阶级专政那无孔不入的强大威力，我算有了深刻体会。我知道他最怕热，每天晚饭后都要在家门前的空地上摆张椅子乘凉。临行前我用剩余的木料给父亲做了一张折叠躺椅，这张躺椅他很喜欢，一直用到人生的尽头。后来每见到他很舒服地躺在上面摇蒲扇，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报答的满足感，甜丝丝的。

回到农村后便我行我素，很少跟家里联系，也不需要家里给钱。经常突然回到家，父亲就要问长问短。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也就没说出我的活动情况。只告诉他我在自学大学课程而已，于是他很高兴，但立即又为我的弟弟们没心思学习而苦恼。我对他说，你已经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他们都已成人，又都有工作。你们为我们辛苦了大半生，现在就别管了。我还开玩笑地说："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人人顾自己，上帝顾大家。'"他居然认真地问："列宁真的这样说吗？好像这不太符合毛泽东思想。"

1976年1月9日，我在家睡觉还没起床，父亲习惯听早新闻，从我为父亲制作的收音机里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一翻身跳下床，听完新闻，马上自做了一个黑袖章，戴上。父亲说："要不是总理那句话，你可能真的完

了。应该戴孝。”没想到刚到中午，许多好心的邻居，都是铁路上的科级干部，纷纷向我的父母劝说，叫我不要再惹事了，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严防阶级敌人趁机作乱，没有组织安排，严禁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父亲又心慌了，叫我取下那个黑纱来。以免惹麻烦。我不耐烦了，问他：“你活得累不累？谁还能把我怎么样？难道给周总理戴孝也有罪吗？我情愿了。”他于是也不出声了。后来我才听说，有人问他我给谁戴孝时，他回答：给他爷爷。其实我爷爷奶奶早就去世20多年了。眼看着那麻木不仁的环境，实在是憋气。9日晚上，我买票上北京，一路上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都是极其隆重的哀悼景象，火车站和看得见的汽车，差不多都挂着黑纱白花，对比我们那儿，反差太强烈了。我想，大多数人民心中有数，即使压抑着，时间也不会太长的。惟一的遗憾就是老毛干嘛没死在前面？不由得想起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1日一早到京，赶上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这年春节，我的三个弟弟、妹妹结婚。父亲只能给他们每人两百块钱。看着他们那不甚愉快的样子，特别是打电报向父亲要钱那个弟弟的老婆，明白地发牢骚嫌少。我把我的三千元存款取出来，给父亲。让他去打发这几个儿女。父亲大吃一惊，马上问我这么多钱是那里来的？我告诉他，除了做木工之外，还有就是每年从南方往北方买卖种子挣的。父亲说：“这叫投机倒把，迟早要出事。你还是到公安局自首吧！给查出来更严重的。”并坚决不接这钱。我一怒之下，给几个弟妹每人几百，揣着剩下的上火车到郑州过年去了。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怎么会生养出我这样的儿子来。

1978年秋，父亲打定主意搞病退让我顶班。我不干，问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回来上班？到这个铁路上来，我只能当一辈子工人。这两年考大学，你也没少费力气，结果铁路局坚决不给任何手续，结果连报名也报不上。我回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在农村，我自由自在，谁也不管。挣钱并不比当工人少，没必要费那个力气。他说，那个户口在农村，总不是个好事。我说户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理他干啥？父亲又说，不解决工作问题，很难结婚。我哈哈大笑，说你太小看你儿子了，别以为没人要我，只是我不想。结了婚，生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岂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你有两个孙子，还有两个外孙，该知足了。什么时候我平反了，什么时候考虑结婚。不用你操心。他又叫我去找铁路局，哪怕是落实政策也是好的。我又拒绝了，告诉他，现在的形势明摆着，他们迟早要给我平反。我决不会去求他们的。总之谈不拢。

但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开始办了。他原本就有血压高，加上许多原来的领导、同事官复原职，又因为顶职的是我，热心人不少。到年底前不过十来天，顶职的文件批了下来，我一听就明确宣布：不干。父亲一听，血压立即升高，而且一进医院就不让出来了，住进了观察室。我只好投降，反正看情况再说。而且我还知道，父亲是在他的科长梦就要实现时决定放弃的，再加上加工资的方案已经确定，他铁定有两级可加。做出如此牺牲，我再不领情，肯定会被口水淹死！我一同意，他的血压就下来了。接着亲自陪我回老家办手续。等我们办完全部手续，赶回县城，在县招待所发现登记有两位我们铁路局的出差人员。我料定又是搞外调的，这年平反、落实政策的特别多，我已经

接待了好几批外调人员。父亲让我去找他们一下，如果确实是找我的，就告诉人家我们走了，不要让人家白跑一趟。我不肯。没想到这老先生自己悄悄去找了人家，但这一找却把他的血压又调上来了：那两位告诉我父亲，上级要给我落实政策，他们是来办我回去安排工作的。而且要赶在年底以前办完！父亲付出如此代价，结果是帮人家凑政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还得安慰他老半天。

虽然退休以后，父亲马上就有单位回聘，聘用工资加上退休工资，远不是加两级所能比的，心理上多少有一点平衡。但没有当上科长，他不时说出些遗憾。这种遗憾没有延续多久。地方上要建一条地方铁路，希望铁路局派员或推荐离退休人员协助，父亲可算是最佳人选：从解放前开始，他一直从事新建铁路的工程财务工作。而地方上这个职位是以厅级待遇设置的。于是父亲有轿车用，出差可以坐软卧、飞机。我笑道："没当成科长，却当上厅长了。"为的是让他愉快以利健康。但父亲并不是只计较名利的人，很快就做出了他的贡献。

这条铁路的初步设计早就完成了。当时一个编组站按照长官意志安排了地点，重新讨论通过这个设计时，原定这个编组站的领导人已经在中央任职，而且地位显赫。于是这个设计就无人说三道四，准备通过。父亲感觉有问题，如果这个编组站摆在江的另一边，投资将减少两个亿！且更有利于将来与一条新的国铁干线衔接，那时又将省下一笔衔接工程费，估计也上亿。谁知他把想法一提出来，立即遭到省建委主任的反对。理由是：这是某某同志定的，不能改。别人也就顺水推舟附和了。

父亲不死心，回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事关人民的血汗钱，凭什么就因为一个当官的糟蹋掉？但你应该拿出依据，据理再争。我相信省里的新领导未必就不听。于是父亲找到他的老友、铁路局总工程师、基建处处长等人，查出档案里过去的选线资料，然后父亲又根据新旧物价差、定额差等，作了个财务比较方案。当这个方案经指挥长送交省领导时，他们马上就对两三个亿的投资差发生了兴趣。最后，那个按照长官意志决定的设计被修改了，实际施工虽然有物价上涨的因素，还是比原方案少花一亿多。父亲高兴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1985年到处办服务公司，我们厂里也办了一个。我出任总经理。一年后这个没花厂里一分钱的公司从无到有，资产已达120多万。还不计厂里职工得到的实惠。但新调来的厂长要动用公司的钱，我不准。于是他派人到处调查，想找出我的问题。结果自然是白搭。但我很不开心，兼之原来说要选厂长，我的呼声最高。上边不同意。我明白了，平反是一回事，用人时相当于我还没平反。于是我要求辞职。父亲又急坏了，坚决不同意。在他眼里，铁饭碗是最神圣的，单干是最低贱的。我不理会他的反对交了辞职报告，他却托人想收回来。我没管那报告批不批，只身空手去了深圳。厂里威胁要开除我，他更是找到上一级的处长，那是他过去的部下。于是我在深圳干自己的，厂里也没任何动作。直到1987年春节，省长在团拜会上给父亲拜年，顺便问到我的情况时，他说了。得到的回答是：铁路是条河，地方是个海。以他的才干，在铁路上是屈才的，让他自己干更好。对于父亲而言，领导的话有特别的说服力，于是我就成了个体户。

平反以后我结了婚，妻子是我妹妹的同学。儿子一出世，父亲高兴得眉开眼笑，虽然他一再想要个孙女，结果仍是光头。我们夫妻都不是每天回家，儿子就跟着爷爷奶奶。等我到了深圳，就更不能回家了。做生意不容易，反复也大。1989年春节期间，有一天从大连回家探亲的妹妹悄悄告诉我，她作为医生，知道父亲已无药救。说着就哭起来了。我大吃一惊，看上去很健康的父亲，怎么会这样？妹妹说，这次回来探亲，她带老爸作了反复检查，现已证实他得的是肾动脉硬化，而且正在恶化。她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病造成肾供血不足，会导致尿毒症，何况父亲还有好几种心血管疾病。

这对我的打击就大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找到医学院我同学的丈夫，他是在美国进修学位并取得成就后回国的。证实了这种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的方法，就连药物缓解延续生命都没有理想的效果。不像脑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都还有药控制。这样，我只能接受现实。在我看来，生命更应该讲究质量，而非数量。乘着现在他很还健康的体魄，一定要让他出去旅游。不然病情恶化，想走也走不动了。回家以后便动员父亲和母亲一起出去旅游。父亲特别喜欢我的儿子，简直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于是我就叫儿子去动员他的爷爷。不知这小子怎么说的，他爷爷居然同意了。之后我问儿子：“你是怎样劝爷爷的？”他说：“我叫爷爷去旅游，回来给我讲故事。我要听云南、泰山、三峡的故事。爷爷就说好，回来一定给你讲。”结果，父亲果然选定了昆明---成都---重庆---三峡---武汉这样的行程。孙子的话，对他说来比什么都重要。加上我姥爷也将庆祝百岁华诞，母亲想去祝寿，于是加上转青岛过泰安的行程。

那时我的生意刚刚转危为安，资金还是很紧张。为使他能在外舒适一些，我给了六千元钱。他拒绝了，说自己的积蓄已足够。我知道他习惯于一分钱掰两半花，就对他说：“姥姥说过：‘穷家富路，出门装阔气。’你不要总是去找那些小旅馆、小饭店，吃好一点，住好一点，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福了。再说，省那一点钱，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并不划算。钱这个东西，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花。钱要是不能花，擦屁股都打滑。退一步讲，出门不比在家里，多拿些钱防备万一，总是好的，有备无患嘛。”他这才接了。

他和母亲飞到昆明，再经过峨眉山、成都，到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到青岛，为我姥爷祝了百岁大寿。在回程时上了泰山、拜了孔庙。这一趟旅游，使他心旷神怡，见到他神采奕奕的样子，我既高兴又伤心，想到很快他就会躺倒在病床上，直至生命结束。而我们刚刚好起来，他竟不能接受我们的报答，实在可叹。1990年除夕下午，我把公司的事处理完，想到父亲时日无多，赶紧向会计要了钱，找到一位卖五金交电的朋友，硬叫他回店撕开封条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PANASONIC 25寸立体声彩电。我要换掉那台17寸飞跃，让父亲好好地看春节联欢晚会。也许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果然，没过多久，他的不适就与日俱增。然后住进医院，尿毒症逐渐加重，尽管明知会影响心脏，也只得靠血透度日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还得瞒着他、安慰他。1990年5月8日夜里，我们领着儿子去医院，小子叫爷爷讲

故事，我说：“你这么大了，爷爷又有病，还讲什么故事？”父亲却乐不可支地跟他讲昆仑关大捷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父亲那时作为铁路员工支援队的一员，亲历了昆仑关战役。讲到杜聿明的部队攻坚时，儿子问他爷爷：“那时有没有‘飞毛腿’导弹呀？”父亲笑了，正好医生推着氧气瓶进来为另一位病人输氧，他指着那氧气瓶对我儿子说：“你看，‘飞毛腿’来了。”病房里一阵欢笑。

眼看时间已经到了11点，我叫儿子说：“爷爷要休息了，我们回家吧。”儿子说：“爷爷，打日本的故事好听，明天还给我讲。”父亲叫他明天早点来。我们走后，留在医院里是我三弟。12点半左右，三弟通知说：“老爸不行了！”我立即叫司机开车过来，赶到医院，终于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他已经因心力衰竭离开了人世。我问三弟，老爸最后说了什么？三弟说，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想死，还要给斐斐讲故事。”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怜的父亲，为儿女们操心还不够，临终仍挂记着孙子！

父亲的丧事并没有张扬，人死如灯灭，没必要搞那么些仪式。孝敬只应该在他生前。火化式只有几十位亲朋好友，他原来的单位、同事我都没有通知。我自己做的悼词，简单地回顾了他艰难的一生和对我们的尽心抚养，忍不住伤心泪下。说到我们刚有报答你的能力，你却匆忙离我们而去，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父亲火化前，我们找不出他有哪一套衣服是像样的，打算给他赶制一套。但母亲说，他生前交代要穿那套铁路制服，那是他最好的一套服装了。于是他穿着他心爱的铁路灰制服化作一缕青烟，升腾到高天里去了。就在父亲进入火化炉的时候，我儿子“哇”地哭出声来：“爷爷，谁给我讲故事呀？”

夜里，我们几个儿女在母亲的召集下聚在家里。母亲拿出一本存折，还有一个账本。母亲说：“这是你们老爸留下来的，你们孝敬他的钱，他全都存起来了，账本上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过：万一我不在了，把这些钱都还给孩子们。一代抚养一代，是人的天职。他们都能事业有成，都能抚养好他们的孩子，就是对我最大的孝敬。”听完母亲的话，我们全都哭了起来。传看那个账本，干了一辈子会计的父亲，记得非常详细。我们逢年过节给他的孝敬钱、我给他的旅游费，全都原封不动记在账上。两个妹妹哭得泪人儿似的，特别是大连回来的大妹妹，当她看到她给父亲买药的500元，父亲没有买药却把它记在账本里时，一下子号啕起来：“老爸，你怎么这样啊！”

我们流着泪表示：这些钱决不能拿。全部留给母亲。母亲推脱不掉，说：“那我就保管起来，我有退休金，够我生活的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再拿回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

wenjunq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4

1965年11月，照惯例，我们学校高中部要到农村劳动，为期一周。此时正是秋收割晚稻的季节。于是行军，走到离校20多公里的太阳村公社。

那时，我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部长。又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还是学雷锋积极分子。一句话，是一个标准、地道的“圣人蛋”。

到了村里，我带着几名积极争取入团的同学，搭伙在全村最穷的人家。大队书记介绍说，他叫廖火生，绝对的雇农，解放时，全村的人都逃到山上，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村里迎接解放军。还把大地主家的全部钥匙交给了解放军。后来成为这一带第一任贫协主席，但没文化也就如此而已。大队一开始并不希望我们到他家搭伙，说哪一家都比他家强。但我坚持要体验一下，何况还能接受老雇农的阶级教育，大队就同意了。

廖火生家只有一间房，还是借着生产队队屋一面墙盖的。既矮小，又黑暗。他的妻子是别人撮合的、一个讨饭路过的瞎子。大儿子约十三、四岁，小的还在吃奶。那张床，只能叫个土台，被子只是一床棉絮，且到处都是窟窿。灶台就砌在床边，大儿子的床实际上是柴草堆边的一个草窝。

说老实话，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如此破败的“家”。

按规定，我进门就把我们五人的六天伙食费、粮票交给他。每人每天五角钱、一斤粮票。这时我看到，破门后边是一堆红薯、芋头。看来，我们得吃几天了。

头一个中餐，进门就看见一筐煮熟了的红薯、芋头，我也觉得饿了，就招呼他们几位：“开饭，吃红薯，平时还难吃到咧。”谁知廖火生却叫：“别吃那个，那是喂猪的。”我已经咬进嘴里一口芋头，欲吐不能，只得吞下去。道：“没关系，可以吃的。”廖火生也笑了。端出铁锅，又端出菜。我这才发现，那五只碗和五双筷子，都是新的。一碗猪肉，另一碗青菜。铁锅里热腾腾的大米饭，香极了。我们在城里吃的都是陈米，这可是新米。我招呼他一起来吃，但无论怎么招呼，他一家都不吃，廖火生说他们吃过了，而那个大儿子竟不见了。

吃完饭，到下田时，从他家不远处走过。我看见他一家都蹲在门口，象是在吃那些“喂猪的”红薯、芋头。在田里向社员一打听，他根本就没养猪。小队长还说，他把好的给你们吃，自己吃红薯。我想，这些伙食费，决不够吃六天的。可我竟怀疑他会给我们吃红薯、芋头，把钱和粮票收起来。这才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可他如此之穷，又拿什么来贴呢？晚饭时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他的大儿子并不上学，给生产队放鸭子。于是抓了些鱼、虾之类，代替了肉。这比我们平时的伙食还好。但我要求同学们，他家不吃我们决不吃。这样他家人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我们也要吃那些红薯、芋头，相互间也融洽得多了。

第四天晚上，按照上边的布置，要访贫问苦，让房东讲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进行阶级教育。于是廖火生便是最

佳人选，我们这家也就多了几个同学，几乎这间小屋都满了。开场白之后廖火生就是不开口，我怎么劝都没用。其他同学只坐冷板凳。我急中生智，来个“启发式教育”，问他问题，引导他说。

“廖伯，旧社会你帮地主做长工吗？”“做的。”看来有效果了。

“地主打你吗？”“没有打过。”我吃了一惊。

“吃得饱吗？”“饱，怎么会不饱。”他话还多起来。

“地主吃肉，你得吃吗？”“得，经常得吃。”“那，你受过苦吗？比如讲，吃不饱的时候。”“有，六零年就苦，苦得很。”同学中居然有人笑起来。

“这么讲，地主对你还好了？”“是啊，他们家对我蛮好。”我开始觉得不对劲，就带点质问：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家的钥匙交给解放军？还带解放军开他家的粮仓？”“那他们拿枪对着我，我敢不听？！”全乱套了，同学们也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我只好叫暂停，然后叫我们班的班长主持一下，我自己出门去找校团委吴书记。吴书记也觉得问题严重，便和我一起去到大队书记家，把他叫出来。大队书记听完我的汇报，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神态，一言不发。吴书记问他，这个廖火生是不是漏网地主份子？

大队书记盯着吴书记的脸，许久才说话：

“我正式告诉你，你的乱猜完全错了。廖火生是我们大队，甚至是我们公社，最穷的一个。解放前是，现在也是。他从来没有讲过假话，至于合不合适你们，我不晓得。要是不合适，你们可以不听他的，我明天帮你们另外安排一家。要是讲他是漏网地主，全大队贫下中农都不同意的。四清工作队也不同意的。”说完，转身走了。

我和吴书记站了一会，他说：“这样，你把同学们叫出来。回住地，自由活动。”这件事，使得我们的同学都吃惊不小。同以前上的政治课正好相反，大家议论纷纷。也使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想了很多。几天来在他家的每一个细节都出现了，完全是老贫农的应有的举止，怎么会这样说话？当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过我至少感觉到，不要什么问题都联系阶级斗争，这样会把好人也想坏去的。直到以后，类似的话听多了，特别是插队以后，才知道廖老伯并没有撒谎。

直到今天，那场景还历历在目。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开车跑到桂林飞西安，途中遇到大雨，结果到机场时离起飞时间只有二十分钟。恰好航班正点，硬是不让办理登记手续。于是误了机，只得改签。机场是理直气壮的，但如果航班误点，乘客便没有理直气壮的可能。凄风冷雨之中，只好到市区开了房间，忍耐到明天的航班。

打开电视，照例是跳台浏览。无意间便看了一连串具有共性的镜头：久违了的徐俐正在播报俄罗斯绑架案里人质的死因，早在网上知道了，于是没有新闻的意义。不过却发觉我挺欣赏的徐俐显得老了许多，是化妆没化好？似乎不像，确实多了些疲倦之态，花容也有点蔫，果真红颜易衰也！

接着便是墨西哥的APEC峰会，我们的“核心”似乎风采依然，但无论怎样表现活力，都抹不去那天意注定的龙钟老态，反而留下做秀的痕迹。听说人家并不服老，还要继续为革命贡献更多的光和热。只是不知道面对那些年龄如同儿孙辈的异国首脑，心中会有何感受。至于那位慈祥的老奶奶，还要为许多外交礼仪规程勉为其难，实在是委屈了她。

记不清在什么报纸上看见另一篇报道，说是在老布什家看见自己当年的照片，他也感叹当时的年轻，以及夫人的年轻，甚至发出“无官一身轻”的议论。

转过来就看到我们那位只有高中学历，完全靠自学立业的副总理，我一直对他很敬佩的。电视给了个特写，还挺长时间，看着那些修饰不掉的皱纹和褶子，我不由得感叹：确实年岁不饶人那！怎么就成这样了？

于是想起自己以前构思过的一幅漫画：BP机响了，把它立在桌子上，后退两三米，终于看清楚上边的数码字：“啊，原来是这小子呼我！”题目可以叫“忘带老花镜了！”只是我的水平有限，老是画不达意，遂作罢。

中央电视台有个“夕阳红”节目，据说是从叶帅的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获得灵感而设立的，不知是否属实。“老归大泽菰蒲尽”，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为老而“喜作”的。相比之下，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那“聊”字用得多么恰倒好处。“无可奈何花落去”，聊以少年之狂无拘无束一回倒还实在得多。

忽然想起那年同学聚会，有位同学说到我的初恋情人。说初恋是确实的，十九岁的少年，一见到她便神魂颠倒，灿若桃花，亭亭玉立，一举手一投足都如同九天之上的仙女。这使我朝思暮想，夜不能寐。说情人则显然是自作多情，别说表达爱意，就连涂写的情诗也没敢“敬献”，只留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因为残酷的阶级斗争，俺

把队站错了，这个初恋也就永远成为美好的记忆。

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始终为当初揭发过我而内疚，希望我能帮她解脱。这使我惶恐不安，没理由我还在使别人承受精神压力。于是马上写了信给这位同学带过去，并问她是否愿意见我一面。我们见面了。当她喊我时，我居然认不出来了，想了一阵才算把眼前这位胖大嫂和我心目中那个她联系起来。

二十多年不见，我们都老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她首先表示歉意，我立即打断：没有什么可以致歉的，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工宣队、军宣队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实事求是说了些东西，既没夸大，也没缩小，何罪之有？没看见邓小平还悔过并保证永不翻案吗？况且，如果没有我的亲近表现，她完全不会遭受如此压力，倒是我应该表示歉意才对。她当然不能接受，总有一种不能经受压力的遗憾。

我不得不为那个时代的荒唐而且后患无穷费尽口舌：让人民都必须以忠贞不屈为荣，甚至树立许多把生命付给忠贞的楷模，那是邪教的教义。错误不在于不能经受压力，而只在于压力本身。人民只需要在守法的条件下为自己的利益竭力，根本不应该为任何别人确定的事业勉为其难，更不必说献出生命。例如越战时美国政府就为他们的士兵印制了13种文字的“投降书”。当战士被解除武装之后，所应该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保全自己和同伴的性命。任何置自己和同伴性命于不顾的行为都是不应该的，例如战俘营里继续从事斗争便不被日内瓦战俘公约所保护。如果鼓励甚至弘扬这种行为，那就是邪恶，因为它漠视被解除武装的战俘的生命权，它与虐待甚至杀害战俘同样野蛮。

虽然不能说明白，但僵局已被打开，本来嘛，二十多年的故事应该是很多很多的，她絮絮叨叨地诉说当年的许多经历，我也挺有兴趣地听着。我的故事多数是有目共睹的，也就不需要介绍。很显然，这二十多年看来她几乎无甚长进，我说的道理她也无法理解。我甚至后悔这次见面。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留在心中美好的回忆，总是美好的，最好不要改变它。但愿我能使她从那个荒唐的负疚中解脱，就谢天谢地了。

人老了，真惨！惨就惨在没有时间的余地了。比如我的初恋时节，便没有可能向她献一朵或者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原因是我们当年没有也不知道玫瑰是表示爱情的，那时我送过一本袖珍版语录本和一枚精致的像章，她回报以一支铱金笔。时代也不断进步，西方的习俗是送一朵玫瑰表示一心一意的爱情；让香港的俗气歌星发展成九百九十九朵了，只缺一心一意的那一朵。但无论多少朵，现在都与我们无关，老气横秋已经到完全没有心跳的感觉了。

惨还惨在会有无穷无尽的回忆却缺乏梦幻与憧憬，说话做事都失去了可笑的稚气。记忆忽然搜索到那年回乡下插队，在武汉时于修舅舅的话：“年轻真好。”算一下他那年还不到我现在的年龄，现在他已经作古几年了。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押根儿没打算还有三十二年可熬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便不错，哪怕如同姜昆相声里描写的那个模样。

倘若再遇到些非常灾难，例如下岗、疾病什么的，那就更加惨不堪言了。

丧气话说多了会令人扫兴。生老病死都是上帝的安排，没有人能改变的。当年有人期盼长生不老，炼丹求药却适得其反。后来有人乐意“万寿无疆”，也有人指望“永远健康”，都不过留下个笑柄。有一部伪历史剧，好像是《康熙大帝》吧，那歌里唱道：“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只是觉得奇怪，活那么久烦不烦？

本来写到此就无话可说了，便拟打住。没料到飞机晚点，我不由得恼火起来：自从文革开始，就一直“站错队”。昨晚它偏不晚点，让我在风雨交加的桂林沤了整整一天。今晚汲取教训，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机场，它却晚点三小时！到达西安已经是半夜，两点才进入酒店。早晨起床，电视上已经开始播“夕阳红”节目了。介绍的是重阳节那天这个节目与江南一座古镇联合举办的老年人与小吃的节目，其中特写了一位女士，她宣布自己今年五十一岁，还有好几位五十多的老人一起来了。我不禁心里一凉：俺已经被她划入老年圈子里了。

不甘心之余，也无可奈何。“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鸠山先生用中国的古训教育李玉和，这古训本身还是合理的。百年已经足够演绎人生所有故事，应该说，绰绰有余了。继续演绎下去，就会产生厌恶感，“人生七十古来稀”，真正干事情，其实最多也就干到这个年龄。再干下去，不但不明智，而且是对他人权利的藐视。

人生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代属于学习和认识自然与社会的阶段；青年、中年属于干事业的阶段；中老年还可以为事业做一点事情，老年人本来就是人生的休息阶段了。从做事情的角度来说，退出做事业的行列，确实有一点悲惨的感觉，无怪乎曹操会悲壮地唱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仔细一算，曹操唱出这千古名篇之时，不过五十三岁而已！当这篇“最后的四言诗”唱出之际，他其实也就完成了另一件壮举：一扫汉代文人除歌功颂德外就只会为儒经作注之颓风，创立“建安文学时代”，树起了“建安风骨”。

又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儿时读连环画看过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个坏国王命令杀死所有的老年人，因为他们只能消耗却不能贡献了。几个青年偷偷藏起一位老人，后来遇到许多艰难困苦，全凭这位老人的经验与智慧，使全部落都得以生存下来。

在人类生存手段薄弱，享受还是奢侈，发展几乎纯属无意的时代，为了种群的延续，采取今天看来残酷的极端手段，在那时应该也合理。孔子名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的也是一个道理。生命的最重要宗旨在于繁衍，也就是种群的延续，这是任何生命都在遵循的道理，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但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一个重要之处便是文化。人类除了生命的延续之外，还有文化的延续。

人类确实伟大，意义全在于此。人老了，说悲惨其实不过是对于生命活力的减弱甚至丧失的不适应，是一种心

理的障碍使然。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那些眷恋已经获得的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的举动，其实非常可悲。可悲之一就在于他们不理解大自然的规律，甚至以为可以对抗这个规律。可悲之二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总害怕它会被后人毁灭。于是“还想再活五百年”甚至“万寿无疆”或者“永远健康”。可悲之根本，在于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它的本质是自私而且卑鄙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管人们如何挣扎，或迟或早，那舟总是会沉的。有意义的事情只在于：趁它还没沉之前，赶紧把帆扬起来，尽可能潇洒地航行一回。

（10月29日始于桂林，31日毕于西安，11月1日修改于南宁。）

本贴由wenjunq于2002年11月01日14:05:50在乐趣园〖华夏知青论坛—广阔天地〗发表.

本贴跟从标题:

得道无古今，失道还衰老。自笑镜中人，白发如霜草 okok 14:34:45 11/02/02 (58)

当官的老了，真惨。 海宽 02:33:30 11/02/02 (1K)

只有做老百姓惨，做农民惨 3x 15:04:48 11/02/02 (176)

比起那些无辜被炸被药的有什么惨的？ 由于 12:40:18 11/02/02 (170)

顺便告知海宽 hangs 07:02:08 11/02/02 (232)

顺便告知hangs…… 海宽 11:53:13 11/02/02 (472)

看来你还是在关注戈壁的 hangs 19:39:56 11/02/02 (310)

更正：张静是副团长。 海宽 11:54:55 11/02/02 (无内容)

写得真好。 ZT 23:15:43 11/01/02 (无内容)

文军写得好随笔 hangs 20:38:21 11/01/02 (382)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wenjun‘Q’一曲，如瑰残阳浴佳人 海风 20:21:39 11/01/02 (无内容)

真棒。 3x 15:45:12 11/01/02 (66)

怎么又搞到金庸那里去了？ hangs 20:41:47 11/01/02 (46)

不止金庸，美国电视上中国老头一上手也是无往不胜 3x 23:08:47 11/01/02 (28)

九十多岁时的齐白石对着自己七十岁的照片 老城 15:00:10 11/01/02 (8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生命的最新定义：五十岁是准青年！ 弱小智 14:13:19 11/01/02 (101)

从山里回来，已经夜里11点了。明天上午还得出门，到越南边境开会，临时上了一下网，看见了关于母亲的话题，便禁不住要敲打这篇文字。

母亲作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因为其他群体也同样伟大：父亲、儿女、爷爷、奶奶……。不过说起母亲，自然是站在儿女的角度，是一种仰视。如果再具体化，是形形色色的妈妈，那么就未必都伟大了。

我就没有那种仰视母亲的心境，常对她老人家说："听老妈的话的，一般都是没出息的。"不过早一个多月，我的老母亲经诊断患了胆管癌，而且已经扩散，肝、肺、脾、胰乃至腹膜都布满癌细胞。此前半年，共在三家大医院留医，居然都没有发现，住院费花了一两万，诊断却是"胆曩炎"，又毫无疗效，于是找熟人转院到肿瘤医院。其实这个结果我已经知道，拿磁共振拍的片子给当肿瘤研究所所长的朋友看，他已经告诉我了。

按我的本意，根本不需要再住院治疗。因为医院根本没有任何手段，甚至连延缓的她的生命哪怕一天也不敢承诺。可我的建议必然遭到非议：连自己的母亲病成这样也不让住院治疗，天知道良心何在？只好按部就班，明知没用也得继续住院。

我找到一个偏方，已经有过连续的临床效果，至少十几位肝癌腹水患者有疗效。这个偏方很简单：一瓣野生仙人掌，要厚实表面发白的，不去刺；加一只猪连条，也称猪横利；再加六七颗红枣。无油盐煮两个小时以上，然后喝汤吃掉横利，一天两三次服完即可。此验方对腹水特别有效，母亲连服两天，肝腹水基本消除，脸色、手脚、身上的黄疸全部消失。精神也恢复正常。我那位从主治医生岗位退休的妹妹，惊讶得无以复加，她也加入拥护我的行列，主张老太太出院，回家吃仙人掌得了，或许还延缓得一两个月的。我告诉她：决不止一两个月，我的同事的表弟，已经肝癌晚期，奄奄一息，医院宣布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了。吃了这个偏方，不但出院了，而且现在还活着，挺精神。逢人便吹：咱命硬，一时半会死不了，多少还要再活一二十年吧。

只是老母亲坚决要求动手术，谁也僵持不过她本人，而且那些医生们明知没戏却要哄她，求生的本能加上对医生的无限信赖，肿瘤医院开刀，剖开又原封不动缝合了。于是白白割了个口子。医院得到一笔手术费，她本人则白白多了一劫，伤口却因黄疸水的缘故，至今没有愈合。

母亲的倔强是与生共存的。她的命运属于颠沛流离那类，尚属牙牙学语就遇上"九一八"，然后跟着姥爷逃难，从满洲里（旧称芦滨县）逃到山东老家，接着逃到江西，最后一直逃到广西、贵州，直至抗战胜利。她竟然在逃难的路上一直读完初中，这使我惊奇。因为教科书里告诉我们："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穷人的孩

子，怎么可能这样？

可我向母亲问起此事，她总是支支吾吾说别的故事，结论总是："再苦，你姥爷也让我们读书。"我始终怀着一个疑团：那可是兵荒马乱的逃难年代。

对母亲最早的印象是不吉利的。那是她在哭，我的姑姥姥在旁边劝，只听母亲抱怨道："旧社会过来的，谁家没有点金子？"见我回来，便打住不再说什么了，只是装出没哭过的样子。后来长大些了，我才知道，在外地当"打老虎"工作队队员的父亲，也被审查了。有人到家里来调查，说我父亲也贪污，缘由起于我姥爷回山东老家前留给我的一对金镯子。只是那调查是"背靠背"的，父亲一点也不知道，而且母亲还被警告，不能告诉我父亲。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母亲憋了许久也不能告诉父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但母亲争取进步的梦想都给这句话耽误了。她从一解放开始就积极工作，认真地申请入党，直至今天也没能如愿。后来很老了的当年的一个负责人告诉她，她那句抱怨话被人听见，而且汇报了，记入档案，于是她的全部努力都白搭。与她一家同时逃难的高舅舅笑话道："你呀，受利用不受重用。"当然是在他们都退休以后，说早了是要倒霉的。

母亲的积极表现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事情。父亲长年在外修铁路，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她的积极使我们根本体会不到母亲有什么温暖可言。我那位姑姥姥活着时常说："你们都是自己长大的。"

也许正因此，我从小就锻炼非常。小学一年级我就会煮饭；稍大一点，每天天不亮就会被母亲叫起来，到菜市排队买五角钱的定量肉；买米、买煤、做煤饼煤球等更是我的任务；还要爬树钩树枝当柴烧。到小学五年级，我做的衣服已经上了学校的展览会，那是班主任特地安排的，赢得的赞许至今也忘不了。后来看《红灯记》，我甚至觉得李铁梅还不如我。

到大跃进时期办起城市人民公社，我们都吃食堂，我是最高兴的，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而我的母亲就更积极了，她几乎不着家。然后出席了许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领回印了字的床单、毛巾、笔记本、钢笔和千篇一律的奖状。甚至在省级代表大会上坐过主席台。这一切给她带来的总有遗憾，我不知听过多少次她的轻微抱怨，她总是实现不了入党的夙愿。

我曾经对她和父亲说过：你们这一代人是最可怜的。从小就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逃亡，及至正青春年华时，却面临一个又一个运动的折腾，说话做事都必须小心翼翼。而养家糊口又如此艰难，屈指可数的收入，名目繁多的票证，非精打细算是很难维持到下一次发工资的。记得那年母亲决定要买一部缝纫机，主要为的是缝补全家的衣服。她邀集了一个"会"，也就是加入的人每月交十元钱，轮到谁这钱就归谁用，顺序是靠抽签决定的。

及至改革开放以后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他们都老了。

父母亲有一个至交老吴，两家人经常来往的，他的大儿子吴小弟和我同班。有一天吴伯伯被警察抓走了，据说是历史反革命的问题，后来被判了重刑。吴小弟的妈妈没有工作，全家都被驱赶到老家乡下去了。那时我很舍不得吴小弟，央求母亲收养他，让他可以继续与我同学。但母亲拒绝了，还打了我。她说，那是反革命分子家属，不可以同情的。

我工作以后，有次偶尔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吴小弟的父亲平反了，老吴的弟弟一直写信上告，最近才查清楚，老吴根本就没有当过还乡团，更没有杀害过农会干部，是搞错了名字。不过他已经死在劳改队里。母亲二话没说就咒骂“四人帮”，我忍不住说她：那是五十年代的事情，还不存在“四人帮”呐。

然后我讥笑母亲，先说了一个我下乡时的故事：那天收工时分，生产队里的猪倌赶着一群猪回村，恰逢村里杀猪，惨叫声让那群猪个个惊恐万分，无论猪倌怎么鞭打都抵足不肯进村。直至那叫声消失了，这群猪才心安理得地回村。然后我说母亲：你们那一代人是不是也这样？母亲把我臭骂一顿，然后叹口气说，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

母亲尽管积极了一生，却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命运。到退休之后，据说有一个文件，说的是当过什么级劳模的，可以享受增加退休金的待遇。她还真的去找过什么部门，人家答复她说她那些模范都是集体性质的，不是个人劳模，于是没有这份享受资格。那天我看见她默默地流泪，那份伤心决不是言语可以说明白的。

母亲原来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后来因为幼儿教育缺乏师资，她响应党的号召，自动放弃公职办起幼儿园。只因当时幼儿教师的指标不够，不能转，于是她选择放弃公职。待到快熬得指标时，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还在动员精简回乡，指标自然又泡了汤。但母亲却毫无怨言，继续积极工作并不理会家里的事情。

到后来，父亲调往南宁，母亲便四处寻找工作。每当父亲叫她在家管好孩子，她便会与父亲争吵，大抵是反对剥夺她的工作权利之类。幸好没多久她的幼儿教育才干被军区发现，那里正缺此类人材，就进入军队职工行列，开办了那里急需的幼儿园。不过她不是党员，于是得调一个女性党员来当主任。无论她对那位主任不懂幼儿教育有多大看法，依然认定人家是党员，当主任是天经地义的。并一如往常继续积极工作着，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才回家。

可父亲却随着铁路的延伸又调走了，他在争吵方面的能耐根本不是母亲的对手，只好领着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去他工作的地方，也算减轻我的负担。母亲的积极还是有回报的，她总是这个那个积极份子或先进份子的获得者，后来也成了军区级活学活用毛著积极份子。军区也曾让她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无奈一外调，恰好父亲被人诬告的历史问题尚未了结，于是从此告吹。直至躺在病床上，还偶尔为自己今生没能入党而感叹亦嘘唏的。

她竟然如此执著地争取进步，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文革中，有次不知什么头面人物找她谈话，为的是我。那位将军告诉她什么我不清楚，但她来信叫我退出我的组织，那信中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已经是排级干部，所以你必须执行中央关于干部子女不得参加群众组织的指示。希望见此信后立即行动，退出你所在的群众组织。

最后的结果不是我退出群众组织，而是她被清理出军队的外围组织，调到土产公司当售货员去了，卖烟叶、棉胎、麻绳之类的货物。自己的儿子都被教育成了现行反革命份子，无论怎么说，也没有资格教育无产阶级专政柱石们的后代的，何况他们都还是幼儿。而我的父亲也受到我的连累，批斗多次之后，贬到铁路小站去砸洋镐，却不料这一年多砸洋镐的生活，却治好了他多年不愈的“五十肩”。

刚被调进土产公司，母亲便心绪不宁。据说常跟父亲吵架，说父亲和我连累了她。父亲甚至告诉我，她还威胁要与我们划清界限，要与父亲离婚。那当然是过后许久的事了。我劝告父亲说，那不过是一种心理失衡后的异常反应，倘若不闹一场，我妈也许就神经失常了。不过父亲的耿耿于怀是永远也抹不平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告诫我妹妹：我死了以后就轮到你们受你妈的气了。

母亲的慈爱是天赋的，无论什么邪教缠身，它总有体现的时候。

刻骨铭心的事情有两件：其一是我被关押在黑屋子里一年多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专案组终于开了点恩。1972年春节前，他们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告我的平安无事。我拒绝了。但春节后他们还是带来了家里送的一点钱和物品：腊肉、日用品之类。附带着还有母亲的一封信，免不了要我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之类话语。但其中叮嘱我保重身体，什么事情都想开一点的言语，令我一生中最深刻地体会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古训。

专案组让我写一封回信，特别交代得把收到的钱及物品列清楚。这份简短的文字是很难忘记的。描述完收到的东西以后，我默写了唐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然后接着写下去：什么天大地大之类都是假的，唯有爹亲娘亲才是真的。

直至今日，母亲也记得这封回信。她说那时看见简直吓坏了，你真是的，也太大胆了。

其二是：到1974年春节后，我终于不明不白被释放了，还同意我继续留一两个月治病。待得大概把病治得差不多时，他们又来催我下乡。所谓祸不单行吧，我却得了脉管炎。左腿一条红珊瑚般的线，从脚趾一直通到股沟，且每天变换一点位置。无论这条腿的什么部位轻轻一碰，都疼痛钻心。医院用过当时极其珍贵的日本进口红霉素也毫无疗效。外科主任是父母亲的老朋友，经过他请来最权威专家会诊，认定非截肢不可。

母亲急得快发疯，到处寻求医药。不知怎么打探到一位祖传治疗毒虫叮咬、无名肿毒的老太婆，也许有点办法。于是用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我前往。给这位老太婆用自己调治的药膏一贴到股动脉处，居然就消肿褪红不疼不痒了。乃至于父亲那位当外科主任的老朋友也来询问究竟用了什么怪药。

但我记得的，是母亲当时那个形象。她那发自内心焦急万状的神态；探得消息后急忙回家告诉我时，那种欣喜兼着担忧的话语；摇摇晃晃驮着我骑车，还要不时回头问我颠着没有的担心；以及次日一早我醒来却发现母亲已经

坐在我的床前。那条该死的红线没有了，腿也不疼了。母亲脸上涌出宽慰的微笑，一滴泪珠从她的眼角流下来。

这滴泪珠一直流在我的心里。

当我敲打完这篇文字，已经到了我的生日。我已经55岁了，天亮以后我会到母亲的病床前，安慰她那不会久于人世的生命。我想问问母亲，55年前的今天，当您生下我的时候，是否整个心都充满了愉悦？

****

本贴跟从标题:

愿你母亲早日康复！愿天下所有母亲健康长寿！ lt 22:19:26 7/27/03 (无内容)

****

母亲现在怎么样了？希望她少一点痛苦。 缺月 11:41:54 7/27/03 (1K)

母亲总是伟大的，不是为她曾经做过些什么，而是为了她曾经生养了我们。

我的爸妈都没有当过右派，都一直是在拼命一样地为D工作。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不让我和一个很好看的小姑娘一起玩，因为她的爸爸是右派。但是那个女孩一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观念。

大了以后想，在别人当了右派的时候而我的父母没有当，他们当时都在党的系统工作。那么，他们都做过一些什么？我很怀疑，也对他们感到过深深的失望。直到他们老了，我们也在老去的时候，直到我从别的长辈口中听说那时候他们也有过自危，直到父亲在身患绝症的时候对我说“从开枪的那一刻起，我和这个D决裂了”的时候。我才理解了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过狂热的理想，有过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无罪的，只要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爸妈追求过理想，为理想付出过许多，但我想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理想破灭的痛苦。在我认识的老人中也有不少人至今都在相信年轻时的梦，我并不想责怪他们，人老了，就让他们对理想“从一而终”吧，不要让人人都去经受那种涅磐时的剧痛。

为了父亲的那句话，我拒绝了有关部门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要“按级别规格”覆盖在他身上的党旗，只把一条洁白的棉布单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我想让他清清白白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尊敬他们吧，他们的追求并没有错，错的不是他们。

****

那是那个时代母亲的标准形象！ 由于 11:33:49 7/26/03 (762)

不顾家是她们要达到进步的唯一手段，也是她们用泪水浇灌出的无奈，其实她们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现如今她们得到了的回报就是一身的病痛，有一次全家聚餐时，我那当年的先进分子婆婆津津乐道地给我们讲述她不惜用揭发别人成份的手段追求入党的，就在她兴奋讲述过后，本人还沉浸在回忆里时，我打断她问：“结果怎样，你达到了

吗？”，她情绪一下就暗淡下来：“没，没入成。。。”，紧接着就愤怒地谴责别人背后算计她，给她下绊。我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那个过程不过是一场明争暗斗的把戏，什么理想什么主义都是粉饰这个过程的门面，我才不会消耗自己的热量参加这个鲨鱼聚会呢，我母亲最明智的地方是，虽然她也想让我们跟她一样积极进入那个过程，但我们会跟她辩论，阐述自己的思想，随后理直气壮地再加一句：“是你从小不让我们说谎话的，所以我们不说认识不到的话。”她就不再管我们了，所以她就没那么多的烦恼和痛苦了。

****

你们是吃不到葡萄。人家是快吃到了。快(想)做奴才的比作了奴才的更凶。 3x 02:53:47 7/27/03 (50)

你是吃了葡萄不吐葡萄皮。 由于 11:23:43 7/27/03 (无内容)

唉，那个光辉历程的年代，毁坏了多少自然环境，扭曲了多少人性！ 老三 03:44:11 7/26/03 (无内容)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三天前又匆忙驱车赶赴深圳，这次有两个助手陪着，他们坚决不许我独自驱车远征。而我的母亲病势已经日趋严重，本来就不该远行的，孔子不是说过：“父母在，不远游”的么？无奈人在江湖，身确不由己，快去快回吧。何况有从主治医生岗位上退休的妹妹，加上一个保姆，我还把在柳州暂时空闲的弟弟调了回来，并交代了医院的朋友，应该不成大问题。

昨天下午事情就有些不妙，弟弟来电话告知：母亲吐血了，是否送我朋友的那间医院？我的心难免有些发沉。只是约定今天下午两点还有一个关键洽谈，人家大老远赶过来，爽约是不合适的。于是决定谈完就走，赶到哪儿是哪儿。好在谈判提前，下午两点就已经出发，唯独还须经过电白县，要耽误一点时间，实在不行，干脆住一夜天亮再往回赶。

三个人在车上，到电白时，最小的弟弟来电话：母亲已经危险了，不能说话。不过一有人进入病房她就会睁眼开开，估计是在等你。虽然已经下午六点半，还是决定赶路。不过在下属面前，我毕竟还算镇静，何况心知肚明母亲的癌症扩散到如此地步，已经无力回天。妹妹说，挺了这几个月，居然毫无疼痛，应属奇迹。母亲自己也对老妹说：不疼不痛拖了这么久，全亏你大哥这个偏方。我感觉安慰，于是谈说依旧。

大约七点二十分，我们即将出茂名至湛江的高速公路，我忽然看见母亲的面容在眼前一闪，眼里分明带着愠怒。谈笑的雅兴全没有了，满脑子都是对母亲的思念。何总与黄总说些什么，我也没听进去。只是一言不发地默默想事。

我设想着赶紧到家，我会陪伴母亲。我要告诉她：在我生命的第一时间，是您陪伴着我；当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一定要陪伴着您。我还要告诉我的妈妈：过去，我连累您受了许多苦，那是我的罪过。我对您有过太多太多的冒犯，现在我觉得过分，愿意向您忏悔，求得您的宽恕。我最诚挚地告诉您，我真心爱着您，因为您是我的母亲。往事一件件在我的脑海里浮动而过，我简直不能原谅自己，怎么可以如此刻薄地挖苦自己的母亲。想到伤心处，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我试图把它们留在眼眶里，但是很难。于是悄悄抽出纸巾抹去。

不久前，母亲告诉大弟，她死后千万不要搞任何仪式。人死如灯灭，只希望我们在南丹县小场镇的荒山上，找一个僻静所在，把她和我们父亲的骨灰埋在一起。她说：“我和你爸在这个地方认识，结婚，生下你和你大哥。让我们俩永远厮守在荒山上就行了。”当弟弟提出异议，说以后不容易扫墓时，母亲说：“扫什么墓呀，也许你们几个还记得我们，到你们的下一代，谁还知道我们是谁？刻个墓碑，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埋在那儿就行了。”

想起这个事情，眼泪又要往外流，止之不住。母亲心底还有这个盘算，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一直认为她很俗，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回到家，我要告诉母亲：我们一定满足您的心愿。而且，过些年我也会去的，那时我一定让墨斐把我的骨灰送到你们身边。生不能尽孝道于父母，死必陪伴你们到永远。那时，我会向你们讲述我那些酸甜苦辣的故事，报答你们的生养之恩。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也离母亲越来越近。一种急迫的归心，也许母亲明天一早甚至今天半夜就要离开人世。我从来没有好好陪伴过她，如果能陪伴她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相信她会感到满足；我更相信我会得到无穷的安慰。这么多日日夜夜，我那么辛苦、那么忙碌地四海为家，怎么就没有想过该陪陪母亲？一眨眼功夫，当我认真想这样做的时候，母亲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多少事，直到失去才知道我们原本应该珍惜？我在这里漫无边际地悔恨，回去说给她听的时候，她还能听得见么？

忽然又记得妹妹说的另一件事情：前几天，母亲忽然大声呼唤，似乎是在极深层的心底里迸发出来的声音："快，快，他们要抓你哥了！"妹妹问她：哪有这回事呀？他们凭什么抓我哥？母亲直视着妹妹说："他们说你哥印假钞。他呀，怎么说都不听，就是不听话。"妹妹说，这是肝昏迷的症状，出现幻觉。我听完妹妹的讲述，心里明白，这该是母亲心灵深处在文革中留下的阴影，在这个症状下的暴露。那完全是因为我给她带来的惊吓，可怜的母亲，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灾难，居然还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底。眼泪不觉又往外涌，直到生命垂危的时刻，这幽灵还在惊吓着我的母亲！

尽管我竭力掩饰自己激烈的内心状况，两个副手显然发现我在偷偷抹眼泪。他们的神态告诉我，他们发现我在伤心流泪，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母亲的病情严重。场面有些尴尬。我曾经想说两句什么来改变这个场面，却又无能为力。我不时偷眼看汽车的里程表，指针晃悠在130-140迈。我很想叫黄让开，我在高速公路上一般都开到180迈以上的，现在会开到200迈。不过目前的气氛注定他们决不可能服从我的命令，我也完全清楚这一点，只能焦急地忍耐。

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我知道今夜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时刻，也许已经进入完全昏迷状态。但我必须陪伴她最后的夜晚，说许多许多话，无论她能否听得见。母亲是平凡的女人，有太多令我不敢苟同的缺憾。但她是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母亲。自从明知她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之后，我不时会想起她的恩德，也自责我对母亲的苛求。最后陪伴她，向她述说我对自己的责难，让她带着赐予我的原谅和儿子对她的爱离开这个世界，成了我最迫切的愿望。

夜晚10点30分，我终于到达南宁市中心，送两位伙计到家之后，我打算直接到医院，陪伴母亲直到天亮。突然想起，我的手机一直没动静，弟弟妹妹们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母亲在医院的哪间病房我还不知道，于是拨通小弟的手机。他告诉我：老妈已经在19点17分去世了。正下车准备回家的何总搭腔说：那正是我们下湛茂高速公路的时

间，也正是母亲的影子闪现在我面前的时间。我一生中最强烈地想念母亲的时刻，竟然是她去世的时候，我却以为她一定会活着等我回来。

不论多少人不相信心灵感应的神奇故事，我信。回到家，妹妹告诉我：母亲临终前弯曲着手指头算着什么，弟媳妇问她是不是算大哥回来的时间？她示意是的。我真想大哭一场，却哭不出声。死生有命，人都是逃脱不了的。母亲一定是等不耐烦，亲自找我来了。我原本想好的一切述说，都不能面对母亲亲口讲述给她老人家听了。母亲，您一定在看着我，我想说的那些话，您都明白了吗？（2003.9.28凌晨4点23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看来《哪壶开了提哪壶》是个挺用功的学生，居然找出来这么个文字资料来，佩服。不过提起那壶开了的，却触动了我这壶没开的。借用那个大名鼎鼎的牟其中先生的“九十九度定理”，俺这壶没开的也加了一度：记忆壶里的水也跟着开了。其实我也是这笔大串联经费的一个开支者，而且至今没有悔意。

1966年七月底，我们几个活跃份子趁着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讲话录音、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讲话录音，工作队灰溜溜的时候篡夺了学校文革运动领导权。首先干的一件事就是不许批斗老师，四位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被我们“松绑”了，他们从此得以回家。其他老师也被允许自己组织“战斗队”，参加文革运动。但这个篡夺的权力没有行使几天，铁路局党委就及时粉碎了我们的阴谋。他们发现这几个学生居然全都出身于职员家庭，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历史问题。于是按照据说是“十六条”精神，成立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校革筹”。一名原校党总支副书记，加上几名出身革干、工人的学生，领头的是干部子弟。

几乎选举结果刚出来，那位当选的“校革筹”组长就来表示关怀了。他原来是我负责培养入团的“对象”，铁路局一位处长的侄儿兼养子，所不同的是，这位处长大人来自山东老根据地，是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干部。我当时就觉得荒唐，如果革命已经蜕化到以血统的纯正确定权力分配，那么它离中世纪的贵族社会也不远了。

这位组长谦虚地请我继续协助他的工作，于是我马上让他要求铁路局派车分批送我校学生到桂林“取经”，因为桂林师范学院“八七事件”闹腾的挺热火，连王任重都来电报了。他立即请示，路局马上批复同意，派了几节加挂车厢，分批赴桂林。我当然在第一批。

在桂林，我又得到了包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内的一批《中央首长讲话》。马上返回柳州，下车就奔铁路局印刷厂，总共要求印刷一万余份各式传单，而且，回到学校就补开了一张证明。最多的当然就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文字，印刷厂还主动配合加上了那个戴军帽的头像。

但我鼓动一批同学直接趴火车上北京的举动使我的那位“培养对象”有点恼火，他喜欢领导更多的学生，跑了一批就少领导一批。批评归批评，接着北京传来“破四旧”的消息，他又来问我该咋办？是不是也学北京的样抄反动派的家？我道不可，我们不知道谁是反动派，要是乱抄家，是犯法的。我们最好游行示威，表示对北京的支持就好了。他有所犹豫，但又拿不出什么主意，只好听从。

这一段时间，“校革筹”成了傀儡，我们几个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于是就有反映，说“校革筹”是木偶，操纵他们的是“六六六战斗组”。这流言使“校革筹”的同学们无地自容，他们终于忍无可忍，集体到铁路局告状去了，据说那位组长还哭诉了许多我们欺负他们的故事。

铁路局副书记、“四清”工作总团团长亲自跑来学校，正式宣布我们这几个是“右派翻天”，我们就开始遭受讨伐。结果我的住校用具全被扔到宿舍附近的菜地里。那些忽然发现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的、天生是左派的同学马上激起了高昂的阶级热情，围攻起我们来了。

俺眼瞧风云突变，许多昨天还围着我们转的同学，立马倒打一耙。尤其是那位“四清”总团长宣布要我赔偿数百元印刷费用时，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但又不肯服输，于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俺回南宁家里去算了。却不料这决定变成串联的开始。

回到南宁，满街都是“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标语，大抵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一片“红色恐怖”的迹象。我首先跑广西大学，我的初中代课老师有一个在这里不记得是当学生还是当助教的，寻得他不很难，因为他在学校挺出名。在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办公室里，他继续对我发泄老师的尊严，却又说不出什么道道。

然后我寻到南宁二中，我的一个高干子弟同学在这里附设的航空学员班学习。见面果然不出所料他是“盾牌红卫兵”的干将。记得最清楚的是，当他带我到他们的司令部，进门就被问了一句：“什么出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抢着先回答了：“（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当然是革干！”于是那个家伙就亲热地拍打我的肩膀：“好，红五类战友。我们的父辈打天下，我们不掌权谁敢掌权？好好干！”

其实我的心已经虚弱到底了，俺的真正出身算职员，充其量也是“灰五类”。一下子进入这个全都穿军装的群体里，那感觉就如同一只乡下土狗进了狼群。和我的同学说话还大声一点，跟别人说话我自己都觉得声音打颤。还记得他们在“盾牌红卫兵”里的职务完全是依据老爸的职务高低确定的，我同学的爹是地师级干部，所以他当“作战部副部长”。其实他完全知道我的真实出身，送我下楼时他告诫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再遇到盘查出身的，你就雄赳赳器昂昂地说‘革干’，千万别嘴软。现在的干部都是革命干部，难道还有反革命干部的？”
走在他们校园里，我看见两个女教师被剃了“阴阳头”，正在扫地。我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老师的？是否太过分？”他的回答很妙：“现在人都发狂了，什么事情过火干什么。你要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自己倒霉，还帮不了别人，算了，只当没看见。”

从二中出来，我去了医学院，那里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学长。整个校园里到处都是辩论场，不记得他们辩论些啥了。找到一个学长之后，他拉我到僻静处，像是做贼，又像是地下工作者。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闯”战斗队现在正处于逆境之中。我高谈阔论了一回，他居然还不知道有那么多令人激动的消息，甚至连“炮打司令部”也

不知道，更别提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了。我把刚从“盾牌红卫兵”司令部里拿来的几份传单，大抵都是中央首长也即江青等人的讲话拿给他看，他于是马上领着我找到另外几位“战友”，慷慨地招待我吃晚饭，当然是学校食堂里的学生餐。然后到了一个被改名为“反修楼”的地方，房间里一排排木架上摆满了浸泡着人体器官的玻璃瓶，灯光昏暗，场景十分吓人。然而我对这几位兄长神侃了桂林的见闻以及听来的各种消息，以及对革命造反的理解等。

几天以后回到学校，怀里已经揣着一张因私铁路免票。铁路职工每人每年都有两张这种免票，据说是“二七”大罢工时，从北洋军阀那里争来的权利，每年十二张。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改成两张。其实根本没几个人用得起，因为每人的工资仅够最低生存消费，坐火车免费之外，出门还要花钱的。我父亲的免票就基本没用过，这次我缠着父亲总算开了一张到北京的私用免票，还有十元钱，以备万一。

果然，到了学校，气氛完全不同了。校革筹每天安排学习毛著，那几位老师又成了牛鬼蛇神。据说还补充了一次“破四旧”，柳侯公园里柳宗元的衣冠冢也被扒开了，我们宿舍里还堆积了好几箱抄来的香水等奢侈品。幸好，我走前卷好的铺盖还原封不动在我床上，没有随“破四旧”之波逐流而去。几位同战斗组的战友都挺坚贞不屈，除开两位已经离去之外，其他人都顽强地坚守我们那个队部。

革筹开始按照铁路局的指示，分批派学生赴北京串联，当然首先必须出身工人或革干，其次是尊敬校革筹的领导，还要表现好。我们这个战斗组是没有资格的，我便寻校革筹论理，因为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出身工人，必须有一个串联的权利。革筹组长早已没有过去那种尊敬的丝毫表现，他毫不客气地训斥我无法无天私自逃离学校，但终于接受了我的要求，批准这位工人出身的同学串联去了。但我要求补发学生证却没有批准。于是我寻得学校人事主任，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贴一张照片，然后写上因遗失学生证尚未补发的证明，然后他骑着照片的缝盖了一个学校的公章。这时我发现原来做学生会干部积累的交情，特别是我篡权时善待老师的举措，此时赢得了回报。私下里，老师们对我都很友好。

眼瞧着我们日子并不好过，于是我要求我们战斗组的其他人干脆开免票出去串联，但没有通过。于是我宣布我必须出去，否则我们就是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革命的方向。大家同意了。学校推举去北京串联的同学大约有十几名，据说要到国庆节去接受毛主席检阅。俺自己先溜了，管他什么革筹威胁的处罚。

上得车就发现，我那张免票根本没用。车上的学生们，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根本不需要任何票。他们都穿着军装，我后悔自己没穿那件旧军装来，那是在军区当职工的母亲买回来的处理品。还没来得及细想，几个京腔便传来了：“什么出身？”这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如同查票一般查了过来。一进我们车厢就宣布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有几个笨蛋自己说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当即挨了皮带抽，还有一个跟他们论理，结果在下一个车站被赶下车了。查问到我时，我记得同学那番教诲，理直气壮地大声吼道：“革干！”他们马上友好地笑了笑。

火车终点站没有到北京站，在永定门就驱赶所有旅客下车，说是只许空车进北京站。我第一次到北京，根本不知道该到何处去，出站就看见几排桌子，挂着的布帘上写着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还有一个桌子前注明“铁路学校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我斗胆前往，人家要学生证和介绍信，我没有介绍信，学生证也是那张纸。灵机一动便称这就是介绍信，人家狐疑了一会，并没有多说，给了个卡片，叫到铁路七小去，还告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记住了北京除长安街、王府井之外还有一条南礼士路。

上公共汽车前，我看了一下那张“外地革命师生乘车证”，背后印着的字还记得有郊区长途公共汽车无效之类的。到了铁七小，教师都成了宿舍，有的用课桌拼成床，有的只是在地板上铺的大通铺。领饭票时，我只管说既无钱也无粮票，他们居然没多说话同样给了五天的饭票，然后告诉我，到期必须离京。

第一次到北京，什么都新鲜，到处逛，也没少跑北大、清华等院校去看大字报，甚至抄录了不少。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再领饭票时人家不肯给，俺只管死乞白赖，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毛主席还没接见哩。终于又领到了饭票。

世界小的时候真的很小，那天去王府井，居然碰见我们学校的那批“红五类”赴京团。多数人都很友好，校革筹组长可不客气，干脆直接地命令我回学校，否则后果自负。经过这么些天造反精神的熏陶，我也根本不会理他，理由依旧冠冕堂皇：谁也没有剥夺我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权利。甚至反唇相讥道：你干嘛害怕我见到毛主席？

国庆节很快就到了，那天最多凌晨三点，我们就被叫起来，吃过早餐之后，等来了许多大卡车，直接拉到东单北大街那处地方，傻瓜一样排开坐地。然后各路神仙开始唱歌，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就是在这漫长等待中拉歌的刺激。

俺平时路过看见路边人行道上那些铁盖，老是琢磨不透它们等距离排着究竟为什么，此时发现它们被围起来成了临时厕所的蹲坑。也不知究竟何时开始检阅，长安街上的队伍没完没了，待到我们的队伍可以行进上长安街，我已经腰酸背疼腿脚麻木了。看见不少人都有小红书，我非常羡慕。手里有个东西摇着怎么说都比赤手空拳晃悠强，于是发誓即使偷也得弄一本。终于走到天安门前，欢呼声震耳欲聋，兼之高音喇叭里不停放送着的进行曲，说是什么的海洋都不过分。

我看见高高的天安门上立着许多人影，挺费力才辨认出正中间那个就是毛主席。没料到他老人家看见我们就转身往回走，后边跟着那个瘦小的林彪。队伍里不约而同地着急了，呼喊声一下子高了几个八度，节奏也快了许多。眼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就要进城门楼去了，我们的整个队形不知怎么的就散了，我也弄不清是自己跑还是被推着走的，很快就到了金水桥前边不远的地方。广播里不断发出命令，但是没有人理会。我看见前边几排被一个角钢焊接成的方截面构件挡住了，那构件活像倒下来的塔吊。

天安门上那两个人影似乎被感动了，回转身子向我们招手。万岁之声立即像涨潮一样激烈起来。直至此时，我才感觉透不过气，前后左右人群挤得只能随波逐流。未几，忽然感觉背后有某种温柔，扭过头来才发现是一个狂热的女生，那压迫必定是她饱满的胸膛吧。想到此不由得脸热心跳，于是思想就开了小差。不知何时老人家已经不见了，在一大队赶来维持秩序的大兵拉扯之下，这些无奈的学生们终于离开了金水桥前，后边的队伍撕破嗓门拼命喊，只可怜他们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什么光辉形象也没看见。

往西去的队伍已经不复存在，走了一阵看见许多学校接待站送饭的卡车，我感觉到腹中在闹腾，只是没有俺们吃的份。脑子里不时回味那拥挤时的压迫，真该感谢他老人家，让俺早早领教了一回异性的温暖。此时已经下午大约四点了，我们住在南礼士路真还算命好，回去就可以狼吞虎咽甚至可以休息。晚上还有焰火节目呢。

没多大会儿，我们战斗组的王肥来了，他是官方派来的，住在北蜂窝，顶不住饥渴干脆到我这儿来了。我到食堂费尽口舌给他弄来俩馒头加一碗菜，他边吃边诉苦，原来他属于那些起大早赶晚集的，啥也没看见，白走了老半天。

我们接着商量回去的事，他们第二天就要集体回校，正不知如何办。我告诉他没必要理会，凭学生证可以到接待站领返回原地的火车票，然后到东单体育场换票，去哪儿都成。夜晚又集合，我们排在西单路口一带，席地而坐等着看焰火。小地方长大的，真的还不知焰火啥样。看着离天安门甚远，于是想往前赶，没走出多远就被纠察队拦下了。这些纠察也是北京的红卫兵，吼两句你不听他们就扬皮带。那些皮带都是彭德怀时代发给军官的，厚实的铜皮带扣让人不得不听从指挥。焰火放起来了，广播里说老人家下到金水桥前边了，看了焰火，开了眼界，王肥回他的住地，我也回南礼士路。

次日领了革命师生乘车证，只给回原地的。我跑到东单体育场，换票的人多了去了，我拿着回南宁的票没几个人知道那是啥地方，不肯跟我换。后来我改口告诉人家这票可以到桂林，顾客立即多了起来。我挑了个去青岛的换了，只是老也等不到王肥，我想，他大约被挟持回学校去了。

到青岛，我先跟着接待站安排的汽车到了省总工会招待所，招待所安排了床位，看来比北京强多了，四个人的房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清静整洁。我把简单行李扔在靠窗户的一张床上，就去看姥爷姥姥，真的很想念他们。姥姥见了我眼睛都笑成一条缝，接着她又叫表弟去告诉附近的舅舅、姨妈，免不了一番亲情倾诉的热闹。

入夜时分我回到招待所，到房间门口就愣住了，怎么房间里来了三位女将，其中还有一位正在洗头。我怀疑走错了门，但分明看见我的行李还在那张床上。一番笨拙的解释与说明，那三位看来是大学生的女将哈哈大笑，那位用毛巾弄干头发的还调戏起我来：“小老弟，你还是中学生吧？没关系，当一次洪常青算了。”我有点狼狈地捡起我的行李，赶紧跑到另一栋小楼的值班室，值班的胖大嫂也哈哈大笑，完了反而责备我：“你跑哪儿去了，那里改

成女学生住的了，找不到你。改去五号楼吧，喏，换把钥匙，快过去吧。”

次日到处走走，青岛似乎没有北京那么热闹，人们的革命热情似乎不如北京那么高涨。我一个人行走在蔓延十几公里的海滨，无数别墅形状各异，显示着不同的风格。忽然有一个感觉：它们的庭院连围墙都绝无相同，联系到我见过市内的房屋，似乎青岛是没有相同的房子的城市。这个城市真是一个房屋建筑的博物馆。

坐在鲁迅公园的椅子上，看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听那此起彼伏的涛声，心潮也如涨潮落潮。我仔细想了我们这几个月来的经历，感觉似乎有点不大对头。如果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领导都不知文革该怎么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想起在家里时，父亲推心置腹的谈话，也有许多警示。父亲说，运动总是先动员你们大胆说话，最后就收拾那些大胆说话的人。凡是运动开始时积极的人，后来都要倒霉。他举了许多成为右派分子的人的故事，其中就有我认识的叔叔伯伯。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们最后会不会成为新时代的右派分子？在学校里已经有这样的吼声了，回去以后又会如何？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明显的，北京的学生里，行为最过激的大抵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他们的口号中明摆着就显示了“老子革命儿接班”的气概，有强烈的权力争夺意识。我们这些灰不溜秋的平民子弟，凑热闹是没多大意思的，尚不得知这次运动要搞到什么时候，趁机玩玩也就算了。我在这个海滨孤独的思索，得出的结论就是回去以后就金盆洗手，如果运动还要继续进行，干脆躲回家去看书拉倒。

从青岛到南京很容易，因为接待站的人很轻易地就相信我关于从青岛到柳州必须经过上海的说法，于是车到南京我就下去了。列车上基本都是学生，主要是大学生。尤其是那些穿军装的学生，格外杀气腾腾，假如你要遇到“哈军工”的，最好别冒犯他们，否则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我在徐州火车站就亲眼目睹一个也穿军装、自称“革干子弟”的家伙。他与几个“哈军工”的争吵，最后暴露出他爹是地区武装部长之后，劈头盖脑挨了一顿军用皮带的抽打，直至他满头是血逃出车站。

我到南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王肥约定要到南京，这里是他的老家；二个是我不知怎的特别想参观一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直接地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前一个目的已经渺茫，因为在北京我们失散了；后一个目的我毫不怀疑。至于革命串联，除开北京到哪儿都是白搭，因此我不再考虑。

逛了紫金山、中山陵，那里的幽静肃穆给我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个音乐坛，太伟大了，我足足坐了好几个小时。假如在照片上看见，说是欧洲的某个地方我也不会怀疑的。又到了雨花台，革命烈士的种种事迹令我惭愧，怎么就想起“金盆洗手”来了？看人家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多么豪迈！激动过后仍忘不了打探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于是询问雨花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看上去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人，很威严的模样。听过我的询问之后，他如同警察审视一个贼，良久才冒出一句话：“你打听那干啥？那是杀国民党的！”

看样子我再不逃走他很可能把我抓起来。我狼狈地逃走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南京依旧那么大，那么绿，那么美。谁还记得当年的灾难？政党的更迭居然可以抹去外敌的凶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无法理解，更不敢表示不满。不过我敢于在心底里思考，我知道，我顶多是个假革命者，因为我竟然还敢思考。革命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彻底的革命者就必须盲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次日早晨，我还没醒，有人进来把我弄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竟是王肥。他说是从总接待站的登记册上把我查到的，他离开北京就按照我的办法，逃出那个团体，到东单体育场换的车票，到南京已经许多天了。我们有了一番亲热的寒暄。接着商量到何处去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议就决定到上海。我办理了离开的手续，拿着简单行李跟着他到了他的亲戚家，拿他的行李。于是没忘记问他的亲戚，结果是，人家从来没听说南京有个什么大屠杀纪念馆之类的地方。

从南京到上海，经过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平原。江南水乡风光确实美不胜收，待得我们到上海，接待站分配到复旦大学。生平第一次看见而且坐上有轨电车，免不了有种新鲜感。遗憾的是天色已晚，复旦也显得荒僻，大上海的风光很难领略。次日一早，我们俩起床，约定不理会接待站的免费伙食，出去吃上海著名的“阳春面”。吃上嘴我们不禁相视而笑：除了葱花、油花之外，大约还有盐。

走过外滩、南京路，不知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商店多得离谱，走了王肥在上海的亲戚家，还是一个什么干部的，体会到上海的拥挤。那样拥挤的居住环境，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迷恋，我们俩都不理解。离开上海的火车票竟然如此玄妙，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位管发给火车票的说，没有什么柳州的票，给你们广州的吧，反正差得不远。

这样我们就乐不可支地在珠江边下了火车。出得站门口，接待站人头涌涌。看见那些卖香蕉的，散乱的香蕉每斤只买一角，王肥买了两斤。我们最终分在荔湾的一个居委会接待站居住。到了地方放下东西便出发，逛广州比逛上海有意思，至少风光好得多。在这个居委会的接待站里也感觉到格外的温暖，那些街道的家庭妇女成了工作人员，她们待我们就像待她们自己的孩子。广腔普通话至今还忘不了：“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啦。”还有那可口的“盐水菜心”，以后直到现在，成了我到广州首先必点的第一道菜，在我眼里，这是粤菜第一名菜。

还记得我们到了黄花岗，那里的自由女神像已经倒在地上。粗大的拔河用麻绳扔着好几条，女神像基座上的献石，国民党三个字全被凿掉了，有几个工人正在用水泥填补。据说是周恩来指示必须恢复那三个字。空场上许多人依旧在为是否应该拉倒这座女神像而争辩，听说拉倒它的时候就吵得厉害，两派都是大学生，一派以华南工学院为首，另一派以中山大学为首，弄不清是哪派把它拉倒的，莫名其妙的是现在一提“红卫兵”，一提“破四旧”，谴责的舆论就冲中学生来了，谁也不去提及：所谓“五大领袖”，没有一个中学的毛孩子。其实，无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破四旧”的冲动都是谎言教育的结果，只有“举世混浊”，才能“惟我独清”；否认人类文明的积淀，方

能凸现救星的神奇与伟大。一旦邪说被描绘成真理，灾难也就顺理成章。

还有一件趣事，那是在广交会的开幕仪式上。那时还围聚于珠江铁桥头的广场上开会。我们挤在外围看热闹。忽然在不远处有点骚动，原来是一个黄头发兰眼睛的外国胖女人，据说革命小将发现她是苏修集团的代表，更严重的是，她居然把神圣的代表红条子，别在连衣裙的腰带上！这是严重的侮辱我国尊严的事件，马上被几个穿军装戴袖套的揪住了。不过这个会毕竟非同小可，马上就有更威风的大会保卫人员接管过去了，我们看见的场景是那个女人嘟囔着被簇拥进了会场大楼，这边也就风平浪静。至于里边会如何道歉，我们没法想象。

印象总是模糊的多，清晰的少，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还有句名言：回忆是不可靠的。不过总的说来，广州比上海好玩。我们去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纪念堂外的草地（也许是个讽刺，因为怕“破四旧”，大门紧闭）、越秀公园等地方，就是没有去过任何一所学校，也没看任何大字报。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回到住地时发现，有一张“强烈抗议”的大字报，说接待站克扣伙食费，伙食太差。落款是上海某红卫兵战斗队。随后又有人在上边批了字：“上海佬，滚回去！”

从广州驱车，我们到了长沙，这是革命圣地，伟大领袖成长的地方。什么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清水塘，都吸引着我们。当然也就涉足其间。印象深刻些的便是那个学校里的水井，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井里打水洗冷水澡。我笑道：我从高一就没有洗过热水澡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王肥便讥笑我为东施效颦。

最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韶山冲，接待站必定安排车辆前往的。钻过那个挺雄伟的韶山渡槽，直到当时感觉非常新颖的毛泽东故居纪念馆，我画了好几张建筑临摹图，只可惜都无影无踪了。在故居里，我和王肥小声议论的话题就是：算不算地主。我们一致认为：中国90%以上的地主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房子。可是我们看见康生讲话里说主席家庭是普通农民，我们觉得，那绝对是拍马屁的捧场。唯独没法求证的是，土改时这个房子的主人是否也挨批斗。

在故居门前有一个池塘，只有塘中心还有尺把深的泥浆水。旁边立着的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少年时期游泳的水塘”，竟然有几个特别“忠”的红卫兵小将脱衣下水了。看见他们踩着泥泞往里边走，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旁边围观的人们一定也是如此认为，否则他们也该下去沐浴这个“圣水”的。惟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两三个女将。只见她们湿了水的白汗衫立即变得透明，于是手忙脚乱地拉扯胸前部分，使之不至于贴在身体上而原形毕露。秋天的天气已经有点凉，水肯定更凉。未几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劝解，让他们都离开水塘。我们不解的是：难道还带了换洗衣服来韶山？

离开韶山到长沙，长沙的食品中，最难吃的就是米粉；留下好印象的是画了叉的“沙利文”点心以及一碗一角钱的甜酒，北方好像叫“涝糟”的。直到在火车站，王肥忽然发现我应该在韶山灌一壶水，我的行李中一直带着一个军用水壶。我们谈笑了一阵，就在车站开水桶接了一壶开水，管他呢，长沙水也未必不能算韶山水的。

火车一路进广西，到桂林北站时有卖柚子的。几个佩带“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下去买了两个，但不知如何下口。一位女生掏出手绢抹干净外皮，另一位戴眼镜的男生接过来就要咬，王肥忍俊不禁被他察觉了，挺谦恭地请教吃法。我们本来打算看笑话，此时便只能帮助他们剥柚子皮。那个眼镜宣布是他请教的功劳，抢过去又想咬。我们再次制止他，帮他们剥成片，那个眼镜还是急迫地抢过一片就嚼。苦涩使他马上吐出来，引起一片哄堂大笑。直到我们吃了一片给他们看，他们才弄明白这玩意儿吃起来有多么复杂。不过美味使他们赞不绝口。

回到学校，学校的形势已经有了变化，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巴黎公社原则”，校革筹的权威便不像原先那么神气。局面不似我们走以前沉闷，到处都成立了新的战斗组，藐视校革筹的就不只我们一个“革命造反战斗队”了。留在家里的大嘴等还扩大了阵容，新增加了好几个战斗员，不过基本上是初中部的女将。我们的回归使大家兴奋，顿时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跑来问长问短。

因为我们去过韶山，也就使更多的仰慕圣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探访，话题重复在伟大领袖青少年时代革命足迹的敬仰之上。那壶长沙火车站打回来的开水，被我们说成“韶山水”，于是有虔诚者把它绑上红绸带，举行了仪式排着队恭饮一口。我和王肥相约千万不能道破，否则会有大麻烦。尽管仪式上那水不够了，人家自己也掺了开水进去。精神的崇拜很快就转化为圣物崇拜，离开了愚昧的煽动，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形成的。

我的所有宣讲，都离不开“串联”两字。最具诱惑力的蛊惑，就在于我带出去拾元钱还没用一半。进一步，我鼓动自由串联，其实校革筹并不反对串联，他们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他们批准下少量出去串联。他们把串联作为一种奖励；我把它当成一种权利，一种人人具有而且稍纵即逝的权利。他们要求有准备地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不许游山玩水；我鼓吹不必理会人家的任何革命经验，那不适合我们。串联就是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秀美。

还有一个当时很敏感的问题：校革筹只许“红五类”串联；我鼓吹不论“灰五类”、“花五类”还是“黑五类”，即使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都可以串联也都应该串联。

校革筹为了消除我散播的恶劣影响，特地组织了一次全校誓师大会，目标当然是声讨那条谁也说不清道不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战斗队”都上台表达了他们的誓言，我们的“战斗队”理所当然地推举我上台发言。说了多少空话已经没有印象，但我公开宣布：“现在的革命大方向就是串联。串联就是革命，不串联就是不革命，反对串联就是反革命！”立即博得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这个煽动后来成为美谈。

召开大会时还神气活现的校革筹，散会时就已经灰溜溜的。第二天就成了过街老鼠，并立即被一个不甘落后的战斗队宣布“夺权”，并当众劈烂了那个公章。一个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原则并已经铁路局党委批准的临时权力机构，到此寿终正寝。它其实是被“串联”两个字打倒的。几天功夫，整个学校都空了。

我躺在阴暗的宿舍里，回味着这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那份得意，大抵和列宁在十月差不多。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校革筹在自己决定召开的誓师大会后便陷入被动。首先是两位成员倒戈，他们显然不想失去外出串联的机会，但人在革筹便身不由己。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就选择了退出革筹。当他们的声明墨迹未干，“红闯”战斗队的几位同学就跑到革筹要求开证明出去串联，结果革筹拒绝了。争吵之后“红闯”马上宣告夺权，废除革筹小组，把革筹小组的那枚木头印章抢过来，当众劈成几瓣。校革筹垮台竟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怨恨者，早已在淘其根基；拥戴者，实在恼火其无能；扶持者，恰又只将其作权益之计。直接的原因，只为人们利于外出串联，它却无视大家的愿望；倘若它积极主持串联，那么垮台的只能是我们。只是它也主持大串联，人走茶凉，它还能领导谁呢？

这一折腾整个学校就炸了锅，大多数老师学生都自行结伴、分头串联去了。我所做的全部煽动，只是介绍了自由串联的可行性而已。学校人事室主任是东北南下干部，他那里收藏着学生档案还有学校原来的公章。看见学校乱了套便慌了神，急忙跑来找我，一是要把学校公章交给我们，说是可能有同学没有学生证，可以开证明给他们；二是希望我们“造反队”把人事室贴上封条，以免档案被抢。他强调，只有“造反队”有足够的威信制止抢掠。

我和“造反队”的同学商量后，同意接受这个差事。当我们到人事室时，什么都晚了。学校的公章也已经被“红闯”夺走，档案柜已经翻得七零八落。王主任正一筹莫展地发呆。我告诉他，算了，一了百了，你也出去串联吧，有工作证就行。于是我在那里翻档案，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唯独记忆犹新的是高二学生“王五”的档案，那里边记录着他不知何时说过：“说来说去，还是资本主义好。”但这句话后来常被我们引用于挖苦“王五”，须知，这几个字已经断送了他的全部希望。为了避免其他麻烦，我们把所有遗留的学生档案全烧了，该死的秘密档案，居然连孩子们也不放过。

而“红闯”的同学更来劲，他们把学校的公章用绳子拴着，放在会议室宽大的窗台上，任由大家随便盖章。于是，对外出仍不放心的同学们排着队自由地为自己开了想开的证明。

没有两三天，全校学生基本上跑完了。老师也跑了，都串联去了。整个学校可以用冷冷清清来描述。我留守了几天，柳州市来了通知，我们学校要做接待站，给了两辆新单车，以及别的东西。总务处的柳主任和袁老师负责，要求学生也留些人。好在确有死活不愿出门的人，我们班上就有个汤姓同学，得了一部新单车整天骑着，他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之所以我多留了几天，原因有二：一是我已经“串”了一个多月，理当让大嘴他们先出去走走；二是我回归学

校之后，不断地有人报名加入我们这个“革命造反战斗队”，其中包括后来她们的父亲成了共和国总检察长的两姐妹。其中有好几位住校同学先回家拿些东西再出去串联的，我必须等他们返回。

在我虔心等待的人中，有一位该算我的初恋情人，当然，她根本不知道我的暗恋。那时正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批判风潮中，大块文章连篇累牍，即使我这个每天都要在阅览室泡很长时间的人也觉得招架不住。这天正沉浸在一篇大文章里，忽然觉得读报桌对面有一个固定的影子，于是下意识地抬头望过去。只见一个女生在对面也全神贯注地读报。我平生第一次发现女生竟然有如此美丽，于是心头怦然而动。越是凝视，就越是心跳得厉害，报纸上写的是些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未几，她似乎发现我的异样举动，抬起头来，视线相遇她就羞怯地微微一笑，也许只是一种礼貌，但对于我确是无以抗拒的强烈冲击波。接着她移动位置，到另一张桌子读报去了。再过一会，她就离开阅览室走了。

我真正觉得奇怪，担任了几年的学生会生活部长，至少每个星期都要检查一次卫生状况，还要布置并检查校值周班，几乎学校每个班级乃至每个角落我都再熟悉不过了，如此面生的女生有点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只是因为我们要准备高考，还有如此热烈的批判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她好像突然从学校里蒸发了一样，尽管我迫切希望再次见到她，却总也未能如愿，此次一见钟情的激动也就只好存放于心底。

没想到那次去桂林串联，火车上又见她了，居然在文革开始后工作组安排的学生管理学校伙食团里，由“老头子”率领着。依旧如此羞怯，如此美丽。更没想到，在我煽动串联已经得逞之后，她又由另一个女生陪着，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造反队”了。这几乎使我欣喜若狂，然后她与这位女伴提出要回家拿东西，并希望我能领着她们出去串联，正求之不得。

没料到一去两三天都没有回校，我在这里望穿秋水，她们却不知“蘑菇”些啥。几批同学都盛情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造反队”里还有倡导步行串联的，但我坚定不移相信串联的时日无多，花那么多时间走路很愚蠢，于是都婉拒了。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学校初中部教数学的季老师，已经快退休的人了。在工作组时期被揭发出一本家庭收支账本，里边有许多红色数字。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表示入不敷出的赤字。最后被强迫承认那是对党表示不满的“血债”，于是成了四个牛鬼蛇神之外的“候补”对象。在我出去串联时，这些“候补”对象都被校革筹勒令每天扫地。我在煽动全校同学串联的同时，也煽动这些老师们出去串联，即使不愿去的也不要听从校革筹的“勒令”，停止一切惩罚性劳动。

这天出校门恰好预见季老师一个人还在扫校园，我与他交谈时他怯问：我真的也可以出去串联吗？我给他以肯定的答复，并举例说其他被“勒令”的老师不是都走了吗？他怀疑运动后期会被“秋后算账”，我又费了许多口舌解消他的疑虑。没想到最终他依旧每日扫地，直至我们又串联回来，给了他一个禁止再扫地的“勒令”为止。而

且，他最终仍未逃脱工宣队、军宣队的“秋后算账”，尽管与我们被清算的“账”相对比，他的“账”已经很不算啥了。

另一位女生回来时告诉我，她的父亲不许她外出乱串，要我回南宁“解救”。俺马上赶回南宁，直接跑到他家，已经记不得费过多少口舌。好在他哥哥原来在学校与我关系尚好，上届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帮了个忙奉劝他爹妈，“解救”任务圆满完成。

从南宁返回柳州，学校里大约还有七八位同学正等着与我们一起外出。我决定走西北线，大家一同到了火车站。尽管多次解释，他们几个依然各带上一床毯子，打起行军背包来。等到火车进站，我发现革命形势确实可算日新月异。几乎每一趟火车都被串联的学生挤满了，不由得记起苏联描述二战小说里的一个描写：“沙丁鱼罐头”。我们如此多人，根本没法挤上任何一列火车去。

紧急协商后，我提议——看来广西学生尚未觉悟——挤上稍微不挤的北上列车，到柳州北下车，然后再上开往贵州方向的列车，那样可以在火车上发现转车去湛江方向的，也许可以捞到座位。多数人反对，于是推举我和“老头子”单身前往北站，他们拿着行李在南站等候。我的算计果然不错，在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卧铺车厢里，我发现十几个穿灰色军装的海军官兵，一问，果然要在柳南转车湛江。为了适应大串联的形势，卧铺车厢已经取消，我就与他们预定下整个卡六个卧铺座位，已经在车上的串联学生也学着我的样占领了其他的铺位，否则我会占领更多铺位的。

车到柳南，车门根本挤死了，要下去的下不去，想上来的上不来。有我们俩在车厢里配合，我们的人从车窗爬上来，“羊克思”依旧不时地咋咋呼呼，此人读高二，姓杨，个性使然，不知何时获得“羊克思”的外号。我至今佩服我们那些同学取外号的水平，几乎大多数外号都“神似”得天衣无缝。两三个小时以前正是他极力反对去北站上车的，后来也主张有车便上，结果哪趟车也没挤上去。他把责任完全推到女生是个累赘之上，听见他那些高论，大伙便讥笑他。

底层的铺位只能当座位，我爬到中铺睡下，头朝里。一位自称在株州上车的女大学生央求坐在我的脚边，没理由不同意的。不料次日早晨醒来，她竟然反方向和我挤在一个铺上，而且睡得正酣畅。看过对面铺上，“羊克思”也获得同样“艳遇”，不过他还在周公那里眷恋着，也许毫不知情。

下得卧铺去上厕所，过道里满是横七竖八的学生，有聪明的已经钻到下铺底下梦见周公去了。看来这一夜又上来不少人。厕所里也有人占领着，好在有人来方便他们还能让出来。这热闹劲比我第一次串联时不知加剧了多少倍。

到达重庆是夜晚，菜园坝车站只作为始发站，我们从九龙坡车站下车，到接待站登记，汽车一直拉到大坪地

方，只记得离红岩村不远。次日一早就首先到那里朝拜去了，然后又参观了曾家岩。我们照例不落参观了歌乐山的“白公馆”、“渣滓洞”，印象极其深刻的就是那里是“中美合作所”，美国佬与蒋介石合伙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劣迹给我的仇美心理火上浇油。直到几十年后，历史资料才告诉我，所谓“中美技术合作所”，早于抗日胜利就不存在了，美国佬根本不知道老蒋把那里用作囚禁革命者的监狱。而且那首被《革命烈士诗抄》等出版物宣传的陈然烈士的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何等荡气回肠，我和广大同龄人都不止一次地背诵。搞了几十年，原来竟然不是陈然的遗诗，而是罗广斌、杨益言的创作。

我们去了一趟沙坪坝重庆大学，再没去串联什么学校，而是地道地游山玩水。解放碑、朝天门码头、江南江北都跑到了，反正坐车、船都免费。本人或许从小就半饥半饱，于是特别好吃。每到一地，首先打听名吃，到重庆也不例外。那种小蒸笼摞起来像好些烟囱的肉饼，已经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不过著名的麻婆豆腐，当时已经被“破四旧”改成麻辣豆腐的，把我和“汪汪”辣得灵魂出窍，三角五分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它确实美味极了，直至我们每人八两米饭才把它消灭。

在重庆我们的队伍便分化了，“羊克思”遇见他们班上的同学，几个没去过北京的随之奔北京而去，剩下七个人跟我上西安。之所以直奔西安，是我考虑那时北京不断传来毛主席接见的消息，人数居然达到一次二百万以上。我觉得毛主席自己也会厌烦，况且这个国家经济能力恐怕也承受不了，所以号召步行，无非减轻压力罢了。也许很快就会停止串联，那么我们回程便可以慢慢下车扫荡诸如成都、贵阳等地。

但离开重庆已经非常困难，菜园坝火车站外人山人海，有排队的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等了两天了。及至我钻进站内，站台上同样人满为患，每一列空车皮进入，立即成了战场，挤得上车的立即关闭窗口，没挤上去的则拼命央求开窗。看着这场景，我顿时想起姚文元那篇评论上海挤公交车的文章，人的立场是随着利益变化的，变得如此之快，确实有点启示作用。

我们那几位带出来的毯子，毫无用场，于是打成一包，反而累赘。我看见一列车正准备发车，满是人头的列车所有车窗都紧闭着。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开了条缝的，我问窗边那位女生，列车到哪儿？她慌忙说人太多了，上不了。我告诉她我们并不上车，她的心态这才平和一些，告诉我这车开广州。我请求她帮忙捎带一件包袱到柳州火车站，随便交给一位车站工作人员就行。她有点不理解，我解释说我们都是柳州铁路子弟，存放在火车站我们回去就可以拿到的，她同意了。此时见旁边几位有责备她多管闲事的，大约他们是一伙的。车窗开高了一点，那一捆七床毯子塞了进去。

后来出站台，“张狗丢”抱怨我太大意，因为他的是毛毯，价值几十，就这么塞给素不相识的人，岂不是等于丢下大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女生到柳州火车站非得找站长不可，由于那时红卫兵小将是惹不起的，站长亲自接过这捆毯子，气不打一处出。他儿子恰好是我们“造反队”的一员，于是这些毯子平安回到学校。这个事例后来

被老同学作为“世风日下”的案例，因为现在这事一定是不可能有的了。

看见重庆火车站的状况，我于是故伎重演，领着大伙出站直奔九龙坡车站。恰好有一列车进站，所有到重庆的学生都在此下车，我们逆潮流而动，上了空空如也的车厢，找到卧铺车厢，这次都学聪明了，一人一个上铺，否则逃不掉一个挤字的。未几，列车工作人员来驱赶，我们耍赖不下车。后来他威胁要叫警察来，我告诉他：你何必管那么死？等会儿还是一满车人，赶走我们还不是要上别人？他想想也就不理了。列车进了重庆火车站，无数人跟着车厢跑，那份壮观，大约只有大串联才能观赏到。直到上满了人，我们才想起没问列车是开哪里的。万一南下，我们岂不是白搭？一问，果然天不负人，本列车开往北京，肯定能到西安。

车到西安，站台内秩序比重庆好，基本上没什么人。站外则大队井然，喝着西北风站在车站广场上。我们分配住在西北工学院，校园里西风萧瑟，人烟稀少；大字报被吹得七零八落，根本没有串联价值。其实我也不明白，全国都在大串联，你到我这个空校园来，我到你那个空校园去，谁跟谁学个啥？只有在西安交大，似乎还有一些坚持没去串联的人，因为那里还有一些新鲜的大字报，主要都是“中央首长讲话”。

我们忙不迭地走访名胜古迹，逛大街。倒是有一些趣事。我照例好吃不已，那天到了一个好像叫老孙家羊肉泡馍馆，已经“破四旧”改名了，西安老人说那是正牌的羊肉泡馍。我进去花了四两粮票，给了两个青岛叫“火烧”的烤面饼，一个大空碗，一块小木牌。我便傻瓜似地坐着，等候党的召唤。结果并没人理我。良久，一位老者坐到我对面，他让我学他的样，于是我把那两个面饼掰成碎块，放到大碗里；再跟着老者到橱窗处递上木牌和大碗；看见里边用热汤滚过那些掰碎了的面饼，再浇上一勺豆腐之类的汤汁，切了两片几乎透明的熟羊肉薄片，算是大功告成。一口吃下去，简直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可以说难以下咽。

想一下便自我解嘲：草都不长的大西北，混个不总挨饿就不错，哪里会吃出什么味道来？刚自以为得了答案，马上就有了收获。在“西安饺子馆”，排许久队吃了羊肉饺子，却有滋有味。再以为不错，探得原来旧名“贾家包子”的，却又上当了，南方无论啥包子都比它强千百倍。

西安的风沙使我们这些南蛮忍受不了。夜里回到床上，穿得如此厚实，肚皮上居然还搓得出一道道细沙！而且还不止这些细沙，毛衣下半截几乎每一个孔里都暗藏着一个虱子。开始时觉得肉麻，拼命捉它们。后来就应了“虱子多了不痒”这句俗话，听之任之了。结果是串联结束回到家，进门之后都必须首先清理这些小动物。

工学院里洗漱都集中于食堂处，一个水泥砌的大水池，傍晚时供热水。许多木盆是只能用不能拿走的，于是就地洗脚。那天来了一群新疆不知什么民族的串联女生，天性快乐的她们总没完没了地说笑，只是一句也不懂。本以为她们的宗教是比较封建的，谁知我错了，她们嘻嘻哈哈就在我们跟前除鞋脱袜，偷眼一看，那白嫩的小腿上居然密布长长的黄色汗毛，比我们这些男生还厉害。

有天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吧，记不很清楚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居然被我看见一张新鲜的大字报，说的是要组织长征队，志愿参加，从西安走到延安。我顿时觉得来了兴趣，到他们写着的办公室去，里边有两个穿军装的男士。我是第三个，于是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听说我们还有七位，他们非常高兴，说马上可以出发了。于是让我留守，他们要去西北局接待站办理有关手续，主要是要钱要物。

我于是如同“傻老婆等汉子”一般，呆坐着，无聊至极便看看那里残留的传单什么的。不记得有多久，他们回来了，居然有一部上海牌三轮小汽车送过来的，十来个行军壶、绑腿、背包什么的，我们搬了一会。那个自称为队长的还交给我一百多元钱，一些陕西粮票。我则在一张表格上签名还写下我的学校。据他们说次日还有五位武汉的学生入伙，打算后天出发，他们就走了，回西北局接待站办理未尽事宜，主要还想弄军大衣。我把这些物品堆好，把钱和粮票锁进柜子里，接着锁好门，回住地去。谁知我们的兄弟姐妹一个也不肯走路，中央已经发令结束大串联，我们原打算去新疆也泡汤了，大家一致要求回头奔成都。

我也无法勉强各位，反正不去就是了。后来，大约1969年冬天，我回到学校，总务处的谭老师告诉我，有几张各地寄来的账单，要我还钱，大致是昆明的七元多、成都的九元多、西安的一百六十多。我告诉谭老师：你回个函给他们，就说该人已死于武斗。于是不了了之。

我们离开西安赴成都，到西安火车站排队等候，一直等到天黑也进不了站。我就到车站附近的接待站签字领了十几个烧饼，分给他们吃了。“老头子”突发奇想，让我和他一块到钟楼那里的夜市吃点东西。我们登上电车就走了。吃罢“涝糟”回来，我们排的那个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我俩着急地赶到进站口，人家死活不让进，说是列车已经超员。那列开往成都的列车就停在一站台，看样子又是晚点列车。车站把门的工作人员说，只要我们的人出来招呼一声，就允许我们进去。可恨这个王肥带领五个人没有一个出来寻找我们，等到那趟列车开走，我们足足站了半个多小时。我俩顶着寒风跺着脚，几个小时后又来了路过成都的列车，我们才得以进站上车。

列车在宝成线上行驶，广元车站卖的豆腐乳，用一片很长的菜叶裹着，味道好极了。“老头子”直后悔没有多买两块。一位四川的大学生给我们介绍了成都三宝：赖汤圆、龙抄手、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我们已经在重庆领略过了，那位告诉说必须成都的才正宗，重庆的不是正宗货。于是我们打算到成都一定要吃到这三宝。

火车在广元前后（记不清之前还是之后）停了一次，足足一整天。那是大山里的一个小站，周围只能看见大山以及线一般的山路。听说重庆已经发生武斗，还死了人，火车没有点，连车头也不见了，于是所有在车上挤怕了的学生们都在铁道上散步。就在站台尽头，我与经过当地正休息的一位中年农民闲聊，得知他背上背着的竹篓叫做“篾篓”、手里撑着的竹竿叫做“竹马”之后，我忽然顿悟：诸葛亮留下的千年之迷，也就是那个“木牛流马”，肯定就是这个“篾篓”、“竹马”。借着当地方言的谐音，让每个士兵自己背粮饷，兵不厌诈地放出风来迷惑司马懿，也许为了使流言逼真，还真的故弄玄虚制作几个不能动弹的木头牛马之类留给司马懿，结果让后世人们

越传越玄。望着附近巨大的山体，还得知剑门蜀道就在这一带，我愈加相信自己的看法。

到了成都，我们又住在省工会干校。其实“老头子”一下车就查到他们住在南郊的跳伞塔，因为有气，故意没要求住过那里去。两个人基本没有随身行李，既轻松也不便。等我们找过去他们不知到哪里玩去了，“老头子”更加来气，拿走我们自己的物件，决心和他们分道扬镳。我从内心不大想这样，因为那里还有她在。不过又要装出无事模样，便顺从了。

仔细想想，我那时活得太累。原本天性所存的冲动，恰好被学生干部身份和假革命的积极所打败，一路出行居然故意掩饰内心状态，连一点表示也不敢。甚至他们又找了过来，我还要装出与“老头子”同样有气的神情，确实可笑。他们回住地去了，我们真的与他们分了手。

我们俩有许多共同点，好吃大约是其中之一。为了寻找“龙抄手”，我们可以坐公共汽车满街乱转。那次刚开车，就发现“国营成都抄手店”的招牌，于是一到站便下车往回赶，辛辛苦苦到了店里，这才发现原来成都人的抄手就是我们说的馄饨。所幸味道还不错，没有在西安吃羊肉泡馍的感受。

到大邑刘文采庄园参观，那里的封建气息确实浓郁，整个庄园的建筑也都渗透着传统的封闭与保守。“天上布满星”的内容显然是一种人为的做作，即使与那里的庭院也格格不入。匆匆参观完我们俩就出来了，但是挺宽阔的停车场上没有几个人，我们还要等待后边出来的才可以回成都。

于是到旁边老百姓摆的摊摊上，一个老者显然别有用心地问我们看过那个水牢没有？我感觉他话外有音，于是追问。他只笑着答说那是烟库改的，旁边另一位阿婆便责怪他多嘴。接着他就什么也不说了。这个印象始终清晰地留在我脑子里。不料几十年后果真显露真相：那个叫冷桂英还是冷月英的，坐水牢的说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其实那里只是刘家收藏烟叶的地库，绝对要防潮的，压根儿没有过坐水牢的事情。

在成都我们照例旅游，什么名胜古迹都不想放过。他们走之前王肥又来过一次，我们不在，他于是留了个条子，告知我们他们的行期。后来听说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许多分歧，特别是她一直抱怨王肥领导无方，希望和我们集合在一起，只是“老头子”的态度导致她以为我也不想与他们为伍，以至于在遵义我们迎面相逢也不过打个招呼而已，这使我感觉后悔。不过只是后话。他们从成都上车，到遵义时分歧已经十分严重，再到贵阳下车便彻底散伙了。

我们到达贵阳时贵阳显示出某种迹象，恰好与后来各地派性斗争的实际挺吻合。我们在大十字街头便遇到一场小规模的打斗，是公交公司工人与人力车工人发生的小摩擦。记得那时已经颁布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什么规定，我们当时在黔灵公园里商谈估计文革运动的动向，我估计运动大约从学生要转入工农运动上去了，有点松口气的感觉。同时也打算趁机再玩一阵，去昆明。

那天我们俩到车站侦查地形，因为接待站已经严格控制车票，往昆明去我们是弄不到票了，必须蒙混上车。没想到在火车站遇见两位女生，她俩到车站等候返回学校，而其他人也各奔东西，似乎已经回去了。他们确实彻底分开了。她看见我们时那个兴奋劲使我感觉到欣慰，于是不失时机邀请一同奔昆明。另一位坚决不同意，说是中央宣布停止串联已经很久了，不应该不服从中央指示，她也表示赞同这个意见。我解释说，同学们肯定不会现在都回校的，至少还得好几天。我们去昆明走一趟不过三五天功夫，回校也不耽误。她显然动心了，不过听说要无票扒车，立即就不干。劝说无效，她希望我们一起回去，但我们俩铁了心要奔昆明，便分手离开。

晚上大约八点，我们绕到车站的站台上，往昆明好像只有这趟车。车厢是货车厢改制的，不知里边那些人何时上的车，总之是一个门也不开，里边全满了。我们到处转悠，始终无法上车，眼看火车就要开了，情急之下我提议干脆爬上两节车厢连接出，因为车厢是货车改成的，两车厢之间的通道便露着天。于是我们面对面坐在两个车厢的连通门外。

火车开出不久，有学生要走过其他车厢，把门打开了，我们就迅速溜进车厢，找座位显然无望，我领着“老头子”一直走尾端，人少些的地方席地而坐。

列车到达安顺，车站上来一些人。只听见一个声音高叫着：“革命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停止串联已经有些时间了，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都积极响应，热烈拥护，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也有少数同学不那么听话，还在继续串联。组织上不得已，只有采取强硬措施，现在，我宣布，凡不是云南省的同学，一律下车！决不许往前走一步！安顺，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凡是在这里下车的，就是革命的；不下车的就是不革命的。你们听清楚了，到了云南，已经没有接待站了，没有人给你们吃、给你们住。抓到了，就一律遣送。所以，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好自为之，再不听话，继续往前走，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是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我和“老头子”坐在地板上，用棉衣蒙住头，装着睡着了。不料他歇了一会儿又开始喊叫了：“现在，我们开始查验学生证。凡是没有云南学生证的，一律下车！请云南的同学们积极配合我们，勇敢地揭发那些外地学生。不要怕，有我们给你们撑腰，有党中央毛主席给你们撑腰。不过，我们可以告诉外地同学，我们安顺欢迎你们下车，我们照样接待。还可以照顾大家，让大家到世界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去耍一下。安顺，是大串联的最后一站，同学们，你们要珍惜哟！”

陆陆续续有好些人站起来“投案自首”了，他们受到欢迎，下了车。“老头子”悄悄问我：我们怎么办？看样子难过这一关了。最严重的是那段取消接待的恐吓，万一真的没有接待咋办？我寻思那多半只是吓唬我们，没理由立即取消接待站的，总有人不会立即离开。

如此执著只是因为我对昆明情有独钟，父亲的好友和我们的邻居陈伯伯娶了个昆明老婆，我们从小就不时听到

她倾诉对昆明的怀念。那一口婉转如莺的昆明话，说起来就像唱歌。真的，我至今也没感觉有哪种方言堪与比类，即使是同样婉转动人的苏州、广州的方言，我也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及昆明话的神韵。于是我安慰“老头子”：不必理会那些吓唬人的虚张声势，俺们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于是就躲。眼瞧着那些佩带“纠察”臂章的人查票似地移动过来，我们便往相反方向溜。却不料列车员早已锁上了通往别的车厢的门，又没料到就在门边有一间废弃不用的小茶炉间，我们万幸地钻进去，尽管拥挤，还是把门反扣住了。等到火车重新开动，良久，我们才敢把门打开，溜了出来。看来下去不少，车厢已经松快多了，只是依旧没有座位，只好照样席地而坐。

一位比我们大不了一两岁的女列车员注意到我们，于是查票。我们没票，就编造了一个美丽的革命故事，大抵是说我们的同学们跑到昆明去了，我们此去为的是把他们动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挽救他们以免落入不革命的队伍里。这个故事连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们，那几句悦耳的昆明话我至死难忘：“死不要脸呐，瞎扯！成天不做工，不种田，白吃饭，到处游山玩水。死不要脸呐！”说罢，她也没怎么样，走了。

贵昆铁路与宝成铁路相比，是另一种雄伟。黄土高坡无论怎样都只是坡，即使进入“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路段，那个大山也不过云贵高原的小弟罢了。路边的山沟可以用万丈深渊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我们曾看见车窗外的深沟里，躺着一列翻车落下去的火车，就像扔掉的玩具火车。

到昆明火车站果然遇到麻烦，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与我们一样蒙混到达昆明，这使我们立即消除了孤立感。接待站摆出一副不予理会的姿态，那些北方大学生就与他们争吵，高个子果然能撑着塌下来的青天，我们耐心地等候下山摘桃子。他们费尽口舌终于有了回报，同一部汽车把我们都拉进了昆明师范学院，我们住的地方离“闻一多遇难处”咫尺之遥。唯有吃饭时领的饭票是写借据才给的，吃饭也与部分学生在一起。印象中几乎每餐都是茈菇，于是墙上也有上海某某红卫兵组织的陈旧大字报，批判食堂伙食太差。此类大字报我们在重庆、西安、成都都有见识，只有上海学生敢于对伙食提出异议，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另一个印象是，我们看见昆明市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第一号“通令”，不记得发布于何时，那是严禁借“破四旧”为名破坏文物古迹的措词严厉的布告，这使我感慨万分。昆明到底是昆明，连左派也不出奇却很可爱的。我们游览过的昆明各古迹所在，破坏迹象几乎无几，确实该布告功不可没。

从西山龙门下来，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公共汽车起点站。眼瞧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提议不要沿着那弯来弯去的汽车公路绕，径直穿过树林下山，否则怕赶不上末班车了。望着杂草与灌木丛生、树木茂密的山坡，“老头子”虽然不甚情愿，但赶不上末班车就会当“山大王”的忧虑迫使他赞成我的主意。我们于是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昆明方向钻进树林，林间景色幽美，只是比路上更昏暗。甚至有猫头鹰已经“起早贪黑”出来觅食了，它们幽灵般的影子掠过，接着传来老鼠的一声惨叫，确实有点吓人。“老头子”更怕草丛里有蛇，几次要求返回公

路，我执意坚持前行，他也只好顺从。赶到公共汽车站，末班车刚准备起步，我们庆幸地坐了上去。这番经历使我明白了，鲁迅所主张的“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真正是人生歧途所该奉行的哲学，确实对极了。

在昆明，我们相当悠闲，胜似疗养。泡在远郊的温泉浴池里，倘徉于黑龙潭、金殿、大观楼、圆通山、翠湖，我们都不想走了。那次我们去品尝著名的“过桥米线”，硕大的陶钵装着澄黄的鸡汤，外边捧着感觉温暖适中，忍不住用汤匙舀起就喝，结果是吐不及舌头都烫木了，原来表面那层油掩饰了汤的热度。如今的“过桥米线”已经身价百倍甚至数百倍，只是没有了当年的滋味。寻常百姓家里的燕子，飞入王谢堂前，是否也会失去什么？

还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大观楼。“老头子”对孙髯翁那副长联赞叹不已，于是全文照抄不误。我欣赏的是那里的景色。我们到达时，白玉兰正盛开，硕大的花朵挂满树冠，居然没长一片树叶。香气扑鼻。我们俩在绿树与花香中交谈，互相间竟然都有不想再闹，只企望安宁地读书学习的打算。只是大学已经停止招生，还不知要停到何年何月，前途一片茫然。

直至元旦前夕，我们跑去铁路打了个电话回学校，家里说串联的人们都已经回校，文革也闹腾得更热烈了。急切地盼望我们回归。此外，还告诉我们：初三班的王某，串联时病死于峨眉山，死因为急性脑膜炎。及至我们回到学校，已经是1967年元旦以后了。

民间有句话：行万里路，胜读十年书。我总是以为，大串联给了我课堂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眼界开阔确实会让人换一副胸怀。我甚至想，孔子倘若没有周游列国，大不了是个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吧。老毛若是也周游列国，中国将如何？再延伸下去，邓大人年轻时没有留学法国，能有那么大魄力改革开放么？言及此，捎带两句题外话。1979年李慎之先生被邓点将随同其访美。飞机上李问邓，改革开放是否主要对欧美开放？邓肯定了。李又问，为什么？邓回答：因为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永远的老三届

（题外话：那天，恰如banjin所言，出差北京，事情谈罢，便有些无聊。适逢老善来电话，解释了一通何以签字办手续离婚，又决定撤销的缘由。偶然来了些思绪。老善的半生旅程，平凡中其实有蕴含着不平凡的故事，于是决定趁着许多回忆新鲜而且热辣的时刻，敲打起这篇文字来，不然转身就会忘记。敲打到眼睛累了，暂时歇息。以《本文纯属虚构，不许对号入座！》为题，发到《如歌的行板》。然后，又东奔西跑，发了的东西也就了了一件事，但不时还有只鳞片爪涌上来，干脆，重新整理，搞成一篇创作也罢。）

老善今年满过56岁奔57岁去了，在这个年龄上，老毛登基了，华国锋接班了，鲁迅死了，孔子也当上了大司寇还趁机杀了少正卯，就连希特勒也死在这个岁数上。可是老善非但不敢想登基而且既没发达当然也没死，依旧在为生活与事业拚搏。这个年龄的人都恰好赶在共和国成立前一年来到人世，老善的至交老文也是这年出生的。有次两位坐在一起喝着小酒胡侃，老文感叹道：“当年吹嘘‘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或者‘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缸里’的时候，心里总有点怯怯的，不像人家那么理直气壮。”老善愤愤地大声说：“你他妈不管怎么‘怯怯的’总还可以吹一下，老子当年是他妈的‘地主狗仔子’，连‘怯怯地’都不敢说！”于是后来，才慢慢地、间或地透露出自己的身世。

身世

老善原籍湖北襄樊地界山区人氏，说话时略带湖北口音，却常常被人误认成河南话。据说他祖上乃是被忽必烈的队伍裹挟从西域流入中原的，于是才有这个怪怪的姓氏。可到了却无从查考只是一代传一代的传言，那些地道的汉族家谱有的竟然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老善家却连家谱都没有，只知道到爷爷这辈就成了当地的大地主，不知多少代人辛勤劳作节衣缩食才攒下二百来亩土地和青砖青瓦的大宅院，只不过那个山沟里的人家，没有十亩八亩田是喂不饱全家人肚子的。所谓“富”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古语云“富不过三代”，他家连一代还没富过就碰上了土改，这些地和房子被没

收了，不但血本无存，就连爷爷本人也因被批斗连气带病死掉了。九三年老善陪老母亲回一趟老家，土改时分得他家正房的旧时长工老白还健在，一口一个“小少爷”地叫，把老善吓得连连摆手；这手还没摆停老白又当着被称为“少奶奶”的老母亲的面交代他的儿孙们：“我们家这正屋是老东家的，自打土改分到我们家名下，那只是帮着保管。几十年来我一直精心保护着这房子，为的是还给人家。人家的东西我们不能白要，白要了别人的东西就算做鬼也不得安宁。趁现在少奶奶和小少爷回来了，说说清楚，以后我要是死了，这房子还是人家的，你们一定要记得还给人家。”这一席话把老善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声明自己毫无这意思，而且永远不会再回老家了，压根儿没有讨回房产的念头，千万莫把老人家的话当真。这不但是老善的心里话，而且他还得为白家老头那番话提心吊胆：万一传出去说他这个共 产党员回来反攻倒算那麻烦可就太大了！老善说，自那以后听见“回老家”三个字都会心跳。

老善他爹当年到武汉求学时，是按照他爷爷的命令成了亲才出远门的，缘由在于三代单传万一断了香火就是头等大逆不道。新娘就是早已定下的“女大三抱金砖”的“娃娃亲”，这才有我们老善没能生在红旗下的遗憾。又没料到他爹尚未学成正果就遇上“四野”大军开进汉口，在一片动员参加革命的热潮中，他爹加入解放大军的干训班，没训多久就救火似的随军南下，及至安定下来与家里联系上的时候，才知道老善的爷爷已经死了，他爹就把老善连同他娘一起接到身边。在这个桂系老巢所在地，南下干部就算“老革命”，升迁一般都很快的。老善他爹又是有大学文化的“老革命”，理所当然就如同坐上顺风船，三下五除二地坐到处长的交椅上了。那时的处长就属于高干行列，并不像现在这样，省城里的处长比街上的果皮箱还要多，当干部不上处长的简直就是人生失败的标志。于是老善当初也就算得上“高干子弟”，自小生活在省委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在学校也是一路顺风总有个班长组长的干干。无论他怎样地注意谦虚谨慎，走路时那昂头挺胸的姿势，还是免不了高人一等的气派。古人云：“祸兮福所托，福兮祸所倚”，这道理极其简单却又极其深奥于是也格外灵验。光阴转到“四清运动”时，不知怎么的就出了问题。缘由在于他爹要提副厅时算一道坎，需要外调查实他参加革命前的生活经历。本来打算寻到原来的中学找两个人问问便了结的例行公事，偏偏老家那边的党组织硬是确认他爹应属于漏网地主分子，根据就在于他爷爷是虽然土改时就一命呜呼了，可老善他爹不但吃剥削饭长大，而且在当地解放前三年一直是靠地主家庭供养着读书的，属于以剥削所得维生。如此板上钉钉的公文带回来，本地的党组织也无法说什么，曾经又派人专门北上核实，那边的结论硬是不肯松动，反倒是又添上老善他爹放假回家还帮地主家庭理过账的生动情节。据说关键在于老善他爹参加四野是汉口解放之后，倘若在此之前哪怕一天也可以称为“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而在此之后就只能算“隐瞒历史混进革命队伍”。接下来官没

升上去却被定性为“漏网地主分子”。这么一来老善他爹立马被开除党籍免职查办，老善本人也背上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包袱，从高人一等的南下干部子弟一下子成为“地主仔”，见人都矮了三分，心境的苍凉是不可言喻的。

老善随之而来的日子苦不堪捱自然不在话下，他爹原本的老同事老战友一下子都躲得远远的，家也从戒备森严的省委家属大院驱赶出来，住进房产局出租的破旧公房里。偏偏他爹又是个心气极高的主，生下来就一路顺风从未交过“华盖运”的，历次运动显然还有不少“违心”的地方，否则休想如此一路顺风步步高升。这一次打击无异于当头棒，整日里除了接受监督改造就没有第二件事情可以做，没多久大病一场接着“交了粮本”，撇下老善和他那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工资的老娘。一下子失去他爹的一百几十块钱之高工资，老娘到处找临时工干挣下点辛苦钱发誓要供老善读完大学。白天跑去遥远的罐头厂剥四季豆削菠萝皮，夜里还得领回料来一个一个地糊火柴盒，老善自然也必需帮忙否则就有断炊之虞。只有对好朋友老文才敢说：“那时别人家肉票不够吃布票不够穿，我们家还要偷偷拿肉票、布票出去卖，换点钱回来不买米只能买木薯粉。老子成天喝人家喂猪的木薯粉糊糊喝到怕！” 言及此老善就哽咽着强制别让眼泪流出来。当国家权力成为雇主，所有人都必须仰仗它才能维持生活的时候，一切民主与自由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谁敢不唯唯喏喏必然会头破血流。

文革

那年头“运动”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四清”的涛声尚未到高潮文革就开始了。还没怎么适应落魄地位的老善一下子又变成了“黑五类”，自然过的是雪上加霜一般日子。老善当上了“黑五类”，可与老善一起长大的玩伴们突然间都成了受宠若惊的“老大红卫兵”，革命激情充沛得嗷嗷叫犹如发情的公猫母猫；兼之落井下石本来就是革命队伍里的光荣传统，有好事者更进一步深挖，楞说老善在被他“地主狗爹”接过来之前也是生活在“地主狗爷”家里，吃的也是沾满贫下中农血汗的剥削饭，必须定为“小地主”。老善的日子就更悲惨了，甚至还被那些自幼一起骑着竹马弄青梅的“红五类”们编入“牛鬼蛇神”老师们的“专政队”里。好在工作组多少还懂得点政策，按照“不许整中学生”的规定把他放回原来的班级。躲过一劫不等于逃出生天，老善从此成为“不许右派翻天”的对象之一，不许参加“战斗队”，不许写大字报更不许去串连。又好在周总理发话提倡“徒步串联”，兼之那些最狂热的积极分子们早就“串联”到全国各地去了。山中既无老虎，老善便组织了几个也是因为爹妈有各类问题而不许串联的同学搞了个“长征队”。红袖章上不准

印“红卫兵”三个字是必然的，但印上“长征队”却是无法指责的事情。于是他们领得盘缠扛着大锅打着绑腿从南疆一直走到延安。为这事他后来跟许多朋友吹嘘过，大抵是出于一种阅历上的优越感，熬过的苦难就是阅历，能从这儿走路到延安的大约也只有他们那几个人。

这“长征”的故事令许多人钦佩，却没有少被天煞的老文讥笑：大冬天在荒蛮的山野里走那么两三个月，即使神经没出毛病，那脚脖子也得走出毛病来。老善无奈只得自我解嘲：“兄弟啊，你不知道，那时别人都跑出去串连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哪里都不给去，那日子你来受受看！要不是老子聪明一点搞成这个‘长征队’走这一趟，就挨守在学校里天天扫树叶，岂不是更惨？”没想到这一辩解反倒更麻烦，这个老文攻击得更厉害：“你他妈的自己脓包，老子当年还是‘右派学生’哩！比你那个‘黑五类’还厉害，属于现行的。我理他们个屁！‘红五类’还没敢串连我就已经串了半个中国，路上查成分我就理直气壮报‘革干！’俺老爹当会计谁敢说不是革命工作？为革命工作的干部谁说不是‘革干’？再说了，你拿个学生证出去谁知道你是什么类？”只可怜老善啥话也说不出来只剩下点抱怨：“他娘的，当初挨整也不如你现在这棍子敲得狠。”

这个老文家当初没有老善他家那么惨，既不红又不黑属于“拉一拉就过来，推一推就过去”的“墙头草”，革命的领导力量曾经敕封他们为“红战友”。却不料老文那小子历来不是省油的灯，他把发下来的“红战友”袖章翻了个个，弄上几种广告粉调和成不伦不类的颜色写上“花五类”戴着，还故意满学校乱串，拒绝批斗“牛鬼蛇神”、捣乱“破四旧”到处张贴莫名其妙的大字报；弄回来一些小道消息油印成“北京来电”胡乱散发，于是被工作组内定为“右派学生”。却不料没等“革筹小组”进一步行动，这小子倒溜出去“擅自串联”去了。及至串了半个中国回来就煽动全校师生乱跑，甚至大声演讲说什么：“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肯不肯出去串联。出去串联就是革命的，不去串联就是不革命，反对串联就是反革命！”一下子把个学校弄得炸了营，青年人谁不想出去逛逛？几天时间就把“革筹小组”变成“光杆司令”，再往下自然被推举成“司令”，然后演变为武斗，再往下就是坐牢批斗，死里逃生总算最终发配下乡。一直整到知青大回城这才洗脚上田回到城里，一屁股屎没单位敢要，只能自食其力也就成了个体户的料子。

与老文这个同龄人相比，老善确实英明得多。他们从延安串联回来家里早已开了锅，“红五类”、“黑五类”都已经不再重要，“造反派”、“保皇派”成为新的话题。老善察言观色窥测了方向，他专门去找“保皇派”靠拢，主要是他那些军区子弟的同学都在这一派里，他们从父母那里得来不少“内部消息”，知道军队很快就会介入决不会让“造反派”有好果子吃。毕竟势力单

薄“保皇派”需要增加力量，既然同学过一场人家也不好总是拒绝，老善于是成为“保字号”之一员。后来他参加的组织果然获得军区支持，这一派群众组织在广西就演变成“联指”。参加不参加活动并不重要，游行示威时能进去排队凑个数就表明了立场，“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么？道理总是人编派出来的。及至派仗打起来，老善不敢造次，多数时间藏在家里，隔三岔五地去过一下“组织生活”不被人家遗忘也就谢天谢地了。这一手被老善称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到六八年老毛指使韦国清搞大屠杀时，作为“地主仔”的他就躲过一劫：倘若他没参加联指而是参加“四二二”指定会被毙掉再扔进邕江里喂鱼虾。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仅后来中央“处遗”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就有八万多人，就连婴儿也难逃一死全家灭绝的亦不在少数。可老善活下来了，而且活得不错，不像老文，傻折腾几年只捡回一条有问题的命来。

下乡

及至下乡插队时老善更是占尽了便宜，身为中学生少数派的联指战士彻底忘记了阶级分析，老善糊里糊涂沾了光就被分配到城市郊区，骑单车回家吃午饭也不耽误出工。这比多数派那些倒楣蛋都被分配到边远山区插队的可算幸福到家了。古代传下来的“福兮祸兮”总是要显示它的威力，接二连三的运动特别是“一打三反”之后老善终于还是“现了原型”。除去重新被人另眼相看之外，有了他这个“地主仔”当垫脚石，他们那里的插队青年就得了一个好处：一有招工之类的机会老善的人头就成为帮人家占名额的垫脚石。那年头若不招工就没有一切，老善后来也倒坦白：心里急得要命表面上还得大做文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每逢开会就得高声嚷嚷，不发誓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就更没有好下场。然而大家都喊不等于大家都做，组织上泾渭分明安排得有条不紊自然有革命需要的道理。眼看着人家一个接一个鞋底抹油，不是参军就是招工要么就“被推荐”去上大学，最后只有老善还被陷在水田里。老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终于绝了望，忽然间“女大学生嫁农民”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榜样，那时老善是否受了白淑贤的影响没人说得清楚，不过老善无论何时都坦然承认：那时他娶了个贫农社员的丑女儿就是为了“中和一下家庭成分”。这说法也确实新颖，“中和”两字给他用得非常恰如其分。唯独这位至交老文丝毫不给面子：硬说老善一定是青春难耐守不住空房，为解决性欲煎熬才娶的这个村姑。

不过老善从此以后果真就有了转机，不再被看作阶级异己分子多少也有了点地位，若不是有这个高招老善可能依旧在乡下煎熬，一直熬到“大返城”；但若无“地主仔”的包袱恐怕就会成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好典型，女大学生嫁农民固然是大典型，男知青娶村姑当个小典型也未必不可。那又会

怎样呢？没人说得明白。就好比开车刚到路口就碰上红灯，等你再等来绿灯人家已经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唯一可以认定的是，无论哪个前景都不会有今天的老善，命也运也，往往在一念之差里发生极大变化，接下去老善也盼来了招工，灰溜溜地一个人卷起包袱进了市里的砖瓦厂。在他之前依惯例无论哪个知青离开都会宴请剩下的知青，轮到老善离开乡下时即使想请客都没人可请了，他是那个公社最后一个招工的知青。虽然到砖瓦厂也是玩泥巴却有工资可拿的，而且城市户口到手简直就跟实现共产主义没什么两样。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理由还得了点关照，老婆随后也被“农转非”进了同一家砖瓦厂。这下子老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那个“黄脸婆”老善肯定不会太关心，但那时候孩子户口必须跟妈的，他老婆若不“转非”这儿子就一辈子都是“农村仔”。

留下的唯一遗憾是，老善的“地主”基因看来有点邪不压正，他那儿子接受的遗传确实无愧于贫下中农。革命因子深入骨髓的唯一表现就是：逢人打架他儿子必定参和，不问来龙去脉更不会分好歹，哪边打不过他就帮哪边决不含糊。该出手时就出手他还晓勇无比，无论别人受伤还是自己受伤都得老善破费，有几次这儿子下手太狠被抓进了局子，这种场合宰起人来远比医院更黑。开始时老善很觉得没有面子，就连对知己老文他也守口如瓶。无奈的是那孩子从来不知悔改，老善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可这儿子依然故我。次数一多老善想要面子也没辙了，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传得快知道的人也就多了起来。老善开始麻木也就无所谓有无，何况人的弱点之一就是苦恼时都渴求发泄更需要一点安慰，老善只有找老文诉说这致命的烦心事。人嘛，尤其是中国人，无论事业有成无成最怕儿子不成，如此一来就连“望子成龙”的希望都没了。老文告诉他烦恼憋在心底只会更加烦恼，憋久了伤身子更加不值。接着给老善出了个馊主意让他给儿子换个环境，年轻人你坏我更坏比着学坏比什么都快，换成陌生环境大家都在学好也就不同了。老善一听就忍不住拍了大腿，接下去找了广州的朋友把儿子安排进了一家技工学校，是交了学费就能上的那种。没想到那小子好景不长，安分了不足俩月就惹出大事：那天他与两个同学逛天河，恰遇上一人逃三人追打的局面。这小伙子又发了激情上去就打，打翻追打别人的一个，额头上跌出个大血口子，伤口缝了七针才收拢。最后才知道人家在抓小偷，那扒手被他救下后逃跑了。后果是老善破费了八万多，虽然免了牢狱之灾学校也不敢收留他了，老善只得领他回家。

升迁

都说是河东河西变来变去总无定数，玩泥巴玩到家也会碰上点升华。全依仗胡耀邦的英明伟大，直到落实政策时才平掉老善他爹的冤案，老善的“出身问题”也就随风飘去。只是刚平反没多久全

国的地主帽子一起吹飞，每念及此老善都高兴不起来："他妈的，老子大好青春年华都已丧尽，这种'迟来的爱'还不如不爱！"将心比心老文知道他的揪心痛楚，再挖苦人家就显得不近人情。反倒是要给点安慰还得搭上自己，格老子哪家没有诉不清的苦情？我比你更倒霉而你总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公是公私是私老善还是分得清楚的，贴心话千万别跟党说这绝对是关键，心底里有怨气千万只压在心底，开大会开小会照样还积极表态，干工作拼老命却是本能，没法改变了。未几，我们的老善混入党里也就平步青云，先当科长后当厂长日子越过越风光。唯独他心里有个陷阱，就是当初搞'中和'娶的这个黄脸婆。其实这女人并不坏唯独没有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早就溶化在血液里，老善也曾无数次劝她读点书改变自己。人家回答说：读书过一世不读书还不是也过一世？只要认得数字不给错钱还要想什么？出不得厅堂下不得厨房就连饭菜还得老善来做，否则天天吃她做的"忆苦餐"真还不知日子怎么过。老善说，我儿子都是被他妈教坏的，这儿子从小只要跟人家有什么纠葛这妇人必定吵闹上别人家门，怎么劝怎么讲都没有用场。她只会回答一句话："我仔自己都不舍得碰一下怎么容得别人打？"听老善说道谁都明白啥都不要讲了，又一个"陈世美"迟早会粉墨登场的。

岁月无痕，岁月如歌。那座砖瓦厂终于彻底关门了，市政府决定把它改建成啤酒厂，山中无老虎却有我们老善，于是顺理成章地老善被任命为筹备组长。用老善的话说："这么个砖瓦厂认得五个字的就千方百计调走，留得住的都是没文化没本事的，还有大量农村来的临时工，老子这个'老三届'要不是'出身不好'当初恐怕也早就调走了！"这"祸呀福呀"的辩证法又开始新的轮回，老善参观学习访问考察忙个没完，朋友们笑道：你这次总算补回了大串联那一次损失。老善乐了："补回了，补回了，大大地补回来了！还串到欧洲去了一趟。"奇了，建一个破啤酒厂还值得去欧洲考察？老善笑吟吟地解释："他妈的，人家黄副市长说中国的啤酒不行，欧洲的正宗，要搞就搞世界级的。他带队领着一大帮人，反正是阿爷花钱，财政、计划、城建、工业、轻工、卫生、农业，都有关，哪个部门都不能少，市府全力支持重点项目要落实在行动。其实真考察不过两天，进人家设备生产厂还不到两个钟头，其余十几天都是旅游。比那时'大串联'舒服多了！"

婚变

这啤酒厂尚未竣工老善的离婚故事就先传过来了。由于本来就是人家的私事，兼之又早有预料，所以并不惊奇。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有权变坏的更多更早。又其实男人秉性就坏，只是由于没有条件露出真面目罢了，一旦条件具备，不是变坏，而是原形毕露而已。再说，老善早就属于搂

着个火炉过日子的那类，一直熬油渣似地熬着，怎么可能熬一辈子？不过社会不这么看，现在当了官换老婆，当初做“老插”的时候怎么就过得美滋滋的？又有说，那时是个“黑五类”，人家“红五类”下嫁给他，王八蛋就是王八蛋，一摘掉帽子就混蛋起来了，地主资产阶级本性就是如此。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实男人的坏秉性都是上帝给的，公鸡坏，公狗坏，就连绵羊也是公的坏，公的不坏还能繁衍得下去么？大熊猫稍微不那么坏，就濒临灭绝了，物种繁衍，非坏不可。只是人不同于动物，于是就有繁衍的秩序，也就是有婚姻制度。

老善之所以这时“变坏”，也是因为有了诱因。这诱因就是他后来的老婆。说到底，男人其实最没出息，他们绝对经不起女人的诱惑，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再教育”里就有一课：“母狗不浪，公狗不敢上。”大约古老体制对女性的歧视和管制，其根由就在于为了治住男性。所以在世界各种不同的地区与种族，不约而同地都严厉地管束女人，例如伊斯兰的教规，你根本别指望看见女人的线条和容貌，只能看见一个个“黑乌鸦”露出一对眼睛。于是男人没了“养眼”的机会也就少了坏念头，不过女人也因此断了“为悦己者容”的可能。老善正是在筹办啤酒厂的过程中，认识了从轻工部门派来的小芳。此女皮肤白皙细嫩，俗话说“一白遮百丑”，且人家容貌亦是眉清目秀的，虽然稍嫌矮了一点，但丰满的身材却显得十分性感。一有夸赞老善现在老婆的，老善便假装谦虚说老婆是“肥婆”。那个从不饶人的老文曾经取笑他：“都说胖女人冬暖夏凉，你搂着这样的老婆睡觉，夏天不用空调，省电省钱；冬天不用取暖。”老善笑得眼睛成了“一线天”，傻瓜都知道他一定很得意。

小芳原本也是有夫之妇，那男人曾是她的学长，长得挺英俊于是博得她的欢心。她父亲是市里重要官员，又是穆斯林，对女儿找了个不学无术的银样腊枪头很不满意，而且他更愿意做一个穆斯林的老丈人，便反对不已。据说父女俩几乎闹到女儿要私奔的地步，老人终于投降了。再往后，那英俊小生的毛病越显越多，更重要的是，原来许多不起眼的小青年，逐改革之浪都开始出息，无论做学问做生意或做官的，都比这小白脸更有成就。小芳开始心态不平衡，但无论怎么说那家伙就是不改，当初几乎私奔的恩爱也就荡然无存，打打闹闹若即若离早已成家常便饭。恰好在这时就遇到我们的老善。论身材长相老善都堪称帅哥，据说在他还没当上“地主仔”之前，就有女生给他暗送秋波甚至递纸条，一旦荣膺“地主仔”的称号就什么都没了。而此时老善正值人到中年，又增添了许多成熟的魅力，四只眼睛一相遇，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一来二去的混熟了，邪念也就水涨船高，终于双方都开始闹离婚，也都如了愿，离完了又结，就成了新家。各自都有一个孩子，约定双方都不许带进家门，打算建造一个地道的两人世界。

背时

这一次又应验了“祸兮福兮”那个永远不败的哲理，老善开始倒霉。如此一来就被许多女性骂成“陈世美”了，更严重的是，他却浑然不知早已有许多双眼睛正暗中盯着他那把交椅，投资几个亿的大项目，其主办在本市当年绝对是一个肥缺，打主意的人多是显然的。且老善在77、78两届高考时还没去掉“地主出身”的帽子，不用说砖瓦厂本来就不打算让他参考，就连他自己也没有信心过政审关。你自己没报名就别怨组织上歧视你，偏偏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接下去年龄超标，即使打算报名也没了指望。于是他成了“永远的老三届”。有次老善在同学聚会时闲聊，说起当年的日子，老善抱怨道：“那时他妈的把老三届吹捧上天，怎么怎么的能干，怎么怎么的有文化，老子就上了他们的当！后来大学生多了，我们这些老狗全都被打发掉，成了丧家犬了！”有“持不同政见者”告诉他：“你其实自己废了自己，还怨鬼怨神的。你个‘老三届’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比后边那些人学的东西多了点罢了，谁让你自己不读书？现在形势变了，‘上有老下有小’，前边有老大学生顶着，后边有新大学生接班，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造反派的，中央本来就信不过，利用不重用罢了。偏你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告诉你吧，武斗时期我们就有一个口号：‘谢天谢地谢自己，归根结底靠自己。’别怨天尤人了，打点精神为自己找后路吧！”

同学朋友间说说事小，官场里争斗事大。有了“陈世美”这个衔头，老善的官位已经岌岌可危。果然，组织部门找谈话，大意即是一无文凭学历，不合当前的形势；二则离婚造成很坏影响，群众议论很多；三则啤酒厂建制高于原来的砖瓦厂，组织上准备任命一个正处级干部担任领导。至于你，享受科级不变，岗位要变。这一变老善就变成了后勤负责人。而那个新来的“一把手”陆续调进“一朝臣”来，老善的职位由正到副，接着就成了个挂名的喝茶干部了。老善正处在做事狂的阶段，这种日子对于他简直就是煎熬。

看来老善的新丈人对这个女婿还满意，干脆通过自己的老关系疏通，老善转身调进省级信托投资公司去了。这家公司是全省最牛的一家国有企业，直属财政厅管，注册资金就达10亿之多，好气派！老善新鸡入笼，挨叮是免不了的。老总派他追债，这是个临时性的职位，号称“组长”。老善找到老文，照例发了一通牢骚。被讥笑道：“这个位置可大可小，当初中央文革也是一个‘小组’；清查林彪、‘四人帮’还是‘小组’，干着再说吧，不是有话说‘骑驴子找马’吗？就当它是那头驴子好啦。”老善这怨气于是消了不少。有时真是命好不如运好，他有天遇见个朋友瞎聊了

几句，谁知道他要追索的债务中有一笔恰好跟这位朋友有点关系。那家欠债单位出地，这朋友单位出钱建商品房。房子已经建好了，可是不好卖。朱老板的“宏观调控”搞得四处一片萧条，兼之还有那场风波引来的抵制。于是这朋友帮了他一把，跟出地的单位一商量，既然房子难卖，给老善一个单元抵债，刚好信托有一批没房子的新婚户，“软着陆”时期国有企业申请建房基本不批，于是两家签署协议了断。老善此举一箭双雕：债务结了，使老总们头疼的房子也有了，深得管他的张副总经理赏识，更得着那些挤在父母家里连做爱都难找机会的小夫妻们的喝彩。随即就传来邓公南巡的各种报道，银行一下子思想解放了许多，整个形势就像那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最紧要的是房价一涨再涨，老善拿回来的房子捡了大便宜，各种夸赞不绝于耳，老善高兴之余又开始忘形。

转机

信托公司决定放手发展，老善兴冲冲跑去找老文，说张副总决定让他领衔，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拨款一千万归他支配搞房地产。“兄弟，这机会实在难得，你得帮忙。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出资金你来操作，合理分配利润，争取做它一番事业出来！”老善的兴奋也感染了老文，他抱怨道：“我们这些民企，岂止像小妈养的，简直就是丫头养的。倘若有这笔资金协助，肯定如虎添翼。”于是他们开始探讨新公司的名称，没几句话之后老善说：“我最敬佩的两个华人，一个是林同炎，另一个是李嘉诚。干脆，就叫《同嘉房地产公司》，既大吉大利，又没人想得到！”老文历来觉得这名称不过符号一个，叫阿猫阿狗都无所谓，只是顺口好听就罢。既然他有此念，当然随便他叫。

接下去分歧就来了。讨论选择哪一个地方作为合作的第一块地时，凭经验老文提供了几个看好却没钱操作的地方。老善说：“李嘉诚说过，房地产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位置，第三还是位置。这个位置一定要选好，明天去找一个风水先生，邕宁县有个李大师很会看风水，要价也高。不怕！找人跟他联络，在你说的那几块地里先选一块风水最好的，开一个好头！”老文冷不防泼了他一瓢凉水：“你这混蛋是怎么混进党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还信风水？告诉你，我从来不信什么风水，我认为风景好风水就好，还请什么风水先生。风水大师那么厉害，他干嘛还要混你们的钱糊口？他家祖坟选好一点，阳宅风水选好一点，岂不发得不清不楚？”于是开始争论，争也白争，争得老文急了，干脆告诉他：“老善！你知道吗，那个风水学说是跟狗学来的！狗拉屎的时候就得看风水，闻来闻去，不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它绝不肯拉屎！知道吗？风水宝地就是狗拉屎之地。”老善开始哈

哈大笑，接着挺认真地问：“兄弟，你这个理论是不是有依据？要是有依据，我听你的！”老文接着告诉他，绝对有依据，是一个大人物说的。老善挺认真地问：“是哪个大人物？”老文说：“就是我啊！你还不知道？”于是两人一通大笑。老善颇有感慨地说：“仔细想想，那个‘地主仔’的阴影到现在还没消散，总是不敢相信自己，总是觉得自己很卑微，就不像你。以后得向兄弟你学习，学会厚颜无耻才行。”又是一阵大笑。老文继续告诉他，李嘉诚那个什么位置位置还是位置的鬼话也是废话，李嘉诚把秘诀都传给你们，他吃什么？首先，除非你是皇帝，好位置由得你来选吗？不可能。再说了，如果银子足够，任何位置都是好位置，像拉斯维加斯，大沙漠中间算什么好位置，人家大把钱一砸进去，还不是一样红火？得知足，见缝插一根针，见好就收。

方针既定，老善跟进办公司注册，一本正经地开始设置公司结构，从信托找来一批年轻人，全都有大专以上文凭的，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番事业。谁知，那个“福兮祸兮”又来作祟了，那个赏识老善的张副总的承诺一直等于零。十几万开办费给他了，接着就没了消息。老善带老文去见张副总，他一副欲说还休的模样，给了些安慰话。于是老文弄到手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失去了，只因没钱。最后才知道，财政厅长兼职信托公司总经理不准兼了，顺理成章应该由张副总接任。谁知张副总踌躇满志地跟几个骨干喝了点酒，说了一通老厅长不该这不该那的闲话，还表示接任后肯定做得更好。这话立马就被人添油加醋地报告了老厅长，这老头一怒之下从中行调来一个行长做老总，生把张副总的接班美梦给破解了。而这位新老总采取的措施是凡张副总提议的事情都不批，直至这位老张要求调走为止。这样，老善莫名其妙地被当成张的红人，几乎又成了新形势下的“地主仔”，后果可想而知了。

努力

不过信托公司新上任的总经理做事还挺给面子，老善继续当他的《同嘉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只是在其上设了一个新公司，这个公司被叫做《贵信投资》，毫无疑问公司负责人是新经理调来的亲信。一划拨“同嘉”归“贵信”管辖，老善从儿子变孙子只能干瞪俩眼，不敢愤不敢怒只能打哈哈。悄悄地老善跟老文商量，把“贵信”老总拉拢过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资金批准权“贵信”掌握三千万，商量来商量去总不如意，不知怎么的老善突然记起老文在香港的关系，从那边发个邀请函办一次香港旅游！那时候跑一趟沙头角都难上加难，若是能去一趟香港岂不是更妙？老文一时觉得这也是不坏的主意，于是马上就与香港的朋友联系。过了没有多久香港就回了消息，一切照办保证满意。老善主动表示两个人的费用全部由“同嘉”负担，但名义上老文的公司必须出面宣

布“请客”。恰好那时老文也打算安排他们公司两员干将去走一趟，因为那边有一批旧轮胎可以搞回来翻新，需要去实地看质量。一行四人手续全部委托深圳中旅，谁知临办手续时老善却垂头丧气了，“贵信”的李总说香港他去的机会多，这次照顾马上要退休的罗副总出去玩玩。木已成舟毫无办法，老善说只能如此还希望你老兄关照一下老罗，务必暗示他回来到李总面前美言美言，死马当活马医也许有用，要不然李总这边总不肯批钱我们还是一事无成。

那个罗副总看来还挺随和，一路上老文和公司的小李、小唐不时拿他开涮，他却仍然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架子。到香港的头几天“例行公事”：旅行社领着走东窜西，等把香港的旅游景点与宰客商店逛完，剩下两天就属于“自由活动”。其实老罗刚到香港就有港商来找，他们是信托在香港的老客户，据说接到李总的电话特地来接他的。老罗不愿离开这三个新朋友就说把香港逛完再说。等自由活动那天，小唐惊呼：“来了部劳斯莱斯‘银刺’！”老文和小李挤到窗口一看，一部银白色的老式轿车停在酒店门前，老罗跟那车上下来的人寒暄几句就上了那车。“车族分子”小唐介绍说，这劳斯莱斯的“金刺”是专供皇室贵族的，“银刺”专供大富豪，每辆车都有档案，必须够资格才会卖给你，否则有钱也白搭。

两天以后这个团要乘快船返回，老罗回来了，还是那部“银刺”把他送到中港码头。到了船上，小唐羡慕地吹捧罗副总坐过“银刺”，把那个“副”字也省略了。罗副总说：“这帮家伙真小气，连部‘皇冠2.8’也不舍得开来，就弄这部旧车来，还要我跟它照相！”小唐放肆地挖苦老罗一通，然后又介绍了一遍这车的等级，老罗这才开心地笑了，拿出一叠照片给我们看，小唐死活要其中老罗与一位美女在车头旁的合影，硬要老罗给他。老罗不肯，小唐道：“这张照片你要拿回家，你老婆不扭掉你的耳朵才怪！给我算了，我就要这部车的照片。”末了，我问老罗那是间什么公司？老罗说：“我们给了他们多少进出口生意，要不然他们回这样待我？做梦差不多！”噢，怪不得大包小包老罗都拿不动了，几件大家伙还需其他三个的人头配额才能过关，尚且没包括那些“香港买单广州提货”的物件。

回来后，老罗确实给李总说了许多好话，李总对老善的态度也明显友善了许多，老善高兴极了。某日，老善极其兴奋地通知老文：“李总要请我们两家吃饭，必须带太太前往。”于是，在当年最豪华的酒店里，三位太太就互相认识了，老善说，这是合作密切的征兆，老文道：“三个女人一条墟，你不怕以后闹翻天？”老善非常乐观地宣布说不会，接着告诉老文，李总夫人当着“贵信”公司的财务部经理，是个关键人物。她已经好几次叫老善把太太弄进“同嘉”来，管办公室的事务。

老善并不讳言他已经做了安排，今天这次聚餐名义上就是为小芳接风的，实际上就是联络感情。老文皮笑肉不笑地警告老善：“凡老婆搅和到老公生意或事业里去的，都不会有好结果，刘少奇让王光美搞‘四清’还发了个‘桃源经验’，结果死无葬身之地；林彪倒霉就在于老婆搅和得太深，最后死在温都尔汗；黄、吴、李、邱，都是老婆参合老公的事情倒了霉。当初政治局不许江青参政，老毛还挺清醒；自打批‘武训传’开始，老婆一搅和进来，老毛就没干一件好事。”然后又举了几个本市“夫妻店”垮台的例子，老善便开始发愣，这才告诉老文，说他老婆什么都好，也能干，只是管得他非常严，几次有女性生意人把电话打到家里，过后他都被审问。老文又知道，他太太自打筹建啤酒厂开始就一直工作在他左右，直到他调进信托为止。老善接着一拍大腿：“完了，完了。这次是她自己提出要求来的，说她们单位快完蛋了，停薪留职也要终结，要另外找饭碗。她还去找过李总老婆，那个女人吹了‘枕头风’，李总主动跟我说的”。老善还招供：“我还为李总关心蛮感动咧，其实只是聘用，又没有调进。这下子坏了，我们公司那几个年轻女将，你知道的，以后就难了，老子不知该怎么小心谨慎才应付得了。”老文于是笑话他，两公婆白天夜里厮守在一起，你不烦她也不烦？人家说“距离产生美感”、“小别胜新婚”，你们这么整天厮守一连几年，还有性欲没有？后来“贵信”李总确实垮了台，还进了监狱；老善认定老文说的那些话太有道理了，这是后话。

风波

有了这次聚会，小芳就很热情地联络老文太太，她们成了“友女”。终于有一次，老善拉老文喝酒时告诉他：“你他妈真好命，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好老婆！”老文纳闷了，他这才告诉老文说：“我老婆回家跟我说，她劝你老婆多管管你公司的事情，特别要注意那些女的，现在的女孩大胆得很，我们都快人老珠黄了，不防不行。她说你老婆一听就哈哈大笑，跟她说：‘要是我老公只有我一个人看得上，那岂不是更凄凉？’我一听就在心里羡慕，他妈的好老婆我怎么就找不到？于是我乘机要她向你老婆学习，娘的，挨她臭骂一顿还叫我不要白日做梦！”然后他借着酒意告诉老文，“同嘉”公司几员女将都主动请求调离了，还说傻瓜也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老文询问他小芳到底怎么对待那几位女将的，因为这几位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确实挺能干，肯吃苦有能力都能独挡一面，更甭说人家有老公有孩子也并非轻佻之辈的。老善叹了口气呷了口酒装出内行模样：“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女人有女人的办法，一个眼神一副面孔甚至笑眯眯地让你倒地。谁受得了那个气？人家惹不起躲得起都走光了，一走就是深圳珠海连信托都不呆了。那个小黄，你觉得最能干的那个，临走时对我一笑，说：‘善总，对不起了，我真佩服你，还能心平气和地做那么多事情，真是善马被人骑

啊！’”听他倾诉老文反而无话可说，本来想告诉他，老文老婆传过来的话，小芳说：“没有我老爸帮他，他那个鸟样还想进信托？还想当经理？我不理你那么多，这些鸟男人你不管就不行，别人我不管，是我老公我肯定要盯死他！”连老文老婆都有感慨：把自己老公说得如此衰你又有多体面？但此时如果传这话给老善听那就实在过分了。老善本是很爱面子的人，听了他这次诉说老文开始知道，他家这本经看来不是一般地难念。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暂且把老善的家事搁置。但那几位女将的离去跟着又带走几位男士，“同嘉”公司的业务就每况愈下了。挂着房地产的招牌连一片瓦也没盖，既然他那里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老文也就逐渐少奔那儿去了。只是有一次市人大办公厅主任跟老文打招呼，他们盖了一幢宾馆楼原打算做招待所的，如今市里宾馆如林显然已经不大好做，再加上钱也不够无法装修，如果老文有兴趣可以来谈承租，装修费用算作租金或者以粗装修结算租了做办公楼或宾馆都可以。那个地方位置非常不错于是老文想起老善，因为不久前老善说李总欲将“贵信”搬出来，让老善找朋友帮忙另寻地方做“贵信”的写字楼。电话一通老善果然反应积极，当天李总就亲自驾到还去看了地方，随后很快谈妥成交，唯独顶上两层人大仍旧留用，要弄个内部小招待所同时也可以兼做领导临时休息之处。李总看来确实很高兴，把这栋小高层的楼房命名为“贵信大厦”，一二楼就转租给别的朋友开了间酒家。

风水

万事具备“贵信”选了个黄道吉日正式挂牌启用，开幕式及宴会更别提有多么排场，看上去花掉几十万元恐怕只多不少。各级领导四方嘉宾熙熙攘攘，李总、善总都打扮得像个新郎。据说，李总的办公室经两位大师选定，楼顶上的字号也经古老的罗盘精测，霓虹灯色彩也是吉利搭配的，就连大门口那对狮子不像狮子、狗不像狗的石头雕像也是大师选定的，据称最能驱邪，至于楼里的红脸关公神龛就没法细数了。老善的公司摆在第四层，这个数字似乎不甚吉利于是在电梯里只见有“3A”。当然更不必说那些吉时吉秒开始的震天动地的鞭炮声了。据说西方发明的无论什么主义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能够演绎出一些奇形怪状不伦不类的闹剧来的，有了这些功夫整定要发得不清不楚，老善也显得格外精神。

只是世界上没有算定赔本还去做这笔生意的傻瓜，恰如那些“股民”不会认定要跌的股票还会吃进一样。尽管这栋楼看够了风水做足了驱邪功夫，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定理永远不会失算。记不得过

了多久就发生一件大事，就在李总办公室正上一层那间招待所的客房里，市人大主任死于“马上风”。电视瞎了报纸盲了新闻也哑了，尽管官方严密封锁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街头巷尾传开了有声有色的流言蜚语而且证据十分充分：一个在位的市人大主任居然没有官方讣告遗体告别更别说追悼会，只有他的“未亡人”等自费登了一条私家小讣告。那些阅历丰富的老伯阿婆就有遗憾者，他们说“那个服务员太年轻啦，农村女呒经验，捋条针扎一下尾龙骨就呒事啦！” 还有更通晓古今的说是古代女人头上戴的簪子就是为这事准备的，万一发生拔下来对准男人的尾椎扎他一下，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绝对灵验。“祸兮福兮”再次显灵，这等衰事恰好发生在李总头顶上那间房，马上就有精通《易经》者危言耸听，老善也暗自心惊觉得大事不妙，果不其然李总经营的棕榈油生意给马来西亚来的骗子骗走几千万，东窗事发后李总锒铛入狱。老善这才跟老文商量说就是那间房衰了，又连带整栋楼都衰完，一定要找个吉祥地方搬走为妙。老文讥讽笑道：倘若不是那两个风水大师都选定李总那间房，人家楼上也不至于“做鬼也风流”的。

却不料他虽然寻得房子搬家走人，但祸根已经埋下，迟早它会发芽。还在“同嘉”那些个女将离去之时，老善就急寻人才填补空白。正好市体委主任是个朋友，把个手球馆让度过来他赶紧找老文去参谋，老文看过之后认定是个好项目，老善说：“兄弟呀这回一定要合作一把，我们好好策划尽快做好它。”这个手球馆位于黄金闹市，在里边加建两层整个改建为一家娱乐场所理应没什么问题。老文认真核算大约六千五百平方米土建连同其他费用不会超过六百万，加上它原来有平面网架结构的屋顶就可以得到将近一万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最要紧的是这种大开间的建筑全市仅有这一间。老文把计划书连同初步设计一并交给老善之后，这事情便泥牛入海了。原来老善找来一个建筑高手，唤作牛林。他原在城建房地产做过二把手，只因搞了无数小动作被人家辞退，于是老文电话里提醒老善得注意这位年轻的先生。但老善坚持认定这是个高手，学的是土建专业技术也在行。既然老善显然打算单打独斗，老文也就不管了，至于“一定要合作一把”之类感叹，在商海里不过泡沫一堆罢了。

哑巴

谁知道工程尚未完工“同嘉”就直属信托，缘由是“贵信”垮台老善又从孙子变为儿子。再接着老善告诉老文说，信托老总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大大夸耀老善眼光独到这是个上等好项目。接下去顺理成章信托直接拨款，从此不再愁钱，老善顺利做完土建工程。乐呵呵的老善又给“祸兮福兮”照顾了一次。果不其然那位牛林又搞了小动作，包工头手下发生内讧，有人揭发施工时抽了钢

筋。这一下就惹出大祸来，包工头拿出证据说是牛林命令抽的。市政府牵头成立了质量专项检查组，到处敲打钻洞折腾了几乎两年。最终结论是可以补救但返工费至少二百万！老善只得灰溜溜低头受训，信托老总顺势又从老家调来亲信另设公司接管，坏事变好事确实是个顶尖妙法，对你是祸对他是福，运气到福气自然会来。人家老总的老弟总包了装修工程，七不上八不下最终结算三千多万，连同财务费用怎么着也超过了四千万。

牛林被解聘已经网开一面，老善幸免了处分自己还觉得很庆幸，拿到结论那天特地请老文吃饭，除了后悔当初没听兄弟劝导之外，还把情况一讲非常感谢信托老总关照。老文又皮笑肉不笑了，一副行家里手气派地告诉他："人家没处分你是不希望把事情搞大，不过应该是他感谢你而非你感谢他。"老善一听大惑不解。老文卖关子让他算一算平均每平米建筑面积花了多少钱？老善赶紧到收银台借来计算器，算清楚每平方竟达五千多！老文又问他，现在市里最贵的商品房卖价多少？他哑巴了，市里最贵的房子号称也只有五千。"你这里没地权没产权只算租赁每年还得付给体委租金150万，多好，反常的工程超支理由很充分，都是你善某人造成的质量事故损失才会导致。他不处分你只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你帮他数了钱却还在感激人家！"于是乎老善终于来了点"九头鸟"脾气："老子去告！"老文又笑了："你的证据呢？人家敢这么干肯定早又准备，查到最后说不定损失全是你造成的，你有最坏的心理准备吗？"酒喝好了，"九头鸟"也飞了，国有资产原本就是一个大蛋糕，谁吃得多谁吃得少全看你手里的刀。那位老总以后果然被审查，还是有无关者告了状。但最终不了了之，果然还是老善负责的施工质量成为充分理由。再后来整个信托十个亿全都报销，批了个破产一了百了，此乃后话。国有资产就有那么个好处，它的所有权是国家的，不是纳税人的，所以无论怎么糟踏也轮不到纳税人说三道四。

下岗

老善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下乡算工龄，他老哥子眉飞色舞告诉老文："老子下乡时间是1968年12月31号，别看这一天，迟一天就少了好几千！"缘故在于信托破产办那个"买断工龄"，他如果晚下乡一天也就少了一年跟着后退一档，"少了好几千"就是如此来的。老善没了正处公职却得了六万多块买断工龄的现大洋，于是开始盘算着干点什么。他美滋滋喜洋洋地找老文商量，连同老婆掏出来的一点私房钱、旧房拆迁的补偿费，这回成了真正的私营，总得干出个人模狗样的事业。然后又惦记着老文当初帮他入股的民生银行股金，那可是他最雄厚的资本了。岂不料没几天他的小芳找上门来了，声言那些股金要转让，且决不许给老善半个子儿。小善忿忿说道："他

那个鸟样子，不是靠我老爸弄他到信托，混到正处级，他还能做什么？这股份请你帮我卖掉，我留着做养老，靠他？我死了都没钱买棺材！”老文要求她跟老善一起商量，却不料小芳顶头来了一句：“不是我跟你签的合同吗？关他鸟事！”这个问题于是严重了，当初老善说自己是副处级干部，不好写这十万雪花银的合同，让小芳来办的，如今该听谁的？老文一个电话打过去，老善跳了起来：“他妈的，她想造反？兄弟你千万帮我压住，等老子回家收拾她再说！”

次日，两口子一起到了，老善乖乖地在小芳起草的合同上签了字。待小芳笑咪咪地走后老文问他，老善说：“好男不跟女斗，她既然答应拿一半出来一起做，你就办给她好了。”于是卖出后的三十来万全都打进他老婆的“卡”里去了。再接着，老善眉飞色舞地跑来，说，几个兄弟弄了个好项目，在向阳百货六楼开食街，地方大且处闹市，如何如何要恢复传统食文化。然后希望老文也加盟，那神态，仿佛李嘉诚二世给的施舍。老文婉言谢绝了，然后跟他分析，那里没有停车场地，如今人们饮食观念早就改变了，你没看那个“麦当劳”每天都在爆棚，小孩和青年人没兴趣吃什么“传统文化”，那些跑官拉关系谈生意的，又看不上你这种不伦不类的食街，谁会到你这个六楼上来回味传统？如今讲究规模经济，没有规模就别谈经济，饭店也不例外。对你这“传统食文化”略有兴趣的只是那些“老嘢”。老善马上打断唠叨：“对了，你这个观点就对了。”于是他跟老文分析如今社会老龄化的问题，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报过统计数字，接着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他还准备在那里开唱粤剧的“梦想剧场”，原本处于解放路那个唱粤剧的场地如今已经拆迁占用了，一大批粤剧迷耿耿于怀，强烈要求恢复。这里离旧唱场不远，恢复它既解决了粤剧唱场的问题，又解除了政府的一个难题。兼之每天几百上千的粤剧迷，可以带旺食街的生意。老文听得烦了，笑话道：“老善，你听我说一句，那些‘老嘢’最多喝你一杯凉茶！”

老善终于把这个“传统食街”开起来了，又终于关门大吉。老文问及亏了多少，他答道：“好彩听了你关于股份制的说教，我老婆当初还想只给几个老朋友合作，不收别人入伙，要是那样，我们两公婆上街讨饭去了。现在亏大概十万。”老文又讥讽道：“你不是说粤剧唱起来很火爆的吗？”他道：“爆得很！那些‘老嘢’自带干粮，提溜着矿泉水来，连我们的凉茶都不喝。倒是成天借碗借筷子，那些辣椒酱、酱油和醋，每天不够他们蘸馒头的。别说了。” 老文哈哈大笑了：“善兄，打住！俺们也快成‘老嘢’了。弄不好哪天我们提溜着矿泉水瓶子里边装的是白开水呢！醒着点吧！”

尾声

汲取此次教训，老善不敢再大意，有次跟老文一起吃饭时他感叹道：“TMD，还是干阿爷的生意好做。不用担什么风险，亏了也是阿爷的。现在自己做，晚上做梦都怕亏，一亏就真的要饭去了。”于是他与几个作家之流的文化人合作搞“文化事业”，投入资金少，到处去拉关系找赞助，最重要的是游说那些市委、县委书记们。得了一担“文化包装”生意，就净赚三五万，颇有些起色，居然还赊销买了一辆“富康”。老文问及他现在是否有点成功感？这老兄回答说：“最成功的是我老婆不在公司兼职了。她开始还雄心勃勃打理办公室，后来对文化事业一窍不通，什么嘴也插不进，自己闹着走了。快活啊！”

这一快活弄的，终于，小芳闹离婚了。那天老善在电话里说：“坚决离，什么字都签给她了，财产也不要了，就是那只狗有点舍不得。他妈的，我仔细想过了，我这辈子不成功，完全是没有找个好老婆！不是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一定有一个女人’的吗？这个女人把我拖死了，她什么都要插手，结果我什么都失败！这次离掉，彻底解放！”老文又笑了：“除了光棍，哪个男人身后没有一个女人？什么成功失败的，都推给女人你就成功了？”

老善的第二次离婚终于没有离成，他是个孝子，当年孤儿寡母老娘含辛茹苦地拉扯他，发誓一定要供他上大学。结果阴差阳错、世事难料老善成了“永远的老三届”。这使老善总觉得对不起老娘。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娘一听说他又要离婚就躺倒了；那边丈母娘也眩晕了，老善和小芳都只好作罢，却已经分居。那个不断打架惹事的儿子已经改邪归正，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当了货车司机；但老善信誓旦旦：“等老家伙们都习惯了或者走了，肯定还是离！”有一天老善约上老文一块喝酒解闷，老善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妈的，现在想起来，那个乡下黄脸婆比小芳还好。”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题外话：写了两个故事，忽然想起可以归纳于“老三届”的故事里去，于是从本篇开始“入类”。其实“老三届”是一个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群体，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泪下”的。有许多事业有成者，更多则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那些成功的故事早已写成各种书籍和文章了，唯小人物的故事似乎没人感兴趣。但我觉得，芸芸众生恰是人类生活的主体，他们的喜怒哀乐恰如无尽的矿藏，干嘛自己不去挖掘？所以，试以此为题材，构筑一些故事，曰“众生相”。其实，我想，我的故事每一个都足以拉扯成一个长篇，一则，本人不是什么教授或者作家，仅个体户而已，没时间和精力去倒腾；其二，我怀疑如今之世道，没多少人还有耐烦心去读那些长篇，说个故事也就结了；其三，网文大抵须言简意赅，于是只得如此。爱看不看，解闷也罢！

《动迁户》

都说改革开放伟大，对于每一个城市人来说，这回的伟大确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说道。不要说那些久别重逢的人，就是一直居住在这里，以致住得几乎麻木了的郑朗生两口子，居然也会找不着北，可见这个城市变化之大。

说起来也是命运使然，朗生中学时有个外号叫做“三脚猫”，这是本地俚语，一般指那些不甚坐得住，喜好到处乱跑的家伙。不过也有反讽的情况，挖苦那些不爱动弹的家伙，只是此类例子极少。朗生这个外号不属于反讽，那时候他是个到处乱窜的主，每年的大年初一，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能借着自行车就骑出去几十公里，借不上就漫无目标地走路逛街，叫做“走大运”，据他说，年初一走上这么一回，今年日子一定好过。其实跟着他走的那几个，根本不在乎是否走得出“大运”来，难得一年一次出去散心，只要开心就好。下乡插队那会儿，每年春节回家，这几个伙计仍然坚持着“走大运”。直到后来，招工、考大学，人都散了，天南地北的连见面都难，又陆续成家各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习惯也就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了。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招工以后始终不离本市的朗生，一日忽然奉调进入本市新建的燃气轮机发电厂，感觉到当初走的这个“大运”，似乎姗姗来迟了。

朗生招工后进入的是市里发电设备大修厂，这个厂专门维修、保养各地发电厂的设备，也生产一些小电动机、发电机，是个令人垂涎的单位。在全民读书热时，朗生又不脱产地读了电大函授班，得了个大专文凭，于是水到渠成地升任技术员，职称改革时又自动变成助理工程师职称。过了一阵，评中级职称要考英语，市里开办了相应的职称英语补习班，交点钱学了半个月，讲课基本上就是讲考试题，朗生轻而易举的就过了“职称英语”这一关，然后又很顺利地被评为工程师，要知道，稍微晚一点，这个大专文凭就很难获得工程师职称了。运气来了，就连昆仑山

也挡不住。就在获得工程师职称之后不久，由于市内电力紧缺，政府决定投资建设一座燃气轮机发电厂，以填补本市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经由省里电力设计院设计，定购了英国、法国的动力与发电设备，据说都是世界一流的先进设备。市委书记决心“要组织精兵强将”一定要搞好这个新厂，朗生又被作为技术骨干调进这家新厂。验收设备，监督安装，跑英国、法国以及参观国内类似厂家，朗生过足了飞机瘾。可是话还得说回头，运气来得早了，人就会有惰性。朗生个工作安逸舒适，“三脚猫”便没了踪影。

厂子投产之时，电就是“老虎”之一。这个厂发的电不进国家电网，只供本市企业。因为进国家电网就没有那么高的电价，入网电价仅0.19元，0号柴油发电成本就超过0.50元，非赔本不可。但直接卖电，1.10元/度还供不应求。那时，这个厂成了“皇帝女儿”，除了开始筹建的那十几个“精兵强将”之外，后来调入的几十人差不多全是“领导关系户”，朗生明白，这些全是多余的人，真正发电，这个厂用不了二十人。可是，既然是个企业，党、政、工、青、妇、宣传、保卫、后勤、采购“一个也不能少”，于是就必须配备这八十多号人。人是多了，却经常玩不转那机器上的电脑程控系统。领导上一拍脑门，决定关掉这套系统，只启用人工控制，于是每班就增加三个人操作，领导上自有好词汇：“增加就业机会，保障社会稳定。”即便如此，也还属“人少好过年”的单位。厂里除了发工资外，经常有外快，有时就根本不知道发的是啥钱，照领就是了。更别提那些日常生活用品，隔三岔五分得不清不楚。瞧着这厂里奖金高待遇好，老婆就拼命唠叨，要他出面把她调离图书馆那个“清水衙门”，也没怎么太费力就成功调入了。唯独技术科长何工有点不以为然：“你把老婆调来，两口子挤在这么个小窝里，惹麻烦啊？”可是轮到分房子的时候，好处就显出来了。市里给燃气发电厂拨了钱买下一栋商品楼，三单元42户，朗生凭着单位建立时已经有中级职称以及双职工的资格，毫无争议就分得了三房两厅的住宅。可何工那套房子就分得很辛苦，他老婆在市计委当科员，按照不许占两套房的原则，告状的一直告到市委去了，不得已，何工只得退掉计委分的那套两房一厅，这才得着厂里这套三房两厅。朗生瞧着何工那忙碌劲，说不幸灾乐祸也可算暗自得意。

何工原是朗生的中学同学，不同班级，但插队时两人在同一个大队，于是熟悉起来。他招工比朗生晚，而且进的是大集体的市三建公司。但后来大学招生，他考进华南工学院的工民建专业，毕业后不久便调入市城建局，筹建这家厂时调来搞基建，这样又跟朗生凑到一起了，两个人的关系自然也就亲近许多。随着电厂发电改成正式编制，何工成了技术科长，朗生成了他的属下。当年插队时绝对没人看得上眼的人物，如今一个接一个地混得不错。相反，原来牛B烘烘的主，反而没啥长进，全他妈国有制给害的。

朗生的好日子并没过多久，以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时代进步太快，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就已经不错了。燃气发电厂的好日子过了几年，随着几座大型水电站的建立，还有好几座大型烧煤的发电厂投产，国家电网供电越来越正常。而且，0号柴油越来越贵，终于到了这个燃气发电厂客户越来越少的地步。然而只要发电机不能满负荷运转，那发电成本就会大幅度攀升。市政府找供电局协商，人家属中央企业，当初你跟人家闹别扭，如今人家并不很买账，最终达成妥协，给了个调峰发电的地位，不到市电紧张就歇着。就这么要死不活地拖了几年，厂子濒

临破产。对于职工有利的是，这个厂破产前把住宅全部折价出售给个人，于是，朗生交了五万五，从此成为有房一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住宅，建筑面积103平方米的三居室住宅。按照当前市面价格，这套房子值二十多万！领到房产证那天，朗生与其他41户领证户商量好，在附近的一间酒楼里摆了25桌酒席，所有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加入了这个狂欢的宴席，争先恐后地一展歌喉，朗生这辈子又醉了一次，是第三次，前两次是下乡那天和招工那天。

从有房的欢乐中爬出来，过了好一阵朗生才发现有点亏。他仔细算了一下：两口子都在这家厂里确实亏了，这间厂一破产，等于全家失业。再寻思一下，那些配偶不在同一个厂里的人更占便宜：何工的老婆在市计委，那边不久前集资建公务员住宅，何工老婆交了成本价买得了一套，环境好设计新的156平方米，待装修完成后他们可以搬进新居。这边这套就可以转让或出租；还有牛副书记、马工会主席以及其他几位，情况也差不多。算到这里，朗生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当初如果不把老婆从市图书馆调到厂里来，她那边也会有一套住宅。回头计算一下，老婆这几年在这个厂里比在图书馆多拿到手的奖金什么的，平均每年也有一万六、七左右，那三年时间大约得了五万，几乎等于白得了这套房子，心态于是稍微平衡了一点。

厂子既然破产，几十号人纷纷各奔前程。几个厂头是没得话说的，他们留用成为市政府处理遗留资产小组成员，处理完毕都回到政府机关去了。那套保养得很好的发电设备以五千万元卖给克拉玛依油田；80多亩土地连同立式大储油罐、办公楼、厂房都卖给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石油公司。听说因为土地价格大涨，这一锤子买卖大赚，还完银行贷款市里还有盈余。然而这些都与厂里职工无关，有能耐的赶紧调入那些尚未破产的国有企业，没有能耐的只好自谋别的出路，一个月四百来块社保是远远不够的。

朗生的儿子已经工作，远在天津的一家公司里，既不需老的给也没有回报给老家伙。朗生的社保多一些，也不过一千二百来块。存折里还有大小十万的余额，过日子理应不成问题，可那个“医保”令人发怵，“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老伴是个“三高”，自己也有糖尿病，虽说只是“初级阶段”，万一哪天来个“大跃进”，要不了多久就得奔“共产主义”！即使不“跃进”而拖下去，这种“富贵病”决不是一般人能拖得起的，若不趁着还有点条件多挣点，真有个三灾两病的，他不敢想下去。他也不是没费力跑调动，可是没成功。如今这世道，招聘条例都有“三十五岁以下”的上限，没人肯要五十多的准老头；何况朗生那发电机专业技术，一则门道窄；二则也已经落伍，曾经托人寻到东莞去就职，那里都是进口的小发电机，跟自己玩惯了的大机器不是一回事，没混到半年就给辞退了。拉下面子跟厂里一般职工那样，开“摩的”拉客并不合适，五十多岁的老家伙，骑摩托就够刺眼的，遑论拉客？去摆个摊位吧，简直不成体统还别说，那沙要是聚成塔，自己的骨头也得打鼓了。还在犹豫观望之时厂里的徐工两口子已经干开了，那老小子还真的拉得开面子，仗着他老伴有一手糕点手艺，还真的摆摊摊卖起糕点来了。朗生不动声色地观望着，没多久老徐就收摊了。私下一交谈，这才知道他每个糕点都挣钱，算上没卖掉的，就赔钱了。开始时送给远处的亲戚朋友吃，送得近了会影响生意。可没几天跑腿送都没人吃了，少做一点吧它就偏不够卖，也没啥意思；可刚一做多几个，就有剩余了。徐工告诉朗生：“那段时间根本不用做饭，两公婆成天就吃没卖

掉的糕点，吃得自己都翻白眼！拉倒吧！干脆不干了，听天由命。”朗生绝了望，也不寻思找生财之道了，老婆不知出去学得什么章法，回家来供上个菩萨每天烧香，祈祷菩萨保佑，啥都不想只求没病就是了。朗生自己则没事溜出去看人家下棋，朗生的围棋下得还可以，那天在棋社看别人下棋看得来了兴致，于是也打算跟人家下一盘。谁知得到的回答是：“搁下五十块钱，赢家收数！”这一棍打得朗生半天出不得声，他出门害怕小偷掏包，从来只带几个钢崩坐巴士。于是只得扫兴而归。想到老年大学学摄影，不是掏不起，而是心疼，问一下每期学费一千元，傻了！花一千块钱学照相？这年头，离开钱果然是万万不能的。

凡事总是有谱的，如果生财无路的话，那么就难免失财有道，甚至这个“道”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市里换了个新书记，上任伊始，那豪情壮志就冲了云天。也合该他上任逢时，基础设施建设拉高GDP成了国策。于是首当其冲的是那条每一任书记都拿来开刀的新兴大道，刚竣工两个多月的三个“渠化路口”，几百万的工程说废就废了，请清华、同济这样的名校设计，很快就挖的挖砸的砸，干起了“灯光亮化”工程。那一条大道两边的路灯，上一任书记喜欢得不得了，可本届书记说拔立马全拔了，换上新式的路灯杆。好几个亿全撒在这个“绿化、亮化”工程上，光是那一端路边坡上几朵“灯花”，造价就是几百万。朗生听说了许多议论，老百姓只管说“不做工程哪来回扣？”并不在乎证据何在。知道浪费那么多钱，心疼自是心疼，可那毕竟不关自己的事。

未几，这条新兴大道这一端又要动工了。本厂有几位家里都有市计委的人，如今改成发改委了，传来消息说书记有话，要改弯拉直，接上河边的滨河大道。朗生有些纳闷，接上不也还是弯的吗？这一拉直，就得炸掉两栋15层大楼，端掉本市最大的影院，还得平毁一大片旧建筑，其中还有市人大立法保护的“骑楼街”的一段。“官方小道”的消息又传来了，市里开会时有反对意见，抓住“立法保护”做文章。人家书记说：“开个会，再立一个法，取消这一段保护不就成了？难道我这个市人大主任是白当的？”果不其然，新的立法出来了，受保护的“骑搂街”不包括这一段。然而为了“保护”花那么些钱装修，还铺了那么华丽的花岗岩路面，全得砸掉！电视上播放开工拆迁典礼好不隆重，就跟不久前竣工典礼一样。再接着，两栋大楼爆破拆除也现场直播，朗生是清楚的，那气派同样不亚于当年竣工典礼！因为当年竣工的电气大厦就是本系统的，不过十来年，说炸就炸了，当那栋楼歪斜着瘫下来时，戴着红花西装革履的领导们笑逐颜开，相互握手致意，就像是董存瑞成功地炸了地堡。最终结果登在报纸上，3.92亿元拉直了370米大道。朗生看着电视直播通车典礼，人模狗样的市领导们都练出“领导姿势”来了，他暗自寻思：扒光了衣服不过一堆赘肉而已，如果命不好被收了监，更别提有多狼狈。谁知电视直播的通车典礼还没完，直接就转到另一处炸掉本市唯一的立交桥的开工典礼上去了，瞧他们忙的！到处都在拆、挖，马路几乎没闲过，刚挖完平整好，又围起来挖新的沟，也是，煤气、自来水、电讯、电力、排污、人防，你方挖罢我进场，不记得哪个画家说要给马路装拉链，管他的，肉食者谋的事情，最终理应宽敞通畅，也是好事。

朗生唯独没料到的是，肉食者终于谋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天报纸上突然登出拆迁公告，说是一条新路正好打这

儿过，限期这一片于2月28日搬迁完毕。朗生他们这栋楼整个儿得平掉！于是小区里便炸锅了，附近同命相怜的几百户人家也都吵翻了天。你想，突然间来这么一家伙，这不是要命吗？而且，限期搬迁却没有任何人来商量过补偿的事情，就算临时去买房子，连装修什么的，来得及吗？何况中间还隔着个春节，让人怎么过法？朗生不由得头皮发麻，不管是不是菩萨显灵，总算没病已经万幸，却来了这么个劳什子拆迁的事情，躲得了病却躲不了灾，这算什么世道？朗生心底最大的安慰就是安居，虽然安得晚了点，毕竟还是安下来了。如今又不得安宁了。

没几天就有人提倡议，管他奶奶的，打横幅上市委静坐去！接着又有人拿来温总理的讲话，拆迁必须人性化，不得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朗生一听，差点又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来，到底党中央跟咱们心连心！也有人不服气，说是哪里已经有人自杀、哪里有人闹事什么的，才有这个讲话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必须同被拆迁人协商是已经定了的，大伙于是开始协商要什么价，否则坚决不搬。还有人嚷嚷不许做甫志高、王连举，谁要是带头妥协就不得好死。那些年轻一些的根本不知甫志高、王连举是啥，朗生就遇到几个发问的，于是也没错过倚老卖老跟他们解释一通。不过许多人知道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悄悄地跑到各家房地产公司打探房价，同时也看看哪里的房子“抵买”。一个春节过得不伦不类，相互间见面忘记了拜年首先探听有什么新消息。

眼瞧着规定的日期过去了，硬是没有任何人来动员拆迁更别提商量价格。直到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内部消息传来说是市里暂时没钱，兼之中央有令不许拖欠拆迁款，这里不拆了。朗生将信将疑按照有人介绍的办法，拿着房产证跑去拆迁办，说是要跟银行贷款需要开证明，否则银行不给抵押。这一招果然还灵，那个拆迁办的小年轻查了内部通知，果然这地段已经解除了拆迁公告，那年轻人收了两块钱给开了个“不属拆迁地段”的证明。朗生心里愤愤不平，奶奶的你发通告说拆，你又发内部通知说不拆，开个证明还收两块钱，没道理可以讲了么？罗嗦了几句牢骚话，那小年轻也不生气，反而安慰道：“老人家，您别生气，这么大年纪气坏了身体可划不来。我们只是打工的，又做不了主。这样吧，我跟领导请示，如果批准一定退回这两块钱给您！”朗生觉得有点哭笑不得，看那态度挺值得笑，可这一通老人家的恭维让他受不了：我真的这么老吗？

朗生拿回这张证明引起一阵轰动，前前后后总有几十人过来看过，市政府拆迁办的证明说此地已经不属拆迁范围，理应安心居住了。果不其然这一年平安无事，拆迁的事情没有人再提起。后来才有人说，那张拆迁公告限定2月28号以前搬迁完毕是有缘故的，国务院关于拆迁的新条例3月1号生效，市政府想打擦边球，赶前一天就不受这个条例约束了。朗生心里是认可这个分析的，他暗自想，他妈的这个政府已经跟人民玩起心眼来了，什么人民政府！不过他跟谁也不敢说，连老伴也没提。自己虽说啥也不是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党员，尤其是有新意思离退休的下岗的党员都得参加“保鲜”，谁知道又闹腾些啥？祸从口出还是谨慎为妙。

眼瞧着新的一年又快要到了，儿子正式宣布今年春节可能回家看看，说不好还带女朋友给爹妈审视。老伴别提有多高兴，慌忙张罗着收拾房子，一天八次地问朗生：是给他俩住一间房还是分开住？朗生还没闹明白老伴到底是啥意思，横了一句道：“要是你女儿跟人家回去，你说住一间还是分开？”老伴也没好气：“你以为现在还是你那

个朝代啊？跟我谈了半年还不敢碰我一个指头，窝囊废！”朗生听着忍俊不禁：“闹了半天你还有意见呐！当初怎么不说？”老伴也笑了：“没意见才怪，差点还以为你有病呢！”不知多久，这两口子没有这么欢乐了，朗生知道，都是这个傻小子带来的欢乐，算算这家伙有两年没回家了，信也不写，电话里说不上两句话就挂机，代沟确实很明显。朗生想，今年这个年是得好好过，这些年来已经没有过年的味道了。于是他打电话，给几个弟弟妹妹都通了气，他们听说这个侄儿要带女朋友回家，也都十分高兴，然后就是抱怨自己的孩子，似乎根本没考虑过婚嫁之类事情。

平安还不到一年，眼瞧着就要过元旦，忽然在楼道里看见公告，这房子又宣布要拆迁了！朗生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时候贴不得？非得在过大年的时候搅和！安静下来没多久的居民群又热闹起来。不过，今年已经不像去年那样，一是有人算计着拆是肯定的，巷子最里边河堤那里已经拆了一片，连着这规划路的那座桥，桥墩也出水面了，于是异地买房搬走了，拿这里的旧房出租；二是去年实行国务院的细则以后，拆迁确实“人性化”了许多，拆迁补偿价格眼瞧着涨，估计每平方米多了差不多一千元。这拆迁补偿一高，许多人甚至盼着他来拆迁。

朗生不是弱智，心里也明镜似的，算算这补偿可以得回至少二十多万，怎么着也可以买一套更舒心的房子。那公告上似乎还体谅大伙，说明白过了元旦就开始评估，元宵节以后开始签约，争取一个月内完成拆迁任务。并且还有提前搬迁奖励，每提前搬迁一户奖励六千元。其他的如铝合金门窗、装修、电话、闭路电视、宽带网都计算给予适当补贴，朗生心里觉得幸亏去年没有拆成，不然的话整个损失会有十万左右。下一件事就是到处看房子，他有些不满的是，如果早个把月通知，儿子回来能住新房多好！

不过这份心情很快就没有了，他跑了几家房产公司都说他不能办按揭贷款，因为已经属于失业或退休人口，没有足够的经济偿还能力。这可比那小伙子一个劲地叫他“老人家”更惨，那不过只是一时拧不过来，如今可是实实在在要卡壳。他跟人家争，可是那些个“售楼小姐”也并不生气，一个劲赔不是然后把什么责任都推给银行，是银行不干我们无能为力。如果银行肯给按揭，我们一百个高兴。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门路了。当他看上那家公司一套房子时，有点心虚地提出按揭遭遇的问题。那个售房部经理把朗生请进他的办公室，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请他到某个熟人的公司开一张证明，胡乱写上个年薪十几万办按揭就没事。朗生听见这主意反倒慌了，这样搞岂不是乱了套？银行如果去调查一下子穿了煲成了诈骗犯更惨。那个经理听了哈哈大笑，说：“老同志你们这代人看来真的跟不上时代了，不过说明你们确实真诚。这年头不玩点虚拟的你还想住房吗？这办法不是别人都是银行里教的。你以为他们不想多按揭几户吗？你交了首期，这房子又抵押给银行，他们啥损失也没有，只不过中央不许他们给房地产贷款，只准按揭，如果都按照那个按揭条件有几个人买得起房子？还有，你没想到的人家都替你想好了，他们保密你的所有文件，要不然税局找你收所得税你还受不了呐！”朗生回家首先找了何工商量，那何工看来早就谙熟此道，不阴不阳地略带微笑答应一定帮他弄一张证明来。还告诉他这办法大有人

用，所谓法不责众不会有什么麻烦，根本不存在任何经济收益怎么也算不上诈骗。朗生知道何工本事不小，听说他如今在一家什么监理公司做技术总监，每个月远比厂里那点收入高多了。他拿的是高级工程师证书，当初在厂里就是有啥证都办的，预算师、监理师证都齐备，那家监理公司离开他恐怕还领不到牌牌哩！有这位老伙计如此这般一番劝导，朗生的心情也顿时豁然开朗。第二天老何就通知他去拿证明，朗生接过来一看，嚯！电气总工，年薪十八万元，每月都有一万二！不过老何另有一张打印好的承诺书，认可这张证明仅为购房需要所开，承诺绝不向这家建筑公司索要一分一厘的“年薪”。朗生爽快地在承诺书上签了名，然后拿着这张证明直奔那家房产公司。

其实头天晚上朗生已经跟老婆算过细账。本来朗生认为儿子已经不可能再回本地，老两口买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也就足够了。可老婆不干。说什么也不能少于现在住的三房，而且，以后有孙子的时候，儿媳妇坐月子肯定得回来，多半那孙子还得老的带。朗生觉得有道理，也很高兴，不然养大了儿子就飞走了，多少有点失落感。还有，看房子的时候才知道，如今那些两房一厅都在八十平米以上，根本不是当初计划经济时规定的，两房户不得超过62平米。如果是高层建筑，加上公摊面积两房户都快一百了。那么还不如买一间多层的三室户，大约在120平米左右，价格不能太高，于是只能在地段上随和一点，别去凑那些黄金地段的热闹。

朗生寻得的这个楼盘其实是按照老婆的指点找到的，它处在一片新区边上，已经有相当规模了，也已经住进来不少人家。据说原来是安居小区，结果超了标，就按照普通商品房出售了；也有人说是开发商有意玩的花招，故意超标然后加价出售。现在这套房建筑面积125平方米，刚竣工不久的现房，设计不错，客厅挺大，采光通风都挺好，布局也合理；唯独觉得离闹市区稍远一点，不过公交还算方便，有两三路公交车；附近也有小区的菜市、超市，还有一家医院；不足之处在于附近没有好学校，不过对于朗生来说这无关紧要。可能正是没学校的缘故，于是被冷落，单价只报2380元，房价合计三十万元。首期预付9万元，其余21万就得按揭。如果以二十年按揭计算，每月连本带息一千多元，朗生估计，到时候拆迁补偿下来，大约25万元足够一次性还款还有剩余，姑且补进装修费里去。

一切都挺顺利，合同签订之后，售楼小姐领着跑银行，交付了首期9万元，谁知银行的职员拿着按揭合同从主任室出来显得挺为难：“对不起，老同志，我们领导说按规定您不能按揭二十年。因为上边规定办按揭年龄上限定在65岁，您现在的年龄离上限只有九年了。主任说，如果按揭十年的话，他可以拿到行里审批，应该能够批准，不过今天就办不成了，您留个电话，过一两天批下来我再通知您来办。”朗生一听就来了火气，拉高了嗓门说道：“莫过你们领导给我算了命？我只能再活九年了？”那女孩赶紧解释，说了一大通银行的按揭规定，都是北京总行定下来的，谁也没办法。跟着来协办按揭手续的售楼小姐也忙不迭地说些同情话，捎带着责骂北京那些定规则的官僚们：“其实房子都押在银行里，他们又亏不了，真不知道这些当官的脑袋里装些什么！”朗生给这两位女孩和那个赶紧跑来的银行按揭部主任一劝，火气也消了不少，寻思着与其再拖几天还不如少按揭几年。于是答应道：“那就给我按揭九年吧！”没曾料到这回是那个主任发话了：“这位先生，很对不起，我们这里按揭最低五

年，然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没有九年这一档的。不如这样，我去给领导汇报按十年办，争取这一两天就给您批下来。”朗生问：“你就不能让他现在批？”“不是的，一个领导批不算数，得他们开会时一起批。按正常的他们每星期一上午才开会，不过我们这已经有好几份合同也需要他们批，明天星期四，他们也可以开会审批的，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办过几个了，肯定能批的。”朗生打了个电话回家请示，老婆说，评估公司上次来的时候说，拆迁办想在春节前办妥第一批，我们积极一点，照理说就算按揭五年也不要紧，反正拆迁款拿到手就提前还他，问题不大。有了老婆大人的指示，朗生便拿定主意，办五年按揭。银行的工作也算做到家了，不但认真负责态度和蔼连保险他们都代办。朗生却有点愤愤不平，有房子抵押，凭什么还得保险？不过既然人家说是规定，也就无话可说，算中国国情吧，规定的就是天经地义的，发牢骚可以，但没用。

办完银行按揭手续，房产局那边登记备案的事情由房产公司售楼部自己去跑，不用朗生操劳。然后把房门钥匙以及那张“入伙通知书”交给朗生。在售楼小姐的领取簿上签名之后，朗生寻思着得跟那个装修队商量装修的事情，反正现在自己是个闲人，亲自跑装修材料市场定料，装修队负责干活，这样就能省不少。再寻思一下还得感谢温家宝，这老哥出台了拆迁条例以后补偿价提高了不少，如果去年拆迁每平米补偿不会超过一千五，今年就变两千三了。要是去年拆成了，无端就少了八万多！这么算算心态又平衡许多，再核计一下，这五年按揭每个月得付本息差不多四千，自己的全部收入连同老婆在内还不够一半。于是由衷地期盼拆迁能早点进行，几天前评估公司来评估，知道每平方可以补偿到两千三，各家各户大都皆大欢喜，不像去年那么吵吵闹闹。但是仍旧有人跟评估公司的人闹，说是没有两千八一平方绝不搬家，要么就在同等地段给一套同样面积的房子，否则没完！闹得最凶的就有本厂的几个工人，朗生觉得这些人实在太过分，你都住了十年的房子，还要求这样简直有点不讲理。朗生甚至联想开了：什么工人阶级最先进，狗屁！

跟装修队的商谈进展还不错，这些江西来的民工在本市已经干了好几年，上次是他们到厂里装修办公楼时，临时派朗生负责监督质量才认识的，活干得还不错。若不是何工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朗生，他早就忘记这回事了。人家现在已经是领取营业执照的装饰工程公司了，那个头头还记得朗生，不过朗生却已经记不清人家姓什么，小伙子换了身行头有模有样，果然今非昔比。过了这几年人家还在干说明人家还混得不错，达尔文说“适者生存”看来也不错。要求春节前他们能够干完活，因为那样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就能住进新房，还能领六千元奖励。只是那个头头似乎颇为难：“郑工，实不相瞒，春节前我们的活特别多，人手很紧。再说，现在这种包工不包料的活工仔们一般不愿接，一是收入少，二是怕材料跟不上或者不合适窝工。不过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尽量安排，这样吧，过两天我再答复您。”朗生答应春节前完工会给适当奖励，那小伙子仍旧坚持得过两天才能答复，于是朗生只好留下电话号码回家去了。

一回到家就给老婆抢白了一通，她说：“人家老李家找的装修队保证春节前做完，干嘛一定得求这个队？还给奖金？美不死这些打工仔！”她接着就给老李家打了电话，那边老李老婆跟她在电话里唠叨了好一阵，最后确定，

明天一早就带她过去。朗生一问，才知道老李买的也是这个小区的房子，也是三房户，早买半年就便宜了三四万，人家还一次性付款，没有这么多按揭之类的麻烦事。朗生想，怪不得老婆能那么英明指点，原来是老李家引的路。不过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这老李怎么就富起来了？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老李原来在厂里干的是采购燃油的活，工资还比朗生低一个档次，奶奶的，这小子肯定那时就捞了不少外快，要不然怎么可能二十多万一次就掏完了？想着想着，干脆打开电视机看热闹，老婆既然愿意跑，让她去跑吧！房子已经买到手，大局已定，她爱折腾就让她折腾去，要不然，自己辛苦半天，她也不可能有满意的时候，别说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她愣是可以挑出一头牛来！

老婆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了，她原本想叫朗生一块去，可是朗生昨晚看英超足球联赛现场直播，一个人疯疯癫癫折腾了大半夜，这会儿睡得正香又不忍叫醒他，于是自己走了。跟着老李老婆转来转去转到市里一处出租屋，这里原本都是郊区菜农，市区一发展这里反倒成中心区了。农民卖了菜地又在宅基地盖起一片小楼房，挤得跟墓地似的，这大约就是那个“城中村”现象。老李老婆轻车熟路绕到一栋五层小楼跟前，那门口牌牌上歪歪斜斜写着个招牌：“宁浪装修”。进得门去就是横七竖八的床铺、桌椅，打工仔们倒是都起床了，床上乱七八糟地扔着卧具、衣服。老李老婆一声喊，应着声从后边钻出来一个嘴边还有牙膏沫的年轻人，这位就是这伙装修工的头儿。老李老婆几乎是喊叫着说道：“你小子到底啥时候进场开工啊？我要是春节前住不进去，可是要扣工钱的！还有，我又给你领来一个客户，跟我那房子在一个小区里，你们就近干活也方便。便宜点啊！也是想赶着住进去过年的，就按照我给你那个设计图，让她改改，一起开工。”那年轻人一脸堆笑：“哎呀！谢谢，两位大姐请坐！我马上安排，有两户一起干就好干多了，不会窝工。三两天保证开工，一定赶在过年以前都完工！”接着就是看图纸，朗生老婆看不出名堂来，就要求带回家去让朗生看看再说。那个年轻工头大致说了一下：基本按照这张图纸，如果没有特别复杂的改动，装修工钱六千元，工具由施工方准备，不过工具使用费另收五百元，材料由业主自购。说好第二天把改好的图纸带过来，签施工合同，预付一半工钱以及工具费，准备一天，第三天开工。保证春节前三天竣工交付使用，交付时结清尾款，每延误一天扣工钱一百元。那工头要求提前一天也奖励一百元，朗生老婆不干，最后说好提前一天奖励五十元。离开时，老李老婆笑道：“你真行，比我还能砍价，妈的，我跟他定的是提前一天奖一百。”回家的路上，老李老婆说，预付款已经给了三天了，原来说好今天进场的，可他们说忙不过来，其实是嫌远，独户的就拖。回家以后朗生已经起床了，自己弄了点吃的。老婆把大致情况说了一遍，递过图纸，让朗生改改。这边确实便宜许多，那个江西佬说优惠也得一万，于是也没什么可说的，仔细看起图纸来。这一整天他都沉浸在设计思考之中，虽然说专业不对口，可画图还是没问题的。更何况当初在厂里监督装修的时候，他曾经找过一些装修的书来看，加上每天看着装修队干活，已经不是外行了。朗生按照老李那张彩色图，自己出了张黑白简图。至于色彩，既然自己选购材料，其实也就没必要了。为了核实主要材料的价格，以及确定某些拿不准的材料，朗生还专门跑了一趟装饰材料城。

次日一早，老婆跑去签了合同交了订金。回来以后两口子一起跑装饰材料市场，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地选购装修

材料，为了买大块的釉面砖还是买小块的，两口子抬起杠来。人家老李整套房子都是实木地板，朗生硬是把客厅地面改成釉面砖了，老婆不乐意，在家就已经摩擦了一会儿。现在老婆看上大块的60X60釉面砖，朗生发现那价格跟好的实木地板已经差不了多少了，坚持买45X45甚至30X30的，那就便宜得多，也因此抬杠。把开始阶段必需的、各种精打细算过的材料都按清单定好货，不知不觉就折腾了大半天。人家送货上门再摆好，回家后已经累得啥都不想动了，心安理得躺在沙发上，朗生寻思着，明天一早就过去，看那帮小子干活，据说，包工不包料的活最费料，那帮工仔故意损坏或浪费你的料；还有趁你没人他们还偷材料，以后用的上时跟下一家算钱；更有说法是装修完了他们偷偷配大门钥匙，以后瞅着机会就来翻箱倒柜。朗生暗自思量，好在当初在厂里监督过装修工程，这回弄自己的事情，想要玩奸连门都没有！

第二天两口子起了个大早，从现在居住的地方奔新居，路程不算近，还得倒车。到了地方朗生继续琢磨，随身带了钢卷尺，测量核准几个尺寸，如果要改，趁他们还没动工赶紧改了，免得浪费还耽误工时。朗生知道自己不如市委书记，左手一叉腰，右手画个圈，建好的可以拆，拆掉的重新建，书记拍板专家跟屁。自己只有这一次机会，别说拆一片楼，就连釉面砖也是一块顶一块的，弄坏一块就得自己掏腰包买来补上。就这么比比划划再局部改改图纸，不知不觉到了大晌午，那帮装修队居然还没来，朗生不敢离开，怕路上岔开了人家来了进不了门。老李两口子还是蛮高姿态的，主动让朗生家先开工，他们不打算春节前搬家，同意让装修队人手紧的时候先干这边。那帮家伙住的出租屋还没电话，又等了一会，老婆提出自己过去催，已经琢磨好该怎么骂人了。

直到中午一点过，朗生的小灵通响了，老婆说这帮挨刀的今天过不去了，叫先回家吃饭再说。朗生折腾到家，已经快两点，正想责备老婆，既然那帮小子今天过不去，怎么不早打电话？可一看老婆那脸色，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紧接着老婆就跟孩子似的“哇”一声大哭起来，朗生只好又劝又哄，止住她的嚎哭这才弄清楚原委：那包工头昨天已经卷款逃跑了，连那帮打工仔的工资都没给。老婆让朗生吃完饭带着合同以及预付款收据过去，派出所已经通知了市公安局经侦队，说是下午三点半，所有被骗的都到经侦队去，办理报案手续。朗生真想破口大骂，又不知该骂谁。本来还想责备老婆几句，看她那如丧考妣的样子，朗生又忍住了。问了一会儿才算知道大致情况：那小子租了农民房，又在劳动力市场找了十几个民工来，已经干了半年多装修了，包工不包料的活挣不到什么钱。眼瞧着春节前生意热火起来，大约收了十几户的预付款，其中还有几户是包工包料的，全都签约说春节前竣工交付，昨天下午他就失踪了。不但那些民工半年多的工资没领到，连房东的屋租水电也还欠三个月的。据说这小子一共卷走十几万。

三点半之前，老李老婆找上门来，老李门道宽，下岗对于他简直就是福音，一直在广东那边倒腾，回家的时候不多。他老婆也是一脸哭丧相，拿过她的预付款收据一看，原来她也是包工包料中的一个，预付的购料款就两万五，七七八八总共给骗走差不多三万块！不知是心态平衡了些还是来了点同情，朗生原本打算埋怨她的话都找不着了。她一说朗生才知道，这骗子原来是汽车班司机小屈介绍的，那家伙是领头呼喊“没有两千八不搬”的主，有次

还差点动手打评估公司的人，却不料早就暗中买下房子了，这小区有便宜房也是他介绍的，他那套房子就是请这个骗子装修，不过他只预付了500块，说是过年前不打算装修，定在正月十五以后。老李老婆还说，本厂找这个家伙装修的有五六家，都被骗了，被骗得最多的还是自己，说着那声音便开始哽咽起来，朗生就更没心思抱怨什么了。不过他这才知道，果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就这么几十号人，成天听见哭穷声，居然都暗中买好房子了，有的连装修都完工了。朗生暗暗好笑，老婆还指望拿六千块提前搬迁奖，恐怕自己是最后一个搬走的。

经侦队的报案室只有十几个平方米，挤着十几个报案人，都是被这个骗子骗了的。轮到朗生报案，人家看过合同与收据之后，让出门复印一份备案，朗生自己去了，让老婆跟警察说情况。回来交了复印件，再一问，这才知道已经报案的被骗金额总计已经28万多了，天那！然后听那小警察训话，大抵是革命警惕性不高之类的批评，朗生记住他说的那句：“这年头，满街都是骗子！有时连自己还骗自己，看你们年纪也不轻了，怎么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朗生瞧着他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心里不知是啥滋味，猛然想起阿Q的教导：“儿子打老子！”今天可算体会到“儿子训老子”的滋味了。天知道这钱还有多少追回的希望？省着省着，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给骗走时倒大方得很，还得乖乖地来听训话，滑稽！

离开经侦队，朗生坚持要去那间出租屋看看。老婆领着过去，首先看见的就是居委会贴的通知，大意便是去经侦队报案。进门瞧瞧，一片狼藉，他终于把抱怨冲老婆发出来了：“这么个鬼地方，你就这么放心给钱？”老婆已经自觉理亏，嘴皮子动了动却没声音。屋子里坐着几个绝望的打工仔，朗生忽然涌起一片恻隐之心：几乎都是些十岁的孩子，他们的爹娘怎么就舍得让他们出来自己谋生？想到这里，朗生的眼睛有些湿润的感觉，不由自主地问一个躺在床上六神无主的小伙子：“你们都没领到工钱吗？”那孩子赶紧坐起来，拘谨地回答说：“没有，平常老板只管饭，说是过年前一次发。”朗生又问：“那他逃跑了谁管你们吃饭？”那孩子说，昨天下午开始就没吃东西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朗生忽然想起自己下乡的时候，那时感觉到的绝望恐怕根本没法跟眼前这些孩子们比，不管怎么样总还有个家，总还有可以指望的父母做依赖的。他回头走出去，到隔壁的小杂货店，兜里的钱还够买下两箱快餐面，那杂货店的女店主知道朗生的意思之后，赶紧亲自端着面箱跟着朗生过来：“快点谢谢这位大伯，你们遇到好人了！”几个孩子跳起来，三下五除二地撕开箱子抢开了，只有眼前这个孩子，一骨碌跪在朗生面前，磕了个头，哽咽着说：“大伯，谢谢！”朗生连忙把他拉起来，让他千万别这样，然后亲自递过去一盒快餐面，一句话也不再说，叫上老婆一起离开。

回家的路上，朗生的思绪难平。想着自己的被骗，也想着这些可怜的孩子，社会该如何救助他们呢？说老实话，朗生自己就没听说过本市何处有这样的救助机构，更不知该到哪里去为这些孩子寻找帮助。突然，他对老婆说：“你先回家，我还有点事。”老婆原本该盘问一下的，可这档子事情闹的，也不敢多问什么。公交车停站时，朗生过到路对面，他又回到这件出租屋来的。快餐面已经没有了，纸箱与纸盒乱七八糟地扔着，那农民房东正在驱赶这群孩子，看见朗生又回来了，顿时收敛了原来的凶气，喃喃地诉说自己的苦衷。朗生没有理会他，看见孩子们

正在各自捆绑着自己的行李。孩子们看见朗生进门，显然觉得奇怪，全都茫然地望着他。朗生数了数，还剩下九个孩子，有两个年纪大些，看样子二十多岁了。朗生问道："你们都做了多久装修的活了？"从七嘴八舌的回答里，朗生知道，最长的已经做过两年多，最短的只有几个月。还知道，他们正准备卖掉那个骗子留下的几件简单装修设备与工具，然后分钱各奔前程。朗生说："这样吧，你们跟着我到我那间新房去，把它装修完，我付给你们工钱，然后你们回家过年去。"欢呼声几乎随着朗生的话音落下而响起，一个声音问道："大伯，我们住哪儿？这里不交钱就不让住了。"朗生想了想，说："要是吃得苦，你们就住那间房子里，挤一挤，别再花钱租这里了。"一个快乐的声音告诉朗生："大伯，不算苦！我们受得了！"有个孩子突然想起来："那个破锅呢？赶紧找回来，还可以煮饭吃哩！"说着，跑出去捡那几件刚扔掉的用具。

朗生带着这九个年轻人到了那个新区，进了堆放着不少材料的房间。那两个年纪大点的，一个姓张，一个姓罗，马上说朗生的材料进得有问题，有几样东西，像装饰木条就早了，本该最后才买的。然后安排一间房，说铺上点木板打地铺，九个人够住了。物业管理的人上来说这里不许装修工人住进来，朗生跟他们解释了一通，那头儿可能也被感动，批准他们住下，但是要求每个人都拿身份证登记才行。末了，他竟然领着朗生，到楼下不远处几间建筑队留下的施工用房，告诉朗生，这房子过一两个月就得拆掉，不过现在可以给朗生用其中一间，堆放材料、住一两个人都可以。忙乎了许久，事情初步安顿出头绪来，还缺几件工具，那个小罗说他知道在哪里可以买二手的，便宜。并说，朗生的材料不是最理想的，在另外的市场有更加物美价廉的材料卖。安顿基本完毕，小伙子们有的已经开始做活路了。朗生决定回家，得拿点钱，米呀菜呀都得买，首先得解决这帮小子的晚饭问题。回家的路上，朗生忽然觉得轻松愉快，受骗后的屈辱感都没有了，他似乎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今生最了不起的事业。

新房子的装修正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这些个打工仔做事也很认真、积极。朗生每天亲自到现场，布置各项任务，还找来两辆旧自行车，不时需要买一点小物件，那个小罗骑上车奔出去。老婆似乎也找到了感觉，每天跑来当厨师。朗生有时很为自己自豪，要是没有这档子事情，自己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充实。他利用老婆在图书馆的旧关系，借来好些有关装修的工具书，每天晚上都在啃那些细则要领，很快地就成为行家里手了。不愉快的事情也有，首先就是那个混蛋儿子，打电话来说，春节可能回不来了，单位头头说要利用春节期间跑一趟澳洲，让他跟着去，机会太难得，所以不想放弃。朗生觉得儿子有道理，虽然有些遗憾但也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老婆则嘟嘟囔囔不乐意，她最关心的还是那个未来的儿媳妇。

越临近春节这房子就越像个样子，这帮小子们干活也很起劲，他们干完这单活每个人平均可以拿六百块钱，那个骗子原来只给他们四百。老李家的看见朗生这边干得起劲，活也做得不错，主动要求把她家的装修也接过来，同样按照原来的合同价位付款。这样一来，两边交错进行，小伙子们收入更高，超过一千了。小张说，至少给家里有个交代。那个给朗生磕头的小伙子姓刘，干脆说春节不回家了，寄五百块钱给爹妈尽孝，也足够了。他还说，从家里出来半年多，一分钱工资也没领到过，只是有饭吃而已。"俺爹妈要是收到俺寄的钱，知道俺出息了，多开

心！”看见这些孩子们满足的样子，朗生觉得自己似乎比他们更开心。人活一辈子，能给自己挣下幸福是应该的，能给别人带去幸福，那才是最开心的事情。有一天，朗生不经意地问小张：如果没有把他们拉来干这活，他们会怎么样？小张说：“那就惨了。我们全都身无分文，卖掉那些工具，最多每人分个三五十块。大伯你还不知道呢，你要是不回来找我们，那个房东要收掉那些工具，他说用来抵扣他的房租，不给我们拿去卖。我们正在偷偷商量，准备把行李拿出去放好，再回来抢！反正没法活了。你来了，他不敢做声了，我们也不用抢了。大伯，我们都商量好了，做完活拿到工钱，我们要凑钱给你打一块匾，你是大好人呐！”朗生吓了一跳，赶忙警告他：“那样做是犯法的！……”没等朗生说下去，小张抢过话头说：“我们知道。所以说大伯你不光是解了我们的难处，还救了我们，在我们安徽老家，匾是只送德高望重的人的，所以才想起送匾的。”这番话使朗生久久不能平静，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复杂的事情，本来就指望一个双方都有好处，自己反正是要装修的，他们也迫切需要解决困境。本来两利的事情，捡回来那么大的喜悦。他想起那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迎来美好的明天”。

眼看春节将近，儿子终于确定不回来过年了。这还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原来的市委书记高升了，新调来一个书记。这也没有多大关系，糟糕的是，新书记对老书记的措施并不热心，可是又没有任何安民告示公布。如此一来，开始流言错杂。有消息说，这里不拆了，新书记要抓市里的工业项目，不再搞第三产业。也有消息说，原来的书记大拆大建，市里财政收入光还债就要还二十多年，没钱支付拆迁费，所以这里不拆了。这消息就像一闷棍，那几个原来最坚决反对拆迁的，如今又是最愤怒的。到处打听都没准信，不过事实却摆在那里：原本积极寻访住户评估的评估公司，如今连人影都看不见一个。原来说春节前签约奖励六千块，如今连签约的人都找不到一个。

这后果表面上似乎没什么，但实际上却并非那么简单：几乎每家都去其他地方买了房，大部分都是扫干净所有存款才交的首期，有不少还是借钱买的。光那个按揭，月供就不是每家的收入能支付的。以朗生为例，两口子全部收入不足两千，月供将近四千，上哪儿找这个缺额？其他的原厂里工人以及一般干部收入更低，全指望得到拆迁补偿以填这个窟窿。拆迁说不搞就不搞了，那盖着政府大印的拆迁公告还贴在楼道里，不拆的公告却没有，也不进行，说不清究竟是哑巴吃黄连还是黄连吃哑巴。朗生赶紧跑去打探，交过首期以后所剩几万块钱，眼瞧着还不够支付装修款，这边却额外承担按揭带来的负担。还有，本来这地段生活十分方便，租金既高客户也多的，可拆迁公告贴在那里，租房也无人问津了。原来像朗生家这样的房子，月租可达800-1000，如今一个月500都没人敢租，谁也不想租个不定啥时就得拆的房子。一旦没有这块租金收入，个个月不吃不喝填按揭也还差一大截！朗生头疼的还不止于此，那边装修还得支付，如果塌了一截打工仔又领不到工资岂不成了新骗子？

朗生找到何工，这老伙计已经住在市里新的公务员小区，环境优雅设施齐备室内装修也豪华不已，朗生进门感觉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暗自想，这世界真的是奇妙极了，看人家上天都好像不费吹灰之力，怎么到自己爬树却如此之难？人家是越老越滋润自己却如同秋风扫落叶，人比人确实会气死人的。何工优雅地端上来一杯茶，然后告诉朗生这可是陵云白毫里的上品，刚下来的“节前茶”，比北方那些“雨前茶”要强多了。朗生不会品茶，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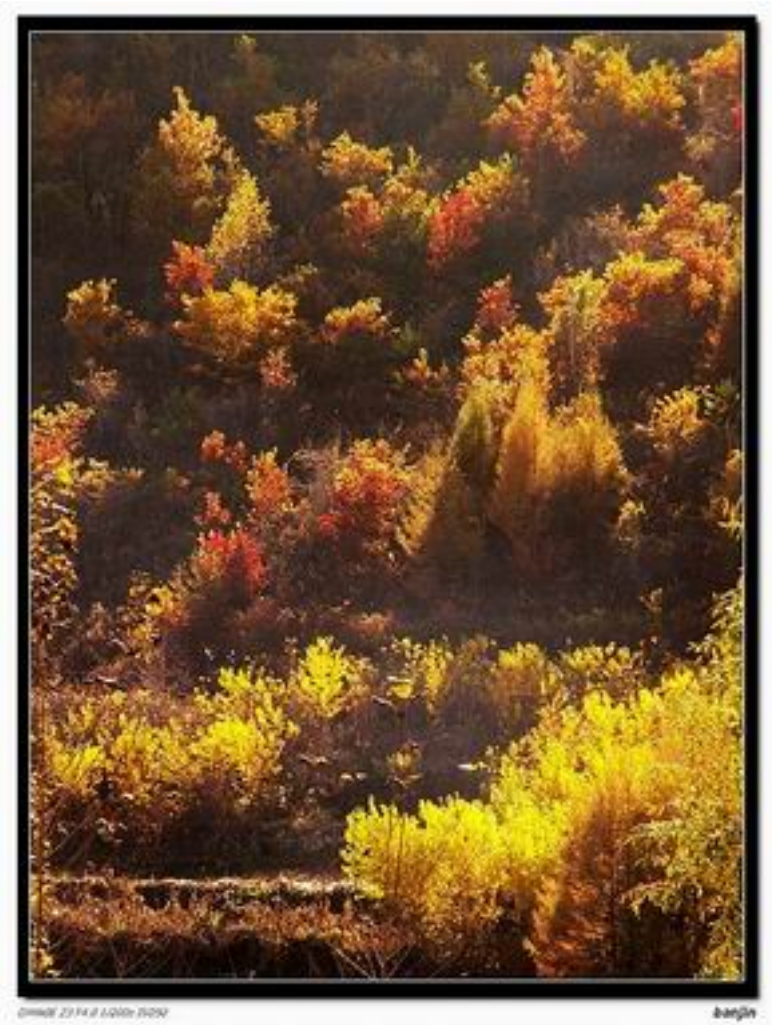
觉得这茶叶有一股清香而已。老何似乎完全明白这位老朋友的来意，明确地告诉他：市面上那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新书记肯定不会明说对老书记的项目不感兴趣，相反，每次开会都坚决肯定老书记的“1368”工程一定要做到底。妙就妙在人家不说死啥时候“到底”，拆迁办申请费用的报告都压在抽屉里没批。说财政不紧张也是扯淡，到处开花到处要钱，给谁不给谁那就另当别论。然后也诉了一通旧房子租不出去的苦处，言下之意便是：我跟你一样，都是受害者。

朗生对别人肯定不会如此信任，这个从中学就在一起的伙计，无需隐瞒什么。他把自从拆迁以来的遭遇说了一遍，老何不动声色地听着，尤其为朗生救助那帮打工仔的事情赞叹。最后他笑了：“我说你们这些高才生果然迂腐，你这岂不是自寻烦恼？这样吧，听老弟一句劝，既然你已经有了那么好的开头，就算逼上梁山吧，干嘛不接着发展下去？我给你提个建议，行得通行不通你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救助的那帮打工仔还算能干而且不奸猾，那么你就领着他们成立一个装修队伍，我可以给你说说话，就在江西老表，那个小丘的公司里挂一个工程队，你们就不用费那么大力气去办牌照了。而且我听说他那里不时缺人手，有的活你可以接过来做就是了，你自己揽的活也可以打他们的牌子干。不过先说好了，他可是讲究质量的人，别看人家一个农村孩子，这点上他可是丝毫不含糊，砸了牌子就砸了饭碗，他就是这么认真。”朗生一听便恍然大悟，这些天他也在考虑这装修做完了该怎么打发这几个年轻人，已经跟小张、小罗透了口风，让他们趁着活还没完得寻个去处，人总不能靠这千把块钱过一辈子。只是他俩都没表态。在自己那里装修，已经有了点小名气，附近买了房的人也有几位过来参观，据小张说，有人已经试探问过，能不能接他们的装修活。如果按照老何的建议，这活接着干下去还是有可能的。于是朗生说，自己有兴趣考虑老领导的建议，而且经过这次装修也把这个行当基本摸清楚了，回去一定跟这几个小伙子商量一下。但是，朗生很认真地说，眼前被政府这个出尔反尔搞得很被动，尤其是所有积蓄基本见底，政府可以高兴就拆不高兴就不拆，自己的按揭却是必须支付的，再搞起这个队伍来，肯定还得有点经费，已经无能为力了。接着他鼓足勇气撕下面子说了几句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那么，你老兄还得帮帮忙，借几万块钱给我作本钱，想认真做靠那几个破烂工具是不可能的，等我们开张了，第一单利润就开始还，要利息也行！”老何听见朗生这么说，居然鼓起掌来了：“敢借钱了？有你的。这样吧，我不想扫你的兴，这钱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不过不是我借给你，你明天去找小丘，把挂靠他的事情谈妥，然后我给你担保，从他那边借给你，把借款手续跟他办好。你说几万就够了？我想你还是没有见识过大蛇是怎么撒尿的，几万块最多够你填窟窿。告诉你吧，据我所知，我们这个房子拆迁，至少今年上半年是没戏了，下半年如何尚不得而知，你还得继续交按揭。但是那桥墩已经做出水面了，他不拆房子已经不可能，总不能做好一个断头桥搁在那里吧！那么你只能堤内损失堤外补，把装修队搞起来挣点钱补缺。这样吧，我告诉小丘，给你准备十万块，前提是你必须挂他的牌开始干活才行，否则你拿什么还？”朗生答应了。

从老何家出来，朗生感觉到一阵清风吹过来，很舒服。他忽然意识到，这还真是春风哩。老何送老同学一直出到公务员小区大门口，老何握着朗生的手说：“老伙计，记住，钱是挣回来的，不是省回来的。”（2005.6.14发

华知、老三届）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武斗纪事A

（这是一篇旧文，回忆文革时期柳州的武斗情况。开始写的时候鄙人还在农村插队，零零星星断断续续，至少三十年了吧！主要是害怕记忆错乱，虽然经过五年囚禁生涯反复不断地提审、交代，印象是很深刻的，毕竟当年的日记早已不知去向，很难保证无错漏。又经不露声色地探访一同经历那段岁月的故友乃至对头，也查阅能够找得到的文件资料，尽量使其无大差错。尽管如此，恐怕仍难保证不失，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吧！）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具体情况如何，在广西，武斗是“三支两军”导致的。但据所了解到的资料看，中国大地上凡武斗之所，皆与军方介入脱不了干系，如果没有“三支两军”，原来的所谓保守派已经分崩离析，大多数人已经参加或改弦更张自立了造反派组织。已经习惯了惟命是从的中国人，当他们明白过来是毛亲自指挥文革运动并且要在这次运动中整肃官员阶层之后，拥护是惟一正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到1966年底，就连省部级干部也纷纷争取“亮相”揭批刘、邓、陶，表态支持群众造反组织，以逃脱被整肃的命运。

1967年春，大势已经非常明朗，例如我们广西，就连一直对群众运动主张弹压的韦国清也在1月29日开始接二连三贴大字报揭批刘、邓、陶，要求群众组织接纳他站在“造反派”这边，只是当时的造反头目曾某某以未明其历史状况为由，其实是怕惹上“招降纳叛”的麻烦不同意而已。2月12日，在乔晓光家里开会，包括韦在内的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亮相”批次，韦、乔敲定由贺希明牵头发表“亮相声明”，这个“声明”签字时，领导干部们争先恐后，竟然有人没轮上首批，怕被甩掉而急得落泪。可见那时当老毛的意思明朗化所导致的效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应该准确，它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并非已经被历次运动吓破胆的干部、群众自发行为。

然而各地匆忙的“夺权运动”呈现乱象，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毛和他的中央文革甚至担心有的地方官员改头换面继续把持权力，因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这种现象势必难免。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命令军队介入地

方文革。既然文革就是毛为林彪接班设置的程序，举国夺权的当口，军队干部介入是必要的。未经严密安排的群众组织夺权，只有军队介入掌管才能保证令行禁止，同时也就为日后林彪能指挥地方权力打下坚实基础。但也是急迫的，此举显然缺乏预设。直至3月19日，中央军委才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把政治上的决策变成组织上的行为，军队干部280万人出动，基本上使各级权力直接掌控在毛、林手里。

最高层始料不及的是，军区决策层沿袭的思维模式跟“刘邓路线”同出一辙，都是“党天下”模式，对于那些“不听话”另搞一套的草根造反者本能反感。于是，军区的介入基本上以压制甚至镇压老造反派为己任，例如取缔“工总”、逮捕它的领导人；扶持已经散伙了的“赤卫队”、“老红卫兵”组织改头换面成为新的群众组织，直接制造了新的社会矛盾，把原本已经大势所趋的“矛头向上”（周恩来语）变成“矛头向下”。

其实这一打击行为也造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文革就此挺着肚子收场也未必不可，至少国家安定下来了。但这样老毛不满意，文革如此收场意味着失败，至少不那末理直气壮。他借着“怀仁堂风波”反“二月逆流”，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反过来支持军区要压制甚至镇压的那一派。于是群众组织便真正成了“各为其主”的状态，军区操纵的一派与中央文革支持的一派，也就是“保守派”与“造反派”，所不同的是双方都贴着“造反派”的标签。在广西，反“二月逆流”的那一派基本都自称“造反大军”，唯有南宁市叫做“422”，那里是首府，于是全广西都成“广西422”了。而对立的那一派，则有组织地统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由于上层的不统一，中央有领导权，而军区有操作权，这两个权力相互矛盾。而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毛随心所欲地东指西打，底层群众之间的斗争只能导致愈演愈烈的武斗。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支持“广西422”这一派，夸赞说：“你们矛头向上，很有劲”。同日，驻柳55军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25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等在广西军区召见“422”头头，除了作检讨之外，也表态支持“422”；26日广西两派代表团在京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31日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令，任命55军副军长孙凤章为柳铁军管会主任，55军机关接管了柳州铁路局的全部领导权。

按照那时各地已经处理过的省，当周代表中央表态之后就成“一边倒”局面。问题在于，广西问题的处理恰赶上老毛改变主意的当口。毛泽东发动文革，说是要搞“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路摧枯拉朽，党、政、文化界均不堪一击，靠的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的震慑。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文化的革命遇到武化的军队就碰了壁。军队支左镇压群众运动的力度远远超过“资反路线”时的工作队，代表形式当属“二月逆流”。毛只注意到“老帅”们否定文革之“逆流”，没深思这股“逆流”的下层支持，暴怒之余就要排除障碍。林彪迎合毛的思路走，指责“带枪的刘邓路线”，受了军队镇压之苦的“老造反

派”扛着鸡毛当令箭，靠着“支左”咸鱼翻身的“老保”改头换面，打着“造反”旗号反攻倒算，那份激情亦胜于“还乡团”。

最糟糕的事情还在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分裂的国民各为其主，十几年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早已摧毁了人性与道德底线，越是有恃无恐便越野蛮。经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仓皇出逃以后，震动使毛明白，他必须依靠军队而放弃造反派。这些个被称之为造反派的家伙其实只是在文革前期“民主”浪潮中跳出来的激进分子，同1957年的右派分子没多大差别。对于专制统治而言，这些人是绝对的害群之马，肃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们本能的选择。惟一的障碍仅仅在于还得为文革寻得体面下台的台阶。

1968年4月下旬，我在北京农机学院看到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上面说周恩来派杨成武直接飞苏杭给毛送了一封亲笔信，附送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周要挟毛说，如果不把王力打倒，他自己就辞职。毛犹豫了两天，终于下决心批捕王、关、戚，并委托周亲自办理。这封信还促使毛转向解放老干部并抛弃造反派。甭管真假，这则消息对我的震动极大，以至于到现在还记得，只是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它。但经历的历史进程确实无情地证实此说，我觉得它显然符合当时的政局变化情况，也预感到我们已经成为高层权力争夺的牺牲品。试想，毛对于“四清”和文革，都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派”，《五一六通知》里咬牙切齿地宣布：“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到1967年秋毛改口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及至1968年，毛的腔调变成：“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我的理解是：毛搞倒“刘邓路线”，包括老周在内。折腾到武汉“七二零事件”，毛被惊醒了，知道老周树大根深搞倒不易，尤其是国家经济离不开这位里手，不如就势做个顺水人情，这才授意姚文元写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生拉硬拽用“五一六兵团”做替罪羊，洗白自己，挽救文革大局。

且不去细究“最高指示”之悖论性质，这三级一跳，文革体面下台，至少做到掩耳盗铃了。惟周恩来看出点问题：毛不是早就说过，只消动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的么？何以折腾出如此巨大动静、花费如此巨大代价，最终只不过搞倒了刘少奇等几个人么？文革哪来的马列主义“新的里程碑”业绩呢？且，除恶不尽迟早还会祸及自身。于是不惜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腕，举国大搞“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把文革造成的动乱归罪于造反派，有目的地硬捏其成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集团故意搞破坏。终因它的荒唐只得不了了之，反倒给文革抹了黑，张志新、遇罗克等，皆成符号，文革洗不去的耻辱符号。当人们控诉“四人帮”杀害他们之时，不知是否刻意回避：始作俑者，周恩来也！

但逐渐知道些内情的军区来了劲，暗地里继续支持“联指”派不使其散伙，甚至通过各级人武部把农村基干民

兵都作为“联指”组织起来，直接对抗周恩来的表态。“824”表态之当夜，柳铁联指即贴出“周恩来824表态罪该万死”的大幅标语，紧接着又改名“钢联指”。而且，“林副主席讲话：广西问题要重新考虑”之类满天飞。广西联指则宣称：“周老三，算老几？老子照样打倒你！”联指则组织群众转而冲击广西军区，认定军区检讨是背叛行为，揪斗其政委魏佑铸达三天三夜，缘由就是他主持搞了那份检讨。

这等事件理应属于很严重的事件，却未被当回事，若无幕后指使至少广西军区会救回自己的政委，决不会任由群众组织如此妄为。而周恩来承诺的“马上解决”广西问题却不见动静了。延宕至9月14日毛南巡讲话颁布，中央明白地改变政策，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变成“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大联合”，于是两派都有理由都有支持，一场真正的杀戮便无法避免。此后，广西两派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互换，“联指”扮演游行、揪斗、冲击军队领导人及军事机关的角色，而“422”却成“执行政策”的角色了。例如“大联合”，“422”方面表现积极，“联指”则反其道而行之，其“宣传部长”程某当时记录：“对‘422’总要压垮他们，写了很多文章”；10月31日，“联指”颁布《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的总动员令》，同当时两派在京代表团所达成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唱反调。

在后来老邓对文革的清算中，官方只有兴趣清算“矛头向上”那部分。例如“处遗”基本上处理了那些批斗老干部的分子，甚至“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伤痕》，也饱含着对“矛头向上”的忏悔。但对于“群众斗群众”，无论斗得多么惨烈，伤亡何其严重，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更不待言对文革思想根源的揭露与批判，因为那样就会把一棵老树的根都刨了。

在广西，尤其是农村地区，“联指”在军区指使下的杀戮行动已经开始了。根据1983年中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调查核实，仅在1967年10月2-4日两天里，全州县东山公社一个大队就集体坑杀76人。主犯、民兵营长黄天辉后于1985年1月被处决。现实录当年中央工作组清查广西文革历史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文字材料如下：“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P53）接着，广西各地陆续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基本上以武装民兵为核心，对地主、富农、右派等成份和出身的无辜人民进行屠杀，经过阶级斗争理论长期熏陶，道德障碍及人性底线皆失灭殆尽，加上权力撑腰，杀起人来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形式上于1967年12月16日下达了“十项命令”严禁乱杀人。但没有任何具体行动，而各级人武部默许甚至直接操纵各地、县以“联指”名义的基干民兵继续杀戮。24日，在中央的催促下，广西革筹、军区

又发出《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仍旧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到了1968年1月，武斗变成明目张胆的屠杀，则是由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筹、军区直接策划、指挥的，变成了由军队直接上阵的杀戮。现在所知军队直接参加武斗最早的事例就是1968年2月29日军区派武装部队包围并剿灭了柳江县里高镇的“造反大军”组织。按照中共调动军队的严格程序，有理由认定此举必然“通天”，否则如广州军区之类没胆识批准的。各地武装民兵杀人活动愈演愈烈，致使逃亡到南宁的群众达数万之众。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也成千上万地逃入各县来的群众。按照当时老年人的说法：“广西人逃难，比当年逃日本鬼子厉害得多！”

例如《年表》记载：“2月27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又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当时两派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周之内连发两次督促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以致出现一些地方提出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29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P71-P72）

“（3月）7日，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派去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按：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会议决定向广州军区提出请求派部队解决融安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X师派部队解决。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P72）“24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X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要求：①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②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③清理外来人员。④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X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P74）

以上官方文字清楚地证实：广西的武斗和屠杀行动完全是由韦国清领导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一手策划发动的，直接调动军队参与镇压，而当时黄永胜领导的广州军区给予完全的支持。当时融安县人武部亮相支持“造反大军”，如果不从速解决，成立革委会必须由人武部政委担任主任，这是军区所不希望的。所以3月7日广西军区命令柳州军分区派部队进驻融安、凤山两县“联指”据点，“保护群众”。广西由军队配合“联指”派进攻“造反大军”派从这时开始。周恩来在北京不断地组织两派代表团搞“大联合”，实际上韦国清显然有恃无恐地采取镇压手

段。

为了实现消灭“422”的目的，广西革筹于3月15日编造了一个“反共救国团”的谎言，诬陷宁明县上石镇“农总”。该报告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称：“‘农总’的‘罪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感慨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枝，步枪十一支，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卫边防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意见是：①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②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年表》P73）这个报告如此荒诞，仅看一句就说明编造者是如何匆忙：他们“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既喊“贺龙元帅万岁！”又“诬蔑”当地部队是“贺龙的部队”，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中央居然也“没发现”就批下来了。于是广西军区强行安在宁明县“造反大军”下属的上石“农总”头上，枪毙了这个组织的所有头头。由此开始的“反共救国团”冤案向各地蔓延，几乎成为“422”的同意语，因此杀戮不知多少，1980年以后平反了事。至于当初是怎样伪造出那些国民党党旗之类“物证”的，则至今仍是个迷。柳州市法院还宣判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派驻广西小组》的案子，国民党何时有过“中央情报局”？不得而知。

其实我们当时就认定，所有这一切策划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首先消灭各地县的“造反大军”组织，然后围剿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城市。我甚至怀疑，韦国清肯定得到了毛的授意，否则他既无此胆量，按照中共对于调动军队的铁律，也毫无可能。可韦国清办到了，还把主持公正的野战军6984部队悉数调离南宁，可见其“通天”能耐。在桂林，联指绑架了著名的全国战斗英雄、支左部队首长郝成忠、柳州联指绑架了55军副军长孙凤章、南宁联指绑架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全都没事，倘若“422”敢如此，早就灭顶了。文革中，政治虚伪的事例太多，我们初步领悟到毛式手腕那种流氓本质，及至“清查五一六”，大规模地赤裸裸地故意造伪，至少我是认定了这个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它也绝对不会有未来。我们曾经如此虔诚地笃信，不止一次地、恭恭敬敬地抄写列宁的教导：“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定导致政治上的灭亡。”结果遭遇的却是“为革命撒谎”的理直气壮，就连“厚颜无耻”也得甘拜下风，倘若还想保持做人的基本底线，离经叛道只能是惟一选择。

广西革筹、军区还在广西“422”的原领导人中瓦解了以龙智铭为首的一些领袖人物，让他们住在军区内。这些人物自1967年5月作为两派赴北京代表团成员起，就一直脱离广西的运动，与他们所代表的广大群众，早已缺乏感情联系甚至组织联系。其实，造反派中并不缺乏以造反为谋求加官晋爵之手段的投机分子，广西又最为典型。但当“422”的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从而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巴黎公社原则罢免他们的时候，革筹与军区毫不理会，继续把他们当作“422”的领袖人物来摆布。后来（7月）在北京，我与龙智铭见面，随即发生激烈争辩。我在激动之余警告他：“你如果不想同‘422’继续混下去，完全有权利宣布脱离这个组织；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窃

用他们的名义，却在为虎作伥，将来你不得好死！”也许我的嘴臭，后来他们被利用完了，虽然混了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同样被韦国清收拾。在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的境遇中，龙智铭真的卧轨自杀了！

在柳州，路局军管会（55军）依旧遵循周总理指示行事，柳铁两派总部的头头签订了“倒旗协议”，宣布取消两派组织，实行“大联委”代表两派共同管理。鉴于当时广西明摆着的杀戮现状，我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联战”几乎面临分裂。但最终还是统一起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一致了，还有少数几个坚持反对意见。忘了交代一下：鄙人当年系柳铁一中高三学生，1967年初本校学生诸“战斗队”联合组成“联合战队”，于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出七位“常委”，我就当上了总头领。本校另一种观点的少数派组成“东方红公社”。我们涉足社会之后，与柳铁“机关总部”，“工人总部”合成“柳铁工机联”，却是支持原铁路局党委书记张炎等干部的，曾被骂作“保字号”。对立面拥戴造反的孙副局长，本应属于“造字号”，但广州军区军交部支持孙副局长造反，我们变成“反军派”，莫名其妙融入广西大势成“打倒韦国清”那一派了。在广西，南宁等少数几个地方称“422”，绝大多数地方称“造反大军”；而对立面经广西军区整合，统一成“联指”，详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1968年1月，我布置“联战”另外一位常委肖普云写作《今日的‘哥达纲领’》，述说反对“倒旗”的理由，并商量好写作大纲，刊登在“联战”2月10日的《红卫兵报》上。谁知此文被广西革筹发现，抓住老肖引用马克思的“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一句，康生定性为反动文章，说此语意在“用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更要命的是，他还武断地宣布：“中学生写不出来。背后有‘黑教师爷’！”江青也发话：“有黑手！要揪出来！”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此文涉嫌者仅肖与我而已，再无别人知晓。毛泽东口口声声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康生、江青凭什么不调查就乱下结论？如此一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们会遭殃，当初文革开始我们就禁止对老师搞任何侮辱性行动，如今无端连累到他们是不能不辩解的。我于是布置联战的学生继续写文章，自己也动笔，到1968年秋《广西日报》批判了“七篇大毒草”，其中六篇出自我们的笔下，那是后话。接着，3月31日军管会抓走了肖普云，因为《今日的哥达纲领》是他执笔的。我便受大家委托上北京告状。直到5月初，我和两位同学一起离京经武汉、长沙返回柳州。

路上已经感觉到大规模的武斗就要开始了，火车进入广西后的一路上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其实就是“联指”派，由军区武装他们，公开地从列车上抓人杀人。赤裸裸的土匪行径披上革命外衣就成壮举，而主持公平正义的野战军第55军，则受到上级批评，部队也基本调离，只剩下部分干部还在柳铁军管会，但他们再也不敢出声了。我直到后来才听说，那些上车搜查的武装“民兵”其实是要抓我的。他们知道我已经在5月3日离开北京，于是开始搜捕我。但他们没有料到我在武汉、长沙都下车了，在武汉拜访了“三钢三新”，到长沙了解杨曦光是否独立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写作，有没有“黑手”在其身后协助，因为康生同样说那文章是“黑手”操纵的。等我进

入广西，已经到17号了，他们久抓不到，便松懈了许多。挤在火车上，我对面坐着对立派的老伍，他是柳铁消防队的干警，文革前我们同在冬泳协会，现在观点不同，所以只打了个招呼便罢。最危险的是到永福、鹿寨车站，那些“民兵”们上车来查，老伍非但没有揭发我，反而打了个掩护。那时已有诸多罹难案例，例如《柳铁工人报》社编辑林某，在桂林北站被联指抓获，受尽折磨后又被绑在炸药包上，引爆炸药便尸骨无存，当时联指把这叫做“坐飞机”。如果本人那时被抓住，也许就没有机会在这里神侃了。问题在于，广西军区命令联指以基干民兵为名，任意拦截旅客列车达数月之久，绑架甚至杀害旅客，却没有任何中央文件或通知，予以禁止。

在我回到柳州的五月中旬，农民已经部分开进柳州市了。4月8日，区革筹、军区召开支左组长和革委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单位成立武装纠察部，使“联指”武装合法化。《年表》编写小组在评述4月9日区革筹、军区连续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广西日报》11日发表诸篇文章时称：“在广西当时派性恶性膨胀，极左思潮严重，已经出现群众组织乱抓、乱杀人的严重局面，本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反‘左’，制止乱抓、乱杀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然而，不仅不反‘左’，却来个反‘三右’，这就必然更加促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乱抓、乱杀人，甚至成批杀人的现象蔓延全区。”（P80）中旬，梧州军分区、贵县人武部分别指挥“联指”以民兵名义大举进攻“422”一派，至月底彻底荡平；下旬，柳州军分区王司令员亲自对“联指”头头说了三点意见：“①柳州造反大军退出拉堡后，你们要注意他们从外面包围你们，你们把兵力调出外边，注意他们在柳州搞你们。②融安、柳江出问题，你们过去为什么不发达群众，挨打了干着急。来宾、武宣‘联指’搞得比你们好。③你们要求发枪，我是司令员，不能发枪给你们，你们自己解决，民兵集中不集中，由你们去和各县商量，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嘛！”王司令表扬的来宾、武宣两县，都开始发生杀人挖心吃肉的现象，文革处遗时，中央工作组查实被食者仅武宣一县即达75人！听完王司令员的讲话，23日，柳州‘联指’即开会调集融安、柳城、武宣、融水、忻城、象州、柳江、八一锰矿共600余民兵武装进入柳州市，27日发起对柳州“造反大军”的攻势，迫使其全部迁往柳江以南。然后在柳州饭店召开盛大庆祝宴会，军分区司令、政委出席，王司令员在宴会上夸赞“打得好！”

列车到柳州火车站，我们下车就被人发现，他立即跑去叫人来抓我。但火车司机都是“工机联”的，他们在车头上看见我们，大声喊我们上了火车头，直接开进机务段去了。回到学校，看见我们的队伍正在紧急集合，原来也有人在火车站听说要抓我，赶紧奔来报信，却报成我已经被抓走，于是我的副手集合队伍准备去火车站救我的。当我们三个出现在他们面前，队伍里一片惊喜，还有些女战士高兴得哭了起来。我的副手感觉松了口气，我不在家，他累坏了。

然后联战“常委”们开了会，他们汇报广西的形势，非常不妙，许多地方如玉林等地，都已经开始杀戮，“造反大军”这派差不多被剿灭干净了。各地都是军分区率领武装“民兵”进行围剿的。我们学校里以及学校旁的柳州冷冻厂，还有机务段、车辆段等几个我们占据的地方，住满了各地逃来的难民。不但柳州市“造反大军”彻底打出柳北，5月9号开始，柳州“联指”会同各县武装部率领的民兵开始攻打水厂、马鞍山水塔、龙家巷等处，“大

军”被压迫在柳南谷埠街及附近一小片地方，岌岌可危。12日，《柳州联指报》发表社论，要给“大军”以“毁灭性打击”。15号，柳州地区各县民兵组成的“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发出“第一号命令”，公开宣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还说：在柳铁，“钢联指”把转业军人组织起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许多枪，还成立了以韩XX为首的处级以上干部幕后参谋部，要不了多久，就要进攻文化宫，那我们只剩下机务段、车辆段、铁一中这一小片地方了。每天晚上，都有枪声、爆炸声传来，不绝于耳。总之，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或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确实没有料到，只不过个把月，家里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

了解了柳州市以及周边各县的部分情况，我感到形势非常严重，我们面临的是生命权还能否保全的局面。然后我报告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到风雨操场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全都坐满了，连老师们还有少数逃难到我们学校居住的市内难民。我的报告很直截了当，中心意思就是继续重申我原来的主张：求生存。所有“保卫毛主席”之类的目标都不重要，中央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弄不好杀灭我们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些所谓“北京来电”统统是骗人的精神鸦片，一个字也别相信。现在我们只有抵抗到底，如果被消灭了，那么江青、康生他们就省心了。只有打出一片地盘，使对方消灭我们的企图失败，中央才可能出面解决广西问题。失败是铁定无疑的，没有任何幻想，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奋斗使类似广西各地的那种屠杀最好不要在柳铁发生。

不要以为现在说大话，那时我们“联战”里早就称康生为“大党阀”；江青被称为“戏子”，周恩来被称为“泥水匠”；张春桥被认定是“叛徒”，甚至当上海的炮打张春桥浪潮被取缔之后，我们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讽刺：“最高指示：‘对叛徒也要做阶级分析。’”有位女生直接提出：“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只有对毛不敢太放肆，私下的抱怨之外最不礼貌的称呼就是“老头子”。说文革期间没有一点“民主”似乎也说不过去，虽然后来我们都为此付出代价，但从1968年春天开始，我们确实很“放肆”。那时我们还流传一个政治笑话：“秘书半夜去报告总理，说广西武斗，死了几千人。总理连头也没抬一下。问：‘火车还通不通？’秘书说还通，他于是再也没理会。没多久，秘书又来报：‘火车也不通了！’总理扔下纸和笔，连忙站起来，大声说：‘找韦国清！他杀点人就算了，怎么把火车也搞停下来了！’”这个政治笑话确实不知道是我们哪位天才编出来的，最后军宣队进校，算在我头上了，罪名是：恶毒攻击周总理草菅人命。还有一句：“总理总理，总是有理。”也不知是谁的原创，“联战”里几乎人人皆知，也算作我的罪状，不过对于我的“反动言论”说来，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反正被批斗，更何况我是总头，便认了，也算“死猪不怕开水烫”吧。

这次形势报告确实打消了许多人的幻想，乃至于很久以后还有人记得。接着同样的内容我又到文化宫总部给更大范围讲了一遍，听众是我们这一派的铁路职工、干部。到柳州市内总部开会，我也重复同样的意见。一句话，本人当时坚决主张打到底，无他，不打就死定了，打或许死的还少些。广西各地的情况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做打的准

备，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各县的逃难者更是络绎不绝，主张打，抵抗到底便很容易得人心，主张交枪求和便会遭到唾骂。最令我吃惊的，是当初极力主张妥协“倒旗”的柳铁分局机关总部头头王反修，如今成路局工机联总部的头头了，废寝忘食地为大家的存亡打拼。

我亲自同住在学校里那些外地难民谈过，他们亲口告诉我许多那边发生的事情，灵山县人武部调集武装民兵围剿“造反大军”，杀害了至少几百人。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全家杀绝，连婴儿也不能幸免。说到他们自己，几个人都哭出声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攻上来，我们看见是解放军带领的，不敢打。结果全都被抓起来，那些解放军就把俘虏交给‘联指’，由‘联指’开始屠杀。我们逃跑得快，才到柳州来的。”这些情况我去北京以前就知道一些，在河池地区凤山、融安等地已经发生。现在扩展到全广西了。5月3日，区革筹小组、军区对于灵山、合浦、东兴（今防城）、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地“联指”滥杀不同观点群众和“五类分子”的情况已十分严重，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市制止乱杀人歪风。（P86）

其实根本走形式而已。就在接到通知后的5月4日，广西最先成立的百色地区革委会甚至在田阳县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组织各县革委会、人武部人员参加，全地区随即开始大规模杀人行动，就连文革以来从未发生过武斗的那坡县，也由人武部组织开始屠杀。该地区凌云县县委书记、原任乐业县县长、地下党老干部黄刚等亦被杀害，缘由仅在于他们持有不同于联指的观点。12日南宁市“联指”竟然将林执真、张祖贤、黄海泉等三位处级干部以及十余名群众装入铁笼搞“活人展览”；“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不仅一批老干部和群众受害，高级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年表》P88）

18日我到设在铁路林场的总部开会，当时有人发现五三八编组站停了 2 个车皮代号 8 ，有军人押运，肯定是军火类。大家为是否去把它抢过来有争议。后决定去把这两节车皮拉回来，由于参加行动的人看不懂包装袋上的外文，拉回来的TNT炸药误认为化肥，又送回去了。接着有人发现柳州火车站停了一些装运军火的车皮，有军人押运。他们为是否去把它抢回来有争议。总部外围观不少群众，情绪激昂地指责头头“右倾”。还有人说，5月上旬，军区向“联指”发枪，南宁“联指”得了一两万枝枪，大批弹药；柳州市“联指”也明抢暗送，搞了军分区两个仓库的武器。后来看资料，得知是3日下午广西“联指”搞了广西军区军械库，得到八千余件武器及大批弹药。参与指挥此次行动的原区团委干部罗某记载：“已同广西军区某领导通气了，经多次强烈要求后，军区才同意给的”；区联指宣传部长程某也说：“哪里是抢枪，是去领的。”形成对照的是，当天南宁“422”也奔市人民公园6936部队去抢枪，非但所获无几还被抓了几十人。当部队奉命将抓获人员押送广西军区时，在中华路上却遭“联指”预设埋伏射击，仅战士就伤31人，死5人。负责押送的部队营长如实汇报，却被军区严厉批评，于是改口说是被几千米外且是射击死角的百货大楼“422”开枪袭击的，“联指”以此大加宣传。（P86）

王反修等十分尊敬地请我发言，本人毫不犹豫地主张抢回来，我根据在北京的感受，认为中央文革看来在放纵

韦国清剿灭我们，取得经验以后在全国推广。全国的“造反派”，无论是否掌权，都注定在被整肃之列。文革搞不下去了，肯定上不了史书，又必须挺着肚子下台，就需要一批替罪羊。到时候可以骗人：文革是伟大的，其中的混乱和损失就是这帮家伙搞破坏造成的。毛主席终归只需要那些没有思想只会听话的保守势力，如果我们不自己保卫自己，让中央知道我们也不是轻易可以斩尽杀绝的，这个阴谋就会得逞，那时我们便只能任人宰割。另一方面，目前中央看来还没有下决心，毕竟这批人是他们发动起来搞文革的，如果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并不好解释。因此拼一拼还是有希望的，至少中央不会采纳屠杀方式解决文革，那就更没法下台。但如果我们不拼一下，韦国清他们下手是绝不会留情的。

这个判断看来不离谱，4月3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广西‘422’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制造了广西文革最大冤案。“此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四人，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迫害死一百零八人。此外，判无期徒刑三人，有期徒刑二十二人公安机关宣布管制一人，外逃下落不明八人（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应定为群众组织。经报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撤销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年表》P85）5月17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2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再次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捏造冤案的目的在于捆绑“422”：“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点，与越侨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冤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平反。”“这一文件发出后，进一步使乱揪斗歪风在全区蔓延，乱杀人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年表》P89-P90）韦国清出手之狠毒，手段之卑劣，堪称世间少有，无怪乎毛泽东要夸赞：“韦国清是好同志。”而我们正处在这种随时遭受打击的利剑之下。

夜里，我与负责“文攻武卫”的副手转到铁路文化宫，柳州市造反大军总部廖伟然、白鉴平等人见了面。白是老熟人，廖是首次相识，他原本在部队做大尉参谋，后来转业到市里，曾经当过四清工作团一个团的副团长。见到广西屠杀日益升级，自报奋勇到造反大军管“文攻武卫”。 见到好几个熟人，问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答复说是从柳江边溜过来的。从粮食加工厂、探矿厂、二级站延伸过去，联指的武装据点把我们同柳州市造反大军切割成两片，而且谷埠街正在遭到连续却不严重的进攻。似乎联指还没有得到命令，否则拿下谷埠街这一小块地方是很容易的，但拿下谷埠街就意味着造反大军彻底完蛋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好向中央交待。“联合指挥部”早已经策

划了攻打粮食三仓和探矿机械厂这两个联指据点，把柳州市谷埠街造反大军地域和铁路连成一片。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所以没能实施。现在柳铁工机联与市里“大军”合作行动，把各分散的武装队伍全都集中了，该开始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原本铁路与地方分家，不准搅合搞文革，往来并不多。如今王反修们敢于跟市里联手，一方面说明局势已经逼人太甚，另一方面说明王反修们还是挺明智的。这次会议讨论进攻方案，部署很简单，我们联战派一个支队，从这边扼守东站路，那边由柳州市主攻，如果联指的援兵过来，我们就得堵住。

副手已经开过几次会了，而且本来由他负责带队，我就没有太多过问。转到文化宫其他地方，正好碰到55军的曹副参谋长，因其兼任柳州铁路分局军管会主任，那时尚留在柳州。许久不见，寒暄几句后我就问他：孙副军长在不在柳州？他不肯回答，反倒问我：听说你们要把探矿厂拿下来？已经打过一次了，已不成秘密，于是我说是的，不拔掉这个钉子，我们不得安宁。他就劝我们不要这样做，一则是先动手会落得政治被动，中央肯定不允许。二则这个厂围墙既高又结实，里边武装很强，未必能攻下。我笑道：你们总是来劝我们，可是“联指”一直在动手，现在已经兵临城下，把我们越围越紧。如果我们不打，要不了多久就完蛋了。说着文化宫屋顶又挨了两个炸药包，这是“联指”发射的定向炸药。

这种定向炸药包据说是解放军在越南的新发明。在地面上挖一个斜坑，把一包小些的炸药放在下面，填些土或者湿麻袋之类的隔离物，上面再放一个大炸药包。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同时点燃，下面那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短，先爆炸，上面的炸药包就沿着斜面飞向要炸的地方，落地后爆炸。只要掌握得当，可以发射得很准确。为了防止飞行途中过早爆炸，失去效果，导火索总是预留得较长。我们被炸得多了，就发现这个弱点。等炸药包落地，就立即冲上去，拔掉导火索，于是便收到一包炸药。这样便发现这些炸药包都用的是苏联产的TNT炸药，显然是援越物资，对方抢了却没被追究责任，甚至连半点动静都没有。

后来对方似乎发现了什么，于是把导火索用铁丝捆结实。我们又发现可以从捆绑点后边把导火索抠出来，照样获得炸药。有的人嘴里叼着利刀，冲上去割断导火索更快更稳当。对方又计算好燃点时间，留适当的导火索，使其落地就炸。我们的人甚至可以从空中飞行的炸药包冒的烟火估算出来，这个炸药包能不能缴获，决定是否冲上去。最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统计，柳州“联指”共发射的两万多个定向炸药包，我们这边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它炸死！后来的专案组也认为不可思议，甚至不相信。而我们却从飞来的炸药包里，获得数以吨计的炸药。也学会发射它了，后来干脆用厚钢板焊成斜坡状的发射器，连挖坑都免了，被称为“野崽炮”。

好在五十年代建的铁路文化宫非常结实，不然早就垮了。我于是乘机对曹参谋长说：你看，这不又打过来了？我们不打怎么办？人家的方针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只好针锋相对，保全自己。旁边几个同学和机关干部也帮腔说话。正说着，二楼跑下来一个人，说厨师吴师傅被打死了。我们急忙跑上去，只见他歪倒在床上。我顺着墙上的子弹孔，测过去一看，原来是从探矿厂方向打过来的冷枪。看来开枪的是个职业枪手，居然能从窗口垒着的沙包留孔

里打过来，那孔是留作观察用的，只有一块砖那么大。曹参谋长叫我注意，这个枪手很厉害。正说着那个孔里又打进一枪，子弹打在床边的木柜上，离我不过十来公分。我连忙弯着腰跑到窗口的沙袋后边，那个孔看来已经挨了很多枪，我找了块砖头把它给堵上了。从沙袋里还掏出一颗子弹头，拿过来给曹参谋长看。他自言自语说：妈的，这种枪他们都有了？接着告诉我，这是一种新式的狙击枪，部队也没几枝的。我道：你该向上级汇报了吧？军区总说联指没抢过枪，他们有那么多枪，连四管高机都有好几挺，现在还有这种新式狙击枪，该不是军区给发的吧？

曹参谋长迟疑了一下，说："我们早就报到中央军委去了，没用。小伙子，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于是拿着那颗弹头，招呼他的警卫员离去了。我又到广播室去看了看，播音员正在那里播送"强烈抗议"，动作挺快，只是吴师傅再也活不过来了。他的后脑勺开了个大洞，子弹是从嘴里进去的，看来他正打哈欠时就中弹了。

从前在书上读过"达姆弹"也称"开花弹"，武斗中发现除开老式的"七九"、"三八大盖"、"捷克造"、"苏式步骑"之类旧枪外，AK47的几乎所有的子弹都是这类开花子弹。人被击中，进去一个小孔，出来便是一个直径几公分的大洞！我们联战女孩孙某走在马路上便挨了一枪，大腿上被剜去一大块，落下终身残疾。我特地找了些湿泥装在麻袋里，然后用AK47射击，扒出弹头才发现：原来这种弹头是用很薄的钢片冲压成型的，里边灌上铅锡合金。击发后弹头被枪膛里的来复线切割成六瓣，飞行时的高温使弹头内的合金熔化，一击中目标合金因惯性向前挤压，钢制的弹头壳立即绽开，倒翻成一朵喇叭花，被击中者便被这朵"花"拽走一团血肉！战争的残酷可见一斑，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知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留下血与泪的记忆，甚至有的连记忆也没有，早早进入坟墓了。

没多久，副手开完会下来，我问道：开完了？他点点头。我们一起回学校，上了我开的嘎斯69苏制吉普车，他告诉我：19日夜里开始打，我们还是负责打援。我说：怎么样，这次我来带队吧！调哪个支队上？他笑道："你他妈的充什么好汉！万一你挨枪死了，谁来领这一帮人？"然后又问："是不是中央真的要卸磨杀驴？这次去北京，怎么不去找周总理？娘的，他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就是听了他的，才有今天。当总理的，说话也不算数！"我笑道："你也太天真了些，说话算数能当总理吗？不是说'总理总理，总是有理'吗？他哪里还有闲功夫管我们的事情。我找他的联络员都躲着不露面，在北京两个月，跟他妈乞丐似的。跑了清华、北航几趟，蒯大富跟'414'斗得热闹，他的秘书的秘书挡着，别想见他。韩爱晶据说得了肺结核，到什么地方疗养去了。这帮家伙现在像中央首长，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迟早会被收拾掉！我们住在北农机雄头他哥那里。北京的大学生都在谈恋爱，等着分配工作，写大字报也是要求分配。没有几个人还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据说上海有一批专门整张春桥的，挺勇敢，原来我们想去拜访，听说都被抓了。看来只有我们中学生还在傻乎乎地闹，反正前途无著，据说都要下乡，北京有一些积极的已经自报奋勇了。"他原来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属于"德智体"皆优的优秀学生，还指望着上大学。我们这些原来的中等生全都在笑话他，其实哪个不指望文革快点拉倒，早点恢复高考去读书呢？只不过人家成

绩优异，期望值更高罢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看来比较伤心。

回到学校，副手情绪很低落，连招呼也没打就耷拉着脑袋回他房间去了。我知道我说的消息对他是不小的打击。不过对于我，从来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武斗没死，下乡已经算好事了。那时队伍里流传一句名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喝凉水。”几乎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经常念叨。

19日，下午四点时分，副手把有枪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了。那个时候，枪就是命根子。我们曾经制定过纪律，弄到枪一律上交。结果根本实现不了，无论谁弄到枪都会成为“私有财产”，他于是有了战斗的资格，非常神气。罗嗦了一点，不过说明当时那种积极性。天黑下来，十几条枪全部出发了。后半夜枪声大作，我在屋里看书，但啥也看不进，忐忑不安总有些不祥的感觉。天快亮时下雨了，我觉得不妙。我们已经死了四个同学了，每次都下雨。枪声依旧很激烈，看来这仗打得不顺利。到六点多，曹大个冲进我的房间，铁青着脸告诉我：“张大死了！”我立即觉得一阵晕眩。张大是我们高三级31班团支部干部，昨晚出发前特地跑到我房间，还给我那本《叶尔绍夫兄弟》，当时属于“限地师级干部阅读”的，说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现在一想，总是一种不正常的预兆。

我历来不相信什么神仙鬼怪，但这些事情确实显得蹊跷。1967年8月3日，第一次长矛大刀的武斗就死了也是高三的胡超亮，那天出发前他向几个要好些的同学交代了好几件事。后来他被捅死了，热辣辣的艳阳天忽然下起雨来。接着是小龚晶，刚上初一的小姑娘。死于车祸老天也下了场大雨。再后来是方天行，初二的男孩，跟着柳州市一车初中生跑去来宾县抢枪，天蒙蒙亮就下雨，他们刚进入就被武装部的埋伏开枪打了，15个进入大院的被全歼。都是手无寸铁的初中生。我和曹副参谋长去处理，武装部的军官们全都无影无踪，据说“九五”命令刚下达，但曹副参谋长说不可能，他们最多只接到电话通知。然后是1968年1月21日，和我住同一间房的莫兆明，原来比我们高一届，因为体格棒游泳好进了自治区水球二队。因为一队夺得全国冠军之后，去香港比赛全队叛逃，他们全部被遣散回来就和我们同届了。那天大清早，我还没醒，他把我叫醒然后告诉我他要去柳州地区文工团借几件乐器，我们的《联合战队队歌》他已经把词曲都写好了，让我起床后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改改。

我当时觉得奇怪，我是夜猫子，他早睡早起，从来轻手轻脚怕惊醒我的。怎么今天却把我弄醒？于是骂了他几句。起床算了。没多大一会老天又下雨了，我心里一惊：千万别有什么事情发生。没多久，果然传来噩耗，兆明被联指打死了！给我报信的正是张大！

兆明是我们“联战”中的骨干，身体强健，好几种乐器都是高手，作词谱曲都能来。我们所有人开汽车都是他教会的，而且还能修理。成天乐哈哈的，从来没有看见他红过脸，人缘极好，却就这么死了！再一问，原来他和小奇、眯子等走过探矿厂门口，恰好看见两个解放军战士被一群市民围攻，于是上前解围。没料到探矿厂这个联指的武斗据点里冲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对着他就开了一枪，子弹正中心脏，当时就死了。后来我们闹腾了许久，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两个解放军战士也“失踪”了，部队里说没有这两个人。而第一次调查会这两个战士参加了的，虽

然什么也没说明白。显然，假如有这两个战士，必然对联指不利而对我们有利，这是上边不允许发生的。现在要打探矿厂，我们的积极性自然可想而知。却不料出师未捷，倒先失了张大。没多久，整个进攻被取消。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算起来，张大已经是我们死去的第五位同学了。

当此战失利后，带队的副手觉得对张大之死有指挥责任。而他自己则刚一下来就对我宣布要辞职，理由是我们现在的大方向不对，根本不应该去进攻别人。我把他训了一通之后，他不服气，干脆躺倒。于是我拜托丘八管点事情。他并非“常委”，因为当初采取“巴黎公社原则”选举联合战队常委时没有选上，但很有头脑，我经常跟他商量些事情，曾经希望把他补选进来，但终于没能如愿。文革前他和张大是同一个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张大是宣传委员。俩人关系十分密切，现在自然十分悲痛。

现在副手辞职的事情他也知道，安慰我道：你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如果不打出点地盘，必定死路一条！他是个书呆子，什么攻打别人？我们的地盘几乎被打光了，造反大军已经完全被打出柳北，要不是廖胡子上来，连谷埠街也要被打光。谁攻打谁？再不反抗我们就被蚕食殆尽。不过没必要顶替他，威信不够，给你当个助手还是挺合适的。还有个插曲，联战一位支队长“老扁”是个独生子，他父亲亲自找我要求帮助动员他儿子离开，眼泪都禁不住了，可怜话说了几箩筐。直至我保证跟他儿子下死命令让他离开柳州，老人家才感激不尽地回去。谁知我见到他儿子还没说正题，这位同学先发话了：“我老头子找你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休想让我离开弟兄们，要不然，你先当逃兵我再逃。我们选你当头头是信任你，要是罗索别的你趁早滚蛋！”此事遂作罢，不过他爹也没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

5月20日晚上，我到林场“工机联”总部开会。我虽然只是中学生的头头，却是这个总部始终担任“三人核心”的惟一一个，在整个柳铁以及柳州市，也是“五人指挥小组”之一，算是说话算数的一个。会上派出去查证的人报告说，在柳州站停了几天的车厢上，装的是绿色的箱子、有军人押运所以没法看仔细。与会者对于是否是军火争论了一番，最后决定管它是不是军火，先拉回来再说。不必问，我至少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个。经过几天不停地争论，总算有了行动计划，由王反修、李振岭两位组织策划。别看平时激昂的人多，到20日夜晚决定实施之时，却没谁愿意亲自参加行动了。弄了半天，自报奋勇的只有三个人，还都属于无证上岗：司炉小韦去机务段开车头，工务段的小杨负责扳道岔，车站的小李负责摘钩挂上那几节车皮。挂上后直接拉到冷冻厂，那里是我们的地盘，有铁路专用线和站台，王反修和老桂坐镇指挥。各种传说都不实，甚至1983年中央工作组调查结论说“动员数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了八节车皮”也不实，只有三个人干这件事。这个消息也通知了柳州造反大军指挥部，只不过让他们组织人力来搬军火。

21日凌晨，第一次拉到冷冻厂3个车皮是炮弹，押车的军官说你们要来也没用，后面那几节车皮是子弹，要抢还不如抢那些。于是王反修喊他们原车皮送回，火车头第二次开到地方几分钟就把八节子弹车皮拉走了，就连押运子弹车的军人也以为是正常调车行动。就那么三个人，把八节车皮顺利地拉进我们学校旁边的冷冻厂，这个厂只有

一个工人参加“联指”组织，早跑了。负责押运的军官跟等候在那里的王反修交涉，那军官说这些子弹是要运到凤凰仓库的，让王给他打收条，否则他没法交差。王反修他们知道子弹是运到凤凰仓库的也就放心许多，还在讨论抢不抢时就有担心怕是援越物资，那样吃罪不起。不过，当时谁也没想过，凤凰距离柳州不过40来公里，怎么停在柳州车站那么多天呢？王按军官的要求写了收条，签名时脑子一转悠就签了“李向阳”三个字。大家见全是子弹却没有枪，多少有些失望。车皮一直拉到列车停在专用线站台上，负责具体实施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桂报告了王反修，王又找来李振岭，然后找我。商量怎么办？我问车上是什么？老桂说全部是子弹，没有枪；共11800箱，1700万发56－1式子弹。老桂说，只有两个车皮还没动，其他的都卸得差不多了。看场面也不觉得奇怪，汽车、拖拉机、人力车、自行车都在装运子弹，男女老少川流不息，特别是那些避难的难民们，比谁都积极。我马上叫停止搬运。看见有老俩口正吃力地企图运走两箱子弹，就劝他们别搬了。他们死活不肯，那老头还教训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

我抱怨王反修没有头脑，怎么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抢起来了？有组织地把武装人员派一些，每个车皮卸掉一批，我们就足够用的了。把八个车皮再送回去，政治上要主动得多。老桂反问道：送回去？联指抢去怎么办？我笑道：我还怕他们不抢呢！只要他们一抢，这个罪名就有人跟我们分担了！其实“联指”的武器有军区在明抢暗送，极可能根本不需要。老桂听明白了，连忙解释说：我给造反大军白鉴平打电话，没想到他们怎么就这么快就来这么多人。听我说“中央一个来电我们就彻底完蛋”，王反修也急了，赶紧问现在怎么办？我吩咐老桂，立即关闭冷冻厂大门，严禁再有子弹运走。然后组织人员把没运走的子弹都装回车皮里，动员大军和工机联各组织，交回子弹，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上交子弹的活动，一定要造成声势。先把还没动的两个车皮送回去，算是第一批上交。

“工机联”总部指挥李振岭到底是转业军人、工人，操着他那一口河南乡音吼道：“交，交个屌！都交了不是就白抢了吗？”老桂说他：“李军长，你放心。现在你就是下命令：不交就枪毙！恐怕连三分之一也交不上来。”王反修接口说：“十分之一也别想。”李振岭恍然大悟，一拳砸在大腿上：“嘿！俺这个脑瓜就咋这笨？刘世清！来，传我的命令，马上发告示，彻底上交！一颗子弹也不许留，违者马上开除！快去！”刘世清立即跑走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立即拉回去的两车皮子弹被堵在半道上，人家不让你交哩！而且，那些进凤凰仓库的子弹都变成“援越物资”了，这在当年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我心里也有些提心吊胆，弄不好中央文革马上就会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组织，那就一了百了。直到王反修找了军管会，好像是曹参谋长点了头，才算拉走上交了。接着，我们到处拉标语、横幅，设了好几处上交站，零零星星不断有上交的故事。这批子弹其实没啥用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合用的枪，我们管兵工造手榴弹的“老太婆”开始研究如何利用里边的火药。但它的威慑力量极大，流言蜚语说八节车厢里装着新式武器。我们的广播站也大喊大叫，把流言蜚语变成严正警告，称谁敢上门武斗必须“自带棺材”。

我们甚至在半夜里弄个炸药包在空汽油桶里炸响，然后高音喇叭叫唤称成功地掌握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

22日夜晚，廖伟然带领造反大军几个武斗指挥员，来到铁路文化宫总部。因为副手辞职不干，我自己去了。我们挤在电影放映机房开会，部署攻打探矿厂、粮食加工厂的作战计划。根本不需要解释，拿下这两个地方，市里和铁路就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生存的惟一途径。这个会上只布置各个队伍负责进攻的方位，这时我才注意到，还有博白县造反大军的人。他们坚决要求负责主攻方向，称其人马都在博白的经历过韦国清的屠杀，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复员军人，还有好几个在部队都是特等射手。唯独需要补充几条枪。廖伟然显然很支持，但那时想调枪谈何容易！任何人只要有枪，宁可上战场战死也不肯借枪出来的。说了半天也没用，廖胡子干脆发了脾气，让每一支柳州市的武装队伍，各调一支枪出来。于是李振岭主动宣布借两支枪给他们。总算解决了问题。我偷偷问博白造反大军的那个头，为什么跑到柳州来？他叙说了博白被围剿的情况，坚定地说是部队参加围剿的，“我们看见解放军，都不敢打，他们却进攻上来。有的人就向部队的人投降了，结果他们把我们投降的人交给联指，让联指来杀！”说着流下眼泪来。他又告诉我，他的全家都被杀光了，自己是靠玉林铁路工机联的人帮助逃到柳州的，回去肯定死路一条，只有和你们一起拼了。后来，他们果然成为攻打探矿厂的尖刀。

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打援”，虽然探矿厂已经打死了我们的两个兄弟，莫兆明和张立纬。但为了避免铁路与地方的混杂，廖胡子坚决不让铁路的队伍参与直接进攻。何况，我们联战总共只有五、六支枪，惟一可以得意的是我们有一挺“白管加拿大”轻机枪，是从桂林师院“老多”那里要回来的，只是那枝枪没多少子弹，连试一下枪都没舍得。

散会后我就立即回去调动队伍，定于凌晨六点开始进攻。我回到学校，把所有枪支都调动出来，自己带领上了阵。在铁路医院的宿舍“长大楼”屋顶，不知为什么，眼看就要到点时，我忽然觉得发抖，双手抖得特别厉害，心都快要跳出胸膛了。真正的作战对于我还是头一次，说不害怕绝对是假的。未几，一发白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枪声顿时如炒豆般响起。说也怪，枪声一响我也不发抖了。探矿厂很早以前属于劳改单位，围墙既高又坚固，我处的位置正与之在十字路口的对角，两条路上的情况都看得清楚。它北面是粮食加工厂，也是联指的武斗据点。所以没什么动静。它的西面马路则热闹非凡。我看见连续三个人冲过马路送炸药包，结果连一个人通过的洞也没炸开。而围墙高处却有几个枪眼开始还击，枪声绝对是AK47发出来的，他们的枪确实棒。但看来博白造反大军的家伙没有吹牛，几乎每一个点射就打哑一个枪眼，确实好枪法。

在粮食加工厂这边，同样是西边马路，正在我的脚下不远，柳州市那个被称为“狗牯队”（柳州地方话，意为“混混”）的“青年近卫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进去了，不多会儿便在三仓办公楼顶上烧起一堆火，这表示已经占领。接着我们看见有一群人影利用横列着穿过马路的沙包掩护，逃向探矿厂。我们的枪响了，子弹却不知落在什么地方，那群人逃进了探矿厂。再过一会，一发红色信号弹在粮食加工厂升起，尽管枪声很激烈，四周的欢呼声依旧很清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表示粮食加工厂已经被全部攻下来了。这时，从粮食加工厂方向也发动了

对探矿厂的进攻，从火力强度看，造反大军缴获不少，因为他们原来连轻机枪都没有。

我的同班同学“扣鳃”把着那挺“白管”喊我，我顺着他的手看去，也许被“狗牯队”的胜利激励，“红总”和博白造反大军的已经抢先冲进探矿厂大门，那座围墙始终没能炸开。而在更南边马路上，至少有二、三十号人从探矿厂侧面出来逃往二级站方向，也即南边。“扣鳃”问我打不打？无论距离还是角度，都是最佳射击时机。我犹豫了几秒钟，命令道：“算了，让他们逃吧！”寻思着武斗毕竟算不上战争，只要把对方吓跑也就算胜利了，不必那样你死我活。何况，我们还需时时惦记着运动结束后的清算，尽量别打死人总是好事。当时在场的人有抱怨我心慈手软的，但到9月份工宣队、军宣队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刑，一心要从联战抓出几个“杀人犯”以法办却始终未能如愿。

整个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探矿厂连同粮食加工厂，号称“联指”的“钢刀”，据说是攻不下的堡垒，被我们拿下来了。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连成一片，两个多月来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忧心一扫而光，那种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廖胡子的威望顿时高起来了，他文革中并无什么动静，直到“造反大军”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才自报奋勇跳出来当总指挥。这一个漂亮仗打下来，权威变得极大，柳州市任何捣蛋分子调皮，只要说是廖胡子叫的，马上乖乖服从，决不敢造次。

五十五军的曹参谋长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劝阻我们，千万不要进攻探矿厂。除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外，说那个地方确实非常易守难攻，凭我们的实力不可能打下来。据文化宫我们广播站的同学说，打起来那天晚上，她们陪着曹参谋长到文化宫楼顶看那边打仗，他脸色非常难看，一直说你们真不听话，吃过两次败仗也不接受教训。结果战斗结束后他离开时留下一句：要是在部队，你们确实是好料子。最后，我们挨整前夕，孙副军长、曹副参谋长都被关起来了，曹后来自杀了。其实他充其量不过同情我们而已，从未给我们出过什么主意，我们都听说过他当年解放海南岛时是“渡海先锋营”营长，因为弟兄们死得太多，一怒之下毙了几个俘虏，于是遭处分，一直没当过主官。没想到竟然没逃过文革这道坎。

高兴没两天，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站岗的曹大个跑来报告：学校外边马路上，过去了几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背的枪都是铁把冲锋枪，不像解放军那种木把56式，会不会是“联指”假冒的？我跳下床，跟着他跑步到校门口，果然见雾霭中有一个连左右的军人，正向学校西边高坡菜地开去。没多大会儿拉开成散兵线，挖起战壕来了。脑子里顿时涌上各地部队配合联指剿杀“422”和造反大军的故事来。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我接着跑回校内，一边通知大家赶紧行动把枪支收藏好，子弹是收缴不完的，关键是为数不多的那几支枪一定不能被缴了去。一边用自己架设的电话与机务段、文化宫等地联系，却联系不上。看来似乎不只是对付我们铁一中的。

我又回到校门口，那时我们学校附近的厂子如红星农械厂也住满了来自柳北及一些县份的难民。外边已经有不少难民在观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女老少都有。我向部队那边走过去，毛利和几个同学不放心，也跟着我过

去，到竹鹅溪那座桥头就被看上去是个连、营级干部的人阻止，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挖战壕？为何不准前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学校四周都有部队，而且工事的朝向是对付我们的。结果他除了警告我不能靠近桥，他们执行紧急军事任务之外，啥也不说。我只好退后。而此时天已经放亮，周围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但看上去这些部队指挥官显然没有预料我们学校及周边居然住着如此之多的难民，有些手足无措。

回到学校被告知，说机务段也被武装部队包围了，其他地方尚不知情况如何。工机联总部所在的林场离我们学校不过几百米，恰好正在散兵线背后。但道路已经被禁止通行，已经过不去了。那时我们的地盘上，任何学校、厂房之类房屋都成了难民营，路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起来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有点低能：一早来到就挖战壕，既然武装围剿却不进入学校；而且根本不与任何人联系或发出警告；等到人群众多了才禁止交通；没有任何有目标的行动却在激怒老百姓。我敏感地嗅到一种阴谋的气味，但看这架势也无能为力。渐渐地，感觉这局面不妙，难民与军人辩论已经初具规模，矛盾正在尖锐化。我不宜留在此地，直觉告诉我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说煽动什么的，即使我一言不发也没用。于是交代毛利，我回我房间的天花板上睡觉，武斗开始时那上面就做了些工事，还有简陋的床位，告诉他不许告诉任何人，有紧急情况你自己来叫我。便溜之乎也。

《年表》记录如下：“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反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P92）临近中午时分我被毛利叫下来，他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里的一支铁把冲锋枪。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严重冲突，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事情的经过，除了少数几个战士出力护枪之外，多数人不出力的。他们把枪横着挂在胸前，摇晃着语录本念念有词，任由你把枪拿走。甚至还有当兵的说：“我入伍前是湘江风雷的，枪你拿去，爱惜些啊！”不少女生都抢到枪了，她们都上缴或者送给说好话的男生了，还有至少两位难民也交上来所获之枪支。后来关押中审问此事，专案组愣是不肯相信我躲在天花板上睡觉，彻底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不过，经过内查外调，确实如此。

大家兴奋至极也不奇怪，那么多子弹正愁没枪哩！有传言说开了：“毛主席刚送来子弹，林副主席就送来枪，真不愧是接班人啊！”这回，所有支队都有枪械了，大家都很威风。但我心里更担忧了，抢子弹的事还没完，又抢枪了，真不知中央会怎样收拾我们。转念一想，只能听天由命了，无论中央怎么办，总比让韦国清收拾我们强。部队既然撤了，总部的电话也通了，我赶到林场总部所在地，没几个人，都在眉飞色舞地讲述抢到枪的事情，这才知道我们所有据点都被包围了，也都经历了与我们学校差不多的过程。

我觉得，当我们刚取得一次进攻胜利后，部队就直接出动“强行收缴”。而在数月之被进攻中，即使南宁、柳

州“联指”抢了万余枝枪及大批弹药，军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采取强行收缴之类行动。我们在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我们。还不止如此，《年表》记录如下：“27日　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P92）明明是“联指”发动进攻，区革筹、军区却告“422”的状，并埋下“大武斗”之伏笔。就在5月24日，梧州军分区副政委付亨通、副司令李钱荣等亲自策划，除驻梧州部队、民兵之外并调钟山县人武部长李崑带领武装民兵联合攻打“422”占优势的平桂矿务局，此战直至7月7日方结束，14日召开“庆功祝捷大会”，一切都是明火执仗地进行，肆无忌惮。而中央“处遗”时的资料则记述了此战之血腥：大肆杀戮中，留德归来的矿务局总工、全国人大代表亦被杀害，“联指”割下他的头，用铁丝穿了双耳，挂在其夫人胸前游街示众。

广西“422”至少从1968年2月起，面临着的是广西的官方、军方、民兵组织以及“联指”的联合武装围剿与杀戮；而这些显然得到中央和广州军区的支持。广西的做法，也许正是一种实验，是举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先声。黄永胜至少是知情而且支持的。在三月时他升任总参谋长，而莫名其妙地杨、余、傅忽然被说成我们的后台。须知当初“联指”用来对抗周恩来“824”讲话的，正是“余立金讲话”。并且，配合着广西的屠杀，康生接二连三宣布《今日的“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有黑后台。在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学生写的时，他直接叫唤：“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然后把支持“422”的省级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接着把谢王岗、袁家柯宣布成“国民党特务”；甚至连柳州铁路局书记张炎也被逮捕，说他操纵一派，也就是操纵我们。其实张炎自1967年冬天就躲到北方避难去了，压根儿没有任何言论或行动。何况，即使他想指挥我们也没可能性，那时，我们狂傲得就像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目空一切，根本不可能听任何人的。

过去我们只是根据现象判断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操纵联指武装消灭我们，而且直接把农村的基干民兵武装起来参加联指组织，直接进入县城消灭各县的“422”或造反大军组织。拿下探矿厂似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联指”。于是我们在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我们的文字证据。白鉴平似乎对这些证据重视不够，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中央肯定获得了这些文字材料，其实谁都知道中央还有众多耳目隐身蹲在广西，他们不会白吃饭必然密报广西情况，韦国清也提醒联指注意这些人，他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毫无反应。我始终坚持认为，以韦国清的为人，他根本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去对抗中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上边包括中央任何一个机构都了解的，他们默认这些行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上报材料，而是要立即把它们公布于众，印成报纸广为散发，“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留下点东西，不至于将来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分歧，白鉴平又掌握着这些难得的资料，他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这个意见基本没被理会。

后来统计了一下，我们联战共获得四十多支枪。更重要的是，整个造反大军、工机联得枪数百，有了子弹再有枪，对“联指”的震慑作用无可比拟。加上“联指”自己并不明智的夸大，拼命广播、宣传说被抢了几千支枪，更使得他们自己恐慌不已。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许多地方农民都说，那时武装部叫基干民兵去围剿柳州的造反大军，听说柳州造反大军抢得了很多武器，还有飞机大炮，结果大家都不敢去。

在决定攻打探矿厂的时候，就确定打下探矿厂以后接着进攻探矿厂后面的二级站等联指据点。现在有了枪，这个主张更成了上下一致的强烈要求。26日，在探矿厂由白鉴平、廖伟然主持作战会议，我去参加了，决定当晚开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红星农械厂，廖伟然亲自指挥。我们负责攻打红星农械厂隔壁的医药站仓库，我回到学校，几个支队都要求参战。我考虑了一下，只需要一个支队便可以了，其他支队作预备队。于是“袁猴”和“余修”率领的一支队坚决不肯预备，宣布说，“张大”是我们支队长，就是给这个医药站的冷枪打死的，报仇的责任只能一支队完成。别的支队便没话说。

夜里八点，战斗准时打响。我看了天气，满天星斗，万里无云，暗自高兴，只要不下雨就不会死人。打探矿厂就是好天气，我们今天看来应该顺利。枪声一直没停，间或还有爆炸声。因为近，大约九点多，我按事先的约定走到农械厂，见廖胡子正在手摇电话机上吼叫。没多久，叫唤完了。我问情况如何？他说还不坏，隔壁的院子已经基本拿下，正向纵深发展。

聊了一会，忽然一声巨响似乎就在身边，接着旁边一棵锄把粗的苦楝树“巴嘎”一声断掉了，我本能地举双手护住头。廖胡子笑道：“要是打中你，连爆炸声你都享受不到。现在蒙头太晚了！”我看他连动都没动一下，不由得十分敬佩。农械厂的于老三闻讯跑来，打着手电找到那个弹坑，离我们不过两三米远。廖胡子一看，骂道：“妈的，他们不用抢，‘八二’迫击炮都有了。好彩打在这个坡底下，要是歪一点打到坡上头，我们两个都报销了。”

不断有消息传回来，也有人回来请示廖胡子。我最关心一支队的情况，回来的人却称根本不知道。来来回回都靠翻围墙，倒是在医药站仓库的围墙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可以让人进出。我继续等待消息，却毫无动静。后来在探矿厂后面的战斗地点发生了一些问题，廖胡子被车接走了。又过了一会，一个人翻围墙过来，却踩响了我们自己埋设的土地雷，一声爆炸，那人倒在地上，接着又爬起来。我听见涌上前的几个人中，于老三喊道：“袁猴！”我连忙冲过去，扶着他问：“怎么样？”他说道：“他妈的，什么破烂货，炸得老子腿痛死了。”守候在另一边的几个医生、护士跑上来，几乎是硬拖，把他拖到医疗站。我把于老三骂了个狗血喷头，明知道要从这里发起攻击，却不把地雷排除。于老三大喊冤枉，下午已经排除而且清查过的，怎么会漏掉一个？到战地医疗站，医生告诉我说没事，筋骨都没有伤，只是小腿肌肉被弹片啃了一口，已经打过破伤风针了。我知他无大碍，便讥笑道：“猴子也有肌肉？”他歪在椅子上让护士包扎，也反唇相讥道：“猴子是你老祖宗，没有肌肉你就只有鸭肉了。”

细问之后，才知道，一支队的弟兄们已经打过外贸仓库去了。完全占领，根本没人守卫，所以没有伤亡。现在正在清理战场，休息待命。马路东边也被红总占领，一切顺利。我看看表，差不多午夜一点了，于是叫“毛利”打电话给廖胡子。没想到廖胡子破口大骂：“占领了外贸仓库，为什么不打红色信号弹？差点自相残杀！”我转身责问“袁猴”，他才说，信号枪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我只得给廖胡子连解释带赔礼道歉。最后，他命令说，今天到此结束，休息并安排好岗哨，明天继续进攻二级站。我愣了一下追问：白天？他说天一亮就打，趁热打铁！我说与其明天白天打不如现在接着干，我担心大白天伤亡肯定不小。廖胡子根本不容我多说，干脆利索地命令道：“我是总指挥，明天天亮开打。”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沉思不语。“袁猴”一边喝绿豆粥，一边说着作战情况，眉飞色舞的。原来我们进攻了许久，居然只是几个进城农民在守卫这两个据点，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尼龙袜、塑料凉鞋。市里“红总”把他们都收拾了，我们根本没捞着真打。放那些枪和手榴弹响，都是自己给自己壮胆的。第二天中午，我亲自率队进攻时，看见两具用竹席盖着的尸首，掀开一看果然是这身打扮。原来两个据点总共只有十几个进城的武装基干民兵，除这两个阵亡的，其余都逃跑了。

没多久，“少奇同志”下来请示，支队长“余修”问怎么办？我告诉他，“袁猴”有伤，回学校休息，其他人就地休息，注意派好岗哨。明早二支队上来接防。由于和我们一起进攻的还有柳州市“柳江风雷”，他们全部是初中生， 67年9月6日凌晨，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被埋伏的县武装部干部打死15人，几乎全军覆没。却不料因此参加的人反而竟多了，以后就成为市内初级中学联合的学生组织，据说他们还不收高中生。因为15个死难者里有我们联战的方天行，而且全部埋葬在我们学校，于是这支队伍很愿意和我们一起活动。我告诉“少奇同志”，跟“余修”说一声，照顾一下“柳江风雷”的人，无论如何他们只是初中生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支队不肯下来，于是二、五两个支队没法上去。二支队其实是我们的兵工厂，厂长就是“老太婆”。他们1967年8月武斗期间就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手榴弹和子弹，这次抢得子弹却没有枪，于是他们与柳州机车车辆厂合作，正在研制我们自己的冲锋枪。没想到“525”那天他们也弄到几枝冲锋枪，于是对于从来没有资格上战场提出异议。我已经答应他们和搞后勤的五支队凑合起来接一支队，攻打二级站的，现在一支队在前方不肯撤下来，他们就要求参加进去。我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全都挤在那么一小块地方作战，坚决不批准，他们只好不断来请战。天亮时“袁猴”上去督促一支队撤下来的，结果他成了“肉包子打狗”也坚持在前线了。

直到近中午时分，我跟廖胡子通电话，他已经知道二级站相当难啃，马路比较开阔，那边围墙又很坚固，始终炸不开口子。打算暂时停止攻击，以避免伤亡。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二级站里发射的迫击炮已经有好几发落在我们学校里，我们还没有这等武器。于是我从农械厂摇电话，告诉“袁猴” 攻击已经停止了，把一支队撤下，我带二支队上去接替警戒。他争了一会，终于服从了。我把二、五两个支队一共12支枪带上去，接替了一支队。柳州市也把“柳江风雷”替换了，是另一支杂牌军顶替，其中还有几个扛鸟枪的，真正是指望“鸟枪换炮”的一伙。

他们知道二级站里驻守着“联指”的精锐部队，比较难打，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的武器精良，都指望缴获几支好枪，最好是那些迫击炮。因为我们没有重武器，而“联指”连四管高射机枪都有许多挺。

到前边，隔着马路，“袁猴”给我讲解了对面的情况。那里的片石围墙非常坚固，我们冲过去放了几次炸药包，只炸开一个小口子。我观察一下，发现那个小洞顶多只能钻过去一个人，而且还非常勉强。惟独感觉安慰的是，我们没有人受伤。据说那小洞是“柳江风雷”送上去的炸药包炸出来的，送炸药包的回来时中了一枪，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过了没多久，柳州市过来一位领队的，说他们决定不理廖胡子的命令，自己先干。我表示怀疑，他自称是侦察兵转业的，看情况对方可能正在撤退，再不进攻就让对方逃跑了。二支队带来好几发我们自己研制的枪榴弹，于是打了过去，在那边院子里爆炸之后并无反应。柳州市的那位仁兄，说话间已经派出一名爆破手，冲过马路，把炸药包塞进已经炸开了的那个洞里，接着沿围墙跑开躲起来，显得很有经验。爆炸之后，那个洞变成一个豁口。趁着烟尘未散，我喊了一声“冲！”就带头冲过马路。到豁口旁边，二支队的“老油子”不知啥时居然抢到我前边去了，喊了一声：“我先过！”就钻进去了。我跟在他身后进去，一座座仓库静悄悄的，我意识到：对方真的跑了。“老油子”不理任何事，对着任何可疑的地方就开枪，跟进来的其他人也照样办理。我马上布置分开成几个小组，搜索前进。

整个二级站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柳州市那位仁兄一边发射红色信号弹，一边骂廖胡子笨蛋，害得他们白忙一场。那几位指望“鸟枪换炮”的，更是抱怨不已。未几，“雄头”他们过来，要求继续追击，冲过东站那边去。我叫他和“老油子”一起先侦察一下情况，大中午的，万一有埋伏就惨了。他们应声去了。没走多远，跑出来几位家庭妇女，手舞足蹈地大喊：“他们都逃跑了！联匪都逃跑了！往鱼峰山那边跑了。”我一听，立即告诉那位仁兄：“你快报告廖胡子，另外，你们的人留在这里打扫战场，我们先追过去。”

我们追到东站旁边，迎上来一群老老小小，抬着米饭、菜肴，还有开水。一位老太太，硬往我手里塞咸蛋。他们七嘴八舌地诉说苦情，我也没听清他们到底说些什么，但那种箪食壶浆的场景至今难忘。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跟这些人周旋，继续追击到东站大门口一带，我恐怕孤军深入，下令停止追击。其实什么也没得追，不过自己跑，人家逃跑得更快罢了。廖胡子看来在我们报告之前就得到报告，柳州市那边也出击过来了。“红总”比我们稍微神气一些，绘声绘色地告诉说：他们在拿下五金仓库之后，什么对手也没遇到，却不想“联指工交兵团”的送饭车来了，有红烧肉、青菜、豆腐、米饭等，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一个劲地招呼吃饭。于是他们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还不敢贸然吃，于是命令俘虏先吃然后再自己享用。可我们饥肠辘辘，直羡慕他们的运气。

在正对鱼峰山的鱼峰大道上，我们领教了“联指”架设在山顶上的机枪“问候”。于是柳州市“红总”决定扑过去，直接攻打鱼峰山。我通知我们的人回学校填肚子。但对方显然清楚，孤立的鱼峰山是无法守得住的，只要包

围不用进攻，必成瓮中之鳖。于是还没有等攻击发生，他们就撤了。红总和造反大军的队伍一路向东追击过去，这样我们虽然失去了全部柳州江北地区，但在柳南却把铁路与地方连成一片，最重要的是，我们控制了粮食、肉类、生产物资的储备地区。双方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如果没有农民进城这个因素，我们其实还占优势。

问题接着来了，在铁路这边联指控制了铁路医院，连同技术馆。另外还有小鹅山，不断打冷枪。有一个小插曲：铁路“联指”有一个武斗干将，名叫陈德威，抓人打人十分狠毒，因此我们这边的人们都恨之入骨。有一天他被机务段我们的人抓住了，同样遭到毒打。我知道时他已经遍体鳞伤。于是下令接管，由九支队派人把他弄到我们学校。我看他伤得不轻，亲自带领九支队几个弟兄武装护送，去请著名的跌打专家苏医师。没想到回校路上遭到“联指”伏击，对打了一通“联指”的人撤退了。虽然无伤亡，但却把苏医师吓得不轻。特别是当他到达学校，知道是为陈德威医治时，气得一塌糊涂，坚决不干。我费了老半天劲才说服他，给陈诊断、下药。陈并没有伤及筋骨，见他被关的地方没有蚊帐，我又做了安排。整个联战在文革中是不准打人的，据说还是有人犯纪，但毕竟不严重。这也使后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感到不可思议。后来陈逃跑了，回到“联指”那边反而被说成叛徒，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成了逍遥派。

直属铁道部的柳州铁路机车车辆工厂一片地方成立了第三指挥所，他们自己决断自己行动在5月26日夜晚攻下了小鹅山。另外还有马鞍山，联指控制这座柳州市的最高山，架设了高射机枪，不断向我们的地方扫射。不时听见有行人被击中甚至击毙的事情。受到威胁最大的还是柳州造反大军，他们的居民集中区谷埠街一带，直接被马鞍山上以及柳江对面的“覃连芳大楼”上打过来的机关炮威胁。于是柳州造反大军与铁路工机联总部联合决定，拔除技术馆及铁路医院、马鞍山两处据点。使柳铁地区与“钢联指”以竹鹅溪为界，柳州市与联指以柳江河为界，对峙到中央解决问题为止。

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柳州军分区5月29日在柳北的柳州饭店召开地区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王司令员下令：“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动手。”郭政委作总结，会议决定“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大刮十二级台风”。此次会议散会后，各县革委会主任或待成立的准主任，组织各县民兵开进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在各自县份，则滥杀“五类分子”及本地“造反大军”群众，后来中央工作组统计，被杀害者达7659人。我们更不知道，当天中央文革同意韦国清等领导人赴京汇报，讨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五月三十一日夜，柳州市负责进攻铁路医院，据侦察，医院里驻扎着由各地联指调来的复员军人为主的最精锐部队，武器配备也极好。技术馆驻扎着名义上是我们学校“东方红公社”的学生，我们清楚，他们不但人少，而且都是些只会听话的角色，主要的还是外边的武斗人员。会议是我参加的，联战负责正面主攻技术馆，铁路上其他队伍从侧面攻击。我安排驻守文化宫的一支队把我们仅有的一挺马克辛水冷重机枪布置在文化宫楼顶，压制技术馆和

铁路医院的火力；其余的人马与九支队、五支队一起按计划摸进技术馆与铁路医院之间的铁路第五小学。两支队伍都由我带领。

要攻打技术馆的事在我们的队伍里属于公开的秘密。人人都盼望参加这次作战，最典型的数汤姓两兄弟，我们叫他们为“大、小冰棍”，我亲自找他们做工作，大意是俩只能上一个，万一两个都报销了，你们汤家就绝后了。没料到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绝了活该，你要不给我上阵，我就先嘣了你！”结果是安排他们一支队驻守文化宫，随时待命。

半夜，眼看快要打响时，我又开始发抖，而且越抖越厉害。脑子里非常矛盾。万一死人，我是否对得起这些弟兄以及他们的父母？可是如果我们束手待毙，死的人就会更多！广西各地已经发生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明白，必须拼死一搏，才会有那么一线生机。也才会有如此热烈的要求参战的事情。不由得想起“老扁”的父亲恳求我的样子，现在他们就要主攻技术馆，心中的滋味实在难以言谕。

一发信号弹升起，首先是医院东边响起激烈的枪声。我立即感觉不妙，因为战前布置是分头摸进去，以偷袭方式解决问题的，这枪声说明原来的布置已经失效了。而我们的五、九两个支队正摸到铁五小，万一暴露，他们将被两面夹击，而且在低洼处。我赶紧摇电话，九支队的副支队长“闯将”接的，他告诉我两个支队分别在球场两边的教室里，整个铁五小没有一个人，现在五支队也上来了，占领了靠近医院的那栋办公室。三拨人马被一个足球场分割成三块，非常不妙。我告诉“闯将”，交代大家都不要暴露，我亲自上去。“闯将”一听就急了，叫我千万别上来，不然失去与其他部分的联络和指挥，更糟糕。

我处的位置与他们所在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米，但只有一个不足一米宽的土埂连接，两边都是很深的水塘。这道土埂又被医院以及联指占领的铁路局大院两边火力控制，来往很危险。我觉得上去确实用处不大，这时与总指挥部间电话通了，我急忙问医院东边是怎么回事？留守指挥部的王某告诉说，红总的队伍刚摸到医院旁边的木材加工厂，与“联指”的队伍遭遇了。看来他们正打算摸过来进攻粮食加工厂，于是交上火了。估计技术馆那边未必知道我们的计划，但最糟糕的是从竹鹅溪旁边摸过技术馆西边的那支队伍没有联系，他们的电话还没架设好。而摸往技术馆斜对面的机务段的队伍，也还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同时到达，对技术馆的进攻就没法开始，但拖延对我们显然不利。

我脑子里马上涌出来两个方案，一是我们自己马上进攻技术馆，拿下技术馆也就切断了医院以及进攻木材加工厂的联指队伍的退路。但我们的队伍总共不到三十人，未必吃得下技术馆；二是把人马撤下来，对技术馆进行火力攻击，使对方恐惧然后肯定会撤退原来打算进攻的队伍，甚至把医院、技术馆也撤了。第二方案如果凑效，是最理想的结果，至少不会牺牲人员。

还没等我拿定主意，电话响了，拿起来一听，是机务段的队伍，他们已经摸进了铁五小旁边的局长宿舍院里，

照例是空无一人。我顿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联指不乏军队转业干部，甚至很可能还有现役干部，怎么在鼻子底下就如此大意，连一个岗哨都没有？会不会是个圈套？如果是，那我们已经被装进去了。特别是铁五小，他们一进攻完全可以把我们打得狼狈不堪。想到此，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摇电话，打算通知“闯将”他们立即炸开围墙，转移到地势高一些的局长宿舍院子里去，与机务段的队伍合并。但电话不知何故已经摇不通了。

其实什么都晚了，技术馆和医院那边枪声响成一片，不时夹杂着迫击炮弹的爆炸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通往铁五小的土埂已经被机枪扫射所封锁。从电话里得知，“红总”的人曾经攻进医院，但又被打出来了。不知何时，“闯将”已经被人带到我身边，浑身湿淋淋的。我叫他先换衣服，他却说没时间。接着把冲锋枪推到背后，告诉我，现在铁五小内我们的人已经被火力压制，除了东边还可以对医院射击以外，其他人都只能躲在教室的角落里，只是不用担心，什么伤亡都没有，联指也不能攻过来，因为那个球场太开阔了。

然后我们上到二楼，最东边的山墙早就打开一个大洞，只是医院常打冷枪过来，所以用一张八仙桌挡上了。他把八仙桌拉开一半，我们俩从洞口看下去，他指着现场告诉我情况。忽然两声枪响，一听就知道是苏式步骑枪打的，“闯将”头上戴着的铁路大盖帽被打飞了，我的头上洒满了灰沙。我们身后的墙上有两个弹孔，看上去是两支枪同时发射的。“闯将”骂了一声，接着说真他妈的好枪法，两百米开外还这么准！

我摇电话叫文化宫楼顶上的马克辛重机枪压制住医院的火力，他们说根本看不见火力点在哪儿，只能压制技术馆的。这时天已经大亮，“闯将”又要回铁五小，我叫他千万叫大家都不要急，“联指”肯定不敢攻过来，轮流监视就行了，一定不要动。又关心他怎么过这个土埂，他回答，没什么，注意点就是了。我从二楼北面厕所窗户看下去，只见他三拐两拐，都是两边打不到的地方，然后下塘，举着枪沿土埂游泳到中间那个涵洞钻过去，继续利用土埂掩护，平安到达对面。

没多久，局长宿舍那边老任来电话，说那里的二楼已经被炸塌了，不光有迫击炮弹，还有定向炸药包。他们已经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我只能让他们死顶，注意不让对方偷袭，一定要守住，不然铁五小就很惨。带队的任树德答应了，并保证一定守住。这仗越打越窝囊，枪弹、炮弹都落到我所在的前沿指挥部。而肖联保率领的队伍至今没有联系上。

接到通知，我从前沿指挥部赶到文化宫总指挥部开会，竹鹅溪对面的枪弹扫得我几乎无法离开。不知是否发现有人要过去，溪那边枪打得更勤了，我根本无法通过两栋楼之间的空地。“毛利”赶紧会同两个女将，拖了一挺轻机枪到楼房西头掩护，这时我忽然发现五六只鸭子，它们竟然站成一行，躲在一棵大树后边。聪明的小精灵，居然知道那枪是从哪边打来的。听见“毛利”他们的机枪响了，对方显然被吸引，乘此机会，我飞快跑过危险地带，到了文化宫。

会议在电影放映室进行。王某报告了肖联保那队人马的情况，他们按时摸到技术馆后边，因为电话线没有拉上，无法报告情况，于是隐蔽在民居里。直到天快亮才派一个人回来报告，而王某接到报告居然没有告诉我这个前沿指挥！我把他好一顿骂，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居然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柳州市那边更糟糕，“红总”市三中部队八个人躲在一个大坑里，没料到一发迫击炮炮弹恰好落在坑中间，全部阵亡。“青年近卫军”两名战士，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双方都没有能力进攻，整个战势成胶着状态。我始终最担心铁五小内我们的弟兄，他们始终被压制在低洼的地方，幸好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我暗自寻思，只要不下雨，我们大约不会有伤亡的。

廖胡子看来很伤心，三中部队阵亡的几个人，全都是他的能干部下，却意外地死于盲炮。他暴躁地命令他老婆，也是部队转业的上尉军官，立即回去亲自把那一箱四零火箭弹搬上来，一定要轰掉医院那个堡垒。拔掉这个钉子，医院就可拿下来了。最后商定，只要医院攻下来，立即全面发起攻击，端掉技术馆。

回到前沿指挥部，已经下午。“毛利”告诉我，机务段的林某在指挥部北面趴着，过不来。竹鹅溪那边的火力太强。林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进机务段当了火车司炉。我到楼房北边厕所窗口一看，他趴在一棵脸盆粗的大叶桉树旁，离房屋只有三米多远。但竹鹅溪对面显然已经发现他了，枪弹不断落在附近。我一看情况就知道这小子窝囊，不然这三米距离无论如何都可以冲过来的，现在趴在那里反而不利。

过去摇电话，责问任树德为什么让他跑回来？任开始不说，后来才答复是他自己被炸怕了，坚决要撤退的。我于是交代“毛利”，设法把那间厕所窗台下部打开，弄一些东西遮挡，然后把他救回来。如果不行，就弄一包合适的炸药，炸一个洞。“毛利”答应了。我便离开到指挥部的房子里，电话询问医院那边的情况。

没多久“毛利”来报告，说林被打死了。“毛利”说，他看来吓傻了，喊他不要动，他总要抬起头来催我们快点。叫他不要抬头他还要抬，结果给竹鹅溪那边一枪打中脑袋，完蛋了。我跟着过去一看，那个脑袋已经缺了半边。战场往往如此，缺乏冷静的代价是生命。但是，这样的武斗又是为了什么？

“闯将”又从铁五小跑回来，衣服照样湿淋淋的。这身衣服已经湿了两次了。我连忙问那边的情况，他告诉我，五支队趁着还没爆炸就把联指发射的一个定向炸药包扔到围墙脚下，结果把围墙炸垮了一个豁口。于是跟局长宿舍打通了，他们可以来往两边，情况好多了。其他弟兄们一切安好，联指不敢进攻的，我们在两边卡住球场，他们过不来。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任树德没告诉我这个情况？他笑了，他们在最西边那栋楼里，根本过不来，哪里会知道这边的情况？

再问一下，他说，弟兄们一天没有东西吃了，就是饿，要是有吃的还有水，那么再守两天也没问题。说话间女将“跛子”端了一碗刚煮好的面条来，他立即接过来狼吞虎咽。再过一会，“毛利”和另一个女将拿来一个塑料袋

的包子，还有几个行军壶的开水，准备给他带回去。“毛利”坚决要跟他去，两位女将也要求跟去。“闯将”说，你们不会游泳，去不了。最后，“毛利”跟去了。枪声骤响，子弹打在水面和土埂上，看见“闯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由想起林某。战场确实有许多奇妙的东西。

柳州市那边看来很不顺。医院那座堡垒，其实就是大门上边突出部的房间。下边是空的门厅。它三边空旷，可以封锁我们所有进攻路线。廖胡子的老婆冒着生命危险把四零火箭筒送到前边，没想到只有两发底火。“红总”的业余水平发射了两发，全都歪到一边去了，那座堡垒依然封锁着他们的前进路线。“闯将”要求我们不理会柳州市那边，自己发动进攻，打进医院后边的家属区，切断守在医院的“联指”退路，然后逼他们投降。我没有同意。因为这只是武斗，不是正规的战争，熬过最艰难的阶段，他们必定会先眨眼，接着会后撤。只要别死人就阿弥陀佛，没必要把他们往死里打。

下午四点多，文化宫来人告诉我，副手说我已经打了一天一夜，叫我下去休息，他来接替指挥。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并非别的，只在于他终于明白过来了。眼瞧着此地必是相持状态，于是我回到文化宫，开上那部嘎斯69回学校去了。当然跟他说些鼓励的话。谁知到傍晚时分传来消息，说我们已经攻占技术馆了！我马上跳上车，带着副手，还有后勤的几名女将，管后勤的老龙从来没让人担心过，装着他准备好的烧肉、米饭、菜汤，车子塞得满满的，发动起来就出发了。

自从我们攻占二级站以后，这才发现“联指”为什么一直盘踞这些地方作为据点。这一片地方有医药、外贸、石油、机械等许多仓库，各种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烟草、白糖、酒类、药材、土特产等。九支队马上弄回来两部苏联产“乌拉尔－2”边三轮摩托车；后勤的老龙他们则发现了白糖、酒、牡丹香烟；机务段那帮人用人参煮面条，结果太难吃便倒掉了，被住在机务段的老人连汤带面一起刮干净；任树德还弄了个犀牛角刻图章。这股砸抢风直到我下令老龙率领六支队查封各仓库才止住。后来市内红总的人发现水池里有几条出口香港的娃娃鱼，每一条都有几十公分。开始不知道是啥，吓了一跳，经难民中有人指点，弄到食堂加菜吃掉了。

到文化宫时，见到“余修”。他并不很高兴地对我说，有点怪，我们从局长宿舍摸过去，没有任何动静。一直摸到技术馆，空无一人，他们全部自己撤走了。还有，竹鹅溪那边也撤走了，整个铁路局大院全都空了。是住在那边的居民来报告的。我们派人过去，真的全撤走光了，“袁猴”他们还在搜索，叫我回来跟你报告一声。我立即上二楼工机联总部，老桂守在那里，也报告了同样情况，并补充说，“钢联指”全部撤到柳北去了，现在用车皮把柳江铁路大桥给堵死了。

我立即判断，肯定是广西军区有指示给他们的，目的是以中断铁路运输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军区会向中央报告，说是我们中断铁路运输的。于是老桂开始紧张，我叫他赶紧派人把王反修、李振岭找来，并立即通知白鉴平、廖伟然，马上召开联席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老桂马上照办了。认真回想起来，这个傍晚是我在整个文革中头脑最

清醒的时刻。大约晚上七点，在探矿厂造反大军总部，紧急会议召开了。白鉴平开始打官腔，首先庆祝胜利。我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胜利，如果硬打，我们未必打得过人家。现在他们主动撤退是个阴谋，目的是给我们栽赃！我们必须弄清楚详细情况，现在就必须确定紧急措施、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占领再多地盘也没用，中央一旦下个文件，我们肯定完蛋，预期的“求生存”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按照目前中央废黜老造反派的趋势，这种情况很可能马上发生。

白鉴平反驳我说，没理由凭想象散布悲观情绪，中央是不会抛弃老造反派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听信军区的报告。王反修、老桂则支持我的意见。争论还比较激烈。廖胡子后来发言，他说我的意见有道理，即使没有那么悲观，即使中央还继续支持我们，我们总得有相应的措施，总不能听凭军区谎报军情。从作战情况看，联指根本不是战败，继续打下去我们未必能打赢。他们突然全部撤退到柳北，里面绝对有阴谋。他说完之后，逐渐地多数意见站了过来。白鉴平说：你也不能光讲形势，有什么高见说出来我们听听。

我要求立即以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严正指出“钢联指”主动撤退柳北并中断铁路交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第二，马上组织武装纠察队，维护社会治安。对于任何私人住宅，无论观点属于哪一派的，都不许抄家、抢劫财物。任何组织未经总部批准，不得自行强占铁路局的任何单位。否则武装纠察队将予以严惩；第三，立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恢复柳南所有厂矿的生产。铁路由工机联负责，今晚就组织通车工作，柳北通不了就通南宁、贵阳，客、货运输都开通；第四，立即通过柳铁军管会向联指发出呼吁，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如果“钢联指”的人愿意返回柳南恢复铁路运输，热烈欢迎，保障人身安全决不伤害任何人。第五，马上组织恢复商业单位的供应工作，建立粮食供应系统，保障粮油供应，实现柳南地区社会稳定。

这些意见马上被通过了，接着散会，分头去落实。

我们回到文化宫，接着又开工机联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各单位分部全部回驻本单位，恢复本单位的正常生产，保护本单位的所有公、私财产，特别是撤退到柳北的“钢联指”人员的住宅；机务段、车辆段等原来住有地方难民的，要尽快动员他们搬出去，现在地盘大了，可以住进二级站、学校等有空房子的地方去，力争全部撤离铁路单位；马上由老桂组织运输系统人员，建立通车指挥部，尽快恢复通车，越快越好。王反修负责与铁路局军管会联系，经过他们呼吁“钢联指”人员返回，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

柳州铁路分局“工总”在老桂的率领下，马上开始了恢复铁路运输的工作。柳铁军管会在曹参谋长的亲自关照下，给通车以全力支持。尽管有生命危险，火车司机、列车乘务人员踊跃报名要求出乘，机务、车务、工务、电务、车辆、调度等部门也全力投入工作，很快我们就开出第一列旅客列车，往湛江、南宁方向。往贵阳方向的旅客列车也准备开通。

但我们显然斗不过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第一趟列车还没开到黎塘，就被他们命令“联指”以武装民兵的名义

截住了，他们用枕木拦住轨道，还插着毛主席画像。我们的所有人员，包括随车的军管会人员、柳州分局“工总”负责人都被扣留。接着，往贵阳去的列车开车仅行进了一个区间，就被“洛满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民兵拦截了，他们自称奉广西军区、革筹的命令，要搜查武器，防止外流。尽管搜查结果并没有任何武器，也不准列车再开动一步！

最后，广西军区与革筹干脆于6月12日发出通告：“哨卡是在县革委会人武部统一领导下，由民兵对不明身份的来往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明确命令各地农民可以拦截火车以防武器外流。而当时的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截车船，破坏交通运输”的。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必须加在我们头上！

6月13日，中央关于恢复柳州地区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通知下达了。那个通知含糊其辞地指责破坏铁路运输，并要求立即恢复。这意味着，这个屎盆子已经在我们头上悬着，随时都会扣下来。我们当时流传一句话：中央文件无效，要等注解出来才有效。指的就是这一点：广西军区命令设立的哨卡堵着铁轨，“联指”的列车压在柳江铁路桥上，在军管会的协调下，代号为“45号”的援越物资列车一来，铁桥两边都会撤除障碍，那些列车确实畅行无阻。我曾经对曹参谋长说：既然“45号”列车能畅通，别的车也应该能通。他不置可否，只说试试看吧。其实，真要恢复通车，只需给广西军区一个死命令就全解决了，犯不着下达这个不着边际的“紧急通知”。

6月17日，周恩来为首，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我们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这是令任何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理解的。

我们还不到二十岁就亲身体会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含义！

同一天，鹿寨县（1958年燃放了共和国最大“卫星”、日产钢铁二十万吨而名扬世界）武装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张春峰，亲自率领上千武装民兵进攻柳州市。而在前一天，象州县革委会发表对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严正声明”。虽然早就有农民武装进入柳州市协助联指围剿造反大军，但都是偷偷摸摸的，从来不敢公开承认。现在则已经赤膊上阵了。廖胡子不愧是从人民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面对鹿寨县的队伍打过来他在窑埠布阵迎击，结果张春峰等１４人被击毙。那支鹿寨民兵队伍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一下便镇住了其他各县的民兵队伍，他们人心惶惶，再也不敢冒犯柳州了。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各地，才得知那些农民们传说得更玄，廖胡子变成妖魔鬼怪，武装部给补助也拉不起队伍来。后来发生的南宁、桂林、梧州等市的大屠杀，唯独在柳州没有发生。这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天知道是巧合还是计划，6月18日联指发动了反攻。东边的攻势因为前一天鹿寨民兵的土崩瓦解而变得风平浪静；南边的象州发表“严正声明”之后也无动静；北边有柳江阻隔，攻不了；只有西边由柳州市、柳铁以及南宁等地来的“志愿军”攻得厉害。而这边恰是我们铁路地区。他们占领了铁路木材防腐厂之后，也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立即在这个方向布置了防线。

副手恢复了昔日的活力，重新担负了联战的指挥责任。我则更多地参与柳州市和柳铁的联合指挥部工作，忙活了一阵通车白劳之后，我的心更多地操在如何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局面之上。我经常寻个空子到“丘八”和“老头子”那里去聊天，大家都很关心形势，而且他们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有更多的思考。“老头子”在反对倒旗协议时期与几乎整个联战意见相左，许多人甚至要求我批准开除他。我拒绝考虑。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意见，除了证明自己怯懦之外，还表示我们没有真理。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错了，我们就应该坦荡荡地服输。另一方面，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证明他是一个想问题的人，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而“丘八”则是我的盟友。早在文革前，因为他是先天性色盲，理工科大学不准报考，所以他初中便开始钻研文史哲。我虽然以几何与物理见长，但也不乏文史方面的兴趣，更何况我管着图书馆的事务，我们便经常讨论、争论。现在我跟他们两个经常分别进行讨论，只是对文革的看法。我们一致的意见是，文革肯定搞错了，在我后来被批斗的“恶毒攻击”言论里就有“文革上不了史册”，这是我们几个的共识。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中央现在正在开始清算造反派，毛需要为文革的正确寻找替罪羊；“丘八”同意我的一半意见，但对“找替罪羊”仍不敢确定；“老头子”则把文革的一切荒唐都归罪于江青，更隐蔽一些的，还有林彪。他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便没有那么多隐蔽，直接告诉我和其他一些同学：“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

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还有，我必须考虑如何争取更好的处境。在总部的会议上，我不只一次提出必须搞好宣传舆论，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使我们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还可以把真实散布于群众之中，以后总会有人记得。白鉴平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从来没行动。1967年他在北京住了大半年，有一些“通天”的渠道，把我们缴获的许多文字，军区布置武斗的文字材料全都用于“告御状”去了。每一次告诫，换来的都只是相信他有办法的承诺。我知道他的上告肯定能告到至少中央文革那里，但中央文革其实不过是毛主席的办事组，他老人家已经决定扑灭我们了，你还指望什么？在一次会议上，我发怒了，指着白的鼻子吼道：“白老眯，我告诉你，中央只会在造反派中选择个别人来代表这个势力，做个样子。其他的都在打击之列。但愿能选到你！”

不过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我在联战中同样是一言九鼎的，于是布置所有能写的人才，交代任务。我们有自己的报纸，还有印刷厂。同学们早就能够自己选字、排版、印刷，我要求写一系列文章，充分揭露事实真相。“丘八”高度评价我的决定，并决定执笔写文章。可惜他尚未写成，便阵亡了，实在是我最伤心的事情之一。“老头子”没有上战场，他执笔写了两篇文章，还有别的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李TZ，竟然报来一篇出色的文章，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老三届中学生，写的文章成为1968年9月《广西日报》批判的七篇“大毒草”中之六篇！这六篇的

题目是：《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向何方》、《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必须全盘否定广西资产阶级派委会》、《二论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广西军区必须改组》。我自己亲自执笔写的《砸派的骄傲》没有入选。

话题还回到武斗上来。

6月19日防腐厂武斗有升级的趋势，我们联战布防到从铁路木材厂到铁路拘留所一线，足有好几公里。为了了解前线实际情况，我驾驶“乌拉尔”边三轮摩托车前往。到文化宫时，驻守在技术馆的一支队见“毛利”不在我身边，不放心，“袁猴”派“大冰棍”跟我随身护卫，他挎着伞兵枪，挺神气地跨进边斗。车行至防腐厂公路，我忽然发现急弯处端头路边高坡上有一座地堡，枪眼正对着我们。猛地觉得不妙，几乎没有思索，马上转90度弯冲下公路。地堡里的枪声几乎同时响了，听声音我就知道那是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的扫射。摩托车冲到路底下豆角地里，这里是死角，机枪打不到，它也不响了。机枪手看来是个老手，但不知他为何迟了一点，倘若早几秒钟，我俩死定了。

停下车，发现车斗有枪眼，再看“大冰棍”的外衣上有两个枪眼。我问他受伤没有，这小子说：“我这么瘦，子弹找不着我的。”车没坏，人没伤，实属万幸。“大冰棍”不解：“妈的，不是说这一片全都被我们占领了，怎么乱打枪？”我想可能情况有误，也许我们走错了地方。我把车发动起来，机枪马上又响了。接着听见路对面机枪也响了，这枪声是我们那挺“加拿大白管”，看来是在掩护我们。

我告诉“大冰棍”，注意点，那个地堡肯定是“联指”的，我们命大，没被它敲掉。必须冲出去，你得抓紧把手。我看准了一处斜坡，肯定冲得上去，危险只在冲上路面以后那几秒钟，只要冲过路对面，那个地堡就打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到达对面大楼。发动，加油，机枪骤密。连续加油减油，离合器捏死，车并不动。终于听见枪声突然停止，我知道他们的弹匣空了，马上松开离合，车子猛然加速冲上公路。几乎没看见路面又冲下对面路坡，这里是他们打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车子也陷在烂泥里，原来这边是一条大沟。于是弃车步行，钻过豆角地便走到我们占领的大楼旁边。这是我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大楼是五支队和二支队占据着。拿枪的人员多数都在前沿阵地，这里都是些后勤、医务人员。大家都还在议论刚才那一幕，“袁医土”（她自称已经达到医士水平，于是得了这个外号）几乎带着哭音诉说他们焦急的心情，但招呼我们却听不见。我问那挺白管机枪在哪儿？他们告诉说在楼顶。过了一会儿，副手被人叫来了，一见面就责怪我们不该上来，“大冰棍”就抱怨他没有说清楚情况。我制止他们的争执后，了解了战况和布防情况，他带我去看了一件“新式武器”。

那是一个氧气瓶，里边填满了TNT炸药。他告诉说这是联指发射过来的“炮弹”。我不由得有点惊讶。我们把灭火器壳填上炸药当炮弹，把氧气瓶割掉底当炮筒，发射定向炸药。没料到联指竟然把氧气瓶当炮弹了。“大嘴”说这样的炮弹一共发射了五六枚，一枚命中旁边那栋楼，炸垮了一角，这一枚没有爆炸，说着轻轻踢了两脚。

已经把雷管拆了，因为我们并不很缺炸药，缴获非常多，所以没有急着把炸药弄出来。

20日有郊区菜农前来报告情况，说“联指”在防腐厂里开进许多各地来的武装人员，据说都是战场老手，大多数是复员军人。自从张春峰等被击毙，鹿寨的武斗团被打垮之后，消息震慑了其他县份的农民，虽然有十几个县的农民进城，但人数已经不很多，只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些转业、复员军人，不少“特等射手”之类“大比武”时代的尖子。而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逃亡来的县份造反大军成员，最典型的就数博白造反大军那十来位，其中有一个还是广州军区“大比武”的优秀射手。于是双方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21日傍晚，我在学校。老龙率领后勤人员给前边送饭，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西瓜，装了一筐。临出发，看见我和“丘八”在一起，老龙呼唤我们同往，我没表态，“丘八”却非常积极，说从未上过战场，去见识见识。我忽然发现李湘在汽车上，知道他俩暗恋着，就咬着他耳朵：怕是要找机会陪李湘吧？又对老龙喊，为什么要去那么多人？还都是些女将？老龙说，让她们去开开眼界，不然总是说我们重男轻女。九支队队长“闯将”开车，另一个支队长“老扁”还在前方。说笑间汽车开走了。

天黑下来时，电话里传来消息，前边交上火了，联指开始进攻。我跑去一问，送饭的汽车还没回来。接着开始下雨，我觉得情况有点令人担心。于是带上“毛利”，开车去文化宫总指挥部。到地方见到老桂，他向我汇报情况：设在铁路局党校的前线指挥部有王某指挥，王反修、李振岭到造反大军总部开会去了。看样子今天晚上联指有进攻的苗头，正在你们联战布防的防腐厂一线。柳州市那边，听说张公岭一带也有动静。

目前最激烈的进攻地点恰是我们防卫的区域，我叫“毛利”接通技术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余修”。问了情况之后，告诉他并叫他通知猿猴，我在文化宫总指挥部，有情况就马上报告过来。技术馆在柳江边，必须严加防范。“余修”答应了。再接着局党校来电话，王某告诉说，前边有一阵枪声，像是在铁路局木材厂方向。电话摇不通，情况不明。我叫他立即派人过去，一定要弄清楚。然后自己摇木材厂那边的电话，确实不通。心情一下子就坏下来，天在下雨，我的队伍在最前方，枪声都在木材厂那边，正是我们的防区，忧心忡忡是必然的。

没过多久，技术馆那边“袁猴”打来电话，一支队布在江边的岗哨发现有一条汽船，正沿着南岸缓行，看样子有登陆的企图。他请示该怎么办？我马上告诉他，把一支队拉几支枪到江边，所有枪都打它一梭子弹，让它明白这里有准备。否则他们在这里登陆就在我们战线的后腰捅了一刀！“袁猴”有点担忧，如果打枪就暴露了目标，而很长的一段防线只有一支队十几支枪，可能顶不住。我告诉他，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他们既然只有一条船，肯定装不了许多人。我们枪一响他们就必然会逃。相反，如果不开枪，他们很可能以为无防守而登陆，那样就必须硬打了。“袁猴”明白了，立即带队奔江边去了。后来打来电话，说那船是装甲的，子弹打上去当当响。还报告说，船果然往上游方向逃跑了。

我立即紧张起来，因为上游铁路桥边有地方519护桥部队的一个营房，这支部队铁杆支持联指，他们有可能利用军队营房作掩护，在营房下边登陆，接着可以从技术馆背后打过来，或者直接扑向党校前沿指挥部背后。甚至就这样切断我们前沿队伍的退路。于是马上摇电话到党校，命令王某立即组织一支队伍，从党校背后直插江边，见船就打，保住这一带不设防地区。他答应了，并马上行动。这时发现分局公安分处老金、老刘两位四野老兵到了指挥部，他们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我于是松了一口气。

可人算不如天算，我摇电话到铁路桥头阵地，六支队守在那里。最近江对面联指用四管高射机关炮朝我们乱扫，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机关炮，似乎还有打不完的子弹。这种机关炮威力极大，隔着近一公里的开阔江面还能把技术馆两层三七砖墙都打穿。六支队防地距离最近，被打得也最多。无奈，我把我们最威风的马克辛重机枪调给六支队，安装在江边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废碉堡里，让它跟江对岸的两挺机关炮对话。但我和六支队都忽视了一件事：他们阵地背后，仅隔着一股铁道，对面便是那个519护桥部队的营房。

再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首先是联指已经占领了磨滩村，而那里正是我们联战的前沿阵地；然后便是找不到总指挥；接着便是铁路木材厂通讯中断。最要命的消息是王某打来的电话：说联指有两条大船在铁路桥头登陆，上来了七、八百人。没等他说完，我就在电话里骂开了。那个地方是极平缓的卵石滩，就是一个人划的小船也靠不了岸的，几百人的大船根本开不过去！我命令他必须马上派人实地查看，不要胡乱猜想。

却不料一问才知道，开始我叫他派一支队伍到党校背后的江边去，他根本没有执行！理由是总部调司机学校的延安联战过来，他们至今没到，派出去党校就没队伍防卫了。这使我恼火万分，这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居然如此不负责任！“毛利”在旁边听见我发火，自报奋勇地要求从技术馆后边小桥抄近路兜过去看看。他一说倒提醒了我，马上摇电话到技术馆。接电话的是“余修”。我问清楚这边无动静之后，叫他让“袁猴”马上带一支队五、六个弟兄马上抄近路搜索江边，重点在党校后面的空白地带。并明确地说了我的担心：如果党校被偷袭，我们前方所有弟兄的退路都被切断了。

“余修”立即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说了句：找“袁猴”来不及了，我自己带队上！便挂了电话。我很感动，有这样的支队长，事情一定能办好。可是马上就接到王某的电话，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联指占领了水电段桥头阵地，马上进攻党校，要求撤退。我暴跳如雷，对着电话吼道：“王立和，你要撤出党校我就毙了你！”老金他们也结果电话跟他讲不能撤的道理，谁知电话挂上了，再摇便没人接听。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桥头阵地也摇不通电话，严重的局面使我烦躁，如果桥头阵地失守，不知道六支队弟兄们伤亡如何？更严重的是，它完全卡断了前方木材厂、磨滩村等阵地的退路，好几十人将面临可怕的境遇。我在屋里抽着烟、转着圈，“毛利”正按我的要求不停地摇党校电话，始终没人接听，看来王某真的逃跑了。这个混蛋！

忽然“毛利”喊我，电话有人接了。我急忙接过耳机，说话时才知道是同学唐立行。他率领“小辫子”等两三

个女生，专门负责拉电话线的。问过才知道，他们刚从前沿撤退下来，党校空无一人！唐说，就他妈的跟国民党逃跑去台湾似的，一塌糊涂。再一问，知道前边更惨，桥头确实失守了，六支队伤亡只知道“曹大个”伤得很重，听说“杨克思”和“方块”都死了。前边木材厂失踪了好几个，“丘八”、李能、李湘、“糖醋”；副手也下落不明。唐还支支吾吾地说：你老弟也失踪了。我打断他，问他有枪没有？他回答说只有一支冲锋枪。我叫他马上安排“小辫子”她们，分别守候在二楼四个角，他本人拿枪来回巡视，千万顶住，我马上带队伍过来。

我挂上电话，交代老桂负责守在总指挥部，老金协助他。我立即奔党校。老桂是个很负责的机关干部，做事也很有条不紊。从我到达文化宫总指挥部开始，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守候在旁，不停地按照我的吩咐四出联系。见我要离开，他也想跟着到党校去。所有的消息都说明，那是个极危险的地方，老桂也非常担心。但只有文化宫才可以与四面八方联系，这里是中枢，不可能没有人驻守。我告诉他，我从党校直接与他联系，这里只有靠他传递消息。

我要带的队伍此刻却没有，老桂希望我停留一下，司机学校和第三指挥所的队伍快要来到了，带着队伍上去会安全许多。不过形势明摆着，必须马上把党校控制住，这是成败的关键。于是告诉老桂，任何队伍到达就直接命令往党校开，不能迟延。出了文化宫大门才看见雨非常大，该死的老天！嘎斯69已经被九支队开上前线，至今未归，我跨上边三轮摩托，“毛利”坐进边斗里就出发了。

到达党校之前就不断遇见前线溃退下来的人群，我一路吆喝所有带枪的都跟我回党校去，没停车也没减速地开过去，不久便到达党校。唐立行还不错，已经纠集了好几条枪留在这里了。我一到达马上叫“毛利”带领他们出党校大门，守候在路上，把前线退下来的所有带枪的都截住，让他们进党校来集中。凡是不听命令的，人可以放走，枪必须缴下来。接着摇通文化宫电话，告诉老桂，本人已经平安到达，目前已经纠合了七八条枪了，还在截败兵，估计可以顶住。

没多久，“小龙”进来。我赶紧问前方的情况，他带着哭腔告诉说大多数人还守在印刷厂一带，退路已经没有了。前边乱成一团，关键是指挥没了，副手下落不明。我打住他的说话，因为“毛利”看来有点成效，进入党校的武装逐渐多起来，说这些丧气话于士气不利。我让大家排队，居然还凑了十几条枪。告诉大家目前的情况很严重，但我相信“联指”同样害怕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俩人对眼睛，谁先眨眼谁就输。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前面还有几十位战友，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救出来，下场会如何，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正说着，六支队支队长“大宋”喘吁吁跑来，手里挥舞着一支冲锋枪。原来他知道桥头阵地失守以后，纠集“杨克思”等三四个人，摸回桥头，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了。原来“杨克思”还健在，碉堡里的重机枪也在，连子弹都没少。这消息使大家振奋。我马上命令所有人都归“大宋”指挥，立即赶回桥头阵地去。

他们走了一会儿，首先是司机学校延安联战两个小队的武装到达，老桂叫他们来的。领头的请求分配任务，我叫“小龙”马上带领他们赶过印刷厂去，与我们的人汇合后，逐步向铁路木材厂反攻，能到哪儿就夺到哪儿。“小

龙”迫不及待领着他们前往，我赶紧招呼道：“让‘闯将’ 总负责，禄山和‘老扁’配合。”这三个家伙平时就玩得来，“闯将”在攻打技术馆时就证明了他的勇敢、镇定和机智。我想，早要是任命他指挥作战，今天绝对不可能成这个局面。顺便补充一句，我们每个武装支队都有两个支队长，都是支队公认而形成的，为的是更方便，还有，万一战死一个，另一个可以继续指挥。

然后唐跑来报告，“袁猴”来电话。我接后他告诉我，“余修”他们搜索的结果，那片地方没有“联指”武装。当地菜农报告说，“联指”只有一条汽船在519部队守桥营房处登陆，上来十几个人，从营房那边直接到桥头那边去了。我直后悔自己大意，没有对营房加以防备，现在果然是从那里攻打了六支队的屁股，其实应该说是拦腰一击，六支队还有一半人跟“大宋”驻守水电段。“袁猴”接着要求分兵过来支援，我告诉他不必来，但必须分兵驻守党校背后，防止“联指”武装回头扑过党校来。

再就是老桂来电话，王反修在机务段把装甲列车搞好了，打算开出来助阵。我告诉他，可以开到磨滩村以北，我们的人正在收复木材厂和磨滩村。老桂建议只收复到木材厂算了，磨滩村以及防腐厂、一线队等的收复待总部重新研究作战方案以后。否则恐怕会打乱仗。他的意见显然是有道理的，再一问，是金常琨、刘道义两位四野老兵建议的，那就更不必说了。只因为我们还有“丘八”等下落不明，我仍然坚持打进磨摊村去。

这些败阵下来的溃兵很快就组织成为反攻的力量，按照部署开上各自的攻击地段。但接着又传来不好的消息，这消息是老龙带来的：他们到桥头六支队的阵地送饭时，听说木材厂那边失利了，而且技术馆也遭到攻击，联指有两条大船正准备在桥头阵地登陆。我打断他，谁告诉这个消息的？他说是方块接王某的电话后说的。我立即感觉这个抗美援朝时立功的老兵其实是个脓包！王反修安排他作为党校前沿指挥部的指挥是今晚失利的第一罪魁，而他自己逃跑后至今不知下落。我后悔开始时过分重视文化宫总指挥部了，我一开始就应该到党校来，因为前边的电话线都只拉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单线转文化宫。其实只要再拉一条技术馆到党校的电话线，线路不过千米，总指挥部完全应该设于此地。这有我自己的决策责任。

老龙继续说，知道形势紧张之后，他们全部后勤人员都留在桥头阵地协助防守，但注意力都集中到柳江江面上去了。没料到联指从守桥部队营房里打过来，正打击着桥头阵地的后方。副支队长杨首先被炸，他躺在铁轨边装死，联指从他身边攻过来，曹大个接着被手榴弹炸伤；糖醋冲过去救护，我看很危险，叫她别过去。她不听，硬是冲过去了。联指上来几个人，把她抓走了。老龙十分伤心：“我看着他们把她拉扯走的，上了柳江铁桥。她拼命挣扎拼命喊，我本来可以开枪扫射，那几个家伙一个也跑不了。我怕打着糖醋，怎么也扣不了扳机。她就在我眼皮底下给抓走了！”说着就流下眼泪。我责骂道：“你他妈的真窝囊！宁可打死她也不能让他们把她抓走啊！”老龙忽然对着我吼起来：“我他妈的下不了手！”

我们都知道“联指”是如何对待女俘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会把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地凌辱。而且被“联指”俘

虏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特别是我们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五月下旬，南宁铁中两个老初三的女生与我的小学同学常刘弟一起来柳州，企图向我们求援一些武器。结果在柳州火车站被联指认出来抓走了，其中一个是我在南宁铁中同学的妹妹王惠平。这女孩十分漂亮，她妈妈从南宁跑来，几乎成天以泪洗面。我找军管会曹参谋长帮助救援他们三个，一直没有结果。六一那天傍晚，联指主动撤退，我们在火车站前面联指放弃的空大楼里发现了常刘弟的尸体，他赤裸着身子被反绑着双手，心脏部位有一个枪眼。后来另一个刘姓女孩跑回来了，她对我哭诉了那几天的遭遇：赤裸着被强迫跳舞、跑步，那些联指的武斗人员不时来凌辱一番。六一那天是柳州分局军管会一个军官乘乱把她救出来的，给她一套衣服叫她赶紧跑，这才得以逃生的。更让我担心的是，她与王惠平已经分开几天了，不知道王的下落。

我下令到处寻找，一定要找到，哪怕是一具尸体。但始终没有找到，活不见人，死没见尸。大约在六月十三四号，军管会来人通知，王惠平被释放了，但伤很重，要我们在铁桥头做好医护接人的准备。我马上通知医院，准备好一切可能的救护器材和车辆，王惠平的妈妈也亲自到铁桥头接她的女儿。两个解放军战士抬着担架过桥来，陪同的还有两名军官。我们的医生掀开白床单一看，下边是赤裸着奄奄一息的王惠平。这时护送她过来的军官才告诉我们的人，她是今天天刚亮时被一部汽车扔到柳州军分区门口的，当时就一丝不挂。

在救护车上，她睁开眼睛对母亲说了一句："妈，给我报仇。"便咽气了。到林场我们的医院，老太颇去给尸体拍照，我也去了，身上明显的伤并不多，只有乳房上满是伤痕，下身流着十分腥臭的液体。我们安排由一位原公安法医验尸，后来曹参谋长也来了，听完法医的耳语之后，他骂了一声："该死的畜生！"然后对着尸体立正并敬了一个严肃的军礼。王妈妈哭喊着要我替她女儿申冤，我心里十分明白，这冤屈永远难申的了。中央已经不会听我们说任何东西，再冤枉也将石沉大海。

王惠平之死，使我沉思了好几天。他哥哥是我初中高一届同学，因为乒乓球打得好，没毕业就进了自治区体工大队。小惠平是个活泼聪明的女孩，跳舞唱歌都挺出色，我们都觉得她长大了会是一个文艺尖子。我到柳州上高中就没见过她，不过三四年功夫，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结果居然如此悲惨！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对方原本也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许多人还是转业军人。是什么使本来善良的人变成野兽？

我已经想了许久，始终没有想出个道道来。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武宣有人被挖肝吃掉我们已经听说，只是将信将疑。面对王惠平的尸体，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中央文件一再强调严禁"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越斗越厉害。我想，其实老毛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而且乐此不疲！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其实就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个被奉之为经典的阶级斗争学说，本质就是煽动仇恨的邪说，它使一切人的同情心丧失殆尽，并逐渐归于兽性。文革，正是这个理论登峰造极的演示，老毛就是这个邪恶运动的罪魁祸首。

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其手段的卑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利用天真无知的青少年来实现政治斗争的

目标，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奸淫幼女！后来，尽管我的队伍没有任何人打过对方任何人，我们却成了“杀人放火”；而曹参谋长敬那个军礼，后来也成了“挑动武斗”的罪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这是我亲身经历教育我认识的结论，即使成为一堆骨灰，我也不会改变这个认识！

现在我们的糖醋又被抓走了，她甚至比王惠平更漂亮，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当时我真的怨恨老龙没有开枪，如果她又成为第二个王惠平，怎么办？后来有一部电影展现了要击毙即将被日本兵俘虏的女战士的情景，我很理解，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也很清楚我们的任何牺牲都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换取以后更少牺牲而付出的代价罢了，不应该让她受到折磨，更何况开枪或许她只是受伤，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呢？也许我是错的，她后来安全地活着回来了，抓她的是柳铁联指，没我想象的那么野蛮。

没多久，电话传来消息，我们的人推进到木材厂了，没遇到抵抗。我松了口气，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联指”其实只是过来骚扰一下，他们其实并不打算进攻。如果没有硬仗要打，我们付出的牺牲就会减少。我期望这样。于是马上布置守着电话的小辫子：如果木材厂那边电话接通，告诉他们联指已经撤退，大胆地收复磨滩村，找到丘八、李湘他们。拂晓时分，“闯将”打来电话，他们已经控制了磨滩村。占领木材厂时电话没接通，他自作主张进入磨滩村的。没有任何交火，联指撤退了。看来他有点不解气：“他妈的，连一枪都没放！

直到下午，我们只找到了丘八和李湘的尸体，还有李能没有找到。李湘是被柳北打过来的机关炮击中的，丘八为了寻找李湘，硬是不听劝阻冲上去的，连手榴弹也没拿一颗。赤手空拳上去后，显然被联指抓住了，双手被反绑着，一只脚掌被砍掉，然后被枪杀的，那几枪都打在脸上，我们无法辨认他的相貌，只是从衣着、体形上判断是他。这一对恋人，或许相互间还没有来得及表示爱意，便只能到地下去做连理枝了！我不由得想起出发前跟他开的玩笑，也后悔没有阻拦他。我的部下告诉我他们的尸体运回学校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看他一眼。堪称至交的好同学、好朋友，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不过20岁。我们却已经经历了许多老人也未能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接着，老龙来请示如何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冷漠地说：“别开了！就这么埋了吧。”老龙显然不理解，愣着看我。我告诉他：“追悼会一开，一切都交差了，都结束了。我真的不愿意就这么结束。”老龙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情，一言不发地退出去了。后来他们还是开了追悼会，不过形式变了，其实是在校园那块墓地上的葬礼。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用那台“钟声601”磁带录音机反复地播放莫兆明生前自弹自唱的《联合战队之歌》，是他作词作曲，经我修改了歌词的那首歌。一连几个小时，任凭眼泪默默地流，衣襟全都湿透了。

现在，李能在哪里呢？闯将判断是被抓到柳北去了，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相信的事情。闯将告诉我，无论谁喊他，他都会以为是李能回来了。但李能确实没有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联指”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重伤员，抢救上船运回柳北。没想到在江中间时，有人把他认出来了。于是被扔到江里，至今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或任何遗物。当人性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十恶不赦的罪状批判时，残忍是无产阶级必须的斗争精神，老毛说：“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的雷锋叔叔也有言：“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那么，你还能指望文明世界的什么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坷！”在文革中我极度鄙视“联动”，不过却认同他们的一个口号：“活着干，死了算！”当一个又一个与你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朋友接连死去，昨天还在一起活蹦乱跳，今天就成为永远的过去，那份疼痛逐渐变得麻木。我们都不过20岁上下，今天同样年龄的孩子们几乎还都在撒娇。我于是常常惶惑，我们是否承受的太多了！

23日，总部开始策划攻打柳南防腐厂、大修队一带联指盘踞的阵地。包括磨滩村后面那个村庄，记不清叫什么名了。我们联战的弟兄们坚决要求主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自己的死难兄弟姐妹报仇，那种心情只有我丝毫也无。我明白那仇根本报不了，需要的只是赶走这些家伙，巩固我们的地盘，给他们造成恐惧心理，待中央收拾我们的时候，他们没机会施展屠杀的手段。

一支队坚决请战，一伙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青工武装，也要求参加联战的队伍共同主攻。我们终于担负了磨滩阵地的主攻任务，其实就是我的一句话而已。那时我在总部已经一言九鼎的了，连柳州市的廖胡子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余修知道他们属于尖刀班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九支队属于另一路尖刀班，闯将却丝毫没有高兴的迹象。我问他是否有畏难情绪，要不就让二支队、六支队替换？他笑着回答：你要是敢换掉我们，弟兄们马上干掉你！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要是能救回李能就好了。”

25日夜晚，我亲自带队上阵。我在前几天的表现无疑给他们极好的印象，这使我感到极大温暖。还有什么能比弟兄们的信任更鼓舞人的呢？但他们到了铁路水电段就不许我前进了，前线指挥部设在那里。

这一仗打了三天，结果是把联指彻底赶出了柳南，而且我们真的连一个伤员都没有。这也是文革中武斗的最后一仗，后来《七三布告》下达了，联指知道他们胜局已定，不需要再打。我也清楚我们败局已定，只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每一次挣扎的机会。我们的报纸按照我的要求连续发表好几篇文章，为的是要在历史的记载中留下一点真实。

柳州的局面果然如我所期盼，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我们五个头全部在北京被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但留在家的负责人照样组织得很好，坚持先交枪后欢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大家也都明白，这不是为了照顾我们，而是为了照顾铁路畅通。

武斗记事B

（上接A）

高兴没两天，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站岗的曹大个跑来报告：学校外边马路上，过去了几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背的枪都是铁把冲锋枪，不像解放军那种木把56式，会不会是“联指”假冒的？我跳下床，跟着他跑步到校门口，果然见雾霭中有一个连左右的军人，正向学校西边高坡菜地开去。没多大会儿拉开成散兵线，挖起战壕来了。脑子里顿时涌上各地部队配合联指剿杀“422”和造反大军的故事来。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我接着跑回校内，一边通知大家赶紧行动把枪支收藏好，子弹是收缴不完的，关键是为数不多的那几支枪一定不能被缴了去。一边用自己架设的电话与机务段、文化宫等地联系，却联系不上。看来似乎不只是对付我们铁一中的。

我又回到校门口，那时我们学校附近的厂子如红星农械厂也住满了来自柳北及一些县份的难民。外边已经有不少难民在观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女老少都有。我向部队那边走过去，毛利和几个同学不放心，也跟着我过去，到竹鹅溪那座桥头就被看上去是个连、营级干部的人阻止，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挖战壕？为何不准前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学校四周都有部队，而且工事的朝向是对付我们的。结果他除了警告我不能靠近桥，他们执行紧急军事任务之外，啥也不说。我只好退后。而此时天已经放亮，周围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但看上去这些部队指挥官显然没有预料我们学校及周边居然住着如此之多的难民，有些手足无措。

回到学校被告知，说机务段也被武装部队包围了，其他地方尚不知情况如何。工机联总部所在的林场离我们学校不过几百米，恰好正在散兵线背后。但道路已经被禁止通行，已经过不去了。那时我们的地盘上，任何学校、厂房之类房屋都成了难民营，路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起来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有点低能：一早来到就挖战壕，既然武装围剿却不进入学校；而且根本不与任何人联系或发出警告；等到人群众多了才禁止交通；没有任何有目标的行动却在激怒老百姓。我敏感地嗅到一种阴谋的气味，但看这架势也无能为力。渐渐地，感觉这局面不妙，难民与军人辩论已经初具规模，矛盾正在尖锐化。我不宜留在此地，直觉告诉我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说煽动什么的，即使我一言不发也没用。于是交代毛利，我回我房间的天花板上睡觉，武斗开始时那上面就做了些工事，还有简陋的床位，告诉他不许告诉任何人，有紧急情况你自己来叫我。便溜之乎也。

《年表》记录如下："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反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P92）临近中午时分我被毛利叫下来，他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里的一支铁把冲锋枪。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严重冲突，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事情的经过，除了少数几个战士出力护枪之外，多数人不出力的。他们把枪横着挂在胸前，摇晃着语录本念念有词，任由你把枪拿走。甚至还有当兵的说："我入伍前是湘江风雷的，枪你拿去，爱惜些啊！"不少女生都抢到枪了，她们都上缴或者送给说好话的男生了，还有至少两位难民也交上来所获之枪支。后来关押中审问此事，专案组愣是不肯相信我躲在天花板上睡觉，彻底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不过，经过内查外调，确实如此。

大家兴奋至极也不奇怪，那么多子弹正愁没枪哩！有传言说开了："毛主席刚送来子弹，林副主席就送来枪，真不愧是接班人啊！"这回，所有支队都有枪械了，大家都很威风。但我心里更担忧了，抢子弹的事还没完，又抢枪了，真不知中央会怎样收拾我们。转念一想，只能听天由命了，无论中央怎么办，总比让韦国清收拾我们强。部队既然撤了，总部的电话也通了，我赶到林场总部所在地，没几个人，都在眉飞色舞地讲述抢到枪的事情，这才知道我们所有据点都被包围了，也都经历了与我们学校差不多的过程。

我觉得，当我们刚取得一次进攻胜利后，部队就直接出动"强行收缴"。而在数月之被进攻中，即使南宁、柳州"联指"抢了万余枝枪及大批弹药，军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采取强行收缴之类行动。我们在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我们。还不止如此，《年表》记录如下："27日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P92）明明是"联指"发动进攻，区革筹、军区却告"422"的状，并埋下"大武斗"之伏笔。就在5月24日，梧州军分区副政委付亨通、副司令李钱荣等亲自策划，除驻梧州部队、民兵之外并调钟山县人武部长李崑带领武装民兵联合攻打"422"占优势的平桂矿务局，此战直至7月7日方结束，14日召开"庆功祝捷大会"，一切都是明火执仗地进行，肆无忌惮。而中央"处遗"时的资料则记述了此战之血腥：大肆杀戮中，留德归来的矿务局总工、全国人大代表亦被杀害，"联指"割下他的头，用铁丝穿了双耳，挂在其夫人胸前游街示众。

广西"422"至少从1968年2月起，面临着的是广西的官方、军方、民兵组织以及"联指"的联合武装围剿与杀戮；而这些显然得到中央和广州军区的支持。广西的做法，也许正是一种实验，是举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先

声。黄永胜至少是知情而且支持的。在三月时他升任总参谋长，而莫名其妙地杨、余、傅忽然被说成我们的后台。须知当初“联指”用来对抗周恩来“824”讲话的，正是“余立金讲话”。并且，配合着广西的屠杀，康生接二连三宣布《今日的“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有黑后台。在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学生写的时，他直接叫唤：“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然后把支持“422”的省级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接着把谢王岗、袁家柯宣布成“国民党特务”；甚至连柳州铁路局书记张炎也被逮捕，说他操纵一派，也就是操纵我们。其实张炎自1967年冬天就躲到北方避难去了，压根儿没有任何言论或行动。何况，即使他想指挥我们也没可能性，那时，我们狂傲得就像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目空一切，根本不可能听任何人的。

过去我们只是根据现象判断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操纵联指武装消灭我们，而且直接把农村的基干民兵武装起来参加联指组织，直接进入县城消灭各县的“422”或造反大军组织。拿下探矿厂似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联指”。于是我们在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我们的文字证据。白鉴平似乎对这些证据重视不够，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中央肯定获得了这些文字材料，其实谁都知道中央还有众多耳目隐身蹲在广西，他们不会白吃饭必然密报广西情况，韦国清也提醒联指注意这些人，他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毫无反应。我始终坚持认为，以韦国清的为人，他根本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去对抗中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上边包括中央任何一个机构都了解的，他们默认这些行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上报材料，而是要立即把它们公布于众，印成报纸广为散发，“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留下点东西，不至于将来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分歧，白鉴平又掌握着这些难得的资料，他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这个意见基本没被理会。

后来统计了一下，我们联战共获得四十多支枪。更重要的是，整个造反大军、工机联得枪数百，有了子弹再有枪，对“联指”的震慑作用无可比拟。加上“联指”自己并不明智的夸大，拼命广播、宣传说被抢了几千支枪，更使得他们自己恐慌不已。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许多地方农民都说，那时武装部叫基干民兵去围剿柳州的造反大军，听说柳州造反大军抢得了很多武器，还有飞机大炮，结果大家都不敢去。

在决定攻打探矿厂的时候，就确定打下探矿厂以后接着进攻探矿厂后面的二级站等联指据点。现在有了枪，这个主张更成了上下一致的强烈要求。26日，在探矿厂由白鉴平、廖伟然主持作战会议，我去参加了，决定当晚开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红星农械厂，廖伟然亲自指挥。我们负责攻打红星农械厂隔壁的医药站仓库，我回到学校，几个支队都要求参战。我考虑了一下，只需要一个支队便可以了，其他支队作预备队。于是“袁猴”和“余修”率领的一支队坚决不肯预备，宣布说，“张大”是我们支队长，就是给这个医药站的冷枪打死的，报仇的责任只能一支队完成。别的支队便没话说。

夜里八点，战斗准时打响。我看了天气，满天星斗，万里无云，暗自高兴，只要不下雨就不会死人。打探矿厂就是好天气，我们今天看来应该顺利。枪声一直没停，间或还有爆炸声。因为近，大约九点多，我按事先的约定走

到农械厂，见廖胡子正在手摇电话机上吼叫。没多久，叫唤完了。我问情况如何？他说还不坏，隔壁的院子已经基本拿下，正向纵深发展。

聊了一会，忽然一声巨响似乎就在身边，接着旁边一棵锄把粗的苦楝树“巴嘎”一声断掉了，我本能地举双手护住头。廖胡子笑道：“要是打中你，连爆炸声你都享受不到。现在蒙头太晚了！”我看他连动都没动一下，不由得十分敬佩。农械厂的于老三闻讯跑来，打着手电找到那个弹坑，离我们不过两三米远。廖胡子一看，骂道：“妈的，他们不用抢，‘八二’迫击炮都有了。好彩打在这个坡底下，要是歪一点打到坡上头，我们两个都报销了。”不断有消息传回来，也有人回来请示廖胡子。我最关心一支队的情况，回来的人却称根本不知道。来来回回都靠翻围墙，倒是在医药站仓库的围墙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可以让人进出。我继续等待消息，却毫无动静。后来在探矿厂后面的战斗地点发生了一些问题，廖胡子被车接走了。又过了一会，一个人翻围墙过来，却踩响了我们自己埋设的土地雷，一声爆炸，那人倒在地上，接着又爬起来。我听见涌上前的几个人中，于老三喊道：“袁猴！”我连忙冲过去，扶着他问：“怎么样？”他说道：“他妈的，什么破烂货，炸得老子腿痛死了。”守候在另一边的几个医生、护士跑上来，几乎是硬拖，把他拖到医疗站。我把于老三骂了个狗血喷头，明知道要从这里发起攻击，却不把地雷排除。于老三大喊冤枉，下午已经排除而且清查过的，怎么会漏掉一个？到战地医疗站，医生告诉我说没事，筋骨都没有伤，只是小腿肌肉被弹片啃了一口，已经打过破伤风针了。我知他无大碍，便讥笑道：“猴子也有肌肉？”他歪在椅子上让护士包扎，也反唇相讥道：“猴子是你老祖宗，没有肌肉你就只有鸭肉了。”
细问之后，才知道，一支队的弟兄们已经打过外贸仓库去了。完全占领，根本没人守卫，所以没有伤亡。现在正在清理战场，休息待命。马路东边也被红总占领，一切顺利。我看看表，差不多午夜一点了，于是叫“毛利”打电话给廖胡子。没想到廖胡子破口大骂：“占领了外贸仓库，为什么不打红色信号弹？差点自相残杀！”我转身责问“袁猴”，他才说，信号枪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我只得给廖胡子连解释带赔礼道歉。最后，他命令说，今天到此结束，休息并安排好岗哨，明天继续进攻二级站。我愣了一下追问：白天？他说天一亮就打，趁热打铁！我说与其明天白天打不如现在接着干，我担心大白天伤亡肯定不小。廖胡子根本不容我多说，干脆利索地命令道：“我是总指挥，明天天亮开打。”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沉思不语。“袁猴”一边喝绿豆粥，一边说着作战情况，眉飞色舞的。原来我们进攻了许久，居然只是几个进城农民在守卫这两个据点，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尼龙袜、塑料凉鞋。市里“红总”把他们都收拾了，我们根本没捞着真打。放那些枪和手榴弹响，都是自己给自己壮胆的。第二天中午，我亲自率队进攻时，看见两具用竹席盖着的尸首，掀开一看果然是这身打扮。原来两个据点总共只有十几个进城的武装基干民兵，除这两个阵亡的，其余都逃跑了。

没多久，“少奇同志”下来请示，支队长“余修”问怎么办？我告诉他，“袁猴”有伤，回学校休息，其他人

就地休息，注意派好岗哨。明早二支队上来接防。由于和我们一起进攻的还有柳州市“柳江风雷”，他们全部是初中生，67年9月6日凌晨，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被埋伏的县武装部干部打死15人，几乎全军覆没。却不料因此参加的人反而竟多了，以后就成为市内初级中学联合的学生组织，据说他们还不收高中生。因为15个死难者里有我们联战的方天行，而且全部埋葬在我们学校，于是这支队伍很愿意和我们一起活动。我告诉“少奇同志”，跟“余修”说一声，照顾一下“柳江风雷”的人，无论如何他们只是初中生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支队不肯下来，于是二、五两个支队没法上去。二支队其实是我们的兵工厂，厂长就是“老太婆”。他们1967年8月武斗期间就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手榴弹和子弹，这次抢得子弹却没有枪，于是他们与柳州机车车辆厂合作，正在研制我们自己的冲锋枪。没想到“525”那天他们也弄到几枝冲锋枪，于是对于从来没有资格上战场提出异议。我已经答应他们和搞后勤的五支队凑合起来接一支队，攻打二级站的，现在一支队在前方不肯撤下来，他们就要求参加进去。我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全都挤在那么一小块地方作战，坚决不批准，他们只好不断来请战。天亮时“袁猴”上去督促一支队撤下来的，结果他成了“肉包子打狗”也坚持在前线了。

直到近中午时分，我跟廖胡子通电话，他已经知道二级站相当难啃，马路比较开阔，那边围墙又很坚固，始终炸不开口子。打算暂时停止攻击，以避免伤亡。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二级站里发射的迫击炮已经有好几发落在我们学校里，我们还没有这等武器。于是我从农械厂摇电话，告诉“袁猴”攻击已经停止了，把一支队撤下，我带二支队上去接替警戒。他争了一会，终于服从了。我把二、五两个支队一共12支枪带上去，接替了一支队。柳州市也把“柳江风雷”替换了，是另一支杂牌军顶替，其中还有几个扛鸟枪的，真正是指望“鸟枪换炮”的一伙。他们知道二级站里驻守着“联指”的精锐部队，比较难打，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的武器精良，都指望缴获几支好枪，最好是那些迫击炮。因为我们没有重武器，而“联指”连四管高射机枪都有许多挺。

到前边，隔着马路，“袁猴”给我讲解了对面的情况。那里的片石围墙非常坚固，我们冲过去放了几次炸药包，只炸开一个小口子。我观察一下，发现那个小洞顶多只能钻过去一个人，而且还非常勉强。惟独感觉安慰的是，我们没有人受伤。据说那小洞是“柳江风雷”送上去的炸药包炸出来的，送炸药包的回来时中了一枪，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过了没多久，柳州市过来一位领队的，说他们决定不理廖胡子的命令，自己先干。我表示怀疑，他自称是侦察兵转业的，看情况对方可能正在撤退，再不进攻就让对方逃跑了。二支队带来好几发我们自己研制的枪榴弹，于是打了过去，在那边院子里爆炸之后并无反应。柳州市的那位仁兄，说话间已经派出一名爆破手，冲过马路，把炸药包塞进已经炸开了的那个洞里，接着沿围墙跑开躲起来，显得很有经验。爆炸之后，那个洞变成一个豁口。趁着烟尘未散，我喊了一声“冲！”就带头冲过马路。到豁口旁边，二支队的“老油子”不知啥时居然抢到我前边去了，喊了一声：“我先过！”就钻进去了。我跟在他身后进去，一座座仓库静悄悄的，我意识到：对方真的跑了。“老油子”不理任何事，对着任何可疑的地方就开枪，跟进来的其他人也照样办理。我马上布置分开成几个小组，搜索

前进。

整个二级站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柳州市那位仁兄一边发射红色信号弹，一边骂廖胡子笨蛋，害得他们白忙一场。那几位指望“鸟枪换炮”的，更是抱怨不已。未几，“雄头”他们过来，要求继续追击，冲过东站那边去。我叫他和“老油子”一起先侦察一下情况，大中午的，万一有埋伏就惨了。他们应声去了。没走多远，跑出来几位家庭妇女，手舞足蹈地大喊：“他们都逃跑了！联匪都逃跑了！往鱼峰山那边跑了。”我一听，立即告诉那位仁兄：“你快报告廖胡子，另外，你们的人留在这里打扫战场，我们先追过去。”
我们追到东站旁边，迎上来一群老老小小，抬着米饭、菜肴，还有开水。一位老太太，硬往我手里塞咸蛋。他们七嘴八舌地诉说苦情，我也没听清他们到底说些什么，但那种箪食壶浆的场景至今难忘。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跟这些人周旋，继续追击到东站大门口一带，我恐怕孤军深入，下令停止追击。其实什么也没得追，不过自己跑，人家逃跑得更快罢了。廖胡子看来在我们报告之前就得到报告，柳州市那边也出击过来了。“红总”比我们稍微神气一些，绘声绘色地告诉说：他们在拿下五金仓库之后，什么对手也没遇到，却不想“联指工交兵团”的送饭车来了，有红烧肉、青菜、豆腐、米饭等，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一个劲地招呼吃饭。于是他们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还不敢贸然吃，于是命令俘虏先吃然后再自己享用。可我们饥肠辘辘，直羡慕他们的运气。

在正对鱼峰山的鱼峰大道上，我们领教了“联指”架设在山顶上的机枪“问候”。于是柳州市“红总”决定扑过去，直接攻打鱼峰山。我通知我们的人回学校填肚子。但对方显然清楚，孤立的鱼峰山是无法守得住的，只要包围不用进攻，必成瓮中之鳖。于是还没有等攻击发生，他们就撤了。红总和造反大军的队伍一路向东追击过去，这样我们虽然失去了全部柳州江北地区，但在柳南却把铁路与地方连成一片，最重要的是，我们控制了粮食、肉类、生产物资的储备地区。双方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如果没有农民进城这个因素，我们其实还占优势。

问题接着来了，在铁路这边联指控制了铁路医院，连同技术馆。另外还有小鹅山，不断打冷枪。有一个小插曲：铁路“联指”有一个武斗干将，名叫陈德威，抓人打人十分狠毒，因此我们这边的人们都恨之入骨。有一天他被机务段我们的人抓住了，同样遭到毒打。我知道时他已经遍体鳞伤。于是下令接管，由九支队派人把他弄到我们学校。我看他伤得不轻，亲自带领九支队几个弟兄武装护送，去请著名的跌打专家苏医师。没想到回校路上遭到“联指”伏击，对打了一通“联指”的人撤退了。虽然无伤亡，但却把苏医师吓得不轻。特别是当他到达学校，知道是为陈德威医治时，气得一塌糊涂，坚决不干。我费了老半天劲才说服他，给陈诊断、下药。陈并没有伤及筋骨，见他被关的地方没有蚊帐，我又做了安排。整个联战在文革中是不准打人的，据说还是有人犯纪，但毕竟不严重。这也使后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感到不可思议。后来陈逃跑了，回到“联指”那边反而被说成叛徒，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成了逍遥派。

直属铁道部的柳州铁路机车车辆工厂一片地方成立了第三指挥所，他们自己决断自己行动在5月26日夜晚攻下

了小鹅山。另外还有马鞍山，联指控制这座柳州市的最高山，架设了高射机枪，不断向我们的地方扫射。不时听见有行人被击中甚至击毙的事情。受到威胁最大的还是柳州造反大军，他们的居民集中区谷埠街一带，直接被马鞍山上以及柳江对面的“覃连芳大楼”上打过来的机关炮威胁。于是柳州造反大军与铁路工机联总部联合决定，拔除技术馆及铁路医院、马鞍山两处据点。使柳铁地区与“钢联指”以竹鹅溪为界，柳州市与联指以柳江河为界，对峙到中央解决问题为止。

我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柳州军分区5月29日在柳北的柳州饭店召开地区革委会主任会议，部署镇压“造反大军”的作战计划。王司令员下令：“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动手。”郭政委作总结，会议决定“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大刮十二级台风”。此次会议散会后，各县革委会主任或待成立的准主任，组织各县民兵开进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在各自县份，则滥杀“五类分子”及本地“造反大军”群众，后来中央工作组统计，被杀害者达7659人。我们更不知道，当天中央文革同意韦国清等领导人赴京汇报，讨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五月三十一日夜，柳州市负责进攻铁路医院，据侦察，医院里驻扎着由各地联指调来的复员军人为主的最精锐部队，武器配备也极好。技术馆驻扎着名义上是我们学校“东方红公社”的学生，我们清楚，他们不但人少，而且都是些只会听话的角色，主要的还是外边的武斗人员。会议是我参加的，联战负责正面主攻技术馆，铁路上其他队伍从侧面攻击。我安排驻守文化宫的一支队把我们仅有的一挺马克辛水冷重机枪布置在文化宫楼顶，压制技术馆和铁路医院的火力；其余的人马与九支队、五支队一起按计划摸进技术馆与铁路医院之间的铁路第五小学。两支队伍都由我带领。

要攻打技术馆的事在我们的队伍里属于公开的秘密。人人都盼望参加这次作战，最典型的数汤姓两兄弟，我们叫他们为“大、小冰棍”，我亲自找他们做工作，大意是俩只能上一个，万一两个都报销了，你们汤家就绝后了。没料到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绝了活该，你要不给我上阵，我就先嘣了你！”结果是安排他们一支队驻守文化宫，随时待命。

半夜，眼看快要打响时，我又开始发抖，而且越抖越厉害。脑子里非常矛盾。万一死人，我是否对得起这些弟兄以及他们的父母？可是如果我们束手待毙，死的人就会更多！广西各地已经发生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明白，必须拼死一搏，才会有那么一线生机。也才会有如此热烈的要求参战的事情。不由得想起“老扁”的父亲恳求我的样子，现在他们就要主攻技术馆，心中的滋味实在难以言谕。

一发信号弹升起，首先是医院东边响起激烈的枪声。我立即感觉不妙，因为战前布置是分头摸进去，以偷袭方式解决问题的，这枪声说明原来的布置已经失效了。而我们的五、九两个支队正摸到铁五小，万一暴露，他们将被两面夹击，而且在低洼处。我赶紧摇电话，九支队的副支队长“闯将”接的，他告诉我两个支队分别在球场两边的

教室里，整个铁五小没有一个人，现在五支队也上来了，占领了靠近医院的那栋办公室。三拨人马被一个足球场分割成三块，非常不妙。我告诉“闯将”，交代大家都不要暴露，我亲自上去。“闯将”一听就急了，叫我千万别上来，不然失去与其他部分的联络和指挥，更糟糕。

我处的位置与他们所在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米，但只有一个不足一米宽的土埂连接，两边都是很深的水塘。这道土埂又被医院以及联指占领的铁路局大院两边火力控制，来往很危险。我觉得上去确实用处不大，这时与总指挥部间电话通了，我急忙问医院东边是怎么回事？留守指挥部的王某告诉说，红总的队伍刚摸到医院旁边的木材加工厂，与“联指”的队伍遭遇了。看来他们正打算摸过来进攻粮食加工厂，于是交上火了。估计技术馆那边未必知道我们的计划，但最糟糕的是从竹鹅溪旁边摸过技术馆西边的那支队伍没有联系，他们的电话还没架设好。而摸往技术馆斜对面的机务段的队伍，也还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同时到达，对技术馆的进攻就没法开始，但拖延对我们显然不利。

我脑子里马上涌出来两个方案，一是我们自己马上进攻技术馆，拿下技术馆也就切断了医院以及进攻木材加工厂的联指队伍的退路。但我们的队伍总共不到三十人，未必吃得下技术馆；二是把人马撤下来，对技术馆进行火力攻击，使对方恐惧然后肯定会撤退原来打算进攻的队伍，甚至把医院、技术馆也撤了。第二方案如果凑效，是最理想的结果，至少不会牺牲人员。

还没等我拿定主意，电话响了，拿起来一听，是机务段的队伍，他们已经摸进了铁五小旁边的局长宿舍院里，照例是空无一人。我顿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联指不乏军队转业干部，甚至很可能还有现役干部，怎么在鼻子底下就如此大意，连一个岗哨都没有？会不会是个圈套？如果是，那我们已经被装进去了。特别是铁五小，他们一进攻完全可以把我们打得狼狈不堪。想到此，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摇电话，打算通知“闯将”他们立即炸开围墙，转移到地势高一些的局长宿舍院子里去，与机务段的队伍合并。但电话不知何故已经摇不通了。

其实什么都晚了，技术馆和医院那边枪声响成一片，不时夹杂着迫击炮弹的爆炸声。这时天已经蒙蒙亮，通往铁五小的土埂已经被机枪扫射所封锁。从电话里得知，“红总”的人曾经攻进医院，但又被打出来了。不知何时，“闯将”已经被人带到我身边，浑身湿淋淋的。我叫他先换衣服，他却说没时间。接着把冲锋枪推到背后，告诉我，现在铁五小内我们的人已经被火力压制，除了东边还可以对医院射击以外，其他人都只能躲在教室的角落里，只是不用担心，什么伤亡都没有，联指也不能攻过来，因为那个球场太开阔了。

然后我们上到二楼，最东边的山墙早就打开一个大洞，只是医院常打冷枪过来，所以用一张八仙桌挡上了。他把八仙桌拉开一半，我们俩从洞口看下去，他指着现场告诉我情况。忽然两声枪响，一听就知道是苏式步骑枪打的，“闯将”头上戴着的铁路大盖帽被打飞了，我的头上洒满了灰沙。我们身后的墙上有两个弹孔，看上去是两支枪同时发射的。“闯将”骂了一声，接着说真他妈的好枪法，两百米开外还这么准！

我摇电话叫文化宫楼顶上的马克辛重机枪压制住医院的火力，他们说根本看不见火力点在哪儿，只能压制技术馆的。这时天已经大亮，“闯将”又要回铁五小，我叫他千万叫大家都不要急，“联指”肯定不敢攻过来，轮流监视就行了，一定不要动。又关心他怎么过这个土埂，他回答，没什么，注意点就是了。我从二楼北面厕所窗户看下去，只见他三拐两拐，都是两边打不到的地方，然后下塘，举着枪沿土埂游泳到中间那个涵洞钻过去，继续利用土埂掩护，平安到达对面。

没多久，局长宿舍那边老任来电话，说那里的二楼已经被炸塌了，不光有迫击炮弹，还有定向炸药包。他们已经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我只能让他们死顶，注意不让对方偷袭，一定要守住，不然铁五小就很惨。带队的任树德答应了，并保证一定守住。这仗越打越窝囊，枪弹、炮弹都落到我所在的前沿指挥部。而肖联保率领的队伍至今没有联系上。

接到通知，我从前沿指挥部赶到文化宫总指挥部开会，竹鹅溪对面的枪弹扫得我几乎无法离开。不知是否发现有人要过去，溪那边枪打得更勤了，我根本无法通过两栋楼之间的空地。“毛利”赶紧会同两个女将，拖了一挺轻机枪到楼房西头掩护，这时我忽然发现五六只鸭子，它们竟然站成一行，躲在一棵大树后边。聪明的小精灵，居然知道那枪是从哪边打来的。听见“毛利”他们的机枪响了，对方显然被吸引，乘此机会，我飞快跑过危险地带，到了文化宫。

会议在电影放映室进行。王某报告了肖联保那队人马的情况，他们按时摸到技术馆后边，因为电话线没有拉上，无法报告情况，于是隐蔽在民居里。直到天快亮才派一个人回来报告，而王某接到报告居然没有告诉我这个前沿指挥！我把他好一顿骂，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居然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柳州市那边更糟糕，“红总”市三中部队八个人躲在一个大坑里，没料到一发迫击炮炮弹恰好落在坑中间，全部阵亡。“青年近卫军”两名战士，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双方都没有能力进攻，整个战势成胶着状态。我始终最担心铁五小内我们的弟兄，他们始终被压制在低洼的地方，幸好天气晴朗，烈日当空。我暗自寻思，只要不下雨，我们大约不会有伤亡的。

廖胡子看来很伤心，三中部队阵亡的几个人，全都是他的能干部下，却意外地死于盲炮。他暴躁地命令他老婆，也是部队转业的上尉军官，立即回去亲自把那一箱四零火箭弹搬上来，一定要轰掉医院那个堡垒。拔掉这个钉子，医院就可拿下来了。最后商定，只要医院攻下来，立即全面发起攻击，端掉技术馆。

回到前沿指挥部，已经下午。“毛利”告诉我，机务段的林某在指挥部北面趴着，过不来。竹鹅溪那边的火力太强。林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进机务段当了火车司炉。我到楼房北边厕所窗口一看，他趴在一棵脸盆粗的大叶桉树旁，离房屋只有三米多远。但竹鹅溪对面显然已经发现他了，枪弹不断落在附近。我一看情况就知道这小子窝

囊，不然这三米距离无论如何都可以冲过来的，现在趴在那里反而不利。

过去摇电话，责问任树德为什么让他跑回来？任开始不说，后来才答复是他自己被炸怕了，坚决要撤退的。我于是交代“毛利”，设法把那间厕所窗台下部打开，弄一些东西遮挡，然后把他救回来。如果不行，就弄一包合适的炸药，炸一个洞。“毛利”答应了。我便离开到指挥部的房子里，电话询问医院那边的情况。

没多久“毛利”来报告，说林被打死了。“毛利”说，他看来吓傻了，喊他不要动，他总要抬起头来催我们快点。叫他不要抬头他还要抬，结果给竹鹅溪那边一枪打中脑袋，完蛋了。我跟着过去一看，那个脑袋已经缺了半边。战场往往如此，缺乏冷静的代价是生命。但是，这样的武斗又是为了什么？

“闯将”又从铁五小跑回来，衣服照样湿淋淋的。这身衣服已经湿了两次了。我连忙问那边的情况，他告诉我，五支队趁着还没爆炸就把联指发射的一个定向炸药包扔到围墙脚下，结果把围墙炸垮了一个豁口。于是跟局长宿舍打通了，他们可以来往两边，情况好多了。其他弟兄们一切安好，联指不敢进攻的，我们在两边卡住球场，他们过不来。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任树德没告诉我这个情况？他笑了，他们在最西边那栋楼里，根本过不来，哪里会知道这边的情况？

再问一下，他说，弟兄们一天没有东西吃了，就是饿，要是有吃的还有水，那么再守两天也没问题。说话间女将“跛子”端了一碗刚煮好的面条来，他立即接过来狼吞虎咽。再过一会，“毛利”和另一个女将拿来一个塑料袋的包子，还有几个行军壶的开水，准备给他带回去。“毛利”坚决要跟他去，两位女将也要求跟去。“闯将”说，你们不会游泳，去不了。最后，“毛利”跟去了。枪声骤响，子弹打在水面和土埂上，看见“闯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由想起林某。战场确实有许多奇妙的东西。

柳州市那边看来很不顺。医院那座堡垒，其实就是大门上边突出部的房间。下边是空的门厅。它三边空旷，可以封锁我们所有进攻路线。廖胡子的老婆冒着生命危险把四零火箭筒送到前边，没想到只有两发底火。“红总”的业余水平发射了两发，全都歪到一边去了，那座堡垒依然封锁着他们的前进路线。“闯将”要求我们不理会柳州市那边，自己发动进攻，打进医院后边的家属区，切断守在医院的“联指”退路，然后逼他们投降。我没有同意。因为这只是武斗，不是正规的战争，熬过最艰难的阶段，他们必定会先眨眼，接着会后撤。只要别死人就阿弥陀佛，没必要把他们往死里打。

下午四点多，文化宫来人告诉我，副手说我已经打了一天一夜，叫我下去休息，他来接替指挥。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并非别的，只在于他终于明白过来了。眼瞧着此地必是相持状态，于是我回到文化宫，开上那部嘎斯69回学校去了。当然跟他说些鼓励的话。谁知到傍晚时分传来消息，说我们已经攻占技术馆了！我马上跳上车，带着副手，还有后勤的几名女将，管后勤的老龙从来没让人担心过，装着他准备好的烧肉、米饭、菜汤，车子塞得满满的，发动起来就出发了。

自从我们攻占二级站以后，这才发现“联指”为什么一直盘踞这些地方作为据点。这一片地方有医药、外贸、石油、机械等许多仓库，各种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烟草、白糖、酒类、药材、土特产等。九支队马上弄回来两部苏联产“乌拉尔－2”边三轮摩托车；后勤的老龙他们则发现了白糖、酒、牡丹香烟；机务段那帮人用人参煮面条，结果太难吃便倒掉了，被住在机务段的老人连汤带面一起刮干净；任树德还弄了个犀牛角刻图章。这股砸抢风直到我下令老龙率领六支队查封各仓库才止住。后来市内红总的人发现水池里有几条出口香港的娃娃鱼，每一条都有几十公分。开始不知道是啥，吓了一跳，经难民中有人指点，弄到食堂加菜吃掉了。

到文化宫时，见到“余修”。他并不很高兴地对我说，有点怪，我们从局长宿舍摸过去，没有任何动静。一直摸到技术馆，空无一人，他们全部自己撤走了。还有，竹鹅溪那边也撤走了，整个铁路局大院全都空了。是住在那边的居民来报告的。我们派人过去，真的全撤走光了，“袁猴”他们还在搜索，叫我回来跟你报告一声。我立即上二楼工机联总部，老桂守在那里，也报告了同样情况，并补充说，“钢联指”全部撤到柳北去了，现在用车皮把柳江铁路大桥给堵死了。

我立即判断，肯定是广西军区有指示给他们的，目的是以中断铁路运输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军区会向中央报告，说是我们中断铁路运输的。于是老桂开始紧张，我叫他赶紧派人把王反修、李振岭找来，并立即通知白鉴平、廖伟然，马上召开联席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老桂马上照办了。认真回想起来，这个傍晚是我在整个文革中头脑最清醒的时刻。大约晚上七点，在探矿厂造反大军总部，紧急会议召开了。白鉴平开始打官腔，首先庆祝胜利。我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胜利，如果硬打，我们未必打得过人家。现在他们主动撤退是个阴谋，目的是给我们栽赃！我们必须弄清楚详细情况，现在就必须确定紧急措施、补救措施。否则我们占领再多地盘也没用，中央一旦下个文件，我们肯定完蛋，预期的“求生存”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按照目前中央废黜老造反派的趋势，这种情况很可能马上发生。

白鉴平反驳我说，没理由凭想象散布悲观情绪，中央是不会抛弃老造反派的，而且不可能完全听信军区的报告。王反修、老桂则支持我的意见。争论还比较激烈。廖胡子后来发言，他说我的意见有道理，即使没有那么悲观，即使中央还继续支持我们，我们总得有相应的措施，总不能听凭军区谎报军情。从作战情况看，联指根本不是战败，继续打下去我们未必能打赢。他们突然全部撤退到柳北，里面绝对有阴谋。他说完之后，逐渐地多数意见站了过来。白鉴平说：你也不能光讲形势，有什么高见说出来我们听听。

我要求立即以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严正指出“钢联指”主动撤退柳北并中断铁路交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第二，马上组织武装纠察队，维护社会治安。对于任何私人住宅，无论观点属于哪一派的，都不许抄家、抢劫财物。任何组织未经总部批准，不得自行强占铁路局的任何单位。否则武装纠察队将予以严惩；第三，立即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恢复柳南所有厂矿的生产。铁路由工机联负责，今晚就组织通车工作，柳北

通不了就通南宁、贵阳，客、货运输都开通；第四，立即通过柳铁军管会向联指发出呼吁，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如果“钢联指”的人愿意返回柳南恢复铁路运输，热烈欢迎，保障人身安全决不伤害任何人。第五，马上组织恢复商业单位的供应工作，建立粮食供应系统，保障粮油供应，实现柳南地区社会稳定。

这些意见马上被通过了，接着散会，分头去落实。

我们回到文化宫，接着又开工机联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决定各单位分部全部回驻本单位，恢复本单位的正常生产，保护本单位的所有公、私财产，特别是撤退到柳北的“钢联指”人员的住宅；机务段、车辆段等原来住有地方难民的，要尽快动员他们搬出去，现在地盘大了，可以住进二级站、学校等有空房子的地方去，力争全部撤离铁路单位；马上由老桂组织运输系统人员，建立通车指挥部，尽快恢复通车，越快越好。王反修负责与铁路局军管会联系，经过他们呼吁“钢联指”人员返回，共同保障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

柳州铁路分局“工总”在老桂的率领下，马上开始了恢复铁路运输的工作。柳铁军管会在曹参谋长的亲自关照下，给通车以全力支持。尽管有生命危险，火车司机、列车乘务人员踊跃报名要求出乘，机务、车务、工务、电务、车辆、调度等部门也全力投入工作，很快我们就开出第一列旅客列车，往湛江、南宁方向。往贵阳方向的旅客列车也准备开通。

但我们显然斗不过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第一趟列车还没开到黎塘，就被他们命令“联指”以武装民兵的名义截住了，他们用枕木拦住轨道，还插着毛主席画像。我们的所有人员，包括随车的军管会人员、柳州分局“工总”负责人都被扣留。接着，往贵阳去的列车开车仅行进了一个区间，就被“洛满区革命委员会”的武装民兵拦截了，他们自称奉广西军区、革筹的命令，要搜查武器，防止外流。尽管搜查结果并没有任何武器，也不准列车再开动一步！

最后，广西军区与革筹干脆于6月12日发出通告：“哨卡是在县革委会人武部统一领导下，由民兵对不明身份的来往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明确命令各地农民可以拦截火车以防武器外流。而当时的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截车船，破坏交通运输”的。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必须加在我们头上！

6月13日，中央关于恢复柳州地区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通知下达了。那个通知含糊其辞地指责破坏铁路运输，并要求立即恢复。这意味着，这个屎盆子已经在我们头上悬着，随时都会扣下来。我们当时流传一句话：中央文件无效，要等注解出来才有效。指的就是这一点：广西军区命令设立的哨卡堵着铁轨，“联指”的列车压在柳江铁路桥上，在军管会的协调下，代号为“45号”的援越物资列车一来，铁桥两边都会撤除障碍，那些列车确实畅行无阻。我曾经对曹参谋长说：既然“45号”列车能畅通，别的车也应该能通。他不置可否，只说试试看吧。其实，真要恢复通车，只需给广西军区一个死命令就全解决了，犯不着下达这个不着边际的“紧急通知”。

6月17日，周恩来为首，中央领导人接见柳铁军管会成员，这些不善阴谋只知按中央指示办事的五十五军领导人，全部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的惟一罪过，就是积极支持我们恢复通车的举动。柳铁军管会主任、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被当场撕去领章帽徽逮捕入狱。这是令任何稍微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理解的。

我们还不到二十岁就亲身体会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含义！

同一天，鹿寨县（1958年燃放了共和国最大“卫星”、日产钢铁二十万吨而名扬世界）武装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张春峰，亲自率领上千武装民兵进攻柳州市。而在前一天，象州县革委会发表对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严正声明”。虽然早就有农民武装进入柳州市协助联指围剿造反大军，但都是偷偷摸摸的，从来不敢公开承认。现在则已经赤膊上阵了。廖胡子不愧是从人民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面对鹿寨县的队伍打过来他在窑埠布阵迎击，结果张春峰等１４人被击毙。那支鹿寨民兵队伍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一下便镇住了其他各县的民兵队伍，他们人心惶惶，再也不敢冒犯柳州了。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各地，才得知那些农民们传说得更玄，廖胡子变成妖魔鬼怪，武装部给补助也拉不起队伍来。后来发生的南宁、桂林、梧州等市的大屠杀，唯独在柳州没有发生。这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天知道是巧合还是计划，6月18日联指发动了反攻。东边的攻势因为前一天鹿寨民兵的土崩瓦解而变得风平浪静；南边的象州发表“严正声明”之后也无动静；北边有柳江阻隔，攻不了；只有西边由柳州市、柳铁以及南宁等地来的“志愿军”攻得厉害。而这边恰是我们铁路地区。他们占领了铁路木材防腐厂之后，也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立即在这个方向布置了防线。

副手恢复了昔日的活力，重新担负了联战的指挥责任。我则更多地参与柳州市和柳铁的联合指挥部工作，忙活了一阵通车白劳之后，我的心更多地操在如何应付越来越险恶的政治局面之上。我经常寻个空子到“丘八”和“老头子”那里去聊天，大家都很关心形势，而且他们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有更多的思考。“老头子”在反对倒旗协议时期与几乎整个联战意见相左，许多人甚至要求我批准开除他。我拒绝考虑。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意见，除了证明自己怯懦之外，还表示我们没有真理。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错了，我们就应该坦荡荡地服输。另一方面，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证明他是一个想问题的人，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而“丘八”则是我的盟友。早在文革前，因为他是先天性色盲，理工科大学不准报考，所以他初中便开始钻研文史哲。我虽然以几何与物理见长，但也不乏文史方面的兴趣，更何况我管着图书馆的事务，我们便经常讨论、争论。现在我跟他们两个经常分别进行讨论，只是对文革的看法。我们一致的意见是，文革肯定搞错了，在我后来被批斗的“恶毒攻击”言论里就有“文革上不了史册”，这是我们几个的共识。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中央现在正在开始清算造反派，毛需要为文革的正确寻找替罪羊；“丘八”同意我的一半意见，但对“找替罪羊”仍不敢确定；“老头子”则把文革的一切荒唐都归罪

于江青，更隐蔽一些的，还有林彪。他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便没有那么多隐蔽，直接告诉我和其他一些同学：“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

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还有，我必须考虑如何争取更好的处境。在总部的会议上，我不只一次提出必须搞好宣传舆论，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使我们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还可以把真实散布于群众之中，以后总会有人记得。白鉴平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从来没行动。1967年他在北京住了大半年，有一些“通天”的渠道，把我们缴获的许多文字，军区布置武斗的文字材料全都用于“告御状”去了。每一次告诫，换来的都只是相信他有办法的承诺。我知道他的上告肯定能告到至少中央文革那里，但中央文革其实不过是毛主席的办事组，他老人家已经决定扑灭我们了，你还指望什么？在一次会议上，我发怒了，指着白的鼻子吼道：“白老眯，我告诉你，中央只会在造反派中选择个别人来代表这个势力，做个样子。其他的都在打击之列。但愿能选到你！”

不过指望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我在联战中同样是一言九鼎的，于是布置所有能写的人才，交代任务。我们有自己的报纸，还有印刷厂。同学们早就能够自己选字、排版、印刷，我要求写一系列文章，充分揭露事实真相。“丘八”高度评价我的决定，并决定执笔写文章。可惜他尚未写成，便阵亡了，实在是我最伤心的事情之一。“老头子”没有上战场，他执笔写了两篇文章，还有别的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李TZ，竟然报来一篇出色的文章，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老三届中学生，写的文章成为1968年9月《广西日报》批判的七篇“大毒草”中之六篇！这六篇的题目是：《今日的“哥达纲领”》、《今日向何方》、《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必须全盘否定广西资产阶级派委会》、《二论广西革筹必须转向》、《广西军区必须改组》。我自己亲自执笔写的《砸派的骄傲》没有入选。

话题还回到武斗上来。

6月19日防腐厂武斗有升级的趋势，我们联战布防到从铁路木材厂到铁路拘留所一线，足有好几公里。为了了解前线实际情况，我驾驶“乌拉尔”边三轮摩托车前往。到文化宫时，驻守在技术馆的一支队见“毛利”不在我身边，不放心，“袁猴”派“大冰棍”跟我随身护卫，他挎着伞兵枪，挺神气地跨进边斗。车行至防腐厂公路，我忽然发现急弯处端头路边高坡上有一座地堡，枪眼正对着我们。猛地觉得不妙，几乎没有思索，马上转90度弯冲下公路。地堡里的枪声几乎同时响了，听声音我就知道那是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的扫射。摩托车冲到路底下豆角地里，这里是死角，机枪打不到，它也不响了。机枪手看来是个老手，但不知他为何迟了一点，倘若早几秒钟，我俩死定了。

停下车，发现车斗有枪眼，再看“大冰棍”的外衣上有两个枪眼。我问他受伤没有，这小子说：“我这么瘦，子弹找不着我的。”车没坏，人没伤，实属万幸。“大冰棍”不解：“妈的，不是说这一片全都被我们占领了，怎么乱打枪？”我想可能情况有误，也许我们走错了地方。我把车发动起来，机枪马上又响了。接着听见路对面机枪也响了，这枪声是我们那挺“加拿大白管”，看来是在掩护我们。

我告诉“大冰棍”，注意点，那个地堡肯定是“联指”的，我们命大，没被它敲掉。必须冲出去，你得抓紧把手。我看准了一处斜坡，肯定冲得上去，危险只在冲上路面以后那几秒钟，只要冲过路对面，那个地堡就打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到达对面大楼。发动，加油，机枪骤密。连续加油减油，离合器捏死，车并不动。终于听见枪声突然停止，我知道他们的弹匣空了，马上松开离合，车子猛然加速冲上公路。几乎没看见路面又冲下对面路坡，这里是他们打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车子也陷在烂泥里，原来这边是一条大沟。于是弃车步行，钻过豆角地便走到我们占领的大楼旁边。这是我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大楼是五支队和二支队占据着。拿枪的人员多数都在前沿阵地，这里都是些后勤、医务人员。大家都还在议论刚才那一幕，“袁医土”（她自称已经达到医士水平，于是得了这个外号）几乎带着哭音诉说他们焦急的心情，但招呼我们却听不见。我问那挺白管机枪在哪儿？他们告诉说在楼顶。过了一会儿，副手被人叫来了，一见面就责怪我们不该上来，“大冰棍”就抱怨他没有说清楚情况。我制止他们的争执后，了解了战况和布防情况，他带我去看了一件“新式武器”。

那是一个氧气瓶，里边填满了TNT炸药。他告诉说这是联指发射过来的“炮弹”。我不由得有点惊讶。我们把灭火器壳填上炸药当炮弹，把氧气瓶割掉底当炮筒，发射定向炸药。没料到联指竟然把氧气瓶当炮弹了。“大嘴”说这样的炮弹一共发射了五六枚，一枚命中旁边那栋楼，炸垮了一角，这一枚没有爆炸，说着轻轻踢了两脚。已经把雷管拆了，因为我们并不很缺炸药，缴获非常多，所以没有急着把炸药弄出来。

20日有郊区菜农前来报告情况，说“联指”在防腐厂里开进许多各地来的武装人员，据说都是战场老手，大多数是复员军人。自从张春峰等被击毙，鹿寨的武斗团被打垮之后，消息震慑了其他县份的农民，虽然有十几个县的农民进城，但人数已经不很多，只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些转业、复员军人，不少“特等射手”之类“大比武”时代的尖子。而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逃亡来的县份造反大军成员，最典型的就数博白造反大军那十来位，其中有一个还是广州军区“大比武”的优秀射手。于是双方基本处于对峙状态。

21日傍晚，我在学校。老龙率领后勤人员给前边送饭，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西瓜，装了一筐。临出发，看见我和“丘八”在一起，老龙呼唤我们同往，我没表态，“丘八”却非常积极，说从未上过战场，去见识见识。我忽然发现李湘在汽车上，知道他俩暗恋着，就咬着他耳朵：怕是要找机会陪李湘吧？又对老龙喊，为什么要去那么多人？还都是些女将？老龙说，让她们去开开眼界，不然总是说我们重男轻女。九支队队长“闯将”开车，另一个支队长“老扁”还在前方。说笑间汽车开走了。

天黑下来时，电话里传来消息，前边交上火了，联指开始进攻。我跑去一问，送饭的汽车还没回来。接着开始下雨，我觉得情况有点令人担心。于是带上“毛利”，开车去文化宫总指挥部。到地方见到老桂，他向我汇报情况：设在铁路局党校的前线指挥部有王某指挥，王反修、李振岭到造反大军总部开会去了。看样子今天晚上联指有

进攻的苗头，正在你们联战布防的防腐厂一线。柳州市那边，听说张公岭一带也有动静。

目前最激烈的进攻地点恰是我们防卫的区域，我叫“毛利”接通技术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余修”。问了情况之后，告诉他并叫他通知猿猴，我在文化宫总指挥部，有情况就马上报告过来。技术馆在柳江边，必须严加防范。“余修”答应了。再接着局党校来电话，王某告诉说，前边有一阵枪声，像是在铁路局木材厂方向。电话摇不通，情况不明。我叫他立即派人过去，一定要弄清楚。然后自己摇木材厂那边的电话，确实不通。心情一下子就坏下来，天在下雨，我的队伍在最前方，枪声都在木材厂那边，正是我们的防区，忧心忡忡是必然的。

没过多久，技术馆那边“袁猴”打来电话，一支队布在江边的岗哨发现有一条汽船，正沿着南岸缓行，看样子有登陆的企图。他请示该怎么办？我马上告诉他，把一支队拉几支枪到江边，所有枪都打它一梭子弹，让它明白这里有准备。否则他们在这里登陆就在我们战线的后腰捅了一刀！“袁猴”有点担忧，如果打枪就暴露了目标，而很长的一段防线只有一支队十几支枪，可能顶不住。我告诉他，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他们既然只有一条船，肯定装不了许多人。我们枪一响他们就必然会逃。相反，如果不开枪，他们很可能以为无防守而登陆，那样就必须硬打了。“袁猴”明白了，立即带队奔江边去了。后来打来电话，说那船是装甲的，子弹打上去当当响。还报告说，船果然往上游方向逃跑了。

我立即紧张起来，因为上游铁路桥边有地方519护桥部队的一个营房，这支部队铁杆支持联指，他们有可能利用军队营房作掩护，在营房下边登陆，接着可以从技术馆背后打过来，或者直接扑向党校前沿指挥部背后。甚至就这样切断我们前沿队伍的退路。于是马上摇电话到党校，命令王某立即组织一支队伍，从党校背后直插江边，见船就打，保住这一带不设防地区。他答应了，并马上行动。这时发现分局公安分处老金、老刘两位四野老兵到了指挥部，他们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我于是松了一口气。

可人算不如天算，我摇电话到铁路桥头阵地，六支队守在那里。最近江对面联指用四管高射机关炮朝我们乱扫，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机关炮，似乎还有打不完的子弹。这种机关炮威力极大，隔着近一公里的开阔江面还能把技术馆两层三七砖墙都打穿。六支队防地距离最近，被打得也最多。无奈，我把我们最威风的马克辛重机枪调给六支队，安装在江边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废碉堡里，让它跟江对岸的两挺机关炮对话。但我和六支队都忽视了一件事：他们阵地背后，仅隔着一股铁道，对面便是那个519护桥部队的营房。

再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首先是联指已经占领了磨滩村，而那里正是我们联战的前沿阵地；然后便是找不到总指挥；接着便是铁路木材厂通讯中断。最要命的消息是王某打来的电话：说联指有两条大船在铁路桥头登陆，上来了七、八百人。没等他说完，我就在电话里骂开了。那个地方是极平缓的卵石滩，就是一个人划的小船也靠不了岸的，几百人的大船根本开不过去！我命令他必须马上派人实地查看，不要胡乱猜想。

却不料一问才知道，开始我叫他派一支队伍到党校背后的江边去，他根本没有执行！理由是总部调司机学校的

延安联战过来，他们至今没到，派出去党校就没队伍防卫了。这使我恼火万分，这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居然如此不负责任！“毛利”在旁边听见我发火，自报奋勇地要求从技术馆后边小桥抄近路兜过去看看。他一说倒提醒了我，马上摇电话到技术馆。接电话的是“余修”。我问清楚这边无动静之后，叫他让“袁猴”马上带一支队五、六个弟兄马上抄近路搜索江边，重点在党校后面的空白地带。并明确地说了我的担心：如果党校被偷袭，我们前方所有弟兄的退路都被切断了。

“余修”立即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说了句：找“袁猴”来不及了，我自己带队上！便挂了电话。我很感动，有这样的支队长，事情一定能办好。可是马上就接到王某的电话，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联指占领了水电段桥头阵地，马上进攻党校，要求撤退。我暴跳如雷，对着电话吼道：“王立和，你要撤出党校我就毙了你！”老金他们也结果电话跟他讲不能撤的道理，谁知电话挂上了，再摇便没人接听。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桥头阵地也摇不通电话，严重的局面使我烦躁，如果桥头阵地失守，不知道六支队弟兄们伤亡如何？更严重的是，它完全卡断了前方木材厂、磨滩村等阵地的退路，好几十人将面临可怕的境遇。我在屋里抽着烟、转着圈，“毛利”正按我的要求不停地摇党校电话，始终没人接听，看来王某真的逃跑了。这个混蛋！

忽然“毛利”喊我，电话有人接了。我急忙接过耳机，说话时才知道是同学唐立行。他率领“小辫子”等两三个女生，专门负责拉电话线的。问过才知道，他们刚从前沿撤退下来，党校空无一人！唐说，就他妈的跟国民党逃跑去台湾似的，一塌糊涂。再一问，知道前边更惨，桥头确实失守了，六支队伤亡只知道“曹大个”伤得很重，听说“杨克思”和“方块”都死了。前边木材厂失踪了好几个，“丘八”、李能、李湘、“糖醋”；副手也下落不明。唐还支支吾吾地说：你老弟也失踪了。我打断他，问他有枪没有？他回答说只有一支冲锋枪。我叫他马上安排“小辫子”她们，分别守候在二楼四个角，他本人拿枪来回巡视，千万顶住，我马上带队伍过来。

我挂上电话，交代老桂负责守在总指挥部，老金协助他。我立即奔党校。老桂是个很负责的机关干部，做事也很有条不紊。从我到达文化宫总指挥部开始，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守候在旁，不停地按照我的吩咐四出联系。见我要离开，他也想跟着到党校去。所有的消息都说明，那是个极危险的地方，老桂也非常担心。但只有文化宫才可以与四面八方联系，这里是中枢，不可能没有人驻守。我告诉他，我从党校直接与他联系，这里只有靠他传递消息。

我要带的队伍此刻却没有，老桂希望我停留一下，司机学校和第三指挥所的队伍快要来到了，带着队伍上去会安全许多。不过形势明摆着，必须马上把党校控制住，这是成败的关键。于是告诉老桂，任何队伍到达就直接命令往党校开，不能迟延。出了文化宫大门才看见雨非常大，该死的老天！嘎斯69已经被九支队开上前线，至今未归，我跨上边三轮摩托，“毛利”坐进边斗里就出发了。

到达党校之前就不断遇见前线溃退下来的人群，我一路吆喝所有带枪的都跟我回党校去，没停车也没减速地开过去，不久便到达党校。唐立行还不错，已经纠集了好几条枪留在这里了。我一到达马上叫“毛利”带领他们出党

校大门，守候在路上，把前线退下来的所有带枪的都截住，让他们进党校来集中。凡是不听命令的，人可以放走，枪必须缴下来。接着摇通文化宫电话，告诉老桂，本人已经平安到达，目前已经纠合了七八条枪了，还在截败兵，估计可以顶住。

没多久，“小龙”进来。我赶紧问前方的情况，他带着哭腔告诉说大多数人还守在印刷厂一带，退路已经没有了。前边乱成一团，关键是指挥没了，副手下落不明。我打住他的说话，因为“毛利”看来有点成效，进入党校的武装逐渐多起来，说这些丧气话于士气不利。我让大家排队，居然还凑了十几条枪。告诉大家目前的情况很严重，但我相信“联指”同样害怕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俩人对眼睛，谁先眨眼谁就输。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前面还有几十位战友，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救出来，下场会如何，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正说着，六支队支队长“大宋”喘吁吁跑来，手里挥舞着一支冲锋枪。原来他知道桥头阵地失守以后，纠集“杨克思”等三四个人，摸回桥头，把这个阵地夺回来了。原来“杨克思”还健在，碉堡里的重机枪也在，连子弹都没少。这消息使大家振奋。我马上命令所有人都归“大宋”指挥，立即赶回桥头阵地去。

他们走了一会儿，首先是司机学校延安联战两个小队的武装到达，老桂叫他们来的。领头的请求分配任务，我叫“小龙”马上带领他们赶过印刷厂去，与我们的人汇合后，逐步向铁路木材厂反攻，能到哪儿就夺到哪儿。“小龙”迫不及待领着他们前往，我赶紧招呼道：“让‘闯将’总负责，禄山和‘老扁’配合。”这三个家伙平时就玩得来，“闯将”在攻打技术馆时就证明了他的勇敢、镇定和机智。我想，早要是任命他指挥作战，今天绝对不可能成这个局面。顺便补充一句，我们每个武装支队都有两个支队长，都是支队公认而形成的，为的是更方便，还有，万一战死一个，另一个可以继续指挥。

然后唐跑来报告，“袁猴”来电话。我接后他告诉我，“余修”他们搜索的结果，那片地方没有“联指”武装。当地菜农报告说，“联指”只有一条汽船在519部队守桥营房处登陆，上来十几个人，从营房那边直接到桥头那边去了。我直后悔自己大意，没有对营房加以防备，现在果然是从那里攻打了六支队的屁股，其实应该说是拦腰一击，六支队还有一半人跟“大宋”驻守水电段。“袁猴”接着要求分兵过来支援，我告诉他不必来，但必须分兵驻守党校背后，防止“联指”武装回头扑过党校来。

再就是老桂来电话，王反修在机务段把装甲列车搞好了，打算开出来助阵。我告诉他，可以开到磨滩村以北，我们的人正在收复木材厂和磨滩村。老桂建议只收复到木材厂算了，磨滩村以及防腐厂、一线队等的收复待总部重新研究作战方案以后。否则恐怕会打乱仗。他的意见显然是有道理的，再一问，是金常琨、刘道义两位四野老兵建议的，那就更不必说了。只因为我们还有“丘八”等下落不明，我仍然坚持打进磨摊村去。

这些败阵下来的溃兵很快就组织成为反攻的力量，按照部署开上各自的攻击地段。但接着又传来不好的消息，这消息是老龙带来的：他们到桥头六支队的阵地送饭时，听说木材厂那边失利了，而且技术馆也遭到攻击，联指有

两条大船正准备在桥头阵地登陆。我打断他，谁告诉这个消息的？他说是方块接王某的电话后说的。我立即感觉这个抗美援朝时立功的老兵其实是个脓包！王反修安排他作为党校前沿指挥部的指挥是今晚失利的第一罪魁，而他自己逃跑后至今不知下落。我后悔开始时过分重视文化宫总指挥部了，我一开始就应该到党校来，因为前边的电话线都只拉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单线转文化宫。其实只要再拉一条技术馆到党校的电话线，线路不过千米，总指挥部完全应该设于此地。这有我自己的决策责任。

老龙继续说，知道形势紧张之后，他们全部后勤人员都留在桥头阵地协助防守，但注意力都集中到柳江江面上去了。没料到联指从守桥部队营房里打过来，正打击着桥头阵地的后方。副支队长杨首先被炸，他躺在铁轨边装死，联指从他身边攻过来，曹大个接着被手榴弹炸伤；糖醋冲过去救护，我看很危险，叫她别过去。她不听，硬是冲过去了。联指上来几个人，把她抓走了。老龙十分伤心："我看着他们把她拉扯走的，上了柳江铁桥。她拼命挣扎拼命喊，我本来可以开枪扫射，那几个家伙一个也跑不了。我怕打着糖醋，怎么也扣不了扳机。她就在我眼皮底下给抓走了！"说着就流下眼泪。我责骂道："你他妈的真窝囊！宁可打死她也不能让他们把她抓走啊！"老龙忽然对着我吼起来："我他妈的下不了手！"

我们都知道"联指"是如何对待女俘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会把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地凌辱。而且被"联指"俘虏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特别是我们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五月下旬，南宁铁中两个老初三的女生与我的小学同学常刘弟一起来柳州，企图向我们求援一些武器。结果在柳州火车站被联指认出来抓走了，其中一个是我在南宁铁中同学的妹妹王惠平。这女孩十分漂亮，她妈妈从南宁跑来，几乎成天以泪洗面。我找军管会曹参谋长帮助救援他们三个，一直没有结果。六一那天傍晚，联指主动撤退，我们在火车站前面联指放弃的空大楼里发现了常刘弟的尸体，他赤裸着身子被反绑着双手，心脏部位有一个枪眼。后来另一个刘姓女孩跑回来了，她对我哭诉了那几天的遭遇：赤裸着被强迫跳舞、跑步，那些联指的武斗人员不时来凌辱一番。六一那天是柳州分局军管会一个军官乘乱把她救出来的，给她一套衣服叫她赶紧跑，这才得以逃生的。更让我担心的是，她与王惠平已经分开几天了，不知道王的下落。

我下令到处寻找，一定要找到，哪怕是一具尸体。但始终没有找到，活不见人，死没见尸。大约在六月十三四号，军管会来人通知，王惠平被释放了，但伤很重，要我们在铁桥头做好医护接人的准备。我马上通知医院，准备好一切可能的救护器材和车辆，王惠平的妈妈也亲自到铁桥头接她的女儿。两个解放军战士抬着担架过桥来，陪同的还有两名军官。我们的医生掀开白床单一看，下边是赤裸着奄奄一息的王惠平。这时护送她过来的军官才告诉我们的人，她是今天天刚亮时被一部汽车扔到柳州军分区门口的，当时就一丝不挂。

在救护车上，她睁开眼睛对母亲说了一句："妈，给我报仇。"便咽气了。到林场我们的医院，老太颇去给尸体拍照，我也去了，身上明显的伤并不多，只有乳房上满是伤痕，下身流着十分腥臭的液体。我们安排由一位原公

安法医验尸，后来曹参谋长也来了，听完法医的耳语之后，他骂了一声："该死的畜生！"然后对着尸体立正并敬了一个严肃的军礼。王妈妈哭喊着要我替她女儿申冤，我心里十分明白，这冤屈永远难申的了。中央已经不会听我们说任何东西，再冤枉也将石沉大海。

王惠平之死，使我沉思了好几天。他哥哥是我初中高一届同学，因为乒乓球打得好，没毕业就进了自治区体工大队。小惠平是个活泼聪明的女孩，跳舞唱歌都挺出色，我们都觉得她长大了会是一个文艺尖子。我到柳州上高中就没见过她，不过三四年功夫，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结果居然如此悲惨！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对方原本也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许多人还是转业军人。是什么使本来善良的人变成野兽？

我已经想了许久，始终没有想出个道道来。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武宣有人被挖肝吃掉我们已经听说，只是将信将疑。面对王惠平的尸体，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中央文件一再强调严禁"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越斗越厉害。我想，其实老毛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而且乐此不疲！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其实就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个被奉之为经典的阶级斗争学说，本质就是煽动仇恨的邪说，它使一切人的同情心丧失殆尽，并逐渐归于兽性。文革，正是这个理论登峰造极的演示，老毛就是这个邪恶运动的罪魁祸首。

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其手段的卑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利用天真无知的青少年来实现政治斗争的目标，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奸淫幼女！后来，尽管我的队伍没有任何人打过对方任何人，我们却成了"杀人放火"；而曹参谋长敬那个军礼，后来也成了"挑动武斗"的罪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人类最卑鄙的行为，这是我亲身经历教育我认识的结论，即使成为一堆骨灰，我也不会改变这个认识！

现在我们的糖醋又被抓走了，她甚至比王惠平更漂亮，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当时我真的怨恨老龙没有开枪，如果她又成为第二个王惠平，怎么办？后来有一部电影展现了要击毙即将被日本兵俘虏的女战士的情景，我很理解，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也很清楚我们的任何牺牲都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换取以后更少牺牲而付出的代价罢了，不应该让她受到折磨，更何况开枪或许她只是受伤，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呢？也许我是错的，她后来安全地活着回来了，抓她的是柳铁联指，没我想象的那么野蛮。

没多久，电话传来消息，我们的人推进到木材厂了，没遇到抵抗。我松了口气，这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联指"其实只是过来骚扰一下，他们其实并不打算进攻。如果没有硬仗要打，我们付出的牺牲就会减少。我期望这样。于是马上布置守着电话的小辫子：如果木材厂那边电话接通，告诉他们联指已经撤退，大胆地收复磨滩村，找到丘八、李湘他们。拂晓时分，"闯将"打来电话，他们已经控制了磨滩村。占领木材厂时电话没接通，他自作主张进入磨滩村的。没有任何交火，联指撤退了。看来他有点不解气："他妈的，连一枪都没放！

直到下午，我们只找到了丘八和李湘的尸体，还有李能没有找到。李湘是被柳北打过来的机关炮击中的，丘八为了寻找李湘，硬是不听劝阻冲上去的，连手榴弹也没拿一颗。赤手空拳上去后，显然被联指抓住了，双手被反绑

着，一只脚掌被砍掉，然后被枪杀的，那几枪都打在脸上，我们无法辨认他的相貌，只是从衣着、体形上判断是他。这一对恋人，或许相互间还没有来得及表示爱意，便只能到地下去做连理枝了！我不由得想起出发前跟他开的玩笑，也后悔没有阻拦他。我的部下告诉我他们的尸体运回学校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看他一眼。堪称至交的好同学、好朋友，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已经和我们永别了，不过20岁。我们却已经经历了许多老人也未能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接着，老龙来请示如何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冷漠地说："别开了！就这么埋了吧。"老龙显然不理解，愣着看我。我告诉他："追悼会一开，一切都交差了，都结束了。我真的不愿意就这么结束。"老龙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情，一言不发地退出去了。后来他们还是开了追悼会，不过形式变了，其实是在校园那块墓地上的葬礼。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用那台"钟声601"磁带录音机反复地播放莫兆明生前自弹自唱的《联合战队之歌》，是他作词作曲，经我修改了歌词的那首歌。一连几个小时，任凭眼泪默默地流，衣襟全都湿透了。

现在，李能在哪里呢？闯将判断是被抓到柳北去了，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相信的事情。闯将告诉我，无论谁喊他，他都会以为是李能回来了。但李能确实没有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联指"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重伤员，抢救上船运回柳北。没想到在江中间时，有人把他认出来了。于是被扔到江里，至今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或任何遗物。当人性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十恶不赦的罪状批判时，残忍是无产阶级必须的斗争精神，老毛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的雷锋叔叔也有言："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那么，你还能指望文明世界的什么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坷！"在文革中我极度鄙视"联动"，不过却认同他们的一个口号："活着干，死了算！"当一个又一个与你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朋友接连死去，昨天还在一起活蹦乱跳，今天就成为永远的过去，那份疼痛逐渐变得麻木。我们都不过20岁上下，今天同样年龄的孩子们几乎还都在撒娇。我于是常常惶惑，我们是否承受的太多了！

23日，总部开始策划攻打柳南防腐厂、大修队一带联指盘踞的阵地。包括磨滩村后面那个村庄，记不清叫什么名了。我们联战的弟兄们坚决要求主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自己的死难兄弟姐妹报仇，那种心情只有我丝毫也无。我明白那仇根本报不了，需要的只是赶走这些家伙，巩固我们的地盘，给他们造成恐惧心理，待中央收拾我们的时候，他们没机会施展屠杀的手段。

一支队坚决请战，一伙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青工武装，也要求参加联战的队伍共同主攻。我们终于担负了磨滩阵地的主攻任务，其实就是我的一句话而已。那时我在总部已经一言九鼎的了，连柳州市的廖胡子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余修知道他们属于尖刀班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九支队属于另一路尖刀班，闯将却丝毫没有高兴的迹象。我问他是否有畏难情绪，要不就让二支队、六支队替换？他笑着回答：你要是敢换掉我们，弟兄们马上干掉你！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要是能救回李能就好了。"

25日夜晚，我亲自带队上阵。我在前几天的表现无疑给他们极好的印象，这使我感到极大温暖。还有什么能比弟兄们的信任更鼓舞人的呢？但他们到了铁路水电段就不许我前进了，前线指挥部设在那里。

这一仗打了三天，结果是把联指彻底赶出了柳南，而且我们真的连一个伤员都没有。这也是文革中武斗的最后一仗，后来《七三布告》下达了，联指知道他们胜局已定，不需要再打。我也清楚我们败局已定，只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每一次挣扎的机会。我们的报纸按照我的要求连续发表好几篇文章，为的是要在历史的记载中留下一点真实。

柳州的局面果然如我所期盼，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我们五个头全部在北京被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但留在家的负责人照样组织得很好，坚持先交枪后欢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大家也都明白，这不是为了照顾我们，而是为了照顾铁路畅通。（完）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大约在1983年前后，（记不准了，具体时间容查证再说。）于修从武汉来信，大意是说武汉的果蔗很畅销，每市斤批发价在二角左右。他和猿猴商量，让我在广西弄一车皮果蔗到武汉，哥们也在商品大潮里拾两个蚌壳。

我当时正忙着厂子的扩建，原来发配到厂子里的工程师们都落实政策走了，俺们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厂子就成了我“称大王”的地方。工艺、设备、土建、电力技术全归我管，虽然月薪只有38.5元，整天忙活，夜里画图，不亦乐乎。

于修这个建议确实使我动心，出去一打听，本地果蔗送到站台每斤0.11元，一个车皮10万斤，刨去每斤平均二分的各项费用，可赚七千块！即使每斤只赚五分钱，那也是五千。三分天下，俺净赚1600以上，顶得俺三年的工资！

于是行动。

一打听，每个车皮至少可以塞11万斤，稍微装好一点就是12万斤，预算收入会超过两千！问题也接着来了，本钱上哪儿找？大约15000元，那时绝不是小数字。好在于修下一封信又来了，不但可以解决一万元现钞，还约定了通电话的办法：他晚上可以到铁路的熟人值班室打铁路电话，约定我接电话，并把我接电话的号码电报告知。

我每天夜里都在办公室画图，电话可以随时接。只是要我出那五千，有点难。我发电报当晚，电讯到底比邮件快，于修的电话就来了。我们讨论了各项细节，他打保票说他做果菜生意的朋友多，绝对亏不了。我也告诉他，世界上没有一个生意不是算着有赚才去做的，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他一再保证后，我答应筹足余款，做一车试试。

次日寻访火车站，那里的计划、调度有好几个熟人。没想到这一去就喜出望外，站调老陈，文革时是俺的铁杆部下，他告诉我，连那五千都不必筹，他帮忙解决。车皮计划要报是来不及的，他给变更落空计划，每个月都会有几十个这样的车皮的。

于修的汇款还没到，老陈就落实了：原来他答应帮一个甘蔗货主解决一个到西安的车皮，那个货主先收一半订金给我弄一车果蔗来。简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修的汇款到达，那位仁兄连甘蔗都进了站台。我又没功夫办具体事，于是干脆交给他一万，什么都由他办好。我把领货小票寄给于修，请老陈和这位老兄吃一餐。却不料席间老陈一口一个“司令”地叫，那位仁兄居然也是我们这一派的，述说了一通我们文革时遭的罪，他死活坚持把饭钱也掏了。

未几，武汉传来好消息，净赚六千多。全部钱寄过来，任务是继续发两车。我已经与这位仁兄成了朋友，两车也顺利运到武汉并马上出手。于修在电话里口沫横飞，社会主义的美景被他描绘得活灵活现，太阳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于修跟着要继续发三车，并乐滋滋地预言：今年最后一批，做完就收兵，马上我们就会成万元户。于是俺每晚都梦见黄粱熟了，那香气简直可以飘几十里！不由得记起毛 主席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来。

这回消息来得迟了，好几晚都不见电话铃响。电话终于来了，他那永远快乐的声调全没了，告知我：武汉落实“五讲四美三热爱”，制定的具体措施中有一条，街上吐一口甘蔗渣，罚款五角。于是甘蔗没人要了，只好慢慢来。然后把北大、清华都骂了个狗血喷头，因为他记不清究竟是哪个学校提出这个该死的口号，原先他描绘的武汉人酷爱吃甘蔗的美好春光，一下子就变成“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为了证实他们确实尽了力，而且不是在蒙我，于修建议我亲自到武汉走一趟。

再过两天，恰好路局领导来视察，罗总工程师提议让我跟他一起出去参观一下水泥厂。我马上提议先到黄石华新水泥厂，再下罗总要去的苏州雪浪采石水泥厂。罗总立即答应了，他说正好顺便拜访武汉的朋友。

一到武汉，电话里猿猴的同事说，这家伙近几天失了魂似的，有空就往外跑，这会儿没在厂里。等我和罗总工武汉铁路分局办完一点事情，罗总工应约到朋友处吃饭，我也说去朋友那儿吃饭。分手后就赶过他们厂里，恰好碰见猿猴。告诉我于修约了几个司机朋友，要把那些变质了的甘蔗拉到滠口那边，倒进长江里去，不然仓租费受不了。还告诉我昨晚就开始了，今天搞完。接着苦笑着诉说了他俩如何在街头卖甘蔗，“怕见到熟人，给厂里头知道了不好，老子戴个大草帽，前头拉得低低的。”

屋漏偏逢连阴雨，于修回来垂头丧气，原来他们被环卫部门抓了个正着。“最后一趟就完了，个巴妈儿的，把老子们捉起了，人家说污染长江，连人带车一起要扣。好话说了几汽车，又买烟又请吃饭，好歹通了，只算一车，罚了几十块钱。”

晚饭在六渡桥那里的一家餐馆吃的，招待几位帮了忙的朋友。席间说得最多的还是他们发动朋友帮助卖甘蔗的故事，那该死的“汉汾酒”，味道简直差极了，绝对是世界上最差的酒。夜里算账，还好，总的说余款还够还债，没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实属万幸。

从此以后，猿猴再也没有染指生意场上的任何事情，于修和我后来都干脆辞职下海。于修不两年就飞黄腾达，并移民中美洲。四年前破产了，直到目前仍没有翻身,前天来电话：“破产也得有破产的本钱，还记得那次卖甘蔗的故事吧，你说的，赚了个经历也是好的。”俺已经破产过两次，现在正准备为第三次破产创造条件。不为别的，

哪怕赚个经历也是好的。

这回记得时间，1985年，厂里成立服务公司，俺当了经理。

缘由起于试点民选厂长，尽管俺太有自知之明了，动员各位不要拿俺当猴耍，却还是以绝对多数当选。上边肯定通不过，因为文革当过头儿，属于“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角儿。不过，我心里没有丝毫的不平衡。一个从政的朋友告诉我：上边有精神，据说是某老爷子的意旨，当过红卫兵的一代人原则上不能提拔为党棍，只能从事技术或行政业务。所谓年轻化、知识化，不过是绕过这一代人的托词，等老一辈的都退出时，更年轻的已经起来了。相比于那些并没有当过造反头目的人，俺不如他们冤。不过处长是老爹的老同事，文革时也“亮相”到俺们这一派的，又正好风行“服务公司”，照顾情绪让俺当经理。

没多久，原籍拱北的处长来电话，他老弟在珠海联系了一项工程，希望我去一趟。这是一个炸山的工程，据说要把板樟山炸开一个缺口，使拱北与香州连成一片。而我们这个厂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一直在炸山，为铁路道渣提供石料，已经炸平了几座山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都在我这个公司，吃掉这个工程实在是驾轻就熟。

到了珠海，到处都在建房修路，一片施工景象。林处长的老弟在拱北等候着我，我住进拱北邮政宾馆就与他联系，接上头他便带我坐中巴前往前山，依旧是到处修路，不过基本上不塞车，没多久就到了地方。绕进山坡上一个不伦不类的住宅区，说是别墅，太拥挤太俗气；说不是别墅，却又全是独立建筑。

进了屋子，那种进了城的乡巴佬的色彩明显不已，最显眼的就是那座享受着香火的关公瓷像。我确实弄不明白，儒家的忠义之偶像，怎么就变为进城农民的财神了。几个操着潮州口音的人都热情地招呼林先生，介绍过后，我开始为本公司吹牛。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然后说他们代表市政府指挥部的某领导，这个炸山工程许多人抢，但只有他们才能决定。然后约定次日喝早茶，他们把市府的那位干部请出来。临告别他们不无得意地吹嘘：深圳、珠海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潮汕人手里。回拱北的的路上，林先生证实潮汕来的干部确实掌握了中层权力。

分手以后我自己到了关闸附近，到处都是兜售“水货”的人，还有缠着你去买旧西服的。也有不少澳门过来买蔬菜的，顺便带过来一些免税店里买的洋烟、洋酒、洋香皂之类，据说卖掉赚的钱就够他们买回要买的蔬菜、副食。第一次到珠海，瞎走，顺便逛了一些电器商店。感觉有些饿，就进了一间不甚豪华的小饭店，后边大棚里堆码着足够装几卡车的“珠江啤酒”。吃饭的人不多，正吃着走过来一位，问我对菜肴是否满意，接着点了根烟坐我对面。

我问他是否私人开的饭店？他连忙摆手，说是广州珠江啤酒厂在珠海的分销点。然后叹气说现在珠海人不喜欢

珠江啤酒，喜欢进口的兰带、生力、嘉士伯什么的。不过这里规定要分配过来批发，八角钱也难卖，只有那些打工崽还喝“珠啤”。等等。这位经理捎带着递过一张名片，欢迎常来关照。闲聊一阵俺就干脆回宾馆看电视，没瞧过香港电视还是有点好奇的。

却不料房间的电话响了，接过知道是林先生到大堂了。未几他带着两个白天见过面的潮州佬，寒暄已毕就直白地问我带了多少钱来？我抱歉地告诉他们，除了差旅费之外，并没有带多少钱。他们很失望，责怪我既然来谈工程，怎么可以不带钱？我说如果需要可以电报通知家里汇过来，电汇是很快的。他们干脆地说，如果没有几万块的见面礼，领导是不会出来喝早茶的。对此我表示不可接受，八字还没一撇就要钱没道理，只有在我们进场后，可以给提成。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其实我已经怀疑这伙人都是骗子，能跟这样的下三烂混在一起的干部，大约只会是“下四烂”。林先生有点抱怨，说他们确实很有能耐。我告诉他林处长没有说要带什么钱，再说，扛几万现金跑那么远也不安全。实话说我也在撒谎。我们公司成立，厂里根本没有给一分钱，只给了报废的山场和一个报废了的土立窑，我们自己开发地下部分的石料，整好土窑烧水泥，卖给湛江地区。厂里的石料和水泥只供铁路内部调拨，是不能卖给地方的。公司刚开业不久，我们根本拿不出哪怕两万块钱。

次日一大早坐船过深圳。无目的地瞎逛了一天，第二天回到广州，已经快晚上10点了。在华南理工读了几年书，广州还是熟悉的。因为住不起高级宾馆，兼之某设计院有一个熟人，便到那附近找了间小旅馆住一张床位。在珠海住单间是为了谈工程摆的谱，花了一百多却白搭，结果非常心疼。现在这间房里有三张床，另两位正在看那台旧电视，香港武打片使他们全神贯注。

我合衣躺下，心不在焉地翻书，心里极不是滋味。虽然是处长叫来的，毕竟花的是本公司的钱，而我们挣钱却不容易。不知何时，那个武打片结束。两位看电视的开始打招呼，接下去的谈话使我明白，他们是广东恩平来的，要珠江啤酒，已经住了三天，还没有搞到货。并告诉我，黑市已经卖到1.1元/瓶。我马上想起珠海批发部那个经理，刚想告诉他们，话到嘴边留下了，俺得想办法把这次的差旅费挣回来。于是，马上宣称我有熟人管商业，或许可以弄到一两车。他俩立即兴奋起来，围过来递烟，许诺说只要搞到，无论进价多少，都给1.1元/瓶，现金交付，不用开票。这一夜，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次日一早，赶紧到我朋友供职的设计院，利用他的电话，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通了那个经理的电话。没想到他也高兴极了，答应以最低价给我，只要帮他完成销售任务。我乘机说不开票是否可以降一点价钱，他答应得飞快：绝对可以降几分钱，具体数目算完才答复。我接着记下了他们的账号。真没想到，我们一直以为开放的广东，也会有如此荒唐的计划经济的事情。

放下电话便马上赶去东山铁路招待所，只有在那儿我才能跟家里通话。接电话的是我的副经理“龙瞎子”，我把事情大约说了一下，问清楚我们又收了点货款，账户上有三万多元。他知道这个消息也兴奋得跟孩子似的，记下账号等，答应立即叫财务电汇两万元过去。并约定尽快赶过来，最迟明天早晨到达中山，让我今晚住到中山，他有个亲戚在中山汽车站宾馆当经理，找到他可以打折。没有他我是忙不过来的，而且这家伙擅长投机倒把，让他来具体操作。

回到招待所，那两位正眼巴巴地等我。说清楚可能有五六车货以后，他俩也乐不可支。不过很谨慎地宣称必须货到付款，为了证实他们有钱，特地亮出存折来，好家伙，足有十万多元哩！我让他们等着，我还得去办事，明天肯定回来找他们，然后可以交货。这两位说他们还得住几天，然后请我吃午饭。席间我才知道，“珠啤”在他们那儿最畅销，零售卖到1.5元。瞧着两位的殷勤劲，我感到这事有谱。

午饭后我搭中巴到中山，到石歧汽车站宾馆，找到他那位亲戚，他却不让我住。理由是太脏了，于是另寻了一处宾馆，友崽管事，折扣不菲。却不料骚扰电话不断：“先生，要小姐吗？价钱不贵。”我这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有“小姐”了。偏偏俺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懦夫，只好把电话撂在一边。次日上午龙瞎子到了，马不停蹄赶过珠海。

到银行查，款没到。那个经理必须收钱才肯发货，真没料到龙瞎子是个颇有心计的家伙，他把电汇底单带来了，经理一看就乐了，忙不迭地去找车，装满车就出发。龙瞎子应经理挽留，呆在珠海。其实俺也看得出，他是扣一个人质，以防款不到位。俺跟着押车奔广州，那两个家伙真的在旅馆里望穿秋水。

款货两迄，电话通知后，才知道人家在广州也有账户。存进去，又发货，到底折腾了几次，俺确实记不清了。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电汇过来的两万，原封不动又退了回去，而我们口袋里还有两万多。龙瞎子高兴得不得了，班师回朝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龙瞎子从镇上匆匆赶回来，向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镇供销社接了广东佬一个大订单，正大批收购干姜片。须知，我们这里的生姜颇有名气，鲜姜每斤八分，倘若遇到那些急于出手的主，也许六分就可以成交。至于每斤生姜可以晒出多少干姜片，谁也不知道。

龙瞎子以身作则，自己掏腰包买了十斤生姜，回家动员老婆孩子，切开了晒成姜片，折合成干姜片每斤八角左右，供销社收购价每斤1.1元，有赚。于是说干就干，龙瞎子不知从哪儿买回一汽车生姜，报账是六分。汽车和人工都是厂里的，分给全厂职工家属加工，龙瞎子成了大忙人。

从厂里职工家里收回姜片，每斤九角计算，第一批干姜片运到镇上，干姜片已经涨到1.2元了。我们公司还有赚，龙瞎子高兴的一颠一颠的。一下子，这间水泥厂就成了干姜片加工厂。所有职工家属就如同《地道战》、《地雷战》里那些堡垒户似的，有空隙就跑回家，到家就切生姜、晒姜片。

干姜片价格直线上涨，后来一直涨到2元多，当然生姜也水涨船高。职工们也知道行情以后，马上背叛了我们公司，干脆自己单干，自己买姜自己卖干姜片。我们这个服务公司基本没了姜味。

不多久，坏消息传来了：供销社停止收购干姜片。有几户干得最起劲的跑来求我们公司帮忙收购他们做好的干姜片，即使便宜点也行。

龙瞎子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接着他又打探到真实的消息，供销社几座仓库里堆满了干姜片。原来竟然是上了广东佬的当：那几个广东佬跟供销社签了合同，付了订金，而且按时付款提了前几批货。把价格哄抬起来以后，他们又把以前低价提走的货转回头高价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点，便胜利大逃亡了。

据说供销社损失了几十万。至于各家各户卖不出去的，没人知道有多少。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公司的小郑、小周，坐火车时认识了邕宁县外贸公司的经理。他俩回来报告的消息是：该公司欲收购河南产的白蒜头，出口法国。如果我们有能耐搞到货，并解决到达广州黄埔港的车皮，可以跟我们签订十个车皮的合同。

经过龙瞎子打探和计算，我们可以净赚十万元以上。这是一个大生意，本经理亲自出马，跑到邕宁县签订了合同。人家死活不愿意付定金，说是外贸公司没有付定金的先例，但合同上可以签上违约金，两万五千元。

回来就把公司的两个女将小胡、小徐派了差，否则她们老是抗议我歧视女性。龙瞎子指引的目标：开封。

没几天她们打电话回来说：符合标准的白蒜头产于江苏丰县，保证直径四公分以上，每头不超过七瓣。价格比开封还便宜。于是批准她们前往。再接到电话时，她们已经跑到山东滕县去了。说是路上遇见滕县果菜公司的李经理，答应帮助收购，而且滕县蒜头比丰县更好，是外贸出口基地。

不过我犯愁了。因为郑州铁路局是我的根据地，原来一起插队的那帮家伙，好几个招工到了铁路运输部门，宙宙已经帮我问过，搞十个广州车皮没问题。那时到广州的车皮，比皇帝的女儿还金贵，滕县属于济南局，俺们啥关系也没有，车皮咋办？

两位女将说，李经理说，既然是出口，他们历来走青岛港，路局内车皮容易搞。我又跑到邕宁，外贸公司说，可以改在青岛交货，那里船期还可以。为了慎重起见，又签订了一个补充合同。不日，样板蒜头寄回来了，一个个跟大胖小子似的，确实漂亮。龙瞎子送去外贸公司封样，据说他们也同声赞叹。

我们付了大半订金，果菜公司负责收购。

一切顺利进行时，外贸公司来了加急电报：因为法国客户原因，蒜头不要了。

赶紧过去讨个说法，人家摆出皇家气派，不予理会。龙瞎子威胁要起诉他们，人家根本不在乎，就连合同上规定的违约金，人家也不愿答理。

滕县那边已经收购了七个车皮的货，立即停止也够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没两天，龙瞎子在中山的亲戚就介绍一位港商，给价比外贸公司还高。唯一增加的要求是，我们要代办出口。这时我才想起来，俺的三姨父转业到青岛外贸公司了，据说还是经理级的人物。这应该没问题。

为了慎重起见，我亲自奔山东处理，龙瞎子下广东签约。等我到了滕县，龙瞎子已经来电报说合同签了，对方回香港即付25%的定金。剩下的事情就是办理出口手续，于是赶去青岛。好几年不见，姥爷、姥姥见了我简直高兴极了，还说俺那位三姨父是书记，不会有问题。

三姨父过来挺亲热，我一说委托出口的事情他就严肃起来了：你们算是什么公司？怎么也能出口？我解释了老半天，他却不为所动。规矩非常简单，必须外贸公司才有资格跟香港签合同，我们自己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告诉他，在我们那儿什么公司都可以跟香港签合同。他的回答让我永世不忘："你们那是敌占区，我们这是解放区！都像你们这样乱搞，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完了，别求他。我赶回滕县，那个果菜公司李经理倒是有许多同情心，他答应以他们公司名义帮我们找他们县里的外贸代办出口。于是心上的一颗石头落了下去，只是还没落到地面，更坏的消息来了：跟龙瞎子通电话时，他告诉我们，香港佬也不要货了，那25%的定金压根儿就没付。

天还是有绝人之路的，简直绝透了！

两位女将看见我那副颓丧相，赶紧帮着掉眼泪。恰好李经理过来，瞧着这场景却乐了。这位魁梧英俊的山东大汉说："别伤心了，我正来跟你们商量，有内蒙的客户来要蒜头，给他们吧。慢慢来，就别指望出口，卖给国内得了，资本主义靠不住。"

于是他帮着给内蒙，给河北，给辽宁，不多时就处理得差不多。剩下大概两三吨，发零担回去，不然差旅费受不了。回去后那些大蒜头足足处理了几个月，总的算起来亏了几乎一万块。直至一年多以后，我们终于从外贸公司讨回了那两万五的违约金。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从山东返回广西，在前往郑州的火车上遇见一群广西老乡。他们是几个地方的粮油商，国营、私营都有。领头的那位对我们的两位女士格外殷勤，交谈之后知道他是南宁市粮油供销公司的副总经理，居然与龙瞎子同姓。听说了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之后，奉劝我们专心做粮油生意，“粮油总是要吃掉的，永远卖不完，批量大一样赚钱。”我对他的看法有点认同，于是他表示可以协助我们销售，我们可以协助他们要车皮。这是一个好建议。

到郑州以后，我必须去看望宙宙，龙经理热情地邀请两位女士与他们一起先行，到螺河，那里有我们广西粮油贩子们的基地。我同意后，她俩跟这伙粮油贩子没出站台就上车走了。我到郑州跟着宙宙拜访了几位插友，顺便弄清楚搞车皮的路数。麻烦的是，螺河以下的车皮还要跑武汉分局。

次日到螺河，寻着螺河旅社，这里真的有一个广西佬的地盘，川流不息地往来着广西的粮油贩子，交流信息，互通有无。甚至连厨房设备都齐全，因为北方饭食都吃不惯。主持着这个据点的是玉林人阿劳，这小子连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认识了这一批人，交流了各种粮油食品的采购、运输、销售及付款方式，我返回，小徐因孩子在家不放心，跟我同车返回，留下小胡一个，我们发现龙副总特别兴奋。

到了厂里，我和龙瞎子、艾头商量今后的业务方向。艾头是四野南下的干部，刚从厂长位置上离休，在我们公司挂副经理，主持生产那一摊。他俩都支持以粮油贸易为主，龙瞎子还炫耀了一通他在本地粮油行业的关系。

之后，小胡来电话，说龙副总可以从他们的货源中给一车皮黄豆，单价0.43元。龙瞎子当即拍板说可以介绍。我和艾头要求他找一个买主批发掉，我们没有经验，而且零售费时间，资金恐怕支撑不下去。两三天功夫他就找来广东遂溪县一家服务公司的经理，与我们签订了合同，遂溪车站交货，每斤0.49元。龙瞎子算了一下，这一车皮可以赚四千块以上。

但螺河那边要钱，账户上留一万维持生产之外，还可以调三万，不够货款的。电话联系过之后，小胡说可以了，差价让龙副总垫。然后描述了龙副总的殷勤劲，不无得意。小徐在电话里千万交代，提高革命警惕性，这家伙不怀好意。

调过去三万元，没几天车皮就发出了，到站直接抵达遂溪。龙瞎子收到铁路内部快件寄来的单据，根据装车的件数，跟遂溪结算了货款，转账之后便交付了领货凭证。龙瞎子刨去费用，算了半天告诉我：除了小胡的差旅费还没算之外，净赚四千七。然后得出结论说，还是这样好，不用费太多周折，赚得干脆利落。

没两天那家服务公司经理找上门来，哭丧着脸要我们下去处理质量问题。我和龙瞎子一起到遂溪，只见他们的

货棚里堆积着两批麻袋，经理告诉我们，那边新麻袋装的黄豆，质量没有问题，这边一百多旧麻袋装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他叫了两个工人，随意挑了一麻袋出来，打开一看我就傻眼了，里边除黄豆之外，还有许多杂质，甚至还有土疙瘩。该死的河南老乡，玩奸也别玩到俺们头上，真个是萁豆相燃了。

我和龙瞎子商量了一阵，答应他们派工人过筛，把杂质刨掉，我们退回相应货款。龙瞎子呆在旁边看着，我下湛江去结算一笔石料款，次日中午返回，眼前的景象把我吓一跳：筛出来的杂质足可以装一汽车，土疙瘩、碎砖头、混凝土碎块混杂在灰土里，甚至还有一个残缺的水缸底！俺们的贫下中农可真是好样的。

龙瞎子跟对方算过账，五千多斤黄豆抵过这堆杂质，所有费用算在一起，得退给人家两千八。后来查问才知道，因为原来给的车皮通知是五十吨的，进站也是按此吨位备货。后来实际给的是六十吨车皮，临时调来十吨货填补，就这十吨货出的问题。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不管怎么说，粮油生意至少没那么大风险，确实比较稳当。公司的进账虽然不显著，但积累还是逐步增加的。家底一厚，头脑就开始发热。

小郑和小周看见小胡经常得到表扬，还有比他们多的奖金，自然很眼馋。于是提出要发运甘蔗。这玩意儿是本地特产，每年一到季节就有大批北方客户来采购，乃至于火车站把战备线用作甘蔗专用站台，每天十几节车皮外运。他俩合伙寻得个陕西三原的客户，由我们代办发运，因为厂里有铁路专用线，不需与别的客户争站台，也属得天独厚。

但是，应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近代谚语，火车站也有服务公司，他们以调车难为由，总是不按时给车皮。而那些甘蔗停在站台上晒太阳，每天都会赊秤头，还要影响观感和质量。我到分局寻过几次，车站自有车站的办法，始终改观不大。于是陕西的客户便被车站服务公司抢过去了。

小郑找我，不如自己发货上去，收入还高。卖一个车皮的甘蔗，收入相当于代办三个车皮。于是我答应他们试试。艾头不甚赞成，理由是“货到地头死”，人生地不熟的肯定搞不掂。见我不当回事，于是“违心地”同意了。其实我的潜意识里，还有扳回一局的成分，上次与于修他们贩运甘蔗亏了，这次赢回来。

小周的亲戚在河南平顶山，也搞服务公司，说好了我们发一车甘蔗，他们负责销售，利润三七开，因为他们出不起钱。合同既然签订，我们就自己发车。俩货特别积极，专门跑到贵县新墟乡寻得一片优质甘蔗，整片包下，据说价格只抵得几分钱一斤。

计划订得十分完美：在春节前二十天左右运到，那边报来的价格达两角三到两角五。而且各单位都要分年货，这玩意儿经济实惠，每年都很受欢迎。甘蔗是农民包砍的，厂里的汽车队负责运输，省了一笔运费。装车那天，厂里热闹非凡，似乎大家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原来发运三原的甘蔗，并没有谁关心过。

火车开出，小周和小郑也奔上旅程。原来打算叫小胡从螺河转过去，他俩坚决不干，大有一比高低的气概。没多久便得到消息，一切平安。但接着就有写波折：在我们的货到达前几天，陆续到达好几个车皮的甘蔗，销售可能有点不顺。我叫他俩赶紧寻单位售出，价格可以低一点，不赔为底线。

又过几天，仍没有打开局面，我感觉不好，兼之春节前也该到郑州、螺河拜访铁路和粮油关系部门，于是亲自北上。到了平顶山，才发现这个城市很分散，颇费了些时间才找到我们那家合作公司。他们派人领着我到了甘蔗所

在地，天那，我们那车甘蔗似乎没有动多少。小郑和小周正蜷缩在篷布遮盖的甘蔗一角，钻进去一看，像是个帐篷。

原来他俩为了节约费用，没住旅社，买了处理军被和煤油炉、锅碗，吃住都在甘蔗堆旁。还可以看着甘蔗，省两个顾人看守的费用。天阴冷潮湿，真难为这两个家伙了。询问一下情况，卖出去四万多斤，还有八万多斤，主要是前边来的货多了，多数单位都已经买了那些货。小郑说，好几个单位都后悔，我们的甘蔗质量特别好，但他们已经买了，只能遗憾。而小周那个亲戚的公司，所属单位的头头看见情况不妙，不许他们介入了，盈亏一律我们自理。

正说着，帐篷外有人问：甘蔗咋卖？他俩连忙窜了出去，陪着笑脸跟人家讨价还价。末了，那人蹬着平板三轮拉了四捆甘蔗走了。我出来看，北风吹着丝丝冷雨，正吹洒在篷布上。小郑数着钱，然后告诉说今早到现在，总共卖了不到三百块。我们再分析一下，头几天还卖出去多一些，现在是越卖越难卖了。批零兼顾，也没什么大动静。小周的那位亲戚，私下还到处帮寻买主，听说有个矿还没买年货，但愿能谈成。

我提了些建议，是否到农村集镇去推销，只指望单位恐怕不行。这两个小伙子说，也不成气候，主要是前边来的货太多了。顺手一指，不很远处也有一个甘蔗大棚，似乎那甘蔗比我们还要多。

眼瞧着要到晚饭时候，我建议他俩跟我一起找个饭馆吃饭，他俩都推脱不去，理由是可能会有人来要甘蔗。小周提议：头儿，你也别去了，我们一起吃煤油炉煮的饭吧，也算你体验一下生活。我答应了，不过，我说我是肉食动物，得有肉才行。小周叹道：北方跟我们那儿不一样，下午就难买新鲜菜了。小郑叫那个聘来的小伙计，让他跟着去附近一个熟食店，买点熟食。捎带一瓶酒，今晚跟领导喝二两。

喝着“二锅头”，嚼着酱驴肉，他俩诉说着这一趟的辛苦与艰难，发誓以后永远也不搞“送货上门”的营生了，只想着我们自己这一车，没有查一下发货的运输计划，是最深刻的教训。小周气愤说他那个亲戚单位的头儿，一看见甘蔗多了，就撕毁合同。说要起诉他们，那个头根本不在乎：“在平顶山地头上，俺还怕你们了？”

夜里，我没去找旅馆，三个人挤在帐篷里。外边的北风松一阵紧一阵的，我也说不清是受罪还是一种享受。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到郑州螺河办完事，又回到平顶山，那堆甘蔗似乎少了点，又似乎没有少。小郑告诉我，已经去了五万多斤，接着告诉我，这两天又到了几车，看来情况越来越不妙。

他俩决定春节不回去了，决心要卖掉这批甘蔗。小郑说，千万不能亏本了，要是亏了，以后在公司怎么做人？

春节后，他俩回来了，真的没有亏本，确实难为他俩了。

常在河边站，不可能永不湿鞋的。在生意场上，受骗不是新闻，不受骗才是新闻。企望永不受骗，恰如上战场却指望不受伤一样。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长期或宏观意义上的生意，而不是短期或具体的生意。

我们在螺河搞的其实都是饲料原料，货源难寻且资金有限。逐渐地在龙副的劝导下转到信阳去搞大米，广西的大米竟然还需要从外边调，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在信阳发运了一阵大米之后，住在同一个旅社有人找我。谈过才知道他们是珠海斗门县白蕉粮所的，跑到河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们那里越来越多农民以钱代替粮食充抵公粮，现在需要买米顶公粮数，而且当地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大米常常不够供应。计划内调拨的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所以必须自己采购大米。现在头疼的是搞不到广州车皮，据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搞车皮计划有路子特来请求帮助。

其实我们搞广州车皮也挺难，我提供了一个路径：火车发运广西贵港，那里有下河线，火车皮可以直接到码头，卸车就直接装船。斗门就在西江边，船可以直接运到斗门卸货。这样车皮就好搞一些，比死等广州车皮容易多了。

没想到他们商量以后提出一个办法：大米差价不是很大，给我们提成加价都不容易处理。而且有了车皮计划未必就能发车，还必须跑武汉调度所请求发车，也是没谱的事情。即使运到广西贵港，也必须找船，协调车船衔接关系。不如这样，干脆给我们20万元，让我们用，在两个月内，我们负责按贵港开船价格计算，每斤标二米0.40元，把20万全部还他们大米。如果是标一米，每斤加五分。

这是一个好机遇，我连犹豫的功夫都没有，立即答应了。因为标二米在信阳收购，每斤0.35元以下，标一米也不超过0.38元。而且这两种米都可以直接从粮所购买，没有质量忧虑。那些市场米价格甚至低到0.25元，但质量必须很费劲，你简直要每一麻袋检查，否则里边碎米率太高还不说，糠纰石砾绝对要你没脾气。只是四川那些粮贩子不在乎，他们调回去的大米基本上都用于酿酒。我们最缺的是流动资金，20万足够四、五个车皮的货，两个月也可以周转两、三次，最后发货我们还有赚。他们要了我们家里的账号，并约定回去可以邮寄签合同。天上不会掉馅饼，权当说说，俺也不太相信他们真的会兑现。

过了没有几天，家里电话问我，收到斗门白蕉粮所电汇的20万元，是干什么的？艾头甚至怀疑是否别人打错款了，叫赶紧给人家退回去。会计见回单上明白地写着我们公司的名字，才来电话询问。天上真的会掉馅饼！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交代家里注意查收邮件，因为还会有合同寄来。结果至今也没有寄合同来。

我们的货款从来就是几万的档次，如今一下子有了二十万，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油然而生，走起路来都脚下生风。原来跟别人谈生意总是战战兢兢的，如今多神气："你给我组织十个车皮，一次走五个，见货付款！"对方立即会毕恭毕敬地仰望着你，那感觉，真是"味道好极了"。连龙副他们都羡慕不已，一个劲抱怨自己走夜路怎么就没踩中牛屎。

这一得意就忘形，第一单生意就是被骗。

到处寻合适的货源也不容易，眼瞧着时间过去却发不出货自己也着急。那天一个信阳劳动局服务公司的熟人小尹来报，西工路那家采购站有货源，标二米0.32元。我和他一起去了，那位姓李的经理称其在息县一个粮所订购了五个车皮的标二米，可以转让给我们，叫价0.32元。他还拿出合同原件，我看见他们进价0.30元，看来合理。我们马上签订合同，虽然有点犹豫，还是付给定金四万元。

然后就是拖，李经理总有理由搪塞。再往后我打了个长途电话到那个粮所，人家说压根儿没这事。还告诉我他们这是旱地，大米还需调进。不过挺热情地介绍说有芝麻和蚕豆，可以大量供应，可惜俺不需要。

好在俺信阳朋友多，加上介绍人小尹自己也不好意思，很快把李经理家都找到了。软硬兼施的结果是追回一万元。接下去便是打官司，李要求和解，把仓库里的白酒和陈醋以及水果罐头顶账。我坚决不从。小尹帮忙寻得办案法官，喝了两餐拍打胸膛保证我赢。吐着酒气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

我还得赶紧利用这笔资金，眼瞧信阳大米合适的少，那些市场米实在不想要，于是委托小尹负责官司的事，我跑到湖北武昌县城去要货去了。不日回来，小尹带我去找那位法官，他保证很快就判决，一定不叫我吃亏。那天我们和车站的朋友去酒楼吃饭，没想到那个李经理正在里边招待客人，及至酒足饭饱出门时，路过李那间包厢，从开着半边的门里望进去，保证我赢的法官正是李经理招待的客人。

最后，我们终于胜诉了，法官实现了诺言。我们得到了李经理被执行的白酒和陈醋，水果罐头没了。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起诉，免了诉讼费还多得些水果罐头，更别说喝酒的开支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常在河边站，不可能永不湿鞋的。在生意场上，受骗不是新闻，不受骗才是新闻。企望永不受骗，恰如上战场却指望不受伤一样。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长期或宏观意义上的生意，而不是短期或具体的生意。

我们在螺河搞的其实都是饲料原料，货源难寻且资金有限。逐渐地在龙副的劝导下转到信阳去搞大米，广西的大米竟然还需要从外边调，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在信阳发运了一阵大米之后，住在同一个旅社有人找我。谈过才知道他们是珠海斗门县白蕉粮所的，跑到河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们那里越来越多农民以钱代替粮食充抵公粮，现在需要买米顶公粮数，而且当地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大米常常不够供应。计划内调拨的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所以必须自己采购大米。现在头疼的是搞不到广州车皮，据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搞车皮计划有路子特来请求帮助。

其实我们搞广州车皮也挺难，我提供了一个路径：火车发运广西贵港，那里有下河线，火车皮可以直接到码头，卸车就直接装船。斗门就在西江边，船可以直接运到斗门卸货。这样车皮就好搞一些，比死等广州车皮容易多了。

没想到他们商量以后提出一个办法：大米差价不是很大，给我们提成加价都不容易处理。而且有了车皮计划未必就能发车，还必须跑武汉调度所请求发车，也是没谱的事情。即使运到广西贵港，也必须找船，协调车船衔接关系。不如这样，干脆给我们20万元，让我们用，在两个月内，我们负责按贵港开船价格计算，每斤标二米0.40元，把20万全部还他们大米。如果是标一米，每斤加五分。

这是一个好机遇，我连犹豫的功夫都没有，立即答应了。因为标二米在信阳收购，每斤0.35元以下，标一米也不超过0.38元。而且这两种米都可以直接从粮所购买，没有质量忧虑。那些市场米价格甚至低到0.25元，但质量必须很费劲，你简直要每一麻袋检查，否则里边碎米率太高还不说，糠纰石砾绝对要你没脾气。只是四川那些粮贩子不在乎，他们调回去的大米基本上都用于酿酒。我们最缺的是流动资金，20万足够四、五个车皮的货，两个月也可以周转两、三次，最后发货我们还有赚。他们要了我们家里的账号，并约定回去可以邮寄签合同。天上不会掉馅饼，权当说说，俺也不太相信他们真的会兑现。

过了没有几天，家里电话问我，收到斗门白蕉粮所电汇的20万元，是干什么的？艾头甚至怀疑是否别人打错款了，叫赶紧给人家退回去。会计见回单上明白地写着我们公司的名字，才来电话询问。天上真的会掉馅饼！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交代家里注意查收邮件，因为还会有合同寄来。结果至今也没有寄合同来。

我们的货款从来就是几万的档次，如今一下子有了二十万，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油然而生，走起路来都脚下生风。原来跟别人谈生意总是战战兢兢的，如今多神气："你给我组织十个车皮，一次走五个，见货付款！"对方立即会毕恭毕敬地仰望着你，那感觉，真是"味道好极了"。连龙副他们都羡慕不已，一个劲抱怨自己走夜路怎么就没踩中牛屎。

这一得意就忘形，第一单生意就是被骗。

到处寻合适的货源也不容易，眼瞧着时间过去却发不出货自己也着急。那天一个信阳劳动局服务公司的熟人小尹来报，西工路那家采购站有货源，标二米0.32元。我和他一起去了，那位姓李的经理称其在息县一个粮所订购了五个车皮的标二米，可以转让给我们，叫价0.32元。他还拿出合同原件，我看见他们进价0.30元，看来合理。我们马上签订合同，虽然有点犹豫，还是付给定金四万元。

然后就是拖，李经理总有理由搪塞。再往后我打了个长途电话到那个粮所，人家说压根儿没这事。还告诉我他们这是旱地，大米还需调进。不过挺热情地介绍说有芝麻和蚕豆，可以大量供应，可惜俺不需要。

好在俺信阳朋友多，加上介绍人小尹自己也不好意思，很快把李经理家都找到了。软硬兼施的结果是追回一万元。接下去便是打官司，李要求和解，把仓库里的白酒和陈醋以及水果罐头顶账。我坚决不从。小尹帮忙寻得办案法官，喝了两餐拍打胸膛保证我赢。吐着酒气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

我还得赶紧利用这笔资金，眼瞧信阳大米合适的少，那些市场米实在不想要，于是委托小尹负责官司的事，我跑到湖北武昌县城去要货去了。不日回来，小尹带我去找那位法官，他保证很快就判决，一定不叫我吃亏。那天我们和车站的朋友去酒楼吃饭，没想到那个李经理正在里边招待客人，及至酒足饭饱出门时，路过李那间包厢，从开着半边的门里望进去，保证我赢的法官正是李经理招待的客人。

最后，我们终于胜诉了，法官实现了诺言。我们得到了李经理被执行的白酒和陈醋，水果罐头没了。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起诉，免了诉讼费还多得些水果罐头，更别说喝酒的开支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如果说欺骗，除了银行被某些客户欺骗之外，还有银行对客户的欺骗。其实中国至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那些所谓银行，对政府而言，不过是金库或钱庄；对客户而言，又不过只是一个当铺。

我们公司是以生产为主的，修复了厂里废弃不用的土立窑，继续向下开采报废了的旧石场。产品基本上卖给湛江，部分水泥供应海南。但这些产品的利润率不高，我们的贸易又因为资金不足也做不了多少。于是财务科长劝我跑银行。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好路子，我们可以建一座大型石灰窑，利用机务段火车头烧过的煤渣，参和一点煤，少卖点石料，烧出生石灰来粉磨，出生石灰粉。

这个念头当初我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时就产生了。那时工地都要挖一个大坑，把生石灰放水浸泡，发它一两个星期。因为时间短了，发不透，抹灰以后就会爆裂，满墙面会出现一个个小坑，像个麻脸。这种麻脸现象甚至会在几年内陆续发生，很令人头疼。再者，生石灰水化反应之时，大量热能被释放，林则徐当年就是利用这种热能“焚烧”鸦片的，它比现在那种浇汽油焚烧毒品的方法先进多了。不过，这种发过的石灰沙浆的强度也因之下降了许多倍。如果用粉磨生石灰粉就可以同时避免上边两种缺陷。

我们经过计算，生产这种石灰粉，国内尚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跟艾头、龙瞎子商量，他们都十分支持。如果这种石灰粉装袋销售，利润率比水泥高得多！而且开创一个新产品品牌，意义也不小。我向新调来的厂长请示，因为我们需要资金。这位厂长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们东搞西搞，我根本不赞成。随便弄点钱，改善一下职工生活就拉倒。还真想做什么大事了？

龙瞎子跑去银行，求贷款。好话说了许多，更要紧的是他的亲戚里有个银行的官员。不过我们没有固定资产抵押，厂里也不肯担保，难度不小。龙瞎子终于把银行的官员领回来了，他们对我们实现计划的前景毫不怀疑，但手续不具备。我于是讥笑他们：银行的唯一宗旨就是向有把握偿还本金、利息的企业放贷。既然你们也不怀疑我们偿还本金、利息的能力，还要抵押或担保，岂不成当铺了？

终于谈妥了。艾头的夫人是厂里家属队的头，她们办了个小型混凝土砌块厂，利用采石车间的渣粉与水泥车间的破包水泥生产水泥砖。许多年来她们都叫“家属队”，在我的建议下她们领取了“预制厂”的营业执照，并扩建了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生产设施。由她们担保，我们获得一年期信贷15万元。

很快，艾头跑到平乐县买回一台淘汰的球磨机，并依山势建石灰窑。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不料银行来追还贷款，说上级来检查发现我们贷款手续不合规章，“预制厂”不是国有企业，不能担保，要提前追回。钱已经花了

大半，设备基本买完，贷款期只开始一个多月，如果不还就要冻结账户。百般无奈之余，只好先把账户上的五万元充还，然后艾头卖掉球磨机等设备，建设中的石灰窑也停下来了，我们自然损失不少。项目便自然泡汤了。

后来买了我们处理设备的老黎，自己开了粉磨石灰厂。不过他比我们聪明，先不建石灰窑，靠买生石灰来生产，后来发达了再扩建，甚至买了大球磨机。如果我们不被提前追还贷款，即使建好石灰窑也无妨。后来生意做久了，见此类上银行当的事也多了。

这次事件被厂里的头儿追究不放。本来如果他同意改由厂子担保也没事，只是我磨破嘴皮他也不干，宁可看着我们损失好几万。后来才知道，缘由是有工人对他提建议，说服务公司生意兴隆，干脆把厂子也并入服务公司算了。这使他的革命警惕性顿时高涨起来，对我们的日常经营也开始横加干预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做生意时，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便是喝酒，无论什么高档白酒，到我口里只有一个味道：又苦又辣。如此毫无酒欲的我，偏偏颇有酒量。时至今日，来它半斤八两的，依旧开车回家不带出错。

在螺河发运玉米、豆类、麦麸、豆箔之类，不时要请人喝酒，否则难办事。铁路上那些人，喝起酒来还有节制，基本没有喝醉的事情发生。粮油部门的就良莠不齐，有的见好就收，有的则死缠烂打，姓什么都忘了还要缠住你不放。许多喝酒的故事都忘记了，但有两次喝酒是忘不了的。

一次我们去河南沈丘县，探得那个粮仓里有几十吨绿豆。一副志在必得的欲望驱使我们招待粮仓主任一行。缘由在于刚发出过一个车皮，原来向西平县一个粮所定了一车皮玉米，及至快要进站装车时，这个粮所的玉米只有半个车皮的货，而且这个所长要搭上他处理不掉的半车皮绿豆，否则连那半车玉米也不给。绿豆不甚好批发，只能零售，为了保证那个宝贵的车皮计划，也为了得到半车玉米，咬牙答应他了。

这个车皮走回去，我们只能先卸到南宁市粮油公司的仓库里。没想到玉米刚卖完，绿豆突然缺货，价格直线上涨。28吨绿豆，我们进价0.38元/斤，卖价0.65元/斤，半天时间就卖完了，赚了一万多。龙瞎子加急电报告诉我，赶紧去进一车皮。差不多探访遍了，只发现沈丘这里有这些货。

或许我过于急迫的表现给这个酒鬼主任有了把柄，于是他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灌那个“张弓大曲”。他每灌下去一盅，我都得奉陪一盅，龙副总狡猾地避让开了，不过我知道他有胃病，不得不担待些。（捎带说一句，去年他去世了。过去老说胃病，结果死于亚急性肝坏死，同我们的宙宙一样。）

借着酒劲，主任不断将军：“你还想要这绿豆么？绿豆解酒，一车皮绿豆够解一辈子酒啦。”为了这车皮绿豆，俺只好舍命陪“君子”了，直喝得天昏地暗。却不料俺忽视了，他是个好胜之徒，如果你不倒下，他会更来劲。我耐不住那小盅子慢慢来，一急就拿起玻璃杯，一瓶酒刚好倒满三杯，对着他喊酒话：“不是说‘感情深一口闷’吗？来，俺俩一对一杯，干了！”他也吼道：“干了，痛快！俺就喜欢你这豪爽性子。”大家都干了，剩下一杯一分为二，也干了。

后来回到房间，我只有在卫生间不出来的份，吐得场光稻尽，然后睡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其他的事情全不记得了，龙副总告诉我，我和那个主任，每人平均喝了一斤半以上。事后我懊恼不已，酒醉的感觉丝毫不亚于大病一场，脑袋又疼又胀，五脏六腑全乱了套。何苦来着，不就是那一车绿豆吗？凭什么要去玩命？

看来，那位主任肯定也不省人事。次日上午，龙副到他们粮仓，他没来。下午我和龙副一起再去，他还没来。直到第三天上午，他到了，我们签订了合同。后来他到螺河，俺们又喝了一次，不过这次他规矩得很，不到三两。

后来我和龙副去到赤峰地区，一个粮站的雷经理与龙副是同行兼老熟人。这个龙副告诉雷："这次我给你带了个能喝的，你们肯定能对上。"我在龙副背后擂了一拳，他大喊大叫一阵便说起了故事：原来他并没有胃病，但是没有酒量。插队招工时，听说他被公社一个副书记的亲戚顶掉了，一急起来就到处找关系，硬喝了几餐，从此落下胃病。雷是个很开朗的人，说说笑笑毫无遮拦。自称是蒙族人，我奇怪地问：蒙族还有雷姓？他说蒙族不止雷姓，别的姓还有。

待到办完事，约定明天签合同，晚上他要请我们吃烤全羊。驱车跑了一阵，到了一个蒙古包组成的饭店里。雷告诉我，这个烤全羊是用干牛粪烧火烤的，绝对正宗。说罢据说是按蒙族的规矩，撕了一只羊腿给我，尽管我自称"肉食动物"，这么一条羊腿还是望而生畏。他说必须这样，吃多少算多少，有刀子，慢慢割就是了。一切都正常进行，雷也是插过队的，大家说起插队时的故事，无论悲喜，都是过眼云烟。

雷用蒙语说了些什么，没多会儿就进来两位蒙族姑娘，还有她们的伴奏乐师。送了哈达，接着唱蒙语的敬酒歌，用银碗敬酒。蒙古人不像河南人那么小肚鸡肠，不用小盅子嘬，而是用银碗哈。继续下去雷就逐步升级了，上来的是号称"塞北茅台"的"集宁老窖"。两个唱过歌的蒙族姑娘一人递过一碗，龙副死活不肯接，蒙族姑娘说了一大堆话，我笑了："幸亏没有一部'内蒙宪法'，要是有，龙副今天非下大狱不可。"雷哈哈大笑，他那几个副手也跟着笑。没料到雷突然说："老龙有胃病，'内蒙宪法'对他实行特赦。而且也是老朋友了，不需要太客气。不过老龙今天已经宣战，由新朋友上！"接着他接过龙副没接的酒，一饮而尽，俺也只得奉陪。

就这么碗来碗去的，龙副劝了几次也无效。我一说少喝点，他们马上就搬出"内蒙宪法"，什么看不起了，什么民族团结了，什么汉族老大哥得给面子了，等等。喝了一阵就是舌头硬了的那个腔调，俺其实不过强撑着应付，那"集宁大曲"连又苦又辣都不见了。唯一清醒之时，就是明白他拿明天签字的事来要挟。我真想说不签就拉倒算了，可是也明白他这是醉话，也不想真的白跑。及至最后，雷叫换碗，换上来的碗，没装半斤也装了四两。雷宣布："老龙表现不好，老哥真够朋友，这碗干了！明天你们公司那两车玉米，每斤下调两分钱，按内部调拨价算账。老龙的就算了。"俺硬着头皮干了那碗酒，既不苦又不辣也不烧心，只想吐出去。

我怎么回宾馆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彻底失去记忆。次日发现，左手食指和中指各鼓起一个大水泡，那是香烟夹在指间烧的，连疼痛感都没有了。不过，正如雷说的，老蒙喝醉了，说话也算数。他真的把我们的两车玉米定了0.12元/斤。龙副那五个车皮，每斤0.14元/斤。这是豪饮的回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我们这个服务公司开办一年多以后，账面资产已经达到120万元。其中，生产部分贡献了大约一半，贸易部分也贡献了一半。因为我们必须发给厂里职工奖金，有一两个月甚至超过厂里的工资部分，口碑越来越好。但因此来自厂里班子的微词也越来越多，特别要命的是那个干脆把厂子合并进服务公司的“幽默”议论。

有一天厂里财务科长小许悄悄告诉我，厂长向铁路局纪检告了我的状，说我在外边跑，吃了许多回扣。我当时就有点手脚冰凉的感觉，因为我们采购都是掏钱出去的，每一批货都要抠门似地讨价还价，为的只是一两分钱。而且后来因为质量保证问题，基本上都是找国有粮食部门要货，何来回扣？我仔细想了许久，无论五金交电还是粮油，我们决无“吃回扣”的可能。再者，我们这几个人甚至厂里的青工，直至今日见面都叫我大哥的，谁会告状呢？为了融洽跟厂里的关系，厂长刚调来我就聘他那没工作的老婆做出纳，简直是教了许久才得以应付的，何以他如此不给面子？不过，屁股上既然没有屎，俺也不怕。

终于有一天，厂里的书记找我谈话，宣布服务公司除了生产这一块继续进行之外，别的生意一律不许做了。我感到很突然，于是提出要求：还有些预付货款必须要回来，另外也得跟上边的合作单位打个招呼，至少得感谢人家的帮助。但书记不许。接着他问了斗门那笔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合同都没签，凭什么汇20万来？我解释了许久，并说，此事已经圆满结束，人家也没有意见，不应该有问题。他只是狐疑地望着我，皮笑肉不笑。

过了一阵，还是这个书记，一口一个老弟地叫，让我出去跑一趟。然后表扬我遵守纪律，没有发现我有何违反纪律的行为。这下我就更糊涂了，问道：让我到哪里去？他说，信阳饲料公司那笔两万八千元没有追回来，必须去追。这是我们预付的鸡饲料款，原来订合同要两车皮，发了一车皮后，我们销售情况良好，每斤优惠价0.12元给我们的，我们卖到0.25元。本来继续发一车完全没问题，结果厂里命令不许再发，我就给电报让停发了，余款按照命令叫打厂里的账户。

我宣布，我决不去，如果要去，我必须到螺河等地，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他笑咪咪地同意了。没想到这一去我就怒发三千丈。首先是信阳饲料公司，王经理等告诉我：你们那里来外调，硬要我们提供给你回扣的事情。TMD，我们本地饲料批发就一角四，俺们看你投缘，照顾老乡，给你们一角二，还给回扣？他娘的，你们是共产党老子就不是共产党啦？你们铁路是国营老子粮食局就是私人的？会计已经出去给你们汇款了，老子把她叫回来，不汇！合同规定两车皮，老子执行合同，你们必须要补够钱俺就交货，不然这钱就在这放烂去。俺骂了一通大街那俩熊货不敢吭气。最后俺告诉他们：想要钱就把老钱叫过来，他不来你们就别要，执行合同！

到螺河，粮油转运站也被外调，不过那里没有我们的尾款，说说就走了。蔡站长还告诉我：那些外调的说你已经抓起来了。其他几个单位都被外调过，所以他们一见我就格外热情，好几个粮食部门都说，那帮外调的家伙确实说我已经被抓起来了。所有我原打算招待人家的，都被人家抢着付账了，都说你又没法报销，吃你的于心不忍。老实说，我确实被感动得厉害，几次眼泪都差点掉下来。特别是饲料公司王经理，愣叫财务支付现金让我带上："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回去交发票给他们，娘的，幸苦了这么久，情当安慰费算俅。"于是叹息了一通，干公家活真没劲，看你，那么辛苦结果弄出个专案组来外调。你说，这算啥？

龙副已经从小胡那里得了些风闻，后来又接受过外调，现在一见我，顿时百感交集。他叹息说：我们都看着你们怎样辛苦的，特别是你，夜晚钻上火车下武汉，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白天跑分局调度所办事，连夜又站火车回来。吃也不舍得吃，花也不舍得花，一装车就干通宵，自己补麻袋。TMD，我们都佩服。不过，我们发那么多货，都同你们一样就累死了。最后，他有点兔死狐悲："妈的，谁知道呢？也许哪天我也会跟你一样遭遇。"

在这些安慰和同情的鼓励下，俺也横下心了，与其如此，不如不干。在阿劳处喝酒，我发誓回去就辞职，实在没意思了。阿劳几个高兴得乱喊，支持我辞职。叫我辞职就过来一起干，保证比打阿爷工舒服。

既然心态已经如此，我相信王经理那番劝，干脆下广州、深圳、珠海跑一趟，再去斗门告别一下。没料到深圳、珠海没有边境证去不了，于是转斗门。一到斗门，白蕉粮管所的几位都高兴起来，他们都以为我被抓了。郭主任告诉说，那帮外调的简直没有脑，我们打20万给你，难道还要给你回扣？这个天恐怕都要倒转过来。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连合同都没有就打款，我告诉他们，因为信得过。结果他们跑到粮食局告了我一状，害得我写检查。真没意思。我赶紧道歉，是我连累了你们。他说你道歉个屁，又不是你干的。还告诉我，那些家伙要粮管所写收据，退回来的20万没有给收据，财务不好处理。我给个屁！老子打款过去你们也没给收据，凭什么退回来我要打收据？

他这一席话倒提醒我了，为了回去免得麻烦，我请他们帮个忙，给个证明说那件事已经两清。否则我跑过来他们不给充账我就要自己买单。郭主任一口应承，让我自己写，他们盖章。我说那字迹会看出来，郭说可以拿去打字。于是照办。

回到厂里，果然这个证明发挥了作用。书记批准报销费用了，如果没有这个证明，他们确实不会给报的。接着我打报告要求辞职，他们不批准，于是我自己走了。回南宁家中，到处物色新饭碗。后来厂里要开除我，也懒得理会，所谓无欲则刚，已经死心塌地自己谋生，谁管你是开除还是批准辞职。却不料局里物资处没批准他们开除我的请示，原来我的哥们升处长了，他比我大两岁，文革前上了大学，赶上了机会。

然后俺在南宁市寻了个单位，改写请调报告，这是谭处长叫的，说是给厂里一个台阶，也好把户口和人事档案转走。没料到厂里调离结算时，赚的钱都拉倒，说是群众的功劳；亏的数都算账，那是我的罪过。特别是那次大蒜头生意，两万五没有追回来，也没有起诉，是渎职行为，要赔50%。我回头就走，俺不调动了，户口也不要了，爱

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还是那位处长从中协调，最后动员俺赔了两千五，顺利调动，人事关系和户口一起转了。

天地有时很小。回到南宁，有天陪妻子逛街，没想到她在街上遇见一个一起插队又一起招工的“友女”，还在邕宁县人民医院当护士长。她们谈话间便说起丈夫来，我猛然听见她说她丈夫是邕宁外贸副主任，于是问他的姓名，就这么巧，正是那位跟我们签合同的经理。于是说起那个故事，这位护士长知道我的遭遇便很同情，宣布回家一定教训她丈夫。

未几，她高兴地告诉我妻子，邕宁外贸公司把两万五千违约金赔付了。结果我追问厂里，我赔的两千五该退给我了吧。答曰，进了账的钱，没法退出来。而且，当初忘记收取我的教育费用，已经充抵了。

一切祸害的起源是，谁让你喧宾夺主呢？在武大郎的饭店里，个头哪怕只高一点，你就会倒霉的。不过，这一段也没白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着不过是个过程，赚了个经历也非常好。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做生意，继续赚经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史迪威大叔的故事

前几年偶然得知重庆有座史迪威纪念馆，而且设立于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些惊讶。此前知道湖南芷江有飞虎队暨陈纳德将军纪念馆，一直想去一次，却始终未能成行。我能想像陈纳德将军及其飞虎队的辉煌战绩足以充盈那座并不很大的纪念馆，却不知道史迪威的纪念馆里能展示些啥。他抗战期间在华在印缅之举措都充满争议，蒋介石和英军印缅统帅蒙巴顿几次三番要求罗斯福总统将其调回，罗斯福也曾几度提出调回他。全亏得有马歇尔这座靠山力保才得以延续任命到1944年10月。若不是老蒋装斯文命名那条“史迪威公路”，恐怕这个姓氏早就被人遗忘了。

章东磐兄9月2日在腾讯文化上发表新论：《不要再给史迪威泼脏水了》，不几日就有网友转来请予以评介。读罢大概知道东磐曾经“极为痛恨史迪威将军”，以后接到约稿重新阅读很多文史资料，认识上有了很大转折：“我通过这三年的研究，慢慢寻找资料，觉得史迪威是一个军事专业素质非常优秀的军人，是一个敢于认错、有着宽广胸怀的军人，是一个充满着善良的、人文情怀的将军。他是一个高贵的人，不应该再往他的身上泼脏水。”碰巧了，近年来以滇缅战场为题材的各种创作、活动颇多，几乎一面倒都在讴歌。对此，我既无助兴之欲，也无泼水之念。

我对史迪威将军曾经有过的钦佩感淡去已有些时日了，但也从未“痛恨”过他。人家是美国将军，责无旁贷地要为美国的利益打拼，中国的利益只是兼顾。至于他是否尽职尽责功过如何，这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范畴，那也扯不到爱恨情仇上去的。民国在大陆的败亡无疑是一种文明沦陷历史倒退，若追责的话蒋公理当是第一罪魁。然而中国人历来有眼无珠不识好歹也合该承受惨烈牺牲忍受无端痛苦，似乎轮不到史迪威在此担多少罪责的。

东磐兄说是还有大作加以详述，我只能静待，因为无法想像“泼清水”又能洗刷史迪威成啥模样。然而东磐兄在滇缅抗战史的研究上是下了工夫的，为填补此项研究之缺失贡献良多。我也曾应南周之约为其大作《父亲的战场》、《国家记忆》作文推荐。想必他现在发此谈话必然事出有因，于是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既有认识，再次回过头去核查旧作以及相关的资料，但重审那些诸说不一的资料，颇费了些功夫梳理后，觉得他现在这个说法很难被接受，正相反，我却陷入他已扬弃的认识上去了。

中国的抗战，乏胜可陈，除了薛岳的“长沙大捷”之外，也就只有中国驻印军的胜利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

以理直气壮地说贡献。除此之外，伏击了非战斗大车队数百人的“平型关大捷”乃至正宗硬仗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等，“惨胜”的只是中日两国对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成形，谈贡献便很牵强。倘若美国没扔原子弹中国的抗战还可以赢得扎扎实实的胜利与尊严，因为日军崩溃局面已显现，国军已开始胜利反攻；斯大林未必有机会摘那么大的桃子。那样的话，我们自己也能昂首挺胸说“战胜”之外，就连后来的日本的右翼势力也没底气蔑视中国的。

两颗原子弹既炸垮了日本也震得民国骨酥肉散，更给予苏俄千载难逢之良机，甚至涂鸦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杜鲁门一伙心急火燎地扔原子弹显然是一种短视行为，它至少缺失最起码的计划安排，扔完原子弹会怎样？方方面面该如何应对？我遍查史料居然没发现任何这方面的文字，更谈不上瞧见任何哪怕粗线条的预案，显然杜鲁门只是把它当一颗普通炸弹扔出去了，导致后患无穷。实话说，我没有那么足的底气去讴歌滇缅抗战，尽管驻印军征战、牺牲与成就都无愧彪炳青史，然而权衡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福祉，怎么看都得不偿失！

中国近百年来唯一可称战神的孙立人将军曾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军队撤离缅甸之前把中缅未定界定下来！史迪威公路基本沿“未定界”中国一侧修筑，定下来就意味着它是中国的沿边公路。他的建议被蒋否决了，理由是那会引起国际纠纷。可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之前之后的种种刁蛮举措，可曾顾忌过“国际纠纷”？孙立人将军统率下的新三十八师乃至新一军，是中国对日作战中唯一每战必胜且毙敌必数倍于自身阵亡人数的队伍，即使列入二战盟军战绩点评也是佼佼者！而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乃至筑路、支前民工的牺牲与成就，却因为老蒋的怯懦无能，化作仅为换取百余万吨美援物资所付出的代价，何其可悲！

我真的不明白如今诸多专业的、业余的史家可劲讴歌滇缅抗战是否苦中寻乐？中国官兵无数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斗与牺牲，其胜果最终都被老蒋化为乌有。倘若蒋不是否决而是采纳了孙立人建议，收复这片被殖民者劫掠的幅员，无论怎么说这场血战的价值与意义都还有可圈可点之处。须知，当时罗斯福就是因为不允许为英国收复殖民地作战才不肯派美国大兵赴缅作战的，美国佬不可能帮助英国反华，即使“国际纠纷”发生老美至少不愿替大英帝国抢占殖民地助威，否则罗斯福无异于自掌耳光！就算它装傻，跟英国佬打一仗又咋的？老蒋自己窝囊废在开罗就使罗斯福大失所望，更使中国在世界留下贫弱可欺之印象，无怪乎他会失去整个大陆。

民国额外的给付还有：四十余万国军精锐聚集滇西，缅北还有近十万，导致日军在中原长驱直入，直接打断了民国的脊梁！就连罗斯福也在导致史迪威去职的那封电报里说：“此次湘桂之败，使昆明空军基地陷入受攻击的危险境地，不仅会减少飞越驼峰的空运吨位，中印之间的空中航线还可能中断，除非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中国人民长期英勇抗战和美国全力支援所获的成果，可能付诸东流。”驻印军缴获的日军文件也有清晰的训令，要他们在缅北顽强抵抗牵制华军有助于日军在“桂林方面”的作战。史迪威为其个人荣耀，不断地向华盛顿打小报告阻止蒋欲从滇西抽调兵力回援之企图，还要求向蒋施压增派滇缅兵力。愚钝的老蒋竟然舍近求远从中原抽调13军等部长途驰援黔南，让出大片区域给共军占领。日、美、共三家殊途同归，在不同的角力场上合力搞垮民国政府的效果如秃

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下面专谈史迪威。

以我对史迪威的阅读而论，他是个才华横溢尤其是语言天赋超群的佼佼者，坚持记日记表明他对自我生命价值的珍视程度非常高。他的许多认识确实是对的，例如还在北伐时期就判断冯玉祥："他可以背叛任何人——他完全是为自己的。"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精准结论，值得赞赏。对于蒋介石的尖刻指责大部分也都成立，虽有不合时宜之嫌。更不必说史迪威那些关心士兵生活、质朴肯吃苦、亲临前线之类模范干部的事迹。

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来华美国人群体之主流就带有理想主义以及新教徒式救世主情结，借鲁迅的话说就是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史迪威当属其中情绪最偏激者，这显示了他不具备高层领导人应有的政治素质。上梁不正下梁歪，以他为符号，二战时一群美国政府的代表似乎来中国不是为了帮助抗日作战，而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推翻独裁专制、建立美国式宪政民主制度，是来干革命的！比如说史迪威的得力部下谢伟思，1944年8月23日唆使老毛向老蒋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把毛都吓了一跳。盘算一通然后电令在重庆的林伯渠去试探各方面，回电说大受欢迎，于是林奉命在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上正式叫板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同一天美国大使高斯呼吁建立"中国所有各党联合参议会"。此举迅即获得那些不得志的墨客骚人跟风，中共顿时成为耀眼明星，"统一战线政策"大显神通，周恩来也公开号召"结束一党专政"。22日毛自己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做检讨，说谢伟思教他向老蒋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而"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总以为天下是蒋介石的，美国人反倒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于是老毛亲自率领各报高调抨击"一党专政"吹捧"美国式民主"，笑蜀先生扒拉了一堆旧报纸就凑成《历史的先声》了！其实那只是蛊惑人心的噱头，不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误，连这本书都被强令下架了。

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史迪威及其麾下头顶着美国官员的光环，对于民国政府的声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说他吹响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号角一点也不过分。有以史迪威为符号的这批美国官员助力，中共在政治上的主动性疾速提升；而老美迫使老蒋集中国军精锐于滇缅战场，仿佛抗日只能到滇缅，别处再怎么打都不算！日军则不失时机集聚有史以来最大兵力开打"一号作战"；共军抓住机遇跟在日军身后抢占中原地盘，还美其名曰"敌后战场"。三管齐下的结果是：毛泽东终于有底气在1944年12月20日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国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流血牺牲所挣来的人心甚至很难说是否敌得过史迪威们所造成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一直延续至今，官方以及许多青年人现在仍不承认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努力与成就便是例子。

蒋介石或许是独裁者，他比斯大林更独裁么？显然不！丘吉尔有名言："如果明天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们宁愿与魔鬼结盟！"借以诠释他力主与苏联结盟的理由。即算民国是"地狱"，日本已经进攻多年了，美国政府也已经与中国"魔鬼"结盟，以史迪威为首，奉派执行盟约的一批美国军政人员何以对美国政府训令阳奉阴违，不致力于

助华抗日，反倒热衷于搞垮“地狱”里的“魔鬼”呢？史迪威的忠实助手多恩将军后来披露，史迪威甚至曾让他准备详细计划暗杀蒋介石。

须知，梦寐以求打垮蒋政权的日本皇军，似乎还没玩这等刺客游戏！有人质疑多恩讲述的真实性，还有议论说是罗斯福在开罗授意史迪威“除掉”蒋介石，可所有相关史料均无支持此说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之外，反倒有诸多与之忤逆的记载，例如罗斯福与儿子的谈话。史迪威受命赴华之时就明言：“在中国除非除掉蒋介石，否则毫无办法。”难道对其极端赞赏的史汀生部长也会误记吗？那可是谈话当天的记录。1943年他更是在美联社采访团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言：“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处决一百名高层领导人。”这也算史迪威人格高尚的标志么？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帝国主义高层人物发出过如此叫嚣的，无论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还是日本皇军司令东条英机，都不曾发表过如此张狂的帝国主义言论！

而罗斯福1943年3月8日亲笔写信指示马歇尔：“史迪威与蒋委员长打交道的办法恰恰是错误的，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一位中国人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当史迪威谈到蒋委员长脾气暴躁、难以驾驭、得寸进尺等等时，无疑他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谈到要以更加严厉的语调同他说话时，他恰恰是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在描述了蒋“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万万人民公认的领袖”以及“极为艰难的工作”之后罗斯福接着明确指出：“蒋委员长认为有必要维护他的最高统治地位。如果你和我身临其境也会这么做的。他既是总裁又是总司令，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用严厉的语调说话，也不能以对待摩洛哥苏丹的办法，强迫他做出承诺。”其实还在1942年10月，罗斯福就写信给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这应该是最高司令的命令了，马歇尔、史迪威都置若罔闻，老史一如既往地出言不逊。直至11月开罗会议时，马歇尔获悉各方反映情况多了，再次警告史迪威不得对委员长出言不逊，他却矢口否认。马歇尔不得不正色直陈：“我知道你一贯不撒谎，但我希望这不是新的开始。”与史迪威宣称的“独裁者‘花生米’”有出入的是：蒋政权一方面根本统治不到中国的大部分幅员，就连体制内他也没法完全驾驭；史迪威就任之时便宣称蒋介石只能指挥得动政府的十个军。二方面他还有“独裁无胆”之软肋，民主只是“多与少”的问题，远谈不上“有与无”。

蒋记民国政府的腐败现象，正如塔奇曼正确指出的：不是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的腐败，而是权力式微导致的腐败。以史迪威为符号的这些美国官员，恰恰违背了罗斯福的旨意，以搞垮“蒋家王朝”为己任，下错了药！美国人强势介入中国政治推进倒蒋，加剧了权力式微，九教三流都来投美国人之所好，企图获得承认从美援中分一杯羹，甚至想得到军援以增强实力对抗中央政府。最典型的莫过于，周恩来还在史蒋矛盾初露端倪时便宣称红军愿意受史迪威指挥。老史便信以为真一次又一次提议武装红军两个师，由他来指挥他们抗日作战。实际上他派往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发现：中共对史迪威毫无雅兴，根本没打算听他的，只不过想利用他来给老蒋添乱而已。美国人干涉的结果非但未能阻滞腐败势力，反而使腐败愈演愈烈，成为民国腐败现象的助燃剂！他们中某些人后来受到麦

卡锡主义追究责任也是咎由自取，尽管已经于事无补。

史迪威的肉眼甚至不如冈村宁次，冈村在1939年11月14日的报告中就指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的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细察日军战史，可知其整个抗战期间始终追着"中央直系军队"作战。对于以中共军为主的"200万抗日敌军"充其量只进行"治安战"。而史迪威却利用其掌控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之便利，努力挤压"中央直系军队"，不断鼓噪要接济并振奋"200万抗日敌军"。

史迪威那份"唯我独尊"之豪气，即便在宪政民主根深蒂固的欧美也难觅其匹。我没发现他对古往今来任何人有过崇敬之情，即使在西点时被认为刻意效仿格兰特将军，而且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效仿终其一生，也没能寻到他崇敬格兰特的任何言谈或文字。这很少见，即使狂傲的巴顿将军，近者崇拜南北战争名将杰克逊，远者崇拜迦太基首领汉尼拔，史迪威似乎谁也没崇拜过，除了他自己。反过来他蔑视的人却多了去，几乎没有一位同事或上司能入其法眼，更别说盟军同仁。即便是号称与之关系良好的英军斯里姆将军、华军孙立人将军，也只不过挨他骂得较少罢了，吵架更是家常便饭。与之共事的英国人，甚至美国人，多数人无法容忍，英印军统帅蒙巴顿要求美国政府撤回史迪威的次数一点儿也不比蒋介石少，英军总参谋长布鲁克甚至当面请马歇尔撤回史迪威，因为他跟英国三军将领都无法相处。史迪威自己也在被调回时的日记里承认："英国人反对我，中国人反对我....."甚至一连点了五位美国总统特使的大名，说他们都在跟他作对。就连他的忠实助手多恩将军也称之"一向目中无人的史迪威"，这就只能算是史迪威自己的问题了。

一战时初出茅庐的史迪威，以情报参谋官身份供职赴欧美军总指挥部，便将美军情报部同僚统称为"花生米俱乐部"，唯不知是否包括当时美军情报部首长马歇尔中校。而史迪威对这个"花生米"说道的初始定义是："得到少校以及更高职位并派给各种舒适工作的富豪、政客和各种社交明星。"也即他所蔑视的花架子。后来他用这个绰号来称蒋介石，当然表示出极强的蔑视心理。至于塔奇曼在其名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里说："花生米原来是蒋介石在秘密电文中的代码，后来经常用做委员长的名字"，纯属想当然。

不用说同僚，就连一战时的威尔逊总统在史迪威眼里也不过是"晕头晕脑的傻总统"；而后来的总统罗斯福则被其称为"我们的傻子"、"轻浮的傻瓜"甚至讥笑其残疾称之"橡胶腿"。尽管他对工作的热情与勤勉确实非同寻常，这使他深得当时情报主官的马歇尔、炮兵主官的史汀生赏识，他俩二战时升任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委史迪威以重任乃情理之中事。马歇尔一上任陆军总参谋长，第一个就将怀才不遇、准备退役的史迪威升为准将，紧接着委以要职提升少将，再举荐其出任美军赴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可升中将。只是因为英国人当时坚决不愿意被美国人指挥，坏了这个差事。然后才有派赴中国战区出任参谋长兼空头的驻华美军司令，亦可捆绑中将军衔，两年半连升三

级。

在印缅战场唯一能与史迪威和平相处的英军名将斯里姆，后来评价史迪威：“我应该说，直至军级水平（Corps level）上，一名优秀的战术家，但不是一位好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更高的层面上，他既不具备那种气质，也没有战略背景或行之有效的判断。甚至在战术领域里，我认为他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为有意只任用平庸的美国下级指挥官，而在他的班子里裙带之风盛行。”窃以为史迪威在印缅整个任期都与之共事的斯里姆，这个评价还是挺客气的，即认定史迪威只有军长以下带缺憾的战术能耐。这比陈纳德将军评价“他作为指挥官具有指挥一个师的司令官的气质，但缺乏作为一个战区司令所需要的才识”高了一级。其实也过奖了，美军参与缅北作战的官兵客气的跟着英国人称史迪威为“最优秀的三星级连长”、不客气的称其为“一坨屎”，“梅里尔掠夺者”指挥官之一奥格本上校则称其“冷酷无情，毫无人性”；其最激愤的队员甚至后悔没打黑枪崩掉史迪威！

那么史迪威是否如东磐兄所认为的“是一个军事专业素质非常优秀的军人”呢？这太笼统，除了训练大兵或可称道而外，史迪威从未带兵打过仗，哪来的“军事专业素质非常优秀”呢？作为连、营、团长，事必躬亲的史迪威可能还符合这个评语；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直至他被召回，两年半时间里居然连这个参谋机构都没有正常运转，除史迪威外还有这样的参谋长吗？对于接替其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职务的魏德迈，史迪威居然可以不与交接便扬长而去，他留驻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告知魏德迈，参谋部所有资料都在史迪威裤兜里，这与“皮包公司”有何区别？魏德迈索要史迪威在任时制定的中国战区作战计划，竟被告知史迪威从未要求制定过这样的计划！如此渎职行为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是要被军法审判的，然而偏偏在法制严谨的美国，马歇尔等高层庇护他到极致，所有批评他的美军将校都被调离，就连驻华海军武官也未能幸免。魏德迈只能苦笑称接下一个“烂摊子”，然后赶紧在一个月内将参谋机构完善并运作起来，迅即组织制定了之后中国战场的反攻作战计划，并使之付诸实施。

这里无仿多说几句：魏德迈应该算是史迪威在西点的学弟，几乎步史迪威后尘在菲律宾、驻中国步兵15团服役，后又奉派在美国、德国的参谋学院深造。1941年在马歇尔的战争计划办任职时，几乎所有美国新战争计划他都是主要制定者，他所制定的《胜利计划》被采纳，成为美国整个欧洲战场的对德作战主脉。也因此深得马歇尔赏识，常作为马歇尔的代表出席联席作战会议。只因其为德裔，又曾被国会某些议员责难有“亲德倾向”而遭调查，失去赴欧洲战场效力的机会。若不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调查不了了之，兼之马歇尔惜才心切，魏德迈或许军旅生涯也到此结束。1943年9月升少将并派往东南亚战区任美方参谋长，显然是马歇尔为扶持史迪威而派遣。但小肚鸡肠的史迪威将其置于东南亚战区的英国人中，不让他染指X部队缅北作战，这使蒙巴顿占了便宜，才华出众的魏德迈无疑为英帕尔及后续战事制定作战计划贡献不小。

而史迪威全力以赴的缅北作战，斯里姆称其搞裙带关系并非空穴来风，除副手多恩原是地图绘制师，在史迪威手下做过助理武官；参谋长柏特纳战前是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商贩；美军特遣队司令梅里尔乃美军语言培训班的日语教师。均系其旧部或老相识，都靠着史迪威当上了罗斯福称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他调儿子来任情报主官，两

个女婿皆做主要联络官。他所重用的美军官员基本上都是盲人瞎马，没有一个算得上称职，更不要说出类拔萃。若不是国军最优秀将领孙立人、廖耀湘等在那里鼎力支撑，缅北作战必定也是一塌糊涂。

缅北作战初篇

东磐兄举例说史迪威指挥错误还要撤掉立下大功的新22师65团团长傅宗良，然后大加赞赏说史迪威如何认错。其实还不止，他不但撤销了惩罚傅团之前电，还电请老蒋提拔傅宗良上校为少将副师长，并在新22师师部亲自向傅宗良道歉，说："你的战术修养比我好！你的战术修养比我好！"这个故事充其量可算作亡羊补牢，挽回的是他自己的声誉，而不是对傅宗良的恩德！

其实这个案例是一连串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1943年10月10日，在列多主持总指挥部工作的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纳准将，按照史迪威既有之计划发布了第6号作战命令："大龙河以北及大洛地区，仅有土民和缅军组成的搜索部队，间有一两个日本军官配属。着新三十八师112团于11月1日前，自现住地前进，占领大洛至大龙河及大奈河之交汇点与下老寨一线，以掩护新平洋前进基地建筑新机场，以便于盟军后续兵团进出野人山区。"接到命令后，孙立人认为日军不可能防守薄弱，所用兵力太少太分散，三个目标点相距70英里且隔着大山，112团三个营根本无法相互照应。但柏特纳笃信小史迪威审定的情报认定目标点"只是一些土人缅军组成的搜索大队，哪有什么正规日军？"似乎只需开过去接防而不需攻坚。本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商定次年2月进攻北缅，为了实现史迪威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大出风头的愿望，柏特纳以军令强派112团兵分3路提前行动：第一营是左路，目标是大龙河西岸的临滨和于邦；中路是团直属部队和第二营，作为左右路之预备队；右路是第三营，目标是拉家苏。实际上三个营都将面对日军第十八师团3个联队的强敌，而且一年多来，第十八师团已在唯一可供大部队推进的胡康、孟拱河谷地域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只等进攻部队来送死。

即使在实战时进攻受阻数星期无进展、三营营长陈耐寒牺牲的现实面前，从不上前线的柏特纳仍固执己见，连攻击部队报告说日军配备山炮等重武器也认为是谎言，自吹是炮兵专家断言山炮根本不可能运到那种地方，不顾我军伤亡命令继续强攻。孙立人得悉112团遭日军重兵围困，立即由重庆飞回，欲亲率新38师其余两团赶赴增援，柏特纳坚决不准。还不断以电报报告在开罗的史迪威，楞说国军畏战不肯进攻。拿不到捷报显摆的史迪威则据此向罗斯福告状，使得老蒋在美国佬面前不断遭受质疑，这些电报以及史本人对中国军队的贬损对打击罗斯福有意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努力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不但英国人借题发挥力主取消缅甸作战的计划，连罗斯福本人也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扶不起来的阿斗。

开罗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罗斯福、丘吉尔一行赶赴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灰溜溜归国的老蒋经印度时责怪孙立人，听孙陈述后亦无话可说。留在开罗等待总统的史迪威闲来无事便去金字塔、耶路撒冷等处旅游观光。孙立人一

再与柏特纳激辩均无果，只得通过无线电随时指挥112团各营构筑阵地坚守待援。柏特纳据此再次发报状告中国军队无能且坚决不肯发动攻势，史迪威不在，这个电报则被在开罗的东南亚战区英国军官们知悉并趁机炒作。待罗斯福、丘吉尔返回开罗，英方在会谈时拿柏特纳的电报大做文章，丘吉尔再次强烈要求取消“海盗计划”。即，老蒋一直坚持的要英方从海上发动攻势，中方从陆地发动攻势合力夺回缅甸的计划。美方一直硬着头皮支持这个计划，“三叉戟”会议上已算是通过了，丘吉尔也答应增兵两万给蒙巴顿执行这个计划。老蒋曾带着“大国地位”和“海盗计划”两个气球回重庆吹嘘，可如今既有斯大林在德黑兰承诺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垫底，又有此电报作证，罗斯福只好两边妥协，同意取消“海盗计划”的同时对蒋同意推迟夺取北缅的攻势到下年，以为安抚。其实将缅甸战役拖到欧战胜势确立后正是丘吉尔的如意算盘。

而老蒋带着老婆去参加开罗会议，简直不可思议。内里却含隐衷：此前老蒋令宋子文赴美活动，一定要把史迪威调离。宋氏不辱使命，在美经过多方努力已见端倪，他发电报给老蒋告知几点意见，只需老蒋坚持己见罗斯福就会下令另外安排史迪威的任所，因为罗斯福已经认定史迪威不能履行他赋予的在华职责。这个消息很快被老史知悉，也明白形势严峻，于是去走夫人门道，跟孔、蒋夫人说了许多好话。用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记述仅有“订了攻守同盟”字样。宋氏姐妹便一起上阵纠缠老蒋，这个昏君居然转向食言不再坚持要求调走史迪威了！宋子文闻讯大发雷霆，却无法令老蒋回到原议，一怒之下甩手而去，这才给了他妹妹这次机会，反倒更糟糕！史迪威到了开罗也就变了脸，丝毫没给蒋宋美龄留面子。

罗斯福与老蒋接触后颇感失望，视中国为大国的气球也开始瘪了，很快回到欧洲中心之轨道，此后他从“四大国”的天平上减少中国的砝码，增加苏联的砝码，史迪威的心腹柏特纳这份电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开罗会议是中国国际地位从上升转入跌落之拐点，此乃宋氏姐妹之前受了老史忽悠游说蒋介石否决宋子文坚决赶走史迪威计划的结果，古今中外举凡夫人参政必遭恶报的一个案例。那几块国土其实势在必得，老蒋连签署一份公报的机会也没捞着，霍普金斯起草的新闻公告尽管被唤作《开罗宣言》，却是连外交文件也算不上的。马歇尔明白中国和远东战场从此不那么重要，想顺从罗斯福意见把史迪威调出这个泥坑，但被史拒绝，他不想灰溜溜地离开，坚持要兑现当初宣布必夺回缅甸、直捣东京的誓言。

老史提前展开的作战原计划就一厢情愿：用所谓“Y部队”即远征军南下进攻；用英军第四集团军横渡钦敦江拦腰截击，加上“海盗计划”认可的登陆仰光作战；他指挥“X部队”即驻印军由中路直插缅北掩护修路。在8月魁北克“四分仪”会议认可“执行上缅甸作战”，英印总督韦维尔上将据此划定区域，不许驻印军从中缅进攻，只准从利多经胡康河谷向密支那、腊戍一线以北区域进攻，不得南下。这区域除密支那地区外都在“中缅未定界”中国这边，只是全盘配合作战之一部分。但史迪威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中美英开罗会议上出风头不惜孤注一掷，不顾其他方向尚无任何开打计划就抢先命令驻印军“通过老鼠洞钻过去，并且一边走一边打洞”。

现在开罗会议最终决定，中南两路的英军攻势全部告吹；鉴于老蒋原本承诺远征军南下是以英军的海上攻势夺取仰光为前提的，如今“海盗计划”泡汤，罗斯福又建议搁置远征军南下至下年，只剩下驻印军这两个师3万余人孤军深入野人山密林玩命，此乃兵家大忌。史迪威抢先开打事实上只是一场豪赌，即使赢了其意义不过是打通一条险峻的低等级公路而已，若出师不利驻印军官兵性命就成了他输掉的筹码。

此时驻缅日军处于最强盛阶段，当面之敌有第十八师团（加强）、第二师团、第五十三师团、第五十六师团以及第三十四独立旅团，朝鲜调来的第四十九师团已在途中。除第五十六师团部分主力布防滇西外，其余不少于14.6万人均在驻印军受敌范围。而彼时尚未开打英帕尔战役，缅南尚有第十五、二十八两军之五个师团加两个旅团约13.7万人可随时增援北上。史迪威尽管盲人瞎马，也知道强敌不好对付。他搬不动英国人却能欺负蒋介石，手握“租赁法案”物资监管权逼蒋出兵是增大赢率的唯一希望。

还在1943年9月至10月，史迪威在重庆与德里间奔忙，与英国人扯皮保护美援物资不被截留、游说蒋介石参与进攻，挺进北缅的驻印军指挥权则交给他的参谋长柏特纳准将。孙立人对这位根本外行的总指挥极不信任，认为他严重低估了胡康河谷日军实力，这会使驻印军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他强烈要求撤换柏特纳，代之以一位中国将领。实际上是要求一直被史迪威旁落的驻印军副总司令、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将军行使应有权力。这个要求获得老蒋支持，史迪威不干，站得住脚的理由只有一条：经罗斯福批准招募的2850名美军5307特遣队将参与进攻，必须由美国将领才能指挥。

现状也是出师不利，112团已在全军覆灭的危险中挣扎。非但无增援且无补给的各营仍在坚守阵地，其中112团第一营在进攻于邦时遭遇强敌。11月4日，营长李克己身先士卒，率一个加强连攻于邦，敌据工事死守不退，步炮火力之强出乎意料。派人一侦察，据守之敌是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之主力，兵力超过一个联队！尚有敌第十八炮兵联队从山口不断炮击相助，且敌军迅速增兵，未几便达到3个联队的规模。112团出发时仅被允许携带60毫米迫击炮，史迪威曾规定每炮兵连每日发射不得超过150发，柏特纳照此拨发弹药。李营长所部反被包围。李按孙立人指示择易守难攻处构筑阵地，柏特纳居然连派飞机投放给养弹药也不准，李部只得靠吃芭蕉根饮植物茎中出水居然还坚守阵地30余日！

至史迪威从开罗返回，他隐瞒了会上灾难性变故，不商讨如何应变仍坚持孤军独进，还相信柏特纳一面之词指责孙立人。孙与之争辨多时仍无果，无奈，只得请他次日一同飞赴前线视察再作结论。视察之后史迪威也看出错在柏特纳，孙立人再次要求撤换无能且贪生怕死的柏特纳仍被拒，鉴于柏氏那个电报也导致史迪威在英国人面前颜面扫地，自知理亏的他只好解除了柏特纳的指挥权，同意交还孙立人、廖耀湘师级指挥权。或者可以算是史迪威尚识时务，至少不属于冥顽不化之徒；或许也是逃避罪责的良方，一旦失败就有替罪羊担责。但却奠定了日后在孙、廖指挥下驻印军创造辉煌的基础。可以判定，若史迪威继续把持两师指挥权，缅北之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战果的！

缅北作战续篇

孙立人获得本师指挥权后即率其余两团迅速穿越雨林赶赴于邦，12月22日在前沿干萨坎设立师前进指挥所，孙并未立即开打，而是了解敌情部署我军攻击路径及作战要领。26日上午发起攻击，此战很快大获全胜，歼敌十八师团五十五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2500余人，生俘13人，新38师伤亡230余人，获得首战于邦大捷。史迪威27日即已下达新命令，令新38师与派来接防112团原有防务的新22师65团“设法驱逐自大洛至太柏家一线之敌”。孙氏一方面需对于邦战场予以清理，二方面认为于邦之战必须总结，与新38师官佐讨论确立了今后作战之方略。老史不耐烦了，他在1月2日的日记中指责“孙立人不肯动。在空中支援、弹药和炮火方面提出荒谬的要求”，不愿意“让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等等。

3日史迪威下令第65团归孙师指挥，同时又下令傅上校之65团“沿大洛河右岸直捣拉加苏，以解112团第3营之围后，渡过大洛河，夺取大洛”，这才有了东磐兄所引述的史迪威谦虚故事。老史的脑瓜只有一根筋，除了知道解救被困拉加苏112团3营之主题外，并不懂别的战术，更不懂大洛为日军补给基地，日军大部已开赴拉加苏围歼第3营，防守大洛兵力必薄弱的道理。傅团长据战场实情违令先攻补给基地大洛，并在百贼河设伏围歼从拉加苏赶来援救大洛的日军五十五联队三大队。此次“围点打援”毙其大队长冈田公中佐以下700余人，生俘20余人，创大洛大捷外也解了拉加苏之围。仗还没开打史迪威就致电老蒋并获准罢免傅宗良团长职务，25日夜获捷报后并不相信，26日去点验敌尸时是带着4名宪兵准备带走傅团长的，碰了一鼻子灰且面临中国官兵强烈抵制，他毕竟识时务明白不私下道歉只能会给自己公开抹黑，私了之后可算其敢于认错，不可能归结到他指挥有方上去。

先有孙立人指挥114团获“于邦大捷”，又有65团的“大洛大捷”，进而肃清系列日军据点，导致日军首次军心动摇。日酋牟田口廉也哀叹“中国军队的战力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并指令田中新一“停止目前攻势，于福昆（胡康）沼地行持久作战”，并告诫田中：“十八师团在攻占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作战中，因其卓越的表现而享有‘森林之狐’的盛誉。而你现在的对手孙立人和他统率的新三十八师，却是一头勇猛善斗的‘森林之虎’。你得处处小心谨慎。”日军第十八师团曾有过的嚣张气焰从此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没能打出哪怕像样点的作战，直至彻底被歼灭。

在缅北之战中这类案例多了去，越是仔细研读缅北战史越能感到史迪威之虚名其实是孙立人、廖耀湘给创下的！比傅团更典型的战例还有：1944年2月史迪威命令廖耀湘率新22师开进缅北参战，正面攻打孟关，然后拿下瓦鲁班；命孙立人新38师迂回敌后夺取沙杜渣。有了此前系列战败以及牟田口廉也的告诫，敌十八师团长田中新一采取强固阵地收缩防守的战术，使原已构筑两年多的工事群更完善更坚固，他亲自坐镇孟关战场指挥防御，廖师按照史迪威命令作战遭遇顽强抵抗进展受阻，伤亡颇重。行进中孙立人发现史迪威命令他攻打的沙杜渣离孟关远在75公

里外，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根本不能形成与廖师呼应的效果，即使侥幸取胜也必伤亡惨重。遂自主决断命令113团中途回师改打距孟关25公里的军需供应地瓦鲁班，这就越界作战彻底违背了史迪威的命令。

奇袭瓦鲁班不但断绝了孟关守敌粮弹供应还切断其退路，造成敌军心动摇直接配合了廖师作战。此役迅速大获全胜，田中新一仅靠其工兵联队长深山忠南在西南方向密林中开辟的小路才得以逃脱，师团关防、座驾皆被我军缴获，日军十八师团已被打残，其残部尔后虽经补充兵员达12次之多，但战斗力也就今非昔比了。此战使得英军统帅蒙巴顿也大吃一惊，该师团曾在马来半岛横扫英军如卷席，导致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居然被两个中国师给打垮了？他马上飞赴孟关验证，亲眼看到华军战果对其日后作战决策有了新的感受，提振了英军也能打败日军的信心。而史迪威对于孙立人违抗其军令另搞一套也无话可说，此后反倒沿孙立人思路制定作战计划，而美国新闻界则大肆吹嘘史迪威如何用兵如神。

密支那消耗战充分证明史迪威不会打仗

例如密支那作战，尽管史迪威借鉴了孙立人以及英军温盖特将军的迂回作战经验，让孙、廖两师沿孟拱河谷攻击日军各要隘，从正面向密支那推进，吸引日军兵力及注意力。然后让美军“梅里尔劫掠者”特战部队单独完成长途奔袭密支那任务，但这支美军部队按罗斯福特批招募时就约定在缅北山林中作战90天即结束任务回国。这也是温盖特从非洲和中东长途迂回奔袭作战中总结出来的时限，超过这个时限部队的作战能力将急剧衰落甚至崩溃。若从1944年2月7日他们被派往北缅前线开始算，到受命奔袭密支那的4月28日，已经苦战两个多月精疲力竭，且因伤、病、亡减员严重，勉强可战者不足两千人。眼看还剩十天就可以回家时史迪威却强令他们奔袭密城，且亨特上校为之申请橡树叶勋章还被史迪威嗤之以鼻，谓之美军官兵当以为国效命为最高荣誉，不应计较功利。官兵沸反盈天老史只能以军令强迫执行。不得已老史将英国人拒绝其参与英帕尔作战的新30师88团、50师150团加新22师山炮连与美军混合组成两个纵队，由梅里尔任总指挥秘密攀岩钻林偷袭密支那，刻意瞒着孙、廖打算自创辉煌。这一招本不失为好棋，可他跟孙立人学得其标却未得其本，不懂打仗的根本缺陷导致此战成为整个缅北作战中打得最臭、伤亡最惨重、消耗最大的一仗，足以证明史迪威及其左右的军事素质差得一塌糊涂！

首先他那个宝贝儿子主管情报，浑然不知密支那日军的真实部署，甚至连城区地图都未加以研究，更谈不上合理的作战计划。美国战略情报局101特遣队在克钦邦组建的游击队一直遭老史蔑视，尽管整个缅北作战的有效情报85%是他们提供的。克钦情报告知密支那城中包括机场兵力充其量不足700人，主力部队在密城外据点及伊洛瓦底江东岸据守，以防中国远征军来袭。当中美联合部队秘密潜抵密支那河西从三面剑指密城，史迪威仅要求所部占领密西机场，待空运援军抵达后再攻密支那城区。第50师150团5月17日突袭占领密西机场之后，史迪威得意忘形，当晚在日记里好好奚落了认定他六月以前拿不下密支那的英国人：“但愿这会让英国佬七窍生烟”。但事情的发展并

不如愿，“七窍生烟”的不是英国佬而是史迪威自己。

在指挥部的梅里尔没得到史迪威进一步指令不知该做什么，密西机场指挥亨特上校两天内也未得任何指令，他手下的美国大兵则认为总算超额完成任务该回家了。实际上该部已经伤病满营，后经史迪威的军医主任诊断剩下的1400余人不但体力消耗已达极限，80%的人还患上螨伤寒症，根本不适合继续作战了。老史可不管这些，他的战争思维模式认定当兵就是要卖命的，给梅里尔特遣队补充新兵还得继续作战。但主要作战任务只能靠150团继续下去，他们下午3时许便已扫清机场，然后不知所措，黄春城团长遂命郭文轩营长率第3营入城。因5月11日远征军已渡过怒江开始滇西作战，留守密支那的第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两个大队分别驻守北面的瓦扎和支援西南面孟拱，其余大部布防江东，警戒腾冲方向。留守城内少量日军自知不是对手，都隐藏起来。郭营既不知地形地貌又不知敌情，转了一圈未遇敌便以为日军已逃离，在火车站捡了些洋落然后奉命返回机场宿营。

这事很费解，黄是一位身经百战很有军事才干的团长，照理应该兵贵神速地全团进城搜索布防才是正着，何况17日下午新30师89团一部已空运密西机场，足以在机场及可能来袭方向设防。但考虑到史迪威的命令是占领机场迎接空运后续部队再夺密城，无论现场指挥亨特上校还是远在后方的总指挥梅里尔，显然都局限在这个命令的禁锢之内。后来梅里尔则要把黄春城团长革职来做替罪羊，导致该团官兵群情激奋始作罢。但我们可知至少史迪威是没有下达攻占西机场以后迅即攻占密城命令的，否则无论梅里尔还是亨特、黄团都必然挥师直入决不敢停滞。此外，孙立人所有迂回包抄均有正、奇两军紧密配合旨在夹击乃至围歼敌寇。而史迪威的迂回却变成长途攻坚，密城除西面受敌之外，并未成夹击之势更不用说包围，而且西机场后续空运来的援兵仍成一路攻势，整个战场形成两军对垒局面，完全失去了迂回包抄的意义。如果不能形成包围或夹击，就该一气呵成趁敌不备且兵力薄弱时速战速决拿下密城固守，后续兵力布防城外歼敌于来援途中。可见史迪威根本没概念，拿下西机场就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开祝捷会了。

18日一早梅里尔先飞到，以战地指挥官迎接统帅的姿态迎接率领12名记者飞来的史迪威大帝。得意忘形的史迪威只顾显摆其出奇兵攻占密支那的“辉煌战绩”，然后任命梅里尔为攻密城总指挥，自己则返回印度继续向英国佬炫耀。他兴奋过头甚至忘了密城北边丁克路高还有中美联军特遣队第一路留在此堵截日军的500余名官兵，连续阻敌17天后8天没空投补给，使得这些官兵拾野果挖野菜充饥。而按照史迪威命令首批空运来的居然不是亨特要求补充的粮弹医药，也非地面战斗部队，而是派不上用场的防空高炮部队！他显然以为密支那已在囊中只需要防空守卫了，18日一天运来各种工程维修及机场管理设备及人员赶修机场，作战部队仅运抵2500余人。

从17日下午至19日清晨史迪威无作为，日军则在联军指挥混乱的两夜一天里分秒必争调来援兵、粮弹，使守城兵力增至3000余人，由丸山房安大佐指挥进入原有工事之外还构筑新工事甚至连大炮都架设好，只等中美联军上门送死。而日语教师出身的梅里尔既不知敌情、地形又不懂战术，只会分兵出击喊打喊杀，对于国军军官要求迅即切断八莫、孟拱两边通道的建议也置之不理，荒唐到密城居然还能开出一列火车运送物资到孟拱！真有军事才干与经

验的中国军官被史迪威和他的业余将领管辖着，这仗注定没法打。

19日一早，梅里尔下令从六个方向进入密城，作为中路先导的150团3营，郭营长骑着高头大马率全营分四路纵队开进城区准备占领火车站。岂知日军已在火车站等地既有防御阵地配备强大火力，进入埋伏圈的郭营长首先中弹殉国，一个营被围歼大部阵亡，仅得少数几人逃遁。情急之下150团奉命全员上阵，因对城区及周边道路毫无了解，攻下火车站即面临日军反扑，又因补给跟不上居然打到弹尽粮绝不得不拼刺刀突围之地步！虽然史迪威陆续空运来的新30师89团、14师42团以及炮兵都加入进攻，结果因不了解地形导致自己人两次狭路相逢自相残杀，伤亡达671人之多！但梅里尔仍旧遵循每炮连日发射150发配给弹药又导致火力不敌日军，通讯、补给、空中支援皆混乱不堪，打了十几天反被日军逐回机场。而日军则援兵不断，5月30日水上源藏少将率两个大队加一个工兵中队约2000援军，携6门火炮及军需平安进入密城并接管指挥权，不计算作战损失的话守军已达5000余众。若梅里尔或其后任柏特纳、或史迪威本人稍有基本军事常识按中国军官建议出兵截断密八公路，至少水上的援军是没那么容易开进密城的。

水上源藏奉了缅甸方面军死守到底的军令，抵抗更坚决、有方。尽管史迪威陆续增兵达11500多人、孙立人部113、114团7月中旬自主拦截歼灭了援密的日军五十三师团一二八联队、炮兵五十三联队各一部约2000余人、美国空军7月13日对城中狂轰烂炸投弹达754吨，比其余弹药消耗总量还多20%，密城仍久攻不下。心急火燎的史迪威不但将美国派来顶替“劫掠者”遗缺的新兵派上阵，他们未经训练许多人连枪都不会放；还将美军工兵乃至卡车司机、洗衣工、食堂服务员都空运来进攻密城，但就是不准孙、廖及其两师精兵介入，甚至不跟孙、廖谈密城战事，他顽固坚持独领风骚，想证明自己不靠孙、廖也能打胜仗。只得像开头那样将指挥权交给战场指挥郑洞国和50师师长潘裕昆、新30师师长胡素，仍然进展不大又拿跟柏特纳顶牛的胡素做替罪羊，将其撤掉赶回国。最终靠拼耗以及潘裕昆组织敢死队穿插挺进才在8月5日彻底占领密支那。

从占领密西机场起算，此战总耗时80天，国军损失6670人、美军损失2207人，歼敌约2300人，俘敌69人；而7月中旬孙师两团夹击仅半天就击毙援密日军1600余人，溃逃之敌约400人也在其后两天内彻底肃清。若这支援军未被歼而加入作战更不知会打到何时。7月中旬以后，无增援的密城日军拼耗不过盟军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水上源藏于是在7月底下令边打边逃，最后一批日军从8月1日夜里开始从水路逃走，至4日夜晚逃尽，他自己也在渡江后自杀。

密城之战正胶着时，5月底6月初日军万余携重炮、坦克意欲夺回西通。新38师112团与敌激战六天六夜，粮弹基本耗尽史迪威拒绝空投补给，理由是密支那战事紧张飞机忙不过来。孙立人紧急变阵调遣113、114两团奔袭卡盟等日军据点，最终以伤亡比1：15歼敌4500余人。史迪威自己事后也承认，若当时有空中补给，攻克孟拱至少还会提早许多日。实战至6月25日，新38师、新22师、50师149团等部已经攻克孟拱，接着扫清孟拱河谷残余日军控制了

孟密间铁路、公路进抵密支那西南郊。7月11日113团离密城甚至不到3英里，彻底切断了密支那到八莫的公路。密城仍在苦战中。这就意味着史迪威的得意之作：派中美联军“暗渡陈仓”长途奔袭密支那纯属白搭！正面部队已推进到密城，可那里还在艰难苦战，偷袭的意义为零！7月25日史迪威仍坚持不让孙、廖部染指密城战事，宁可舍近求远空运新30师90团来加入攻密战。孙立人、廖耀湘所部也都只能赋闲观战，好处是给了部队一个休整机会。

对比孙立人新38师2000余人攻打西通万余日军，我军阵亡180余人，毙敌2700余人；同样兵力打孟拱守敌约6000人，毙敌2000余人，还分兵解救英军第77旅，我军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算新38师，从进攻缅甸开始到此时为止，阵亡官兵约900人，歼灭日寇约17000人，损失比为1：18！而驻印军缅北全部战事阵亡歼敌比约为1：7，还包括密支那的“负数据”在内！密城之战不仅证明史迪威军事素质既低，其心胸狭窄也够可以的，而且丝毫不在乎下属的生命价值。5月5日他竟因孙立人部伤亡太少而训斥其“作战不力”！孙次日即书面据战绩实情批驳此谬论，史迪威只能装傻不予回复。他在力争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时曾经放言：“离开了美国人指挥，中国人就不会打仗。”新30师组建未几，系由军政部第25补训处募集四川、广西壮丁组成，运抵印度训练数月首次作战即缅北战役，三个团先后加入攻密之战，在史迪威和他那几个助手指挥下伤亡惨重进展迟缓；转入孙立人新一军编制后，尽管还有新部队难免的失误之处，但总归一路高歌奏凯。尤其是攻1.4万重兵据守的南坎及老龙山，在112团配合下，十天拿下毙敌3000余人。正反两面的事实证明，离开了中国人的指挥，史迪威根本不会打仗！

关于三个问题

东磐兄谈到他认识转折的几个要点：“这个问题关键是这么几点：第一，到底1942年中国远征军征战缅甸失败的责任归谁？当时几万中国军人死在那片战场上，这个责任到底归谁？第二，史迪威和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之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迪威是不是基于个人私利想要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而蒋介石先生是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才坚决地守住了自己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第三，史迪威在人格和专业素质上，到底值不值得肯定？”

这几点言简意赅。第一点，1942年远征军缅甸战败责任最大的是英国人，丘吉尔认定日本人占领缅甸英国还能夺回，而中国军队助其守住缅甸反倒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患，可谓“宁赠日本勿与中国”是也！糟糕的是它明明不想打却装出要拼死一战的样子，使得国军处处被动。直到3月25日，从史迪威处得知老蒋已识破英国人只想撤不愿打，亚历山大还亲自飞赴重庆向蒋承诺：“决心坚守在现在的阵线。”“阵线稳定后，准备反攻，以克服仰光为目标。”哄得老蒋激动万分，当天下令第五军组织东吁会战。孟德斯鸠早就夸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老蒋却被英国佬哄得团团转，真是有辱祖宗门庭！

其实背地里英国人已经做好全部撤退到印度的计划了，亚历山大上将就是靠敦刻尔克拿法军当炮灰掩护英军逃跑而出名的，调他来无非故伎重演罢了。当廖耀湘、戴安澜按照史迪威、杜聿明的“平满纳会战”计划，节节撤退

引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入预定地点时，英军忽然弃守普罗美，国军侧翼洞开，面临腹背受敌状态所谓会战也就泡汤。而国军南下缅甸固然有保住唯一外援进口之迫切需求，但握有缅甸主权的英国军队无心恋战只想利用华军掩护其撤退，这一仗注定打不赢。

其次罪责应在老蒋，他一开始就不应该轻易将远征军指挥权授予从未打过仗的史迪威。老蒋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皆属平庸之辈，就连阴谋也玩得十分拙劣。正因此，他唯恐失去枪杆子的支撑，到处插手指挥。白崇禧曾告诉史迪威："只有切断了连到重庆的电话线，我们才可能在战场上有真正的指挥权。"蒋虽然授予史迪威远征军指挥全权，看看靠不住又指示杜聿明等另搞一套。开始只有杜聿明一个司令；接着来了史迪威这个光杆司令；出问题了再设置罗卓英于杜之上、史之下；此外还有个林蔚的参谋团。远征军指挥系统成了四匹马拉车各奔一途，还统统置于英军指挥之下，不打败仗那才是怪事！

老史瞎指挥应负添乱之责。比如他获悉东部有日军装甲部队突进，在其4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有传言说日本人的坦克师在垒固，目标是腊戍吗？天哪，这一举措会把我们压垮。"这证明他明知问题的严重性，却没去关心东部防御甚至连一次视察都没有，一门心思在中部与国军和英军争指挥权，结果恰是东部不守造成中部溃败，此日正是转折点。入缅作战计划是参谋团参谋长萧毅肃主持制定的，本身就是个大乌龙。它居然靠3万余人的第6军防守500余公里的东部，脑子里就没把宽阔的东部当敌境！实战正是这段漏洞很多的防线被轻易突破，导致滇缅公路重镇蜡戍失守，远征军后路被断军需遭劫军心动乱形成溃败。若论职责，担任远征军总指挥的史迪威该负全责，考虑到他本来就不懂打仗这个总指挥也名不副实姑且不去追究也罢。

而中国军队在溃退途中的损失惨重，老蒋、罗卓英与杜聿明都要负责，蒋不明缅北气象及地理条件就下令撤回国不去印度；罗擅自出逃还导致火车相撞，铁路因此瘫痪两日严重影响军事调动；杜聿明不顾孙立人告诫说野人山去不得，与其被雨林折磨死还不如硬打走大路，固执己见酿成惨剧，数万忠勇不能战死疆场却陈尸雨林。这三位是罪魁，特别是愚忠之杜聿明，史迪威则不应该为此承担什么。相反，他要求中国军队退往印度无疑还是明智的，孙立人服从该项命令证明了这一点，何况孙部被中英两军当炮灰殿后时已获得完成掩护任务后有自主决定去向之权，说孙违令不讲道理。无论英国人、史迪威、蒋介石还是杜聿明，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日军的实际兵力与作战方略，谈何应对之策？反倒是日军作战计划几乎像是把着中英军队之脉搏而作，天衣无缝，溃败也就不奇怪了。

东磐兄盛赞史迪威3月21日要派另两个师南下攻打日军显然只是纸上谈兵。史迪威甚至连一个基本的作战安排都没有，更谈不上后勤准备，孙子兵法云："兵无辎重则亡"，史迪威不过只是下车伊始瞎哇啦而已，中国军人的死活他是不管的。且他明知英军只想逃跑不想打仗，强令国军两个师南下配合正在同古苦战的200师向日军反攻则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扯淡。当时正面即有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五十五师团，这两个师团共42500余人士气正旺、后勤充沛且供应线路短，还有制空权。而入缅国军4个满员师每师不过9000人，其余5个师平均每师只有6000余人。不但没有制空权、重武器，就连粮饷弹药也不足。多余说一句：200师乃是国军装备最强的重装甲师，英国人不肯运

其装备，于是轻装南下拿来当步兵师守东吁，老蒋也真能糟践！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28900人于3月26日、第十八师团一部于4月8日先后登陆仰光，盟军方面竟无一人知晓。就像后来的进展一样，日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的作战计划是东西两路突进，迂回截断中、英两军后路；东路第十八师团主力则一直蛰伏于泰国境内，日军在泰军工兵配合下赶修泰缅公路直通缅甸东部高原。此路于2月动工，4月上旬即完工。等到20日第五十六师团兵至垒固时，第十八师团主力沿此路从泰国清迈地区开进缅北,两个师团并驾齐驱，神不知鬼不觉斜插西堡，29日即取蜡戍。而远征军首脑层包括蒋介石、史迪威在内，非但没人察觉第十八师团在泰国境内动向，就连它的存在都一无所知，泰国境内修路亦未察觉。这支全员31400人的加强师团不但彼时形同幻影，就连打完仗几十年能说清楚它的来路者都不多，讨论什么第一次入缅怎样才能取胜不是很滑稽么？仔细斟酌一下，第一次入缅作战，由于英军不配合无论怎样打都赢不了。倒不如照老蒋开头的一个设想，即在缅甸中部偏北地带择地设防，即使胶着也可拒敌于国门之外，便属幸甚！

史迪威在颁布攻击令当天给老婆写信称：“日本人对马圭的空袭（摧毁了英驻缅甸皇家空军主力）几乎断绝了我们本已匮乏的给养，我们不得不完全接受现实，目前这段时间不会有反击发生，不过，中国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他们能忍受比这更艰难的条件而不会崩溃。”这说明老史心中明知无胜算而硬为之，多开下去两个连给养都难乎为继的师，别说取仰光，纯属拿中国军队将士们的生命当儿戏！事实上200师在同古就已遭第五十六师团加入进攻，若不是杜聿明紧急调派新22师长途奔袭搭救、并在3月29日夜不理史迪威禁令自主下令突围，次日一早敌军即展开全面攻势打同古，这个师那时就完了！

至于说什么日军立足未稳必可大胜之类，根本就是想当然。实际上日军立足奇稳，到处都有缅甸独立军接应，老百姓箪食壶浆还帮带路搞破坏，立足不稳的恰是国军。日军按预订计划第三十三师团从西边溯伊洛瓦底江向北疾进；第五十六师团从东边溯萨尔温江狂扫而上；第五十五师团沿中路攻势推进，是有充足准备的预设作战。4月3日修改计划动用第十八师团主力由泰国斜插入缅，与五十六师团并驾齐驱快速推进直取蜡戍。作战目的清晰地定为包围歼灭华军主力。若依了史迪威从中部南下增援同古收复仰光的命令，国军第5军三个师正好送进日军口袋阵里，必被截断退路全军覆灭！下场绝对比钻进野人山更惨！

第二，史迪威争指挥权是他欲达成在印缅战场打败日寇大业的基础，他想比肩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尼米兹成美军四大统帅之一，此宏愿无可厚非，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则是其悲剧的根子。实际上争指挥权首先是与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开始的，英国人对于老美只派了史迪威做“光杆司令”耿耿于怀故不买账，至于争权细节如何暂不去讨论。但中缅印战区处于各自为阵的状况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人一心想放弃缅甸撤退到印度；史迪威争不过英国佬就来欺负中国人，因为他手握租赁法案中援华物资支配权，此乃要挟老蒋之利器。老蒋心知肚明国军战斗力有限，编制也有限，满员师甚少，多数师不满员甚至半员。一个日本师团人数多于两个中国满员师，第十八师团甚至三倍

出头，兼之武器装备与训练的差异，所以告诫史迪威须得五个中国师才能对付日军一个师团。史迪威以其在中国驻军直至做武官的阅历，自认为中国兵强官弱，只要换掉军官改善伙食与装备，再加以美式训练，中国军队就是一支不得了队伍。这个认识并非完全没道理，国军高层包括老蒋在内不是旧军阀就是北伐投机商，靠着苏联红军手把手拽起来的“名将”，那个“黄埔军校”早期不过是个短期培训班，少数能打仗的也是天资聪颖靠战场磨砺出来的，并非那个“军校”有多神奇。抗战本来是一次机会，做到论战绩升职降级择龙弃鱼整编国军亦非多难的事。只是老蒋同史迪威其实是一路货，他俩军事素质都只是一堆泡沫，皆热衷裙带关系只不过各有各的裙带罢了。

孙立人回忆说因为指挥混乱，国军各部乱兵在英军缅民逃空了的曼德勒城里搜劫民宅商铺，足足耽搁了十天之久却未能组织任何防御！他担任曼德勒卫戍司令时，部下曾拦截了第5军的汽车，装满了搜刮来的非军用物资说是要驶往密支那运回国。鉴于杜军长乃撤退总指挥，孙也只好摇头准予放行，料定其根本别想回到国内，果不其然。而第66军军长张轸系老蒋所谓“北伐老人”、黄埔教官，辖新28、新29、新38师，有眼无珠直斥孙立人师是“杂牌中的杂牌”。可他的嫡系新28、新29师，在缅甸作战未触即溃，劫掠民财却毫不含糊。宋希濂直白地称其根本不是兵，就是一群土匪！逃回国后张被撤职，所部遭裁撤。9月7日蒋却任命他为24集团军副总司令，不降反升。后来蒋任命黄埔教官刘峙做淮海战役总指挥，就连国军将领都叹息：派不出老虎就派只狗，怎么派了头猪来？老蒋如此治军，可想而知它的战斗力能有多强。

自1928年以来，老蒋一直指挥不动国民党系列各支杂牌军，唯有依赖中央军才能实现他的统治，这是国军中始终抹不去的“嫡系”印记。史迪威依据其过去在华阅历以及缅北作战的新见识初到重庆不久便向蒋提交了一份整军报告，可见其争权至少还有改造这支军队使其提升战斗力的良好愿望。转交这份报告的宋美龄直言不讳称：“噢，那些德国顾问就是这样向他建议的！”她指的是1934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提交过的整军计划。或暗示史迪威有前车之鉴这份新计划仍会成为废纸一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应该说老史训练部队还是内行，如果国军能采纳他的训练方式编训国军，怎么说都是好事情，驻滇远征军的编训成果足以证明。只可惜狂傲的老史要置换所有上校以上军官，全部由美国军官接替，这个异想天开的帝国主义者碰上老蒋顽固的民族主义，除了撞出火花啥事都办不成。只能用“一个巴掌拍不响”来形容，一门心思要指挥权的史迪威，正好硬撞老蒋的敏感之处，动不动就挥舞“租借物资”大棒相要挟，终归好事没成几件，坏事倒成一堆。

在孙、廖两师驻印练兵时期，史迪威竟然要以美国军官换下全部营级以上军官！这等最愚劣的帝国主义主张企图把中国军队变成殖民地军队，如英印、英缅军之类，理所当然会遭孙、廖坚决抵制，继被老蒋否决这才未能得逞。而派来训练大兵的美国教官只是照搬美军校那些基础训练科目，除了器械操作、通讯卫生等可算是新东西而外，其余跟中国军队训练科目差不多。孙立人认为不够，自行按照他入缅后构想的热带雨林作战模式安排额外训练，专攻雨林作战所需要的攀爬、泅渡、穿插等实战本领。美国总教官曾为此大发雷霆，所幸孙立人毕竟有仁安羌之战打出来的威名，史迪威也算明智未予制止。

事实上，孙立人的新38师从1932年就开始按照孙氏编排的科目严格训练，其后又经海州、都匀两处训练营苦练，其成效早在淞沪抗战时就经过实战检验，战绩乃是参战各部最优秀的。入缅后仁安羌一战能以千余兵力攻坚大胜日军7000余众；被当作炮灰掩护中英各部逃跑，继续成功完成了任务，战毕居然还是中英各部建制最完整、军容风纪最严明的一支队伍，其代表队还在印度盟军各路比武竞技赛中力拔头筹，绝非偶然！孙氏这些自编的训练科目也是根据入缅后的实战情况精心设计的，事实证明它奠定了新38师辉煌战绩的基础。史迪威只能说命好，若没遇上孙子后人统率的这支队伍他头上的虚荣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去探究老蒋内心如何盘算，窃以为东磐兄论说军队指挥权无涉国家主权是不成立的。军队指挥权若无涉国家主权，那么还有什么能算是国家主权？1918年初史迪威在法国就曾亲历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拒绝英法要求美军交出指挥权之事，唯一理由即是涉及美国国家主权。后来战场形势不利，只有协同作战而无统一指挥的联军被鲁登道夫将军指挥的德军突破防线损失惨重，这才迫使联军成立法国福熙元帅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美国亦同意其军队“暂时归联军司令部调遣”，尽管美军建制依旧仍属主权让渡。

二战时盟军统一归艾森豪威尔主持的司令部调遣，蒙哥马利尽管喋喋不休、戴高乐尽管趾高气扬，但因政府让渡了这份主权，他们也只能服从艾克调遣进行战斗。以上均属于主权的让渡，绝非无涉主权的行为。主权是可以让渡的，但需合情、合理、合法、自主决定，否则就属于受到侵犯。东磐兄若说老蒋把持的国民政府让渡主权之是是非非可能更合适，去论说军队指挥权无涉国家主权就有失偏颇。哈佛史学大家费正清后来评述说：“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可见，军队指挥权无涉国家主权乃是东磐兄独家见解。而这个主意正是史迪威出的，他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的始作俑者！

第三，说“史迪威在人格和专业素质上，到底值不值得肯定”过于笼统。任何人在人格和专业素质上都是鱼龙混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即便如希特勒、斯大林、东条英机那类人，都有其人格优点和专业素质的特长，只能以其行为效果为依据判断善与恶、罪与非罪。具体到史迪威，若以“雷锋精神”作标尺去衡量，确实可圈可点。身先士卒、体恤下情、带病坚持工作之类，足以戴朵大红花拍照挂在光荣榜里。但若以三星乃至四星将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去衡量，至少是不称职的！而他在本宁堡军校获得的“醋酸乔”雅号，则彰显了他的人格缺陷，偏偏他还引以为荣，这缺陷就奠定了他必然失败。就连他的政治盟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都认定他不适合留驻现职，这就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即便一个公司的高管，如果里里外外都处不好关系，还怎么开展工作？讨论“值不值得肯定”有意义吗？

能为其“人格和专业素质”作肯定背书的，似乎仅有率领百余人经过三个星期的长途跋涉，“一个都没少”地到达印度，风头早已出尽颂歌也唱得够多了。然而，这是一位身负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所应

该做的事情吗？英国军官们就此送给他“美国陆军最优秀的三星级连长”雅号，陈纳德将军则坦率地评价说：“如果他是一名连长或营长，他只需对其直接指挥的部队负责，这种行为确实值得称道；可是作为身负重任的亚洲美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擅自离开部队并三个星期音信皆无的行为，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知和不负责任。”这个评价基本客观。作为中国战区的总参谋长、缅甸盟军总指挥，放弃职责率领百余人玩蒸发游戏，自始至终居然没给他的总司令哪怕拍一个电报！直至6月4日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马格鲁日将军转告老蒋说史已经抵达印度半个月了，老蒋暴怒也属正常，若按军法弃部潜逃本该枪毙！

仅说一条：孙立人率新38师比史迪威一行晚几天抵达印度。但因史迪威未予安排，英国东方警备军团军团长艾尔文将军竟要将其缴械作难民处理！孙师官兵激愤不已，双方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孙立人一边理性周旋，一边选择有水源、易守难攻的山坡扎营严阵以待。所幸斯里姆将军正在英帕尔养病，闻讯立即出面告诫艾尔文孙师于英军有恩，不可无礼：“对于新38师必须给以协助，绝不能乘人之危无礼相待。何况新38师战斗力极强，阁下的部队根本不是新38师的对手，非但不能缴械，还将引出不幸后果。”艾尔文于是缓和态度，发电向总督韦维尔请示。韦维尔始终是极力反对中国军队驻扎印度的，又逢亚历山大将军恰在德里，闻讯立即赶赴韦维尔上将处，细数新38师仁安羌救援英军壮举，以及在色格、卡萨、温早等地血战掩护英军撤退等功绩，力劝韦维尔阻止艾尔文的愚蠢举动，下令其优待该师，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的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在要求华军各部撤退印度时曾与亚历山大将军和英缅总督商量，这两位曾正式向史迪威表态：华军撤退印度时必须解除武装，按难民身份给予收容。他是事先就知道英国佬这个无理但合法的举措的，本该提前同英印当局乃至更高层协商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不说他弃职责奔走的三个星期，既然先于孙部到达印度数日，却没做任何事情化解这个必然会发生的矛盾，只顾跑去德里对新闻界作秀，显然不务正业严重失职！又所幸这支部队是新38师，倘若换成另一支无此对英功德的部队，如新22师，结果会如何？要么屈辱地被缴械，要么发生流血冲突。

史迪威对于中国抗战危害大于帮助

史迪威对中国抗战所给予的帮助，即使有，也不如他所造成的危害大。我们无妨探讨一下史迪威对中国抗战所起的作用，似乎比探讨他的“人格和专业素质”更有意义。

史迪威持共和党立场，对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是不买账的。受命赴华时就认为罗斯福“被迫跟一个在很多方面跟我们的敌人德国相像的政府结盟；这是一党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群法西斯”。既然如此，他完全可以跟原拟派任此职的休.德拉姆将军一样，拒绝受命就是了，何况马歇尔还有澳洲的指挥职位为他准备着。但他似乎违心地表示：“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不远万里跑来就任“一党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群法西斯”的总参谋长。马歇尔交待

的任务目标只是“武装和训练在中国的中国部队”，监管美援物资，使中国能够对日作战以拖住大批兵力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这也是罗斯福的旨意。可史迪威初来乍到就没把中国战场放在心上，全部精力都用在整一支队伍自己玩，先想拿下缅甸建立功业，紧接着提出“打到东京去”的口号，这不但大大超出美国政府的授权，也无端提升了一系列支撑它的人员、技术与物资的需求标准，成了亚历山大将军说的“一系列麻烦的制造者”。

史迪威的自以为是膨胀得令人不敢思议，为满足个人情绪宣泄他可以冥顽不化地置任何全局于不顾。当密支那终于拿下之后，中国远征军也即“Y部队”的进攻却受阻。当初他使尽各种招数逼老蒋开打滇西，为的是配合驻印军进攻，减轻甚至阻止日军分兵增援。英国人的骨头他啃不动，就抡着“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的大棒来敲诈蒋介石，银样蜡枪头的老蒋其实已经被他成功制服了，对于史迪威3月27日所提要求完全满足，我们下面就会说到。

到8月5日密城拿下，驻印军反攻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就连一直在等着看笑话的英军也忍不住派遣第36英非师前来助阵以便分一杯羹，此外还担负着阻止中国军队乘胜南下逾越他们给定界线的使命。照理，驻印军应该趁胜挥师八莫、南坎，一方面修通史迪威确定的中印公路南线就差这一段；另一方面拿下滇缅公路重镇南坎就切断了滇西日军补给线与退路动摇其军心。日军的兵力与军需主要聚集在八莫到腊戍一带，攻打八莫地区形成与远征军的夹击之势，令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腹背受敌。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凡人也能理解的事情。

然而史迪威忽然改变态度按兵不动了！国军五个装备最强劲的师加上各类直属重装、工兵等部队皆休整待命，若算到10月14日实际出动，驻印军休整3个月出头！

我们无妨回顾1944年春季开始的印缅战事。3月15日日军第十五军三个师团8.5万兵力，连同后勤辎重运输人员共计12人渡过钦敦江，21日翻越缅印边界山脉进入印度。一时间风声鹤唳，日军大有攻陷英帕尔等地的气势。史迪威开始担心驻印军后路被抄，于3月27日紧急飞赴重庆，面谈之外还书面向蒋提出两项要求：

“马上组织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地区，并沿滇缅公路南下北缅，与中国驻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逼日军撤出英法尔（即英帕尔）地区。/加派五十师和十四师空运到印度的雷多，这两个师主要担负警戒胡康河谷后方，协助英印当局保卫英法尔，防止入侵英法尔之敌，从清德温江由大洛盆地偷袭胡康河谷。”

由此可知，日军入侵印度英帕尔地区，着实吓着了史迪威，要求国军立即开始滇西作战及增派两个师的最终目的，都是“逼日军撤出英法尔地区”；直接目标即“与中国驻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且不说这个判断完全外行：第一，日军在南缅尚有第二十八军所辖第五十四、五十五两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约5万人作为总预备队，远征军无论怎么打都影响不了英帕尔战事，远征军发动攻势充其量只能配合驻印军；此外史迪威担心日军从英帕尔断了后路，若滇西未取，驻印军必腹背受敌，甚至有被歼灭之危险。滇西得手才有出路，至少可以挺进回国。第二，两个师空运印度，确实可以保护驻印军后路，但日军旨在彻底端掉盟军在印度的后勤基地是其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自然断了驻印军后路，无需为断掉驻印军两个师后路分散兵力。如果高看老史的智商，充其量他在借题发挥吓唬老

蒋。

此前他派驻远征军的助手多恩已告知他中国远征军兵员缺额甚大，尽管经驼峰航线提供的物资用了一些装备、训练这支部队，许多将领也迫不及待想投入战场。但对于老蒋而言，动用如此巨大的兵力都用于替英国佬解围并不情愿，但也存在英帕尔战役失败必断绝印中运输线的危险，犯踌躇并不奇怪。日军在中原也即史迪威说的“东部”正开展强大攻势，可滇西缅北几乎集中了国军大部分精锐。据远征军第53军130师师长王理寰回忆，当年仅集结在滇西的中国军队就多达40万人。老蒋调如此大量的部队入滇西，本身即蠢着，有人说不到滇西史迪威不给美援物资。暂不说实际上调去也没得啥美援，老蒋稍微聪明点不如投史迪威所好，调二三十万大兵去桂林逼他开训“Z部队”，助其向史汀生施压，绝对是两全之策。退一万步说，中国的抗战是全局，滇西缅北的征战无论怎样夸大其意义都只是局部，舍全局而顾局部、弃中心而就边远，必然是愚蠢的决策。

而史迪威却巴不得东部失败得惨些，如此既可以证明他预言准确，还可以打击老蒋和陈纳德，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他是不管不顾的。史迪威接连向马歇尔告状说老蒋不想打仗，马歇尔再操纵罗斯福发来威胁性极强的电报，大棒只有一个：远征军不开始滇西作战就断绝美援！这是老蒋的软肋，他终于饮鸩止渴，为了不失去美援，基本上也不顾东部--中国的基业所在。

可飞越驼峰运到的美援物资大部分被用于驻华美军空军及其他机构，装备远征军的也只是剩下部分的多数，能给老蒋装备国军的更是极少部分。除去陈纳德第14航空队还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外，美援对于中国内地军队而言如同鱼饵！若再将国军精锐大部花在维系美援通道之上，对于抗战大业绝对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迫使中国远征军投入印缅战事，盖因史迪威的误判及私心，并非那里真有危及全局的险恶形势存在。罗斯福、马歇尔等美国高层，以不为殖民主义抢地盘为由，坚决不肯派正规陆军涉足滇缅战场，却顺从史迪威的叫嚷逼中国军队为英国殖民主义打仗，可谓伪善到了极点！

今日阅读滇缅抗战的辉煌战绩，我不得不说，那其实是民国走向败亡的转折点，美国佬包括史迪威在内，对于打倒“蒋家王朝”贡献实在太大！毛说“要给一吨重的勋章”，以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阿诺德、史迪威以及后来的杜鲁门为符号的美国佬应该领取八百公斤，剩下的才能分给其他人。而这八百公斤里史迪威当领取一半以上！

见过老蒋之后的4月3日，史迪威约蒙巴顿和斯里姆在印度乔哈特空军基地会面。史迪威对日军入侵英帕尔地区忧心忡忡。他并不知道日军能打进英帕尔平原是蒙巴顿批准、斯里姆将军采纳第四军军长斯克恩兹将军建议所做的决策：放日军第十五军三个师团渡过钦敦江进入英帕尔平原才好全歼，他们的胃口根本不在于“击退”！英军从1月中旬获得确认情报就开始谋划，此时已有充分准备：还在3月5日日军尚未开始出动时，英军温盖特将军就已指挥其“亲迪部队”近万人连同大炮汽车等装备空降缅甸中部日本第十五军后方杰沙地区，原准备用于乘日军渡江

时东西夹击。现在确定放日军进入英帕尔平原再歼灭，斯里姆将英17师、第20英印师从缅印边界易守难攻的大山撤回，温盖特的“亲迪部队”就因距离太远使不上劲了。

史迪威被蒙在鼓里，主动提出抽调新38师主力协助斯里姆保卫英帕尔。傲慢的蒙巴顿当即予以拒绝，明确表示如果让中国人参与保卫英帕尔，那还不如让日军占领它！斯里姆还算客气，告知史迪威英军完全有能力保卫英帕尔，日军充其量不过能短暂地切断部分铁路、公路，至多不会超过十天就能恢复。他继续隐瞒英军在日军渡江前及渡江时按兵不动，目的就是要全歼日军而不是击退它。斯里姆感谢史迪威的好意，但新38师是史迪威在缅北建立功业的实力保证，还是继续留在缅北战场为好。国内外不少著作甚至连老兵回忆皆因史迪威误导，又因史迪威确实自作多情下达过要新30师防卫印度境内铁路的命令，述及此事都说英军蒙巴顿等将领惊慌失措，以及驻印军新增部队应英军之邀参与保卫英帕尔之类说道，其实根本就没影的事。英军非但谢绝了史迪威的援助意见，鉴于3月24日温盖特将军因飞机失事身亡，斯里姆盘算着既然“亲迪部队”对英帕尔作战已帮不上忙，为避免分心干脆将其交由史迪威指挥，算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也可算英军为缅北作战出兵近万。

这回，史迪威得了斯里姆的保证并意外获得“亲迪部队”指挥权顿时意得志满，迅速决定将新30师调入缅北，149团跟随廖师进攻孟拱河谷，另两个团配合梅里尔指挥的美军特遣队作战直至奔袭密支那。现在史迪威兜里有美英军13000余人加华军三个师，有足够的本钱撇开新一军独自创业。他下令偷袭密支那对孙、廖以及英国人都绝对保密，甚至除梅里尔、柏特纳等几个核心人物之外，突击队官兵都不知所以，老史要显露一把自己的军事才华！跟个孩子似的，挺搞笑，只是对于作战官兵而言只能是苦笑。

英国人从缅甸撤回印度后并未闲着，他们在人事、军需、兵员、运输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有效调整，尤其是中东的战事胜利结束，皇家空军大批东调，仅飞机一项就已达600多架。兼之美第十航空队也已拥有600多架飞机，新建改建机场120余处；陆军也增配了精兵良将，后勤准备充足，与1942年时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日本人主动入侵英帕尔地区简直是天赐良机，三个师团送上门来其实分散了兵力，远比留在缅甸静待英军未来的进攻要愚蠢得多！但事出有因容后再述。斯里姆将军在充分掌握敌我情况的前提下，制定了极有把握的作战方略，并将最合适的将领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根本不像史迪威那样滥用亲信，连一个完整像样的作战方案都没有，始终就是即兴作战。整个英帕尔战役基本掌控在斯里姆的计划内，是一次极其漂亮的“防守反击”战例，到7月10日，一败涂地的日军终于获准踏上“白骨之路”撤退、斯里姆穷追猛打歼敌之时，史迪威仍在密支那城外一筹莫展！

史迪威倒打一耙

也就在史迪威约谈蒙巴顿、斯里姆的同一天，也即老蒋在接到史迪威要求的第六天，便按照史迪威第二项要求派出增援驻印军的第14、50两师登机赴印。因为是史迪威急需，所以空运顺利，几天之内就全部飞抵印度，进行换

装和短暂训练编入驻印军作战序列。加上上年冬组建、已经空运印度的新30师，连同1943年12月志愿入伍的以知识青年为主的近万名新兵补充新一军两个师，史迪威掌控的中国驻印军已有近十万人马。老蒋还顾不得雨季即将来临，命令脓包将军卫立煌率领两个集团军十余万人于5月11日渡过怒江开始攻势作战。

老蒋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100%满足史迪威3月27日的要求做得够可以的，尽管相当愚蠢。可换来的却是老史仍不断地向华盛顿诬告！

鉴于卫立煌满脑子只有旧军阀混战时期陈腐的战术思维，其指挥大兵团作战也仅有中条山溃败之记录，只因他属于蒋所谓“北伐时期的老人”便被委与远征军司令要职，注定要打拼耗战。他所谓“香肠战术”说起来好听，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却是大兵团攻坚作战，逐次增兵并无协调。龙陵是中心战场，说是龙陵、松山、腾冲三地扎成一节一节分别围歼，实战与孙立人之围点打援相反，致力于啃防守坚固的三地，而不是把围歼长途奔袭的援兵作为重点。回望历史，国军中一大批军师级“中青年干部”确属当之无愧的精英才俊，被老蒋麾下那些涂抹着北伐金漆的朽腐打压着，无怪乎民国越玩越没戏！

以87师打龙陵为例，打到第三天腾冲日军还可以增援6000余人来救助，堵截的却只有一个营！结果是占领龙陵老城的87师接连遭遇腹背受敌，反被逐东撤，直至离怒江只有3华里日军止步才停下来，张绍勋师长引咎自裁，未中要害才免一死。休整一周后三个师再上，敌仍可由几处调兵3500余人反攻。7月13日，第71军又集结五个师约30000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向龙陵县城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远征军整个滇西作战就是一场有勇无谋的拼耗，胶着而又惨不忍睹。

打到8月初驻印军已经攻占了密支那，而史迪威却不准驻印军向八莫、南坎进军了！这使日军得以喘息。他彻底背弃了自己于3月27日所提出的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的主张，任由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付远征军！

8月19日，察觉无后顾之忧的日第三十三军据此改变作战计划，对驻印军取守势、向远征军发动攻势的《断作战》计划确立：“军要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击灭远征军主力之后，前出到怒江一线，在援救腊勐、腾冲守备队的同时，切断印中联络路线。”随即调第二、四十九两师团主力由南坎移师北上芒市，指挥机构亦从缅甸新维迁到芒市。在必要的后勤准备完成后，9月3日开始向北进攻。

来势汹汹的日军主力15000人沿滇缅公路奔袭龙陵，卫立煌本应设置大批机动部队担负伏击、围歼来援日军之责，而仅用少量部队蚕食各据点。反倒是大批部队陷在攻城阵地上，少量部队阻截援兵，使日军增援轻易地与龙陵守敌合力作战，更加剧了攻城难度。兼之史迪威留在远征军担任“总监军”同时还掌管军需大权的助手多恩，居然把远征军的食品、弹药贮存在离前线三百多公里处，开战后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及时将其运抵前线，因缺粮少弹也严重影响了远征军的作战。能推诿的借口只好说松山未拿下卡住了滇缅公路，其实根本在于物资放错了地方。十余

万大军都能顺利渡江上阵，就连多恩本人也能坐吉普车绕过松山去前面的指挥部，一个日军阵地就阻止了粮弹输送？为弥补此项严重失误，史迪威的司令部下令第14航空队除配合远征军地面作战展开空袭、护卫并无敌情的成都机场之外，还得承担转运军需任务。390架战机被老史下令调用，陈纳德只有90架战机可用于东部！进一步削弱了对两湖一带推进“一号作战”日军的打击。

老蒋急于解救龙陵颓势，请史迪威发兵攻八莫、南坎，如此日军将首尾难顾，对驻印军而言此刻也是最佳战机，正符合老史3月27日书面要求中“造成东西夹击之势”条款。然而此刻史迪威满脸得意，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说他的部队需要休息。老蒋气得七窍生烟，却毫无办法，当初将驻印军指挥权“无限制条款”授予史迪威，老史告急时老蒋很快就满足了史迪威的全部要求，如今驻印军闲得无聊却被史迪威扣住不准打仗！许多史论都在唠叨史迪威喊打喊杀，老蒋畏战，整个儿黑白颠倒！恰是史迪威在最关键时刻扣住驻印军不准配合作战，看着远征军同日寇厮杀伤亡惨重战势紧急而无动于衷。

情急之下，老蒋9月初增派劲旅第200师上阵参战，又从各地征得新兵万余人补充远征军，就连稚气未脱的“少年兵”都大批调来冲锋陷阵。而日军倾抗战以来最大兵力展开的“一号作战”正威逼桂、黔，其作战计划明确了作战目的：“将美国在桂林和成都的B29轰炸机基地，在轰炸日本本土之前，对其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打碎中国军队的脊梁骨，迫使其政府丧失斗志”；“打通中国北方到印度支那的交通走廊”。

日军最为担心的是：“缅甸远征军的大约一半，即6个军，16个师左右，可能在衡阳失守前后调往湘桂方面，虽然这与缅甸北部地区的战局演变也有关系，但还必需估计到这个情况。”由于史迪威的作用，日军这个担心落空，云南方面连一兵一卒都没能东调，日军苦战克衡阳后得以在桂、黔势如破竹。当然这也与老蒋的愚蠢有直接关系，他没有魄力挣脱史迪威乃至美国官僚的压力，一直被牵着鼻子走。他若下令远征军稳扎稳打不急于求胜，如日军计划所担心的调几个军到东部，湘桂至少不会失守如此之快！此乃另一话题，这里点到为止。

史迪威再倒打一耙

史迪威以拿下密支那为其丰功伟绩显摆了一个月后，于9月6日飞到重庆，8日老蒋继续向他提出要求发动驻印军对八莫的攻势，以助滇西扭转颓势，史迪威仍幸灾乐祸坚持不肯发兵。史迪威还扣住租赁物资不给国军以补充，他下达的命令是未经他本人审查一枪一弹也不准拨给任何中国部队，宁可放在仓库里生锈。衡阳作战极其艰难时陈纳德将军曾请求将归属第14航空队的军需拨1000吨给薛岳，史迪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对他留在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说：“让他们自作自受吧”。

中国军队40万精锐被胶着于滇西战场，东部面对日军抗战以来最大攻势一败涂地。这使赫恩将军对史迪威如此

冷漠地对待日寇的攻势也觉得太过分，告诫道：“对东部局势一再采取拖延的态度，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但史迪威就是不为所动，赫恩只得奉命发电报答复陈纳德：“已充分考虑了你提出的为衡阳守军提供一千吨物资的建议。但史迪威把他对事态发展的见解通知了我们，他正想让东部出丑，因而不想采取任何行动。”眼看着据守衡阳的第十军缺粮少弹，陈纳德退一步请求批准给五百吨，史迪威仍然不准，直至8月8日衡阳陷落。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其主要职责本该协助蒋总司令协调中国抗战全局，但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缅北作战去了，为了这个局部不惜牺牲全局，算是帮助中国抗战还是与日寇里应外合破坏中国抗战？

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的物资，从1942年至1944年9月，交给中国远征军的武器为：冲锋枪2724支，步枪20000支，机关枪663支，迫击炮284门，火箭筒524具，山炮302门。何应钦说：“多数空运到中国的军火，都是提供给驻华美国航空兵的，交给国内400万国军的只有1706支冲锋枪，1000支步枪，96门山炮和351挺机关枪。”除了驻印军确实全副美械之外，可怜几十万远征军除了200师发过胶鞋之外仍是“草鞋兵”，大量十几岁的娃娃兵在滇西拼命，当时都有军歌《少年兵》了：“我们少年兵，我们少年兵，精忠报国肯牺牲，明天上战场，明天上战场，杀尽鬼子强盗兵，看国旗飘扬多美丽……”原日本兵早见正则回忆7月25日松山滚龙坡之战：“炮声一停，敌人已经攻到眼前，冲过来的敌人，有很多是连嗓音都还没有变化的少年，他们呼喊着稚嫩的声音冲了上来。”诸多文字和影视对于远征军的“美械”描述大抵只是凭想象，参战的远征军18个师全部美械即使集中使用也不过能部分装备两个师而已，抗战老兵回忆衣衫褴褛的远征军与装备整齐的驻印军会师场景介绍并不止一两篇。而英军截留的租赁法案对华援助物资却装备了21个师！

直至9月13日，休整补充完成的日军眼看就要进攻桂林，史迪威坐不住了，他先飞到昆明陈纳德处，然后与陈纳德一道飞桂林，在他管辖下的仓库里终于同意拨付500吨物资给国军，而他在重庆的指挥部已下令开始破坏桂林的机场与仓库了！因时间紧迫，囤积已久的物资除了几吨运往昆明之外，剩下的物资史迪威下令销毁，主要是难运走的汽油，以免落入日军手中。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物资都是经驼峰航线运到昆明，再以各种方式运到桂林的。因为史迪威要在此设立另一处训练基地，搞一支“Z部队”出来归自己指挥。但美国陆军部否决了再为中国培训装备30个师的计划，遂闲置。如今又要返回头运回昆明，只是飞机不足只能运走少量。而陈纳德因缺乏汽油经常停摆或削减出击次数与规模，6月4日蒋曾出面请史迪威拨给14航空队汽油用量，以利空袭打击一号作战的日军，被拒。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里说：“想要为第14航空队骗到汽油，他想要的是整个世界，却从来不知回报”。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怀特1944年6月的报道称：“鸟儿在印度境内的B17飞机排气口里做窝，可中国在哭喊着渴望空军力量。”可知老史滥用职权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到此时数万加仑的汽油及其他物资全都付之一炬，这是一个驻华美军总司令应有的作为吗？

在处理完桂林的事情后，史迪威飞回重庆去继续跟老蒋争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国军方面则将此刻才获得的500吨物资赶紧车拉船载抢运到贵州独山。老蒋的小算盘也足够恶劣，他本可以按照陈纳德的意见就近拨给薛岳

的第九战区，只因薛岳不那么听话驯服，老蒋宁可舍近求远运走，继续不给薛岳部以合理的补充，尽管薛岳的第九战区正处于对日作战的中心。直至日军11月打到独山，这批物资以及征用汽车从重庆运来的物资仍在独山的仓库里，抢在日军到达前美国情报局特遣队销毁了这两千余吨美援物资，美国新闻界于是满世界报道说蒋介石囤积五万吨物资不给军队拿去抗日，留待以后打内战！补充一句：之所以聚在独山，是因为黔桂铁路那时只通车到此。

史迪威以老蒋心急火燎要他进攻八莫地区为筹码，在与马歇尔充分协调后正式向老蒋提出要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他甚至替老蒋起草了给自己的指令：任命其为民国陆空战斗司令；授权他组织对日军的反攻；改编和调遣中国军队，包括任免军官的决定权。所有这些权力“均不受指挥官或者省以及战区界限的限制”，似乎势在必得。他还下令部下起草了做总指挥的几个命令与文件。其实早在7月上旬，史迪威同马歇尔就商讨过这件事，马歇尔可谓“为朋友两肋插刀”，提议升迁史迪威为上将，居然把当时尚未攻下的密支那作为其“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页”记入功勋簿，并促使罗斯福总统发来内容近似的电报，同时告知蒋升迁史迪威之事。大概史迪威大叔认为现在已经水到渠成了吧？

几乎被史迪威逼疯的老蒋则反过来给史迪威下了最后通牒：若不下令驻印军停止休整并在一周内发动对八莫一线的攻势以牵制日军，减轻龙陵战场的压力，他将立即下令撤回远征军用以防卫昆明。而且，驻印军已经无需如此大的兵力，需要将新六军调回内地抵御日军攻势。老蒋自以为捏住史迪威的七寸了：这招可使史迪威千辛万苦整出来的“利多公路”成废物，他的光辉也就不复存在。两个傻逼继续斗智斗勇！也就在史迪威与老蒋顶牛之时，继8号攻克松山之后前线又报告于14号拿下腾冲，何应钦亦告知继续向Y部队补充一万兵员。史迪威据此认定老蒋撤军之言已无可能，故意留着龙陵围而不攻却是可能的，于是在收到老蒋通牒的日记里写下“这个疯狂的杂种。”“他想放弃这个地方并让这整个工程都报废。不可思议。”他扣住驻印军不准作战就可思议吗？

未能如愿的史迪威9月15日发电报向正在魁北克与罗斯福、丘吉尔一起开会的马歇尔告状，他隐瞒了老蒋已调遣其精锐200师加入远征军作战以及向远征军补充兵员一万人之事，愣说老蒋不肯增兵。不知是否也算人格高尚？更荒谬的是，还隐瞒了他拒绝老蒋要求驻印军停止休整立即向八莫方向展开攻势这个前提，告状说老蒋要从萨尔温江流域撤军，不愿继续进攻。对于东部形势则完全编造谎言称：“我现在确信华东的灾难在他（蒋介石）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认为日本人在那个地方不会再骚扰他，并且设想他会躲在萨尔温江战线后面安安稳稳地等着美国来结束战斗”，似乎老蒋欲迁都密支那。当然主旋律还是请马歇尔动员罗斯福强迫老蒋授予他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马歇尔收到此电立即让部下依据史迪威的意思起草了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以命令的口吻训斥了老蒋并晓以利害之后说：“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唯一办法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发动进攻，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马歇尔把这份电报塞给忙得不亦乐乎的罗斯福签字，然后于18日发出。事后罗斯福诡辩说他正被丘吉尔纠缠不休，没细看就在电报底稿上签了字，颇有抱怨马歇

尔之意，天知道究竟是咋回事！

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四个多月以来远征军一直在滇西拼命进攻，老蒋更是下达过“限9月上旬收复松山”、“腾冲必须在9月18日国耻纪念日之前夺回”，否则就拿军指挥官“军法从事”的强硬军令！而且现在松山、腾冲都已拿下，龙陵也正在激战，拿下它指日可待之时，史迪威还如此报告，是否属于卑鄙下作之勾当？

此时无战事的只有驻印军，扣住驻印军不准进攻的恰是史迪威本人。真是恶人先告状了！

更微妙的是，马歇尔也不可能不知道远征军几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攻势作战及不断取得的战绩，阿诺德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远征军渡过怒江开战是远东战场的最大行动。却仍按照史迪威的谎报起草电报稿；罗斯福也不去查实就胡乱签字；马歇尔竟然将电报不是直接发给老蒋或中国有关机构，而是发给史迪威让他转交蒋介石。此乃马歇尔的损招，要给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出一口鸟气？这不啻捅老蒋一刀再在伤口上抹盐！马歇尔为袒护老朋友史迪威一步一步扭转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号称宪政民主的美国这个阶段乌龙事很多，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本文暂且按下不表。塔奇曼评述说二战时期军人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战争又使美国人忽略了这个错误。确实是相当准确的评述。

接下来的进展那些历史著作各种书刊杂志记述详尽，我们也就不在此唠叨。小人得志的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等要员的劝阻，趾高气扬地拿这个电报在老蒋面前耍了一通威风，还在给老婆的信里、日记里好好宣泄了一通，得意忘形之态彰显无余，什么人格、尊严、体面都忘到爪哇国里了。只是这回史迪威得意过头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换来的是老蒋发威，无论马歇尔等如何挽救，他铁了心这回一定要赶走史迪威。

在史迪威终于明白形势已经不妙之后，10月10日，赶在民国国庆这天终于下达了指挥部第18号命令：驻印军与英非军第36师向八莫方向攻击前进。请注意，此时经腾冲、松山等地激战日军万余精锐及储备均消耗得差不多了，不得不于9月14日下令停止进攻，23日残敌数千余退守芒市，拿下龙陵已无悬念，驻印军此刻才开始的攻势对远征军作战已经没有配合意义了。反过来，日军退守无疑又增加了驻印军克敌难度，只有最愚蠢的指挥官才会如此作战，可它正是史迪威的杰作！我们不去揣度史迪威下攻击令有没有挽回他的政治颓势的主观因素，似乎这个“第18号令”也不那么吉利，罗斯福18号这天“直接肯定地”下令调回史迪威。而马歇尔们也不动声色报复蒋介石，最终倒霉的还是中国。

<u>回顾史迪威中国抗战的某些作为</u>

*薛岳的第九战区因使用国产无线电通讯设备经常出故障甚至坏掉，所带来的通讯中断已经对作战造成极大损害。为了保障作战通讯顺畅薛岳自己出钱请陈纳德为其在美国购买50台美制V-100电台，陈很热心地为之联系采

购，甚至筹办无线电培训班拟培训这些设备的操作人员。史迪威连这种顺水人情也不肯做，因为这种电台属于军用物资，他的司令部一纸公文就禁止这些电台运来中国。

*不光薛岳，就连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急需建立一批情报网站，以利为空中打击日军获得更精准的情报。美国战略情报处主任多诺万将军认为非常必要，批准提供这批无线电装置，史迪威竟然也禁止将其运进中国，免得给陈纳德再造辉煌。至于对中国抗战的利弊，史迪威不予考虑。

*1944年10月下旬，魏德迈接任史迪威就职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审查租赁法案物资清单时，发现有5000辆计划中的道奇卡车没有提供，而中国战场因卡车严重缺乏已经导致运输困难一直无法满足作战需要。（这年1月，为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计划修建成都新津机场，国府下令征用所有民间汽车，就连路过成都的汽车都扣下为之服务，最高达1236辆；4月，急征汽车800辆，紧急运送美驻华空军作战物资；6月，国府下令10日内急征汽车400辆，由重庆运输1200吨物资增援湘桂前线；7月，在川黔两省急征汽车800辆供三项军事运输；9月，再急征汽车600辆，从重庆运输作战物资赴湘。这种急征民用汽车无疑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魏德迈迅速向美国外经处提出要货申请，可外经处主任H.威劳尔却告知魏德迈：早在一年前外经处就提供过这5000辆卡车，是史迪威断然拒绝接受，所以才没能实际拨给。

*而魏德迈审查空军飞机情况时，惊讶地发现本该交付中国的75架运输机居然一直被英军截留使用！斯里姆将军当时正在筹备英军反攻缅甸战役，不愿交出这批史迪威已经默认其使用的飞机。怒不可遏的魏德迈根本不理会斯里姆的抗议，下令美军飞行员将已经装上飞机的英国物资全部就地卸下，立即将飞机飞往昆明。

*成都机场完工后，美军B29远程重型轰炸机进驻该机场。为了以后轰炸日本本土稳当可靠，需进行实验性轰炸。陈纳德认准此为难得良机，建议去轰炸日军在汉口的补给基地，如此可以有效地阻滞乃至破坏日军在华攻势。然而史迪威予以拒绝，机群宁可飞往曼谷轰炸没啥意义的铁路工厂，也不准协助中国抵抗日军攻势。魏德迈接任以后，陈纳德试着再次提出请求，魏听取汇报后认为非常合理，马上批准可动用一百架B29，按陈纳德提供的汉口等地日军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仅12月18日一次出动77架B29轰炸汉口，日军的基地、军营、码头、仓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损失惨重。陈纳德的B24、B25则不失时机轰炸长江舰船及陆路交通设施，有效地打击了驻华日军。战后日军驻华中司令高桥中将承认，因美国空军轰炸导致驻华日军作战物资损失了一半，华南日军顿时陷入严重缺粮少弹状态，口粮降至每人每日150克大米之地步，不得不决定从黔桂粤开始撤军。而这类轰炸本可以提前六个月进行，那样的话日军能否一直打到黔南，各人自己去想。

以上几个案例只是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玩的部分阴功，他滥用职权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兼之他满脑子一战时期地面战理念，与陈纳德主张的空中打击理念格格不入。这本来不应成为大问题，经过商讨各择其优无疑可得出最佳配合方案，对于打击日军这个共同目标只有利而无害。身为驻华美军最高指挥官的史迪威理当姿态更高，顾全

大局。关键在于史迪威那种乖戾的性格左右了他的狭隘的心胸，兼之又有马歇尔、史汀生、阿诺德这样的高层官员一直在出格地偏袒史迪威，让他在中国胡作非为不光给中国，同时也给美国造成重大损失与牺牲。

关于驼峰航线

我们先检讨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抗战叙事中经典华章的航线，既是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又是中美军人可歌可泣的拼搏故事之典型。但其中包含的疑问与猫腻，却鲜少被人们提及。

驼峰飞行有南北两条主航线，南线无超高山岭飞行安全基本不成问题，更兼降低飞行高度每机载货量可增加许多。1942年2月罗斯福料定仰光很快就要失陷，批准阿诺德将军的建议开辟印中航线，并在国会发表公开讲话称：“日本人可以切断滇缅公路，但是我要对英勇的中国人民说，无论日本军队的侵略多么严峻，用飞机空运物资给中国军队的路线将会很快被发现，在本次大战中，我们将永远记住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站出来和侵略者作斗争的。”随即，布里尔顿率美军第10航空队从澳洲调往印度，其参谋长奈登将军所提方案：飞机飞行200空里运送物资到密支那，然后装船运到八莫；再由汽车经南坎上滇缅路运抵昆明。由于那时飞机严重缺乏这无疑是最高效、经济且易行的方案，并非种种说道认为的从密支那上空飞过，直飞昆明。日军占领密支那就掐断了这个尚未开始使用的降落点，并没掐断空中航线，是盟军自己吓着自己改道飞北线的。

飞北线，飞机必须飞越最高7000米的高山峡谷，复杂的气流状况更使当年的飞机很难招架。于是就有很多悲壮的故事，主要是飞机失事导致的损失与牺牲，各说不一，取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驼峰空运中，共运输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损失飞机468架，最高一夜坠毁19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中华航空公司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这条航线的损失率甚至超过欧洲战场上对德国轰炸的损失率,而笃信杜黑、米切尔“轰炸决定论”的美英战略空军，直至1943年冬都是无战斗机护航“裸炸”德国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日机袭击与驼峰失事哪个危害更大？

压倒一切的历史叙事都是如此介绍的：之所以要舍弃安全的南线去飞如此危险的北线，盖因日机利用密支那机场起飞袭击所以“铤而走险”。但若仔细推敲就不难看出：日军进攻领缅甸时有飞机近500架，被飞虎队和英国空军击落击毁300多架，之后补充战机使其总数达277架。以最普遍的零式战斗机为例，其升限6000米，不带副油箱航程2220公里，带副油箱3300公里。那么，即使驼峰飞机飞北线也只退让了200空里，并没能逃出零式飞机的攻击范围。实战中直至1943年10月，日机都在不时空袭印度的运输航空队基地，并袭击零散的驼峰运输机，最后一次袭击在1944年1月，日机8天内击落15架运输机，可知实际上飞北线并不能避免日机侵袭。或者日机不愿意到如此危险的空域去冒险袭击美机，故遭日机击落的飞机尚不到失事美机468架的零头，这就像杜聿明率领第五军躲进野人山葬身林莽的官兵十倍于战死者一样！

实际上日军战机基本上从未使用密支那机场，它刚失陷布里尔顿就下令对其进行系列轰炸，基本将其摧毁，日军不得不另修简易跑道以供轰炸保山等地的飞机临时起降；10月比塞尔又命令陈纳德23大队对密支那、腊戍的空机场进行轰炸，那些弹坑直至盟军收复时仍未填完。日军的空军基地在泰国的清迈和缅甸的东吁，因为密支那离中印都近，日军也惧怕来自两边的空袭同样在回避危险，没打算使之复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组建101特遣队曾以摧毁密西机场为目标，结果并无针对机场的任何袭击记录，此处无物可摧，他们只得到处摧毁日军的交通运输系统；当中美联军偷袭密西机场时，一个日本空军人员都没有，荒废的机场仅有一架早已报废的运输机躯壳，而我军也是在抢修过损毁的跑道才得以起降飞机的；八莫的机场也只有两架因缺少零部件而搁置许久的零式战机，此外缅北各机场均无固定的日本空军驻扎，仅在执行任务时作为前进机场临时起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袭击过中印间航线和相关机场的日军战机是从密支那机场起飞的。

1942年10月上旬，陈纳德曾电告史迪威及其空军助理比塞尔准将：日机即将轰炸昆明和印度汀江空运基地。但一贯蔑视陈纳德的史迪威和比塞尔并没当回事。随后，空袭昆明的日机遭到陈纳德第23战斗机大队迎头痛击一颗炸弹也未能扔到昆明；相反空袭印度汀江却大获成功，比塞尔麾下第十航空队驻扎此地的40架P40仅有两架起飞迎战，在地面被炸毁12架P40和10架运输机。暴跳如雷的比塞尔当天半夜电令陈纳德次日轰炸密支那与腊戍机场作为报复，尽管陈纳德指出那里并无敌机，但比塞尔不予理会。他是史迪威授权的中印缅空军总指挥并兼第10航空队司令，正在进行轰炸香港和广州的陈纳德只能服从命令，中断对华南的任务派机用经驼峰航线运来的汽油和炸弹，返回数百英里去轰炸两个空荡荡的机场。这里本不是陈纳德负责的地盘，第十航空队就近飞来轰炸既是职责也更划算，但比塞尔偏偏不这么干。

比塞尔早在1931年就是陈纳德空战理论的论敌，宿怨颇深。1942年3月奉派安排杜立德机群轰炸东京后降落衢州机场事宜抵重庆，与史迪威一拍即合竟然不向中方以及陈纳德透露任何讯息，却热衷于协助史迪威收编飞虎队。直至4月18日杜立特机群因行动被迫提前故于雨夜飞抵华东上空，预定降落的衢州机场负责人陈诚的侄儿说，因未得指令当晚并未开放机场导航信号。比塞尔在原定机群快要到达之前的半夜12点才通知中方，那时机群都坠毁几个小时了！原拟交给中国的16架B25轰炸机中，除8号机迫降于苏联远东地区，5名飞行员被苏联当局羁押外，其余15架坠毁于浙江10架、安徽2架、福建3架。他们本来可以被导航降落在我方控制的各机场，仅仅因为史迪威、比塞尔的“保密”而导致灾祸！

75名美国飞行员有5人迫降时丧生、8人被日军抓获，其余62人被中国军民救助脱险。有一架飞机竟然飞越我方数座机场才坠毁于鄱阳湖日占区，被俘的飞行员3人遭枪杀。日军对救助美军飞行员地域的平民疯狂报复，屠杀数万之众毁财无数！比塞尔是本该上军事法庭的罪犯，只因其与史迪威沆瀣一气故被留用充当其空军助理，推诿说是杜立特机群提前抵达酿成悲剧，居然还升职且比功勋卓著的陈纳德早一天晋级为准将并被史迪威任命为战区空军司令！

他和史迪威一样认为驼峰航线不值得发展，当陈纳德的参谋长库帕上校批评史-比在印度实施消极防御的空军政策时，比塞尔竟以健康理由将其调回美国，陈纳德的抗议非但不被史迪威接受，反而通过陆军部一直打压库帕。而库帕很快被驻澳洲的第5航空队司令乔治.肯尼调去任参谋长，他所作陈纳德式进攻性作战计划深受肯尼赏识，并迅即产生奇效，日军舰船在马六甲海峡及其周围损失惨重，基本断绝了日本通过南洋输送作战物资及援兵的通道，日本海军1942-1943期间曾嚣张地对东印度海岸进行轰炸，导致盟国舰船只得退缩西印度海港，至此也无法继续。

举凡看过电影《桂河大桥》的都应该记得，日本人因抢修泰缅铁路并限于1943年12月必须通车，除日军工兵1.2万人外，还押送美英荷战俘6万余人，以及东南亚民夫十余万人抢建铁路的惨烈故事。这是一个怪象：盟军为躲日军飞机飞驼峰航线，而日军为躲盟军飞机抢建泰缅铁路。另一方面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日军在缅甸并无多大的空中实力：总共277架飞机，包括侦察机、轰炸机与运输机；盟军挺进缅北全靠空运提供武器弹药粮饷医药，运走伤病员，仅“亲迪部队”9000余人连同各种装备、车辆空运到缅甸中部敌后，大规模机群包括滑翔机均无遭日机袭击之记录；日军飞机仅在第一次若开战役时有过规模轰炸，其余都属偷袭。即使增援英帕尔作战，也仅成功空投过500发迫击炮弹；以上史实充分证明日军飞机并未能对中印间航线造成多大威胁，只是史迪威为其地面制胜理论制造的借口。

统而言之，作为驻中印缅美军总司令的史迪威，我们不去探究其居心，至少他称职的话早就该下令第10、第14航空队集中力量彻底摧毁日本空军在越南、泰国、缅甸的基地，干掉那两百多架飞机，中印间航线哪里还需要折腾到驼峰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在史迪威未到任之前，“飞虎队”靠仅有十几架P40在泰国、缅甸上空作战31次，击落日机217架，可能摧毁43架；英国驻缅空军战机数倍于飞虎队，击落日机74架，可能摧毁33架。丘吉尔给缅甸总督的电报称：“这些美国人在缅甸的水稻田上空所取得的胜利（如果不考虑规模上的差异），完全可以和英国战场上的皇家空军在肯特的蛇麻草地上空所取得的胜利相媲美。”英王也特地授与陈纳德等帝国勋章。

英军驻缅空军司令史蒂文森在其缅战第一阶段报告中认为：“缅甸战场上，在作战中首当其冲的是飞虎队的那几个P40型飞机中队，他们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总是首先到达战场，并有良好的作战设施。在缅甸战场上，被击落的绝大多数敌机，是由他们击中的。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赢得了两军的尊重。”他还叙述了丘吉尔所说“英国战场上的皇家空军”辉煌空战损失率为1：4，而飞虎队则为1：14！

这些看似无关的史实告诉我们：日军在进攻缅甸初期以近500架飞机的优势取得制空权，但损失巨大，仅剩飞机167架。1942年缅甸失陷迫使飞虎队从缅甸及边界基地垒允仓皇撤退到昆明，接着史迪威通过陆军部强制解散这支战功显赫的队伍，7月4日，220名队员愤愤离去，剩下的5个飞行员、5个参谋和19个地勤人员被收编，另组成第10航空队管辖下的第23战斗机大队。日军剩下的167架飞机却夺取了缅甸至滇西上空的制空权。

1942年7月，中东英军失守托布鲁克，美军驻印第10航空队全部飞机与人员都调往中东，库存的本属中国的“租赁法案”也被运往中东和苏联，以救援那边的战场危机，就连本来交给陈纳德组建23大队的一个轰炸机中队都连人带机一并转飞中东去了。8月，史迪威用比塞尔代替布里尔顿出任第10航空队司令官，尽管美国又运来飞机派来飞行员与地勤人员装备第10航空队及驼峰航线，使之仅P40就有40架之多；10月又组建美国空军驻印特遣队，但在史迪威、比塞尔掌控下主动出击打击日本空军的行动也就消失了，驼峰航线也极为惨淡。就在陈纳德23大队不但击败日军飞机对昆明的空袭，还主动出击成功地轰炸了日军在越南的基地同时，日机对加尔各答的空袭迫使美军机构向阿萨姆转移。而日机跟着轰炸阿萨姆，美机连还手之力皆无，几十架飞机被摧毁，印度基地一片狼藉。

这使得一直支持史迪威的阿诺德都极为恼火，迫使史迪威督促比塞尔改进驼峰航线现状；而航空技术顾问弗兰克.塞克莱尔年底向美国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为中印航线的糟糕状况并不是技术原因，而是因为史迪威、比塞尔都是空运计划的“失败主义者”。陈纳德也通过威尔基给罗斯福提供他的计划，罗为此作出总统指示，阿诺德也施加压力，史迪威这才令比塞尔去抓，将驼峰运输吨位提升了些，到年底总算达到千吨，但距罗斯福的要求相去甚远。反之，同飞一条航线的中华航空公司却干得不错，乃至有人建议将美军驼峰运输队交给华航运作，阿诺德也赞同此议。史迪威立即否定这项建议，理由是军人不能被平民指挥。他甚至反复警告华盛顿不要使中国人对空运产生期望，“租赁法案”物资充其量只有5-10%可以通过空运送达中国，其余的还得修公路予以解决。

因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日本已无力增派大批飞机赴缅甸战场。1943年补充到277架飞机，却维持了一年多的制空权！而这时段恰是史迪威掌控中印缅美国空军时段，几乎找不到第10航空队打击日本空军及其基地的案例。我们有理由产生疑问：如果集中空军力量打击在泰缅的日机及其基地，还用得着飞越损失惨重的“驼峰航线”北线吗？即使不去探讨他那阴暗的心理因素，凡是陈纳德主张的老史必反对，难道不可以认作中印缅美军总司令的失职吗？

实际上，1942年8月13日陈纳德就向史迪威建言，以攻势夺取缅甸制空权，从而保卫中印航线的安全。但史迪威不予理会，比塞尔则有恃无恐。10月8日陈纳德只得经总统特使威尔基带信给罗斯福，详尽地陈述了发动空中攻势夺取中印缅战区制空权，从而保卫中印航线直至摧毁日军地面战斗力的计划。尽管或有夸张之言，但实乃应行之策。罗斯福将此信发给史汀生的陆军部，招来一片嘘声，也即被否决。

1943年3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决定将陈纳德晋升为少将以脱离比塞尔，并建立归他领导的第14航空队时，就指示将驼峰运输的控制权从史迪威心腹比塞尔手上移交给陈纳德。为给马歇尔等留点面子，罗斯福决定不下行政命令，由阿诺德将军保证执行这个调动。阿诺德于是写信由派给陈纳德第14航空队作参谋长的格伦准将带给史迪威，让他将驼峰航线指挥权交给陈纳德。可史迪威接到此信不予理会，继续把持驼峰航线指挥权，竟然不了了之！

1943年5月12-25日“三叉戟”会议期间，陈纳德与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展开争论，史迪威拿着比塞尔拟定的报告坚决反对加强空中打击和扩大驼峰航线运输量，注重打通陆地通道。此意见被罗斯福否决，罗斯福下令7月驼峰

航线必须保证7000吨运输量，9月必须达到10000吨；这些物资必须保证每月4700吨为陈纳德14航空队所需物资，2000吨为史迪威打通地面通道所需，余额由史迪威分配给其他陆空作战所需。取消“安纳吉姆”计划也即英军海上登陆仰光作战，陆地攻势仅对缅北进行，计划在11月开展。史迪威公开表示反对扩大驼峰运输能力，他认为执行下属陈纳德的计划乃是耻辱。按照正常程序，罗斯福本该免去史迪威在中印缅战区的职位，另派他人。但马歇尔、史汀生劝阻了罗斯福，并阻止了罗斯福欲授予陈纳德负责指挥中印缅地区空军的任命。

整条航线已经给这两个家伙阻滞了一年多，被总统责令本该大力改善的行动仍拖泥带水。驼峰运量1943年6月1887吨，7月3451吨，9月4624吨。远达不到罗斯福的要求，导致其对此烦不胜烦，告诉马歇尔说：“已经非常厌恶印中事务。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糟。而最糟的是我们每一次都不能履行我们的诺言。”令人不解的是，尽管阿诺德也认定史迪威一心关注陆地作战，没有精力把驼峰航线管好；罗斯福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出替换史迪威之言。仅从称职与否来衡量，他也早该下台了，居然都能被马歇尔给化解掉。之后马歇尔、史汀生为了使罗斯福欲让陈纳德掌控驼峰航线指挥权的打算泡汤，就精心安排了一个局：将驼峰航线收归美国空运总队直管，既不给陈纳德也不给比塞尔，派戴维森准将取代比塞尔的第10航空队司令、海恩斯将军指挥驻印空军特遣队，另派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任空运司令，但整个美军指挥权仍在史迪威手里，他的空军助理比塞尔仍可以驻中缅印美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

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接管改组后的驻印美国空运指挥部，阿诺德再调来韦勒将军整顿印度基地的混乱状态，以及空运指挥部后勤工作；霍格将军担任印中联队司令官，这个美中联合组建的空运机队本是陈纳德出任司令官的。阿诺德本人是坚决支持空运的，碍于马歇尔对史迪威死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法阻止史迪威胡来，只能采取绕开他的办法派来一群将军解决问题，导致驻印美空军指挥机构错综复杂，可怜的驼峰航线飞行员还得继续玩命。

1943年年底美英空军司令部改组后，总算是排除了史迪威-比塞尔的干扰，开始进攻日本空军。接着利用日军进攻英帕尔的机遇，斯特拉特迈耶联合英国空军组织力量向日军空军开展攻势，迅速摧毁了大部分日机，彻底夺得制空权。中国驻印军在战后的经验总结中也写道：“我军任至何处，弹药不虞缺乏，即令深入敌后被敌包围，亦可利用空军投掷补充，亦不致发生断绝之危险。总之，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直至5月，驼峰航线又慢几拍于才开始飞南线。

请注意，这个南线并非原本计划的以密支那为飞行终点的南线，而是经过密支那上空直飞云南各机场的航线，彼时密支那连同机场都还在日军手中。当月运抵云南的援华物资就达13686吨。碰巧密西机场是5月17日被攻占的，6月份密城仍在激战中，空运量已提高到18235吨，7月份更急速上升为25454吨。把驼峰航线改南线飞行归功于史迪威夺取密支那是一种误解，根本要素是排除史迪威、比塞尔压制后美英空军彻底夺取了缅甸上空的制空权。可怜500多架飞机坠毁一千多飞行员丧生，与其说他们死于恶劣的驼峰航线，不如说死于美军高层的昏聩，史迪威首

当其冲！

史迪威公路

1942年1月30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宣布“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一条陆上运输线”，这就有了“驼峰航线”与“史迪威公路”这两项闪光于中国抗战史之主题。史迪威当时就认定空运只是应急措施，充其量只能运输援华物资的5-10%；他只看重“修筑一条公路”作为援华物资的主输送途径。撤退到印度以后，他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反攻加筑路”之上，甚至对于跟进筑路建设一条输油管道他都极力反对，无奈罗斯福坚持要建，他也只能作罢，任由建设输油管的队伍尾随进行，他懒得过问就是。

缅甸作战之前1941年4月中国交通部专家组就开始进行中印公路选线踏勘，撇开最早路径不论，确实选定的最佳路径是从印度英帕尔沿既有大路经缅甸的霍马林到密支那；再经腾越古道修筑公路直抵腾冲；跨越怒江抵保山大官市接既有之滇缅公路为离港口最近、最省钱、施工最易之路径。号称第一路径，但英国人不准利用英帕尔入缅路线。1942年2月15日中英在新德里商讨中印公路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取第二路径，即从印度东北利多至国界甘绍关越过边境那加山脉抵葡萄，再沿迈立开江河谷旧公路南下到密支那就与第一路径重合了。这是除第一路径之外最省且施工难度较小的路径。

会上还预设了辅助路径，也即3月1日中方杜镇远赴印与英方确定的路径。史迪威实际修筑的就是这条穿越野人山、胡康河谷经孟关到密支那的路径。不过那时日军尚未占领仰光，未考虑作战因素这条路确实短些，但野人山及胡康湿地实情尚未踏勘。英国人指定这条路径还有一个要素：直至孟关，它都在“中缅未定界”北边，显然有预防中国借筑路向南扩展领土之戒备。史迪威知道这一带修路颇为艰难，曾试图走第一路径，但韦维尔不准，老史也就不再争了。他命令美军后勤司令惠勒中将选定路线，惠勒与英国技术军官实地探访那加山脉之后，都认为在此筑路太过艰难，即便修通也不可能支撑多大运量。只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得不按照史迪威命令找出一条似乎可行的路线交差。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军人流血牺牲打下这片地域，“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并未放弃，光绪十九（1893）年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国勘定的滇缅边界止于腾冲西北尖高山，由此向西包括胡康河谷皆为滇西六宣慰司辖地。英国人尽管觊觎此地良久，但亦未能侵占，仍归孟养土司宣慰司领地，其南界被称为“中缅未定界”，1943年7月中国出版的地图将其清晰标明。蒋介石以避免国际纠纷为由拒绝孙立人留兵驻守占领地域的建议，而这片筑路地域（除孟关以南至密支那北沿迈立开江末段直至尖高山以外）都是中国领土，战后却撤了个一干二净！及至共和国，周恩来大笔一挥，整个江心坡地域约七万平方公里全都慷慨地签约割给缅甸了！

到日军重兵据守时仍循此路径开战并筑路，显然不如走第二路径，也即经甘绍关、葡萄（42年96师溃逃至此，当地大土司闻知余韶师长驾到，连忙从箱子里翻出大清国所赐官服穿戴整齐跪迎中央钦差），沿旧土路南下密支那，日军在这一带布防薄弱，基本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据点。大概是因为史迪威的情报错误，以为只有少量缅军驻守胡康河谷故未取这段的缘故。若从密支那沿着腾密故道修路到腾冲，再从腾冲直插保山大官市接滇缅公路，就连龙陵、松山都可以避开，日军即使想阻断也必须离开坚固工事出来野战，这仗必好打得多！为何史迪威要撇开密腾故道舍近求远一直绕到八莫多走几百公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段路中英双方皆未勘探过，只有驮马路，而且八莫到南坎路段极其险峻，上百道拐远甚于著名的“24拐”，施工难度也大得多。

实际上中方一直在运作腾密线，甚至在日军占领腾冲时也派出过勘测队勘探该线路中国境内路段，始终在准备着。8月5日驻印军拿下密城，腾冲彼时尚未收复。孙立人曾令孙蔚民连长率加强连及美军一个排，于8日启程沿腾密故道越猴桥抵达中缅边界口岸处，9月4日与远征军卫立煌派出的胡振国副团长所部，以及美军工兵、医官、记者等举行小规模会师仪式，象征着远征军与驻印军胜利会师。然而此次会师仪式被否定，孙连返回后孙立人却不予理会。

重庆军委会在7月初即已下令边战边修筑保山-密支那公路，10日成立第一工程处，开始勘定路径。9月14日腾冲光复，尽管龙陵之战尚在进行，保密公路国内段已全线开工，重庆下令抽调广西、四川公路部门组成第二工程处开始对国境外至密支那路段的勘探并负责施工，美军在中国境内的工兵团也配合施工。蹊跷的是，1945年1月4日毛石路面的腾密线即可通车，却无车行；至19日继续扩宽达双向通行标准完工，仍无车行。120辆满载物资的GMC卡车及8辆附属车辆、6辆指挥车组成的“皮克车队”12日才从利多出发；14日起在密支那停留一个星期，等待八莫-南坎路段畅通。24日抵达南坎后又停留三天，等待新一军拿下芒友。28日在畹町举行通车盛大庆典，宣布老蒋建议命名此路为史迪威公路，该建议获得美国陆军部认可。该车队2月4日抵达昆明。

中国政府下令赶修的腾密路捷径，若以能通车时起算，足足闲置了20余日，似乎刻意为离去的史迪威出一口鸟气。1月17日，一个美军中尉等不及了，他驾驶一辆吉普车率领三辆卡车驶上腾密公路，22日夜抵达昆明，这才知道两天前就有一辆美国海军的吉普车已经驶过同一路段捷足先登了。还在密支那的皮克将军闻讯大怒，下令不准算作通车纪录，只有自己率领的车队走八莫才是正式的美军车队。

按照《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云南公路史第一册》所给数据，中印公路从印度利多至密支那434.4公里；由密支那过腾冲221.3公里；直插保山大官市接滇缅路145.6公里；由利多至昆明总里程1491.3公里。若腾冲转向龙陵接滇缅路到昆明，总里程则为1568.3公里。现状是从密支那转八莫，到畹町接滇缅路到昆明。总里程为1731.7公里。比密-保线多240.4公里；比龙陵线多163.4公里。输油管在中国境内昆明-畹町截弯取直为690公里，较公路少269.4公里；若按照中方意见走保-密路径，还将少敷设300公里以上。然而美方施工仍按史迪威原定路径，直下畹町不走腾冲，国内段不得不敷设至畹町与之衔接。1945年6月1日通油，此时英军已收复仰光近月，本属多余工程。但印度境

内尚有大量存油，利用输油管输送至次年1月4日停止，7个月时间输油10余万吨，比“史迪威公路”总货运量多1倍以上！

史迪威及其支持者事前评估，当公路完成后当月运输量即可达36000吨，并很快可增长到65000吨/月。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开通时尚属旱季，首月运输量6000吨，仅为预计的1/6。而1944年12月美军空运量即达35000吨，次年1月46000吨，至7月空运量跃增到71000吨，仅这一个月运输量就是史迪威公路全部运量的1.42倍！而且，这条公路通车不过三个月零几天，英军收复仰光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实际上史迪威公路面临报废，只是为了清空已经堆积在印度的物资，空运与公路运输才继续维持几个月。到11月15日印度积压物资清空，美军空运与公路运输任务均告结束，同一个时段空运物资555000吨，史迪威公路全部运量约50000吨，还不及空运的零头！历史证明史迪威的主张是劳民伤财的愚见，他头上顶着的只是一堆闪光的泡沫！

史迪威公路从利多到畹町全长772.3公里，自1942年末开始兴建，到1945年1月通车，总共耗用“租赁法案”物资45000吨，几乎接近它完成的总运输量；其直接成本1.48亿美金，接近所运物资总价值的4倍！工程施工人员在北缅地区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胡康河谷筑路，共搬运土方1350万立方米；从河床中挖掘用于铺设路面的砾石138.3万立方米；用于筑路的木材达25万立方米，乃至于英缅林务官向史迪威索要伐木税费；仅一条穿过沼泽的堤道就使用了2.8万立米的木材加上2400根木桩；公路跨越10条大河和155条小溪，修建桥梁约700座，其中包括战争中所建360米最长浮桥；公路不仅经过世界上最崎岖的地形，还得同野兽毒虫以及热带雨林气候、疾病抗争。施工中有1133名美国人员死亡，每公里死亡约1.5人，数量更多的中方军人与当地劳工的死亡都算上，每公里死亡10人以上！

无论这条“史迪威公路”经过反复热炒达到何种程度，它的实际数据就是如此。为了它，中美两国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得不偿失！

＊ ＊ ＊ ＊ ＊

本来还有讨论“一号作战”的章节，因为前面已经涉及到史迪威在其中许多表现，与本章节部分内容形成重叠。再者，引发这次作战的最根本原因是阿诺德将军之远程轰炸论，他的用B29“超级空中堡垒”以成都为前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之“马特洪峰”计划，与“史迪威公路”同样华而不实，却引发了日军对中国的绝望攻势。需要指出的是，史迪威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这个计划必将引起日军对中国东部的打击，中国不具备抵御这次进攻的能力。史迪威唯一值得夸赞的见地，也是与蒋介石难得的意见一致，偏偏没能扭转阿诺德将军的荒谬，官大一级压死人？

1944年11月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战役胜利结束，塞班岛及其周边诸岛就成了新的轰炸东京基地，从这里起飞要比成都近了上千公里。次年1月魏德迈取消了“马特洪峰”任务。事实上，从成都起飞的B29只维持了不到7个

月，执行了20次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美国官方组织的评审认定它“对促使日本投降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花费如此巨大又空耗了本来就很紧缺的战争物资”。倒霉的是中国，美国将军们的短视所造成的祸害，都落在中国头上；而他们的洞见可能带来的好处，全都化为乌有，中国基本没有受惠。

本文到此打住，算是一个纲要文字吧！详论另外写作。

（2014.9.25--12.23）

wenjung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文革纪实】：

“建政三”的故事

1968年10月24日，大概中午时分，五次特快抵达南宁站。我家就在车站北面不算远的地方，却没有回家的感觉，也回不了家。看见站台东半截布满戴着黄袖套的大兵，还有戴着红袖章的平民，全都荷枪实弹，一副杀气腾腾的阵势。

在北京被抓起来关了两个月出头，我们这些“422坏头头”终于押送回南宁，算是叶落归根了吧！不知道加挂了几节软卧车厢，总之每节包厢关二至四人，戴着手铐，门口守着一个持枪大兵。没想到他们怎么就把我安排和廖胡子在一起，照理说该配一个南宁422或桂林造反大军的坏头头才是，以免串供。见到老廖，跟他打了个招呼，顺便说句风凉话：“嘿，不愧是坏头头，还得享受处级以上干部待遇。”没等老廖搭腔，门口的大兵一拉枪栓，吼道：“不许说话！再说老子毙了你！”看他那一副小人初次得志的张狂样，我丝毫不怀疑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闭嘴为妙。开车前来了两三个军官，告诉说不准睡下，只准坐着。等等。好几条戒律，记不清了。我问能不能打开手铐？其中一个皮笑肉不笑地反诘道：“想逃跑？！”走了。

火车在路上走了两天，一路秋高气爽风光依旧，只是想到曾经不断做梦要为这块神奇美丽的大地做贡献，黄粱一枕尚未闻鼾声却已先破灭了，无限惆怅不断涌上心头。跟廖胡子轻声聊过几次，得趁那大兵坐出包厢之时。盛夏时节在北京的监狱里蹲了两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身上的汗臭味连我们自己都闻得到，他们肯定更无法忍受。列车上“南铁金刚钻”的列车员来送饭，他们原本就跟我们对立，这会儿敲盘子打碗学猫叫，给“老鼠（“广西422”被称作“鼠派”）头头”们的饭盒里，糊锅巴夹生饭混杂，几根萝卜干烂菜帮摆在上面，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竹篾充当筷条。

忽然想到，没准那饭里吐了痰撒了尿都有可能。自己别去想便罢！在北京的号子里，某日，等到晌午时分还没得饭吃，1号囚徒大约饿得发慌，就念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念完就要我和一首。本某傻乎乎凑了个热闹：“饥如虎，窝头并不苦。残汤加水尽入肚，糠粃石砾皆不吐。据说都有补。”岂料被举报给狱卒了，提溜出去狠狠训了一通，说俺篡改诬蔑革命诗篇，

罚站起码两个多小时，那一餐的两个窝窝头也没得吃：“你不是说‘都有补’吗？给你吃饱了还怎么改造反动思想？”

双脚踏上站台，好歹都算落地家门口了，未来的命运不敢细想，只有听天由命一条路。谁知刚要进入车站大楼的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个人来，对着我剃光的脑袋就是一掌：“哈哈，钱大头，你也有今天！”扭头一看是初中同学姜某某。反正双手被手铐箍着，也没法回敬一掌的。给自己一个安慰：人被狗咬了，千万别咬回狗一口。瞪他一眼算是比阿Q更优雅的反击姿态！

穿过火车站大楼，紧接着上了解放牌军车，篷布遮蔽得严严实实，只准蹲在车厢里啥也看不见，不知会运到哪里去，但知道绝对不会运到明园宾馆的。车停下之后，我们被吆喝下车，全都跪在炽烈的阳光下，沐浴红太阳火辣辣的光辉。一个穿着军用翻毛大皮鞋的兵哥挎着略显陈旧的AK47在我们前面走来走去，俺寻思：这鸟破枪，真不如老子的队伍当初挎的伞兵枪。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在我面前，用“夹壮”的普通话问我：“你穿的军装是从哪里抢来的？”我从鼻孔里哼了声：“不是抢的。”本来如此，它是俺老妈在303医院买的回收处理的正规军服，只是旧得略显白了而已。他又带着嘲笑说：“是你们那个左派军长孙凤章给的吧？啊？他现在去哪里啦？”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回答与否，猝不防他飞起一脚猛踢在我左胸上，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连喊一声“共产党万岁”的机会都没有。或许幸好没喊，还能回魂醒来，却不知道我怎会趴倒在地上。白老眯在我旁边跪着，低声说：“你昏倒了。”那个大兵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远端站着的是另一个大兵，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老老实实爬起来，继续跪着，左胸隐隐灼痛，好在还不算很厉害。

又晒了一阵，我们被叫了起来，排着队，提着自己的小包袱，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取掉手铐换成脚镣。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被吆喝着押解进了牢房。这辈子第一次被戴上脚镣，当时乃是享受死囚待遇了，忽然想起李玉和那个唱段：“狱警唤，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可惜我没有阿Q那种胆色，兼之胸口还痛，那么高的调门，唱不出口。

我和王反修被关在同一栋监舍里，他在后面那间小号，只关四五个人；我在前面这间大号，关着十几个。牢房是红砖红瓦砌的平房，两栋之间距大约六七米，平着屋山头还砌了红砖墙，起码有四五米高吧，围成一个院落。囚室的门是用粗钢筋和角钢焊成的，足够结实但通风透气。那位公安人员把我带进号子时，里面爆发出一片抗议声，于是知道这间房已经关了17个犯人，我再进去就是第18个了。那公安既不理会也不出声，等我进门他就锁上门走了。进了号子才知道这间房很长，比北京的牢房睡地铺好些的是，用杉木板做成一溜长长的通铺，从屋子这头到那头，前面留着一米多宽的路。

号子里的十几个囚犯都靠着墙坐在铺上，对着门口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约摸三十来岁吧，一脸横肉。他

冲着我用白话说："你悃（睡）最里头！"我看过去那正是一个马桶所在，跟床铺一样高，标准水桶一样粗，有盖。于是想起小说里描写的"牢头"，不敢造次只能按照他的吩咐朝那马桶走去，只是有脚镣牵扯着，相当于碎步走。

岂料他喝住我，问道："你系由宾低（哪里）捉入来喀？"我能听懂白话，但不会说，只能答以普通话："从北京押送回来的。"他又问："为乜嘢（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冷场不到一分钟，他似乎想起什么，接着问："系422呢帮头头？"我道："是的。"谁知他呼腾一下挪过床边来，像是电影里那些找到组织的地下党员，只差没说："我可找到你们啦！"接着让我坐在他旁边，告知："我嘀（我们）都系支持你嘀喀！"我以为这些都是"南宁422"的人马，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被抓进来？"他嘿嘿一笑："我嘀，偷嘢又有，屌嘿（性犯罪）又有，撞死人又有，打跤又有。样样都有！"哦！原来都是"南宁422"的基本群众，堡垒户，还不在组织的。

他很兴奋，跟着就喊："阿三！过来帮他除开介脚镣。"我吓了一跳，太胆大包天了吧？等会大兵过来，岂不是拿我撒气？赶紧拒绝。他笑了，告诉我说没事的，然后叫一个唤作阿欢的到门口去望风，那小伙子大约十六七岁，精瘦，应了一声就到门口去了。这个叫做阿三的，也不过十六七岁，这小伙子胖墩墩的，一副憨厚模样。只见他拿了根竹筷子，把方的那头折断，分出竹青那一片，极其麻利地在我脚下一插一抽，那脚镣就打开了。解下的脚镣跟手铐一样，只是连接两个锁环的铁链长些（后来知道这是轻铐，重铐是锻打加铆的，休想打开）。仔细一琢磨原来阿三是把那竹片顺着铐齿推进去，就把两边卡齿隔开了，铐子也就随之打开。阿三叫我收好那片竹青皮，以后自己开锁。再以后我也很老练，不需要竹青，只需火柴盒的木皮分一片出来就能开手铐。

我问牢头"贵姓？"他自我介绍说："喊我胡须佬就得啦！"又叫阿三端来一个小木盆的水，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外边有一口缸，可以从钢筋门空隙伸手出去舀水，这个木盆是囚犯公用的，洗脸洗澡都是它。然后阿三乖乖地按照胡须佬的吩咐帮我洗脚，也没谁表示不满。胡须佬解释说那缸里是囚犯们洗脸刷牙用的水，是自来水，干净的。唠叨了一通废话，他改变决定了，命令离他三四位一个六十来岁老者往那头挪，以下全都挪一位，腾出一个人的位置告诉我："你就悃呢度（睡这儿）。"然后解释说如果我挨着他，正对门口，万一军管大兵过来我会来不及扣上脚镣。想得真周到。

接下去就要我讲北京的牢房是怎样的，吃的咋样，等等。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比这里差，小小一间闷房，挤着四五个囚犯，屋子里尽是汗馊味，刚进去差点被熏昏倒。阿欢笑道："你一落来我嘀都差嘀昏倒。"那老者便趁机叫我洗澡，说我身上太臭馊了，大概睡在他身边会熏死他。阿三不用胡须佬吩咐，伸手出去舀了一木盆水，我也顾不得啥，脱衣服就在门口边洗，阿欢把自己的香皂拿来给我用。这时我才发现左边胸口疼痛处，似乎肿了。那肋骨也许骨折了，只是我没往那方面想，只认为是那个翻毛皮鞋踢的瘀伤。多年以后直至现在，那两根肋骨长得更突

出了些，顶得左边胸口丰满得简直会令许多“太平公主”嫉妒。

近黄昏时，在囚犯们嗷嗷叫唤声中，下午那餐饭送来了，送饭的女工把一罐一罐蒸饭摆在门口水泥地板上，饭上头盖着没一星点油色的豆芽菜。囚犯们戏称她们为“拜山”，那两位女工啥也不理，摆完拉着板车走了。囚犯们按顺序一个接一个从栏杆间拿饭，先拿的有选择权，秩序井然，似乎比现在挤公交车、开轿车的还要文明许多！就连拿饭的顺序也每餐自觉轮换，这餐第一个，下餐就变末尾，余类推。不过胡须佬永远排在第一个前面，享受牢头待遇。确实，这里的菜饭要比北京监狱强得多，那里每餐两个窝窝头，一碗咸得发苦的黄瓜片儿汤，同样是一颗油花也看不到，而且从8月18日进去直到离开，始终不变都是那种黄瓜片儿汤。而在这里不过月余就换过好几种青菜。

牢房外不远处不时就有火车隆隆驶过，我问胡须佬，这里是啥地方？他道：“建政三。”我弄不懂，阿欢告诉我说是南宁市建政路三号，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简称，那时还属于荒郊，如今已成闹市。94年我曾到南宁市财政局去办事，见到那里的门牌恰是建政路3号。打探得知看守所早已拆迁，只有后围墙还是原来的遗留，特地寻至大院最后面，看见那幅高高的围墙上还清晰地留着当年牢房屋山头的痕迹。

住下几天后，就逐渐知道各位的业绩：胡须佬是沙井农民，趁武斗乱时偷着卖掉了生产队里的两头牛；阿三是因为私藏两颗手榴弹想留着以后炸鱼；阿欢是投机倒把，在青岛买火石到乌鲁木齐去卖。两分钱一粒买进，到那能卖一角一，一个行军壶能装两万粒；我旁边老者乃重机厂附近的菜农，儿子是南宁市联指的中层头目。生产队里几个小孩玩泥巴堆坟墓，他那个四五岁的孙子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木牌牌当墓碑，然后几个小屁孩烧纸磕头。岂料那漆成红色的木牌牌上还有黄字，上书“毛主席万岁”的，于是被抓了。经查老者乃富农成分，办案人员一唬：“是不是你爷爷教的？”吓傻了的孙子说是，于是他就被关进来了。幸亏还有儿子护着，没怎么吃苦。里边还有一个强奸犯；两个斗殴伤人的；一个抢得汽车开车撞死人的；一个卖了支手枪的。数偷东西的最多，好几个。还有几个闷声不吭的就不知道为啥被关进来了，不肯说。其中有个30多岁的河北人，一口唐山话，只说是临时关押在这的。

这帮“阶级弟兄”跟我说了许多解放军帮着联指打展览馆、解放路的惨烈故事，更讲述了那些屠杀场面，老实说我是没想到的，心头一阵一阵紧缩。柳州的情况会怎样？当初我使劲鼓吹拿下柳南，在火车上跟廖胡子交流时他说他也是这个想法，即不打出一片地盘来一定被屠杀。但结果会如何？会不会也是部队参战？都不得而知。

“建政三”比北京的监狱管得松，军管了以后公安成了打杂的，乐得清闲。大兵们耀武扬威像是天已降大任于他们了，头两天还有些兵豆子来看坏头头长成啥样，大概没发现青面獠牙也就没啥兴趣了。接下去就没人进过这院子，只在院外巡视。阿欢很活泼开朗，跟我特别近乎。他告诉我他姓何，老爸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成解放军后担任某航校教官，老妈是某医院的医生。58年老爹当了右派遣送劳改了，老妈划清界线离婚改嫁。他被送回南宁，跟着爷爷住在西关路一带。武斗时那里成了战场，爷爷带着家人逃到老家乡下，他自己跑回来跟两位街坊大哥

搞投机倒把。据他说北方许多地方他都去过，每赚得钱就吃香喝辣。没想到几个月前在新疆被抓获，押送回来还不到一个月。

他那两位同伙被关在后面，哪栋哪间他都知道。某日忽然后面的牢房里有人喊阿欢，他上床抓住后窗的铁栏杆，引体向上把头伸到对方看得见的所在，问："宾个（谁）喊我？"后面那牢房里有人告诉他，再后面一排的某某叫告诉他，那个什么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要再瞒了。阿欢答应之后那人又向后传话过去了，他下来后有些郁闷，自言自语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了呢？啥事他不说，也没人追问。似这样的传话串供在建政三好像常有，我在里面见识过两三次。

阿欢带进来一本《外国民歌200首》，是64开的小本。我问他怎么带进来的？他笑笑说塞进内裤里就带进来了，然后告诉我说这些人没人能欣赏外国歌，其实好听过我们中国歌。这小子的音乐知识很丰富，教我如何熟识简谱，然后我们选取其中的歌来唱。现在还记得《鸽子》、《西波涅》、、《西班牙女郎》、《小鸟》、《河里青蛙》什么的，少说也有三四十首吧，都是在号子里跟阿欢学的。那首《含苞欲放的花》，我们俩还能用两个声部合唱。又如美国歌曲G.马塞伊的《囚徒之歌》："啊，但愿会有人真心爱我，有人亲切地呼唤我。但愿有人和我一同生活，只因为我已厌倦寂寞。/明天我将搬去新的牢房，留下我亲爱的人多凄凉。四周里围着冰冷的铁栅，我的头枕在硬石头上。/梦幻之我乘上一艘大船，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我要飞到我爱人的身旁，奥，这船儿给我带来希望。"至今没忘。如此放肆地唱，居然从来没有人来管过。后来下乡时，郑州插友焦宙问我咋会那么多外国歌，我跟他说多数是在牢房里学的。他打趣说看来没坐牢是一种遗憾。

每天早上都会有放风时间，我到这时就自己铐上脚镣，出去走动，到点回来自己再解开它。有两个人要抬马桶到粪坑去倒，他们都抢着去。我有些奇怪，阿三告诉我出去得看风景，弄不好还能捡到烟屁股，不抽烟的话能换饭吃。没几天就亲眼瞧见了。那个卖枪佬捡了两个烟屁股回来，还挺长，跟另一个讨价还价许久，换得一盅饭。这里的规矩是：三个一公分以上的"红灯"烟头换一盅饭，要是"漓江"烟头就要四个。"红灯"烟卖0.24元，"漓江"烟0.21元，其他牌子比照价钱换算。这回卖枪佬捡的是"黄金叶"，比一公分长一点，所以要两个换一盅。至于是上午那盅还是下午那盅，协商解决。

那个得了烟屁股的打架佬乐呵极了，不知从哪儿弄的报纸，把那两个烟屁股掰开卷成一个喇叭筒，用白话哼哼："人穷志不穷，卷烟大大筒。"怎么点燃它呢？号子里几个人都忙活起来，主持的竟然是阿三。不知他们是从破棉衣还是被子里扯了点棉花，然后摊薄它，拉扯成十来公分长、两三公分宽的薄棉条；再抽了根草席上的草，把它分剥成很细的丝丝，对折成大约三四公分长一束，垂直交叉放在棉条正中间；再用拖板鞋从墙上刮石灰粉，小心地均匀撒到草席丝束中部。这时阿三把棉条对折包裹住草席束，再使劲卷成一个"春卷"，然后用一双平拖板鞋压在床板上，阿三出力地来回狠搓，没几下就汗流浃背了。另一个家伙头贴着床板凑近闻那来回搓的棉草卷，十几分钟后只听他喊："得啦！"阿三把拖板鞋一丢，赶紧拿起棉草卷，那中间已经焦黑，折断就吹气，火苗就从中窜起

来了。打架佬接过去点着喇叭筒，大口吸着，一副陶醉的模样，旁边几个围着的流着哈喇子看。抽到最后，参与搓火的两个各获赏吸一口。而卖枪佬换得的饭，得分四分之一给不抽烟的胡须佬，这是牢头的权利。而得烟抽的那位就坐在床里闭目养神，以免看见别人吃饭辘辘饥肠受刺激。

“建政三”的牢饭算是货币，可以交换的东西很多。我旁边这位老富农，坐牢居然坐成“富豪”了。几乎每天的两盅饭他只吃下午那一盅，上午那盅我们吃饭他打坐，只是不面壁罢了。有位从外地抓回来的年轻人，用一条质地很好的全新毛哔叽裤子，跟他换了八盅饭，算是最高价；另一位用一件同样很好的宽纹灯芯绒夹克衫，换得他五盅饭；一套天津产“红梅牌”长袖运动衫，只能换两盅饭。还有别人的小件换的，衣裤之类差火一点他都不肯要的。胡须佬说他身后那个包袱里全是换来的衣裤之类。只是他从不会换烟抽。

我们前面哪栋是女监，据说主要关的是性犯罪的女犯，政治犯经济犯很少，夜里不时能听见她们中有人哼哼凄婉调子，听得人都要神经。一天这个河北佬脱光了在铁门里冲凉，没想到对面高窗里竟然露了女人面孔。胡须佬最先发现，喊：“河北佬！对面嘀女人看你冲凉呢。”河北佬无动于衷，只抬头瞧瞧便继续冲他的凉，似乎越来越暴露得起劲。阿三他们一起涌过去看，那边窗口里轮换了几张年轻女人的面孔，还有一个在嗤嗤笑。阿欢说都是做鸡挨抓的，脸皮厚。但很快就不见了。那幅后窗很高，手能抓到窗栅，但要把脸提升到窗口还是很吃力的，坚持不了多久。河北佬仍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冲凉。其实每个人都是那样冲凉，多数人套一个裤衩，少数就这样光屁股冲，也没见过前面会有人围观。

牢房里的伙食据说每天八两粮食，实际上恐怕吃不到，菜里根本无油，饥肠辘辘是每天的常态。于是乎尽管牢里关的几乎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却没人还有性欲，也从未听说谁会谈女人。最具共识的话题就是吃。一旦讨论起这话题，大家都来了精神。尤其是河北佬，他吹起他们河北的吃喝简直旁若无人出神入化，但说来说去也就是饺子面条烙饼，肉食也不过酱驴肉和扒鸡。真有料的还数阿欢，他走南闯北搞投机倒把，一定没轻饶他的肠胃。从新疆的烤羊肉串、卤羊蹄，内蒙的烤全羊、炖羊杂、酱骨头，济南的翡翠面条，武汉的豆皮，一直说到广东五花八门的粤式大菜。某日讨论猪身上哪一部分最好吃，众人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谁知他忽然冒出一句：“猪大肠要是洗得太干净，没一点猪屎味就没有生炒大肠的好味道！”大伙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然后哈哈大笑。我后来又听到南宁市宋福民市长同样的说法，知道阿欢不是瞎掰。

那个强奸犯也是郊区农民，生的颇有些猥琐，黄里透黑的脸色眼圈还有一层淡淡的乌黛色，总感觉像个病人，生理和心理都有病。谁都可以欺负他，尤其是阿三。胡须佬吩咐啥事他一准行动最快，欺负强奸佬也最出格。有一天阿三跟这小子打赌，说他那个牛甘果叶子的枕头，强奸佬若是能绑在“麻雕”（生殖器）上在号子里走五个来回，他愿意输掉两盅饭。强奸佬顿时兴奋起来，他从未有任何可以换得饭吃的物件，这是个好机会。他们在马桶边

折腾了一会儿，那家伙光着屁股前面吊着个大枕头开始走，谁知走了一半那枕头掉地了。吵了一阵说不算，再次绑的时候他们连蛋蛋后面的根一起绑上了。这货走到三圈半，突然倒地面色铁青，口吐白沫浑身直抽抽。胡须佬赶紧下床掐他的人中，气是喘过来了但神志仍然不清。

胡须佬赶紧冲着外面大声喊："报告政府！出人命啦！"大概被外面巡视的大兵听见了，没多大会儿就冲过来几个大兵和公安，打开牢门责令胡须佬把他背了出去，仍旧光着屁股。过了一阵胡须佬被公安带着回来了。阿三脸色也极难看，这货惹出来的事情，可能会有大麻烦。好几个人问胡须佬，他只是简单说"死不了"就再不肯多说。果然，没多大会儿，一个军官领着几个大兵过来，打开牢门把阿欢、阿三带了出去，刚出院子大门我们就听见抽打声，还有阿欢与阿三的惨叫。再过一会儿他俩都被押送回来了，看样子阿欢挨得更厉害，脸上还留着血印子。那个公安跟进门来搜阿欢的东西，歌书被搜走了。

这事儿就这样不再有声响。第二天放风时阿欢告诉我，说胡须佬包庇阿三，硬说他是主谋，害得他挨打得很惨。还有歌书也是胡须佬告密才被搜走的。阿三似乎也觉得有点对不起阿欢，讨好似的总跟阿欢说好话。谁知事情还没完，当天下午来了个被唤作"班长"的兵哥，点了阿欢的大名叫他到门口，问了几句歌书的事就要他把双手伸出铁栏栅门，阿欢照做了。他双手抓住阿欢的双手，一只脚蹬住铁门使劲往外拽，阿欢的胳膊被铁栏栅挤压着，只听见他惨叫不已我们却看不出有何大动作。直到阿欢哭着求饶，那大兵才肯松手。然后教训他，说他是这个号子里最调皮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狗崽子，骨子里的坏水最多，等等。

本以为他该走了，岂知他用食指指着我，说你这个坏头头，在这里面还不老实，还唱黄歌。我们不会整治你，但会把你的表现写进档案，等你回到柳州你就知道厉害了，被你蒙蔽的群众现在都觉悟了，到时候看他们会怎样收拾你！然后才走了。我明白胡须佬把我同阿欢唱歌的事揭发了，不过想想那也算不得啥，只是阿欢的胳膊外侧有些青瘀，也磨破了些少，看不出有多大伤害。但两天多他那双手都绵软无力，连饭盅都端不动。这种阴狠的整治真厉害！

牢房里安静了两三天，大家都闷声无语。那个强奸佬被公安押解着回来收拾东西，然后就带走了，胡须佬说是换到另一个号子去了。这时大家似乎明白，胡须佬的牢头地位也是军管认可了的，但号子里的囚犯对他却不那么尊重了。等阿欢的手完全恢复正常，这小子的活泼禀性又逐日显现。其实也不过闷了两三天而已。号子里又进出两三个，每一个新进来的人都会被打探外面的消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动向。

好像是每个星期三吧，记不准了。外面可以给里边的人送东西，大抵是牙膏肥皂衣衫药品之类。牢里也可以写信给家里要东西，但只能由监狱方审视批准才寄得出去。每到"拜山"那天，公安会来到牢门口，点一两个名字，丢下几件东西在门口，被点到姓名的就会欢天喜地奔过去拿自己的物件。胡须佬说食品是不能送的，说我还没进来之前老富农曾经有一次被儿子送过康乐饼干，惹得其他人吵吵着也要家里送吃的。以后就告知不准送食品，也不见

再有送吃的了。但胡须佬说老富农曾经被叫出去吃东西，而且还把牢里换得的衣衫送走过一次，说他儿子现在官挺大，能耐也大，不知是真是假。只是我在时没见过他被叫出去过。

某日突然来了个军官，跟着的公安打开门，叫我出去。我问公安是否要收拾东西，他说不用。出门后那军官核实过我的姓名，叫公安把脚镣卸了。那公安拿钥匙打开了，然后问军官脚镣是否留在这回来再铐上。那军官笑笑说："拿走吧，他每天进去就自己打开了，铐着还不是哄我们自己！"我跟着这位军官，出了院门，走着走着知道我们这栋在第二排。到了看守所的办公室，里边有好几个人，军人平民都有，后来关在党校旧址时认识了其中的何福然，那个戴眼镜的女的叫陈薇，其余不认识。唠叨了些啥全然记不得了，只知道我给他们的印象是态度不好。然后他们到隔壁房间去商量什么，我瞧见桌面上放着一包开过的"大前门"香烟，好像是某个军官的。环顾四下房间里确实没人，赶紧上前从里边掏了三支，再多恐怕会被发现。他们商量回来，唠叨几句，就说我可以回去了。

公安押送我回到监舍，我则乐不可支，问阿欢，一整支"大前门"可以换几盅饭？一伙人讨论了一会儿，结论是，如果完整的一支可以换三盅饭。我从兜里掏出那三支烟，拿两支换六盅饭，剩下一支自己享用。至于他们几个人分，怎么分，都不关我的事。点火方法依旧。当天下午餐，吃了两盅饭，好久没有这种吃饱了的感觉了，真爽。次日早上餐又是两盅。想着还有四次吃饱饭的感觉，不由得哼起《沙家浜》里的唱段："一日三餐有鱼虾……"岂料还没等到下午开饭，那公安来开门，叫我收拾行李出监。NND，我还有四盅饭没得到哩！早知道不换饭自己抽烟多好！忽然想起来，大声说："阿欢，剩下的那四盅饭归你！"出监后直接被押送回柳州了。

光阴似箭。1998年夏末，一天下午四点多，区信托老胡来电话拉我当晚参加一个宴会。我不假思索就说不想去，这类宴会浪费时间太多。但经不住老胡的劝说，大抵是还有好几个熟人都会去，大家好久没聊聊了，借此机会叙叙。只好答应去了。到六点多，我们一起到了明园饭店一号楼旁边的餐厅。是一次自助餐晚宴，看请柬得知，主办公司是澳洲来推销葡萄酒的，看样子像是产品推介会。但得知他们还要投资建厂，在南宁市搞分装。

百多位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果然有许多熟人朋友，见面总得聊几句。未几，澳洲方面和南宁市政府相关机构的主宾进入餐厅，一通例行废话之后，主持人请澳洲公司亚洲区总裁何先生致辞。听见那名字我就吃了一惊，再看清楚了，就是阿欢！似乎长高了一些，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但音容笑貌显示就是他。根本没听清他那夹白的普通话说些什么，然后开餐，主宾到各处向来宾敬酒，我躲开了，不愿意在忙乱中跟他相认。今晚全是这牌子的葡萄酒，可惜我认不到英文，也就记不住。等到一轮应酬过去，我看见他得了些空，遂迎上前去，到他面前时他似乎有一迅间惊愕，又迅即返回常态。我说："阿欢，不认识我了？"他定了定神，接着说白话："大佬，真系你？"握手的感觉还有点颤抖，我也用白话回答他："我走阵时，肿留低几盅饭俾你介。"他立即会心地哈哈大笑，说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我。

紧接着他拉着我走出餐厅，到门前的花园旁边，给了一个熊抱。然后告诉我他所在乃是马来西亚的公司，这是

他们公司与澳洲公司的合作项目，想开拓中国红酒市场，不过他认为可能不太乐观，因为中国尚无红酒文化。他很惊奇我能说白话了，接着告诉我，今晚最好不要说“建政三”的事。之所以不要说这事，是因为今晚有区市两级政府的官员在场，他不想引起他们的尴尬，或者要做不必要的解释，不如不提。何况他也没被判刑，不说也不算隐瞒什么。我答应了。

说着话，那个澳洲洋人出来找他，他们用英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阿欢介绍我与那个洋人认识，握握手。我们回到宴会厅，晚宴很快就进入尾声，阿欢又登台说话，说着话他忽然说今晚很惊喜地遇到30年前的老朋友、大哥，算是跟南宁的一种缘分。接着就招呼我上台，我摆摆手表示不必了。谁知他硬是过来拉我，只得上去应酬几句。宴会散席以后，他们外资方一伙人被政府机构接走，临行前他特地告诉我：明早八点以前，一定要来，在新都酒店一楼西餐厅我们聊聊。我和老胡走去停车场。老胡问：“你他妈的，30年前你不是在坐牢吗？是牢里的患难兄弟？”我记得阿欢的嘱托，撒谎说：“坐牢之前的朋友。”回家的路上，一路思绪难平。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很奇妙。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新都酒店西餐厅边吃边聊，这里很安静，食客不多。说起“建政三”那些往事，也说了些各自后来的经历。他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他也走了，因为未满18岁，释放了，但没逃过上山下乡，他爷爷全家连人带户口都被驱赶去了百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才搬回来，他老爸也平反回到南宁，然后他全家都去了马来西亚，他们家族在那里有很多亲戚。他出去后才真的得机会读了些书，混到大学毕业，等等。忽然，他低声跟我说：“唱《含苞欲放》，你还是唱低音部，我唱高音部。还记得吧？”我说：“你神经啊？在这里唱？”他说：“没关系，小声点。看，一个客人也没有了。”拗不过他，于是无伴奏小声合唱开始，我们仍像当年在“建政三”那样默契，只是惹得餐厅那些工作人员都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这两个疯子！

回味“建政三”的那段日子，不过个把月吧，我更愿意认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大学生活，还是值得回味的。（初稿于2013.12.27——2014.5.5略改定稿）

wenjung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

小城的电视台好久不转播凤凰卫视节目了，又不让装“小耳朵”，所以，如果不出差，就看不到凤凰卫视，当然无缘于“鲁豫有约”。但谁料想不久前，我和妻子居然到凤凰卫视北京基地做了一次“鲁豫有约”的嘉宾。

那是一段令人意外和愉快的经历。

参加广州庆祝“老三届”建站六周年聚会后，回来便参加市机关一年一度的乒乓赛，本人“老当益壮”，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挂名的）。那天，比赛正酣，手机响起来，是“鲁豫有约”的一个编导打来的，说要采访我。由于体育馆噪杂，我们约好晚上再联系。想起前些天凤凰卫视在“老三届”上征求嘉宾，自己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就象从来不关心的彩票和股市一样。

这次凤凰卫视主动找上门来，全是村长西里的推荐。我纳闷，西里自己就是一个天生的嘉宾，再说，“华夏知青”和“老三届”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为什么偏偏推我“出山”？好在这个谜底晚上就“揭晓”了。

晚上，编导彭璜的电话来了，我们一气谈了一个小时，我将当年两次高考的经历全部倒了给她，特别是屡试屡败的结局。看得出，编导已经读过被收在“岁月如歌”里的《失落的大学梦》，特别关注我落第后的思想情绪。几经“诱导”，慢慢我将忘却多年的痛楚再历练了一遍。还供出了妻子也是77、78年的考生，恰恰也是彭璜挖掘故事的对象，接着便和妻子聊了起来。她们大概又聊了一个小时，彭璜对她说：你们一起来北京做嘉宾吧，题目是关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纪念的。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题材需要各个方面的典型，有考上大学的，有考不上大学的，我属后者。果然，在北京做节目时，我的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双双请了假，于4月20日下午到上海虹桥机场，其时，凤凰卫视已经为我们定好了机票，只要凭身份证即可领取登机牌，十分方便。飞机降落北京机场时天色尚明，刚进候机楼，凤凰卫视接站的师傅就来电话，表示他已经在等候。另外又接了一位山东的老师，我们便上车驶往市区，此时已经夜色迷朦了。

春天让人愉快，路旁白杨的新绿特别养目，车子掠过树丛，草坪和灯火闪烁的大厦。由机场高速经五环、四环，宽畅的马路和纵横的立交气势非凡，我似乎已经记不起四十年前旧北京的模样：满是尘土的巷子，厚重的矮房和靠在房檐下晒太阳的翁媪——文革“串联”时在北京的印象。司机说我们运气真好，几天的风沙刚住，而且下了雨，北京城因此格外鲜亮起来。

司机把我们送到万年青宾馆，告诉我们跟总台说是凤凰卫视的就行，然后就开车走了。

这是设在中央团校里的一家宾馆，门脸不大，楼层却很高，大堂也不大，加上有个什么培训班的在报到，更显得有点局促。办完入住手续，我们到附近的饭店点了几个菜，两瓶啤酒，感觉不错。

二、

21日上午，凤凰卫视的编导、摄影如约而至，一位漂亮姑娘和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身后一堆“长枪短炮”。简单宣暄两句，他们就开始在狭小的客房里拍摄大屏幕用的背景资料。摄影小周一看就是个老手，三下五除二就利用房间的灯具把拍摄的灯光搞定了。先是小彭看着一张纸上的条条提问，边说边录，很快就过了。接着拍资料，大大小小的照片、证件、书信铺了一床，小周举着摄影机，时仰时俯，忙出一身汗。

临行，小彭说23日下午进录影棚，到时会有车来接，意思即从21日下午到23日上午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支配。于是，在这段时间里，就在北京，妻子找到了30多年未有音讯的中学同学，见到了同样是30多年未有联系的插队时的好友，登上了她向往多年的长城。我在04年末刚来过北京，“华知”许多朋友也聚过了，所以，全身心陪她游逛，天天出没在三、四环一带：会友、逛街、下馆子。

说起下馆子，我发现北京真是个好地方，各种风味应有尽有，而且价格适中，一点不比江南贵。我们几乎天天换饭店吃，十分惬意。特别是在宾馆附近的马路旁，有一家四川饭店，早上供应的却是北京的各色早点，尤其是那油条炸得又大又黄，配上一大碗热豆浆，美极！那白糖、咸菜随便取用，并不限量。我和妻子就天天早上到这家饭店用餐，她每天换个口味，我则天天豆浆油条，真解谗，现在还想着呢。果然是：

“北京的小吃……九十九……，样样地都叫您那……吃不够……”23日上午，我们想利用几个小时出去逛逛，便打开地图，发现颐和园离住地并不远，在同一轴线上。待我们到车站，却找不到直抵颐和园的车，问路人，皆不知。于是，我自作主张，以为是颐和园方向的车就上了。车不挤，可以说很空，首票员问到哪，我说到颐和园，她又问：

“到哪？”“颐和园”我又说。

“什么？颐和园！连我都不知道颐和园在哪……你上错车了吧？”“那这车往哪？”我问。

“往公主坟”她答。“那就到公主坟吧”此时，对面坐着的姑娘对我们说：“你们是南方来的吧，我告诉你们吧……”她把如何去颐和园的走法很详尽地说了一遍。这时才知道，我们已经南辕北辙了。即使方向走对了，也得倒三部车才能到。姑娘说如果去公主坟可以买衣服，不过，那的衣服档次较低；如果喜欢，最好去北京大戏院看话剧，眼下正是“人艺”的一个什么大庆，好戏连台……

她给我们介绍了一路，直到下车。一下子，以为北京人太傲的偏见被这姑娘的热心驱到爪哇国去了。

三、

23日下午，正式去录影棚做嘉宾。从宾馆到录影棚——亚洲电视城，车子开了好长时间，又一次领略了北京的都市风光，也由此感到北京城之大。

我们到达时，一档节目正在录制，我们被安排在休息室等候。接待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且态度和气，礼貌，显得很有修养。待我们快上场时，几个年轻人围着我们，这个给化装，那个端水，又是找座，一口一个“老师”“伯伯”“阿姨”地乱叫，使人感到亲切，没有一点紧张。只是他们往我脸上涂的类似花生酱样的东西让我生疑，他们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反光，他们是行家，任他们摆布吧。本来22日在长城上晒了一天，现在涂上这玩意，脸更黑了。

来前，以为北京气温低，没有带太多的夏衣，没想到北京居然比我们江南还热，加之22日登长城出了一身汗，衬衫换洗后，竟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出场。最后翻出临行那天买的一件本打算途中穿的蹩脚衬衫，上面的许多皱折被我用宾馆的电热杯熨平，就穿着它走进了录影棚。有谁知道，访谈中我穿的那件衬衫才值49元钱！

整个访谈录制中，感到比较放松，这主要是因为鲁豫主持技巧和平和的谈话风格，再者就是灯光和色调都比较适宜，给人以轻松的感觉。节目录毕，我觉得比较满意，其实，这种自我感觉往往靠不住。比如谈话中，虽然尽量想将普通话说得标准些，自己也觉得说得已经不错了，下得台来，妻子说我“一说话下面就有人说是上海人”，可见我的所谓普通话还是差劲得很。真正感到难堪的是我观看凤凰卫视播放后，简直难以相信，一直自以为说得可以的普通话竟如此水平，信心大减。

录制期间，观众——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大学生们，都很配合，所以场内气氛很活跃，鲁豫设计的互动也十分成功。本来，这些观众就是冲着鲁豫来的。结束后，我们在休息室与鲁豫合影留念，鲁豫很善解人意，一一满足嘉宾和嘉宾朋友们与之合影的要求。有趣的是，待我们走出录影棚大楼，这些学生们都没有走，而是摆好了“阵势”，直等鲁豫出来集体合影呢。起先我不知道，因为先出了大门，见学生们哄了起来，还以为自己一下子成了个人物，学生们要与自己合影呢。转念不对，他们一定是鲁豫的粉丝，于是赶紧站到一边，作了一个配角。果然，在与鲁豫合影后，学生满意而归。

附记24日，到老熊家。中午，将夏雨赠老熊的一瓶“山庄老酒”喝干，甘醇香浓，好酒！

25日，缺月驾车陪我们夫妇游野长城，午餐昌平后，多入歧途，几经周折，终到黄花城。春日京郊，古城延绵，美不胜收。

回到北京，打表200公里。

晚，餐于绍兴饭店，有缺月、疏桐……，喝花雕。

26日上午，飞回上海。

本贴于2007-06-11 08:32:52在乐趣→情感交友→纵横发表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飘落的女孩

春天是阳光，是微风，是细雨；春天是绿草，是嫩芽，是生命。可这年的春天，在明媚和煦的阳光下，在甜美温暖的春风中，一个女孩从楼上的窗口飘落，轻轻地和她的生命一起，从此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仿佛这个世上从未曾有过。

女孩仰面躺在地上，还穿着冬天的紫色棉袄，她身上全无血迹，脸上也没有痛楚，她望着楼上敞开的窗子，对着围上来的人们轻声说：是我爸推的。这是她在美好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人们从她的眼神看出，她怕人们的责备：太淘气，这么高的楼你也敢跳！

至少，我理解她的眼神。

女孩的父亲老李是我工友，我们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相处过八年。老李是车间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因为出身原因失去考大学的资格，进厂临时工一当就是十几年，木讷的老李无论干活还是说话总不如人，所以根本就没有发展的机会，许多比他晚进厂的都当上了什么科长、主任的，他还在生产一线卖苦大力。

老李干活和他说话一样，慢条斯理的，他不会偷懒，要他甩开膀子干也不行。因为木讷，工友们不相信他读过高中，小青年时常嘲笑他。起先他还解释，发怒，后来遇到多了，他不解释也不发怒，只是不屑地瞪一下眼作罢。

女孩是老李唯一的孩子，他也只能有这么个孩子，因为女孩生下不久，她妈妈就去世了。我还清晰记得冰天雪地里老李用自己做的滑车拉老婆去医院的情景。因为出身不好又是临时工，没有人肯嫁给他，到三十出头才在附近农村找了个媳妇，还带着一身的病。老李哪有能耐帮媳妇治好病啊，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媳妇就死了，给他留下个女儿。

此时，两个大龄的弟弟要结婚，关于房子全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他和女儿被弟弟们从家里赶出来，无奈住进厂里的倒班宿舍。接连的挫折打击，特别是媳妇去世后，老李的神智开始出现问题，明显的表现就是自己经常嘟嘟囔囔，不明就里的工友依旧和他开着玩笑，直到他歇斯底里大发作。

尽管老李精神出了问题，对女儿依旧疼爱有加，女儿出生以来，没有受过什么委屈，每日里像跟屁虫似地随在老李身后，久了便成为厂里一道风景，全厂人人都认识这个小丫头。

有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随着老李进进出出，虽然他们过着居室无着的日子，旁人看来父女相偎也是那么和美。人们可怜女孩，有送穿的，有送吃的，女孩生活得倒是无忧无虑。女工倒班宿舍和我的寝室同在三楼，女孩就住在里面，放假或厂休日，宿舍无人，女孩害怕，就常来我们寝室串门。我们给她糖吃，她给我们唱歌，虽然歌唱得不怎么样，但唱得很认真，投入。女孩很健谈，不久，她家的情况我们便了如指掌：两个叔叔一点也不好，他们踢爸爸，爸爸的鼻子都被打出血了；他们把爸爸推出来，将我也推出来了；爸爸打不过他们……

那个年代，生活很艰苦，我们还有从上海带的挂面、香肠，女孩和她爸爸每日在食堂就吃窝窝头和白菜土豆，日日如此。我们能给她的，也就是些糖果，饼干，每次她都舍不得吃，总是放入口袋，不知是想与父亲分享还是留着慢慢品味，表情总是那么高兴甚至是惊喜。

老李终于发病了，那日在车间里干着活，不知哪个混小子刺激的，他歇斯底里大发作，以致厂里派了民兵将他捆绑起来，直接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这一去，就是半年。半年后回来，没有上几天班就又送进去了。从此，女孩就一个人住在厂倒班宿舍，更显孤苦伶仃，无倚无靠。本来不懂忧愁的女孩开始变了，没了笑容和歌声，走路躲着人，总是像小猫一般贴着墙根。在楼道里，她见到人，会靠墙停下步子，让人过去才敢继续行走。失去庇护的女孩就像失去亲鸟的雏，像失去母亲的猫狗一样可怜。

有一年春节放假，大年三十的深夜，宿舍大楼静无声息，就我一个人，因看书尚未睡下，听见门外有动静，就开门探望。大过年的，一天都没有听到人声，因此不太放心。出门见是配电房的女工俞素珍，她说值中班，刚下班，家远回不去就住倒班宿舍了。见她一个女子，又是深夜，就陪她去库房取被褥，然后帮她打开倒班宿舍的门，听得女工倒班宿舍的门轻轻“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便回自己的寝室去。突然，倒班宿舍传来了猛烈的打斗声和呼救声“救命……救命啊……”我顿时头皮一紧，觉得头发都竖起来了！没有多思考，跑到宿舍门前，飞起一脚将门踹开，只见里面两个黑影缠在一块儿，一个喊着“救命……鬼……鬼啊……”，另一个喊着“我不是鬼……我不是鬼……”

我开始以为遇着歹人了，本想解救，听着声音都是女的，赶紧打开宿舍的灯，一看是女孩和俞素珍缠在一起，她们两个都紧张害怕得气喘吁吁，近乎衰竭。我哭笑不得，将她俩分开，等她们恢复的差不多，问起怎么回事，才渐渐将原委弄清。

原来无家可归的女孩一个人住在倒班宿舍，心里十分害怕，早早地就睡了。半夜听得有人声，又见开门，吓得爬起悄悄蹲在了门后。俞进屋开灯，并没见到有人，就将被子铺好关灯睡觉。此时女孩不敢惊动来人，想悄悄爬回铺上继续睡觉，就摸着黑往床边挪。俞刚躺下觉得有动静，起身只见一个矮矮的黑影朝自己摸来，吓得差点昏厥过

去，情急之中大喊救命，以为自己遇上了鬼。女孩此时也怕极，一把抱着俞大喊“阿姨……我不是鬼……不是鬼啊！”俞更加害怕了，两人就缠成一团，都吓的半死。

由此可见，女孩一直生活在小心惊恐之中。

后来女孩读书了，又戴上了红领巾，常常自豪地在我们面前显示一下，读书使她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世界，眼神中多少有了些许欢快，可是，这一切是多么短暂！

春暖花开，老李病愈，满怀欣喜地从几十里开外的精神病疗养院回到厂里，放下行李，头一件事就是去找他心爱的女儿。女儿还在学校里，老李就到厂外的小卖部买了一些糖果蛋糕之类，分别三年了，他想让女儿高兴。

挨到下午，女孩回来了，照常在睡觉的铺上摊开书本做作业，门开了，老李走了进来，他很想和女儿亲热，于是，用他自己觉得最温柔的语调喊女儿：“丫头，我出院了！”不知是长期服药的结果还是怎地，这几个字从他嘴里吐出后，变得那么沙哑刺耳，女孩吓得一跳，赶紧爬到铺上。

“是我，是爸爸。”老李说罢，捧出糖果、糕点，凑上前，继续说：“丫头，这是给你的，过来吃。”

老李将糖果直往女儿身旁送，女儿惊恐地往后退，她觉得这个声音沙哑刺耳，满脸胡茬的人似乎在施放诱饵，自己就是他要抓的小鸟，于是，她一个劲儿地往后退缩。

“你怎么连爸都不认识了？过来！”老李有点不高兴。

“你是……是……精神病……”女孩一边还在往后退，一边说。

“谁……谁……说我是精神病？我不是！”老李有点恼怒。

“你走……你走……我……不吃……你的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老李十分震怒。

他起身抓女儿，眼看就抓住她的腿了，女孩往后一仰，在抽回脚的同时，靠在了铺旁的窗子上。老李抢上一步，伸手还要抓，只见女孩挺身起来往后一靠，整个身子就全贴在窗子上了。

冬天，宿舍的窗子是插死，并用纸糊上的，只有这样才能抵挡东北凛冽的寒风，而春天到来后，早有人将糊窗的纸揭了，为了透气，窗子时常是开的。此时的窗子正是既没有封死也没有插住，东北建筑的习惯窗子常朝外开，当女孩身子重心压在窗子上的时候，身后的两扇窗子骤然朝外打开，女孩徒劳地往空中抓挠了几下，便飘落楼外。

女孩死了！一朵尚未绽蕾的花儿凋谢了。那个时代，一个悲惨的小生命，除了我今天的这篇小文，再无痕迹

了。

女孩并不想死，老李更不想害死自己的女儿，害死女孩的是那该死的建筑！是那该死的朝外开的窗子！

事情过去30年了，此文谨以哀悼！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阿东的故事（一）

阿东其人

阿东的大名原叫陆伟东，文革起，他便改名为姚卫东了，这也是有出处的，因为他母亲姓姚，至于“卫东”嘛，过来人都知道，那时流行——保卫毛某某嘛。阿东文革时当过学校“红卫兵”头头，绑过老师，打过校长，为此自豪过好多年，常常吹嘘当年的“革命行为”，直到清理“三种人”才缄口不语。

下乡插队，阿东表现不错，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很快就抽到市里当了工人。劳累之余，红卫兵脾气不改，老是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心想他的共产主义事业，一心想抓“坏人”立功，伟人的幻想使他常有些奇怪的行为，即自觉不自觉地效仿历史伟人的举止言谈。他喜欢买书，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他买来当时能够买到的书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拿起笔在上面乱涂乱划，一个晚上，一本大部头的书里便有了他读过的痕迹：眉批、旁批、注脚等等，有时他一天能够“读”完好几本这样的书，老H认为他是等成为伟人之后供人家研究或纪念用的。阿东还讲过一个据说他亲身经历的极其惊险离奇的故事（见“阿东的罗曼史”），不知道是不是他幻想出来的。

之所以怀疑阿东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因为他太理想主义了，他总觉得自己将来要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作大贡献，对此痴迷几近癫狂。

阿东是个理想主义且富于幻想的人，也是个侠义热心肠的人，谁有什么事他都愿意帮助。有次深夜，老H高烧四十度，大冷天他从热被窝里爬起，借辆自行车驮老H到医院挂急诊，看完病，还请老H到夜市酒馆喝了两碗啤酒，至今老H记忆犹深。单位里有个技术员，是老五届的大学生，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拖着两个孩子住在筒子楼里，日子要多艰难有多艰难。孩子吃不惯杂粮，阿东就把自己辛辛苦苦从上海背来的大米挂面统统送给她，家里捎来的咸肉、香肠和菜油，他也匀她一半。阿东朋友多，经常给他寄来吃的，他放在柜子里，常被别人拿来吃，他并不计较，一笑了之。不过，阿东也有气人的地方，宿舍里其他人有好吃的，他也常会自作主张送人，说以后他家捎来了

还，从来也没有见他还过。那时，有许多知青依旧在乡下，来往都要经阿东所在的这个城市，阿东总愿意为他们跑腿，如买票啊，住宿啊……。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常常将自己的被褥全部让给过往的知青，自己去睡满是虱子的夜班宿舍。记得从三棵树开往上海的57次列车总是半夜到站，老H不知有多少次被阿东叫醒，去车站送路过的知青。从乡下来的知青也可怜，大包小包挤不上火车，被车站工作人员喝来喝去，有阿东相助，他们心里塌实多了。阿东到车站送行的热情多年不减，颇得知青的好感。

接下来试着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全面描述阿东的传奇生涯，以飨网友。

共产三月

进厂不久，一次发工资，阿东召集宿舍的十来个知青，说大家将工资集中起来，统一支配，尝试共产生活。这意味着工资将集中使用，个人没有消费的自由，当即遭到多数人的拒绝。阿林第一个反对，不无讥讽地说："谁爱共产谁把钱交出来，我不参加！"最后大多表示没有兴趣，参加共产的只有阿贵、阿发、阿张和老H连阿东五人，其中两个与阿东同学，而老H是阿东的下铺。

"共产小组"成立了，大家将工资交给阿东，由他掌管经济大权。当天，阿东买来一些洗漱用品，分给每人一份，还买了两包熟肉和油饼。晚上，油饼夹肉，还喝了一瓶通化葡萄酒，首日共产生活其乐融融。

后来的几天生活证明，阿东的确有本事，天天的伙食比吃食堂好多了，还有水果——食堂天天窝窝头，见不到一点荤腥。第二个月，阿东兴高采烈买来锅碗瓢盆和煤油炉，说天天到饭店买太贵也不方便，还是自己炒菜做饭，这样节约开支。从此，宿舍里煤烟缭绕，大家开始吃阿东做的饭菜，虽然常常夹生或烧焦，但油水仍比食堂的足，几人觉得还将就得过去。

一天，阿东不知从哪儿搞来一条大花鲢，足有三四斤，对大伙说："晚上下班回来你们等着吃鱼吧！"那年月吃鱼是稀罕事，何况这么大一条鲜鱼。这天上班八小时我心里就一直惦着这条鱼，可以说下乡到现在还没有吃过鲜鱼呢。那时阿东抽调在厂"群专"，自由得很，他可以在上班时间回宿舍做饭，没有人管。我们下班回到宿舍时，已经满屋鱼香了。阿东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从他的笑意中看出他十分得意：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哈，我借了个大锅，今天全鱼宴！"阿东说。

是的，鱼是整条放在锅里炖的，我们的小锅哪儿炖得下这么大的鱼啊。大家迫不及待地围在锅旁，筷子齐刷刷地向锅里的鱼伸去。

第三个月，阿贵表示退出“共产小组”，因为半个月的“银根紧缩”，油饼越吃越少，经常吃食堂买的窝窝头，喝阿东煮的菠菜汤。接着阿张也宣布第四个月要“独立”，不再参加共产了。阿东说这本来就是试验，以后总结经验，情况会改善的。阿张坚持要退出，说下个月的工资不交了。阿东无奈，说革命只能靠自觉，不能强迫。阿贵、阿张只经受了一两个月共产生活熏陶，便退出了，只有阿发和老H继续跟着阿东接受共产生活的洗礼。

第三个月，阿东与大家先吃苦：天天窝窝头、菠菜汤；菠菜汤、窝窝头，待到月底，他带大家到馆子里大吃一顿，吃得满嘴油光光的，然后抱一个大西瓜回来，让大家特别是那些拒绝革命的人感受到“共产小组”的优越性。但阿东毕竟没有真正当过家，理过财，两三个月下来，“银根”愈加紧缺，他也乏了，炒菜做饭也不起劲了，老是说：今天这顿简单点，一人两个面包吧。或者干脆拉到饭店去吃油饼。这样一来，大家是很乐意的，阿东却入不敷出，不到半个月，钱已经用光，他只好自己贴补。眼看“共产小组”的日子过不下去，阿发和老H一起提出散伙，阿东嘴上说不同意，要革命到底，其实他这么贴下去也是承受不起的，于是，三个多月的共产生活正式结束，阿东的“共产小组”就此解散。

阿东的罗曼史

这是阿东亲口对老H讲的故事。

那是1966年底，他作为红卫兵，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串联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那天他刚要下火车，就被一阵密密的子弹堵回了车厢，再看那车厢，已经被打得如蜂窝一般。原来，此时新疆的两派正在武斗，动的都是真枪真炮。阿东他们几个红卫兵从另一面的窗子翻出，正要跑，那边的机枪又响起，他们只好爬在轨道上，一动也不敢动。这时阿东发现自己身上粘糊糊的，不知是受伤了还是沾的别人的血，反正周边躺倒不少，不知死活。

正当阿东处于绝境的时候，一个铁路工人冒死过来，带领他们穿过封锁线，跑到一个安全的小屋，对他们说：现在是保皇派在报复镇压造反派，连外地来的红卫兵也不放过，已经被抓起来很多，你们赶快离开新疆，向毛主席报信，派解放军过来吧！阿东听到这些义愤填膺，决心要和新疆的革命派一起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后来，阿东在与保皇派的战斗中负伤，仍旧是这个铁路工人救了他，并且将他送到天山脚下自己的家里疗养。这里要交代一下，阿东再三强调的这个铁路工人是□□□族，由此演义了阿东的一段美丽动人的浪漫史。铁路工人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儿，名字叫燕妮。□□□族女孩的名字一般叫“哈丽萨”、“阿依古丽”什么的，这个□□□族女孩居然叫了一个和马克思夫人一样的名字。阿东在她家疗伤，她几次掩护阿东躲过保皇派的搜捕，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感情。铁路工人尽管是阿东的救命恩人，但因不是同种同族，坚决反对他们俩的恋情，他认为一个

□□□不可能嫁给汉人。最后，他们只好棒打的鸳鸯各自东西，至今，阿东还和燕妮还保持联系，继续着革命的友谊。为证明这个故事，阿东还让老H替他发一封给燕妮的信，不过，从来没有见到新疆的回信。有时，老H嘲讽地对阿东说：你的新疆历险记是不是编出来的，那个燕妮怎么和马克思夫人一个名呢？阿东会不屑地回答：哼，你懂个屁！

燕妮的故事十有八九是阿东幻想出来的，后来自己也不好意思提起，想想马克思夫人叫燕妮大家都知道，再怎样也不该造出个燕妮来，谁能相信？而下面的故事却是真的。

阿东后来追求一起来厂的知青阿兰，但由于知青阿龙的介入，他最终放弃。阿东自我解嘲道："我怎么会真的和她？我们根本就不般配"。阿东的个子一米八〇出头，而阿兰不足一米六〇，看来是不般配，但是谁都知道阿东是真的喜欢阿兰的。

阿兰个子不高，却长得苗条匀称，脸蛋也端正，特别是两个大眼睛水灵灵的，男人见了总想多看几眼。阿兰跟谁说话都低着头，那羞涩劲儿让男人产生百般的爱怜，阿东应该说天生的情种，看到阿兰早已魂不守舍，他自己不好意思，就经常拉老H一起到阿兰的宿舍去，说些"有事的话，你尽管叫我阿东"、"朋友给的鸡蛋，你拿点去吃吧"……还邀阿兰和其他一些人出去郊游，他则起劲地为大家特别是为阿兰拍照片。晚上，他让老H做帮手，将这些照片洗出，放大，压光，然后亲自给阿兰送去。按理阿兰应该看得出阿东的用意，可她就是表现得不即不离，不知怎么想的。这时，阿龙出动了。

说起阿龙，除了长着一副讨姑娘喜欢的脸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那时论出身，阿东父亲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阿龙的父亲则是劳改期满留场职工；论个子，阿东有北方人一般的大个子，阿龙只有一米七〇；论资历，阿东是正牌中学里的红卫兵司令，阿龙却是工读学校出来的，至于工读学校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学校。但是，在与异性交往上，阿龙天生老道，他可以很自然地带着一丝微笑与姑娘搭话，举止言谈处处表现得很绅士。阿龙无论何时，都衣着整齐，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而南人北相的阿东则不修边幅，言行大大咧咧。

阿东的那些小动作在阿龙看来就是小儿科，他不要什么人来陪，他会直接邀请阿兰聚餐、看电影、拍照等。在拍照上，阿龙棋高一着，他直接请照相馆的朋友放大，弄得阿兰像明星一样。阿龙还会弄来一些紧俏的物品送给阿兰，一切做得似乎那么不经意，很有城府，不似阿东那样直露。

不久，大家都看出他们两个在较劲，阿龙似乎很有胜算，我行我素，并不在意阿东的表现。然阿东却是沉不住气了，几次对老H说：阿龙这个流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会得逞的！阿东开始攻击阿龙。他先是利用回上海"外调"的机会，将阿龙的身世调查得个"底儿掉"，在厂里广为传播，然后，十分关心地提醒阿兰要提高革命警惕性，特别要辨别那些坏分子的真正面貌和狼子野心，还说阿龙是因为调戏女同学和偷窃才进工读学校的。都是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主见，阿兰听阿东这么一讲，就不敢和阿龙来往了。阿龙知道后，放出话来，说与

阿兰这个烂货只不过是玩玩而已，自己外面女人有得是，不过，既然阿东不择手段坏他名声，礼尚往来，你阿东也休想得手！果然，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调戏阿兰，关于阿兰不检点的谣言四起，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弄得阿兰在厂里抬不起头来。不久，阿兰就嫁给一个当地人，搬出了宿舍。阿东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竟是鹬蚌相争。

阿东真正成功的恋爱是一次路遇，真真切切地让他大大浪漫了一番：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闯进他的生活。

在上海开往东北的火车上，与阿东相邻的是一个杭州姑娘，高挑的身材足有一米七、八，白净的鹅蛋脸显现出吴越女孩的俊俏，她是在黑龙江插队的杭州知青，和阿东一样正返回东北。阿东平时待人总是乐呵呵的，而且热心，特别是对女孩子，加上阿东一米八几的高个子，不知怎么女孩就上心了。两人互留了地址，半年的鸿书传情，确定了恋爱关系，等姑娘再回杭州，到此地下车会同阿东一起返上海，然后杭州。两年之后，阿东义无反顾地自动离职，跑到杭州郊区的一个农村重新插队，与已经病退回杭州的姑娘结为夫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阿东的故事（二）

高度警惕

阿东虽早已不是红卫兵了，可“阶级斗争”这根弦依旧紧张着，在他看来，到处有“四类分子”和“牛鬼蛇神”，既然有这些坏分子的存在，就不可能没有破坏，只有提高革命警惕，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他们。所以，阿东常常秘密观察周遍的人和事，渴望能发现什么，好有所作为。

有天，阿东和几个知青在车站广场闲溜达,有人拿着一个长型的饭盒，对着站前高耸的毛泽东塑像做着瞄准的姿势。远远地阿东看见了，脸色一沉，极其严肃地说：“有个反革命！”他让大家分散包抄过去，很快成功地将“反革命”生擒。他们几个押着“俘虏”，送到附近的派出所，阿东对警察说抓住一个现行反革命，这个丧心病狂的坏分子居然敢对毛主席瞄准！派出所的警察问清情况，连连夸赞阿东觉悟高，警惕性强，说“上海的红卫兵就是不一样”。警察收下阿东斩获的“阶级敌人”后，阿东十分兴奋地离开派出所，似打了个大胜仗，而后继续闲逛。

等他们回头又经过车站，发现刚才扭送的“现行反革命”居然又在站前晃荡。阿东气得呼呼直喘，说这个警察一定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要去把他揪出来。阿东率领大家气势汹汹杀回派出所，派出所已经“关门大吉”。回到厂里，阿东立即到保卫科报案，保卫科长哈哈一笑，说小将们的精神值得表扬，但那个反革命是方圆皆知的神经病，他爸爸还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呢！如此，阿东还惺惺然地说：“神经病就不会是反革命了？也可能是装出来的！”

更有甚者是不久后的一个深夜，老H正睡得香，迷迷糊糊只听阿东对他说：“醒醒！醒一醒！你听什么声音？”老H隐约听见很远的什么地方在“都……都都……都……”地响，时断时续。阿东一脸严肃，说这一定是特务在发报，要老H起来和他一起去捉特务！

老H穿上衣服，跟着他拿了一只大电筒悄悄出了寝室，顺着墙根一点一点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摸过去，老H觉得既紧张又刺激，十分好玩。他们走过一条巷子，穿过一条马路，竟然来到工厂的大门口。可以判断出声音就是里面传

来的，阿东小声对老H说“不要跟门卫讲，就说进厂有事”。他们摸进厂里，听“发报”声音越来越清晰，阿东说敌人太狡猾了，居然隐藏在工厂，想用厂里的生产噪音掩盖其发报的声音，此时的阿东满脸是即将大功告成的兴奋。

他们隐蔽在墙跟的阴影里，弯着腰朝着响声方向前进。在机修车间，阿东让老H停下，用手指了指，又把手指竖起，压在自己的嘴上，意思是说找到了，特务就在里面。机修车间晚上一般不上班，只有几个值班的钳工在打瞌睡，怕生产车间设备出了问题好抢修。潜进车间后，静静地边听边搜寻，这声音好象又跑到外面去了。

他们悄悄退出来，阿东在前老H在后，继续四处寻找“电报”声的源头，终于确定声音是从锅炉房里发出来的，阿东摆摆手，要老H停下，轻声说他先进去，如果听见搏斗声老H再冲进去，并要大声喊“抓特务……，老H知道，这种关键时刻他一定会冲在前头——因为他太想抢头功了。

他们摸到锅炉房门口，本想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同时大喝一声“不许动”的阿东此时象泄了气的皮球，回身对老H说：“走……妈的……上当！”

老H再看，锅炉房里一只开水炉的气阀喷着蒸气并“都都”作响，顿时忍俊不禁，嘲笑道：“你以后不要神经过敏，好不好？”

阿东不好意思地说：“太象发报的声音……一模一样……。”似乎他熟悉发报的声音。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纪实】：

妻子王玲

（1）

天黑了，窗外灯火璀璨，楼下通往太湖的每条大道，都似串串晶莹的珍珠项链，一直延向不远的太湖苏州湾。

我伫立在窗前，外面是绿树，街巷，行人、汽车——一幅生动的风物图景，窗内身旁的病床上，躺着病重的妻子，此时的她已经打了一针止痛针，疼痛正在缓解，惯常她可以安稳地入睡，直至下一次疼痛袭来。然而今晚的她却睁着双眼，炯炯有神，像专注地看着什么。我俯身问她，她轻摆手指，意思说没事。很长时间我们的默契是：点头为有事，摆手指则无事。于是，我让女儿小睡，我则继续守在床边。

妻子举起双臂，双手似指挥般摆动，十个手指也都在动。起先，我轻轻按住她的臂膀，想让她安静下来，不要耗费体力，毕竟八九天没有进食，全靠输液维持呢。但她努力摆脱我的束缚，继续她的“指挥”。看她手指摆动得很有节奏，我忽然醒悟：她是在弹钢琴。我赶紧将ipad放在她一旁的床头柜上，打开音乐。

轻快悦耳的《春之声圆舞曲》在妻子耳畔响起，她的摆动竟然与之合拍，然后是《杜鹃圆舞曲》，再后……

我对女儿说：“看，妈妈在弹钢琴呢！”此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妻子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以为明天的太阳依旧能够照亮她红润而又娴静的面容。

她睁着双眼努力地弹着，一丝不苟地合着节拍。她的眼睛此时格外明亮透澈，由于长期输液，药物浸入弥漫的缘故，清澈的双眸竟有些微黄。

Ipad里足有三十多首曲子，直到所有曲子都放完，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她还在弹着，我把音乐关了，想让她休息会儿。她垂下一只胳膊，另一只还在弹，然后又是双臂举起，继续弹奏着，十几分钟之后，双臂都放了下来。她该睡觉了，弹这么长时间，已经近十天几乎没有进食的她，一定疲乏之极。

我轻轻抬起她的手腕，觉得格外地柔软，把把脉搏，只觉得极其细微地跳动了一两下，再无任何感觉！把手放

在她的鼻孔下，没有出气，我知道，妻子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我对女儿说：妈妈走了！

女儿不想相信这个事实，对我说：没有！妈妈是晕过去了！

……

1973年春天有半个月，我几乎天天要穿过福世花园，再从愚园公馆西侧的一条小路走到愚园路，然后到中山公园乘公共汽车，这是从王玲家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那时，这条柏油铺就的小路幽静整洁，路两旁的法桐在春光下刚刚吐出鲜嫩的绿叶，树下时常有几个儿童在嬉戏。走出这条路是愚园路，那儿有更高大的法桐树，伸展的枝脉使道路成了绿荫下的长廊。每当走在这些生气盎然的法桐树下时，心情就会格外地好，愉悦的心情使我觉得周边一切都好，整个世界都很美好。

这就是初恋的心情！那年春天，我和王玲一起回到上海探亲，由于在东北分居两个城市难得相见，一回到上海，恨不能时时在一起，所以，在探亲有限的十几天里，我天天往她家跑，因而天天要走过那春天的绿廊。那珍贵的半个月，是我与王玲相恋以来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日子。

（2）

与妻子王玲相识是在1969年冬天。那时，下乡已经有半年了，与她天天在一口锅里吃饭，一起下地劳作，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因为在一个集体户的上海知青有18人，9男9女，分别来自长宁区的7所学校，大多互不认识，少男少女的我们，情窦未开，羞于来往，故而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男女生之间并不熟悉。

快上冻前，队里让我们挖菜窖，要挖一个大大的菜窖，大得足够储藏我们18个人吃一冬的白菜、土豆、萝卜和大葱。给知青自己干活并无工分，男生大多不愿意干，队长大概看我老实，就分配我和几个女生一起挖窖。那天几个人忙活了一天，总算将菜窖挖出个模样来，傍晚，歇气时，一些同学回屋子喝水，我则在菜窖旁挖出的土堆上坐着休息。

抬头发现菜窖对面也有一个女同学没有回屋，站在土堆上，看着快要完工的菜窖，似乎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她着深紫酱红的罩衫，黄军裤，短发，带一顶下乡时发的棉军帽，这是上海女知青的一般打扮，没有特别之处。而我一眼瞥去：鹅蛋脸，弯弯的眉，觉得她很美，在我眼中端庄大方，神情坦荡、自信……

我不由地“砰砰”心跳起来，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一个连自己都感到羞愧的念头闪过：如果能娶她为妻就好了……！而这个念头稍纵即逝，接下来便是自责：下作，无聊，竟然会产生这样荒唐的想法。我觉得面对一个如此

纯洁的姑娘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人家的侮辱！何况，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那年，我17岁，她16岁。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王玲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在上海过完1970年春节，大多数同学都早早回到了尚未解冻的黑土地，仅有几个女同学未归，其中就有她。

大地没有解冻，农活还不多，偶尔队里会让我们休息一天半天的，于是几个知青凑在一起玩玩牌，打40分或算24点。那天我们正在女知青借住的老乡家里玩牌，就听得远处的县道有汽车经过，不一会儿，就有人喊："王玲她们从上海回来啦……"

正玩得起劲，故没有在意，直到几个女知青风尘仆仆，大包小包地走了进来，才意识到"王玲她们从上海回来啦……"跟我们有关，赶紧打完手上的那副牌，和知青小马灰溜溜的离开她们的屋子，此时，我明显地觉得有人不屑地瞥了我和小马一眼。这个瞥我们一眼的人，小马告诉我，她叫王玲。

1970年夏天，是下乡的第二年，集体户同学之间渐渐的熟悉起来，无论男女。而我与王玲从未说过话：一是没有机会，她是9个女生中，最为寡言少语的，很少听到与人闲聊；二是不敢接近她，总觉得自己心怀过鬼胎，有点自惭形秽。

她似乎一直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这个感觉，不仅仅是我，集体户的其他同学和老乡也认为她清高，不好交往。我更是有自知之明，根本就没有与之来往的念头，何况，那时的我个子矮矮的，一米七〇都不到，其他同学大多比我高大得多，谁能瞧得上我呀！

（3）

这年夏锄，屯子里的老乡多找借口不下地，这个说肚子疼，那个说脑瓜迷糊，他们有个口头禅：共产党饿不死人。意即你多干只能分得一份口粮，不干也分这些口粮，所以他们一点儿出工的积极性都没有。如此，苦了我们这帮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天天起早贪黑下地，累得连吃饭都懒得吃，只想倒头就睡。

一个下午，知青们在西甸子铲地，为齐腰高的玉米锄草。那是出了名的大长垄，一条垄铲到头要老半天，那望不到头的田垄，直累得你几乎绝望。我疲乏之极，慢慢地铲着，远远地落在众人之后，欣慰的是我后面还有一人，她就是王玲，就在我身旁那条垄。

两个人默默地，看似肩并肩地以差不多的速度前进着，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彼此不免尴尬。记不得是她还是我先发话的，两人便铲地便交谈起来。

她问我是不是写过一首诗，并且将诗的内容大概说了出来，当时我很心虚，因为的确在日记里写过一些打油的东西，那都是些胡乱涂鸦，上不得台面，她怎么会看到的？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五个字、七个字凑足四行或八行就是诗了，晚上在煤油灯下倒是写了不少，锁在自己家里带去的小木柜里，自我欣赏，不敢示人。到底是怎么传到女生那儿去的，当时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是知青小毛搞得鬼，他最大的喜好就是撬同学们的箱柜，偷吃人家带来的罐头和糕点，顺便把里面的家信、日记什么的拿去到处传。据说他脑子先天有病，大家拿他也没有办法。

正因为小毛，这首诗居然被王玲看到了，还说写得不错！呵，人算不如天算，看似不经意的行为，竟为我与王玲一生的姻缘牵了线，搭了桥。

之后，干活时我常常跟她说话，从扭扭捏捏到大大方方，彼此的了解多了起来，但直到1970年9月我离开农村，我们仅仅还是一般同学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的。

我离开农村的那天，同学们送我到村口，王玲和几个女同学送了我一支钢笔，一本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写了几句留言，也是在后来才看出那是王玲的笔迹。

到四平安顿好之后，我给集体户的同学，队长和玩得比较投机的几个年轻社员一一写信，告知在城里的情况，很快就收到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王玲的。

回信大多说些革命啊，理想啊，事业啊……所谓励志的空话，套话，那是当年流行的八股，唯有王玲在信中跟我讲了户里的情况和心中的烦恼。因为刚刚离开同学们，对他们的境况我深为关心，于是又去信询问详情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来二去，我与其他人信件来往日渐稀疏，而与王玲格外的频繁起来，于是，知青和老乡纷纷谣传我们两个恋爱了。其实，起初的几年里，我们来往的信中没有片言只字涉及爱情，全是讨论一些问题，谈一些看法，尽管用后来的眼光回看那些思想和观点，显得十分肤浅和幼稚，但我们是一直认真严肃地交流着。

几年的书信交往，彼此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两人都是有信必回，无话不谈。曾经回去过下乡的那个屯子，有次正逢下雨，交通中断。

那时的公路是泥筑的，只要下雨，三天之内必不能通车。因为要回去上班，我十分焦急，王玲为我几次跑到大队部打电话询

问天气和交通，令我十分感动。这就又激活了我藏在灵魂深处的“鬼胎”：她应该是我此生最为重要的人！

1972年1月，她从乡下抽调到吉林省辽源市的一家工厂，开始了她六年的工人生涯，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这年也是我们由朋友转而成为恋人的一年，漫长的相恋时光由此开始。

2月，她用春节放假时间去看望小姑，上海交大毕业的小姑在锦州葫芦岛的719所工作。王玲从辽源出发必经四平，换车间有半天的空闲，这令我十分欣喜，我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心。在她来之前，我熬灯费蜡几个晚上，写就一封书信，想她在四平时有机会当面交与她，可在她来四平后的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有其他同学陪伴，我无机可乘。

晚上送别她从车站回到宿舍，心情沮丧，我把这封书信压到箱子底下，再也没有寄出。这时我还不到20岁。

此后，仍像过去一样与她保持通信，但涉及内容已经不是两人共同关心的集体户，而是各自身边发生的事情和所谓国家大事了。我发现她对世事的看法与我很不一样，她是紧跟报纸、电台走的，我则不然。她想说服我，我想说服她，所以，在信中我们的争论多了起来。

这儿不得不先说说王玲的家庭出身和她受到的家庭影响。他父亲即我岳父早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这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是全国设备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医科大学，校长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迁址贵州安顺，岳父在那儿完成学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曾获中正奖学金。毕业后即为国军现役军官，先后在重庆和上海等医院工作，国军败走台湾，本来已经通知跟医院一起随迁，后运输吃紧，他们非战斗人员便留在了大陆。解放军占领上海，医院被解放军接收整编，此时岳父母刚刚结婚，岳母是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一下子成了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随军队辗转于江苏，安徽和上海的野战医院，王玲1953年9月出生于南京的陆军总院，至今还保存着当时陆军总院开出的出生证。在王玲三岁以后，岳父母调至解放军在上海的八五医院，他们一家才定居上海。八五医院给分配了住房，系原美国海军俱乐部旧址——一幢欧式的别墅洋房，房前的院子有几个篮球场大，院子里有种满草坪和花木，她们兄弟姐妹就在这个院子长大的。

小时的王玲生活优越，富足，当时岳父母在医院的收入远高于一般平民，所以他们家吃穿不愁，讲究营养，可以常年雇用保姆。然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极其严格，从穿着上丝毫看不出几个孩子出身小康家庭，甚至比一般人家还要朴素。这些，盖因于岳父母全盘接受当时的思想教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岳父是旧军队整编过来的，和岳母都加入了解放军，享受着优厚待遇，他们对此心怀感激，尽力地主动地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把所接受的一切又灌输给自己的下一代，王玲就是受着这些正统教育长大的。

她从小在穿着上不挑剔，经常穿姐姐穿过的旧衣裤，以至于班主任想让她申请减免学杂费。她父母也极少给子女零花钱，常常让他们姐弟几个分食一个

苹果，说吃多了是浪费。在思想行为上，王玲完完全全符合当时青少年的品德标准：诚实听话，成绩优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佼佼者，当着中队主席或班长。

岳父母在军队医院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与子女团聚，王玲从小养成自立的习惯，早早学会生炉子，买菜做饭，洗衣服，甚至照料刚会走路的妹妹。在八岁时，王玲扁桃体发炎，发着烧一个人走了几里路到妈妈所在的八五医院动手术，然后再一个人走回家，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常年的家庭影响养成了她坚强，独立的性格，这个性格伴随了她一生。

（5）

然而，就在岳父母以为不断自我改造，自觉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已经融入革命大家庭的时候，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造反派不想一一甄别你的思想究竟改造到什么程度，一概打入十八层地狱：岳父作为二十一种人被勒令参加学习班，后又送去郊区养猪。岳母则早晚在医院里，夜里也不能回家，家中只剩一帮孩子！幸而她们早早自立，料理家务已成习惯。

终于熬到一家人团聚时，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姐姐去了安徽无为县蜀山区，王玲去了吉林双辽县，一个紧挨科尔沁草原的地方。这里提一句，要说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的话，唯一的好处就是上山下乡把王玲发配到了吉林省双辽县向阳公社合作八队的沈家屯。而我，本来报名是去内蒙的，后学校硬让我去云南或贵州，母亲不同意，最后阴差阳错地也被发配到与王玲同一个屯子，千里姻缘就此拉开序幕。

中国有句成语谓“矫枉过正”，岳父在思想改造方面，简直比打天下，坐天下的人还有过之无不及，他们高频率地给王玲寄信和各种简报，全是要她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紧跟中央部署，诚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私批修，做又红又专一代新农民等等。这些玩意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玲，她果真花了很多时间认真去看《红旗》，读社论，硬要从自己思想里找出“私”字、“修”字，然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一番。我在乡下时一点也不知晓这些，全是后来从她的日记中看到的。林彪事件以后，她幡然醒悟，逐渐摆脱她父母的说教，挣离束缚思想的藩篱，开始自己的独立思维，特别是上大学以后。

在与她相恋的最初几年，我们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其中最强大的阻力来自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以及她的叔叔和姑姑，即遭到她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反对！

在她父母的发动下，所有的人都写信给王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对与我交往，甚至连她几岁的妹妹也上阵了。记得他弟弟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张纸的劝谏书，以三字经形式写的，现在读来依旧有趣。结婚多年后，王玲的小妹对我说，她其实一点也不反对二姐与我交往，当年全是父母动员她表态的。

她们全家在竭力反对我们恋爱的同时，紧锣密鼓地为王玲在邻近上海的城市为她寻觅对象，简直有病乱投医，到处托人，逮住一个就写信给王玲，让她有机会去相亲。记得岳母同事有个亲戚，是南京的一个工程师，大学毕业，王玲父母觉得很合适，南京距上海不远，结婚后就可以调到南京。于是全然不顾这个工程师比王玲大十几岁，写信让她回家探亲时在南京逗留。

她父母还费尽心机，双管齐下，写信给女儿细数我的种种不是：工人、兄弟姐妹多、没有学历，特别是思想也不好。那个时代，似我这样的知青，哪来的学历？至于认为我思想不好，倒是有缘由的。

我曾在给王玲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段话，百里外辽源市的王玲没有收到这封信，信居然被人转寄给千里外上海王玲的父母了。满是革命思想的岳父见到普希金的诗句，顿时大做文章，连连写信给王玲，说我思想有问题，崇拜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记得他跟王玲说：知道普希金是什么人吗？他美化贵族统治阶级，宣扬爱情至上，丑化革命运动领袖，已经被批倒批臭，这个人引用普希金的诗句，说明他的思想很不健康！看来，我这个准岳父也是读过普希金的，可能读得比我还多，否则何以知道普希金，此时不过借题发挥罢了。

注（1967年，《公安六条》发布，还规定了一个“二十一种人”，将当时的所谓“坏人”一网打尽：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政、警、宪、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6）

家庭的施压使得她不堪负担，特别是她最疼爱的小妹的苦求，更令她不忍心回绝。难道自己这一步是走错了？她在思考，在彷徨……

我与她分别在两个城市，虽然相距不远，但难得见面，唯有鸿雁传书，此时她除了家庭的压力，还有其他烦恼事缠绕着她。

或许她待人太真诚，热心，或许她太单纯，质朴，一些人对她颇有好感，也有人执着地追求她。

某某是车间的团支书，在当时，应该属车间年轻人中的佼佼者，经常找她谈工作谈思想。旁观者清，那些都是由头，目的不说也看得出来，车间里的师傅们也愿为他作伐，班长就曾跟王玲提起过，认为她应该考虑。王玲对我

讲过此事，说如果我们不是相恋在先，她或可能动摇，闻此我虽心有醋意，但并没有感到威胁，我知道即使王玲有意，她父母这一关也是万万过不去的。后该团支书被推荐去上大学，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一个是比她大得多的师傅，平日里这个师傅文质彬彬，很有城府，明显不同于车间里其他的大老粗。他也经常找王玲说话，嘘寒问暖十分关心。王玲在信中曾跟我介绍过这个师傅，说人很好，也谈得来。后来这个师傅的态度让她警惕起来，这个师傅常常抱怨自己的婚姻多么不幸，与妻子如何如何没有共同语言，几次三番邀请王玲去他家作客，王玲一再拒绝，始终不接受邀请，渐渐对他敬而远之，不再来往。

她们一起进厂的上海知青男男女女有二三十个，不少男知青与王玲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萌生情愫，而他们在空间上优越于我，天天可以接触往来，这才是我担心的，万一日久生情怎么办？这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正有一个知青热恋着她，几次明确向她表示要建立恋爱关系，他孜孜不舍追求了有一年左右，此事在车间乃至全厂传得沸沸扬扬。

论条件，那个人不比我差，而且占了地理、人和的优势，然而他缺了天时这一重要因素——晚了一步：王玲拒绝了他！

所以烦恼，因为许多人以为他们已经在恋爱，尽管王玲一再解释、澄清，却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一些人仍以为她见异思迁，是个负心人。

那时谈恋爱都是“地下”的，没有人敢公开说自己恋爱了，更不敢两个人大白天去逛马路，看电影，所有行为都是悄悄地，秘密地进行。我极少去她所在的城市，更不用说她所在的工厂了，即使去了，也是在另一个同学处相聚，躲躲闪闪像做贼一样！所以王玲周边的人包括追求者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她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已经有恋人了，但人家以为是托词，不相信是真的。

她烦恼着，远隔百里外的我也烦恼着，因为有一个辽源来的痞子，也是上海知青，当作我的面说着侮辱王玲的脏话。那天在我的寝室里：

“他们说你有同学在辽源？哪个厂的？”辽源来的痞子问。

“是的，在制泵厂。”我不认识他，更不知道是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就答道。

“叫什么？”

“王玲”

“噢，我认得的，拉三，我白相过的。”这家伙嬉皮笑脸的。

那时，我正捧着饭盒吃饭，闻听我扬起饭盒，连饭带菜朝他砸去，幸他身手敏捷，侧身躲过，冲过来要与我打架，被一旁的知青拦住。

后来有人告诉我，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王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信口开河罢了。热恋中的人可能容易冲动，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去中伤她，何况如此出言不逊，当时我想都没想他说的真假，也没有思忖能否打得过他，就怒不可遏地发起攻击了。

事后，我真的有点纠结了，她不在我眼皮底下，一直与她接触不多，所有了解多是信件来往而已，她到底怎样？我觉得自己应该多走动走动了。

（7）

尽管如此，我对她没有丝毫怀疑，相信她绝不会把感情掰开一分为二，如果她认准的事情，或与哪个人交往比我更合适，感情基础更牢靠，她会向我直言道出而不会脚踏两只船，只要她没有说，足以相信她对我的专一。再者，我的信条是：如果她不爱我，只要她哪怕一点点表示，我都会退出，绝不会死缠烂打，这点绅士风度还是有的；如果有人横刀夺爱，或欺负她，侮辱她，则绝对不能容忍！

我虽没有把上述事情放在心里，但和她一样在为她家庭的阻挠而烦恼，她也为此频频落泪，郁闷在心。她在日记中写道：

……远方的亲人，你们爱我，我知道，但你们不了解我，不了解我所了解的人，你们这样的看法多伤我的心，更何况是他……

……姐姐来信了，当然她的好心我领了，道理也未尝不对。然而她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感情……

……收到家里来信，与小姑姑来信内容一样。对于他们的好心我应当感激，但是却不能同意他们的要求。可悲的是弟弟的《谏客词》，使我四面楚歌，十分孤立……

有时，她一天会收到两封这样劝说的信件！

摘抄这些日记的时候，我眼睛湿润了，妻子顶着如此巨大压力坚持相恋与我，而我无能也无法与她分担丝毫，实在有愧！

大概爱情来得似乎容易了些，所以要历经磨难才行，那么，就让我们共同来抵抗她家里的压力吧，我们决定这年春节一起回上海，我决心踏进她的家门，看看是怎样被扫地出门的吧！

没有料到的是我们这次回上海后，竟然峰回路转，负担尽释，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我成了她家的座上宾，我天天踏入她家大门而没有一点忐忑。

王玲的奶奶一向住在大儿子即王玲的父亲家，偶尔去大女儿家小住，她大女婿即王玲的大姑丈部队转业后，安排在浦东川沙县一个中学当校长，大姑一家就定居在川沙县洋泾镇里，我们回到上海时，奶奶正在浦东。她知道王玲回家探亲了，急于想见孙女，但因年迈且视网膜剥离，加之小脚，不能自己出行，那时浦东浦西虽一江之隔，犹如两地，既无隧道又无桥梁，仅靠轮渡交通，奶奶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

王玲对我说去接奶奶回来，用三轮车去接！

四十多年前出租车很少，都是些办公事的人才坐，一般人也坐不起，何况横着一条黄浦江，汽车过不来。骑三轮车去接倒是最为理想，可哪儿来的三轮车呢，再说我从来没有骑过这玩意，从沪西骑到浦东的川沙能行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过浦东呢。

她主意既定，竟然从居委会借到了一辆带蓬的三轮车，就是四、五十年代遍及上海滩那种人力车。次日上午，在她的激励下，在清晨的薄雾中，我骑着三轮车，她坐在后面，我们意气风发地向浦东出发了。

若以中山公园为起点，到浦东川沙的洋泾镇至少要骑车二十公里，其中还要轮渡过江，此行可谓艰辛。但那时我干劲冲天，凭着直觉，一口气就骑到十六铺码头，顺利过江。彼时的浦东还是一片乡野，蚕豆花开，麦苗青青，一路骑来也是十分惬意，中午赶到了她大姑姑家。

吃完午饭，姑姑要我们多留会儿，一是难得见面，二是让我休息一下恢复体力，待一切准备停当出发时已经下午三点过后。

等我骑了六、七公里路气喘吁吁赶到轮渡码头时，最后一班轮渡已经关闸，停止上客！渡轮眼看要离岸。呵！过不了江，意味着我还要把车骑回姑姑家，住一晚上，第二天再骑过来！我受累不算，奶奶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折腾啊！情急之中，我跳下车，奔向码头对工作人员喊道：“车上坐的老奶奶是盲人，请你们关照一下！”工作人员闻听后，居然开闸，放我们上船了！

一天的劳累，对年轻的我而言，稍加休息即可恢复，而这一天劳累换来的收获却是享用终生的，奶奶对我的评价是：人蛮好的，脑子也灵活，不抽烟，不喝酒。在她眼里，抽烟喝酒的就不是什么好人。

得到奶奶的认可，反对的人再多也无济于事。首先，小妹已经被我的梨膏糖收买，老是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弟弟刚刚工作且苦攻外语无暇顾及，姐姐在安徽乡下更鞭长莫及，尽管她父母没有明确对我表示好感，但见面还是客客气气，不像信中那样把我当做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了。而奶奶每见我就一口浓厚宁波方言与我说这说那，我似懂非懂一味应承，所以奶奶很看好我。王玲见状也很是欣喜，说“侬门槛倒蛮精格嘛！”

其实非我“门槛”精，似乎这些都是顺水行舟，天意使然，骑三轮车去浦东接奶奶，实在是天赐良机啊！

家庭的阻挠基本消解，回到东北后，我们的来往愈加密切了，这年冬天，她来四平过春节。

那时我还在车间当工人，十个人住在一间小小的寝室里，她来了吃的尚可解决，住的就很为难了。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我师傅新翻盖了房子，他家只有他和姥姥两个人，有个里屋可以腾出来。于是和师傅商定，王玲来了住他们家那间里屋，师傅和姥姥住外屋。其时，师傅仅比我大两岁，尚未有女朋友，按说不应该把自己的恋人安排他家去住，可那时走投无路，住旅馆需要介绍信，不是探亲单位里绝不会开给你。再者，我相信师傅的为人：朋友妻不可欺，东北人这点义气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委屈了王玲，她来了之后，我将攒下的肉票买了几斤肉送到师傅家，算是一点心意，其他也拿不出什么。而招待她的第一顿饭，是在一个实验饭店里吃的，至今还记得，几个冷的糖三角，一盘干豆腐炒土豆片，一盘洋葱炒肉，所谓肉是几片嚼不动的肉皮罢了，再有一碗甩秀汤，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勾了芡的蛋花汤。就这些已经比我平时的饭食要好，平时天天吃的是窝窝头，白菜汤，烀土豆，缺油少盐吃了就烧心。

最为烦心的还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悄悄话的地方，总不能让宿舍所有的人都回避吧，人家还有上夜班的呢。于是只好去马路上逛，怪不得那个年代情侣们都一对一对的遍及大街小巷，外滩几乎成了情侣滩，原因就在于百姓住房逼仄，情侣们没有可以耳鬓厮磨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四平市，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大多坑坑洼洼满是泥浆，路灯暗暗地似鬼火一般，走在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弄不好就会把脚崴了。

那天傍晚，逛到地委附近，见公园的门开着，就走了进去。由于天冷，没有几个游客，我们转了一圈，在一个干净土坡上坐下，亲亲热热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公园里十分安静，偶尔有一两声虎啸，在公园一隅养着几只老虎和黑熊等动物。听到远处军营传来“滴滴嗒滴”的号声，是熄灯号吧？我们这才发现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于是两人起身想离开，此时听得身后一阵喧哗，有人在嚷嚷：“再往里走走，我看见他们进来的……”只见手电光在乱晃。

他们不会是在找我们吧？我连忙拉着王玲蹲下，再顺着土坡滑到坡底，两人半躺在土坡上，一动不动。土坡那边的光柱扫了过来：

“没有，这儿没有，我说早出去了吧。”

“到坡后看看……”

“算了吧，回去……回去……，别让狼把你掏了！”

这个公园真的有狼，不过是关在笼子里的。

这群人吵吵嚷嚷地走了，我深深吸了口气，与王玲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朝公园大门走去。

然而，要想走出公园却没有那么容易，走到公园大门口时，发现大铁门紧闭，那高高的栅栏上是尖锐的铁枪头，根本爬不过去。此时我想起公园还有个后门，又矮又窄，说不定还开着呢。两个人在黑暗中穿过公园摸到后门，一看也是关着的，无奈我先爬上去越过栅栏，再鼓励她学我一样爬过来。她那时年轻倒也不惧，可就在越过栅栏最后一跳时，只听得“哧啦”一声，外套被铁栅栏上的枪头挂出一个大口子。她头一次来四平看我，搞得如此狼狈，我感到很内疚。她脱下外套检查了一下，安慰我说“没事的，我回去能补好”

（9）

按理正当恋爱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方方走出来说明情况即可，没有必要鬼鬼祟祟躲起来，像小偷似的。可那是个不讲理的年代，被这帮所谓“群专”或民兵逮着，肯定被绑着押解他们的司令部，然后就是审讯，录口供，起码要消遣你到半夜，反正他们无所事事。即使认可你情我愿在谈恋爱，也一定要第二天让单位来人签字画押领回去，如此单位里定会传得沸沸扬扬，传到最后说不定就是“搞破鞋”被抓了。

这个是有先例的，在早，我们厂有一对恋人被抓过。两个人本来就是正常恋爱，无可非议，但一天夜晚在僻静处亲热时，被巡防的“群专”逮到总部审问，后通知厂里派人领回。此事很快谣言四起，两个人在厂里抬不起头来，其中一个很快调离，结果这对鸳鸯最终被拆散。

“群专”意即群众专政，是依附于“革命委员会”下的组织，文革的产物，它无所不在，遍及全国各个大小单位。主要职能是甄别、审查、治安、纠察，拘禁、隔离、审问等等，它几乎集行政、公安、检察、司法的一切权力，以革命的名义裁决一切。“群专”里大多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骨干和打手，作恶多端，当时老百姓闻风丧胆。

对我来说即使抓了，传了，没有什么损失，无甚要紧，而对王玲来说后果就比较严重，因为她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所谓培养对象，正在积极争取她入党呢！

她一厢情愿地努力着，无论工作、学习。她是车工，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先进工作者的大幅照片挂在厂门口的宣传栏里。下班后还要认真阅读父母从上海寄来的各种学习资料，当时的上海是所谓“一月风暴”的策源地，所有能够印成铅字的东西无不表现为极左，学习这些东西其实是误入歧途！可当事者迷啊！她的入党报告打了好久，组织对她考察了又考察，甚至还专门到上海搞了外调，就是入不了党。她哪里知道，有个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又是反动军官的父亲压在背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让她混进党内的，再努力也是枉然。

车间和工厂领导明知这一切，还一味地鼓励她努力……争取……，她也一心以为自己做得不够，还要继续上进才行。在领导眼中她是积极上进，而工友间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在给我的信中她说“似乎上下道工序的师傅对我都有看法，以为我是假积极……”，她为此苦恼。是啊，在流水作业的车间里，她的产量高了，给前后两道工序的压力增加了，人家的不高兴可想而知。

她曾想改造我，因为我给他信中表露的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基本属于“负能量”，与她父母的说教格格不入，有时我揶揄她：你说爱看《红旗》，是不是要我说爱唱《东方红》啊？为此她气恼不已。

那时的她犹如一张白纸，从小受父母和学校的“正统”教育根深蒂固，接触不到大千世界，把那些说教当做天经地义的真理，她固守着自己从小就形成的信仰和理想，为之努力，为之奋斗，要想改变她，除非整个社会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政治、思想、社会秩序都要予以拨乱反正！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一个社会变革和拨乱反正的时代来到了！

注：“一月风暴”称呼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被称为一月革命。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并由于毛泽东的赞扬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10）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她父母立即来信让她报名参加考试，并寄来了复习资料，我也分享了其中一部分，我们各自在当地报了名，开始复习。说是复习，其实就是新学，初一还没有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所有学校停课，一阵疯狂过后就统统被撵到乡下去，知识青年哪有什么知识啊！

我漫无目标地复习着，感兴趣的就多看，比如语文、历史和地理，不感兴趣的则一看就困，比如政治、数学、几何。在车间里日夜三班倒实在累人，再要背公式定理、原理概念和年代事件等，弄得晕晕叨叨的，复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教王玲，她信中片言只字，到底应该如何复习我还是不得要领，总之觉得她比我用功得多。

考试成绩出来，两个人都进入分数线，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分数要高于录取分数线四十多分，我们都接到体

检通知，填了政审表。

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惨——双双落第！

我没有被录取情有可原，因为成绩高出录取线不多，而王玲要高出四十多分，理应录取的啊？她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最后打听出来：政审没有通过！

和入党一样，父亲的历史问题依旧是背在她身上的黑锅。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出身有问题的人不予录取，为什么还让人报名参加考试，这不是作弄人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人帮”虽然倒了，长期形成的极左思潮还存在，阶级斗争理论还在鼓吹，家庭出身仍然是招工、招兵、入党、提干等的首要条件，招生也不例外。

高考的失败令我十分沮丧，决定就此放弃，而王玲又开始复习，准备下一年的高考了。我认为既然因为家庭出身而不予录取，这个出身又是不可改变的，明年考试成绩再好，还是要碰个头破血流！我怕她承受不住再次打击，写信劝她放弃，她的回答十分坚定：绝不！她还嗔笑我“放心吧，考上大学也不会嫌弃你的”。

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她又报名了，第一志愿填兰州大学，她认为兰州比较偏远，报的人少，或能够录取她。可见，她想上大学的愿望多么强烈！

复习期间，我每到辽源去，最多的活动是帮她背政治和历史复习题，我看着资料，她一道题一道题地背，我把她背错或背不出的题目作上记号，她反复温习后再背，一般最多两三次就滚瓜烂熟了，我不堪其烦，她乐此不疲。

怪不得她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原来这样刻苦啊，我绝对做不到，我理解的大多能记住，不理解的再背也记不住。

发榜后，她并未被兰州大学录取，而是接到了四平师范学院（现在的吉林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不是第一自愿，但她和我都十分欣喜，她喜的是终于踏进大学校门，我喜的是她终于来到我的身边。

一个星期天，我起床不久，门口轻轻地出现一个人，她敲了敲开着的门。我定睛一看，是她！她的意外地出现令我惊喜，有点迷茫，她怎么会来？这才想起她已经在四平读书，而不是在百里外的辽源了。

她也曾有过类似的迷茫，她在大学报到后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到了学校，安排妥当后第一件事就想给他写信，之后当然就哑然失笑——已经在一个城市了，怎么还改不了老习惯？

这是她来四平上学后的第一次见面，距开学已经半个多月，想必一切已经安排停当。她兴奋地向我介绍学校里遇到的人和事，选的什么课，寝室里有几个人，食堂伙食怎样，叨叨不绝，新的生活使她振奋。然后跟我说，明天

带上

工具到她们寝室里去，把日光灯修一下，老是一闪一闪的。

晚上送她回学校，从我宿舍到她学校有四五公里路，公交车已经停了，我们走在郊外的马路上，一旁是黑幽幽的沙果树林，树枝上还挂着零星残果，另一旁是连绵的黄豆田，黄豆已经收获，空有一簇簇干枯的黄豆秸，路灯少且暗，没有行人。那晚我心情不好，一路很少说话，因为她要我开始复习，准备次年报考大学，我想她会不会因为我是工人，她是大学生，感到两个人不般配才劝我报考的，如果再考不上呢？她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快，默默不语。

七八级学生入学是十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当走近学校时，天上纷纷扬扬飘起雪来，这是那年的第一场雪。大雪带来些许喜悦，我们在雪中又徘徊了一会，走到校门口，我让她进去，想目送她进宿舍大楼，就在她要转身的时候，突然踮起脚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在雪花飘飘中转身走了。

顿时我心里暖暖的，郁闷、惆怅一下子甩到爪哇国去了，我知道，她的这一吻是想让我放宽心：不要多想，她会一如既往的爱我！

（11）

为了如她所愿，我就此秣马厉兵，开始了下一年的高考复习。两人再三斟酌，决定还是报考冷门：东北这地方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会俄语和日语的多，会英语的相对较少，决定报考英语专业。方向既定，她让上海寄来复习资料，我又开始经受痛苦难熬的苦读时光。由于在一个城市，她每个礼拜天都会来宿舍监督我复习，架不住她相逼，只好按她的方法死记硬背，甚至半夜守着轰隆隆的机床还在背单词。

经过一年半的磨砺，我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吉林师大（现为东北师大）英语系。高考成绩一公布，我喜出望外，无论是总分还是英语单科成绩，均远在录取分数线之上。体检时，发现这年四平地区报考外语专业上线的考生只有六人，其中五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是唯一的工人，成绩排在第二，看来，这次稳操胜券。

体检当然没有问题，在填政审表的时候，有人提醒我少填两岁，因为我那时已经27岁，在考生中属年龄偏大的，他们说没有事，还说前两年厂里考取的几个都少填了岁数，学校只认单位里的公章。正在犹豫，王玲告诫我不准隐瞒年龄，一定要如实填写，诚实比什么都重要；二是没有必要，这个成绩肯定录取。再说七七、七八两年招生，都没有年龄限制。她说得在理，我如实填报了年龄。

她恪守诚信的执着源于父母。她父母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加入解放军的，在后来的履历表上，为了纪念那个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日子，双双把十月一日作为参加革命的日子，因此在退休时不能享受离休待遇。一起整编为

解放军的同事、战友知道后，让他们去找组织改正，认为这事可以说得清楚的，但是岳父母就是不肯去，说表格上的时间是自己填的，自己负责。因此，他们失去了优厚的离休待遇，特别是岳母，作为部队正营级教官，在文革时与普通战士一样复员，到工厂当了一名厂医，收入不及她学生的一半。后来军队复员干部一律改回转业又把她漏掉，她闻讯后，竟安之若素，不去争，不烦恼，尽管每月要少拿两三千块钱。

她父亲更是在认真和诚实方面有点出格，由于认真，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一直搞不好，以致失去好多机会，最后在病理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关于他的认真，上海市病理学会的一个同行专门写了文章发在他们的专业板块上，读来让人忍俊不止。具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后，一度黄埔校友会的袍泽很活跃，在社会上享有盛誉，许多人以黄埔出身为荣。有人拿着表格找岳父，让他填表，这是专门给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填的，多少人求之不得啊！岳父说“我又不是黄埔军校的”，他拒绝填表！其实，他毕业的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那时属于黄埔军校的军医分校，所以校长也是蒋介石，只是岳父一心做学问，不知道罢了。

王玲完全继承了她父母的秉性，无论工作还是交友，把认真、诚实看得极为重要，并持之终生。

可命运再一次作弄了我，直到大学纷纷开学上课，也没有一家学校给我发来通知书！托人到吉林师大去询问，告知：如果报考的是别的专业早就录取了，而这年外语专业他们录取年龄内控在25岁以下！

我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我没有怪她让我如实填报年龄，她也没有为此内疚，诚实是她做人的一贯准则，虽然都在为我的再次落榜难过，但这不是我们的错。落榜之后，她到处写信，打电话，询问有无补录的可能，哪怕大专、高师……

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她为我安排了另一条路：自学。

（12）

当时上海出版过一套《青年自学丛书》，门类比较齐全，她父母几年前就给她寄来了，有写作，语法，修辞，数学，几何以及哲学和历史等等，她挑用得着的都给了我。那时社会刚刚从动乱中走出，百废待兴，许多学校在恢复，一些新建的大专院校也似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教材和教辅都没有同步发展，一时洛阳纸贵，很难弄到实用的教材和辅导材料，王玲给我的这套丛书派了大用场，不仅自学时用，在不久后到教育科当老师，它们还是我现学现教的重要依靠。

正是有了两次高考的经历，厂里在成立教育科，选拔教师的时候，被筹备组看中，一纸调令，把我从一线车间调入新成立的教育科，以工代干，成了专职教师。自此，我在厂里给工人当老师，她在宿舍里给我当老师，在文

学，古文，修辞和逻辑方面辅导我，得益颇多。我经常跟她开玩笑“你们上大学的都是文曲星啊”，她认为我是讽刺她，立马反唇相讥。

就在调入教育科这年，厂里在北山坡为已经登记结婚的青年盖了不少小平房，凡登记结婚的都可以申请，这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机会，当然一定要抓住。在她放寒假时，我请了探亲假和她一起返沪，在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了结婚登记，回到厂里，立即递交了住房申请。

我分到了一间小平房，虽然只有16、7个平方，屋里屋外各一个大坑，王玲和我都十分高兴，她每个礼拜天都过来帮我收拾这将属于自己的窝。我们把坑填平，墙壁刷白，地上铺了红砖，还让上海买了一套家具托运过来。

觉得收拾的差不多，可以住人了，我们请了住在左右隔壁和对门

的三个比较要好的工友，弄了点酒菜，对他们说，今天我们结婚，没有仪式，你们就是证婚人。

这天是一九八一年元旦。

我们的生活节奏还是和以前一样，她周日早上过来，晚上我送她回学校，只是路更远了，有十公里之遥：从市区最北端的城乡结

合部，走到最南端的城乡结合部，每每送她回来，已经快半夜了。

不过，我们一路走去并不觉很远，因为她总是拿些题目来与我探讨交流，比如形式逻辑里的推理公式，英语中的句型、时态，要不就是古文、修辞、训诂或文选等，总之，她把学校里学到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一一“盘点”，似乎让我也沾点“文曲星”的仙气，受一点大学氛围的熏陶。事实证明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但大学里的氛围、环境甚至他们同学之间的关系，我似乎亲身经历一般。

上世纪八〇年前后，拨乱反正成效显著，反思文革，清算“四人帮”呼声高涨，随之而来的伤痕文学受到极大的欢迎，大学校园里思想更是空前活跃，禁锢多年的报刊、杂志、书画、电影首先在大学校园里得到解放，一些翻译作品重又回到图书馆的书架上。对王玲来讲，犹如在她的心灵上打开了另一扇窗，窗外是一个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世界，短短一年多，她的价值观有了极大的变化，不再幼稚、轻信，回过头来反省当年，自己也觉得好笑。她在日记中写道：

……有人把群众的民主要求，一概说成“资产阶级民主”，好像只有资产阶级讲民主，而无产阶级是讲专政的，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却说有“大救星”……

就这些思想，在她上大学前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时只要报上登的她都相信，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而现在，正与我这个“思想有问题”的人的思想日趋接近，真正有共同语言的日子初见端倪。

（13）

回想那个时候，小窝尽管简陋寒酸，因为她的到来，每个休息日都是我最开心的日子。然而心情虽好，物质生活却是那样的贫乏，我没有能力买到更多的肉、蛋、鱼和其他食品，她的油粮关系在学校里，这仅我一个人的定量，即每月半斤猪肉，一两半油，一斤大米和一斤面粉，其余就是玉米粉和高粱米了。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

最惨的时候，我们一整天就啃几只面包，然而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似乎觉得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她可是从小就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她跟我说过，大家都说三年困难时期日子怎么怎么难熬，她一点也没有觉得，因为父母享受着部队的配给，日子相对好过得多。看来，跟我同甘共苦需要有思想准备。

春天，东北蔬菜少且贵，我们因长期吃不到新鲜叶菜而缺少维生素，口角出现溃疡。她说学校周边的沙果林里有许多似荠菜样的野菜，是不是剜点回来吃着试试，说不定和荠菜一样可以吃呢？我们壮着胆子试吃了一回，虽然此野菜没有荠菜那样的鲜味，倒也鲜嫩，既不苦涩也无异味，于是便放开胆子食用起来，她每个周日都带回一包，或炒或煮，帮我们度过了春荒时节。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吃过的野菜叫什么名字，什么纲目、属种。

房前有个小院子，别人家把院子铺上水泥或砖头，我则种满了花草，有夜来香，凤仙花，西番莲和大烟花，整个春夏都花枝摇曳。她也十分喜欢花草，我们无事便在院子里闲坐，别有一番情趣。

道是王玲百般的好，其实她不是没有缺点和脾气。成家以后，我发现了不少过去我尚未了解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洁癖：所有盛装食物的器皿用具，都必须将手消毒以后才能碰；所有外出穿的衣裤都不能直接坐在铺上，必须换上家里穿的才行；来客用过的茶杯，碗筷都要煮过才能再次使用。还有其他细微之处，如拿过钱币一定要洗手，开关，门把手等都须酒精擦过等等。初时很难适应如此约束，时间长了，一点点被她改造过去了。

另一个缺点就是固执，她认定的事情要改变几乎没有可能。婚后大概不到半个月，我为了说服她不要那么固执，也算作一个测试吧，我举起一只玻璃杯，问她：“我敢不敢摔？”

她回答说：“不敢！”

“到底敢不敢？”

“不敢！”

我把杯子往地上摔去，她愣住了，随后大哭，说我这是给她下马威，反正已经结婚，不怕离弃了，是个中山

狼！

其实，我哪敢真的摔杯子，那是新产品钢化玻璃杯，号称摔不碎的，我一是想让她惊奇一下，二是让她不要如此固执，没想到事情搞砸了，非但没有说服她，反而向她道歉了好几年！

不过她的这些缺点别人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哪怕长期来往、共事的朋友和同事，因为她对我如此，对别人并非这样。

家里来客人，她不会要求人家洗手消毒什么的，一切如常；有人习惯地往炕上一坐，她也没有任何表示，依然笑脸相待。等人家走后，则忙不迭地消毒，蒸煮，无法消毒的就拿到院子里放到太阳底下去晒，这么多年，她一贯如此。

说起脾气，有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她脾气到底如何？

婚后不久，母亲领着我外甥女从上海来看我，为了款待她们，我们攒了有半年的细粮及油票、肉票。一天，家里包了许多肉和白菜馅的包子，那个年月算是难得的，才八岁的外甥女觉得好吃，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肚子撑得滚圆。王玲见状怕丫头撑坏了，就让她不要再吃，劝道："晚上再吃，给你留着"。

小丫头不听，还犟嘴。此时母亲帮外孙女说："小孩子，她要吃就让她吃吧"。

王玲转而让我这个舅舅说服外甥女，而我决定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中立，不置可否，她来了脾气，板着脸，放下饭碗一语不发就出门去了。

（14）

母亲有点担心了，让我去追她，我想她充其量是回学校，安慰母亲说不要紧的，本来她晚饭后也是要回去的。

没曾想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把买来的新鲜蔬菜，随后帮我一起下厨做饭，一边跟母亲和外甥女说话，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晚上我送她回学校，问她，她说当时是很生气，出去山坡上转了一圈气就消了。当然她不会轻易放过我，说早知道如此和稀泥，就不嫁给我了！

她就是这样的人，不记仇，不给人难堪，所以我母亲及兄弟姐妹都跟她很合得来，弟弟妹妹都称她姐姐而不是嫂子。她善于自我排解，常说"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因此在她一生中没有值得耿耿于怀，排解不开的事。

母亲来东北期间，我比较忙，白天厂里备课上课，下班买菜做饭，晚上厂里还要轮值，不知怎地就得了阑尾

炎。那天在厂里值班时肚疼难忍，请假回家挨到后半夜疼痛愈烈，就自己骑自行车赶到医院，一化验白血球严重超标，医生说马上住院。此时疼痛未消却又增添了纠结：母亲和外甥女一老一少，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都有问题，让她们留在家里我如何放心？

王玲闻讯后从学校赶来，告诉我只管养病，她已经向学校请假，家里的事情全由她来照料。在我住院的半个月里，她两头跑，一面安排好母亲她们的生活，一面抽出时间到医院陪护，特别是手术后疼痛难忍的两天，她一直守护在我的床边，给我莫大的安慰。翻看她的日记，知道那些日子她是多么焦虑、辛苦；我病愈后她又是那样地欣喜、开心。所有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这年初冬，雪下过了，地上冻了，人们已经穿上棉袄。那天我早早赶到办公室，打水，生炉子，赶在科长和其他老师上班前把屋子烧得暖暖的。此时，王玲突然从学校来了，她裹着围巾，脸被冻得红通通的。我好生奇怪，怎么早到厂里找我？

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她看看屋里没有人，轻声说：“我可能怀孕了！”

我有点发懵，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我们没有打算现在要孩子，关于生育方面无任何计划。首先她正读大四，明年就要毕业，不可能挺着大肚子去实习，去论文答辩；其次我们的生活环境不适合孩子生长，我们也没有做好抚育孩子的思想准备。

她问我怎么办？我一时难以回答，考虑到她的学业，不应该要孩子；考虑到年龄又应该要孩子，毕竟都二十八、九岁了，既然有了就顺应天意吧。不过，我还是想先知道她究竟怎么想的。

“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我说。

“如果是真的呢，要还是不要？”她看着我的眼睛。

“唔……这个……”我吞吞吐吐。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她一定要我回答。

“如果想……正常毕业……，好像……最好……暂时不要，不过……”我还是吞吞吐吐。

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不是在办公室可以讨论的，马上同事们就要上班了，我让去家里，下午请假回去好好商量，她说不用请假，等想好了告诉她，随即一脸愠色和委屈回学校去了。

后来知道，那时她很想听到我斩钉截铁地说一声“要”，这样她便有勇气面对怀孕所带来的一切麻烦，克服种种困难哪怕休学也要把孩子生下来。而我何尝不想要孩子，只是为她考虑，怕耽误她毕业和日后的分配。我的担心

被她看着是优柔寡断，所以她感到恼怒和委屈。

她走后的第二天，自己去医院做了妊娠检查，报告是阳性。

礼拜天她回到家，一语不发把报告给我，似乎是给我一张最后通牒：何去何从，你选择吧！

（15）

（我与妻子相识，相恋至一起生活足45年，情投意合，晨夕与共，如今先我而去，悲痛欲绝，种种追思、怀念，难免溢美，当属常情，还请各位谅解！）

她认为，学业和毕业分配比起孩子来说都是次要的，能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的孩子才是头等大事，于是两人达成共识：申请休学一年，回沪生孩子。

既然要孩子，要一个健康的孩子，对产妇来说营养要跟上，而八十年代初经济虽稍有好转，一切还是凭票证供应，想要给她吃点好的很困难。唯有走街串巷卖豆制品的小贩，他们用从农村换来的黄豆做成豆腐和百叶，沿街大声吆喝“豆腐哦……”，闻听我便会去买一些，回来和白菜或萝卜炖一锅，王玲吃得不亦乐乎，所以她常说女儿全靠吃豆腐养出来的。

为给她增加营养，我还养过几只母鸡，可零下二十多度不能放在室外，只能关在室内的笼子里，母鸡生蛋倒是挺勤，因晒不到太阳，生下的大多是软壳蛋，没有等我们发现，就已经被它们自己分而食之了，只好作罢。

寒假她只身回上海生孩子去了，岳父母答应全力照顾她，所以我也安心，那时候兼课多，请不出假陪她。

这个冬天孤身只影很难熬，家里冷清清的。过去虽然她只是周日回来，偶尔功课不多时也会提前一天回家，有时下班还没有到家，远远的就看见自家窗子透着灯光，心里一阵欢喜：她回来了！而这个冬天不会有奇迹出现了，她预产期是4月28日，生完孩子还要哺乳半年，如此要在上海待上十个月的时间，那是何等漫长的十个月啊！

我们又开始书信往来，内容大多是关于生产的事，知道已经联系了长宁区妇产医院，这个医院距她家不足两百米，紧要关头送医院十分方便，闻讯我很是笃定。岳父母还从亲戚家讨来票证，多买肉买鱼给她补充营养，母亲时常叫弟弟送去几只鸡，她十分疼爱这个儿媳妇。

眼看预产期将临，书信来往格外地多了起来，上班时一天跑传达室几次，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反正没有什么家务，时间大多花在纸上，细细叙述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祝福。其实，我心中的担心一天比一天增大，总是怕有万一：怕流产，怕难产。

反馈信息也算及时，诸如岳母已经准备好多少尿布，隔壁借来了摇篮，谁谁送了学步车……，这些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只想知道她顺利分娩的消息！

“房前栽的杨树发芽长出了叶子，我们的孩子也该出生了，我不相信什么兆头，这回让我相信一次吧：杨树的发芽长叶就是孩子顺利诞生的好兆头！”

以上是我在那年4月25日写下的日记。

然而，从4月20号到5月2日这近半个月里，我没有接到一封来信，或许住院了？或许生了？不得而知。

5月3日来信了，信中非但没有好消息，她还揶揄、嘲讽了我一番，对我不请假回上海陪她甚为不满。按说妻子生产丈夫应该陪在身边，何况一个厂教育科的教师，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自知理亏只好忍气吞声。

可我真的请不出假来。

1982年，根据教育部发文，全国开展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补课，即所谓“双补”，厂教育科首当其冲，我除了每日上课，还要安排课程，组织学员听课。特别是“双补”要参加全市统考的，只有考试合格才能发给国家认可的高中毕业证书，统考之前，单位所在的冶金局为保证及格率事先还组织全局的预考，我负责语文卷的出题和判阅。再者全市统考在即，我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可能请假回上海陪妻子！

5月15日收到来信，没有生产，已经住院观察。

房前的杨树是开春新栽的，本已经发芽长叶，突然发现有几棵开始枯萎，不由的我心一阵发紧，这是什么兆头？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我居然变得迷信，其实，新栽树苗常有假活现象，即根须尚未扎实，无法给植株提供养分，而发芽长叶仅是树干自身的营养，待消耗殆尽后植株便干枯死亡了。

（16）

5月31日收到来信，还是没有生产，已经过预产期一个多月了啊！虽然焦虑万分，但因为信是她亲笔写的，说明她还是好好的，心里稍稍宽慰了些。

就在我煎熬般地度过一夜之后，6月1日，又收到一封信，告知孩子于28日顺利出生，是个女孩。过去平信从上海到东北路上要走好几天，我31日收到的信是28日之前寄出的，孩子出生后他们立即又发出一封信。

原计算预产期是4月28日，孩子出生是5月28日，正好算错一个月，这个责任显然在王玲，这应该她说了算，我一窍不通。

学校中文系书记打来电话，说孩子生好后可以回来继续她的学业，这样不影响毕业（八三届），书记是好心，他以为王玲会带着孩子回来。我把学校的意思转达给上海，遭到她全家反对，他们要她整个哺乳期待在上海，王玲也坚持要休学一年。无奈，我把王玲的意见反馈给书记，书记很通情达理，理解我们的处境，同时告诉我，要马上补办生育指标，否则孩子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乃至以后的入托、上学都无法解决。关于这我们居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在严厉推行计划生育的彼时，即使符合生育条件和要求，没有指标也是断不能生的！

她们班正在毕业分配的八二届同学，经常向我打听王玲的情况，也帮着我传递学校的一些消息，比如，八三届的学生暑假之后马上进入实习阶段，让我通知王玲早点回来随八三届同学一起参加实习，错过实习拿不到毕业证书和学位，只能算作肄业。我把情况汇总一并告诉王玲，她来信说因为试着换牛奶喂养，导致孩子腹泻正在治疗，无法回学校。

这回她是撒了谎！原来孩子的外婆舍不得奶水充足的她离开，她也舍不得离开才三、四个月大的女儿，一时纠结着，怕我对学校不好交代（她们知道我撒不好谎），于是编了个理由。我信以为真，忧心忡忡地去学校把情况讲了，系书记仍然很同情，也很好说话，告诉我她可以再晚些日子回来，但在9月20日前一定要回学校报到。

上海她们纠结着，我也纠结着，学校一再让我通知她回来，而襁褓中的女儿又使她难以割舍，我只好硬着头皮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催。我担心这会让她和她家人以为我是想王玲而为之，这样岂不太自私了！她回来后的确这么问过我，我大呼冤枉，并把记载有学校来催的时间、内容的日记给她看，她不看，说："你真的不是因为想我？就不能老实回答吗？"我明白了，她希望我作肯定回答。

离开东北将近九个月后，她回来了，当天就到学校报到，被分配到四平十四中的一（2）班实习，回来高兴地对我说她在中学读书时也是一（2）班的。

对于她来讲，即将面临的是很难熬的时光。由于强行断奶，奶水充足的她感到十分胀痛，甚至影响实习上课，急需采取措施回奶。那时不像现在信息铺天盖地，我束手无策。她向已经有孩子的同学求教，无非是麦芽，韭菜，山楂等，仅此而已，并无特效，还是时间长了，靠自身的抑制功能，总算一日一日缓解了。

更大的煎熬还不是回奶，而是对女儿的想念。她在1982年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看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日本演员（饰巴的）演得很成功，感情真挚，逼真得很，几番催我泪下。巴告别襁褓中的女儿使我好难过啊！我也有女儿，她仅三个多月大我就离开了。多么难舍的离别啊！这滋味只有我知道！

女儿，好想你！对不起你！

再怎么牵挂、想念女儿，她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实习，很快成了实习班级学生们的老师兼朋友，一个月的实习期结束时，送别会上，许多同学都哭了，这是她没有想到的。这个我并不觉得意外，这一个月她天天挑灯备课，苦想如何培养学生上进的自觉性，对差生如何进行帮助又使其不失尊严。还准备了不少与学生互动的节目，她说要让每个学生都有表现自己和发挥长处的机会，所以她主持的主题班会开得生动活泼，学生们在欢乐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还是摘一段她的日记：

10月27日

下午开总结欢送会……，领导小组组长表扬到我头上。说我大刀阔斧地处理教材，把讲读课与写作课结合起来，采用启发式教育，是具有十几年教龄的老师所不及的。我越听越觉得脸红，真是大大出乎预料。

王玲的长处之一就是敬业，过去当工人是先进生产者，现在当老师自然不在话下，审视她一生的工作轨迹，无一不是认认真真，让人称道的，这在后文还会记叙到。

就在她全身心地忙于实习期间，我们在情感上似乎出现了问题。她回来的第一天，我和她就有一种陌生感，两个人总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因为我催她回来所致，也可能分情于女儿所致，这些都情有可原，我能够理解，但她有时莫名发火，这是我断不能接受的，摩擦由此而生。

一天我兴冲冲回到家，准备包饺子，可她一听说包饺子，拧紧眉毛一脸不高兴，认为包饺子费时间，耽误她备课。我们你一句我一句争执着，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互相不理睬，这样对峙了有一个多礼拜，才慢慢修好。我们相与四十多年，最严重的冲突不过如此，一般互有让步，以致邻居、同事甚至我的和她的家人都以为我们从未吵过架，红过脸。

有时发现她懒得与我说话或根本不理睬我，知道可能哪一句话冒犯她了，但究竟什么话我浑然不知，问她，她就说“自己去想”。过个几天，她便会启发式地让我反省，说我哪句哪句话不对，一定要我道歉或收回，一旦我照做了，马上和好如初。起初我还申辩，解释，时间长了知道她的脾气，干脆有理无理都不申辩，不解释，换来她的亲热，我的开心，何乐不为呢。

上海回来后的几个月，她动辄不高兴，发脾气是有原因的。一是孩子的生育指标一直办不出来，如果没有指标，就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我们两个都要为此受处分。二是孩子的户口，粮油关系因无生育指标而无法落实，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不能老是吃外公外婆的定量吧。三是毕业分配，不知将分到哪个学校，万一分回辽源或其他县里，岂不又要两地生活？

上述种种烦恼，加上想念女儿，她的心情一定很不好，所以，我对她动辄不高兴，发脾气予以谅解，让步是自然的，心想，她没有得产后抑郁症已经万幸了！

好在时间不长，11月初，指标、户口等等都解决了，一块石头落地，我们可以长舒一口气，日子逐渐恢复正常。实习结束之后，学校里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她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于是试着给女儿和自己做衣服，我回家也能吃到现成饭了。

春节我们一起回到上海，我第一次看到已经有八个月大的女儿。

（18）

1983年王玲终于毕业，此时她的八二届同学已经工作有一年。虽然晚毕业一年，但她留在了四平，被分配到四平地区最好的学校：四平一中。她原打算到四中去，那儿离家近些，而且还有她要好的同学，到教育局说了几次，人家不允，说本科生都是先由一中挑选，人家一中已经把你挑去了，教育局作不了主。

一中就一中吧，能留在四平已经比什么都好。她接手高一（六）班（二年级分班后任高二（5）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从此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

或许她天生就热爱这个职业，我发现她教书热情非常高，在家的时间大多用来备课、改作业，写教案，自己动手制作与学生互动的小道具，常常布置一些任务给我，比如打印民意测验表（让学生对教学方式方法进行评价并提建议），录制配音朗诵磁带（比如朗诵《荷塘月色》时配上相应的背景音乐）等等，为了支持她，我只好硬着头皮央求厂里文印室小姑娘帮忙。

除了教书，她在班级管理上颇费心机，虽然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整个四平地区各县市考上来的佼佼者，学生之间因家境，天赋，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毕竟还是有些区别的。王玲对学生一视同仁，十分注重消除差生的自卑感，一次公开课上，王玲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特意点了两个差生起立回答问题。课后学生找到老师，说根本没有想到老师会提问他，一般公开课，任课老师都会提问一些学习优秀的，而且还会提前打招呼让同学作准备。这次他以为没有自己的事，没有想到老师会提问他，他觉得很有面子，因此很感激老师。

这个故事，还是在2009年夏天我和王玲去四平时，她的一个学生讲给我听的，我问王玲，她说有此事。她当时反感公开课作假，把公开课搞得像演戏一般，谁演得真，演得好评分就高，这样的公开课毫无意义，背离了它的初衷。

还有一个事例足以体现王玲的为人。我所在的工厂，有两个人的儿子都是王玲的学生，一个是炊事员吕师傅的

儿子，另一个是厂长兼党委书记的儿子。厂长是我们老乡，彼此过往甚多，而炊事员因琐事跟我吵过架，他的粗鲁让我很生气。当炊事员得知我妻子是他儿子的老师之后，主动跟我套近乎，碰到总是满脸堆笑，说与王玲听，她笑道大可不必，在她眼里厂长的儿子和炊事员的儿子没有区别，她从不去了解、关心学生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也没有给厂长的儿子以特别的关照，反而跟我说了一些炊事员儿子的优点。

这个班级她带了一个半学年，后因女儿的原因，我们在1985年春天南调苏州，送别时，尽管半夜的火车，她想悄悄离开而没有告知学生，学生还是来了很多，他们在月台上依依不舍，许多学生都哭了。后这个班级的学生大多考入北京、上海或长春等重点大学，前程无限。2001年和2009年王玲两次到东北，师生欢聚一堂，王玲十分开心。

南调后她依旧关心着她的学生，“今年要高考了”、“今年大二了”、“明年要毕业了”……这些经常挂在嘴上。离开四平时，高二（5）班同学集体送了一块宽1200cm，高580cm的六马图玻璃匾，如此庞大的纪念品我们硬是小心翼翼一路背到苏州，搬了六、七次家，别的东西扔了无数，唯此匾随我们一再辗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那是因为她对学生们的一片深情。

她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那些学生，认为她的调离，或可能影响学生的情绪，从而影响学业。

1989年夏天的那场风波发生时，她有些焦虑不安，说她的学生正读大四，会不会卷入这场风波里？恰好此时有个学生联系上她，说要来看看并小住几天。我问会不会是逃亡的学生，她说：“你不要瞎想，我不管是不是，只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告诫我不准问学生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

其实我也不在乎学生怎么来，从哪儿来，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者都是客，何况那时我们住在党校里，怎么也比外面安全吧。

（19）

说起南调动因有二：一是女儿两岁多了，活泼可爱，由上海外公外婆领着。我们不忍长年让二位老人受累，而且也想念女儿，我第一次见到女儿是八个月大，第二次见着时已经二十二个月大了。记得那年回去探望女儿，我和妻子激动地迈进家门，见女儿坐在床上，一双大眼睛瞪的圆圆的，愣愣地看着我们，外婆让她喊爸爸妈妈，她憋了半天，怯怯地喊道：“阿姨……，叔叔……”，闻声王玲的眼泪要流下来，女儿不认识我们，不肯喊。如是下去，将来与女儿感情很难融洽，而接到东北我们又不愿意。

这就是我们要南调的第二个动因了，那时东北生活条件极差，吃、住、行，幼儿园和小学设施环境都远不如上海和江南。

吃的以粗粮为主，虽然一天天好转，细粮配给日趋增多，但蔬菜供应品种少，时间短，漫长的冬天几乎只有储

藏的白菜土豆，我们不想让孩子跟着受苦。而住的更是狭窄，每天烧炕弄得乌烟瘴气，常有煤气中毒的危险，而每年都有此类不幸发生。出门是泞泥的土路，雨雪天简直无法行走，公共厕所破烂不堪，半夜要跑出几十米才能如厕，一早还要在臭气冲天的厕所旁排队。一到冬天，家家户户要烧炉子取暖，燃料则各显神通，有煤、木柴，橡胶、塑料，机油，油毡纸，胶木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点的着的都会塞进炉子里，一时城市上空漂浮着令人窒息的尘烟，空气极端恶劣。如此环境，如何能让弱小的女儿来生活呢？外公外婆要心疼死！

起初我对调动一事没有信心，过去曾尝试过，一再失败，就死心塌地想在东北待一辈子了，而王玲态度坚决，为了孩子她任何事情都可以割舍。说割舍是有缘由的，她请调报告递给校长后，被校长一口回绝，说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比如学校给我们一套房子以改善居住条件，把我调入一中等，而放行是不可能的。其时我已经动心，学校若给房子，意味着王玲上班近在咫尺，不必天天早起倒两部车上班了；我调入一中，无论如何都比在企业强，何况当时的一中福利待遇好过一般单位，他们早早地就给每位老师发了液化气罐，那时全中国大多人对此闻所未闻呢！

王玲谢绝了一切诱惑，至于什么培养对象啊之类的更是充耳不闻，仍一个报告接一个报告，终于打动校长，校长承诺，如果有老师肯接她的班，并且要教完这个学年才放，有校长这个承诺，我们调动的努力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玲的执着是正确的，就在我们调动基本成功，已经接到苏州方的调令的时候，校长本人也调到电视大学当校长去了，新来的校长诧异地问："怎么能放呢！"如果当时我们稍一迟疑，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时的教师队伍"固若金汤"，调进难，调出更难！

调动时我在工厂里已经是教育科长了，但"以工代干"的身份未变，联系南调时，对方明确告诉我不可能保留"以工代干"身份，因为这个做法已经取消，这就意味着我过去努力获得的一切都要失去（我曾获四平市政府颁发的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完全有可能分到工厂去当一线工人。

我对此忧心忡忡，妻子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大不了从头再来，还好，苏州方给安排的单位十分合我们的心愿：她分到党校当语文教师，我分在一个事业单位继续从事职工教育。

南下报到的日子，正春暖花开，来到遍地黄花的江南，心情好得难以形容，党校门前就是一片片油菜地和稻田，我们天天手挽手在田间的小路上散步，流连忘返。因为无人认识，所以也无回避和顾忌，后来同事们熟悉了，说当时看到我们亲密无间地在田间散步感到惊异，那个时候远离市中心的小镇上还没有这样的风景，不久此风渐长，或源于我们呢。

为了让我重整旗鼓，她劝我中断考了一半的“语言和逻辑函授大学”，因为教育部不承认学历，要我参加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这个专业对我而言“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王玲本身是学中文的，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是她的强项，文选、写作和文学概论等基础也很扎实，身旁就有老师，得天独厚，随时可以请教，所以很快我便获得大专文凭，然后本科……

几年的苦读终于有了收获，转干，提拔，晋级，还评上了高级讲师（当时在技校当校长），这一切有我的刻苦和辛劳，更少不了她不厌其烦地指教。一路过来，我觉得一直在走捷径，在没有互联网的彼时，学习也好，办公也好，经常遇到把握不透的字词、章句、典故以及语法、修辞和逻辑，懒得翻书、查词典，就问她，大多能得到正确的回答。如果一旦觉得自己回答得不够到位或不准确，她会去学校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直到弄懂吃透，然后说与我听，还戏称“教学相长”。

在自己的工作上，她一如既往地认真、敬业。八十年代中期，许多提拔的干部都没有什么学历，管理能力和政策水平很低，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党校开办了脱产的中专班，王玲又成了这些两年制脱产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来自各个政府机关和乡镇的干部，或担任着大大小小的职务，一些学生文化水平不怎么高，官场陋习倒不少，管理这些学生颇有难度。但王玲连着几个班级下来，学生对她的评价很高，说她书教的好，有水平，学生也爱听她上的课。

我知道她之所以能受到欢迎，是因为她对每一堂课都认真对待，花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准备，并发挥了与学生互动的长处，课上的生动有趣。另外她还有两个长处，也是多年恪守的原则：一是铃响即下课，任何情况下不拖课。她说打铃以后，你想要人家集中思想听课是强人所难，讲得再好也是枉然；二是讲究板书，不随心所欲地写写擦擦。她一堂课就写一黑板字，课间不擦黑板，写满为止，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少吃粉笔灰。这要求在备课时把必须写在黑板上内容想好，做好标注，可见她多细致，多认真。

除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除外，她还在课前课后扫地，打水，擦黑板……，这些在中学里都是有值日学生做的，而现在的学生是成人，许多在单位里是局长、镇长，养尊处优惯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主动干这些，指派他们王玲也不愿意，就只好自己去干了。

关于这，在王玲弥留之际，早已离休赋闲的老校长闻讯赶来，病榻前对王玲说：谁我都可以不去看，唯王老师我一定要来，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老师！其时，王玲调离党校已经二十年，老校长更是在二十五、六年前就调往南京的省党校，仍然对王玲有如此肯定。当时王玲说话已经没有力气，还是面带笑容微弱地说了两声“谢谢”。此时的她一定倍感欣慰，因为这个校长的人品一直为她称道，她说这个校长是她参加工作以来碰到的最好的领导。

王玲的认真一贯于她从事的所有工作，在此可以略举一二。

有次她负责一个考点的监考，发现考场里有个考生在打小抄，她立即予以制止，将纸条没收并记下考号。考试结束有人告诉她，这个考生是新提拔的市委副书记（县级市），王玲闻听丝毫没有感到惊愕或不安，她说："领导更不应该作弊！"她事先知道考场里大小都是个官，尽管如此她仍然一丝不苟。

她几次承担市里招干考试的语文出题和面试考官，每每接受任务之后，就成天在办公室里，闭门不出，回来吃完饭立即又回去，不带一张纸片回来。我开玩笑地说：

"连我都信不过啊？"

"就是信不过你才不敢在家出题的！"她这样回答我，当然是开玩笑。虽然开玩笑，真的也是为了避嫌疑。后来封闭式出卷，更是人影也见不到了。

有次也是人事局组织招干考试，她负责对口专业的面试。面试前一天，她一个要好朋友领着市里一个部门的领导来家串门，这个领导其实也是王玲的学生，但从无过往。王玲来厨房为她们沏茶时，告诉我不要走开。我以为是让我陪客人，于是我在客厅里端水续茶，削水果，切西瓜为她们服务，竭尽主人之谊。等她们走后，王玲告诉我，她们一定是来探口风的，我在场她们就不好意思开口了，毕竟还当作领导嘛。

1995年初，任教研室主任的王玲被调往报社，先是总编办主任，后被任命为副总编，直至退休，在报社工作了十三年。

（21）

王玲从报纸复刊时就调到报社工作，按说是老员工而且是老领导了，但是外界并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她没有记者和编辑那样的知名度和声誉。有人问及我妻子在哪工作，我答曰"报社的"，大多数人不再追问是记者还是编辑，因为他们知道报社还有打字员、炊事员和保洁员呢。

最为有意思的是，常常有人问及上述问题而又知道我妻子姓王的时候，惊讶地说："噢。王×主任是你夫人啊？我们认识，很能干的！"我知道他又搞错了，王×是报社的一个中层干部，外界知道王×的多，知道王玲反而少之又少。

不是王玲性格孤僻，不善交结或不善言谈，我的朋友来家，她都热情接待，相谈甚欢，她小学里还是区少年宫话剧团的，又一直当班干部，练也练出来了。她其实交往的同学朋友很多，只是不想在上班时海阔天空，也不愿意串岗，工作本来就忙，腾不出时间去交结，让她去巴结上级那就更不可能了。

然而时间长了，报社里的一些记者编辑与她感情甚笃，经常来我家作客，成了王玲的忘年交，每每听到她们在

我家客厅里像师生，又像母女叽叽喳喳，说说笑笑，我由衷地为她高兴，这正是她所追求的：不是名利，而是友谊和真情！

她任副总编的工作除了妇女，计划生育，党务宣传外，主要还是新闻题材的策划，记者采访和文字编辑的协调，稿件审读签发以及电脑排版、信息传输，另外还有通讯员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等，因为新闻不是她的专业，要胜任这一切只好付出加倍的努力和辛劳了。

于是家里的书架上多出了许多有关新闻的书籍，她勤学强记，很快入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她的认真更是一如既往表现出来。

有记者把两年前已经发过的稿件重又送审，被王玲一眼看出，她把稿子打回，对编辑说此稿哪年哪月在第几版发过，不能重复刊登，编辑回去一查果然。有时送上来的照片也有此类情况，都被她一一退回重来，可见她审阅多么仔细。有些软广告或语焉不详的文章她要么退，要么责令修改，从不马虎。如常见有“三年自然灾害”一词见诸报端，在王玲这儿此说绝对通不过，被她一律改为“三年困难时期”，王玲认为“三年自然灾害”说不客观，没有依据，到底是天灾人祸尚无定论，报纸上如果肯定“三年自然灾害”那会误导读者。

有人托我，说“你夫人在报社当副总编，能否让我上篇文章”，因为是工作关系，无法一口回绝，回去与她商量，答复倒干脆“可以，拿来，发与不发，编辑部说了算”。我知道她，没有质量的稿子，即使编辑部送上来了，她也不会签发的，就连我也是一样待遇。

我是喜欢写点什么的，过去也常给报刊杂志投投稿，便自以为是地问王玲：“怎么样，贵报如果缺稿子，我可以奉上几篇？”

“欢迎啊，多多益善！”她回答得十分痛快。接下来又说：

“如果你能写得出好文章的话，我们可不会拉进篮里就是菜！”

果然，凡是通不过她“法眼”的文章，自以为写得再好，她也不让我上，逼着一改再改。发了几篇后，我失去耐心，不再投稿，转而发入博客和QQ日志了。

她在审稿上不讲人情，但对同事和下属却满腔热情，举一桩很感动我的例子。

某镇发生了因婚外情导致的恶性伤害案件，第三者与一镇干部同归于尽。该镇有个通讯员就此事写了新闻稿发给报社，因事实清楚，叙述客观，鉴于新闻的时效性，报纸很快编发了。死者家属见报后，认为丑事远扬，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聚众闹事，堵在该通讯员工作单位门口，要她认错，道歉，赔偿，还要打人！一时弄得满城风雨，通讯员在家，在单位都不得安生。

王玲闻讯，觉得通讯员虽然不是报社的人，毕竟是跟报社签约的撰稿人，他们的一线采访是新闻的重要来源，如果此刻不出面保护他们，岂不寒了他们的心？为此，她先打了好多电话，镇政府的，公安的，民政的，妇联的找了好些人，其中就有她的一些学生，然后驱车几十公里到达当地，几经斡旋，将事情摆平。

回来后，她觉得这个通讯员不能再在当地待下去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不知什么时候会报复一下呢。正好报社扩编招考记者，王玲第一时间通知其前来应考，结果这个通讯员高分上榜，成了报社的在编记者。几年以后，这个记者成了报社的骨干，她的文章和大名随着报纸走进千家万户，家喻户晓。

（22）

妻子任副总编后，大小算是报社的领导层干部了，接触的领导和部门多了起来，常常还要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在吃喝风盛行的年月，多少领导干部疲于应酬，无暇工作。而多年来王玲却能独善其身，很少参与，对于应酬能躲则多，时间长了，大家知道她的脾气，也就不再相邀，她每日回家粗茶淡饭，乐在其中。那时各部门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单位领导有一定数额的应酬签单权，王玲却极少签单，有时甚至一年里一张单子都没有签过。

那时报社收入和福利待遇是不错的，许多人就想到报社来。王玲在单位里也算是老资格，有一定威信，就有人求到她，希望能够帮忙。对于类似事情，我一向以为头疼的：拒绝吧，不好意思；答应吧，又难以做到，王玲每遇此事却自有一套。

报社是事业单位，有规定凡事业单位逢进必考，王玲帮来求者谋划应考方法，告诉他们参考哪些资料，分析自己有哪些优势，如何借鉴往年考试题目等等，而不是去帮他们走后面，托关系。她指导过的考生陆续有人顺利通过考试被报社录用，他们很感激王玲，进报社后与她走得也比较近，有人揣度是通过她的后门进来的，王玲也不辩解或声明，她说这种事情无法解释，自己问心无愧足矣。

逢年节有同事或下属送点土特产来，她起先一概拒绝，后来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就先收下，过后以相似价值的物品回赠。这个她也做得很认真，每每要我查一下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她盘算回赠什么比较恰当。

她认为自己的做法无关思想觉悟而是一个人的本质，一向厌恶官场陋习，一旦自己有了一些权力就变本加厉，这样的人本质是有问题的。

在她生病的几年里，她从没有想让单位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支持，跟我说不要让报社的人知道，她不想让人家费心来医院探视。

……

回到家庭生活上来，说说我们调到江南的美好生活吧。

起初，党校腾出一间会议室给我们作宿舍，负责后勤的校长一个劲儿地说这是暂时的，那边已经在动工盖房子，等盖完就会请我们搬家。此话我们将信将疑，新来乍到。

真的能给我们一套房子吗？看挖的地基可都是三室一厅的住宅啊！我们觉得这大大的，有着木地板的会议室已经好的不要再好，何况隔壁还有一个小灶屋间呢。

会议室门前有个大大的院落，种有许多枇杷树或桔子树，夏日枝叶摇曳，树影婆娑，十分怡人。这么好的环境，我们觉得应该把孩子接过来了。

孩子过来以后，节假日一家三口或在党校门前的阡陌中散步，或到太湖边的草地上野餐，其乐融融，这是我们此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

半年以后，我们果然分到一套二楼的三室一厅房子，我们高兴的犹如梦到一般，这与在东北的居住环境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入住后，她心里老惦念着上海的父母，一再邀请他们来家小住，外公外婆想念一手带大的外孙女，自是非常乐意。我从未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与岳父母相与过，当然竭力表现自己，做一个他们满意的女婿。王玲也仅可能地让我表现，似乎在向其父母证明她嫁的人还是不错的。

有一次她去南宁出席一个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时，又通知她直接去镇江党校参加什么培训，来来去去四十几天才回来。期间岳父正在我家，我天天买菜烧饭，洗衣擦地忙得不亦乐乎，还要去幼儿园接送女儿。王玲回来后，我当然要向她表表功了，就说自己如何如何勤劳，天天要干哪些哪些活，她当然也表扬了我一番。

过了几天，她悄悄对我说："爸爸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会撒谎！"我一听此话几乎惊倒，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会撒谎，老岳父怎么一来就看出来了？我正要争辩，她笑着轻轻地说"你以后要注意呢，爸爸向来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一点夸张。"原来我在向王玲表功时说到"……天天洗衣擦地"，岳父听到后，趁我不在时告诉王玲"他撒谎！明明不是天天擦地板的，有时两天才擦一次。"

当然，王玲是当笑话讲给我听的，其中也可看出她对我的信任和理解，她还戏称我这是"合理夸张"，但要我以后千万不要在老丈人面前"合理夸张"了，她知道他爸爸的脾气。

（23）

我自以为属比较孝顺的，可母亲来家时间长了，虽没有过激烈冲突，难免顶撞几句。王玲跟我说，有些事情尽管老人不对，你也不能顶撞，孝不如顺，她在孝敬老人方面真是让我叹为观止。

岳父一生值得称道的是脾气耿直诚实，但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传统的家长作风，在家里说一不二，听不得半点相左的意见，他作出的决定不可违拗。在我家看电视，他因讲究卫生带着厚厚的纱手套拿遥控器调台，常常半天也调不好，于是叫我过去，说遥控器坏了。我试了试没有问题，请他摘下手套，告诉他带手套接触面大，按下去碰到了其他按钮，故而调不好。岳父脸色一沉，扔下遥控器，说声“我不看好了”就回房间了，留下我在电视机前愣了半天。

还有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平时天天晚上要举一会儿哑铃，但如果喝了酒则取消。那天晚上岳父看我未锻炼，问为何，我说晚上应酬喝了点酒，他接着问“喝酒为什么不能锻炼”？我说怕血压升高，他追问我怎么知道血压会高。他是医生，被他这样问下去我还能有好吗？我只好说凭感觉，知道他下一句怎么说的吗？他说“凭感觉就是瞎说”！我没有招他惹他，如此给我下不了台！

这些例子仅仅是沧海一粟，岳父蛮横不讲理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举上述例子想说明的是他很难与人融洽，无论同事或家人。而王玲与其父亲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口角，倘若有不同看法或做法，她总是陈述自己的理由，分析利弊，岳父听则罢，不听她也不勉强，就顺着岳父的意志办。时间长了，岳父发现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经常不合时宜，搞僵、被骗、遗失的事情屡有发生，渐渐地变得大事小情都咨询王玲，依赖王玲了。

每每看到王玲与岳父母说说笑笑，有商有量的情景，我自己就觉得惭愧，因为我对父母就没有这么好的耐心，以为只要为他们好，他们就应该完全听我的，现在想来，对老人尽孝道容易，对老人顺从难啊！

不仅对父母如此，她奶奶在世，王玲也想方设法地尽其孝道。奶奶老迈时双目失明，却坚决要求回宁波乡下度其余生，一个人在祖居孤苦伶仃。念此王玲常常垂泪，几番计划把奶奶接到东北来，无奈奶奶年事已高定不肯挪动。我们结婚蜜月之旅就是到宁波姜山乡下，陪奶奶度过的。记得奶奶说上海真方便，想吃什么都能买到，王玲问奶奶想吃什么，奶奶苦笑道：“想吃馄饨，乡下哪有这么方便啊！”

第二天，王玲让我走几公里赶早市，买回猪肉、青菜和面粉，用啤酒瓶子作擀面杖，在小茶几上硬是给奶奶包了一顿馄饨，她含着泪望着奶奶慢慢地将一碗馄饨吃尽。

1984年底，我们从东北到苏州送档案，正是春节前后，那年雪特别大，我们两个冒着大雪又一次去宁波探望奶奶，陪奶奶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记得我们初二返程赶到宁波站的时候，见站里站外漆黑一片，没有旅客，没有列车。无奈，只好在街上胡乱地寻找旅店，两个人冻的瑟瑟发抖，因为过年，哪还有旅店营业啊！幸好她想起小时候去过一个亲戚家，虽然记不准姓名地址，但记得在火车站附近，于是到处打听，直到半夜终于找到。

奶奶一个人在乡下独自生活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与我商量想南调成功后把奶奶接到苏州奉伺，我当然十分赞成，让一个双目失明年迈老人独自在乡下生活，我早就于心不忍。可惜的是就在我们南调成功，苦等调令的时候，

传来奶奶去世的消息！她家来信没有直接寄给王玲，是寄给我的。他们知道王玲闻讯一定很悲痛，想让我设法慢慢透露给她，这个我做到了，但是她仍然十分悲痛，啼泣不已。

（24）

她之所以与奶奶感情如此之深，与奶奶从小特别疼爱她有关。奶奶一直认为这个孙女最懂事乖巧，临上山下乡奶奶舍不得她远去边陲他乡，特意回到乡下，一双小脚游说相邻与干部，意在让王玲以投奔奶奶的名义到宁波乡下插队落户。

这里也很有故事。

奶奶终于说服生产队领导接收王玲投亲插队，毕竟都是本家，但是有两个条件：一走要走当时规定的程序，即要公社、县两级知青办开出同意到本公社、本县投亲插队的介绍信。二是要嫁给本生产队的青年。这两个条件奶奶都应允了，只是第二个条件瞒着没有对她说。

接到奶奶乡下来信，王玲打点长期安家落户的行装，只身出发去宁波了。年方十五岁的她，大包小包辗转火车轮船到达姜山小镇时已经半夜，一人走在乡间小路，惊恐地发现有人尾随，她喊又不敢喊，跑又跑不动。那人用一口浓重的方言向她喊了几句，她虽没有完全听懂，但知道是在向她打听什么，好像要买点粮票布票之类。王玲用普通话回复说“不知道”后，那人嘟嘟囔囔地扭头走了，虚惊一场，可王玲直到奶奶家还惊魂未定。

第二天，王玲到公社顺利开出介绍信，而在县知青办却遇到了麻烦，里面工作人员架子十足，说要等调查研究、核清楚实了之后才能开介绍信，让王玲回去等，这一等就是半个月，没有一点音讯。

一天晚上，队长来到奶奶家，对王玲说：“今天就研究决定你的事，随我到生产队去一趟。”

王玲立马跟着队长后面，忐忑不安地朝不远的队部走去。

推开队部的木门，里面灯火通亮，坐着一屋子的人，见王玲进屋，眼光齐刷刷地扫来，弄得她满脸通红，只低着头不敢看人。

队长拉了一下王玲：“嗨，抬起头来嘛……”

只听得满屋子的人突然哄笑起来，王玲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脸更红了。

队长朝着大家说：“就是她，王玲，上海学生。”

此时的王玲，感觉犹如古罗马市场待售的女奴，窘迫之极，她夺门而出，身后又是一阵哄笑。

后来知道，那天队长的确在“兜售”她，如果在座的有愿意接纳王玲做儿媳妇的，县知青办那头就由队里出面去办理，如果没有，则让王玲打道回府，没戏！

第二天队长通知王玲可以落户，巧的是这时上海家里来了加急电报，让王玲速返，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她立即赶往宁波乘火车回到上海。

岳母见女儿回来，急切地说不要到宁波投亲了，学校工宣队已经来过几次，说王玲不具备投亲插队的条件，他们已经到派出所调查过，王玲奶奶的户口在上海而不是在宁波乡下。

王玲说不管他，反正宁波那边已经答应落户，而岳母一脸的为难：

“不行的，这是欺骗组织！”

“我认为还是服从学校分配吧。”岳母说出自己的决定。

这时的岳母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唯恐组织不待见，循规蹈矩得很。她在部队任护校教员时，每天吃住在学校，只有在周日才回家与孩子们相聚，尽管学校离家并不远，她却从来不找理由回家看看，不知是胆小呢还是认真？反正，在岳父下放劳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平时家里只有奶奶和四个孩子。

等奶奶从宁波回到上海阻止王玲去外地时，王玲已经离开上海去往几千里之外的东北了，老人费劲心思的努力终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奶奶对王玲疼爱有加，王玲知恩图报，时时惦念着奶奶也是理所当然。而另一个故事却是例外，即王玲对自己从未谋面的舅舅也付诸了深切的关心。

2004年11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教研活动，活动结束后安排海参崴一游，王玲来电问我能否放弃海参崴旅游而去看望一下他在东北农村多年的舅舅。说是征询我的意见，按我们家的惯例这就是客客气气的命令，即使将在外军令也不能有所不受，于是我转道佳木斯的莲江口农场（原劳改农场），踏着初冬的积雪前往她舅舅家。

（25）

王玲的母亲是浙江绍兴人，曾经与有个叫鲁迅的周家住得很近，舅舅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二姐即我的岳母。

上世纪五〇年前后，赋闲在绍兴的舅舅接到北京大姐的来信，说新政权建立伊始，各处需要干部，让他到北京

参加革命工作。彼时中共正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急需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去接收、取代旧政府人员，所以在当时划分的各大行政区（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南、东北）先后成立了革命大学，舅舅本来就是高中毕业，到北京后顺利考入华北革命大学，年轻的他踌躇满志，一心想毕业后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曾想多舛命运就此开始。

毕业的履历表上，舅舅如实填写了当年参加军统集训的经历，他认为当时一腔热血，为抗日投笔从戎，接受了情报收集，电台发报，爆破暗杀等训练，目的是深入敌占区对日本侵略者发动袭击。然而就在训练一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训练班随即解散，舅舅便回到绍兴老家赋闲了。

舅舅想这些经历是光荣的，抗日救亡，匹夫有责嘛，用现在的话说满满的“正能量”，然而，他想得太简单，太幼稚了，就在他递交履历表之后，立即被送往集中营关押，那里全是旧职人员，有旧政权的公务员，警察、军官等等。集中营是一所临时征用的中学，四周岗哨林立，荷枪实弹，他们被告知集中在此便于甄别，一旦甄别结束即行分配工作。

然而舅舅看到的是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在半夜拉出去枪决，舅舅因为没有危害新政权的行为，且是主动向组织交代的，故判有期徒刑七年，发配兴凯湖劳改。当我前往佳木斯市汤原县莲江口农场去看望他时，他早已刑满释放，因为家乡没有亲人，当地政府不予落户，只好留场当职工，又遇文革雪上加霜，连职工身份也予剥夺，遣送附近农村成了没有任何保障，拿工分的农民，结婚后定居于汤原县郊外。

我之所以欣然放弃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原因之一就是想听听她舅舅亲自陈述当年的遭遇，看是否还有什么转机，若能平反岂不功莫大焉。

当我代表王玲来到她舅舅家时，舅舅的激动可想而知，全家动员杀鸡割肉弄了一桌子菜。酒桌上舅舅端起酒杯说：“我的亲人北京、上海、天津及国外都有，从来就没有一个来到这儿看望我的，今天，你是头一个！”闻言我感动得有点热泪盈眶，深感王玲此举英明，舅舅八十多岁了，来日无多，如果此行不来，舅舅或会抱恨终身，我也会后悔遗憾的。

问及舅舅改革开放后为何不予申诉，他说见到电视、报纸上出现过与他一起关押并判刑的同学，他们已经平反履职，自己也写过很多申诉材料寄往北京，但石沉大海，现在年事已高，视力严重退化，几乎无法读写，决定放弃。我说让我带着这些材料去北京替他寻找有关部门申诉，而舅舅说一气之下，他把所有材料已经付之一炬！

临别，遵王玲所嘱我给了舅舅两千元钱，还将自行在哈尔滨买的香烟、糕点及其他物品送与家人。待我回到家，将舅舅的境况告诉王玲时，她十分难受，从此每年给舅舅一家寄钱寄物，从未间断。2009年夏，我陪同王玲再次前往莲江口农场探望了舅舅。

此文不再赘述舅舅的家人，家人的遭遇同样坎坷凄惨，不忍卒读。

此次探望加深了她对舅舅及其家人的同情和怜悯，社会进步发展如此之大，而舅舅生活境况依旧犹如化外之

地，猪、狗、鸡构成的风景，仍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和经济的主要来源，而舅舅已经双目失明，意识迟钝，风烛残年的他，只能梦回他山清水秀，粉墙黛瓦的家乡绍兴了。

王玲在弥留之际，交代我唯一的后事就是：不要忘了接济舅舅和他的家人。本来，岳母每年给舅舅寄钱寄物，近年我们加入后都是寄双份的，岳母九十多岁思维不清，此事便由王玲全权张罗了。

（26）

如果说对自己舅舅的资助出于情亲，那么对弱者和受困受灾者的同情和资助则是王玲的善良所为，仅举两个例子。

多年以前，原报社印刷厂门外是当地公安分局的围墙，围墙里种有枇杷树，春末累累果实压弯枝头伸出了围墙。印刷厂有个外地来打工的杂工，见到墙头有那么多成熟的果实，经不住诱惑，就搬凳子上去摘了几颗，没曾想墙上安有监控设施，还未尝鲜，便被几个警察按住，扭入分局一阵暴打后随即拘留。因为这个杂工负责印刷厂与报社之间的清样传递，第二天王玲久等不见，联系印刷厂才知缘由，她十分气愤，认为这点小事就打人、拘人太过分了！于是立即赶往分局要人。

这个事情本不该由她出面，印刷厂与报社是合作关系，并非下属单位，捞人也应该是厂里的事情，只是王玲见不得那些人飞扬跋扈，动辄打人，所以亲自去分局交涉。人是要回来了，见到鼻青脸肿的工人，王玲气愤不已，纠结了好长时间。

再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年除夕，我家隔壁单位大门口来了几个酒气熏天的年青人，他们欲在门口燃放焰火，就在他们把大盒小盒的焰火摆放好将要点燃时，门卫老张见了出来干涉，请他们拿到别处燃放。他们几个不依，与门卫发生冲突，几人将老张打的头破血流，老张被家人急送医院包扎，那几个人扬长而去，后知道这几个人是当地110的警察。

第二天王玲听说后，即向老张了解情况，派出记者采访此事，并打电话给公安局，告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此事可能见报。结果公安局责成当事人带着礼物和医药费前往老张家赔礼道歉，老张是个老实宽厚的人，见警察上门赔礼道歉了，便息事宁人，说“年青人酒后无德”，原谅了他们。事后老张要感谢王老师，王玲说出自义愤而已，也算公权私用。

与王玲朝夕相处这么多年，她助人的例子可信手拈来，希望工程开启第一年她就给基金会寄去钱款；汶川地震除单位募捐外，她还数次给灾区捐款捐物。她年年联系贵州或甘肃等地贫困地区的慈善机构，大包小包地让我到邮局去寄发，自己搭寄费不算，还要费力将要捐的衣物洗净叠齐，然后打包才行。

她平时工作比较忙，几乎没有时间写文章，但因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她还是经细致入微的调查后，写了一些呼吁重视弱势群体的调查报告或建言。记得她退休前写的一篇调查报告就是关于如何养老的问题，她领着几个记者跑了许多乡镇和各个类型的养老机构，用数据说明即将到来的养老危机，提出了一些如何应对的建议。

下文是王玲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由崔永元编辑（那时崔在央台而不在央视）于1996年6月1日《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

让这些孩子也上学

王 玲

在我们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外来民工的孩子，蓬头垢面，衣着肮脏，一手拖着黑糊糊的蛇皮袋，一手拿着铁夹子，大白天走街串巷，从垃圾筒里捡东西。这不仅与这些发达地区整洁文明的城市面貌格格不入，而且这些学龄儿童的失学又将使我国每年新增多少个文盲？

这几年，外来人口的管理工作已经被各级政府放上了议事日程。

有的地方还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对于城市治安、社会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这项管理工作可否延续到外来人口中的孩子？目前，我国的希望工程越来越兴旺，各地助学献爱心的感谢人事迹层出不穷，那么，能否让外来人口中的孩子也沐浴希望工程的阳光，使他们也成为受益者呢？若能如此，那么民族幸焉，国家幸焉！

当然，这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这也是一项有益的事业，做好了功在当前、利在万代！

（27）

王玲到报社工作后的收入比我高，但她似乎浑然不觉，一直以为我的收入高于她，几次调侃我道“没有上过大学倒比上过大学的挣得多”，因为她从来不管钱财，工资奖金都是打在卡上，卡又在我手中，因此家里的“经济大权”实际完全由我掌管，一应开销都由我来执行，当然，重要支出比如购房、大宗电器、家具等还是要得到她的首肯才行。

如此我在用钱方面有极大的自由度，可惜的是我不抽烟也不喝酒（除了应酬，在家基本不喝），实在无用武之地，于是朋友有困难我会寄个几百过去，每次去看望母亲或姨妈、堂叔等也都会奉上几百上千的，当然我不会偷偷地干，事先事后都会告知王玲，她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头。

在钱财掌管上她对我极为信任，我对她也没有任何隐瞒，结婚几十年没有为此有过哪怕一点点猜疑和不快，大概即谓心有灵犀吧。

记得在1998年，我接到东北一个工友的电话，说自己下岗后生活无着，想开出租车谋生，但买车钱不够，想从我这借一万元。我跟王玲讲了，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两年以后，工友将借钱还回，但不到半年，他来电话又要借一万，我就又给他汇去。不久，有消息说这一万元是借去治病的，且这个工友已经去世，看来钱是还不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紧张，我怕王玲有什么想法，毕竟是我们两个的共同财产！当我告诉她此事后，她没有一句责备，也没有一丝不快，只是问了一下工友的病因和他的家小目前情况。过了好多年，工友的孩子上班有了收入，她们分几次将钱寄了过来，期间我们打电话说不要还了，对方还是坚持将钱还清，我和王玲都很感动。

再有一次借钱出去，更能表明王玲对我的信任程度。

2010年“五一”节那天，家里来了几拨亲戚朋友，我们正忙着接待，我接到一个千里外知青网友的电话，说是买房急需用钱，当地筹遍了尚缺两三万，问我能否解其燃眉之急。我在网上结交了各地许多知青朋友，但从无经济上的往来，且只知道这个网友的昵称，其真实姓名，家庭地址和工作单位一概不知，这钱是借还是不借？

家里的亲戚朋友个个说不能借，说报纸、电视上天天在播报网上诈骗案例，笑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防范。而我觉得既然人家不远千里向我求援，必是十分急迫，只要我核实了对方的真实身份，钱还是应该借的。亲戚朋友转向王玲。要她制止我愚蠢的行为，他们知道只要王玲不同意，我是不会硬把钱汇出去的。

王玲说：“他要借就让他借吧，既然肯借，想必那人是可靠的，就帮人家一把吧，如果上当，也算是买个教训！”

为了给众人一个面子，她又对我说：“你自己作出的决定你自己负责，没有后悔药啊！”

我当即去银行将钱给朋友汇去，两个月后，朋友连本带息并汇费还我，我自然感到扬眉吐气，但也要感激王玲，她没有让我在朋友面前现眼。

她不管钱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甚至自己的工资到底是多少也说不清，对人也一向慷慨，但她自己却非常节约，她认为不该花的钱绝不会掏腰包，从来就与奢侈品无缘。她的一个学生并好友说：“真没有想到王老师身上穿的无一是名牌！”这个学生认为我们两口子收入尚可，按当地人的消费习惯，不穿戴一些名牌显得有点寒酸，所

以她们经常结伴去上海淘时髦，淘名牌，成为南京路、淮海路的常客，而王玲从上到下的穿着，常常加起来也就一两百块钱。

我看她参加各种活动并没有为自己的衣着费心，也不刻意打扮，向来素面。

家里没有任何化妆品。有时我私下想是否亏待了自己的妻子，她却说有这个钱不如出去旅游。是的，所以在我们退休后立即制订了45天欧洲自由行的计划并付诸实施，如果不是岳父和王玲先后罹病，我们68天北美自由行的计划早已完成。

（28）

说起旅游，又要牵涉许多故事，我是喜欢旅游的，本想两个人退休后，好好周游全国乃至世界，但王玲顾虑到年迈的父母，就是不敢远行，这个我能够理解，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嘛。

王玲有姐妹各一，还有一个弟弟，就在我们南调成功后，原来在上海工作的他们先后都去了国外或外地，我们成了离岳父母最近的了。原来我和王玲每月一两次去上海帮其父母料理家务琐事，逢年过节还接来小住一两个月，随着岳父母愈加年迈迟钝，特别是岳父已经表现出老年痴呆端倪，王玲欲将二老接至家中颐养天年，而岳母坚持要进养老院，她是心疼女儿，不愿连累我们。无奈，王玲只好从命，恰好本市有家条件一流的老年公寓开业，我们立即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即去上海分三次才将岳父母及其家当搬来，从此同城居住，王玲更是对父母体贴入微，照顾有加。

她先是陪父母在公寓住了约一个礼拜，以后每个礼拜去三到四次，风雨无阻，那时尚未有公交线路抵达，尽管她腰间盘突出时有发作，还是坚持走很长的路去照料父母，令公寓员工和左右邻居感动。

岳父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好办，而糊涂的时候难免出误会和差错，这就需要王玲加倍细心地呵护了。岳母神志比较清楚，除了行走不便，耳朵不聪外，生活能完全自理，王玲便为岳母去西门子定制了精致昂贵的助听器以提高岳母的生活质量。

而岳父的麻烦就大了，他胸腔内早就装了心脏起搏器，却自以为老当益壮，走路大步流星，然视力近乎盲人，常常磕绊跌倒，只要他出去散步，我们就心惊胆战，唯恐不测，因为来公寓时间不长已经数次进医院检查治疗，都是不慎摔倒所致。平时我们在家最怕的是半夜电话铃响，只要是老年公寓来的都是大事，几次半夜驱车赶往公寓送老人入院紧急处置。

岳父的事情多，脾气还固执。不断地让王玲买收音机，他要同时备三、四个收音机，因为视力不好调台不便，他就每个收音机固定一个台，想听哪个台开哪个收音机。这样也就罢了，他还经常用消毒水给收音机消毒，因视力

不济消毒水三弄两弄就进入内部造成短路，收音机坏了买个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他不肯，硬是让女儿找地方去修，现在哪有地方修收音机的，即使有修的恐怕功夫费比买新的还贵。被岳父消毒损坏的电器比比皆是：遥控器、电话、接线板、电热杯，电热饼等等，装了一纸箱舍不得扔掉。

人说“老小老小”，即谓人老了就像小孩，岳父就是这样一个“老小孩”。他吃饭时经常将汤汤水水滴在衣服上，王玲每次要他换衣服都是百般拒绝，有时甚至还发脾气：“我看蛮干净的，为什么一定要换，以后你不要管了！”王玲有时趁他午睡时悄悄给换了，反正岳父也觉察不出来；有时则像哄小孩似地哄他换衣服。

即使如此，王玲也从未对父亲有过一句怨言，依然恭敬有加。前文已经讲过王玲的“顺”，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对她很是佩服的地方之一。

原来王玲不经管父母的钱财，一向都是由岳父亲自掌管，八十多岁的岳父还一心想理财，结果财越理越乱，这儿不妨说说岳父理财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逢银行上调利息，岳父便会去转存，为了那蝇头小利排上半天的队。时常还在银行营销人员的鼓动下买理财产品，什么债券，基金啊，保本不保本的他都弄不清楚，回来凭证东藏西掖最后连自己都找不到。

有一次，岳父去银行存钱，一万左右的现金他要分三笔存入，是什么用意不知道，王玲怕父亲有闪失，拍派我去当“保镖”。自然岳父是不让我经手的，待存完钱走出银行，他看了看手上的存单问：“我好像存了三笔钱，怎么只有两张存单？”急忙回到窗口去问，人家答曰就是两笔，岳父咬定三笔。正在交涉，我看到对面条桌的窗台上有个牛皮纸信封，取来打开，里面赫然有一沓现金，原来岳父在条桌上填单子的时候，顺手将信封放在窗台上了。

一天岳父在路上散步，被两个年青人拦住，说老先生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国家现在有政策要对老知识分子予以格外照顾，他们公司即将上市的股票规定只销售给对国家有贡献的老知识分子，随即把老先生让进舒适豪华的办公室，好茶沏上，周边五六个帅哥靓女上来应承，弄得老先生飘飘然。他交了100元押金后回家翻箱倒柜，拿着存折、存单要去银行取钱，他已经答应认购五万股那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股票了。岳母得知赶紧打电话给王玲，王玲一听就知道父亲中套了，让岳父接电话后，苦口婆心解释了好长时间，岳父才心有不甘地答应不买了，还说：“押金已经交了，指标浪费了可惜，要不让给你叔叔或小河他姐姐买吧。”电话那头的王玲哭笑不得。

搬家时，他对王玲说他们共有积蓄40万左右，待到了公寓里，把存折、存单，债券等集中起来，算来算去只有20多万。于是又到上海家里去寻，结果在待扔的垃圾堆里找到了近10万元的国债凭证，虽然这些凭证遗失了到期也能领出钱款，但谁知道有这笔钱呢？老岳父连在哪个银行办的都记不得。我们估计还有10万左右的“理财产品”永远也不会有下落了，再次到上海老屋寻找无果，只好放弃。

于是在征求兄弟姐妹的意见后，王玲决定接管岳父的“财政大权”。

（29）

首先她建立了收支专门账本，清点父母的所有钱款一一入账，在父母的存折、存单上标注FM意即爸妈（Father、Mother），这样避免与我们的财产相混。逢到期的存款连本带息转存，为保险起见，一律不买理财产品，除了国债。父母平时的开销她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比较大的开销，至于买点水果、糕点和常用药品等等，王玲一般不入账，作为我们的孝敬了。

按说如此管理大家都应该满意了吧，但是老岳父对“财政大权”旁落心有不甘，对来探视的其他子女抱怨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岳母也说身上没有钱心里不安。他们这样告状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要委屈得撂挑子，然而王玲一笑置之，不过尽管知道母亲无处花钱，她还是经常给岳母几百块钱零花，岳母每次拿钱后全捐给了教会。至于岳父则不必，因为他觉得拿完钱手要消毒太麻烦，所以只要把账本给他过目即可，即使如此，矛盾还是不断产生。

一日，岳母对王玲说：“答应给我的零花钱呢？”

“500块钱不是给你了吗？”王玲回答。

“没有，我没有拿到钱！”岳母一口咬定。

其实王玲给钱的时候，我就在一旁，岳母竟然完全记不得了，在我证明钱肯定给过之后，岳母说一定被护工偷走了。王玲连忙让母亲打住，不要猜疑了，先找找再说，结果在一个抽屉的最下层找到了，原来是岳母怕丢自己藏好的，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岳父就更有意思了，他这辈子从来不做家务，更不去买菜，柴米油盐价值几何还停留在他年轻的时候的印象。比如，我们买去几斤香蕉，随便说起最近香蕉便宜了，只有三块钱一斤。他会惊讶地问：“三块钱一斤还便宜啊，是三毛钱一斤吧？”我们听了忍俊不禁，我故意问他知道现在鸡蛋多少钱一斤吗，他回答说最多不超过三毛一斤。难怪他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笔巨款，原来他对物价如此认识的。

既然以为自己拥有如此之多的存款，岳父想做好事了，他找王玲商量，想用自己的财产建立一个基金，至于叫什么名称，派什么用处请王玲帮出主意。王玲听了差点笑出来，现在物价如此之贵，他们这点钱能够保证养老已经不错了，这是在苏州的养老院，相对便宜点，如果在上海，他们的这点存款支持不了几年的。

王玲没有直接对老岳父说破，就说此事从长计议，还要征求其他兄妹的意见，岳父想想也对，但过后他又改变

主意了，认真的写了份遗嘱，遗嘱大概意思为身后财产分配视子女经济情况而定，谁困难就给谁，鉴于小女儿在德国安身立命不易，建议遗产赠与小女儿。遗嘱写就交与岳母签字，岳母看后说“她花钱大手大脚，满世界旅游，我看她一点也不困难”拒绝签字，这份极不公允的遗嘱就此作废。

小女儿回国听说此事哑然失笑“要他这点钱干什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继承什么遗产”，是啊，岳父这点钱，她在国外不用两年就能挣出来。

上述例子只是想说明王玲替父母掌管钱财的不易，账目记得清楚仅仅是一部分，诸如报销医药费，银行存取都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每次去银行，总要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行，而且要跑到上海去。

王玲病重时嘱托我接管岳母的账务（岳父已经在两年前去世），我觉得这个嘱托太沉重，毕竟我不是他们的亲骨肉，能博得他们真正的信任吗？常有为了一丁点钱财兄弟阋墙的事，何况还有一些不便说的难言之隐，到时我将落得什么下场呢？王玲让我放心，说她已经对兄弟姐妹说过，要他们像信任她一样信任我，信任如斯，我没有理由推托，唯有感动！

（30）

我们两个早就计划在退休后出国旅游一次，憧憬的是自由行，所以还在我退休前几个月，就制订了一个详尽的出游计划：欧洲三个月的自由行，详细到每日住店、交通、景点等等。决定成行的唯一条件是岳父母是否有人接替我们照顾，虽然老年公寓里各种服务很到位，我们也已经请了护工，出行这么长时间还是不放心。终于在王玲北京的姐姐答应前来接班后，我们顺利出行，但行程有所缩减，从原来的三个月压缩到一个半月，减掉了二分之一的行程。

这是一次极为愉快和富有挑战的旅行，也是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相伴出国旅行：美丽的多瑙河、莱茵河和塞纳河畔留有她的足迹，梦幻般的新天鹅堡，圣百花大教堂，米拉贝尔花园印有她的笑容，威尼斯水巷、阿姆斯特丹花市、卢森堡大峡谷、布鲁塞尔皇家广场都有我们的身影。一个半月，我们虽然去的国家不多，但游览的城市有二十多个，旅游团很少去的小城如意大利庞贝、锡耶纳，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德国的科布伦茨，威斯巴登和美因茨等，都使我们流连忘返。

说有挑战性是我们从未出过国，语言又不通，即使稍稍几句洋泾浜英语在巴黎、罗马和汉堡也用不上，这些都是非英语国家城市，我们犹如瞎子、聋子。但我们还是一站接一站地前行，凡是王玲想去的地方，我都会连夜查看地图，把要去的线路、交通安排好，并用iPad在网上预订下一站的酒店，有时还连夜赶往火车站预订座位。要紧的是用“谷歌翻译”将一应地名、站名和一些常用语分别翻译成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然后抄在小纸条上，以备不

时之需。

王玲则负责洗衣服，弄吃的，我们住的酒店往往带有厨房，她就到附近超市买点菜回来，做一顿我们喜欢吃的中式饭菜，因为在欧洲时间一长，那披萨、面包和色拉吃腻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如此信赖我，有时我自己对第二天的行程都没有把握，迷茫得连目标都没有，她会说“没有关系，走着看”，“实在搞不定就歇一天”，她的体谅使我感到轻松，紧迫感得到缓释。

记得有天我兴致勃勃地对她说乘船游塞纳河去，因为我们买的“欧铁通票”可以优惠乘坐塞纳河上的游轮：原价30欧元/人，凭“欧铁通票”只要7欧元/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大皇宫……一路下去可达埃菲尔铁塔，几乎尽览巴黎名胜，还能省不少钱。可等我们去游轮码头购票时，售票员就是不认我们的“欧铁通票”，一个劲地“No…No…”。王玲说没有关系，沿塞纳河一路走去，还能更好地欣赏巴黎风光呢。果然，我们一路走去，游览了许多盘算很久而尚未成行的名胜古迹，原来都在沿河一带啊！

在科布伦茨的莱茵河畔，河中来往着一艘艘巨大的游轮，对岸是一幢幢中世纪的别墅，与游轮相映成趣，犹如一幅生动的油墨画。王玲挽起裤脚，竟下到水里，似孩童般撩拨着河水，十分开心。怪不着在维也纳，她执意要去看多瑙河，就在我们临出发去威尼斯的前几个小时，她还和我冒雨乘地铁赶往市郊，经多方打听，必等看到多瑙河之波后才满意地离开。

她是喜欢上流经欧洲的这些大河了，于是我也撩起裤腿，陪她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双脚浸在清清的莱茵河水里，望着河中满载欢快游客的巨轮和不远处的大桥上静静滑过的“欧洲之星”，十分惬意地享受这异国风物人情。

欧洲之行是快乐的，但她的身体已经初见发病征兆，多次发生吞咽时剧烈咳嗽，我以为是吞咽不得法而致。还有两次出现瞬间昏厥，一次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联邦议会大厦后面，我们正俯瞰峡谷中童话般的景致，她突然两眼发黑，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扶着悬崖边的护栏不能行动了，我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巧克力让她吃，我以为是低血糖所致。还有一次是在罗马的博盖塞美术馆附近，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我陪她在高大的七叶树下坐了好久，她才渐渐恢复正常。由于我们都认为是低血糖引起的，并没有重视，后来才知道这些其实是患肺部肿瘤引起的。

旅游回来后，我们信心十足地酝酿着第二次出游，计划下一年去美国和加拿大，打算从西海岸游到东海岸，除了阿拉斯加，环北美一周，尽心而归。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次年，就在我们计划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要出发时，岳父病了。

（31）

90岁以前，岳父母不怎么生病，因为他们很会保健调理，况且岳父一生烟酒不沾，连蘸一筷头的酒都要脸红，

而一过90岁两个人的毛病就接二连三了。

一天凌晨岳母来电话，说了句“爸爸要不行了，你们快来送医院抢救”就把电话撂了，因为岳母失聪已久，听不见我们的回话，所以每次来电话都是如此：说完即了。

我跟王玲火速赶往老年公寓，见二老好好的在睡觉呢，岳父见我们来，从被窝里问：“你们来干什么？”

原来这天岳父睡得特别深沉，岳母几次叫他未醒，故而慌张，此为虚惊一场。

而另一次则真的“狼来了”！一个后半夜的一点左右，我们接到岳母电话风风火火赶到老年公寓。进屋岳父也是在被窝里问：

“你们来干什么？”

“送你去医院”，王玲说。

“我又没有生病，去什么医院？”

“妈妈说你的嘴有点歪，可能中风。”

岳父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一再说自己好好的没有事，王玲只好退一步，让岳父起来走两步，如果没有事则罢。岳父勉强答应，起床还未等迈步，人已经东倒西歪，似醉酒一般：明显地中风征兆。

送至医院即住院治疗，医生说多亏送得及时，否则后果严重。住院九天，由于岳父严重的洁癖，不让护工服侍，只由王玲天天守护，十分辛劳。她让我不要告诉她的姐妹兄弟，怕他们着急，所以直到出院很久，他们才先后得知父亲的情况。

2013年4月3日半夜一时许，岳母又来电话，同样是说岳父不行了，要马上送医院。这一次是真正的警报，从此我们及亲友都被医院深深套牢，辗转求医数载，直至家破人亡！

岳父4月3日早晨入院，5日即发病危通知，后数次反复，至6月9日中午去世，期间，王玲一次次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纠结与焦虑的同时，还要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否通知远在国外的弟弟妹妹回来？她是想让他们来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而不是想让他们回来承担责任，但弟弟妹妹会怎么想，她犹豫再三。雪上加霜的是她自己的体检报告出来了：CA199和CA125都超出正常值十多倍，医院让她去复查！

她对我说没有关系，这种体检报告大多不准，或许是最近因照料父亲累着了，休息几日即可，我想真这样就好了。因岳父病情严重，我们日夜守护、奔忙，把王玲的事情置之一旁，直到医院再一次来电话通知她赶紧去复查，

她才在我们的劝说下去作了复查，检查结果愈加让人揪心，两项CA值更高，超出正常值二三十倍！

此时的岳父正处弥留之际，王玲的兄弟姐妹也都从国内国外赶来，妹妹联系了上海肿瘤医院，预约在6月10日作全面肿瘤检查，硬逼着王玲立即动身去上海，然她左右为难，一是不忍离开已经昏迷的父亲，二是放心不下独自在老年公寓的母亲，此时岳母咳嗽严重，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王玲一时心焦如焚。

6月9日中午，岳父与世长辞，王玲含泪写就悼词，第二天一早交与从北京赶来的姐姐，自己只身赶往上海肿瘤医院，开始了她漫长而又痛苦的求医之路，我则因为要料理岳父的后事和照顾92岁高龄的岳母，无法陪同前往。

王玲在亲友的安排下，在肿瘤医院一连做了几个检查，起初并没有检查出异常，直到PET/CT断层扫描报告出来后，才发现左肺靠心脏处有4.4×2.2cm肿块，并有少量积液，建议进一步穿刺检查。

双重打击使我不堪忍受，一连数天失眠，茶饭不思，当时还要为岳父的后事操劳，人一下子瘦了好几斤。而在上海的王玲，却表现得非常坚强，电话里与我谈及病情就像在讨论别人的一样，没有丝毫的悲观和沮丧，她这样的情绪一直保持在整个治疗过程。

一个例子可以体现她超常的心理承受能力。

当时她只身前往肿瘤医院作穿刺检查，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重要检查，一般来说病人都要有家属亲友陪同，唯恐意外发生。而此时的我们都在百里外的殡仪馆为岳父送行，来不及赶到上海陪她。在做穿刺手术前，医生例行要找家属谈话，交代穿刺时的注意事项和风险，当麦克风里喊“王玲家属……王玲家属进来……”后，她来到医生跟前，医生这个那个地对她说了好些，最后关照有些事情最好不要跟病人讲，以免病人到时紧张，王玲笑道：“我就是病人。”医生愕然……

（32）

送走岳父之后，亲友们陆续离去，我则一边厢领岳母去医院治疗，一边厢紧着去退飞机票、酒店以及美国黄石、加拿大班夫两个国家公园的旅游预订（因为不可能出游了）：我们在办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签证的同时，已预订了两人环北美旅游涉及三家航空公司共八个行程的机票，也预订了夏威夷、洛杉矶两地的酒店及其他，网上支付款已近6万元。

因为是OK票，国外航空公司一律不退票只退税，损失较大，东航可退但三个行程扣了六千元钱退票费。夏威夷的酒店（Hotel Waikiki）最讲理全额退款，洛杉矶酒店因为捆绑黄石公园一起预订的，它与班夫公园一样，不予退订只能转让，算来总共只退回一万八千多元。后来在美国和上海的朋友为帮我们，分别主动要求将两个国家公园的预订转让给他们，又为我们挽回了有一万五千元的损失，这是后话。

我是6月18日赶到上海的，次日即去医院取王玲的细胞涂片报告（穿刺检查结果）。从地铁四号线下来，我心情糟糕透了，真想大喊一声“老天哪，怎么会这样！”真的不愿意去取这个报告啊！

一步一步挨到肿瘤医院的门口，两旁有跪地乞讨的，我竟想，如果王玲的检查报告排除恶性肿瘤的话，我宁愿爬在地上做乞丐。于是，掏出几枚硬币扔进他们前面的罐子里，这是同病相怜啊！

然而我的愿望落空了，报告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拿着报告，脑子一片空白，挂号大厅里挤挤插插的全是人，而我却感到如此的孤独无助：我怎么去跟王玲说？瞒是肯定瞒不过的啊！

回到女儿家，王玲接过报告看了一会，十分平静地告诉我：女儿怀孕了。对于报告她甚至没有一点点情绪上的波动，就像不是她生病一样。

开始治疗时，她堂妹联系了据说医院最好的专家，那天我陪着王玲去医院，满心以为有专家接治，肯定能制订一个科学合理，可以信任的治疗方案，岂料专家只给了一两分钟问诊时间就把我们打发了。起初我十分疑惑和恼火，医生就这样看病的？可看到挂号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看到医生流水作业般的叫号，我明白了，一个医生一上午要看百十个号，还能指望他能给你十分钟或半小时吗？

由于肿瘤靠近心脏，医生说不能手术只能化疗，拿着肿瘤医院开的处方，我们于7月6日到中山医院肿瘤分院开始化疗，那儿离女儿家较近。

接待的是一个年青的小医生，看着王玲的病历和处方，安慰道：“不要紧，现在这是常见病。”王玲和我听了心里甚感安慰。可在医院的宣传橱窗里，赫然写着什么肺癌目前已经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治愈率仅20%不到，还列出治疗存活年限数据……。这些分明是在刺激病人，打击病人的信心啊！

好在王玲并不去看那些橱窗，她一心一意配合医生，凡医生嘱咐的一丝不苟照办。第一个疗程是三天，每天要注射8个多小时的药水，其中培美曲塞二钠和顺铂是治疗肺癌的专用药，毒副作用非常强烈，三天化疗下来，本来起居正常，无痛无痒的她一下子病态显现：面部潮红，恶心呕吐，干咳，四肢无力……

化疗后她什么也吃不下，没有食欲，但是她还是坚持吃东西，尽管一吃就吐。有时她一天要吃二十多次，每次一两块饼干，喝一点水，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体力与疾病抗衡。记得有天我看到附近有卖新鲜梭子蟹的，知道王玲爱吃，就买了几斤，回家做面拖蟹。中午，我在厨房里烧蟹，那边王玲和女儿闻到腥味双双大吐，一个是化疗反应，一个妊娠反应，后来我再不敢买鱼腥了。

几天后化疗反应逐渐缓解，她便到隔壁长风公园去散步，听人家唱歌，帮着做做家务，很快就恢复到与正常人一般。亲戚朋友来看她，她与客人谈笑风生，病态全无，以致许多人都认为她的病可能误诊，我也心生疑虑，看她

的精神状态，哪像一个癌症病人啊？

然而二十一天后的第二个疗程，又一次折磨开始了。

（33）

就这样每隔二十一天，连着做了四个疗程，每次都是抽筋剥皮般难熬，而每每问及，她总说“还好，没有预料的那样……”她是安慰我们，可我和女儿及亲友都知道，她是强忍着痛苦的啊！

每次化疗反应稍有缓解，她便操心女儿怀孕的事了，督促女儿去医院检查，联系分娩医院，购置婴儿奶粉和用品等等。女儿劝她安心养病不要操心，我却觉得让她管管也好，这样可以使她分心，也是一种心理寄托，对治疗有好处。

由于我们夫妇长年没有进过医院，对看病报销等手续和规定不甚了解，所以起初的医药费大多都是自己掏钱的，每次化疗费用都在三万左右，其中主要费用是进口药物，按规定不进医保，故而不能报销；每次近万元的PET-CT检查和基因检测也都是没有分文可以报销的。此外，每个礼拜还要去闸北中医院，看一个专家门诊并开中药，由于医保规定异地看病必须要在三甲医院才予以报销，闸北中医院不属三甲医院，这每月一千多元的医药费只能我们自己承担了。

为此她十分不安，对我说如此下去家里的积蓄会花光的，担心以后我生病怎么办？我告诉她尽管治病，我生病不是没有医保，况且还有退休金，实在不行可以卖房子。尽管如此，她还是处处想省着点，比如乘地铁在中山公园站下来后，到女儿家还有约三公里路程，没有公交可达，只要她觉得还能走就不肯打的，几年来，沿凯旋路和万航渡路几乎每月都有我们相伴走过的身影。

一般人生病总希望有人来探视，可王玲再三嘱我不要告诉她的朋友、学生和单位里的人，说大热天让人家跑到上海来不好，2013年夏天正逢多年不遇的极端酷热，我想她说得有道理，为他人着想是她做人的准则。

记得女儿结婚前，亲家与我们商量如何操办婚事，大概意见是在上海和苏州分别举行婚礼并设宴，费用则由他们承担。商量下来，最后采纳了王玲的意见：不举行婚礼，不通知一般亲朋，不收贺金，只在上海找一酒店两家人及直系亲戚聚一聚。虽然我们两个工作多年随礼无数，只是入乡随俗而已，并不赞成这种做法，王玲尤其反感。她提出这样做法也是理所当然，一是对此陋习的摒弃，二是不想让人家几个小时耗费在婚礼上。

病痛折磨久了，情绪不易波动的她有时也会出现烦躁和怒气，一日在闸北中医院门口，她突如其来的一场脾气让我猝不及防，束手无策。

那天出门看中医时我习惯性地去取雨伞，她说不用带伞，因为外面骄阳似火，没有一点点要下雨的迹象，为此她还笑我太琐碎。然而在我们看完病取好药欲出医院大门时，一阵倾盆大雨不期而至，而且越下越大，没有要停的意思。我们在屋檐下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能出去，门前的延长中路已经成河，几次有空载的士路过都被打着伞的乘客抢去，我因拿着两大包中药，抢不过他们，又不敢在雨中久留，怕淋湿了药材，一次次退回到屋檐下。

突然见她走出屋檐，淌着水朝马路走去，喊她回来不听，头也不回，这时的雨下得正猛，顿时她浑身湿透，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冲进雨帘跟在她后面，喊她不应，问为什么不答，只是踩着马路上的积水前行，待走到南北高架路口时，一辆的士被她拦下，两个人似落汤鸡般地钻进车里。回到女儿家，问她为什么这样做，万一感冒了怎么办，正在化疗的病人如果感冒可能是致命的？她依旧不答，且连着几日没有理我。

一定是我的表现或哪句话激怒了她，才使得她如此一反常态，此后她从未跟我解释或提及过此事，至今我也不知道她那天为何这样冲动，实为遗憾。

（34）

几个疗程过去，按理应该做增强CT查看疗效如何了，问医生，医生说“怎么，还没有做CT检查？”似乎是我们疏忽了。于是医生开出增强CT检查预约单，经几天的来回折腾，报告出来了，肿瘤明显缩小至1.9×1.8cm，医生说“不错，可以减为半药治疗了。”我们为之欢欣鼓舞，所有的人也都非常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又几个月的疗程过去，肿瘤开始反弹，可气的是医生对此居然毫无反应，每次看病，医生对着电脑显示屏，不知是在看哪年的病历或报告，总是说“不错，继续化疗。”直到我们提醒他，又已经做了四个疗程了，是否应该再检查一次？医生这才醒悟：“是啊，每两次就要做检查的啊？”

这次检查的结果显示肿瘤已经较上次检查增大，为2.1.×2.8cm，但医生坚持还要做几个疗程，他可能认为这种反复属于正常的。而当时我已经心存疑虑，认为这样治病太不负责了，说与王玲，她说：“你不是医生，你又不懂”。

我们起先一直挂特需门诊或专家门诊的号，后发现挂几百块钱的与几十块钱的在看病时竟同样待遇，毫无二致：排一两个小时的队，不到半分钟的问诊……唯一不同的，一个在二楼，一个三楼而已。

既然每次都是如此，处方又是现成的，我们何必每次排队找专家，一旁普通医生的诊室都不用排队，挂号即看，何乐不为呢。于是我们拿着病历看普通门诊，果然一样治疗程序，一样的用药，医生问诊的时间长多了，态度也和蔼多了。

肿瘤还在继续增大，这是我们再一次要求检查后的得到的报告，医生无可奈何地问：“怎么着？”，此时的我们倒成了医生。我们决定靶向服药。

辛亏第一次治疗时，专家嘱咐助手给开了一张基因检测单，我们自费七、八千元作了基因检测，因为靶向用药必须基因配对才行。当即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月剂量的靶向治疗用药“易瑞沙”，三十片，每天一片，总价16500元，平均每片550元，系进口药物，全自费。

靶向服药是患病第二年六月份开始的，因为不作化疗了，王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起居正常，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决定出去旅游，方向为云南，因为那儿气候适宜，环境优美，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

云南之行是7月24日出发的，因为我喜欢坐火车，她也同意，于是买了两个卧铺的底铺，应该是比较舒适的，一路风景旖旎，她也比较开心。但意料不到的是，车抵昆明刚刚入住酒店，她就出现不适，有点发烧，至昆华医院检查被告知：尿路感染。

朋友原定接风的晚宴不能参加了，网上预订去丽江的车票也退了，一心一意在医院挂水治疗，好在有昆明的朋友帮忙和照顾，五天之后消炎，可以活动活动了，但原定计划已经无法实施。

尽管如此，她观光热情不减，我们几乎每天要到酒店附近转一转，有金碧广场和金碧公园、南屏街、东寺塔、讲武堂、翠湖公园、大观楼、民族文化村……还乘朋友的车绕滇池转了大半圈，在闻名遐迩的抚仙湖畔也住了几天，虽然云南的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或其他地方没有去成，这昆明城里应该算是玩得畅快的。

可能因为劳累，她先后在东风广场、民族文化村和翠湖公园又发生了几次晕厥，特别在翠湖公园，从文津桥下来，她一下子靠在我身上，说“不行了”，此时她双眼紧闭，无法站立，我赶忙扶她到近旁的一家咖啡馆坐下，要了杯咖啡，大约过了近两个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8月9日回到上海，11日即去医院检查并开药，继续靶向服药治疗。检查报告显示肿瘤没有继续增大，说明靶向治疗有效果，一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后悔没有尽早采用这个治疗方法，可王玲很冷静地对我说：“平均有效期为八个月，我查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对于这个我一直想瞒着她，岂料她也是早就知道的，否则何以有机构几次三番联系我们说，只要在他们那儿购药，服满八个月后即可终身免费提供药品了，我们对此都没有予以理会，原来她与我心照不宣，知道八个月后是怎么样的情况的！

果然在服药第六个月后的检查表明，肿瘤又开始增大，而且速度非常之快！

此时女儿已经分娩，家中多了一个小生命，白天亲家夫妇过来帮着照顾，加之保姆，女儿家一下子显得逼仄了，于是我们回到苏州家里，只是看病来上海住上几天即回，对王玲来讲多了些路途劳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015年1月28日检查报告显示肿瘤已达4.4.×3.2cm，比治疗前的面积还要大。在门诊室里，医生和蔼地问道：“来了，这次怎么着？”医生这样无可奈何的的态度，实际就是宣告：你的病已告不治，想别的办法去吧！

癌症是顽症不假，治疗手段和用药就那么些也不假，但看着满院子的博导、博士、硕士，病人和家属不都是冲着他们能救命而来的吗？这可是全国一流的专治医院啊，结果竟然是这样的！连他们都没有自信，何况病人乎？若轮着我，碰到这样的医生早就崩溃了。

王玲没有崩溃，她平静地问医生：“能否试试别的治疗方法？”

“什么方法？你说。”医生反问道。

“听说可以介入疗法？”

“可以啊，哪一种？”

“听说有一种叫射频消融的？”

“你想做射频消融？好啊，我马上帮你联系！”年青的博士医生说。

他写了个医生的名字和地址，让我们立即去找这个医生，可是他写的地址是错误的，我们爬到这个楼不对，爬到那个楼又不对，等找到这个医生所在科室的时候，医生已经下班回家，因为这个医生的门诊不是天天有，我们只好等一个礼拜再来。

我本不想王玲做这个手术，唯恐触动癌细胞反而加速反弹或转移，这些我在网上了解过，但我不能跟她讨论这些问题，怕影响她抗争的信心，所以认为时间拖得越长越好。而她却期待着手术，生的希望激励着她，她愿意尝试一切治疗方法，事实上她就是这么做的。

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来到肿瘤医院介入科，医生反复读阅她的CT造影扫描图，觉得射频消融手术有难度，因为病灶面积临近手术极限范围，恐怕不能全部杀灭恶变细胞。但医生可能考虑到没有别的办法了，便接受了我们手术请求，让我们回去等通知，一有床位马上通知我们入院手术，于是我们回到苏州家里。

在等待通知的这段时间里，王玲因为对治疗前景感到乐观，表现得轻松愉快，她天天绕小区的湖边散步，还张罗着给快满一岁的小外孙女做布鞋和衣服，有时还弹两下钢琴。但我心中犹如一块大石头压着，十分沉重，见她天

天咳嗽不停，每咳一口痰都要付出十几分钟的努力，而且痰中的鲜血让人心悸！我是既心疼又无奈，她却从来没有一句哀怨和悲叹，咳嗽稍一缓和，就如常人一样做事或看书，接亲友电话还是谈笑风生。她去世后，亲友们常常问我："怎么会……，怎么会……"意思说前不久还好好的嘛？

由于新搬的家（老房子五楼，没有电梯，不便病人上下），许多东西还没有搬过来。一次我在老房子发现一些有关裁剪的书，就顺便带了过来，她见后非常高兴，说"太好了，正到处找呢"，立即动手做小衣服，小鞋子，见她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如果不生病多好啊！

刚给外孙女做好两双布鞋和两件反穿衣，上海医生的电话就来了，让我们即刻赶往医院，明天手术。

射频消融是使用电极针通过高热原理，使肿瘤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从而彻底失去活性和转移潜能。就在我们到达医院办理入院手术时，主治医生把我叫去，交代关于手术注意事项和风险，然后告知我：消融手术费昂贵且不能报销，让我作最后的考虑。如果决定做，他们马上就作准备，因术前还要打针服药，已经来到医院了，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

当天晚上8点多，王玲就被送进手术室，而不是医生说的"明天"。

手术是在CT环境下进行的，预计所用时间在40分钟左右，我和朋友在室外等候着。

大约才十多分钟，手术室边门打开，一个医生喊道："王玲家属，请王玲家属进来……"

我顿时心跳加速，脸色苍白，冷汗直冒，莫非是出事了？

主治医生跟我讲过，王玲肿瘤的部位紧靠心脏主动脉，原来专家不敢手术切除就是怕万一碰破主动脉，会造成大出血而猝死手术台，现在这个手术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将在手术时慎之又慎。

难道真的……我的大脑僵住了，两条腿机械地朝那扇门走去。

（36）

手术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而操作室与病人完全隔离，通过隔音玻璃幕墙可以看到手术台上的病人。我一进屋就看到许多年青医生在显示器前指指点点，主治医生见我进来，让我到显示器前，说现在显示的病灶较之1月28日扫描的大多了，看来原计划使用一根针消融的方案得修改，要增加。我忙说"可以……可以……两根三根都行……"医生见我同意，让我立即去收费处缴费，说只有缴完费才能继续手术，这是规定。

原来如此，多一根针的费用就要多1.5万元左右，医生也是谨慎得很！

此次手术用去两根针，住院三天，加之药物整个费用为47391.22元，按医生的说法手术很成功，在医院观察了两天，没有发生气胸和大出血，顺利出院。

眼看春节将临，女儿让我们在她家过完春节再回去，而王玲夜夜不停的咳嗽令我们很不安，怕惊醒外孙女，因为她的这种干咳很响。于是我们与女儿一家（还有亲家）吃完年夜饭，次日一早便驱车回苏州。因为是年初一，路上车稀人少，我感到很凄凉，这阖家团圆的日子，病弱的妻子跟着我赶回冷冷清清，没有一丝节日气氛的家中，而我们在苏州又没有亲戚来往，难免伤感。

王玲其实很想在女儿家多待些日子的，因为刚刚能够站立扶墙行走的外孙女很依恋外婆，只要外婆在家，其他人都不要，老是牵着外婆的手满屋子转。从医院手术回来那天，突然见到外婆的外孙女竟兴奋得哇哇大叫，似乎叙说久别重逢的欢乐，出乎寻常。

但为了外孙女好，王玲只得割舍这份感情。半个月前来上海看介入科时，因为我轻染感冒，王玲想当天来回，这样可以不住女儿家，以免感冒传给外孙女。但我怕她太累，坚持要住一晚，最后达成妥协——开旅馆。其实她何尝不想住女儿家啊，外孙女小鸟依人，在王玲心目中已经升为至亲第一位了。

医生说手术是成功的，但王玲的症状并没有好转，咳嗽还是不停，春节过后，根据医嘱去做CT检查，看手术的效果如何。而这次检查及后来的一些事，一锤锤沉重地打击着她，我几近崩溃，而她还坚强地站立着，抗争着！

CT报告显示，她的病情严重恶化，原来消融的肿瘤四周出现新的环状病灶，直逼主动脉，医生说再做消融已经不可能，唯一可采取的只有冷冻疗法，冷冻疗法是进行局部麻醉，然后从患者背部或胸部用长4厘米的针扎入患处。针尖通氩气，达到零下140摄氏度，使周围2厘米范围内的细胞冻结，从而杀死癌细胞。

报告是我去上海拿的，当然医生说的我没有全部转告王玲，只是说癌细胞没有全部消融，再冷冻一次就可以了。

还是像上回那样，我们在家等入院通知。

等待期间我十分焦虑，可以说茶饭不思，因为我已经能够预料到后果，但是还要表现得期待这次手术似地。她也像上回一样天天散步，只是时间更短了。一天她信心十足地要去看望马路对面小区的一个朋友，还没有走出自己小区的大门就感到力不从心而折返。

冷冻手术是4月20日做的，也是一个很晚的晚上，因为CT室白天很忙，介入科只能晚上利用资源了。

王玲进了手术室，我一个人等在外面大厅里，因为没有别的病人，整个大厅就我一个孤零零地蜷缩在冰凉的铁椅子上，没有希望，没有期盼，没有安慰和同情！

大约才五分钟，手术室边门打开，又是一个医生在喊：“王玲家属，请王玲家属进来……”

因为有上次经验，我也就不特别紧张：无非又要加根针罢了。走进控制室，里面白花花的全是医生，有十几个，还是先前的那个主治医生把我领到计算机显示屏前说：“你看，没有几天，整个肺部都弥漫了，已经没有手术价值了！”一旁有医生用光标移来移去试图证实主治医生的话。当然我是读不懂扫描图的，但也不怀疑他说的是事实，毕竟有那么多医生在场，他们也是为我好，取消手术可以省下几万块钱。

（37）

此时我还比较冷静，问：“病人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听不到，这儿是隔音的。”

“原定手术时间是多少？”

“四十分钟。”

“那你们就按四十分钟做，不要管有效无效！钱我照出。”

然后我轻声问医生王玲的生命还有多久，他认真的想了想，说只有三到四个月，现在已经临近恶性爆发期，人说走就走。

我把医生叫到一旁，请他在手术结束后不要告诉王玲真相，特别是在病历和出院小结上不要如实记录，另外我们原来要求配的进口药还是配给我们，虽然已经没有治疗效用，医生一一答应并照我的要求做了。

我此时想不出别的办法，所有一切只是拖延王玲知道真相的时间，因为今天的事让王玲知道。不啻宣判她的死刑！

我仍旧回到大厅毫无希望地等待着，欲哭无泪。此时王玲从加拿大回来探亲的弟弟和弟媳来了，他们见我面色灰白，一脸愁容，感觉到情况不容乐观，便问我怎样。我本不想将真相告知他们，但一时控制不住哽咽起来，只得如实相告。他们闻听双双开始抽泣，想到王玲马上要出手术室，看到必生疑窦，我赶紧让他们止住眼泪，知道他们还没有吃晚饭，就劝他们出去吃饭，调整好情绪再回来。

这次手术其实什么也没有做，不存在气胸或大出血的可能，王玲也没有上次术后的疼痛，所以很快出院。病历和出院小结基本复制了上回的内容，除了医生和我以及弟弟夫妇外，没有人知道手术的真实情况。回到女儿家，女儿女婿和亲家夫妇问及情况，王玲回答说感觉比上次好，亲友来电话问候，她也如此回答，一时皆大欢喜，只有我

强作笑颜，欲哭无泪。

在上海休息几天后我们又回到苏州，此时王玲已经不能自主上下汽车，必须由我搀扶才行，咳嗽加剧，痰中带有更多的鲜血。此前我在医院咨询过医生，一个医生说到此地步国内已经无药可治，国外目前有两种新药，但是大陆中国不允许进口，一个叫“9291”，另一叫“阿法替尼”，唯一的希望请国外亲友购买寄来。再者，服用这两个药以前仍要做新的基因检测，以确认基因是否与药物配对，否则无效。医生再三告知基因检测费和那两种药物都十分昂贵，让我权衡得失。

此时已经顾不上钱花的值得不值得，只要能做到的，能买到的，在所不惜。因为医院里存有王玲的活检标本，无需再行抽血或穿刺，我们连做了两个基因检测，以期上述两种药都可能配对，这样就多一份希望。

按规定的时间十天后我去医院取报告，病理科竟然找不到报告，连那天交了近万元的检测费才换得的单子都没有，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忙了半天，最后跟我说再过十天来取，呜呼，这样的医院如何能让人信任！

大概过了两三天，他们打电话说检测报告出来了，此时我们已经不再信任这报告的真实性了，我们商量出国治疗，别无出路。

首选是加拿大，她弟弟入籍加国多年，联系一个医院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打算很快被否决，他弟弟回复说在加国治疗与国内相差无几。闻此王玲沉默不语，她知道弟弟有难处，不想多说，但是我看出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打击，生病至今从未流泪的她，静静坐在一角的藤椅上垂泪，没有哭声，没有抽泣。

在德国定居的妹妹托在美国西雅图的朋友联系了一家医院，要我们立即把病历和所有检查报告发去，很快西雅图的医院对资料评价之后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前往治疗。由于2013年未能成行的美加两国签证已经过期，我们只好紧锣密鼓地重新申请赴美签证，几番折腾，面签通过，两人都拿到了有效期十年的美签。然而此时，王玲已经十分虚弱，无法承受赴美的长途旅行，出国治疗的计划搁浅。

托人从香港购买的“阿法替尼”药寄到，2万元一盒，28粒，每天一粒。满心想如此昂贵的药能够救命，可事与愿违，服药一个月后检查显示肿瘤还在继续增大，表现的症状也日趋严重。这时一盒药已经服完，第二盒药刚刚寄到，医生紧急制止服药，建议再行化疗，又一轮的摧残开始了！

（38）

化疗的结果加剧了病情已成事实，我从内心反对化疗，但又无力阻止，亲友的关心，同事的热心连王玲也拒绝不了，何况我？从一开始的治疗，就是在亲戚朋友们的好心安排下进行的，如果我出面制止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

遭到猜疑，再说当时我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

身边有不少人也是得的这种病，大多还健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就拿两个最贴近的例子说吧，一个是王玲的叔叔，一个是我大姐夫，都是得的CA，而且得病时间都早于王玲，他们没有化疗或仅轻微化疗，现在都好好的。

王玲对化疗的后果和我一样心里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对不化疗的后果则是将信将疑，没有挑战的勇气，首先亲人这一关也是过不去的。唯有王玲的妹妹几次劝我们先去美国、加拿大旅游，而不要先去不化疗，那时的王玲没有一点点病状，且签证、机票、酒店都已妥当，说走就可以走的。

我倾向于她妹妹的意见，但是我不能出面支持，王玲已经几次对我的意见表示不屑：你又不是医生！如果被家人（不管她家和我家）知道了，会以为我不愿意为王玲治疗，只知道旅游，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出游的。

为了她我可以割舍旅游，但这样的割舍所得到的适得其反，反而断送了她！王玲离去之后，大家似乎都认识到了：

“怎么会这样……蛮好就……”

“早知道，不如就……”

我只能仰天长叹，世上有后悔药多好！

重新化疗能够抑制肿瘤生长的几率连10%都不到，这是医生明确告诉我的，这个时候对于治疗的前景医生已经完全对王玲保密，我也千方百计不让她看到病历或各种检查报告，因为上面全是病情急剧恶化的数据。而王玲表现得格外的平静，几乎任凭医生安排，也不像以前那样必自己阅读病历和报告，她从消融手术失败后几乎再也没有碰过这些资料，显然她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到了哪一步！

我们始终没有提及过一个“死”字，不是忌讳而是真正的怕这个字！相识相恋至相伴四十多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分离，更没有想到要这样分离！整个生病期间，几乎没有讨论过身后事，因为在早我们已经约定，无论谁走：

一、哪儿走哪儿了，即遇车祸、失事，遗体一律在当地处理。

二、绝症不抢救，尽量减轻痛苦则已。

三、火化，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等仪式。

四、不置墓地。

既有约定在先，我们也就不必多说，一心用在治疗上。

又四个疗程过去，仍是没有效果，她已经不能起来多活动，大部分时间只是躺在床上咳嗽，天天纸篓里满满一下子带血痰的餐巾纸。起初还在床头放了收音机，她听听音乐和新闻，后来她几乎就是昏睡，不想说话。

有一天，她让我给她找些止痛药，说头疼整夜不能入睡。我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头疼？会不会感冒了？"

她说不是突然疼的，已经疼了二十来天，只是这几天愈加厉害，难以忍受了。

"这么久你为什么不说？"我问。

"也许是感冒了，我想能够熬得住，怕你担心"她说。

"呵！可能转移到大脑了！"这是我的认为，肺癌发展后期第一可能就是脑转移，我赶紧送她到上海做CT和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肿瘤并没有脑转移，而王玲的头越来越疼，每次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并伴有呼吸急促，脸部潮红等症状。

我千方百计从网上购买了两克"AZD9291"原料，买了空胶囊和淀粉，搅拌均匀之后，用电子天平称重再一一灌入胶囊，让王玲每天服用一粒，以期奇迹出现，此药无效则再无药可试。

朋友打来电话，告知两个最新的消息：其一是新民晚报上有一则报道说，某机构在招募志愿者，符合条件的可免费服用他们治疗肺癌的特效药。其二是在浦东新建的专治肿瘤的医院开始接受病人，该医院有超前的治疗手段和设备，闻讯我们心头重又燃起希望之火。

（39）

我根据报纸上提供的电话联系了那个机构，据说是美国某公司的代理。接电话的告诉我免费服用特效药是要走程序的，因要填一些表格，他们请我到办公室面谈，至于是否符合志愿者的条件，要经美方评估后才能决定，于是我立即前往静安寺附近的这个机构。

在一幢很大气的写字楼里，我找到了这家机构，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接待了我。她一边让我填表一边跟我聊天，问得很详细，详细到我们两个人的每月收入。因为她有着与我一样的下乡经历，所以谈话比较轻松，她也给予我很大的同情，说了很多肿瘤病人应该注意的事情，还反复跟我说这个药是美国最新的科技成果，是从六十多种植物中萃取的活性分子云云。最后她拿出一份协议，要我签字，协议条款多多，大致是我们志愿接受美国什么什么机构的援助等。签完字后，她说鉴于我们的情况，尚不具备享受完全免费的条件，但考虑到都是知青，她可担保我们享受半费，并拿出一张印制精致的图表，表中可以看出此药一个疗程的原价和半价之间的对比，说我可以节省一万

八千元。

刚才听到这个特效药“是从六十多种植物中萃取的活性分子”时，已经觉得有点似卖狗皮膏的味道，到这儿，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所谓援助的实质了。我说没有带这么多钱，下次再来吧，她笑了笑道：“没有关系，可以刷卡的。”

我坚持下次来再说，临走，她居然送了我两付眼镜盒。回家网上一查，发明“特效药”的是兰州一个什么人，刚刚到美国没几年。

说说浦东那个医院吧，全称应该是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在朋友告知以前，我已经在关注这个医院的建设，从动工、落成到开始运转媒体都有跟踪，并且说得很神奇。这个技术是利用质子或重离子射线，经过同步加速器加速后高速引出，射入人体，聚焦能量作用于肿瘤组织的一种放射治疗方法。也被称为“质子刀”、“重离子刀”。看似不错，其实跟放化疗差不多，并不是所有肿瘤患者都能够接受治疗的，它对求治者筛选非常挑剔，而且每个疗程的费用都要在二、三十万以上，且不进医保。

我在网上多方搜集这个医院的资料，得知这个医院就是肿瘤医院的一个分院或科室，病人要在肿瘤医院报名，并由他们筛选推荐，这医院的领导就是肿瘤医院的领导，而我们早就对这个医院没有了信心。看看媒体是怎样报道的：

国内首家、全球少数同时拥有质子和重离子两种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今年5月开业。截至目前，已收治的46例患者中有13例患者已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

“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这什么意思？我想一个地段医院或乡镇卫生所估计每天也会有这么多病人“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的，到底效果如何？语焉不详。

再看报道，因为收益丰厚，全国到处都在上马类似医院：山东、江苏、河南……

希望再度破灭，王玲的情况越来越差，唯一的希望是看AZD9291是否起作用，而此时两克的AZD9291也快用完，再到网上去购买，竟搜寻不到原来的商家，QQ联系没有反应，打电话无人接听，托人去北京的门店看看，保安说已经被查封。淘宝、京东原来可以供货的店家全遭屏蔽，中国大地全面封杀了AZD9291买卖，据说经营AZD9291买卖不合法！

合法的在哪儿？

在上海已经没有意义，每日每夜的剧咳徒增女儿一家的忧虑，为此我们于7月22日又回到苏州家中。

次日一早，王玲在床上对我说头疼，气喘不过来，问我是否应该去医院。这么多年她极少主动要去医院的，小病小痛她都能挺，现在看来情况比较严重了。我立即将她送到附近的苏州永鼎医院，由于她行动困难，我无法又开车又要扶持，只能打电话请她的一个学生开车来送。

这是一家民营医院，医生的资历和临床经验都不能和上海的大医院比，但医生的问诊态度和工作效率都不错，况且医院的设施和环境都不比上海的查，或者可以说要更好些。

因为头疼严重，我们挂的是心血管内科，恰好这天轮值的是上海来的一个专家，他在问诊之后向我们解释了头疼的大概原因，随即开出一系列的检验单和住院单。

这是王玲最后一次住院，她，再没能够走出来！

（40）

检验结果和医生分析的一样，头疼和气闷都是由于胸腔积液过多，严重压迫肺部和心脏致大脑供氧不足造成的，插管引流是当务之急。医院连着几天给王玲引流后，这些症状很快消失，她可以起床自行洗头，上厕所，胃口也好了起来。

前不久在上海医院，王玲做了多次检查，同样的症状，没有一个医生给我们解释过原因，告知应采取的措施，即使在积液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一味地让继续化疗，简直就是不管病人的死活！

入住苏州永鼎医院后，王玲的病情似有好转，但主治医生跟我说他们仅是对症治疗，即缓解症状而已，对于肿瘤，连上海大医院都治不了，他们更是无能为力。这个我能够理解，现在所有希望就全压在AZD9291上了，AZD9291能管用吗？

王玲对AZD9291寄予莫大的希望，因为再无其他可医之药，每天服药时，她总提醒我别忘了9291。而我对此药却已经失去信心。一是王玲的基因变异不一定与此药配对，肿瘤医院不负责的态度令我对基因检测报告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二是网上购买的药物真假难辨。

即便如此，买来的两克药也眼看告罄，当下又无从购买，这对王玲来说，仅有的一点点精神安慰将要失去，剩下的时光只能坐以待毙，这个现实让关心她的人都难以接受，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买到此药！

我在微信、QQ、E-mail中给所有可能联系上的人和群发了信息，希望能够帮忙购买此药，或提供购买此药的渠道。信息发布后无论亲戚朋友，无论国内国外的都积极帮我打听，并很快有了反馈，有几条线索都有可能买到，我们选择了最近的一家，而交易过程犹如贩卖毒品一样紧张。

几番电话确认，供货商答应卖几克AZD9291原料（淡黄色粉末）给我们，说若不是熟人介绍，这笔生意断不能做的。本来应该我到上海去交易，然王玲这儿走不开，24小时不能离人，因为除了我，她不让任何人来服侍，这与老岳父当年一样：洁癖所致。

这个任务交予上海的女儿完成。

那天女儿与对方约好在莲花路地铁站碰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等到了地铁站对方却来电话说换在徐家汇地铁站，而后又换到地铁站附近的一条马路口，让女儿的车慢慢开，等他看到车后会示意的。终于在一个路口接上了头，他跳上车说“快开”，然后把药塞给女儿，取过钱也不点，即让女儿靠边停车，下车扬长而去，女儿觉得他不像药贩而像个毒贩。药到手女儿马上去药房买了空胶囊，次日驱车送至百里外的医院。

大家都在为王玲的病焦虑，奔波，许多亲戚朋友来看医院望她，有来自国外，有来自国内各地；有她和我的兄弟姐妹，有她过去的同事，有她的学生或朋友……。然而回天无力，眼看王玲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她已经不想吃饭，甚至牛奶都不愿意喝，喂她药，她有时会说“算了，今天不吃了”

不是她拒绝吃饭，而是天天十几小时的输液使得消化、吸收功能严重衰退，维持生命的营养全依赖于吊瓶输入。疼痛已经漫延全身：头疼、腰疼、腿骨疼，天天因忍耐疼痛而大汗淋漓，换上的干衣服不到两个小时就又湿透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忍着不要求打止痛针，有时医生都不忍心看她如此煎熬，对我说：“给阿姨打针吧，效果很好的，不要怕产生依赖性。”医生护士查房问她怎样，她总是说“可以，还好”，从没有一句哀怨。有时护士扎针换药几番也弄不好，她也是笑笑，让护士慢慢来，不要着急。即使在最后的日子，她对看望她的人和医生、护士仍然报以微笑。

眼看一切抗争已经没有作用，我劝她打针止痛，这样可以安睡几个小时，也好恢复一下体力，她接受了，在最后几天的半夜时分，待输液结束后我就叫护士来给她打止痛针，以减轻疼痛感。

我让护士撤掉她身上所有的管子和电极线，若需要时再插。入院以后缠绕她的输液管、输氧管、导流管和监护仪上的电极线有十根之多，这些使得她连翻身都十分艰难。输液和导流本就置有滞留针管，需要随时可以接上。王玲已经交代出现紧急情况时不要抢救，我也认为抢救没有意义，这样24小时监护仪就没有必要绑在身上了。撤掉这些之后她很满意，换衣服、换尿裤方便了，躺着也舒适得多。

2015年9月5日凌晨2:48时，在女儿和我的陪伴下，她静静地走了。

就在她走的前日，大风袭来，楼下那株大树——每年春天满树黄花的金合欢，竟被连根摧折，香销云散。

……

追忆妻子的随笔《妻子王玲》到此暂时打住，纵观整篇文章平铺直叙，没有文采且粗糙得很，盖因时间长了恐记忆模糊，不能尽多如实地反映妻子生平和为人，现匆匆写就这个框架，日后可将更多的素材和描述融入，以期能够完整地将妻子生前所有呈现给爱她、关心她的亲友。

以后我还会从某个侧面用文字来回忆妻子，以寄托我的思念。

补记

一、痛定思痛

妻子自2013年5月体检检出有疾，至2015月9月去世，辗转求治，期间化疗17次，手术两次，除此还服用进口靶向药物约18万元，中草药约7万元。27个月来，都在挂水、吃药，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中度过的，可以说苦不堪言，她自己痛苦，亲人焦虑，全家乃至整个家属都没有一天轻松过。

有句话曾经很流行“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过去，对这句话没有体会甚至有点反感，但当你苦苦挣扎，求助无门的时候，便会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站在医院的门口，眼前是熙熙攘攘的病人和家属，个个满面愁容；诊室门口同样也是挤挤插插，一个个像待宰的羊羔或等候判决的囚徒。

老病人熟门熟路却麻木，新病人东撞西碰而焦虑，医生流水般叫号，这里没有安慰，没有笑容，没有特殊，尽管你是千娇百宠，是顶梁柱，这儿也仅仅给你十几秒钟，然后就是“下一个……”

倘若仅仅是这著名的大医院如此也就罢了，你来凑热闹是自找的，然几乎所有医院皆是如此，哪怕一个地段医院，挂号、就诊也要排上一两个小时队才行，健康的人尚可，病人则是雪上加霜，实在折腾不起。

而医院则赛过银行，所有的人都捏着大把大把的钱往收银台里送，八九个窗口，每个窗口都排着几十人，此风景一直可以延续大半天，如果不是许多人用银行卡支付的话，一天运钞车要多来几次，否则无处存放。

如此昂贵的看病费用，若能享受到良好的服务也情有可原，事实是你即使花再多的钱，医院对你来说永远是陌生的，没有一个医生对你负责，跟踪你的病情，一个医生哪怕给你看了十次病，他还是不知道你哪儿得了病。医生也已经麻木，他们一天要看百十多个病人，就是一天看百十多朵花儿也疲劳了，何况是病歪歪的人。

如果医院负责的话，王玲怎么可能做17次化疗，什么样的钢筋铁骨才能忍受这样的摧残？如果医院负责的话，王玲怎么能做两次毫无希望的手术？如果医院负责的话，怎么可能会延误王玲的基因检测，那匆忙拿出的报告怎么叫人信得过？

化疗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理机能，王玲治疗前除了体检报告显示CA指标异常，基本是个健康的人，天天打拳、散步，弹钢琴，还在给老年大学上文学欣赏课。开始治疗后则身体每况愈下，最后逝于器官衰竭而不是肿瘤的恶性爆发。两次手术，没有一次能够完全消融恶性组织，后果医生应该是知道的，而告诉我们的只是术中的风险，并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消融干净的后果。王玲最后积液严重以致压迫心脏和肺部，是因为术后肺部创口始终不能结痂或钙化，体液不断渗出所致。再有就是基因检测，他们把王玲2013年活检（穿刺）标本取出而又忘了检测，则标本失去活性不可能再行检测，除非重新穿刺。但他们居然在两天后重又拿出基因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令人生疑的报告，不能断定它是否真的能够药物与基因配对。

在一个病人身上医院就可能有上百万的收入，至于病人的死活医院却无从知道，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天都有与王玲一样悄然离世的，而医院依旧人来人往，门庭若市。

凡此种种，我不想与医院计较，有人劝我“找他们去”，我还想“安度晚年”呢，不去惹气。唯一目的，希望有人一旦染病，一定要慎之又慎，治与不治要把握好，有时治反而不治；不治倒能有质量地活上几年甚至更长。

二、信仰与修养

岳母信奉耶稣，因为她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自然对神笃信、虔诚，她的一个愿望就是让女儿王玲信教，一直对她灌输神的旨意并力劝皈依，然王玲不为所动。

一件趣事。记得我们南调时，岳母天天祈祷我们调动成功，许愿如果南调成功一定让女儿皈依。在上海，岳母对王玲说，我已经许愿调动成功你就信奉耶稣的。王玲很为难，面对母亲的执着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向母亲许诺如果调回上海她就信，这里她留有一个回旋余地，母亲没有听出来。

南调成功后，岳母说应该兑现诺言了，王玲笑曰：我没有调回上海啊。她认为违心的信是对神的不敬，而不信又如何对神敬得起来，母亲的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但无论在上海还是在苏州，王玲经常陪伴母亲去教堂，如果她没有时间则让我或女儿陪伴，以致岳母认为她已经信教了呢。王玲还买了《新旧约全书》阅读，努力了解母亲的思想，以期有共同语言。她认为宗教是一种文化，接触、了解是应该的，有益开拓视野，增加知识，但是要说皈依，她认为自己还没有这个觉悟。妹妹对她说“妈妈那么想你皈依耶稣，你就假装皈依算了”。王玲答曰：“那不是说谎了吗？信徒是不能说谎的。”她还是那么执着。

我母亲信佛，相信来世，而我却不信，对她烧香拜佛颇为不屑，有时难免开导母亲一番，跟她说菩萨是没有

的，来世也是没有的，那是迷信。王玲让我不要这样做，她说老年人的精神依托不要去摧毁它，虽然是迷信，但总不能让老人家去接受科普，去破除迷信吧？想想如果母亲一日真的不信佛了，精神空虚，无所事事不得病才怪呢。

王玲得病后，怕岳母受打击不让大家把病情告诉她，不是说感冒了，就是说腰间盘突出需要卧床。岳母有时也会起疑心，问我："王玲为什么不来看我，生什么病？不要紧吧？"

只要身体稍稍恢复，王玲第一就是去看母亲，帮母亲换洗衣被、理发，（三十多年来，她父母的头发都是由王玲理的）。即使如此，岳母还是对王玲有了不满，人家对她说"你二女儿真孝顺"，岳母会说"孝顺什么？现在也不来看我，再来我都不认识她了！"她哪里知道二女儿自己正挣扎在生死线上呢！

直到今天，王玲去世已有四个多月了，岳母仍然不知道二女儿已经永远离去，我也不敢再出现在岳母面前，只要我在，她必定要问：王玲为什么不来？如果岳母知道王玲已经去世，肯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打算永远对她保密！

王玲对父母十分孝顺，几十年如一日，而对父母身后事并无打算，完全服从父母的安排，这也是她与父母之间的共识，即不搞任何仪式，不置墓地。所以，王玲在最后时刻也没有向我谈及此类的事情，她只是交代两件事：

一是母亲的监护问题。要求监护权落实给女儿，让女儿来照顾外婆。

二是要我继续关照她在黑龙江农村的舅舅和舅舅一家，在经济上予以帮助。

都说道修今生，佛修来世，一个"修"字寓意深奥，可以阐释无数，而简言之则使之完美。然修养非一定道、佛不可，信可之，不信亦可之，王玲不信道，不信佛，但是我觉得她的修养无可挑剔，无论对事对人。谨此小纪。

三、师生之情

王玲走的当天，我通过网络给所有关心她、爱护她的亲朋友好，以及她教过班级的同学QQ群发了讣告：

王玲于2015年9月5日2时48分，在苏州永鼎医院安详离世,享年62岁。遵其遗愿，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置墓地。

王玲罹病近三年，得到众亲朋友好的关心和很大帮助，在此谨向关爱她，帮助她的各位朋友，致以感谢！

我所以要将消息发给她的学生，因为王玲一直与她的学生们有着联系，有学生还说要过来看她，如果不告诉他们，学生来了岂不伤心，而且白跑一趟。

我在《妻子王玲》里写过王玲与学生们的师生感情，她视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女，每次去北方，无论北京、四

平、长春，学生们都会闻讯而来与老师相聚，在一起像家人那般谈笑甚欢。

09年在长春，那天上午我们要乘车返苏州，一个女同学特意一大早驱车到郊外的鹿场，买来新鲜的鹿茸送给我们，望着学生大汗淋漓的样子，王玲既心疼又感动，至今那对鹿茸还泡在家里的大酒瓶里。

我的讣告发出后，学生们立刻有了反应，多是震惊和伤悲，各地的学生通过QQ和微信联络商量后，决定派出两个人作代表前往苏州吊唁，并要我的银行账号，欲打款过来。因为王玲有约在先，且讣告里写得很清楚，我一一谢绝了学生们的好意，有同学一再来电话，要地址和大殓的时间，我忍着悲痛一再谢绝！

同学们的真情令我感动，我只能对他们说这是老师的决定，还望大家尊重她的意愿。随后，我把网上纪念馆的地址发给同学们，建馆不到一个星期，上网祭奠就超过一千人次，现在刚过四个月，祭奠人次已逾两千。

下面摘录一些同学们发在网上悼念王玲的帖子：

惊闻噩耗，深切哀悼！王老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正直，大气，有真知识，有风骨，有理想，有追求！她只有我们这一届学生，也只教了我们一年，却把她高尚的品格融入了学生的人生。王玲老师永垂不朽！——于多思

王老师千古！我们永远怀念慈祥、坦荡、真诚的王老师！——李皓

王玲老师把高尚的品格融入了学生的人生！——五千年后

王玲老师曾帮我补习过英语，点点滴滴都在记忆里，深深的怀念！——赵文杰

教我的时间很短，毕业20来年后，一见面她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感动流泪表情）——UFO

王老师，您永远属于三年五班。学生于重庆致哀！——传新

王玲老师是我爸认为最有师德的老师，愿你一路走好！——耿箐（这位估计学生的孩子）

下面是同学们拟的挽联：

江南才女，秀外慧中，耿耿丹心垂青史；

人生导师，品正德高，谆谆教诲留人间。

……

同学们悼念王玲的帖子还有很多，有说王玲虽是老师，但更像姐姐；有说尽管王玲找过他的家长，但他还是认为她是最好的老师。帖子内容更多的是感到震惊、意外和悲伤。我翻看同学们的帖子时，也被学生们的真挚情感所感动，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想告慰王玲的是，有这样一群爱她，认可她的学生，此生足矣！

河水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人物三章

知青A

知青A在上海与我一个区，69年插队在同一个县，但不是一个公社。70年首批知青抽调，我和A都到了一个东北较为有名的城市，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先后到这家厂的知青有近百人，有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当然最多的还是本市的。上海人在外的口碑不是太好，但这个厂的上海知青和各地知青相比较，干起活来最卖力。本来，这二十来个上海知青的工种最差，不是劳动强度大，就是污染严重。可这些上海知青在干活时藏尖耍滑的极少，一时颇得工友和领导的好评。

A是这些上海知青中最能干的一个。那年厂里任务紧，人手不够，于是调整倒班时间，变三班倒为两班倒，12小时一班。A居然会干了一个班接着干一个班，连续三天连轴转，直到在机器旁昏厥。还有一次，厂里组织青工献血，他一下子抽了300CC，按规定可以在家休息一天，他却从医院直接进了车间。再有一次更令人咂舌，他为了刷新产量记录，竟违规操作，被机器卷了进去，差点搭进自己的一条命。

如此，我们这些表现极好的上海知青，与A一比就大为逊色了，所以，A年年是厂里的先进，劳动模范，继而又是市里省里的先进，早早就入了党。他戴着红花的大照片十几年来在厂里的光荣榜上就没有拿下过。时常有个劳模会让他去参加，也时常得个笔、本子、茶缸什么的，最神气的是白背心，上面印的“奖”字很让人羡慕。

然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A的所得仅此而已，他最高职位是生产小组长。后来，许多知青逐渐崭露头角，当上了车间主任，书记，也有进厂机关当了科长甚至副厂长的，就连我也在厂里当了一名科长。老实说，有一些人靠的不是A那般地苦干，而是另一条途径。可A老实得象个“乡下人”（上海人语），嘴拙得说起话来吭吃憋肚，“批林批孔”的时候，厂党委曾让他作为全厂最年青的党员在全厂动员大会上发言，他竟哆嗦起来，党委只好换人，换上的人后来当上了党委副书记。

岁月如梭，一晃到了九十年代初，这时，我早已调到长江三角洲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工作了。春节回上海过年，碰到原单位的一个老知青，聊起A，他说，A已经回到上海了。问及原由，他叹气道厂已濒临破产，几年发不出工资，A就领着老婆孩子到上海来谋生了，现好象在一个单位当保安。

闻后，我感慨万分。这个厂原是个利税大户，是这个城市的主要财政支柱，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披露了个中原因：工人东奔西走设法养家糊口，少数厂领导新房照建，舞厅照去，酒席照吃。看完节目，我给过去的一个同事，还仍在该厂留守的组织科长打了一个电话，对他说，你知道吗，××厂最对不起的是谁？是A！他沉寂了半晌，说：可不是吗。

我去找过A，他家原住在老沪杭铁路旁边，自铁路废弃，改建高架明珠线后，就动迁到不知何处去了。今年五一，我应邀到一个也是从东北那个厂回来的老知青家里聚会，席间谈起了A，了解到一些他的近况。

工厂濒临破产，成立了清算工作组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全厂无论工人干部一律放假。随后，办理退休的退休，辞职的辞职，剩下的，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费，各奔东西。A的太太是本市人，比他小好几岁，却也早已下岗在家，一个儿子刚13岁，全家不到三百元的收入难以维持，就举家回到上海，A想上海总要比东北好一点。

上海房子不大，是父母在七十年代用电石渣掺水泥脱的砖坯盖的。阁楼上住的是弟弟一家，楼下是父母，A一家来了，父母便将小儿子的楼上间出一块，让他们栖身。原本就拥挤的居住条件，因A一家的归来显得更困难了，尤其炎热的夏天，连洗个澡都难，一家人难免磕磕碰碰。A太太是东北人，听不懂上海话，时常和公婆、妯娌还闹些误会，A夹在中间，里外难做人。他憧憬能找到一个工作，租间房子，改变一下这窘迫的处境。

回来几个月，他东跑西颠，求爷爷告奶奶也没有找到工作，他没学历，没技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没有上海市户口，也没有外出务工证。他虽持东北有关部门发的下岗证，但上海不认。本来，上海有个优待知青的政策，即在外地退休的回沪知青可以办理落户手续，一旦有了户口，就可以享受有关待遇，而A距退休还有十几年。十几年后，他才能享受的到从东北转移来的养老保险。

上天不负有心人，他妹妹通过关系，给他介绍了个保安工作。面试时，人家嫌他岁数稍稍大了些，保安，当然要年青力壮的。但一问是有着二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又曾经是省劳动模范，就破格录用了他，月薪600元。录用他的单位是个要害部门，是上海的窗口，这个年龄稍大的保安不能放在显要之处，于是，他就把守着这个单位的后门，一干，已有八九年了。

我心想，这不错吗。

可人家告诉我A的处境并好不了多少。先是东北的150元已拿不到了，原先那个厂破产至今，经办人换了几茬，原始资料都失火烧了，没人再给寄钱了。还有就是旧房拆迁之后，全家搬到远离市中心的新居，住房条件改观了，他有了自家的13平米一间屋子，虽然一家三口还嫌挤，毕竟较原来好多了（这用光了他所有积蓄）。但他与父母、弟弟彻底闹崩，虽然还是一个大门进出，但已有几年不相往来。在分房时，利害关系超过了亲情关系，父母明显偏袒小儿子，结果导致一场争战。A太太至今也未找到一个象样的工作，现在给人家饭店当清洁工，一个月260元，而

且说辞就辞。

那么至少A的工作还是相当稳嘛。稳？人家又说，其实，这个工作如果换个人干，早就撂挑子了。A的工作，干一天歇一天，也就是干二十四小时，歇二十四小时，无论刮风下雨，逢年过节不能脱班，如果脱班，按自动离职论处，就不必再来了。生病、交通、吃饭等等单位一概不管。粗粗算一下，按最低标准，每月吃饭要150元，乘车要80元，吃药20元，合计250元，那剩下的350元如何够开销？不知A的儿子去年是否考上大学，如果考上，他们该怎么办？

知青B

夏日的一个晚上，我外出寻友不值，怅怅而归。途经一家研究所，见门卫室大放光明，里面有个光膀子的汉子正在喝啤酒，仔细一瞧，呵，这不是在一起插队的B嘛！

我踱进门卫室，拿腔喝到："上班喝酒，是不想干了？"B先是一楞，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盯我看了有半分钟，突然高兴地叫起来："怎么是你！，来来来，一起喝，什么时候回来的……"随后，用搪瓷茶缸给我倒了满满一下子啤酒。我坚辞不喝，怕万一真因此丢了B的饭碗，我岂不后悔一辈子。多年不见，我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是喝酒的缘故，也是知青情结，B兴致极好，滔滔不绝，他二十余年的沧桑、坎坷就象瓶中的啤酒一样，"汩汩"地全倒在我的面前。

B是六六届初中生，本可以留在上海，因其父曾是一家大厂的厂长，文革时被迫自杀，所以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黑帮子女的他，一气之下，B就主动报名插队落户了。可能是摆脱不了家庭背景的阴影，B在乡下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喝酒，抽烟，讲粗话，因而，下乡不到一年，B的脸上生了不少酒刺疙瘩，说话也成了公鸭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然而，B从来不欺负弱小，能干活，与老乡关系也好。他是知青户里第一个结婚的，妻子是邻队的一个上海知青。结婚后，夫妻俩营造了一个很不错的小窝，喂猪养羊，种豆种菜，倒也弄个鸡鸭满院，园子里有吃不完的瓜果。后来，他们生了一儿一女，日子可说是和和满满。关于这，我在城里也早有耳闻。

七十年代末，上海有关知青返城的政策出台，这对夫妇决然抛弃了自己营建多年的窝，拖儿携女回到了梦魂萦绕的上海。

回到上海，一家四口住进了原先是父母的两居室。早在六十年代，这个居住条件在上海是属于优越的：硬木地板，阳台、宽敞的楼道。虽然卫生间和厨房是共用的，也只是两家人家合用，不象其它公房三四家，甚至五六家合用。B父此时已经平反，B也理所当然安排进父亲生前工作单位的一个下属部门——××研究所。这一切均是靠了当年厂长父亲的福荫，B一家很是满意。其时，有多少回沪知青栖身无处、衣食无着，惶惶奔命于生计呵。

B先是在研究所当工人，干过铣工，采购员，食堂管理员，后来企业不景气，研究所再没有什么研究项目，就把地盘租了出去，原来人马或跳槽，或下岗，散了。B有幸作为留守人员，就看了大门。工资虽说照旧发给，而奖金及其它福利待遇却一概砍去。B太太本来在一个生产仪表配件的街道小厂，已经关闭多年，连一点微薄的保养金都难以为继。此时，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学校读书，一家人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

当过知青的夫妻俩倒也没被压倒，他们一起做起小生意。B妻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日用品，日日略有进帐，B则夜晚到上海有名的南京路摆地摊卖衣服，弄好了一个晚上收入十几块。钱是挣了，人可辛苦。在南京路上摆地摊实际上是打游击战，工商根本就不让摆，见着就抓，抓了就罚。B头脑活络，总能感觉到苗头不对立马撤离，偶尔抓住，他就说自己是从新疆回来的知青，没有工作，你工商总得给我口饭吃吧。工商对他倒也无计可施，对一个穷困潦倒的新疆知青你能怎么样。

最能挣钱的还是赶龙华庙会。龙华是上海的城乡结合处，旧时的庙会形式沿袭了下来。B在每次庙会前大量进货，再花高价租下庙会黄金摊位，等庙会一开，什么货都俏，一天下来“白花花的银子”能净挣一百多块！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这些。B的日子好起来了，用他的话来说：当时说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其实，我做了没几年生意，已经是十万元户了，那时，知青当中没几个比我有钱的。

是啊，若不是后来神使鬼差将资金全部投入股市，B现在绝对是个大款，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92年，研究所对面开了一家证券公司，在别人的鼓动下，B拿了几千块钱投资，卖了××张认购券，中了一千股××股票，上市之后，一下子赚进×万元。原来还有这么容易的挣钱办法，B索性将这几年的积蓄全投了进去，证券公司近在眼前，上班就可以炒股，天时地理都占了，还怕不来钱？B妻胆小，说还是老老实实做生意，不要到时候跳楼。B哪里听得进，为此事两口子时有摩擦。炒股炒到九八年，B的十几万元，除了套牢在股市上的几万元，已经所剩无几。两口子的摩擦也不仅仅是打嘴仗了，动胳膊动腿，摔碗砸缸已经不知多少回了，最后，B妻提出离婚。

B的故事到此应该打住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我觉得非交代清楚不可，正是这件事，让我知道了知青情结的真正内涵。

妻决定离婚，B也同意，两人到民政部门办理手续，可怎么也拿不出结婚依据，原来在乡下办的结婚证书早就不知哪儿去了，不能证明夫妻关系怎么能办理离婚呢？B妻决定到几千里外当年插队的乡下去开证明。到了乡下，乡亲们那个亲热劲儿，问这问那，诉说B夫妻俩在插队时的种种好处。B妻也触景生情，想起当年夫妻俩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情景，不免后悔要离婚。于是，她在乡下住了七八天，只字不提离婚二字，回来后，两人重归于好。

自此B不再炒股，只是工余时间帮妻料理料理小生意，昔日在南京路、龙华庙会上“冲冲杀杀”的精力是没有

了，日子过的虽紧巴巴，但两个孩子开始出道了。

（这是给老笨的素材之二，里面关于股票的事，因不懂股，故记不住，具体数字用×表示，免贻笑大方）

知青C

五年前，一个春节后的傍晚，我在上海西区中西酒楼的门檐下等候一起插队的知青，我们是约好当晚聚会的，这也是大家分手二十余年的第一次聚会。难得下雪的上海，此时竟飘飘扬扬地飞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眼前已一派北国景象。难道老天有眼，为我们这些东北插过队的知青来点当年的背景！为避雪，门檐下的人显然多了起来。有一个女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似乎也在等人。由于地方狭小，很是不自在，我不由地打量起她来。她穿着还算时髦，但缺少身段的衬托，咋一看发型和化妆也可以，可细一推敲就叫人不舒服了，纹眉象二条扭动的蚯蚓，鲜艳的口红将脸衬得有些苍白，苍白中又将细细的眼纹无遮无掩地显露出来。这一定是个饱经沧桑的女子，我想。 “啊哈，你俩来得真早哇！”从飞雪中闪出的薛萍萍笑嘻嘻地朝我大声说道，却把我弄懵了，明明只有我一人等到现在，哪有其他什么人。我左顾右盼地问：“还有谁？”“谁，河水你还没有认出来呀，这不是孙琳娣吗！”薛萍萍指着在我身旁晃了半天的女人说。我再仔细一看，可不，的确是她，原来没认出来真是罪过。当年的孙琳娣漂亮羞涩，一副好身段，可谁想到二十六七年后的孙琳娣是这样的呢。

这次聚会之后，我陆续知道了孙琳娣的一些故事，那是一个知青，一个女知青真实的辛酸史。从1970年开始，村子里的知青抽调的抽调，找门路的找门路，陆续离开了农村。最后，只剩下两对已结婚的知青和一个孙琳娣。原来热热闹闹的集体户，此时只有她一个孤身只影。

刚下乡的孙琳娣，身材修长苗条，言语不多，见人只是微微一笑，显出两个漂亮的酒窝。我离开早，与她接触不多，但知道她是个直性子的人，且很是幼稚，说话直来直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也常常得罪人。老乡们背后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不谦虚，与贫下中农没感情，她之所以在乡下留到最后，恐怕这是主要原因。她的不幸，大概也是如此。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曾经热热闹闹的知青点就剩她一个，白天，出工干活人多还好，晚上回到土屋，孑然一人，孤苦零丁，只有伤心和苦涩。一个人无法起火做饭，她就到老韩家搭伙。原来，每遇知青的粮食霉了或柴草淋湿了，队里就让知青到老乡家搭伙，次数一多，搭伙的老乡家就相对固定下来了，这些年，孙琳娣一直就在老韩家搭伙。老韩家就三口人，韩大爷患慢性支气管炎，成天咳个不停，里里外外全指韩大娘张罗，她可是个能干人。他们有个儿子叫韩兴成，我在乡下时觉得他还是个小嘎子（东北方言，指小孩），挣半拉子工分，整天跟在我们知青后面跑。一个农村孩子，倒也长的浓眉大眼，象模象样的，别看韩兴成个小，其实，他跟我们知青年龄相仿。一天下大雨，晚饭后，韩大娘对孙琳娣说：“闺女，下这么大雨，别回去了，就跟大娘住吧，比你回去空落落的一个人强。”孙琳娣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以后，每逢刮风下雨，她就在老韩家住，她也真不愿意一个人

住在那空荡荡的知青的土屋。时间一长，屯子里的人开始风言风语，有人朝韩兴成开玩笑，说他本事真大，一分钱不花弄个媳妇，还是上海人。人们背地里指指点点，说这说那，甚至有小孩跟在孙琳娣后面喊“老韩家的媳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本来没影的事儿，被人们传来传去，倒生米煮成熟饭了。这年腊月，孙琳娣怀孕了，是韩兴成的种。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在老韩家房后商量着。

韩兴成说，既然这样，赶紧结婚吧。

孙琳娣说，不行，结婚不就一辈子在这儿啦。

那怎么办？

打胎！

听说从房上往下跳能把孩子跳下来，孙琳娣在老韩家屋顶上往下跳了两回，孩子没跳下来，差点儿摔断了腿。又听说骑马能行，韩兴成牵着匹瘦马在草原上遛了一天，屁股都磨破了，也没把孩子给颠出来。实在没法，她就尽找那些孕妇禁用的药来吃，想既然孕妇禁用，就可能把肚子里的累赘打出来。一时间，她肚皮上尽贴的伤湿止痛膏，因止痛膏上写着：孕妇慎用。过来的人都知道，万一她打胎的方法灵验的话，她将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是偏远的乡村，离最近的镇医院有五十多里路，马车要颠簸大半天才能到，只要一点差池就能要了她的性命！最后，孙琳娣决定回上海打胎。

她在上海住了大半年，本想在江南找个地方投亲，可托来托去事情也没办成，后来听说插队知青要大批抽调，就赶紧买了火车票又回到那个既偏僻又穷困的小村庄。事也凑巧，她回到村子的那天，正是韩兴成定亲的日子，老韩家在设酒款待亲家和媒人，很是热闹。原来，韩兴成他爹妈见孙琳娣一去不返，知道事情黄了，赶紧地托人给儿子说了个媳妇，本是表亲，一说即合，只等春节办喜事了。孙琳娣见老韩家如此这般，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她就没有和韩兴成结合的意思，至于怎样怀上孩子的，谁也不愿，年青人一时糊涂。枯燥泛味、劳累辛苦的日子又开始了。孙琳娣为能够招工离开农村，积极出工，连生病都挺着。平时，她很少说话，更难得脸上有笑容，因为打胎的事，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但是，村子里的人并没有因此罢休，一个“破鞋”的帽子扣在了她的头上，在东北，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侮辱。

既然是破鞋，就有人想占她的便宜，小伙子半真半假地跟在她身后，嬉皮笑脸地嚷：

“小孙啊，今晚我到你户里去，你可要留门呀……”“怎么样，到我家搭一伙吧，你看，我比韩兴成强多了。”这明里的调戏，孙琳娣倒也不在乎，她就怕晚上在门外转悠的二赖子，有些个甚至是几里地外其他村子的。所以，一收工，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胡乱吃点东西，无非是窝窝头或高粱米饭。无聊了，听一会儿收音机，有时听着听着，突然就哭了起来，她太向往外面的世界了，可是，抽调的消息还是没有。

开春后的一场透雨，催得苞米苗儿“哧哧”往上长，不多日子就有半人高，一遍锄才铲完，二遍锄就接上了。铲地不是细巧活，只要把草锄尽，不伤苗儿就行，孙琳娣下乡五、六年，干这活儿已驾轻就熟。这天，打头的白老二领着十来个劳力在西大壕铲二遍地，孙琳娣把着一条垄不紧不慢地摆动着锄头，她既不在前，也不落后，估计再铲一条垄就该歇憩了。

“打头的，你看看，这个孙琳娣咋整的，把好好的苗都砍了，都寻思啥来着？”说话的是韩兴成过年时刚娶的新媳妇。

孙琳娣回头看看自己刚铲过的地，只见东倒西歪地躺倒了好些苞米苗，她奇怪，明明自己一棵苗也未伤，怎么就倒了这么些呢？当她看见韩兴成媳妇那狡黠的目光时，她明白了，她气愤地骂了声：“不要面孔，贼喊捉贼！”“你骂谁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呢，你这个破鞋，看我不煽你……”韩兴成媳妇说着，冲到孙琳娣面前抡起巴掌就打。孙琳娣也不甘示弱，两个女人就扭在了一块儿。

打头的白老二跑过来，拉开韩兴成媳妇，骂道：“你还打人，这苗儿是谁砍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明摆着呢，骂你也是活该！”他又安慰孙琳娣说：“小孙，算了算了，她这个人谁不知道。”“放心，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白老二接着说。

果然，那天在西大壕的冲突发生之后，再没人在孙琳娣后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也没人敢骂她破鞋了。这个村子，老白家说话具有镇慑作用，白老二的大哥此时已是一把手队长了。挂锄前的一天，孙琳娣身上有些不适，就没有出工。下午她躺在炕上，就着凉水吃上海带来的苏打饼干，从早到这时她还没吃过东西呢。

“笃…笃……”有人敲窗子，孙琳娣朝外望去，是白老二。她赶忙起身把门打开，只见白老二手里端着一只瓢，瓢里有七八只鸡蛋，他边往里走边说：“哎呀，小孙，病了就到我家去吃，让你嫂子擀点儿面条。”然后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将瓢往炕上一搁。“哎…啊…，…是啊…我好多了，白组长，收工这么早？”孙琳娣觉得有点儿奇怪，这时候白老二应该领着大伙在地里铲地。

“这不是你病了吗，一个人也没个照应，大哥有点儿不放心，给你拿几个鸡子儿来。”白老二说。听了白老二此话，孙琳娣的眼睛湿润了，自从上海回来，还没有人这么关心过她。她感激地朝白老二看了看，说：“谢谢！真…真的谢谢……”一时语塞，竟抽泣了起来。孙琳娣这一哭，就有收不住的样子。她越抽泣越厉害，索性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她是哭自己的遭遇，哭自己的不幸。白老二取来毛巾，说：“小孙，别…别…，你有事跟我说，放…放心…，大哥会帮衬你的。”说着，拨开她的手，用毛巾替她擦眼泪，就势将孙琳娣的头靠在了自己的肩头，另一手搂了过去。孙一下子止住了哭，从白的怀里挣出来：“不…白组长…不，不行！”“小孙，你跟我好吧，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让我哥到公社讨个招工指标给你？”白急切地说着，又上前搂抱孙。孙挣扎着：“不…不

行…”可白的胳膊还是紧紧地箍着她。此刻的孙琳娣突然明白了白的来意，原来他动机不良！“白组长，你还是快走吧，我要出去呢。”孙想尽早摆脱他的纠缠。

白老二早就对孤身一人的孙琳娣垂涎欲滴，上次西大壕发生的事，他觉得是天赐良机，于是就帮了孙一把。今天孙有病，他特意将村里的劳力领到远远的东甸子铲地，然后假装有事，自己偷偷地跑到孙琳娣的屋里来了。他原以为孙琳娣这个破鞋一引就会上钩，没想到会拒绝，该不会是装的吧？他开始动手扯孙的衣裤。这时，他有恃无恐，他想，不管怎么样，全村的人都知道孙是个破鞋，事情捅出去，人家只会认为是孙主动的。病中的孙如何敌挡这强壮男子，这时村子根本没有闲人来往，知青户的屋子又偏僻，任你怎喊叫也没有人听到。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下孙琳娣被白老二强暴了。白老二临走，扔下一句话：“你要想走，就别吱声！”

果然，收割之前，公社下来招工指标了，其中就有孙琳娣。从下乡那年算起，孙来到这个村子已经八年，如今，她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漂亮的姑娘了，在她的脸上，过早地有了川字，皮肤也一如当地农民，被紫外线灼得发红发黑，更重要的，是她心灵受到的创伤。孙琳娣简单收拾收拾，扔下锅碗瓢盆和零散的东西，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她，将屈辱和贞操留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再来的乡村。

河水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30日，可是华知一周年大庆。晚，早早就想打开电脑，时气温高达38°，电脑还没有搬进空调房间。奈着性子等到9：30，开机上网，一看，聊天室已有不少网友，正忙乱着，这个在试语音，那个在找人，主持人虫二不知为何，几番挣扎可就是进不来。几个语音不通的如由于等，在旁边一语不发，只顾冷笑。顿时我有了优越感，对着话筒："喂…喂…有声音没有…"没曾想有人对我说："请把麦克关掉。"随即++0就开始遥控指导如何关麦克。我向来是个遵纪守法的人，领导让咋办咱就咋办。比如一进去，大卫就告知：请在名字后面加个拼音字母，别人都无动于衷，只有我和叶子跑到外面添了个尾巴再重新进去。难怪南风奇怪，一个劲儿问：叶子、河水为什么都拖个尾巴？

关吧！按++0的指示，我狠狠地点了一下关闭麦克的图标，心想大不了和由于一样（不公平，有麦克和没麦克的一样待遇）。待轮到我表演时再打开不迟。

然而，号子公布报名名单：没有河水。

我看到庆祝华知一周年联欢会的通知，就开始作准备，挑了两首关于知青的歌曲《寒风吹破了窗户纸》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还特意将歌词打印了出来，想唱时不要忘词，然后又给号子发去E-mail报名。28日（或29日）晚，在聊天室试语音，问号子是否收到我的报名，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紧张地期盼联欢会的到来，30日白天加班，在单位里还将两首歌练了好几遍。

终于，联欢会要开始了，聊天室里已达30人，据说门口进不来等退票的还有很多人呢，这是华知的空前盛况！（真为华知高兴）

此时，关键人物主持人虫二还在徘徊，找不着门儿呢，看来，他是指望不上了，智囊团决定换马。毛遂自荐的不少，可后来到底由谁担纲我却没弄清楚，当时只顾和几个网友聊天了。

"大山的子孙吆……爱太阳喽……"一声高亢的歌声传入耳朵，还有音乐伴奏，那是大骝在唱，简直就是原装。一直以为这《山路十八弯》只能为女歌手垄断，这回大骝可为男子汉挣足了面子。

只见屏幕上乱成一片：

"好极了！"

"有专业水平！"

"是放的录音吧？"

"真棒！"

……

大骝也真老实，唱完之后还忙不迭地解释：“绝对不是放录音，绝对不是放录音……”

谁还真的认为是放录音呢。

待第二个网友表演的时候，耳幔里传来的是奇怪的声音，细一琢磨，是被拉长了的歌声，居然也是有板有眼，只是一拍成四拍，四拍成八拍了。再看屏幕，字条不滚动了，打进去的喝采不知飞哪儿去了。

电脑中暑了！网友们这个让我塞点冰进去，那个要我洒点水，南风说最好用电扇对着吹，我想这是个好办法，可吊在头顶的风扇拿下来的话，会不会把我的脑袋削掉呢？我决定用扇子扇。找来多年不用的蒲扇，对着宝贝电脑使劲扇了起来，不对，还得把小房间的门关上，否则妻子不骂我才怪呢。她早就对我迷恋华知、老三届耿耿于怀了，“就知道华知、华知，女儿还有几天高考了，你一问也不问……”

嘿，真有效果，屏幕滚动了，恰恰又是大骝在演唱。当他歌中唱到：“见面容易…拉话话难…”的时候，我不失时机地给南风发了一条“我们这儿是‘拉话话容易见面难’”之后，屏幕又死了，老骝那动人的歌声变成了牛吼，电脑又有情绪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跟各位网友告别，想千万不能把机子给烧了，这可是妻子一直盼望的事情。

到底心有不甘，临关机前，又到老三届聊天室看了看，嗬！居然也有十四五个人，原主持人虫二居然在此打杂，他倒能屈能伸。一些没等到退票的网友在这儿也就罢了，那由于明明已经进去了，怎么也跑到老三届来了呢，莫非有两个“天心”“安然”之后，又出来第二个“由于”，要不由于就是来倒票的。

参加这次联欢会，高兴的是天南海北这么多网友心里装着华知，高兴的是与许多熟知、敬仰的网友碰了头。不尽如人意的是联欢会的语音效果不甚理想，还有就是不见老地、大青树等网友，总感缺憾。

（联欢会的当夜，本人就开始上吐下泻，高烧，今日方退。趁病休在家，身子恢复轻松之时，写上一贴）

2001-07-0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刚买回电脑的时候，主要用于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我最喜欢玩的是“美少女工场”：苍穹之中一个雄浑的声音宣告：“白云鸟，现在赐你一个落难公主，从此她就是你的孩子！”随即电闪雷鸣，惊石裂地，狂风过后，树下果然放着一个襁褓，这就是我的公主啦！

庄严神圣的场面，使得我内心有一种感动，好象这个真的是我的女儿。我开始了养孩子的琐碎的过程，喂她吃喝，带她学琴，学跳舞，学修养礼仪……，但钱总是不够，常常在女儿8、9岁的时候，就没钱了。我要去寻宝弄钱，我到处去碰运气，希翼在丛林里的毒蛇窝边，挖掘出一块绿宝石，在重兵把守的皇宫里，偷出一些金银，有时还要和几个围绕着要抢我的珠宝的海盗大打出手……。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律也很真实，有钱可以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可以每个月把女儿送进皇宫和皇后聊天，和王子培养感情，这样女儿长到18岁就可以嫁给王子。但是我养的女儿，不是因为没钱吃饭而夭折，就是因为没钱受良好教育而嫁给屠夫！

一怒之下，我不玩了。听说网上世界很丰富，我决定追赶时髦也上网。我是99年3月份上网的，以下是几个月来在网上的漂流记。

三月：网上果然很多网站，如夏天的游泳池挤满了泳客，就连版面设计、内容分类也和泳客的着装般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虽然信息量大，更新也快，但那些信息报纸上也可以看到，文章都是语言枯燥，让人读了标题就不想读下去。乏味，乏味！还不如买张报纸，悠悠地泡壶好茶，慢慢地看完新闻再看闲情版。咦，找到一个游戏网站，可以和别人一起玩，我也加入进去。在游戏里我是一个女侠，和一个大侠一起寻找武功秘籍，他是个游戏高手，很耐心地带我玩。在我纵跳山崖失脚跌落的危险关头，他一个虎跃轻舒猿臂把我相救，（这会儿真实的我，有一点儿心动）晚上我们在月凉如水的荒野，吟诗作对、吹箫弹琴……唉唉，真实的他，是这麽英俊勇敢正义体贴吗？扪心自问，真实的我，也未必如游戏中的我般美丽温柔聪敏武艺高强……。

四月：在网上发现有个「知青沙龙」，有好些知青在缅怀争论过去，我百感交集，回忆起过去艰难的岁月，想说的话很多，但写不出来，所以只贴了短短的帖子。但有网友写信给我，说我说的好！这下我来劲了，思潮滚滚而来，帖子越写越长。兴奋之下，还搞了自己的主页。我的朋友在教我做主页的时候，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分不清pcu还是cpu之类的小事吗？

五月：5月1日搞了个网上知青大聚会，一下冒出很多知青来，再翻看以前沙龙的记录，原来有很多潜龙卧虎呢，以后说话可得小心。5/8事件后，网上顿时热闹起来，亲美派和亲中派在激烈地争论，可以想象他们脸红脖子粗的模样，在这大是大非的关头，我当然也要表白我的立场。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不会吵架，初尝和人争论的滋味，原来也很有意思，以后我就在网上到处巡睃，看有什么可吵的，就进去凑凑热闹。虽说是闹着玩的，但也会心跳加

速，睡不安宁。呵呵，还是与人为善好呀，老祖宗的话还是要听的。

六月：网友介绍我开个xICQ，说可以解闷。我打开在线的名单，眼前不是脑后飞舞着小辫子的干瘪小老头，就是戴着单眼罩满脸大胡子的海盗在呲牙咧嘴，这是谁设计的脸谱呀！即使是虚拟的世界，也令人觉得恶心。幸好还有盖茨，他竟然穿着中山装，戴着60年代的干部帽，可笑之至！我挑了一个盖茨和他聊天，但他聊了没几句，就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怪不得有些朋友听说我上网了，意味深长地朝我眨眨眼睛。罢，罢！ICQ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玩的。

七月：带着孩子去旅游，置身在美丽的景致，我也常常会想起网上的朋友，想起网上的争论和欢乐。一回到家，便如饥似渴地扑到电脑前。什么时候，网络竟悄悄地占据了我部分的心灵和生活？

八月：正在进行女性主页大赛，大开眼界，我也在努力改善自己的主页，我想把她营造成展现自己个性、重温过去那个疯狂年代的一片天空。但看到网友评论，搞个人主页的都是一些自恋的人在为自己作纪念碑，我有些伤心有些委屈，但内心不得不承认这话未必全错。

也许网络只是信息时代的一种工具，不应该把它贵族化神秘化，更不应该让它取代我们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与情感。一阵清风扑面而来，是应该清醒清醒了！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花季的回忆

我下乡的林场，离广州只有10公里。我们作业区拿政府拨下来安置知青的钱，给我们盖了一栋2层的楼。女知青住上面，男知青住下面，楼前面还搞了一个简易篮球场。周围种了很多白兰树，所以空气中经常飘荡着芳香。宿舍楼往前一点，是一座小桥，小桥的侧面，氤氲的小树林里，隐现着一座红砖平房，那是一所中专。

这所中专的学生都是推荐上学的老三届知青，而且大部分来自海南建设兵团。据说他们中不乏连长、指导员之类的知青中的佼佼者。他们和我们这些步他们后尘的小知青关系不错，我们有时候开联欢会，有时候开运动会，经常在一起打打球。

晚上收工回来去食堂打了饭，我们经常靠在二楼的走廊上边吃边看楼下的球场。常来打球的学生中，有一个叫CJ的最引女知青注意。他长得高大、俊秀，还带有一种书卷气，听说是他们班上的学习委员。虽然他的球技不怎么样，但吸引了最多的视线。

有一次，广州市要举办职工运动会，中专所在的系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年轻人最多的中专。但那班中专生年龄都在25岁以上，他们没有致胜的把握，而他们是兵团培养出来的，有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所以他们把眼睛盯在了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小青年身上。他们请我们几个知青，混在他们当中出战。我们也乐得脱离一下沉闷的环境，见识多一点总是好的。

何况我们被安排住在动物公园集训，还有衣服发！我们每人发了两套运动服，绿色的上衣，白色的短裤，一对解放鞋，穿起来可精神啦！报到的时候，我发现CJ也来了。

动物公园的领导很支持我们，把职工大礼堂隔成两半，我们男女各住一边。老虎和狮子的口粮被悄悄地扣下一点，成了我们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狼吞虎咽的美食。每天清晨，我们沿着垂柳依依的湖边慢跑的时候，眼睛净往人参果树丛上瞄，要是发现有熟了的，就假装绑鞋带拉在后面，把果子摘下来，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偷地吃，然后大声地笑，大声地唱歌。

我们训练完后，就在动物园到处逛，经常会看到CJ坐在湖边看书，有时是在琅琅的读英文，这使我们对他产生

了崇拜。我们不敢主动跟他说话。料想不到，有一次他却跑来找我们，说刚出生了一只小麋鹿，他认识饲养员，可以带我们进去看。

小麋鹿真是可爱极了！小小的身躯与它的母亲不成比例，眼睛是碧绿的，非常澄净，正怯怯地看着我们。我们都说，见识过这么纯净的眼睛，世间所有的什么绿宝石、玛瑙都不值一提了。

后来，我们常常一起拿着饭碗跑去猴山逗猴子，一起捧腹大笑；后来，在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他常常追上我，好象无意中碰上，其实我早看见他在路边的小店里，见我经过才钻出来；后来，他问我喜欢不喜欢鱼，他养了很漂亮的热带鱼，邀请我去他家看鱼。

上他的家？我一下心乱如麻！当时，我才18岁，现在的人18岁时，有可能已经是情场老手，可我们那时，还真不敢想这些事情。我姐姐那一代女知青，很多28岁了还没有男朋友呢。我跟他在一起挺愉快的，我也喜欢他，但……，我不知怎么回答他，突然间，可能是被宠坏的女孩子潜意识里面的恶作剧使然，我想刺刺他，我冒出一句话，我看到他脸色一变，表情很受伤，默默地再没出声。

以后，林场的篮球场上没有了他的身影，我再没见过他。

冬天不知不觉地来临了。每年这个时候，广州公园的湖都要把水放干，把养肥的鱼刮起来，顺便把湖底的沤臭的淤泥清掉。这些脏臭的活儿，通常交给我们知青干。

没有蓬的卡车，冲开刺骨的寒风，把一车子瑟瑟缩缩的知青带到东湖公园。我们都有经验了，去挖塘泥的时候，只穿很少衣服，而且穿自己最破的衣服。因为这种重体力的劳动，出汗很多，而且溅得浑身是烂泥。

休息的时候，我们都找个晒得着太阳的地方，坐下晒干身上的烂泥，暖暖因停了劳动而冷得哆嗦的身子。

南方的冬天，依然绿树婆娑，远处的一品红，一簇簇地红得烂烂漫漫；遍地开满了紫的、粉红的、黄的、鲜红的蝴蝶花，轻盈的花瓣就象飞满了翩翩的蝴蝶。

可是我们看着这些无动于衷，有些甚至头都不抬,我们的脸上一片麻木，夹杂着一丝悲呛。是啊，这个城市再美也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户口不在这儿，我们是被从小长大的城市遗弃的一群，我们现在在这里，只是因为需要我们来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

我们一堆一堆地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互相掰着同伴身上的烂泥，离远看可能象猴子在互相抓虱子吧。公园里的游人都绕道而行，这个角落太臭太脏了。

可是有一个人玉树临风般向我走来，他是CJ！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他喜悦地看着我，说他正在这个公园实习，听说有一帮知青来清塘泥，他就来看看我在不在，想不到真的找到我。

大半年没见，他瘦了好多，他还恨我吗？我局促不安，身边的女伴已发出了吃吃的笑声，我老觉得有一撮头发在戳我的眼睛，于是我把手伸出来，想拨一拨头发。

天哪，我真恨不得有个地洞给我钻进去！我的手，因了粘满了稀塘泥，而又黑又大！掌纹清晰地被放大，粗糙得如同老农的手。我这才意识到我现在的形象：我的头发被凛冽的北风吹得蓬蓬乱乱，满脸是泥星点子，身上穿了我最破的衣服，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赤脚上也是粘满了稀泥而又黑又大又臭……我不敢打量下去了。

他也觉察出我的窘态，和我谈了一会就走了。

一直到现在，我都耿耿于怀，我不能想象自己曾经以这样的形象站在喜欢的人面前！我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的「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农村女团支书找男党支书谈工作的时候，都要往脸上抹雪花膏，让自己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香味。

在那一个鼓吹女性男人化的年代，革命的女团支书都尚且有爱恋中的女性的一点隐秘的心思，我的耿耿于怀应该不算过分吧?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广州

白云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不过是贪玩，体育嘛那是“浑身系刀无把利”（粤语：样样都会点没一样精）

我这人贪玩是出了名的，读书时候历史语文课做数理作业，凭记忆力好对付考试，所以从不用带作业回家，确保大量业余时间玩。从小就满街跑玩“中国——美国”追逐、跳格格（拿粉笔在地上画飞机、田字等，在格子内跳）、甩石子、跳橡皮筋、跳绳、踢踺子、甩膛螺、滚铁圈、拍纸牌、打扑克……很清楚记得，小学的我放学回到家把书包一甩就跑出去玩，“小南——回来洗澡——”奶奶那又尖又长的声音在小巷回响，我好不情愿的被她拽回家。洗完澡，我一转身又溜出门疯去。“小南——回家吃饭——”！我又随奶奶的叫声跑回家。吃完饭我又第三次跑出去玩。九点前，我在“小南——回家睡觉——”的叫声中准时离开战场。那三步曲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现在的孩子绝对没有那样的福气。后来受爸爸影响喜欢上象棋，弟弟却喜欢下军棋，我输了就陪他下军棋，他输就和我下象棋。初一时候，我忘了什么原因得奖品“跳棋”（棋子玻璃球），我疯玩到上课也开小差，特别有同学缺课的时候，我就想我从这个座位跳到那个空座位，东跳西跳最后跳出课室玩去。那年，我玩得最拿手的是荡秋千，蹬得几乎与秋千架子平行了，同学们在下面惊呼“要反秋了！反秋了！”（意思是要翻过架子了）。可能我平衡神经好，不怕。也许荡秋千使我从不晕车晕船。贪玩总会磕磕碰碰受点伤什么的，因为是自找的所以就特别勇敢，不哭，象老地小时候那样，从衣袋裤袋里掏些衣泥捂伤口混过去。

贪玩的孩子是有体育素质的，但我怕苦怕累有点娇气，所以总不成器。初一时候体育老师居然说我柔软度好，叫我练体操，我最怕跳鞍马和平衡木，所以没有正规练就自动退出。接着我猛长个子变得瘦高瘦高的，老师又抓我去练跳高。我荡秋千这么勇敢却怕那沙池上的竹竿，跑呀跑呀跑到沙池前面却用手把杆子扫掉，老师气坏了也就对我失去信心。老师走后，我自己却又觉得跳高好玩，很仔细观察过跨越式、俯卧式和背越式。下乡海南后曾经拿竹竿放树上，下面铺稻草玩跳高。初中时候老师还抓我练中长跑。我没好好练，因为要很早上学，我从来就睡懒觉惯了，不迟到就很不错了。所以也没练成。不过，中长跑是我强项了，校运会我的400、800米跑都有名次。越野跑得过全校第三名。还有篮球、羽毛球、排球都沾过边，但都不成器，只有篮球比赛时候，总有我的份儿，其实主要因为是个子高。其实我最喜欢足球，读书时候没有女足，只有当拉拉队的份，那时想过，如果我是男孩就好了。

真正象点样的除了中长跑外，就是乒乓球和象棋了。曾参加了校乒乓球队，那段时间我住校，所以逼着起早床练球，练脚步、推挡、削球，我还算认真。可是为了提高扣球的力度，老师居然要我们练举重提高臂力，我怕极了，加上天寒地冷的早起床很辛苦，我又自动退出球队了。毕竟练过一下，所以在农场比赛保证第三名（好手实在太多），但回城至今，始终保证本单位冠军。象棋也可以保证头两名（原因是女的下棋实在太少了，我的棋术还很

臭的，属于没棋路一类），最得意是我同科室一个男士总下不过我（不是我厉害，他是初学者），记得一次出差堵车，我和他在小车上连下六盘，我全胜！我答应他回办公室不说，但那次出差的材料由他负责写。

我把体育活动当着玩，自己玩不好就爱看。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乃至全运会等大赛，就是我的节日，可以昼夜颠倒狂看。同事很奇怪我精力那么好，晚上看电视，白天照常上班。我归功于爱玩，爱玩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老天爷知道我爱玩，命运安排我主管省职工体育工作。群众体育不是竞技体育，出发点是为了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提高职工身心健康，也有玩的意思。比如自行车比赛，竞技体育是比快，我们却比慢，看谁骑得慢骑得稳。我们搞过各种趣味体育比赛，适合各种层次职工参与。当然我们也抓正规比赛。前年我具体搞了省职工足球赛，决赛时候国家足协领导也观看了并帮我们颁奖（他们正好在广东开会）。北京市足协主席对我说“你们的决赛水平比北京高两个档次”，年潍泗也来了，对我说广东的球队下去了，但群众足球却全国领先。听得我乐滋滋的。我省好多企业养了球队，球员很多是从足球体校招到工厂的，他们互相找机会比赛。我现在的心愿是尽快搞全省的职工足球甲乙级联赛，让更多的足球发烧友有机会比赛，为推动全民健身尽我所力。

说到俺村奥运会，我真希望回到小时侯玩的那些名堂，追逐、跳格格、甩石子、跳橡皮筋、跳绳、踢踺子、甩膛螺、滚铁圈、拍纸牌、荡秋千等等也列人比赛项目，我可以捞很多块金牌啊！

本贴由南风粤韵于2001年7月18日22:59:35在乐趣园〖老三届〗发表.

——

本贴跟从标题:

广东话要全这样倒也不难懂。浑身是刀，没把快的 hangs 23:38:14 7/18/01 (无内容)

支持南风的提案，所有儿时玩过的游戏均可列入项目。

俺在工厂团委时也组织了首届自行车比慢赛，获得第一的是个被劳教过的青工，俺跟工会主席干了一仗才使他领到了奖。当时最好玩的还属组织拔河赛，那种热烈气氛俺至今难忘。

老地 23:34:29 7/18/01 (158)

你拍一我拍一、丢手绢、老鹰抓小鸡等算不算？ 南风粤韵 00:03:52 7/19/01 (无内容)

算，包括“逗虫虫，虫虫飞喽”都算。 老地 00:21:54 7/19/01 (无内容)

其实你有个强项盖天下的咋不说 hangs 23:46:02 7/18/01 (32)

哈哈对极了！ 南风粤韵 23:58:50 7/18/01 (无内容)

对什么？那是另一范畴的事，又不是搞声乐比赛。 老地 00:23:59 7/19/01 (无内容)

是运动啊，你想半夜钻鸡窝的人，怎么地气功练得也上级别了吧！ 由于 14:09:07 7/19/01 (无内容)

那老地主专司奏乐好了，一唱雄鸡天下白。 99 13:13:47 7/19/01 (无内容)

今天我生日，想起儿时的趣事——

我生于1950年农历5月14日，新历是6月28日。广东话6。28是好日子，音是“路易发”即一路顺风容易发达。所以每到6月28日开市庆典活动都多。可惜我生日是算农历的，结果换算为新历后年年不同，今年生日是7月4日。从不过生日的我坐到电脑前想说点什么，想到老地一篇“五十感怀”那么精彩，好象什么话都给他说完了，我就说说妈妈说我儿时的趣事吧……

51年前的今天凌晨我来到人间，“怎么又是女的”？大人们失落之余却又乐开了，好一个白呼呼胖嘟嘟足足8斤重的大胖女婴。原来我上面已经有两个姐姐，妈怀了我后，大人们就认定我是男孩，说要让我象爸爸一样高大威猛。那时侯我家还算殷实人家，可以让我妈吃好吃足，于是各种营养品连补针一起猛灌我妈，我在娘胎里猛长，以至人们以为我妈怀了双胞胎。我快出生那个月我妈弯身洗澡都困难。接生的王医生见到我这个先天很足的婴儿格外喜欢，不怕7月酷暑老跑我家，亲自帮我洗了1个月的澡。她爱边洗边说我象“剥皮鸡蛋”（指剥了壳的熟鸡蛋很白嫩的意思）。后来她向我妈透露了心思，原来她没有生育能力，先生在香港，她准备抱养一个婴儿去香港定居。她瞄准我是以为我家女孩多好说话。当然选错了目标。这事到我妈那里就止住了，奶奶脾气不好知道了一定会对王医生黑脸。不久后王医生移居香港了，但始终没有如愿的抱养孩子出去。当年我没被人抱去资本主义的香港，伴随着社会主义祖国成长。那个“剥皮鸡蛋”后来下乡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热带雨林摔打，真的几次被烈日晒得“剥皮”。我还很清楚记得在高山上大会战挖穴种橡胶，头顶火辣辣的大太阳，山风却吹得草帽掉脑后。我晒得满脸和手脚通红，洗脸也痛，衣服碰到手脚也痛。接着皮肤变黑后就开始脱皮，脱皮阶段已经不痛了。我对着镜子把脸上整块象白膜般的表皮剥下，还觉得很好玩。其实那是深度晒伤皮肤，从今后在脸上留下黑斑版图惨不忍睹。

对比现在的姑娘们的百般保养，我说起这些她们觉得好恐怖。

妈妈还告诉我说，我爸爸很喜欢抱我，我满月没几天，天上飘着小雨，爸爸居然抱我到天井淋雨，说“要让这丫头从小经风雨”！吓得我奶奶连骂带叫把我爸赶出天井。也真应了爸爸的经风雨那句话。51年了，经历了共和国多少风风雨雨啊！57年上一年级，听说幼儿院那个很疼我的老师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后上吊死了，这事犹如一股冷风掠过我幼小的心灵，那个伤心居然留到今日还清楚记得！接着，饥荒、四清、文革……真是见识了太多太多政治风雨。当然忘不了我下乡海南岛见识的台风暴雨，那呼啸而来的台风把我们刮倒在地，我们几个知青手挽手想站起来往营房跑，可根本无济于事，都在风里雨里挣扎，满身泥水极度恐慌。我现在想，51年前爸爸说让我经风雨不知是

不是这样的风雨？反正我从没问过他。

妈妈还说过我小时候特别怕脏。51年奶奶和妈妈带我回老家农村住了一年多，一岁的我比其他孩子早学会说话，但就不会走路。我两岁了坐在竹轮椅上知知喳喳什么话都会说了就不肯下地走路。好多人笑话我笨我会还嘴就是坚决不走路。一天一个远房姑姑拿了一双花布鞋帮我穿上后，我突然下地登登登的连跑带走的把大家都惊呆了。“原来你会走路的啊”？我这时候才告诉大人们说：“地下这么多鸡屎，我怕”！原来农村的孩子都不穿鞋，大人老不给我穿鞋我怕脏就不愿下地。我还记得五十年代肺痨病没有特效药，冬天，患者好多是出门口晒太阳。我清晨上学时候，家小巷口总见到一个在门口晒太阳的痨病老头，我怕极了，以为周围的空气都是痨病菌，常常掉头绕道上学。我怕脏的事情妈妈记得很多……可是下乡真的可以让我脱胎换骨！好笑的是我下乡海南第一天劳动是挑肥料去给农作物（忘了什么作物了）施肥，那是草木灰和人畜粪尿混合的肥料，老工人用手抓撒，我也毫不犹豫的跟着用手抓撒……我同班一个女生到海南后得了肺病，为了减少相互传染，她一个人住一间茅房。当时我已经调到团部，刚好离她的连队很近。我很同情她，根本不怕传染，好多次去陪她合铺过夜。团部宣传队一个好友得了肝炎，我也不避忌的和她一起吃喝。我想当年我那样做不仅仅是友情为重，很多是一种同是知青的特有情怀。我早已不是那个儿时怕脏的我了。 还有很多很多儿时的趣事，可是和知青话儿连一起就不是趣事了，可惜女儿不一定爱听和听得懂，就在我们的知青家园说好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前苏联歌曲和它的故事(1-6)

一、《青年近卫军》

1922年四月，共青团诗人、政工人员阿历山大·别泽勉斯基被招到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委员会托他写一首歌。其实，别泽勉斯基早就想写首新歌，可是共青团还没有自己的作曲家。他建议采用现成的曲调来填词——那是由几位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外国同志所唱的一首歌曲曲调。

这个曲调的起首句原是奥地利梯罗尔省的民间小曲，流传已有二百多年了。海顿的G大调交响曲、莫扎特的E大调嬉游曲和歌剧《魔笛》的终曲、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都采用过这一曲调。

给别泽勉斯基的限期是三周。但年轻的诗人一下子来了灵感——他从团中央书记办公室出来，走两层楼梯回到共青团的集体宿舍只不过一刻钟，他就写出第一段歌词："向前去迎接黎明，同志们，去斗争！…"到深夜3点，四段歌词全部完成。又过了半小时，团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被别泽勉斯基的电话叫了起来听这首新歌。大家听了不光是喜欢，而且觉得它一字一句都令人热血沸腾，于是大家立即分头把歌词复写了许多份。到了早晨，越来越多的被吵醒的人都在唱这首歌曲了。

《青年近卫军》很快就流传开了。1922年10月在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整个大厅都齐声高唱这首似乎早已熟悉的心爱的歌曲。1923年由作曲家舒尔根改编的《青年近卫军》第一次出版。这以后，无论是游行集会，或者在学校晚会上和野营篝火旁，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卫国战争时期，顿巴斯矿区克拉斯诺顿的一群青年就以《青年近卫军》来命名他们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他们在监狱里，在刑场上都高唱这首鼓舞人心的歌曲。这些情景，我们可以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读到。

这首歌早在1926年就已经被介绍到我国来，第一个翻译这首歌的是瞿秋白，他当时译为《少年先锋队》或《少共国际师》，刊载于当时的中国青年社出版的《革命歌集》上。

二、《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恐怕没有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更熟悉更喜欢这支叫做《卡秋莎》的歌曲了。这支曲调优雅的苏联歌曲自诞生之后立刻传遍了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甚至包括敌人在内。

1938年，莫斯科著名文学家芮宁准备办一本杂志，他把作曲家玛·布朗介尔和诗人米·伊萨柯夫斯基邀请到编辑部，希望他们为创刊号写一首歌。

离开编辑部，在归途的汽车上，作曲家对诗人说，他当时在领导一支爵士乐队，他需要一首可供乐队演出的歌曲。伊萨克夫斯基想起了不久前才写下的八行诗，于是当场写下来交给了布朗介尔。歌词所表现的诗情、纯真和音韵美一下子打动了作曲家。歌曲很快就谱成了。乐队指挥维·克努舍维茨基也十分喜爱这首歌，连连催促要其余几段歌词，布朗介尔只好去了一趟雅尔塔。他在疗养地找到伊萨克夫斯基，把他那一大张写满诗句的草稿要了来，从中选出八行诗，这就是现在的《卡秋莎》。

歌曲的首次演出在联盟大厦圆柱大厅内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员们不得不重唱了三遍。于是，这首歌很快就在全苏流传开来。一开始人们把它当民歌来唱，往往自行填上各式各样的词。歌曲后来还流传到国外。二战期间，意大利游击队把它的音乐动机发展成为一首叫做《风在呼啸》的战歌；在保加利亚，游击队有时用它作为口令；在法国和美国，也填上其它内容来演唱。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军队第一次使用了一种新型的火箭炮，给了德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于是，苏联士兵给这种火箭炮起名为“卡秋莎”。

伊萨柯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晚报》上谈到过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卫国战争期间，一天傍晚，战场上一片沉寂，苏军战士突然听到对面不远处敌人的战壕里传来一阵《卡秋莎》的歌声，而且，这支歌曲居然放了一遍又一遍。苏军战士愤怒了：“怎能让肮脏的法西斯侮辱我们的《卡秋莎》？”于是，战士们出其不意地冲入敌人的战壕，夺回了那张唱片和唱机。

布朗介尔曾谈到：“无论我到那个国家，人们必定把我作为《卡秋莎》的作者来介绍。我的朋友不管从多遥远的地方来，必定向我讲起有关《卡秋莎》的故事。我毫不掩饰，这使我很快乐，但又使我很难过。那么多人议论《卡秋莎》，好象我其它歌曲根本不存在。不过真正使我心满意足的终究还是围绕卡秋莎所发生一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也不是在佛罗伦萨，也不是在东京，而是在莫斯科。我们乘车到郊外去。突然，沿公路走来迎亲的队伍，现代农民的结婚典礼！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彩烈，又唱又跳。他们唱的正是《卡秋莎》，那样清晰，那样委婉动听，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幸福极了！请想想，现在村里人们办喜事竟唱着我的歌！这是对我的劳动成果的最大的奖赏、最高的奖赏。”

在伊萨柯夫斯基的家乡乌格拉河畔出现了一座《卡秋莎》纪念馆，那是当地人民出钱出力修建起来的。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在一块平地上用整段圆木搭起一座类似俄罗斯传统木屋的象征性建筑，木屋里陈列着各种回忆文章，《卡秋莎》的各种语言的歌词、唱片以及有关这首歌的剪报，还有响着《卡秋莎》旋律的电铃。屋子左边放置了一块球型巨石，石上嵌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刻着《卡秋莎》的头两行诗句。平地的一边还竖起一段形状奇特的松树杆，样子酷似竖琴，象征着音乐和歌曲。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首歌曲而建立的纪念馆。

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再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歌曲了。以前有个高中文凭就可算是个文化人，而现在，我觉得满大街挤来挤去的都是学士、硕士、博士和MBA。但是现代的人们宁愿花很多钱到演出厅里，看一些不男不女、阴阳怪气的人穿着女人内衣，唱着病句，满舞台小丑般的跳来跳去，我真不知这时代到底是更有文化了还是更没文化了。

曲作家玛特维·伊萨柯维奇·布朗介尔（1903—1990）。苏联人民艺术家（1944），苏联国家文艺奖（1946）获得者。他生于乌克兰波切普市一个手艺人的家庭。14岁那年莫斯科爱乐学校学习，17岁在玛斯特福尔剧院主持音乐部。30年代以《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和《肖尔斯之歌》一举成名。代表作有《再见吧，城市和乡村》、《等着我》、《在巴尔干的繁星下》和《太阳落山》等；而《卡秋莎》一曲使他获得全民声誉。布朗介尔歌曲的特点是抒情、真挚、纯朴，反映了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体现了苏联年轻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高尚的意向与追求。

三、《搭枪卡之歌》

搭枪卡是一种架有重机枪的二轮马车或四轮马车。由于它机动性强，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这首歌的词作者米·鲁杰尔曼（1905-）在少年时代曾亲眼看到过红军与白军的殊死战斗，看到过这种搭枪卡风驰电掣的扑向敌阵的壮烈情景。

1937年夏，作曲家冈·李斯托夫从一本诗集中读到鲁杰尔曼的这首诗，这立即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不加修改几乎是一口气地就为这首诗谱上了曲。1937年12月18日，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厅里，由苏军红旗歌舞团首次演唱它。在听众的热烈要求下，红旗歌舞团不得不连唱了三次。此后，歌曲传遍了全国。

二战期间，搭枪卡这种武器早已被淘汰，但歌曲却仍在战场上传唱，鼓舞着战士们的战斗热情。在节日的游行行列中，体育界的队伍就是在《搭枪卡之歌》音乐的伴奏下通过红场。

冈斯丹津·雅柯夫列维奇·李斯托夫（1900-1983）。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1973）。他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毕业于察里津市音乐中学，1918-1919年参加红军。1922年毕业于萨拉托夫音乐学院钢琴系和作曲系。卫国战争时期以海军少校身份在海军总政治部任音乐顾问。其成名作为《搭枪卡之歌》，但使他获得全民声誉的是《窑洞里》。

四、《快乐的人们》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谁永远跟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这段神采飞扬的诗句是电影插曲《快乐的人们》中的歌词。

1934年，著名导演格·亚历山大罗夫（1903-）正筹拍影片《快乐的人们》，这是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因为是音乐片，音乐在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影片的主要支柱之一。导演格·亚历山大罗夫深知这一点，于是到处物色一位能谱写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音乐作曲家。影片的主要演员列·乌焦索夫（1895-1982）建议导演聆听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音乐。

乌焦索夫是苏联第一代爵士乐队的领导人兼爵士歌手，他于1929年结识了列宁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杜纳耶夫斯基，杜纳耶夫斯基曾为他的爵士乐队写过不少音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乌焦索夫相信自己的推荐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安排了格·亚历山大罗夫和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为他们以后多年的友谊合作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罗夫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立刻感到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作曲家。

主题歌的音乐写出来了，但是没有歌词。《共青团真理报》为了协助这部音乐喜剧片的诞生，决定在报上为这首曲子征集歌词。应征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一些名家，但导演和作曲家都觉得不满意。他们希望歌词能鲜明地表现出当代人和影片主要观众——青年人的思想感情。最后，来了瓦·列别杰夫-库马契，他写出了：“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动”这样焕发着青春热情的诗句，一下子打动了导演和作曲家。

诗人瓦·列别杰夫-库马契（1898-1949）善于把政治性的题材和口号赋予明快的诗意的形式。他那警句式、格言式的歌词在苏联青年当中有着巨大的鼓动力量。如“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谁就永远也不会灭亡。”（《快乐的人们》），“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祖国进行曲》），“只有寻求才能找到。”（《快乐的风》）。列别杰夫-库马契的诗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人后来一直合作，一直到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去世。

1934年12月25日，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正式上映，不到几天，几乎全苏联都在唱这支热情奔放的歌。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队伍高唱这首歌走过红场。11月，莫斯科召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全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这支歌，场内的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快乐的人们》标志着杜纳耶夫斯基创作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是苏联群众歌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伊萨克·奥西波维奇·杜纳耶夫斯基（1900-1955），生于波尔塔瓦州一个公务员的家庭。1919年毕业于哈尔柯夫音乐学院小提琴系和作曲系。从20年代至50年代，他写了不少轻歌剧。从1932年开始，杜纳耶夫斯基开始转向

电影音乐创作。1934年他为电影《快乐的人们》创作的主题音乐在当时几乎人人会唱；1936年《大马戏团》里的终曲《祖国进行曲》几乎成了苏联的第二国歌。杜纳耶夫斯基为电影创作的插曲总是立刻风靡全国。

战争时期，他主要带领铁路员工合唱团在前线和后方巡回演出，歌曲创作中断了一个时期。在为数不多的创作歌曲里，《我的莫斯科》是最出色的一首。战后，他又开始了歌曲的创作。

杜纳耶夫斯基对音乐有极其敏锐的感觉，他能创作出明朗、优美的旋律，他的歌曲充满了快乐、爱情、青春、健康和力量。杜纳耶夫斯基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歌曲创作体系，把普通、平凡的歌曲提高到真正的艺术水平。他曾经说，“我是用严肃的手法来创作‘轻松’的作品”。 杜纳耶夫斯基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亦有其不可低估的贡献。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前苏联歌曲和它的故事

五、《祖国进行曲》

《祖国进行曲》是苏联电影《大马戏团》中的插曲。这支曲子若是光看它的名字未必会有多少人知道，但一旦奏出它的旋律，可能人人都会觉得它很熟悉。六、七十年代，苏联对华广播的电台乐音呼号用的就是这支歌曲的第一乐句（好象还用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936年，当《大马戏团》基本完成后，大家总觉得最后缺少一首有份量的压轴歌曲，这首歌曲必须能表达影片的主题思想，表达苏联人民对自己祖国的自豪。

任务最后落在了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身上。他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足足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一稿又一稿，共写了36稿才最后写成。杜纳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祖国进行曲》是先写出曲谱，而后由列别杰夫-库马契填上词的。音乐最初是悠长宽广、慢节奏的，后来服从影片的需要改为进行曲式。我坐在钢琴前，左右是亚历山大罗夫（电影导演）和列别杰夫-库马契。旋律出现后，大家同声高唱，欢庆成功。列别杰夫-库马契被音乐所触发，立即写出副歌的歌词，开头一句是‘我们祖国美好’。我对他说，音乐的宽广气息要求的不是‘美好’，而是‘辽阔’。大家就这样定稿了。”

请注意杜纳耶夫斯基说的所谓“辽阔”一词，他的感觉是相当到位的，这也说明了他的确无愧于他后来得到的红旗勋章。大凡一些优秀的大民族——如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在其艺术、审美趣味或其它方面，总是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君临天下、气势恢宏的大家之气。而一些小民族，则常常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一股寒酸气来。以日本为例。我承认它的电器和轿车造的美伦美焕、精巧无比，它的绘画、工艺品，它的所谓的插花艺术、茶道、庭院装饰、音乐、诗歌等等，等等，都是如此。不过，这里也明显地带着一股子小里小气的小家子气。再如，芭蕾舞出自法国宫廷，演员们个个昂首挺胸，舞蹈动作大开大合，背景音乐无不华丽流畅，带着一股帝王家傲视天下的豪气。而日本的歌舞伎，你看看呐，一个个形象猥琐，胳膊、腿儿都伸不直，人站在那儿老半天才动一下，它那唱腔还是念白什么的，也是慢吞吞的。不用太高的鉴赏力，明白人一眼便可看出，这个民族在心底里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日本幸亏早年从中国学去不少东西，我们从它的建筑中还能找到一点点汉唐遗风，为这个几乎一无是处、毫无创造力的民族增加了一丝丝光彩。其实，我们从艺术上可以很容易地判出不同民族的高低优劣。从总体而言，日本

只有技艺和技术而没有艺术。他们还没出过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除了能生产一些廉价电器之外对世界和人类的进步简直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实在想不出他们有什么可以豪视天下的资本。当然，日本受苏美大搞冷战之惠，在经济上比较发达，在劣等民族中算得上是皎皎者。但是，再优秀的劣等民族也还是劣等民族，正如完美的苍蝇仍然是苍蝇一样。相比之下，中国有点象是只病老虎，可是病老虎即使不发威，我们也不能管它叫病猫。

《大马戏团》公映正逢苏联公布第二部宪法，因此，《祖国进行曲》正好反映了苏联人民当时的欢乐和自豪的心情。5月25日，影片首映的当天晚上，电台就播放了这首歌曲。影片的拷贝还没有送到偏远的山区，山里的人们就已经通过广播学会了这首歌。

卫国战争结束后，这首歌曲的速度在群众演唱处理中放慢了，变得比较平静，唱得不象是进行曲了，潜藏在音乐中的抒情性显露了出来。

此歌一向被认为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最高艺术成就，在苏联，这首歌几乎就是第二国歌，而且它也很具有世界性的影响。1936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作出决议："鉴于发展电影艺术中的贡献以及一系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的苏联歌曲"，特授予杜纳耶夫斯基和别列杰夫-库马契以劳动红旗勋章。

六、《红莓花儿开》

1950年1月，全苏联广泛庆祝歌曲大师伊·杜纳耶夫斯基50寿辰。一个月后，全国上映了杜纳耶夫斯基为之配乐的新影片《幸福的生活》。影片音乐荣获斯大林文艺奖，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洛维伐里国际电影节上又获得音乐奖。影片中最成功的插曲有四首：《红莓花儿开》、《丰收之歌》、《从前是这样》和《歌唱幸福》。其中略带伤感和期待的插曲《从前是这样》在两个星期内就成为全民传唱的歌曲。

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首歌获得1959年列宁文艺奖金，它也是一代中国人所喜欢的苏联歌曲之一。

这首歌曲最初是1956年上映的文献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中四首插曲之一，在当时反响并不大。后来在电台里播放，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年，1957年7月底，莫斯科举行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首歌夺得歌曲创作比赛的最高奖——金质奖章，于是它被各国青年带到世界各地，被译成多种语言到处传唱。

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一等奖的获得者美国青年钢琴家范·克来本在告别音乐会上弹起了这支音乐的钢琴改编曲。法国著名作曲家兼歌手弗郎西斯·雷马克把这首歌另填上法语歌词，取名为《春天的铃兰》，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唱。

曲作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始终认为，歌曲复杂或是简单，是并不重要的，终究不是

因为这点才受人喜爱。只有当人们在歌曲里寻找自己生活的旅伴、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旅伴，这样的歌就会受人欢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以广泛流传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曲作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索洛维约夫-谢多伊（1907－1979），列宁文艺奖（1959）、苏联人民艺术家（1967）和苏联国家文艺奖（1943、1947）获得者。他生于彼得堡一个扫园子的工人之家。1929——1931年就学于列宁格勒中央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毕业于音乐学院作曲系。使他荣获全民声誉的是卫国战争期间的《海港之夜》，而他最光辉的作品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1956）和《如果是全球年轻人》（1957），这两首歌传遍了全世界。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早期的作品真挚、纯朴，战时则略带忧伤，战后又转向开朗、乐观和幽默；60年代后显得深沉、成熟而感情细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前苏联歌曲和它的故事

八、《愿世界永远有太阳》

“愿世界永远有太阳，

愿世界永远有天空，

愿世界永远有妈妈，

愿世界永远有我。”

这是苏联歌曲《愿世界永远有太阳》里的四句歌词，这首歌作于1962年。我第一次看到这四句歌词是在文革时期。当时在一篇批判苏修文艺思想的文章中把这四句歌词当成一首独立成章的儿童诗歌，文章作者对其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执笔的这位秀才振振有辞地说：这虽是一首儿童诗，但肯定出自成人之手，它通过儿童之口曲折地反映出广大苏联人民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对前途的悲观和绝望。

一首小诗居然能看得出这么深厚的政治涵义，从小就受阶级斗争教育的我，在理性上大大地佩服这位秀才的“敏锐”和“深刻”；但我的感情却是另一回事，它不大受“阶级论”的支配。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四句诗时，当时的感受有如过电，我被那面对苍穹、直抒心灵的轻轻呼唤和祈祷而感动。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篇批判文章写得真好，可是那首被批判的诗写的更好。今天，我则觉得只有一个纯洁无邪的人才能用这样简约的诗句表达出人们心底的纯真和善良，表达出人类最美好的愿望。

作家冈·楚柯夫斯基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记录了一个男孩子的四句话：“愿世界永远有太阳，愿世界永远有天空，愿世界永远有妈妈，愿世界永远有我。”几年后，画家叶·恰鲁申在他的一幅五一节宣传画上也写上了这四句话。这四句天真稚气的话深深打动了作曲家阿·奥斯特罗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把它抄给了列·奥沙宁，奥沙宁就写出了四段歌词，把孩子的四句话作为歌曲的副歌。这首歌开始时作家标明是儿童歌曲，在学校里、少年宫和音乐会上唱，后来流传到法国和波兰。196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作曲家奥斯特罗夫斯基当初拿出这首歌时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它过于朴素简单，是首儿童歌曲，不是歌手们所期待的歌曲。但是后来没想到演出大获成功。1963年，这首“儿童歌曲”在波兰索波特市的歌舞节上，由女歌手密安萨罗娃演唱，获得最高“成人奖”。

阿尔卡吉·伊里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914-1967），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活动家（1965）。1930年1934年就学于列宁格勒第一音乐学校钢琴系。后在列宁格勒轻音乐队弹钢琴；1940年至1947年在乌焦索夫的轻音乐队弹钢琴。他长于写青年歌曲，1948年的《共青团员》是他成名作。著名的歌曲有《愿世界永远有太阳》、《红石竹花》、《歌曲始终伴随人们》和《地球的声音》等等。（吴秀夫编撰）

九、《两位马克辛》

《两个马克辛》这支歌里描写了一个名字叫马克辛的机枪手和他心爱的重机枪。马克辛是俄国男子常用的名字，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种威力很大的重机枪也叫马克辛。

苏联在1935-1939年间，曾拍过三部电影《革命摇篮维堡区》、《马克辛归来》和《马克辛的青年时代》，影片中的主角就叫马克辛（契尔柯夫饰），是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影片轰动一时，马克辛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941年7月，德军的飞机开始轰炸莫斯科。卡茨和所有的成年人一样，都必须在各家的楼顶上轮流值班。

坐在楼顶上看夜空中的探照灯，听远处高射炮的轰击声。有一次，一枚重磅炸弹落在院子里，气浪几乎把他们从楼顶上掀下来。许多邻居就是这样死在瓦砾中。卡茨就在这种环境下构思出他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首歌。

第二天早上，卡茨把歌送到区广播电台。台里的几位负责人听了之后很不满意。他们指责歌曲失之轻飘，而且具体时间也不清楚，究竟是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时卫国战争时期？后来音乐部的一个领导表态说，先播出看看，好坏由听众决定。

电台的第一次播出恰好由那位饰演“马克辛”的演员契尔柯夫演唱。节目播出后，电台收到了几百封盖着三角邮戳的前方来信，都是要求重播的。战士们写道，他们要象马克辛那样，狠狠地打击敌人。战争后期，情报局在播完苏军光复城市的战报后，常播送这支歌曲。每当人们听到《两个马克辛》的歌声时就会说，看来今天的战况不错，听，又在播马克辛了……

希吉兹蒙德·阿布拉莫维奇·卡茨（1908-），生于维也纳。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活动家（1968），苏联国家文艺奖（1950）获得者。1925年进入格涅辛音乐师范学院。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老橡树旁》（1939）、电影插曲《请坐在我身旁》（1941）是其成名作。卫国战争期间卡茨写过不少出色的歌曲，如《两个马克辛》、《告别歌》、《布良斯科森林哗哗响》和《丁香开放》等。战后亦有不少好作品。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前苏联歌曲和它的故事

十、《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

“……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蓝色的夜雾到处荡漾，在松树近旁响着脚步声，是游击队胜利回防。”

这是苏联歌曲《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中第五段歌词，它镌刻在布良斯克市市中心的一座纪念碑上。这首歌曲的的第一乐句也是该市广播电台的乐音呼号。

斯拉夫人可能是个很喜欢艺术的民族。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大概情节我还隐约记得：有一次诗人马雅柯夫斯基在为红军表演诗朗诵，当他朗诵到：“……枪在我们的手中，列宁的旗帜在我们的前头，……”时，台下忽然站起一个普通战士，他激动地大声说道：“还有您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柯夫斯基同志！”

下面这个故事也能说明俄国人对艺术的爱好：

1942年夏末，布良斯克战线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特地到莫斯科作曲家希·卡茨，希望他为布良斯克的游击队写一首歌。希·卡茨是《两个马克辛》和《在橡树旁》的作曲家，这两支歌在当时很受欢迎。

布良斯克战线定期向游击队供应武器和粮食。但有一次从游击队司令部发来这样的电文：“枪支弹药我们会从敌人手中去夺，但歌曲却不象战利品那样可以缴获，请给我们送一首歌曲来。”游击队的愿望在作曲家心中激起波浪。

1942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卡茨和《消息报》军事记者索甫罗诺夫等人来到土拉州叶甫瑞莫夫市的布良斯克战线红军之家，筹备十月革命25周年的纪念演出。在司令部里，一位中将副司令又同他们提起了游击队的歌曲。

卡茨后来写道：“我和索甫罗诺夫曾经考虑过游击队的歌曲应当是什么样的。游击队员不能列队进行，他们不需要进行曲。圆舞曲吗？在敌人层层包围的密林中哪能跳舞。我们还设想过别的——庄严的、喜庆的、席间唱的，觉得都不合适。后来想起一首早被遗忘的关于1812年战争（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歌曲《莫斯科大火呼呼响》，于是白雪皑皑的森林、游击队的窑洞、篝火的烟雾以及在出发执行战斗任务之前坐在篝火旁的背着缴获的自动枪的勇敢的战士——一下子都浮上心来。就这样诞生了未来的歌曲的曲名和最初的诗句和乐句。”

《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被战线司令部接受，安排在11月7日在红军之家演出。但11月6日，作为军事记者的词作家索甫罗诺夫接到通知要他立即飞越战线去游击队营地。歌曲随他同行。

这位诗人后来回忆道："我记得卡茨当时多么羡慕地送我上飞机。飞机平安地落在遥远的苏捷姆地区冰冻的湖上。是夜，在游击队的窑洞里我第一次唱了《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灯笼的火焰扑腾着，游击队员们鸦雀无声，凝神听着，然后开始轻声唱起来。这支歌曲的生命就这样开始了…"

十一、《夜深人静，四处炮火停息》

这支歌是纪念苏联女英雄卓娅（柯斯莫捷勉斯卡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17岁的女中学生参加了游击队。她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被德寇绞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50年代出生的人都熟悉这不屈的英名。

《夜深人静，四处炮火停息》找不到作者。最初发现这首歌的是1947年在斯大林州，是人们从一个幼儿园教养员那记录下来的。从那以后，人们发现很多州市都在传唱这首歌曲，传唱的都是些十多岁的儿童。最后一次记录是1960年在柯斯特罗姆州，唱这支歌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很可能这支歌的作者就是孩子们自己和他们的老师和教养员。歌词中形象取材于诗人玛格丽塔·阿丽盖尔1942年发表的长诗《卓娅》，而歌曲的音调又和城市小曲、俄国浪漫曲以及苏联群众歌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歌曲的后半段，其节奏和气质十分接近于布朗介尔的《卡秋莎》。

十二、《我的莫斯科》

"我爱那城市树林沙沙响，也爱那运河上大桥梁；我爱到城里红场去散步，听克里姆林宫钟声响叮当。到处有人为你歌唱，不管在城市、在村庄。

莫斯科，我亲爱的首都，你永远活在我心上！你永远活在我心上！

不能忘那年秋天动刀枪，坦克叫，刺刀亮，炮声响；不能忘二十八个好男儿，为祖国战死沙场。鬼子兵凶如豺狼，怎能够迫使你屈膝降！

莫斯科，我亲爱的首都，你永远活在我心上！你永远活在我心上……"

在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中，歌中的二十八个好汉，即苏军316狙击师团一个班的全体战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挡住了敌人50多辆坦克的攻击，守住了阵地。

杜纳耶夫斯基的这首歌成功地把日常生活抒情歌曲的音调和进行曲的节奏结合起来，深沉而富有感情。作曲家基·莫尔恰诺夫对此评论道："对于前线以及后方来说，莫斯科不仅是首都，它是全国的心脏。杜纳耶夫斯基《我的莫斯科》无比准确地表达了战时人们响往莫斯科的心情。"

杜纳耶夫斯基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歌曲不多且多数并不成功，但这支却是例外，它被公认为是佳作，流传甚广。评论家在谈到杜纳耶夫斯基时这样说道："这位作曲家的才能及创作个性的特点，好象就是为了反映日常生活的欢欣和乐观的处世态度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严峻的年代的工作成果，就不及和平时期那

样多。”

在离莫斯科23公里的列宁格勒大道上，苏联的青年们在当年的前线建成了一座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着歌中两行诗句：“鬼子兵凶如豺狼，怎能够迫使你屈膝降！”

十三、《你不要忘》

《你不要忘》是电影《忠诚的考验》(1954)里的插曲，在这部电影中还有其它不少曲调优美的歌曲。这将是杜纳耶夫斯基生前最后一次为电影配乐。

这支歌曲是首抒情的圆舞曲，后来它传唱了数十年，一直盛行不衰。歌中唱道：

“列车飞驰，带你去远方，千里迢迢，远去它乡。你不要忘，亲爱的故乡，你的朋友，你不要忘，你不要忘…

“你不要忘可爱的姑娘，你的命运，你的爱情，你不要忘，你不要忘…”

主歌、副歌及叠唱中都在反复地吟唱“你不要忘，你不要忘…” ，这似乎意味着什么。

第二年，1955年7月，杜纳耶夫斯基身患重病，自己感觉也很不好，但他还是亲临拉脱维亚民族歌曲节。7月22日，杜纳耶夫斯基要返回莫斯科，很多群众赶到里加车站为其送行。列车启动时，有人轻声唱道“你不要忘…”，于是，所有的人都唱了起来。

三日之后，一代英才杜纳耶夫斯基溘然长逝。

十四、《神圣的战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军队攻入苏联。炸弹摧毁了千百座城市，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死在炮火中。诗人瓦·列别杰夫-库马契怀着痛苦和愤怒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起来，巨大的国家…”。战争的第三天，这首诗登在了消息报和红星报上（后来获得斯大林文艺奖）。

当天，一名红军指挥官拿着报纸去找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亚历山大罗夫。这首诗道出了所有苏联人的心声，也深深打动了亚历山大罗夫，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首诗。他连夜把这首诗谱成了歌。

第二天早上他把歌抄在排练厅的黑板上，来不及油印，也来不及抄写合唱分谱，大家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下了词和曲。

6月27号早上，红旗歌舞团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据亚历山大罗夫的儿子博利斯·亚历山大罗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那些坐在简陋的军用木箱上抽着烟的士兵们听完了《神圣的战争》的第一段唱词后，一下子站了起来，掐灭了烟卷，静静地听我们唱完，然后要我们再唱一遍又唱一遍……”。

《神圣的战争》是响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第一首歌曲，在苏联歌曲编年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苏联

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这首歌有一个特色，在节奏上是三拍子写成，却具有队列进行曲般的二拍子的特征。

阿列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大罗夫（1883-1946），苏联人民艺术家（1937），苏联国家文艺奖（1942、1946）获得者。他生于农民家庭。1900年至1902年就读于彼得堡音乐学院，1909年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声乐系，1913年以大银质奖章毕业。1928年苏军红旗歌舞团创建时任团长、艺术指导及合唱指挥，直至1946年逝世。亚历山大罗夫是苏联国歌（1943）的曲作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神圣的战争》、《苏军之歌》等等。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前苏联歌曲和它的故事

十、《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

“……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蓝色的夜雾到处荡漾，在松树近旁响着脚步声，是游击队胜利回防。”

这是苏联歌曲《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中第五段歌词，它镌刻在布良斯克市市中心的一座纪念碑上。这首歌曲的的第一乐句也是该市广播电台的乐音呼号。

斯拉夫人可能是个很喜欢艺术的民族。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大概情节我还隐约记得：有一次诗人马雅柯夫斯基在为红军表演诗朗诵，当他朗诵到：“……枪在我们的手中，列宁的旗帜在我们的前头，……”时，台下忽然站起一个普通战士，他激动地大声说道：“还有您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柯夫斯基同志！”

下面这个故事也能说明俄国人对艺术的爱好：

1942年夏末，布良斯克战线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特地到莫斯科作曲家希·卡茨，希望他为布良斯克的游击队写一首歌。希·卡茨是《两个马克辛》和《在橡树旁》的作曲家，这两支歌在当时很受欢迎。

布良斯克战线定期向游击队供应武器和粮食。但有一次从游击队司令部发来这样的电文：“枪支弹药我们会从敌人手中去夺，但歌曲却不象战利品那样可以缴获，请给我们送一首歌曲来。”游击队的愿望在作曲家心中激起波浪。

1942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卡茨和《消息报》军事记者索甫罗诺夫等人来到土拉州叶甫瑞莫夫市的布良斯克战线红军之家，筹备十月革命25周年的纪念演出。在司令部里，一位中将副司令又同他们提起了游击队的歌曲。

卡茨后来写道：“我和索甫罗诺夫曾经考虑过游击队的歌曲应当是什么样的。游击队员不能列队进行，他们不需要进行曲。圆舞曲吗？在敌人层层包围的密林中哪能跳舞。我们还设想过别的——庄严的、喜庆的、席间唱的，觉得都不合适。后来想起一首早被遗忘的关于1812年战争（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歌曲《莫斯科大火呼呼响》，于是白雪皑皑的森林、游击队的窑洞、篝火的烟雾以及在出发执行战斗任务之前坐在篝火旁的背着缴获的自动枪的勇敢的战士——一下子都浮上心来。就这样诞生了未来的歌曲的曲名和最初的诗句和乐句。”

《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被战线司令部接受，安排在11月7日在红军之家演出。但11月6日，作为军事记者的词作家索甫罗诺夫接到通知要他立即飞越战线去游击队营地。歌曲随他同行。

这位诗人后来回忆道："我记得卡茨当时多么羡慕地送我上飞机。飞机平安地落在遥远的苏捷姆地区冰冻的湖上。是夜，在游击队的窑洞里我第一次唱了《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灯笼的火焰扑腾着，游击队员们鸦雀无声，凝神听着，然后开始轻声唱起来。这支歌曲的生命就这样开始了…"

十一、《夜深人静，四处炮火停息》

这支歌是纪念苏联女英雄卓娅（柯斯莫捷勉斯卡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17岁的女中学生参加了游击队。她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被德寇绞死。后被追认为苏联英雄。50年代出生的人都熟悉这不屈的英名。

《夜深人静，四处炮火停息》找不到作者。最初发现这首歌的是1947年在斯大林州，是人们从一个幼儿园教养员那记录下来的。从那以后，人们发现很多州市都在传唱这首歌曲，传唱的都是些十多岁的儿童。最后一次记录是1960年在柯斯特罗姆州，唱这支歌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很可能这支歌的作者就是孩子们自己和他们的老师和教养员。歌词中形象取材于诗人玛格丽塔·阿丽盖尔1942年发表的长诗《卓娅》，而歌曲的音调又和城市小曲、俄国浪漫曲以及苏联群众歌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歌曲的后半段，其节奏和气质十分接近于布朗介尔的《卡秋莎》。

十二、《我的莫斯科》

"我爱那城市树林沙沙响，也爱那运河上大桥梁；我爱到城里红场去散步，听克里姆林宫钟声响叮当。到处有人为你歌唱，不管在城市、在村庄。

莫斯科，我亲爱的首都，你永远活在我心上！你永远活在我心上！

不能忘那年秋天动刀枪，坦克叫，刺刀亮，炮声响；不能忘二十八个好男儿，为祖国战死沙场。鬼子兵凶如豺狼，怎能够迫使你屈膝降！

莫斯科，我亲爱的首都，你永远活在我心上！你永远活在我心上……"

在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中，歌中的二十八个好汉，即苏军316狙击师团一个班的全体战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挡住了敌人50多辆坦克的攻击，守住了阵地。

杜纳耶夫斯基的这首歌成功地把日常生活抒情歌曲的音调和进行曲的节奏结合起来，深沉而富有感情。作曲家基·莫尔恰诺夫对此评论道："对于前线以及后方来说，莫斯科不仅是首都，它是全国的心脏。杜纳耶夫斯基《我的莫斯科》无比准确地表达了战时人们响往莫斯科的心情。"

杜纳耶夫斯基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歌曲不多且多数并不成功，但这支却是例外，它被公认为是佳作，流传甚广。评论家在谈到杜纳耶夫斯基时这样说道："这位作曲家的才能及创作个性的特点，好象就是为了反映日常生活的欢欣和乐观的处世态度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严峻的年代的工作成果，就不及和平时期那

样多。”

在离莫斯科23公里的列宁格勒大道上，苏联的青年们在当年的前线建成了一座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着歌中两行诗句：“鬼子兵凶如豺狼，怎能够迫使你屈膝降！”

十三、《你不要忘》

《你不要忘》是电影《忠诚的考验》(1954)里的插曲，在这部电影中还有其它不少曲调优美的歌曲。这将是杜纳耶夫斯基生前最后一次为电影配乐。

这支歌曲是首抒情的圆舞曲，后来它传唱了数十年，一直盛行不衰。歌中唱道：

“列车飞驰，带你去远方，千里迢迢，远去它乡。你不要忘，亲爱的故乡，你的朋友，你不要忘，你不要忘…

“你不要忘可爱的姑娘，你的命运，你的爱情，你不要忘，你不要忘…”

主歌、副歌及叠唱中都在反复地吟唱“你不要忘，你不要忘…” ，这似乎意味着什么。

第二年，1955年7月，杜纳耶夫斯基身患重病，自己感觉也很不好，但他还是亲临拉脱维亚民族歌曲节。7月22日，杜纳耶夫斯基要返回莫斯科，很多群众赶到里加车站为其送行。列车启动时，有人轻声唱道“你不要忘…”，于是，所有的人都唱了起来。

三日之后，一代英才杜纳耶夫斯基溘然长逝。

十四、《神圣的战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军队攻入苏联。炸弹摧毁了千百座城市，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死在炮火中。诗人瓦·列别杰夫-库马契怀着痛苦和愤怒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起来，巨大的国家…”。战争的第三天，这首诗登在了消息报和红星报上（后来获得斯大林文艺奖）。

当天，一名红军指挥官拿着报纸去找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亚历山大罗夫。这首诗道出了所有苏联人的心声，也深深打动了亚历山大罗夫，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首诗。他连夜把这首诗谱成了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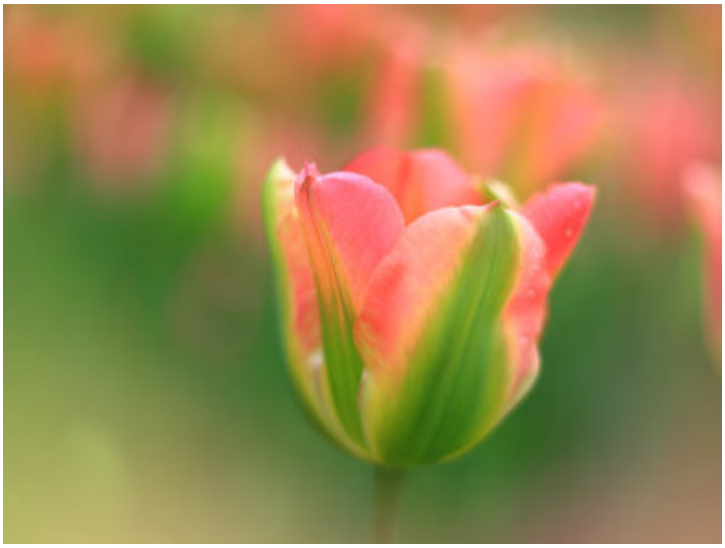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他把歌抄在排练厅的黑板上，来不及油印，也来不及抄写合唱分谱，大家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下了词和曲。

6月27号早上，红旗歌舞团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据亚历山大罗夫的儿子博利斯·亚历山大罗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那些坐在简陋的军用木箱上抽着烟的士兵们听完了《神圣的战争》的第一段唱词后，一下子站了起来，掐灭了烟卷，静静地听我们唱完，然后要我们再唱一遍又唱一遍……”。

《神圣的战争》是响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第一首歌曲，在苏联歌曲编年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这首歌有一个特色，在节奏上是三拍子写成，却具有队列进行曲般的二拍子的特征。

阿列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大罗夫（1883-1946），苏联人民艺术家（1937），苏联国家文艺奖（1942、1946）获得者。他生于农民家庭。1900年至1902年就读于彼得堡音乐学院，1909年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声乐系，1913年以大银质奖章毕业。1928年苏军红旗歌舞团创建时任团长、艺术指导及合唱指挥，直至1946年逝世。亚历山大罗夫是苏联国歌（1943）的曲作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神圣的战争》、《苏军之歌》等等。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字缘

1973年我16岁的时候，受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一年，实行了几年的“一工一农”毕业分配政策停止了，改为“身边只留一个”。这意味着，尽管我的三个哥哥姐姐已经去了农村，但因为小哥哥留了城，我毕业后一定要去农村！

当年还有带头去农村的同学，但那些都是家中没有人在农村的。而我，耳染目睹，家里有这么多哥哥姐姐、表哥、表姐去农村，我自己从小常年去农村分校劳动，早知道去农村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我来说，这个新政策就象天垮了下来，我哭，我闷闷不乐。

妈妈拿来一本字帖，让我挑一种字体来练。妈妈从小练就一手漂亮的柳体字，加上谦逊、稳重、刻苦的品质，以她坎坷的出身、经历，竟能躲过一场场的风暴,始终稳坐机关,妈妈总是认为是由于她的字写得好。我翻看着字帖，眼花缭乱，最后在“柳体”和“颜体”之间拿不定主意。妈妈说，“柳体”俊逸，但稍嫌清瘦，而“颜体”圆厚，稳重福态。那一刻，妈妈的眼睛含着委屈、凄凉，又充满期待，我突然明白了妈妈的心，我选了“颜体”来练。

因为字写得好，街道派出所找我帮忙抄写户口资料。没有工资，但我很高兴，说不定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不用去农村呢。我埋头在一堆发黄散发着腐烂气息的纸张之中，整理别人的历史。嚯！原来中国的户口制度是这么地细致，连你祖宗的前尘往事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你千万不能干一件坏事，否则一辈子都被人揪住.总之在强大的户口制度下，每个人都无所遁形！

因为字写得好，刚下林场，领导就从每人必写的决心书里发现了我，让我协助搞宣传工作。主持林场宣传工作的是一个叫式的小伙子，比我们大3岁，早几年来的。式从小练颜体，功力比我深厚多了，但他说我的大标语和钢板字写得比他好，因此每逢搞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甘愿在一旁裁纸倒墨弹线。现在我想，他是在给机会我。

我们宣传组的小房子只有8平方米，凹凸不平的粉刷墙上，挂着式自己做的镜框，里面的诗随着式的心情来换（华夏知青网站“知青照片”里有我一张在宣传组里拍的照片，背景就是他写的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镜框里的诗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盆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

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吧，既无可奈何，又心有不甘。

式既然从小练毛笔字，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他的家庭出身一定不好。奇怪的是，表面上看，他没有一点自卑，他有时会给我们讲他的家以前有多么堂皇。用以前要求人们谦虚不张扬个性的审视眼光，我们认为他有点牙擦（在北方话里就是牛的意思）.我也不明白在看电视转播周总理的追悼会时，他何以哭得捶胸顿足，要别人搀扶回宿舍。后来我多次追问他，他才说他顺带连自己的遭遇也一并哭了。今天，我才明白了，在那样一个什么都看家庭出身的年代，他们再有才、再积极，什么招工、招生、当兵都不会有他们的份。对于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来说，不使用一下精神胜利法，如何有勇气渡过漫漫人生之路？

每天一收工，我们去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碗就去宣传组。去宣传组，要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土路，夏天的日子，两边盛开着白色的茉莉花。我天天都采一把，养在洗干净的腐乳瓶里。破旧的书桌抽屉没上锁，一打开，我们4个人的零用钱都扔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写文章，写标语，刻钢板。有时候，夜深人静赶材料印刷，真有那种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感觉。

式常常挎着一个黄色的军用书包去外面开会，回来的时候黄书包里满满的都是吃的东西。他的黄书包油腻腻的，可是有一次和娜聊天，我们一致认为他的黄书包最亲切。后来我招工去了工厂，第一次去北京出差，我跑去他家，兴冲冲地告诉他，问他有什么东西要带，他说给我带个黄书包吧，就要我原来用的那种。最近我去他家，赫然看见那个80年代初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黄书包还在墙上象艺术品一样挂着. 半夜，我醒了，过去象电影一样一幕幕重播，我想起了白天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招工走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他支撑着身体到鱼塘边走走，却突然看见我的影子在晃动，他揉揉眼睛，是一个姑娘在切猪菜，身高和我差不多，他走过去问她，怎么没见过你？原来是刚来的小知青，分配在塘边养猪，所以没见过。他觉得她象我，以后就天天去找她聊天，俩人就好上了。他请我原谅他这么快就找了另一个，因为他实在不知怎样熬以后的日子了。他说朋友们个个都骂他傻，为什么要陪我到处奔波活动招工……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几次他有机会离开那个地方他却不愿意走；为什么有几次安排我们一起值班到末了他那些弟兄却人影都没有，我在灯下给他画素描，不许他动，他一脸的尴尬。其实，我早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对我特别关注，但我们那时不敢想这些事情，我们想的是如何积极再积极，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早点招工招生出去. 眼泪哗哗地流个不停，我想不到现在还有人这么惦记我！他说他的女儿14岁了，每逢他督促她温习功课，就会闪过我在灯下刻苦学习的印象，心里马上非常难过……我的心本已被人生的丑恶伤害，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包裹，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但此刻，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人，还有一些事情值得留念。

可惜的是，我们早已不再练字，我们的女儿甚至写着一手丑陋的鸡爪字。时代已经变化了，未来的中国人，不需再凭一手好字找饭吃，人们也无从根据你的字体判断你的性格命运。因为，我们都用键盘打字，每个人的字体一

模一样，都是那么冷冰冰，毫无个性。

现在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想说当时的人是如何对待感情的，比起现在一认识就想上床的“即食面”风气，我们那时候的感情是多么真挚啊！

1999年8月1日于广州

白云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从农村抽回城里，俺进了烧结厂。那是个粉尘王国，号称鞍钢的“大猪圈”。在那个年代，俺的背景不好。分配到一个全厂条件最差、日伪时期建成的老车间。工种么，是装卸工。其实俺是“卸”工，只管卸车不管装。

那年头时兴“介绍对象”，这介绍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然条件”。其实就是“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的“综合打分”。你问俺的条件？俺父亲是“美国特务”“托派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俺母亲带着俺的小妹妹走“五七”道路去了农村；家里的房子也被“造反派”占了，俺住在单身宿舍。。。要说有啥“优势”么，俺想想……那就是每月54斤定量和24圆工资……对了，还有每个工3毛钱的“保健”！

由于“自然灾害”，俺进厂快一年了，眼看着同期入厂的“哥们姐们”都开始着手解决“个人问题”了，俺却始终无人问津。

谁想否极泰来，俺因为参加厂里的球赛，结识了在车间作调度的王师傅。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自然条件”也差点劲，下放车间劳动后就一直没“抽”回去。一来二去，有一天王师傅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讲了老半天，原来他老人家也没见过“那Y头”……只知道也是和俺同期抽回来的“知青”，现在是卡车司机。呵呵，那年头“方向盘”可不是凡人啊！

王师傅决定了相亲的日子，就开始帮俺“倒扯”起来。“去买双皮鞋！”“你有‘的确良’衬衫么？”“你咋没条象样的裤子？”“……”于是俺带上全部家当上了趟“街”，买回一双“模压底”黑色的“翻毛”皮鞋；买了条“快巴”裤子……“的确良”衬衫么，只好等下个月开饷再说了。就这样俺这个月也只能顿顿喝4分钱一碗的“大菜汤”了……

谁知道王师傅还是不满意，最后把他的“的确良”借给俺穿了。“太小了……”“没关系，下摆掖在裤子里……正好露出新裤子……袖子么卷起来！呵呵，穷小子，看你那裤带！啥玩艺啊……得了，也用我的吧！”

装扮好了俺们师徒跨上自行车，一路说说笑笑地奔了“那Y头”的家……记得那是一片58年盖的仿苏式住宅的“工人新村”。所有的房子都一个样。转了一会儿，俺就怀疑下回还找的到吗……“呵呵，想着下回还来？看样能成！”王师傅调侃着带俺上楼。

房门开处，是一条走廊，地上摆着许多鞋……看样子进屋得脱鞋……好在俺是新鞋，脱就脱吧！俺正埋头奋力解鞋带的时候，听见王师傅在门口和屋里的“那Y头”互相问候。等俺激动万分的抬头看时，却被一中年妇女让进了另一间屋。进门这一看，俺晕了。炕上地下坐着四五位老太太……“这是她二姨……四姨。……六姨”俺手足无措地站在地当央如鸡啄米般的点头致意，并跟着复述“二姨……四姨……六姨”“这不是姨，是姑！”“……姑！”

逐一问候了之后，一坐在板炕上的老太发话了：“叫小儿炕上坐吧！”俺战战兢兢在炕沿上坐了半个PG。

“家里都有什么人啊？”审查开始了……“哥几个？”“有房么？”“你妈还开工资么？”“啥工种？”“开多少饷啊？”“装卸工定量不少吧？”……

“￥%*#$%^*+_)@—%？？？”……

记不得我们的讨论咋集中到粮票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一斤……也记不得是几姨和几姨因意见不一致而激烈争论……反正正当俺如坐针毡时，王师傅出现在门口，招手叫俺出去。俺以为可以见见“那Y头”啦，麻溜窜到走廊上。谁知他叫俺穿鞋……“俺还没见……”“走吧，路上我跟你细说”他自说自话地开实逐一的和老太们道别。就在俺埋头系鞋带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的声音说“有空来玩……”俺的心哪个跳啊，赶忙抬头回应，只见一个背影回屋了……嗨！

出了门上了车，王师傅问俺“咋样？”“人都没见啥‘咋样’啊？”“你先说同意‘处’吗？”“见了人才知道……”“你不同意‘处’见啥人啊？”“……”“她家长看了你觉着可‘处’，我替你看了她也觉着可‘处’……你还挑啥”“俺咋觉着象马集上卖马？”“……”“你那条件还想要啥样的？”“那也得见着人吧……”“你这条件要这么挑得打一辈子光棍……”“总得拿俺当人吧……”“谁拿你不当人啦……”

一路上争来争去，后来变成了吵嘴……再后来王师傅急啦：“把我的‘的确良’脱下来！”再后来俺自己光着脊梁奋力蹬着俺那没有挡泥板的破车回单身宿舍啦……再后来？哪还有再后来？！俺的第一次相亲就这样落幕了……

2001-04-2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无所适事的板大爷无缘无故的发了两天的烧，有个坏银就赶紧说：这怕是“飞点”。哼！还是“爱资”呢！

这天是这个冬季难得的暖和天儿，干点什么证明自己好了呢？板大爷想起了扔在车库里近半年的皮卡。对，瞧瞧去。谁知道用遥控器开门无论如何没反应，用钥匙开门后又无论如何没法启动。咦？啥毛病？！板大爷那闲的生锈的脑袋里像装满了浆糊转不起来，对着掀开盖儿的机仓发了半天呆，待满脑袋的浆糊澄静下来，板大爷依稀觉得是电瓶没电了吧？拆！

拉上电瓶找了家买风帆电池的小铺。店主用万用表一测，满脸夸张的说:“完啦完啦，没救了”。“就好像是他的哪门亲戚病危了耶！”板大爷脑子里飘过这么一句。这块电池还是两年前板大爷在雪乡买的，当时就是因为等它充电在困了一晚上，屈指一算也两年整了呢。“买块新的？”“260！”板大爷掏兜一数，连唧角旮旯的散钱全算上只得198！正巧店主在絮叨：“新电瓶要是三个月不用也跑电跑的不能用了。。。”“那我买新的干吗？这车本来就不大用么！”店主又出主意啦：“你给个充电费，我换块充好电的旧电池给你？”没钱办没钱的事儿吧，板大爷花15块搬了块旧的回来。

想换上吧，还不成。车库钥匙在家里，可楼道门的钥匙换了，板大爷没有，只好等套袖回来。可套袖夜班，只好等她下班。好容易套袖回来了，说是一夜没睡急着回家睡觉。板大爷P颠P颠的开车送她回家。抖了个机灵，还拿了她的新钥匙准备去配一把自己带上。。。

呵呵，这可是个系统工程哦！板大爷好容易又有了用武之地。规划是：路过小区便利店，送钥匙去配新的。利用等待的时间去库里换新电瓶，换好电瓶把FK入库，开上皮卡回来拿钥匙，这回可以自己开门不影响套袖睡觉。。。哦，到底曾经是“企业高级管理银员”，周密！板大爷不失时机地表扬了自己一哈。

规划实施阶段开始还算顺利。送了钥匙；换上电瓶。可是无论启动机咋转车就是不着火。看看油表耷啦在角上就是抬不起来，又没油啦？！切，咋老是重复着这首歌？回家取桶打油吧？再试试，也许停的太久了化油器里干了？再试，再试，我再试。。。听着启动机的声音从高音到低音到哼哼，一个不祥的念头滑过板大爷脑际：电瓶又要没电乐？

回家路上取了新配的钥匙，满脑子都是咋会没油了呢？哦，想起来了，当初因为要闲置这车，就没加油！喝，咋就忘了呢？新钥匙很好使，楼道门开的顺！可是家门呢？开家门的钥匙哪里去了呢？又是满脑袋的浆糊！叫门吧？被吵醒的套袖涨红了的脸充斥了板大爷的脑袋。。。找不活着的理由呢吧？板大爷按门铃的手在空中划个优美的曲线，回头就走，打S谁俺也不叫门！

转了半天，想打个电话给哥们求援，电话铃响了半天好容易对方接了，咋又断了呢？原来是“电量低”！TMD，不喝凉水都塞牙！“倒楣”这个词跳出来，赶都赶不走！别说，头两天板大爷还真查了一下，确定这俩字儿就是应该这么写。话说这“倒楣”一词本是江浙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坏。此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那时候，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楣”。 后来，这个词被愈来愈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直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中，人们常把这两个字写作“倒眉”或“倒霉”，这当然是由于不懂得它的来源的缘故。既然研究过就不能那么没文化的写错别字儿了哦！

倒楣归倒楣事儿还得办，克服了加油站不给塑料桶加油，安慰了加油MM怕消防制裁的忐忑不安，千辛万苦终于给皮卡灌了15升93#酒精汽油。运气还不坏，板大爷担心的电瓶终于让板大爷“不幸言中”了一回，罢工了！契而不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板大爷一贯的风格，接着整！找急救中心，来了个微面，带了个大号电瓶外加一司机两修理工，七手八脚终于着火了。那小伙子临走给了板大爷一名片和一句忠告：“起码俩小时别灭火，要是不着了再叫俺！”呸呸呸！乌鸦嘴！

在外面转了俩小时，板大爷回家了。跟套袖说起倒楣的一天，她不XUE地说：那也叫倒楣？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睡成觉？一美容整型的女患者来投诉，说是开车到家一下车就听嘎嘣一声巨响，回家一看,她上个月提臀术刚吊上去的屁股掉下来半个！现在一边高吊一边低垂。。。呵呵，是比俺要够格倒楣哦！在倒楣高手面前板大爷只好曲居亚军乐。。。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网上消息：“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均有明显震感。发生地震后，*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总理正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给成都的朋友打电话都不通，短信也没有回复……想起北距汶川仅60公里的茂县叠溪1933年7.3级大地震造成的惨烈后果，不寒而栗。

汶川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是阿坝州的南大门，有“川西锁钥”和“西羌门户”之称。是大禹的故乡。县城-威州镇居县境北部杂谷脑河与岷江交汇地，四面环山，堡子关雄踞杂谷脑河与岷江之间，有“三山雄秀，二水争流”之誉。是羌、藏、回、汉各族人民相融汇的地带，是全国仅有的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羌族主要居住在县北部的威州、绵虒地区；藏族多聚居在岷江以西地带；汉族主要分布在南部漩口、映秀地区。

汶川县城

姜维城残垣

桃坪羌寨

汶川板季多次去过，曾到过漩口、威州、映秀、卧龙、桃坪、汶川县旧址姜维城等。在桃坪羌寨曾经住在羌族姑娘杨小丽家里，和寨子里的羌族朋友跳锅庄……在姜维城和一群羌、藏、汉族小女孩一起唱过歌……现在，那里经历了7.8级的大地震，怎不叫人心心悬念？

美丽的羌族姑娘（左为杨小丽右为龙小琼）

掌灯后锅庄跳起来

姜维城上，一些小姑娘在唱山歌过六一

板季和她们的合影，祝愿她们此次平安！

汶川的情况目前还不清楚，可是相聚60公里的茂县叠溪震后的情景却是历历在目：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叠溪发生7.5级地震。叠溪城中心部分在剧震发生的几分钟内几乎笔直地陷落，下滑距离达500－600米，叠溪城及附近21个羌寨全部覆灭。四周山峰崩塌堵塞岷江形成11个堰塞湖，伤亡人数近万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叠溪大地震”。

现在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地震遗迹”的“叠溪海子”，就是由于这次大地震阻塞岷江而形成的堰塞湖。有资料称：“其最深处达98米，平均深度82米，蓄水量达1．5亿立方米，湖面面积350多万平方米。地震后古城仅残存东

门瓮城一角，南墙一段石狮、石辗、石碑、石缸各一。该遗址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地震毁灭的古城遗址。是国际地震界研究地震的重要现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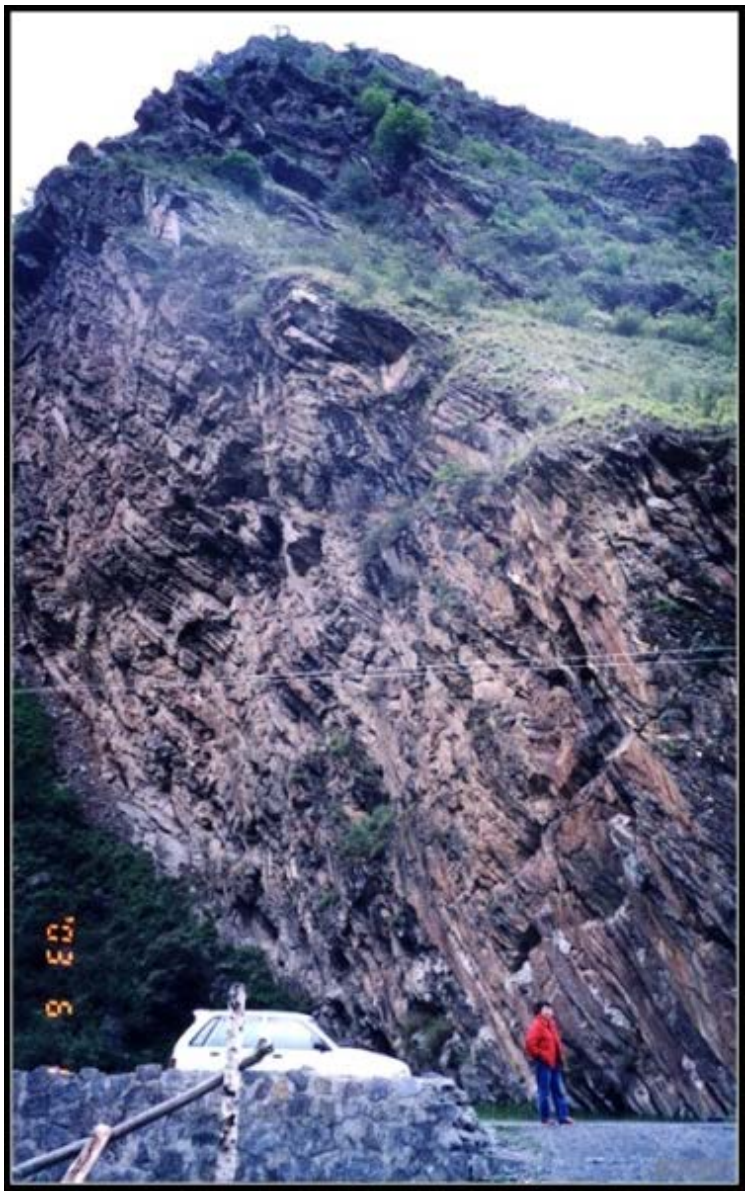
美丽的叠溪海子

生命的颜色

松坪沟眺叠溪

每当风平浪静之际，站在叠溪海子的岸边，还能看见碧波下有人称“东方的庞贝”的叠溪古城残骸。叠溪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大禹、嫘祖和古蜀国的第一代君主蚕丛，都是从这一带走出来的。古城上古称蚕陵，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即在此置蚕陵县，唐代贞观年间建叠溪城，明洪武年间复筑，扼松茂要道之冲，即是军事重镇亦是商贾集散地。现在的叠溪海子由一大一小两个迷人湖泊接连而成，海子周围青山环抱，湖水碧波荡漾，毋庸置疑的是它有着让人惊诧的美。很难想象在它的碧波下，长眠着一座千年的古城和它所有的子民。

地震遗迹



被地震扭成“S”型的岩石

面对如今的汶川大地震，回首叠溪大地震。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板季不由得联想到对于岷江的过度开发。

现如今，以紫坪铺为龙头，岷江上的水坝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关专家指出：“近年来随着水电开发的热潮，一座座水坝在岷江上拔地而起，岷江上游出现了水电无序开发的现象，特别是梯级开发暴露出缺乏流域统一规划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江河的综合功能，这些问题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值得加以重视和及时解决。”“岷江流域处于我国著名的川滇地震区，滑坡与崩塌多发区--川西北龙门山地区；同时还处于西秦岭--横断山东部暴雨泥石流重度灾害区。在这样的地质灾害高发区，一旦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大坝的存在，尤其是高坝、大库以及梯级大坝的存在，将极可能对灾害起到放大作用，并造成具有连锁破坏效应的灾害链。紫坪铺水库坝高156米,库容9163亿方，其上游还有一系列的梯级大坝，面对岷江上游曾多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强震区和大规模山崩堵江溃坝的历史背景，一旦类似叠溪、松潘大地震的事件重演，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今专家担心的大地震终于在岷江上游的汶川发生了。

让我们在震惊和悲痛中祈祷，不要重蹈1933年在叠溪大地震之后一个月发生的那种次生灾难：“沿岷江两岸的银瓶崖、大桥、叠溪三处崩下的岩石将岷江堵塞，顿时出现了三大埝坝。岷江主流断流，银瓶崖埝坝以上的江水被迫回激北流，挟沙石倒涌，两小时后即淹至沙弯、猴儿寨。两天后淹到普安，四天后湖水倒注至泉水崖，淹没了观音庙，水位上升300余米。从此，高山峡谷中出现一片平湖，迤逦达三十华里，宽约四华里，称为上海子。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十一个，淹没了大量的田地和房屋。震后一个多月，岷江上游阴雨连绵，江水骤涨，各海子湖水与日俱增。10月 9 日下午7时，叠溪海子瀑溃，积水倾泻涌出，浪头高达20丈，壁立而下，浊浪排空。急流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3时，洪峰仍以4丈高的水头直冲灌县、沿河两岸被峰涌洪水一扫俱尽。茂县、汶川沿江的大定关、石大关、穆肃堡、松基堡、长宁、浅沟、花果园、水草坪、大河坝、威州、七盘沟、绵池、兴文坪、太平驿、中滩堡等数十村寨被冲毁。都江堰内外江河道被冲成卵石一片，冲没韩家坝、安澜桥、新工鱼咀、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渠道工程、防洪堤坝扫荡无存。邻近的崇宁、郫县、温江、双流、崇庆、新津等地均受巨灾。”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人类的警示，它提示我们，要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最后，祝愿我的四川朋友们平安；祝愿汶川的朋友们平安；也祝愿灾区的人民平安！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板筋抗洪抢险记

虽说辽河是中国第七大水系，俺们辽宁说到底还是个缺水的地儿。你说缺水吧隔个三几年儿还真就涨回大水，这一涨水还就把“九河下稍儿”的辽南平原造他个“沟满壕平”。

俺下乡是在东部山区，听当地“老贫农”讲，那些“河西涝儿”三年不涨水就没着儿没落儿的，涨回大水等水一退那地就肥的流油，一年的收成够好几年吃的。俺下乡三年还真就赶上了一回大辽河支流太子河决口，那是70年9月间的事儿。。。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大队的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把基干民兵集合到队部。简短的动员紧张的准备，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暴土狼烟的乡道上急行军了。去哪儿没人知道，只知道是辽河要决口了去抗洪抢险，看来事儿是有点紧急了，不然俺这个“普通民兵”咋也一下子简化手续未经审查就稀里糊涂的被升格成了那“基干民兵”了呢？平时嘻打海摔的队伍在这紧张神秘的气氛笼罩下还真有那么点队伍的样儿了。一路上不时遇到来自不同公社的队伍，大家都是向同一方向急行军。牛庄？温乡？队伍里不时传来问讯声。反正是向西北，那里是浑河太子河的汇合处，它们合流后就叫大辽河了，因此那里叫“三叉河”。

天色黑下来，方向更不易辨别了，突然前面传来“跑步走！”的口令，队伍骚动起来。很快俺就发现是在一条堤坝上跑，坝的两面全是水，坝上满是人不象是抗洪的倒象是逃难的。。。“立定！”队伍拥成一团，黑暗里传来铁锹的撞击声和笑声。我们到了集结地。

很快就有人说这里是西小姐庙，前面里家窝棚已经决口了！

开始下雨了并且越下越大，队伍在坝上没有任何遮挡，很快就湿透了。大家只能挤在一起取暖，但在风雨中很快就都冷的嘴唇发紫抖个不停。天黑的深伸手不见五指坝上挤满了人，两边又都是水也只好挺着挨浇。队伍中有人用手提喇叭在喊："会游泳的，会游泳的举手！"俺把手高高的举起来。。。"这边集合，会游泳的这边来！"俺拽着俺的锹在人群中挤着出了队列。我们这一群被引领着在坝顶上走，走走停停，不断有队伍汇合进来，一会就有了几十人。最后，我们到了已经由部队设了警戒线的决口点附近，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决口状况，却已经能清晰的听到激流的轰鸣。大家被带到坝坡上列队，说是要等待什么首长接见分配任务。队伍里交头接耳着"任务"是什么，其实，那不是明摆着要组织一支"突击队"么，那个时候遍地是"突击队"俺可是不陌生。

于是就这么淋着大雨，无遮无挡地，一群来自"五湖四海"人有了同一个使命：抗洪。不知道过了多久，坝顶上来了另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站在了凌乱的挤在一起取暖队伍前面，有人出来喊口令，一阵骚动，队伍又有了个队形。"请39军王副师长作指示！"呵呵，俺也和"林彪的三只虎"并肩作战啦？这王副师长，果真大将风度，省略了当时流行的那套"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的战友们。。。"之类的招呼，开门就唱："看过《龙江颂》么？知道江水英么？"原来我们的"光荣任务"是要组织一支"敢死队"，像《龙江颂》那样手挽手跳进滔滔洪水组成一道人墙。。。"陈司令员的飞机现在就在我们头顶上，他问我五天能不能堵住决口，我向陈司令员保证：水高一尺，坝高一丈，军民携手，保证三天完成任务！大家有信心么？""有~"俺也跟着跳脚喊了，声音抖得厉害，自己都能听见上下牙嗑的咯咯响，向那谁谁谁保证，俺这不是害怕，是御彻骨的寒冷，俺眼下就盼着能尽早结束训话，重新挤到一起取暖，这功节咋去完成任务会有啥危险俺可没工夫去想。

谁知还没完，王副师长又问："谁还有困难？"这本是句客套话，地球人都知道的，不想真有一个家伙举手："我。。。我不会游泳就会打狗刨""能打三下不？打一下就能看见你，打两下就能把你拽上来！"谁知那家伙不解风情，居然大哭大嚎了起来。于是下来四五个军人将他拖死狗般拖出了队伍。一片哄笑声中有人跟着喊"我也就会打狗刨！"没辙，王副师长只好详细布置了任务。原来是用拇指粗的大绳将每个人栓在一起，然后分成两拨轮换下水，军队的冲锋舟在人墙后面打桩，再后面是民兵们用沙袋堵口子。。。"有绳子拴着，安全！"乱哄哄的，不知啥时候王副师长已经走了，有人在发放"慰问品"：每人两个面包、一个玻璃瓶罐头、一瓶白酒。

大家重又挤在一堆儿，啃着面包才觉着肚子真是饿得不行。垫吧了一下，就研究如何能打开手里的罐头，这时候才发现罐头还不一样，有肉的、鱼的和水果的，俺运气不错是瓶鱼罐头，咋说也比那冰凉的水果罐头要强，何况那年代大家伙儿都是"胃亏肉"呢？没工具，最后不知是哪个智商270的家伙发明了在锹头上猛劲那么一嗑，玻璃碎了，摊在锹头上用手抓了吃。最后开始有人喝酒，俺也敲掉了酒瓶嘴，灌起来。。。

天渐渐的亮了，决口处看得清楚了。天啊，40多米长一个口子，晨霭中连对面的人都看不清楚，浑浊的洪水咆哮着从14米高的坝内呼啸而出，翻起的浪头有几人高，口子还在扩大，大坝在不断的坍塌，远处的海沟铁路路基也在坍塌。俺熟悉这个地方，修海沟铁路时俺就在这个路段。雨不知啥时候停了，小风吹着，浑身抖着，不知是冷还是怕。面对翻着浊浪的洪水，队伍静了下来，片刻，有人喊："该死该活屌朝上，喝！"于是队伍里又响起了瓶子之间清脆的碰撞声和"干！"的喊声。

天大亮了，又有人来集合队伍了，"这回该栓绳子了吧？"一个念头飘过脑际，大概都有同样的想法，队伍骚动着，有人原地转圈，有人爬不起来，有人鼾声不断，甚至有人哇哇大吐，"高了，肯定是高了！"俺想。

离拉歪斜的总算排起了队，那人讲了一气子，好像是说由于洪水太大，冲出的口子太深，人下去根本探不到底儿。。。"各回建制！"就这句俺听得明白"咋啦？不干啦？"俺问旁边的人，"要干你留下！"他没好气儿。

"各回建制！"说的轻巧，俺的建制在哪儿呢？四万人在坝上挤做一团，哪里是俺的建制呢？顺着坝找吧。寻找途中俺遇见了修铁路时的房东，就是他教俺："牛精海怪，辽阳不在外，西小姐庙人最坏，里家窝棚没锅盖"，这回不但没锅盖连房子都没啦，全家卷了个席筒子在坝上蹲着呢。村儿里的房子多数就露了个顶，在洪水的冲刷浸泡下，时不时的有房子轰然倒下"冒一股烟儿就没啦！"每当有房子倒下，坝上就有女人凄厉的嚎哭扬起，此起彼伏很是凄惨。

2008年11月21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老齐头

板四爷当工人的时候认识几位神人，老齐头就是其中的一位。

话说当年老齐头已经是五十多了，在架工班当班长。这一个架工班班长按说不是个什么重要角色，可是老齐头真就是个角色。呵呵，您莫急么，听俺慢慢道来。

板四爷当时在工会混个搞宣传的差事，“工会工会，吃饱了就睡”。每天也就是宣传个最高指示，搞个黑板报唔的，要说有什么带点竞争性的事情就是总厂开大会，画个报捷板什么的，十几个单位的望一块儿那么一戳，能比个高下，好在那时候见天介“捷报频传”每天也忙得什么似的。

这位老齐头每天中午固定来工会那小屋坐一阵儿，他一头花白的头发理了个平头，总是剪的倍儿齐，唇上一抹小胡子很神气的噘着，一身只有干部穿的“舒式”白帆布劳作服（一种翻领，下摆散开的和立领“三紧式”截然不同的劳作服，关键是一边一个“大挎兜”明显就是装记事本儿的）虽然打着补丁可是洗得看得见布丝，脖子上围的白毛巾也是虽旧却不脏。他抽卷烟却从不现卷，总是从一小铝菜合里拿卷好了的，他不下棋也不“打娘娘”，来工会只是为了看报。（他那形象非常像一位香港的电视剧演员……这是后来板四爷经常看到那位演员时想：“真像老齐头”的原因）许是他桀骜不驯的外表，许是他特立独行的作派，搞不清为什么板四爷对他很客气有加，时间一长，爷俩处的不坏。（呵呵，板四爷当时也就24、5岁儿）

老齐头第一次“露脸”是一次大修。当时板四爷所在的烧结车间“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了四台90平方米的烧结机，据说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机组。可是开工典礼后只转了半个班就不得不停产检修，说得邪乎点：板四爷为开工涂的“捷报”墨迹未干，检修的队伍就开进了车间。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检修翻车机的圆形滑轨。这翻车机是卡着一辆载重50吨的车皮，翻转180度卸车的那么一庞然大物，那滑轨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呦！更难的是，由于设计失误，翻车机室的吊车被设计小了，吊不起那滑轨。

检修指挥部开了几次攻关会，还是没有办法。最后一次老齐头被邀请参加了，他说："活人能叫尿憋死？！""别光瘸子打围坐着喊，你尿个我看！？"四营（总厂检修车间的"番号"，当时工厂里都这么叫）带队的架工头儿不乐意了。"你要报屁俺就来！"老齐头毫不让份儿……一通叫号儿，四营摔耙子不干了，老齐头成了这活儿的"总提调"。害得车间设备主任追着腆胸昂首的老齐头屁股后头一个劲儿的问："不是玩的齐师傅，有把握么？"老齐头开工那天，工地上围的人山人海，都是来看老齐头到底有什么金刚钻敢把检修力量一流的四营给"顶了"?四营撤下来的人马一个也没走全在圈儿外候着看热闹。就见老齐头楼上楼下亲自检查了一番，高声叫道："来两个活的!"他的俩徒弟应声站了出来"抗上几根杆子，上吊车加固！"接着他又指挥几个人用枕木把四个千斤顶支在滑环下面，把吊车的吊钩挂在拴住滑环的钢丝绳上。人群静悄悄的，说书的常见的说法是："掉根针都听得见"……"听我的哨儿!"老齐头手里举着指挥旗站在滑环正面的零米平台上，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嘟、嘟、嘟嘟……"滑环底部四位架工步调一致的压着千斤顶，吊车上他的徒弟几乎是探出了身子在听他的指挥，眼见那钢丝绳一点一点的绷紧，"嘟---"随着一声长哨，老齐头把双臂向两侧横着一扫，上下全停止了。"扛根铁棍"，跟我来！"没想到老齐头把自己也算进"活的"一拨儿里面去了的板四爷愣了一下，急忙拎了根撬棍跟上去。

爬上吊车才看清，原来行架上都被备上了碗口粗的松木杆子，老齐头接过撬棍猛敲哪些木杆，敲了以后还趴在上面用耳朵听。。。"下去！"随着老齐头的命令，我们又回到零米平台。老齐头竖起手中的指挥旗，哨音又急促地响彻整个工地……随着"嘟——"一声长哨响起，热烈的掌声连绵不绝，成功了！掌声中就见满面红光的老齐头歪着头在听那四营的架工头儿说着什么，脸上的笑容也渐渐退去。。。最后，就见他把头一甩，走过来拍了板四爷肩膀一下："走，爷们儿，洗澡去！"泡在热水里，板四爷问他敲哪些杆子干吗，"那杆子要是没断那声音是'嗡'的一声一直传到头的，要是里面有了断茬儿，声音就短，那就不能再吊了。。。"哦，还真的不是蛮干。看他闷闷不乐，板四爷说："早点回家喝一盅好好歇歇吧？""歇歇？没准儿今晚还得来!"夜深了，值班的板四爷正跟女广播员小全儿在广播室有一搭没一搭的调侃，车间设备主任裹着一阵凉风冲进门来："快去接老齐头！"出门一看，总厂还派了辆了吉普车，看来事态严重了。那吉普车装上板四爷就唿哨着冲出了厂区，却原来，那个大圈圈检修后复位时倒了，万幸的是没砸到人。

老齐头住在城南郊一片鞍钢开工时期建的"简易住宅"里，那是一种非常简陋的成排的红砖小房，很大一片，每一幢都长得一个样，半夜时分撞进去，找了很久才找到了老齐头的家。板四爷陪着小心敲着老齐头家的窗户"齐师傅，齐师傅您开开门！"半天，才听见老齐头吼了一声："等着！"一会儿，门开了，老齐头铁塔般的堵着门站在那里："咋地啦？倒啦？"听俺大致介绍了事故情况，他冷笑一声："早知道！走吧"他老伴追出来塞给他一件东西，借着门口昏暗的灯光，板四爷看见了那只熟悉的小铝菜盒。

上车以后，听老齐头絮叨，才知道原来吊起哪个大圈圈之后那四营的架工头儿对老齐头说的话是："齐师傅，

回家歇歇吧”老齐头对他说：“能撂下？”“能，俺吊不起来还撂不下么？家去歇着吧，齐师傅”随着吉普车的颠簸，车上轰响着老齐头的咆哮：“哼！吊不起来就放不下！还叫我家去歇着吧，明摆着是瞧不起我老齐头么！”闲话少叙，黎明时分，趴在办公桌上睡的哈喇子多老长板四爷又被叫醒了：“送老齐头回家！”望着满眼红丝的车间设备主任，板四爷半天才明白，事故排除了，那和捣蛋的大圈圈乖乖地复位了。

在热气腾腾的澡堂子里，板四爷又和老齐头泡在一个池子里了。“齐师傅，给讲讲……”“这帮死人，俺就知道他们怕把吊车给拽下来，一定是先松的吊车，结果压机（千斤顶）扛不住蹦了，还不倒？吊车不能先松，要先放压机，吊车溜着，同步往下撂，知道不？同步最重要！”澡堂子里就咱们俩，回声嗡嗡地轰响着“同步。。。重要”“要是真伤了人了多不好啊，齐师傅？”“那帮死人胆儿小着呢，往下放心里没底儿，早就尥蹶子跑远远儿的了，撤压机的砸不着，有0米平台隔着呢，就是那吊车没给拽下来是孩子大人有福！”这回老齐头没马上走，又去现场转了一圈，才坐上总厂的吉普车回家了。不简单啊，总厂的吉普车从来是只接抢修的工人，没有往家送的规矩。据说，是总厂领导特派的。板四爷因为领了令，也跟车去了老齐头家。

屋子很挤憋，一间屋子半间炕，却收拾的一尘不染。老齐头拉板四爷一起喝一盅庆贺一下，板四爷乐得就上了炕。几碟小菜一壶烧酒，爷俩天南地北的侃起来。原来四营那个架工头儿是老齐头的师哥，当年师父比较偏爱他。早年间考八级工的时候考题是攀上手脚架，单臂单腿拎上来一根架杆子水平地绑好。师傅让其他人先考把老齐头放在最后，“那是使坏儿，那根杆子考了大半天儿，又是汗又是吐沫，都滑唧溜的了，能好干么？轮到俺，俺脱了个大光膀子，吐两口吐沫抹在胳膊上，三两下就把那碗口粗的杆子提溜上来，乞哧咔嚓捆了个牢绑……下了杆子俺叫来俩徒弟，把胳膊一伸‘拔刺儿’！哈哈哈，可算出了口气！”“哈哈哈哈！”“俺徒弟说，犯不上啊师傅，这么多刺儿。俺说：‘你懂个屁！这就是八级工，到开饷的日子少一个蹦子儿脑袋瓜子砸碎！’”结果呢?结果因为名额限制老齐头的大师兄评上了八级，老齐头那期却没评上八级，于是结下了梁子，后来老齐头就脱离了四营这只王牌军来到了俺们这个鸟儿不下蛋儿兔子不拉屎的新区。

呵呵，小鸡儿不撒尿肚里有道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难怪老齐头对他的大师兄那么……那么……那么什么啊？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夸父悲歌

最近我在沈阳见到了红嫂，得知“红孩儿”-他们的儿子现在生意红火，我想红河谷定能笑慰九泉了吧？刚刚我看了董浩的博文：《对话的思考——读“追随红太阳”》勾起了我对红河谷的回忆。说老实话，对那段历史我和红河谷的看法并不一致，而且据我的感觉是无法通过沟通达到一致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同情和他对我的信任。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纪念他的逝世一周年，翻出来贴在这里留个念想儿吧。

夸父悲歌——红河谷一周年祭

2003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十一，我正驱车颠簸在秦岭爬不完的盘山道上，突接清平自沈阳打来的电话,一个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消息震惊了我--红河谷终于离我们而去!随着车子的颠簸，脑际一直萦绕着红河谷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容…

一年多以前，我在沈阳第一次见到了红河谷。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我惊呆了。沉重的病体；下岗的妻子；生意受挫的儿子；基本没有经济来源的贫寒家境。。。生活能够给一个人带来的苦难还有什么没有给他啊！？

那天,我坚持要请红哥和红嫂吃顿饭，倒底是要表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讲他的儿子，拿儿子的作品给我们看。可以看出是个有才华的青年，可是，红哥你咋就不明白呢，在中国的装修设计市场上立足并不完全靠的是才华啊！余下的时间我们唠下乡，正是这段共同的经历联系了我们。就在这次，我在酒桌上听他讲了“劫台大客回家去”的故事。。。讲这些的时候他的眼中是放着光的，是啊，除了对儿子的期望他所真正拥有的就是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了！

“真是位勇士！”回程路上我感慨的对清平说。心里一直在想着红哥的事情，说不清是钦佩是惋惜还是怜悯，高速公路上我错过了路口，一直跑到抚顺才掉头返回鞍山。

清平的文章在网上传开了红河谷的故事，有人提议发起赞助，响应是热烈的。从此，红哥也走进了我的生活，但真正认识他还是后来的事。

我曾陪同许多网友到医院和家里探望过红哥。无论是疼痛的折磨还是化疗的摧残，面对网友，他都打点起精神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接待网友。看着他谈笑风生几乎忘了他是个恶疾缠身的病人。记得一位北京网友来沈阳探病时，他还和我们一起去了清东陵，由于不能走长路或许也是为了省那不菲的门票，他坚持留在公园门外的车上。谁知当我们回来时他用留给他的矿泉水把我的车窗擦的锃亮！他说："我喜欢车，有辆车想去哪儿就方便了。"说的我鼻子直发酸，赶紧说："等您儿子的公司办好了，叫他给你买一辆我陪你出去转转！""对！我们去承德看网友！"曾经有段时间，红哥的主治大夫倪大姐都认为奇迹在红哥身上出现了。她约我专门从鞍山来沈阳，很兴奋的介绍病情的好转和红哥生命的坚强！我感谢她为红哥所做的努力，她说："是他的坚强和必胜决心帮了他自己！"那些日子里网上也洋溢着欢声笑语，大家都在相互转告这个好消息。。。过年的时候，红哥还给许多帮助过他的网友发了贺年卡！没想到，春节刚过，红哥最终还是走了！

我是个不会安慰人的人,在红哥病痛期间我几乎没有给过他任何言语上的安慰.我觉得他是一种象征,是我们这一代人状况的象征.我痛感悲愤的是自己没有回天之力能够帮助他摆脱病魔的缠绕.红哥是个勇敢的人。一次我进京出差，一批北京知青托我带些钱物给红河谷。火车是清晨到达沈阳的，出租车司机奇怪我为什么大清早一下车就奔肿瘤医院。听了红河谷的故事，他诧异会有人为从未谋面的人治病掏腰包，感叹世上还有好人。最后他叹道："这病，人财两空啊！"是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要什么样的勇气和执着啊！

红哥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在病房里他用自己的激情感动了曾经因病房治愈率而拒绝收他入院的病房主任。他在护士节庆祝会上充满激情的讲话为他赢来经久不息的掌声,使他成为全院护士的朋友。他的乐观豁达以及病情的迅速好转曾成为院方推荐给病友的榜样。

红哥是个命运坎坷的人。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怕就是文革期间了。说辉煌是因为那时的他激情燃烧，热血沸腾，青春放射着光芒。毛时代在他的的回忆中是红色的。他以顽强拼搏来对抗命运多乖,至死都没有向命运低头红哥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哀在于终其一生也想不通"革命"有什么错？至死也没觉悟他的全部不幸正是植根于那个疯狂的时代。他抵抗着恶疾的折磨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完成了《追随红太阳》一书，他要把这些留给后人去评说。这是个象小草般平凡的人以他的生命写出的书，真实是它的全部价值。我期望它真能流传后世，我相信它会有价值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记忆，是新时代夸父的悲歌！

“小姓”的故事

姓氏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姓，它起源于什么时候？族谱上最早的祖先是谁？千百年来，这个姓如何光彩，出过哪些有名的人物？这篇东东就将告诉您俺这“小姓”的故事。

在国内问：“贵姓”经常有答曰：“免贵，姓X”的。在新加坡则听见过答曰：“小姓X”的……可说句老实话，俺活这么大一直也没对俺的“小姓”问过一个为什么。直到有一天俺去安徽马鞍山追项目，席间遇见了一位“老饱学”……呵呵，俺咋忘了他老人家“贵姓”了呢就叫他L吧……

席间当谈到俺自南京“打的”来马鞍山途中请司机帮忙找俺的祖籍江宁徐（土盖）未果，买张地图也只找到了孙（土盖）的时候L说了：“你的老家在江宁牧龙镇……你原不姓徐！”

喝！俺咋觉着就象李奶奶给李铁梅讲革命家史？！看他一本正经，追问的人很多，每位都比俺迫切，他倒卖起关子来了：“去查马鞍山日报……副刊有登……”在众人起哄下，俺连干了三杯他才侃侃道来……

“这江宁府在洪武年间是徐达的封地，当时有奴随主姓的习俗，很多人就都姓了徐！江宁的徐姓多从此来。不过你别急，只有你们牧龙镇这一支跟徐达没啥关系……”

“话说南宋大奸臣秦桧本是状元出身，有才无德，卖国求荣，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爱国名将岳飞……”

“这跟俺有啥关系？叫俺喝那么多……”

“别急……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给岳飞平了反，追封武穆郡王。还要缉拿秦桧到案偿命。不想有人透露了风声，秦桧带领家人畏罪潜逃了……俗话说的‘秦桧也有仨好朋友’就打这来的……”

“管俺啥事儿？”“别急，听他往下讲！”在座的都拦俺……俺只好耐心听下去。

“往哪逃啊？全国百姓都恨透了秦桧！只有往北逃到金国去……日宿夜行，有一天就来到了这江宁府牧龙镇。全家人饥渴难当瘫在路边实在走不动了，去路边一农舍讨口水喝。秦桧有一搭无一搭地和那老农聊天。当他知道此

地叫做牧龙镇的时候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嘴里还高叫着‘到家啦！不走了！不走了！！’家人以为他急疯了，他却说‘想俺秦家一门书香三代为相（据说秦桧家出过仨宰相）如今闹到无以为家！想不到天不绝我，让我找到了家！’……”

“家人都觉诧异。秦桧解释道：‘皇帝是啥？是龙啊！宰相是啥？牧龙人啊！这牧龙镇还不是我的家么？’……于是乎，秦家就在这牧龙镇住下了……”

“还是跟徐没啥关系啊？”

“住是住下了，这秦是不能再姓了！百家姓姓个啥好呢？秦桧到底是状元及第出身，想了想说：‘就姓徐吧！这算隐姓不算改姓……’”

“呵呵，你们江宁府牧龙镇这支徐姓就是秦桧的后代啊！”

俺跳起来揪住这L要不依，后来他一说出由秦改徐的道道俺还真服了他！各位有空猜猜L是咋说的？

TMD，难道这L要叫俺“人到墓前敬武穆，俺到坟前愧姓徐”不成？！

以下是引用荃荪孤植的跟帖发言：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秦氏、赵氏等等，徐姓被司马迁列为嬴姓十四氏之首。徐姓发源于安徽的泗县和江苏的泗洪县；就血缘而论，徐姓的祖先最早可追溯伯益的父亲皋陶（舜的大理官），徐姓得姓的时间是公元前512年，得姓的地点是夷邑，得姓的缘由是以国为姓（因徐国被灭）。

秦姓起源三说：嬴姓之秦、姬姓之秦、大秦之秦。江宁秦氏应是姬姓之秦：秦桧的确出自于江宁秦氏，江宁（南京）也是秦桧的出生地，其兄秦梓也出生在江宁。

不过中国正史因为有了野史的陪衬而更加引人入胜……呵呵，欣赏扳金的妙论。

今天我找到了徐墡村

俺祖籍南京江宁徐墡村。

曾经有些年俺在马鞍山钢铁公司追项目，很多次自南京机场搭乘出租车去马鞍山，经过江宁。记得户口本上写的是“徐（土盖）村”，不认得这个字，查新华字典也没有，便有边随边地懵了个读音“盖”，结果出租司机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买了当地的地图，见上面有好多个“土盖”，现在还记得的有“孙（土盖）”等等。

今天博友孙尔台在博客上联络我，过去一看，原来是位才子，他自己做的二胡独奏曲《梦回草原》真是很好。看到他在南京，俺留言说其实俺也是南京人，只不过没有找到那个“徐（土盖）”而已。由于写不出这个（土盖）字来，俺又在网上新华字典里查这个字。当然了，在“偏旁部首”栏里土字偏旁14划里面还是没有这个字。不知咋的，突然灵机一动，想那个字是不是没有简化字啊？再查下去，发现在16划里面有个“壒”字！俺没什么学问，吃不准这个“壒”是否就是那个“土盖”，于是又查繁体的“盖”，还真的就是写作“蓋”。哈哈，无意间俺终于找到了这个“徐壒村”。要感谢孙尔台博友哦！

对于这个“壒”字，新华字典如是说：基本解释：壒 ài尘埃：“幽泥化轻壒。” 笔画数：16；部首：土；笔顺编号：1211221215425221

呵呵，教训一：不求甚解，原来连祖籍都找不到哦，惭愧！

教训二：那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简化汉字啊，难怪很多人名在电脑上打不出来。

2010-12-19

banjin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十六岁那年（文革记忆）

记忆中1967年初的冬季是个暖冬，那时我刚从北京串联回到家，呆在家里治疗串联时得的急性关节炎，每天打针之后，就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病稍好点就摆弄无线电。正因为如此，我脱离了学校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没去参加1967年初打倒省委、炮轰市委、进驻省军区大院的那些行动。直到2月初，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来到家里，说是他们要成立个战斗队，邀我也参加，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又回到了冷冷清清的学校。

我们的战斗队名为“红导弹战斗队”，由班上十多个调皮捣蛋的男生组成，曾经有几个女生要求参加进来，经全队开会研究后，一致反对，理由是将来出去“长征串联”时，女生会成为包袱。我还记得当时那几个女生等在走廊上，由我出去告之我们的决定，话没说完那几个女生就哇地哭了起来，吓得我急忙逃回教室，大家面面相觑，顿生悔意，待我们立即改变主意，再出去通报说可以接受她们时，却被她们一顿抢白，甩下几双白眼，拂袖而去，搞得我们不知所措，不过后来的事证明还是没有女生要好些。

我们的“红导弹战斗队”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小有名气了，甚至连外校的也知道了，但可气的是，从老师到同学，都称我们为“混捣蛋战斗队”。现在看来，人家这么叫，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六七年初昆明所谓的“三家巷”（指昆明的云大、昆工、师院三所高校之间的一条小街）每天都进行的辩论会上，只要我们“混捣蛋”一出现，再能说会辩的都不敢上台了。到不是我们有多厉害的口才，而是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观点，没有什么倾向性，管你是哪派的，就凭着人多势众乱起哄。我们曾经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刷标语，上下两条标语，分别是两派的口号，让人搞不清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别的具体事迹嘛，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我们是那种高中生、大学生见了就犯怵的初中生，一度搞得两派头头们都非常头疼。

不多久，就有人前来招安了，两派都派了代表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加入他们。

当时昆明的两大派，分别是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炮兵团”一派和以昆明工学院为代表的“八二三”一派。文革刚开始时，什么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行动，这两派还是一致的，到了夺权时，就分裂了。八派是保省长周兴

的，炮派是保省委书记赵健民的。斗来斗去，都是为了这两人的权力，那些造反派领袖们所做的，都是所谓的各为其主。说起来仍然是党内派系斗争，此类事，文革前、文革后一直都有人在做，只不过文革中这种权力之争的形式表现得相对极端一些而已。

尾随着大专院校，当时已经瓦解了的中学红卫兵，也就分为两派，成立了中学八二三和中学炮兵团。我到北京串联时，北京的中学我们一个没去串，也没跟北京中学生红卫兵联什么，去的都是大专院校，见过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领袖人物，都是大学生甚至是教师，没一个是中学生。昆明也是如此，当时声名赫赫的红卫兵领袖，方向东、黄兆琪等人，没有一个是中学生。现在不知怎么的，一说红卫兵，几乎所有人的印象都是当时的中学生。其实自始至终，中学生只是配角而已。以我们而言，当时并没有什么派性观点，仅仅因为八派派来做我们工作的，是原来我们的高中辅导班的，加之我哥也是八派的，于是我们也就加入了八派。当时，我的父母在机关参加的却是炮派，于是一家六口人，分成两派，大人一派，小孩一派，在饭桌上还要辩论一番，甚至会辩得翻了脸，等到吃下一餐饭时又和好了。我学校的同学虽说分成了两派，还都是当时中学生中的核心组织，但互相之间却只限于口头辩论而已，从未发生过冲突，在后来的武斗时期，两派还联合保卫学校，互相照应。

参加了大派之后，在高中老大哥们的管辖下，我们的活动有了些约束，干的事也更为“轰轰烈烈”了。我记得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变我们的住宿条件，把我们的行李搬到校长家，把那所位于校园花园里的住宅占了两间，跟校长一家做了邻居。我哥他们几个高中生，则在校园苗圃一角，占了原来园丁的小屋，并将其命名为春来茶馆。于是乎从春季直到夏季，我们住在学校过了一段非常惬意的日子。常规的日程是：早上睡个懒觉起来，到食堂随便要点泡饭、面条什么的吃了之后，就在门前缅桂花树下石桌上杀上几盘围棋。午饭之后，徒步走到穿城而过的盘龙江上游，或郊外的某个湖泊、水库，游泳、晒太阳。晚饭后或是在礼堂溜旱冰，或在石桌上下围棋。待到天黑了，让任图书管理员的校长夫人带着去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躺在床上看至半夜，一天就这么混过来了。当然，并非一直都这么悠哉游哉地混日子，也要经常参加诸如游行集会、进驻团省委、市委等活动，还时常做那种白天围缴投机倒把黑市、夜间抓捕赌徒之类的横扫四旧的事。当时抄黑市时，记得某天去抄我们自己也经常光顾的无线电零件市场，把那些我们都认识的倒元器件的贩子抓到学校教室里请教技术问题，随后就放掉了。至于围缴其它黑市如鸽子、粮票、纪念章、邮票等就不讲什么客气了，抓了人送公检法，东西也没收掉，送到兵团总部。我们甚至还跟公检法造反派联合搞过个大行动，花了近两个月时间跟踪埋伏，将全市抽大烟和贩卖大烟的团伙查清后，在某个夜间统一行动，出动了50多辆大卡车，查抄抓捕了200多个烟鬼、烟贩，没收的大量烟土、现金，都成了公检法造反派的战利品。那段时间，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搅扰我们好日子的，还有些派性活动，特别是两派之间的武斗。

我16岁生日过后第6天，云南发生了第一次武斗，在东风广场召开“打倒刘、邓、陶，炮轰省市委”的大会上，两大派为抢夺话筒大打出手，随后炮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与八派在全市发生多起冲突。从这天起，两大派正式决裂，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武斗。

我参加的第一次武斗，是炮派占领了省政府那天。听到消息后，我们受命拿上弹弓去到省政府门前攻击对方。到那儿一看，只见黑压压一群头戴藤安全帽、手持梭标的工人守在大门口，门前则围着大批观众。双方对峙着，不时有人冲出来，向对方扔一块石头后，又迅速地跑回自己人当中。我也用弹弓朝对方发射了不少小石子，估计也伤了人的。待大家扔石头扔累了，不等下令，便撤回学校了。第二天，所有人的右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武斗刚开始时，两派所用武器只是石块、弹弓、木棒，一场混战之后，最多有几个负轻伤的，只听说近郊工矿区和专州县有用梭标捅死人的事，也听说外省发生了动用枪炮的大规模武斗，死了不少人，对这些传闻大家半信半疑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昆工亲眼见到一辆从某个县份来的卡车上放着的据称是被抽掉了筋的几具死尸后，才相信真的有打死人的事。

武斗逐渐升级，连市区也经常发生战争，我们也感到有必要加强自我防范，于是跑到郊区汽车厂去，在那儿住了几天，由厂里同一派的工人指导，自己动手制造了好几件武器。我制造的一支梭标是全不锈钢管的，一米长，顶部装了一把三角刮刀，旋下来可以装入柄里，就像支盲人拐杖，大家见了都大加赞赏，不过这武器一次也没用上，学校被炮派占领后就丢失了。

1967年8月下旬某天正午，学校门前大街上响起了一阵阵重型汽车的轰鸣声，数百辆大卡车满载手持梭标的炮派组织成员，由东向西呼啸而去。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是哪儿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了，到后来才知道，是炮派去“抢”了省军区的武器库，武斗升级了，真枪实弹的武斗由此开始。那天晚饭之后，我们正在学校礼堂台阶前聊天，忽然听到西边由远而近响起了爆豆般的声音，很象是春节期间放鞭炮。我们学校里的军代表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野战军，他们告诉我们，这不是鞭炮，是枪声。阵阵枪声越来越近，我们跑到学校门口去看，军代表拼死拦着坚决不许我们出门，大家只能躲在铁门后观看。门外，随着震耳的枪声，中午驶过的那些卡车又轰隆隆地驶过，车头上架着机关枪，车上的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不停地朝天发射。那时是黄昏时分，正是华灯初上之时，大街上却空无一人，家家关门闭户，汽车声震得门窗直响，脚下的大地在抖动，刺耳的枪声震耳欲聋，大街上硝烟弥漫，气氛十分恐怖。

当时，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真是感到害怕了，想到我们的对立派已经拥有了真枪，我们却只有几支自己制造的梭标大刀，我们怎么会是人家的对手呀。不用多，对方只须停下一辆车，下来3、5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我们全都干掉。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想到了父母和家里的弟妹，开始为他们担心起来。我家与省政府仅一墙之隔，这些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人员，正是回到被他们占领的省政府大院去的，似他们这般漫无目标的乱开枪，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就匆忙赶回家中。不料，却吃了个闭门羹，整个小院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家里的人和所有的邻居都不知去向了。我没有房门钥匙，便绕到屋后，准备用特殊办法打开厨房门弄点吃的。正在操作时，脑后忽地响起一句北方口音的问话：“小小，你干啥呢？”吓了我一大跳，回头一看却不见什么人，

待那人说："在这儿"，才发现高墙沿露出一支枪，一个戴藤帽的脑袋。仔细一看，那枪并没对着我，那藤帽下的脸相也还算和善，是个40多岁的汉子。我向他解释：这是我的家，家里人都不知上哪儿去了，我想进屋去找点吃的。那人正盘问我时，一个邻居回来了，听到我们的对话，急忙把我叫了出去。在他的带领下，我才找到了跑到别人家避难的家人，我妈当时就不准我再回学校，要将我和弟弟、妹妹以及别人家的几个孩子一起送走躲避武斗。我和我哥不愿离开昆明，第二天就不辞而别，回到了学校，我弟弟妹妹则没过几天就被送到北京去了。

回到学校，听说与我同级的一个炮派的同学，参加了前天的抢枪行动，不幸被同伴走火打死了，这是我所在学校文革中死去的第一个人。

随后不久，八派也成功地"抢"了野战军的枪械库，数量虽少于炮派抢的，枪支性能却十分精良。炮派抢的枪支属退役的武器，是民兵用的，多半是那些老三八、七九步枪，也有些美式卡宾枪和苏式冲锋枪，而八派抢到的则是当时部队装备的五六式步枪、冲锋枪。不过八派的这种优势并没保持多久，不出几天，炮派就到昆明海口军工厂"抢"走了大批当时刚制造出来的、装备给出国部队的仿美制M16，代号为8号武器的新式步枪。那时的形势是，省军区暗中支持着炮派，而驻滇野战军却支持八派，两派的所谓"抢枪"事件，不过是双方的后台军方送枪而已。据参加了行动的我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当他们冲入军火库时，守库的士兵不但不阻止，主动开开库门，还热心地教他们识别各种武器。

两派拥有了军火之后，武斗的性质立即升级，真枪实弹的战斗多次发生，每次都要死上几个人。当时，凡市区发生战斗，一听到枪响我都跑去观战，亲眼目睹过正在跑着的人中弹倒地而亡的情景。也经历过枪弹嘘嘘从身边掠过，站在前边的人忽然倒下，吓得我飞奔逃命的险状。那时，大白天闹市中忽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满街熙熙攘攘的行人一瞬间跑得一干二净，刚才还生意兴旺的商店，大门都关上了，真不知道那些店员是如何训练的，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将那种一块块的铺门板迅速拼装起来。枪声过后，整条街上空无一人，静寂之中忽然爆发出妇人的号啕大哭，那就意味着又有人被打死了。

当时炮派的总部设在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八派的总部则设在工人文化宫，两派基本上形成以盘龙江为界而对峙，各占据了一半昆明市区地盘。双方为了将对方势力赶出自己的地盘，发动了无数次攻击。每天都会发生小规模的巷战，夜间也时常进行偷袭战。位于五华山上的省政府东大楼，是当时市内的最高点，炮派在楼顶架设了高射机枪，每天朝距离数百米的省水利厅大楼扫射。在那里的八派毫不示弱，也架起高射机枪朝东大楼射击，打得楼墙弹痕累累，没一块完整的玻璃。我家就在两派高机互射的弹道之下，每天枪声一响，玻璃就震得簌簌抖动。

在我的记忆中，在市区内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枪战的地点有省博物馆、东风百货大楼、省公安厅、正义路、新建设电影院等地，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发生在正义路的那次。记得那天是八派组织搞了一次游行活动，当游行的车队沿正义路向上行经省政府门前时，挂在正对着正义路的五华区人民医院二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胸前突然被从里面捅

破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一挺机枪从那里伸出枪口来，街道两旁的楼上，也伸出了许多支枪，向街上一辆跟着一辆载满了人的卡车喷泄出雨点般的子弹，一颗颗手榴弹也轰轰地在车上炸响。刹那间，大街上火光闪闪、硝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数分钟过后，枪声平息，哨烟散去，大街上一片狼藉、血肉飞溅、横尸遍地，受伤者的哀号声凄厉万分。这次袭击游行队伍是在正义路与省公安厅两地同时发生的，在省公安厅那边，由于是从侧面单边射击，距离也较远，“效果”远不如正义路这边。但也仍有很多死伤，我校一个初一的同学，就在那儿挨了一枪，肠子都流了出来，幸好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小命。这天我恰好从学校回家换洗衣服，我家距正义路只有几百米，等我跑到了巷口，枪声已经停了，只见一群人躲在巷子里，贴着墙朝街上观看。我挤到前面，探出头去看，只看到满街的汽车，车上的人已经跑光了，车下横七竖八躺着些人，也有人垂挂在车栏杆上，有人在呻吟，还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哀嚎。稍过几分钟后，街上有人在跑动、喊叫，我们也跑到街面上去，大人们开始查看地上的人，还有气的就急忙抬起来朝医院跑。当时我跟一些孩子顺着一辆辆汽车跑，跳到驾驶室踏板上往车里查看，见到驾驶室或车厢里面有人就喊大人们来救助。从丁字型街口往坡下，我爬了不到十辆车，忽然间，枪声响了起来，听着声音那子弹是朝着我们飞过来的。我急忙跳下车来，随着大人们逃到街边，躲进了当时的国际照相馆门道里。街的对面，出现几个持枪的人，靠在墙边上朝五华区人民医院方向开枪。显然，这些人是八派的。紧接着，对方的枪声爆豆般响了起来，那几个人就跑进巷道里去了。我们却遭了秧，一阵阵的子弹从我们身边掠过，房子上中弹后，砖瓦碎片掉到面前，灰尘迷眼呛人。国际照相馆的人也够坏的，任我们再怎么拼命的擂门，他们就是坚决不开。狭小的门道容不了那么多人，边上的一圈人实际上已经暴露在外了。又一阵枪声过后，只听到“噗”的一声闷响，一个中年人一声不吭地向前倒下了。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一齐跑出门道，朝街对面的小巷直冲。我记不清当时有没有人朝我们开枪，只记得等我跌坐在一块草地上，缓过口气来后，才发觉已经到了文庙里面了。我自己都不清楚当时我是如何跑过大街，窜进那条小巷，爬过那道3米多高的围墙的。在这恐怖的一天，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鲜血、人性的丑恶一面，也看到昆明市民显示出了美好的一面，无数民众冒死抢救伤员，那些靠苦力生活的三轮车夫发挥了高尚的风格，他们骑着三轮车往返于正义路与各大医院之间，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无偿地救助那些受伤的人。

9月5号，毛泽东签发了不准抢夺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九五命令”下达，云南两大派于9月10号签订了停火协议，大规模的武斗停止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此期间，双方仍经常发生小摩擦，也时常有人被打死。差不多每天都会响起某派高音大喇叭播放的“强烈抗议”，内容多是指责对立派破坏停火，制造了什么事件之类。过不了多久，另一派的高音喇叭也必然叫响“强烈抗议”，称对方造谣。那种情形，跟现在的印巴、以巴、朝韩等发生冲突后的宣传舆论极为相似。炮派的高音喇叭当时是最厉害的，那些比大圆桌还大的喇叭架在位于市区最高点五华山的广播电台发射塔上，功率强大，且居高临下，在广播战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时，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会忽然响起炮派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接着就是毛泽东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等等，然后就是嗓音尖厉的女高音声嘶力竭地“强烈抗议”。而同样也在几分钟之后就响起的八派战歌《歌唱麦贤德》和同样

的“强烈抗议”，却因地势较低而声音较弱。于是炮派那个扰人清梦的女播音员，成了当时昆明市民最痛恨的人物。

入秋后，两派的摩擦开始增多。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当时的艺术剧院观看贵阳市红卫兵艺术团的演出，归校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快到学校时，我注意到街上的行人异乎寻常的多出很多来。往常到这时间，街上早已经冷冷清清的了。同行的其他人仍在讨论着刚看过的演出，没人注意到街上的情形，我心里却有一种可能要出事的预感。进到学校关上大铁门后，我没忙着回宿舍，拉住一个最要好的同伴躲在门后观察。前一轮武斗后，“炮管区”内的八派主要据点只剩下了东风大楼、新建设电影院。这新建设电影院位于文林街中段一个三叉路口，侧面是建设坡，正面则对着我们学校，而八派的西区指挥部就设在其中。我俩观察到街上的闲散人员越来越多，似乎都是些青壮年男子，他们二、三个人一组，就在这条街上来回慢慢走动，眼睛不时地向对面的新建设电影院瞟。我意识到有些不大对头，担心这些人是冲着新建设电影院来的，让同伴跑回宿舍叫高中的同学来看，结果他把军代表也叫了来了。我校军代表中有一位姓范的连长是昆明地区两派停火领导小组的成员，跟两派的头头都熟悉。可能是他打了电话给新建设电影院里的八派头目，不一会儿就看到电影院的小门开了，10多个人从里面出来，上了街边的一辆卡车开走了，在街上漫步的那些人看着他们离去，也没什么异常的动作。

这时，已是半夜12点了，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事了，刚想回去睡觉，忽然就听到了沉闷的爆炸声。只见街上那些人全都朝着电影院的侧门跑，看得出来，他们手中都拿着手枪。一阵枪声后，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一些人躲在门后，不时朝二层楼开枪。不一会儿，又响起手榴弹爆炸声，滚滚浓烟中，隐约可见人影晃动，枪声也激烈地响了一阵。待到枪声平息下来，有人站到亮处朝楼上挥手，大叫别开枪，随后就有几个人从门里抬了两个人往街的另一头跑。冷场了大约半个小时后，与前边差不多的情形又重演了一次。差不多快2点时，从文林街东面传来了大队人马跑步的脚步声，一支队伍出现在街面上。昏暗的街灯下，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视力所及之处，能看到刀枪在闪亮，到了近处，这些人很有组织的分散开来，隐蔽在背对电影院的一侧街边。我们看见这批人手中持有的都是长枪，还有抬着机关枪的。又过了一阵子，从文林街西边又来了一支队伍，同样站在街边待命。随后，有人用话筒朝电影院喊话，大意是要对方投降。他这一喊，似乎提醒了对方，电影院楼顶的高音喇叭忽然响了起来，开头仍是先放《歌唱麦贤德》，随后自然就是那“强烈抗议”了。播了才几分钟，声音嘎然中止，电影院里的灯光也同时熄灭了，很显然，占领了一层的炮派采取了措施。双方于是再次开打，这次外面的火力大增，直打得电影院楼上砖瓦横飞、玻璃哗啦啦直往下落。待枪声停息后，却见街两边的队伍一阵骚乱，范连长打开了学校小门跑了出去，我们的眼光尾随着他，赫然看到新建设的坡头，不知何时已经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支不带枪的解放军部队，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军代表跑进那队伍中，不一会儿，那些解放军就忽拉拉地跑上前来，将新建设电影院给围住了。见到这情形，炮派的队伍往后撤走了，我们则欢呼着跑出了校门。电影院里的灯又亮了，范连长跟几个军人进入电影院里，八派的人送走了几个伤员。我们想进入里面看看，却被当兵的给挡在外面，这时周围的居民也出来了，街上挤满了

人，都在议论打战的事。正热闹着，突然响起几声枪声，人群大乱，只见许多人突破解放军的防线，拥进电影院里，里面枪声大作，等大家定下神来再看时，电影院里已经挤满了炮派的人，那些解放军反而被他们挡在了外面。又过了一阵，范连长被几个人架了出来，周围一群壮汉护着，朝新建设坡下走，我们学校的军代表急忙指挥着那些解放军围过去抢夺。几乎是同时，另一群人拖着被绑起来的7、8个八派俘虏，朝东边跑。范连长被抢回来了，但八派的人却被抓走了。目睹这情形，我们激动起来，大声朝炮派那边乱骂。当即引起对方的回骂，并气势汹汹地朝了我们冲过来，那些解放军急忙护着我们往学校里撤。混乱中，突然响了一枪，我们一个同学一下子蹲了下去，大家吓坏了，急忙围住他，却见他又站了起来，抱着一只脚唉哟直叫，军代表扶他在街边坐下，仔细一看，他鞋上有个小洞，脱掉鞋看，子弹正好从大姆指丫缝穿过，只擦破点皮。眼看着有同学受了伤，我们站在校门口，又朝对方骂阵，开始时他们不理会，可过了一会儿，却突然扑过来几个人，对我们前面的同学拳打脚踢。我们也不示弱，一拥而上回报以颜色。对方人少，吃了点亏，退回去了。不一会儿，他们大群的人便向我们挤过来，军代表急忙把我们推进学校小门，关上门后他们站在门外挡着，学校炮派的同学也出去劝解。对方围在门口僵持了一阵，天快亮了，他们才撤了。这天晚上，八派的西区指挥部就这么沦陷了。

两派停火的那段时间，我们搞了一份自编自印的名为《中学号兵》的小报，几个高中文史班的写手负责写稿，其他人则分工负责铸字、拣字、排版、校对、印刷直到上街卖报的所有业务，所有事务都是由我们自己操作的。那几个高中写手都是些快手，写出的文章风格泼辣、说理简单、幽默风趣，很能迎合当时的民众心理。“号兵”搞出几期之后，除本派的纷纷要求赠阅外，连市民也来索要。印量大了，也就由油印版改为了铅印版，我的工作也从每天在学校摇几千下那台从团市委抢来的速印机，改为每天到昆明工学院的印刷厂，坐在小排字间里拣铅字、开园盘印刷机，成了一名排字工、印刷工。

新建设电影院武斗事件后没过几天，一天早上，我加班排字熬了一夜后回学校睡觉，走到校门口，却见大门、小门都紧闭着，门前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工人，一大群同学正围着他们吵吵嚷嚷的，群情激昂，要求他们放学生进学校去。我挤上前去，认出这帮工人正是那天晚上攻打新建设电影院的那些人当中对我们骂得最凶的一伙，据说是昆明郊区某个大集体所有制工厂的。这些工人非常横蛮，已经用枪托打了我们几个同学，同学们非常气愤。正吵得厉害时，几位军代表和老师出来了，向大家说明了情况，大意是炮派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学校，从今天起不准学生再进校，经协商，今天上午可以让住校的同学进去收拾东西，中午12点以前必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说完后，对方对我们放行了，我到宿舍一看，一片狼藉，我放在枕头下的钱、粮票和很多私人物品都不见了。捆好行李扛着出校，走至礼堂前，见高三文史班教室前聚了大批学生，正在吵闹，便走过去爬上窗前观看。这一看，把我肺都给气炸了。几个满脸横肉的恶汉，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在教室门口，教室的角落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用一把刺刀，刀尖顶在墙上，刀身架在一个戴眼镜的高中女生脖子上，另一只手伸进了那个女生的前胸衣服里。看到这可怖的一幕，我和所有的学生们几乎同时怒骂了起来，“流氓、混蛋、土匪！”喊声对那个家伙起到了点作用，他把手

缩回来了，回过头来看着门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相。那几个端着枪的家伙用刺刀逼住涌上前的学生，有的已经拉起了枪栓。正在这时，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突然冲进了教室，不知道她是怎么就突破了防线进去的，她冲过去一把拉开那人持刀的手，护住那个已经被吓得尿湿了裤子的女生，朝着那家伙大声训斥。这个女教师个子很小，在那个壮汉面前却毫无惧色，把那家伙给镇住了，退了好几步，看到这一变化，同学们不由得一齐鼓起掌来。这时，军代表也赶来了，他们派人与女教师一起将那个女生送走，并将我们劝离了学校。背着行李走出校门时，我回头看了看，校门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站岗的工人，穿着蓝色工装，手中端着美式汤姆冲锋枪，这印象一直留在我脑海中。

走出学校，我没回家，直接去了昆明工学院，就住在了教室里，大量的印刷指责炮派挑起第二轮武斗的《中学号兵》号外。没过几天，接到八派指挥部的通知，要我们赶快撤离昆工，说是炮派已经决定攻打昆工了。于是我们先搬到了北塔路上的煤炭学校，后又搬到位于东郊的华侨补校里，随后进驻了省人民印刷厂里，继续印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这份小报，当时在昆明乃至全云南算得上是颇有点名气的，甚至比八派的派报《八.二三战报》和炮派的派报《火炬报》还有名，提起《中学号兵》，几乎是众人皆知。我们到当时的省市革委会去，只须亮出《中学号兵》的证件，就通行无阻了。记得有一次我们还进入了省委组织部的小院里，给被滇挺枪杀的省煤炭管理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拍照，将死尸抬到院子里去时，我抬着那死人的左脚，当时那肉体触手冰凉的感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冬季来临，昆明又陷入武斗的恐怖之中。这次两派都发了狠，动用了土坦克、榴弹炮这类重武器，互相进行围攻。那种土坦克我曾看过，还钻到里面去玩过，是用拖拉机改装的，两层钢板中间夹着棉絮，5米开外用步枪打，外层钢板打穿了，里层的钢板只起个小包。炮派从五华山上用榴弹炮轰击远在10公里之外的汽车厂时，我刚好在家，那隆隆的炮声，震得我家房顶直往下落灰，还好对方没用大炮还击，否则稍打偏一点，我家就完蛋了。

记得第二次武斗较为有名的战事有攻打东风大楼、砖瓦厂、汽车修配厂等。因为基本上都发生在远郊区，我亲历的就不多了。市区内的战事如攻打东风大楼等，双方火力都十分猛烈，我去了也只敢远远地站在武成路中段观看，再不敢走近去冒险了。记得我们刚从昆工撤出住在煤炭学校时，有一晚，我们正在酣睡，教室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机枪声，睁眼一看，有人就在我们身边架起机枪，朝对面的国际旅行社大楼射击。不等我们起身，对方的还击就开始了，密集的子弹打在教室的玻璃窗上，我趴在被子里，只觉得砖石、木屑、玻璃碎片溅落在被子上，发烫的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我们是趁着对方的射击稍微松懈的间隙，爬到背街的教室里去的。第二天天亮双方不打了，我们回去收拾行李时，看到这间教室的窗户带窗框都没了，面窗的墙上布满了枪眼，墙灰全都掉了。

在省人印那段时间，我们也拥有了枪支，是八派武装里那些喜欢《中学号兵》的小头目，分几次送给我们的。我记得我们当时拥有五六式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五四式手枪好几支，子弹有好几箱，还有一箱手榴弹。刚得到枪的那天，我们很是兴奋，拿着枪跑到四零三厂后院去打着玩，打得一棵比篮球还粗的大树齐腰折断了，打过后好几

天，耳朵里都在嗡嗡地叫。到了后来，打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对枪支的新鲜劲也过去了。那时最得意的是有个同学，他居然有一支小勃朗宁手枪，非常小巧，据说是从省公安厅抢的，可惜没有几颗子弹。不过大家最喜欢玩的还是某同学拥有的一支左轮手枪，扣一扳机就转动一次，撞针则清脆地击响一下，我曾经冒险将这支枪带回家对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炫耀。这支枪只有两粒子弹，有一天有个外校来玩的同学不小心玩走了火，打响了一发，那子弹弹头穿过坐在床沿的一个同学的小臂，从躺在他身边的另一个同学的鼻尖上擦过，打进了床头的墙里。那伤了小臂的同学被送进了医院，幸好没伤到骨头。另一个同学的鼻尖则黑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看上去似乎仍有些黑。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个蛮撞家伙玩手榴弹，大家正围坐一起说话，这小子拿着个手榴弹，把盖给旋开了，用小指勾着弦，就放开了那颗手榴弹。大家目瞪口呆，眼看着那手榴弹在他手上吊着晃悠，还好有个正蹲着的同学反应快，一下子扑在地上，双手托住了那铁疙瘩，其他同学也反应了过来，齐声喝着“别动”，抓着那家伙的手，把弦圈从他小指上褪了下来。

当时除了印报纸之外，我们还拥有一辆宣传车，车上备有柴油发电机、扩音机，车顶装了四个高音喇叭，每逢有什么最高指示发表，或是某地又发生武斗事件，我们就开着这辆车到市中心去散发我们自己印制的号外和传单。那时的形势是，武斗方面，炮派占了上风，政治上却是八派占了上风。虽然支持炮派的只是省军区，但明显的是他们的胆量和人数都要比八派的多些，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工人武装。当时的工厂里，绝大多数工人是1953年、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也相对保守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云南修国防公路的所谓工役制部队，这批近二万名从山东、河南按征兵条件招来的农村青年，到云南后都不愿意再回老家，因为赵健民答应安置他们，他们就成了支持赵健民的最坚决的炮派武装力量。这批人有部队训练的基础，打起战来很有章法，自然成了炮派最得力的武装，也就是他们，组成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滇西挺进纵队（简称为“滇挺”），他们一路所向无敌，一直打到下关，消灭了沿路各地州的八派组织，打死了不少人，随后返回头向昆明进逼，搞得八派人心惶惶。炮派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却不料惊动了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昆明军区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剿匪令，派出了正规部队打垮了滇挺，缴了他们的枪。炮派所支持的省委书记赵健民也被当时的中央文革抓去北京关了起来。这下子炮派大势所去，八派从政治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1968年1月底的春节，枪声代替了昔年的鞭炮声，我记不清我家那年是否吃年夜饭了，好象是没有，因为当时我弟弟妹妹都还在北京躲避，我爸我妈也住在西郊的亲戚家里。而那些在武斗中有亲人丧生的家庭，真不知道那年的年夜饭是如何吃的。滇挺事件后，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云南两大派大大小小差不多二千名头领于2月初被召集到北京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一办就是半年之久。在中央的压力之下，两派于2月中在北京达成停火协议，并决定向军管会交出武装。

交枪限期快到的那几天，昆明市的枪声比过年的鞭炮声还激烈，有枪的人都在抓紧时间消耗弹药，向空中不停

地开枪，时常有流弹伤人的事件发生。当时，我们还有好几箱子弹和手榴弹，白天要印报纸，我们就在晚饭后将枪架在窗口朝天上打。我专门从子弹箱里挑也有色标的曳光弹，压进冲锋枪弹匣里，一梭一梭地朝天上打，看着漆黑的夜空里那一串串彩色火球冉冉上升，引来窗外观看的人群的赞叹声。交枪限期的最后一天晚上，有人提议去把那一箱手榴弹消灭掉，大伙就扛着箱子到了铁路边，一人发了几枚，趴在铁路的一边朝另一边的菜地里扔。等扔完之后，我抖掉浑身烂菜叶和泥块，取出耳朵里的纸团后，正打算站起来，我身旁一个家伙叫大家先别起身，说是他最后扔的那颗还没炸呢。大家只好又趴在凉冰冰的碎石上等着，等了足有好几分钟，仍没动静，大伙沉不住气了，试探着起身后跑开了。回去的路上，那小子老在念叨，万一明天那手榴弹炸着农民怎么办之类的话，大伙的心给说毛了，便决定返回去找，而且还真在那已经被炸得稀烂的菜地里找到了那颗哑弹。把这哑弹带回宿舍后，大伙看着它又犯了难，怎么处理它呢？一夜未眠，一个个的脑袋瓜都僵了，埋了、藏起来，各种主意提出来又被否决，有个馊主意差点被采纳了，这个嫁祸于人的主意可谓创意非凡，竟然是打算把那颗哑弹从窗口扔到过路的汽车车厢里，让汽车给带走，幸好在等待过路的汽车到来之前，有人想起来，万一扔下去就炸了，那祸可就更闯得大了。最后，大伙还是偷偷的将那颗哑弹扔进厂里大厕所后面的粪坑中去了。

两派交了枪之后，武斗平息了，我们的报纸仍在发行，我却不想干了。在武斗中，看多了鲜血与死人，看多了两派中的丑恶行为。炮派、八派残忍地对待对方俘虏的行径我都见过，歪曲事实、诬陷对方的宣传更是双方都毫不脸红地常用手法。虽然我所在的一派，靠政治手段取得了胜利，我却感到了某种说不清的厌恶，于是我回到了家中。

在家中，我迎来了我十七岁的生日，久已不见的邻居们见到我时，都说我长高了。我的十六岁，就这么过去了。

老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三十五年前，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串连就此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第一次远离家乡，带上我妈给的几十元钱和几十斤粮票，到北京去朝觐伟大领袖，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串连”。

我们这一队约50人，大部份是高中的，初中生较少，跟我同级的初二学生只有四、五名，还有二、三个初一的，我们算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上北京串连的。出发之前，在学校集中学习了几天，反复交待纪律，一再强调串连是上北京见伟大领袖，是去学习北京红卫兵造反经验。对我来说，满脑袋想的是“好玩，肯定太好玩啦。”

要说好玩，串连可真是太带劲了。刚登上火车时，大家都兴奋极了，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从没出过远门，也没坐过大火车。车开动之后，一个个趴在车窗前，看不完的新鲜。看累了，坐下来拿出家里带的鸡蛋、烧饼、水果、零食，凑在一起吃。吃了点东西后，我约上两个小伙伴，顺着车厢游逛，看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聊一会儿，交了不少朋友。当时成昆线还未开通，我们走的是贵昆线。一路上山高水险，少见人迹，火车开得很慢，不多会儿就停，一些当地的农民背着背篓上车下车，从一座大山走进另一座大山。

车到贵阳，我们下车入住贵阳师范学院，随后便上不了车了，被迫在贵阳滞留了几天，我把个贵阳城逛了个遍，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红鸡蛋”才卖四分钱一个。10月28日在贵阳参加了庆祝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的大会，因为我们是昆明来的，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还受到后来被称为弯月亮的贵州省委书记贾某某的接见，让我们受宠若惊。等我们好容易挤上车后，不知为什么又在柳州下车，在那儿呆了2天。柳州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清澈见底的柳江，高高的鱼峰山，还有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大捆削好了的水果甘蔗。从柳州上车后，整列车的乘客基本上都是带红袖章的中学生，越往北边口音就越杂。都是一帮孩子，抢座时吵架、打架，坐下来后又交上了朋友。每到一地，吃住都有接待站，只交粮票不交钱。直到1966年11月2日，列车终于停下来了，北京到了。

因为串连学生太多，北京城里已经住不下了，我们实际上只到了北京郊区良乡，住在一个工厂的大礼堂里，没有床，睡在铺了干草的地上。到达的当晚，刚吃过饭睡下，突然叫集合，说要进城到天 安门广场，毛主席第二天上午接见我们。于是一阵欢呼雀跃，每人领了一包蛋糕，上火车坐到北京站，步行到天 安门广场。我就在这天深夜，走进了北京城，走到了天 安门前。当晚，有数十万各地串连学生集合在广场上，上面怕大家坐在地上睡觉给冻坏了，派了几十支军队的宣传队来演节目，又送面包又送水，欢腾了整整一夜。我们刚下火车，一路上就没睡好，这时根本抗不住了，两人背靠背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被当兵的发现后揪起来、摇醒，站着看演出，不由自主的又睡着了。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午，当时的所有领袖人物都出来了，站在天 安门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则挥着小红书，高

呼万岁。由于离得太远，根本就看不清脸面，大家就往前挤，秩序顿时大乱，所有人挤成一个巨大的肉团。我个头小，被挤在旁人的胸背之间，气都喘不过来。好在我比较机灵，扒着别人的肩头往上一跳，两边的人一挤过来，我就被抬在空中，脚不落地，随着人流转来转去，转着转着，不自主地被转到了最外圈，一下子倒在一群女兵的身上。那些女兵把我从头上接力似的向外递，最后把我送上了一辆海军的军车。在军车上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又有吃的又有喝的，一个当官的还递给我一把大望远镜，我急忙将镜头对准了天 安门城楼，中国的几个伟人活生生地到了我眼前，这些人就是我们无比崇敬、高呼万岁的对象了。当我看清楚那几张在电影上、照片上已经看得最熟悉不过的脸孔时，仔细端详他们没有一点表情的面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看了一阵后，我将镜头移向下面的人群，看着那些流着泪，不知疲倦地挥着红宝书，嗓子都已经喊嘶哑了的人们。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流眼泪，于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因为我见到当今圣上时，居然流不出激动的泪来，我生怕被别人看出来，便一直捧着望远镜，用它来盖着眼睛。过了一阵，下面的人群更混乱了，我听到广播里有人在喊话，急忙往城楼上看，正好见到毛泽东皱着眉头，转身离开，喊话的人是周恩来，他正指挥着下面的人群疏散。我在卡车上一直呆到尿急了，看到下面已经不那么挤了，便向海军们告别。上厕所是件很艰难的事，长安街人行道上那些用帆布围起来的厕所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实在等不及了，只好学别人的样，朝着那红墙解决了问题。等我想起来要找自己人时，左盼右顾，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走了数遍，一个认识的人都见不到。想再去找海军们时，那辆军车已经不见了，我只好凭记忆朝北京站走，打算自己乘火车回良乡。走着、走着，眼皮子便重得直往下坠，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一个15岁的外地男孩，背着个军用小挎包，闭着眼在北京大街上机械地走着，直到一步踩空走下人行道，惊出一身冷汗来，才看到迎面走过的游行队伍都在看着我发笑。路边北京老太太们在热情地招呼着，要学生们去喝大碗茶。我走过去坐下，喝光三大碗茶水后，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又毫不客气地吃了老太太们的2个大馒头，然后在她们的指点下，找到了相距不远的北京站。

11月11日，我们迁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错过了那天的接见。在此前后，我们每天带上馒头，到各所大学去听演讲、抄大字报。11月26日下午4时，我们到西郊机场又一次接受接见。这次是领袖们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看得就更为清楚一些，不知是怎么搞的，我还是没挤出一滴眼泪来。

天气越来越冷，我们还穿着单衣、单裤，围成一圈睡在大教室里几块暖气片旁，每天早上被军代表费尽气力喊起来出操，吃过早饭后带两个冻得硬梆梆的馒头、几根咸萝卜条，有时给一个煮鸡蛋或是一根粉肠，背上一壶白开水，乘上开往各大院校的军车，坐在卡车上被寒风吹着，实在受不了，有一次我的手被铁篷杆冻上了，皮都扯掉了一块。记得去故宫看收租院泥塑那天，我带了条毯子在车上披着，车到站时毯子下面已经钻进了五个人。我曾经想到亲戚家去借冬衣穿，已经找到胡同口了，犹疑半天最终没敢进去。因为当时带队的是个女高干子弟，很左，不准任何人去找亲戚。她的说法是：串连不是游山玩水，不是探亲访友，每天都安排我们去各大院校抄大字报，谁要违反了，立马通知学校，开除出红卫兵。在北京时她还真开除了一个到亲戚家借了棉大衣的，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所以我虽然到了北京，却不敢到亲戚家去。虽然不敢去找亲戚，但却实在抗不住玩的诱惑，我和几个绝对不会

告密的好友结成死党，每天轮流安排一人去抄大字报，其他人则偷空去玩，回来后再补抄。当时我甚至自己瞎编一篇大字报，反正检查的人也只是随便翻翻，看看字数够了就过关了。我当时去了天象馆、自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又去了北海、颐和园、动物园等等。玩了大半个北京，一直没被发现。

在北京住了那么长时间，因为吃住都不花钱，我买了不少无线电零件后，身上带的钱还剩下许多，可是粮票却没有了。于是我便写了封信，要家里给“电汇”粮票来。当时还死爱面子，认为给爹妈写信是想家、懦弱的表现，所以信是寄到学校，收信人是我哥，而我哥已经步行到延安去了，于是我便跟家里断了音信。我妈不断写信发电报给北京的亲戚，那家人全家总动员跑遍了北京城找我，后来只找到了我弟弟。他是比我晚点上北京的，刚到时特惨，住在天坛公园的帐篷里，冻得生病了。后来他被接到亲戚家后可就享福了，穿得暖暖的，吃得好，还有人陪着上公园玩。而我却成天吃馒头、大白菜汤。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冻得要死。衣服脏了也不敢脱下来洗，全身长满了虱子。头发长了也不愿剃，怕冷。记得有一天，我在汽车上，一个老太太见到我这副模样，拉着我的手直掉泪，非要我到她家里去住，说她的孩子也去外地串连了，过冬的衣服都在，可以给我穿。我连亲戚家都没去，当然也不会去的。因为我们住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没去北京市接待站登记，我的亲戚无法查找到我的下落，家里人都认为我是丢了，我妈急得要死，我却计划着只要让我们离开北京，我要玩遍全国才回昆明。

终于通知我们离开北京了，大家登上了南行的火车，此时已经快到年底了。到衡阳换车时，列车严重超员。几个大点的同学挤上去了，留下了本来就不想挤上车的我和三个比我还小的，而且四个人身上只有我还有20多元钱。三个小孩哭了，我意识到我的麻烦事来了。虽然我只比他们大顶多一岁，事实上有一个跟我同级的只比我小几个月，我已经不容推卸地担上了把他们带回昆明的责任。可这样一来，我想脱离队伍，跑到广州去的阴谋就破产了。我只好带着他们，挤上下一趟车，一路上跟人打架争座，数次换车，碾转千里，历尽艰辛地回到了昆明。到达昆明站时，我身上只有一元多钱了，刚够分给4个小花子模样的串连学生，分头乘车回家。

我第一次出门远游，历时六十多天，家里没有我一点消息，都以为我失踪了。当我忽然推开家门时，大家都认不出我来了，我妹妹事后说她以为是个要饭的闯进来了，只有我妈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她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象是骂了一声“这个死鬼”，就跌回坐位，半晌才哭出声来。

我立即意识到，我想要点钱粮再出去串连是不可能的了。

（附：几件纪念物http://yncomm.com/image/wt/cl1.JPG）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上初中时，外语课学的是俄语。开头有一课有几句简单的对话，老师随便指了男女同学各一人站起来表演，男生表演敲门者，先说："克多、克多"（敲门声），女生问：你是谁？（这句俄语我忘了）男生则答曰："艾的呀，阿廖沙。"就这么两句话，那个幸运地被老师选中、看起来很老实、穿着件补了好几块补钉且已洗至发白的兰褂的男生，便极不幸地背上了两个绰号，一个是"克多"，另一个则是"阿廖沙"。后来因为有人连叫几声"克多"，被人叽为"老母鸡下蛋了"，这"克多"便没人再敢叫了，"阿廖沙"便成为这个男生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绰号了。

不久后，同学们混熟了，放学后开始互相串门。阿廖沙从不参加，也不邀任何人上他家玩，一放学就独自走了。有一天我们去另一个同学家，走至一条废弃的米轨铁路边时，那个同学指着路边一溜低暗的棚屋中间的一间，告诉我们说那就是阿廖沙家，那个在油毡屋檐下坐在一个小草墩上、以一个方凳为桌，正在埋头做作业的那个扎小羊角辫的小女孩是他妹妹。当时大家都半信半疑的，虽然大家已经知道他家里很穷，父亲2年前死了，他母亲没有正式工作，靠做手工活养家，可我们见到的那房子也太破旧了，比民工住的工棚好不到那儿去，简直不敢相信能把那地方称为家。我们走过去问小女孩阿廖沙在不在家？小女孩很乖巧，管我们叫哥哥，告诉我们她哥哥帮妈妈拉车去了，我们没进他家门就走了。有几个同学说曾在路上见过阿廖沙他妈妈拉着辆平板胶轮车，车上堆着小山一般高的纸盒，阿廖沙则在车后推着。同学们见到了多半会帮他推上一段，他妈妈会很客气地道谢，阿廖沙则只是笑笑。我们从那个同学家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再次路过他家时他和他妈妈正好在家门前干活，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做的活都是裱糊纸制品，好象有三、四种产品，我记得有火柴厂的火柴盒，烟厂的装烟丝的圆纸盒。做火柴盒的工序少些，只是将那些裁好的薄木片用纸粘成内外两种盒子，在外面贴上被称作火花的商标，便可以放到一旁阴干了。做圆纸盒则麻烦一些，要先将报纸裱成一张张纸板，吊在绳上晾干，送到纸厂用裁刀切成宽窄不一的条状和圆形，再裱糊成一个个漂亮的纸盒子。我们见阿廖沙的小妹妹正手脚非常麻利（昆明话"利索"之意）地在粘火柴盒，一眨眼功夫就做好一个。便试着也做了几个，都不成功，还弄得两手糊满了浆糊。他妈妈弄水给我们洗手时，从门外隐约可见里面放着张双台床，一张小桌、一个齐胸高的木柜，还有些锅、碗、瓢、盆什么的，看来里面几乎没有可以转身的空间。回到家，我发现我父亲抽的斗烟丝的包装盒正好是阿廖沙家做的那种纸盒，火柴盒则不一样。

阿廖沙在班上人缘很好，很稳重，从不跟谁争吵打架，见到象我这样调皮捣蛋的家伙们干坏事时也只是笑笑，既不参与，也不干涉。课间休息时他很少跑出教室，即便出去上厕所也是立即回到教室赶作业。大家知道他放学后要帮他妈妈做事，也就不去打扰他。记得有段时间体育老师病了，代课老师图省心，让女生在室内做垫上运动，男

生则到操场上踢足球。阿廖沙也参加踢球，但他是将那双尖上补着皮子的布鞋脱掉，打着赤脚参加的。曾有一次他铲球弄得脚背满是鲜血，让他去医务室他硬是不去，用草纸包上了事。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一直很稳定地排在前10名之内。似乎所有的老师对他都很照顾，没有谁为难过他。当时那些下乡学农、到工厂学工、到商店学商、到部队学军的活动，从不见他参加，就连游行、旅行、参观之类的活动，他也多半不用参加。我们听说学校在收学费时对他也有所照顾。

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打宣布停课直到复课，阿廖沙就一直没到过学校。划红黑五类时，也有人提到过他，说他家那么穷，应该算红的，正准备派人通知他来参加“组织”，被我们班主任阻止了，据他说，阿廖沙的爸爸解放前成份并不太好，是个小手工作坊业主，雇过两个工（其实就是带过两个学徒），当时的几个红五类领导迟疑了一阵子后，决定将他划为“灰崽子”，之后也没人想起通知他来参加运动。于是，停课近二年多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期间，我们一直没见到阿廖沙。复课后，久别重逢的同学们聚在教室里，（我们初中生跟高中生不同，即便派别不同，相互间并无多少私怨，）男生们大吹特吹武斗时的见闻，女生们则围成一圈叽叽喳喳议论。等到军代表点名时，大家才发现阿廖沙不知何时已经端坐在他的座位上了。还是那个老样子，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兰褂子，又瘦又黑，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他早已是一家街道工厂的小师傅了，每月能挣20多元钱呢。

所谓复课，其实一堂课都没上，没过多久就下乡了，奇怪的是不知为何阿廖沙也跟大家一起下去了，按理说他可以享受家庭困难的政策照顾不用下乡的，班里有几个家况远比他好的同学都还争取到了照顾，在城里分了工作。

下到边疆后，阿廖沙分到了一个半山区傣家寨子，同他一起的还有我们班的几个男、女同学。那个寨子离我所在寨子不算远，半个月后我们跑去找他们玩，赫然发现阿廖沙已经独自住进寨子边上的一幢空竹楼，过起了独立生活。我们去看他时，他正忙于收拾“家”，没空跟我们闲聊，只见他极熟练地用砍刀破竹子，那手法一点不比那些傣家汉子差。问他要不要帮忙，他连连摇头，我们便很知趣地告别，回另外几个知青的住地。吃饭时，那几个同学诉说阿廖沙的不是，说他刚来两天就找乡上要求将他的安家费单独分给他，估计他将大部份钱寄回昆明了；还说他每天埋头干活，深得社员们和队领导的好评，相比之下，其他知青则显得偷懒、娇气、奸滑；据说他刚来没几天就跟队里要了一块自留地，每天收工后就泡在那块地里，从不串门，跟大家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隔阂。看来，阿廖沙大概是知青下乡时就带了菜籽的极少几个先知先觉者之一，待我们写信向家里要求寄菜籽时，他已经在公社“街子天”（当地风俗是每五天赶一次街）卖菜了，在当时的街子上，他是唯一的站在菜摊“后面”的知青。之后，我们时不时地到他那个寨子串门，但都没想到去看看他。听其他同学说，他养了两头猪，好多鸡和鸭子。待赶街天见到他，特意看了看，摊前果然放着成筐的蛋。我们没买过他的菜。有同学说曾经想照顾他生意，结果他拼命推让不收钱，反而闹得很尴尬，以后大家就有意绕开他的菜摊了。

转眼三年过去，待到开始招工时，又听说他是他们队里首推第一人选，他却坚决地表示不走，把那名额让给了

别人。有同学分析过，若是当工人，他早就当过了，当初也大可争取不下乡来。他肯定是认定了当农民反而有更多收入，才不肯回城的。据说头两年分红时，他都是队里的第一名，每年都接近500元。他那个生产队分值并不算高，但他的分红值肯定是所有知青当中数一数二的。我被招工前，特意找他话别，他陪我喝了杯茶，送了我一个他手工制作的装茶的竹筒，这件小玩艺做工相当精细，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可以算得上件工艺品了。

我回城后没多久，便有同学告之，阿廖沙回来了。不清楚他是探亲还是也招工了，大伙儿便约着星期天一起到小铁路边他家去看他。到了那里一看，那棚屋还在，门却紧锁着，透过门缝窥望，屋内空空如也。莫不成是搬家了？正好邻居有人回来了，上前一问，答曰：全家迁户口去边疆了。

打那时起，即使是同学聚会，也很少再有人提起阿廖沙。我则是逢搬家时，老伴翻出那个已经开裂的竹筒问我扔不扔时，才会记起他来。那竹筒后来还是被扔掉了，可记忆却一直埋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边疆。1996年，当地政府组织老知青返乡，我才得以如愿。当两千多名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中年“知识青年”全都穿着由当地政府发的白色短衫，聚在庆祝大会会场时，前排却坐了一排穿红衫的人。看他们也是中年人了，跟穿白衫的我们相比较，显得黑一点，处老一些，但又明显地不像是当地人。待大会开始，当地政府领导发言中介绍，才知他们是当年数千知青中仅存的30多名留在当地的。当他们站起来，转过身面向全体返乡知青致礼时，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拼命忍住那盈眶的泪水，一个个地认，从他们布满了岁月刻痕的脸上我认出了几个曾经熟识的、少年时代的同学。但所有穿红衫的人都看遍了，却没有找到阿廖沙，待我好不容易挤进人群，与老朋友说上话，才得知阿廖沙没来，据说他日子过得很好，家还在那个寨子，他母亲已经早几年死了，他妹妹嫁给了当地一个汉族干部，他找了个农场老工人的女儿，已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从州里文艺学校毕业，分配在州民族歌舞团。与其他留边知青不同的是，他是唯一一个至今仍是农业户口的老知青，据说他多次拒绝了选拨当干部、上学的机会，而且连队里选他当干部他都不愿当。

当晚联欢会上，一个当地小伙子登台献歌，刚开口说了一句：“叔叔、伯伯、婶婶、阿姨们……”便哽咽住了，一位老知青跳上台去拥住这个小伙子，老泪纵横，接过话筒向大家介绍：“这个孩子是我们一位老知青的儿子，他父亲当年把他奶奶、姑姑的户口迁来，一家人扎根在这块热土上……”这是阿廖沙的儿子吗？仔细一看，真象极了当年的阿廖沙。此时，那孩子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全场一遍嘤嘤、抽泣声中，在我的耳边，分明又听到了“艾的呀，阿廖沙”这句课文，唉，我就是个钢打的硬汉，也忍不住了……

2001-07-0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地水银

1970年10月下旬某天下午。

在通往云南西部边境的公路上，行进着一辆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老旧的长途客车，从这车两边窗下糊着晕车的人吐出的秽物来判断，这车已经跑了好几天长途了。此时，它背负着满满一车人和车顶上那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箱包、装着鸡、鸭、小猪仔的竹笼，正在费力地爬最后一段漫长的坡路。

挤得满满的车厢里静悄悄的，在单调烦人的引擎哼哼声和闷热中呆坐了一天的旅客们都疲倦了，谁都不想说话，只盼着快点到站，下车喝水、吃饭、冲凉，躺倒放松一下混身酸疼的骨头。这一路上，每天一到下午就都是这样的，坐在最后一排的那几个知青，一路上最为活跃，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没了声息，互相靠着在打瞌睡。

当汽车挣扎着跳过一个土坑时，激烈的颠簸把坐在驾驶员后面一排，正靠着哐当作响的窗玻璃睡觉的小罗惊醒了。他先把右座那个歪靠在他肩上呼呼大睡的中年男子推开，然后解下系在前面栏杆上的毛巾，把满身的汗水擦了。系好那条已经分不出颜色的毛巾后，他从那个很巧妙地栓在栏杆上的军用挎包里掏出纸烟，抽出两支并排叨在嘴上，很老练地用手挡着风，同时划着三棵火柴点烟，点着后，递一支给前座的司机。那司机头也不回地接过烟，一句话不说，继续开着车。小罗也不说话，又把头靠到玻璃上，边抽烟边盯着那崎岖的山路想心事。

在小罗座前栏杆上栓着的挎包旁，在被他擦过汗的那条毛巾的遮掩下，还吊着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正随着车子的震颤而小幅摇晃。假若有心人注意的话，会发觉在已经过去的五天五夜的旅途中，小罗从未动用过这个水壶。

在这个水壶里，装着他的心病，正是它，使得他一路上提心吊胆，也使得他一反以往的豪爽性格，独往独来，从不与任何人交谈，显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姿态。这当然使得车上的旅客们，特别是那几个知青，对他颇有微词。不过在那年头，人们都明白着呢，没人会去招惹一个阴沉着脸的、一看就是个知青的小伙子。

“鬼使神差”，一路上这个词一直在小罗心里念叨着。每当后面那伙知青吹着口琴唱那些他也曾经放声高唱的歌曲，他压不住心里不由自主的想跟着哼唱的欲望，直憋得太阳穴青筋突突地跳。听着他们大声谈笑知青中的传闻时，他真想跳起来大吼一声：弟兄们，来打我一顿吧，我是个坏知青。

车子刚驶出昆明，接受第一个卡点检查时，小罗已经后悔了。一路上，他一直在后悔。即使是能够顺利通过最后一个卡点---那就意味着大功告成，他仍然感到后悔。看着那个倒霉的水壶，想想这令人心惊肉跳、寝食不安的几天鬼日子，他真是肠子都悔青了。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次，他产生过把那个水壶扔出车窗外或扔在旅社床下的冲动。

在这个不起眼的绿色军用水壶里，装了满满的一壶水银。

一个月前，小罗接到了母亲的电报，报文只有七个字：父亡于地震速回。拿到电报后，小罗只是呆呆地在屋里坐着。同寨子的知青们拿走了电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办好了大队和公社的证明，收拾好了他的行李，还买了点花生、红糖、猪油让他带回去。他们送他到县城，到县知青办为他办好通行证，买好车票，又陪他在县城住了一夜，一直把他送上了汽车。他已经记不清他是怎样回到了省城，怎样与伤心过度的母亲一起从火葬场抱回父亲的骨灰盒，这期间小罗几乎没说过话，也没掉一滴眼泪。他只记得那大理石的骨灰盒热呼呼的，让他想起小时候冬天将双手塞进父亲怀里取暖。小罗的父母在一所大学教书，他们是下放到五·七干校时遭遇地震的，父亲死后，学校安排他母亲回城，又帮着将他妹妹从兵团调到学校食堂工作。刚安葬了父亲，一天夜里，一伙当兵的跟着派出所的警察到学校把他带走了，听关在一起的知青说，省里有个高级领导让人暗杀了，怀疑是知青干的。也就是在这莫名其妙地被关押时，他听到了有关水银的事。

“淘金，懂吗？”朝大家说这话的那个知青嘴里叨着支草雪茄，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水银，就是汞（不是红药水），知道吗？只要能弄到一两公斤，就可以到’’那边’’去淘金……”那天晚上，被关押的众知青竞相凭着当年学过的那点儿中学物理、化学知识为了淘金为何要用水银争论了一通。

小罗虽然躺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有关淘金的话题他却是竖起耳朵听了个清清楚楚。从那时起，他就象中了邪似的，一心想着淘金。他曾经看过一本叫《毒日头》的小说，记不清是谁写的了，可书中有关淘金的内容，他却大体还记得。他还记得书里后半段所描写的那让他感概万分的情节：书中主人公为了爱情，放弃了靠淘金得来的巨额财产，跟所爱的人在山间买了块土地，过着快乐的隐居生活。不料那个主人公在自己的领地上又发现了更丰富的金矿，为了来之不易的爱情，书中主人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将金矿掩埋了。

小罗插队的寨子紧挨着国境线，他曾经在一家傣族老乡家中见过一个从“那边”过来走亲戚的“外国人”，说是外国人，其实也是个傣族，他曾经为那人所说的“那边”比中国好过而生气。但那人的确很有钱，脖子上、手指上都套着粗大的纯金首饰，还给了那家老乡好多外国钱。他记得那人就是个淘金者。那人说过，在从边境过去不远的江里，就有含量很高的金沙。他回忆起那人也曾说过要到中国买水银。

文革中小罗认识了一个工人，那小子岁数比他大不了多少，却处处摆出副老大哥的架势来。小罗去他厂里玩过，见过那里满池的水银。他们还曾经扔了段废钢轨进去，看到那截沉甸甸的钢轨漂浮在亮晃晃的水银液面上，让

小罗想起了中学课程中学到的“比重”。小罗想，如果找这个哥们弄点儿水银，绝对没问题。有了水银，只要敢冒险带到边疆，即使不去淘金，光是卖水银就能发一笔大财。

被关了三天后，小罗的母亲和学校的人把他保了出来。出来时他的通行证已经到期了，小罗只好打点行李，准备回乡下。直到临走的前两天，他才下了决心，找到那个工人，很顺利地弄了一壶水银。他在这工人的宿舍住了一夜，两人聊了个通宵。说实在话，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做这件事是犯法的，也一直没想清楚有了钱之后要做些什么。可在那哥们的坚决支持下，他抱着做基督山伯爵的梦想，带着那壶水银上路了。

车停了，几个穿军装的人上了车。小罗又紧张起来，他低着头，装成在打瞌睡。这是最后一个检查站了，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可以说“成功”了。车上的人纷纷站了起来，伸展着疲惫的腰身。小罗没敢动，他仍然坐着装睡。那些检查人员很随便地看了看车上的人，点了点数，就下了车，车上的人也随着下车去方便。小罗本不想动的，要命的是，刚才一紧张，尿也急了。他看了看被毛巾盖着的水壶，自己告诫自己：坚持住，最后一段路了，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他又点了一支烟，这次不必再为司机点，司机也已经下车了。他抽着烟，夹紧了腿，拼命忍着，可是生理反应却由不得他，小腹已经憋得发疼了，他后悔吃中午饭时不该喝那一大碗水。小罗回头看了看，车上没剩下几个人了，前后几排座的人都下去了。他决定下车。下车前他想了一会儿，为带不带上水壶而犹疑，他担心带着水壶会引起坐在路边屋檐下的检查人员注意，便空手下了车。

因为下车晚了，等小罗解了手跑回来，其他人几乎都已上了车了。小罗跳上车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满地滚珠般散落开的一地水银。他的头嗡的一下大了，弯着腰靠在车门口，一只脚还没上来。往后的事，有如他多次在梦境中碰到过的那样，不同于梦中感受的是，他并没感到紧张和害怕。他听到一个妇人在向他解释：小孩子发现了水壶，想喝水，她就解开了那背带……太重了，她提不住……妇人满怀歉意，絮絮叨叨叙说的时候，那个腮边挂着泪珠的小孩躲在妇人身后，探出颗小脑袋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全车的人也都在看着他，有人在轻声议论，那几个知青反而一声不吭。等到两个检查人员从他身后挤上来，喝令他下车时，他有如大梦初醒般站直了，很冷静地走到座位前，解下挎包，从包中掏出香烟，先递给司机一支，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头也不回地转身下了车。

他没去捡那个水壶，走过车厢走道时脚下踩着满地滚动的水银珠。

此后，再也没人见到小罗。跟他同车的那几个知青后来打听到：因为他抵死不肯说出水银的来源，被从重判了8年劳改，罪名是“投机倒把”。他们曾经与小罗同寨子的知青一起，陪着他的母亲和妹妹去县大狱探望他，看守说他拒绝出来见面。听说他因为服从改造而提前2年获释，出来后没回家，随后便不知去向，那个工人也一并失踪了。

2001-05-30

1977年，我所在的工厂设立了厂教育科。当时，这个厂约有二千人，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只是小学。厂里约有600名30岁以下的青年，多半是文革中小学没毕业，69年进厂的青工。71年招进厂的一批知青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其他只是初中生，我在文革前也只读到初二。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在厂小学校做过几天代课老师的缘故，教育科刚成立就把我调过去了。

教育科的工作特别繁忙，先是利用厂里小学校的教室办夜校，主要是组织厂里不识字的老工人办扫盲班和为识点儿字的老师傅们办数学班。教育科只有三个人，科长、副科长两个中年人加上我一个年青人，于是白天、晚上都是我守在学校，就住在学校的一间空车库里。当时找教师还很困难，主要是没有多少经费发给人家补贴（虽说那补贴也少得可怜），于是很多时候就只好由我亲自上阵去教，当然只是教点识字、四则运算这些小学程度的课。后来根据师傅们的要求，又加了跟生产工作有关的几何课和力学、电学课程，这些已经是中学的内容了，好在我上学时数学、物理还过得去，临阵磨枪看看教材，结合学徒时学到的东西来讲，到也很受欢迎。

1978年，厂里决定要对青工开展文化双补，要求在一年内把全厂青工分批抽出来搞半脱产的文化补课，这个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因为请不到数学老师，又是我硬着头皮上了讲台。这次可跟老工人班不同啊，下面坐着的学员里，有些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或是技校生，讲不好就要闹笑话的。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打那儿来的勇气，或许是凭着我跟厂里这些年青人都挺合得来吧，居然也就办起来了。记得当时我也搞了点小花样，在组织青工分批脱产来学习时，我有意识地将为数不多的老知青中的高中生、初中生搭配着抽出来，这样每个班上都有几个数学特别好的做我的助手。上课时，每到重要章节，我就有意地发动他们跟我一起讨论，多解题让他们上台来讲不同解法，有好几个班的作业都不用我动手批改，全交给他们了。就凭这些人，我也就顺顺当当地把任务给完成了。

1979年，我得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要开办的消息，心里便打起了小九九。因为当时我是被厂里定为不许推荐参加高考的人，已经痛失77、78两次机会了，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为了一己私利，我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去找当时的厂长、书记，向他们建议厂里也办个班，说了不少“为厂里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话。那位工人出身的书记听了之后，很不耐烦地训斥我，“我们厂又不生产电视机，搞什么电视大学？”气得我差点儿动上手。好在这人也还是个明白人，经我耐心解释后，便同意了，但明确说他们一切都不管，要我自己想办法去活动。

所谓活动，首先便是要办的这个班得名正言顺，否则连毕业证都拿不着。于是我勇闯省教育厅，直接找了省教育厅的头，要求在我厂设个教学班，没请客、没送礼，全凭着一股热情、执着，居然获得了批准。

有了招牌，得找个地方挂呀。此时，双补班仍在继续办着，教室是借用一车间的那一小栋化验楼一楼。我便去找到一车间主任商量，希望他把二楼也借出来给我办电大班，这哥们二话没说便给腾了出来。

教室有了，可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还没有，已经快到考试时间了，来找我报名的人屈指可数，就算全都考上了，也远远不够办一个班的人数，可真把我给愁坏了。厂里的年青人77、78两年高考走了几个，还有不少人在上夜校、函授班（我当时也在上夜校，已经上到大二了，）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机会受大学教育，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却没人来报名？究其原因，是经济因素。我那个厂当时是冶金系统的一个重点厂，厂门口连牌子都不挂，对外只用“267”这个代码，汽车上也是只印个“267”，搞得挺神秘的。当时这个厂的待遇比起其它厂的要高出好大一截，一般工人工资加上那些内容繁多的补贴（什么高温补贴、有害气体补贴等等）每个月能拿到100多元，我这种所谓二线的机关干部也沾光可拿到7、80元。当时好些知青已经结了婚，有的已经有了小孩，青工也正是谈恋爱的年龄，都是要用钱的时候。如果上了电大（全脱产班），那些个补贴就都没了，每月就只有那大约40元的干工资，这就是我招不到兵马的最直接的原因。

那段时间，我真是忙得上了火了，白天在厂里各车间、晚上在城里各家乱窜，逮谁是谁，不分时间、地点，不管他在干什么，连人家正约会也不管，还去找人家的父母、亲属、朋友，硬要逼着他们报名，象个祥林嫂似的，人见人烦。花了大量功夫，最终动员来参加考试及格的，仍不够办班的基本人数，行业主管局已经提出要我们的学生并到局里的班上，眼看这电大班就要破产了，危急之际，那位“不生产电视机的”书记起了大作用，他出面找了家同样招不够人数的一家矿山，把他们的学员合到我这儿，还让厂里给人家提供宿舍，这电大班终于办起来了。

后来，我带着学生们，在厂后的山上开山炸石，辟出一块平地，找来建筑队盖起了教学楼，等到我也跟第一、二届的学生们一起拿到毕业证离开时，这座后山的大学已经有了近百名学生了。

直到现在，有时在街上还会冷不丁碰上有人叫我“老师”，我也会极自然地应答，虽然我既无当老师的才学，也从没正式当过老师，但我毕竟办过几年学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家看看

1970年7月，我在云南瑞丽下乡已经一年多了。一个赶街天，哥哥到姐线公社小饭馆找到我，拿了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头就嗡地一下晕了，电报上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回”。

当时我全家六口人，散到了六个地方：我们哥俩在瑞丽，在相距七公里的两个生产队插队，离昆明近千公里；妈妈在离昆明有500多公里的一所五七干校，弟弟所在的思茅生产建设兵团距昆明600多公里，爸爸在昆明郊县的五七干校，只有他还能每月一次回家看看只身一人留在昆明读初中的妹妹。跟家人们离别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了，早就有看看他们的想法。说起来简单，实现却很难，其他地方的知青想回家也许容易，只要生产队同意，买张车票就行了，我们可不行，途中有三条大江挡道，要想过桥必须持有县公安局签发的边境通行证，要得到这张边境通行证，首先必须得到县知青办签发的探亲许可证。

那时的县知青办，可算是知青的最高主管机关了，各公社虽然也有知青办，但没有权力批准知青探家，而县知青办对知青的管制相当严，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允许知青们回家，能获准回家探亲的知青，只能是出具直系亲属生重病或是死亡的医院证明才行，按知青们的说法，基本上只有“奔丧”才能实现回家看看的愿望。也有另外一种机会，比如经军代表“特批”的少数几个女知青，无须什么证明就能回家。

见我拿着电报发愣的样子，哥哥忙解释说妈妈根本没病，这封电报是妈妈应他的要求拍的。

不久前，云南峨山发生大地震，在那儿的云南教育系统五七干校损失惨重，死了不少教师，其中有不少是知青的家长，于是有不少知青获准回家探望。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县知青办相对放宽了手续，只要凭家里发来的病危电报就可以批准回家探视。正好哥哥一个在保山运输队开车的初中同学要开车来瑞丽玩，他就起了借此机会搭车回趟家的念头，写信给我妈，要她拍个装病的电报来。妈妈也是想儿心切，也不顾什么党性原则了，当即就拍了这封只有四个字的电报。

按照规定，家里人病了只能批准一个知青回去探望，幸好我们哥俩在不同的生产队。哥哥拿着电报顺利办完生产队、大队直到公社的批条后，又把电报给我送来，我接着办这些手续。

我写了份申请，一段语录开头后，就只有因妈妈生病了，希望请假两个月回去探望，只有寥寥数字。生产队长

根本不识汉字，一听说这事，着急得很，当即让我帮他写上同意二字，然后他在下面签上他的傣文名字，还要跟我一起到大队、公社去办，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办这种假事毕竟还有点儿心虚。到大队办手续很顺利，那个管知青的干部吃过我的亏，怕我。到公社也很顺利，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跟哥哥处得不错，明知不能批准哥俩一起走，却二话没说盖了印。

随后，两个队十多个知青陪着我们哥俩一起走了20多公里，到县城办最后的审批手续。哥哥先办，通过。在他之后，等别的知青办了几个以后，已经快到吃中饭时了，我才在一大伙知青的簇拥下进了那间小办公室，递上盖了两级知青办大印的申请书。县知青办那家伙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姓W的刚才办了一个，你跟他是哥俩吧？众知青立即起哄，你什么眼神呀，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他们俩就互不相识，你跟我们队谁谁也是哥俩吧，乱哄哄地吵得那家伙头疼。其实我一直没抱多大希望，我也向哥哥说过，不行就他一个人走吧，所以当时我连声都没吭。那家伙在一片哄吵声中，不耐烦地挥挥手，签字盖章，刷地一下就把那纸申请塞到我手里了。我站在那儿还没反应过来呢，在大伙的欢呼声中涌出那间小办公室，一起到县公安局办通行证去了。

拿到通行证，回家等车。跟我同寨子的知青除办病退走了一个女生外，我是第一个获准探亲的，大家都知道我是搭货车走，都要求我帮着捎带东西回家。瑞丽因为毗邻缅甸，物质条件较好，能往家里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农产品有大米、红糖、白糖、猪油、菜油、炼乳、花生，当然还有打火机、走私手表等，只是穷知青买不起。我那个寨子有20多个知青，每人托带一包东西，走时装了一辆牛车。到哥哥那儿一看，他要带的东西更多，全寨40多个知青，每人也有一包，加上我们哥俩带的两大麻袋大米，五磅白铁桶装的猪油、菜油各一桶，还有一小箩红糖，一布袋白糖，要带的东西都堆成了小山了。我看着直发愁，这到时怎么带呀？

我在哥哥的寨子等了两天。下午车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天。听到轰隆隆的汽车声，我从竹楼窗子看出去，大乐——三辆大解放，每辆后面还拖了个挂车，非常有气势地开进寨子。这下子好了，不愁东西带不了喽。我们当即决定，再带两大箩无眼菠萝，哥哥寨子的无眼菠萝可是当地最好的品种，这下妹妹可以大饱口福了。

哥哥的这位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去当了驾驶员，这次跟他一起来的，有他两个同事，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老师傅，另一个是个中年师傅。还有两个女的，是那两位师傅的老婆，跟着一起来玩的。这些师傅们家里都有知青插队或是到农场，所以一见面就跟我们很亲热。他们到瑞丽玩两天才走，就在这两天时间，瑞丽其他被批准探亲的知青找来要求搭车，师傅们毫不犹豫，全都同意了。到我们动身时，车上已经有了来自不同公社、不同寨子的六男三女共九个知青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用假病证明办的探亲。车开的那天，人人心情愉快，一路欢呼着，乡亲们看着直纳闷：这些个没良心的，家里有人病重病危，他们还高兴成这样？！

我们的车队耀武扬威穿过县城，顺利通过瑞丽江大桥的检查，中午时到遮放停车吃饭。吃完饭上车一看，三个车厢都塞满了人，大都是想搭车到芒市的当地人，其中也有几个知青打扮的女生。师傅们商量了一下，那个老师傅

去驾驶室拿了一叠票，爬上车厢去，要搭车的人买票。他刚上车宣布卖票时，我注意到那几个女知青小声嘀咕着，打算下车了。老师傅先盯住几个穿干部制服的，要他们买了票，然后只收那些穿民族服装的傣族老乡半价，对那几个女知青，他连问都不问。老师傅要下去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不住了，问他为什么要他买全票，老师傅翻着白眼说：优待少数民族是我党历来的政策，懂么？知青比少数民族还稀奇，免费。他话刚说完，知青訇然笑了起来，那个干部脸红一阵白一阵，蹲下不吭气了。

车到芒市，一个师傅有孩子在20多公里外的公社插队，他们开了一辆车去看望，我们则找了个旅馆住下等。这一等就是三天时间，可惜了我们那些菠萝，每天都要翻出好几个熟透了的请大家吃。

从芒市出发时，车上又多出了几个知青，途经保山、下关、楚雄，一路上不断有搭车的知青，等到昆明时，车上已经有27个回家探亲的知青了。大家都是知青，见面就熟，一路上故事不少，欢声笑语不断，要到昆明那天，众人商量着到昆明后怎么玩，把插队的艰苦早给抛到了脑后。

车队翻过碧鸡关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昆明城里的万家灯火扑面而来，大家那个激动、那个兴奋呀，连平时矜持的女生，也忘形地直着嗓子欢呼。一年多以后，当我被招工回城，与同车的数十名知青一起再次看到这城市的灯光时，反而没有这么激动了，因为当时心里不仅想到将面对的未知命运，还突然想到了仍在乡下的朋友们和那里的乡亲们。

回到久别的家，首先发现我们哥几个走前住的那间平房居然被人占了，妹妹从楼上跑下来接我们，听她说，院子里什么革委会的趁我们走后，强逼她把那房腾了出来。这还得了，第二天当我们哥俩阴沉着脸找到那革委会时，他们当即就把楼上一间房的钥匙交了出来。休息了一天后，我们分别到同寨的知青们家中送东西，看望他们的父母，跑了好几天才基本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去看在干校的爸爸。见到我们，爸爸叫我们等着，就到食堂打饭给我们吃。我看得出来，他虽然没什么表示，但听到别人夸他两个儿子长得壮实时，心里还是很满意的。饭后，父子三人到水库边聊天，爸爸掏出包香烟来，自己叼一支，给哥哥一支，却不给我，两人边抽边聊，哥哥明知我也会抽烟了，却故意不说破，把我晾在一边，气死我了。爸爸没多说什么，只简单问了我们以后的日程，给了我们些钱，就把我们送走了。按照他的安排，哥哥先到普洱、思茅看我妈和我弟，等我哥返回来我再去。

哥哥走后，我成天跟几个朋友在城里闲逛，游泳、踢球、上公园、看电影，一句话，玩疯了。那时的昆明，跟我们同年龄的人几乎就见不到，我们走到那儿都会被人认出是知青来，我们去学校看老师时，那些小校友们围着我们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可能在他们眼里，知青跟那种被流放充军的罪人差不多，挺神秘的。

那时我们有几个会玩乐器的知青，常聚在我家里合奏，我会弹八弦琴，加上拉手风琴的，吹笛子的，拉提琴的，我们戏称为知青四重奏。有时我们也带上乐器去公园，一群人在我们的伴奏下，唱起知青们爱唱的“黄”歌，

吸引了公园里的人。

哥哥回来后，我只身一人踏上了远赴普洱、思茅的探亲之路。我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让我们哥俩一起去，他担心别人会对我们家一下回来两个知青有看法。

见到妈妈后，第二天她就带我到普洱县城的百货商店去买穿的。没想到，在那个小百货商店的一个偏僻的柜台上，居然放着一把盒子上面落满了灰尘的小提琴，这可是在昆明都见不到的呀。我当即提出不买衣服了，要买提琴。我妈一问价，42元，这可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呢，可她还是毫不犹疑地买下来了，这可是我此次探亲最大的收获了。

在妈妈的干校住了三天，又动身去思茅看弟弟。

一年多不见，弟弟明显长高了，也长壮实了。他在的那个农场，除了昆明知青外，还有北京、上海来的，比我妈那个尽是些老头、老太太的干校好玩多了，我在那儿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返回昆明。

回到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找那个会拉提琴的哥们来教我学琴，学了没几天，才刚刚入门，哥哥提醒我，我们的假期到了，该回去了。这怎么成？我要哥哥先走，让我再学上一两个星期后再回去。

哥哥也没坚持，他也没走，我们又多留了一周时间，直到爸爸回来。

爸爸回到家，来看了看我练琴，没说什么就出去了，直到下午才回来，然后让哥哥叫我到他屋里，递给我们两张飞机票，说了句：你们明天走吧。

知子莫如父，这句话真是不假。爸爸知道此时如果催我回去，我肯定不干，但如果是乘飞机，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当然是做梦都想坐一次飞机的。

就这样，10月的一天早晨，我们坐上了一架苏式小军用运输机改装的客机，离开了昆明，沿着当年的驼峰航线，飞往滇西。飞机起飞后，我从那小圆舷窗往外看，第一次看到昆明城的全貌，当那碧波荡漾的滇池从机翼下掠过时，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这么美丽的昆明，真舍不得离开，这里有我的家，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家……

老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

20070828，月全食。说是最佳观察位置在瞎国。

不是俺拍的，也不是小熊拍的。是瞎国银民拍的。

1

年初的时候，小熊毕业了。其实她早就毕过好多次业，光在瞎国就毕了三次。这不是折腾吗！

不折腾能行？当然不行，毕这三次业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凑够申请身份的分儿。所幸银家毕这三次业还都不是那些混分儿的专业，末末拉了儿还闹了个该校类似"十佳青年"那么个称号。为毕这些业凑这些分，一晃儿小熊都在瞎国飘游了四年，要是再算上出去上大学都有八年了。打日本鬼子不过如此，银生能有几个八年？

业毕完了，分也凑够了，接下来就该申请身份啦。ZF是官儿，瞎国ZF也是官儿，全世界的官儿没有不僚的，东北银不是说官不大僚不小嘛。

申请身份先得弄一大堆证明文件，证明你能凑这么多分儿。那天晚上，小熊来电话了，一听声儿就不对。怎么了？说是很关键的学历认证机构来电话说条件不够，不能为她证明相应的资质。这不是气银吗，中国银民早都掰着脚趾头把应该选修的课程算过多少遍，怎么可能不够？

"不可能的！""银家就是说不够哈""申请复议呀""当然，已经在写信了""对，别灰心。也许什么弄错了"一阵沉默……

"不管了，要是再不行也只好回家。反正俺熬了四年，该做的俺都做了，能做的俺也都做了，要是还不行俺只

有回家……（以下省去一万字。俺耐着性子听完银家发泄，别银就用不着受这罪了）""没事。真要回来就回来吧，什么地方不养银哈"……

就算俺不至于叽歪，心里同样不踏实。肯定有什么不对了，天涯海角，俺真帮不上什么忙，想来想去，只好打电话请瞎爷爷判断一下。他老银家一听比俺还火急火燎，火急火燎又能怎么着呢。老妖精难道不是能做的都做了吗？俺相信会好起来，要是真遇上倒霉也只能认命。

俺相信小熊能把事办好。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睡觉吧，能睡得踏实么！

2

小熊三岁的时候，俺就推着自行车和她一起早晨走到幼儿园，晚上再从幼儿园走回来。上小学以后，除了遇上狂风暴雨，都是她自己去上学。中学当然就一概撒手不管，任由她骑一个小时车去学校。到了大学银家干脆就离家出走，自己创造自己的天地去了。至于远去它乡那天，老母熊还在候机楼外边给她叽叽歪歪打电话，银家已经跟刚认识的一帮同去瞎国的小孩们聊得嘻嘻哈哈了。

记得鬼子的电影《狐狸的故事》里说，小狐狸长到一定时候，老狐狸就把它们都咬出去，自生自灭都活该了。本来这是世界上动物共同的做法，唯独自认为最聪明的银类退化到成天为崽子叽叽歪歪，一直叽歪到自己给儿咣当的那一天。

小熊的一个同学她妈是俺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一直到小学毕业那孩子长得比她妈还高还壮，老妖精仍然天天早晨接晚上送，迟到早退旷工在所不惜，好在那会儿是大锅饭。到这孩子考上中学，终于有一天她妈哭丧着脸问大家伙儿这么远的路可怎么接送啊？实际上过了没一个月，那孩子就自己飞也似的骑车上学去了。

动物的本能就是自谋生路，老狐狸教会小崽子打食儿也就完成了使命，早一天把小崽子咬出去，小崽子就早一天成熟。

银啊，最没出息的动物！

3

说别银容易说自己难，那天夜里实在睡不踏实，脑子里全是这件乱七八糟的事，迷迷瞪瞪忍了一宿。

早晨（瞎国那边已经上午了）电话就响把煤球和俺都吵起来。这次是阳光不是阴霾，小熊说那个认证机构刚来过电话，说是昨天把学过课程列表漏看了一行，认证已经通过并寄出，道歉云云……。幸亏老公熊和老母熊的心脏都还算坚强，不然多半等不到这个电话就已经咣当了。也好在瞎国的官僚还知道核对还知道道歉，要是在基国呢，也许俺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些话用不着俺去教小熊，亲身体验总比老妖精说教更容易让小兔崽子们接受。

在老妖精的眼睛里，孩子永远是孩子，总想叽叽歪歪指挥银家该这样该那样，总以为小兔崽子们什么都不懂什

么也不会，老东西哪里知道小兔崽子们天天都在长大，天天都会有自己的新想法新认识，越来越会对这些老不S的东西嗤之以鼻。

世界是他们的，曾经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缔不是我们的。我们老妖精，暮气沉沉，好象晚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不在我们身上。那个老不知S的家伙居然还好意思说也是我们的，丫才是个真正的老FDP。

跟孩子说话不能太深，银家有银家的想法，银家也明白老FDP想说什么，只不过不愿意认菘就是了。

想当初，俺送小熊去机场的时候，这小兔崽子还满脸不高兴地说出去就出去，学个学位就回来当海龟。俺没理她，路是银走出来的，就算是破路也得走，真要撞上南墙再回头也没什么了不起，俺们这辈子撞的墙还少吗？

大概齐半年之后，电话、QQ、MSN里不知不觉地变成讨论移民的话题。俺没吱声儿，但是俺知道那小兔崽子变了，俺不想点破。那是自由，那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没有银强迫你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只要你的行为符合银类的良知。那是公平，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只要你尽力做好你应该做的。

老狐狸从母性到兽性的转变也太残忍太突然，其实小狐狸未尝不讨厌老不S的家伙。自诩为最聪明的动物，银类反而把天性给忘了。小狐狸长大会咬银，青少年的孩子会反叛，老家伙要是总沉浸在自以为是，结果多半好不了。

4

PR（瞎国的绿卡）顺利拿到了。小熊在电话里兴高采烈地告诉俺的时候，俺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忽然之间，一股辛酸涌上心头，俺明白该做的俺都做了，历史使命也快完成了。孩子长大成银了，银家要自己走今后的路，世界是他们的，不再是俺们的。俺们是晚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咣当不过早几天晚几天的差别。

5

高考对于任何一位家长都是磨难，刻骨铭心的磨难。

小熊是在山东上的大学。高考她发挥得一般，分高不高低不低，留在北京只能上个三流学校选个三流专业，去外地就能上更好的学校能选更好的专业。与坚决不离家门半步的同学不一样，我们讨论报志愿的时候，小熊毫无障碍地同意出去，银家或许早就想见识一下新的世界去创造自己的天地。谁知道呢？

别羡慕别的孩子考得更好，也别不屑别的孩子考得更差，磨难对所有家长都一样。考分低的忙着怎么挤进录取线，考分高的急着找更好的学校选更好的专业。

听派出所的片儿警说，每年高考前少数民族的队伍就会壮大一回，但凡祖上十几代沾点少数的边儿都赶紧改户口，就为了加分嘛。

俺一位同事的孩子考了几乎满分，被清华计算机系录取，那孩子一根筋非要上当年最热门的生物工程系，人家不要就坚决复读一年再考，第二年生物工程不那么热了，考上了最热的计算机系~~~真不知道他爹他妈这二茬罪是怎么受的。

那些年招生现场在大兴宾馆，去过的都说那才叫震撼，炎炎烈日下望眼欲穿的家长，眼皮朝上翻的工作人员，多么强烈的对比。有幸混入现场，才知道那就是骡马大会，各学校认识不认识的招生人员都递纸条子，你收我的我收你的，大家哈哈哈。饭局是少不了的，一声招呼忽喇喇去十几口子，买单当然是有道儿的家长，甚至都闹不清楚请的是谁，拉动GDP呀。

俺一直认为不能把孩子套在为读书而读书的僵化体制里，俺鼓励她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更要有自己的目标。这是一条长满荆棘的路，不是还要上学么，不是还要工作么？很多时候你不能不屈服，不能不在僵化与自由发展之间找平衡，这不是孩子的责任，是家长的责任，累呀！

俺有个神经兮兮的同学曾经声称要让她女儿退学，回家自己教育，甚至说要办个班，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带到大。后来当然没退学也没办班，不过8*8后全家留在米国，她女儿哈佛毕业了。

6

真的该做的都做了么？

人生就是折腾，没有喘息的时间，直到想喘也喘不了的那一刻。小熊上完了学安下了身，接着就是找工作。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全世界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更看重经验的异国它乡。

几个月来小熊做过各种工作，和专业有沾边的也有不沾边的。有那么一天，说是一个门户网站要她做全职了。听上去挺好的嘛，可惜好景不长，去了才知道大老板是个同胞，很暴发的那种，对IT一窍不通，日常工作都由同样一窍不通的小蜜瞎指挥。上班大家都在大眼瞪小眼，闲得煮骨头熬白菜，弄得办公室象饭馆，却要每天加班到十点多。或许招聘是这个公司唯一正经的活儿，职员天天都有新来的天天都有辞职的，走马灯也似的换。

小熊感觉不好，俺也感觉不好。不干活还挣钱还不好？您说要是这么好吃懒作的一两年下来，人岂不就废了？俺们都想不通这个公司怎么回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洗钱。留在那里干什么？两个星期后，小熊辞职了。小熊说，以后再也不到中国银的公司工作了。

虽然万里之外俺帮不上忙，人家也用不着俺帮忙，牵挂却不会没有的。除了钱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孩子们长大了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总以为家长落伍，其实真到出毛病的时候想到的才是你，直到你两眼一闭的时刻！

有一天板筋那个老FPD坐旁边听小熊给俺打了一个钟头的电话，忒羡慕地说他家丫头要交学费才特亲切地跟他说上五分钟。俺说您算了吧，俺家小熊是问俺MIS设计的事儿涅，幸亏她爹不是文盲。

可不是吗，在断断续续失业的一年里，小熊需要的不是钱，是要和俺讨论，要听俺的意见。尤其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她要的是鼓励和支持，还有俺的馊主意。不管俺说的她信不信，俺还是要说，还是不能不说。父母未必懂得孩子，孩子也未必懂得父母，就象俺们曾经不懂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谁也离不了谁。

经验和技能更多要靠日积月累，孩子们走进社会的时候，才忽然发现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并不很中用，尤其是从天朝的学校走出来的。如果家长不能象老狐狸那样教会小狐狸打食儿，狐狸早晚要成了濒危动物。

7

小熊学钢琴纯属偶然，她6岁那年有个亲戚的学生来北京上雅玛哈的暑期培训班，临时住在俺家。那个学生是个大孩子，整天跟小熊和她表哥玩作一团，吹拉弹唱热闹非凡，于是兄妹俩都吵着要学琴。

那会儿一架星海105要两千块钱，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而且钢琴课的开销更是大头儿。俺跟这俩个小兔崽子有过一次太深奥的对话。俺告诉她们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基本别指望成名成家，很艰苦但是可以有很多乐趣，更会对人生有难得的领悟。这些话对于那么大的孩子多半听不懂，不过她们听懂了别的孩子放学后在楼下玩的时候她们要练琴，别的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她们要做作业，那不是一天两天的辛苦，也许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俺希望她们认真地想好是不是真要学钢琴，如果要学的话就希望她们能坚持下去。她们都很郑重其是地点了头。

孩子们的话未必能当真，但是家长不能不引导她们当真，更要以身作则地让她们当真。孩子在练琴的时候家长可以去做饭，也可以看看书，但是不能在旁边看电视。从那个时候起俺家的电视基本成了摆设，为此老公熊和老母熊不知掐过多少架。

在这漫长的学琴过程中，孩子们不可能没有波动没有反复，俺相信莫扎特那样的大家小时候也一样，在无穷无尽的音阶和练习曲的包围中会困惑会反感会抵触会拒绝。好多人都认为学钢琴就得家长拿个掸子把儿条帚疙瘩站旁边儿，俺认为那纯属屁话。如果没有兴趣，就不可能深入到音乐之中，没法感觉到它的思想，如同强迫贪官信仰什么主义，剩下的只是糊弄。家长能做的只有引导和鼓励，与其说这是考验孩子的耐心，不如说这是考验家长的毅力。

十年以后，小熊考过了九级，因为上了高中就没再学下去。小熊没有成钢琴家，但是她有了一种乐趣，有了一种爱好，也有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小熊搬家以后买了台钢琴，说是找不到工作就在家教死孩子学琴。她有没有回想过那十年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当她的同学为了一小时八块钱在拼命刷盘子而她可以一小时五十块钱坐在家里教小鬼子弹琴的时候。她从来没对俺说过，但俺知道她会感激俺，因为俺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丝苦涩。

没留意过从什么时候开始，让孩子学这学那成了一种风气，琴棋书画文艺体育，大凡能当作一技之长的都一窝蜂也似地塞进本来已经被上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的生活里。其实他们当中有多少是真正出于爱好呢？深究起

来，多少包含着家长的过多的希望，那种望子成龙的功利。成龙也罢成虫也罢，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倒也并无大碍。

当您咬着牙狠着心去培养孩子的时候，或许是在为她们谋一种生路，就象老狐狸教小狐狸打食儿那样。

顺带说一点不着边的，小熊那个表哥家长是外交官，曾经在俺家住了三年多。后来他爹妈任满后回家，就再也没有弹琴。再后来那孩子上了清华，再后来上了米国，现在娶了老婆，说是年薪十几万了，不过从来没给家里什么，还不时算计他爹妈那些辛苦钱。

自家的羊自家拴，俺操那心干啥？！

8

其实更大的功利得失考验的是家长。记得当年返城后在劳动局门口等着分配时，有个老插发表过一通高论，大概的意思是俺们等半年了还在待分配，是因为非要让妇女也顶半边天，要是能把她们挣的钱划给她们老公，能空出多少就业机会，而且她们还能省了托儿费保姆费伍的，云云。在那个大讲男女平等的年代说这种话可算石破天惊，事隔多年，俺竟然越来越觉得这哥们儿说得对。

小熊两岁半的时候，俺就把她送到幼儿园。那时候俺上班要骑自行车跑十几公里，每天早晨七点把她送到幼儿园，然后飞也似的到单位，下午提前溜号飞奔到幼儿园接小熊。尽管如此，通常俺都是最后一个接孩子的家长。回想起来，俺要感谢俺的室主任，他从来没因为俺天天早退说过什么，有的时候还悄悄提醒俺该走了。俺也要感谢幼儿园的校长和老师，她们天天都因为要等俺不能按时下班，却从来没什么怨言。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俺们从来都在两难的窘境中挣扎。一边是要为养家糊口去奔命，一边要为教育孩子去操心，二者很难两全。父母都把精力投入到事业，则孩子少了很多必须的关爱。太多的顾家，又难于事业有成，没钱难于让孩子过得更好，孰轻孰重，实在是难于取舍。

当俺在单位忙碌的时候，总要分出一点精力别忘记孩子。当俺冒着寒风赶到空荡荡的幼儿园，总能看到小熊眼睛里的委曲。生活就是这样继续，一天又一天。事业无疑要大打折扣，孩子也少了很多关爱，对俺们来说，都是付出，都是无奈，就看每个人更看重哪个。

是耶非耶？那时爷爷奶奶都健在，不送小熊去幼儿园也没问题。俺以为那不行，她总要自己走自己的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学会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如同小狐狸笃定要独立，那就不如早些让它们学会打食。人啊，什么都能改变，就是不能改变自己的习惯，这习惯却是从小养成的，一辈子跟着你。深究起来，中国的国骂真是精粹，很多时候要遣责某人的恶行，确实不得不问候他长辈是怎么养的。

俺不知道自然界中除了人类是否还有其它动物会隔代哺育，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却匪夷所思地把四世同堂当做其乐融融的美事。殊不知把孩子交给祖辈哺养，最大的可能是惯坏孩子，尤其对于独生子女。

小熊五岁的时候俺分到了房子，小熊奶奶为此赶紧办了退休。但是俺坚决否定了把小熊留在奶奶家，尽管俺知

道奶奶很伤心，也知道俺要受更多的累。好多年后，老人家走的时候，俺很难过，俺知道她老人家这辈子少了一大块乐趣。俺自己为了小熊牺牲了很多，让老人家也陪着牺牲，俺欠老人家很多。只有到了老不S的年纪，才懂得老年人的想法，然而于事无补，有什么用呢。

如果一个人工作就足以维持家庭，如果有足以放心的教育环境，如同教育的困惑，这不是俺们自己的过错，

9

小熊这次回来呆了两个月，竟然还是飞也似的过去了。临走的前一天，俺跟一个在美国的哥们儿打电话聊天，说起了银生，说起了这辈子。从上学、插队、工作、成家……，忽然之间到了花甲之年，所剩时日无多啦。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那哥们儿说，你不能细算这笔账：就算还能活20年，也就七千多天，还不唰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俺说，你能再活20年吗，再活20年真成老妖精了，反正俺觉得俺不成，再能活10年已经很知足了。前半辈子透支的太多，从三年挨饿、下乡苦力开始，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一根蜡烛总要烧完，前边烧得多，后边就剩得少。

他说，也是啊！折衷一下算15年吧……K，只有五千多天了。咣当！你还好，后边还有女儿照顾着，俺可是老无所养。

俺说，你算了吧，小熊明天就走了，俺不是一样没指望吗。假如银家一年休一次假回来看俺，15年也就15次一个月。再说了，银家有银家的生活，与其年年都跑回来看俺，不如去满世界去看看，就算她要回来看俺还不忍心涅。

老夜冤，不冤不乐。老夜挣，不折腾不罢休。

10

终于有一天，要跨过那个中国式整数关口。

一个甲子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粒氢二氧一，却是个银无可回避的转折，那意味着您快玩儿完啦。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国银好面子，尤其擅长把坏事弄成好事。所谓大寿，不过是拿热毛巾把脑门子上的抬头纹抹撕平了再去装年轻，活到这份儿上，还有啥可高兴的，就剩天凉好个秋。

大寿不大寿随它去，用不着折腾亲朋好友让大家伙儿跟着一并受累，自己弄点好吃的犒劳自己倒是应该的。一碟肘子一杯浊酒，安安静静地跟煤球坐一块喝上两口，这么大半辈子也该歇口气了。

二锅头灌下去，猛然醒悟过来折腾这几十年无非就是为了两个字：活着。

为自己活着，为老人家活着，更为了儿女活着。要活，要活得滋润，要活得更好。就象犄角上挂着草的羊，一

脑门子心思想吃到嘴，直到累趴下那天才明白过来无非是过眼烟云。银啊，总要为虚无飘渺的幻想没完没了地付出。

地球的另一边，小熊发来了贺卡。有银惦记着你，你也要惦记着别银，就得活着，就得活下去。

11

经历了记不清多少次打短工之后，终于被这个公司认可，小熊签了长期合同，成了公司的正式一员。技不压身，不是么？

老公熊老母熊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银家一年挣的钱快赶上俺一辈子了，谁叫俺没出息涅。不过老公熊认为这辈子干得最成功的事，就是咬紧牙关让小熊找到了自己的银生之路。没有观众，没有喝彩，也没有报答，因为这是老不S的老妖精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也是心甘情愿做的。

小熊可不这么想。银家说，本来打算下个月就不干了，因为这个工作没有挑战性，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银家说，干了好久太累了，要彻底休息，好好睡大觉。银家说，账上有了好多钱，要好好享受一下，去爱丽丝岩去塔斯马尼亚去环绕瞎国走一圈。这下子哪里都去不成了，因为CEO说了她非常有能力，因为部门经理说能招来她简直是big surprise，因为同事纷纷说离不开她。唉，银们都在重复着同一轮迴。

这不过是千万年来银类周而复始的轮迴中的一幕，没什么可夸耀，没什么可报怨，也没什么可懊悔。太阳落下去，太阳还会再升起来，不管有没有你，也不管有没有银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风雨阴晴六十年

前言

我是“解放牌”的，在全国欢庆建国60周年大庆前夕，我也迎来了60岁的生日，当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退休的时候也到了。

回顾这60年的经历，真是酸甜苦辣皆有，风雨阴晴俱全。我将以前在凤凰网和一些知青、电子网站发表过的文章串起来，再补充上没写过的年月，形成一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算是对自己多半辈子的回顾，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写照吧。

第一章

最初的记忆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开国大典”前半个月，出生在云南昆明。

不过我们家可不是昆明人，父母原来在北平的交通部公路局工作，1947年跟随著名的桥梁专家罗英，带着外婆和还在上学的小舅舅，到昆明的四区公路局任职。

我出世时，昆明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当年12月，卢汉发动起义，昆明得以“和平解放”。但是街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冲突，流弹横飞，我们一家人到太和街（今北京路）一位亲戚家的地下室里躲避风头。

一年多后，弟弟也出世了。其时，正值解放后大兴建设时期，父母的单位改组为“交通部西南第三施工局”，开赴昆（明）（打）洛公路建设工地。父母带着年近六十的外婆和我们弟兄俩也加入了筑路大军，小舅舅则留在昆明住校上学。

那时的云南边疆，还处于原始的蛮荒状态。老虎豹子出没，瘴疠疫病流行。我从记事开始，就听到各种各样的惊险故事。一个故事说：某工人夜里起来上厕所，因为外面太黑就拿了两支电筒，走到厕所外发现山坡上蹲着只老

虎，两只大眼睛瞪得圆圆的。工人吓得不敢动，用两支电筒与老虎的眼光对照。双方一直僵持到天蒙蒙亮，老虎转身走了，工人才得以解脱。另一个故事说，一天晚上，工地上拉来了一些猪肉，炊事员便煮了一大锅红烧肉，准备第二天改善伙食。谁知夜里一只老虎闻香而至，拱开树枝搭建的伙房门，把一锅肉吃个精光，然后闷头大睡，把隔壁睡觉的工人吓得大气不敢出。直到天快亮，老虎才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了。在普洱，我还亲眼见过被豹子咬死的猪。

工地上的人还拿我开玩笑，说我长大后要长络腮胡子，老佧佤见到要拉去杀头祭祖。妈妈也说过，一次她独自外出，在山上与一个挎着长刀的佤族汉子狭路相逢，赶紧让到边上，心都悬到嗓子眼上，还好那人匆匆走了。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是危机四伏啊！刚懂事的时候，经常做噩梦。

一段公路修好后，工程局就要搬到新的工地，称为“翻段”。我们家在机关，一般还是搬到修好路的地方。我记得好几次天不亮就被叫起来，爬到烧木炭的卡车上，等着司机摇动小鼓风机，给煤气发生炉点着火，然后就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前行，有次，外婆还被煤气给熏昏了。

小时候，最崇拜的英雄当然是解放军。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智取华山”，我的小人书也多半是打仗的故事。玩具自然是各种枪了，妈妈还给我们兄弟俩做了小军装，不但有陆军的，还有海军的，至今家里都还有好几张当“小解放军”的照片呢。

艰难的生活让父母明白，拖老带小无法适应这动荡的环境。54年冬天，妈妈借到部里开会的机会，把外婆和我们弟兄俩送回了北京。

第二章

分司厅胡同那时候，从边疆工地到北京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们先坐大卡车到昆明，再坐窄轨小火车到滇东北的沾益，从那里又改坐汽车，经贵阳换车到金城江，才见到大火车，但到柳州还得换一次车，到了武昌又得坐轮渡过长江到汉口再上火车，前后花了半个多月，才来到北京，在分司厅胡同20号租了两间小房住下。

20号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房东住北屋，姓什么我记不清了，家有两个孩子，儿子是个跛脚，女儿是个结巴。东屋姓潘，有两个儿子温峰和温岳，比我们稍大。西屋姓王，家里没有小孩，跟我家很少来往。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就属隔壁邻居—同住南屋的刘家。

刘家当家的是个三轮车工，用现在的话就是“板儿爷”，老婆连着给他生了四个女儿，总算老天开眼，第五个是儿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和我们最玩得来的还是老三敏捷和老四芝捷两个女孩。我学会的第一支歌《我的祖国》就是敏捷姐姐教的。

初到北京，让我们两个南方山里来的土小冒眼花缭乱。我们刚去北京时已是十一月，天气变冷了，妈妈给我们买了棉猴。我高兴地用帽子装苹果，弟弟穿上棉猴连路都不会走了，一迈腿就摔了个屁股墩。

妈妈抽开会的间隙带我们去了苏联展览馆，这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辆载重25吨的大自卸汽车，车轮都比妈妈还高，我们站在车下简直就是大象旁的小兔子。

妈妈开完会就回工地去了，我上了分司厅幼儿园，弟弟还小，只能上胡同里的托儿所。带我的老师姓梁，后来我听说，她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她对小朋友可亲呢！我刚到幼儿园时胆子特别小，有两次，我在游戏时尿急了也不敢去上厕所，尿在裤子里了。梁老师耐心地帮我处理，送我回家。她鼓励我多和小朋友们交往，和小朋友一起，我认识了芍药花，学会了《大树底下有棵小绿苗》的歌，还见识了“吊死鬼”（一种毛虫）。慢慢地，我的胆子大起来了，后来还敢独自一人表演节目了。

幼儿园给家远的小孩准备了儿童车，其实就是带棚、带小椅子的三轮车。我家住得近，没权利坐，我可羡慕家远的小朋友了。总算有一天，幼儿园带小孩去公园玩，我就坐了那么一次。

后来，小舅舅考上了北京大学，也到北京来了。他这一路上比我们更惨：遇到水灾，路断了！几经周折，到北京时已经开学半个多月了。多亏了他的同桌帮他补课，她后来成了我们的舅妈。

有一次，舅舅、舅妈（那时他们还没结婚，我们叫她“姑姑”）和外婆带我们上街，下公共汽车时外婆把提包忘在座位上了，多亏舅舅记住了那辆汽车的车号：677，他走到对面的车站，等677号车返回来，跟售票员一说，那位和蔼的阿姨就马上把提包递给了舅舅，那时的社会风气真是好啊！

从此以后，我对汽车号码产生了极大兴趣，我弄了本小本子，出门就带上，里面分大卡车、公共汽车、小汽车记下了好多号码。有一次，我在胡同的一个大院（后来的宁夏驻京办事处）门口看见一辆漂亮的小轿车，牌照刚好被几个人挡住，就悄悄转到后面去看，谁知被那几个人发现了，大声呵斥，吓得我赶忙往家跑，但车号还是被我看见了，是：104028。还有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国产的“解放”牌汽车，也赶快把号码记下来，是：105509。这虽然是孩童的游戏，但使得我以后对数字比较敏感。直到现在，虽然年纪大了，我对数字的记忆力还很强，不管是同学、亲戚，还是公司里同事或客户的电话号码，谁都没有我记得全。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和外婆就教我认字，这也是我们家的传统了。我的三个舅舅都是从小便学认字，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二舅年轻时就当上了副研究员，还到过苏联，给我们带回来自动铅笔和皮兔子呢。这样，我五、六岁时，已经可以结结巴巴地念报纸了。可当时，北京对儿童入学年龄卡得很紧，九月一日前年满七岁的才能上小学，我刚好是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幼儿园的园长亲自到小学去帮我说情，这才得以避免八岁上一年级的命运。

分司厅小学当时叫“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还是有点名气的。抗美援朝时一幅著名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中的那个男孩就曾是分司厅小学的学生。

我上学时去得很早，学校门口有卖烤白薯的，我很爱吃。胡同里的烧饼也是美味的早餐，学校里还有一分一小杯的豆浆。中午，我经常是带饭到学校吃的，校内有蒸锅，可以热饭。外婆为了鼓励我考五分，在馒头上做了个大大的5字。她还仿照小舅舅在北大得的“三好”奖章的图案，给我绣在书包上。

那时学生的学习是很轻松的，放学后没多会儿，作业就做完了。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爬到二门外刘家的三轮车上闲聊。记得谈得最多的是苏联的话题。图104飞得多快，牛奶面包多么好吃，将来我们也会有的。

国庆节是我们最兴奋的日子，那天中午，参加完天安门阅兵的炮兵部队要从安定门大街出城。我们早早地就赶到胡同口，大街旁已经站了不少人，当轰隆隆的马达声在街上响起，我的血都要沸腾了！我一面呆呆地看着行进的战车队伍，一面留神听着大孩子们的议论，这是榴弹炮，那是加农炮……。晚上，我们还要跑到鼓楼大街的拐角处，看天安门广场放的焰火。

院子里的一家人有一台老式的交流收音机，我常跑到他家门口，对着收音机想：里面为什么会有人讲话呢？大概和工地上的大喇叭一样，是从电线里传来的吧？小舅舅为了满足我的好奇，买了一架矿石收音机。又找来竹竿、电线，架起了天线。矿石机一响，我有时间就把耳机套在头上。这最初的好奇心引导我日后成为无线电爱好者，并把电子作为终生的事业。

后来，小舅舅毕业分到了哈尔滨，在鞍山的大舅舅要接外婆去住，妈妈的单位也在昆明定居下来，就到北京把我们接回了云南。

第三章

回到昆明来到昆明后，我们住在局机关的宿舍。爸爸由于“历史问题”，已经被贬到工程处上班，在全省各地流动，只有开会或探亲时才能回家。妈妈是事业型的女人，一心扑在工作上。又适逢“大跃进”时期，晚上也经常加班或学习，我们兄弟俩就在家看书。吃饭是在机关食堂搭伙，伙食还不错。每顿有甲乙丙三种菜，偶尔还有“特菜”，甲菜一毛五，乙菜八分，丙菜五分，特菜三毛。开水也是到水房打，机关还有理发室、浴室，生活还算方便。

我上了局里的子弟小学，弟弟上了半年的幼儿园后也进了小学。开头我和同学相处并不融洽，那些弹玻璃球、拍洋画、滚铁环、打陀螺等游戏我是一样不会。学生中很多是工人子女，我那些“太阳黑子”、“月亮离地球有三十八万四千公里”等话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有个同学还经常欺负我，后来我在其他同学的鼓动下跟他打了一架。

没想到这家伙平日张牙舞爪的，力气还没我大，几下子就被我压到下面了。

但是老师非常欣赏我，子弟小学的教师并不是正规师范毕业的，而多半来自本局的各个部门。当年在推广新的汉语拼音方案，那些老师都不会。我正好在北京学过，而且操一口普通话。于是一到拼音课，老师就让我来教，得到了“小老师”“小北京”的称号。一位老师评价说，学生要都象我一样，老师都可以睡大觉了。

59年妈妈的单位到飞机场参加扩建，机场离家虽然只四、五公里远，但是她工作太忙，又不通公共汽车，经常回不来，就把我们哥俩丢在家里。我们自己打饭吃，自己去上学，家里乱得象垃圾堆。假期遇到便车，我们就跑到机场工地去玩，最激动的事情就是看飞机。那时正掀起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高潮，工地的木工班用木头做了一辆汽车，以脚瞪为动力，开到机关“献礼”，四、五公里路用了两个多小时，要搁到现在，真能叫人笑掉大牙。但那时候谁都不敢说，怕被插上“白旗”。

三年困难时期，机关食堂实行封闭管理，到时间职工就进去吃饭，吃完才能出来，任何东西都不能带回家。我和弟弟在学校食堂吃，菜饭是又少又差，有时就只发一块包谷蒸糕。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有次弟弟饿得直哭，妈妈也没办法，家里连一颗米都翻不出来。偶尔附近的小饭馆卖“淀粉”，就是象糨糊一样的糊糊，还得排半天的队。后来妈妈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发了些糠饼子，也多半给我们俩吃了。一直到我上了中学，食堂的伙食也就是一勺掺包谷的米饭加一勺苦菜，六三、四年后供应才逐渐好转。

后来班上转来的一个新同学，他的妈妈是本校的老师，爸爸是局里的工程师，和我很合得来。我们一起去他的亲戚家看收音机，一起学着装矿石机，然后又玩上了电子管。

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后，进入了附近的一所中学。在这里，我又交了一个好朋友，他是铁路小学毕业的，同样爱好科技。我们经常互相交流玩无线电的体会，有时上课都在偷偷传递线路图。

三年的初中生活很快过去了，我的最大收获是个子长高了，从小学毕业的一米三九猛窜到一米六二，上初二时一年就长了十一厘米。还有就是无线电技术突飞猛进，能够轻轻松松地装出六、七灯的收音机。我学习上好象没费多少力，就是成天迷着无线电，以至于弟弟经常笑话我“三句话不离本行”。

升学时，好多同学都选择了上中专，包括我们班主席、学习委员、文体委员等，原来他们是因为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参加工作。而我仍然是一心想上大学，还常跑到高中毕业班教室外面，研究那些招生广告，憧憬自己的未来。当时没有想到，上了高中的结果就是把自己送下了乡，回来也只能当学徒工，而上中专的同学还比我们早几年进了厂。

我的高中仍然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所以没有适应环境的问题，遗憾的是一同玩无线电的朋友都上了别的中

学。这时候，我开始玩半导体了。下乡参加秋收劳动时，我带了一架自己做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还引起了农民的好奇，晚上很多人跑到我们的住处来听小收音机。

第四章

动乱年代1965年下半年到了1966年初，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渐渐浓厚，高举旗帜、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政治课，大集会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在体育场听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做报告，把“可歌可泣”说成“可唱可拉”，我才惊奇地知道。原来高级干部的水平也会这么差。

66年中，文革正式开始了。我们学校停了课，好多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最崇拜的数学老师也被说成“特务”，据说他家门后面随时放着把大斧头，准备砍人。我惊奇地回家跟妈妈说“阶级斗争真复杂啊！”我们被派去看守“牛鬼蛇神”，先是在家门口站岗。有次我们两人去看守图书室的商老师，那位同学跑开了，商老师提出要上厕所，我战战兢兢地跟在他后面到大街上的厕所里，忍着恶臭站在门口守着，真怕他逃跑。后来学校又把这些老师集中关押，上面就叫我们提着打棒球的大棒棒站在教室门口。直到运动方向转移，也就不了了之，各回各家了。

班上的学生被分成了几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被加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父母是工人、革命干部的同学成了“红卫兵”，出身不好的同学就成了“黑崽子”，而我们这些职员家庭的就是“骑墙派”了。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市中心的盘龙江水都漫上了堤岸。学生也参加了抗洪，到北郊的山坡上挖土，铲到大卡车上。雨一直不停，我们全身都淋湿了，回来时在车上被风一吹，又冷又饿，浑身发抖。当时的“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运动我们都没参加，难怪那些造反派说，调学生抗洪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接着，大串联开始了。开头只是出身好，当“红卫兵”的学生才有资格出去，后来就不管这些了，只要有个学生证就能登记车票。我们几个同学胆子比较小，到十月底了才敢出去。我们只登记到了去贵阳的票，头天晚上就跑进火车站等着，车一来，下完人就爬了上去，直等到第二天开车。到了贵阳后，我们被安置在郊区的一所学校里，登记车票又只能到重庆。无聊地在贵阳逛了几天后，我们才上了到重庆的车。下车时发现，对面来了一列北京车。这次我们不再守规矩了，不管票不票的，上去再说。让我们碰着了，这趟车是到北京的学生专列，根本没有人查票。但是，正因为是临客，到哪儿都要给别的车让路，从重庆到北京足足走了五天五夜。饿了就到站下去买个馒头，困了就轮换挤着在座位上打个盹，等到北京站下了车，感觉天地都是转的。

解放军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西郊的矿业学院，我们就住在教室里，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因为到得晚，北京接

待的学生太多了，住宿条件很差，没床不说，连被子床单全没有，就一个光光的草垫子放在地板上。晚上就脱下棉袄盖在身上，和衣而眠，好在暖气很足，冻不着。洗漱只有到卫生间里，冷水解决。每天一早，军代表领着我们跑步做操，再去吃早餐，饭后学习毛主席语录，之后就自行到各高校看大字报了。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抄写“毛主席最新诗词”，后来才知道，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终于盼到了毛主席接见的日子，11月26日一早，天还在黑着，我们就被叫起来，每人发了点干粮，徒步往西郊机场赶。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天终于亮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空场子上等着。西北风呼呼地吹，天空灰蒙蒙的。我们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只是耐心地等啊等…

猛然，人群骚动起来。大家都争着往前挤，可是前面也是人群，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只好拼命地跳啊，跳啊，指望着能看到主席的车队。终于，模糊地看见远处几辆吉普车急驰而过，车上的人呢，根本看不清楚。平静下来后，大家面面相觑：日夜盼望伟大领袖的接见，就这么过去了？学生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等到了住处，天已经全黑了。

几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车比来的时候还要挤，直到过了衡阳才找到座位。我身上那份脏啊，满是虱子，简直和叫化子差不多。一到家，妈妈就叫我赶快去洗澡理发，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丢到大盆里，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

学校里已经完全停课了，一些学生组织了战斗队，我也参加了其中最大的一个。不过我进来是看中了学校的那套广播器材。因为喜欢玩无线电，经常听收音机，那些广播员就成了我崇拜的人物，夏青、齐越是我心中的明星。借助《无线电》杂志，我学会了喇叭的配接。很快，广播站的全套工作我都能胜任了，最高兴的是把播音内容录到磁带录音机里，然后一边排队打饭，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广播。

社会上的造反派分成了两大派，几个月后，文化革命演变成了武斗。西郊一家工厂的本派人员进驻到我们学校，我去了妈妈单位的广播站。这里是整个系统的总部，除了广播站，还有一辆用长途客车改装的宣传车。我们六个广播员分为三班，一班到广播站，一班上宣传车，一班打杂。上宣传车是最好玩的，车上有发电机，一边开一边放喇叭。开头没有录音机，放音乐用的是一台老式的78转电唱机，为避免开行时震动引起唱片跳槽，要专门设个人端着唱机。吃过晚饭，车子就唱着歌，开到市中心的花园旁。然后我们就一篇篇地广播小报上的文章，商店的台阶上坐满了听众。遇到游行，车子就开到队伍中间，奏起激昂的音乐，挺威风的。不过，我们也碰到过危险。一次游行到对立派的地盘上，忽然前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们吓得趴到地板上。还好司机机灵，马上掉转车头往回开，后来听说，一位原来在我们车上管发电机的工人被打死了。

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了，造反派被解散，成员各自回单位，学校也慢慢复课了。革委会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清理阶级队伍”。我最记得动员报告里有句话说：“云南是和平解放的，和平解放不和平”！意思就

是：这里的阶级敌人特别多。群众之间互相揭发，兜老底，查祖宗，“反革命”、“特务”、“叛徒”的帽子满天飞。我有两个同学的父亲都被整得自杀了，后来统计，父母所在的局里死了几十个人。

第五章 知青经历（上）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届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老人家一句话，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从学校回家，走的妈妈单位门口，一条大标语映入眼中，妈妈的名字赫然在上，还被打上了红叉：“把女特务XXX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妈妈解放前大学毕业，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业务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伙工纠队员闯进家，翻了个底朝天……

城里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报了名，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在中缅边境的偏僻小县—盈江。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后，轻轻走到妈妈的卧室门边。妈妈没有起来，斜靠在床头。我说了句“妈妈我走了”，便赶紧扭过脸去，生怕眼泪会夺眶而出。这一分别，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弟弟帮我把行李送到了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带拖斗的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装进拖斗，行李卷则放到车厢里，白天当座位，晚上取下铺盖。

汽车开动了，路边那飘扬的红旗、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我都好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车队离开了城市，缓缓爬上西郊的碧鸡关。大家都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春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盘山的道路是那样漫长，天渐渐黑下来了，汽车还在喘着粗气，象老牛一样爬行。有两个男生抽起了烟，谁都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车队开进了一所学校，我们草草吃了饭，把行李卸下来，铺到拼起的课桌上，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包，云遮雾绕的盈江坝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我们在县民族中学卸下了行李，县上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县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军连长，对我们挺严厉。据说他对知青说过：“你们知青，骨头都要烂在盈江！”我们六男四女十个同学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合作社，那时，边疆还没有实现公社化，到“九大”后才成立的公社。

由于县上经济十分落后，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属于农场和糖厂的。我们就只有把行李交马车运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个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里的老会计到区上来接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不到，个子不高，很精干，可惜就是瘸了一条腿，据他说是小时侯放马，被马踩的。

我们跟着老会计走了约两公里路，来到位于江边的寨子。正是日落时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烟缭绕，江水缓缓地向西流去，风景真是美极了。

社上将我们安顿到社管会住下，这是一栋两层的瓦房。楼下堆放着稻种和一些杂物，还有两口棺材。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屋，女生当然住里边的小屋，有简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个大通铺。

到寨子后，就赶上了春节，我们都被分到各家去过。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却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女儿。大概是水土的原因，这里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们寨子十五户人家，有十几岁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个，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个，这个区名叫“弄璋”，大约就是想要儿子而取的吧。

节后，我们就正式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寨子里缺男劳力，几个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们先是跟在农民大哥后面，看他们如何掌犁，如何转弯，然后再自己操作。知青老黄胆子最大，也是最先独立掌犁的。可他在转头时多打了牛两下，那牛发起疯来，甩脱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冲去，犁头卡在田埂上，只听“啪”的一声，木梁断做两截。一位穿西装的老头大叫起来“三孟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三块五”的意思。

我是最后“放单飞”的，分给我的是一头小母牛，脾气温顺，当然力气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项劳动是往区上的糖厂送甘蔗，这活儿倒简单，推着小推车一天跑几趟就行，只是多出几身汗。我们寨子在江边，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卖二分六厘，真比内地的稻草还便宜。

天气一天天变热，劳动一天天加重，烦恼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问题。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费。粮食由粮管所定量供应，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两。我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粮当然不够吃。于是，我们先是虚报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两五，又在粮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粮本裁开，重复购买。后来这招被发现了，粮管所把粮本每页都编了号，便只好到

乡上打证明买碎米吃。吃菜也是问题，弄璋街五天才赶一次街，平时根本没有菜卖，我们的钱又紧，经常弄得吃盐水泡饭，有时找大妈要点酸菜，或掐点地里的豌豆苗。后来分到了一块菜地，才算基本解决了菜的问题，我们还盖了个厕所，把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

少数民族的饮食开头也让我们不习惯。有一次，我们和农民一起捉了不少鱼，因为没有油，就煮了一大锅鱼汤。正当我们馋涎欲滴时，一位农民从家中拿来一盆酸笋子，哗地倒进锅里。闻到那股酸臭味，我们顿时食欲全无。不过可能是气候的影响，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酸的食物，现在要闻到那味，还觉得挺亲切的。

二是住的问题。社管会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农忙一来，社上要用那屋开会、放东西，就把我们男生赶到寨子中一所废弃的牛圈里居住，这里只三面有墙，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栏杆，用来拦牛的。这还好办，砍点竹篱笆来挡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尽管垫了不少土，下起雨来地面还是冒水珠，连我带来的一块自制万用表都锈死了。每天劳动回来，躺在湿漉漉的被子里，那滋味真是难过。这局面一直持续到秋收后，社里给我们盖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转。

三是疾病和蚊虫的困扰。边疆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蚊子不仅多，还会传染疟疾，边疆是疟疾高发区，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们寨的知青小陆首先被疟原虫击中，等他病好点，原来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干校挨整，心情极坏。有一天，他告诉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独自离开了寨子。后来，又有几个同学生病。我吃了解放军医疗队送来的抗疟药，当时没有病，但却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后一个月，我就因感冒引发了疟疾，饱尝了那种“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痛时节痛得天灵破”的难受滋味。

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尽管也搞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只能对付点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了一片疱，又痒又痛，走几公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金霉素，价钱不低，花了我五块多钱，疗效却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几天吃不下饭。多亏解放军医疗队进村来，才把病治好。我们大队的知青小施，在农忙时突发肠梗阻，就因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死时还不到十八岁……。

蚂蝗也是讨厌的东西，我们以前在市郊劳动时虽然见过，但这里的蚂蝗特别大，能围着小腿绕一圈。傣族妇女喜嚼一种槟榔、草烟、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蚂蝗用这种混合物一抹，蚂蝗就掉了。我们知青就只会硬抠下来，然后就流血、溃烂…。更可怕的是旱蚂蝗，又叫草蚂蝗，这家伙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黑色，两头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头上好象有类似红外探测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叮上人时没有感觉，等发现，它早吃饱跑掉了。有一次我参加种花生劳动，看天气不热，便把草帽摘下来放在地边，等劳动完没细看就戴上了。谁知里面藏了一只草蚂蝗，把我的额头叮得鲜血直流。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乡后几天，也到盈江来了，和他的同学在一起，离我这儿几十公里。妈妈进了干校，爸爸在工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分在四个地方，经常几个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还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远，缺少路费外，那几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碍，过任一座桥都必须有县人保组的证明！知青要想拿到这证明，要经过大队、公社、县知青办的层层审批，哪个环节卡一下，你就别想回家。不象内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来斗一顿。知青们为了回家，真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游泳过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冻死的，据说还有为躲避过桥盘查，藏进油罐车被闷死的…。我有几个同学算是幸运，他们买通了运大米的驾驶员，躲到卡车车厢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过了桥。至于再回农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

第五章 知青经历（下）

回不了家，很多知青就到外五县“串寨子”，所谓“外五县”，是指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五个县。文革中，德宏州被撤消，这五个县被并入保山地区，为与原来保山地区所属的保山、腾冲、施甸、龙陵、昌宁五个县区别，被称为“外五县”。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我们隐隐听到隆隆的声音，大家以为是打雷，没有理会，都去睡觉了。第二天刚起床，老社长就跑来告诉我们：“山边发大水了！”我们冒着雨跑到现场一看，都呆了：原先山清水秀的田园村庄，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砂石滩，这是一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由于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席卷着泥土石头奔腾而下，大树被连根拔起，最大的石块竟然有房子那么大！有四个村庄被淹没，近百人遇难。所幸的是：村子里的知青都逃出来了。

县知青办的潘连长也在这次灾害到来时殉职。他听说了洪灾的消息后，连夜骑着摩托往灾区赶，由于天黑路滑，撞到一辆拖拉机上。后来知青们用《流浪者》插曲的调子为他编了首歌：“正当洪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连长潘金生，骑着摩托，一不小心，撞在拖拉机上…，他的头撞破了，受了重伤，送到了小平原（县城）抢救了一整天，没有效，没有效…。啊，潘金生，潘连长，你可听见我一声声呼唤…. 。”潘连长的遗体被埋葬在县城旁的一座小山上，实现了他“骨头也要烂在盈江”的誓言。

那几天，全大队都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死难者的遗体被掩埋了，幸存者的生活又成了问题。我们寨子的稻田也被淹没了一部分，秋后的收成将受到影响。

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寨子的知青小陆跑去参加了缅共！他姐姐哭得死去活来，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一核计：干脆一起去位于潞西县曼海的缅共接待站，把他拉回来！

为了出门的方便，几个女生设法弄来了探亲证明。我们收拾好东西，一行人便出发了，坐班车经梁河县来到腾冲。

谁知刚到腾冲县城，就遇到了难题：由于连日阴雨，公路不好走，从腾冲到潞西的班车停运了！才出门就回头吗？不行！我们决定，走路也要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蒙蒙细雨还在下，我们披着雨衣，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仿佛又回到当年步行长征时。

忽然，后面传来了马达声，有汽车来了。男生们急走几步，转到山包后面，女生则转身准备堵车，因为那时流传一句话："女生的辫子比刹车还灵"。

算我们运气好，来的是一辆解放军的嘎斯51空货车，带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二话没说就让我们全上了车，经过龙陵县，下午我们就到了潞西县城，过了一夜，又赶到遮放，找有同学的寨子住下了。我们托人带信给小陆，让他赶到接待站见面，挑了一个不下雨的日子，向曼海出发了。

从遮放到曼海有四十八公里路，极少有汽车来往，为省时间，我们抄小路走。大概是去当缅共的知青太多，小路都踩成了大路，根本不会迷路。路旁有参天的大树，密密的灌木，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中午，我们走到了一个部队驻地，每人花两毛钱吃了顿客餐，那酸黄瓜可真是美味无比啊！解放军战士以为我们都是去当缅共的，不免又劝说一番。

天快黑时，我们终于到了接待站，其实就是边境线中国一侧的一排茅草房，小陆还没来，我们只好先住下。来接待站的人非常多，大通铺上一个挨一个。夜里，我被挤得睡不着，爬起来坐着吧，又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熬了三天，才算把小陆等来了。

可是一交谈，我们就发现想把他拉回来的努力是徒劳的。的确，我们继续待在寨子里到底有什么前途，谁也说不上来。与其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待一辈子，不如到战场上大干一番。我们不但没有能说服小陆，反而被他搅得心乱如麻，有的甚至也盘算是否跟他走了。最后达成协议，他陪我们去遮放，再从畹町出境，路上再接着谈。

归途中，我们搭了一段拖拉机，回到遮放，又见到一辆装载筒盐的大货车陷在泥坑里。我们帮司机把货物卸下，将车从坑里推出来，再把货装上，得到的回报是坐车到畹町。路上我们仍然没能说服小陆。到了畹町，大家在照相馆里合了一张影，目送着他，再次离开了我们。

接下来，我们步行到了瑞丽。和其他边疆县不同，这里是坝区（平原）与缅甸接壤，尽管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边民来往仍很频繁，市场比盈江县热闹多了，还可以用解放鞋换五星牌打火机呢。我们在瑞丽逗留了三天，就

踏上了回盈江的路。我要到陇川县看望一个老同学，就与大家分手了。

在陇川住了几天，同学帮我找了回盈江的伴儿—三男一女，都是盈江知青。我们顺着县城后面的山路来到了户撒，这里是阿昌族的聚居地，出产的户撒刀远近闻名。那三个男生要买匕首，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决定不走了。我和那个女生坚决要回去，于是只有我俩结伴而行。

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是很拘束的。我背着挎包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相距一两米。因为怕迷路，我们只敢顺着公路走。太阳渐渐西沉了，公路又靠近国境，我们埋头只顾走，也不说话。天黑下来了，那夜一点儿月光都没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白色的砂石公路，路上静极了，只听见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因为黑，连山下第一个有知青的寨子都错过了，直到将近十点，才看见另一个寨子的灯光，找到知青点，住了下来。

这次出游，历时一个多月，经过梁河、腾冲、龙陵、潞西、瑞丽、陇川六个县，又回到插队的盈江。

除了外县，我们当然也没放过在县内游玩的机会。盈江风景优美，最出名的景点是虎跳石和落水洞。大盈江在坝子里水流平缓，最宽处差不多有三百米，可是流到坝尾后，由于山体影响，江面变窄，水势变急，最窄处从两块相距七、八米的巨石间流过，这就是著名的虎跳石，水流之急可想而知，那水声很远就能听到。更奇妙的是江水过了虎跳石后，转了一个弯，钻到一块更大的石头下面去，从另一边流出来，这就是落水洞。附近有支流上的瀑布，景色也很壮观。还有一座小铁桥，据说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人修的，是当时通往缅甸的交通要道。

那时在外五县，知青出外游玩成风，住在公路附近的知青点“客流”不断，口粮都不够吃了，只好也锁起门外出。这一段经历后来被称为“外五县大串联”。

回来后不久，秋收就开始了。

首先是割稻子，这活儿我们以前上学时下乡支农也干过，可在这里干又不一样。这里的镰刀比内地的小，刀口呈锯齿状，不需要磨，越用越快。不过要是被这刀割了手指，那就糟糕了，伤口参差不齐，很不容易封口，愈合后也会有疤痕，我们寨子的女知青小付就深受其害。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的稻子长得很高大，如果不倒伏，差不多有一米四、五高。割稻时不需弯多少腰，剩下的稻茬都有膝盖高，然后再放牛去吃。

挑谷是秋收中最累的活，负担重、路途远，而且因为稻捆是穗朝下的，路上不可能休息。最难过的一关是要挑着稻捆爬谷堆，谷堆矮时还好，等堆到几米高后，竹梯又陡又滑（所以干这活不能穿鞋），肩上是沉重的挑子，一不小心就会出危险。好容易熬到田里的稻捆快挑完了，一天下午，我从谷堆上下来，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蹲到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起插队的知青把我送回宿舍，帮我洗了脚，扶我到床上，可是我不能平躺，只好靠在床上。女同学为我煮了面条，但我一口也吃不下。待到第二天，同学们送我到公社卫生院，那医生查了半天也说不出名堂，最后诊断为“肋间神经痛”，打了一针封闭了事。

休息了几天，我又参加了打谷劳动。这里打谷的方式很奇特，不用打谷机，也没有掼盆，而是把稻子堆到场上，赶着牛转着圈儿踩。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脱了粒的稻草用叉子挑开，待谷粒堆到一定程度时，用铲子铲到另一边扬场。这活儿倒不累，只是当老牛站下不动，撅起屁股时，就得赶快捧一把稻草，接住牛粪扔到一边。

秋收后，大队要建立甘蔗基地，从各生产队抽人，我和知青老黄被选中了。这基地就在我们大队的山边，离上次发洪水的地方不远。因为晚上回不了家，当地的农民都不愿去，各生产队送的差不多都是知青，大家在一起，好不热闹，仿佛又回到了上学时下乡支农劳动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山坡上挥锄开荒，初冬的早晨，草地上露水很大，解放鞋一会儿就被湿透了，看看天不冷，大家就都光着脚干。知青小曾挖到一丛灌木旁，突然窜出一条蛇，朝他脚上咬了一口。小曾大叫一声坐到地上，旁边的同伴把蛇打死了，我们围过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条剧毒的竹叶青！有人找来了带子，扎住小曾的脚腕，几个知青轮流背起他往卫生院跑，经过一个知青点时，又找来季德胜蛇药片让他服下，由于抢救及时，小曾总算没把命丢在农村。以后，谁也不敢光脚干活了，我们在基地一直呆到计划的荒地开完。

年底，寨子里又来了一位新伙伴—小王。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小时侯因小腿上长骨瘤，截去了一小段骨头。按身体条件他本来可以不下乡的，但就是因为“出身问题”，留城的申请得不到批准。工纠队、红小兵天天跑来家里“做工作”，最后连口粮也被停了。无奈，只有来投奔我们。小王很有文才，上初一时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帮忙，就因一手好字博得高中同学的喝彩。可是到了农村，他和我一样，就算弱劳力了。小王后来办病退回了城，靠做木工为生，77年以优良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我们的母校，后来当了教研室主任，专带高中毕业班。

下乡的第二年到了，我们又开始重复上一年的劳动。干活时，我常常望着寨子通往外边的小路，真盼望有人来吧我们接出农村。

没想到机会还真让我盼到了。公社的广播员（当地人）不听新来的军代表陈主任的指挥，陈主任一怒之下把他撤了职，赶回家种田。不知是谁向陈主任推荐了我，说我在学校搞过广播，可以胜任这工作。陈主任是南京人，非常同情我们这帮远离家乡的知青，当即拍板把我调到了广播站。我的待遇是工分加补贴，一切关系仍在生产队上。

我在农村不是个好劳力，到广播站倒是得心应手。除了每天三次转播电台节目和自播节目外，我还把前任留下的一大堆坏广播器材修好了，陈主任乐得合不拢嘴。当时正逢搞“政治边防”运动，我还常帮公社机关写标语、刻蜡纸、印点材料什么的，拿了近一年的“政治工分”。

71年夏天，一个消息在县里的昆明知青中传开来：上面要来人在知青中招工了！要采取自己报名，贫下中农推荐和上级批准的方式。一时间，回家探亲的知青赶忙回到了生产队，常外出乱串门的同学也乖乖地出工了。

一个滂沱大雨的日子，招工人员真的来了。到我们公社招工的是广播局、铁路局、冶金局和建工局的一些单位。

我当时正被抽到公社广播站，看到“广播局”几个字，不由得心中一动。我玩无线电差不多有十年了，又能说一口还算不错的普通话，在学校、农村都干过广播。即使进不了电台，去搞搞修理总可以吧！我急忙找到新来的公社赵主任，请求他让我回城。赵主任看我坚决要走，便同意找人替我。接着，广播局招工的干部就来找我，递过来一张表，说：“我们广播局是重要单位，你一定要认真填写，不许隐瞒”。我赶紧填好表交到他手里，他看着看着，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因为我的表上有这么一条：“父亲解放前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我的几个同学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后来这干部对我说：“有特长的家庭都有问题，家庭没问题的都没有特长。”那个年代，当然是政治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

接着来找我的是铁路局的军代表，他走进广播室，东看看，西看看，又提了好多问题，最后点点头说：“就来我们这儿搞广播吧！”只要能回城，在铁路局也行啊，我一边准备办交接手续，一边等着填表走人。

谁知等我拿到招工的表格一看，却是建工局所属的一家工厂的，我才知道，铁路局广播站的那个名额又被别人顶了，不过工厂招工的干部说，进厂也让我去广播站。

不管怎么样，回城就好。71年8月26日，我和近百名知青一起，登上了厂里来接我们的大卡车。走的虽还是来时的路，心情可大不一样了，一路上大家唱啊，闹啊，憧憬着新的生活。

第六章

当上工人五天后，车队开进了位于郊区的工厂。在新工集训时听说，广播站的位子早被区武装部长的小姨子捷足先登了。唉，只要能回城，不干广播也行，谁叫咱没后门呢，听天由命吧！

在路上听司机的儿子说，我们进厂后要住大礼堂。到厂里一看，礼堂早被施工的民工们住满了，知青们被分到厂后面的一个村子里，住到农民的家里，这不是又回农村了吗？那时，妈妈已经调回了机关。我家就住在本市，但却在城区的另一边，要转两趟公共汽车，花一个来小时才能到厂里。可毕竟是能天天回家了，就没有在村子里住下。

经过几天的进厂培训，我们被叫去参加清理炉渣的工作，每人还发了身再生布做的工作服。到那儿一看，几台煤气发生炉下面堆满了炉渣，连炉盘都差点转不动了，真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清理过。知青们出了几身汗，铲出的炉渣装了十几卡车，把煤气炉下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身上的衬衣也被掉色的工作服染得蓝一块，紫一块了。

开始分配工作了，这批知青一共一百四十人，有一百人分到新成立的纤维车间，五人分到车队当修理工，剩下我们三十五人分到生产线上。除了一名知青因哥哥和军代表是战友，当上了维修电工外，其余的大多当了司炉工和切割工，对我还算照顾，被派到原料车间做了一名行车司机。

这是一台五吨抓斗桥式起重机，跨度十七米多。负责将火车或汽车运来的石英砂、石灰石等原料抓入仓库，再根据破碎工段的需要，把原料抓入不同的料斗。工作时仓库里没有人，抓沙子石头也不需要很精确，否则，还真难为了我这个近视眼。

我的师傅是个姑娘，比我还小两岁。她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开起行车来倒挺熟练，但讲起机械、电气原理就傻眼了。不管怎么样，能者为师嘛，我就乖乖地跟着她学吧。

开行车这活儿不复杂，就是大车、小车、提升、开闭四个开关，都有五至六个不同的速度档。但我天生小脑不够发达，胆子小，加上眼神不好，在女孩子面前又拘谨。花了一个多月才敢独立操作。

“放单飞”后，我慢慢就不满足于每天扳扳开关的工作，开始跟着维修工师傅们学习技术。每次检修，不管是调抱闸，还是换钢绳，我都跟着师傅们干，遇到不懂的问题还向他们请教。

负责行车维修的电工是位老师傅，姓李，东北人，文革初期被整得够呛。他对厂革委和车间的头头一肚子气，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却挺好。可能是都说北方话吧，他和我特别亲近。看到我经常向他请教技术问题，又听说我爱好无线电，就问我愿不愿跟他学强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当时厂里搞弱电的只有一个小小的仪表室，负责电度表和气动热工仪表的修理检定，那可是只有领导干部的子女才有资格进去的地方，咱们平民百姓休想，能做个电工也不错。

从这以后，每逢行车上事情不多的时候，李师傅就带领我到车间各处的设备旁，讲解维修方法。全车间有一百多台电动机，好几个集中控制电柜，使我增加了许多见识。他还把绕制电葫芦制动线圈的工作交给我，这是个易损配件，别人要一个小时才能绕一个，我因为有搞无线电，绕变压器的基础，二十分钟就能绕好。

这年，另一位电工师傅生病住进了医院，一检查，是脑子里面长了个瘤，动手术后半身不遂，无法上班了。维修工人手不够，李师傅就乘机说服了车间主任，把我调到了电工班，不久就参加维修值班了。

值班时，我还跟过别的电工师傅。我们这个厂是连续生产的，除了停产检修，一年365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停。设备要是出了问题，必须马上修好或启用备机。师傅们都各有不同的高招。比如有一次，送原料的电葫芦由于电源滑线接触不良，停在半空中。要依着我，就先去找架梯子，再断电，爬上去检修，可这样要耽搁不少时间。一位师傅赶来，找了一根长木棒，在头上缠几圈粗保险丝，伸到滑块和滑线中间，就把葫芦开起来了。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76年底，工厂停产检修，行车需要进行大修，所有的线路、电阻器、控制器都要更换。李师傅虽然搞了多年行车，可看起图纸来很吃力，何况设备科只给了一张草图，没有接线图。我承担了全部控制线路的接线工作，凭着对原理的理解，准确地接好了几百根连线，一次试车成功。行车大修好，我的电工技术也来了次飞跃。

可是，我这块电工牌子只是车间承认，在厂劳资科里，我的工种仍然是行车工。77年，厂里进行了一次技术工种考试，车间把我也报上去了。实作的题目是排除机床的三个故障，限定一个小时完成。技术科的干部们不相信我能行，还给我又加了一个故障点。虽然我以前没接触过机床，可它们的原理比行车简单多了。我只花了十九分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而正规的电工反倒有好几个被“抽卷”。至于理论考试，就更难不倒我了。考试完后不久，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电工。

79年，厂里大搞技术革新，我们车间要搞自动配料线，把我抽到了技术革新小组。我在组里试制了关键部件“接近开关”，使自动配料获得成功。接着，厂里熔窑的监控系统进行改造，换装全套晶体管电动单元组合仪表。因为我对晶体管电路比较熟悉，被调去充实仪表室，我又当上了仪表工。

第七章

酸甜苦辣这段时间，我又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结婚。妻子是本车间的一个工人，虽然貌不出众，却很本分贤惠。本来厂里给我们分了间住房，可是住在里面的一位大龄单身工人说什么也不让。无奈，我们只有在城里的家中布置了新房。第二年，我们的女儿来到了人间。不久，弟弟也结了婚，搬到岳父母家去住了。

1980年，父亲熬到了60岁，从中越边境的工地上回到了昆明，一家人终于团聚到一起。母亲由于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仍依然上着班，还经常外出讲课。

以后的九年，是我们家最平静祥和的日子。孩子乖巧伶俐，妻子贤惠勤快，父亲更是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每天我们下班回来，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饭后，孩子做作业，父母看电视，我们做家务，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

在工厂时，社会上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表现不算突出，又没有什么关系，工农兵学员自然与我无缘。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28岁了，正处于热恋之中。一怕功课丢生考不上，二怕毕业后不知分配到何处，三怕专业不合适……。一时犹豫，错过了这难得的机遇。79和80年两次招收电大电子类学员，正好是我结婚和妻子怀孕，生产的一段时间。加上我被厂里调到仪表室，正负责将窑炉老的气动仪表改换为先进的晶体管仪表的工作，又没有报名。这样，上大学的机会再次与我失之交臂。

有一次，妈妈的一位同事对她说：“你儿子记性好，让他学学英语吧。”她回来和我一讲，我却嘟囔道：“我们当工人的学英语干什么，那是杀龙的本事！”没想到，三年后，“杀龙”的机会真的来了。我们厂要从国外进口一套计算机控制的配料设备，我因为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被抽调到筹备组。进口设备，自然有培训的机会，但众所周知，出国是领导的事，很少有技术人员能去，更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工人了。但活儿还得我们干。图纸资料一到，大家都惊呆了。仅电气图纸就有二百多张，还得自己设计制作配套的控制柜。我英语水平低（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只好搬来词典，逐字啃图纸。有一次，居然把“集成电路”翻成了“联合循环”。我赶忙报名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函授，边学英语，边学技术，终于搞通了图纸，并设计制作了控制柜。等外国专家来时，在跟他学技术的同时，也练习口语。工程投产后，我被任命为车间仪表技术员兼仪表组长。

老外走后不到两个月，问题来了。由于设计的失误，碎玻璃与其他原料一起送入混合机搅拌，使得混合机的桨叶很快磨损。厂里发了电传与外方联系，他们立即发来了新程序。可装到计算机里，根本无法运行。再联系吧，对方不承认是他们的错，认为是我们安装的问题。当时，这种计算机（可编程序控制器）在国内还很少见，同行业我们是第一家，找不到技术资料，也没有老师可请教。我在电柜后坐了三天，总算找到了程序的错误。再发电传，老外低头了，设备很快恢复了运行。

在工作中，我痛感知识的缺乏。于是，我自费上了仪表、计算机、英语的函授班，并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拿了一大堆证书。可是，没有正式文凭，终归是处处碰壁。87年，厂教育科的干事问我：“现在自学考试要报名了，你愿来看看吗？”我仔细研究了招考目录，当年还没有计算机和电类专业，只有英语还有点基础，就决定报考。我到省自考办买来书籍，又参加了夜校辅导班。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一边上班，一边学习。除了第一次基础英语考试因准备不够和没经验，只得了55分外，其余都一次通过了考试。

就在我只剩“听说”一门课没考，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妻子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我们结婚十年，感情一直很好。我参加自考，多亏了她的全力支持，做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几乎全是她操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考试，我被分到一个位于农村小学的考点，那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考试。她为了我，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来送饭，看着我一口口吃完，又赶去上班……。

接着，母亲受不了打击，病倒了。那时，孩子还小，岳母也需要照顾，处理交通事故的繁杂过程更是往我心上流血的伤口又撒上了盐。我真是心力交瘁，吃不下，睡不着，体重在几天内就下降了五公斤，一下子象是衰老了十年。

多亏同事和同学们伸出了帮助之手，有的帮我带孩子，有的照顾老人，他们还鼓励我坚持考完试，完成妻子的遗愿。我从悲痛中站起来，白天忙上班，还要抽空去医院陪母亲，有时送母亲进治疗室，我就在走廊里读英语。晚上带着孩子读书，睡觉，尽力去抚慰她那小小的心灵。

到了考试的日子，我强打精神，走进了师范大学的考场。那天的考试分两场，上午考听力，下午考会话和朗读。等考完试，我几乎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个多月后，成绩下来了，我得了“良好”，可谁知道，为了这个不起眼的成绩，我付出了多少？

拿到文凭的那个星期天，我来到了郊区的公墓，将证书供奉在妻子的墓前，抚摸着墓碑，泪如泉涌……。

母亲终于还是没能挺过去，不久死于心力衰竭，年仅66岁…

几个月内，我就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家里真是塌了半边天。

第八章

新的生活这时候，她，象上帝派来的天使，来到的我面前。

她是我上夜校的同学，本来不太熟。一次，校方发现有人蹭课听，就重新编排了座位。凑巧，名单上我俩之间的两个同学都没来，便成了同桌。我得知，她在电大英语专业学习过，第一次自学考试的三门课都顺利过了，很是钦佩，有啥不懂的就向她请教。我们一起同学了一年多，后来，由于她有两门课没考过，便上了不同的班级。她听说我家出事的消息后，立即赶来，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寒假里，我和父亲到医院看护住院的母亲，她就把我女儿接到她家中，带出去玩。

接触中，我们的心越靠越近。她在铁路上的一家工厂工作，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从小就受歧视，进厂被安排在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打芯子。她不向命运屈服，坚持自学。但是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导致分道扬镳。说到伤心处，俩人抱头痛哭。

她帮我，我也帮她，那最后两门课的考试也拿下来了。我们逐渐发现相通的地方非常多，经过三年的相互了解，重新建立了家庭，阳光和欢笑又回到了我家。好事成双：她也如愿以偿，到一个中学当上了教师。

在一位好心领导的帮助下，我也调到了上级局直属的一家科技公司。这边的工作和工厂比起来，要复杂和辛苦得多，出差是寻常事，有时电话一来，提起包就得走。每年我都有超过三个月在外面跑，最长的一次去了近五个月，一年的行程至少有一两万公里。我在外面跑，爱人在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孝敬老父亲，妥善处理孩子的矛盾，让我能安心工作。

我和同事们一道跋山涉水，跑遍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安装了数十套自控装置，并在邻国的工厂里也安装了国产的计算机控制设备。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后来，我以技术员的身份直接申报中级职称。经过一系

列的考评过程，获得了局中评委的一致通过，终于取得了省人事厅颁发的工程师证书。

几年后，局机关要改制了，科技公司的前途未卜。为避免卷入复杂的人事变动，更是想深入学习计算机技术，我在四十五岁的“高龄”时，跳槽到了一家电脑公司。

电脑公司对我又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以前我仅仅是接触工业控制计算机，程序都是写好在里面的，只管硬件，不管软件。现在，和通用计算机打交道，学会了操作系统、办公软件、计算机绘图、硬件组装…对以前见过的单片机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有段时间，公司里和台湾商人合作组装笔记本电脑，我负责进厂配件的质量检验，见识了当时还比较神秘的“本子”。

在生产线搬迁去深圳后，我又接手了公司自行开发生产的一个产品，刚去就遇到由于以前没办理过生产和计量许可证，而面临被技术监督局查办的危机。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类事情，找人请教、跑上级机关、制定标准、准备资料、送产品去检验…通过半年的努力，总算通过了各级评审，拿到了许可证，恢复了生产。以后，又根据市场的要求，在协作单位的配合下，重新设计和改进了产品，并在国家总公司的评测中取得了第二名，向省外推广。那几年是公司最红火的时候，我也忙得脚不沾地，开展示会、投标、制定方案、售后维护都要去跑，最多的一年，飞机都坐了十几次。

近两年，由于市场和公司内部的变化，我这块的业务开始萎缩。但我也没闲下来，硬件维修、网络管理、软件测试、内部广播…什么都干。企业嘛，不能象一些机关单位，可以在职养老。人，多动动是好事，越闲越懒，越养越虚，生命在于运动呀。

我们的新家建立后，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他老人家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先后学了书法、国画、古代文学、诗词等。遗憾的是，终因年事已高，于2003年病故，终年83岁。

退休的日子临近了，有人认为啥都完了，我倒觉得是人生新的起点。摆脱了早九晚五的限制，去除了繁杂琐事的羁绊，能够自由安排自己的一切，是盼望已久的大好事。

回顾这几十年的经历，虽没做过什么惊人的大事，却也没有碌碌无为。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时遇到了困难时期，求学时遇到了“文革”，该上大学时下了乡，三四十岁了还为文凭而奔忙。面对世上的不平，人间的坎坷，我努力过，我奋斗过。

历尽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方懂得阳光的可贵。忙碌奔波了几十年，更期待平静祥和的生活，人生六十正金秋。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我的广播情结

我对广播感兴趣开始于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父母远在云南边疆修公路，外婆带着我和弟弟住在北京东城区分司厅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隔壁邻居家有一台很旧的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晚饭后声音开得大大地放广播。我经常站在他家门口，呆呆地盯着那台收音机，那美妙的音乐是怎样发出来的呢？我以为收音机的声音和外面挂的大喇叭一样，是从电线上传来的。在北大上学的小舅舅看我那么入迷，便用他的零花钱买了一台矿石收音机给我，还在院子里架好了天线。这下，我除了吃饭睡觉，一回家就把耳机套在头上，听故事，听音乐，特别爱听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记得当时为了省钱，舍不得买几毛一个的“活动矿石”，而是用八分钱一只的固定矿石，得用针从小孔里伸进去调整“灵敏点”，调不好就声音小甚至不响，这可是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耐心。

后来母亲调到昆明的机关工作，也把我们哥俩接到了昆明，外婆则住到首钢的大舅舅那里。我心爱的矿石收音机也留在了北京，但我对收音机的梦想却一直没有断。上小学五年级时，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他家有亲戚开无线电行。我跟他去玩过两次，看到那各种各样的收音机，心中突然萌发出自己也装一台的强烈愿望。

说干就干，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刘同康写的《矿石收音机装修技术》，照葫芦画瓢地动起手来。漆包线是还让在北京的外婆请人买的，再找来妈妈装蜡纸的硬纸筒，绕起了线圈。机座是自己用三合板钉的，还买了一个可变电容器。

最贵的零件是耳机，家里那时还没有收音机，所以妈妈挺支持，给我买了一付耳机。

最难的事情是架天线，开始我用一根竹竿，在头上横绑一支筷子，做成蛛网天线。但我家住在一楼，天线太矮，收听效果不好。我就打主意，从三楼的楼梯口架一根线到对面那幢楼的楼梯口。可是，两幢楼之间有一组动力电线。我在线头上拴了重物，想从电线上甩过去。谁知力气不够大，线头从几根电线间掉下来了，我吓得跑回家躲起来。还好，那电线上都有绝缘，没引起短路。妈妈找来一根长竹竿，费了好大劲才把线头挑出来了。我仍不死心，请一个力气大的同学帮忙，总算把天线架上去，这下效果就好多了。

为了能用喇叭听广播，我还上过一次当。我在杂志上看到有一种“晶体喇叭”，据说灵敏度很高，便跑遍全城

的无线电行去寻找。最后在一家小店里发现一只喇叭，后面是一个很小的圆盒子，不象永磁喇叭，更不象舌簧喇叭，就问是不是晶体喇叭。店主看是个小孩，骗我说是的。我花了三块多钱把这只喇叭捧回家，接上矿石机，声音却小得象蚊子哼。后来，打开小盒子一看，里面是一只耳机！用一根细铁丝，一端焊在膜片上，另一端焊在纸盆中央，是一只“耳机喇叭”，难怪声音小。我那时胆子小，不敢去找店家退货，第一次吃了奸商的亏。

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一点，买了一台祖国牌五灯三波段电子管收音机，我又打起了装电子管收音机的主意。但是交流电是很可怕的，我决定先装一台直流收音机。不过，一般的直流电子管乙电电压都要45伏，书上最少的也要22.5伏，我上哪儿找那么多电池呢？终于，我在《我们爱科学》第三期上发现了一篇《低乙电一灯收音机》的文章，这台机子的乙电只需要9伏，用六节电池串起来就行。

一灯收音机比起矿石机来，增加的东西不多，主要就是一只电子管。我把妈妈给的零花钱攒起来，好不容易凑够了三块五毛四分，可是到商店一问，那只2П2П（后来叫2P2）要市公安局证明才卖！天哪，2П2П的输出功率才75毫瓦，还顶不上后来的一只小功率晶体管。可在那个年代，“强放管”都是严格控制的，怕装电台与境外敌特联系呀。我缠着妈妈去单位打证明，妈妈开始不愿意，一定是对当时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心存疑虑，我哪儿懂这些啊，只会耍赖，妈妈最后还是给我打来了证明。

开头做的矿石机是用手工扭接的线，搞电子管收音机就必须焊接了。我从旧货摊上花两毛钱买来一支75瓦电烙铁的把儿，又花八毛钱买了一支烙铁头，用长螺丝固定，先做成一支火烙铁，放到煤炉子里烧热了再焊接。

我用木板做了一个h形底座，上面是两块板钉的，中间留了一条缝，装电子管座和线圈，再加块面板，用寄包裹的木箱做了个电池盒。1962年的8月15日，我的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会唱歌啦！我高兴地用红、蓝圆珠笔在机座侧面写下了“1962-8-15”几个美术字。

一灯收音机装成后，虽然比矿石机要好，可声音还嫌不够大，用舌簧喇叭都只能靠近了才听得到，而且只能收本地的几个电台，我坚定了要装交流收音机的决心。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做底盘，一次学校组织积肥时，我在一家工厂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破收音机铁皮底盘，虽然缺了一块，还有点扭曲，我仍如获至宝，拣回家去，敲敲平，再用一块三合板做成面板，缺口的地方也补上一块三合板。底盘上的孔不够，我又没有手摇钻，就用钢锯片折成斜角，后面包上布，手都磨破了才钻好一个孔。

电子管从哪儿来呢？我开头打的主意是：装好后先把家里收音机上的管子拔过来试，成功后再慢慢买。没想到大舅舅听说我要装收音机，给我寄来了几只电子管，我简直高兴得要疯了。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变压器，市面上有，要二十多元一个，对一个初中生，这简直是天价。跑到无线电厂想订

做，也得十八元。后来，我看到一个电路，变压器只用来供电子管的灯丝，高压用市电直接整流，便花十二元买来一只灯丝变压器使用。

在上初一年级的寒假，我的五灯收音机终于装成了！虽然样子难看，性能却不差，除了声音难听点（那是因为我用了处理品的喇叭，而且没有装在木箱里），灵敏度比家里那台祖国牌还高！不过，那个灯丝变压器也让我吃了些苦头。有一天放学，一位同学要来看我的作品。那天下着雨，他打赤脚，我穿着球鞋，开机后，我的手无意摸到了底盘，我俩的耳朵又正好碰上了，一下子，把两人都电得跳了起来。从此，我每次开机前都要先用电笔量一下底盘。

收音机装好了，可没听多久，又被我拆了，因为我想试验新的电路。什么加高放、6U1变频、两级中放、加“猫眼”、音调控制…，除了因找不到合适的输出变压器，没试过推挽电路外，能找到的电路差不多都鼓捣过了。有一段时间电子管特别便宜，一毛五分钱就能买到一只，当然不是常用的管子，而是6J1、6H2、6F2之类，我用手绢兜回来一堆，变通使用，也装成了几台三、四灯机。

搞无线电，缺不了万用表，我那时当然买不起，就到旧货摊上花一块五毛钱买了个400微安的表头，再花两毛钱买个三刀十一掷的开关，找个木头盒子。电阻是计算好后，买上一堆各种阻值的，到妈妈单位上借万用表来量，串串并并解决的，居然也拼出一台可以用的万用表。

后来晶体管出现了，我当然跃跃欲试，但这小东西实在是太贵了。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的一只检波二极管Д9就卖到九元八角！到上高一时才忍痛花九元多买了两只三极管，装成一架两管来复式收音机，在郊区下乡支农时还很出了些风头。农民们还没见过那么小的收音机，每天晚上宿舍里都围满了人听广播。

大串联时我到了北京，除了到几个学院看大字报，就是钻进无线电商店了。妈妈给了我五十元钱，我就买了三十多元的元件，回到家自然又鼓捣开了。光１９６７年就装了五十多台收音机，大部分是帮别人装的，但从来没收过钱，有时还倒贴零件。

文革中我也参加过造反派，当然也是为了接触广播好玩。开头还是正儿八经地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放放唱片，学校组织学生去修水利时把扩音机也搬到工地上鼓劲。后来运动深入，分起了派，可就热闹了。我们这派占据了教学大楼，拥有美多A150扩音机，941电唱机等设备，而对立派只有缩到图书室的小木楼上。有段时间，我们找来了几个带扩声筒的大口径纸盆喇叭，低音极强，对着小木楼大放“坦克兵之歌”，据他们说当时真有楼要被震垮了的感觉。

武斗开始后学校让给了本派的工人“兵团”住，我又去妈妈单位的“造反派”那里玩广播。这边条件要好得多，还有一辆宣传车。我们六个学生分成三组轮班，一天在广播站，一天上宣传车，还有一天休息或打杂。宣传车

是用一辆“解放”牌长途客车改装的，把后半截的座位拆了，用胶合板隔出一间发电机室，中间放扩音机，播音就在门边上。最有意思的是放音乐的设备，当年录音机尚少，一般车上都还是用电唱机。但是车子是要动的，电唱机受震动就会跳槽，于是只有用比较小的单78转唱机，老黑胶粗纹片，电动式唱头，钢质唱针，车子开起来时还得用人坐在小板凳上端着唱机。我们这边的“派歌”是“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对立派是“抬头望见北斗星”，人们在街头远远听见音乐就知道是哪派的来了。吃过晚饭，宣传车就开到市中心，两派开始吵架，这边“严正声明”，那边“强烈抗议”，街边站满了听众，很是热闹。武斗中当然也有危急的时候，一次跟在队伍中游行，突然前面响起枪声，街上乱作一片，大家都吓坏了。还是司机机灵，调转头就往回开，后来听说，曾在我们车上管发电机的一位工人被打死了。

69年我和弟弟当知青下了乡，妈妈被赶进了干校。家里买的和我装的交流收音机都送人了，那些电子管、变压器等零件都丢了。现在想起来好可惜啊！要是留下来，没准儿成为“文物”呢。

我只带着一堆书和半导体零件到了边疆农村，我装的半导体只有中波，什么也收不到，好在队上有一台“飞乐２Ｊ２”的两波段收音机给我们知青用。寨子里没有电，当然装不成收音机，我经常跑到两三公里外一个有电的寨子里的知青点，在那里过无线电瘾。一年后我被抽调到公社广播站，这下就如鱼得水了，我不仅修好了站上的很多器材，还帮公社上几个单位修了收音机。我的工作是每天早上和中午转播中央电台和省电台的新闻，晚上自办节目，播点稿件，放放“样板戏”和歌曲。广播站有一台“上海１４４”和一台“熊猫６０１”收音机，那可是当年最好的机子了。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能放的唱片不多，翻来覆去就那几张。

招工回城时，我被广播局来的干部看中了，可是一到政审，说是家庭有问题，被刷了下来。接着铁路局的一位军代表想要我去搞广播，但等他一走，那个名额就被别人顶了。最后是一家工厂把我要了去，先也说要我去厂广播站，但是进了厂才发现，那个位子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不过厂里对我还不错，没让我去干体力活，而是当了一名行车司机。出师后，我又被车间的电工老师傅看上，调到了电工班，几年后又进了厂仪表室。就这样，我的职业没能和广播搭上边，不过还算是与电子的爱好越走越近。

进厂当工人后，玩无线电条件就好多了。特别是当了电工后，车间里有铁皮、硅钢片、漆包线、绝缘材料，还可以烤绝缘漆、有绕线机，用点边角料就能做出变压器、机壳。最让我高兴的是在一个新车间旁发现了几大罐丢弃的三氯化铁，赶忙抬回来，自己做印刷电路板。

装电视机是我多年的愿望，开头我对晶体管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比较陌生，也买不到合适的行输出管，就准备装一台混合式的，用晶体管装信号通道，电子管装扫描通道，底盘都做好了。可是邻厂的一位师傅给了我两只汽车电油泵上的高反压大功率管，又叫我去看了他的作品，我顿时信心大增，马上动起手来，很快装好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除了高压包是买的外，中频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等都是自己绕制的。不过这机子仍是“裸

体”的，显象管用铁皮箍固定在底盘上，高压线都暴露在外面，我要不在家，别人都不敢开。当时电视机还比较希奇，晚上家里常有许多客人来看电视。以后我又请会木工的弟弟做了个机壳，装了第二台电视机，并赶在女儿出世前送到岳母家，妻子坐月子时就天天可以看到《大西洋底来的人》啦。

当了爸爸以后，在家里就很少有条件玩无线电了。不过，靠了这个特长，我的工作倒是与爱好越来越接近。先当维修电工，又当仪表工，最终成为了电子工程师。

后来，我又调到一家计算机公司，除了搞电子，又迷上了电脑。学会了计算机电路绘图等应用软件，开发新产品。可是，干这一行也真够累的，因为新技术层出不穷，知识更新极快。要不抓紧学习，几个月就落后了，真应了那句话，得“活到老，学到老”。

我的广播情结始终没有断，收音机一直在我家里占有一席之地。跟着广播，我自学了英语。为了收听电大的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我还装了一台袖珍的电视伴音收音机。有了广播的帮助，我通过了英语自学考试和计算机函授考试。

结婚前，我自己装了一台晶体管－集成电路混合的台式收音机。以后自制的木壳坏了，我就使用一台“星球”台式收录机。因为出差多，我又买了一台袖珍多波段机，带到外面用（自己没法装，因为找不到壳子和小元件）。有一年到老挝搞了几个月工程，我也把收音机带去了，每天晚上收听祖国的声音。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收音机，连我用的MP3也带有FM功能。

临近退休年龄，公司的硬件业务也萎缩了，我就退到了二线，做些设备维修工作。巧的是，公司里搞了内部广播，又找上了我。选设备、布线、安装，然后每天上午十点放广播操音乐，上下班时播点歌曲。现在的音源可是先进多了，用上了电脑。要什么曲子，上网下就行。头天晚上开的奥运会，第二天就播出了“you and me”。

广播，将陪伴我一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在老挝打工

1994年1至5月，我参加了云南国际公司承包建设的老挝水泥厂工程。我们是１月８日出发的。当时，北方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即使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接近零度，大家都穿着棉毛衫裤和毛衣。当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降落到万象机场时，地面温度竟达２８度，这可是昆明夏天的最高温度啊！来接我们的同事都穿短袖衬衣，我钻进汽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毛衣。

下午，项目经理部的朱总带我们参观了万象市容。与国内的城市不同，万象的建筑比较分散。一幢幢房屋被绿树丛隔开，环境很优美，只是在商业区才有成片的建筑，而且多在三层以内。街上汽车、摩托挺多，而行人很少。有人说在万象街上走路的多是外国人和和尚。说到和尚，这也是万象街头的一景，他们身披桔黄色袍子，三五成队，沿街化缘。老挝人都信奉小乘佛教，城内寺庙很多。我们还去看了集市，集市很大，有点象昆明的螺蛳湾。里面商品不少，但除了香烟和卫生纸外，差不多都是进口的，而且多半是泰国的产品。这里商品的价格比较贵，早来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国内用一元人民币能买的东西，在这里就要一美圆。老挝的货币叫基普，当时一美圆约可兑换七百基普。由于物价高，钞票面值低，当地人来逛市场都是在手里攥着一大把钱，因为钱包都装不下。

晚上，我们就住在经理部驻万象的办事处。这是一所两层楼的建筑，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楼上有十来间客房，都自带卫生间，条件挺不错，可就是临街，噪音大，早上四点多钟就被摩托声吵醒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车前往水泥厂工地，该厂位于万荣县城附近，离万象约１５０公里。沿着著名的十三号公路向北行进一个小时，就进入山区，再走一个多小时才到工地。路上有好多处被洪水冲过的痕迹，有的地方还搭着临时便桥，不过总的来说，路况还算不错，大部分都是柏油路面。路上的汽车新车多半是日本车，旧车则基本是前苏联的，偶尔也见到一两部中国的跃进牌，还有不少是拼装车。

我们到时，水泥厂的土建工作已基本完成，正进入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因为输电线路尚未完工，是用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的电。在这里施工的是云南思茅地区的两家建筑公司的一家安装公司。设备是采用中国产品，由于从琅勃拉邦到中国边境的公路路况很差，重型车辆过不去，而且一到雨季就基本不能通行，这些设备多是先经海路到泰

国，再用火车运到泰老边界，最后用汽车送到工地的，光运费就占了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而材料如钢材、水泥、电线等就在当地采购，一般都是泰国生产的。

春节，我们放了一天假，在位于万荣县城的项目经理部过的。县城就象个大村子，有一个医院，也有一个市场，不过比万象的小得多，商品也很低档。我们看中了一个小摊子上的老挝风景明信片，可是和摊主语言不通，他又没有计算器，不然按计算器就可以讨价还价了。正尴尬之际，过来了一个越南人，会说英语，他自称是来帮当地安装电视转播站的。就充当了我们的英语/老语翻译。我们在集市上还居然见到了几个四川人在卖中国产的衣服、鞋子，真不知他们是怎样跑到这里的。

县城位于万象到琅勃拉邦的公路旁，交通还算方便，与万象和琅勃拉邦有班车往来。因为客车少，当地人就把货车改装了一下，做了个棚子，车厢里坐人，顶上装货，有时人多了，也爬到车顶上，我们戏称为“大篷车”。

县城附近还有一个遗弃的飞机场，是印支战争时美国人修的。我借了辆自行车在跑道上骑了一圈，还很平坦。经理部有好几个同事都是在这里学会开汽车的，然后在当地考了试，转成国际通用驾照，以后回国后再办成国内的执照。

县城后面是一条河，水流极清澈，风景非常优美，颇有桂林山水的味道。厂里用的水就是从这条河里抽取的，经过处理，送到山上的水池里储存。

在国外工作可不比国内，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操心。从埋设备的地脚螺丝，到吊装、穿管拉线、全要自己动手。我们这几双敲键盘、拿电烙铁的手也操起了大锤、电焊钳……。最要命的是：当地连一颗螺丝钉都买不到。什么东西都得从国内带来。

有时设备一到，我们就全体总动员，参加卸货。因为租用吊车是很贵的，大家便人拉肩扛，把一些较小的物资从车上卸下来，大设备才用吊车吊。经理部的司机蔡师傅是铁道兵出身，他指挥我们在木箱下垫上管子，搭好跳板，用叉车把箱子拖下来。

生活条件是比较差的。住的是铁皮顶的临时房，2-3人一间，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吃饭在建筑公司食堂搭伙，早点一律是米粉，正餐就一菜一汤。本地买不到多少蔬菜，得开车去万象买。雨季里，连一个菜都很难保证。有时弄到点四川榨菜，都开始变味了。不过我们也吃到过在国内见不到的野味，如穿山甲、大蜥蜴、蛇肉等。

出门在外，最牵念的是家庭。电话是不通的，经理部有一部电台，定时开机与国内联系，但私人的事是不能用的。邮政寄信得通过泰国，价高不说，时间得几个星期。最便捷的方式是通过每周一班的昆明至万象的班机，托乘飞机的中国人带信。每星期四上午，昆明国际公司的人员把单位和家人给我们的信送到机场，经理部派车到万象机场接，同时把我们写的信送上飞机，下午昆明的同事去接，然后再分发。这样，有班机的那天就成了我们的节日。

下班后吃过饭，就守候在路旁，等待那辆白色皮卡车的出现。车一到，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去，拿到信的，兴高采烈地跑回宿舍去读，拿不到的，可就大失所望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气候也变得更热了，白天最高温度经常在四十度以上。限于条件，宿舍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吃饭时，大家都脱了光膀子。一边吃，一边就看见汗水从胸脯上往外渗出，吃完饭，全身就象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午休前，得打桶水来冲次凉，上班前，穿裤子成了件痛苦的事，因为裤子是烫的！我们电子项目组的几个哥儿们都是在春城昆明长大的，哪儿受过这种苦，可是为了工作，还是都咬牙挺过来了。

泼水节到了，这是老挝最热的时候。我们又放了一天假，经理部派车送我们出去玩。首先去了一个溶洞，说老实话，这洞比我们云南的差远了。好在山下有一股很大的清泉，别处是暑气逼人，可一走近泉边就感觉阵阵凉气，甭提有多舒服了。老挝人还比较封建，男男女女都穿着长衣长裤跳到水里泡着，几个中国人可不管这些，只着泳裤，下去一阵畅游。

接着到了一个人工湖，这是前些年修建水电站形成的。电站由日本人承建，路边还遗弃着一些旧的施工机械。湖面很大，我们花十美圆租了一条机动船，绕湖转了一圈。由于水面上升淹没了大片森林，水下伐木成了当地的一大景观。上得岸来，几个同伴还不尽兴，又跳下水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留在岸上看衣服。一个戴眼镜的老挝男人向我走来，用英语和我打招呼。原来他是一名教师，带学生来旅游，见到我们这帮外国人，就来练习口语。回想开始学英语那阵，还到处找外国人对话，没想到在这儿变成别人的练习工具了。

最后，我们又跑到万象，到凯旋门和塔銮摄影留念。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几只大象，几个老挝人坐在象背上，悠然自得地唱着歌，我们赶紧停下车，以大象为背景猛照一通。

除了春节和泼水节，我们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两个月不出厂门是常事，感觉上真象当年在农村插队，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不过条件是好多了，有固定的收入，每天三餐饭不用愁，还有电，有自来水。只是工余没有什么娱乐，工地上有一台电视机，通过卫星天线能收到中央四套节目，有时也租点录象带来放，但都是港台片，我们不感兴趣，多半是躲在宿舍里看书。

经过四个多月的苦干，我们负责的汽车衡、热工仪表、计算机配料、电视监控等项目完成了，还帮助经理部做了一些其他工作。但是，供电项目还没完成，无法投产，我们就先回到了国内，等生产时再派人去。

几个月后，电力线路总算完工了，水泥厂举行了点火仪式。设备运转正常，生产出老挝历史上第一批水泥，并很快达到了设计能力。

照相机的故事

71年3月,在农村插队的我和弟弟终于被批准回家探亲。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昆明。

那时，母亲的“特嫌”问题已经平反，从干校出来后，被重新分配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工地。爸爸尚在边疆修公路，请不准假。我们家原来的住房已经被军代表“占领”了，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作为母子三人的团聚之所。

妈妈平反后，补发了几百元的工资。既然没有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添置的。先买了一台“红旗”牌三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给妈妈下工地使用。然后，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想到：买一台照相机！

我们经过比较（那时挑选的余地也很小），买了一台“海鸥”牌4B双镜头的120相机。这种相机虽然笨重一点，但使用简便，成像效果好。在探亲的一个多月里，我和弟弟跑遍了市里的大小公园练习照相，光动物园就去了八次。

回农村后，这台相机成了宝贝。我们用它照下了我们知青劳动的场面：挖地、犁田、放牛、种菜；照下了我们知青生活的情景：喂鸡、唱歌、做饭、杀蛇；照下了边疆美丽的风光：险峻的虎跳石、落水洞、宽阔的大盈江；也照下了知青的家—破烂的茅草房。

那时侯，在插队知青中，照相机真是非常少见的。自然有同学来借相机，相机便随着知青朋友，走遍了大小村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镜头。

至于冲胶卷和洗相片，穷知青当然是自己动手啦。我那时被抽调到公社上管理广播站，公社里有电有水，这可是两大必备条件。晚上一般没有什么事，我就开始冲洗工作了。药粉和相纸是从昆明带下来的，配药水时没有量筒，就用一墨水瓶60毫升来估计。设备嘛，我用的是妈妈同事教我的最土的方法。找一支手电筒蒙上绿布，便成了冲胶卷的安全灯，先把胶卷拆开放入显影液，双手不停地将它卷来卷去，估计差不多时就用电筒照一下，行了就洗干净再放入定影液，然后再清洗，最后用夹子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晾干。洗相片就更土了，用一张红纸把灯泡包起

来，在右边留一个小洞。把底片和相纸用两片小玻璃片夹起来，拿到小洞漏出的光下晃十几秒钟，再拿到左边的药水内显影、定影，冲洗干净后，又贴到一块大点的玻璃板上。第二天早上开广播的时候，把玻璃板放到那台150瓦的电子管扩音机上方加热，相片干后，就一张张“啪啪”地掉下来了，再剪一下边，照片就完成了。当然也少不了帮知青朋友们洗照片，我那小小的广播室夜里就常常成为了免费冲洗店。

回城后，相机记录下了我们当工人的历史。我开吊车，弟弟开铣床……。我们出差时自然要带上它。同事、亲友中有人外出时，也来借用这台相机。它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京、上海、哈尔滨都去过，还到过西藏呢！

谈恋爱时，相机又成了赢取女友芳心的有力工具，那时，女友和她的伙伴出门游玩，几乎都是我充当摄影师。我第一次拜见未来的岳父母大人，就是背着这台相机为他们照全家福。

女儿出世后，相机又为她留下了最初的“倩影”，笑、哭、爬、坐，捧奶瓶、堆雪人，蹒跚学步、翩翩起舞……。每年都要照上几十张照片。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135彩色照相流行，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好些了，才又买了一台“海鸥”DF-1型照相机，取代了这台老的120相机。但是，冲胶卷和洗照片自己就无法胜任了，只能送去冲印店。

DF-1是台单反相机，成像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时候的相机很少有自动功能，光圈、快门、聚焦全凭经验调整，对提高摄影技术很有好处。可惜彩色胶卷很贵，加上冲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因此当时的照片都是以照人，特别是孩子为主，很少舍得照纯风景照。

九十年代后，由于工作变动和家务的繁忙，摄影这个爱好被逐渐淡忘了。DF-1由于年久，也开始出现问题。有时我外出，就带个傻瓜机，完全是“留念”而已。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很多朋友和同事都用上了数码相机，才感觉到，该把这个老本行再捡回来了。于是赶快去买了台长焦的“柯达”，又重新迷恋上了照相。

数码相机可真是个好东西，只要备好电池和存储卡，只管使劲照。觉得不好的就删除，特别喜欢的洗成照片，一般的就往电脑里面存，再不放心的还能刻成碟。这台相机跟了我三年多，拍了一万五千多张（段）照片、录象。虽然上班忙，还是抽空跑了红土地、元阳梯田、路南大叠水、海南三亚等地，有几张照片还在上级单位的比赛中评上了奖。

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买台数码单反机，再配上其他装备，等退休了，就外出旅游，把大好河山尽收入我的镜头之中！

续写照相机的故事

前几年，写了篇《照相机的故事》，并发表在凤凰网的知青频道上。

几年过去了，我退了休，摄影成为我的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照相机也几经更新换代。于是，照相机的故事就有了新篇。连同原来写的，算是我玩相机的完整经历吧。

1971年3月,在农村插队的我和弟弟终于被批准回家探亲。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昆明。

那时，母亲的"特嫌"问题已经平反，从干校出来后，被重新分配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工地。爸爸尚在边疆修公路，请不准假。我们家原来的住房已经被军代表"占领"了，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作为母子三人的团聚之所。

母亲平反后，补发了几百元的工资。既然没有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添置的。先买了一台"红旗"牌三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给她下工地使用。然后，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想到：买一台照相机！

我们经过比较（那时挑选的余地也很小），买了一台"海鸥"牌4B双镜头的120相机。这种相机虽然笨重一点，但使用简便，成像效果好。在探亲的一个多月里，我和弟弟跑遍了市里的大小公园练习照相，光动物园就去了八次。

回农村后，这台相机成了宝贝。我们用它照下了我们知青劳动的场面：挖地、犁田、放牛、种菜；照下了我们知青生活的情景：喂鸡、唱歌、做饭、杀蛇；照下了边疆美丽的风光：险峻的虎跳石、落水洞、宽阔的大盈江；也照下了知青的家-破烂的茅草房。

那时侯，在插队知青中，照相机真是非常少见的。自然有同学来借相机，相机便随着知青朋友，走遍了大小村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镜头。

至于冲胶卷和洗相片，穷知青当然是自己动手啦。我那时被抽调到公社上管理广播站，公社里有电有水，这可是两大必备条件。晚上一般没有什么事，我就开始冲洗工作了。药粉和相纸是从昆明带下来的，配药水时没有量筒，就用一墨水瓶60毫升来估计。设备嘛，我用的是妈妈同事教我的最土的方法。找一支手电筒蒙上绿布，便成了

冲胶卷的安全灯，先把胶卷拆开放入显影液，双手不停地将它卷来卷去，估计差不多时就用电筒照一下，行了就洗干净再放入定影液，然后再清洗，最后用夹子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晾干。洗相片就更土了，用一张红纸把灯泡包起来，在右边留一个小洞。把底片和相纸用两片小玻璃片夹起来，拿到小洞漏出的光下晃十几秒钟，再拿到左边的药水内显影、定影，冲洗干净后，又贴到一块大点的玻璃板上。第二天早上开广播的时候，把玻璃板放到那台150瓦的电子管扩音机上方加热，相片干后，就一张张"啪啪"地掉下来了，再剪一下边，照片就完成了。当然也少不了帮知青朋友们洗照片，我那小小的广播室夜里就常常成为了免费冲洗店。

回城后，相机记录下了我们当工人的历史。我开吊车，弟弟开铣床……。我们出差时自然要带上它。同事、亲友中有人外出时，也来借用这台相机。它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京、上海、哈尔滨都去过，还到过西藏呢！

谈恋爱时，相机又成了赢取女友芳心的有力工具，那时，女友和她的伙伴出门游玩，几乎都是我充当摄影师。我第一次拜见未来的岳父母大人，就是背着这台相机为他们照全家福。

女儿出世后，相机又为她留下了最初的"倩影"，笑、哭、爬、坐，捧奶瓶、堆雪人，蹒跚学步、翩翩起舞……。每年都要照上几十张照片。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135彩色照相流行，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好些了，才又买了一台"海鸥"DF-1型照相机，取代了这台老的120相机。但是，冲胶卷和洗照片自己就无法胜任了，只能送去冲印店。

DF-1是台单反相机，成像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时候的相机很少有自动功能，光圈、快门、聚焦全凭经验调整，对提高摄影技术很有好处。可惜彩色胶卷很贵，加上冲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因此当时的照片都是以照人，特别是孩子为主，很少舍得照纯风景照。

九十年代后，由于工作变动和家务的繁忙，摄影这个爱好被逐渐淡忘了。DF-1由于年久，也开始出现问题。有时我外出，就带个傻瓜机，完全是"留念"而已。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很多朋友和同事都用上了数码相机，才感觉到，该把这个老本行再捡回来了。

但是早期的数码相机价钱很贵，我们收入不高，两个孩子又先后上了大学。几次快把钱攒够了，又因有额外开支而被迫推迟。记得我曾经看中的相机有美能达的Z3，富士的S304等，都没能如愿。直到05年，才买了一台长焦的"柯达Z7590"，又重新迷恋上了照相。

数码相机可真是个好东西，只要备好电池和存储卡，只管使劲照。觉得不好的就删除，特别喜欢的洗成照片，一般的就往电脑里面存，再不放心的还能刻成光碟。这台相机跟了我几年，拍了三万多张（段）照片、录象。虽然上班忙，还是抽空跑了红土地、元阳梯田、路南大叠水、海南三亚等地，有几张照片还在上级单位的比赛中评上了

奖。

但是，老柯达虽然在明亮的环境中效果还可以，因为技术落后，缺点越来越觉得不能容忍。首先是存储速度慢，照好一张要等几秒钟才能再照下一张；其次是高感效果差，噪点很多，在较暗的地方很难对上焦，甚至不如后来生产的卡片机。这样，我又产生了换数码单反的欲望。

就在我刚刚退休时，一位朋友升级相机，换下了一台美能达A5D单反，我便以很低的代价收入囊中。

数码单反相机的成像品质和操作性能远胜于普通DC，当然也对操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退休后事情少了，我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这台相机的研究，有机会就出去实践一番。

玩单反的确大大丰富了我的摄影知识，以前用普通DC，即使是手动档，也只会注意光圈和快门，偶尔调下曝光补偿和白平衡，现在也弄懂了各种测光方式、对焦方式、动态范围的处理等等。

退休后时间多了，一有机会我就带着这台A5D出去拍照，女儿也受我的影响喜欢上了摄影。

A5D终究还是老了，经不起我这样高强度的折腾。2010年7月爬上玉龙雪山，正支起脚架，对着云雾中时隐时现的主峰拍得起劲时，忽然快门按不下去了。检查后只能回放，屏幕上的拍照信息全都没了。幸亏那台柯达还带在身边，使得以后的香格里拉之行没留下多少遗憾。

回昆明后，我把相机送到一家维修店，店主检查后说是主板坏了，很难找到配件，即使有，其代价差不多相当于重新买一台了。

女儿耐不了没有单反机的寂寞，攒攒钱买了一台索尼A550。我俩就共同使用这一台单反，谁出门谁带。

女儿手小力薄，单反机时间抬长了还是感觉很吃力的。正好几个月后索尼公司又推出一款A55单电相机，体积小，性能非常不错，我便买了一台给她，这台A550就成为我专用的啦。

到年底，在“橡树摄影网”上见到一位本地维修师傅打出的广告，声明修不好不收费。我便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把A5D送了去，谁知很快接到电话，说只是防抖组件坏了，花了四百元就起死回生啦。

这下，我就拥有两台单反机了，虽然镜头只有一套。

网上流传这么几句话：“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要让一个男人破产，只用送他一台单反相机”。说得是有些危言耸听，但玩单反烧钱是确实的。

我是企业退休职工，收入有限，不能像大款那样发烧。什么“全画幅”、“大三元”，目前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有句话说得好：“这镜头那镜头，关键是相机后面的那个头”。我玩相机的原则是：量力而行，高兴就好，用

好手头的器材，努力提高技术，适时添置设备。目的是充实情感，陶冶情操，让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jinmalu916.blog.sohu.com/176909955.html

金马鹿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9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和巫家坝机场的老故事

昆明巫家坝机场快要成为历史了，回想起我和巫家坝机场的老故事。

“大跃进”时，巫家坝机场开始扩建，省公路工程局抽调了一个工程处参加建设。我母亲在局里负责材料试验的工作，也被调到工地上。父亲也是修公路的，常年在外不回家。母亲在机场的工作很忙，加班加点是常事，刚上小学的兄弟俩就只好自理啦。开饭时抬着碗到食堂买饭，饭后提着水壶去打开水，早上自己起来上学，经常来不及洗脸，家里也乱得像垃圾堆。机场离家虽不太远，也就四、五公里吧，但以前没有公共汽车，到工地都得搭运材料的便车。

经常跑机关到工地的是一辆“小道奇”，编号3001，驾驶员姓张。遇到假期，妈妈又回不了家，张叔叔就带我们去机场工地玩。第一次进机场时我可紧张了，到了大门口，就低下头躲在驾驶室座位上，生怕让警卫战士看见不给进。

妈妈工作的试验室离大门不太远，里面是各种试验机械和试模。为了安全，妈妈不让我们自己跑出去玩。不过室里有位陈叔叔对我们很好，画图给我们讲解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工作之余又带我们去跑道边，我这才真正见到飞机是怎样起飞的，先从停机坪沿滑行道缓缓滑到主跑道尽头停下，然后发动机大声轰鸣，猛然冲向跑道，到了一半多点的位置就抬头离开地面，飞向蓝天。

后来又一次与巫家坝机场亲近是在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到机场附近的和甸营村支援秋收。村子就在机场东面的坡上，在村头就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我们几个喜欢飞机的同学开心极了。当年昆明机场是军民两用的，每天起降的民航飞机不多。正逢越战时期，军用飞机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战斗机都是歼5、歼6等老型号。只有一次，我们见到了三角翼的米格21，当时航空知识杂志正好介绍这种飞机，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第一次坐飞机是在四十年前当知青的时候，可不是那时候很有钱，而是赶上了机会。

７１年春天，我和弟弟从插队的盈江县回家探亲。当我们假期快满，准备返回农村时，听说了这样一个消息：从昆明到保山的飞机票价临时降为三十元！要知道：这一段路如果坐汽车，票价也得二十来元，而且要走三、四

天，加上住旅馆和路上的吃喝花费，也接近三十元啦！我们五个知青就一起买了四月八日的飞机票。

谁知好事多磨，当我们八日一早赶到护国路的民航售票处时，却被告知“今天没有飞机，请明天再来”。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说：“四．八”不宜登机，因为“四．八”是当年叶挺、王若飞乘飞机遇难的日子，不吉利。

到了第二天，情形依旧。第三天，还是一样。天哪！要是坐汽车，也该到了。当时的中国民航就是这个样子。

第四天，也就是十一日，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到民航售票处，看到有一辆大客车停在里面，旁边站着准备上飞机的乘客，总算能坐飞机啦！

进了巫家坝机场，停机坪上孤零零地停着一架苏制伊尔－１４螺旋桨飞机，这种飞机有两个引擎，三十二个座位，前三点起落架。我们沿着扶梯从后部的舱门走上飞机，服务员（那时可不叫空姐）招呼大家快往里走，说如果大家都站在后面，飞机会翘起来的，看看那单薄的小飞机，没准还真有可能呢！

飞机起飞了，声音很大，冲上蓝天没多久，就遇上了气流。飞机象大海里的一叶小舟，剧烈地颠簸起来，机上三分之一以上的旅客都呕吐了，我们几个知青仗着年轻，都还没事。

慢慢地，飞机平稳下来了，服务员给大家唱了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还发给每人一小盒五支装的“中华”香烟。

昆明到保山的直线距离不到四百公里，我们一共飞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比起坐汽车，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保山机场是土跑道，飞机降落时也颠簸得很厉害。下了飞机，我们等着领去行李。当被告知，行李会运到售票处，下午再提时，几个知青飞跑到那辆二十多座的民航车上抢位子，嘴里还叫着：“我们已经花了二十九元九角了，还有一角钱享受”，因为，那时的民航车是免费的。

第二次坐飞机是在八年以后，仍然是自费的。1979年，我到上海旅行结婚。去时为省钱，坐的火车硬座，在拥挤的车厢里差不多熬了三天两夜，把没出过远门的妻子折磨得晕头转向，下车几天才回过神来。我们在上海游览后，还到苏州无锡转了一圈，回程时想去买卧铺票。到了车站一看，这里人山人海，比昆明站还可怕。想买卧铺票得提前三天登记排队，每天上午八点和下午四点各点一次名，不到的就算放弃，最后一次点到名发个号，晚上还得在售票处排个整夜，就这样也不能保证买到票。我算算包里的钱还有剩余，就到延安中路789号的民航售票处去碰运气。

当年从上海到昆明每周只有三趟飞机，其中周二和周六是安24，经停南昌、长沙和贵阳，周四是三叉戟，只停长沙。票价都是一样的，每人124元，正好周四还有票！只是售票员说：介绍信要收掉的。那年头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出门住店买票都凭单位开的介绍信。我们是住在亲戚家里，钱用得差不多了也只得放弃游杭州。我乖乖地把介绍信交出去，再掏248大元换来了宝贵的飞机票。

周四一早，我们乘公交来到售票处，再换免费班车去虹桥机场。时间还早，来得及在餐厅吃了碗馄饨，印象中价格比外面的贵不了多少。“三叉戟”就是林彪出逃时坐的那种飞机，三个发动机位于尾部，外形比螺旋桨的安24漂亮多啦！

飞机起飞了，客舱里的声音不是像老飞机那种“嗡嗡”声，而是像刮风一样的“唰唰”声。喷气式终归比螺旋桨快多了，在长沙停了四十分钟，中午我们就降落在巫家坝机场了。

我参加工作的头二十年是在工厂里，开头是普通工人，最多当到车间技术员。即使出差到省外，也就是坐火车。九十年代跳到电脑公司后，才有了坐飞机出差的机会。特别是2000年前后，公司的业务扩展到很多省份，我又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经常被叫出去。2001年，我到省外出了七趟差，只有最后一次返程因为近年底，工作不太忙，我主动要求坐火车回来，其余的十三次都是坐飞机。

坐飞机出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有一次，河南鹿邑的一个用户的设备出了问题，下午接到电话后，我订了第二天一早到郑州的机票。十点多在新郑机场降落，中午就到达用户那里，接着开始工作，晚上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用户很满意。又有一次，河南漯河有个招标会，指名要我参加，可是当时工作正忙，我就连返程机票都订了。头天下班后坐晚上七点多的飞机，下来后由代理商的车送到漯河。第二天白天开一天会，晚上返回郑州。第三天一早乘机返昆，总共才用了四十个小时。

我到过十几个机场，最亲切的当然是家乡的巫家坝。到外面出差回来，我最爱订云南航空的机票。在挤满外乡人的机场里，见到飞机尾翼上大大的绿孔雀，就意味着马上可以回家了，多开心啊！因为机场离市中心近，下了飞机，我一般不打出租车，坐上52路公交，一元钱就到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云航加盟东方航空，不久，巫家坝机场也要被长水新机场取代了。老机场现在已经位于市内，没有发展余地，而每天五百多架次的起降也使单跑道及旧设施不堪重负。为了留下更深的印象，今年我还几次到和甸营、朱家村天桥等地拍摄飞机降落的照片。我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到长水机场乘机外出，再坐飞机回到我们的新机场！

2011-12-03

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jinmalu916.blog.sohu.com/196272477.html

外祖父的故事

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早在抗战时的1941年就与世长辞了，我是在8年后才出生的，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仅仅限于几张照片。记得有一张是他早年留学德国时拍的，坐在一个山坡上，旁边放着登山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另一张是他在津浦铁路工作时，坐着手摇轨道车在铁道上。可惜这些照片都在“文革”时毁于“抄家”。八十年代我弟弟出差到济南，母亲就叮嘱他照一张“表楼子”（济南车站钟楼）的照片，那是外祖父当年办公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历史文物90年代被当地的败家子给拆除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外祖父的史料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我最近在网上搜索，还居然发现民国时的铁路月刊上登过他的两篇技术文章：一篇是《混凝土及胶浆所用砂石之颗粒比率》，另一篇是《减少曲线钢轨磨损之方法》。

外祖父的故事摘编于大舅1991年所写的《陈之达先生生平及遗诗史话》。所有人称沿用原文。

陈之达先生生平及遗诗史话（摘编）

先父陈之达（1889-1941）字大我，号微尘先生，1889年9月1日生于广州，是晚清著名经学大师陈澧先生的嫡长曾孙。少年时代因家学渊源，对国学即有很深的造诣。十六岁时与友人办报刊，投身民主革命，后东渡日本，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先祖父陈庆龢（he）公在清政府任要职，怕出麻烦，就送他改到德国深造。

在经西伯利亚赴德途中，当时乘火车要走半个月，此期间他在车上通读了一遍《昭明文选》，可以想见他国学根底之深。1909年在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攻读土木及河海二专业，与著名水利学家，我国水利事业奠基人李仪祉先生为同窗挚友，交谊深厚。

1914年他正准备攻读博士学位，适逢欧战爆发，不得已匆匆回国。1919年与先母蔡瑀女士结婚。直到抗战，他一直在济南任津浦铁路工程师。一开始就参与从津浦铁路北段（天津至徐州）接管德国人的养路管理。因欧战开始，北段的德国人撤走了。当时南段的英国人看笑话，说北段交给中国人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两年后，英国人到北段考察，惊奇地发现北段比南段还好，尤其是父亲所负责的桑梓店到泰安一段，全长近一百公里。客车驶过，号称平如柏油马路，为全国铁路界所称道。

先父为人端方正直，一介不取，嫉恶如仇，爱国心甚强。在从事技术工作中，除勤恳奉公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十分愤恨。他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在政府中任要职，但他从不去拜访。如王宠惠先生（曾任外交部长，是我国当时在国际上知名的外交家），顾梦余先生（曾任铁道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他自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以诗酒自娱。他常教育孩子们，将来要学自然科学，不要从政。

他自幼勤奋好学，爱书如命。在技术专业之外，尤工诗词，书法及金石水平也甚高。他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都用于购书。1937年以前他写过很多诗词，未付印就在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山东沦陷后，他赋闲家中，追忆往日诗词，又写了近百首诗。手稿装订成册，保留至解放后，不幸又在十年浩劫中毁于造反派的抄家，这是十分可惜的。

二十年代是父亲生活、事业中最顺利的一段时间。工作安定、经济富裕、妻子贤惠、儿女个个勤奋好学。工作之余，他常与朋友们饮酒聚餐，有时也打打麻将。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时局触动了他的爱国心，他不再参加游乐，戏剧、电影更与他无缘。从此他日夜勤奋工作，除白天上班外，晚饭后总要在家做些设计，画些图纸，直至晚九点后。再让儿女陪他吃点夜宵，他喝点酒，这是他最大的乐趣。母亲高兴地引用辛稼轩的词说，这正是“秋好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一家人沉浸在和谐、美满、幸福的气氛中。

吃夜宵时他讲许多古往今来的轶事，我们的许多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母亲对他这样刻苦工作很担心，怕他累坏了身体。他业余工作从不拿加班费，类似这样的傻事他还有许多，按规定他出差是可以用免票乘头等车的，他却总是自己花钱乘二等车（当时铁路客车分头、二、三等）。每天四元大洋的出差费（当时可买五、六十斤富强粉）他从来不领。

“五、三”惨案时济南火车站附近枪林弹雨，别人都躲在家里，只有他每天弯着腰，半走半爬地去办公室，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区铁道上巡视一番，没有事才放心回家。当时铁路上许多工程是包给营造商投标的，包工头总是送些礼物和钱，以求中标。父亲不但不收，而且叫来训斥一顿，将礼物掷还。

母亲是贤良温顺的，对这些虽不大满意，却也不愿多说。只是开玩笑说他有神经病，以后就戏称他业余做工作为“做神经”。他不断地思考国家大事，对社会上的黑暗腐败现象非常痛心。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中原大地，也摧毁了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父亲将家眷从济南转移到较小的城市兖州去，他则带领几位同事和一批工人天天在炮火中进行抢修桥梁的战斗。有时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铁路桥梁，桥一断，前方得不得给养，仗就无法打。飞机一来，他们就躲进田间草堆里。飞机一走，马上就扑上去抢修。有时修好的铁桥上火车刚开过，敌机又来把桥炸毁了。这样再修再炸，再炸再修，他们整整战斗了几个月的日日夜夜，每天以白干酒代茶来支撑他那被折磨得十分瘦弱的身体。到了1937年11月因国军节节败退，敌军已逼近黄河岸边。为了保住黄河天险，就得炸掉黄河铁桥，否则敌人的装甲车开来，战局将不可收拾。父亲亲自带了人去埋炸药，回来后，他和几位多年共事的老友在办公室听消息。一声巨响，桥被炸毁了。他们想到二十多年来亲手建造和维护的大桥毁在自己手中，个个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但是，黄河天险还是挡不住敌人的铁骑，济南是难守了，兖州也保不住。失业的父亲和家属往何处去的问题摆在眼前，母亲希望去武汉跟政府走，孩子们都支持，但是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父母在，不远游”，祖父母在沦陷区北平，两个弟弟都已去后方，他觉得不应远离。但在战火纷飞的地方，日军到处烧杀奸淫，十分残暴，为了全

家的安全不得不想办法躲避一下。父亲在铁路上的同事好友安晴波先生、沈维来先生也都不打算去后方，他们与兖州天主教堂取得联系，在教堂里腾出一些房子，安置我们这些铁路员工和家属。教堂地方很大，分南堂和北堂两部分，中间是一条街，在街的东西两头由铁路局给装上大铁栅门。看到日本兵要来，就由德国神父、修士们出来阻挡。从1937年底开始，我们在教堂里住了十个月，又迁回济南，直到父亲去世，一共四年多时间。

这是父亲和我家命运的一大转折，从富裕、幸福、美满转化为贫穷、苦难和不幸。父亲失业了，孩子们也都失学了。

日本占领山东后，组织了伪政权，铁路也通了车，他们也需要中国铁路员工帮助工作。父亲不但自己不肯参加，对参加的人也非常鄙视，认为他们是当汉奸。实际上不少人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找工作无以为生。

此时父亲赋闲在济南，租了一所房子，每日无事则外出散步。他的老部下、好朋友程正予先生、戴明诚先生、庄西塘先生家里人口都较多，经济困难。但受了父亲的影响，也都不愿参加日本人办的铁路局。他们把家眷安置在家乡，从海路经越南到后方去报到。送他们启程时，父亲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去呀。母亲也表示，只要他去，她就带着孩子们去北平跟祖父母一同生活，还可以照顾老人。但父亲始终下不了决心，内心是很痛苦的。

父亲在性格上迂腐而又脱离实际，与世难合。他自己也知道，但就是改不了。他常讲一个故事，苏东坡有一次在户外竹床上躺着晒太阳。他肚皮很大，就问他的学生们肚子里是什么。有的说是一肚子忠心，有的说是一肚子学问，有的说一肚子书。苏东坡笑了，说都不对，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父亲的好友黄虞臣先生原来也是铁路员工，因善于经营理财，便辞去了公职，从事房地产股票生意，不久就成了巨富。抗战前夕他对父亲说，你有两万元存款，都取出来交给我，我代你在天津英租界买些房子。等到打起仗来，人们都往租界跑，房价就会大涨，你出租或出卖都可以获利几倍到几十倍。父亲却说："我不能乘人之危来赚钱"。黄先生笑了，说："你将来是要穷死的"，后来果真如他所说。在我家困难的时候，黄先生和其他一些富有而知己的朋友都多次向父亲诚恳地提出有困难尽管开口，但他始终婉言谢绝。直到他去世后，我们孤儿寡母才得到朋友们的主动帮助。对于买房之事他并不后悔，但只靠银行存款的一点利息，物价又天天上涨，生活渐渐拮据了。他不讲穿着，也不看戏，而是个美食家，在吃的方面是有爱好的。二十多年他一直每餐喝绍兴花雕加饭酒，吃一些好菜，饭很少吃。沦陷后好酒买不到了，肉也很贵，只好喝白干酒。在渐渐凄苦的日子里，他开始尝到穷的滋味。

生活在逼人了，"汉奸"不肯当，后方又不去，唯一的希望是国军打胜仗，反攻收复失地，使我们重见天日。每当听到远处有炮声，他就叹息到："打过来就好了！"台儿庄大捷、长沙大捷都给父亲很大的鼓舞，但最后还是打败了。有时他听到打雷误以为是炮声，空欢喜一场。后来父亲从一位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朋友处借来英文版的《华北明星》、《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知道些真实消息，否定了社会上许多乐观的传闻，就戏称那些马路消息

为“神话”。

当时的华北伪政权挂的是五色旗，父亲日夜盼望的是看到青天白日旗。后来倒也见到了，只是上面加了个黄三角，写有“反共灭党”字样，这是南京伪临时政府的标志。不久，汪精卫投靠了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旗上的黄三角也去掉了，但仍是汉奸的旗帜。父亲非常愤恨、伤心。

1940年，父亲忧愤成疾。开始时以为他是营养不良，只吃点国产的补药。后来病势加重了，就请他在德国时的同学，济南市名医王注东先生来看。王大夫一看就说诊治晚了，但还有救，于是开了一些药。当时的药多是日本产的，父亲看到药瓶上有日本字就宁死也不肯服。王大夫叹口气，也没有办法。这样，父亲就在五十二岁的盛年，被愁苦和病魔夺去了生命。

父亲生前的勤奋好学是一般人难及的，他一贯爱书如命。抗战炮火中他只身逃出，八千多册各种藏书全部化为灰烬，这是使他非常痛心的事。在天主教堂闲住时，家里只有一本孩子们带出来的《世界语入门》，他拿去每天刻苦学习，几个月后就能用世界语写短文了。教堂给了他一本《德汉词典》，他想到国内缺少一本《汉德词典》，就着手编纂。直到他去世前，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写卡片，整整积满一箱，按其内容可以编一本很大的词典。这份未完成的遗稿存放在他的好友秦次风先生家里。以后几经战乱，我们与秦先生失去了联系，父亲辛劳几年的成果也就没有下落了。

从父亲的一生看，他确实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旧社会的腐朽风气和战乱使他一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他有不少著作，包括诗词和技术方面的论著，由于他不好名，没有付印，就在战争中失散了。一个热爱祖国、正直善良、博学多才的人就这样默默离开人间几十年了。我们怀念他，将他的部分遗作和生平写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作为无价宝的遗产。

金马鹿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9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留痕】

前言

今年四月游台归来即住院半月并初诊为冠心病，回家调养一月再次住院。经造影检查发现三支冠脉堵塞，情况分别是80%、90%和95%，确认是十分严重的三支病变，必须及时进行搭桥手术。但本人不同意手术，我的看法是，有些症状我过去就有，这个病在历史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医也与之搏斗千年；而且并非在进行性的发展，能够坚持服用药物是可以维持生存的。虽然医师言之凿凿地一再晓以利害，我瞻前顾后仍然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当然我也明白，这可能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博弈。

人一到了不怕死的境界，心态就特别平和淡定，何况我素来临危不惧，自省一生办事筹划周密，我没恐惧阴影又思维正常而且无其他疾病干扰，因此坚信自己认真配合医师服药治疗和积极学习冠心病相关知识来增强自我保健，生存一年半载绝对没问题，医疗维护得当活过三年五年甚至更长也有可能。

我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最震撼的几个时期。几年前我就想要将自己的经历如实描写，纪念我的前人和献给我的后人，一直没动手是认为今后有足够的时间。哪里知道如今可能是没时间去完成了。因此我出院之后立即清理以往数以万计的照片，选择一些有保存价值的添加文字说明冲印成册留传子孙和血缘近亲作为今后的怀念载体——我不保留骨粉飘洒台湾海峡。

此外，就是将我劫后残存的和近年写的一些文字进行选择汇编出版馈赠亲友，文字水平虽不值一评，但毕竟反映出我生命中稀疏的脚印。万一老天爷不帮忙，留下这点东西多少也算是一个交代。

我的回忆录在年初写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初稿现在也收录在这里面，愿天假以年让我能够全部写完实现愿望。

2011年11月20日

风雨人生六十年

写在前面

历史的真实是由许多面构成的。芸芸众生都是个点，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组合方方面面就能够保留许多历史的真貌。我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最震撼的时期。几年前我就想要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纪念我的前人和献给我的后人。

之所以一直没动手，是打算在描述各个时期经历的同时写一下自己今天的看法，是想在自己的认识有所清晰以后来做到叙中有议。虽然我在一九九八年就进入网络，此后也支离破碎的看到些披露出来的资料，但却越来越感到当代中国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资料的禁锢，我有生之年根本无法实现“认识有所清晰”。因此我就改变初衷采用白描形式保留素材给后世史人做参考。

这不是小说，我的文笔也就这烂水平，但是可以预告读者不至于感到枯燥乏味，我的家族人物和一些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有关联，诸如杨开慧、柳直荀、李维汉、程潜、程星龄以及抗战名将朱耀华等等,有可靠的史料引人入胜。

我一生经历坎坷，却一直未失尊严地从事富于挑战性的技术工作，创造了几十年中设计和大多数是主持制造重量约千吨的非标准机械设备和工艺装备全部成功应用于生产的奇迹。有些经历也充满奇特和惊险，下面举几个例子吧，七岁的我坐在藏有枪支的轿子上通过日本鬼子的几处检查关卡；在反右之前有位父亲的挚友、中央某部的司局首长要调我去他身边工作；在反右的大辩论大批判中我敢于据理力争；押送去劳动教养在站台排队候车我去厕所返回时看守兵竟然禁止我靠近队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正在劳动教养却没享受到社会上的普遍饥饿而是吃得身强体壮；在劳教工厂我人格受到尊重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技术能力；解除劳教后那里的领导承诺给我行政靠一级升一级，一再动员我留下当工厂的管教干部；劳动教养回来不久有位美丽的她要求和已婚的我私奔新疆；“文革”时下放农村又去了个渔米富乡，而且在那里建立了一番事业……

还有过不少足以改变我后来人生轨迹的事件就不再列举了。我的回忆录之中有不少经历的故事性很强，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同时具有可读性，请读者诸君耐心去看吧。

第一部　动荡童年

1937年4月4日的中午时分，一个男婴在湖南长沙兴汉门外一所普通民居呱呱堕地，这天正好是中华民国法定的儿童节。

当时的兴汉门外，围有一大片空地，经常轰鸣着枪炮声，这是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械处的试射场。这个男婴的父亲就是这个军械处的处长。他给这个男婴取名建人，字健，这个男婴就是我。

1.1　最早的记忆

最早记忆只在1943年我六岁左右的事情。

当时我家住在长沙比较繁华的中山东路，是父亲由军械处长改任长沙保安总队总队长搬迁过来的。这一片房屋原来是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一大片建筑物当年为什么空置在那里。

我家住在学校原来的一处办公室。四周有很高的围墙，东面紧邻当时长沙最高大的建筑“国货陈列馆”，底层有当时最豪华的银宫电影院，到晚上都可以听见电影对话。办公室是几间有条侧巷可通过中山东路出入的平房。进门就是客厅，客厅通书房；父母卧室和姐弟卧室有门相通，保姆的卧室兼作储藏室；在另一边是两三间客房。前面有个大院子，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院子西面围墙有小门通向保安总队营地；那边是一师附小的教学区，有两行排列的教室和面积很大的操场一直通到和中山东路垂直的水风井街道。

可能是童年生活动荡的缘故吧，现在残留的印象很少。

一天晚上中山东路离我家不远的油布雨伞店失火，烧到邻近的南货爆竹店，大人抱我在院子里，只见火光冲天，鞭炮的爆炸声混合着人们的叫喊声闹了一夜……

一次有个妇女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上门乞讨，在保姆易妈“打发”她的时候，我也学妈妈的样跑进房里两手抓了可可糖（那时很流行的方形花生奶糖）给那小朋友。后来母亲发现饼干桶开着，问我怎么不盖好，我就告诉了拿糖的事，当时两手都不空，母亲说：你细人仔就会怜贫惜苦了，好哇！

我童年的好友是条叫“阿旺”的黄狗（后面还有它的故事）。家里还养了好多鸽子，早晚起飞时一阵很大的哗哗声……

母亲有空闲就喜欢吹箫，吹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我也熟悉一些片断常常跟着“唱”几句“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什么的，就是唱到“九一八，九一八……”时，稚嫩童声常常引起大人好笑：“你在洗衣呀”——长沙话里湿衣拧水叫做“揪一把”。

我稍微懂事一点父亲已改任长沙最繁华的城南镇镇长，在南门上班早出晚归和我亲近很少。现存唯一的记忆是父亲带领母亲和我们姐弟到院子那边的操场看保安总队新调来的王营长点名。部队集合他先训话，然后点名，到点完一连一排后他要“喝水”，就将花名册交一连长。他行伍出身识字很少却有超人记忆力，集合之前文书把一连一排的花名册读给他听两遍，他点名时竟可以不出差错，随后又似乎合情合理的叫连长往后代点，表演得滴水不漏。

父亲改任城南镇长之后保安总队移交给郑延龄团长，长沙失守后保安总队撤退到湘西，随后回归国军团建制去

广西抗战。有关郑延龄在后面还有叙述。

那时我家天天有桌麻将，主角是易增虔伯伯。他是早期中共在长沙的骨干成员，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挚友，抗战前被捕。国共合作后我父亲出面保释，当局同意他住在我家并担保他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一位远房表哥后来告诉我，易增虔一直在以打牌作为掩护进行工作。当时是通过他传递信息的，所以湖南“和平”后担任省军管会委员的易伯伯马上就安排当时无业的表哥去长沙交警队上班。有关易伯伯在后面还有叙述。

当时保释出来在我家住过一段日子的还有我叫她纯姐的女大学生车纯。后来在长沙有亲戚告诉姐姐，说车纯在长沙一个中学任书记，曾经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但当时我们姐弟都离开长沙了。纯姐您也九十高龄了，能看到我这些文字吗？感谢您没忘记我们！

姐姐说父亲当时还保释了两位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是直接释放的，所以我没有一点印象。

母亲主持家务本来就很忙了，有时三缺一还不得不陪易伯伯打牌，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过问我。

最关爱我的是大我十一岁的姐姐，晚上是姐姐带我睡觉的，平常穿衣吃饭也多是姐姐料理。姐姐要上学读书，难得带我出去玩，有时是“羊羊”带我上街看看，还有记忆的是我家隔壁“利华金号”的邓太太总要给我好多糖果饼干，还要我喊她“岳母娘”。

“羊羊”是贵州人。父亲有位黄埔同学调防长沙，他去拜访时见部队正在处罚逃兵，父亲见这个逃兵还是个大孩子，就向这位任团长的同窗求情，将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讨”了下来。在我家居住过渡了一段时期以后，改名叫杨吉昌补入保安总队。他后来一直是父亲的勤务兵。

“文革”后我曾经问过姐姐怎么我小时候没上幼稚园？怎么我没有谁教我认字习字的印象？姐姐说长沙三次会战都让你碰上了，不是逃难就是躲警报呢。姐姐还说妈妈教杨吉昌练字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手好小楷，杨读过私塾）你不是在一边描红吗，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

1.2　长沙沦陷

下面先摘录些有关史料：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粮仓，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战略要点。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鉴于长沙地区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不利防御作战，第九战区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改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与敌对抗，大部分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后来称为“天炉战术”。

9月14日，一次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在会战中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激情，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十万兵力不但未能达到歼灭我主力的目的，相反，各路日军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被歼灭。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损失惨重，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两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1941年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时。由于九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于是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这次作战，虽然由于情报被破译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仍然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九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两万余人伤亡的代价。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驻广州之集团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和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一改被动局面展开防御作战。第九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带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展开退却时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的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又称为长沙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五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大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三次长沙会战中，政府成功的动员了民众，始终得到强而有力的配合，广大民众大义凛然，宁愿自我牺牲，坚壁清野，也不让敌人获得物资补充，而且往往是一声号令就在一夜之间挖断公路，阻滞了敌人行动，为我军的胜利取得战机和赢得时间（这里面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由于“四九”之后的某些原因却无人记载和颂扬，击键至此只能为之一叹！此刻我向这些浩气长存的前人在心中默拜！——作者注）。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6月)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而长衡会战又是日方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战火烧到湖南。6月16日开始向长沙城区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隔江分阵，力不能支，而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火力又遭到日军重炮和空军的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至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

四次会战中，国军广大官兵，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敌以重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以上史料摘录自“百度百科”）

长沙大火和前三次会战我还很小，虽然我曾随大人短期避难乡间，但我的祖母和妹妹都是在这期间因缺医少药而亡故。而我没有任何记忆存在。

抗战时期残存的记忆，是在我上小学之后。

中山东路是很繁华的商业街，柏油马路十分清洁，而且下雨以后马上就干。我发蒙读书是过马路不远的玉泉小学，因邻近一座叫玉泉山的寺庙而得名。玉泉山的庙前有两尊“敬惜字纸”的大铁炉总是烟火弥漫，我至今还有印象。

当时每周一早上是“纪念周”，全校学生集中在大礼堂，唱国歌、背诵《总理遗嘱》，然后是校长训话。当时是每班一列，我排在第一个。除了这点我再也没有其他印象了，因为才上两三个月的课日寇就开始轰炸长沙了。连续三次失败的敌人，这次采取极为卑鄙和残酷的手段：疯狂地轰炸平民！

刚开始日机架次并不多，学校开开停停。当停课在家一听到头次警报我们就躲到隔壁的“国货陈列馆”（即后来的长沙第一百货公司）。后来这座当时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也炸掉了六层的一个角。随后不久，日寇的轰炸次数和飞机数量更多了，那一大片飞得很低的灰朦朦的飞机我至今还有印象。国货陈列馆也不安全了，就到那时还是城乡结合部的韭菜园去躲警报，那里有很大的防空洞，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就像上学一样。

警报没来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就在防空洞旁边的黄砂滩上挖洞，在洞上架满小树枝然后铺上纸，在纸上面洒一

层砂后就躲在一旁等着大人去踩……大人们就没有这种心情了，谁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有家可归。傍晚回家的路上，几乎每次我都看见路边用席子掩盖的尸体，还有道路及墙壁上飞溅的血迹。还有一次至今记得很清晰的场景：我们走进一店门敞开却空无一人的茶馆去休息，刚坐下来大人就在水缸边发现一条血淋淋的人腿……

在敌人的狂轰烂炸之下我军撤退，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

1.3　逃难西乡

长沙沦陷时我家是怎样离城的？之所以我一点记忆也没有，估计是在夜间仓促出逃。从下面三点可知当时是非常紧张急促的：一是父亲不在一起；二是丢弃一切家当轻装出走；三是不去祖籍长沙东乡而是逃向西乡。

母亲、易妈带领我（还有黄狗阿旺）有时雇轿有时步行匆匆向西。还记得在中途小住时我误食了房东家的“地螺狮”中毒，嘴舌发麻言语困难。可把母亲吓坏了，因为我的妹妹就是在上次逃难途中生病夭亡的。后来房东家给我吃了许多白糖水才好的。

越是向西走竹子越多，沿途可以看到许多用石灰泡着竹梢的坑，后来大人告知这是准备做纸浆的。最后我们停留在长沙和宁乡交界的大山“楼梯岭”下面的一个村庄。这里有父亲的朋友，母亲就租房住下，我们才停止了奔波。没多久父亲和他的副官廖炳炎勤务兵杨吉昌找到了我们。那时姐姐住校读中学，在沦陷前就随学校撤退的，父母很不放心就打发廖副官去找学校，姐姐接回来后我们就一家团聚了。

今天我对那个村庄还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片断记忆：村前有条小河，一次和姐姐在河滩草丛中拾到许多鸭蛋；还看见在小桥上有位也是逃难的先生只在线头上用青草打一个结，用没钩的钓竿一刷就一条游鱼抖落在铁皮桶里，我都看呆了。

我还听说在“楼梯岭”有“红毛野人”。红毛野人是不吃人的，楼梯岭的山顶叫“天上”，在靠近“天上”的路边有许多竹筒，行人至此就将双臂套上竹筒，如果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就双手举起，它抓住竹筒就会哈哈大笑，这时就可脱手离开。

那个村庄很大，有一座祠堂，他们“七月半敬祖宗”规模很大，我看到四个人抬一个有圆桌面大的南瓜很奇怪，后来知道这是好几根瓜藤培育一个瓜，（当时在长沙乡下就有农校）是专门用来供祖的；供祖用的果品不完全是鲜果，里面有一些是瓷器做的，葡萄、荔枝等等做得十分逼真；还有那祭祀场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我们吃住都很清苦，易妈把锅巴铲下来晾干再焙脆保存在饼干桶就算我的“零食”了，现在回忆那味道真好。

我一直奇怪离城时父亲为什么没和在我们一起。直至1999年和姐姐回忆往事我才知道：在30年代江西成立了国中之国而发生内战，邻近的长沙成为战时的大后方，伤兵强横买卖、打人闹事的不少，普通警察约束不了他们。父亲领导保安总队进行铁腕整顿恢复了市面秩序，获得市民一致好评。因此调任长沙最繁华富裕的城南镇任镇长，在这期间他又成绩卓越（我有位同学的父亲是长沙最繁华地段的大老板，他和我父亲有过事务交往，说我父亲清廉正直，办事干练，在城南的政绩获得一致好评。在后面录有他亲自经历的叙述），三次会战之后当局决定将长沙城市中心分属各镇的繁华地段一起包容建立城中镇，并命父亲筹建。那时他已交卸城南镇镇长，正带领副官勤务兵和秘书在物色房屋奔忙筹建，是个公文包工作小组。四次会战长沙是紧急撤退的，当时市政府没法联络到他。随后他带领随从在追赶上级的途中遇到居住在长宁边界的我们就停留下来。汇合以后他还是经常出门。我还记得有一天父亲回来好兴奋的对我们说：有两个“便衣”在岳麓山的后山用铁球打死了两个鬼子，还活捉了一个回来。

在敌我交错的频繁战事中，武装人员的行动是很不安全的，他和他的随从无法追找到仍在不断撤退的上级政府，就没有任何收入，（也从此失去了“组织关系”。）一大家子在异地他乡难以维持生活，在1944年9月我们就动身回祖籍长沙东乡去投亲了。

1.4　避难东乡

刘氏在长沙东乡曾是名门望族，我幼时听父亲讲过先祖原任桂林知府，之后在福建任道台，福建巡抚邓延祯革职充军新疆时他“进退与同”愤而辞官。他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只带了一块可测天气的“晴雨石”回乡，此外别无长物。我家的祖屋在我曾祖出世前已经卖去大部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到我的曾祖出生时家道中落，只是一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而已。曾祖自幼聪彗，二十岁中进士，作为“天子门生”留京任翰林。曾祖在少年就和郑姓名门闺秀定亲,虽然我家已显露败象，郑氏仍然信守婚约，以有二十四座庄屋的田产（庄屋是在分散的田产处建有供佃户居住的房舍）和丫头陪嫁。曾祖母家学渊远，幼读诗书，而且擅画。据说我祖父兄弟姐妹自幼就是随母发蒙的。曾祖在京坐的是清水衙门，他生性刚直不阿加之少年得志，后来得罪了上司，他就两袖清风辞官回乡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家坐吃山空经济每况愈下，幸而我祖父擅书法，时人目为宋体权威，当时寺庙经文刻板聘请书手都通过他认可推荐。于是在清末变卖了剩余的田地房产分家，以千两纹银在长沙城最繁华的南门正街“顶”了一间三层楼的店面房，（“顶”是在产权所有者未赎回期间内有使用权而无产权）发挥祖父擅书法篆刻的长处，创办“崇文堂”招揽寺院经书、签文书写，并延师刻版以及给印刷业补充活字销售。我祖父去世后祖母就

将祖父的产业交给叔祖父变通为刻字店经营。从此我家就在长沙城里居住，所以虽是“祖籍”，其实我家在长沙东乡已经没有任何田地房产了。

我祖父有一兄弟分家后去买了一处小型的田地房屋，因为无子，我父亲的胞弟从小就过继给他。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长沙东乡那叫“白石塬”的小山冲去呢？

白石塬属距长沙城一百一十公里的高桥镇，鬼子虽然在那里有据点，但附近大山多，白石塬虽然离开高桥镇只四公里，但是一个山里有山峰峦重叠的小山冲，四次会战之后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地势复杂鬼子不敢进来。邻近是一片敌人势力不及没有伪组织的真空区。因此，父亲选择去那里，政治地理环境是首要因素。

此外就是经济因素。我祖母的亲姨侄五伯伯住在这里，他在任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时，在白石塬购置了田地房屋。当年他家破落比我家还早而且母亲亡故，我祖母在自家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对姐姐两个年幼的遗孤一直爱护有加，关怀衣食和学业。

在长沙二次会战时我祖母就卧病在床，父亲眼见大战将临，所以在长沙三次会战之前，就让我母亲侍奉生病的祖母带领我们姐弟去乡下五伯伯家避难。姐姐后来告诉我，当时父亲在城中上班履职常下乡看望祖母，老人家想吃的城里名菜五伯伯用小汽车从长沙城送回来仍有温热。

不久我祖母在那里去世，五伯伯和三伯伯（长沙著名的慈善家郑稚存先生）披麻行“仿孝子礼”治丧。所以避难在这里我家才能够解决生活问题（两位郑家表伯后面还有相关的叙述）。

我们回东乡是分两批走的。母亲、易妈、父亲和副官廖炳炎勤务兵杨吉昌是先期出发的，因为他们一路需要探索着绕过敌占区才安全。

我和姐姐是坐轿子直接通过长沙城市区走的。那时出入市镇都有检查关卡，听说过卡要向鬼子敬礼。可能是我在轿子上晃悠得睡着了，鬼子也就放过了我这个小孩，所以我没有什么敬礼的印象。只记得进市区当晚我和姐姐住在旅馆里，电灯一会就没了只好点支蜡烛。次日姐姐带我上街打算回“故居”看看，经过中山东路进入青年会的马路口看见停了一架不足两丈长好小的飞机；在我家出入的巷子门前多了一个卖杂货的小木屋，因为里面原来是兵营，情况不明我们没敢进去。次日一早就出城，我大概又是坐在轿上晃悠得睡着了……

父母一行比我们先到，五伯伯已在他家对面租好一处除上厢房以外的半边四合院，房东王伯藩有两房妻子，东上厢房当时是王一娘在住。虽然是半边，却是座北朝南的两进，前面一进入门就是客厅，一侧是乡间传统的“火塘屋”，即在地上挖一个烧松枝的火坑，放上铁架子就将“楼锅”在上面烧水和炖菜；火塘处房顶上有钩子吊熏腊

肉。

在客厅另一侧是父母、姐弟和易妈的卧室；越过天井就是后进，中间是堂屋，两侧有四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廖杨两位的卧室，还有间客房备用。靠近后山有一大间安置有碾、磨等农家设施；天井下面有宽约一米的石板沟向外排水；天井的走廊有边门通一间是披屋的下房，下房可堆放农具杂物，还有“猪楼”。

我和姐姐到达之前已经安置好了日常家具，客厅也布置了些字画摆设。居家质量当然不及沦陷前的长沙，最不同的是有堂屋，在神龛中间是“天地君亲师”，两边供奉我家祖宗的牌位，每逢朔望母亲按照乡间习俗击磬烧香。

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人人啧啧称奇的事：为了在路上安全，父母一行出发时特地将阿旺送给别人了。可是在我和姐姐到达的次日，阿旺来了！它竟然依靠嗅觉找到了我们的新家。阿旺大约和我同年，在我十一岁时它老死了，姐姐带我在后山埋葬了它，还做了坟堆插了块木碑。

由在西乡那样的简陋一下子有了个像样的新家，我一直感到奇怪。后来姐姐告诉我是二次会战一开始就去过乡下，运去了一些日用衣物，当时在五伯伯家还添置了一些家具，后来有些没运回长沙去。有些字画随即和摆设不少是我家祖传之物。

白石塬是个南北走向的小山冲，处于相对高度在二三十米的两山之间，宽度约三四百米不等，中间有条不足一丈宽的小溪。两边的房屋都是依山而建，挖平缓坡来扩充基础。因此家家户户的后山都有丈余高的山坡壁立，可挖掘储藏洞保存红薯、做腐乳和腊八豆。这里真是鸡犬之声相闻，相隔近的两边民居可以呼唤说话。

因为小山冲是南北走向，所以依山而建的房屋多数座东朝西或座西朝东。但少数大户人家例如我表伯他购买的“许家屋场”在外面看来是座西朝东的一长条，实际在里面是一进连一进有门相通座北朝南的四合院，五伯伯家除了堂屋是地砖，其他房间都铺设地板，朝南一边下面是很大的固定玻璃，上面有玻璃窗可以开闭，通风采光都好。听姐姐说我家的祖产叫做“百丈屋”，和“许家屋场”一样是几套相通的四合院。但是比“许家屋场”还要长一些。这些砖木结构内部装潢很好的座北朝南的小型四合院在土改时都拆开分给贫农散建成许多小型的土砖房屋了。

这里的每幢房舍不论豪华和简陋都有一个名称，我家租住的房屋叫做“杨新盛”（全部是土墙和三合土地面，门窗也比表伯家简陋多了），紧邻的叫做“杨合盛”，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四方院子，是当年杨氏聚族而居的“围屋”；“杨新盛”是在杨氏家族兴旺时为家族子弟读书建立的房舍，四九建政后的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将军少年时期就是在这里读书的（我父亲的秘书是他的胞弟杨乾三）。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的房屋就叫“堪上屋”，白石塬两边的山都有弯进去的小山沟，在这里的房屋就称

为××湾。其中有个留霞湾，住的是我表伯的族亲，也是个富户，有田产又有在外服役的军官和经商的子弟，他们在1948年增建了一幢小型新式楼房，父亲听说笑了一笑。

在白石塬虽然有座小型的刘家祠堂，但刘姓居民并不多，多数姓杨。其次是我表伯他们的郑姓，另外有少量杂姓居民。“杨新盛”后来卖给了勤劳致富的种田能手王伯藩，郑姓的表伯买了“许家屋场”，有刘家祠堂刘姓居民却不多更没富裕的，说明了那时社会不动产高度的流动性。

在白石塬安定之后，五伯伯给我家两块田“吃饭”，请了个叫刘四爷的远房族叔顺带帮助操持耕种，吃饭时父母总是请四叔坐上方；农忙需要人手时廖炳炎、杨吉昌也一起帮忙。下房里有“猪楼”，入乡随俗我家也养猪了。

之所以称为“猪楼”，就是猪舍用竹片编排成有缝隙的“楼板”，一边铺有稻草让猪睡觉，稻草是常更换的，另一边是它的排泄处，因此猪楼相当干净。猪楼下面有一个大坑，冲扫猪的粪便就流在坑里，更换下来的稻草就覆盖在大坑上面遮盖了臭气，稻草日渐沉淀腐烂就增加了肥料的有机物。在坑的外边就是菜地，浇水施肥近在咫尺，现在回忆感到这样的设计十分科学。

母亲、易妈常领着我们姐弟跟四叔学种菜。抗战胜利后我家不养猪种田了，但是这块菜地一直种到1949年初我家离开那里。（姐姐婚后在姐夫机关宿舍附近的空地种菜；“文革”期间母亲和我一同下放农村种菜都是当年练就的基本功。）

1.5　夤夜借枪

不久，发生了一件我至今记忆深刻的大事：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火塘屋烤火，正打算要睡觉，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支小部队，为首的军官说他们的参谋长和刘先生是同学（父亲青年时期进湖南讲武堂之后服务军界，后来又在中央军校特训三期毕业），听说刘先生回来了，命他送信问候；母亲礼貌地接待他们，说先生外出没回家，请他们喝茶休息。军官说顺便来向刘先生借枪抗日，母亲说没有枪呀，吩咐易妈备饭，军官说吃过饭了，不要易妈离开，说刘太太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来帮着找找，就命部下开始搜索。

军官没有离开火塘屋，母亲十分镇定地和他谈话应酬，我们姐弟始终坐在她身边。后来部下报告在柴火堆的下面找到了四支枪和子弹。

军官一支一支地查看用几层油纸包裹严实的枪支以后就写了收条给母亲，大意是：今借到刘先生勃郎铃一支、左轮一支，二十响快慢机两支和子弹若干投入抗战，在抗战胜利之后送还。落款是一长串部队番号及经手人等等。临走时军官命令士兵在院子里排队两行，请母亲检查有没有其他东西，母亲忙说没有没有。随后就是军官口令立正敬礼排队离去。勃郎铃是父亲的，廖炳炎原在军械处任连长也是快慢机，跟随父亲到警察总队任父亲的副官后更换

为左轮，杨吉昌就只好背两支二十响了。据说廖可以双手打快慢机。

次日易妈说少了只铜脸盆，母亲说绝对不可能，客厅那些小摆设一样不少，人家要那鼓囊囊又耀眼的铜脸盆干什么。

那天父亲是带领廖炳炎、杨吉昌去拜望朱姨爹的（淞沪抗战名将朱耀华，后面还有关于他的叙述），之所以留宿未归是多年未见加上路远不及回来。

次日父亲回来看过收条说，来的是驼子兵啊，埋怨母亲说要枪就给嘛，人家客客气气的，弄成搜查的局面太不好意思了。说他如果在家有可能跟他们去看看的。后来父亲说他根本没诚心要藏。枪是凶器他只是放在偏冷的西北后山房。

这时我才知道这些枪弹是暗藏在两张轿子坐垫夹层里面的。是请篾匠师傅在编制双层坐垫时填棉花把枪弹嵌在中间。我和姐姐大摇大摆坐在上面通过了敌占区的重重关卡，如果那时鬼子弄个吸铁石什么的来检查，那么可能就没我今天的回忆录了。真险呀！

军官写的收条母亲一直收藏的，大概是在“文革”抄家之风掀起时母亲将它和许多“罪证”一起烧了。多年以后，我埋怨母亲不该把这收条烧了，父亲说来的是“驼子兵”。我知道过去打“码子”的四“の”是个驼子形象，联想到这支军队很可能是新四军，当年那军官文质彬彬的礼貌模样和在月光微明的院子里排队向母亲敬礼的士兵，至今我仍历历在目。四九之后的教育形成了我的思维定势，那么良好的军纪只可能是新四军。

2004年我在华夏知青论坛发贴，其中涉及到朱耀华将军死于土改，曾经引起史界网友异议，国共两方都说他死在战场，后来有朱氏族人证实是对的。我深感网络不乏了解湖湘往事的史学高人。后来就将这个借枪的故事在论坛发贴求证“驼子兵”是不是新四军。不久就有回复，说明此时江南新四军早已集结完成北撤。当年几次会战在战场敌我交错，国军小股部队不及突围的情况许多，在长沙境内一直存在有打散的国军自动组成游击部队坚持抗战。这样也就证明了父亲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回到东乡他就去拜望朱姨爹，谈论时局必然要涉及当地游击部队有关情况。

后来我也知道在东乡有散落孤军英勇抗战杀身成仁的悲壮事迹，2001我将这个故事在论坛发贴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那些文字我会复制在后面相应的地方。

1.6　母女情深

在白石塬有件使我当时惊讶极了的事：回乡次年清明母亲带我和姐姐去给姐姐的妈妈“扫墓挂坟”。怎么姐姐

还有个“妈妈”？和母亲不是亲生母女？姐姐和我又是何等的亲密，姐姐和我怎么不是一母同胞？此时我才知道我母亲是父亲的继室；母亲是“填房替位”原来我见过的姨妈和舅舅的都是姐姐生母的兄弟姐妹。

我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勤劳朴实，宽以待人，正直善良。早年读过“女子传习所”，却又是丫头出身。这样奇特的故事是母亲在“文革”被批斗坦白交代时我才知道的。

母亲原籍是湘南永州人，很小就父母双亡。因此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父母的身世。曾经担任过永州东安县长的湖南有名书画家蒲凡生先生是当地的有名富绅，大约在母亲五六岁时，蒲公和一位极为仰慕他而且擅画又情愿做如夫人的陈氏小姐结婚，收养母亲的族人就趁机将母亲作为礼物送给蒲府新太太做丫头，陈夫人感到这孩子相当乖巧，深为怜爱，取了一个很富贵的名字“金玉”。

蒲公将已去世的如夫人留下的三岁小公子交由陈夫人抚养。三年以后小公子到了要发蒙的年龄，当时已普及有新式课程的学校，陈夫人出身败落的书香门第极富同情心，就将金玉认为义女，让她一同去上学照应小公子。这样我母亲就有读新式小学的机会；在小学结业之后，她仍然是以丫头心态小心翼翼地在陈夫人身边伺候生活和在画室侍奉笔砚。多年之后她说那时在国画创作时有落笔失误或不慎滴墨，画家马上用舌头去舔，然后补笔成水墨形态，多数可以挽救。画室侍奉的空闲，她在蒲公和陈夫人的指导督促下读了一点诗书和练就了一手好小楷。

抗战胜利后母亲和东安恢复了联系，她写信问候是称父母大人的，当时我也附页向外祖父母问安。当然后来我叫小公子为舅舅。舅舅在西南联大毕业时外祖父已经去世，抗战胜利他就业上海后就接外祖母来沪，四九建政后外祖母将往年的画作送寄卖行，后来有行家发现其中有名家蒲凡生的题词和落款的作品，明白来历之后当局将外祖母补为虹口区政协委员。我铁路学校毕业分配在江苏后曾多次去沪问候，我母亲也几次去舅舅家小住。1958年我在苏北劳动教养初期甚苦，江苏境内禁邮食物，是外祖母在上海给我邮寄了奶粉和桃酥。

时光匆匆，转眼我母亲已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亭亭玉立的妙龄女郎。恰恰那时有位外祖父在长沙的画坛至交好友来东安拜望，在画室看见有幅蝇头小楷极为眼生，询问是何人书写，外祖母就带领我母亲出来拜见。外祖父看见这位雅士一时目不转睛，征得外祖母同意就将我母亲送他作如夫人。他带领我母亲回长沙的当天顿时河东狮吼，他那豪门闺秀的夫人是有言在先禁止他纳妾的，坚持退回，闹得鸡犬不宁。

长沙一直处于革命新思潮的前沿，他的子女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属于当时的进步青年；富庶子弟推动解放婢女在当时的长沙已形成风气，见我母亲有新文化基础，于是就送她进入湖南省的“女子传习所”。

当时，比较开明的富庶人家是送小姐上女子中学的，女子传习所相当于职业学校，中等人家的女孩就在这里学习新式文化课程和刺绣、缝纫等技艺。

五伯伯在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任上就是在传习所选了位毕业生做姨太太的（在正室五伯母去世以后“扶

正”了）。我父亲在丧偶一年半以后也来这里物色继室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姐姐婚后在衡阳一直和一位开成衣店的柳姨妈交往，母亲告诉我柳姨妈是她年轻时的同学。

母亲幼孤，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她的心中有着深刻的烙印。她幸运地得到了实践儒家仁爱精神主人的恩惠，能在少年时期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教育，她成长期深得爱沐，长成后传递仁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对七岁丧母又乖巧可爱的姐姐必然是疼爱有加。因此，在婚后她对姐姐视如己出，让一个女童得到母爱真情。我出生之后十岁的姐姐心灵温暖地怀抱着小弟弟自然产生浓厚的骨肉之情。正如母亲常说的“人心都是肉做的，心是要用心来换的。”她们一生母女情深，姐姐对母亲的关怀和孝敬毫无夸张的说是超过了我这个亲生儿子。这些在后面都要叙述到。

有一件我至今记忆清晰的事：一次姐姐带我去山上采杜鹃花，回来时家人已吃过饭了，姐姐就自己在厨房做了两碗饭端出来，一碗是蛋炒饭一碗是白饭。姐姐要我挑一碗，我选了白饭，才扒一口就发现在下面也是蛋炒饭。这说明十七岁的姐姐已经养成优良的品德而且懂得在心灵上去影响和教育弟弟了。

1.7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现在回忆起沦陷期间的往事，我十分怀念父亲的副官廖叔叔、勤务兵杨大哥和保姆易妈。

我父母为人敦厚平和，待他们素来亲如家人。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姐弟从小对他们十分尊重并有着深厚的感情。长沙沦陷后父亲没有收入，他们也没有一分钱工资。而且廖、杨两位手上有枪，在军界有一定的资格和熟人，但是他们仍然宁愿和我们患难与共。在白石塬他们还参加田间耕作为解决生活而辛勤劳动。这既显示了他们的高尚品德，也折射出我父母的人格魅力。

易妈是长沙西乡人，年长我母亲约七八岁，她丈夫抗战阵亡牺牲以后，她十多岁的儿子进了我三伯伯的遗属学校；（前面说到过三伯伯是我祖母的亲姨侄，长沙有名的慈善家，当时开办有接收烈士遗属的孤儿院、遗属学校和节妇教养所等）在那里读书和衣食生活是全部由学校负担的，但学校在长沙东乡离开她很远，她后来没去节妇教养所，由三伯伯推荐到我家做保姆。

易妈读过私塾略通文墨。有一次她说了句“雪中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廖叔叔和她争论起来，廖叔叔说锦上添花的不见得都就是小人；“官司”闹到父亲那里，父亲同意副官的看法，说“落井下石是小人”就对头了。还说《增广》可能是有不同版本。（我感到当时在长沙城乡一般人都能够在日常语言中夹杂些《增广》条文。）

这件事之所以我记忆清晰，是因为父亲不久就给我带回一本《增广贤文》，指导我在阅读中理解意义。我虽然没有大人“一本正经”地教我识字写字的记忆，但是，这就从侧面证明七岁的我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了。

我和姐姐叫她易妈，母亲叫她易大娘，父亲和廖叔叔叫她易嫂，杨大哥叫她易婶，在乡下时她和廖叔叔、杨大哥一样叫我父亲“三爹”（读音近嗲，那时乡邻称呼我父亲是刘家三嗲、母亲刘三娭毑，湖南人称呼祖母“娭毑”，实际上对尊敬的中年人也这样称呼，而且有许多中年夫妇也有相互叫嗲嗲、娭毑），她和我一样叫杨大哥“羊羊”、 对廖叔叔，她和姐姐一样是玩笑似的直呼“副官”，（廖叔叔有过抗议，她和姐姐说：一屋人就你是个官还不高兴吗。）她对我和姐姐一直是直呼名字，和副官一样叫我母亲三娭毑（维独杨大哥叫我母亲三婶）。回忆那时彼此的称呼，至今我仍然感到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浓浓亲情。
廖叔叔家在长沙城近郊，那里是敌占区所以他不能回去。在我父亲由军械处长改任长沙警察总队长时他跟随过来，以连级军官任我父亲的副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看到电视有个策反湘赣边境一支国军起义的老电影在片头上有“历史顾问：廖炳炎”。我认为这不是重名，因为在1948年秋父亲退出政界后廖叔叔短时间离开过，在四九年初他又重新回到父亲身边参加湖南和平运动的有关活动。廖叔叔是沟通能力很强的资深军官，很有可能是以那时的“组织关系”受命重新回了部队。

杨大哥在我父亲1948年退出政界并没回去，留下跟随我父亲参加湖南和平运动的活动，因此在湖南和平解决后由新政当局“资返”他回贵州。在1951年他还去衡阳看望了姐姐，他1953年结婚时我才毕业，也汇款去祝贺的。可能是后来的政治运动原故才和我们姐弟失去了联系。

易妈和廖叔叔如果活到现在已近百岁，最年轻的杨大哥也应有86岁了，因为他参加过湖南和平运动，按照后来的“政策”他应该属于“离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幸运逃脱此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

不论他们是去世了或还健在，我衷心的感谢他们，怀念他们，祝福他们！

1.8　难忘的一九四五（上）

借枪事件发生在围炉向火时节，随后不久就过年了。以往在城里怎样过年我没一点印象了，但在乡下过年还有一些记忆。

除夕晚餐有一桌丰盛的饭菜先祭奠祖先，到晚上就依当地风俗一家在火塘屋“围炉守岁”，开始我是兴致勃勃的听大人说往事，讲故事。我的一些片断记忆多数就是来自此后每年的“围炉守岁”。比如父亲说过，在北伐时敌方的步枪是连发五粒子弹的，而我军的步枪多数是打一枪就要填个子弹的老式步枪，连发五粒子弹的枪十分少，器不如人即使是胜仗也牺牲很大。有次败仗他是趁夜色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守岁到后半夜，年幼的我蒙蒙胧胧地睡着了，到天亮大人叫醒了我，说是要“发笔”，要我在一张红纸写上：“新年发笔、大吉大利、童叟之言、百无禁忌。”随后大人都写了，他们写的什么我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易妈不肯写，还说莫让她“赫走了财神菩萨”。

此后每年初一清早都有新年发笔，父亲的字有饭碗一样大，母亲和姐姐、羊羊写的只鸡蛋那么大了。写的都是励志和吉祥内容，可能我睡意没消，具体文字没有记忆了。就记得有一年我写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易妈说不吉利，妈妈说童言无忌没关系。

其后有过受益终生的“新年发笔”记忆，将在后面说到。

过年要去给长辈拜年的。除了邻近的亲戚，那年我还去了离家约三华里也是安全区的柳午亭老先生府上拜年。午亭老先生是毛泽东先生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的父亲。

在周边乡民中柳家五嗲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小爱拳脚，武功高强。在日本留学学的是体育，还带了位日本女子回国做续弦太太，他平日在家练拳，寒冬腊月也冲冷水澡。乡邻传言最玄的是给他拜年磕头还要“记账”的。

午亭先生是父亲的父执辈，父亲在年轻时就是通过柳直荀结交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郭亮的，在后面有相关叙述。回乡以后的首次过年他当然要去拜望请安。出自好奇，我就缠着父亲要跟随去柳家拜年。

在柳府看到他日本太太也和乡下娭毑没什么两样，除了磕头拜年和赐我“包封”之外，没有其他记忆。父亲回来告诉我：他老人家是新式教育家，有日记习惯，所谓拜年“记账”可能是顺手记下当日他对世交后辈仪容谈吐的印象。后来是怎样记录我的，父亲也不知道。

过年不久开春就进入农时，我家一些常用小农具是杨九爷送的，还一直借他家的耕牛，记得我跟羊羊去他家牵过牛的。大型农具是向房东王二爷借的。杨九爷通文墨，以现代的话来说他当时的职业是乡村猪牛生意的经纪人，我家住在那里的五年不少事情是请他帮忙的。（后面还有和杨九爷父子交往的叙述。）

随后就到了六月伏天。母亲“晒箱子”时我发现了许多第一次看到的东西。有父亲的呢子军装、斜皮带、短佩剑和蒋委员长签名的照片。知道了父亲曾经去庐山在中央军校受训的事。

晾晒有不少没装裱的字画，对许多“尺方”母亲一一告诉我哪些是娭毑画的、哪些是老娭毑画的，说老娭毑陪嫁丫头的画也能送人的一些往事。

我当时感到兴趣的是两本很大的画册，里面都是照片，是长沙各界公祭张辉瓒和鲁涤平的纪念册。母亲说鲁涤平的姨太太得知死讯就跳楼自尽了。

以后每年母亲晒箱子都逢暑假，年岁及长的我再看娭毑和老娭毑的画就有了一点欣赏能力，在产生自豪感的同

时，也在心中萌发有蒙胧的责任感，觉得自己今后不能愧对先人。

我再看那些画册就知道曾经的内战，开始有了政治启蒙。

白石塬子弟在外做事的不少，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到。我家一片欢腾，大人几乎个个激动得热泪滚滚，我也欢欣鼓舞得忙来忙去寻找红绿花纸和姐姐一起做灯笼……整个村庄的人也都沉浸在欢腾之中，锣鼓声鞭炮声此伏彼起。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好是乡民准备“七月半烧包祭祖”的时候，不乏鸡鸭鱼肉，有些人家趁势摆酒宴客，实足热闹了几天。我虽然很小就会唱一些救亡歌曲，亲身经历了敌机的轰炸，又跟随大人辗转流离，年幼的我清晰明白“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道理。而那几天的气氛更加使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国家民族、什么是民众民心，这些深深地植根于我幼小的心灵中。

所谓“烧包”就是将“钱纸”——扎了孔的黄纸装在纸包内，在纸包的当中写上受用者的称谓姓名，在左下方写有敬献者的称谓姓名。受祭者的牌位按照家族世系有序地排放在堂屋中间的条桌上，在这前面有摆放果品和酒菜的祭桌，鸣放鞭炮以后家人就按照辈分先后叩首祭奠，然后烧包。

那天父亲对天井另设一张祭桌，立了“抗战阵亡将士之灵位”，家族烧包完成后，再次鸣放鞭炮，父亲满面庄重地对灵位三叩首，然后包括易、廖、杨在内全家轮流叩头拜祭。在此同时，他在一旁为阵亡将士烧“钱纸”。在一叠一叠的钱纸熊熊燃烧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一直是满面泪痕……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流泪，幼小的我当时内心极为震撼……

我稍稍成熟之后就理解到父亲当时的心情：他在追思八年抗战的悲壮激烈，他满腔热血至诚至敬地悼念为国牺牲的英灵。日寇入侵使他失去了老母幼女，面对国恨家仇，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的热血男儿，他是为自己在国难当头时刻避难乡间而愧疚，为自己未能浴血沙场抗敌救国而感慨！

1.9　难忘的一九四五（下）

胜利之后有许多信息相继传来。

有远房表姐和族兄是寄宿读书随校撤退到湘西的，两位都是富家子女，在抗战后期为抗敌救国而投笔从戎，胜利后传来的消息是他们已经为国捐躯了！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听说一些宗族七月半开祠堂祭祖时议论惩处当过汉奸族人的事情，有些扬言要捉拿“沉塘”；有些是决议此人今后不入家谱。乡人的民族气节使我敬佩和震撼！

民族大义滋养了童年的我，对我此后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秋收完成以后，乡下就有菩萨出巡，我第一次看到那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长短喇叭齐鸣和硝烟弥漫“放

铳”的庞大游乡场面，白石塬有乡邻摆香案“路祭”。

抗战刚胜利在真空区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怎么能够有如此的大场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民间组织的活动。

当时的长沙乡下有一些诸如“义仓”“学仓”之类由乡绅牵头的民间社团存在。那时完全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几乎已不复存在，这些“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按照拥有的田亩为单位每年拿出一定的稻谷组成的。当地民谚：“湖北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有逃荒的灾民到来就由“义仓”安排“粥棚”接待，维护所在地的秩序防止扰民。“学仓”负责主持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幼童启蒙教育（不收费或收费极少），发现有“会读书”的贫寒子弟就由“学仓”资助进一步求学，这大概就是近代湖南出人才的原因之一。这些民间社团在历史上就存在的，一直和官方无关，所以在抗战刚胜利的无政府状态下也能够组织活动。

现在回忆，那时乡村的社会秩序是不错的，我没有听说过什么坑蒙拐骗和以强凌弱的事情。而“挥子”的流通，感觉当时乡民之间社会诚信度是相当高的。

所谓“挥子”是在沦陷期间和其后的货币疯狂贬值时期，在乡村由信誉高的富裕人家或店铺出具可兑换银洋若干（也有以稻谷重量为单位的）用厚实的“牛皮纸”书写的狭长纸条作为货币流通，除了在大写数字处盖有印章以外，在落款处还有亲笔签名，在姓名的后面都有个“大笔一挥”的“挥”字，所以乡民称它为“挥子”。它在乡村社会始于何时我不知道，但的确是起了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文革”期间我下放在历史上是“吴头楚尾”的江苏西南角高淳县，这里的农民称布票为“布挥子”。

我家紧邻的“杨合盛”有一个范姓老板的杂货店，笔墨纸张、烟酒糖果、日用百货等琳琅满目。有时我也去那里玩和买东西的，但却没我使用什么货币的记忆。当时乡邻多数是记账届期结算，可能我家也一样。乡民之间归还借用的东西或传递口信，往往就拜托店老板转达，范家铺子就像个信息和物资的中转站，我家有事拜托杨九爷往往是去那里捎口信的。

我在下面说明一下长沙方言和某些称谓。

长沙方言的“爹爹”读音和李铁梅差不多，我对父亲就是叫爹爹。但是“嗲嗲”（dia）却是祖父了（不是“发嗲”那么嗲的读音，和吴语中称祖父辈的阿“爹”的读音差不多。）

“爷爷”普通话是祖父，但是在长沙方言中“爷”字读音牙，可以作为父亲的称呼，比如：“我父亲”方言口语可“我屋里爷（牙）”或者“我爷老子”，乡下也有叫父亲“爷爷”的（读音牙牙）。

乡民对有一定地位平时为人随和的才亲切地称呼某家某嗲，如对我父亲就称他“刘家三嗲”。对有地位的富裕人士平时又摆架子的就叫老爷，如对我表伯都称他五老爷。像我家的房东是种田能手勤劳致富的，他拥有田产房屋

和两房妻子（土改评为富农），但乡邻仍然只叫王二爷，除了开玩笑，平时没谁叫他王家二嗲的。

家族中有些亲兄弟往往排行不是连续的，这就是共祖父的孙子按根据出生年月来排行的，三伯伯五伯伯的中间插了个大于五伯伯的堂兄弟。我父亲是老大，但是在堂兄弟他排第三，所以乡邻称他“刘家三嗲”。

前面说了，我父亲的胞弟自幼过继给另一房延续香火，我称一叔、父母叫他一弟。杨开慧故居管理员说在“开慧百年”纪念活动之前整修时也发现她塞在墙缝里给一弟的信。为什么有这样打乱堂兄弟排行的称谓，我至今也没弄明白。

白石塬介于高桥镇和金井镇之间，金井镇在长沙平江的交界处，因此白石塬和附近一带居民的土话是带有浓厚平江腔的，但是都能够说长沙官话。

当年我还在那里听到过有一种称为“翻话”的暗语，比如：“他们是汉奸坏人”，说成“拿塔能猛利市烂汗连奸来怀宁人”，有一些基本规律。据说是沦陷时期糊弄外来汉奸的密谈。这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不知道后来是否有学者留意过。

前几次会战保卫了长沙城，长沙东乡是首当其冲的战场，乡下有过短期沦陷，曾经有鬼子兵在白天进入过白石塬。我听姐姐说二次会战时期日本兵曾来过一次，妇女儿童都上后山躲避，可是鬼子没进入门抢劫抓人，只在许家屋场门前的“禾堂坪”放火点燃稻草垛，看见火光燃起以后日本兵就走了。乡民随即出来救火，草垛的火只延烧了小部分屋檐，抢救及时没让房屋烧起来。但殃及池鱼，烈火烤焦了我家存放在许家屋场“夹墙”里面的一些东西。“夹墙”是旧时大户人家在房屋建造时设置的一个房间和一个房间之间的小空间，一般人在里面看不出来，只有经验丰富的土匪可以采用外墙总长度减去各个房间内空间之和发现其中有夹墙。

因为曾经有过鬼子在白天进村，所以在避难期间我基本是宅在家中，只和我年龄相仿的邻居家两个女孩玩过“跳房子”，有时也和母亲去对面的表伯家看望，那里有因战事辍学的两个表姐和一个大我十天的也是和我一样文静的表哥，因此我的童年没有当时小孩子“弹弹子”、“滚铁环”一类的室外游戏经历。

沦陷期间的长沙东乡虽然在山区有许多没敌伪组织的真空区，但都被比较平坦的小丘陵地带的敌占区隔断，往来十分困难，因此胜利以后走亲访友马上恢复。

头一个来我家的远客是朱耀华将军。记得那天他一身白竹布短衫，在客厅和父母谈笑甚欢也赞扬了我们姐弟，吃饭前他平易近人和廖杨两位寒暄。我和姐姐很奇怪朱姨爹拿碗的手怎么一直在抖。次日我家备轿送他走后，父亲告诉我们，当年淞沪会战不要说我们武器远不如敌，人家的兵穿皮鞋我们的兵穿草鞋。朱师的阵地当时是敌众我寡又无后援，临近失守他写下遗言，在举枪自尽的一瞬间勤务兵跃身扑过去，这样子弹才没打到脑壳是穿过了左肩胛就留下了残疾。

朱耀华将军因为厌恶内战，抗战胜利后就回乡下隐居。

1950年的寒冬腊月，乡下“挖浮财”，柳午亭老先生被光膀子斗争，农会知道他不怕冲冷水，打算对他泼大粪斗争了；恰在此时中南军区派军官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来抢救，午亭先生在吉普车上就告诉带队军官，朱耀华将军正在被斗，可是那位军官不知道朱耀华为何许人，等到他回武汉汇报中南军区首长再来抢救，朱耀华将军已被“镇压”多日了。

父母率我们去拜望八叔嗲嗲。八叔祖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湖南军界地位很高，北伐以后即退隐乡下，历届湖南省执政者都聘请他为省参议。八叔嗲嗲是我祖父的堂弟，只大我父亲十几岁。那次拜望除了记得他的续弦夫人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叔叔以外，没有其他的印象了。

相隔不久，随学校撤退到湘西的镇叔和毛姑回乡马上就来白石塬看望我们。八叔祖母去世以后在长沙沦陷之前他们是常来一师附小我家的，幼年丧母的毛姑和我母亲、姐姐一直很亲热，决定到离开我家很近的达德中学继续读书。

镇叔在湘西已经高中毕业录取在国立师范大学。镇叔衣着朴素待人彬彬有礼，知识渊博庄重少言，记得他一闲下来就看英文书。他不厌其烦、和蔼可亲地回答我好多幼稚的问题，那时我就十分崇拜镇叔，对我以后影响很大，详待后叙。

1.10　重新上学

说起来我是在1944年春就上学了，当时断断续续没上多少课，就在家躲警报了。后来的日子里应该是会有大人零零星星教我读书识字的，只是记不起这些情景了。

1945年秋，设立在刘家祠堂的迈群小学筹备开学。已经出门安全了，白石塬附近来读书的学生很多。

因为战事的影响，姐姐在住校读中学时已经超龄，而且当时家庭经济状况也没能力供她再去长沙城住校读高中。所以闲在家里的姐姐就去那里教一、二年级。另外一位是回乡避难的高工毕业生（相当如今的大专）杨老师教三、四年级。

这个学校是一到四年级都坐在祠堂大厅上课的复合教学班。虽然姐姐在那里教书，但有时候姐姐早上没课就我一个人去学校。记得在一个雪后的上学途中，我的短套鞋陷在雪地的烂泥里面好不容易才拔出来。母亲知道后就给我买了双木屐。

我一进去大概就是读三年级，因为记得批改我作业的是杨老师。和我同年级的有小表哥兆果，是五伯伯的次子，他们堂兄弟姐妹命名的排序是仁毅果敢、智慧光明。

我自幼没有被父母打骂过的印象。当年冬天我不肯穿姐姐留下的大衣受到母亲的严厉斥责：自古笑烂不笑补，这不烂不补为什么不穿。我说袖肩上有摺是女孩穿的。母亲说照这个道理倒冤枉你了，那就改一改吧。

1946年中华民国进入宪政时期，乡下在建立民选政权。待业的父亲当选了当地的乡长。平易近人的父亲在乡民中印象不错，二次会战在乡下时他深夜单身“捉鬼”也广为传言，何况原来是在城里做过“大官”的。我不清楚当年的选举经过，但他的“当选”毫无疑问必然是有五伯伯和其他乡绅在幕后安排的。廖杨两位跟随他多年，自然和他一起去那里任职。这样我家就不再种田了。

不久，留学美国的大表哥兆仁回乡探亲，每人都有礼品，送我的是“玻璃皮带”、“玻璃牙刷”和一些卡通画片。那时不知道这些是塑料制品，感到新奇得不可思议。大表哥是三伯伯的儿子，随后就回美国去了，四九以后我和他有过通讯，在后面要叙述到。

1946年秋有位叔外公去世，母亲带我们姐弟去悼念。

母亲一直是恭敬有加的承袭姐姐生母的身份和那边的亲戚交往，受到那边亲友的一致赞扬。

这次奔丧，大厅有许多隆重的仪式，可能是我没在场，除了记得“礼生”（司仪）有人来吊唁就高喊“孝子敬谢”之外没留下其他印象。

记忆深刻的是在侧厅有六七张桌子开“流水席”，所谓“流水席”是吃走一批马上收拾干净，继续上菜开席。我喜欢吃八宝饭，想吃了又去坐席，吃几口上面的果子就下来。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责备了我：“不成体统，你太涉（失）格。”回来时那边的亲戚送了许多礼品，还用独轮车送我们走。一边是大包小包、一边坐了我。去时是坐独轮车的，因为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母亲怕小孩耽误时间。当地的习俗是如果客人留宿，请来推独轮车的或者是轿夫一般是当天返回的，不至于造成主人家的住宿和礼仪方面的压力。前面说到朱耀华将军来访，次日也是我家备轿送他走的。

中途我们在一堂舅家停留，这位读书人的舅舅却爱好“打铜”工艺。他送我们一只“灶里铜壶”，是可以在烧饭菜的同时“叉”到灶堂里烧开水的。壶身是整体地用紫铜片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的连接也没有一点焊锡。这个“灶里铜壶”至今仍在，算得上是了解金属工艺的我，至今也没明白他是怎样敲打出来的，在我国民间的确存在一些绝技。

那时大人从来不操心我读书和做作业什么的。反正同在一个教室只要你想听什么课都听得见。当时是允许“跳级”的，我读了一年半就毕业，我和果哥都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在当地很有名的“沙田中心学校”。

这个学校离家有十余里路，还要翻座相对高度有五十米的菜家岭，于是我在十周岁时就要寄宿学校读五年级了。

（未完待续）

老牛先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0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留痕】

风雨人生六十年

第二部　快乐少年

2.1　住校读书（上）

沙田中心学校设立在罗家祠堂，罗姓是当地仍然兴旺的望族，祠堂的规模很大，可以容纳百余学生。就近的走读，寄宿的有七八十名。

这座学校之所以有名，一是师资雄厚。既有不少老师是大学生（避难留下来没来得及回城谋职的）又有在当地颇有人望的“老学究”。二是学校学风浓厚，学校里面的墙壁上到处贴有学生自办的壁报。三是管理严格，寄宿生黎明即起，跑步上操，早晚自修。食堂里由学生轮流“帮厨”（上饭菜、收拾碗筷抹桌子、打扫卫生。）餐桌没有板凳，一律站着吃饭；吃饭前要齐声朗诵一首诗，听到老师“开动”的口令才可以吃饭。不管你是少爷小姐一律自己洗衣服。更有趣的是上体育课不论男女学生一律赤足。

我今天还清楚的记得：教音乐的女老师戴的是戒指手表；教美术的何老师是住校的，晚饭后总是用他的大搪瓷杯当球拍和同学一起打乒乓；地理老师生动比喻湖南是人头湖北是帽子，还用自己做的日晷在太阳下面教我们测量“午时三刻”；自然老师在课堂演示植物嫁接和在大太阳下面用放大镜烧豆荚讲解聚焦原理。那时我对学习充满兴趣。

历史老师是位学识渊博的性情中人，常常脱稿给学生讲故事，在讲到中华国耻时他往往会两眼晶莹骤然无语，学生亦为之动容，有时师生一起泪洒课堂。至今仍记忆清晰的是说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时他慷慨激昂地振臂面对学生：他们才是真正地为国为民啊！他们都是富家子弟，用不着去舍身亡命去谋取私利的。激发我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无限景仰！在读中学以后我不惜代价地交换、购买收集了成套的七十二烈士纪念邮票，在“文革”抄家之后没有归还。历史老师真性情的教学震撼了少年的心灵，引发和培育了我此后一生对历史的兴趣。

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教国文的郑老师，这位先生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满腹经纶怀才不遇寄情于教书

育人。他只采用官方课本中少量的白话文，对我影响深刻的有《最后一课》；而大部分是自选教材，有些是出自《古文观止》的，如《爱莲说》、《桃花源记》《前、后出师表》等等；有些是先生收集的近代古文如《波斯老人》等等。内容都是宣扬真、善、美的。先生在课堂时常插入诸子百家的格言，诸如“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教导学生正直善良、刚正不阿、自强不息；也有借《苛政猛于虎》之类来惋惜民生，旁敲侧击时政的。我受教于先生门下两年，不仅由于先生循次渐进的教育方法培育出我一点文字功底，更可贵的是我获取了一生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先生终年一身朴素装束和不怒自威的神情至今仍在我脑海之中。

五年一期我是年级第二名，第一名是果哥，五年二期起我以年级第一名直到毕业，果哥在六年一期后就跳级进城考中学了。

前面讲了这里的学生自办壁报成风，以往是到六年级才出的。感觉我的作文较好，在五年二期郑先生就鼓励我出壁报了。

壁报是将自己写的又必须有几种文体的短小精悍的文章誊在两张大白纸上，要错落有致地进行“排版”，用水彩写标题、勾花边。开始我学习“前辈”们的样式，很快我就有了自己的特色。

五年二期我出了三次壁报，引起老师和同学注目的不是那自有特色的排版而是一篇《我的志愿》的文章。这是照抄我完成的老师命题作文。我文中开门见山说这个题目是陈年老套“校校如是凡学子必拟之”“我辈少年不能辨五谷者尚有之又何能区识百业”“先生难我矣，唯可答者志在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也。”当时不过区区几十字的文章现在我只记得这几句了（这个作文本我一直保存着，1967年我还重阅过，“文革”抄家后没有归还）。那时我根本没去想过非议老师出的题目会被责难，更没想到的是，恰恰相反，我竟然因此文而得到先生的赏识。先生在文后批曰：“一泻如注清清白白孺子可教也”；从此先生对我另眼相看了。

次年春我是六年一期了，虽然我是全校五年级的年级第一名，但主要是“壁报效应”放大了我的“知名度”，我破天荒地改变了毕业班学生担任的惯例，在六年一期当选学生会主席。

那时有公民课，除了三民主义、宪法条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与怎样做个好公民这些内容以外，也讲解民主选举的具体进行程序。因此学生会选举等于是课堂教学的演练。由各班级学生无记名投票提名候选人，然后按照初选提名的得票数遴选出前十几名同学作为候选人；在余下的同学中推选出唱票、记票和监票的工作人员，然后再次投票选举，得票数最多的当选主席，随后的前几名就是学生会委员，选举的全过程没有老师的干预。

六年一期我有一篇考试作文记述过年的事，其中谈到有些穿新衣服的人行动拘谨手足无措：“嗟呼，人为万物之灵，万物当备于我，人为物役岂不悲哉！”老师十分欣赏在这段文字边逐字打了“豆点”，文后批曰：“诚哉斯言。”文章出在壁报上后全校师生反应强烈，“人为物役岂不悲哉”一时成为同学间流行的打趣语。

这学期我又是年级第一名，推波助澜到下学期我又当选学生会主席。

学生会各门类的委员是在竞选主席中得票数在前几位的同学按照兴趣和特长担任的；六年一期我当选主席后心中就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因为这些落选主席的同学的学业人品都是出类拔萃的，多数是高我一期，有的仅相差我十多票，我只是侥幸有运气而已。因此我如履薄冰，在他们面前一直谦逊有加，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当时学生会要组织学生间各种比赛和文艺活动，他们平时的工作量很大，但我这个当头头的并不辛苦，只要用心组织协调好就行了。当年的际遇使我在锻炼了组织能力的同时养成了对下属同事谦逊尊敬的态度，往后的事实证明我一生因此而得益匪浅。

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使我自小有着一些朦胧的“求新”的意识。以作文来说当时有不少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同学，他们的文笔一点也不比我逊色，只是我在观念上不怎么人云亦云，遣词造句又时有辛辣，从而得到有点“离经叛道”倾向的老师的欣赏，常常褒奖有加。如此益发促使我这种意识的增强，对我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回忆当年我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可能是在迈群小学时大家在一个教室我可以听到高年级课的影响和出自小孩子的好奇心吧，我当时有提前阅读待教课程的习惯，上课我又是很专注听讲，加上记忆力比较好，所以看起来好象我不太用功，但是考试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得高分。

2.2　住校读书（下）

住校读书的课余时间我很少参加体育活动，就是爱看书。而且是好读“闲书”。晚自修时让公民老师没收过几次书，后来还挨过他一次耳光。（那时是学生各人带只“美孚灯”集中在祠堂大厅晚自修，七八十盏灯，灯光摇曳，蔚为壮观。晚自修是由公民老师监督的。）我挨了耳光后打算向校长申诉这是侮辱人格，住校的何老师听说后要我算了，说公民老师是罗家祠堂的红人，何况你又是屡教不改。

奇怪的很，除了在前面说过的食堂印象以外，很奇怪我对当时在宿舍等其他生活情况没留下任何记忆。学校旁边有小店，当时我口袋里有过多少钱？我去买过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记忆。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从小就不贪零食，直到此后一生。

当年我课余玩什么呢？在五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同学在刻图章，感到很好玩，就盯着他不放，请求跟他学。后来他送给我一个木章坯子和刻刀，我刻了自己的大名盖出来十分得意（这枚木章至今还在。）培育了我后来对雕刻的兴趣。再就是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种瓷土，我也去挖了些，在揉熟之后反复练习泥塑，后来捏出几只猴子头和空心的卧牛，倒也蛮像样的。阴干了还相当结实，我带回家在灶里焙烧之后，其中有只卧牛还可以盛水呢。直到如今，我还可以三下五下地捏出个猴头来。

还有就是学“皮影戏”。我好羡慕同学心灵手巧，制作出一些古装戏剧人物。开始时学他们的样用粉皮做，到后来我将家里没用的照相底片用开水泡过擦成透明胶片，然后在上面画好头象，衣服填上色彩，剪好形状之后再用线订好关节再系上几根筷子，在凳脚上贴张白纸后面放美孚灯就可以“演出”了。这些“文物”是不在了，儿时对手工的兴趣锻炼了我的手指和毅力，对我此后在工厂有崇拜手艺的心态和爱好动手的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秋，学校组织远足去了东乡有名的隐珠山，当年我是有过篇白话记叙文的，（作文本“文革”抄家后没有归还。）2001年我根据记忆在网上发了一篇纪念文字，现在复制在下面：

“血染隐珠山——纪念“9.18”七十周年

隐珠山是长沙东乡一座有名的高山，她之所以出名一是山高；二是在山顶上有一棵方圆几十里都可以看见的千年白果树；三是在山顶上有一组叫“九间房”的天然石洞可以相互穿插。以上是古来天生，而赋于隐珠山莫大荣誉的是抗战期间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在这里浴血奋战一直到全部殉国。

长沙沦陷后我家辗转数百里绕过敌占区回到祖居之地长沙东乡的一个敌人势力未及的小山冲，隐珠山浴血奋战的故事我曾经听说了一点。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在读小学六年级，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去隐珠山“远足”，一路上同学们相互交流、补充印证，隐珠山的故事我就知道得更多一些了。几次长沙会战的战斗都是十分激烈的，有时敌我穿插交错，那一营部队据说是撤退不及的“孤军”，当时隐藏在隐珠山一带的大山之中。当知道有一支敌军进入了隐珠山下一个小镇，敌人兵力大我一倍，已是无援的孤军硬拼是不行的。部队就设计由老百姓将掺有桐油的茶油给了鬼子，鬼子吃了当然是腹泻，趁鬼子们一个个泻得糊里糊涂，我军连夜突然袭击，杀得鬼子“只剩下几个报信的”。鬼子随后就举大兵力来报复，我军退守到隐珠山上和与自己几倍的敌人周旋，居高临下敌人损失惨重。打到后来是士兵们依山据石各自为战，“和鬼子拼了”“弟兄们报国的时候到了”同仇敌忾的呼喊声彼伏此起，打了二天一夜弹药绝尽展开了肉搏战，终因敌多我少一个营的官兵无一屈服全部以身报国壮烈牺牲。

当时的学校组织的“远足”，师生都是步行的。那天同学们走到山麓还算一支“队伍”，上山之后就逐步形成三五成群的散兵游勇了。我那一行有五六人，一个平常很活跃的同学爬到一块巨石顶上大呼：“环我皆山也……”于是大家搜肠刮肚掉起文袋来了。山上野毛栗多，采下毛栗球用脚在地上搓一下就出现栗子，我跟随掉了一句“虽无丝竹管弦之胜一搓一栗亦足以告慰馋怀。”大家边走边玩甚是热闹……

那时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没有集中训话、献花圈、喊口号之类的仪式。但是同学们走到当地老百姓建造的纪念阵亡将士的忠烈亭时，一个个都收敛了沿途的嬉笑，一个个都顿时无语，都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这是完全发自孩子们内心的真正的“静默三分钟”……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钻山洞的，我们都翘盼快点到山顶看那神秘的“九间房”。及至，看见前面一拨同学一个个

都没精打采的从洞中出来，一打听是有同学听说当年鬼子用火熏死了隐藏在洞中的将士……我们失去了刚才的兴奋默默无语进入洞中。洞内忽明忽暗我们想寻找战斗遗迹，一无所获。出洞时我们这一行同学又像离开忠烈亭一样不约而同地向着洞口默默无语深深地鞠躬……

远足隐珠山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当年在忠烈亭前默哀鞠躬的少年已是两鬓秋色，忆及往事我仍然是热血沸腾，在键入此文的过程中还时时平添两行老泪……那忠烈亭还在吗？长沙新修的《地方志》记述了隐珠山之战吗？……

我已经将这个悲壮的故事告诉了我的儿孙，当年那些自发默哀的少年同学也必然会同样如此。今天我至诚至敬在网络上宣传这个有智有勇的战斗故事并藉此悼念英烈。血染隐珠山的将士们，你们视死如归捍卫民族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怀念和景仰，你们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中华子孙。

一切为国捐躯的英勇的中华将士们永垂不朽！”附录：2002年我重上影珠山，当晚在网吧发贴：隐珠山在长沙福临镇附近，今日上午我乘摩托重上隐珠山，车行到半山就看见群山尽在眼底。上行到隐珠山小学路面就坑洼不平，只好步行。沿途看见有几座别墅，有两座可以看见门匾：“静养园”“守一斋”，请教正在铺石板路的师傅知道这些别墅是长沙市有钱的明星和老板造的。

我询问修路是谁出的资金，他们告诉我是上面静养寺的老和尚。在这庙后就是朱家岭，有朱RJ的祖屋，他的祖父朱八先生曾经住在那里“躲兵”。听说今年朱RJ要来，九十几岁的老住持知道他是个清官，是不会发句话叫省里县里修路的，所以就出十几万资金就近取石从小学到庙门口修一公里石板路。（今注：可惜了老住持的一片诚心，后来朱并没去长沙东乡。）

继续前进邻近庙前，又有几位铺路的师傅，我请教他们：当年的纪念亭还在吗？回答说：烈士塔呀，“反五风”就敲掉了。再问：总还有一点保留吧，那个有石栏杆的底座应该还在吧，回答是：五八年修水库石板全部拆走了，几十年了，现在那里都长满草木了……

我问摩托司机什么叫“反五风”？回答：五七年反右以后就开始搞的，城里抓右派，乡下就反五风。到处毁神拆庙，叫和尚尼姑还俗结婚种田。最可惜的是山下面不远一个十几丈高的御赐牌坊都敲掉了，那牌坊全部用几百斤重的麻石条搭建，不要说那些雕花的飞檐和对联牌匾可惜了，就是那建造方法都有得研究哪。那时没有吊车是如何将那么重的条石搞上去十几丈高的，那时没有水泥是怎样横横竖竖地石楔套石楔的站稳了几百年，要是留到现在就是个有名的旅游景点了；摩托司机连连说：造孽啊！造孽啊！毁祖宗的基业，敲子孙的饭碗，这班化孙子几十年冒做过好事。

既然烈士塔已无痕迹可寻，我也就不再继续上去了。

转眼就来到“静养寺”。寺庙是前后两进，主殿佛像和实施简陋，内进有住在庙内清修的居士在打扫院子；请教知客僧，寺庙在“反五风”时菩萨敲光，随后做了林场的场部，一直到1993年才重建恢复的。

临别，我在功德箱放了二十元香资，鞠躬祷告：我佛有灵就请转告那些为国牺牲的英灵，老百姓没有忘记他们！

2.3　假期生活（上）

学校离家十余里，要翻座相对高度大约四五十米的山岭，刚去时有独轮车送我，在山顶陡坡上下我是自己走的，道路熟悉以后我就不要独轮车送了。因为天气因素不是每个星期都可以回家的，在寒暑假就一直在家了。　小孩子是喜欢玩的。那时我玩什么呢？除了我在晚上“演出”皮影戏有邻居小朋友光临外，我很少参加同龄孩子的室外游戏。我好静不好动，这可能与近邻都是女孩子以及我是在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有关。

忘记是在哪年假期，阿旺生了一窝小狗，我好疼爱那一天天长大的小生灵。哪里知道等到开学以后我星期天回家，就留下条白狗“守义”，其他的都送别人了。我伤心得很，还哭了一场。

那时在我意识中认为在外面野还不如看书好。那些“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封神七侠五义”、“征东征西平南扫北”什么的我都是在假期中读光的。我五伯伯家的两个表姐当时在长沙城读初、高中，使我有机会读一些时新的报纸杂志和中外小说。还看了不少现在连书名都想不起来的“杂书”。只记得在四八年寒假我借了本好厚好厚的小说《野兽野兽野兽》，大家认为不是我那个年龄小孩子看的，都笑我：你捧得动呀，你是在蛇吞象啊。

我看书的速度快，姐姐说我是“囫囵吞枣”，大人评价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虽然如此，假期的读书还是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

父亲在外做事，就是星期天也只能偶尔遇到。到寒暑假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他总是告诫我要珍惜少年时光发愤读书，说他幼年时他和姑妈是我祖母教读三字经千字文发蒙，小时比较宽松，后来祖父抽空选授了一些四书五经和督促练字，如果背不出或没写好是要罚站打手板的。他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人生学无止境，在少年时节要“打好底子”才有“本钱”能够在今后看得懂书。

父亲指导我学习的事，还能够回忆起来的很少。

他常要我多读《古文观止》，说里面有不少文章可以启迪心智陶冶性情，偶尔他还随口吟颂一些段落。还要我多练字，说没一手好字今后在社会上要“涉格”的。我原先是临摹姐姐的柳贴，后来感觉颜体端庄就由柳改颜。由于贪玩（看书）又没有大人督促，所以我没勤奋地练过大字。“四九”以后学校不要求写大字，这样就越发生疏

了。

有一次我给叔祖父写拜年信，快写完时我呆在那里思索如何收尾，父亲过来看见了，就教我在后面写“为颂为祝”，我顿时感到前后就连贯了。

我在家里发现有本叫《训诂谐音》的发黄老书，其中内容让我莫名其妙。父亲告诉我这书是学讲官话的，是当年外出做官的必修课。

父亲对我在学校的成绩优秀和当选学生会主席一向是不置可否，倒是干预过我在学校的一件事。

那时学校每学期有一二次讲演比赛，我每次参加都得奖。我当选学生会主席以后又参加比赛得奖。父亲知道了就说：学生会是组织比赛的，参加讲演可以，但是不要参加评奖了。此后我就按照父亲说的做，参加讲演不进入评奖。

那时每逢暑假父亲便请一位前清秀才的伯祖父来讲书，听讲的有我姐姐和五伯伯家的静姐姐和三毛姐姐，果哥也跟着来，虽然是为姐姐们讲《孟子》的，但是我和他一直在听讲，尽管有些一知半解，但总吸收了一些养料。讲《古文观止》我和果哥是必须参加的，感到他没有我们老师讲得浅显生动。老人家那抑扬顿挫的官话吟诵虽然听不太清楚，但是感到十分有趣。

父亲虽然和五伯伯是母系血亲兄弟，又居住靠近，但他们往来并不多，偶尔见面我看见他和五伯伯也是就事论事，交谈显得平淡。不知道是否因为是五伯伯提携他进入警备司令部又一直是五伯伯的下属，或者是他俩性格和价值观有差异。那时我就看到五伯妈的衣着考究，对待下人颐指气使，感到她的言谈风度和我母亲大相径庭。

三伯伯是住在长沙城的，他在高桥有茶场，回白石塬看望有时是住我家的，三伯伯很喜欢我和姐姐，说我文静会读书，姐姐贤惠。每逢三伯伯来全家都很高兴，父母和他交谈热烈又亲切。

静姐姐那时读高中了，她有些大小姐的做派，是不怎么来我家的。三毛姐姐是五伯伯和静姐姐的奶妈生养的，当时连我也知道，想必她是清楚内情的。她在假期常上我家玩，母亲和姐姐都很疼她。三毛姐姐对我很亲热，可能是我好静，她总叫我妹子。“四九”以后她随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七年初我和她还有信件往来，至今还记得地址：长春斯大林大街二段XXXX号信箱。遗憾的是那时她还没寻找到生母。

果哥和我同年又是同学，都“会读书”。两表兄弟在学校包下了头两名，一时传为佳话。他也和我一样好静，一起探讨过用算术方法破解当时流行“鸡兔同笼”；在假期除了他上我家来听讲书，一起玩耍的记忆很少。都没逃过“反右”这一关，三毛姐姐和果哥在1957年之后就与我失去书信联系。果哥在后面还有叙述。

我自幼没娇生惯养，父母对我平时的语言行为常有指点，要求严格。虽然我在学校始终是头两名，父亲不置可

否，母亲也没有赞扬过，还说我读书不用功，只是凭记性好些。常用“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来警告我（这一警句我至今不知母亲出自何典。）

十岁的我就住校读书两年，母亲只去过学校两次，一次是送我入学，在翻山坡时妈妈就叫我下车自己走。另一次是听说我得了红眼病来接我回去的，在家用草药煮鸡蛋，剖开拿去蛋黄贴在眼睛上面，治疗几次就痊愈了。

此时镇叔已经去南岳国立师范大学，毛姑在靠近我家的达德中学读书，星期天就回白石塬。她在学校传染了乡下人叫做“闹疮”的皮肤病，母亲就用猪大肠洗净加草药煮汤给她洗澡，几次就好了，乡下土方的疗效有时真出人意外。

母亲知道些中药的药理，常用一些中药放猪肚子或鸡腹腔内清蒸之后再切块煮沸，这药膳香甜鲜齐备，姐姐后来继承了这操作方法，多年耳濡目染使我也知道一点中医药的知识。

这里顺带留下点史料：当时在城在乡我都看见中药的包装纸上印有简单说明该药的状、味、效的文字，母亲有点中药知识，我估计是在蒲府奠定了兴趣，后来通过这些包装纸和使用实践得到提高。

父亲的胞妹是嫁给姐姐生母的堂弟的。姑父母去世的早，在一师附小时大我八岁的表哥郁文是住过我家的，记得他偷着抽烟被父亲狠狠地打过。沦陷期间他没和我们一起，可能是“开后门”去了三伯伯的遗族学校读书。

1947年初的寒冬腊月他来到白石塬和我们一起过年。多年未见感觉他真正是大人了，郁哥那时在中央军校，一身戎装身板笔直，相貌神态很像我父亲。

“新年发笔”平常是用一般红纸，那次父亲是在洒金红上写了“俯仰无愧”和“事预则立”给郁哥，随后告诫我们这是做人做事要永远要铭刻在心的圣贤之言。父亲那颜中有柳的大字，我至今印象深刻。

在郁哥离开的前夕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今后要“以直待人”。说了些郁哥和姐姐都知道的往事：凡能用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一时犯错的“冤家对头”的人，以后都获得大家的赞赏和尊重。相反，在遇到“对头的”有难就落井下石的人，此后都让亲友鄙视和对他有戒备。为人要正直，对事不对人。虽然我因年幼不知道这些亲友往事的“典故”，但这些话在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灵之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在1949年初，郁哥来去匆匆住了一夜。他马上要随部队去台湾，是特地来辞行的。当夜我们姐弟都在一起和他话别，母亲针对郁哥争强好胜的脾气，告勉他今后待人要将心比心；父亲说世事如棋，人心难测。以他的体验教育我们：诚信为立身之本，可以不变应万变。（我1993年给在英国留学次子的信中还引用了）。

次日一早，我们一家送他，走到小溪的桥边时他恳请止步，再次庄重地向舅父母叩头告别。

母亲后来常想念郁哥，说他机灵聪明，就是太争强好胜，如果没死在战场他必然发达。作为血亲兄弟在后面还

有关于他的叙述。

父亲任乡长后廖叔叔长住乡公所。杨吉昌平时虽住乡公所但常和父亲一同回来，他的换季衣物仍然是母亲在操心的。记得母亲曾向父亲谈论过他的婚事，父亲说现在的时局不必考虑，要解决也等到以后回城再说。

记忆仍然清晰的是：我读六年级的一个星期天，他特地弯回来看我。那天他背了支步枪，易妈打趣他：杨班长你峨是背只吹火筒回来哒，借颏的枪咳冒还把你啊。他们共事多年，过去他身上一直是双枪二十响。大家说笑了一番。

等到我下次回家就没看见易妈在，母亲说她儿子毕业以后三伯伯已经推荐去做事了，易妈当然要回去料理他的生活。没能给易妈送行，当时我心中好难过。

2.4　假期生活（下）

读高小的我，已经不是一般的“黄口小儿”了，有时也和父母交流。有时来了客人，父母也不阻止我一边旁听，这样我就知道了更多的社会事物。

父亲为人刚正不阿，一生坚守淡泊，从来没有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

我在家时遇到过父亲对待有些衣冠楚楚的不速之客，他言语不多，只是有事说事。我的印象中他没有虚与委蛇的“朋友”。

父亲一向平易近人，卸任乡长后乡邻来串门的更加多了，他在二次会战时期就和乡邻熟悉，杨九爷兄弟和刘四爷是常客。说起当年他深夜单身“捉鬼”的往事，他说人世间哪里有鬼，那时半夜去尖叫的人也知道这是多年尸骨的磷火，他装神弄鬼可能是别有用心，他深夜去看又朝天打了一枪，算是警告。

父亲平时虽不苟言笑，但在熟识的友人之间他也不失风趣幽默，总是很随便的和乡邻聊天说笑。记得有次他向抱支短把子水烟袋来的乡邻要让他吸一口，那乡邻说要呛人的“你恰不得”，我爹爹说：我“恰不得”是舍不得你里面灌的人参汤么。有人开玩笑说灌的是尿吧，在座乡邻一致大笑。

那时乡邻聚集“扯谈”总有一些炒蚕豆和红薯片之类的小点心，喝茶是各自一杯，如果是喝酒就仅用一大杯周转着轮流喝，这样的习俗显得亲密和谐。

1947年父亲和他三位好友拍了合影，照片上面的题词我至今记得：“吾侪共谊，二十有年，志同道合，心无二言。”其中一位孙伯伯离开我家很远见面少；合影里面的易吟陶伯伯是大学生西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他窝居

乡间。易伯伯和另外一位余考三伯伯住金井镇附近，离开我家没几里路，父亲和他们常有往来。

父亲一直保持军人风范，便服如农而腰身挺直，声音洪亮又性情开朗，每和他们聚会总是十分高兴，聊起来海阔天空，我在家也不必回避。记得那时他们说过如果谭嗣同当时去了日本使馆避难又将如何如何，说中山先生如果晚死十年又将如何如何，如果当年没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又将如何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他们谈论这些依然兴趣盎然；古今逸事纵横捭阖，时局动向各抒己见，从而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是我以后爱好历史的诱因之一。

有时他们也说些逸闻趣事，有个故事我记忆深刻，后来一再传播，现记述如下：

一中药房的坐堂郎中一天遇到个年轻人搀扶位老者来求诊，郎中望闻问切之后了解到这对父子是从江西到长沙投亲未遇又盘缠花光，父亲心急如焚而致病；郎中明白原委立即处方：枣仁若干南枣若干生地若干人参若干附子若干当归若干熟地若干。在方子的后面写了“一服即付”。

这个方子拿上柜台以后，众拣药师都茫然无法操作，因为完全不符中医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不像是个治病的方子，更加不明白什么是“一服即付”。

后来有个才满师的拣药师接下方子，仔细端详之后并没拣药，而是算盘噼里啪啦地一算，就拿了十两银子给年轻人，说先生要你们父子立即回家去。柜台上其他拣药师吓得说你疯了，怎么不拣药倒付十两银子给他们。年轻拣药师解释说这是先生在方子里面说的，既然找人难找在生地人生父子当归熟地。而且枣仁若干南枣若干生地若干人参若干附子若干当归若干熟地若干，这一贴药算下来正好是十两银子，先生关照“一服即付”我是遵照先生的吩咐就付十两银子给他们。

坐堂郎中是这药房的老板，他听到年轻拣药师的解答之后对众拣药师说我正是这个意思，后生可畏啊。老板不久就任命这个才满师的年轻拣药师当了药房掌柜，后来还将独生女许配给他。

易吟陶伯伯虽然自己是西医但在1948年底因病去世，余考三伯伯则在湖南和平解决之后马上担任了金井镇的汽车站站长，那时我才知道余考三伯伯是潜在乡间的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父亲是参加过左翼团体的青年军人，二十余年前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挚友，那么大学生西医的易吟陶伯伯之所以窝居乡间，今天我分析完全可能是政治原因了。

有位抗战外出当兵的族人内战被俘，在1948年释放回到白石塬；他辈分高我叫二叔公，他的大哥不肯让出房间让他居住，二叔公就请我父亲评理；我父亲认为他外出当兵时并没分家，祖屋是共同财产，二叔公有权居住。一叔公就是不同意，说他一家人住满了腾不出房间。再三劝告仍然不听，后来二叔公只好让步去租屋居住。哪知这一正常的调解一叔公后来仍耿耿于怀。

不久易伯伯和余伯伯来串门，父亲和他们说起二叔公回来谈到“共区”拿自己印的票子收缴法币的事情，他们

说这边加紧印新票子，那边又哄进来大量旧票子，物价不起飞才怪呢。

下面摘录我在网搜索到的《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与法币是怎样兑换的》中的一段：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搜索到的相关资料不少，单这一处就证实他们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学校听同学说我父亲外出办事中途打尖和抬轿子的在一个桌子吃饭，在当地的上层社会一时传为笑话，我同学中有不少是这些人的少爷小姐。我问父亲是否有此事，他回答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是分开桌子吃饭那就不是我了。随后又说些职业不同人格平等的道理。

父亲出身在一个没落的文人家庭，从小就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教育，家道败落他自幼就体验到世态炎凉，境况使他自幼在平民之中成长，即使稍有发达，自然是能够保持平等待人的心态。

那时的乡属地广阔，管辖高桥金井两个市镇，乡公所靠近金井，离开白石塬大约五华里，他平时回家一直是步行的，即使办事也多数是步行。之所以有时坐轿子是受当时的礼仪约束，如果他步行去拜望一位有身份的长辈或名望乡绅，人家会认为这是不恭。

我在前面说到“独轮车或者轿子是当天返回的，不至于造成主人家的住宿和礼仪方面的压力”。这不单纯是个安排住宿困难的事。那时的乡间封建的等级意识仍然浓厚，怎么安排轿夫的食和住当时是有礼仪规范的。在比较开明的人家，分开吃饭感到于心不安，在一起又于礼不合。

那时乡下流行一种叫做“瓢把子姑姑”的“扶乩”活动，是在水瓢的把子上捆绑一根筷子，由一位据说是不识字的女性“请神”之后，就拿水瓢在盛有大米的木盆上移动，出现一些痕迹由在场的人去识别为文字。一次有客人来谈到扶乩出现有“朱毛亡沽口”，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打仗的事神仙也管不过来啊，若问战事，要看民生。当时我还不太理解，1949年过年不久住在长沙城以后，以我的所见所闻才明白那时父亲是已经明白到人心向背决定未来。

少年的我已经受到科学的熏陶，曾经去邻家看过“师公赶鬼”。法师在病人房间内不知所云地大声叫喊，手舞足蹈地焚烧符咒，室内乌烟瘴气我都闷出了一身汗。回家以后我的评论是装神弄鬼愚昧无知。父母告诫我：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千万不要去冒犯人家。

关于鬼，我曾多次问过父母。

父亲不相信有什么鬼。也不相信那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但是他说那些“姑姑扶乩”、“师公赶鬼”是人家的职业，和佛、道是两回事，佛、道是劝人心向善的，神灵亦无亦有，神灵佑公道，公道在人心。为人行事要向善屏恶，心安才平安。母亲听说某人戴了只大金戒指防“点打”（民间传言的点穴术），父亲说：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看来他是做过亏心事了。

父亲说：敬“天地君亲师”和祖宗的牌位也不是什么迷信，是表达敬仰和怀念。他一再告诫我，看见那些迷信活动也要尊重他人，不要指指点点乱发议论（我读初中在天主堂拿了圣经做集邮册，父亲见了狠狠地训我说这是亵渎神灵要犯众怒的）。

母亲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拜菩萨是心诚则灵。抬头三尺有神灵，做事要凭天地良心。

那时有些我不熟悉的亲戚来走动，母亲总是热情接待。对家境不好的亲戚，妈妈嘱咐我们姐弟待他们礼数要更加周到，往往在临行时赠送点东西，父亲回来听说总是连声称赞母亲。

我自幼的印象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姐姐也和我是一样的看法。

父母的成长经历以及教育熏陶差别不大，自然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待人接物理念相同，处理事务往往不谋而合。父亲是举重若轻不谋细事的人，母亲也任劳任怨从不唠叨，一直相处融洽。

唯一的一次吵闹是发生在我五年级寒假。父亲有位在乡公所任庶务的同事住在紧邻我家的“杨合盛”，他的妻子难产父亲在那里帮忙到半夜才回来，母亲觉得一个男人怎么去帮忙难产，父亲认为邻居有难帮忙是理所当然，何况是自己的下属更责无旁贷。两人各执一词愈演愈烈的争吵起来。父亲说母亲是无理取闹而大发脾气，是姐姐请五伯伯过来才平息了。多年以后姐弟回忆当年的事都认为妈妈那时是敏感过头了。

父亲“失踪”遇难母亲才三十七岁，但她坚守一生，始终和我们姐弟相依为命。

父亲有位年轻时的朋友王子科在胜利之后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南省署”的主任，父亲进城办事就在他那里带了一些小桶包装美国“汤粉”回来，是有土豆、大葱和牛肉混合成为即泡即食的粉料，据说是剩余的军用物资，味道不错。但是这些救济物资没看见在乡下发放，而我后来在王子科公馆看到有不少橄榄形大木桶是装美国汤粉的。战后常听到斥责发国难财的，我也义愤填膺，当时目睹这些大木桶也不禁唏嘘。

过继出去的叔叔在父亲卸任乡长后不久，带菊姐姐来我家拜望；他要借用父亲的军校证件去“跑广州”谋生（当时是在广州购进香港时髦洋货到长沙城转卖），他和父亲是同胞兄弟在照片上看不出多少相貌差别，有父亲的证件就可以应付沿途的检查，父母没有拒绝。少年气盛的我当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对父亲的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我是深信不疑的。作为一个多年军政首长的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身无积蓄”。我多次听到过别人这样评论父

亲，而且亲身的生活感受也知道家里的确是没钱（菊姐1949年即随夫去东北工作，姐夫是李维汉的亲侄）。

2.5　乡间的衣食住行医娱

衣：

那时农家纺织的“家机大布”相当厚实，另外一种叫“夏布”是麻线织的比较凉爽，是多数乡邻的日常服装。那时洋布比较贵，一般乡邻只在“出客”时才穿洋布衣服，在夏季不少是穿夏布服装。

一般乡邻平常是“短打扮”，冬季一般没大衣但有乡邻穿棉长衫的。有些在外面读书的学生常穿皮鞋或球鞋下着西装裤外套长衫，这样的打扮那时是习以为常的。一到过年乡邻的打扮都整洁。在乡下五年当然知道有贫富分化，但我没有看见过像后来的影视剧里那样穿着破烂不堪的乡邻。

我们全家的衣着基本无异乡邻。这不单是入乡随俗或者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主要是父母一贯的勤俭朴实和平易近人的情操。那时湖南冬天是很寒冷的，父母的皮袍子是祖父母的遗物，平常穿的都是战前的衣服。记得在1947年暑假才看见父亲做了套派力司中山装进城穿。

母亲在乡下没有添过新外衣，只看见她在夏天穿过件旧的香云纱短袖衫，其余的衣着和发式都是入乡随俗。她战前的衣服除了有姐姐能穿的之外，还有些收藏在箱子里。

姐姐处于青春发育期，衣服必然常有更新，做过些质地好的花布旗袍，其中有一件短袖浅蓝夏装有很长的翠竹斜贯全身，十分好看，我至今记忆清晰。也给我做过洋布学生装，对姐姐往日的衣服能改的我也安之若素的穿去学校。但在那时我我不愿穿新衣服，感觉太新颖显眼，要清洗过以后我才肯穿。

我们全家都用家机大布添置冬季内衣，用夏布做蚊帐或夏衫。

那时全家的冬季袜子和乡邻一样，是先“上底”的，这样可以延长穿着时间。我是难得买双春秋袜子的，是妈妈和姐姐穿过的春秋袜子的袜底烂得无法再补妈妈就剪去袜底掉个头来缝给我穿。这个“掉个头”的方法让我在十几年以后的右派劳教工厂里将破旧的汗衫、背心改内裤发挥到了极致。

食：

战时的乡间除了食盐日常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喂猪养鱼和养鸡鸭生蛋，当地气温四季有新鲜蔬菜，终年有剁辣椒和泡菜，冬天腌制腊肉、鱼、鸡；做甜酒酿和用酒糟腌糟鱼，在红薯洞发酵做腐乳和腊八豆，逢年过节还将大米磨细调浆放在盘子里蒸米粉，将红薯去皮煮烂糅合成块晾干以后可以切成片或条状，油炸或沙炒都很香甜，自制兰花豆和芝麻豆子糖等点心，乡间生活自有一番风味。

当时乡间请客吃饭一般“八大碗”和他乡无异，稍微正式的宴请是以主菜采用海味的不同来命名为蛏干席、海参席、鱼翅席等等。但在乡间五年，我这个小孩子没上过这些酒席。

前面说到那个留霞湾富户的老太太，她的孙子（听说现在台湾）和我同学又是我表伯的族亲，我假期去玩，老太太总要她的孙子陪我和她一同吃饭。老太太的饭菜是送到她卧室的，一个红漆托盘盛放有九个小碗，总有盐菜蒸肉和蛏干炖蛋以及香菇鸡汤这些落口消溶适合老人口味的菜，其他菜蔬做得也十分精致，和那时相当简单的乡民日常饮食比较，真是天壤之别，少年的我当时也不无感慨。

我家后来虽然不种田喂猪了，但仍然种菜和养鸡鸭，日常生活和乡邻差不多。当地农民不吃牛肉，母亲知道以后我家也不再吃了。我问母亲这算什么风俗。妈妈说牛耕田才有谷，牛拖碾才出米。是牛养了人呀，再吃它的肉于心何忍。说这样的风俗使人心向善，很有道理。

我家那时偶尔才有一次我十分喜欢吃的红烧肉，在平时只有几片腊肉的小荤菜。常吃石灰水蒸蛋，不仅味道鲜美，成年后我的骨骼强健，应该是有补钙效果。

我喜欢吃妈妈用全鸡和猪肚子做的药膳，还有“谷芽子粑粑”和“荞麦粑粑”，到夏天我家学会了用“凉果籽”做凉粉，这些美味我至今仍然有记忆。

抗战期间还有两件值得纪录的事。一是因为禁运乡下食盐紧张，我家也买过铲下尿桶霜熬制的“硝盐”。二是买不到钢笔墨水就用丝瓜叶子搓揉压榨过滤，写出来的字是淡绿色。

住：

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白石塬的几处房屋的格局，其他乡邻的房屋形式基本上和毛泽东先生的韶山故居差不多，只不过有大小和新旧程度不同而已。不少人去过或者看见过照片，这里就不再赘述。

当时乡民造屋基本是采用土坯，建造房屋互助精神很好，近邻以及亲友都来帮工，一些近亲赠送杉木一看就知道，因为在上面有红纸或红布条。那里气候湿润，山上郁郁葱葱，一些小灌木年复一年的生长，是乡民的生活燃料。杉木和枞树也无须人工种植是掉下的种子天然生成。

行：

在前面说过轿子，那可不是个单纯的力气活，在山区抬轿子是需要有相当技巧的，父亲必须是轿子出行总是请杨九爷去请抬轿里手的。

独轮车有两种，一种轮径小适合运输物资；一种轮径比较大是载人的，在前面还有个小轮子方便通过道路缺

口，在车面上有尺余高的的栏杆遮档了车轮，既保证了安全又可以作为乘客扶手和绑扎物件。推载人的独轮车必须掌握好平衡，同样是需要技巧的。一般乡邻的老人和小孩子出行常有坐独轮车的。远行当然是去汽车站搭班车，那时是车旧路况差，常常半路抛锚。

医：

那时乡间一般小病多数是采用“单方”自医。慢性病有请走方郎中或者是去有名的郎中先生那里求治的。白石塬的乡邻很少有请师公赶鬼的，倒是有一种“收赫”，认为是小孩子被鬼吓了致病要收回魂魄，仪式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拿碗大米念念有词然后将火红的“灶心土”浸到红糖生姜水里面让孩子喝下去。“收赫”没有专门的职业人，乡下不少人都会，是“业余级”的法术。父亲说这是个发汗的方法，碰巧是能够有效果的。

那时母亲也用从乡邻学来的行之有效的“单方”，比如给我医治眼睛。但在我家有常备药品，中药西药都有，中药是“四磨汤”，是四种棒状名贵药材，在个磁钵轮流用水磨，对一般小儿疾病确实有疗效，磨去了一半的四段药材“文革”前还在，我妈妈还给孙子使用过。四种药材的名称忘记了，好像还有一段在。另外是“八卦丹”，“诸葛行军散”和云南白药、十滴水等一般成人常备药。

常备西药除了碘酒红药水之类还有些我忘记了名称的外用药膏和锡纸小包装的“柠檬粉”，这个很酸的药粉对于一般头疼脑热致效很快。

娱：

那时的乡间也玩西式的扑克牌了，但是多数人是玩一种叫“跑符子”的纸牌，也有打麻将的，但是在我家从来没有过这些娱乐活动。“杨合盛”有个大院子可以唱皮影戏，因为演出是晚上，姐姐陪我去看过。我的兴趣是去后台，看到他们用那么多的杆子操作，感到我做的那些皮影戏人物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而已。

后来相当有名的湖南花鼓戏我从来没看过，可能是那里观众太少没票房价值，主要原因我到后来才知道那时是认为花鼓戏内容淫荡，当局明令禁演的。

“杨合盛”范老板店铺柜台外边有两张桌子，我常见有乡邻在喝茶说笑，父亲有空也去过参与聊天，那里也算是乡间的公共休闲场所。

在乡下当时有上门打渔鼓唱道情的，有的是乞丐，也有是流动卖艺的，有时来到我家，妈妈从来不去分辨他们身份，说来的就是客，总是泡芝麻豆子茶招待（在当时这是待稀客的礼节），弹唱完了就打一升米送客。

聚集“扯谈”，是乡邻乐意的消遣方式。不论父亲在不在家，都常有乡邻到我家来聊天，但是我家那些富室亲友我从没见有过在座的，可以说是“谈笑尽乡农，往来无浑丁”。所谓无“浑”丁是我从来没听到过不三不四的谈

论和粗鲁的语言，在一旁听了也让我增长见识愉悦性情。我在幼年和少年时期都有良好的家庭和社会语言环境，因此我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国骂”或什么地方版的“三字经”出口。

当时的乡邻聊天往往谈论政府告示，都是朗朗上口的句子，我记得开头总是“照得”；其中一个还有部分记忆：“照得久旱无雨，谨防来年春荒，有备才能无患，严禁煮酒熬糖……”曾经听乡邻说了个看告示的笑话，我成年之后辗转南北都曾多次转述：

一群人聚集在看官府告示，有位仁兄看见身边有个啃萝卜的也在观看，这位仁兄知道他是文盲，就装模作样地朗读起来：“长沙县政府，禁止啃萝卜，”这个啃萝卜的听了马上就藏起了，这位仁兄继续朗读：“藏起打一百”，啃萝卜的听说马上就丢了，这位仁兄再朗读：“藏起打一百，丢打一百五。”啃萝卜的听到马上就逃之夭夭，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那时都有尿桶，在谁家“扯谈”，乡邻要方便时总是风趣的说“还茶钱”。

近年有网友问我关于当年“抓壮丁”的事，附带说明一下。

我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抓”壮丁。但是我知道当年的“买壮丁”。

那时征兵是抽签，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怕去当兵的也有想去当兵的（湖南不少乡民认为当兵是条出路）。于是怕去当兵的就花钱买想去当兵的顶替。这在当时是半公开进行而且当局也默认的（史料记载在1948年程潜下令湖南停止征兵）。

2.6 进城观感

四个寒暑假经历了不少事情，有些就不叙述了，下面讲讲我进城的观感。

白石塬离开长沙城约120公里，要步行到高桥搭汽车，我是很难得进城玩的。留下记忆的有三次。

一次是在五年级暑假，是母亲带我去的。住在前面说到的父亲年轻时的朋友王子科的公馆。王有位姨太太艺名曾福佩，是当时的湘剧名旦，她原姓同我家，因此我叫佩姑。她和大太太各住一边，我们是留宿在佩姑那边，但母亲总是带我去向大太太问安的。

王公馆中间有个很大的院子，看见大太太的少爷小姐在那里骑自行车，作为乡下孩子我相当好奇地靠近观看，很礼貌地以哥姐招呼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不仅没有回应而且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我瞟过藐视的目光。

回去以后我告诉姐姐，姐姐说这些暴发户子弟就这个德行。我们靠本事吃饭有品行做人。这给我幼小的心灵又

上了一课。（注：王子科的襟兄是湖南省民政厅长，靠这个关系他才有“善后救济总署湖南省署”主任的肥缺）。

再一次进城是和父母一起去的。在父亲一位朋友家午餐，父亲好像和主人夫妇相当熟悉，谈话用餐都不怎么拘礼。我十分奇怪在蚊帐上有一些彩色小块花布，回来之后问母亲，妈妈告诉我那是县党部书记家，你爹爹年轻时就认识他们夫妇的，他太太原来是共产党，蚊帐是夏天收藏被老鼠啃了用小块花布补洞的。

后来我知道在大革命起始长沙就有庞大的由学生和青年军人、店员、手工业者构成的左翼青年群，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分别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在当时一致拥护北伐，盼望国家统一富强，不分彼此一起参加活动。在“马日事变”之后，当时的恋人有各奔前程的，也有不舍分离宁愿放弃自己的组织跟随对方的。我父亲当时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军人，但是在此后的岁月他对待当年的挚友一直是情感依旧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1948年初我和父母一同进城拜年，父母带我去当时已开放为公园的天心阁，我看见有三尺高的矮汉子在收门票，从游人的议论中我知道这是买来婴儿放在坛子里面喂养逐步换坛子到发育成熟的。我听得毛骨悚然，说这是惨无人道我再也不去天心阁玩了，父母当时赞许了我。

随后又跟父亲去“青年会”（当时长沙最豪华的新式餐饮娱乐场所）参加一个新式宴会。那时我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父亲特意提前带我进去游玩，进门有卫兵查看请柬和证件让我很惊讶；父亲带我四处走动，时而发现有流动卫兵。当我看见有人正在清洗一批当中有洞的雪亮的台子，我问这是做什么用的，他没有回答而且马上就带我出去了。我一再追问，父亲总是他言搪塞，使我更加诧异。后来到处请教才有人告诉我那个有洞的台子是吃猴脑席用的。

当天出席团拜宴会的都是湖南当时的军政要人，对某些人来说这正是在儿子面前炫耀自己地位的机会，父亲当然没这样的低级趣味。一向性情开朗的父亲，这次为什么对我支支吾吾？后来我知道父亲是因资历厚重又委屈乡间，是有故旧要人的提携他才获得破例邀请。他宁肯放弃这样一个可以会晤到那些有权力改变他处境的老上司和一些身居要职故旧好友的机会，也不愿让那样残酷的血腥场面来戕害自己儿子的心灵。

1999年姐姐告诉我，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省府要人推荐他回城做事，而且仍然是团级，但是是当别人的副手，后来爹爹考虑可能和他会性格不合才没有去。

2.7　准备升学

父亲在1948年秋乡长任期结束以后就离开了政界。我回来听说他和五伯伯吵架，一时沸沸扬扬。闹得我们表兄弟姐妹都不来往了。我一直没明白争吵的原因，是在1999年姐弟一起回忆往事时姐姐才告诉我当时是父亲在为她筹备出嫁。

原来姐姐在白石塬“迈群小学”教书的工资（稻谷）是存放在五伯伯那里的（他是地主每年要出售稻谷）；五伯伯是达德中学的校董，他说钱都投入了达德中学，现在达德拿不出来。父亲一生两袖清风，他的工资只够供给家用，素无积蓄。指望姐姐储蓄的工资置办嫁妆，现在一个血亲的表兄竟然说拿不出钱来。你说他急不急。

好在姐夫性情忠厚，为人朴实无华；他的祖母和我祖母同宗板仓杨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堂表兄弟，姐夫也就是堂表哥。姐夫是土木工程师，当时在南岳公路服务，婚后居住机关，姐夫不计较那些繁文缛节，于是在1949年元旦过后，姐姐就两只皮箱从俭出嫁了。

脱离政界之后父亲频繁往来于城乡之间。起先我不知道他是在忙什么。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蒋程虽然素来不和，但竞选失败仍需要安抚这位民国元老。下面摘录些人物ABC网《为湖南和平起义出谋献策的方叔章》文章中的片段史料：

“1948年7月,程潜回湘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方叔章闻讯从南京回到湖南,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两人接触更为频繁,程潜视方叔章为知己,无论公事私事,多与他商议。此时,战局已非常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程潜受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已有走和平起义道路之意。”“为稳定政局,应付事变,程潜采纳了方叔章等人的建议,利用蒋介石原先的承诺,在湖南组建了2个正规军共5个师,并加强了地方部队的建设,将原来的2个保安旅扩编为4个保安师。”

到1949年的寒假时我在家时看见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我家和他商讨什么，而且离开了好久的廖副官又回来了。一次有好几个人在客厅，我听到是在谈枪支的事情。随后我就问他，父亲庄重的说：你也算长大了，可以告诉你，颂公（程潜字颂云）见时局紧张，为了保住湖南不遭战火，在筹建部队保境安民。现在老长官命我做一些事情，你现在不要出去说。

下面再摘录些人物ABC网《师生长沙演“双簧”》文章中的片段史料：

“陈明仁来到长沙，首先拜见程潜。26年前，当陈明仁只身去程潜举办的讲武学校谋事的时候，还是身背青布包袱的小青年，可现在已是堂堂的兵团司令官了。他们闲话当年，感慨万千。当晚程潜为他设宴洗尘，席散之后两人秘密交谈。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程潜看了一看，淡然一笑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当即表示：“我知恩必报，这次回湖南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两人这次虽然交谈尚浅，但程潜至少摸到了陈明仁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之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明仁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很受感染，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设想国共平分秋色，在和平中保持自救的路子，已不大可能行得通了。”

不久陈明仁将军的部队驻守长沙，有陈明仁和他志同道合促成湖南和平解决，因此程潜就没必要再扩充部队，父亲进行的工作也就停止了。

父亲往来于城乡之间的同时也在筹划我家的搬迁和我的升学。

当时国立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资雄厚，管理严格，学生一律寄宿。不仅是名校，成绩优良的可以直接升大学本部，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免学费，但国师附中是十分难考的。我有住校读书的经历，父母认为我的成绩尚好，而且去那里读书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少许多，父母就确定我报考国师附中。

长沙城黄兴南路祖父遗留下来的崇文堂，当时是由叔祖父在经营刻字店，那是我家的祖业，三楼是空闲着可以居住，父亲就在进行清理和安排居家。

1949年一过元宵节，父亲就带我进城，哪里知道国师附中已经报名结束，父亲马上决定我去报考离开崇文堂比较近的长郡中学和妙高峰中学。长郡中学在晚清创立，是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一直是长沙最有名最难考的学校。长郡中学是以招生名额按照分数高低顺序录取的，结果我没考取。父亲打听到我只相差几分，就安慰我是因在路上晕车又进城生活不适应受到影响。但是我心中明白强中有强，我只是个偏居乡下孩子之中的佼佼者而已。当然我的成绩是轻松的录取在妙高峰中学了。

父亲带我看去三伯伯，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迁进城，三伯伯知道在崇文堂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我又有住校读书的经历，就叫父亲让我在妙高峰中学寄宿读书。因此我当时就没回乡下直接去妙高峰中学报到寄宿了。

进城读初中，我的人生进入了新的一页。

<u>写在中间</u>

童年和少年时期初稿写完了。今日回览做了些修改。想到十岁的我之所以将字帖由柳改颜，是看到父亲的书法、镇叔的钢笔字和国文郑老师的板书都如颜字一样的端正，感到好看，他们当时是我最亲近的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他们为人都刚正不阿，衣着朴素，不苟言笑，必然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那时我还没知道“字如其人”的说法，今天反思我的价值观和许多行为心态就是在换字帖时基本定型了。

少年时期写的比较多，长大了记事当然多一些。还有个重要的发现是，在心无旁骛进入回忆之中有如时光倒流，对往事场景有着拼图一般的连锁反应，例如爹爹给郁哥写“俯仰无愧”、“事预则立”的尺方一直是记忆清晰的，在回忆时想起是写在洒金红上，如是就想起了隔壁的范家铺子的许多事情，但又怎么也想不起当年我使用过什么货币，倒是连带想起了“挥子”，诸如此类的连锁记忆发掘出许多往事来。此外，我曾经答应过吃文字饭的朋友，如果我哪天写回忆录对“旧中国”的社会面貌笔墨要详尽些。少年时期的见闻写了不少，其中“乡间的衣食住

行医娱”是为此专门添加陈列的。感到我是尽力了，很抱歉的是，对许多我知道的不多和记忆不清晰的我不敢落笔，以免有差错贻误后人。

2011年2月24日

注：

“洒金红”是在质地较厚颜色较淡的红纸上有无规律的金色斑点。

老牛先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0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留痕】：

“文革”亲历“牛鬼蛇神”

1957年我正是“双十妙龄”，之前一年我在两处全国性的报刊发表了文章，可谓“风华正茂”，特别引人注目。那时我的的确确是拥护党的好孩子，所以在五七年春的风潮之中我什么都没有“鸣放”。哪里知道单位右派“指标”没达到，我“出身”不好又是大可警猴的“特优鸡”，所以在“反右”之后的十月“补”到一顶“帽子”。从此以后“运动场上显身手”的故事多多。

到“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是在劫难逃。一九六七年夏天在对我的批斗会上，我上台“坦白交代”开口第一句：“诸位”，引起哄堂大笑，主持人马上训斥“不老实”；接着的一阵口号后，我又重新开始：“诸位，是因为我不能称诸位为同志呀……”又是一阵更加激烈的哄堂大笑。还好，主持人事先关照了不许我“交代”当年的“具体罪行”，——因为当年在“反右”之后的10月领导号召职工写大字报帮助“整改”，我的大字报说的是：计件工资六个月修改工时定额就“剃光头”（即按照最快速度制定新计件工时），使工人无休止的增加劳动强度“不是社会主义对待工人应有的态度”。在当时我大字报内容是批判不得的——所以“批斗会”很快通过。

当时的“程序”是会后即要去“游街”。此时一位叫WX的青工气势汹汹冲上来包棕子似的密密麻麻有板有眼地捆绑我，我顿时奇怪怎么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痛苦，原来在贴近肩背手腕部位时其实是松散的；心中实在感到好笑，因为在刚才批判我的“新罪行”中就有一条“拉拢迷惑青年”。此时我心领神会装成很痛苦的样子，“老老实实”的我被浩浩荡荡的簇拥着上街了，WX一直在后面像耍猴人一样牵着绳子（他怕露馅呀。其实我与他接近并不多。他是孤儿，家庭贫困还要抚养一个妹妹，某些人嫌他有些“流里流气”，我平常和他并不亲近，但一直是以正常的心态对待他，谁知只有小学毕业的他却读懂了我的心灵），一路上我心中充满“人生如戏”的感觉。这样一来我伪装了一阵子后就忘乎所以，一不留神就忘了假面具四下张望，甚至按捺不住露出一丝微笑看着那些沿街“欢迎”我的人群……

几天之后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同学，他满脸庄重地对我说：看你游街都嬉皮笑脸的，太不老实了，你那昂首挺胸若无其事的样子是在对抗，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我唯唯喏喏地谢了。回家后腹拟（那时不敢在纸上留痕）了四

句：

前呼后拥好风光　心无疚愧首自昂我叹泥娃难敌雨　吾兄应识高锰钢我这位同学是搞炼钢工艺的，对高锰钢冶炼很有研究，曾经被专门派去支援关外的兄弟工厂开发高锰钢道岔。所以我自然而然的为他老兄摆出了“高锰钢”。高锰钢的性能特点是它初始硬度并不高，但受到压力后它的表层硬度是越压越硬，内在强度也相应越高。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几年后我这位同学支援三线到了四川，不久那里清查“五一六”搞到他头上了。他只是一个“走读生”——就是不关起来可以每天回家的“审查对象”。哪里知道他连这一点毛毛雨也受不住，竟悬梁自尽了，呜呼哀哉！

当时我拟这句“我叹泥娃难敌雨”时并不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丝毫没有想过与他的未来有什么关联，谁知道竟然会有此结果。以前听说过有“诗谶”，我这称不上是诗，哪里知道这个“谶”字，却不幸而言中了。

“报应” 那天“游街”的总指挥是当时单位“红联”头头之一，出发时我叫他：“YX，不要经过我家门口惊吓了孩子。”当时他满口答应：有数有数。牵绳子的WX和在旁边的同事都报以欣慰的微笑。

哪里知道上街之后有许多繁华路线他不走，偏偏去经过我家门口，而且还停下来口号一番。知情人都背后谴责这赤佬不是个东西。

换作别人倒也罢了，唯有他真正使人恶心。因为当时倡导技术革新，他买了本《青工技术革新入门》，其中有许多他看不懂，一直来问我，我总是深入浅出讲解机械原理和不厌其烦地教他计算，那时的他对我不无崇拜恭敬有加，算得上是我的学生。

到1971年初我戏剧性的“解放”马上又光荣地“上山下乡干革命”，到江苏最西南的高淳插队，没多久就奉命去县城创建工厂。起初频繁出差常州，遇到原来同事告诉我XYX在厂里很臭，不得人缘调到电话机厂了。说那赤佬终于遭到报应，他老婆遇到车祸、儿子心力衰竭死亡。我听了之后表示：他本身卑鄙猥劣和老婆孩子的不幸无关，仅仅是偶然吧。

可是没多久我又被告知，他在电话机厂偷盗铜条和配件被抓到，本来是要开除的，是派性保护才退赔记过了结。我对同事说，这是他那卑鄙小人本质决定的，不论在哪里他早晚都要出事的。

“四囚歌”20世纪60年代为了社会安定，不少工厂收纳些十六七岁的无业青年半工半读。“文革”期间流行“牛棚”，单位的“革命组织”赶潮流也象征性的搞了几天，就让这些半大的小子做看守。

我的为人和遭遇，历来受到一般群众的同情，我去那里以后顽强地进行技术革新，设计和亲手制作了不少设备和工艺装备减轻了劳动强度，更是受到他们的赞赏，因此在那“大风暴”之中一直受到他们的保护。

为了应景，我也去过“牛棚”小住。当时有五位入选，有两位是国民党员，其中一位在民国年间担任过火车站长，另一位去后方抗战在重庆军火仓库担任过保管员；有一位是参加过三青团的中学教师，另外一位是个所谓的地主婆。

在第一夜的开幕式上“小将”们训斥之后就将皮带在桌子上挥得劈啪响，然后在前面几位的臀部刷了两下子，眼见要打所谓地主婆的瞬间，我立马对为首的小将说她是做奶奶的年纪啊，他竟然住手没去抽那老太太；我说话都管用当然也不会对我怎么样了。

白天是正常上班的。我第二夜去是看“小将”们“审讯”那位参加过三青团的教师，这位是和自己的学生结婚的，而在其后也有不少花边故事。“小将”们的“审讯”就是想听桃色故事，皮带挥他交代如何勾引女生玩弄女人，他架不住抽就开始讲，此时我就叫他们不要抽了，而且诙谐的说：你们皮带劈啪响我都听不清楚了。

我知道这些小青年一向是尊敬我的，一直希望我去上课，所以我说话还管用。后来知道是有人在背后警告过他们不能碰我半个手指头。

我最后一次去“牛棚”是担任看守。当时有位“红五类”同事偷窃工厂物资被抓获而关押，晚上需要有人看守，我和那位在重庆军火仓库担任过保管员的伙计负责下半夜，“红五类”同事关锁在室内，我们在外面轮流驻守，天明我被嚎嚎的哭声惊醒，原来是那位“红五类”同事凿壁而去，我安慰这嚎嚎大哭的“难友”：不关事的，我们是在他们上锁封闭的室外，何况那空斗墙原先就有松动。果然后来也没拿他怎么地。而我呢，倒是收获了莲花落四句在腹中：

厂设囚牢本是稀以囚监守更加奇夜半新囚凿壁去天明急得老囚啼“高空拦网”在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小将”们是没碰过我半个手指头。但在当年我也曾被人“按”了一下。

当时的“程序”是“牛鬼蛇神”在游街之后必须早一些去上班，在门口排队示众“请罪”。我享受此待遇时已是当地风暴的中期，普及到所有单位。上下班路上挂着或者拎着牌子的“牛鬼蛇神“可谓络绎不绝，大胆的还相互嘲笑。演员们多数是无所谓了，观众也失去了新鲜感。我这个人昂首挺胸惯了，所谓示众请罪我多是漫不经心地站立，往往不仅没俯首低头，还时不时目送行人，众多革命群众也从来没计较过我。

但是有个叫CZK的技术员，我一向认为他相当聪明，作为中学生他担任技术员着实是有才干，我这个科班生到来以后就难免使他黯然失色，同事说他对我的心情是：既生瑜，何生亮。

有一天他见我端立平视，厉声嚷嚷“老实些“，不足一米六的他矮了我一个头，像拦网一样踮起来按一下我头顶，至今我仍然记得在他转身而去的那一刻我滑稽的对他报以微笑。

下班途中有同事告诉我，中午在食堂就有人议论我那莫名的一笑，许师傅还说了：CZK尬一记把自蚧哈得弗轻。许师傅是工会主席，翻译这方言是：CZK他这一下把自己打得不轻。

我欣逢盛世历经运动，但是被人动手一生也就只遇到这次高空拦网。近年听知情人说矮佬CZK晚景凄凉，我不感到奇怪，古人早说了，小人常戚戚。

2004年陆续发表发在《老三届》论坛和“群网”老牛先生主页

老牛先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0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留痕】：

难忘的小南门之辩

我进入初中是1949年初，正是湖南当局筹划和平解决的前夕，也是地下党在各校活动强而有力的时期。对现实产生不满的我，自然是热心的受众，成了“进步青年”，进步到在亲友中传播他们的宣传和教唱的歌“山那边呀好地方，麦苗美呀菜花香，你要吃饭来耕种，没人给你做牛羊……”。

后来考入铁路学校，学习和生活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我内心相当感激，认为只有掌握了真理的政党才能有这样的气魄去培育敌对阶层的子女。毕业分配到工厂以后我工作和学习都十分积极，可以说是党的乖宝宝。50年代初期物价平稳、社会安定，国家建设也突飞猛进，使我欢欣鼓舞，曾经就当时感想写过些五言句足以证明。

1957年春季的大鸣大放中我这个乖宝宝没片言只语。随后的“反右”斗争中就参加过一次在大礼堂右派批判大会，大会内容已经没有一点记忆了，只记得当时的批判大会的形式相当文雅，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比较有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铁路和地方关系好的很少，这个部属厂比常州市高一级，厂长是南下军管的师政委，而且是位党内高知，难免有些傲气，平日和市里几乎没往来。厂长爱才，“反右”时偌大的单位的确没抓几个右派，听说市里以反右不力准备打他右派了，在大连疗养的长征干部“二万五”书记匆匆赶回来调和，保住了厂长。他们在背后如何交涉外人当然一无所知。

在当年9月底，工厂动员群众写大字报“帮助整改”，虽然“反右”才不久，一般职工没有参与过“大鸣大放”和斗“右派”，对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提意见仍有不少；我所在车间的领导热情到送馒头、花卷给下班后在写大字报的职工。正在争取入团的我当然积极响应号召，一开始我就在车间贴了不少对工作方面的建议，但这些后来都没收入“材料”。

到11月风云突变，车间出现大字报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车间随即打印了我的几张大字报并加上按语发各班组进行“大辩论”。下面将收入“材料”的大字报以及经过逐一叙述。

“整改”运动开展不久，在厂部长廊就有大字报批评工厂新建的干部楼房和职工住宅的质量和面积差别太大，旁边马上有许多大字报响应，其中有些描写具体，诸如一家三代几口人，在唯一的二十平米卧室内已经有两张床了，只能向上发展搭建阁楼安排父母，形容是塞罐头、睡鸽子笼。随后厂部长廊又有大字报指名道姓批评住宅科长不仅是自己住干部楼，而且把属于一般职工的小姨妹连带入住。看见这些群众呼声，我当时“就地取材”在旁边帖了付对联“住高楼携小妹，自是风雅，如登西天极乐境；栖矮舍搁爹娘，可怜小民，犹进罐头鸽子笼。”不少熟识的同事看到我这对联都表示支持，对其工整也不无赞赏。在夸赞中少不更事的我有些飘然，看到车间有许多对审批合理化建议感到不公正的大字报，我就在半张纸上卖弄篆体写了“暗无天日”四个大字的横幅，后面小字是“日来见大字报批评合建不公的众多，同一合理化建议项目低等级先提而不用高等级后提则用者实不胜枚举，不知合建组诸公有愧于民否”。在打印材料中，“暗无天日”被诠释为“反党”铁证，是我的第一号罪状，批评住宅科长那付对联排第二。

排第三的是我在厂部长廊批评当时的副总工程师脱离群众。他原任我所在车间的主任，这位西南联大的高才生热心创新，参与试制铸钢气缸的技术实践，但作为一个千人车间的首长他不可能经常在场，就命我做好现场工艺纪录向他汇报，要求用图文整理好这些原始资料。

之所以向器重我的长辈写大字报，是车间团支部书记的有意启发：王主任升上去就难得看见他了，你也给厂部领导提提意见啊。提意见就提意见，随手写了几句应景文字，现在只记得有“深居相府乐不思蜀”这些轻飘幽默的话。但是后来却成为认定是“反党”的重磅炮弹。插入一段：那时我对厂部领导心怀感激，因为是他们的尽心尽力妻才能够调来。在1956年我和妻确定了的恋爱关系以后就请求和我关系很好的厂团委书记帮助将她调到我厂来，他活动了一番之后告诉我，人家夫妻关系还在等待解决，你不过是恋爱关系啊，结了婚再说吧。妻的父亲在劳改，供养母亲和妹妹她每月工资所剩无几，我工资比较多在一起又开销少，如果她调来是一举两得，于是我就在195 7年初办好结婚证明再次要求解决；哪里知道1957年铁道部决定全路“人事冻结”，任何单位不得增员。后来厂团委书记上下活动，动员一位技术员申请调回江西，通过人事付厂长和上饶铁路分局协商在双方不增员的情况下对调，这样就解决了妻的调来，我内心十分感激他们。

排在第四的是后来唯一收入“定案材料”的大字报，几十个字至今仍有记忆：

“计件工资六个月剃光头极不合理！

模具和装备的新旧程度以及季节不同对工效影响很大，拿半年之内的最快生产速度改为新工时定额，这样剃光头将使工人无休止地增加劳动强度，不是社会主义对待工人应有的态度。”

那时中午在俱乐部写大字报围观的师傅不少。“剃光头”是工人创造的形容词，这张大字报是一些老年师傅提出来要我写的；还有师傅提出写要求恢复发放寒碳费和年终双薪，这些是“旧中国”留下的福利制度，1955年就停

发年终双薪，寒碳费也在1956年停发。还有师傅提出改在车间“翻牌子”对路远的职工不公平希望有补贴——工厂自从1937年由吴淞迁来，所有单位上下班都是在小南门翻转自己的工号牌考勤的，而从小南门到我所在的车间步行正好是公交汽车的一站路——但是，对经济问题我一概不写。

加上按语的“材料”发到班组，不知道别的班组是怎样“辩论”的。我所在的班组有近三十人，师傅们发言的极少，作为党员的工长也只说说“嘎小宁聪明来兮有安骄傲是真的，看见领导有一安安不尊敬””（这小孩很聪明，有点骄傲是真的，看见领导有一点点不尊敬）这些无关痛痒的话。就工会组长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说我反这反那想破坏什么什么的，发言积极到口沫四溅（不是形容词，后来他因此入党）。我当场问那工会组长，高压配电间你能进去吗？他说不能。你说我想破坏什么什么的，我在电炉炼钢一年，上下班更衣和休息就在这里面，我没破坏你怎么去解释？——配电间保卫森严发生事故要影响到整个华东地区供电。我还问他，这些年你买了多少公债？料定你不到我的二成。班组年年剩下没完成的公债怎么会是你说的“仇恨新社会”的人来“包梢”呢？问得他哑口无言，反而引起师傅们交头接耳一阵骚动。

当时认购公债是作为任务下达到班组的，许多班组都完不成，我一直包下那些家庭负担重的师傅们的份额来完成班组任务。这是我所在的班组年年是厂级先进集体的原因之一。那时我收入不低又消费很少，我在银行没帐户，几年的积蓄全部是公债。当时车间S书记还有党委的理论教员常来班组旁听，眼见这样的班组“大辩论”是进行不下去了，马上就升级到车间大会批判。

车间大会批判之前S书记和我谈话，指着那“材料”说，你看看这上面有编号，组织对你负责，是不许外传以后要收回的。你只要虚心承认错误，认真检讨到群众满意就没事了。S书记和我平日关系不错——妻调来之后他还到我家祝贺一起午餐的，我对他说的“不许外传以后要收回的”有些感动，和在班组会上那带点玩世不恭甚至是盛气凌人的心态不同，谦和的对他说了自己的困惑，就是不知道是错在哪里我又怎么去检讨呢。

车间大会批判我照样据理力争，学生时期多次参加讲演比赛的我，面对听众从不怯场，我心无愧疚理直气壮的一一辩护，当年故事实在丰盛，等待今后细说，目前在抢时间，下面就拿我批驳头版的“暗无天日”举例吧。

在会上我背诵了“暗无天日”横幅后面的小字之后说，合理化建议低等级先提不采用高等级后提反而采用的事实在座都是知道的，请问这公道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是他们办事不公的“暗”遮“无”了明朗的天，这“合建组诸公”一个是戴反革命帽子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另外两个是国民党员，暗无天日我写篆字就是给他们看的，现在说我大字报在“反党”，如果这也算反党的话，那么请问，我反的是什么党？

那时车间办公室外四周和俱乐部大厅针对我的大字报也有许多，而且“火力”逐步升级，甚至拿同学间“校长”“上将”（这位同学他的上衣多数只有三粒纽扣）这些玩笑称呼上升到什么集团。后来大字报我懒得去看了，

在大会批判时听到些荒诞不经的发言我不由得心中暗笑。每每S书记和我谈话，总是批评我检查不认真而且态度极不严肃。我说比在班组我虚心许多了，已经检讨自己有自高自大、自命清高和承认自己存在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我实在没反党总不能检讨出反党吧。至于态度，会上那些活宝说的差一点让我笑出声来了，我怎么严肃得起来啊。我重述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发言，S书记和参与谈话的党委理论教员一时无话可说了。

一般群众在当时为了趋利（入团入党）避害（撇除牵累）而做“托”，荒诞不经地胡说几句，我心中一笑罢了。趋利的无咎无誉，避害的更是无可厚非，事后也没责怨过他们。可是，一个国家大型重点厂在开除布告上竟然说我年龄二十九岁，要在厂门口架机关枪扫射党员干部，荒诞到给我添了八年阳寿和发了挺机枪，事后听说我只能长叹一声笑不起来了。

眼看又进行不下去了，一直不怎么插话的党委理论教员有天约我晚上去小南门通行室“谈谈心”。虽然时近元旦，通行室休息间的炉火旺得我脱去外衣。理论教员态度和善的开导我只要检讨过关就没事了，对他的“帮助”我也礼貌的表示感谢。谈话中我又嘲笑那些荒诞不经的“揭发”，他说群众运动中出现一点不全面的看法不要过分计较，而思想改造对你是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必须尊重工人。我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毕业来厂报到有五个同学分配在化验室我分配在车间办公室。当时在协助车间副主任编写印发“增产节约运动”小报，看见大多数同学分配在班组跟师傅实习。我没贪图安逸而是主动要求下班组，足以证明我尊重工人热爱劳动；我还用事例证明自己一直表现优秀，办公室几进几出，都是我自己主动要求下班组的。特别是参与铸钢气缸试制完成之后我不留在技术室，而是要求到当年一般青工都不肯去的专业化生产班组，后来在那里又创造了独特的班组核算模式在全厂推广，因此得到厂长颁发的特别奖。当年还评选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青年”，得到由常州市团委颁发的证书。我在生活上艰苦朴素，至今没手表去年寒冬去北京才买皮鞋，而是将工作以来的积蓄全部买了建设公债；这些都是车间群众都知道的事实。我编写歌颂党的话剧“哈尔滨之夜”在1956年上海铁路文艺会演获得编剧一等奖，那时你还在路局宣传部应该是知道的。我质问他，这样一个青年会利用“整改”去反党吗？

他说这只是你一个侧面，从理论上分析，以你的家庭出身在内心对党对新社会有所不满也合乎常理，而且你大字报是旁敲侧击用心良苦。我说恰恰相反，我对党心存感激，对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欢欣鼓舞，所以在大鸣大放我没写一个字，在几年之前倒是写过几十句五古表达了当时的思想感情。他听说我还有写过的东西，流露出一丝高兴的表情，立即骑自行车带我回去找出笔记本。回通行室后他拿那笔记本仔仔细细地反复翻阅，除了那几十句五古，其余都是技术笔记，没有他想要的什么东西。这个笔记本后来不知去向，那五古倒是零零星星还记得一些；……忆昔黑暗日，特务打学生，……米油日三价，民苦不聊生，……疼我沈崇姐，恨纵法外人……衣食无忧患，课堂学技能，……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贤君，……五年一计划，神州气象新，……高楼追日月，烟囱若茂林，昔日蓬垢妇，今朝一展春。……

我指着那五古对他说，时过数年我心依旧。只是这个“蓬垢妇”如今恐怕要算反党了。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这时通行室主任进来重新泡茶，一边说小青年能有多大问题，态度好一些说清楚就行了。他是南下的排长转业，这位湖南老乡一向对我不错，听他这样一说感到自己的态度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

俩人喝了会新泡的茶，闲扯几句不疼不痒的废话，气氛越发轻松，理论教员探讨似的问，小刘，你说党在哪里？我说在党委办公楼啊。他说那只是机关房屋，而且还是国民党造的。又问：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党员干部去实施去落实的，对吧。我说是的。他接着说：党就是由具体到个人的党员干部构成的，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贴厂部的大字报都在攻击党员干部，对王总用深居相府来冷嘲热刺，对住宅科长更是哗众取宠一语双关进行攻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这不是明显的在反党吗。

听他这样一说，我一下子蒙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知识浅薄还是折腾了几十天的确疲劳了，竟然对他这样的推论没法回答。想到刚才我那老乡说的“态度好一些说清楚就行了”，想到我又没违反工厂什么规章制度，更没犯什么法，充其量是个思想认识问题，一直坚持下去会无休止……、顿时脑海中一片茫然，于是就回答他，我接受你的推论，我的大字报在客观上产生了反党印象。

理论教员笑眯眯说，能够认识就好，只要认真检讨就过关了。

他还真的没说错，在随后开了两次大会，否定我的“客观上产生了反党印象”，直到承认是有“大字报反党”，才算“过关”。直到次年2月，再没谁找我谈话。

曾经有人问过我，那时为什么不害怕。今天回忆，首先，自幼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养成了我实事求是、坚守诚信的性格和有临危不惧的胆识（在学校、在家庭一再受到“贫溅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言传身教，此后事实证明这些教诲贯穿了我的一生）。其次，我当时无所畏惧最重要原因是“信任”。早在进入初中就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联合政府》，而且后来又读过几遍。使我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期待国家实现民主政治，“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何况我一向工作积极、行为端正，几张大字报既不违规更没犯法，当时我真正不相信写了《论联合政府》的毛泽东先生创造的新中国会“莫须有”以文字坐罪国民。我没亲身经历在这之前的几次“运动”，“三反五反”是在报纸上了解的，感到是英明正确；“打老虎”听见师傅们说过，虽有偏差，但都是事出有因、情节涉法，而且在事后也不了了之；1955年内部“肃反”在工厂是静悄悄的进行，也没看见有什么严重后果出现。“反右”是参加了，可是那时还没进入“处理”阶段。因此我不是单纯的幼稚无知，是一个“法”字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和“初生牛犊不‘知’虎”罢了。

有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反右”他们还是孩提时期，不知道有多少大小知识分子当时和我一样是头脑里根深蒂固有个“法”字在。

大会结束以后，几十天的折腾虽心有戚戚，无知的我却想高枕安睡，不知道还有另一只靴子没掉下来，而是开了铁路免票元旦假期出游了。

到1958年2月初，S书记找我谈话，说是我检讨还可以而且承认了错误，上面决定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宽大处理，不划我“右派”而是“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一头雾水，不知曾几何时我去了人民“外部”，更不明白这所谓“分子”的轻重——车间那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合建组成员不是仍然在当他的工程师吗——当场稀里糊涂的表示了感谢。（注：我虽然几度在技术室工作但没变更职称，保留着工人身份，后来有补充“政策”规定在工人农民里不定“右派”）。

谈话以后，转眼就是春节假期，还是一个“法”字让人“有恃无恐”，我开铁路免票一家人回湖南探亲去了。

节后回来，我还是不知道人家还有一只靴子没脱，虽然心中感觉别扭，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工作积极，操作细致，不仅超工时同时还超级（当时计件工资是干几级的工件就按照几级的工资结算，工段长放心我的技术没派过六级以下的工件），又从来没废品（当时按照成品率吨位结算质量奖金），工资月月是百元以上（相当于八级师傅和工程师的工资，当时四级技工五十六元工资，五口之家的生活可算中上水平）。

此时，往日友好故旧全部疏运，直感自己已是孤独的另类，虽然心情沉闷却仍然没存在什么恐惧。就是那大会小会让我看清了一些人的灵魂。我自幼行路一如父亲昂首挺胸，此时，我每当看见那些表演过的小丑就心存鄙视，偏转脑袋向上斜，视之无人，遇到那些因运动而“发达”的，甚至是感觉此人是不愿或者害怕认我为友的故旧也同样如是，年轻骨架的可塑性强吧，天长日久造成两肩不平，让我落下个终生破相。此后多年路遇一般熟人我从不主动招呼。后来有人问过：蛮神气噶小官宁哪浪两只肩膀一高一低？（蛮神气的小伙子怎么肩膀一高一低）今天在这里回答了，同时也向那些当年是害怕连累的和路遇我没主动招呼的朋友致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转眼卸去冬装到了4月。

为了缓解车间天车紧张，我所在班组是下午四时上班。4月10日的午后有人来我家通知我马上去车间有事情。

到了俱乐部楼上的支部办公室，看见那个自大会批判开始就常来的穿风衣的陌生人也在。S书记一向和我相当随便，这时他一反常态很客气的要我坐下喝茶，他说，早上各班组讨论对我的三种处分意见，留厂察看、开除出厂和劳动教养。中午大会进行了表决，大多数同意劳动教养，是送你去外面学习半年再回来。——当时我惊讶还要处分？但是听他这样说，我心中倒有一丝高兴，与其在这里作为孤独的另类，还不如离开这个环境一段时间好——随后他给我一式几份的打印件，要我仔细看，说是我要签字的。这个上面写了我出身反动家庭对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整风整改中利用写大字报挑拨群众向党进攻什么什么的，文字不多措词也不算严重，如今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当时感到意外的是，打印件上唯有“事实”是当初排行在大批判“材料”最后的“剃光头”大字报全文——其中

有“这不是社会主义对待工人应有的态度”是我所有大字报之中唯有的社会主义四个字——而当初“材料”前面的重磅炮弹没留一点痕迹。最后是，决定开除出厂送交民政部门劳动教养。看到结尾我“愣”了一下。S书记看我对着打印件发呆，马上说：就去半年，在那里每月照样发工资的，当然不会有你现在这么多，差不多到国庆就好回来了。

在小南门交锋我接受”党员就代表党”的推论以后，在内心仿佛也感到自己大字报是在客观上产生不良效果，感到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党的培育。于是就在后面写了些同意结论，决心认真学习改造自己，早日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每张打印件都同样签名认可。

这时S书记向我介绍那个穿风衣的陌生人是市里的干部，说现在他陪你回去准备一下衣服行李。我没想到是如此迅速，心中一愣和S书记无言以对呆一瞬间，市里的干部见了就说，不早了我们抓紧时间去吧。我镇定地向S书记伸手告别，他伸出双手握着我喃喃地嘱咐：好好干早些回来。我立马转身下楼和那市里的干部一同乘小吉普离开车间驶向生活区。

天空一片阴沉，就和我的心情一样。在漏风的小吉普上我相当冷静了，回忆到曾经在报上看见过“劳动教养条例”，那些情况符合劳动教养、是否有期限一点不记得了，就记得这属于行政性处分是就业性安排。

回到家，妻子正在整理衣物，原来她是接我车间书记电话立即回来，看见她面有泪痕我安慰说没什么大事，这是行政性处分，学习半年就回来，出去换一下环境不见得是坏事。

市里的干部等在一边，夫妻也没什么可多说了，收拾好衣服行李，就回到等候在门前的小吉普上。哪知刚才阴霾遍布的天已经下雨，在天公的见怜之下，我乘小吉普驶向新的人生旅途。

初稿时注：54年后的今天，“小南门之辩”似乎历历在目，理论教员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两句京腔至今在耳，虽然此文说的是我右派“后补”始末，我用“小南门之辩”作为标题，是那个夜晚实在是太具戏剧性了，怕今后没机会写特意提前抢救出来。

2011/12/10

修改时注：初稿电邮友情编辑柳浪女士作文字订正发回之后，我看了两遍感到受益匪浅，同时觉得在前注说的“后补始末”实际没完成，是有始无末。在每遍逐字逐句的领会编辑订正的同时，我作了少量的文字调整和内容补充，在后面补了2000多字的“处理”过程，有始有末的描述了我后补右派全过程。

2011/12/16

永远的痛

上星期手语课下课回家的路上

一个同学称赞我的头发漆黑，问我是不是妈妈遗传的

我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

已经不记得当年她头发的样子……

是从那一年起吧，Deer成了无处撒娇的孩子

也没什么，“上帝如果给了你一种伤他就一定也会给你一个机缘，让你能慢慢地治好它”

只是，那么多年过去，心底那个洞仍是空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填满，无法补好的吧……

2012-05-14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那一年，因为年少气盛，见不得办公室政治的肮脏可怕，受不得莫名其妙地被人当做磨心的那种憋气，我不告而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时一般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一样没带：调令、户口、粮食关系。带回的，只有一个小背囊，两纸皮箱书，满肚子书生意气。

我成了一个“黑人”。天天想方设法去找工作。没有调令？不行。没有户口？不收。好不容易求人介绍找到一个据说暂时没有调令也收的单位，去了，人家一看——女的？不要。

可是，尽管如此，我仍是母亲最大的安慰。因为，就在我回家后，发现母亲已咳嗽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陪着她去了很多次医院。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的打击终于到来。母亲被诊断得了肺癌。已是晚期，手术亦无效。医生的预后是不超过半年。记得那个夜晚，父亲找了个借口，把我们兄妹三人叫到外面。是仲春的夜晚，不算冷，父亲的声音却是颤抖的。我转过视线，不忍看父亲那双含泪的眼。苍天必定是睡着了：母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性格开朗，真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找上门来的。

母亲自然是被瞒着的。我们只告诉她是风寒入肺，所以久咳，夏天就好了。看上去她并没有疑心。盼望已久的女儿终于回来了，她高兴，逢人就说。

我把自行车的后座用木板加宽，做了个垫子，隔天就用车子推着母亲去看医生。市医院看不好，去地区医院。地区医院也没什么效，就去看人家介绍的名老中医。中药很苦，母亲跟我一样怕吃中药，每次都要哄着。最有效的一句是“你再不吃我就回去了”——再加两块山楂饼，一个尽可能甜的笑容。

然而母亲是日渐地衰弱了。一直坚持不肯住院的她，终于被我们好说歹说地劝服，住进了老年病医院。基本上，住进这医院的病人都是在病床上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的。

几经周折之后，我终于成了附近一个小县城里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小单位的一名不在名册的临时工。为了答谢那份知遇之恩，也为了支付日益庞大的医疗费和营养费，我拼命地干活，不挑难易，不问报酬，三天两头的熬通宵。晚上到医院陪夜，我把图纸摊在好心的护士拿给我的方凳上，一小块一小块地画出一张张 0 号图。天亮了，回去把图纸交付校审，跟头儿打个招呼，便又奔波于菜市场与医院之间。那时，我们这儿市场上买不到鹧鸪，得跑到广州清平市场去买。为此我特意学会了开摩托车，一有机会借到摩托车就往广州跑。

父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想尽办法，要让母亲多吃一点，开心一点。然而我心下疑惑，母亲也许自己已经猜到了真相。有一次，被我逗得乐不可支的母亲，忽然拉住我的手：“女，其实我知道……”我大吃一惊，急忙打岔：咦你知道我给你炖的是鹧鸪汤吗好不好喝来来来多喝一点……

然而我们跟死神打的是一场必败的仗。那一年的元旦，母亲已必须借助呼吸器吸氧。那一天上午，我回单位借了部摩托车回来，一转过楼梯口，那位年轻的医生就叫住我：你先在这儿坐一会。眼里带着一抹轻轻的怜惜。我不顾一切扑入病房。

我没来得及看着我的母亲断气。

我没有哭。

追悼会上，抬眼看着母亲的遗容，想起那个阳光充沛的午后，母亲说：你回家了，我就安心了。

想起外婆说，母亲生下我坐月子时，全部的营养品只有一斤红糖。

想起母亲说起我的儿时，父亲刚被调到这个城市，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去煤厂做临时工，我一岁多就被送到外婆家，两年后母亲来接我，我已不认得她了，躲在外婆的身后不肯出来。

想起母亲说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常半夜三更的要抱着上医院看急诊。病中的孩子总是哭闹着的，护士不耐

烦，把母亲一顿好骂，母亲抱着我一起哭。

想起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吧，放寒假了，两个哥哥一大早就跑出去玩耍，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包油角，做煎堆，炸蛋散。母亲下班回来，看看我一整天的劳作成果，欢喜得笑眯了眼：女，真乖。想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五毛钱：昨天烧了你的书，拿去买一本赔给人家吧，以后不许一边煮饭一边看书了，饭烧糊了都不知道……

想起那一年，我放假回来，来访的朋友看到我正站在梯子上粉刷墙壁，有点惊讶：怎么你也会干这个？母亲得意地说：当然了，我这个女儿能顶儿子使呢。

我没有哭。

前年重九，回故乡扫墓，去看已经八十多岁的外婆。外婆一提起我母亲就老泪纵横：你妈妈命苦啊，几十年都在熬，好不容易等到你兄妹几个都工作了，你也回来了，该可以享点清福的时候却去了。我还指望她给我送终的呀……我轻轻握住外婆的手，柔声说：婆，有我呢……

我仍然没有哭。

只是，我从此不敢听人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记于亡母十周年忌

鹿鸣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2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育儿日记

好多年没照着稿录入了，很生疏，为了忠实于原样，我边录入边校对，速度很慢。也好，可以重新细细地咀嚼和品味那些痛苦与甜蜜交织的旧日时光……

日记写在一个近似方形的棕粉色的准硬皮笔记本上。本皮儿已经变色、变形，脊处也磨得露白，纸张都黄了，只有钢笔字迹还算清晰。

第一页上写着——

写给我和我的女儿——崧漾

锦萍

1983. 12. 10

二十多年来，我曾无数次地翻阅过这本日记。重读的时候，或大笑，或思考，没有很动情的时候。或许这次是要做一次清点吧，翻到这页，真切如昨的往昔竟飓风般地在我的脑海中横扫而过，说时迟，扫时快，无法言传，唯有意会。心一动，雾便蒙上了双眼。

前言

三个多月的时日梦一般地逝去了。

9月1日我穿着夏日的单衣住进了市妇婴医院。

9月7日下午3点55分生下了小崧漾。

今天我穿着棉衣，在睡着了的小崧漾身旁写日记。

出生记录

婴儿的出世，不仅母亲要经历一番巨痛，婴儿本身也要经过一场艰难拼搏的。小崧漾的第一声啼哭缓慢而轻弱。我无力地躺在产床上想：她也累了，哭不动了。

三天后[9月9日上午]，我和女儿一块儿出院时，才仔细地看见她——一张白嫩细腻的胖圆脸，两颊微微泛红。脑后的头发黑而较长，脑顶的头发很细很短。小嘴儿紧紧地闭着，上唇几乎包住了下唇，嘴唇薄且棱角分明，很好看。鼻梁较高。睡着的眼睛有些吊稍。醒后的哭声好响，全然不似在产房时的哭声了。睁开的眼睛真令我失望——小豆儿眼儿，肿眼泡。但眼珠亮而有神。几乎没有眼睫毛和眉毛。耳朵大而丰满。

第五天给她洗的澡。肚子很圆很大，肚脐上贴着纱布。四肢没有多少肉，膝盖骨又大又圆。细长的小脚丫。小手十指尖尖，指甲很长，像经过修整了一样，非常好看。并没握拳，手指伸张着。

她饿时，便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了，脖颈上的松皮肤绷得一条一条的；嘴也张得不能再大了，呼哧呼哧地左边嘬两下，右边嘬两下，反复几次，再不喂她，就拼命地哭起来。

也许因为她生下来第一次吃的是奶瓶，又粗又长的奶嘴给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我的比奶嘴短而细的乳头，她怎么也吃不着。张大的嘴一边在我的乳头周围乱晃，一边哭着。她哭出汗了，我也急出汗了，这时她才不得不把张大的嘴闭上，嘴闭上的时候就能碰到乳头了，于是开始吃奶。最后总算吃到了，人的先天本能是大有潜力的。

漾还没出生时，我父亲就把漂亮的婴儿记录册买好了。漾出生之后，记录册的前几页内容都是父亲帮我填写的。可惜后面每年仅一页的内容我都没能续写。

许多事，紧一下就做了，一旦错过，就永远也补不上了。

记录册中有一页是脚丫印。我妹特意在单位借了印台到婆婆家帮我，印的时候，可能因为凉的刺激，漾还哭了几声。第一只脚印印得比较清晰，印第二只的时候，漾有了警惕和反抗，没印好，虚出个边儿来。漾的脚丫特别小，细细的，像两只精致的饺子。

通过我的观察，孩子的脚丫形状直接影响开始走路的时间，凡是走路比较早的孩子，脚丫多半比较宽大。

从医院把漾抱出来时，她在睡。待她醒来，见她小眼儿如豆，还肿着眼泡，我立刻就哭了——眼大眼小无所谓，肿眼泡是我无法接受的。后来知道，初生婴儿肿眼泡是正常现象。

漾的指甲成筒状，一少半与肉相连，空着的那一多半显得特别长。我曾在电视上见过许多经过精心修整的指甲，但都无法同这与生俱来的完美指甲相比，天成的杰作实在令我惊叹，心想——原来慈禧太后的指甲是跟婴儿学的啊！

当时我以为所有的初生儿都长着这样的指甲，没拍照片，有点遗憾。

来看望我的同事说，哎呀，你家孩子是通天鼻啊。我吓了一跳，忙问，通天鼻有啥说法？她说，我也说不清，听孩子爷爷说起过，反正是好事。通天鼻就是鼻子根部一直延伸至发际线处。漾的异常宽大的额头上有一条十分明显的隆起。

第一个月

在医院的三天，我除了疲劳、疼痛和失眠外，几乎没有想过女儿，也没有感情。见到孩子之后，深深的母爱之情竟像决堤的洪水般不可遏止。她的一颦一笑，她的一呼一息都紧紧地牵动着我的心弦。三十个日夜，我大部分时间是坐着抱她的。有时一夜不能合眼。不知何因，抱着她就睡，放下就哭。我时刻觉得自己要垮了，没有一点儿气力，但又总有一股力量让我不知疲倦地干着。

尽管有些爱哭闹，但她的身心是健康的。第七天，已经能以头足为支点挺起全身。十二天时就能借助斜坡翻过身来。吃饱后就闭着眼张大嘴巴笑，露出没有牙的红牙床，样子十分有趣。哭的时候，先“啊，啊”两声，如不抱起，便“啊——”地一声大哭，好半天喘不上一口气，脸和全身都憋成紫青色，非常吓人。因为怕她哭，我总是吃不上饭。就是有人抱她，我也放心不下。

她小闹的时候，给她念诗或唱歌，就能安静一些。给她放音乐，她就把眼睛瞪大。

半个月后，她常常抬起眼睛看挂在她头上方的花床单。

腿上长肉了，包住了大膝盖骨，线条圆滑了。

二十一天时，发出了“e——”的声音。

她很爱洗澡，从不哭闹。

快满月时，眼泡渐消，眼睛大了一些，眉毛开始长了。

月子里，漾总抬手在脸上舞动，被指甲划着的地方就出一道红印子，令我心疼万分。可是，她细嫩的小手指软软的，我根本不敢动用剪刀，只好用带子把她的衣袖绑上。她舞动着露不出来手的袖子，样子很滑稽，谁见了都乐。

漾的奶奶和父亲都不会给孩子洗澡，只能我自己做，没几天，我手腕的腱鞘就肿得像个小乒乓球，鼓鼓地凸着，很疼。

漾明明是睡着的，只要离开我，马上就哭，谁抱都哭。婆婆逼我吃饭，在她的哭声中，我根本吃不好，月子里经常胃疼。

总不能睡觉，我困得要命，于是想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平躺着，把她斜放在我的胸腹上，只要我不把她放下来，她就可以一直沉睡。

她醒着的时候，我就同她说话。我像尊敬一个大孩子一样地尊敬小小的她。

我对漾说了许多将来的设想。我说，等你长大了，妈带你去公园和动物园，动物园里有老虎、狮子、大象，还有许多美丽的鸟……后来，真的实践了我对她的诺言。从她一周岁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她去动物园或公园，直到她上小学。那时，我妹单位星期六休息，她总是用她的“存工”在星期日请假，陪我带漾去公园。

除了同漾说话，我还给她背诗。只要我在说，无论什么内容，她都爱听，但她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我给她背古诗词时，她比较平和。我给她背英文小诗，她就稍显兴奋。这在后面的日记中有记录。

带孩子期间，我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更不能捧一本书，只能在自己的大脑里清仓。我是个很懒的人，背不下来几首诗。比较有把握保证不出错的古诗词只会背十几首，英文小诗会背的仅有三首。如此可怜的一点点存货，居然反复地用了好久。

如今回头想，这三首英文小诗，内容极简单，寓意却很深，甚至可以受用终生。原文太简单，直接译成中文吧——

第一首：

春天是绿色的

夏天是明亮的

秋天是金黄的

冬天是白色的

用这样的眼光看四季，

终生都会是美好的。

第二首：

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玩的时候好好玩

这是一个好方法

使你幸福又快乐

我曾把这首诗赠送给若干位小朋友，我希望我所爱的孩子们都能以这样的态度生活。

第三首：

好，更好，最好

永无终了

从好到更好

从更好到最好

漾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这首诗是对她的真实写照。

这一个月内，漾的姥姥和姨来过许多次，每次来都说没时间，明天不来了，可是第二天她们又来了，漾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们。[]

第二个月

满月后来到姥姥家，住在姨的六平米的阳光充足的小屋里。[我和她姨住大床]小崧漾睡在姥姥给借的漂亮的小铁床里。

满月第五天，我沿着她的小床慢慢地走动，她就用黑亮的眼睛盯着我，直到看不见，才把头转回去。

情绪好的时候，就抿嘴一笑，眼睛微眯，瞳孔放光。

各种各样的喉音日渐增多。

三十八天时知道害怕了。我仍像以前一样将她放在水盆里洗澡，只是事先脱掉了她的上衣服。她用小手在我身上乱抓，抓住衣角后，就死死地攥着。为了洗手，我将她攥着我衣角的手掰开了，她竟暴发性地尖声哭起来。

她哭闹时，用会发出声响的塑料鹿逗她，就不哭了，并且用眼睛跟踪小鹿。平时用小鹿逗她，她也盯盯地看。因为小鹿是红色的，所以她格外喜欢。她对所有红颜色的东西都感兴趣。我一直穿红色的衣服。

一个半月时，我把她抱到外屋去，因为换了环境，她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头在枕头上快速地转动着，眼珠乱转，把屋里她能看到的一切都看了又看。

快二个月时，一逗就笑，并手舞足蹈起来。经常把胳膊抬起来，专注地看自己的花衣袖。开始吸吮自己的小

手，但她并不清楚那是自己的手，因为胳膊动弹，小手离开了嘴，她就哭起来。

眉毛长全了，眼睫毛长很长了，眼睛更大了，尖尖的小手指变粗了，小手背上胖出了坑儿。小胳膊小胸脯上尽是肉，光着身子时可爱极了。大腿很粗，脚丫显得很小。穿上棉裤和绒衣，像个大孩子了。

漾满月后，我轻松多了。漾在姥姥和姨的怀里很高兴，我便得以脱身了。

漾的姥姥和姨，一下班先跑到小屋看漾，漾就兴奋得手舞足蹈，累得呼呼喘粗气。

满月没几天，我喂漾桔子，那时还没有无核桔。我拿起一小瓣，先用嘴咬掉一个小尖，再用手捏住，让她吸吮。第二天，在她的大便里发现了一颗桔子核，令我后怕，再不敢喂了。

漾出生之后，我一直没敢大刀阔斧地给她洗澡。肚脐没长好时，不能放在水里，一直是我用手托着她洗。肚脐长好之后，因为漾奶奶家室温低，一直给她穿着上衣放在脸盆里洗。漾姥姥家室温高，第38天时，我把她脱光了放在脸盆里，万没想到她会害怕得尖声暴哭，把我吓得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想起把我的衣角重新塞回她手里，总算安静下来。慢慢地适应了好几天，我才敢把她脱光了洗澡。漾是个极其敏感的孩子，事事我都得格外地小心。

有一天，漾在40分钟内连拉了5次大便，所有的尿布都脏了，她还直哭，不放我离开半步，离漾的姥姥和姨下班还有3个多小时，那一刻，我感觉极端地无助，便同她一起哭了。

漾的皮肤太娇嫩，我总是及时地给她换尿布，洗过的尿布都用开水烫过，可是她的小屁股还是“打”了，红红的，极度地心疼使我的胃巨痛……

为了治疗漾的“打”屁股，漾姥爷没少费心思，一会买这个，一会买那个，有人说玉米淀粉最有效，仍然不行，最后用了紫药水，总算好了。[]

<u>第三个月</u>

是日新月异的一个月。

二个月零五天才笑出了声。

这时，她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玩了，总是“A（4）！A（1）——”“KA（4）！KA（4）”地找人。我一到她的小床旁，她一边微笑，一边手舞足蹈，累得呼呼直喘。我望着她，她就大声地喊。听到音响大的乐曲时，就张大嘴笑起来。

二个半月以后更不好带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哭了，一边哭一边发出各种声音来“叙述”自己的要求。这时，我便俯身与她说话，给她朗诵英文短诗。于是她不闹了，张大了嘴笑。我在她玩时给她看彩色画册，她竟认真地看完左面看右面，我一边翻着书页，她一边看着，很有意思。我把彩绣、花手绢、画片、旧挂历等东西都拿给她看，看见红色图案时，她就抿嘴儿一笑。

一次，她哭了。我拿着五光十色的彩绣金鱼，大声说：“小崧漾，看看，这是什么！”她睁开眼睛（哭时闭着眼）看见彩色金鱼就不哭了。

70天以后她的要求更高了。吃完奶，自己玩一会儿。我看她，她就冲我笑。玩够了就睡。醒来后又要玩，不是自己玩，是让我带着她玩。我抱着她在屋里走，她便把晾衣绳上的衣服和每一块布片，以及墙上的画、桌上的花盆和鱼缸里的鱼等一一看一遍。我累了，坐下来，她马上哭。我只好抱她继续走，直累得我浑身是汗，她仍不罢休。

我用手在她的胳膊和腿上快速地抚摸，她就高兴地放声大笑。她生气时，就用小手在我的前胸乱抓乱打，把我的下巴和脖子挠得好疼。她吃奶时，就用小手在我的腋下轻轻地抓挠，痒痒的。

近三个月时，头颈终于能独自挺立起来。

衣服全变小了。脑顶上的头发长出来了。有要求时不再大哭，而是紧皱双眉，发出带着哭腔的各种声音，小嘴撅撅着，眼里露出乞求的目光，样子十分可怜，这时只要与她逗玩就可以了。她也知道寂寞了。

漾出生后，在奶奶家住了一个月，又在姥姥家住了一个月，之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漾70多天的时候，姥姥来看她。

我说：“妈，小崧漾会看书了。”姥姥说：“净瞎扯，哪有这么小的孩子会看书的，不怎么碰巧了呢。”我马上拿出画册，翻给漾看，果然是看完左面看右面，不是看一二页，而是连续看完一本画册。母亲笑着说：“这孩子真的会看书啊！”我光顾着同母亲说话，翻页的速度慢了，漾大声地喊起来。漾是个性急的孩子，她看完了我就得马上为她翻页，翻慢了不行，翻快了也不行，得她刚好看完才能翻。平时，我总是非常专注地观察她的表情，在适当的时机翻页，她就一直很安静地看。

1983年12月8日

补记：

漾漾上午没闹。下午哭了两次，都是因为尿布湿了，给她换完就不闹了。下午3：20又哭了，这是要求我带她玩了。我抱着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她便左顾右盼。许多人认为不能随便抱孩子，怕惯坏。实际上一味地不抱是错误

的。几个月的婴儿也是有思维的，她有她的乐趣和需求，除了温饱之外，她也有精神上的需求——亲人与她的交谈，妈妈对她的抚爱以及她自己对新鲜事物的“探索”……我宁愿让别人埋怨我惯孩子，也不愿让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受委曲。她这么小，正是心理发展的非常时期，她不懂得什么叫坚强，所以，对她采取冷漠的态度，实在是太残酷了。让孩子长时间地哭，可能对身体没什么损害，却损伤了她的心灵。

自从有了女儿，我的灵魂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她的笑声能把我的身心溶化；她的哭声使我的心疼痛。有时候，她哭得十分委曲，一双泪眼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怎么也不忍心让她继续哭。她不会坐也不会走，但她要看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只有亲人抱着她的时候，她的欲望才得以满足。现在她已经不满足平躺在我怀里了，她愿意坐在我的腿上，像大人一样地看周围的一切。如果我把她从坐姿改为平躺，她便以无泪的哭声表示抗议。最后，她坐在我腿上睡着了，我把她放回小床，可是她马上醒了，两只手抓挠着，双脚乱蹬，大发雷霆。我又抱起她，待她睡熟才放回床里。这次她没醒，但面部表情却变了——兜兜着的小嘴拉长了，双眉皱了起来。

以上日记都是1983年12月10日追记的。如今回头看我当时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我对孩子的娇生惯养使她比其他严教出来的孩子有更坚强的意志力。娇生惯养与溺爱是截然不同的。或许今后我会专门说说这个话题。

清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家”

“家”，不仅仅是一个院落或是几间房屋。

“家”的核心是氛围，是一种由亲人营造出来的给人温暖并使人渴望回归的氛围。

“家”，有时是一个固定的居所，有时是一个简单的意象，有时只是一种切实的感觉。女儿小时候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和妈妈在一起，走到哪里都是“家”。

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家”是时间的函数，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变迁——有可能是居所的变迁，也可能是意象的变迁，更可能是感觉的变迁。

小时候，“家”是灯光。

那个五口之家，有祖父母、父母和我。节假日，父母带我外出，常在天黑后返回，一看到家里窗户映出来的黄色灯光，我的心立刻就暖起来——爷爷奶奶早把好吃的饭菜做好等着我们呢！几十年后的今天，小时候的许多生活细节都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但那窗灯光和灯光所给予我的细微又刻骨的欣喜和温暖，依然是清晰的。

初中时，“家”是奶奶的身影。

我上初中时，已经是有了妹和弟的七口之家。我每天与忙碌的父母接触不多。爷爷已经退休，与奶奶一起为我们做早饭。为了让我这个贪睡的家伙多睡一会儿，奶奶总是在最后一刻叫醒我。我快速地起床穿好衣服，在奶奶为我准备好的洗脸水里抹几下，就坐到饭桌前，爷爷提前为我盛好的饭菜温而不烫。我一边吃饭，奶奶一边帮我梳小辫儿（唉，那年月的女生都留长辫子，很麻烦）。吃完饭，我接过奶奶递过来的书包，拎着爷爷帮我装好的饭盒（午餐），愉快地走出家门去上学。

奶奶一手把我带大，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没受过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罪，我习惯了放学回家就见到奶奶，偶尔赶

上奶奶不在家，心里顿时裂出一个大窟窿，空洞洞地难受。

下乡后，“家”是美丽的四合院。

离开沈阳那天，学校操场上热闹非凡，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全校一千多名学生，浩浩荡荡地开出城市，奔往我们插队的地方。到处是眼泪，我却一点儿也不难过，心中涌满了豪情壮志。但是，现实的生活是艰苦而单调的，我时常会想念家乡和亲人，而这种想念经常依附于那个美丽的四合院的零星影像——两棵树冠极繁茂的丁香树和五月的花香；宽阔的房檐和故宫一样的红柱子以及围坐在柱子周围的同学讲的各种各样的鬼故事；被破四旧运动砍得伤痕累累的石浮雕和门上那些有着凸起花纹的彩色玻璃以及摸上去的手感……回头想，这种思念是复杂的，既有对亲情的依赖，也有对原有生活方式的的怀恋。

结婚后，“家”是父母的亲情。

无论是住在公婆家，还是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心中的“家”一直是父母的居所。女儿都很大了，每次回父母家时若是半路遇到熟人询问，总是脱口而出“回家”，而不是“回妈家”。曾经被许多人纠正过，却始终改不了口。除了被逼迫或是违心，正常情况下言为心声，就连临近父母家楼口时我那迅速加快的脚步，都是情不自禁的。

如今，大自然是我的精神之“家”。

目前的居所，是我有生以来居住过的房子中条件最好也最宽敞的，但它没有“家”的氛围。每次投身到大自然中，无论多么苦累，甚至睡在烂泥地里，心情都是愉悦的，有回到“家”里的亲切感和轻松感。而每次从大自然返回城市时，混浊的空气总是令我感到窒息，需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重新适应。这段适应的时光很恍惚，很难过，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过下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

一位在京城工作的同学说，常有无“家”可归之感。也许，这种感觉许多人都或轻或重地有过。我想，一定有一个真正的“家”，它不在外面，而在我们的心中。只有找到了真正的“家”园，才会有安宁、祥和、宽容与愉悦的心境。

2010.4.8

冰溪摄影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网络千钧爱 知青万古情

——记红河谷和他的知青网友们

如果把千百万知青比作树林，红河谷就是其中的一棵银杏。这位普通而又优秀的53岁沈阳老知青依然胸怀昔日激情，在癌症全面转移的情况下，又顽强地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呕心沥血完成了此生唯一的著作《追随红太阳》。2003年2月10日下午6时，红河谷依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留下他奋斗追求点点足迹的世界，告别了他情牵梦萦的知青朋友们。

依照红河谷的遗嘱，2003年4月4日（阴历三月初三），他的妻儿、老母、兄弟、妹妹、亲属、好友、同事、邻里及网友代表一行60多人到他曾插队的村庄所在的辽河边上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春风猎猎，黄尘滚滚，阳光灿灿，河水滔滔，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散，逐波流逝……从此，红河谷的生命便永远地与曾洒下他青春血汗的土地和河水溶为一体了……同时，还有许多东西留了下来--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遗作和他未了的心愿，给我们启示和激励，令我们深思和奋勉。

终生进取的红河谷

红河谷，真名王世新。文革开始时，他是沈阳第一中学的高一学生。1965年9月，他在十六取一的竞争态势下考进了这所重点中学。入学后，他成为班里的高才生。他是无线电爱好者，组装过收音机，1967年又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使他的父母兄弟和街坊邻里提前十几年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1968年9月24日，红河谷随同学一起到辽宁省法库县依牛堡公社三尖泡大队插队。他只在生产队呆了3个多月就被抽调到县里，全县的有线广播全套系统就是由他亲手设计安装的。1971年他回城当了工人。1979年他考上电视大

学，学习电子专业，毕业后又到东北大学进修仪器仪表专业。他曾给沈阳市的许多技术人员讲过电子技术及电视维修课程，如今沈阳电子行业中的一些技术骨干曾经是他的学生。在单位他是电子工程师，厂里的技术中坚。

红河谷是个很敬业的员工，但工厂效益不好，每月仅有400元的劳保工资。妻子下岗，150元的生活补助费也难保按月领到。他的生活并不富裕，一家三口居住在面积很小的一室一厅住房里。1997年秋，红河谷被确诊为鼻咽癌。在养病期间，他学会了上网，写下了许多插队时的故事，陆续在网上发表。他感到，有缘在网上结识众多朋友是他今生最大的快慰。2001年秋，病灶转移成骨癌，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体重由160多斤减至110多斤。

恰在这个时候，红河谷萌生了一个写书的念头。他要同命运抗争，同癌症赛跑；他要秉笔直书，记录下他的经历他的回忆他的青春岁月他的难忘情怀。从此，他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跋涉，一段悲壮的历程。

骨癌是极痛的一种癌症。据红河谷生前讲，往往只有泡在极烫的热水池里，他才能暂时摆脱那种让人时刻不得安宁的刻骨疼痛。因此，他一度每天上午都到浴池去，自己带个温度计，因为他的皮肤已经很不敏感，无法感知水的温度。当池子里的水温不致于把皮肤烫坏的时候他便下去（水很烫，别人都不敢下去），坚持数200个数，约3分钟，然后在心里默念：癌细胞，热死你！烫死你！战胜你！之后从池子里出来，到床上休息30分钟，再下热水池。如此反复四次，然后回家。

从红河谷家到浴池，只有一站多地，是健康人步行10分钟的路程。这段路他需要休息10次才能走到。他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不让妻子接送，坚持独往独来。最初他还带着手机去浴池，以便随时与家人联系，后来就什么都不带了，因为任何一点重量都是身体难以承受的，甚至在天气已经很冷的时候他也不敢多穿衣服，以减轻骨骼的负担。

就这样，红河谷每天上午去浴池，下午在家写稿子。疼痛时常使他脸色骤变，大汗淋漓……除了在知青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有一部分已经写出草稿，还有一部分只拟出了提纲。"不能让这段历史无端地被忘记一定要留下一些文字让我们的后代从中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成为红河谷的一种使命，强烈的使命感催促着这位理科高才生进行着极其艰难的写作历程。

虚拟网络有真爱

2001年5月以后，虚弱的红河谷已经无法上网并且中断了写作。红河谷经常发帖的论坛是沈阳热线，华夏知青和老三届两个论坛中只有二位网友认识他。知道他得了癌症的网友浮萍见他好久不在坛上发言，便在各个知青论坛上发帖呼唤。当网友们几经周折找到红河谷时，他已经贫病交加，又因儿子的公司受挫而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红河谷的情况被网友清平介绍到华知和老三届等知青论坛上，大家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素昧平生的国内外网友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伸出了友爱之手，书籍、贺卡、光盘、药品、金钱……每一件物品都满载着深深的爱。

参加捐助的网友中，有身患癌症的病友，有已经下岗的工人，有全国各地的同龄人，有旅居海外的老知青，还有年轻的晚辈人，海角天涯的朋友们慷慨解囊，只为帮助红河谷圆他的梦--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完成写作计划，为后人留下一本真实的记录。

许多人认为，网络世界是虚拟的，网络人际关系是复杂的，网络人情是淡薄的。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做不到的事情，在网络世界里却可以做到。如果没有网络，天南地北的人也许永远也无法相识；因为有了网络，遍布世界各地的知青便有了彼此相识的机会。是网络让我们认识了红河谷，是网络使红河谷结识了众网友。众网友与红河谷之间的真情，在虚拟的网络里演绎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震撼了许许多多人的心，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虚拟网络有真爱！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是十多岁的青少年，我们把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自觉不自觉地献给了那场运动和上山下乡。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着不同的身世和处境，及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知青更是融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分布于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童稚的心中萌生过的理想之花和在同一历史背景下燃烧过的激情是我们共同的过去，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下岗工人，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普通群众，仅凭着共同的曾经，便有了一份亲切感，这是一种血缘，时代的血缘。

如今，在年龄半百左右的老知青中，很少有人还能像红河谷那样仍然保持着最初的激情和热血了。与红河谷谈话，有一种昔日重回的感觉，你会为他的执著所感动，被他的激情所振奋。红河谷代表着我们曾经的激情和理想，他是身居陋室重病缠身无法自由行动却仍然心怀天下乐观豁达的人。他是勇士，真正的勇士！

在医院里的红河谷，承受着病痛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却依然乐天地给病友们讲各种各样的笑话，高唱过去的老歌，鼓舞那些比他更年轻更自由的病友们。在医院举行的护士节大会上，红河谷的发言多次激起热烈的掌声。红河谷是一个很不错的演说家，他的激情和不向病魔低头的精神感染激励着许多人。他以自身的行为鼓舞了病友也鼓舞了医护人员，医院上下许多人都对他钦佩不已。

住院期间，红河谷曾多次在病床的白床单上摆开网友们寄来的东西：书；贺卡；光碟；照片；网友签名打印的红河谷文章；各种小礼物；汇款单复印件；网友来信；实寄信封……这些都是红河谷的宝贝，收藏在一个很大的公文包里，跟随红河谷住院，再跟随红河谷回家。这些宝贝与红河谷紧紧相随，给他温暖，给他安慰，给他鼓舞，给他力量。在翻阅这些宝贝重温网友深情的时候，那彻骨的疼痛会暂时减轻一些。一次，他用姆指和食指捏着一张网友寄来的小卡片，用满含笑意的眼神盯着它说："这么个小物件，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爱呀！"朋友们的网名和真名，红河谷已经烂熟于心。一个个鲜活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关爱，已经注入红河谷有限的生命之中，支撑他生存下去的信念，给予他继续写书的动力。

为工作奔忙在世界各地的网友EE多次打来越洋电话，给予红河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国内的兄弟姐妹们从各地

打电话给红河谷，电话最多的时候几乎天天不断，甚至几个不同地方的电话赶到一起，带给红河谷许多欢快和惊喜。虽然大家不曾谋面，却亲似多年老友。被病痛折磨得有气无力的红河谷会在接电话的瞬间充满朝气，他在电话里开朗地大笑，说话声变得饱满而洪亮……没有人能从他的声音中感觉出他的虚弱和病痛……

来自沈阳、鞍山、盘锦、哈尔滨、承德、北京、上海、广东、美国等地的20多位网友曾专程来沈看望红河谷。鞍山的板筋和盘锦的浮萍、天娇是最先来沈看望红河谷的外地网友。北京的一位妹妹在百忙之中两次专程来沈，只为给红河谷以精神的慰籍。这位妹妹第一次来沈时，红河谷脱下病号服穿上西装高兴地走出病房，像正常人一样地参加聚餐，游园，并且把板筋的车玻璃擦得更亮……这位妹妹第二次来沈时，红河谷已经讲不了太多的话了。每次有网友来沈，只要板筋没外出，总是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开车从鞍山飞速赶来。承德的夏雨、金刚、秋风和柳絮先后来沈看望过红河谷，带来承德知青的深情厚意。上海的野兔，北京的缺月，哈尔滨的微风，曾先后特意赶到医院慰问红河谷。广东的大石头，背着沉重的电缆绕道来到红河谷家，带来广东网友的真诚问候和关爱。西里村回国探亲时也专程来沈看望红河谷，板筋把放假的女儿也带来了，天娇专程从盘锦赶来。看见小板筋和年轻的西里、天娇，红河谷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家住沈阳的牛虻等一批年轻网友在我们不认识红河谷的时候就到红河谷的老家易家沟看望过他了，后来又到医院与红河谷团聚过。居住在海外的沈阳网友秋枫和山里人也先后到医院看望过红河谷，给予他手足般的关爱和帮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一位网友到来的时刻都是红河谷欢乐的节日！这些关爱给予红河谷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红河谷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可以陪网友去饭店，坏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交谈。秋风和柳絮来沈时，红河谷已经病得不能下床了。当他俩与红河谷告别的时候，红河谷竟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并以极快的速度滑到了床边，放下双腿准备穿鞋下地……可是他没能穿上鞋----那股瞬间的激情只够他从床里移动到床边----他又痛苦地回到了无奈的现实里……无论他葆有怎样的青春热血，久病缠身的肉体却让他无法随意地行动--病魔把一个热血沸腾的汉子禁锢在床上，是怎样的一种折磨！

网友们在一年多里，先后给红河谷捐款三次，总计一百多人次（有些网友多次捐款），捐助金额约合8万元人民币，解决了红河谷医疗费用上的燃眉之急，帮助他赢得了最后的写作时间。最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对于普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红河谷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一段时日。这期间，他忍受着身体的巨痛，在网友们的热情关爱和鼓励下，以顽强的意志争分夺秒见空插针地完成了他留给后人的《追随红太阳》一书，了却了他的一份心愿。

勇士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在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钢铁汉子红河谷也想到过死。他说--疼得真想把腿砍掉！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可能要选择一了百了的办法。不管我将来死了也好，活着也好，我都是永远感谢这些知青网友们的。这53年的生

命，我一直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奋斗着的。我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尽管我一辈子没什么出息，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但是我所涉及到的问题，我都尽力地去做了。去年癌症转移不能动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想过了，死亡之前得有一种预兆：不能吃；不能动；折磨你，毁掉你生存的信心。一个伟人的母亲说过：人生是个赌场，发牌的是上帝。无论上帝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都要出好每一张牌。我的孩子总算走出了这步。去年，我生病，孩子生意失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网友们帮助了我，给我带来了希望。我是个给一点火光就能燃烧起来的人，一生都在永不停息地努力奋斗着，从中学时学无线电，直到最后学习网络。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能遇到网上这么多的朋友，是我最大的欣慰。全国这么多知青，有谁能得到我这么多的厚爱？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在这个时候，仅仅说一声谢谢是远远不够的。谁到了我这个时候，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了。有时我想，谁能需要我点什么呢？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给生病的朋友们吧。可是又一想，我是癌症患者，我的器官不能用啊，连这最后的一点路子也没有了……（沉默许久）算了吧！

也许有来生，来生再与大家在一起吧……

如果这次，还能给我一些时间，就是上帝对我的最高奖赏了。我的这一生也太累了，一直有种孤军作战的感觉，这儿闯一下，那儿闯一下，也没闯出个什么来……太累了……人为什么要死呢？生活太累了，该休息了，那不就是死吗？我每天都在听胡发云的《我们曾经年轻》，再好的乐曲也有停顿的时候。

红河谷的脆弱只是寒光一闪，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仍然是坚定而顽强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表现得更加执著和勇敢。

最后的红河谷

2002年12月10日，医生对红河谷进行了最后的交待并给了他特殊的证明，凭着这个特殊的证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购买吗啡。红河谷明白，医生已经给了他最后的宣判--无论他的病情怎样发展，医生都无能为力了。在这样的时刻，红河谷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搏！这一搏，没有美丽，只有苍凉和悲壮。

一个被病魔的巨痛折磨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的人，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仍然冷静地思索着，顽强地抗争着……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做到这些，健康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最后的写作历程非常非常艰难！疼痛使他无法握笔，打一针吗啡只可以维持二三个小时不特别地疼，他利用这段疼痛减轻的间歇赶快打字，最后的许多文字都没有手稿，他实在写不动了，都是咬着牙直接打在笔记本电脑里的。

红河谷每天连续几个小时抱着笔记本电脑，不知道死神何时光临，惟有只争朝夕！有朋友说，《追随红太阳》一书出得太快了，若是再晚一些，红河谷或许还可以多活一些日子--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实是残酷无情

的。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焦急，他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为了抢时间，一切工作都紧张地进行着--旧照片汇总、新照片拍摄、设计封面、写序、联系印刷厂等工作多管齐下。红河谷的一些同学和网友们在不同的城市里忙碌着，但这些人都远没有红嫂辛苦，红嫂是一位好妻子，她瘦弱得像一个年轻姑娘，却每天跑很多地方，走很多路，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得尽量快些并尽量圆满，她是红河谷最后生命中的一座靠山。

居住在美国的网友蕾拉捐助了书籍印刷所需的全部款子，并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从美国打来电话。蕾拉，这位网友中唯一的姐姐给了红河谷最宝贵的亲情和临终的温暖。红河谷用孩童式的语调幸福地对我们说："我有个姐姐了，蕾拉是我姐姐，我唯一的姐姐。"--是的，红河谷在家里是老大，蕾拉给了红河谷无人可以替代的关爱和亲情。

胡发云答应为红河谷的书写序，红河谷非常地高兴。胡发云是红河谷崇拜的作家，也是在红河谷生命后期多次打来电话关爱他鼓励他的人。微风为红河谷的书设计了封面，需要把那么多的照片和资料浓缩在小小的封面上，微风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构思，最后的设计方案使红河谷非常地满意。华知和老三届两个知青网站为红河谷设立了专门的网页，网友们写下了许多诚挚的留言。

为了尽快地完成印刷工作，印刷厂的工人大礼拜不休息，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文字和封面的印刷。文字部分是在沈阳印刷的，封面是在哈尔滨印刷的，微风和风尘44一起把几百套封面寄发到沈阳。巧的是两地的印刷完成时间刚好相遇，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装订成书。

2003年1月29日下午，几百本崭新的《追随红太阳》一书运到了红河谷家。在这之前的许多天里，红河谷已经进食困难，只靠打点滴来维持生命，时而有些神志不清。为了完成给网友们签名的心愿，红河谷自己决定停掉第二天的点滴，因为点滴一打就是一整天，无法活动。在此之前，红嫂还特意上街给红河谷买来一支新钢笔。

2003年1月30日上午，红河谷没打点滴也没吃任何食物，执著地准备在自己的书上为网友们签字。他面庞清瘦，脸色黄里透黑，黑而粗的胡须很长很乱，门牙断掉了两颗，显得十分苍老。细细的胳膊，抬起时吃力而虚弱。腿和脚肿得很粗，皮肤发亮。红河谷虽然十分虚弱，但精神还好。因体力不支，说话不多。也许是因为要签字了比较兴奋，竟然同意喝点果汁。

红嫂扶他坐起，用书为他在床边支起一个可以写字的台子。红河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起软弱的手臂伸了伸，郑重地握起钢笔，马上又放下了。他活动了好半天手指，重新拿起笔，又停了好一会。正常人很容易做的事情，他做起来竟如此吃力。他握着笔，好久写不出一个字来。终于正式下笔了，一个"赠"字写得很大很漂亮，然后是蕾拉的真名，三个字顺利地连续写出来。下面是王世新的签名，然后是年月日。第一本书签字成功！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这十几个字的分量的。写完这十几个字的红河谷已经把所有的力气使完了，签后面二本的时候，他已经有些精神恍惚了，字迹变得模糊而重复。在给微风签字的时候，他久久地呆坐着，看了"赠"字好半天。没有人敢说话，怕说话的声响惊扰了他。也没有人知道他要写什么，只能静静地等待。好长时间以后他问"微风两个字怎么写？"我们赶紧把地址本递上去，让他照着抄。每一笔都写得很慢很慢，停顿半天，再写下一笔。一个字与另一个字之间是更长时间的间隔。静默，静默……艰难得似乎呼吸都要停止了。

时间过得很快，字签得极慢。签了三本，红河谷已经累得坐不住了，红嫂扶他躺下。他紧闭双目，神思恍惚，意志和病魔在进行着激烈顽强的抗争……一个小时之后，他急着要脸盆，开始呕吐。竟吐了小半盆，喝进去的果汁远没有吐出来的液体多。吐完之后大便一次，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排便。之后他说感觉舒服多了，又重新开始搭台、签字。这次，他更认真更专注了，但错误仍很多。签了几本之后，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我们问他："还能签吗？不行就盖章吧？"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无力地躺下，不再提签字的事。

如果他还有力气签字，是绝对不会同意不签的。圣诞节前他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写完一百多张贺卡，那时虽然艰难，还能坚持，这次他是彻底地没有气力了。那些贺卡几乎是他最后的绝笔了。写字对于弥留之际的红河谷来说是无比艰难的。他多想在自己的书上为朋友们亲笔签名呀！遗憾的是他终于没能全部完成这个心愿。

用了一天的时间，红河谷只签了几本书，这时的他更虚弱了。第二天是除夕，重新开始打点滴。晚上，儿子回来了，红河谷与儿子说了最后的话，就再无力说话了。初二以后，连点滴也很难打进去了，连续两天只能打进去半瓶液体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点滴流得非常地慢。再后来就不能喝水也打不进点滴了，只是空耗着残存的生命。

初五晚上，清平打电话给红嫂，说初八才能去看望红河谷。好多网友通过QQ 、电话和E-MAIL让清平转达他们对红河谷的问候和祝福。清平在给一位网友的信中说："红河谷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在耗着生命最后的一点精气，他若能坚持到初八，我将再去看他最后一次。"

这位网友回信说："病重病危的人都差不多的：说话、点头等常人不以为意的动作他们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听话的能力还有，如果你初八再去，不必让他说话或回答问题等等，他听到你的声音就应该很高兴了。"

初八下午，清平很晚才赶到红河谷家。一进门就看见比前几天更瘦弱的红河谷闭着眼张着嘴躺在床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一个那么坚强硬朗的汉子竟被病魔消蚀得气息奄奄了……清平记着那位朋友的话，想着许多朋友让她转告的问候和祝福，相信红河谷一定能听懂她的话。于是，清平对着闭着眼张着嘴的红河谷说："红河谷，我代表网友来看你，他们问候你，希望你健康起来！"接着，清平把让她代好的网友名一一说了一遍，之后又把能想起来的网友名也唠叨一遍，她知道，无论是否对她说过，朋友们都会记挂着红河谷的。红嫂问："你听懂了吗？"红河谷用力地点头，动作很大，嘴使劲地抿着，从紧闭着的双眼的眼角处溢出了两滴眼泪，泪没有滚落下来，像两颗珍

珠一样停留在他的脸上。几天的空耗，他身体里已经没有多少水分了，这两滴泪是他物质生命最后的精华。红嫂说，几天以来他流了三次泪。一次是儿子回来的时候；一次是一位来看望他的老者在他面前痛哭的时候；一次是清平转达了网友们的问候的时候--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流泪。

红嫂和红河谷的亲人去厨房吃饭的时候，清平单独陪着红河谷。他的手和脚是凉的，其他部位是暖的。清平一边抚着他的手和胳膊一边对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许多没有病的健康人没做到的事你都做到了。书顺利地印出来了，慢慢地就可以寄给所有的朋友们了。你的主要愿望已经实现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依然闭着眼。清平又说，我知道你还有许多梦想没来得及去做，你很想做完这些事。这时，他非常用力地点头，张开嘴，啊了两声。清平接着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懂你的意思，没有人能把一生的梦想全都实现，能把主要的梦想完成就很了不起了。这时，红河谷的表情变得平和了一些。

红河谷的亲人们简单地吃过饭，又来到红河谷的床前。他睁开眼，双手使劲合拢起来，把清平的手握得很疼，谁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大的力气。红嫂说，他可能是要坐起来，于是他弟弟过来把他扶起。红嫂喂了他几勺水，竟喝进去一些。红嫂说，好几天喂不进水了，有时候喂进去是白色的水，吐出来是红色的水。红河谷坐了一会，他弟弟又重新扶他躺下。他弟弟揭开被，我们看到水肿已经蔓延到他的后背了。在腿上按一下，如果不用手去抚弄，深坑都无法平复。

初十上午，红河谷的腿脚以及腹水全消了。下午5点半红嫂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后来，他示意想翻身，红嫂帮他翻身时，他开始大口地喘气，之后就瞪大了双眼。红嫂用手在他眼前晃动，没反应，再摸脉搏，没有了。红嫂立即打120，仍然期待着医生能救他……回头再看时，红河谷的眼睛闭上了，嘴却张得很大。他一定是还有好多话要说有好多事想做呀！人类在病痛和灾难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和无助！

红河谷是一个执着追求热爱生活的人。他一直期待着有医生能妙手回春。他还想继续写作，并"希望大家能利用晚年的宝贵时光，把印在脑海里的那段东西留下"--这是他在《追随红太阳》一书中对所有知青朋友的期望。

当我们重读他的文字凝视他的照片的时候终于明白：红河谷在编书时坚持采用他年轻时的照片，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深深的眷恋和回忆，他写书是对青春岁月的一种纪念和诉说。他走了，而他的书则长留在了海内外朋友们的手中和心里。人类的物质生命没有太大的差别，多则百年，少则几天，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人的精神生命却差别很大，有的人可以活在人们的心中甚至万古流芳。古往今来的学友之情恐怕都无法与知青插友相比，梁祝的同窗之情也难能借喻于知青间的情谊之厚重绵长。在艰难的环境下同甘共苦的经历中熔铸而成的生死与共的友情，将超越老知青们的生命而长存。

我们还有几个八年

网海浮沉，网事悠悠。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网名，携带着它背后那个鲜活个体的若干信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网际风格。一些人如流星般闪亮，亦如流星般迅忽，绝尘而去，匿迹销声。一些人曾经非常活跃，而后潜入深海，难得出来冒一小泡。一些人沿着蜿蜒的小路始终时紧时慢地向前走着，尽管居无定所，总能开创出一块可耕的田园或营造出一间温馨的小窝，硬是把现实中的天涯维持成虚拟中的咫尺。种种聚散分合，暗淡了桃源的梦幻，彰显出文字之外的真性情。当灿烂的烟花散尽，存留心底的是若干个义气的男女哥们儿，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

7月16日下午5点，红嫂、浪花、清平与大石头、板筋在沈阳塔湾附近的一个老知青饭馆聚会。我与红嫂虽然同居一城，但我们常常是借外地网友的光才有机会见面。

大石头找的这家小饭馆十分简陋，但通风极好，免去了本老土忍受高档饭店缺氧的痛苦，暗自庆幸。从敞开的窗子望出去，有一些自种的蔬菜，倍觉亲切。板筋屋前屋后去找老知青，没找到。服务员很年轻，大厨也没多大年纪，老知青躲在幕后，难得一见。

在饭桌上大石头问我，到广州想吃什么？

我说，荔枝。

大石头说，早几年就好了。板筋去过我的荔枝园。当时养了20多只狗，还有藏獒。

板筋说，我们哥几个说要吃狗肉，把大石头吓得赶快跑了出去，搬一大半肉回来。

大石头说，你最好把狼狼吃了。

板筋说，我如果把狼狼吃了，它妈就能把我吃了。

席间，说起红河谷。大石头说，红兄是个好人啊。听此话，一股悲凉袭上心头，我没敢接话。大家沉默数秒，聊起另外的话头。

两位大侠故事多多，聊也聊不完。

大石头说，去北京的机会最多，小路每年只给我一个指标。

我说，每年一次可以了，我们八年才见你一回。

算起来，上一次见到大石头和板筋都是零二年的事了。

八年的岁月痕迹在相见的瞬间稍纵即逝，一切仍如八年前一样。大石头还是瞪着两只明亮的小眼儿，一脸的顽皮和无辜。板筋仍似一棵桉树，多数时候装深沉，偶尔露出笑面虎的模样。

八年聚一次，来去匆匆。

余生，我们还有几个八年？

2010-07-1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古堡。人物】系列：

驼子

太阳早落到高脚岩后面去了，夕辉染红了半个天。这个时候，李家堡人喜欢端着盆似的大海碗蹲在门口，唏哩呼噜往嘴里扒拉被火烧云映得橙红的苞谷饭，哪怕是坨老咸菜也要咬得嘁哩卡喳山响，口唇吧嗒有声，一顿普通的农家晚饭就吃得声色俱佳。吃罢将碗朝地上一搁，返身从门里提一草墩，喝开拦脚绊手嬉戏打闹的娃儿们，往前几步到村路坎坐下调笑斗嘴谈天说地。高兴了，换把叶子烟，咂得长杆烟锅滋啦滋啦响，然后就中气十足地吧叽吧叽往地上射口水，暮色中烟火此明彼暗星星点点。要是斗气了，就拎起屁股下的草墩摔到对方门里去，拍拍屁股回家，但不关门，那草墩跟着就会给砸回来，只要随手把大海碗拾开，不用担心没坐的器物。喜恼不论，这都是李家堡人惬意的时光，宁静祥和。 贫富也好，苦乐也罢，这长长的日子大大的天，总还是那古朴悠远的人间烟火，淡泊但实在。 自那日黄昏开始，李家堡古来的这种宁静祥和被毫不经意地击碎了。老碉楼前的公路上自北向南接连几日开进着拉洋炮的卡车和挎洋枪的老总，南边开仗火了。从别小枪的那个白面书生口中，人们晓得了是和万恶得很的日本干，头一回听到了诸如“前线”、“抗日”、“牺牲”等新鲜名堂。白面书生是“上面”派来做什么“民运”的，连当了保长的八爷也让他三分。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心慌意乱的李家堡人，再没了做营生的心思，整日聚在场院上听那白面书生口沫乱溅地讲，李家人们搞懂了，他是要人们相信，我们干得赢日本。当然干得赢，咋会干不赢？过了那么多老总，一人一泡尿也把狗日的们呛死。这个阵仗大了，李家祖宗怕都没见过。当白面书生对着这些呲着满是烟垢黄板牙的李家汉子说到国名时，人群中那个又矮又勾随时神兮兮的驼子猛地嚷起来：“哈，中——国？老子们中国！嘿！”这惊咋咋的一声，骇得众人一抖，便笑骂：扯疯，自家是哪国种都晓球不得。中国就是……安？！就是县了嘛。“屁！”李家堡的先生气了，把烟锅往地上一磕站起来，山羊胡一翘，双手抱拳唱戏一样地说：“中国乃大清，大清即中国是也！”书生脸上的慷慨激昂立刻凝固，非哭亦非笑，把个白净净的脸生生蹩成付猪肝。 没过多久，就有汽车往回开了，拉的全是缺手断腿的伤兵或死人。李家堡人头一次听到了瘆人的呻唤声，头一回嗅到了令人翻肠倒肚的尸臭，接着就有了三五成群破衣烂衫满是血迹污垢的老总窜回来，到处使枪弹换鸡换蛋，连包谷粑粑都换，全无了去时的威风。后来从高脚岩方向开来了一队穿着齐整的老总，十几个人，由一个叫李上尉的官领着，在公路上架起了机枪，受了伤的放行，好脚好手的全部撵回去。当李家堡的人听见了隐隐传

来的晴天滚雷似的炮声时，公路上北败的老总就从三五成群到蜂涌而至了，任李上尉他们脸红筋胀声嘶力竭，也难挡住这些失了魂魄的人们。到后来败兵们竟把枪对准了李上尉他们，一身灰尘双眼血红的李上尉和他的部下无可奈何地撤下了公路，他们同李家堡人一起站在路边，目送北败的老总们拼命般窜过高脚岩过江去了。 那雷一样的炮声日渐清晰，公路上却冷寂了，目睹了这次前无古人的大进军和大溃退后，李家堡人习惯了热闹，他们觉察到了这冷寂不祥的意味，看着灰白色死蛇一般的公路尽头，人们猛地记起了过去那些个宁静祥和淡泊悠远的日子，竟恍若隔世。 又近黄昏，高脚岩后的太阳肯定象颗颤颤欲滴的大血珠悬在远山的顶上，因为整个李家堡都被反射的夕辉浸透了让人心惊肉跳的血红。炮声停息了，山野愈发静，在公路边呆了一整天的人们终于明白，再不会有自己的老总从这条路来了，要有的话，就只会是…… 上尉和他的部下正在公路对面收拾东西准备向北撤离，沉默的人们把视线一齐投向了沉默的八爷，他们企盼这个李家堡的“天”能象往日一样令李家子孙逢凶化吉。八爷感受到了压力，他想过逃难的事，但人可以投亲靠友，那几代人的家业能带得走吗？人都散了，就没了势力，今后李家在这方圆几十里的脸面往哪里放？八爷怕日后咋个向高脚岩上的列祖列宗们交待。八爷背过身子，面向村口的老碉楼，目光投向了高脚岩顶，他是在向老先人们讨个主意？还是在乞求他们冥冥之中的保佑？良久，风水先生吧嗒着烟锅踱到八爷身旁说：“两国交兵，百姓遭殃，这不假；可谁做皇上也要让老百姓过日子，不然他做谁的皇上？”他顿了一下又说：“李家堡的劫数未到！”他晓得八爷的心事。李家堡连主事爷都可以更换，可先生就是先生，他自有他的高明之处，这就不是其它人可以替代的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抵抗！只有抵抗！”人群里传来白面书生尖利的声音。先生眯眼咂烟，没听见一般；八爷掉头冷冷看了他一眼，说：“屁！”然后转向李姓人们交待：“回去告诉大家，不管是捡来的还是换来的洋枪炸弹，要就丢得远远的，要么就藏扎实……”他瞟了一眼白面书生后接着说：“谁也不要给李家堡找麻烦！” 八爷话音未落，碉楼老坎上噌地撑起个又勾又矮的声影，是驼子，他拍屁股跳脚大声八气地嚷嚷：“要炸了要炸了……”人群兀突惊一头便唿啦向驼子涌去， 七嘴八舌地问：“是哪样要炸了？”“讲清楚点……”驼子得意地看到了他所期待的效果，想起几天前被众人讥笑“不晓得是哪国种”的事情，就觉得很解气。“哪样要炸都晓球不得，你们算什么……中国？”驼子居高临下，指头在众人脑壳前点点戳戳。一个女人挤出人群，上去给驼子兜头就是一脑掌，拧着他的耳朵令他快讲，兴头上的驼子恼怒得正欲发作，扭得一看是他姐就尿了，歪着头说：“我们的老总不要日本的老总过江要在太阳落山后把桥炸掉”。“你咯见着你姐夫？”“我怕桥炸断回不来就没过江。”“鸡和蛋呢？”“换着稀奇东西了！”驼子说着又来了兴头，把头一甩挣脱了他姐姐的手，提起背兜眉飞色舞地眩耀：“瞧瞧，这个可以开山炸石，这个用绳子下绊还可以炸野物……”众人伸头去看，认得那有把子的铁坨坨是炸弹；那几块用黄纸包着的小方块却只有白面书生晓得，叫什么“梯恩梯”说是比炸弹还恶。驼子的姐姐黑风丧脸地扬手又给了驼子一脑掌，不待他反应过来，就被跌跌拌拌地拽走了。 可怜的驼子没能把姐夫请来为家人搬迁逃难出力，不但把他姐隔在了江这边，还给李家堡人带来了这么个让人绝望的消息。象是印证这消息的准确，暮色中那高脚岩方向的天边扯了几道闪，接着就是几声沉闷的轰响，随着这几声轰响，李家堡人的心一下坠了下来，原来盛放着心的地方空荡荡的，被抛弃的悲凉的感觉填塞了那个空间。

与血色的黄昏大相径庭，天黑时分竟下起了沥沥小雨，李家堡村路上绝了人迹，家家关门闭户，人们惶惶不安敛声闭气地围坐火塘边，连狗都嗅出了异常，缩进狗窝一声不吭，间或一两声小儿的啼哭都能把人骇一机灵，往日饭后的热闹无踪可寻，若大个李家堡竟如废墟般的死寂。 这一片死寂中，李上尉他们一身精湿满腿红泥地摸回了李家堡。黄昏时的那几声爆炸；不仅绝了李家堡人的希望，也断了李上尉他们的退路。在江边，留守善后的人员向他们传达了上峰命令：滞留南岸部队，一律并入游击二师战斗序列。即便有一千个不愿意，而对血浆一样的滔滔江水也万般无奈，咒几声，叹叹气，李上尉率他的十几个兵只得重返李家堡。他们沿公路翻越高脚岩来到村口老碉楼下已是掌灯时分，面对黑咕隆呼无声无息的村子，李上尉不敢贸然进去，他让部下进了老碉楼，独自摸进村叩响了八爷的门环。 李上尉的到来，白面书生象抽了一颗大烟似地兴奋起来，不能过江回内地带来的恐惧和遭遗弃的沮丧一扫而光，他以为李上尉是奉命保卫李家堡的，至少可以带他离去，所以热情得让李上尉极不自在，他本来仅为食宿而来，明天就要向游击二师集结地出发，白面书生的热情却让他生出了军人不能保百姓平安的内疚而坐立不安起来。只有八爷还是冷静的，他的思考实际而没有丁点感情色彩，白面书生太天真，那十几个兵加上李家堡的全部也不能保住李家堡，这种仗火除了壮烈以外毫无意义，而李家堡不需要壮烈。他相信风水先生的话，李家堡劫数未到。既是为李家堡的生存考虑，让军队进村宿营就不合适了。一袋旱烟咂完，一直闷头眯眼的八爷磕磕烟锅沉沉地问：“住下了？”白面书生闻声急了，窜到八爷跟前说：“人都还在村外，咋个说住……”八爷冷冷地用长杆烟锅把他拨开到一边，直视着李上尉，李上尉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说：“都在村外碉楼里……”“那就好！”八爷接得极紧。“吃的等下就送去。”八爷停了一下对李上尉说：“老总啊，当老百姓的还要过日子，实在帮不了你什么了。”“咋个帮不了，李家男人哪个不是好枪手……”白面书生又冲到八爷跟前，八爷站起身气哼哼地说：“要是到了那种时候，李家堡任谁都比你狠！”说罢顾自离开了堂屋。李上尉凄然一笑起身欲走，白面书生一把拉住了他，要求同往，李上尉看他弱不禁风的样子，拍拍他的肩膀说：“明天再说吧，兄弟。”白面书生呆立在屋门口，听院门吱呀而闭，他沮丧到了极点。 李家堡人在惶惶不安中熬了大半夜，终于没能抵住身心交瘁疲惫的侵袭，抱着听天由命的想法在黎明时分沉沉睡去，就连老碉楼顶那困乏之极的哨兵也坠入了梦乡。天地间万籁无声，静得能听到露珠滚落的声音，淡青色的岚气在缓缓游动，象要把山、树、村庄都浮起来。黛紫色的天幕挂一弯残月，冷漠地注视着这些七高八低呲牙裂嘴的山们。微熹中，一队黄色的人马出现了，下了公路经直奔李家堡而来。行至老碉楼前，与出来小解的兵打了个正照面，双方都怔了一下，那兵醒过神来大叫了一声：“日本人！”紧接了一声枪响，那兵就被撂了个仰翻叉，几乎同时，碉楼内哒哒射出了一排子弹，碉楼上的哨兵也把手榴弹接二连三砸了下来。霎时，枪声，爆炸声和由此惊起的狗吠响成了一片，在山谷里激起巨大的回声。这突如其来的声浪，将李家堡自古及今的寂静击了个七零八落而灰飞烟灭了。 老碉楼前面对公路的一侧是一片开阔的田地，来自碉楼内的打击象一把铁扫帚将日本人一下扫到了几十米外的地埂下，田地里留下了几具尸体，吃了亏的日本兵爬着跪着支起了小炮，几声爆炸过后，李上尉就有了伤兵。李上尉真没想到日本人会冒雨夜行来得这么早，这么快，遭遇得又是这么突然，好在他占据了地形的优势。自第一声枪响开始，他就决定把自己交待在李家堡了。作为军人，尽管他清楚地

明白这种战斗的结局只有一个，拚死抵抗作出牺牲在军事上毫无意义，但昨夜在八爷家的际遇深深刺伤了他军人的自尊。趁日本人不明底细还未来得及实施迂回包围，李上尉把人全都叫到了楼下，他一脚踹开背对日本人通往老坎下的村路的碉楼门，用那挺捷克机枪逼着不愿走的士兵们，士兵们含泪撤离了。碉楼内仅余李上尉和三个伤兵与数十倍于他们的日本人对峙，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又发起攻击的日本人被那挺捷克机枪和不断飞来的手榴弹再次扫下地埂之时，那条掩护了撤退士兵的老坎也掩护了悄悄迂回碉楼后方的日本兵，刚停止射击的李上尉还没喘过气来，两颗手榴弹就塞进了碉楼……李上尉和另二个幸存者在昏迷中被俘了。 驼子的脑壳昨晚挨了他姐一顿暴抽后，他妈连涕带泪的恶咒也没能影响他的睡眠，自然也没影响他清早到自家地里拉屎的十几年如一日的习惯。驼子家靠村边，这天他同往日一样，睡眼惺忪地提着裤子，趿拉着的毛边鞋拖一路红尘，急不可待地奔地里而去。地头，驼子狠吸一口清凉的空气一用劲，排一推热烘烘的秽物，肚里倾刻轻松，便觉出头上的痛疼，一摸，竟有数个板栗大小的包包。“恶婆！”他咒了一句，挪个地方，面对了垒得很高的、他藏匿炸弹和“梯恩梯”的苞谷草垛。他很后悔没象以前他姐没嫁那时，见势不妙就钻到苞谷草堆里去，不就免去了昨晚那顿暴抽？他正边想边嘟囔，村口骤然而起的枪炮声骇得他一纵，一头扎进包谷草堆。枪炮声平息后，他随便捡块土垡刮了屁眼就拎起裤子懵懵懂懂往回颠。 村路上隔了十几步就站着个穿黄衣、荷枪实弹的老总，不见别的人。狗们大慨都让主人们拴住了，只闻其声。驼子进村一看就怔住了，他何曾见过这种阵仗？手一松，大裆裤唰地滑落脚踝处，他弯腰想把裤子提起，只觉脖颈处一紧，双脚便离了地，一只大手提着他开始了运行，耳朵听见的全是咿哩哇啦的、他搞不懂的话。“日本！”他反应了过来，他没怕，真的，他很想表现得象条汉子，但首要的是先把裤子提起来，露着羞处是无论如何也充不成汉子的。于是他开始了提裤子的努力，接连几次都没成功。就这样，驼子精个白花花的瘦屁股被提到了日本官面前。双脚才一着地，驼子第一动作就提裤子，在拎着裤腰左右一搭再向内一掖的系裤子的过程中，驼子想好了，他要尽可能挺直驼背，仰起脑壳，还要叉开两腿攥起拳头，大吼一声：“老子们中国！”他系好裤子在挺驼背仰脑壳过程中，眼睛自下而上地滑过对面那日本老总的腰间，看到了一把长长的腰刀，他没敢吼出来，样子自然也很不汉子了，那日本官对提驼子的老总厉声呵斥，那老总就把脚“啪”地一磕，“哈！”了一声，同时把头也向驼子点了一下。“哈个鸡巴。”驼子想骂还是没敢骂出声，但是感到顺气得很。那日本官笑咪咪地拍拍驼子，伸伸大拇指，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掏一大把花花绿绿的小块块递给驼子，驼子没动。日本官剥了一块丢嘴里，又向驼子递来，怕球！驼子接过来嘁哩咔嚓吃了起来，甜！驼子的紧张随糖一起溶化了。说真的，还真没谁拿正眼看过驼子，更莫讲是这种级别的待遇。驼子心里受用得很，觉得日本老总也还可以，不象白面书生说得那么骇人，想起村人们惊惶害怕的样子，驼子有些好笑，就有了高人一等的得意。当日本官给驼递来一坨小草墩似的盐巴时，驼子向日本官咧开大嘴笑了。 八爷被惊醒时，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穿好衣服出屋门，正看见穿裤衩的白面书生从斜靠在院墙上的牛车架子上往下溜，白面书生见了八爷就急急奔来，八爷见他面色青白，嘴唇、掐着小枪的手和光着的腿肚子不知是冷还是怕都在瑟瑟发抖，他语无伦次地说：“……来了……来……了”八爷暗自庆幸自己的决断，若不及时把这酸秀才从风水先生家弄到自己家来住，真晓不得他会给李家堡招来些什么灾祸。八爷面无表情地用长烟锅

指指那支小枪说："把你的猪脚把把丢到茅厕里！"然后整襟伸袖，洞开院门，在家人注视下，端着大烟锅四平八稳地步出院门。他刚迈出门坎还未下石阶时，一支上了刺刀的枪唰地横过来，拦住了他的去路，这动作无声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他：你已不是这方土地上的"天"了。八爷收住了脚步却没后退，他没看挡住他去路的人一眼，目光投向那高高的高脚岩，眼里闪着两朵极亮的小火花。 驼子带着一干日本人来了，他嘴里塞满了糖果，从嘴角延伸到衣襟的涎水丝颤颤悠悠，在刚冒头的阳光下亮晶晶的。话是说不灵醒了，驼子只用手指指八爷便顺墙一蹲，把玩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去了。日本官笑咪咪地迎八爷走去，横在八爷面前的枪收回去了，八爷对日本官伸来的手无动于衷，那只手毫不尴尬地顺势一挥，一坨盐和一板洋布送到了八爷跟前，八爷神态如初，那手又一挥，东西就绕过了八爷送入了院门。八爷虽然没有因此而对这些日本老总产生一丝好感，但却敏锐地察觉到：李家堡的劫数未到！真被风水先生说着了。在极短的时间里他权衡了利弊，为了李家堡他不得不与日本人有限的合作。八爷是这么一个人，他不知道韩信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却深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退与忍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遍及了整个民族文化，渗透了民族精神，男女老少谁都能说出点道道，但要寻找并把握住最佳的机会恰到好处地运用，就有高下之分天壤之别了。八爷的精明过人之处正在于此。 八爷吩咐蹲在墙角的驼子去叫风水先生，自己则毫无表情地端着大烟锅兀自转身进了院门，那日本官一挥手，日本人一窝蜂地跟了进去。先生来了，他和八爷在枪刺的闪光下与老是笑咪咪的日本官开始了气氛尴尬的"谈判"。为保李家堡一方安宁，李家堡不要驻兵，这是八爷的唯一要求。日本官痛快地应承了，但同时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李家堡出十几人到高脚岩修碉楼，二是每隔十天给日本人送一背篓肉或鸡蛋，三在撤离前清缴李家堡所有的包括火药枪在内的武器。 躺在八爷家床上的白面书生被发现了。他是因了那张与本地人明显不同的脸而引起挨门搜索的日本兵注意的。那日本官仍是笑咪咪地来到白面书生的床前，他拿去白面书生头上敷着的毛巾，注意看了看额头，又扯起右手看食指。跟在后边的八爷慢慢悠悠地说："他不是兵，是我在江那边城里读书的侄儿，过江看我染了热病。"日本官大概听懂了"热病"，这种蛮荒之地特有的，给日本人留下了恐怖惨痛记忆的怪异的病，他笑容顿失，撒手离开了卧室。八爷注意到，白面书生躺在床上的身体虽在颤抖，而那眼中却了无惧色。"不尿!"八爷在心里暗自认可了这一介书生。 成了武器监交人的八爷和所有前来交枪的李家子孙，在场院上见到了满身血污的李上尉，他与另二个伤兵被绑在垒稻草用的木桩上。听到人声，李上尉抬起头睁开眼睛缓缓扫视着他的这些同宗家门，看着他们将那一支支残破的火药枪扔进架了干柴的土坑里，脸上露出轻蔑和讥诮的笑。人们没有散去，他们退出日本人的警戒线，远远地看着。和八爷站在一起的日本官喊了一声，来了三个兵，他们取出子弹推入枪膛，八爷注意到，子弹头是红色的。枪响了，三个人头爆成三团血雾，接着，三具无头尸体被扔进满是干柴和火药枪的坑里，一桶洋油泼了进去，"蓬！"火燃了起来，一柱黑烟径直冲向了李家堡的天空。 ……

"汉奸！"白面书生指着驼子骂。"汉奸！"被抽派了人去修碉楼的人家也学着骂，进而全李家堡人都把驼子骂作"汉奸。"对这新鲜骂法他们虽不全明白，但觉得骂得顺口，解气并且洋派。驼子感到太冤枉，他拼命解释又讲不清爽更没人想认真听，他讲不动了，就独自躲到苞谷草堆里咬着手指费劲地想：我还不是被抓的？只是带日本

找找人就汉奸了？再说人家给我盐还给糖吃，你们拿得出来我还不是可以带你们找人，又不是偷的抢的。八爷得的东西比我多，你们咋不骂他汉奸？想顺了，气就壮了，再有人骂他汉奸，他就嚷："咋不敢骂八爷？欺善怕恶，算什么……中国！"闻者皆结舌。然而驼子的家人却没让驼子喘一口气，先是驼子的老娘将那盐巴咚地掼进茅坑，就势一头栽了下去，驼子随之跳进粪坑奋力将老娘顶于驼背之巅，为此灌足了一肚子屎尿。后来被救起的老娘就一病不起，只要喘得过气就把驼子咒个灵魂出窍，驼子的姐就不失时机地给他脑壳上邦邦地敲上一个个青鼓鼓的"猪儿包"。驼子钻苞谷草堆的次数多起来，他把玩着那手榴弹和那些叫"梯恩梯"的黄方块，心里鬼火直冒，这些日本杂种偏生找着他，整得他里外难做人，想恼怒了就筋暴暴地吼一声"鸡——巴！"然后钻出草堆回家。 李家堡的日子难过了。日本人修的碉楼不偏不倚正好在李家祖坟的坟院里，头一批抽派去的李家子孙不愿在他们先人头上动土，不愿让先人尸暴荒野，日本人就把其中两人打个骨裂筋断送下了岩，八爷上岩交涉不仅毫不理会，反而给八爷立了两条规矩：一是要随时报告游击二师的情况，二是修碉楼的人不得反抗和逃跑，否则就驻兵李家堡强征劳力，以保证碉楼的修建。李家堡悲声连连，没有一家愿意再让家人上高脚岩去顶那两个被打废了的人的缺了，那日本人倒也干脆，将送吃喝的人扣下，放回一个被折磨得象痨病鬼似的人。人能好脚好手的回来就好。在八爷的指派下和风水先生的游说下，无奈的人们只好继续给日本人送吃的。象有了默契似的，日本人扣下一个送粮的，就放回一极度虚弱的人，这些人的妻儿老小一看那痨病鬼模样就涕泪横流。李家堡阴风惨惨人人自危。 一日，风水先生到八爷家。八爷晓得又是为给日本人送吃喝的事，就没吭气，他晓得先生肯定是又有了什么主意。果然，咂了一锅烟后，先生慢悠悠的说："喊驼子送吧。八爷一听如释重负，不禁喝了个"好！"当然好，一个残废人日本留下何用？让他去，免得他在村里戳村人的眼睛，也免得再往岩上派工，还给日本人以某种暗示。 其实日本人的碉楼也修得差不多了，人多了也麻烦。驼子去的那天，那日本官愣了一下，随即释然，笑咪咪地走来，挥动又胖又大的巴掌拍着驼子驼背的最高点象是表示亲热。瘦小的驼子被那熊掌似的巴掌拍得前仰后合，引一片大笑。驼子虽有些承受不住，但紧张害怕却减除了许多，便也呲两排七歪八扭的黄板牙对日本官笑得很灿烂。末了，驼子不但没留下干活，日本官还让他带回一个人，走时日本官让驼子转告八爷：多送些鸡蛋来。驼子神气了，汉子了，他在村人惊诧的注视下，使劲挺胸典肚目不斜视，英雄凯旋般地走进村路。到八爷家，他将大拇指翘起向肩后指指那个焉败屁臭的人，说："我讲个情，日本就把他放了。朋友嘛！"他把那长把背兜当地一掼，说声："日本要鸡蛋！"就晃着膀子走了。一想起村人们那满是畏惧的眼神，他心里真是受用得很。驼子再上高脚岩，这次日本官还是拍他个站立不稳，摇里晃荡不亦选举乐乎，照例一片笑。他回村时日本人给他吃了碗鸡蛋挂面，不仅又让他带回个人，还送了他一双高腰大皮鞋。才走出日本人的碉楼，他两脚左右一踢，那双断帮裂底的毛边鞋飞出老远，麻杆似的瘦脚插入了巨大的皮鞋，空嗵空嗵的皮鞋声极有气势地响遍了李家堡的村街村巷。驼子逢人就说：日本老总好！闻者侧目。他姐抬手又要抽他，他将脚一跺，空嗵！弄得动静极大，竟把他姐骇得一抖，手没抽下来。驼子益发觉得这鞋子的前主人——日本老总就是好！ 就这样，谁也记不得驼子送去了多少鸡蛋，送得李家堡的鸡几乎绝了后。抽去的人被驼子一个个带回来了。驼子趾高气扬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整天嚷嚷日本老总好，村人一见他就走得远远的。以

白面书生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对驼子的张狂是恨得牙痛，几次三番要八爷惩办汉奸，未了八爷只说了一句："办了驼子你们去送鸡蛋？"就全都哑了。眼见人都一个个回了村，白面书生他们背着八爷采取了行动。 又送鸡蛋，驼子兴冲冲地背上他那长把背兜，拖拉着大皮鞋空嗵空嗵地奔高脚岩而去。驼子把蛋送进碉楼交给日本伙夫，就听那日本官在门外叫，他往门外一伸头就见那日本官朝他猛招手，他走过去，日本官照例咚咚地拍他的驼背，又是前仰后合摇里晃当站立不稳，那群日本兵又是哄然大笑，连碉楼的哨兵都笑得一抖一拌的。驼子得意忘形，竟也伸手去拍日本官，不想那日本官竟然翻了脸，哇啦哇啦吼了起来，驼子有些不高兴，心想你拍我就不让我拍你？驼子又伸手想接着拍，日本官一挥手，那些日本兵一下上来就把驼子围在中间，嘻嘻哈哈地你推过来我搡过去。驼子步履趔趄象不倒翁像陀螺似地旋转摇晃起来。天旋地转中的驼子终于发觉，狗日的日本决不是在表示什么亲善！想到这里他腿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就在这时，碉楼里冲出那个日本伙夫，手里抓着几个鸡蛋，愤怒地嚷着，窜到驼子跟前，一扬手，几个鸡蛋就在驼子脑门上叭叭地炸裂，一股恶臭弥漫开来，日本人捂着鼻子退后了几步，连驼子都干呕了两下。完了，鸡蛋被人作了手脚。驼子惊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官火了，他令驼子跪在碉楼前的空坝上，那个伙夫提了铁线钳子复来，将铁线用钳子绕于驼子脑袋上拧了个邦紧，驼子又疼又怕浑身发抖，却是不敢吭声。日本兵们抬出那篓鸡蛋，一人抓几只，一齐将臭鸡蛋照准驼子砸了个劈头盖脸，所有臭鸡蛋在驼子脑袋上嘁里咔嚓开了花，脓似的汁液糊了驼子一头一脸，漓漓拉拉流遍全身。经历了臭鸡蛋冰雹似的袭击，驼子的脑袋象被砸开了窍，他好象是有些明白那白面书生所说的"亡国"、"侵略"是咋个回事了。 太阳升起来了，这是一轮亚热带的日头，早晨的清凉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日上中天之时，热浪滚滚溽热难当，山野间仅知了在有气无力地叫着，这是狗都不愿涉足于太阳地的时光。一切都仿佛静止了，热，要命的热。独自顶着毒日头跪在空旷的院坝里的驼子，头脸和身上的臭鸡蛋汁液蒸发出奇臭无比的气味，他终于忍不住呕了一滩，空气里又添了一股酸臭。呕了一阵他不呕了，他已觉不出臭味了，臭鸡蛋的汁液开始结壳。汗液在不断涌出又在不断被蒸发，浓缩的汗碱叮咬着皮肤，奇痒，他伸手去抓挠痒极了的地方，日本人喝斥着跑来，将他两手朝后捆在驼峰之下。后来的奇痒变成了灼痛，周身火烧火燎的。随气温升高，真正要命的是那紧箍于脑门上的那圈铁线，心脏的每一次搏动，都给脑壳带来一阵欲裂的痛疼。驼子狗似地张开大嘴喘粗气，半睁半闭的眼睛无神无奈地呆望着前方被升腾的热浪弄得晃乎不定的景物，膝盖早已没有了疼感，取而代之的是万虫钻肉般的麻木，这麻木遍及了膝盖以下的小腿。"狗日的日本杂种，怪想得出些名堂来治人……"驼子心里骂着，而身体却太想动一动了。只要让动，哪怕重新换一种更难受的姿势。但驼子不敢动，之前的每一次动作都召来碉楼顶哨兵的叫骂，那日本伙夫就拎根烧火棍应声而至，给驼子身上暴起些由红到紫黑的鼓突突的道道。驼子已经晕乎乎的了。不知从何时开始，碉楼内外静得如无人一般，一只大蚂蚁爬到驼子眼皮上狠命叮了一口，驼子一颤，从无意识状态中回过神来，他偷偷向碉楼顶瞟了一眼，发觉哨兵不见了，只剩那张膏药旗一动不动地耷拉在竹杆上。他眨眨眼，极小心地动了动，碉楼方向没反应。动作再大些，还没动静。驼子激动了，"日本杂种也怕老子们中国的日头！"他边想边麻着胆子将左膝向前挪了一步，右膝随之跟进，碉楼反应如故。驼子跪着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逃生的长征，一尺一尺又一尺， 待驼子挪到离碉楼十几丈的坝坡下后，他

站起来朝岩下一溜烟地奔去。 第二天清晨，微熹初露，驼子又被急迫的便意蹩醒，照例不去茅房，而是忍着身上的伤痛，捂着青紫的脑门，又奔自家地里而去。当驼子在苞谷草堆旁褪下大档裤还来不及体会排泄的快意之时，村里的狗们突然吠成一片。他立即钻入苞谷草堆，他扒开拦在眼前的苞谷草向村里望去，只一眼就把眼睛吓得睁开老大：一伙日本兵围住了他家那幢茅草房，两个日本兵走到门前只一脚就把门连带门框一起踹倒了，他们闯了进去，屋里就传出他姐惊乍乍的尖叫和他老妈不换气的咒骂。没多久，赤着脚仅穿小衣小裤的驼子姐姐被日本人扯着头发拖了出来，人还没站稳，那个日本官上前一把就扯去了驼子姐姐的小衣，一对白花花的奶子裸露无遗，戳眼得很。驼子老娘咒着，摇摇晃晃地出现在门前，手才撑住门边，就被一只枪托狠狠地杵个仰面朝天向门内倒去，恶咒变成了呕呕干嚎。这种遭雷打的事，纯朴的李家堡人是以断子绝孙猪狗不如加以诅咒的，他们即便开仗火打冤家也从不去碰老人女人和娃儿，这种事自古以来尚无人见识过。草垛里的驼子惊骇的两眼瞪得如同牛卵子，可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被日本兵从茅房上撸下来的干松毛，把驼子家门洞堵个严实，火点燃了，火叶子忽忽地舔着房檐的山茅草，房子冒出了越来越浓的白烟，而后“蓬”地一声燃成一支硕大无朋的火把。这时，驼子的姐姐被按倒在松枝搭就的茅房后，白土布的小裤被一个日本兵挑在枪头上举得老高……驼子一头栽在红泥地上昏厥过去，在他意识的屏幕上摄下的最后一幅景象，是红色烈焰背景下的白色小裤，红得戳眼，白亦戳眼。 驼子醒来爬出草垛时，李家堡不见人影不闻人声，一片坟墓般地静。驼子缓缓走到家门口，脚一软，咚地跪下了。他伸头朝茅坑里看了一眼，清粪水里漂浮着他姐精赤的躯体，他嘟嘟囔囔地说：“死了好！死了好！”他反来复去地念着，慢慢爬起身，使劲扯倒了尚未完全倒塌的茅房盖住粪坑，然后挪到他老妈炭似的尸体旁歪头看了许久，继续念着“死了好”，疯狂地将烧塌的土块，石头往他老妈那里堆。人们不知何时来了，几个汉子过去帮驼子，却被驼子血红的眼睛逼住了，他们相互对视一下，放下手中的石块、土块搓着手讪讪地退到一旁。就这样，人们无言地看着驼子用废墟的遗留物、曾构成他的家的东西，填平了茅坑，为他老妈垒起了一座不方不圆的坟。驼子这才拍拍手跪下了，泪水扑嗒嗒涌流出来，人们没有听到哭声，只听到那从牙缝中迸出的“死了好”那没完没了的念叨。

那两大堆苞谷草垛成了驼子的家，任谁也无法将他劝离这里，他要在这里守望他的已故的亲人。一连许多天，富有同情心而记性又极差的李家堡人似乎忘了驼子是个千夫指的“汉奸”，不断有人往草垛那里端吃送喝。驼子是端来就吃拿来就喝，不吭一声气也不看任何人，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那个神经兮兮的驼子仿佛消失了。一矣天黑，驼子拱出草垛来到原来曾是他家的那块地方，守着掩埋着他老妈的土石堆，一跪就是半夜。村人们都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驼子这回早迟怕是要整出点事情来。 驼子按山里的规矩守够了时限，送鸡蛋的日子又到了。头晚驼子在他妈他姐的葬身之地跪到半夜后，返回草垛拿了一抱东西去了八爷家，回来后他没再钻草垛，而是坐在坟堆前，将那东西又缠又裹地乱了半天，临近天亮时分他把那坨东西塞进了装鸡蛋的背兜。驼子不知道，就在他捆扎忙乱之时，八爷带领李家堡的汉子们都悄悄离了家，连狗吠都没听见一声。 黎明来临，驼子收拾好了东西，他仔细拍打了身上，转身面对曾是他家的地场，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下跪，三个响头咂得红泥地咚咚响，磕了个有声有势。他起身环视着李家堡的红土、绿树、白雾、蓝天。一阵清风拂面，驼子猛吸一口凉凉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

一群鸟儿从他头顶的天空掠过，扔下一串叽啾的晨唱，驼子目送那群小精灵消失在深邃的天幕，那张多少天来无悲无喜无怨无怒木然的脸上竟显露出些许活气，他挎上那只与众不同的背兜出发了。行至岩坡上，他回头看了眼尚笼罩于缭缭白雾之中的李家堡，随即扭头噔噔地踏上了上岩的路。 日本官今天心情特好，他蹲在距碉楼二十步开外的土壕里边拉屎边嘘嘘吹着怪声怪调的口哨。昨日联队押运弹药来的人，给他带来了一纸嘉奖令，联队长夸赞他自筹粮草有方，防区内没有民众暴乱和游击二师的骚扰。他清楚联队的其它据点常与游击二师接火，他也清楚因战线过长和这里的雨季，联队对粮食供给十分恼火。若说他至今未与游击二师照面是他的运气的话，那么自筹粮草的成功与其它同仁相比就分出了高下，他真是很得意自己亲善加强制而取得的效果。对驼子家采取的行动仅是针对一家一户有限的行动，目的是要威慑李家堡人，摧毁其试图反抗的意志。他认为他成功了，他没象他的同仁们饿肚抢粮还损兵挨骂，他拥有了晋升的筹码。为此他昨夜山吃海喝，直闹得消化不良，大清八早就拉了个乒乒乓乓。 正当日本官想入非非之时，驼子被哨兵放进了碉楼。碉楼底层，那日本伙夫喝令驼子放下背篓随即抓了几个鸡蛋，绕开冒着白汽的锅，到枪洞眼那里就亮连磕了几个嗅嗅，当他象以前一样生吞一个鸡蛋后满意地转过身时，就立时呆成一段木头戳在那里了：驼子靠着门边墙根角那堆码得有半人高的弹药箱，握着绑满“梯恩梯”手榴弹的手放在弹药箱上，他伸腿将碉楼门蹬死，怪怪地笑起来，另一只手把脚上的高腰皮鞋脱了，手一扬，皮鞋准确地飞入冒着腾腾白汽的大锅里，一股异臭立即飘出。他对那还端着钵拿着蛋壳的伙夫弯弯膝盖指指地，伙夫准确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扑地而跪，大颗大颗的汗珠沁出额头。驼子伸手从背兜抓起鸡蛋，一个接一个地、慢慢悠悠地砸向前面的脑壳，仿佛在从容不迫地品尝着，享受着什么。鸡蛋快要摔完了，那满头满身蛋液的日本伙夫的神经终于崩断了，他哇哇怪叫着一头扎到柴堆里，双脚还使劲往里蹬。楼上的日本兵听到怪叫，一下涌到楼梯口，看见驼子那样，都魂飞魄散地楞在了那里。驼子嘿嘿笑出声来，笑着笑着嘎然而止。他攥紧拳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挣个脸红筋胀眼睛凸突，声嘶力竭爆爆地喊了一声：“老子们中——国——！手一拽，一股青烟从手榴弹把子上的小洞里嘶地喷射出来…… “轰！”一声巨响，恰似晴天一个霹雳，领着李家汉子包围碉楼的八爷是先看到那碉楼一抖，将楼顶的哨兵弹飞了下来，才听到了响声，整个碉楼酥了似地坍下。那些端着藏匿多时的快枪的汉子们全被震蒙了，耳朵嗡嗡叫，竟没听到八爷的号令，直到那被震落坡脚晕了的哨兵跌跌爬爬动起来时，这些百步穿杨的枪手才醒过神来，端枪就射。一排子弹飞去，那哨兵就成了筛子。 岩顶，李家汉子们在废墟中起劲地翻着。真希望再爬起一个来。嗜猎的脾性加上仇恨，这欲望决不是射杀一个哨兵所能满足的。八爷没动，他不指望在这种爆炸之后还会留下点什么完整的东西。他站在一大石块上，背着的手搓着几粒上岩后捡到的红头子弹，眼睛远眺岩那边血红的大江。白面书生带游击二师的人来了，他是昨夜八爷派去的，他们白赶路，连八爷都没料想到，仗火结束得这般干脆。白面书生气喘喘地来到八爷身边，惊诧地问：“完了？”没人回答，八爷动也没动。白面书生四周看看又问：“炸的？谁……”“驼子。”闷头咂烟的风水先生应了一声。“哗啦 ”一声响，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土壕石块堆里爬起个晃晃悠悠的人来，只见他满头是血，无耻地光着屁股，裤子连同脚都还埋在土石里。八爷一摆手，几根就要击发的手指离开了枪板机，他伸手要过杆枪，咔咔几下退尽子弹，两粒红头子弹被压入弹仓，哗，弹上膛。“是狗日的

日本官！”人们认出了这笑着杀人的杂种，这声喊，令那日本官一颤，他仰头看见众人和八爷对着他的枪，他一下反应过来，求生本能促使他转身就跑，可套住脚的裤子连绊了他几个跟头，八爷没举枪，那日本官跌着扑着滚着爬着又跑出几丈后，八爷缓缓抬起枪，那风水先生从嘴里抽出长杆烟锅随手一丢，说声：“我来！”从八爷手里接过枪，扭头朝地上射泡烟痰，然后枪一顺“当”就是一枪，奔跑中的日本官的头一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一闪即逝的血雾。八爷拿过枪，迎天扣动了板机，“驼侄，老叔有礼了！”八爷的眼中噙着两粒波光闪闪的晶莹。 白面书生呆望着，一切是这般突然和神奇，一群不知何为“中国”的山民村夫，一个早晨就把恶得扯闪的日本人收了个干净，将一切颠倒了回来。待还过神来他想起的第一句话竟是“……到那种时候，李家堡任谁都比你狠！” 太阳从东边的大山背后爬了起来，又大又圆，血红，把沉聚于半山的雾汽浸成赤色，高脚岩似滔滔血浪中的一叶帆。血色阳光下，狼藉的战场于苍凉的寂静中，荡一股融融暖意。岩下，响起一排枪声，这是游击二师——李上尉旧部的弟兄们在向他们的长官致敬，这是本世纪这方土地上关于战争的最后一排枪声。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古堡·人物】系列：

瞎子

改朝换代了，世道变了。李家堡村外那条兼有泄洪功能的牛车路，车碾水冲更显深了。在这如沟的路上，看老坎上那座愈加破败的碉楼，就有点看村后高脚岩的味道了。又过了一、二十年，碉楼虽朽，却需仰视。自然，我们的八爷也添了几把岁数，人变得不但更精，且老辣了。

李家堡有了吃官粮的干部，官家的事八爷管不着了，而民事村人们都更愿意找他，和那根权杖似的大烟袋一样，八爷还是八爷。于是，李家堡的官事民事分工明确，搭配合适，相得益彰，无论八爷、干部、村民们心里头都安逸。八爷这人的乐善好施和他处理李家堡内部事务的得法，令村民们佩服之至，人们得益于一方安宁，自然感激他。八爷得人心得很，真个是有口皆碑。那个李家堡最可怜的瞎子常念“菩萨心肠哟”。

莫看瞎子现在瘪着两只眼窝，勾着腰杆扬着个脑壳，一根烂竹杆的的哆哆敲穿了多少个日月，以前他可是个比山鸡灵醒，比野兔活巧的好枪手，只要他去赶山，就没有干着回来过，打着的野物也从没有活的，因为野物被击中的部分差不多尽是脑壳，所以他出手的皮子都是能卖好价钱的货色，李家堡也少有人没尝过他猎的野味。李家堡周围方圆几十里，他是有些名气的，算得上个人物。

那年春上，八爷对他说：“说个媳妇吧，给你那死鬼爹妈留个种”。他勾个脑壳，一双乌黑的手把那蓬乱麻麻脏稀稀的发毛抓了半天，才臊着脸，裂开红口白牙说了两个字：“莫钱”。八爷看了看他那样子，又好笑又冒火，一根指头指指戳戳。“地里头的营生做好了不是钱，野物的皮子不是钱，你娃是手散，不抠着把着过球的日月。屙泡尿照照，你一身筋筋吊吊稀脏八脏，活甩甩一个叫花子，羞死先人”！八爷从嘴里抽出烟袋嘴，射一泡黄痰后摇头叹道：“扶不起的猪大肠哦！算球了，老子给你跑一趟”。男人做媒在李家堡是要遭人笑的，但成人婚姻又是做善事积大德，何况是给李家堡有名气的人物做媒，更何况做媒的是八爷。正常，简直太正常了，全村近百户人家竟未闻非议。

恰逢春雨天，八爷说媒回来，淋个精湿，春雨似箭，八爷病了。那风水先生说是着了风寒。作为李家堡有名有脸的枪手，他欠不起这份情，八爷为他说媳妇得病，叫他心头哽着硬是过意不去，于是他提了些越冬干货去看八

爷，八爷死活不收，搞得他心头愈发不安逸。只得悻悻出门，门口，八爷的女人把他叫到一边，要他给八爷打两只野物补身子。二话没得，他背枪上了山。春雨天的山林，到处稀扎扎冷嗖嗖，野物都钻了窝，他转了一天栽了几跟斗，头一回空手而归。“不该赶山的日子莫去惹山神”，他想起了枪手们的禁忌，他爹就是在这种日子赶山才滚了岩子的。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头阴阴地闷痛，眼皮就突突地跳。“噫？怕是惹到了”。回到家时已是黄昏，他卸下身上的行头，发现火药筒进了水。晦气！他摇摇头射口唾沫，往火塘里丢几块树疙瘩，随手将那竹制火药筒插到火塘灰里烘烤着。他颠着烤茶罐，心烦意乱，总觉着要发生什么事。就着起来越旺的火，他的眼睛不停地睃着屋内的家什……突然，他嗅到了什么，他意识到了，忙扔了茶罐伸手提起那已被烤得焦黄的竹筒，他失悔这从未有过的大意。晚了。“嘭”地一声，屋里爆出一团桔黄的火焰，他被烧得糊头赖嘴，眼水也被冲了。他瞎了。这是山神对一个违禁枪手的处罚，他比他爹幸运。

八爷一家在他养伤期间尽心得很，寻医找药挑水送食，能帮的都帮了。怕他想不开还经常来吹把嗑子，给他消愁解闷开导安慰。但八爷却不了解，他虽失去了枪手的眼睛，却仍拥有枪手的硬气。瞎子感受了从强者沦为弱者而被怜悯的那难言的滋味，对八爷的好意，却是十分领情的。伤一好，他就开始试探在黑暗里生存的本领，凭借枪手发达的感觉器官，瞎子很快就学会了自己过日子，唯几亩地仍由八爷代他召呼着。日子转得飞快，秋收了。春夏的劳作要收获，地要翻耕犁耙的服侍一回，等把粪肥弄到地头，又该播下秋冬的营生了，这是最紧扎的日子。收获的喜悦，播种的辛苦和着如虎的秋阳蒸腾起的热浪，呛得人气都喘不灵醒。瞎子着急了，他不忍再给八爷添忙，也想自己试试盘弄地里的事，便摸把镰刀磨了要去收苞谷。八爷气得发抖，直骂得瞎子三魂离体，这事传遍了李家堡，没人不说八爷是大善人，仁义！瞎子自然不好坚持，由了八爷去。

以后八爷就把那几亩旱地当自己的种了起来，瞎子也再不好得管了，有啥子就吃啥子，落个肚子饱，倒也过得不操心。日子一长，就乐得自在了。接连两三年的风不调雨不顺，背时，趟灾了。听那些有点耳眼的干部讲还是全国性的。很会过日子的李家堡人的饭食变稀了，炊烟之后全李家堡满是转着大碗边喝糊涂的唏哩呼噜声。艰难的日子为李家堡人提供了经验，可他们绝没料到，在未来的大灾难面前，他们细水长流的传统防范的手段，微弱无力得可怜。一日夜半，八爷摸黑来到瞎子屋里，悉悉嗦嗦地拖进几麻袋苞谷子。关了门，八爷坐到火塘边一面颠着瞎子递给的烤茶罐，一面嘘呼嘘呼的喘大气。八爷这是咋个了？全李家堡粮食紧缺的时候，他几麻包粮食不用马驮车拉，偏生夜半三更悄悄谜谜的亲自扛来？瞎子感到奇怪，却没吭气，默默地给八爷揩品茶用的小茶盅。八爷唏溜溜咂完一盅汤药似的烤茶后，他沙脖沙哑地说：“后面的日子怕是要熬着过了，这些苞谷都是你那几亩地里收的。你一个废人更难讨生活，想想嘛还是你自己去管吧，放在我那里，以后也难得保住……”瞎子心头热了：只有八爷这时才想得起他。感恩之情复苏了他枪手的豪气。话快冲出喉咙时，却被八爷止住了。“我认得你要讲些哪样！”八爷说：“日子过到这种地步也莫讲义气了，当不得饭。你的地皮我的气力，这点苞谷就算我们两家的，要得不？”瞎子憋到这时才讲出话来：“八爷咋个说嘛，不是你八爷我瞎子怕早都喂了野狗了，你说咋个就咋个，听你

的。”八爷一拍大腿道：“好，你好生听起，不管啥子时候都莫开腔给外人晓得，这苞谷我不吭气就莫动。”说完就起身将苞谷装进两口大水缸，埋到瞎子屋后那早已废弃的猪栏里。八爷临走时，鸡都叫了，他还在对瞎子紧咋咐。一夜来，瞎子不晓得点了多少次脑壳，应了多少声，终于急了，说“我就死也不得吭气的！要信不过我瞎子就埋到别处去！”八爷再没吭气，拍拍瞎子的肩膀，走了。

其实瞎子不憨，他也许比全李家堡人对灾荒的预感要早，除了他敏感发达的感觉器官外，他证实灾荒最直接的信息，是来自他摸摸索索在村外设置的套子夹子的收获上。自眼水被冲后，赶山是不行了，地里的活路又插不上手，但枪手嗜猎的基因并未死灭。瞎子伤好后，就在村边地头的竹林沟渠边设些机关，捕些山鸡野兔，偶尔也可捕到点稍大的狐狸、獾之类的。既享受了征服的快意，又弥补了荤腥之缺。近年，瞎子察觉到了山神的叹息，往年喧闹的山林正变得寂静，猎到的野物越来越少了，直到那一天，竹吊套勒住了一条饿慌了的狗，他收拾了猎具，拄着那破竹杆无声无息地游遍了村里的酒坊、碾房、豆腐棚，在村人们的不觉中，很是搜到了些馊豆渣烂酒糟和陈麸糠。瞎子的储备早就开始了，这是精明的八爷始料不及的。

救济粮没批着。蔫败屁臭的干部们回来对八爷说，连县长都吊着脖子吃饭！八爷问：“你们没叫县长把这里的储备粮拉走？”干部们讲：“目前粮食运输不安全，叫就地存好管好，县长说粮食就是人命，不能动，这是死命令。”八爷立刻意识公房里的那些粮食滞留在李家堡，无异于一颗巨大的、随时可能起爆的炸弹，它极可能引起人们的骚乱，这李家堡经不住，丢失政府储备粮的罪责，李家堡担不起。“先人！这回怕是要挨了。”八爷咕噜了一句。无论李家堡人怎样勒紧裤带，也挡不住盛粮的器物逐渐地浅下去。

人们锅里的饭食越来越清，掺和的草草叶叶越来越多，植物越来越浓的青黑色从饭碗里爬上了人们的脸颊。瞎子却没那么窘迫，他在加紧搜集那些猪不吃狗不闻的东西的同时，意外地在村外地里发现了隔年未收净的洋芋疙瘩。养全村人不行，但足够他一人活命了。天一挨晚，瞎子就在全李家堡人都饿得不想动的时候悄悄摸出村子，一刨就是大半夜，刨完就随便找个沟坎蹲下烧几个吃一饱，有剩余就带回家藏起，天一亮就睡大觉。

终于，李家堡断粮了。没多久，能吃的植物被一扫而光，山上也没了活物的踪迹，号称忠良的狗们突然于一夜间全部叛逃。人们流着泪咬着牙宰杀了牛，这可是他们的半个天啊！分肉时，暮色苍茫的场院周围，突然出现了无数绿莹莹的眼睛，血腥味吸引了狗，饥饿提醒了人们。于是，往日射杀野物的枪口对准了那些为主人立下无数功勋的看家狗、撵山狗们，直打得方圆几里不闻狗吠，当听说哪里狗吃了牛，狗吃了人，李家汉子们就遗憾得摇头咂嘴，为狗们不来李家堡而叹息。

当人们翻田鼠捉蛇的时候，瞎子的天然“粮仓”被发现了，人群漫过，所有的地全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坑坑洼洼的狰狞得很。民兵早就把公房看起来了，但干部们觉出公粮和种子仍然有人偷。八爷来了，民兵集合在院坝里，他黑丧着脸在队前晃了十几个来回，看着这些面呈菜色虚弱肿胀的人，他停步对干部们说：“每天称几两粮食给他

们煮锅汤喝格要得？”干部们略为商量点了头。接着，八爷转身对民兵说：“现在粮食就是人命，谁再偷就拿命来换！”八爷把话一说完，转身就去了风水先生家，一夜未归。还真有敢试一下的。那个内盗的民兵被抓了现行，捆成个棕子，同包在马褂里的粮食一起送到了场院上。干部宣布了盗粮事实，两个民兵押着盗粮人在村人沉默的注视下走过。忽然，人群中扑通一声，接着响起女人孩子有气无力的哭嚎，刺激得人们一颤，人声渐起。一直坐着没吭声的八爷站了起来，伸手拦住了要往村外走去的三人，人们安静下来。八爷和干部们说了几句后，面对众人道：“早年，干这类勾当的人是要被剁手撵出李家的，在这种要命的关口，拿命换粮的话也是我说的，干部也是莫得法呀！”他扫一眼怔怔的人群，接着说：“听人讲，这里那里都有饿死的，我们李家没有，不值得背个杀人的恶名。饶他一命算了，但人却是不能再留在李家堡了。”说罢，他提上那包着粮的小褂，随那三人朝村外走去。人们无声地目送他们的身影没入村巷，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村外那毫无生气、肃杀狰狞的野地，不由地打了个寒噤，他们想起那条被铜炮枪击伤后却对逼近的人群不管不顾而贪婪地舔噬自己身上的血的红了眼的狗……村口的碉楼边，八爷松去捆人的绳子，将手提的东西递给那人。面对死都不曾皱眉的山里汉子，此时却扑地而跪，泪流满面，求八爷将粮食转交妻女。八爷拍拍他的肩膀叹口气说：“粮你带走，是死是活你自己奔去吧，你屋里头的人我会看顾的。”说完就转身带人顾自回村了。

八爷和干部都到了公房议事。当晚民兵收缴了所有火枪。第二天就传出：“救济粮就要来了”的消息。但干部和民兵都不曾料到，处罚盗粮食事件和收缴火枪，无意中将村人的注意力引到了公房。公房那边飘出的粮食香味刺激着人们空荡荡的肠胃，疼痛难耐。踪迹无有的“救济粮”的消息，抵挡不住公房里那伸手可触的粮食的诱惑。骂声渐起，便有了“先分公粮再用救济粮充抵”的流言。八爷在堂屋踱来踱去焦躁不安的时候，风水先生急火火地一头撞入八爷家大门，气喘喘地抖着山羊胡子嚷嚷：“雨！……这两天肯定有大雨！”八爷如释重面露喜色。当晚，八你和干部带人连夜将公粮悄悄转移到了村头的碉楼里，人随之住到里面，不敢有丝毫大意。

瞎子可不知道这两天村里出了些什么事，自顾不暇的人们更是连想都没想起过他，在村外地里再刨不出什么之后，瞎子再不走动了，整日昼伏夜食足不出户，半饥半饱的他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的活动，减少体力消耗。他这么做是放不下八爷埋在他家的粮食，他不愿让人惊奇李家堡竟有个饿不死的废人。这天一早，瞎子正准备在火塘边躺倒睡觉，猛然被突如其来的脚步声和嘈杂人声所吸引，他推开条门缝竖起耳朵，当他证实人们是为粮食而去后，他吁了口气，说声“山神有眼”也夹了条口袋乐颠颠地随人流而去了。村口碉楼前站着八爷一行人和不时抬头望天的先生，他们紧张地听着人声奔公房而去，过了一阵，公房那边闹了起来，一股浓烟冲上了天。“公房被点了。”旁边那村干部颤抖着声音喃喃地说。“他们等下就要来了。”八爷的话音毫无表情。果然，村路边的村巷里出现了晃动的人影子。八爷眉毛一跳，定睛看去，是的，他们来了！一个、两个……八个、十……人群涌出巷口漫了过来。

八爷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他没敢犹豫，命民兵朝天放枪。一排枪响后，人群停顿了。没多久，人们惊愕的脸又木了下来，在后面人的推挤下，腿又开始了向前机械的移动。一步、两步……八爷朝前紧走了十来步，伸开两手

挡着人们。“乡邻们，听我讲……”他象突然被风呛了一口似的，半截话卡在了喉咙里。眼睛！他眼前是无数只闪动着莹莹绿光的眼睛。这些眼睛的视线直愣愣地越过他盯着碉楼。“狼眼！”他脑际中闪过这两个字，头皮一阵发麻，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身后的民兵有人软瘫了，有人溜了，还站着的连枪都快拿不稳了。毕竟是八爷，在回头的一瞬间即恢复了他往日的镇静。“乡邻们，救济粮就要到了，政府的粮就是皇粮，是万不敢动的呀！”八爷的声音空荡荡的令人感到他底气的不足，对饥饿的人群来说碉楼里的东西的诱感力是不可抗拒的。只几步路，生的希望便伸手可及，只消再往前几步。枪，带黑色死亡气息对着他们，死的确让人恐惧。回去？且不论今后如何过下去，许多人甚至连家都走不到了。死不过是时间和形式的不同而已，本质却无任何区别。枪不算什么了。那么八爷呢？今天的人们瞳孔里根本就没留下他的影象。人群只短促地犹豫了一下，又向前移动了。一步、两步……面对步步的进逼，八爷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退却。“我保证！明天发救济粮——”八爷挥着手臂喊得脖筋凸突面庞发紫。没人听他的，或者是人们没听见他说什么，他们失却了听力。作为回答，只是一片嘁嘁嚓嚓的脚步声。八爷继续后退，无可奈何，额头沁满汗珠。

瞎子裹在人群里，终于搞清了这是怎么加事情，八爷的叫喊他听到了。人们哪，怎么可以难为八爷啊！他费尽气力硬是挤到了八爷和人群之间。“回去吧，乡邻们，看在我瞎子的面份上回家吧”！瞎子？有这么个人，我们吃过你打的野物，可现在你有吗？想起喷香的野物肉，人们的饥火愈加炽烈了。“咕咚”瞎子被推了一扑趴，他很快又爬了起来，再次超过人群，横挡在八爷和人群之间，人们看到他脸上的血。“莫难为八爷，你们晓不得他了？”没有人理他。“嗵”瞎子被重重地撞倒在地，有脚从他身上踩过，红土的烟尘中，他几番欲起都被撞倒，手中的竹竿不知摔到了何处，耳边传来竹子被踩而爆裂的声音。他绝望了，心横了，待他艰难地挣扎而起趔趄地再次超过人群后，身子已靠在碉楼下的土坎子上了。此时，寂静的骚动中清晰地传来子弹上膛的咔嗒声，八爷原地未动面如土色地闭上了眼睛，任人们从他身旁穿越。瞎子站稳身子，止住喘息，挥动着脏兮兮的两手大喊：“到我家去，猪圈里埋着粮食！好多粮食，我的粮食！”

粮食？瞎子有粮食？人们的听觉只对这两个字起作用。对呀，八爷代瞎子种的那几亩地，是八爷叫全村人让给瞎子的最好的地，哪年的收获都不是个小数字，就这灾荒年收下的都足够他活了，还能没有大结余？这年辰正常的壮汉都找不到吃，一个废人咋会饿不死？人流停滞了，有人开始往回走了，紧接着人群全部往回颠了，仿佛瞎子把一块骨头扔到了一群饿狗的身后，其回奔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些饿得行将倒毙的人。碉楼前的所有人都瘫软倒地，长出一口大气。天边隐隐地响起雷声，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天，要下雨了，小不了。八爷和先生对视了一下，脸上竟如释重负地露出了不易觉察的微笑。瞎子摸回到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家”，天已擦黑了，他在一片狼籍中翻遍了每个角落也没找到一星半点可供充饥的东西。冷、饿、累交加，抽尽了他骨头里的精气，他歪倒在已被踏灭的火塘边迷糊过去了。当急骤的雨点把瞎子揍醒时，已近午夜。他突然想起八爷仍在碉楼看粮，那残破的碉楼早就没有顶了。瞎子撑起来，夹起身下垫的破席子往碉楼方向走去，他想帮八爷做点什么。哗哗的雨声中，瞎

子摸到了村头，刚出巷口，猛地与一个气喘嘘嘘的人撞到了一起，一个沉重的物体从那人肩上摔到了地上。“粮食！”感觉敏锐的瞎子从物体落地的声响里立即准确地作出了判断。怒火恶气一下冒了起来：为这些粮食，八爷和他是作出了怎样的牺牲啊！瞎子反应极快地出手抓住对方的衣服一拉，顺势勒紧了对方的腰。“贼日的好歹毒……”瞎子咬牙切齿地说。“瞎叔莫嚷，是我！”“小二？”瞎子一愣，那人就势挣脱瞎子的手扛上东西跑了。小二是我八爷的儿，也是民兵啊，瞎子疑惑了，同时他隐约感到雨夜中还有人在活动，不止一个。瞎子想起小二常帮他送粮，做事和八爷一家对他的好处，他不想去碉楼了，他带着不被信任的悲凉和重重的心事回去了。

瞎子摸到家还不到一袋烟，从不登门的风水先生摸黑冒雨的来了，屁股一挨草礅就开始唠唠叨叨反复盘问一声不吭的瞎子，问来问去就两句话：“格向别人讲过是哪个在你家埋的粮食？”“刚才你遇着哪个了？”好久，木头一样的瞎子开口问：“是哪个要晓得这些？”先生看了看瞎子，说：“是八爷。”稍停，先生又低声讲：“这些事情晓得不晓得你要掂量，今后可不敢乱说昏讲哟！”瞎子不耐烦了，枪手的脾气冲了起来：“球！八爷晓得这些，何必多问！再说，乡邻们吃了八爷埋在我家的粮食，那也是八爷的面子，他家小二扛一袋回去不为过嘛。”听罢瞎子一番话，老先生的脸色阴了，他默默地、悲哀地审视了瞎子一阵，摇摇头，鬼一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当人们再次涌到村外时，和那几个被八爷支回去睡觉的村干部一样，惊呆了：老土坎上，那座历尽沧桑的李家堡的象征不见了，碉楼只剩下几块翻倒的泥壁，八爷、先生一干人满身泥水。冲了，连碉楼带粮食都被洪水冲了。人们捶胸顿足指天骂地，诅咒不长眼的老天，绝望中，竟无人深究那水是如何漫出那条如沟的村路而冲了老坎上的碉楼的，更没人注意八爷、先生脸上那神秘的松快的神情。瞎子两天没吃什么正经食了，时至正午他躺在火塘边往口中艰难地塞着黑棉絮，突听人喊着叫着：“分救济粮了！”他念了句“山神有眼”，想站起来却怎么也办不到，他用尽全力爬到路旁，再也爬不动了，他求匆匆而过的人们带话给八爷帮他领粮。听者要么不理睬他，要么就骂他一句忘恩负义，瞎子一急头就晕了，头一下戳到地上，不动了。八爷给被逐出李家堡的盗粮人的妻儿亲自送了粮，没给瞎子送，也许八爷以为瞎子自己已经领了粮了。李家堡炊烟四起，久违的粮食香味弥漫，村街村巷中到处是唏哩呼噜叭嗒叭嗒的吃喝声，死亡的阴影远遁了，村子有了生气。空寂的村路上又有人声和脚步，盗粮人的妻女去八爷门上跪地谢恩的事，在村里流来传去，腹中盛了粮食的村人们的精神已恢复到能传播这类信息的程度了。“仁义！”八爷又是好名声。

几天后，人们在紧挨村边的地里发现了瞎子，他死了。身体周围除了爬痕外，手所能及的地方都被翻挖了，双手被血泥糊成刺目的两坨，嘴里塞满了泥土。……又是几天，县里来了汽车，装着粮食，说又是救济粮。县里的干部表扬了李家堡，大灾之年没死人，有功！却没人提存在李家堡储备粮的事，皆大欢喜。但这一切都与瞎子没关系了。李家堡人记不得也没想记得他们当初把瞎子掩埋的确切位置，瞎子连坟都没有一座，到阴间，他还是个孤魂野鬼。

孙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58

《古堡·人物》系列

血色

娃坐在那截被老雷神劈倒的原木上，两只小拳头支着下巴，痴痴地看着那血色的日头西下。

娃在这山坡上已经望了一天了，圆圆的小肚皮瘪了，那颗神气的眉头痣也黯然了。稚气的小脸交织着沮丧和期待，连他身旁的那条掉毛老狗也眯着满是眼屎的双眼，把头搁在前爪上，昏昏欲睡。

日头离山一竿的时候他就会来……

等到太阳离山一尺肯定会来……

再等等，等到太阳挨山尖再回家吧……

娃就这样等着，等着那个人。

娘告诉娃，是那人救了娘。在娘捡菌子的那匹山里，他的火药枪掀翻了两只向娘扑咬的豺狗，后来娘就跟了那人，再后来就有了娃。娃虽不明白个中道理，但他没有再问从未笑过的娘。娃只是觉得那人与他有关系，反正要没有那人的一火药枪就没有娃，娃对那人就很感激。娘活得很不开心，好象也与那人有关，娃又有点气那人。不管怎么说，娃和娘一样想那人，娃在心里千百次地勾勒过他的形象。

夕阳越来越低也越来越红了，把那山那树那人那狗通通泼了个鲜血淋漓。娃在想，这颜色一定同那人腿上的、外公胯间的血。

娘说有了娃就瞒不过外公了。火冒三丈的外公就要把娘送给山脚的那个瘦老驼子，娘跑了，跑到那人的独家小院去了，那路好远哟，要翻几匹山呢。这种事好象很不体面，在这片山里谁家出了这种事是要提出“对放”的，不然就脓包，抬不起头。那天外公提着火药枪带了外姓的证人硬逼那人站到五十步外，结果那人的腿跛了，外公尿尿

的家什烂了——娘说那人没装铁子，枪里只装了些沙石。

夕阳更红了，天地间的一切都象被凝成了酽酽的血坨坨，娃看见老狗惊讶地睁大了眼，血红血红的很象外公的眼睛。

外公坏！虽然娘不愿意娃这样说，但娃依然这样认为。娘带娃去过一次外公家，那是唯一的一次。去的时候娃高兴极了，老远的山路也没要娘背。可外公一见娃就鼓起烂红眼，骂：杂种！娃气了就说你活该。外公懵懵地问什么活该。娃说你的雀雀没有我的好。外公一巴掌令娃的粉嘟嘟的小脸变青肿了。娘哭了，娃没哭，扯上娘回了那几匹山外的独家小院了。娘说娃的眉头痣象那人，气性也象。娃就为此自豪。

落日又大又圆又红，颤颤巍巍的。那个十五的月亮也又大又圆，幸亏不红，不然狗眼就难辨那夜的那串火把了。

其实那人早就决定枪交外公了，这对山里的汉子来说，是宁愿大脚趾朝天也不会干的屈辱事，但为了娘，那人认了。只是因那时娃要出生离不开，于是那晚接生婆刚把娃包好，狗就发现了对面山上的那串火把。狗吠着迎去，惹来几声枪响。娘的兄弟替外公寻仇来了。那人说，我只能出山躲够五年，合了山里的规矩再回来。他抱起娃，抖着声气唤了声：娃——！就跛着伤腿跑了。娃的名字是那人取的。

山已经把那大日头咬残了，快要掉进大山的肚子里去了，淡青的雾霭缓缓从山脚升起来，把远山浮起。暮色中，山们肃穆深沉悠远。

娘说今天要煮毛豆、青包谷还要烤红薯干。娃想了起娘满是企望的脸。可是娃饿了，娃想要回家了。娃想站起来但他的小腿坐木了，娃想哭，却没有泪。

突然，狗伸直脖子耸起耳朵，不动了，它哼着嗅着，然后晃着尾巴站起来，瞪着山下。落日余晖中，一个跛脚汉从山下沿曲里拐弯的山路急急赶来，追着那道红与黑昼与夜的分界线。近了，近了，娃看见了那颗眉头痣，那人也呆呆看着娃的眉头痣，手中的小包袱缓缓滑落在地上，他抖着声气唤了声——娃？！跛腿一软扑倒了，怀中滚出血色的红荞饼和红皮蛋。娃嗖的蹿起了身，提一把欲坠的裤子，鼓起圆圆的小肚皮，脖子上起一道蓝色的筋，暴暴地喊：爹——！山，震得一抖。

娃拉着那人往家里跑。娃说娘等你哩，娘给你买了枪哩，娘做了好多好吃的哩，娘今天哼曲儿了哩，娘还笑了娘笑的时候真好看哩……最后几步坡爬完了，在他们面前，没有了那个独家小院，只有一堆硕大无朋的火焰……

爹来了，娘去了。娘给爹买的新火枪只烧剩了枪筒，爹给娃带的红荞饼红皮蛋供在了娘的坟头。爹哭了，娃哭了，两个山里汉子第一次哭了，哭得昏天黑地。

八月十五，是娃的生日娘的祭日爹的回归日，那天，月亮是血色的。

孙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古堡·人物】系列：

绝地（熬狗）

1、

狗的天，塌了。

天亮时分，连夜赶回山寨的狗，一下被眼前的惨景猝然击倒，昏厥过去。

火头已经过了，浓烟一团团翻滚着，向晦暗无风的天上涌去，连接了低垂的铅灰色云层。山茅草苫就的房顶化作了黑草灰，随腾腾烟气在半空打着旋飞飞扬扬，依恋着这个它们曾经覆盖下的家而不忍离去。几棵焦糊的柱子兀突地指向云幕低垂的天，火烟不断从柱子上迸开的裂缝中冒出。烧坍塌了一截的土夯墙，象被烟叶熏黑了的獠牙朝天狰狞地呲着。那几具焦黑的人体上，蓝色的火苗在不断跳动。灰烬中，两支日本步枪已经烧没了枪托，乌黑的枪管上的刺刀扭曲着翘了起来。废墟中不断地发出噼噼啵啵的爆裂声，为这所农家小院以往拥有的那些温馨与平和的日子，唱着最后的挽歌。

从昏厥中醒来的狗一脸冷峻，他整理出一块地场，归顺了死去的亲人。寻遍场院，竟找不到可以用来遮盖他们的物件，都烧光了。狗环视四周，站起身来，把还没烧完的竹篱院墙三下两下拆了，掩盖了他的亲人，然后发疯似地在废墟中翻找起来。弩机、箭镞、套索都烧成了灰，没了踪影，夹子也烧变了形，已经不能用了，连菜刀都烧成了弯曲的铁片。所有挂在板壁上的狩猎用具，都烧光了。狗只找到原来靠在竹篱院墙上的冲担和栓在上面的牛皮条，还有一捆浸泡在木桶里的棕索。

狗挎了棕索，提了冲担，来到他的亲人面前，并无有特别的悲与愤，和以往出门的道别一样平静，狗说：我去了，你们等我回来。说罢，狗寻着驮队留下的痕迹，匆匆而去。

……

突然，急急赶路的狗象是听见了什么，停住了脚步，全身一下紧张了起来，从背上把两头包了尖铁头的冲担顺下来，抓在手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侧耳倾听着，眼睛警觉地搜寻着四周。阴冷潮湿的空气中再没了他刚才捕捉到的隐约的声响。山林的沉静，把心跳急剧的咚咚声放大了。

狗浑身湿漉漉的，雨水浸透了他的土布褂子，褂子下摆的十二只衣兜和大裆裤满是红泥的裤脚，被山石树棵扯挂得一缕缕的，黑色大包头下的眼睛喷射着仇恨的火焰，赤红。他找寻着，地上的痕迹又隐没了，尽是棕黑色的枯枝败叶，狗伸脚踩了踩，就冒出了红泥浆。他蹲下身扒开这些枝叶，露出了被踩得翻浆的地上留下的清晰的蹄印和脚印。狗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自然累积的枝叶踩上去只会冒黑水，这是人为撒上的。这把戏都玩几次了。狗紧走几步，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一块突出于枯枝败叶之上长着绿苔的黑石头上，听见了！他听见从地下传来的他所拼命追寻的声音。狗激动起来，心想，甩我？祖公是干什么的？是在这大山里走了多少年马帮的马锅头！

挨千刀的日本杂种，老子追着你了！被仇恨烧灼着的狗把这句话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狗做了十几年的赶马人不假，说自己是多少多少年的马锅头，狗确是有点底气不足。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而且这马锅头还是八爷主动让给他的。

八爷是李家堡的保长。八爷从来不与官家打交道的，是几年前杀到江边的日本鬼把李家堡祸害惨了，后来预二师的来了，江边成了游击区，日本杂种的据点被阴一下阳一下挨一挨二的扫清了。八爷那次领着寨子里的男人和预二师的弟兄掀了李家堡高脚岩的碉楼，那些作孽的杂种一个没跑掉。从那时起，八爷就应了保长这个差，打日本的事情，他都领着族人顶真去办，做得有板有眼。以前从不过问官家事的李家堡就还成了“模范村”呢。

县里给李家堡的公干是为在敌后游击的预二师运给养。地处边地的李家堡，本来就是千年古道上的驿站，谁家没有跑马帮的经历？八爷亲任马锅头，筹集骡马挑选人，拉起了马帮。狗想做马锅头。他家几辈人都在这古驿道上“搭帮”，很有些年头了，可就始终没有人做过马帮的最高掌事——马锅头。这座被称为“天界”、“高脊排穹”的大山里，细若游丝的古驿道在苍翠的山林里若断若续时隐时现，断头路、飞石口、倒马坎、望乡箐、收命崖、紧走三步……狗熟悉它们就象熟悉自己的掌纹。那山道险，悬崖峭壁深沟大壑的，他是亲眼目睹了多少命丧绝壁深箐和激流滚石的惨剧啊。那点经验全是命换来的，这怕也是八爷首选了他的缘由。狗想做马锅头，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格和能耐，但他没说，心想，小锅是不是铁打的，上路才晓得。可就几个来回，狗服了。八爷终归跑过大码头，见多识广，道上的行规礼数无一不通，对驿道的熟悉程度，也不见得就比狗差多少。而在日军眼皮底下走马帮，就是狗所不曾经历过的了。欢实的马铃铛摘了，恣纵的撩拨得人心漾漾的山歌是不能吼了，连马嘴都用竹笼子套住，横竖是不能有大响动。给赶马人温暖和希望的火也不能生了，吃干粮喝生水，老铜锅烤茶罐几天都用不上一次。马屁股后都系了马粪兜，人也不许乱扔东西，每次歇息后的地方都得抹去痕迹。每到那些关口，人心都是悬吊

吊的。

那次夜过青石板，眼看就剩最后几驮就过完了，寂静的夜里突然传来马吹响鼻的声音，日本鬼呜哇呜哇叫起来，八爷命两个赶马人飞身上马，打着尖利的呼哨向来路狂奔而去。在暴起的枪声中，马帮从容离去。如果说这次让狗开了眼界，对八爷的机智由衷赞叹的话，后来八爷收拾了三个日本鬼后，便对八爷钦佩之致了。这大山里的驿道，纵横交错如蛛网迷宫般，赶马人是根据季节、天气、货物交接、人马状况选择线路的。除了隘口，古驿道并非仅此一条。那回他们带预二师的伤兵返回时，被发现了。三个日本鬼追了上来。枪声中，赶马人慌了，八爷冷冷一声，喝住人们，随即把马帮带上了老冲沟。这是雨季大山泻洪的通道，被湍急的水流冲刷得笔直狭窄，旱季里就是寸草不生的干沟，也成了马帮抄近路的一条通道。不知死活的日本鬼顺着狭窄的老冲沟追来，八爷一声号令，几块大滚石呼隆隆推了下去，三个日本鬼就身首异处了。

这回动静整大了。带回去的枪和钢盔被送到了县城展览，县太爷差人敲锣打鼓给八爷送来了大红帖子，说还要奖励李家堡三匹好马。城里那些好看的学生娃娃还到李家堡“宣传”了一回，八爷披红带花老爷一样坐戏台子，李家堡扎实风光了一把。而此时，八爷象是看透了狗的心思，长袍马褂打扮得乡绅模样的八爷在去县里受奖的前夕，把狗找来，手中的大烟袋杆指指划划一番，就把马帮交代给了他。

狗当上马锅头了！狗对八爷真真是服气得五体投地。八爷就是八爷！狗这样赞叹。

翠儿却不这么认为。她说李家堡的马帮这回算是和日本鬼结仇了，再走马帮就不会那么撇脱。翠儿是狗的媳妇，她背着狗儿在锅台边忙碌着，并没有因为狗勾头咂烟半天不吭气而停下她的说道。她说八爷是见好就收呢。说八爷是缩头乌龟呢……。狗听不过意了，闷闷地说：乱讲些哪样？人家八爷会象你讲的那种？你那张嘴干的稀的乱淌！见狗顶嘴，翠儿有些吃惊地扬起了好看的眉毛，嘴却益发地不饶人了。你个木瓜脑壳！人家屙泡屎走了，你还生生要把屎吃掉，难怪你叫狗！翠儿把山里女人暴烈的火色拿出来了。要在平时，狗就一声不吭，翠儿的火气没了回应，自然消了去，可今天狗听不得翠儿把八爷的好心说得那么不堪。他们马帮那是受了县府的褒奖的，他们可是听了那些学生“宣传”的，他感觉应该用“宣传”和翠儿摆谈摆谈，不然这婆娘不知深浅。国家兴亡……马夫有责！他兀突地吼了一声。翠儿楞了一下，狗就很得意，这正是狗想要的效果。翠儿定了神，随即撇了嘴说：土狗学洋狗叫，那是匹夫！老娘也是懂“宣传”的。其实那天“宣传”时狗专门就“匹夫”问过师爷的。对师爷摇头摆尾之乎者也的说文解字狗听不懂，可他就记得了“匹”和马有关系。“匹夫”就是马夫，马夫就是赶马人，马夫有责！这次该狗撇嘴了：还说懂“宣传”，屁不懂！

翠儿背上的狗儿挺了挺身子，咬着指头流着口水的小嘴附和狗似的嗯嗯了两声，翠儿扭头笑嗔，嗯个屁，一点小人人屁都晓不得就会拉偏架了？狗一咧嘴，脸就笑烂了，说：我家狗儿懂事理呢。翠儿记得，第一次看见狗的那种父亲式的灿烂笑脸。那是狗刚走马帮回来，看着铺上肉乎乎的小人人舞动着胖胖的小手小脚，高兴得手足无措，

按奈不住当爹的欣喜去亲娃儿的小鸡鸡时，被迎面泚来的尿水喷了一头一脸后的表情。狗并不躲避，任尿流满面，眯眼享受着尿水冲击所带来的快感，然后舒坦的说一声“狗解手”，引得翠儿又笑又骂。山里人命贱，孩子一出生父母几乎都以狗狗、狗儿相称，那亲昵与柔情便都灌注在了里边。狗的爹妈大概还来不及给他取个大号，就撒手归西了，狗就成了他的大号，连李家师爷要给他取名他都不干，狗就被从小叫到大了。这回添了男丁有了延续香火的种，狗对得起爹妈的在天之灵了，满足与欣喜溢于言表。那段时间，只要天气好，狗就抱着狗儿故意坐在村路边，一有人路过，他就嘘嘘地把尿，把那小肉虫虫在阳光下袒露个明明白白。有村人因为他的显摆笑骂“狗日的”，他忙点头说，是呢是呢，狗儿狗儿狗的儿嘛，不是狗日的才怪了。狗儿这名字就这么来的，尽管翠儿不喜欢，可一村子都这样叫着了，时间一长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妥，习惯了。

翠儿狗儿是狗的“天”！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为了他们，狗怎能不上进怎么能不做马锅头呢？就为了狗儿嗯嗯的附和，狗也是要当定马锅头的了。

大反攻从旱季打到雨季，都几个月了。狗的马帮这次是给前方送弹药，途中要经过翠儿家奶奶在的那个小山寨。狗带了翠儿母子一起来。与往常一样，到了山寨翠儿就和奶奶住一段，等狗回来或下次来，再回李家堡。这是狗在“抢婚”前就和翠儿约定好了的。

狗的媳妇是“抢”来的。其实说“抢”不太确切，说“赖”来的倒怕还合适些。

狗那时还是马帮里的青头小伙。

驿道委蛇，马铃叮咚，马帮从浓阴敝日的丛林里走出的时候，日头刚偏西，刺破云层的阳光一柱柱地射下来，山野被映得深一块浅一块。忽地，雾气缭绕的半山里，响起吹叶子婉转嘹亮的声音，接着，脆生生的女声传来：

赶马大哥歇歇脚，

妹子家里来坐坐

有肉吃么有酒喝

热火塘边咂烟锅。

那是赶山拣菌子木耳的山里女子，离寨子近了。山歌调子给人疲马乏的马帮注入了活力。赶马人的嘴角露出了会意的微笑，连马都翕张着鼻翼，呆滞的眼睛灵动了起来。

有来有往，赶马人对歌了。稍显沙哑的嗓子高亢着，把阳刚与野性抛向了那云遮雾罩的山顶：

赶马阿哥要歇脚

想到阿妹家里坐

肉不吃么酒不喝

有句话要对妹说

……

歌声未落，有人粗粗地跟了句“想钻阿妹花被窝！”马锅头笑骂：开屎口！果不然，只一会那妹子的反击就银铃般顺着山坡滚了下来。笑闹中，马帮走得轻巧了。马锅头说，今天就在这寨子歇。其他赶马人笑问，天那么早就歇了？该不是有相好吧？放屁！马锅头骂。其实大家明白，这时辰要走到下一个寨子就得走夜路了，都怕碰到山贼。

难得见到生人的山民们聚拢到了场院，七手八脚地帮马帮卸驮子栓马，寨子喧闹起来。忙碌中，一个窈窕的妹子挤进人群，厉声问道：哪个刚才对调子吐粗口？人们楞了一下，随即哄笑起来。狗一抬头，眼睛就直了，就那样的盯死了那妹子。哄笑中，妹子察觉到了那双刀子似的眼睛，双颊飞起两片红云，扬一下那好看的眉毛，留下句“牛马畜生！”一拧腰挤出了人群。卸了驮子栓好马，赶马人和山民们倚着驮子换烟叶子抽，两个年轻的赶马人在场院边上逗着一群光屁股娃娃，阵阵童谣传来：“赶马老大哥，要吃板栗请马屙，要吃茶，请马撒……噢——”。

天擦黑了，马锅头寻到了狗，狗还是木桩那样戳在那里。从那妹子出现的那一刻起，狗完了。马锅头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着了。在这片大山里，赶马人和山里妹子缠绵凄美的爱情故事，生生不息，可大多没有结果，却把人伤得很重。这回，狗该疼了，那是剜心挖肺的疼哟。马锅头是叫狗给马挑水的。魂不守舍的狗挑着桶木木地朝村外老岩下的流水潭走去。西下的日头又大又红，走向老岩边的狗渐行渐远，就象被烧熔于那团炽热里去了。马锅头摇摇头，叹了口气，顾自回去招呼马帮夜宿的事情去了。

流水潭其实是瀑布冲出的回水湾，跌落的水流溅起水雾在夕辉照射下，腾起了一道绚烂的彩虹，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背景下，仙境般的美。曲曲弯弯的石板路把狗引到了潭边水口，刚驻足，狗就被美景吸引了，睁大了的眼睛晶莹地反射着七彩的光泽，他不由自主地走去，他想要走入那美景。穿过竹林，攀上矗立于水潭边那白色的大石头，整个水潭尽收眼底。霎时，他犹如被弓弩射中了心脏，屏住了呼吸——潭中，有个一丝未着的女子。

潭中的女子莲藕般光洁的手臂撩起的清流在细如凝脂的皮肤上流过，从凸凹有致的窈窕的身体上滑落。她双目微闭，好看的细眉安逸地舒展着，脸上满是惬意和舒坦。这正是那个火辣辣的唱山歌的妹子！不难想象，这情景对于青头小伙的狗，震撼有多么剧烈。他的嘴大张着，脑袋一片空白，肩上的担子滑下来，水桶空嗵嗵地跌落了。水桶滚落发出的声响，在寂静的幽谷里、也在他们毫无准备的脑海里激起巨大的轰鸣。犯了山里规矩了。这是狗的大

脑恢复运转后的第一反映。边地的人们是按性别在河流中分段沐浴的。坝子里的人们多是男上游女下游，而山里许多地方则相反，不能错了的。狗是在那仙境美景的诱惑下犯的忌。

“八”字型驮架拼就的狭小空间里，狗静静地躺在那条已经分不出颜色的毡子上，没有一丝睡意。狗知道山里的规矩，犯了这种忌，要么由人家挑一驮一马作为赔偿，要么把人留下为人家做一年工，否则，这冤家就要打到见血。马帮的惯例是宁可损失驮马人也要带走的。这关系到马锅头和马帮的声誉信用，声誉和信用是走马帮这一行的根本，他们看得比命还重。可狗却很平静。他等着，等待那个就要到来的时刻。当狗随马锅头暴怒的喊叫钻出驮架拼就的栖身之地时，夜幕已经降临了。被火把照得通明的场院上，嘈杂的人声随狗的出现平息了下来。火把燃烧的呼呼声中，马锅头对寨主说的话很清晰。狗不是故意的，犯了忌，错了，甘愿认罚。马和驮都在这里，你们选吧。狗走上前去，低了头，闷闷地说：我是故意的，我甘愿留下。人们呆住了，象看憨包一样看着狗。马锅头纵过来扬手甩给狗一个大耳巴，吼道：憨狗日的，你留下，我咋个向你们李家堡八爷交代？狗依旧低着头，伸手揩一把被搧出来的鼻血对马锅头说，马帮的弟兄可以做证，我是自己情愿，不是你和马帮不管我。狗顿了顿接着说，也请你和八爷说清楚，不要为难这寨子，是我自己要留下。然后他对寨主说：我留下，听寨主打整。出乎意料，被这种豆得瓜的结果搞懵了的寨主，此时刚回过神来，他磕磕烟袋锅说，你看了人家翠儿，就去她家吧。说罢转身走了。

2、

狗把头从那块黑石头上抬起来，耳朵上粘了青苔，他长呼一口气，撑起身子朝前看去，左前方有一个坡地，林木茂盛。狗跳起身朝坡顶跑去，到达坡顶，他立刻趴到地上。地上吸饱了雨水的厚厚的腐植土被他的身体压榨出黑水，浸泡了他的前胸，尽管他浑身燥热，也禁不住打了个寒噤。雨季的山林是湿冷沁人的。

往日喧闹的山林，现在静得出奇，几个月的炮火震荡着这片大山，雀鸟野物们都不知吓跑到哪里去了。狗从刚才地下听到的动静判断，日本鬼与他所在的位置还有相当距离，估计那消除驮队痕迹的人也不会离他很近。判明了情况，狗选了一棵大树蹬了一脚，待那树叶上的水珠暴雨似地滚落后，他上了树。

看见了！那山坳里有一小块林中空地，有驮马的影子从那里经过。一，二，三……他极力睁大眼睛，想从那树丛中闪过的驮马中发现那个令他牵挂的身影。白蹄子，现在比不得在马帮的时候，这些日本鬼都是老豺狗，哪样断子绝孙的事都做得出来，你千万莫跟他们犟。狗在心里念着。

三个日本鬼换了三匹马。白蹄子是县长奖给他们马帮的三匹马中的一匹。八爷从县里把它们牵回来的时候，狗一眼就瞧上了它。这匹马栗红的皮色溜滑，肌腱饱满，小碗大小的四蹄上都有一圈半拃宽的白毛，很是精神。那天狗迎了去，一把搂着马脖子就翻看牙口，抬头笑着对八爷说：四岁口，正好出力。说完也不松手，在马身上摩挲

着，舍不得放开。八爷好笑地说，你瞧你讨（娶）媳妇等不得天黑的样子。爽性把缰绳扔给狗，狗还就立马抓了把谷草把马牵到了小河沟，笑呵呵地给马刷身子，嘴里还紧着唠叨。可回来的时候，这马死活不进马帮的圈，狗把缰绳往喂马的赶马人手里一丢，刚一转身它就又跳又叫地朝狗挣，狗让那人送开绳子，这马自己就走了过来。狗把缰绳甩到它背上，背着手顾自在前面走，马就在后面跟着，竟然一直跟到了狗的火塘边。狗和它有缘分，他叫它“白蹄子”。

白蹄子很有灵性，本来就是役马，不用特别调教，几趟走下来，它就不愿意跟在其他马的后头了，狗就把小圆镜子和红穗子给它披挂到头上，让它做了头马。白蹄子是天生的头马，过桥走险路，该紧该松该压步子，清楚呢。慢慢地，它大概也知道“人马有别”了，也去和其他的马共一槽头了。只是歇息的时候，驮架一卸，它都会找到狗的身边来挨挨擦擦地呆一下，再回马群那边去。

那三匹马可是全李家堡荣誉的象征啊，喂的马料都比别的马好。村里的姑娘媳妇和娃娃不时都会来马棚，把白白嫩嫩的手伸给它们舔，那手上是攥了盐末的。怎么想得到，竟就在他手上给丢了。马锅头丢了马帮，这是羞死先人的耻辱啊！其实也不能怪狗。从大反攻开始，双方都在调兵谴将部署兵力，战线犬牙交错，阵地几易其手，主战场外零星的遭遇战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谁晓得在路上会遇上哪边的队伍呢？狗他们马帮走得比过去艰难了。

常走夜路必遇鬼。任狗怎么小心，还是遇上了日本鬼。当狗看到那突然出现的刺刀的时候，已经晚了，马帮和一队日本鬼在古道转弯处迎头遭遇了。

这一队日军是给山上的前沿部队送炮弹的。日本来的那些大洋马在云南险峻的大山里不中用，都滚了岩子。抢来的马和毛驴骡子杂七杂八，这些拉磨送粪的牲口听不懂这些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叽里咕噜的叫唤，这个调头那个磨屁股，行进经常受阻。在崎岖湿滑的山路上，有牲口连同炮弹被挤下了岩子。加上高海拔地区雨季的山林阴寒砭骨，运弹药的差事很不顺。后来日本鬼把这些牲口用绳子栓了连成一队，拉着打头的牲口走。牲口们因为绳子束缚，少了展转余地，虽常被绊倒失蹄，但毕竟顺畅多了。拉拉扯扯几天的艰难行进，好容易赶到枪炮如沸子弹横飞的前沿。一到山头就看见没了炮弹的炮兵在急切地挥手，这时，就听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那炮阵地腾起无数黑黄硝烟的柱子，挥手的炮兵顺坡滚落了下来。

炮兵阵地被掀了。

炮兵阵地背靠绝壁，本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偷袭者竟能从那雾气弥漫的绝壁下攀上来。炮兵阵地的丢失，使前沿步兵的侧背直接受到威胁。不要说中国士兵从那里扑下来，只要用火力打击就足以使前沿防线崩溃。这令战场指挥官紧张万分，他就近命令被炮阵地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目瞪口呆的押运兵们：不惜代价夺回炮兵阵地。

收复阵地没花什么代价，只有几人被扔来的起初以为是手榴弹的石块砸伤，一人被扑上来的中国兵咬掉了脸上

核桃大的一块肉。踏上被炸得稀烂的阵地，他们没有找到一具完整的炮兵尸体和一门可以使用的炮。被刺刀戳得血肉模糊的中国兵倒在阵地一角，九具尸体的脚上总共只有五只草鞋，身上被山石树枝挂得筋筋掉掉的灰布单军装的碎片，在细雨寒风中瑟瑟抖动。十多个日本兵惊讶地看着这些穿着单薄瘦弱不堪的士兵，不清楚他们是以什么做为能量，居然能攀上这深不见底的悬崖发起攻击。就是些这样衣着褴褛形容枯槁的士兵在高寒山区阴冷的雨季向守备部队发起的旷日持久的攻击吗？离这些中国士兵尸体不远处，一捆用接起来的绑腿刚吊上悬崖的老步枪还没有来得及解开，他们能随身带上悬崖的手榴弹全部扔向了炮兵阵地，可见这个炮兵阵地对中国军队的威胁有多么大。

九个徒手的中国士兵对进攻决绝的抵抗，是以石头和牙齿为武器的。

失去炮兵支援的防线在又一次冲击下动摇了。押运兵们增援到了硝烟笼罩着的前沿，当他们伸头出枪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切令他们头皮发麻：沿阵地一线的山下，一片灰色尸体覆盖了坡地，而灰色的浪潮仍然无休无止地扑来。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凄厉而令人胆寒的军号启动着一次强似一次的冲击。血肉横飞的地狱般的阵地上，那个戴眼镜的押运兵一口气打光了配给的子弹后，发抖了。又一阵剧烈的爆炸，一条从天而降的大腿把他砸倒，看着压在身上的残肢，他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上满是血污涕泪横流，竟无力将那条大腿从身上搬开，他瘫软了，裤裆里一片稀湿。

弹尽粮绝的阵地被突破前夕，剩余的押运兵接到命令，把送来的炮弹再原样运回他们出发的那个小城。那边地小城此时已被中国军队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成了孤城，那里的防卫非常需要这些炮弹。命令很严厉：炮弹必须运抵。又一波进攻退去后，伤兵都被留在了阵地上担任掩护，奉命收缩回撤的残兵们失魂落魄地溃去。为躲开中国军队的追击，也避免从来就没停止过的游击武装的袭扰，驮队由一个伍长带领着，离开大队撤离线路，进了老林子。这时，他们听见身后阵地方向在又一次暴起的枪声后，零星响起了沉闷短促的爆炸声。他们知道，那是留守的伤兵们拉响了怀中的自杀弹。这意味着，在这座绵延险峻的高山上，他们苦心经营两年而被指挥官自诩“东方马其诺”的，抵抗了中国军队自旱季到雨季几个月顽强进攻的防线，已不复存在。通往那座孤城的路上，再没什么屏障能阻挡中国军队进军的脚步了。失败的气氛笼罩了驮队，伴随他们遁入雨雾迷蒙湿冷阴暗的森林。

进入浩瀚的原始森林，这队人马如同一片落叶，立刻就被淹没了。阴霾的天空被浓密的树冠遮蔽，昏暗一刻不离地伴随着他们。地上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腐草败叶象吸饱了水的海绵，一脚下去，黑水就没到脚脖子。异国森林显露出狰狞而又莫测的险恶，它把饥饿寒冷的阴影投向入侵者，以坎坷曲折的羁绊疲乏他们的身心，消磨他们的意志。他们朝着大致的方向，寻找着依稀可辨的毛路，砍着丛生的刺棵藤蔓，滚着爬着，行进得艰难缓慢。

才进入森林两天，已经有几头牲口不声不响地倒地毙命，它们自被抢来的那天起就没好好喂过料。炮弹箱又匀到了其他牲口驮架上。从小城出发时带的饭团，尽管被汗水雨水浸透捂得馊臭，也被阵地上那些断粮多日的士兵抢而分食了。那时，尚有黑绿色的野菜汤喝，现在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了。生火是不可能的，不光怕暴露目标，事实

是根本就没有可以点燃的柴草。几个带伤的人在打摆子，其中就有那个脸上被中国兵咬掉一块肉的，他发着高热，头大如鼓，纱布被扯去了，被雨水泡得发白肿胀的伤口象张开的嘴，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不断往外渗着橙色的黄水。他揪着马尾巴踉踉跄跄地走着，没人能帮他，所有人都筋疲力尽。那个带眼镜的押运兵自从被飞来的大腿砸倒后就得了拉稀的毛病，已经很虚弱的他曾经想帮扶那个打摆子的伤兵，但被伍长厉声制止了。不时有人栽倒，但别指望有人帮助，只能自己挣扎而起拼命前行。每人都知道，在这原始森林里掉队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执行命令的机器，伍长是合格的。他不会为一个人而损失更多的人。至于丢弃炮弹而让伤病者骑乘牲口这样有违命令的念头，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他脑袋里，炮弹比牲口重要，牲口比人重要。他最人性的决定是允许伤病员揪住牲口尾巴。

然而，伍长一直担心着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们迷失了方向。驮队在这阴暗繁密的丛林中打着转转，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狗他们马帮就是这时与这些在森林里乱窜的日本鬼撞上的。

3、

观察到驮队动向的狗，三下两下就从树上回到了地面，他紧紧裤腰，把两条被刺棵挂开了的芭蕉叶似的大裤脚提起，别在腰间，捡起冲担匆匆追去。

在接近那片山坳的时候，驮队走过的痕迹又露了出来，踩得稀烂的红泥路在绿色覆盖下的山野里，显得十分的刺眼。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倒着一头牲口，狗紧走了几步赶上前去，这是一头断了一条腿的毛驴，已经死去。狗从毛驴那磨烂了的腰肋、断肢和残缺渗血的蹄子上看出，这支驮队所走的路，绝不是正常的马帮所走的，而是那些非常伤马蹄的，会别断马腿的滚石路。如果不是为了躲避山贼或洪水，马帮轻易是不会走那样的路。可从他跟踪这驮队以来，几乎所有碎石滚石路都被走过了，有的甚至是专门甩开好路没来由地转进去的，好象是在有意绕路走。一路追来，狗发觉他们在绕着一个很大的弯子，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不动声色的大弯，开始好象是朝孤城的方向，不知不觉中渐渐偏移，后来走的路与初衷就一点不相干了。为什么？他疑惑起来，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突然，狗听见有刷刷的声音从前面的弯道那里传来。狗把身子一下就隐入了林子，那响动渐远，狗从路边的林子里绕到了前面的小高地，他从树后伸头一看，只见两个日本鬼屁股对着他正搂了腐叶子边退边撒，掩盖着路上的泥浆。刚好撒到狗藏身的小高地，他们手中的腐叶撒光了。他们直了腰喘了口气，其中一日本鬼仰头张嘴接天上的雨水，另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向狗趴着的这边指了指，咕噜两声自己就先走了。狗低眼看了看自己的前面，就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沟流淌着清水。那日本鬼过来了，狗轻轻趴到树下草蓬里，紧抓着冲担的手沁出了汗水。狗知道他要喝水，却不想他竟跨过那小沟径直走到狗藏身的树前，解开裤子哗哗地撒起了尿，溅了狗一头一脸。狗把头抬起来时，那日本鬼已经背对狗蹲下了，撩着水扑哧扑哧地洗脸，然后趴下身去喝水。狗那时并没多想，他将冲担

横了，一纵而起，当屁股骑到了那日本鬼的背上的同时，横着的冲担也压住了日本鬼的脖子，狗用力按住冲担的两头，把面前那颗肮脏的头死命压到了沟底的淤泥里。日本鬼手脚拼命地刨得稀泥乱飞，把地上刨出了许多道道，一会就痉挛起来，接着狗感到屁股下的身子一软，没了生命的迹象。突然，有日本鬼的叫唤和吧唧吧唧的奔跑声传来，狗跳起身向山上跑去，“当”的一声枪响，狗听见噗的一声，他看见有血溅开来……

林子里，狗躺在地上，剧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喘息使他无暇顾及流血的伤口。子弹打掉了他的左耳并在他脸颊开了一道血槽。狗仰头对着天说：翠儿，这个算你的！

翠儿骂：憨狗。狗喜欢听，如同露珠滴落水潭那样晶莹清亮的声音。

犯了山里规矩的狗，在翠儿家马棚堆谷草的楼上住下了。他成天勾着头，也不看谁，下地做营生，上山猎野物。每日回来都顺带一背架上好的山茅草或是几棵椽子料，有空就打苫房顶用的草排。要么就和泥修补那被风雨侵蚀得沟沟壑壑的土夯山墙。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象是完成着某一预定的事。可只要翠儿出现，狗就目不转睛了，眼光粘着翠儿来来往往。他们第一次对话时，翠儿正洗洋芋，她又感觉到了浑身不自在，虽然对面打草排的声音窸窸嗦嗦的一直不停，但她明白那目光在戳着她，这么些天一直这样。在别人目光中过日子，无论如何算不上好滋味，可气可恼。干哪样！她头一扬，眼睛恼怒地瞪着狗。看你。狗并不回避她的眼睛，双手依然窸窸嗦嗦的编着草排。看哪样！翠儿厉声道。看你。狗的声音依然如故。不准看！翠儿气极。狗还是不温不火地说：看都看了。这让翠儿猛地想起水潭边的情景，她涨红了脸唰地站起来，一木盆泥水哗地把狗泼了个从头到脚。狗并不躲避，甚至都没动弹一下。片刻，他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竟嘿嘿笑了。气得翠儿把木盆摔成了一堆木片。翠儿被这须臾不离的目光追逐得无可忍耐了，那天她爆发式地冲狗大喊了一声：看你老娘！狗一楞，第一次低垂了眼睛，闷闷地说：我老娘死了。气冲冲的翠儿本来转身走了几步，听到狗的话，她一下顿在了那里。院坪里，谁都没动，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天地间充斥了静。这静，放大了山林里老阳雀的叫声。从院坪抬眼望去，层叠苍翠的山浪与深邃通透的蓝天交接处，有一朵白云，悠悠地飘。

狗在翠儿家已经有几十个街天了，翠儿家在不动声色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残缺的院坪竹篱今天换几根明天补一片地变得齐整悦目，班驳的老山墙被拌了松毛的胶泥一面面拍得结实抹得光生，廊下贴墙张着的野物皮越来越多，那长着草和青苔的乌黑腐朽的屋顶，也换上了厚实的新草排，黄灿灿的，压得实妥妥的。其实翠儿的奶奶早已谅解了狗，那个被火烧云映红了半个天的傍晚，翠儿对狗说，便宜你，走吧，回你们李家堡去。坐在马棚独木梯上收拾捕猎用的夹子扣子的狗连头都没有抬，就说了声：不！翠儿一扬眉毛讶异地说，我们家包谷饭好吃？宁可喂狗也……。我就叫狗。狗打断了她的话。翠儿火了，大声问：你要整哪样？！狗说，我要讨（娶）你。说罢爬到马棚楼上躺倒在草堆里，把呆了的翠儿孤零零地扔在了楼下。半天，才听见翠儿大声骂了一句：憨狗！狗望着屋顶咧开嘴无声地笑了。昏暗中，狗的牙很白。

马帮又来了。天擦黑，马锅头带了一碇盐专门来到了翠儿家，把刚从山里回来的狗喜欢昏了，他拉着马锅头在火塘边坐下，递上水烟筒，颠着烤茶罐，用衣角把酒杯似的小茶盅擦得反光，嘿嘿地把脸笑得稀烂。焦香的烤茶味还没散尽，酽酽的茶汤刚喝两盅，忙出忙进的翠儿和奶奶就把喷香的烤麂子干巴和包谷酒端上了桌。来之前，马锅头心里还悬着，不知能不能喝着翠儿家的一口水，也不晓得狗过得有多背时，他怕热脸凑上了冷屁股。狗他们李家堡的八爷请他带的这碇盐巴就是想请主家善待狗，现在看来多余了。这狗东西有憨福，过得倒象是这家的主人了。知道狗的话少，马锅头一高兴，借着酒劲顾自说起来。他说八爷夸狗呢，敢作敢当不愧李家汉子；他说要是那些敲牛大胯跟马屁股的赶马人知道狗过得这好，怕都会被谗死；他说你狗日的莫回李家堡了，干脆就在这里上门算了……。火塘边的奶奶打岔说，不合呢，这种男人是要遭人笑话，抬不起头，就萎尿了。奶奶转头对狗说，明天你就跟着这个赶马大哥回去吧。狗咽了口中的酒应道：好。狗的话音刚落，隔壁翠儿织土布的织机声一下就停了，接着是咣当一声，什么东西被摔到了地上。翠儿穿过堂屋甩门出去，在门口，她给了那撵山狗一脚，骂道：喂不家的憨狗！马锅头一下噤了声，不安地看看翠儿的奶奶，又看看狗。翠儿的奶奶摇摇头，轻轻叹口气，顾自搓棕绳了。狗若无其事地笑笑，招呼马锅头，吃！喝！

奶奶起大早做了包谷粑粑，把狗送到了寨口。寨口，马帮的驮子都上了马背，等着狗呢。大核桃树下聚了看热闹的人，寨主笑嘻嘻地叫狗得闲又来，村人们七嘴八舌地和狗打着招呼，狗一概地报以嘿嘿的笑。翠儿没来，一大早就挑着桶和要洗的衣裳出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照面。狗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情，他接过翠儿奶奶手中的包谷粑粑，嘿嘿笑了笑，就和马帮上路了。走出好远了，到得垭口，狗回头望去，那山寨口的大核桃树下，还有一个瘦小的身影站立在那里，狗好象看见那被山风拂动着的灰白银发……。

狗随马帮回李家堡了。翠儿却感到有点怪怪的，浑身不自在，又是哪点不对了？一大早就在回水潭一直呆到马帮离去，她才恹恹地回来。心烦意乱的她推着石磨忘了给磨眼续上包谷，把石粉都磨出来了。这可麻烦，得把磨掀开来清扫磨齿，不然再磨的粮食掺了石粉，就不能吃了。一恼之下，翠儿摔了磨杆来到院坪，心里憋闷的她抬头朝着蓝汪汪的天空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目光掠过狗挂在房檐下那些捕野物的套子夹子和弩机，她突然意识到，那是因为少了那象影子一样须臾不离的目光。翠儿坐在狗常坐的独木梯上想：那憨狗的眼睛好亮，象星星。翠儿的脸颊突然烫了……

对于训练有素的军人和富有经验的赶马人来说，这样的遭遇都极不应该。除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屏蔽了相互间发出的声音之外，日本鬼是由于地形的原因和精疲力竭致使感觉迟钝，而狗他们马帮却是因为不可原谅的麻痹。他们赶到原来的指挥部时，敌方阵地已被攻克，追击已经展开，指挥部正准备前移。他们得到命令：越过战线，把弹药送到已经展开追击的部队。狗看了这几个月来已经成了主要运输线的驿道，熙熙攘攘，走不快，狗选了一条新路线，想抄近道追赶，这是他们几个月前为敌后的预二师送给养所走的隐秘通道，可还没到原来的战线呢，就遇到了这帮日本鬼。

日本尖兵撞上狗他们的马帮的时候，着实紧张了一头，等搞清了这是一支没有武装押运的马帮时，日本伍长大喜过望。这一来，向导、役马都解决了，还有熟练的马夫，腾出牲口可以让士兵骑。那伍长念了声：天皇保佑！派人看住了赶马人。除了几驮架手榴弹和子弹，马帮驮的弹药都被掀到了路边，炮弹被挪到了马帮的役马的身上。赶马人携带那点的包谷粑粑荞麦饼都被搜夺一空，眨眼间就进了这些饿绿了眼的日本鬼肚子里。

八个赶马人被喝令蹲在路边，那伍长走过去，拍打着一张花里胡哨的纸使劲嚷嚷，狗见过，那叫地图，可谁都不知道他在叫什么，都摇头。狗从他的话中听到了一个不断重复着的词，就是那孤城的名字。狗问了一声，那伍长急忙点头称是，便示意狗带着驮队“开路”。狗十分懊丧，这些日本鬼逃跑把路都跑反了，居然跑到了中国军队的后方，害他倒这么大的霉。你咋个不干脆跑到昆明去？狗恨恨地想。狗运送的物资都是从那个叫“昆明”的、很远很不得了的大城市来的。

驮队出发了，狗走在前面，赶马人被分到了驮队各个部位，日本鬼披着从赶马人身上剥来的棕蓑衣，骑上腾出来的牲口，刺刀就在赶马人的头上晃着。那日本伍长的眼睛毒，他往嘴里塞完那一小块包谷粑粑，连嘴都不抹就拉住了白蹄子的缰绳。除了狗，从来不让人上身的白蹄子，今天竟没表示出一点反抗的意思，竟就让那伍长骑上了，竟就开步走了，狗就从心里有点瞧不起它。欺怂怕恶！你马日的也想做汉奸。狗心里想着嘴里竟念了出来，他惊了一头，看那伍长并没理，他就晓得这帮日本鬼不仅说不来人话，也听不懂人话。他顺带着把骑在马上的日本鬼也骂了一把，心头感觉好了点。这种炮弹狗运过，那是运去打日本的，而现在他竟要带路把炮弹送去打自己人。狗很后悔刚才一多嘴，就成了这两年常听到的新词——“汉奸”了。狗的脑袋想着，脚下就偏了，他可不愿做“汉奸”。

驿路延伸到了“三道拐”，这是一段一面靠山一面临岩子的险路。狗朝靠山的一面拉了一下缰绳，感觉白蹄子犟犟的，刚要扭头呵斥，却见白蹄子猛一拧身子，没有防备的日本伍长被甩了下来，慌乱中，伍长乱抓乱薅的手扒住了一块突出的石头，半个身子已然挂在了岩子外。后面的日本鬼拉起伍长，挺枪就要刺白蹄子，却又被白蹄子掉转屁股一下踢倒，滚出一丈远。伍长制止了爬起身还要冲来的日本鬼，一挥手，给白蹄子背上加了两份炮弹。狗醒过神来，拍了拍马脖子，那白蹄子不象从前一样和他蹭脸，却一扬头喷了鼻子，顾自走它的路。狗无端地感觉气短，一股火冲了上来。马日的你还瞧不起我？你看着！

走过“三道拐”，赶马人们就知道，马锅头要玩名堂了。这已经不是去孤城的路了，而是去江边的伐木场。那里有个叫老财迷的老者和他儿子，他们把伐了的木头滚到岩子边推到江里漂走。那都是些卖得起价的好木材。虽然偏僻，离战场较远，但兵荒马乱的，那两父子怕都离开了。那里是江边，天黑得早，林密草深地势复杂，趁夜脱身应该没问题。只可惜了这些风雨里枪炮里都与赶马人相依相伴的马，它们给马帮和李家堡带来了多大的荣耀啊！竟要狠心丢下它们。丢了它们，咋个有脸回李家堡呢？赶马人心里都很沉重。

天黑时分，驮队赶到了伐木场，那两父子竟然还在。几个月来这片大山里炮火打得叮叮咣咣，连雀鸟野物都跑了，他们还真能定得下心来伐木。从斜坡上码得齐整的小山似的原木看来，已经没人来收了，他们是想等仗火平息后卖钱的。谁做皇帝也要过日子。老辈子都这样说。蹲在窝棚边煮饭的老者看见了狗，站起身刚要抬手打招呼，楞住了。狗刚喊出一声：快跑！就被兜头一枪托打翻。已经隐蔽绕到窝棚后面的日本尖兵抓住了老者和他刚钻出窝棚的儿子，把他们绑在了原木上。狗捂着流血的脑袋坐在地上，气急败坏地对老者说：要钱不要命的老财迷呀！再次挥来的枪托打断了狗的话。

卸了驮架后的赶马人被捆成了一串蹲在岩子边，身后的岩子下就是滔滔江水。山茅草苫着的干柴火被找着了，日本鬼兴奋地嚷嚷着杀了一头毛驴。这里地势低凹林木茂密，火光不会外露，只要不冒白烟。日本鬼谨慎地添旺了篝火，把血淋淋的肉用刺刀穿了在火上烤，江风习习掠过岩子，青烟还没升到树稍就被吹散了。有肉吃有火烤，日本鬼有了精神。天黑尽，那个戴眼镜的日本鬼好奇地拿起伍长从窝棚里扔出来的巴掌宽的大锯子，在那里敲敲弹弹地看，却被伍长一把夺了去，交给了两个日本鬼。伍长不会留下这两个不会赶马的人，他不想前脚走，后脚就被人领着中国军队追来。也不知道伍长说了什么，那两个日本鬼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提起长长的锯子向伐木人走去。在火光的映照下，老者被躺着绑到了一棵原木上，两个日本鬼狞笑着挽了袖子，一人一边，竟然用大锯在老者的肚子上拉了起来。老者的肚子一下被拉开了，血溅起来，青白的肠子一涌而出绞到了锯子上，颤颤发抖。老者一下撑起了头，一口血喷得老远，绝了气。被喷了一身血的日本鬼并没停下，锯子吃进脊椎骨的声音喀啦啦地响，他们在嘎嘎地笑。赶马人看得肝胆俱裂，有人软瘫在地。老财迷呀，锯一辈子树，你反倒被锯子锯了呀。狗泪眼迷离地说着。

老者的儿子离他爹就几步远，从他爹被捆倒开始，就一直挣扎扭动着身子狂喊怒骂，眼睛瞪得象要撑裂眼眶。嘣的一声，绳子断了，他一下扑翻了离他近的那个日本鬼，挥起了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来的一块石头……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所有人都呆了一下，就是这几秒钟，那刚才还在狂笑着的日本鬼的头，被砸烂了。那小伙子死得比他爹还惨，日本鬼们都扑了上去，按住了他，那伍长用伐木的大斧把他的手脚全部剁了。不知是光线太暗还是泪眼迷糊，狗看见被剁离了小伙子身体的手手脚脚都在地上跳动。那小伙子四肢的断面在突突涌血，凄厉的惨叫听得人毛发耸立，那伍长扔了斧头，抓一把土塞进了那小伙子的嘴里。惨叫停止了，那血糊漓拉的躯体却还在地上蠕动……

一片混乱中，狗摸到了绳子。一生都在拉马捆扎货物，无数次地系绳解绳的赶马人，手如鹰爪般嶙峋有力，对绳子天生亲和。他们背着火光摸索着松开了捆绑他们的绳索，看守他们的哨兵还被原木堆那边的变故吸引着，狗盯着他，手在背后两下就做了一个活扣，一摆头，赶马人跳起来，活扣准确地套上了哨兵的脖子，狗拧身一背，那哨兵的脚吊离了地面，一声未吭，喉咙就勒碎了。赶马人们顺岩子边向黢黑的森林跑去，他们被发觉了，日本鬼们叫喊着奔来，拖着哨兵的狗来不及跟上，去路就被断了。狗返身回到岩子边，就那样勒着那哨兵纵身朝下面的大江跳了下去。在空中坠落的时候，狗听见白蹄子的一声嘶鸣，狗有些快意地想，马日的，看见了？随即，耳畔一声轰

响，狗就失去了意识。

4、

狗从那已经被挂烂的大裤脚上扯下一条碎布，勒住了左耳的伤口，黑布条从鼻梁上横过，把狗那线条粗犷的脸隔成了上下两半，多了几分凶悍和神秘，样子倒有点象山贼了。他整理了一下斜挎在身上的棕绳，把冲担上的牛皮条扎在腰间，勒住了翻飞的土布褂子。

似乎是为了证实狗的疑惑，驮队绕出的这个大弯，竟然奔前天晚上他们脱身的伐木场去了，只不过现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那是一条U字型的路，伐木场就在那U型的顶端，进去了也得要绕出来。那是伐木人去江边走的，马帮如果不是前方有突然的变故是不会走那里的。这个大弯绕得老道，很象狗前天走的那样，不是当地山民或赶马人是不会走得这么老道的。有人带路？那是谁？不管是谁他都是好样的，这一进一出就能拖他两天时间。狗突然想，是不是有赶马人被抓着了？狗记得清楚，那天他是在最后，因为怕那哨兵没死就勒着走，跑不快。赶马人个个都象山耗子，进了山林如鱼入水，他不相信那些日本鬼能抓着他们。是白蹄子？那牲口认路是厉害，也不至于象人一样地故意绕圈子呀。

有雨点落到狗的脸上，狗抬头看了看天，又飘雨了。穿过山坳，在下坡的路边又有两头倒地的牲口，有一匹马是马帮的，前胛后面心脏的部位有刚捅的刀口在冒着血。它们都是别了腿的瘸马，不累死也走不了多远的。倒下了，那些狗杂种还要捅一刀。狗蹲下身子捋捋马鬃，他和这些马一起走了多少年了呀，没想到这回遭了那么大的难。狗眼睛红了。

日本杂种，才刚开始呢，瞧祖公咋个整你们。咬牙切齿的狗拎了冲担，顺着山势，在与路平行的林子中穿行。狗知道，那个日本鬼一死，就等于告诉了他们他的存在。这种来自后面的威胁，谁都不会等闲视之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狗才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呢，他再不踏上那条路。山势渐低，竹丛剑麻多了起来，狗走得更小心了。前面是一个山口，狗记得，过了这个山口就是一溜的下坡，直低滚石坡，那就快要到江边伐木场了。在山口前的林子里，狗恍眼感觉高高探出山口的竹稍仿佛是动了一下的，他停了下来，把自己隐蔽在灌木丛里定睛看去，果然，那许多的竹稍中，有两三棵竹稍又颤动几下。这回狗看得很清楚，那种颤动只会是活物的触动引起的。竹丛长在路边，马不会碰到的，如果是石头滚落就不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动法了，那只能是人！狗不走山口了，他攀缘着爬上了山头，警觉的眼睛搜索着下面的山口竹丛，狗看见了，那两个撅着屁股守在路边的日本鬼。狗很遗憾，要是他的弩机不被烧了，现在摸下去，保证每支箭镞都能正中他们的喉咙。狗咽了口唾沫，悄悄离开，绕过了山口。在远离山口的一个转弯处狗看了看那逶迤而下的驿道，不见人影，另一头，驮队正消失在前面的林中。狗选好的地方是一个顺山势凹进去的山湾，两头背阴，光线很暗，驿道从山湾中粗大的龙竹丛中穿过。狗不敢耽搁，几下就爬到了竹子高处，

套上棕绳，接连坠下了几棵竹稍，他把几棵竹稍分别用劲收紧，扯得那竹子咔咔作响，再把几棵竹子合并了，使力量合一。狗按了按绷得邦紧的棕绳，他满意了，这劲道能吊起一头小牛的，而那初始的一弹，则足以撕裂一头豹子。他一口气在这短短的路面上做了几个活套，撒上腐叶。狗不再理会在山口设伏的日本鬼，他知道他们终归要来追驮队，那棕绳套子不说把他们撕裂，也得把他们全身的骨节抖散了。在那阴暗的山湾里吊一夜就能冻死他们。

老财迷，这两个就算你们父子两的了。狗在心里念了一句，整理了剩余的棕绳，转身向前面的驮队追去。

随马帮离开小寨回李家堡的狗，又回来了。这个犟种日怪！犯忌该留驮马，他偏留下；放他走了，他却又回来。狗不合常理的举动，令寨子里的人搞不懂。也怪巧的，狗回来那天，心情烦闷的翠儿独自赶山在山里滚了坡，脚崴得又青又肿动不得，不大的坡，咋个也爬不上去。她坐在地上哦嚯嚯——不停的喊，期望着回应，茂密的森林吸收了她的叫喊，回馈给她的，只有山风掠过树枝的呜呜声。终于喊不动了，她无奈地眼看着日头西下。黑夜来临，山林的夜并不寂静，总有突如其来的莫名响动。豺狗、老熊、野猪、传说中的山鬼……恐惧袭来，她后悔没有约了小伴一起来，她是为了释放心中的烦闷才来赶山的。都怪脑子里总是显现着的狗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狗眼！她张了张干裂的嘴唇骂了一句，却没发出声响。她嗓子哑了。想起狗，翠儿一哽，眼泪就出来了。疲劳、疼痛、恐惧和急剧降低的气温消耗着翠儿的体力，困倦阵阵袭来，翠儿努力抵抗着，她不想因为睡着了而被高寒山区夜的阴冷冻死。突然，迷糊中的翠儿隐约听见了喊声，黑暗里，她猛地睁大了眼睛。哦嚯嚯——！又是一声。她一下撑起身体拼命回应，可她听见的，却是沙哑的嗓子发出的微不足道咝咝声。情急中，她随手揪了片树叶子，狠命吹了起来，尖利的声响突破了密林的封锁，回荡在山间。就这样，喊声与吹树叶的声音呼应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后来，她看到了火把的红光，听见了山里汉子的毛边鞋拍打地面发出的扑扑声。接着，火把在坡顶出现了，翠儿看见，火把下，是身背弩机的汗水淋漓的狗。

最初的羞涩过去以后，趴在狗背上的翠儿细细的体味着山里汉子强健的躯体发出的腾腾热力，温暖与安全感让她彻底松弛了身心，睡眠张开了黑色的羽翼温柔地覆盖了她……。

村口的老核桃树下聚集了许多火把，村人们正要进山寻找他们。看见狗的火把后，他们哦嚯嚯地喊起来，狗也哦嚯嚯地回应着。这没有具体内容的呼喊，却交换着足够的信息。高亢的吆喝惊醒了翠儿，当意识到她将在众目睽睽下伏在一个汉子的背上进寨子时，她在狗的背上挣扎起来，她并没有想，那双青肿的脚是否能支撑得住她的身体。狗的双手象箍桶的蔑绳着了水，收得好紧，翠儿的挣扎没有丝毫的效果。眼看被火把映照着的寨口老树就在眼前，翠儿停止了挣扎，心反而塌实了，她索性把脸埋进了狗的脖窝，在村人们关切、惊愕进而意味深长的注视下，回到了寨子。

山高，离天就近了。干净透明的夜空墨蓝墨蓝，缀着些稀疏的星星。风爽爽的吹来，把秋虫们的吟唱和秋熟的山林发酵了的沉醉四处张扬。躺在马棚里的狗没来由地忽然感到周身燥热，瞌睡不翼而飞。他不安地辗转着身体，

压得身下的干草沙沙作响，额头竟就沁出了热汗。这燥热烧得狗躺不住了，他悄悄下了楼梯，院门咿呀，狗没入了朦胧的夜色。流水潭瀑布边，狗扒了衣服投入水中，身体浸泡在水里的那一刻，他明白了，这燥热源自于那晚翠儿伏在他背上的感觉。哦，那两团温软……狗把头靠在那块巨大的白色石头上，任清凉的水流带走他由内及外的燥热。哗哗水声中，燥热消散了，狗平静了。他仰起脸，这时，月亮从山坳那边缓缓爬上来，好大，大得象山民祭祖盛牺牲用的巨大银盘。这大银盘里老辈子们说的桂树玉兔画一样的清晰，活灵活现。他惊讶，他从来不曾这样细致地注意过的大月亮啊，那么圆，那么亮，仿佛伸手可触。月华如水流泻，满潭碎银摇曳，狗醉了。

忽然，迷醉于秋夜景色的狗象听到了什么，狗极力地搜寻着隐约可辩的乐声。在瀑布单调的哗哗声中，有弦子铮铮，若隐若现的，轻柔的女声飘过来了……

月亮升起来，山寨静悄悄

弦子响起来，情随风儿飘

调子唱起来，阿哥莫要笑

心儿捧出来，阿哥要不要

哎——

阿哥要不要

狗心里一动，他听出来了，是翠儿！调子唱完了，弦子却没有停下，分明在等着他对呢。对歌需要以极快的反应编词应对，笨嘴笨舌的狗却不行。狗急了，哗地从水中猛地站起来，水淋淋地上了岸，顺手揪了片树叶子和着弦子吹起情歌调子，弦子铮铮牵引着他顺着石板路向潭边的大竹林走去。竹林深处，弦子停了，叶子声也停了，而情歌调子柔美的旋律却好象那纱一般的岚气，依然在缠绵轻漫地萦绕飘荡……月影班驳的大竹林里，幽暗除却了所有的羞涩，翠儿没入了狗那散发着腾腾热气的怀抱，立刻就被熔化了。翠儿的身子微微颤栗着，急促而灼热的鼻息吹得狗的胸脯痒酥。人一过这道坎，胆子就大了，口拙的狗便也机智了起来。他对翠儿说：我看了你，就给你家做工；今天你看了我，你说咋个整？依在狗臂弯里的翠儿扬起滚烫的脸，把眼睛看定了狗，说：那就跟你一辈子！狗记得清楚，他搂着的翠儿的眼睛里有两朵燃烧着的火苗。

一片云飘过，月光暗了下来，阴影温柔地覆拥了大竹林。

雨季的大江是红色的。被雨水带到大小沟壑中的红土都灌注到了江里，江水好似浓酽的血浆。半身泡在红色江水里的的狗是被冻醒的。怎么会在江里呢？借着依稀的晨光，他看见了卡在江边岩缝里的尸体，脖子上的绳子在水中漂荡。想起来了，昨夜他就是勒着这个日本鬼跳的岩。从高岩到江面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把狗摔昏了，这个回水

湾，留住了随波逐流的狗。不行，这样会被冻死的。狗想动一下，可全身都是木的。又下雨了，雨点很大，砸在脸上啪啪地响。这阵雨不会小，来一次山洪就会被冲走的。狗开始了逃生的努力。他从动脖子动手开始，每动一下，关节都象木轮牛车似的嘎嘎作响，疼痛难耐，但他不敢停下。手抬起来了，肩侧过来了，终于，他翻过了身子，抓住江边的石头，把自己拖离了江水。

上游伐木场的原木被推下岩子后，有的会被冲入这个回水湾里打转转，伐木人要走好几里山路下到这里再把原木推入江中。一条毛路线一样地挂在陡峭的山上，那上面有个岩洞，是个干洞，老财迷的儿子常在那里避雨，时辰晚了也点一堆火在那里过夜的。人一动，血就活了，狗被泡得灰白的手有了红色，颤抖抑制不住地袭来。他撑起身子，揪着树棵茅草艰难地攀缘。一路上，他撕扯树干上的“树胡子”、抠挖地上的地衣苔藓和裸露的茅根塞进嘴里，他不在乎也没感觉到这些“食物”的苦涩腥麻，他需要咀嚼。

岩洞里温暖干燥，狗一头栽倒在那堆干茅草上沉沉睡去。

狗醒过来，大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歇了，天光泻入岩洞，已是正午。狗怔了怔，一下翻身起来，他得回去，去报信，去带兵来夺回他的白蹄子，杀光这帮日本鬼。

午后，狗摸到伐木场后的陡坡上，从一块岩石后慢慢探出头。老岩子前的缓坡地上伐木人的窝棚还在，被雨水顺坡冲下的黑色枝叶覆盖了地面上的痕迹，那堆原木还垒在那里蓄势待发的样子，好象就等窝棚里的人出来，将原木堆下的木楔子一拉，就呼隆隆地滚过坡地坠入岩子下的江中。如果不是老财迷和他儿子的尸体还有那头驴的骨架陈横在不远处，谁相信昨夜在这里发生的惨剧呢？惟独不见了那日本鬼的尸体。据说他们有一习惯，砍下战死者的左手，尸体就地处理。大概是扔江里了吧？狗想。四周一片死寂。狗站起身来，紧张感一消失，饥饿袭来，胃部绞疼，头就眩晕了。狗摸进了窝棚，在木壁缝里找到了火镰火石，他从吊着的一把火草中揪一撮下来燃起了火，用踩扁了的铜吊锅取了水，砸了驴骨头熬了起来。虚弱的他靠坐在窝棚门口，对不远处被锯成两截的老者说：老财迷呀，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装殓不了你，吃了东西就要赶紧去报告，先报仇。你莫怪我。狗看看天色，如果要在明天赶到指挥部，天黑前就得出发，明早赶到翠儿奶奶那里吃点东西再走，下午就到了。

日本鬼呀，莫说一天，就是再给你们两天也转不出这片大山！狗恨恨地想。

正如狗想的一样，赶马人一跑，日本鬼们的心里就发虚：赶马人是山里的油子，随便谁都能带了中国军队来，那样他们十几个人回孤城就没了希望。不敢多耽搁，半夜就开拔。开始还能根据江流走向判断大致方向，可到了林木幽深的森林里驿路七绕八绕就迷糊了。天亮时分，一阵瓢泼大雨浇了他们个晕头转向，茫茫雨雾中，他们彻底丧失了方向感。时至黄昏，森林里却已经黑了，日本伍长下令停止前进，领着一个士兵登上山头。在那兵爬上大树观察时，疲劳令他一阵眩晕，他一头载倒在地。他吃力地翻转身子，仰面朝天，失神的眼睛盯着树缝间透入的即将敛尽的天光……突然，树上传来欣喜的叫喊：灯火！灯火！就在对面山头！

翠儿随走马帮的狗来到了奶奶的寨子，要在这里等到狗的马帮回来。这次来，狗连寨子都没忙得进，前方军情紧啊。马帮是连夜走的，他们不用怕山贼了。自从和日本鬼开仗火，山贼都不抢运军需的马帮，反而在各自地盘上修桥补路，要紧地段，还打着灯笼火把给马帮照亮。听说竟有山贼提了日本鬼血淋淋的头去找官家邀赏呢。男人都出民伕了，寨子里只有老人婆娘和娃娃，老寨主就领着这些老人婆娘给官家军队做事。寨子离主要的进军路线看着不远，真正走起来爬坡下坎要一天呢，别的做不了什么，老寨主的官差其实就是筹粮。随精疲力尽伤了元气的军队换防，军粮派了几次，寨子里没有一家的粮食还够挨过雨季，都在喝稀的了。可只要派粮，他们还出。老寨主的话是：守着山林还会饿死人？那些婆娘们则说：再咋个我们也不能不如那些山贼。老寨主的官差做得一点不困难。

挨晚，寨子里的人又来到翠儿家院坝。前方战事紧，男人出民伕，女人们心里空空，晚饭都没了心思。翠儿理解她们。翠儿象头天一样，给她们讲山外的新鲜事。翠儿讲李家堡那条公路，还有不吃草就能在公路上呜呜跑的叫做汽车的铁牲口；讲县城外那大石碾压得平泱泱的飞机场，还有能从天上扔炸弹的大铁鸟……那些铁鸟人们不生疏，两年前就有染着红粑粑的大铁鸟从他们头上飞过，炸了县城。他们听赶马人说，日本飞机“五四大轰炸”，县城都炸烂了，死了好几万人呢。这回我们也有飞机了，也炸那猪不啃狗不闻的日本鬼！翠儿带来的消息鼓舞人。开始老寨主不来，他还对狗和翠儿那不伦不类的“抢婚”心存芥蒂。后来抵不住诱惑，先是悄悄摸来躲在人后听，翠儿见了，并不招呼。后来奶奶把他请到人前，人们轰地笑了，他磕磕长烟锅说，莫闹！说完自己也绷不住笑了。这次翠儿给奶奶带了一盏洋油灯。天没下雨，擦黑的时候她就把灯提出来挂在屋外，院坝里的人们发出了惊叹。对于祖祖辈辈点松油明子照亮的人们来说，带玻璃罩不怕风亮晃晃的洋油灯是够神奇。这是狗从前方救回来的那个蓝眼睛的大鼻子送的，说是报答狗的救命之恩。大鼻子的官大，好多官都向他敬礼的。狗知道这灯还要点那叫“军需品”的很金贵的洋油，便找了去，要请人家喝酒，那大鼻子有伤不能喝，找了其他大鼻子陪他。才没喝几盅他就提出“赌酒”，结果把人家都整翻了，他赌得一小桶洋油，大鼻子说够点一辈子的了。

谁想这盏灯让日本鬼看见了。西洋大鼻子送的洋油灯引来了东洋的日本鬼。

经过谨慎侦察，伍长一挥手，这群肮脏狰狞的日本鬼扑进寨子，他们抓着了老寨主。这个极不配合的犟老头被伍长下令吊在了寨子口的大核桃树上，扑过来撕扯的寨主家婆娘被伍长旁边的日本鬼开枪打死。枪声激起了这些濒临绝境的困兽嗜血的兽性。伍长命令封锁寨子，不能放走一个人，强行筹集给养。遇到抵抗即以刺刀解决，不许再开枪。他从这个小山寨竟然没有一个青壮男子的现象里得到一个警示：这可能是中国军队战线的后方。他怕暴露目标。鬼影散开了，小山寨顿时响起了怒骂、撕打、惨叫、哭号和物品被打砸碎裂的声响。

5、

爬坡下坎攀岩越壑，狗象只山猫，悄无声息地在雨雾蒙蒙阴冷晦暗的山林里潜行着。在树木竹林与雾气的缝隙

中，依稀闪过正在林中驿道上行进着的驮队。牲口可能都被勒了鼻口，远远地只能听见隐约传来的蹄声。狗追上了驮队，正与之平行地同向而行，他紧了紧腰间的牛皮条，加快了速度往驮队的前头赶去。

前面是滚石坡，狭窄的驿道的一边是风化的岩壁，上面尽是些摇摇欲坠的石头，另一面则是深渊。类似这样的路狗他们马帮在给预二师送给养时为躲避日本鬼的关卡时走过的，那只能一驮一马地过，眼睛还得随时观察着上面的动静，防备着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飞落而下的滚石。不是万不得已谁走这样的路啊，不知这帮日本鬼今天是被哪个好汉引到了这条路上，狗感激他，他使狗有了机会在那里给日本鬼准备一座坟场。

抵达滚石坡顶的狗顺着那十多米宽的岩顶走了一遍，他很满意他见到的一切：连绵的阴雨把红泥土浸泡得松软，雨水切割出大块的土石悬在岩边，只要几块石头的滚落就可能引起吸饱了水的岩壁塌方。那样，岩下的路和路上的一切都将被冲向深渊或被活埋于土石之下，路也就不复存在了。狗在周围弄来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码好，就等着日本鬼的出现了。突然，狗灵机一动，他放弃了现在就采取行动的想法。他要把日本鬼全部放进这“U”型路的底部——伐木场，再断绝他们的退路。他只要把另一出口的“三道拐”封住，那日本鬼不要说运送炮弹，自身性命都难保了。在这原始丛林里，狗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那就是杀光这些兽类。

狗匆匆离开滚石坡，继续往前赶路，寻找着适宜于狩猎的合适场所。自从他把自己与日本鬼的关系定位于猎手与兽类的关系以后，从狂怒的复仇欲望中清醒下来的他多了心思，狗边走边算计着这些日本鬼的人数。连上后面那必死无疑的、可能已经被套子吊着的日本鬼，应该还剩七、八个。

就是这里了。几棵小腿粗细的柞树挨着路边。这是木质坚硬韧性极好的树种。狗在林子里找了两根手膀粗的干树棵，他掰去了树棵前部的那些枯枝，那些横七竖八的断茬支棱着，象两根狼牙棒。狗把它们的根部一高一矮地别在紧邻的柞树之间，分别朝路的走向平行的前后两个方向狠命扳去……当藤条做好的机关绊索安置好后，狗隐入了山林。

大概是因为在驮队后面安排了伏兵，可能也因为这段路要平直一些，视野良好，情况明了，两个日本鬼的尖兵没有在路边搜索前进，而是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快到那几棵柞树了，狗注视着路上的藤条绊索，它就象路上随处可见的爬过路面的的藤条，被枯枝败叶掩蔽得若隐若现，毫不起眼。狗心里默默数着步子，到了，只听嘣的一声，两根木棒相向着横扫而过，后面的日本鬼被安置得较高的木棒击中后背，几根尖利的断岔穿透了胸腔，他只来得及哼一声就跪倒了。前一个日本鬼被安置得低的木棒扫断了膝盖，倒在地上凄厉地叫唤起来……

狗和翠儿相好，其实都看在奶奶的眼睛里，早就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罢了。从狗离开山寨后翠儿魂不守舍的样子，到那个月圆之夜院门两次吱呀开合，该来的终归要来，该去的终归要去，奶奶懂得这个理。奶奶知道，这山里没人看得起漂泊无定的“敲牛脚杆跟马屁股”的赶马人。她也清楚狗的脾性，如若“上门”（入赘），他那山里汉子的自尊就会屈折一辈子。然而明媒正娶的彩礼对于狗这样孤人来说，简直就想都不敢想。因了这些不是规矩

的“规矩”，亘古以来，断了这大山里的多少好姻缘啊！那令人肝肠寸断故事听得太多也看得太多了。奶奶想好了，她不想那些悲剧故事在她的翠儿那里重演，她默默地在做着她觉得应该做的一切。

其实奶奶想到的那些“规矩”，狗和翠儿也想到了。翠儿爹妈死的早，是奶奶把她带大的。奶奶对她的养育最不讲“规矩”，从小她就象山野里的万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率性自然，山泉野菜粗茶淡饭喂养的健康，无拘无束活力张扬。老实说，翠儿在对狗说“跟你一辈子”的时候，并未把山里的“规矩”放在心上，可当她血液回流心跳趋缓以后，她放不下的是奶奶。狗其实太想连奶奶一起带着走了，他也想到了李家堡人会说他讨媳妇还顺带“讨”了个奶奶，他并不在乎。狗孤身在这世上守着两间茅草房过了多少年，加起来也没有在翠儿家这不到一年的日子温暖舒心，他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了。但狗和翠儿都知道，奶奶是不会离开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山寨而成为他们的累赘的。他们陷入了两难境地。

从来不管翠儿在木织机上做多做少的奶奶，突然地成了严格的监工，不仅老是催促翠儿织多点织快点，还不时把织好的土布拿到亮处查看。家里的土布也不让拿到街子上卖了，相反，她还用野物皮子从马帮那里换了些上好的黑洋布回来。又是捶洗晾晒长长的土布料，又是打糨糊贴布壳子，奶奶不动声色地忙碌着。直到有一天，奶奶拿着鞋样和打好的布壳子，还有黑洋布和浣洗得白白的土布交给翠儿，扳着指头要翠儿按着鞋样纳鞋底做毛边鞋，做有十二个兜兜和十二颗布疙瘩扣子的黑边马褂子，还要做有白布腰的大裆裤的时候，翠儿明白了奶奶的心思，泪流满面。奶奶对狗说，狗，你抢亲吧。生性倔强的狗一楞，随即被胸口涌上来的热流哽住了。抢亲在山里其实不完全是暴力的，也有未嫁女子与相爱的男子密谋而心甘情愿被悄悄“裹”走的。这种对“规矩”的叛逆，在山里人看来是对家族的羞辱，只要事主要求，只要能寻得到私奔男女的踪迹，他们都会被绳之以家法，甚至不惜与敢于阻挠的男方家族结仇开仗火。除非这对出走的男女了无音讯无从寻觅，一年后他们就可以回来认娘家父母。当然娘家人认不认他们尚无从知晓，但家族是不会再管的了。然而即使娘家父母认下了他们，允许他们进门，这就意味着不仅免除了男方需要送出的丰厚彩礼，也等于自认了自家“养不教”之过，在家族中从此蒙羞而遭人耻笑。奶奶懂这些，不是要事主的要求吗？奶奶去老寨主那里去“要求”了，却不是要求别的，而是要求允许狗把翠儿“裹”走。老寨主懵了，费了好大气力弄清了奶奶的意思后，气得把长烟杆都摔成了两截，说这是祖宗八代都没见过的事情。奶奶从街子上买了一支上好的烟锅送了去，带着计谋得逞的满足，笑盈盈地顾自走了。

善良而智慧的奶奶啊！

狗并没有急于带着翠儿离开，相反，翠儿得留下来，等狗跟马帮再来的时候才随他回去。狗得留出足够充裕的缓冲时间，让山寨的人们适应这“祖宗八代都没见过的事情”，他也得回李家堡收拾一下他那两间茅草屋。他们都定好了，以后狗跟马帮，翠儿就一起来和奶奶住，待狗返回时再一起回李家堡。那就等于一年到头有相当的时间翠儿还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全力地为奶奶一段时间里的生活储备劳作着……

狗要走了，奶奶陪他去老寨主那里辞行，他央求老寨主关照奶奶，余怒未消的老寨主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寨子的事我们自有规矩，你一个外乡人少插嘴。老寨主对奶奶说，要走就体体面面地走，起码么换一身衣裳，莫给李家堡的人说我们不懂礼。说罢起身进屋了，临走还嘟囔了一句：你这个老奶尽整些精精怪怪的事！奶奶只是安详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黑包头、白土布衣、黑边马褂、大裆裤、毛边鞋，一水的新，把狗年轻的身躯衬托得精神抖擞。人是桩桩，全靠衣裳。奶奶边念叨，边抻展着狗的袖口衣襟。奶奶很满意。不仅满意翠儿的手艺，也满意狗走过村路时吸引的众多的眼光。奶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村口那浓荫盖地的老核桃树下，奶奶掏出了一个蓝布包，一层层打开，现出了两只玉镯头。翠儿认得，那是奶奶的陪嫁。奶奶说过，爷爷在世时，它们分别戴在爷爷奶奶的手腕上；爷爷去世后，奶奶褪下了它们，又分别戴上了翠儿爹妈的手腕上；从翠儿爹妈走了后，翠儿除了偶尔在夜里醒来见到奶奶擦拭或呆看着它们外，平时是根本见不着的。奶奶把镯头一人一只地给狗和翠儿戴上，说：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副，只有两个人戴上了以后，才叫一对。你们啊，不要让它们又变回一副去。说完就掉头回村去了。狗和翠儿都没有说话，奶奶的话很够他们想一气的。狗从翠儿手里接过小包袱，憨憨地笑笑，一步几回头地走了。走到大垭口，狗再回头，村口的老核桃树和那令他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疼的女子，被升腾起的雾气遮掩了。狗不舍地望了又望，回头刚要迈步，一串脆生生的山歌调子滚落下来：

哎——

云走山不走

哥走妹不留

送郎到村口

盼哥早转头

……

山林死寂，夜暗如漆，阴寒砭骨。穿行于黑暗与寂静中的狗，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和脚步声。狗是天擦黑的时候从伐木场离开的，他估计明天下午是能够赶到前线指挥部的，一定要赶到。不能放过这帮日本鬼！狗现在只想这个。为了他的马帮，为了惨死的伐木人父子，为两年前李家堡被残害了的乡亲，为狗亲手掩埋了的那些战死的军人，为狗亲眼目睹的“5.4”大轰炸的尸山血海，还有由此而引发的瘟疫中死去的几万百姓……从战火蔓延到这片安宁的土地的两年中，日本鬼制造的灾难与兽行狗听到的看到的实在是太多了，淳朴的山里人怎么也无法将这些闻所未闻的残暴与人的外形统一起来。日本鬼，作孽太多，不得好死，死定了！狗第一次给在敌后游击的预二师送给养时就这样断定。那次狗见到的预二师的弟兄们，赶马人的眼泪都下来了。虽然听说当地百姓都叫预二师“花子

军”，但实在没有想到他们的穿着连狗见到的叫花子都不如。那次是带了预二师的长官连夜越过战线去县城见“总司令”，到了城外关卡那里被拦住了，直到城里有快马送了官服皮鞋来换了才放进去的。换下的衣服被守关卡的兵用刺刀挑到一边点着了，虱子烧得啪啪响……。谁能想象，就是这些“叫花子”在敌后和日本鬼成年数的拼命，硬是打出了名气。那晚，在预二师驻地，狗还见到了那个写信痛快淋漓的斥骂日本鬼的花白胡子老县长和他那著名的“流动县政府”，夜幕中还有那些扛枪的农民、送粮的老人……狗他们走的时候，身上能脱的都给那些弟兄们留下了，穿着单衣回来的。那时狗就看清了，日本鬼，死定了！

眼前的黑暗实在太深太重，没有月光，没有星光，连磷火荧光和野物绿荧荧的眼睛都没有。哪怕有点风呢，让树叶茅草发出窸嗦。可除了喘息和脚步声还是喘息和脚步声。几个月以来枪炮轰鸣血雨纷飞的战争，使山林失去了往日的喧闹，野物逃离了它们世代繁衍的栖息地，它们是山林的精灵啊，没有了它们，山林就没了活气。黑暗与寂静阔大无边，让落入其中的人感觉自身如同一粒微小孤独的尘埃。在听觉和视觉都近乎失去意义的时候，其他的感觉却灵敏了起来。狗闻到了什么，太熟悉了，马汗味？可心急如焚的狗并没有去细想这意味着什么。不仅因为这是通往后方的路，还因为这样的黑夜连多年行走于这片大山里的赶马人都倍感吃力，日本鬼就根本没有行动的本事，何况还是一支驮队。他们跑不了！狗极力睁大眼睛，凭借许多年走马帮赶夜路的感觉和依稀的山影辨认着，奔走着。

半夜了吧？狗无法断定，寒冷、黑暗和寂静令人丧失了对时间的判断，这让狗很着急。要知道，他必须在黎明时赶到奶奶和翠儿所在的山寨。山寨距离前线指挥部还有大半天的路程，他打算在那里吃点东西再走。两天两夜中，肚子里除了那锅驴骨头汤就没有装过正经粮食。在伐木场喝的那点热汤使他濒临冻僵的身体恢复了活力，可现在已经感觉不到汤的存在，代之以急迫的饥饿感，汗已经出完了，空空的肚腹难以抵御山林的湿冷，狗浑身不时地打着寒噤。他感到很奇怪，喝了一铜吊锅的汤汤水水怎么就没撒过一泡尿呢？饥饿寒冷和黑暗令狗想起了奶奶那终年不灭的火塘，那又香又辣的酸菜汤和包谷酒，还有翠儿烙的金黄色的粑粑，又糍又糯，噗噗地冒着热气……这令狗肚腹绞动肠鸣阵阵，难受，不能想这个。这时候翠儿睡了吧？一想翠儿就是那温软的胸脯。人家是搂着老婆睡，狗却喜欢被翠儿搂着睡，为的就是可以挨着那两团温软，拱两拱，觉就睡得塌实了。自从有了狗儿，属于他的那两团温软便被夺去了。这小狗日的！黑暗中的狗竟咧开了嘴，露出白牙。狗儿是狗的心，那肉虫虫似的小鸡鸡不光是狗喜欢炫耀，奶奶也喜欢显摆，招惹得寨子里的汉子也嬉笑说：狗日的枪法好，一枪一个准。奶奶虽然嘴上骂着，可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洋溢着喜气。这是狗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三个亲人，一想起他们，心里就温暖了起来。想到这些，狗下意识地驱动着腿脚，快点！再快点！赶回山寨！

当狗跌跌撞撞爬上一个小山包时，漆黑的夜幕上，远远地跳出一团火，橘红色的火光标明了方向：那就是小山寨。除了祭祀和节气，寨子里会在场院上燃起巨大的篝火，今天会是什么节日吗？狗想了想，断定没有。那是谁家着火了？这要在旱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一烧就是一个寨子甚至几匹山，可现在是雨季，连房顶的茅草都是湿

的，什么火也烧不了这样大的。突然，狗的心脏一阵尖锐的刺痛，如同扎入了一把利刃，利刃的搅动使得心脏成为了碎块，这疼痛几乎让狗窒息，眼前忽地冒出无数飞舞的金蝇子。狗浑身的皮肤瞬间暴起一层鸡皮疙瘩，随即，所有毛细管重又尽数贲张，汗液如开启了闸门的水，从这个几乎脱水的身体内涌出。冷汗挂满脸庞，湿了衣裳。狗眩晕了，他踉跄了一下，忙靠了一棵树，揪住胸口的衣襟，大口大口地喘息。这疼痛来得这么突如其来，这么剧烈，这么没来由，使狗的胸腔里那盛放心脏的部位一下没了内容。狗并不知晓这疼痛来自于何方，直觉告诉他，赶快回去！赶回有他骨肉亲人的小山寨。

6、

被扫断了腿的日本鬼凄厉的惨叫，将恐惧迅速地传播开来，日本鬼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森林中复仇之神的存在。过去他们也有过被夹子夹伤和被弩机发射的涂了毒药的箭头袭击的经历，但那多是一次性的报复行动。而今天，整个驮队被死死盯住了，每次袭击都是那么有效，猝不及防。日本鬼如临大敌，眼睛一刻不停地搜索着远远近近的竹木刺棵和山茅草丛，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就会变成复仇的利器，突然地刺入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身体。恐惧，恐惧压迫着他们的神经。

日本伍长打破了令人压抑的宁静，他在路的一侧看到了狗留下的痕迹，令两个日本鬼向狗躲藏的方向搜索，其他日本鬼架起了机枪，做好了掩护准备。在近在咫尺的威胁面前，日本鬼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铲除这个威胁，暴露目标也在所不惜。狗盯着那两个小心翼翼爬上坡来的日本鬼，身体轻轻地向后移动着，保持着与日本鬼的距离。忽然，狗脚下一空，身体一下被卡住了。石缝！狗真懊悔，这条横贯坡顶的石缝刚才去路边的时候他是越过了的，怎么就忘了呢？幸好是在右边，身体左边的石缝更宽更深，被山茅草和灌木刺棵掩蔽着，掉下去就可能要了命。狗一动不敢动地趴在石缝边缘，在山茅草后紧张地注视着坡下。左边的日本鬼在前，正对着狗的日本鬼在后，一步又一步地走来。近了，更近了，刷唰的脚步声中，能清晰地听见那有些颤抖的喘息。当狗看到那双翻毛皮鞋迈向他的眼前的时候，他埋下头闭上了眼睛……突然，哗啦的一声，同时有惊叫从左边传来，然后是石头叮叮哐哐的坠落，接着狗就听到了肉体翻滚下坡的钝响。片刻，狗睁开眼，慢慢抬起头，见那两个吓破了胆的日本鬼正在路旁接受那伍长的斥骂，啪啪的耳光抽得山响。

日本鬼们不派尖兵和后卫了，除了伤病者，其他人也都不骑马了，他们相互间只拉开十几步的距离，每人都靠着一匹牲口，让牲口的躯体做为他们一侧的掩护而警戒着另一侧。驮队前，牲口当了尖兵，被用来打头开路，他们战战兢兢地继续前行。

狗满是虚汗的头伏在了手臂上，他长吁了一口气，咚咚的心跳很急促，血液鼓胀得左耳部的伤口阵阵疼痛。而就在这个时候，狗没有看到那个把日本鬼带入歧途的人，被捆在马上，就在他下面几十米的地方过去了。

待狗挣出石缝，没有顾得上满身的擦伤，拼命地赶到了伐木场后的陡坡上，他又看见了前些天他勒着那日本鬼纵身一跃的老岩子和岩子下面血红的滔滔江水。喘息甫定，狗就听到了马蹄达达的动静，他赶忙匐下身来伸头向空地入口处望去。几匹牲口先出现了，接着进入空地的日本鬼环顾了四周便嚷嚷了起来，一个捆绑着双手的老者被推到了前面，那灰白的山羊胡子和插在后领口的长烟杆令狗惊呆了：老寨主？！那日本伍长气急败坏的哇啦哇啦地蹦着叫着，老寨主并不理会，他慢慢地踱向岩边，一转身，背对了江水仰天大笑了起来，翘得老高的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笑声震荡在山林中，树叶上有雨水滚落下来。突然，笑声嘎然而止，只见老寨主对着山林高喊：汉子，我晓得你在，牲口我都带到了，我们全寨子人都拜托你，一个都莫放脱！老寨主的声音在两把刺刀穿透胸腹的同时终止了，他的身体消失在悬崖边缘的时候，狗的头一下插进了草丛，双手抓起的两把腐叶被攥出了黑色的汁液……

突如其来的枪声把正在煮包谷糊糊的翠儿和她奶奶骇得一抖，激起了一片狗吠。奶奶拦住了要出去看看的翠儿，想了想，吹灭了洋油灯，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暗中，耳朵捕捉着外面的动静。有重重的脚步声传来，门外的撵山狗一声低沉的咆哮，接着就是一声惨叫，院子里立时响起扑打声和咿哩哇啦喊叫，这杂乱的声响在撵山狗的一声呜咽后停止了。翠儿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开门，就被两把枪刺逼了回来。在火塘里的火光映照下，那枪刺上还在滴落着暗红色的液体……

翠儿家那点包谷糊糊几乎在眨眼间就被你抢我夺地倒进了三个饿痨鬼的肚子，他们甚至顾不上被撵山狗撕裂的伤口，把铜吊锅舔得溜光，然后瞪着发着绿光的眼睛威逼着翠儿和奶奶再给他们做吃食。奶奶去舀包谷面了，翠儿挑起水桶刚要出门，被一把刺刀拦住。她对着铜吊锅示意，那戴眼镜的日本鬼嘟囔了一声，押着她出了门。寨子被可怕的骚动笼罩了，村路上，翠儿被绊了一个趔趄，她定睛看去，是刚才还在听她说话的小媳妇，肚子被豁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她吓呆了，就感觉到来自身体内的翻涌，她和那个四眼狗似的日本鬼都呕吐了起来。还没直起腰来，前边的茅草房里猛地暴出一声令人汗毛倒立的嚎叫，随即，那扇蔑笆门被一个捂着眼睛的日本鬼从里到外地撞倒滚了出来，紧接着门口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挥舞着剪刀的婆娘，她刚出房门，一把刺刀从身后洞穿了她的身体……接着，翠儿看见了被吊在寨口树上的老寨主和倒在血泊里的女人。翠儿挑着水桶在刺刀的押解下木木地走过，她依稀听到被吊着的老寨主发出的一声“呸！”

寨子里不要翠儿的奶奶上军粮，说她一个孤老人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奶奶不高兴，可没吭气，交粮的时候她还是背了去，人们没法阻挡她那不声不响的倔犟。其实奶奶已经接近断粮。今晚她当着那些日本鬼的面翻扑了面柜，甚至还把给狗留着的一罐老包谷酒抱了出来。她一声不吭地忙碌着，表现出来的驯良，让这几个日本鬼放心了，他们解除了身上的枪械，饿狗一般地抢食，噎得眼睛翻白。翠儿青白着脸，流着泪，对奶奶悄悄说了她挑水路上的见闻。木木的感觉过去后，内心的悲与愤使她身上打摆子似的战抖。奶奶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只是当翠儿说到老寨主好象冲她“呸”了的时候，奶奶的身体抖了一下。肚子里有了食物，酒和火塘的热量使三个日本鬼身上的衣

服腾起了白汽，吃饱喝足了的日本鬼被沉重的困意压倒了。这之前，奶奶还叫翠儿从对面的马棚里抱了很多干草给他们垫上。

夜深了，翠儿搂着狗儿和奶奶坐在火塘边，只有那个背时的带眼镜的日本鬼不得睡，他被指定盯着这家房主人。他把玩着洋油灯，比比划划地与她们说着什么，开头翠儿并没在意，她在想，就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一个古来静谧安详的山寨，怎么转眼就成了惨绝人寰的地狱的呢？一个电光石火般的提示掠过，她突然明白了：洋油灯！是她挂在院坝里的洋油灯招来的灾祸啊！一个炸雷在脑际轰然爆裂，翠儿的大脑一下就空白了。奶奶不停地往火塘里加柴火，火烧的又大又旺，被连日阴雨浸透了的茅草屋顶，被烤得冒出了浓浓的雾汽。鸡叫二遍的时候，那日本鬼终于垂下了头发出了鼾声。奶奶捏了一把翠儿的膀子，说。你走，带着狗儿去找他爹去，找寨子的男人们，叫我们的老总来，为我们寨子报仇。翠儿要奶奶一起走，奶奶说，那就一个都走不脱，寨子里的人就白死了。翠儿问，奶奶你怎么办？奶奶说：我不能还不如那些山贼。山里女人的刚烈与倔强，并不完全是表现在语言上，而是她们对认定了的事情不回头的决绝。爱是这样，恨更是这样。而就在这时，那个背时的日本鬼又被急迫的便意憋醒了，他恼怒地骂着什么，提了枪匆匆跑出了院坝。天就要亮了，不能等了。奶奶说。你要还是我们山寨的女人，你就快走！不然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在奶奶的逼视下，泪流满面的翠儿背了熟睡中的狗儿一转身没入了门外的黑暗……

奶奶把门插死了。原来的门没有闩，那门闩是狗带翠儿走的时候新做的，很扎实。奶奶返身从屋角拎出了那洋油桶，把洋油撒在房屋各处，连同那两个日本鬼的身上和他们垫着的干草。那个酒罐被倾倒了，清亮的酒液汩汩流出，空气中混合了酒香和洋油的气味。奶奶从火塘里抽出了一根燃烧得正旺的柴火……灯光能招来日本鬼，那火光就不能招来我们的人吗？何况是大火！出民伕的汉子们看见寨子着火就会知道发生了变故。

日本鬼，你们就等着吧！奶奶其实早已经想好了，今晚所做的一切都在为着这一刻。

燃烧是从流淌着的酒液开始的，那蓝色的火苗以着火点为圆心向周围呼地蔓延开去，几乎一瞬间，火在屋里蓬地爆开，两个日本鬼立刻成为了两个乱滚乱叫的火团。茅草屋顶的浓烟代替了蒸腾的白汽，随后轰地燃成了明火，火头直刺夜空。一个遍地翻滚的日本鬼把即将烧透的板壁撞破了个洞窜了出去，火老鼠一般在当地滚了两滚，却一头钻进对面装满干草的马棚，马棚熊熊燃烧了起来，这时，他腰间自杀用的手榴弹爆炸了，将燃烧着的木块草捆掀向空中。堂屋的火光中，奶奶闭着眼睛，表情安详，嘴角露一丝隐约的笑纹……

翠儿一出院门，迎头遇上了那个拉稀的日本鬼，他大声地叫嚷着，横着的枪不断地把翠儿往院坝里推搡，翠儿急了，伸手在那日本鬼的脸上一阵抓挠，便抓到了眼镜，翠儿抓住对方慌忙护眼镜的短暂松懈狠命一撞，那日本鬼一仰向后倒去，拿着步枪的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弧，重重地墩在地上。“砰！”地一声枪响，夜就被震碎了。翠儿背着被惊哭了的狗儿拼了命跟斗扑爬的奔跑，没有逃离身后追踪而来的刺刀。近了，更近了，黑暗中的刺刀急速地一闪，翠儿被一股来自背后的力量撞倒，同时感到了一阵刺痛，狗儿啼哭的声音嘎然而止。随着啼哭声的终止，狂乱

中的翠儿一下感到她的意识正在如同游丝般被抽走，剩下的只是一副躯壳了，连冲天而起的大火和那声震耳的爆炸也没能唤回她那走失了的魂魄。

呆滞的翠儿抱着血团似的狗儿重新站在被大火映照得通明的院坝的时候，那些日本鬼束手无策地望着熊熊大火，日本伍长发疯似地嚎叫着，翠儿充耳不闻。她在那舞动着的火叶子里看见了狗那阳光般灿烂的笑脸，那声“狗解手”在耳畔真切地响起……银发飘飞的奶奶出现了，她正把那玉镯头往狗的手上戴呢，“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副，只有两个人戴上了以后，才叫一对”。慈爱的音容犹在……突然，翠儿听见咯咯的笑声，是狗儿，张着圆滚滚的满是肉涡的小手在朝她扑腾，那口齿不清奶声奶气的叫妈声不绝于耳，在脑际反射出无数个回响，越来越大……翠儿打一个寒战。恢复了意识后的翠儿已经决定不活了。面对上下两辈的亡灵，面对狗，如同行尸走肉般地苟且偷生一辈子，对翠儿来说，比死还残酷。她不能离开她的心肝她的狗儿，她要带着狗儿找奶奶去。这个刚烈的山里女人一头撞倒了逼近她的伍长，一转身扑进了大火。熊熊的火焰中传来她决绝的嘶喊：狗——！不要放过这些挨千刀的！

如果说孤零零的一两声枪响在茫茫山林中可能被淹没和忽略的话，那这场大火和爆炸恐怕是难以不让人发觉的了，天一亮，那冲天而起的浓烟就会把消息传遍方圆几十里。它打消了日本鬼想在这个偏僻的山寨休整的打算。凌晨时分，日本鬼们备好了鞍驮，把全村还活着的人都捆到了大核桃树下。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寨子，经过昨夜的杀戮，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捆在树上的婆娘娃娃和老人都被塞了嘴蒙了眼睛，这些无声的身躯在恐惧与绝望中瑟瑟发抖，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老寨主被从树上放了下来，他将作为向导而带领这些日本鬼走向孤城。伍长是以要杀光这小山寨的人相威胁，逼迫老寨主答应做向导的。吊在大核桃树上一夜的老寨主是看着那场大火烧起来的。开始他看着那茅草房顶蒸腾出白色的雾汽觉得很不解，直到浓烟代替了雾汽，火舌窜出了房顶的时候，老寨主明白了奶奶的用意，他老泪纵横。那时侯，他就打定了主意。

残暴的日本伍长知道，在这片愤怒的土地上，处处都是可以致他们于死地的陷阱，连山贼都把他们视为兽类，他们的行为甚至他们存在的本身就已令天怒人怨了，任何人都会成为他们致命的威胁，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当地人。伍长暗自向充当后卫的士兵授意后，两把刺刀顶着老寨主的腰，驮队向寨子后山仓皇而去。

天没有下雨，依然阴霾，林子里十分寒冷，山路湿滑难行。爬上了寨子后山的山顶，老寨主驻足回头眺望，在天放亮前的黑暗中，那大火仍在熊熊燃烧，烟气袅袅，火光映红了半个天，位居山头的小寨轮廓在火光中时隐时现。往日这个时候正是鸡打鸣的时分，院门和挑水扁担的吱呀声引一片狗吠，寨子就醒了。随后，冲碓的咚咚声和哦哦的吆牛声就该响起来了……而今天，寨子一片死寂，没有一丝活气。老寨主额头青筋暴涨，怒目喷火，他咬着牙发狠地说了声：我给你们带路！扭头带着这伙日本鬼进入了原始森林。

心脏的那阵刺痛过后，一身冷汗的狗倍感寒冷。满眼金蝇子消散了，黑暗如磐，那夜幕中突然跳出的火光，指示着、召唤着狗，狗就是循着这团火光而来的。看到这团火光的时候，狗已经有了不祥之兆，他曾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但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惨烈的景况。

灰烬中的两支步枪已经烧没了枪托，乌黑的枪管上的刺刀扭曲着翘了起来，狗能够认得出来，这是日式步枪。门口是一具抽搐成一团的男尸，嘴唇已经烧完了，裸露着两排厉厉白牙。火塘边那依然端坐着的黑糊糊的身躯，没有了眉目，但从那庄稳的姿态中，狗还是认出了奶奶。狗的目光在继续搜寻着，搜寻着他最想找而又最不愿意在这里找到的。直到这时，狗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他脑子里还固执地转着侥幸的念头，总不会都……总有人……总……狗的目光停止了移动，那是一堆已成为木炭的椽子板壁，火星子不断地从那覆盖了一层白灰的暗红中跳起。狗颤抖着拨开了那些余烬，下面是一具俯卧着的人体，焦黑的身体青烟缭缭。不象，不是她。流水潭边那秀美窈窕的腰身，那莲藕一般白玉一样的手臂……她不是这么短的，这象个孩子。不象她！不是她！翻过那碳一样的躯体，喀嚓一声响，那躯体往身下弯着的手臂木柴似地折断了。下面一具小小的身体腾起了白白的热汽，皮肉烧灼的气味冲进了狗的肺腑。那只折断了的、因搂着那小身体而没被烧着的手腕处，一只被人油浸泡得亮汪汪的碧绿的玉镯头显露出来。狗木然地从那条断臂上褪下了玉镯，刚一起身，一下就动不了了，他清楚地听见身体内发出的碎裂声，过往的人生体验所构筑的一切，在这时轰然坍塌。狗的嗓子里一阵灼热，甜腥味涌动着冲了上喉咙，血就顺着嘴角流淌了下来。眼一黑，浑身精气在一瞬散尽，狗一头栽倒在那片焦土上。

……

7、

日本鬼们上了老寨主的当，不敢再耽搁，掉头便向来路退去。眼看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机会，狗赶忙起身直奔滚石坡而去。

老寨主的出现，实在是出乎狗的意料之外。狗想起“抢婚”讨翠儿做媳妇的时候，老寨主那死头干僵的样子，他怎么会答应给日本鬼带路呢？可他不仅带了路，还把这些日本鬼带到了死路上。这不能不让狗重新看待老寨主，他不光是倔犟刚烈，也颇有韬略。日本鬼啊，前天是祖公我把你们带到了这里，今天老寨主又把你们到了这里，天意不可违，为了你们所作的孽，拿命抵吧，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场。

候在滚石坡顶的狗，一眼就看见了打头的白蹄子。马日的犟种，驮着两倍于其他牲口的重负还要充头马。在滚石坡下狭窄的路段，白蹄子停了下来，整个驮队便都停住了，它晓得这样的地方需得要一驮一马的过，这就是头马的素质。可日本鬼在赶马人脱逃后又把驮队全都用绳子连接了起来，它是等他们来解绳子的。日本鬼们来到了驮队

前，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他们，保持着戒备，见了这险峻的地形，犹豫不决了。那个影子一样紧跟着他们的复仇者，说不定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等待着把死亡送给他们。如果兵力和时间都还够，他们应该派出搜索绕道坡顶掩护驮队安全的，可这两个条件都被这些山民在巧妙或暴烈的周旋中消耗了，丧失了。日本鬼们估计得到，追兵将至。时间紧迫，他们解开了白蹄子，紧张地看着它走过这段险路。他们还是不放心，又接连放过了几匹驮马。已走到路那头的白蹄子象发现了什么，它想仰头嘶鸣，无奈嘴被套住了，它急噪地用蹄子刨着地，吹着鼻子。闻着我的味道了？马日的，日本鬼已经管不着你了，你自家回去吧。狗为白蹄子获得自由而欣慰。狗转回头，看这些日本鬼还玩什么名堂，他不着急，他就等着他们过呢。可日本鬼们并没有一起过，却让那个断了腿的伤兵趴在一匹骡子背上过来了。这个背时鬼已经没有了嚎叫的气力，他那被惊恐扭曲了的脸扬着，无助无望地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降临的厄运。狗忧郁了，他在滚石坡的一切准备，是为了集体收拾日本鬼，为一个伤兵就太不合算了。况且这样对付一个伤兵也不太够汉子。可没等狗多想，一块滚石的自然坠落，砸断了日本鬼紧绷的神经，机枪就不分点数地扫向坡壁，巨大的声浪在山沟里激荡，震耳欲聋，狗面前堆码的石头被枪弹撞击得火星子乱迸，狗下意识地一缩，滚到了坡后，他还没有稳住身子，贴在地上的耳朵就从山肚子里听到了低沉的咆哮，抬头一看，那堆码好的石头已经不见了……

山野里安静下来，狗小心地挨到坡壁边，他在一棵树后探出头去：眼下的路和路上的伤兵已经没有了，就是一面乱石狰狞的大斜坡。不要说驮队，就是兔子也不敢穿过这名符其实的滚石坡了。驮队已经掉头，向伐木场而去。路那头过去了的牲口都吓跑了，惟独白蹄子还在，它这时正在那里窜蹦跳跃扭腰颠屁股，硬是把那驮架上的炮弹箱给掀了。狗是看着它离开路钻了林子的。

在伐木场脱身后又在雨夜的森林中跑散了的七个赶马人，没有一个跑回李家堡，他们比狗还早一天，先后都赶到了指挥部报警。此时的指挥部已越过战线前移，原驻地成为了留守处，负责战场善后和物资伤员的中转，除了军火、马匹、粮食和几个火夫警卫以外，无兵可派，而清剿残敌打扫战场的部队都在前方的山上。接到赶马人报警的长官向正在驿路上急进的部队求援，但被告之，部队必须齐装满员地在规定时间集结于孤城，军令如山，爱莫能助。一场大战正在酝酿，站在路边的赶马人看着行色匆匆的军队和马帮走过，心急如焚。一天过去，黑夜降临了，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十几个伤好归队的预二师的兵，在一个少尉排长的带领下摸黑赶到了中转站。这些兵大多与赶马人们都认识，那个排长还是马帮送回来的呢。听留守处长官和赶马人一说情况，这些预二师的兵二话没有，当即决定明天出发。那长官让他们随便补充弹药，这让这些“花子军”的兵开了眼，在敌后，子弹袋从来就没有装满过的他们，何时开过这样的洋荤啊！

深夜，哨兵报告对面山上有火光和爆炸声，这让留守处长官很忧虑。大战刚过，日本鬼溃逃方向只会是孤城，而不应该出现在这远离战线的后方。可战时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万一是真是一支小部队呢？这对于没有武装的马帮、民伕、伤员甚至他这留守处来说，都是灾难。对面山头的火光看似很近，可“见面能说话，隔山跑死马”，

爬坡下坎走起来要有大半天的工夫。在这种铜锅底一般黑的夜里没有火把是不好行动的，但无论哪一方使用火把，都会暴露自己的行踪而给对方以可乘之机。那长官和排长商议后，命哨兵加强观察与警戒，排长天亮后带人改道向山寨进发，待弄清情况后再作截击日本驮队的行动。

天亮了，夜间着火的山头在白天一直冒着浓烟，赶马人带着预二师的兵在下午赶到山寨时，村里的惨状把他们都惊呆了。开肠破肚鲜血横流的尸体横陈在寨口大核桃树下、村路上和那些茅草房内外，其状惨不忍睹，血腥味和火烟味令人窒息。出民伕的汉子们已经回到了山寨，他们是送伤员返回时看见浓烟而急速赶回来的。他们各自守在自己的亲人的尸体边，有的痴呆呆地坐着，有的在声嘶力竭地试图唤醒死去的人，而那山里汉子嚎叫一般的悲声，让每个人的神经都震颤了起来，小寨阴风惨惨。见了预二师的兵，他们都围了过来，当得知就是要剿灭这帮遭天砍的日本鬼时，这些汉子们都各自找了家什要跟了去。排长极力解释着，只挑了八个人，他指着黑云翻滚的天空说，不能让惨遭不幸的乡邻再被雨淋，他要其他人在寨子里收敛尸体。几个赶马人忙跑去了狗的媳妇家，他们看见了仍在冒烟的废墟，焦糊的枪刺和尸体仿佛在诉说着昨天夜里那惨烈的一幕。用竹蔑遮盖好了的大小尸体归顺在空地上，赶马人们知道，他们的马锅头回来过！他已经追去了！

根据留下的痕迹，排长决定兵分两路寻踪追击。为保证兵力的集中使用，排长指定一个兵带寨子里的八个人为一路，如果发现日本鬼，不作正面攻击，只要跟住他们，袭扰他们，鸣枪示警，等两处合兵再行攻击。其余士兵由排长带领随赶马人走另一条路。两拨人各自匆匆追去，很快隐入了山林之中。

滚石坡的路被引发的泥石流截断了，驮队只能回到“U”型路的底部——伐木场，重走前天来的那另一条路。这次重返旧地，日本伍长看着伐木场遮天蔽地的森林和那血浆一样的江水，心情如同这云层密布的天空一样，阴沉沉的。这是个不吉利的地方。自从撤退以来，兵员损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离开这里以后的三天中，一半的士兵殒命于这片大山之后，又回到了这里，这是不是宿命？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伍长不禁打了个寒噤。这个鬼地方！他大声诅咒了一句。这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中，从东南亚一路杀来的战胜者，军鞋踏过，对手无不望风披靡。那些黑瘦矮小的东南亚人，那些貌似强大的蠢笨的白人……除了支那军队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以外（仅仅是麻烦而已）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对手。优等民族对于劣等民族的优越感，在他心中急剧膨胀，他鄙视他们的生命，蔑视他们的存在，他居高临下践踏虫蚁般地屠戮他们，凸显着大日本皇军的不可战胜。到了这时，不仅军官的说教，他自己也认为优等的大和民族偏于狭长海岛一隅，是耻辱，是不公平。杀戮对于他来说，是建立新秩序的需要，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可踏上这片土地以来，这里的山民村夫老人妇孺甚至竹木山石泥土，都成了索命的复仇者。他们象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一切徒劳的挣扎与疯狂除了加速灭顶之灾的降临之外，毫无其他效果。支那军队的反攻，如此坚韧，一改以往印象。任阵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那凄厉的军号和怒涛般的吼声却没有终止过，一直以杀戮为乐事的他也为之胆寒了。这是些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百姓啊！他不能理解这片土地对于他们的敌视、厌恶与拼死的抵抗。

伍长没有让人疲马乏的驮队停顿，直接穿过伐木场，走上了前天被赶马人带来的那条路。幽灵般飘荡在黑森森的山林里的复仇者，不会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的，更何况随时可能出现的追兵。天色不早了，必须脱离这个令他恐惧的死地，否则只能返回伐木场。在狭窄的路上宿营，他们无疑都会成为活靶子。丢失了头马，打头的牲口就要人牵着走了。伍长没了办法，除加强戒备外，路遇林木茂盛情况复杂的路段，便狂抽打头的马屁股令其负痛前奔，以期触发那些暗藏的机关。他不能再损失兵员了，现在不连伤病员只有五个人，要照应这支驮队已是捉襟见肘，还要防备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遭到的袭击。他撤消了不许开枪的命令，他已经不在乎枪声暴露目标了，毕竟消除现实的危险更迫切更重要。伍长庆幸这个暗中追踪着他们的家伙没有远距离致命的武器，譬如毒弩，否则他们活不到现在。想起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的被毒弩射中的士兵暴死的情形，心中一紧，便厉声催促着加快速度，这样的叫喊，仿佛可以减轻些许恐惧。

崎岖曲折的路上，驮队仓皇而去。

8、

滚石坡的路断了，日本鬼要逃出这里，必经三道拐。狗去三道拐走的是切线，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狗足够设置好一切了。

三道拐象一个“3”字，每道拐都是一个很急的回头弯，两个凸出的急弯象待发的箭头似的，仿佛都已支出了悬崖的边沿，悬崖边的石缝中几棵剑麻稀稀拉拉的参差着。凹进山肚子的弯道上，路的一边是悬崖，内侧是难以攀登的峭壁，竹木繁密，地上藤葛交错，两头的藤蔓越过了深涧，绿荫把路遮成了一段一段的。狗就在这里候着日本鬼。他用石头把倒地的干龙竹砸开，破成竹片，以棕绳扎住一摞竹片的两头，用棍子从这摞竹片的中间朝两边狠命撑开，棍子两头的竹片就弯成了两张弓，一只夹子就做好了。放置在地上的夹子里用几根木棍搭在中间作为机关的棍子上，踩入大夹子的猎物就会被强力夹住，这一击足以伤及筋骨。而地上的腐叶，就是这些夹子最好的伪装。以同样的原理，狗用冲担上的皮条做弦，给自己准备了一支粗糙而强劲的大弩机。在凸出的弯道上，狗设了一些夹子。同时也象滚石坡前对付日本尖兵那样设置了扫杠，就手也结了几个套子。在凹进山肚子的弯道上，狗在悬崖边找到了一根酒杯粗的藤条，他把这藤条拼命向路的内侧拉过来固定住，用绳子连接了作为机关的木桩。这是一个大弹弓，就看谁将成为射向深涧的弹丸了。狗在这里施展着一个山里人全部的狩猎手段，他不让日本鬼走出这里。老寨主说的“一个都莫放脱！”狗要用他们作为牺牲，祭奠亲人和那许多狗认识或不认识的死者，他比任何一次狩猎都做得精心。做完了这一切，狗巡视了他的杰作，没有疏漏了，他满意地拍拍手，顺着紧挨路内侧峭壁生长的几棵笔直的大树回到了壁坡顶。

天近晚，起风了，树叶竹稍沙沙响。狗耸了耸鼻子，闻到一缕随风飘来的马汗气。来了。狗双脚蹬弓，拉开牛

皮条弦，为弩机安上指头粗的竹条。他隐蔽好自己，眼睛盯住了第一道拐。驮队出现在了狗的视线里，那马突然不走了，任怎么抽打，只原地打转，恼怒的日本鬼扬起刺刀戳向马屁股，那马跳起来，竟回身向驮队撞去，狭窄的路上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枪响了，那马被打倒推到了路边。一匹憨骡子被牵过来，那日本鬼走在路外侧，把身体藏在骡子侧后试探着走过来。狗冷笑了，从那两个尖兵被扫杠打翻以后，为躲避一侧的袭击，他们就一直这样，可狗为他们准备的夹子，这次就在外侧，只盯着繁密竹木的日本鬼在劫难逃。“啪”的一声，山谷中就响起了惊惊乍乍的嚎叫。夹子有一头是栓在地上那些盘根错节的藤葛或树根上的，疼痛惊恐的日本鬼顾不上观察这些，几次起身欲逃都被拽翻。那憨骡子被叫声吓了一头，却没感觉屁股上有催促的击打，便悠闲地低头踱步寻青草啃，骡子嘴拱发了吊索，大龙竹唰啦一声弹起，骡子脑袋被猛地向上吊起，身子就在路上挣扎。憨骡子堵了路，也遮住了狗的射界，狗几次调整弩机都没法瞄住在地上拼命叨脚的日本鬼。狗放下弩机，抬眼看去，只见日本鬼的机枪已经架在路边石头上，日本伍长叫喊着，一名日本鬼手持一根长竹竿赶了过来，竹竿一路拍打，便有夹子套子啪啪地被触发弹了起来。那日本鬼一直在变动位置，没有留下足够的瞄准击发的机会，待到了那憨骡子的身后，他起身挑断了吊索，那正往后挣的骡子屁股猛地朝后一坐，竟呼隆隆翻下了悬崖。那伍长见状赶着几匹牲口就跟了过来。那日本鬼转身跑去躲到前头的毛驴身后继续前来。进入了一段树荫。狗听见设置在那里的扫杆嘣地一声，就有木棒击打肉体的闷响传出。驮队在狗的下方走出树荫时，不见了毛驴。侥幸没被扫到的日本鬼胆战心惊地与第一匹马拉开了距离，竹竿捅着马屁股向前走，狗抓起绳子，那匹马一走出标记，狗用力一拉，急速弹出的藤条扫得掩蔽的腐枝败叶纷飞，将那日本鬼弹出路面，他在空中挥舞的手吊住了岩子外悬空的葛藤。狗不怠慢，一下站起来，举起弩机便射，那指头粗的竹条噗地扎进了在悬崖外打晃的身体，那日本鬼短促地叫了一声，扭了两下便坠落了。几乎同时，机枪子弹泼水般打来，狗感到肩膀一麻，被一股力量猛力推倒，他紧着爬了两下，藏身于大树后，没顾上袭来的疼痛，咬牙拉开弩机，接连射倒两匹牲口，阻塞了道路。然后接二连三地把竹条的“箭”频频往树荫下射去。活着的牲口和日本伍长掉头窜出树荫。在机枪掩护下，那倒地的日本鬼得救了，扑趴连天地退了回去。突然，狗的侧后传来惊慌的叫喊，逃出了弩机射程的伍长寻声奔去救援。狗知道，他设在身后的套子勒住了从后面袭来的日本鬼，他一寸寸地朝后挪出身子，等他提着弩机找去时，只见到了被截断了的绳头。

……

当日本伍长惊恐地发现，这个神秘的森林复仇者突然地拥有了远距离杀伤武器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们与对手之间，只有胜者能够活着离开这片森林了。

天就要黑了，在这异国的山林里，黑夜不是入侵者的朋友，今天要闯过这一关卡的希望破灭了。驮队掉头向伐木场走去，只有在那块与森林保有足够距离的空地上，人数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他明白地知道，就是把驮队全部丢弃也没有用，那影子般的人要的是他们的命。而与这个对手的较量，如果依仗人数比对手多而进入山林搜捕，只会象猎物一样被逐一捕杀。在森林里，他们不具备与敌手抗衡的能力。伍长在心里暗自琢磨着。

那个脸上被中国兵咬掉了一块肉的日本鬼被丢弃了，潮湿、阴冷、饥饿、连日的奔波和疟疾令他的伤势迅速恶化，肿胀的头已经发黑，烂得不成样子，散发着恶臭。他奄奄一息，在渐渐浓重的暮色里，象只没有生命的麻袋被扔在了路当中。

山林一片寂静，那远去的驮队马蹄声若隐若现，成为了森林中唯一可辨的声响。躺在地上的伤兵不舍地追寻着这蛮荒的森林中这点唯一与人的活动有关的声响，被抛弃的悲凉感笼罩了他。他是作为“没有丧失作战能力”的轻伤者编入这个押运分队的，他没资格也不想留在阵地上做最后的抵抗后拉响身上的自杀弹。他觉得他能够活下去，但他期望的是随战斗部队撤往孤城，而不是留在这支行动迟缓、为躲避追击而不得不在阴寒潮湿，环境恶劣的森林里撤退的驮队。老实说，手持武器的他，脸上被徒手的中国兵用牙齿咬去一块肉，这本身就够耻辱的，为此他遭受了严厉而轻蔑的责骂。可他没法开口解释的是，那个中国士兵是迎着他射出的子弹和捅出的刺刀扑上来的，他甚至来不及抽回刺刀就被勒倒了，那具涌流着鲜血濒死躯体内的仇恨和着最后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了牙齿上。他没有选择，只有服从。来到这片土地的两年中，他已略知这亘古蛮荒瘴疠横行的大森林的厉害，许多强壮的生命都消逝在了那里面，何况他一个因饥寒和伤病而极度虚弱的人呢？恶化了的伤势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热和摆子彻底击垮了他，他不甘地沦为了不断遭受袭击的驮队的累赘。

伍长把他扶下牲口放倒在地的时候说，他们要去捕杀那个可怖的袭击者。这里是唯一出口，明天驮队再来的时候会带上他的。在求生的欲望下，尽管伍长话语中的漏洞明显，但他还是情愿相信。而现在，他浑身已经被地上的泥水浸透了，体温在慢慢消散。夜幕刚刚降临，寒冷黑暗还很漫长，还能熬到明天吗？他没有信心。想到这里，他伸手摸了摸伍长别在他腰间的自杀手榴弹，心中竟然还涌起了一阵感激，当那个袭击者出现时，或者当生命处于最后的时刻，他情愿选择帝国军人的死法。无法抑制的战抖又来了，越来越剧烈，浑身的肌肉在跳动，牙齿敲出哒哒的声响，他的意识在慢慢模糊。

不远处，一支黑洞洞的枪管伸出了路边的草丛，两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路上依稀可辨的人体。伍长伏在机枪手旁，听着驮队杂乱的蹄声逐渐远去，心里估算着那个神秘的袭击者出现的时机。按正常情况，阻击者在目的达成后，一定会观察驮队是否真的离开，以决定阻击阵地的取舍的，那么他就不会忽略路口当中的那个伤兵，他必须判断这个躺在地上的人是否真的失去了反抗能力。伍长等待着的就是这个时候。暮色加重了，树叶间隙中透进的天光虽然还亮，林中的光线却在迅速暗下去，视线越来越模糊。机枪手揉了揉眼睛，尽力分辨着目标周围的动静。

暮色苍茫中，一个黑影在路旁的山坡上出现了，他果然发现了横陈在路当中一动不动的人体，他警觉地停住，蹲下了身子。片刻后，他顺着一条岩石缝轻轻摸了下了路边，几块小石块向那躯体飞去，并没有激起任何反应。他小心地凑近了去，想看得清楚一些。突然，他不动了：那里有一双眼睛，一双倒映着残余天光的眼睛在瞪着他，那里面有恐惧、有疯狂。四目相对，都象在考量对方的神经坚强的程度。那黑影看见那只一直压在腰腹上的手在手榴

弹把那里拧动着。终于到了极限了，倒卧地上的人发一声喊，手一拉，就有火星喷射了出来。那黑影见状情知不妙，向后一倒，人就摔进了石缝当中。随着那声叫喊，爆炸与枪声几乎同时响起，森林的寂静被击碎了。

待一切都静了下来，山林的夜降临了。伍长在爆炸和枪口发出的闪光留在视网膜上的影象消失后，离开了埋伏地向目标跳跃着、躲闪着摸过去。那里一片死寂，没有了袭击者的踪影，留下的只有胸腹被炸成空洞，脑袋被机枪子弹打去一半的尸体……

伐木场。伍长支使着日本鬼把炮弹全部卸下堆码了起来，从狗他们马帮掠得的手榴弹，除了安置在了炮弹箱中间的以外，其余的都分发了。他们专门挑出八匹相对壮实的马单独栓在一处，其他牲口身上都挂了手榴弹集中到另一侧。接着，他们用上次没有烧完的那些柴火在空地上燃起了一堆火，所有干柴全部搬来了，看来，他们打算让这火一夜不灭的了。又一只毛驴遭难，那些割成块的肉堆在一件蓑衣上，他们几个今天明显是吃不了的。一阵忙乱后，除了在火边煮肉烤肉的一个人外，日本鬼们都隐没到了黑暗中。

篝火呼呼燃烧着，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细碎而清脆的响声，火光照亮的范围，占了空地的一大半。如果没有火光，眼睛在暗夜里尚能辨认个大概，因为有了火，视觉反差大了，火光照射的范围以外，更显得黑。伍长抱着机枪依着一根原木隐身于窝棚旁的黑影里，他注视着火光映照的范围，心里对他的这个部署很满意。窝棚离火堆不远，几乎处于这个空地的中央，除了在火堆边准备吃食的人以外，其他两人都隐伏在火光映照范围之外的黑暗里，在这个视界、射界都很好的范围内，弓弩的射程是够不着火堆边的人的，若想要射杀火堆边的目标，人就得靠近，而任何闯入者在这个一览无余的空地上，都将被交叉的火力打成筛子。

又回到这里了。伍长环视着伐木场已经熟悉了的景物。从撤退以来，他已经四次光顾这里。第一次在这里他损失了两名士兵，今天一天之中三次踏入这里，每次都被阴郁不安的情绪困扰着，那种黑色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浓厚。他一直在琢磨冥冥之中的这个安排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他已经明白地闻到了死神的味道。这个该死的不祥之地！这时的伍长已经没有了任务的概念，运送炮弹的任务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他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他就要把被丢弃的炮弹箱中间的和那些牲口身上的手榴弹弦拉出来做好绊，他要让尾随而来的他憎恶的劣等支那人付出代价。如果今晚能够安然度过，明天他们就将骑上快马以速度的优势摆脱这个该死的袭击者，那些烤肉足以支撑他们逃离这个令他恐惧的大森林。

一切都在今晚了，伍长知道那个人不会无所作为的，他一直在凭借山林中可资利用的一切，扮演着猎手的角色。可从刚才天擦黑的伏击开始，双方已经从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关系，更改为互为猎手与猎物了。蹲踞在窝棚阴影里的伍长，犹如一只身处绝地而又迫切地渴望噬血的狼，盼望着能给对手致命一击的机会出现。

来吧来吧，让该来的尽快来，该结束的尽快结束，决一生死的欲望刺激着他。他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暗夜中，两支队伍正穿越山林向这里赶来……

9、

当狗从树干和灌木的缝隙中看到那堆橘红的火光时，已经后半夜了。

黄昏时分的一阵机枪子弹，一直当猎人的狗差点成了别人的猎物。拿伤兵当诱饵，这帮杂种就不是人！日本鬼的伏击虽未得逞，却令狗一时难以判断他们是否会借势返回三道拐。狗的伤口很疼，他需要歇歇了。起风了，天会晴了吧，这天也该晴晴了。狗就那样坐在路口旁的山包上边想边吞咽挖到的葛根，没嚼几口，失血和疲劳使狗迷糊了过去，直到一阵山风摇落树叶上的水滴把他给激醒。

篝火将林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剪影，火光中晃动着的人就是个黑色轮廓。其他日本鬼呢？狗有些可惜被白白耗费了的时间，如果紧跟驮队，日本鬼的动向就清清楚楚，那样，他就还是猎手。烤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狗的肠胃痉挛起来，几天来就没装过正经吃食的肚子里尽是些根根草草。这些在县城里当山珍卖的东西一旦成为主食，还真抵不得包谷粑粑洋芋坨坨。狗咽了口水，掏出葛根接着嚼起来，他得积蓄能量。隐伏在树后的狗仔细地观察着，那未遂的伏击告诉他，不想成为猎物就必须十分在意。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他想在黎明前最黑暗、人最疲乏的时候动手。狗翻转身子仰面朝天躺着，竟在树缝里看见一丝星光。天晴了。狗想象着明天那日头的炽热。有了日头，炮火也消停了，那些生灵们该回来了吧？山林又会变得喧闹了。……阳光下舒展着叶片的花草竹木，或笨拙、或乖巧、或调皮的野物在林间窜蹦腾挪，还有山鸡、老阳雀和那无数歌唱吵闹的雀鸟……阳光下，奶奶在搓棕绳，翠儿给狗儿把尿，红扑扑的脸上纤细的绒毛被阳光照得透明发亮，狗儿圆滚滚的腿间小肉虫虫反射着日头的颜色，嘎嘎的笑声空谷回声般地荡漾在山寨上方湛蓝的天际……锥心的刺痛撕肝裂肺般地又一次地穿透了狗的胸腔，狗醒过来，他攥起拳头，圆睁双目，牙关咬紧地说：还债吧，日本鬼！

狗朝那堆码在半坡上的原木摸去。后背上那又大又笨的弩象翅膀一样张着，要保证行动不发出一点声响，在灌木丛生的林中实在不容易，狗的行走很吃力。原木堆在火光照射的边缘，随篝火的跳跃时隐时现。那里有没有藏匿有日本鬼，狗不知道，但能够看到的目标就是那火堆旁的人影，他不想放过。狗的每一步都轻如山猫，无声无息地潜行着。每一丛灌木山草后，他都停下来仔细观察，选择好下一个藏身之地再往前行。到了，背光的原木堆后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以听觉判断四周的动静，可激烈的心跳和包扎着的左耳影响了狗的听力。狗靠着原木堆，尽力地平缓呼吸。待心跳平复，狗解开了包扎在左耳部的布条，血把伤口和布粘住了，他轻轻揭着，可最后那一点粘死了。狗把土布褂子下摆撩起来塞进嘴里紧紧咬住，猛地一拽……疼痛过后，有热流顺着脖子往下流。森林中的寂静真切地传到了他耳中，他甚至能隐隐分辨出空地那边篝火燃烧发出的劈啪声。狗悄无声息地爬到原木堆

顶，抬头一看，他停住了取弩机的手。距离太远了！即使射去，到了那里也没劲道了，怕连布都射不穿。还得靠近！狗下了原木堆伏下身子向前爬去。在那明与暗的交界处，狗停下了。原木堆前的空地中央是码好的炮弹箱，侧边是窝棚，再往前是火堆，火堆的那头就是老岩子下的滔滔大江。伐木人老财迷聪明，他把伐好的原木拦在这陡坡上堆码起来，原木堆前下部以下细上粗的长楔子塞了，一矣买卖成交，只要一人一边把套了绳子的楔子一拉，原木堆就会崩塌，在窝棚前滚过空地掉入江中。那被反复碾压的空地上平平整整寸草不生，在火光照射下，任何活物出现在那里都无从藏身而变成狩猎对象。狗把头埋到地上，他得仔细想想。狗是见过老财迷放滚木的，父子两人吆喝着号子，保持相同的力量，使楔子同时向两边歪倒，这样才能使原木挤挨着顺序滚去，否则就会横七竖八地滚满空地，连自己的窝棚都毁了。可狗要的却正是让原木乱滚到空地上，不仅想把火堆边的日本鬼撞下江，还要把他认为住有日本鬼的窝棚也平了。要是把杂种们的炮弹也碰炸了才过瘾，那他们都莫想有全尸！狗不知道，炮弹是要引信才能爆炸的。狗把已经派不上用场而又影响行动的弩从背上取下，悄悄朝原木堆前爬去。狗选的是原木堆靠窝棚一侧的楔子，他在楔子上套上棕索后，就向原木堆侧后那棵斜卧在地的原木爬去。狗想得周到，拉动楔子避免不了声响，一旦被发现，那棵大原木便可以抵挡射来的子弹，可那时对于日本鬼来说，一切都晚了。

起身刚要爬过大原木的狗突然停住，浑身上下象弩机上的弦一下绷紧了。他听见，就在这大原木的那边，有因紧张而粗重急促的呼吸声传来。日本杂种，藏在这里呀。狗后怕起来，那日本鬼要是早一些发现他，他就成猎物了。双方就隔着这大原木等待着，他们心存侥幸，都希望对方没有发觉自己，都等着后发制人。日本鬼没喊叫，这一路他领教了这个森林复仇者一招致命的厉害，喊叫只会暴露自己的具体位置而招致杀身之祸。僵持。时间在流逝，狗侧头看了看老岩子方向，透过黑暗，已经能隐约看到前方流淌过来的大江的轮廓，江水反射着暗淡的天光。天就要亮了。天一亮，在这开阔地边沿的狗，就真的会象条狗一样被猎杀了。没了退路，只能拼死一博。决心一下，狗用冲担向原木猛地一击，这响声在安静而又充满紧张气氛的黑暗里，足以令人的神经失控。原木那边呼地站起个人来，狗双腿一用劲，纵上了原木，挥起了手中的冲担。啪！枪响了，子弹擦身而过。狗心里刚闪过“臭枪法”的同时，斧子劈开木头的感觉就顺着冲担传来，惯性令他向前一扑，对方的刺刀噗地戳进了狗的肚子……。倒在原木后的狗，听到几声喊，枪声就响起了，子弹击打在原木上，咚咚的钝响。狗一阵眩晕，腹部疼痛难忍。这不同于臂膀和耳朵的伤口火辣辣的锐痛，而是搅动着五脏六腑的钝痛。他拼命挣扎着靠坐起来，双手握住刀把，慢慢将刺刀拔了出来，血水紧接着喷涌而出。他赶忙解了包头布使劲捆扎住肚子。做完这一切，浑身冷汗的狗，已近虚脱，他喃喃地说：狗儿，爹替你做掉了一个，是爹亲手做掉的。狗的意识慢慢模糊了……

枪声一响，伍长便知道，开始了。他终于来了。他喊叫埋伏在原木堆旁的那日本鬼的名字，没有回答，他知道，他又少了一个人。目标既已明确，他赶忙呼叫另一个潜伏在路口的日本鬼向他靠拢，他不想再被那神秘的杀手零敲碎打地把本钱折光。篝火旁瘸了脚的日本鬼和伍长开了枪，掩护路口那戴眼镜的日本鬼跑了回来后，停止了射击。伍长不知道，如果他现在过去，那一直让他又恨又怕的人就被生擒了。伍长不敢，那人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惨

痛，他现在只要监视住那里，天一亮就不怕了。

毕竟是这片山里的人。小山寨的八条汉子和那个预二师的兵几乎就没有被日本鬼的伪装所迷惑，他们紧随着日本驮队留下的痕迹快速地追踪而来。天快亮时，在滚石头坡前的山弯里，他们见到了那两个被倒吊在路中央的日本鬼，两人浑身的骨节都错位脱臼，软稀稀的，呕吐物从鼻子眼睛到头发流淌到地上，他们奄奄一息，气若游丝。山寨里的人就知道，有人跟住了日本鬼。他们正要把这两个日本鬼解下，宁静的夜里突然爆起了枪声，他们为一震，随即扔下了那两个日本鬼，朝伐木场那边匆匆奔去。他们以为排长率领的兵已经和日本鬼干上了，他们得赶快赶去，不亲手宰几个日本鬼他们无法向全寨子的冤魂交代啊！

他们抵达滚石坡时，路断了。心急如焚的人们没有片刻犹豫，返身回到滚石坡头，离开道路，翻山穿林越过了滚石坡。天亮时分，他们赶到了伐木场。

幸亏这黎明前的黑暗中暴起的枪声，赶马人带领的预二师的兵没有过三道拐，否则狗在那里设下的那些机关就整了自己人。听到枪声，排长的第一个反应是：糟了。他分辨出这是机枪和日本步枪的声音，在敌后这么长时间，随时和日本鬼交火，这步枪的声音他太熟悉了。山寨里的人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老百姓，仅凭一支步枪和那些柴刀，交火的结局只能是悲剧。他赶快询问赶马人，要求以最短的时间走最近的路赶到那里。赶马人熟悉这片山林，他们甩开了弯弯绕绕的驿道，寻了毛路，顺枪声暴起的方向走切线径直奔去……

晨曦中，伐木场里景物已清晰可辨，那堆篝火还在燃烧，四处静悄悄的，淡淡的雾气在林中飘荡，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小山寨的汉子们和那个预二师的兵犹豫着走进了伐木场。预二师的那个兵隐隐觉出了些许不对，他正要招呼大家，机枪就响了，随子弹射入人体的噗噗声，有人倒下。这些只有寨子之间开仗火打冤家经验的山里汉子，发一声喊，挥舞着手中的柴刀竟迎着子弹扑了过去。趴下！快趴下！预二师的兵声嘶力竭地喊，见没人听他的叫喊，他赶忙端枪射击，篝火旁射来的一粒灼热的弹头，高速旋转着钻进了他的脑袋……

10、

枪声与呐喊震醒了狗，他探出头去，正看见晨曦中那些挥舞柴刀扑过来的汉子，他们中不断有人被打倒。狗急了，他死命拉动棕索，可受伤的腹部使不上力，原木堆下的楔子纹丝不动。狗低头抓住冲担时，目光扫过那被劈碎了头颅的日本鬼腰部。手榴弹！他从那做诱饵伏击他的伤兵那里知道怎么用了。他把那两颗手榴弹抽出来往后腰一别，直奔那楔子而去。放置在楔子根部的手榴弹盖拧开了，狗一拉弦，身子同时向后滚去。轰——爆炸激起的巨大声浪在林中回响，原木堆雪崩似地坍塌了，呼隆隆翻滚着冲向那片空地。枪声停了，窝棚垮了，炮弹箱倒了，篝火旁的日本鬼被撞得飞了起来，坠落到了老岩下。就是一瞬间，空地里一片狼籍，遍地横七竖八的原木别着翘着支棱着。狗摇摇晃晃爬起来朝空地走去，他在想，那炮弹怎么就没被撞响呢？看着满地的原木，狗觉得也不会有人逃出

这个灾难的。狗有些遗憾，他是闭了眼捂了耳朵等着那地动山摇的爆炸发生的。

三个没被打倒的汉子被滚滚而来的原木挡住了脚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他们惊呆了。血人一样的狗趔趄着走下坡来时，他们都认出了对方。汉子们想过来帮他，刚一举步，机枪又剧烈地响起，三人被悉数打倒在地。狗看见了，就在那翘起的原木后，一支枪管喷吐着红色的光焰，狗顺坡滚了下去，贴在了那原木的侧下方。那日本伍长已经疯了，机枪不住地响，弹雨泼去，那些已经没有了动静的身体被打得血肉横飞。狗不知道自己的人来了多少，可只要这挺机枪叫嚣着，就散布着死亡。狗拼尽全力爬上了那翘起的原木，居高临下的他看清了，日本伍长跪着，扭曲的脸在抽搐，狠命扣响支在原木上的机枪。令狗感到耻辱的是，机枪一侧翻倒着的子弹箱，正是狗的马帮要送去前线的，就是这些子弹击倒了小山寨的那些汉子。怒火中烧的狗双眼血红纵身而下，冲担同时刺去，运动中，身体一歪，冲担只浅浅扎入了日本伍长的左胸，狗一点不敢松劲，脚才站稳，他就抓紧冲担用尽全力顶去，将日本伍长顶得靠住了身后的原木。日本伍长在狭窄的原木缝隙里被挤住了双腿无法站立，只得丢了机枪，双手抓住冲担死命抵抗着。力量在这一刻平衡了。突然回复宁静的山野里，只有双方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冲担在扭动，在颤抖……没有人再向这边冲过来，狗明白了，这些汉子都死了。狗在心里对他们说，这些都是发了疯的野兽，不是山里打冤家的对手啊。狗悲愤交加。受伤的左臂使不上劲了，腹部的伤口热呼呼的液体一股股地涌出，冲担在逐渐向狗的这边移动。那日本伍长竟腾出一只手伸向了机枪。狗拼力一顶，冲担在满是血与汗的手中滑动了，狗一咬牙，以右胸顶住了冲担，那尖锐的铁尖刺入了皮肉，冲担的移动停止了。重获平衡的狗飞起一脚踢开了机枪，脚下一晃，身体一下滑坐到原木上，身体的重量猛地由高向低压去，将日本伍长重新抵了回去，冲担也更深地进入了双方的身体。狗前倾着身体坐在原木上，圆瞪着的眼睛红得就象马上就要爆裂的血球，那里面熊熊燃烧着的怒火任何人看了都会胆寒。日本伍长终于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他在心中猜想过许多次的敌手了，他认出来了，马锅头！竟然是他撵着人数十几倍于自己的日本押运分队追打几十里，并把他们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这样一个山野村夫在大日本皇军的脸面上一再地甩着耳光。狗感到后腰被硌得很疼，他突然想起，后腰还别着一颗手榴弹。这一发现令他振奋。他以右手和胸暗自加力，左手飞快地抽出手榴弹啃酒瓶盖似的揭了弹盖，这动作一气呵成，当手榴弹弦在弹把上晃悠的时候，日本伍长才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这时，哗啦啦一阵响动，旁边的原木后站起一个人，他眼镜斜挎着，满脸污血和泥巴。一眼看见举着手榴弹的浑身是血的狗，极度恐惧的他呆了片刻，竟号啕了。一点不汉子！狗在心里骂，竟没有鄙夷他的感觉，反而心生怜悯。狗回过头，对那日本伍长努努嘴，日本伍长低头按他的示意看去，大惊失色：他身下是几颗撞碎的木箱中滚落的炮弹，其中一颗竟然还在他的胯下。重新抬起头来的伍长面如土色，汗珠滚滚，便松了劲，冲担噗嗤地桶进了他胸膛。狗伸出舌头把手榴弹弦慢慢舔入口中，低沉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奶奶，这个日本官算我孝敬你的！一拉弦，狗顺势翻下了大原木……

湛蓝得没有一点杂质的天空下，群山怒涛一样汹涌着铺排到天的尽头，山浪排空处，太阳升起来了。这是一轮高原的太阳，炽烈而直白，一露头便将她那灿烂的笑容袒露无余。连绵多日的雨水把她的面容浣洗的白亮清爽，明

媚的阳光在通透的空气中一无遮拦地泼洒在这片大山上。

一柱柱光束穿过林荫的缝隙落到了林中空地上，光柱中有白色的雾气在袅袅上升，那些飘动着的细密的晶体反射着太阳的颜色，流光异彩。一条光柱落在狗的脸上，他紧闭着的眼睛感受到了阳光，他看见了小山寨流水潭瀑布上空的彩虹，那莲藕般白嫩的手臂窈窕的身影和那好看的眉眼呢？狗仿佛置身于那温润的流水中了，浑身的毛孔尽数张开，真舒坦。那温润跑到了脸上，一下又一下地蹭着，哦，那是流水潭边的大竹林里那张汗湿的脸？抑或是那泚到脸上的尿……一声嘶鸣传来，把狗从昏迷的幻觉中唤醒，他极力睁开眼睛，就见白蹄子粉红的舌头又向他脸上舔来。马日的，还记得找我？狗伸手拍了拍马脸，白蹄子一曲腿，在他身边卧下了，扭头咬住狗那破破烂烂的褂子往起扯。狗艰难地翻动身子，几经周折才趴上了马背。白蹄子驮着狗走出伐木场，阳光一下撒遍全身。白蹄子停了脚步昂头嘶鸣起来，狗勉力抬起头，前面有雾气在山间飘过，隐隐约约，亦真亦幻，赶马人和许多的兵正朝他跑过来，象踩着云似的，飘飘忽忽……狗四处环顾着，红土、绿树、白雾、蓝天，还有那条环绕着大山反射着阳光的白练似的大江。这片大山里再也没有丑陋的日本鬼了！想到这里，狗激动了，他要告慰他的亲人、他的乡亲，他大声地喊着他们。他喊奶奶，喊翠儿，喊狗儿，喊老财迷，喊老寨主……

狗并没有听见自己所发出的一丝声音。可这时，山林中一声清脆的鸟叫声却清晰地传入了狗的耳朵里，在寂静的山林里是那么响亮，那么真切。狗的眼泪在这一刹那如破堤之水，汹涌而出。

2005-6-14

孙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古堡·人物】系列：

绝地（熬狗）

1、

狗的天，塌了。

天亮时分，连夜赶回山寨的狗，一下被眼前的惨景猝然击倒，昏厥过去。

火头已经过了，浓烟一团团翻滚着，向晦暗无风的天上涌去，连接了低垂的铅灰色云层。山茅草苫就的房顶化作了黑草灰，随腾腾烟气在半空打着旋飞飞扬扬，依恋着这个它们曾经覆盖下的家而不忍离去。几棵焦糊的柱子兀突地指向云幕低垂的天，火烟不断从柱子上迸开的裂缝中冒出。烧坍塌了一截的土夯墙，象被烟叶熏黑了的獠牙朝天狰狞地呲着。那几具焦黑的人体上，蓝色的火苗在不断跳动。灰烬中，两支日本步枪已经烧没了枪托，乌黑的枪管上的刺刀扭曲着翘了起来。废墟中不断地发出噼噼啵啵的爆裂声，为这所农家小院以往拥有的那些温馨与平和的日子，唱着最后的挽歌。

从昏厥中醒来的狗一脸冷峻，他整理出一块地场，归顺了死去的亲人。寻遍场院，竟找不到可以用来遮盖他们的物件，都烧光了。狗环视四周，站起身来，把还没烧完的竹篱院墙三下两下拆了，掩盖了他的亲人，然后发疯似地在废墟中翻找起来。弩机、箭镞、套索都烧成了灰，没了踪影，夹子也烧变了形，已经不能用了，连菜刀都烧成了弯曲的铁片。所有挂在板壁上的狩猎用具，都烧光了。狗只找到原来靠在竹篱院墙上的冲担和栓在上面的牛皮条，还有一捆浸泡在木桶里的棕索。

狗挎了棕索，提了冲担，来到他的亲人面前，并无有特别的悲与愤，和以往出门的道别一样平静，狗说：我去了，你们等我回来。说罢，狗寻着驮队留下的痕迹，匆匆而去。

……

突然，急急赶路的狗象是听见了什么，停住了脚步，全身一下紧张了起来，从背上把两头包了尖铁头的冲担顺下来，抓在手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侧耳倾听着，眼睛警觉地搜寻着四周。阴冷潮湿的空气中再没了他刚才捕捉到的隐约的声响。山林的沉静，把心跳急剧的咚咚声放大了。

狗浑身湿漉漉的，雨水浸透了他的土布褂子，褂子下摆的十二只衣兜和大裆裤满是红泥的裤脚，被山石树棵扯挂得一缕缕的，黑色大包头下的眼睛喷射着仇恨的火焰，赤红。他找寻着，地上的痕迹又隐没了，尽是棕黑色的枯枝败叶，狗伸脚踩了踩，就冒出了红泥浆。他蹲下身扒开这些枝叶，露出了被踩得翻浆的地上留下的清晰的蹄印和脚印。狗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自然累积的枝叶踩上去只会冒黑水，这是人为撒上的。这把戏都玩几次了。狗紧走几步，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一块突出于枯枝败叶之上长着绿苔的黑石头上，听见了！他听见从地下传来的他所拼命追寻的声音。狗激动起来，心想，甩我？祖公是干什么的？是在这大山里走了多少年马帮的马锅头！

挨千刀的日本杂种，老子追着你了！被仇恨烧灼着的狗把这句话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狗做了十几年的赶马人不假，说自己是多少多少年的马锅头，狗确是有点底气不足。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而且这马锅头还是八爷主动让给他的。

八爷是李家堡的保长。八爷从来不与官家打交道的，是几年前杀到江边的日本鬼把李家堡祸害惨了，后来预二师的来了，江边成了游击区，日本杂种的据点被阴一下阳一下挨一挨二的扫清了。八爷那次领着寨子里的男人和预二师的弟兄掀了李家堡高脚岩的碉楼，那些作孽的杂种一个没跑掉。从那时起，八爷就应了保长这个差，打日本的事情，他都领着族人顶真去办，做得有板有眼。以前从不过问官家事的李家堡就还成了“模范村”呢。

县里给李家堡的公干是为在敌后游击的预二师运给养。地处边地的李家堡，本来就是千年古道上的驿站，谁家没有跑马帮的经历？八爷亲任马锅头，筹集骡马挑选人，拉起了马帮。狗想做马锅头。他家几辈人都在这古驿道上“搭帮”，很有些年头了，可就始终没有人做过马帮的最高掌事——马锅头。这座被称为“天界”、“高脊排穹”的大山里，细若游丝的古驿道在苍翠的山林里若断若续时隐时现，断头路、飞石口、倒马坎、望乡箐、收命崖、紧走三步……狗熟悉它们就象熟悉自己的掌纹。那山道险，悬崖峭壁深沟大壑的，他是亲眼目睹了多少命丧绝壁深箐和激流滚石的惨剧啊。那点经验全是命换来的，这怕也是八爷首选了他的缘由。狗想做马锅头，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格和能耐，但他没说，心想，小锅是不是铁打的，上路才晓得。可就几个来回，狗服了。八爷终归跑过大码头，见多识广，道上的行规礼数无一不通，对驿道的熟悉程度，也不见得就比狗差多少。而在日军眼皮底下走马帮，就是狗所不曾经历过的了。欢实的马铃铛摘了，恣纵的撩拨得人心漾漾的山歌是不能吼了，连马嘴都用竹笼子套住，横竖是不能有大响动。给赶马人温暖和希望的火也不能生了，吃干粮喝生水，老铜锅烤茶罐几天都用不上一次。马屁股后都系了马粪兜，人也不许乱扔东西，每次歇息后的地方都得抹去痕迹。每到那些关口，人心都是悬吊

吊的。

那次夜过青石板，眼看就剩最后几驮就过完了，寂静的夜里突然传来马吹响鼻的声音，日本鬼呜哇呜哇叫起来，八爷命两个赶马人飞身上马，打着尖利的呼哨向来路狂奔而去。在暴起的枪声中，马帮从容离去。如果说这次让狗开了眼界，对八爷的机智由衷赞叹的话，后来八爷收拾了三个日本鬼后，便对八爷钦佩之致了。这大山里的驿道，纵横交错如蛛网迷宫般，赶马人是根据季节、天气、货物交接、人马状况选择线路的。除了隘口，古驿道并非仅此一条。那回他们带预二师的伤兵返回时，被发现了。三个日本鬼追了上来。枪声中，赶马人慌了，八爷冷冷一声，喝住人们，随即把马帮带上了老冲沟。这是雨季大山泻洪的通道，被湍急的水流冲刷得笔直狭窄，旱季里就是寸草不生的干沟，也成了马帮抄近路的一条通道。不知死活的日本鬼顺着狭窄的老冲沟追来，八爷一声号令，几块大滚石呼隆隆推了下去，三个日本鬼就身首异处了。

这回动静整大了。带回去的枪和钢盔被送到了县城展览，县太爷差人敲锣打鼓给八爷送来了大红帖子，说还要奖励李家堡三匹好马。城里那些好看的学生娃娃还到李家堡“宣传”了一回，八爷披红带花老爷一样坐戏台子，李家堡扎实风光了一把。而此时，八爷象是看透了狗的心思，长袍马褂打扮得乡绅模样的八爷在去县里受奖的前夕，把狗找来，手中的大烟袋杆指指划划一番，就把马帮交代给了他。

狗当上马锅头了！狗对八爷真真是服气得五体投地。八爷就是八爷！狗这样赞叹。

翠儿却不这么认为。她说李家堡的马帮这回算是和日本鬼结仇了，再走马帮就不会那么撇脱。翠儿是狗的媳妇，她背着狗儿在锅台边忙碌着，并没有因为狗勾头咂烟半天不吭气而停下她的说道。她说八爷是见好就收呢。说八爷是缩头乌龟呢……。狗听不过意了，闷闷地说：乱讲些哪样？人家八爷会象你讲的那种？你那张嘴干的稀的乱淌！见狗顶嘴，翠儿有些吃惊地扬起了好看的眉毛，嘴却益发地不饶人了。你个木瓜脑壳！人家屙泡屎走了，你还生生要把屎吃掉，难怪你叫狗！翠儿把山里女人暴烈的火色拿出来了。要在平时，狗就一声不吭，翠儿的火气没了回应，自然消了去，可今天狗听不得翠儿把八爷的好心说得那么不堪。他们马帮那是受了县府的褒奖的，他们可是听了那些学生“宣传”的，他感觉应该用“宣传”和翠儿摆谈摆谈，不然这婆娘不知深浅。国家兴亡……马夫有责！他兀突地吼了一声。翠儿楞了一下，狗就很得意，这正是狗想要的效果。翠儿定了神，随即撇了嘴说：土狗学洋狗叫，那是匹夫！老娘也是懂“宣传”的。其实那天“宣传”时狗专门就“匹夫”问过师爷的。对师爷摇头摆尾之乎者也的说文解字狗听不懂，可他就记得了“匹”和马有关系。“匹夫”就是马夫，马夫就是赶马人，马夫有责！这次该狗撇嘴了：还说懂“宣传”，屁不懂！

翠儿背上的狗儿挺了挺身子，咬着指头流着口水的小嘴附和狗似的嗯嗯了两声，翠儿扭头笑嗔，嗯个屁，一点小人人屁都晓不得就会拉偏架了？狗一咧嘴，脸就笑烂了，说：我家狗儿懂事理呢。翠儿记得，第一次看见狗的那种父亲式的灿烂笑脸。那是狗刚走马帮回来，看着铺上肉乎乎的小人人舞动着胖胖的小手小脚，高兴得手足无措，

按奈不住当爹的欣喜去亲娃儿的小鸡鸡时，被迎面泚来的尿水喷了一头一脸后的表情。狗并不躲避，任尿流满面，眯眼享受着尿水冲击所带来的快感，然后舒坦的说一声“狗解手”，引得翠儿又笑又骂。山里人命贱，孩子一出生父母几乎都以狗狗、狗儿相称，那亲昵与柔情便都灌注在了里边。狗的爹妈大概还来不及给他取个大号，就撒手归西了，狗就成了他的大号，连李家师爷要给他取名他都不干，狗就被从小叫到大了。这回添了男丁有了延续香火的种，狗对得起爹妈的在天之灵了，满足与欣喜溢于言表。那段时间，只要天气好，狗就抱着狗儿故意坐在村路边，一有人路过，他就嘘嘘地把尿，把那小肉虫虫在阳光下袒露个明明白白。有村人因为他的显摆笑骂“狗日的”，他忙点头说，是呢是呢，狗儿狗儿狗的儿嘛，不是狗日的才怪了。狗儿这名字就这么来的，尽管翠儿不喜欢，可一村子都这样叫着了，时间一长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妥，习惯了。

翠儿狗儿是狗的“天”！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为了他们，狗怎能不上进怎么能不做马锅头呢？就为了狗儿嗯嗯的附和，狗也是要当定马锅头的了。

大反攻从旱季打到雨季，都几个月了。狗的马帮这次是给前方送弹药，途中要经过翠儿家奶奶在的那个小山寨。狗带了翠儿母子一起来。与往常一样，到了山寨翠儿就和奶奶住一段，等狗回来或下次来，再回李家堡。这是狗在“抢婚”前就和翠儿约定好了的。

狗的媳妇是“抢”来的。其实说“抢”不太确切，说“赖”来的倒怕还合适些。

狗那时还是马帮里的青头小伙。

驿道委蛇，马铃叮咚，马帮从浓阴敝日的丛林里走出的时候，日头刚偏西，刺破云层的阳光一柱柱地射下来，山野被映得深一块浅一块。忽地，雾气缭绕的半山里，响起吹叶子婉转嘹亮的声音，接着，脆生生的女声传来：

赶马大哥歇歇脚，

妹子家里来坐坐

有肉吃么有酒喝

热火塘边咂烟锅。

那是赶山拣菌子木耳的山里女子，离寨子近了。山歌调子给人疲马乏的马帮注入了活力。赶马人的嘴角露出了会意的微笑，连马都翕张着鼻翼，呆滞的眼睛灵动了起来。

有来有往，赶马人对歌了。稍显沙哑的嗓子高亢着，把阳刚与野性抛向了那云遮雾罩的山顶：

赶马阿哥要歇脚

想到阿妹家里坐

肉不吃么酒不喝

有句话要对妹说

……

歌声未落，有人粗粗地跟了句“想钻阿妹花被窝！”马锅头笑骂：开屎口！果不然，只一会那妹子的反击就银铃般顺着山坡滚了下来。笑闹中，马帮走得轻巧了。马锅头说，今天就在这寨子歇。其他赶马人笑问，天那么早就歇了？该不是有相好吧？放屁！马锅头骂。其实大家明白，这时辰要走到下一个寨子就得走夜路了，都怕碰到山贼。

难得见到生人的山民们聚拢到了场院，七手八脚地帮马帮卸驮子栓马，寨子喧闹起来。忙碌中，一个窈窕的妹子挤进人群，厉声问道：哪个刚才对调子吐粗口？人们楞了一下，随即哄笑起来。狗一抬头，眼睛就直了，就那样的盯死了那妹子。哄笑中，妹子察觉到了那双刀子似的眼睛，双颊飞起两片红云，扬一下那好看的眉毛，留下句“牛马畜生！”一拧腰挤出了人群。卸了驮子栓好马，赶马人和山民们倚着驮子换烟叶子抽，两个年轻的赶马人在场院边上逗着一群光屁股娃娃，阵阵童谣传来：“赶马老大哥，要吃板栗请马屙，要吃茶，请马撒……噢——”。

天擦黑了，马锅头寻到了狗，狗还是木桩那样戳在那里。从那妹子出现的那一刻起，狗完了。马锅头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着了。在这片大山里，赶马人和山里妹子缠绵凄美的爱情故事，生生不息，可大多没有结果，却把人伤得很重。这回，狗该疼了，那是剜心挖肺的疼哟。马锅头是叫狗给马挑水的。魂不守舍的狗挑着桶木木地朝村外老岩下的流水潭走去。西下的日头又大又红，走向老岩边的狗渐行渐远，就象被烧熔于那团炽热里去了。马锅头摇摇头，叹了口气，顾自回去招呼马帮夜宿的事情去了。

流水潭其实是瀑布冲出的回水湾，跌落的水流溅起水雾在夕辉照射下，腾起了一道绚烂的彩虹，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背景下，仙境般的美。曲曲弯弯的石板路把狗引到了潭边水口，刚驻足，狗就被美景吸引了，睁大了的眼睛晶莹地反射着七彩的光泽，他不由自主地走去，他想要走入那美景。穿过竹林，攀上矗立于水潭边那白色的大石头，整个水潭尽收眼底。霎时，他犹如被弓弩射中了心脏，屏住了呼吸——潭中，有个一丝未着的女子。

潭中的女子莲藕般光洁的手臂撩起的清流在细如凝脂的皮肤上流过，从凸凹有致的窈窕的身体上滑落。她双目微闭，好看的细眉安逸地舒展着，脸上满是惬意和舒坦。这正是那个火辣辣的唱山歌的妹子！不难想象，这情景对于青头小伙的狗，震撼有多么剧烈。他的嘴大张着，脑袋一片空白，肩上的担子滑下来，水桶空嗵嗵地跌落了。水桶滚落发出的声响，在寂静的幽谷里、也在他们毫无准备的脑海里激起巨大的轰鸣。犯了山里规矩了。这是狗的大

脑恢复运转后的第一反映。边地的人们是按性别在河流中分段沐浴的。坝子里的人们多是男上游女下游，而山里许多地方则相反，不能错了的。狗是在那仙境美景的诱惑下犯的忌。

“八”字型驮架拼就的狭小空间里，狗静静地躺在那条已经分不出颜色的毡子上，没有一丝睡意。狗知道山里的规矩，犯了这种忌，要么由人家挑一驮一马作为赔偿，要么把人留下为人家做一年工，否则，这冤家就要打到见血。马帮的惯例是宁可损失驮马人也要带走的。这关系到马锅头和马帮的声誉信用，声誉和信用是走马帮这一行的根本，他们看得比命还重。可狗却很平静。他等着，等待那个就要到来的时刻。当狗随马锅头暴怒的喊叫钻出驮架拼就的栖身之地时，夜幕已经降临了。被火把照得通明的场院上，嘈杂的人声随狗的出现平息了下来。火把燃烧的呼呼声中，马锅头对寨主说的话很清晰。狗不是故意的，犯了忌，错了，甘愿认罚。马和驮都在这里，你们选吧。狗走上前去，低了头，闷闷地说：我是故意的，我甘愿留下。人们呆住了，象看憨包一样看着狗。马锅头纵过来扬手甩给狗一个大耳巴，吼道：憨狗日的，你留下，我咋个向你们李家堡八爷交代？狗依旧低着头，伸手揩一把被搧出来的鼻血对马锅头说，马帮的弟兄可以做证，我是自己情愿，不是你和马帮不管我。狗顿了顿接着说，也请你和八爷说清楚，不要为难这寨子，是我自己要留下。然后他对寨主说：我留下，听寨主打整。出乎意料，被这种豆得瓜的结果搞懵了的寨主，此时刚回过神来，他磕磕烟袋锅说，你看了人家翠儿，就去她家吧。说罢转身走了。

2、

狗把头从那块黑石头上抬起来，耳朵上粘了青苔，他长呼一口气，撑起身子朝前看去，左前方有一个坡地，林木茂盛。狗跳起身朝坡顶跑去，到达坡顶，他立刻趴到地上。地上吸饱了雨水的厚厚的腐植土被他的身体压榨出黑水，浸泡了他的前胸，尽管他浑身燥热，也禁不住打了个寒噤。雨季的山林是湿冷沁人的。

往日喧闹的山林，现在静得出奇，几个月的炮火震荡着这片大山，雀鸟野物们都不知吓跑到哪里去了。狗从刚才地下听到的动静判断，日本鬼与他所在的位置还有相当距离，估计那消除驮队痕迹的人也不会离他很近。判明了情况，狗选了一棵大树蹬了一脚，待那树叶上的水珠暴雨似地滚落后，他上了树。

看见了！那山坳里有一小块林中空地，有驮马的影子从那里经过。一，二，三……他极力睁大眼睛，想从那树丛中闪过的驮马中发现那个令他牵挂的身影。白蹄子，现在比不得在马帮的时候，这些日本鬼都是老豺狗，哪样断子绝孙的事都做得出来，你千万莫跟他们犟。狗在心里念着。

三个日本鬼换了三匹马。白蹄子是县长奖给他们马帮的三匹马中的一匹。八爷从县里把它们牵回来的时候，狗一眼就瞧上了它。这匹马栗红的皮色溜滑，肌腱饱满，小碗大小的四蹄上都有一圈半拃宽的白毛，很是精神。那天狗迎了去，一把搂着马脖子就翻看牙口，抬头笑着对八爷说：四岁口，正好出力。说完也不松手，在马身上摩挲

着，舍不得放开。八爷好笑地说，你瞧你讨（娶）媳妇等不得天黑的样子。爽性把缰绳扔给狗，狗还就立马抓了把谷草把马牵到了小河沟，笑呵呵地给马刷身子，嘴里还紧着唠叨。可回来的时候，这马死活不进马帮的圈，狗把缰绳往喂马的赶马人手里一丢，刚一转身它就又跳又叫地朝狗挣，狗让那人送开绳子，这马自己就走了过来。狗把缰绳甩到它背上，背着手顾自在前面走，马就在后面跟着，竟然一直跟到了狗的火塘边。狗和它有缘分，他叫它“白蹄子”。

白蹄子很有灵性，本来就是役马，不用特别调教，几趟走下来，它就不愿意跟在其他马的后头了，狗就把小圆镜子和红穗子给它披挂到头上，让它做了头马。白蹄子是天生的头马，过桥走险路，该紧该松该压步子，清楚呢。慢慢地，它大概也知道“人马有别”了，也去和其他的马共一槽头了。只是歇息的时候，驮架一卸，它都会找到狗的身边来挨挨擦擦地呆一下，再回马群那边去。

那三匹马可是全李家堡荣誉的象征啊，喂的马料都比别的马好。村里的姑娘媳妇和娃娃不时都会来马棚，把白白嫩嫩的手伸给它们舔，那手上是攥了盐末的。怎么想得到，竟就在他手上给丢了。马锅头丢了马帮，这是羞死先人的耻辱啊！其实也不能怪狗。从大反攻开始，双方都在调兵谴将部署兵力，战线犬牙交错，阵地几易其手，主战场外零星的遭遇战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谁晓得在路上会遇上哪边的队伍呢？狗他们马帮走得比过去艰难了。

常走夜路必遇鬼。任狗怎么小心，还是遇上了日本鬼。当狗看到那突然出现的刺刀的时候，已经晚了，马帮和一队日本鬼在古道转弯处迎头遭遇了。

这一队日军是给山上的前沿部队送炮弹的。日本来的那些大洋马在云南险峻的大山里不中用，都滚了岩子。抢来的马和毛驴骡子杂七杂八，这些拉磨送粪的牲口听不懂这些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叽里咕噜的叫唤，这个调头那个磨屁股，行进经常受阻。在崎岖湿滑的山路上，有牲口连同炮弹被挤下了岩子。加上高海拔地区雨季的山林阴寒砭骨，运弹药的差事很不顺。后来日本鬼把这些牲口用绳子栓了连成一队，拉着打头的牲口走。牲口们因为绳子束缚，少了展转余地，虽常被绊倒失蹄，但毕竟顺畅多了。拉拉扯扯几天的艰难行进，好容易赶到枪炮如沸子弹横飞的前沿。一到山头就看见没了炮弹的炮兵在急切地挥手，这时，就听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那炮阵地腾起无数黑黄硝烟的柱子，挥手的炮兵顺坡滚落了下来。

炮兵阵地被掀了。

炮兵阵地背靠绝壁，本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偷袭者竟能从那雾气弥漫的绝壁下攀上来。炮兵阵地的丢失，使前沿步兵的侧背直接受到威胁。不要说中国士兵从那里扑下来，只要用火力打击就足以使前沿防线崩溃。这令战场指挥官紧张万分，他就近命令被炮阵地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目瞪口呆的押运兵们：不惜代价夺回炮兵阵地。

收复阵地没花什么代价，只有几人被扔来的起初以为是手榴弹的石块砸伤，一人被扑上来的中国兵咬掉了脸上

核桃大的一块肉。踏上被炸得稀烂的阵地，他们没有找到一具完整的炮兵尸体和一门可以使用的炮。被刺刀戳得血肉模糊的中国兵倒在阵地一角，九具尸体的脚上总共只有五只草鞋，身上被山石树枝挂得筋筋掉掉的灰布单军装的碎片，在细雨寒风中瑟瑟抖动。十多个日本兵惊讶地看着这些穿着单薄瘦弱不堪的士兵，不清楚他们是以什么做为能量，居然能攀上这深不见底的悬崖发起攻击。就是些这样衣着褴褛形容枯槁的士兵在高寒山区阴冷的雨季向守备部队发起的旷日持久的攻击吗？离这些中国士兵尸体不远处，一捆用接起来的绑腿刚吊上悬崖的老步枪还没有来得及解开，他们能随身带上悬崖的手榴弹全部扔向了炮兵阵地，可见这个炮兵阵地对中国军队的威胁有多么大。

九个徒手的中国士兵对进攻决绝的抵抗，是以石头和牙齿为武器的。

失去炮兵支援的防线在又一次冲击下动摇了。押运兵们增援到了硝烟笼罩着的前沿，当他们伸头出枪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切令他们头皮发麻：沿阵地一线的山下，一片灰色尸体覆盖了坡地，而灰色的浪潮仍然无休无止地扑来。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凄厉而令人胆寒的军号启动着一次强似一次的冲击。血肉横飞的地狱般的阵地上，那个戴眼镜的押运兵一口气打光了配给的子弹后，发抖了。又一阵剧烈的爆炸，一条从天而降的大腿把他砸倒，看着压在身上的残肢，他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上满是血污涕泪横流，竟无力将那条大腿从身上搬开，他瘫软了，裤裆里一片稀湿。

弹尽粮绝的阵地被突破前夕，剩余的押运兵接到命令，把送来的炮弹再原样运回他们出发的那个小城。那边地小城此时已被中国军队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成了孤城，那里的防卫非常需要这些炮弹。命令很严厉：炮弹必须运抵。又一波进攻退去后，伤兵都被留在了阵地上担任掩护，奉命收缩回撤的残兵们失魂落魄地溃去。为躲开中国军队的追击，也避免从来就没停止过的游击武装的袭扰，驮队由一个伍长带领着，离开大队撤离线路，进了老林子。这时，他们听见身后阵地方向在又一次暴起的枪声后，零星响起了沉闷短促的爆炸声。他们知道，那是留守的伤兵们拉响了怀中的自杀弹。这意味着，在这座绵延险峻的高山上，他们苦心经营两年而被指挥官自诩“东方马其诺”的，抵抗了中国军队自旱季到雨季几个月顽强进攻的防线，已不复存在。通往那座孤城的路上，再没什么屏障能阻挡中国军队进军的脚步了。失败的气氛笼罩了驮队，伴随他们遁入雨雾迷蒙湿冷阴暗的森林。

进入浩瀚的原始森林，这队人马如同一片落叶，立刻就被淹没了。阴霾的天空被浓密的树冠遮蔽，昏暗一刻不离地伴随着他们。地上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腐草败叶象吸饱了水的海绵，一脚下去，黑水就没到脚脖子。异国森林显露出狰狞而又莫测的险恶，它把饥饿寒冷的阴影投向入侵者，以坎坷曲折的羁绊疲乏他们的身心，消磨他们的意志。他们朝着大致的方向，寻找着依稀可辨的毛路，砍着丛生的刺棵藤蔓，滚着爬着，行进得艰难缓慢。

才进入森林两天，已经有几头牲口不声不响地倒地毙命，它们自被抢来的那天起就没好好喂过料。炮弹箱又匀到了其他牲口驮架上。从小城出发时带的饭团，尽管被汗水雨水浸透捂得馊臭，也被阵地上那些断粮多日的士兵抢而分食了。那时，尚有黑绿色的野菜汤喝，现在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了。生火是不可能的，不光怕暴露目标，事实

是根本就没有可以点燃的柴草。几个带伤的人在打摆子，其中就有那个脸上被中国兵咬掉一块肉的，他发着高热，头大如鼓，纱布被扯去了，被雨水泡得发白肿胀的伤口象张开的嘴，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不断往外渗着橙色的黄水。他揪着马尾巴踉踉跄跄地走着，没人能帮他，所有人都筋疲力尽。那个带眼镜的押运兵自从被飞来的大腿砸倒后就得了拉稀的毛病，已经很虚弱的他曾经想帮扶那个打摆子的伤兵，但被伍长厉声制止了。不时有人栽倒，但别指望有人帮助，只能自己挣扎而起拼命前行。每人都知道，在这原始森林里掉队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执行命令的机器，伍长是合格的。他不会为一个人而损失更多的人。至于丢弃炮弹而让伤病者骑乘牲口这样有违命令的念头，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他脑袋里，炮弹比牲口重要，牲口比人重要。他最人性的决定是允许伤病员揪住牲口尾巴。

然而，伍长一直担心着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们迷失了方向。驮队在这阴暗繁密的丛林中打着转转，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狗他们马帮就是这时与这些在森林里乱窜的日本鬼撞上的。

3、

观察到驮队动向的狗，三下两下就从树上回到了地面，他紧紧裤腰，把两条被刺棵挂开了的芭蕉叶似的大裤脚提起，别在腰间，捡起冲担匆匆追去。

在接近那片山坳的时候，驮队走过的痕迹又露了出来，踩得稀烂的红泥路在绿色覆盖下的山野里，显得十分的刺眼。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倒着一头牲口，狗紧走了几步赶上前去，这是一头断了一条腿的毛驴，已经死去。狗从毛驴那磨烂了的腰肋、断肢和残缺渗血的蹄子上看出，这支驮队所走的路，绝不是正常的马帮所走的，而是那些非常伤马蹄的，会别断马腿的滚石路。如果不是为了躲避山贼或洪水，马帮轻易是不会走那样的路。可从他跟踪这驮队以来，几乎所有碎石滚石路都被走过了，有的甚至是专门甩开好路没来由地转进去的，好象是在有意绕路走。一路追来，狗发觉他们在绕着一个很大的弯子，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不动声色的大弯，开始好象是朝孤城的方向，不知不觉中渐渐偏移，后来走的路与初衷就一点不相干了。为什么？他疑惑起来，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突然，狗听见有刷刷的声音从前面的弯道那里传来。狗把身子一下就隐入了林子，那响动渐远，狗从路边的林子里绕到了前面的小高地，他从树后伸头一看，只见两个日本鬼屁股对着他正搂了腐叶子边退边撒，掩盖着路上的泥浆。刚好撒到狗藏身的小高地，他们手中的腐叶撒光了。他们直了腰喘了口气，其中一日本鬼仰头张嘴接天上的雨水，另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向狗趴着的这边指了指，咕噜两声自己就先走了。狗低眼看了看自己的前面，就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沟流淌着清水。那日本鬼过来了，狗轻轻趴到树下草蓬里，紧抓着冲担的手沁出了汗水。狗知道他要喝水，却不想他竟跨过那小沟径直走到狗藏身的树前，解开裤子哗哗地撒起了尿，溅了狗一头一脸。狗把头抬起来时，那日本鬼已经背对狗蹲下了，撩着水扑哧扑哧地洗脸，然后趴下身去喝水。狗那时并没多想，他将冲担

横了，一纵而起，当屁股骑到了那日本鬼的背上的同时，横着的冲担也压住了日本鬼的脖子，狗用力按住冲担的两头，把面前那颗肮脏的头死命压到了沟底的淤泥里。日本鬼手脚拼命地刨得稀泥乱飞，把地上刨出了许多道道，一会就痉挛起来，接着狗感到屁股下的身子一软，没了生命的迹象。突然，有日本鬼的叫唤和吧唧吧唧的奔跑声传来，狗跳起身向山上跑去，“当”的一声枪响，狗听见噗的一声，他看见有血溅开来……

林子里，狗躺在地上，剧烈的心跳和急促的喘息使他无暇顾及流血的伤口。子弹打掉了他的左耳并在他脸颊开了一道血槽。狗仰头对着天说：翠儿，这个算你的！

翠儿骂：憨狗。狗喜欢听，如同露珠滴落水潭那样晶莹清亮的声音。

犯了山里规矩的狗，在翠儿家马棚堆谷草的楼上住下了。他成天勾着头，也不看谁，下地做营生，上山猎野物。每日回来都顺带一背架上好的山茅草或是几棵椽子料，有空就打苫房顶用的草排。要么就和泥修补那被风雨侵蚀得沟沟壑壑的土夯山墙。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象是完成着某一预定的事。可只要翠儿出现，狗就目不转睛了，眼光粘着翠儿来来往往。他们第一次对话时，翠儿正洗洋芋，她又感觉到了浑身不自在，虽然对面打草排的声音窸窸嗦嗦的一直不停，但她明白那目光在戳着她，这么些天一直这样。在别人目光中过日子，无论如何算不上好滋味，可气可恼。干哪样！她头一扬，眼睛恼怒地瞪着狗。看你。狗并不回避她的眼睛，双手依然窸窸嗦嗦的编着草排。看哪样！翠儿厉声道。看你。狗的声音依然如故。不准看！翠儿气极。狗还是不温不火地说：看都看了。这让翠儿猛地想起水潭边的情景，她涨红了脸唰地站起来，一木盆泥水哗地把狗泼了个从头到脚。狗并不躲避，甚至都没动弹一下。片刻，他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泥水，竟嘿嘿笑了。气得翠儿把木盆摔成了一堆木片。翠儿被这须臾不离的目光追逐得无可忍耐了，那天她爆发式地冲狗大喊了一声：看你老娘！狗一楞，第一次低垂了眼睛，闷闷地说：我老娘死了。气冲冲的翠儿本来转身走了几步，听到狗的话，她一下顿在了那里。院坪里，谁都没动，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天地间充斥了静。这静，放大了山林里老阳雀的叫声。从院坪抬眼望去，层叠苍翠的山浪与深邃通透的蓝天交接处，有一朵白云，悠悠地飘。

狗在翠儿家已经有几十个街天了，翠儿家在不动声色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残缺的院坪竹篱今天换几根明天补一片地变得齐整悦目，班驳的老山墙被拌了松毛的胶泥一面面拍得结实抹得光生，廊下贴墙张着的野物皮越来越多，那长着草和青苔的乌黑腐朽的屋顶，也换上了厚实的新草排，黄灿灿的，压得实妥妥的。其实翠儿的奶奶早已谅解了狗，那个被火烧云映红了半个天的傍晚，翠儿对狗说，便宜你，走吧，回你们李家堡去。坐在马棚独木梯上收拾捕猎用的夹子扣子的狗连头都没有抬，就说了声：不！翠儿一扬眉毛讶异地说，我们家包谷饭好吃？宁可喂狗也……。我就叫狗。狗打断了她的话。翠儿火了，大声问：你要整哪样？！狗说，我要讨（娶）你。说罢爬到马棚楼上躺倒在草堆里，把呆了的翠儿孤零零地扔在了楼下。半天，才听见翠儿大声骂了一句：憨狗！狗望着屋顶咧开嘴无声地笑了。昏暗中，狗的牙很白。

马帮又来了。天擦黑，马锅头带了一碇盐专门来到了翠儿家，把刚从山里回来的狗喜欢昏了，他拉着马锅头在火塘边坐下，递上水烟筒，颠着烤茶罐，用衣角把酒杯似的小茶盅擦得反光，嘿嘿地把脸笑得稀烂。焦香的烤茶味还没散尽，酽酽的茶汤刚喝两盅，忙出忙进的翠儿和奶奶就把喷香的烤麂子干巴和包谷酒端上了桌。来之前，马锅头心里还悬着，不知能不能喝着翠儿家的一口水，也不晓得狗过得有多背时，他怕热脸凑上了冷屁股。狗他们李家堡的八爷请他带的这碇盐巴就是想请主家善待狗，现在看来多余了。这狗东西有憨福，过得倒象是这家的主人了。知道狗的话少，马锅头一高兴，借着酒劲顾自说起来。他说八爷夸狗呢，敢作敢当不愧李家汉子；他说要是那些敲牛大胯跟马屁股的赶马人知道狗过得这好，怕都会被谗死；他说你狗日的莫回李家堡了，干脆就在这里上门算了……。火塘边的奶奶打岔说，不合呢，这种男人是要遭人笑话，抬不起头，就萎尿了。奶奶转头对狗说，明天你就跟着这个赶马大哥回去吧。狗咽了口中的酒应道：好。狗的话音刚落，隔壁翠儿织土布的织机声一下就停了，接着是咣当一声，什么东西被摔到了地上。翠儿穿过堂屋甩门出去，在门口，她给了那撵山狗一脚，骂道：喂不家的憨狗！马锅头一下噤了声，不安地看看翠儿的奶奶，又看看狗。翠儿的奶奶摇摇头，轻轻叹口气，顾自搓棕绳了。狗若无其事地笑笑，招呼马锅头，吃！喝！

奶奶起大早做了包谷粑粑，把狗送到了寨口。寨口，马帮的驮子都上了马背，等着狗呢。大核桃树下聚了看热闹的人，寨主笑嘻嘻地叫狗得闲又来，村人们七嘴八舌地和狗打着招呼，狗一概地报以嘿嘿的笑。翠儿没来，一大早就挑着桶和要洗的衣裳出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照面。狗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情，他接过翠儿奶奶手中的包谷粑粑，嘿嘿笑了笑，就和马帮上路了。走出好远了，到得垭口，狗回头望去，那山寨口的大核桃树下，还有一个瘦小的身影站立在那里，狗好象看见那被山风拂动着的灰白银发……。

狗随马帮回李家堡了。翠儿却感到有点怪怪的，浑身不自在，又是哪点不对了？一大早就在回水潭一直呆到马帮离去，她才恹恹地回来。心烦意乱的她推着石磨忘了给磨眼续上包谷，把石粉都磨出来了。这可麻烦，得把磨掀开来清扫磨齿，不然再磨的粮食掺了石粉，就不能吃了。一恼之下，翠儿摔了磨杆来到院坪，心里憋闷的她抬头朝着蓝汪汪的天空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目光掠过狗挂在房檐下那些捕野物的套子夹子和弩机，她突然意识到，那是因为少了那象影子一样须臾不离的目光。翠儿坐在狗常坐的独木梯上想：那憨狗的眼睛好亮，象星星。翠儿的脸颊突然烫了……

对于训练有素的军人和富有经验的赶马人来说，这样的遭遇都极不应该。除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屏蔽了相互间发出的声音之外，日本鬼是由于地形的原因和精疲力竭致使感觉迟钝，而狗他们马帮却是因为不可原谅的麻痹。他们赶到原来的指挥部时，敌方阵地已被攻克，追击已经展开，指挥部正准备前移。他们得到命令：越过战线，把弹药送到已经展开追击的部队。狗看了这几个月来已经成了主要运输线的驿道，熙熙攘攘，走不快，狗选了一条新路线，想抄近道追赶，这是他们几个月前为敌后的预二师送给养所走的隐秘通道，可还没到原来的战线呢，就遇到了这帮日本鬼。

日本尖兵撞上狗他们的马帮的时候，着实紧张了一头，等搞清了这是一支没有武装押运的马帮时，日本伍长大喜过望。这一来，向导、役马都解决了，还有熟练的马夫，腾出牲口可以让士兵骑。那伍长念了声：天皇保佑！派人看住了赶马人。除了几驮架手榴弹和子弹，马帮驮的弹药都被掀到了路边，炮弹被挪到了马帮的役马的身上。赶马人携带那点的包谷粑粑荞麦饼都被搜夺一空，眨眼间就进了这些饿绿了眼的日本鬼肚子里。

八个赶马人被喝令蹲在路边，那伍长走过去，拍打着一张花里胡哨的纸使劲嚷嚷，狗见过，那叫地图，可谁都不知道他在叫什么，都摇头。狗从他的话中听到了一个不断重复着的词，就是那孤城的名字。狗问了一声，那伍长急忙点头称是，便示意狗带着驮队“开路”。狗十分懊丧，这些日本鬼逃跑把路都跑反了，居然跑到了中国军队的后方，害他倒这么大的霉。你咋个不干脆跑到昆明去？狗恨恨地想。狗运送的物资都是从那个叫“昆明”的、很远很不得了的大城市来的。

驮队出发了，狗走在前面，赶马人被分到了驮队各个部位，日本鬼披着从赶马人身上剥来的棕蓑衣，骑上腾出来的牲口，刺刀就在赶马人的头上晃着。那日本伍长的眼睛毒，他往嘴里塞完那一小块包谷粑粑，连嘴都不抹就拉住了白蹄子的缰绳。除了狗，从来不让人上身的白蹄子，今天竟没表示出一点反抗的意思，竟就让那伍长骑上了，竟就开步走了，狗就从心里有点瞧不起它。欺怂怕恶！你马日的也想做汉奸。狗心里想着嘴里竟念了出来，他惊了一头，看那伍长并没理，他就晓得这帮日本鬼不仅说不来人话，也听不懂人话。他顺带着把骑在马上的日本鬼也骂了一把，心头感觉好了点。这种炮弹狗运过，那是运去打日本的，而现在他竟要带路把炮弹送去打自己人。狗很后悔刚才一多嘴，就成了这两年常听到的新词——“汉奸”了。狗的脑袋想着，脚下就偏了，他可不愿做“汉奸”。

驿路延伸到了“三道拐”，这是一段一面靠山一面临岩子的险路。狗朝靠山的一面拉了一下缰绳，感觉白蹄子犟犟的，刚要扭头呵斥，却见白蹄子猛一拧身子，没有防备的日本伍长被甩了下来，慌乱中，伍长乱抓乱薅的手扒住了一块突出的石头，半个身子已然挂在了岩子外。后面的日本鬼拉起伍长，挺枪就要刺白蹄子，却又被白蹄子掉转屁股一下踢倒，滚出一丈远。伍长制止了爬起身还要冲来的日本鬼，一挥手，给白蹄子背上加了两份炮弹。狗醒过神来，拍了拍马脖子，那白蹄子不象从前一样和他蹭脸，却一扬头喷了鼻子，顾自走它的路。狗无端地感觉气短，一股火冲了上来。马日的你还瞧不起我？你看着！

走过“三道拐”，赶马人们就知道，马锅头要玩名堂了。这已经不是去孤城的路了，而是去江边的伐木场。那里有个叫老财迷的老者和他儿子，他们把伐了的木头滚到岩子边推到江里漂走。那都是些卖得起价的好木材。虽然偏僻，离战场较远，但兵荒马乱的，那两父子怕都离开了。那里是江边，天黑得早，林密草深地势复杂，趁夜脱身应该没问题。只可惜了这些风雨里枪炮里都与赶马人相依相伴的马，它们给马帮和李家堡带来了多大的荣耀啊！竟要狠心丢下它们。丢了它们，咋个有脸回李家堡呢？赶马人心里都很沉重。

天黑时分，驮队赶到了伐木场，那两父子竟然还在。几个月来这片大山里炮火打得叮叮咣咣，连雀鸟野物都跑了，他们还真能定得下心来伐木。从斜坡上码得齐整的小山似的原木看来，已经没人来收了，他们是想等仗火平息后卖钱的。谁做皇帝也要过日子。老辈子都这样说。蹲在窝棚边煮饭的老者看见了狗，站起身刚要抬手打招呼，楞住了。狗刚喊出一声：快跑！就被兜头一枪托打翻。已经隐蔽绕到窝棚后面的日本尖兵抓住了老者和他刚钻出窝棚的儿子，把他们绑在了原木上。狗捂着流血的脑袋坐在地上，气急败坏地对老者说：要钱不要命的老财迷呀！再次挥来的枪托打断了狗的话。

卸了驮架后的赶马人被捆成了一串蹲在岩子边，身后的岩子下就是滔滔江水。山茅草苫着的干柴火被找着了，日本鬼兴奋地嚷嚷着杀了一头毛驴。这里地势低凹林木茂密，火光不会外露，只要不冒白烟。日本鬼谨慎地添旺了篝火，把血淋淋的肉用刺刀穿了在火上烤，江风习习掠过岩子，青烟还没升到树稍就被吹散了。有肉吃有火烤，日本鬼有了精神。天黑尽，那个戴眼镜的日本鬼好奇地拿起伍长从窝棚里扔出来的巴掌宽的大锯子，在那里敲敲弹弹地看，却被伍长一把夺了去，交给了两个日本鬼。伍长不会留下这两个不会赶马的人，他不想前脚走，后脚就被人领着中国军队追来。也不知道伍长说了什么，那两个日本鬼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提起长长的锯子向伐木人走去。在火光的映照下，老者被躺着绑到了一棵原木上，两个日本鬼狞笑着挽了袖子，一人一边，竟然用大锯在老者的肚子上拉了起来。老者的肚子一下被拉开了，血溅起来，青白的肠子一涌而出绞到了锯子上，颤颤发抖。老者一下撑起了头，一口血喷得老远，绝了气。被喷了一身血的日本鬼并没停下，锯子吃进脊椎骨的声音喀啦啦地响，他们在嘎嘎地笑。赶马人看得肝胆俱裂，有人软瘫在地。老财迷呀，锯一辈子树，你反倒被锯子锯了呀。狗泪眼迷离地说着。

老者的儿子离他爹就几步远，从他爹被捆倒开始，就一直挣扎扭动着身子狂喊怒骂，眼睛瞪得象要撑裂眼眶。嘣的一声，绳子断了，他一下扑翻了离他近的那个日本鬼，挥起了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来的一块石头……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所有人都呆了一下，就是这几秒钟，那刚才还在狂笑着的日本鬼的头，被砸烂了。那小伙子死得比他爹还惨，日本鬼们都扑了上去，按住了他，那伍长用伐木的大斧把他的手脚全部剁了。不知是光线太暗还是泪眼迷糊，狗看见被剁离了小伙子身体的手手脚脚都在地上跳动。那小伙子四肢的断面在突突涌血，凄厉的惨叫听得人毛发耸立，那伍长扔了斧头，抓一把土塞进了那小伙子的嘴里。惨叫停止了，那血糊漓拉的躯体却还在地上蠕动……

一片混乱中，狗摸到了绳子。一生都在拉马捆扎货物，无数次地系绳解绳的赶马人，手如鹰爪般嶙峋有力，对绳子天生亲和。他们背着火光摸索着松开了捆绑他们的绳索，看守他们的哨兵还被原木堆那边的变故吸引着，狗盯着他，手在背后两下就做了一个活扣，一摆头，赶马人跳起来，活扣准确地套上了哨兵的脖子，狗拧身一背，那哨兵的脚吊离了地面，一声未吭，喉咙就勒碎了。赶马人们顺岩子边向黢黑的森林跑去，他们被发觉了，日本鬼们叫喊着奔来，拖着哨兵的狗来不及跟上，去路就被断了。狗返身回到岩子边，就那样勒着那哨兵纵身朝下面的大江跳了下去。在空中坠落的时候，狗听见白蹄子的一声嘶鸣，狗有些快意地想，马日的，看见了？随即，耳畔一声轰

响，狗就失去了意识。

4、

狗从那已经被挂烂的大裤脚上扯下一条碎布，勒住了左耳的伤口，黑布条从鼻梁上横过，把狗那线条粗犷的脸隔成了上下两半，多了几分凶悍和神秘，样子倒有点象山贼了。他整理了一下斜挎在身上的棕绳，把冲担上的牛皮条扎在腰间，勒住了翻飞的土布褂子。

似乎是为了证实狗的疑惑，驮队绕出的这个大弯，竟然奔前天晚上他们脱身的伐木场去了，只不过现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那是一条U字型的路，伐木场就在那U型的顶端，进去了也得要绕出来。那是伐木人去江边走的，马帮如果不是前方有突然的变故是不会走那里的。这个大弯绕得老道，很象狗前天走的那样，不是当地山民或赶马人是不会走得这么老道的。有人带路？那是谁？不管是谁他都是好样的，这一进一出就能拖他两天时间。狗突然想，是不是有赶马人被抓着了？狗记得清楚，那天他是在最后，因为怕那哨兵没死就勒着走，跑不快。赶马人个个都象山耗子，进了山林如鱼入水，他不相信那些日本鬼能抓着他们。是白蹄子？那牲口认路是厉害，也不至于象人一样地故意绕圈子呀。

有雨点落到狗的脸上，狗抬头看了看天，又飘雨了。穿过山坳，在下坡的路边又有两头倒地的牲口，有一匹马是马帮的，前胛后面心脏的部位有刚捅的刀口在冒着血。它们都是别了腿的瘸马，不累死也走不了多远的。倒下了，那些狗杂种还要捅一刀。狗蹲下身子捋捋马鬃，他和这些马一起走了多少年了呀，没想到这回遭了那么大的难。狗眼睛红了。

日本杂种，才刚开始呢，瞧祖公咋个整你们。咬牙切齿的狗拎了冲担，顺着山势，在与路平行的林子中穿行。狗知道，那个日本鬼一死，就等于告诉了他们他的存在。这种来自后面的威胁，谁都不会等闲视之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狗才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呢，他再不踏上那条路。山势渐低，竹丛剑麻多了起来，狗走得更小心了。前面是一个山口，狗记得，过了这个山口就是一溜的下坡，直低滚石坡，那就快要到江边伐木场了。在山口前的林子里，狗恍眼感觉高高探出山口的竹稍仿佛是动了一下的，他停了下来，把自己隐蔽在灌木丛里定睛看去，果然，那许多的竹稍中，有两三棵竹稍又颤动几下。这回狗看得很清楚，那种颤动只会是活物的触动引起的。竹丛长在路边，马不会碰到的，如果是石头滚落就不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动法了，那只能是人！狗不走山口了，他攀缘着爬上了山头，警觉的眼睛搜索着下面的山口竹丛，狗看见了，那两个撅着屁股守在路边的日本鬼。狗很遗憾，要是他的弩机不被烧了，现在摸下去，保证每支箭镞都能正中他们的喉咙。狗咽了口唾沫，悄悄离开，绕过了山口。在远离山口的一个转弯处狗看了看那逶迤而下的驿道，不见人影，另一头，驮队正消失在前面的林中。狗选好的地方是一个顺山势凹进去的山湾，两头背阴，光线很暗，驿道从山湾中粗大的龙竹丛中穿过。狗不敢耽搁，几下就爬到了竹子高处，

套上棕绳，接连坠下了几棵竹稍，他把几棵竹稍分别用劲收紧，扯得那竹子咔咔作响，再把几棵竹子合并了，使力量合一。狗按了按绷得邦紧的棕绳，他满意了，这劲道能吊起一头小牛的，而那初始的一弹，则足以撕裂一头豹子。他一口气在这短短的路面上做了几个活套，撒上腐叶。狗不再理会在山口设伏的日本鬼，他知道他们终归要来追驮队，那棕绳套子不说把他们撕裂，也得把他们全身的骨节抖散了。在那阴暗的山湾里吊一夜就能冻死他们。

老财迷，这两个就算你们父子两的了。狗在心里念了一句，整理了剩余的棕绳，转身向前面的驮队追去。

随马帮离开小寨回李家堡的狗，又回来了。这个犟种日怪！犯忌该留驮马，他偏留下；放他走了，他却又回来。狗不合常理的举动，令寨子里的人搞不懂。也怪巧的，狗回来那天，心情烦闷的翠儿独自赶山在山里滚了坡，脚崴得又青又肿动不得，不大的坡，咋个也爬不上去。她坐在地上哦嚯嚯——不停的喊，期望着回应，茂密的森林吸收了她的叫喊，回馈给她的，只有山风掠过树枝的呜呜声。终于喊不动了，她无奈地眼看着日头西下。黑夜来临，山林的夜并不寂静，总有突如其来的莫名响动。豺狗、老熊、野猪、传说中的山鬼……恐惧袭来，她后悔没有约了小伴一起来，她是为了释放心中的烦闷才来赶山的。都怪脑子里总是显现着的狗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狗眼！她张了张干裂的嘴唇骂了一句，却没发出声响。她嗓子哑了。想起狗，翠儿一哽，眼泪就出来了。疲劳、疼痛、恐惧和急剧降低的气温消耗着翠儿的体力，困倦阵阵袭来，翠儿努力抵抗着，她不想因为睡着了而被高寒山区夜的阴冷冻死。突然，迷糊中的翠儿隐约听见了喊声，黑暗里，她猛地睁大了眼睛。哦嚯嚯——！又是一声。她一下撑起身体拼命回应，可她听见的，却是沙哑的嗓子发出的微不足道咝咝声。情急中，她随手揪了片树叶子，狠命吹了起来，尖利的声响突破了密林的封锁，回荡在山间。就这样，喊声与吹树叶的声音呼应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后来，她看到了火把的红光，听见了山里汉子的毛边鞋拍打地面发出的扑扑声。接着，火把在坡顶出现了，翠儿看见，火把下，是身背弩机的汗水淋漓的狗。

最初的羞涩过去以后，趴在狗背上的翠儿细细的体味着山里汉子强健的躯体发出的腾腾热力，温暖与安全感让她彻底松弛了身心，睡眠张开了黑色的羽翼温柔地覆盖了她……。

村口的老核桃树下聚集了许多火把，村人们正要进山寻找他们。看见狗的火把后，他们哦嚯嚯地喊起来，狗也哦嚯嚯地回应着。这没有具体内容的呼喊，却交换着足够的信息。高亢的吆喝惊醒了翠儿，当意识到她将在众目睽睽下伏在一个汉子的背上进寨子时，她在狗的背上挣扎起来，她并没有想，那双青肿的脚是否能支撑得住她的身体。狗的双手象箍桶的蔑绳着了水，收得好紧，翠儿的挣扎没有丝毫的效果。眼看被火把映照着的寨口老树就在眼前，翠儿停止了挣扎，心反而塌实了，她索性把脸埋进了狗的脖窝，在村人们关切、惊愕进而意味深长的注视下，回到了寨子。

山高，离天就近了。干净透明的夜空墨蓝墨蓝，缀着些稀疏的星星。风爽爽的吹来，把秋虫们的吟唱和秋熟的山林发酵了的沉醉四处张扬。躺在马棚里的狗没来由地忽然感到周身燥热，瞌睡不翼而飞。他不安地辗转着身体，

压得身下的干草沙沙作响，额头竟就沁出了热汗。这燥热烧得狗躺不住了，他悄悄下了楼梯，院门咿呀，狗没入了朦胧的夜色。流水潭瀑布边，狗扒了衣服投入水中，身体浸泡在水里的那一刻，他明白了，这燥热源自于那晚翠儿伏在他背上的感觉。哦，那两团温软……狗把头靠在那块巨大的白色石头上，任清凉的水流带走他由内及外的燥热。哗哗水声中，燥热消散了，狗平静了。他仰起脸，这时，月亮从山坳那边缓缓爬上来，好大，大得象山民祭祖盛牺牲用的巨大银盘。这大银盘里老辈子们说的桂树玉兔画一样的清晰，活灵活现。他惊讶，他从来不曾这样细致地注意过的大月亮啊，那么圆，那么亮，仿佛伸手可触。月华如水流泻，满潭碎银摇曳，狗醉了。

忽然，迷醉于秋夜景色的狗象听到了什么，狗极力地搜寻着隐约可辩的乐声。在瀑布单调的哗哗声中，有弦子铮铮，若隐若现的，轻柔的女声飘过来了……

月亮升起来，山寨静悄悄

弦子响起来，情随风儿飘

调子唱起来，阿哥莫要笑

心儿捧出来，阿哥要不要

哎——

阿哥要不要

狗心里一动，他听出来了，是翠儿！调子唱完了，弦子却没有停下，分明在等着他对呢。对歌需要以极快的反应编词应对，笨嘴笨舌的狗却不行。狗急了，哗地从水中猛地站起来，水淋淋地上了岸，顺手揪了片树叶子和着弦子吹起情歌调子，弦子铮铮牵引着他顺着石板路向潭边的大竹林走去。竹林深处，弦子停了，叶子声也停了，而情歌调子柔美的旋律却好象那纱一般的岚气，依然在缠绵轻漫地萦绕飘荡……月影班驳的大竹林里，幽暗除却了所有的羞涩，翠儿没入了狗那散发着腾腾热气的怀抱，立刻就被熔化了。翠儿的身子微微颤栗着，急促而灼热的鼻息吹得狗的胸脯痒酥。人一过这道坎，胆子就大了，口拙的狗便也机智了起来。他对翠儿说：我看了你，就给你家做工；今天你看了我，你说咋个整？依在狗臂弯里的翠儿扬起滚烫的脸，把眼睛看定了狗，说：那就跟你一辈子！狗记得清楚，他搂着的翠儿的眼睛里有两朵燃烧着的火苗。

一片云飘过，月光暗了下来，阴影温柔地覆拥了大竹林。

雨季的大江是红色的。被雨水带到大小沟壑中的红土都灌注到了江里，江水好似浓酽的血浆。半身泡在红色江水里的的狗是被冻醒的。怎么会在江里呢？借着依稀的晨光，他看见了卡在江边岩缝里的尸体，脖子上的绳子在水中漂荡。想起来了，昨夜他就是勒着这个日本鬼跳的岩。从高岩到江面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把狗摔昏了，这个回水

湾，留住了随波逐流的狗。不行，这样会被冻死的。狗想动一下，可全身都是木的。又下雨了，雨点很大，砸在脸上啪啪地响。这阵雨不会小，来一次山洪就会被冲走的。狗开始了逃生的努力。他从动脖子动手开始，每动一下，关节都象木轮牛车似的嘎嘎作响，疼痛难耐，但他不敢停下。手抬起来了，肩侧过来了，终于，他翻过了身子，抓住江边的石头，把自己拖离了江水。

上游伐木场的原木被推下岩子后，有的会被冲入这个回水湾里打转转，伐木人要走好几里山路下到这里再把原木推入江中。一条毛路线一样地挂在陡峭的山上，那上面有个岩洞，是个干洞，老财迷的儿子常在那里避雨，时辰晚了也点一堆火在那里过夜的。人一动，血就活了，狗被泡得灰白的手有了红色，颤抖抑制不住地袭来。他撑起身子，揪着树棵茅草艰难地攀缘。一路上，他撕扯树干上的“树胡子”、抠挖地上的地衣苔藓和裸露的茅根塞进嘴里，他不在乎也没感觉到这些“食物”的苦涩腥麻，他需要咀嚼。

岩洞里温暖干燥，狗一头栽倒在那堆干茅草上沉沉睡去。

狗醒过来，大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歇了，天光泻入岩洞，已是正午。狗怔了怔，一下翻身起来，他得回去，去报信，去带兵来夺回他的白蹄子，杀光这帮日本鬼。

午后，狗摸到伐木场后的陡坡上，从一块岩石后慢慢探出头。老岩子前的缓坡地上伐木人的窝棚还在，被雨水顺坡冲下的黑色枝叶覆盖了地面上的痕迹，那堆原木还垒在那里蓄势待发的样子，好象就等窝棚里的人出来，将原木堆下的木楔子一拉，就呼隆隆地滚过坡地坠入岩子下的江中。如果不是老财迷和他儿子的尸体还有那头驴的骨架陈横在不远处，谁相信昨夜在这里发生的惨剧呢？惟独不见了那日本鬼的尸体。据说他们有一习惯，砍下战死者的左手，尸体就地处理。大概是扔江里了吧？狗想。四周一片死寂。狗站起身来，紧张感一消失，饥饿袭来，胃部绞疼，头就眩晕了。狗摸进了窝棚，在木壁缝里找到了火镰火石，他从吊着的一把火草中揪一撮下来燃起了火，用踩扁了的铜吊锅取了水，砸了驴骨头熬了起来。虚弱的他靠坐在窝棚门口，对不远处被锯成两截的老者说：老财迷呀，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装殓不了你，吃了东西就要赶紧去报告，先报仇。你莫怪我。狗看看天色，如果要在明天赶到指挥部，天黑前就得出发，明早赶到翠儿奶奶那里吃点东西再走，下午就到了。

日本鬼呀，莫说一天，就是再给你们两天也转不出这片大山！狗恨恨地想。

正如狗想的一样，赶马人一跑，日本鬼们的心里就发虚：赶马人是山里的油子，随便谁都能带了中国军队来，那样他们十几个人回孤城就没了希望。不敢多耽搁，半夜就开拔。开始还能根据江流走向判断大致方向，可到了林木幽深的森林里驿路七绕八绕就迷糊了。天亮时分，一阵瓢泼大雨浇了他们个晕头转向，茫茫雨雾中，他们彻底丧失了方向感。时至黄昏，森林里却已经黑了，日本伍长下令停止前进，领着一个士兵登上山头。在那兵爬上大树观察时，疲劳令他一阵眩晕，他一头载倒在地。他吃力地翻转身子，仰面朝天，失神的眼睛盯着树缝间透入的即将敛尽的天光……突然，树上传来欣喜的叫喊：灯火！灯火！就在对面山头！

翠儿随走马帮的狗来到了奶奶的寨子，要在这里等到狗的马帮回来。这次来，狗连寨子都没忙得进，前方军情紧啊。马帮是连夜走的，他们不用怕山贼了。自从和日本鬼开仗火，山贼都不抢运军需的马帮，反而在各自地盘上修桥补路，要紧地段，还打着灯笼火把给马帮照亮。听说竟有山贼提了日本鬼血淋淋的头去找官家邀赏呢。男人都出民伕了，寨子里只有老人婆娘和娃娃，老寨主就领着这些老人婆娘给官家军队做事。寨子离主要的进军路线看着不远，真正走起来爬坡下坎要一天呢，别的做不了什么，老寨主的官差其实就是筹粮。随精疲力尽伤了元气的军队换防，军粮派了几次，寨子里没有一家的粮食还够挨过雨季，都在喝稀的了。可只要派粮，他们还出。老寨主的话是：守着山林还会饿死人？那些婆娘们则说：再咋个我们也不能不如那些山贼。老寨主的官差做得一点不困难。

挨晚，寨子里的人又来到翠儿家院坝。前方战事紧，男人出民伕，女人们心里空空，晚饭都没了心思。翠儿理解她们。翠儿象头天一样，给她们讲山外的新鲜事。翠儿讲李家堡那条公路，还有不吃草就能在公路上呜呜跑的叫做汽车的铁牲口；讲县城外那大石碾压得平泱泱的飞机场，还有能从天上扔炸弹的大铁鸟……那些铁鸟人们不生疏，两年前就有染着红粑粑的大铁鸟从他们头上飞过，炸了县城。他们听赶马人说，日本飞机“五四大轰炸”，县城都炸烂了，死了好几万人呢。这回我们也有飞机了，也炸那猪不啃狗不闻的日本鬼！翠儿带来的消息鼓舞人。开始老寨主不来，他还对狗和翠儿那不伦不类的“抢婚”心存芥蒂。后来抵不住诱惑，先是悄悄摸来躲在人后听，翠儿见了，并不招呼。后来奶奶把他请到人前，人们轰地笑了，他磕磕长烟锅说，莫闹！说完自己也绷不住笑了。这次翠儿给奶奶带了一盏洋油灯。天没下雨，擦黑的时候她就把灯提出来挂在屋外，院坝里的人们发出了惊叹。对于祖祖辈辈点松油明子照亮的人们来说，带玻璃罩不怕风亮晃晃的洋油灯是够神奇。这是狗从前方救回来的那个蓝眼睛的大鼻子送的，说是报答狗的救命之恩。大鼻子的官大，好多官都向他敬礼的。狗知道这灯还要点那叫“军需品”的很金贵的洋油，便找了去，要请人家喝酒，那大鼻子有伤不能喝，找了其他大鼻子陪他。才没喝几盅他就提出“赌酒”，结果把人家都整翻了，他赌得一小桶洋油，大鼻子说够点一辈子的了。

谁想这盏灯让日本鬼看见了。西洋大鼻子送的洋油灯引来了东洋的日本鬼。

经过谨慎侦察，伍长一挥手，这群肮脏狰狞的日本鬼扑进寨子，他们抓着了老寨主。这个极不配合的犟老头被伍长下令吊在了寨子口的大核桃树上，扑过来撕扯的寨主家婆娘被伍长旁边的日本鬼开枪打死。枪声激起了这些濒临绝境的困兽嗜血的兽性。伍长命令封锁寨子，不能放走一个人，强行筹集给养。遇到抵抗即以刺刀解决，不许再开枪。他从这个小山寨竟然没有一个青壮男子的现象里得到一个警示：这可能是中国军队战线的后方。他怕暴露目标。鬼影散开了，小山寨顿时响起了怒骂、撕打、惨叫、哭号和物品被打砸碎裂的声响。

5、

爬坡下坎攀岩越壑，狗象只山猫，悄无声息地在雨雾蒙蒙阴冷晦暗的山林里潜行着。在树木竹林与雾气的缝隙

中，依稀闪过正在林中驿道上行进着的驮队。牲口可能都被勒了鼻口，远远地只能听见隐约传来的蹄声。狗追上了驮队，正与之平行地同向而行，他紧了紧腰间的牛皮条，加快了速度往驮队的前头赶去。

前面是滚石坡，狭窄的驿道的一边是风化的岩壁，上面尽是些摇摇欲坠的石头，另一面则是深渊。类似这样的路狗他们马帮在给预二师送给养时为躲避日本鬼的关卡时走过的，那只能一驮一马地过，眼睛还得随时观察着上面的动静，防备着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飞落而下的滚石。不是万不得已谁走这样的路啊，不知这帮日本鬼今天是被哪个好汉引到了这条路上，狗感激他，他使狗有了机会在那里给日本鬼准备一座坟场。

抵达滚石坡顶的狗顺着那十多米宽的岩顶走了一遍，他很满意他见到的一切：连绵的阴雨把红泥土浸泡得松软，雨水切割出大块的土石悬在岩边，只要几块石头的滚落就可能引起吸饱了水的岩壁塌方。那样，岩下的路和路上的一切都将被冲向深渊或被活埋于土石之下，路也就不复存在了。狗在周围弄来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码好，就等着日本鬼的出现了。突然，狗灵机一动，他放弃了现在就采取行动的想法。他要把日本鬼全部放进这“U”型路的底部——伐木场，再断绝他们的退路。他只要把另一出口的“三道拐”封住，那日本鬼不要说运送炮弹，自身性命都难保了。在这原始丛林里，狗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那就是杀光这些兽类。

狗匆匆离开滚石坡，继续往前赶路，寻找着适宜于狩猎的合适场所。自从他把自己与日本鬼的关系定位于猎手与兽类的关系以后，从狂怒的复仇欲望中清醒下来的他多了心思，狗边走边算计着这些日本鬼的人数。连上后面那必死无疑的、可能已经被套子吊着的日本鬼，应该还剩七、八个。

就是这里了。几棵小腿粗细的柞树挨着路边。这是木质坚硬韧性极好的树种。狗在林子里找了两根手膀粗的干树棵，他掰去了树棵前部的那些枯枝，那些横七竖八的断茬支棱着，象两根狼牙棒。狗把它们的根部一高一矮地别在紧邻的柞树之间，分别朝路的走向平行的前后两个方向狠命扳去……当藤条做好的机关绊索安置好后，狗隐入了山林。

大概是因为在驮队后面安排了伏兵，可能也因为这段路要平直一些，视野良好，情况明了，两个日本鬼的尖兵没有在路边搜索前进，而是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快到那几棵柞树了，狗注视着路上的藤条绊索，它就象路上随处可见的爬过路面的的藤条，被枯枝败叶掩蔽得若隐若现，毫不起眼。狗心里默默数着步子，到了，只听嘣的一声，两根木棒相向着横扫而过，后面的日本鬼被安置得较高的木棒击中后背，几根尖利的断岔穿透了胸腔，他只来得及哼一声就跪倒了。前一个日本鬼被安置得低的木棒扫断了膝盖，倒在地上凄厉地叫唤起来……

狗和翠儿相好，其实都看在奶奶的眼睛里，早就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罢了。从狗离开山寨后翠儿魂不守舍的样子，到那个月圆之夜院门两次吱呀开合，该来的终归要来，该去的终归要去，奶奶懂得这个理。奶奶知道，这山里没人看得起漂泊无定的“敲牛脚杆跟马屁股”的赶马人。她也清楚狗的脾性，如若“上门”（入赘），他那山里汉子的自尊就会屈折一辈子。然而明媒正娶的彩礼对于狗这样孤人来说，简直就想都不敢想。因了这些不是规矩

的“规矩”，亘古以来，断了这大山里的多少好姻缘啊！那令人肝肠寸断故事听得太多也看得太多了。奶奶想好了，她不想那些悲剧故事在她的翠儿那里重演，她默默地在做着她觉得应该做的一切。

其实奶奶想到的那些“规矩”，狗和翠儿也想到了。翠儿爹妈死的早，是奶奶把她带大的。奶奶对她的养育最不讲“规矩”，从小她就象山野里的万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率性自然，山泉野菜粗茶淡饭喂养的健康，无拘无束活力张扬。老实说，翠儿在对狗说“跟你一辈子”的时候，并未把山里的“规矩”放在心上，可当她血液回流心跳趋缓以后，她放不下的是奶奶。狗其实太想连奶奶一起带着走了，他也想到了李家堡人会说他讨媳妇还顺带“讨”了个奶奶，他并不在乎。狗孤身在这世上守着两间茅草房过了多少年，加起来也没有在翠儿家这不到一年的日子温暖舒心，他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了。但狗和翠儿都知道，奶奶是不会离开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山寨而成为他们的累赘的。他们陷入了两难境地。

从来不管翠儿在木织机上做多做少的奶奶，突然地成了严格的监工，不仅老是催促翠儿织多点织快点，还不时把织好的土布拿到亮处查看。家里的土布也不让拿到街子上卖了，相反，她还用野物皮子从马帮那里换了些上好的黑洋布回来。又是捶洗晾晒长长的土布料，又是打糨糊贴布壳子，奶奶不动声色地忙碌着。直到有一天，奶奶拿着鞋样和打好的布壳子，还有黑洋布和浣洗得白白的土布交给翠儿，扳着指头要翠儿按着鞋样纳鞋底做毛边鞋，做有十二个兜兜和十二颗布疙瘩扣子的黑边马褂子，还要做有白布腰的大裆裤的时候，翠儿明白了奶奶的心思，泪流满面。奶奶对狗说，狗，你抢亲吧。生性倔强的狗一楞，随即被胸口涌上来的热流哽住了。抢亲在山里其实不完全是暴力的，也有未嫁女子与相爱的男子密谋而心甘情愿被悄悄“裹”走的。这种对“规矩”的叛逆，在山里人看来是对家族的羞辱，只要事主要求，只要能寻得到私奔男女的踪迹，他们都会被绳之以家法，甚至不惜与敢于阻挠的男方家族结仇开仗火。除非这对出走的男女了无音讯无从寻觅，一年后他们就可以回来认娘家父母。当然娘家人认不认他们尚无从知晓，但家族是不会再管的了。然而即使娘家父母认下了他们，允许他们进门，这就意味着不仅免除了男方需要送出的丰厚彩礼，也等于自认了自家“养不教”之过，在家族中从此蒙羞而遭人耻笑。奶奶懂这些，不是要事主的要求吗？奶奶去老寨主那里去“要求”了，却不是要求别的，而是要求允许狗把翠儿“裹”走。老寨主懵了，费了好大气力弄清了奶奶的意思后，气得把长烟杆都摔成了两截，说这是祖宗八代都没见过的事情。奶奶从街子上买了一支上好的烟锅送了去，带着计谋得逞的满足，笑盈盈地顾自走了。

善良而智慧的奶奶啊！

狗并没有急于带着翠儿离开，相反，翠儿得留下来，等狗跟马帮再来的时候才随他回去。狗得留出足够充裕的缓冲时间，让山寨的人们适应这“祖宗八代都没见过的事情”，他也得回李家堡收拾一下他那两间茅草屋。他们都定好了，以后狗跟马帮，翠儿就一起来和奶奶住，待狗返回时再一起回李家堡。那就等于一年到头有相当的时间翠儿还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全力地为奶奶一段时间里的生活储备劳作着……

狗要走了，奶奶陪他去老寨主那里辞行，他央求老寨主关照奶奶，余怒未消的老寨主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寨子的事我们自有规矩，你一个外乡人少插嘴。老寨主对奶奶说，要走就体体面面地走，起码么换一身衣裳，莫给李家堡的人说我们不懂礼。说罢起身进屋了，临走还嘟囔了一句：你这个老奶尽整些精精怪怪的事！奶奶只是安详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黑包头、白土布衣、黑边马褂、大裆裤、毛边鞋，一水的新，把狗年轻的身躯衬托得精神抖擞。人是桩桩，全靠衣裳。奶奶边念叨，边抻展着狗的袖口衣襟。奶奶很满意。不仅满意翠儿的手艺，也满意狗走过村路时吸引的众多的眼光。奶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村口那浓荫盖地的老核桃树下，奶奶掏出了一个蓝布包，一层层打开，现出了两只玉镯头。翠儿认得，那是奶奶的陪嫁。奶奶说过，爷爷在世时，它们分别戴在爷爷奶奶的手腕上；爷爷去世后，奶奶褪下了它们，又分别戴上了翠儿爹妈的手腕上；从翠儿爹妈走了后，翠儿除了偶尔在夜里醒来见到奶奶擦拭或呆看着它们外，平时是根本见不着的。奶奶把镯头一人一只地给狗和翠儿戴上，说：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副，只有两个人戴上了以后，才叫一对。你们啊，不要让它们又变回一副去。说完就掉头回村去了。狗和翠儿都没有说话，奶奶的话很够他们想一气的。狗从翠儿手里接过小包袱，憨憨地笑笑，一步几回头地走了。走到大垭口，狗再回头，村口的老核桃树和那令他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疼的女子，被升腾起的雾气遮掩了。狗不舍地望了又望，回头刚要迈步，一串脆生生的山歌调子滚落下来：

哎——

云走山不走

哥走妹不留

送郎到村口

盼哥早转头

……

山林死寂，夜暗如漆，阴寒砭骨。穿行于黑暗与寂静中的狗，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和脚步声。狗是天擦黑的时候从伐木场离开的，他估计明天下午是能够赶到前线指挥部的，一定要赶到。不能放过这帮日本鬼！狗现在只想这个。为了他的马帮，为了惨死的伐木人父子，为两年前李家堡被残害了的乡亲，为狗亲手掩埋了的那些战死的军人，为狗亲眼目睹的“5.4”大轰炸的尸山血海，还有由此而引发的瘟疫中死去的几万百姓……从战火蔓延到这片安宁的土地的两年中，日本鬼制造的灾难与兽行狗听到的看到的实在是太多了，淳朴的山里人怎么也无法将这些闻所未闻的残暴与人的外形统一起来。日本鬼，作孽太多，不得好死，死定了！狗第一次给在敌后游击的预二师送给养时就这样断定。那次狗见到的预二师的弟兄们，赶马人的眼泪都下来了。虽然听说当地百姓都叫预二师“花子

军”，但实在没有想到他们的穿着连狗见到的叫花子都不如。那次是带了预二师的长官连夜越过战线去县城见“总司令”，到了城外关卡那里被拦住了，直到城里有快马送了官服皮鞋来换了才放进去的。换下的衣服被守关卡的兵用刺刀挑到一边点着了，虱子烧得啪啪响……。谁能想象，就是这些“叫花子”在敌后和日本鬼成年数的拼命，硬是打出了名气。那晚，在预二师驻地，狗还见到了那个写信痛快淋漓的斥骂日本鬼的花白胡子老县长和他那著名的“流动县政府”，夜幕中还有那些扛枪的农民、送粮的老人……狗他们走的时候，身上能脱的都给那些弟兄们留下了，穿着单衣回来的。那时狗就看清了，日本鬼，死定了！

眼前的黑暗实在太深太重，没有月光，没有星光，连磷火荧光和野物绿荧荧的眼睛都没有。哪怕有点风呢，让树叶茅草发出窸嗦。可除了喘息和脚步声还是喘息和脚步声。几个月以来枪炮轰鸣血雨纷飞的战争，使山林失去了往日的喧闹，野物逃离了它们世代繁衍的栖息地，它们是山林的精灵啊，没有了它们，山林就没了活气。黑暗与寂静阔大无边，让落入其中的人感觉自身如同一粒微小孤独的尘埃。在听觉和视觉都近乎失去意义的时候，其他的感觉却灵敏了起来。狗闻到了什么，太熟悉了，马汗味？可心急如焚的狗并没有去细想这意味着什么。不仅因为这是通往后方的路，还因为这样的黑夜连多年行走于这片大山里的赶马人都倍感吃力，日本鬼就根本没有行动的本事，何况还是一支驮队。他们跑不了！狗极力睁大眼睛，凭借许多年走马帮赶夜路的感觉和依稀的山影辨认着，奔走着。

半夜了吧？狗无法断定，寒冷、黑暗和寂静令人丧失了对时间的判断，这让狗很着急。要知道，他必须在黎明时赶到奶奶和翠儿所在的山寨。山寨距离前线指挥部还有大半天的路程，他打算在那里吃点东西再走。两天两夜中，肚子里除了那锅驴骨头汤就没有装过正经粮食。在伐木场喝的那点热汤使他濒临冻僵的身体恢复了活力，可现在已经感觉不到汤的存在，代之以急迫的饥饿感，汗已经出完了，空空的肚腹难以抵御山林的湿冷，狗浑身不时地打着寒噤。他感到很奇怪，喝了一铜吊锅的汤汤水水怎么就没撒过一泡尿呢？饥饿寒冷和黑暗令狗想起了奶奶那终年不灭的火塘，那又香又辣的酸菜汤和包谷酒，还有翠儿烙的金黄色的粑粑，又糍又糯，噗噗地冒着热气……这令狗肚腹绞动肠鸣阵阵，难受，不能想这个。这时候翠儿睡了吧？一想翠儿就是那温软的胸脯。人家是搂着老婆睡，狗却喜欢被翠儿搂着睡，为的就是可以挨着那两团温软，拱两拱，觉就睡得塌实了。自从有了狗儿，属于他的那两团温软便被夺去了。这小狗日的！黑暗中的狗竟咧开了嘴，露出白牙。狗儿是狗的心，那肉虫虫似的小鸡鸡不光是狗喜欢炫耀，奶奶也喜欢显摆，招惹得寨子里的汉子也嬉笑说：狗日的枪法好，一枪一个准。奶奶虽然嘴上骂着，可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洋溢着喜气。这是狗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三个亲人，一想起他们，心里就温暖了起来。想到这些，狗下意识地驱动着腿脚，快点！再快点！赶回山寨！

当狗跌跌撞撞爬上一个小山包时，漆黑的夜幕上，远远地跳出一团火，橘红色的火光标明了方向：那就是小山寨。除了祭祀和节气，寨子里会在场院上燃起巨大的篝火，今天会是什么节日吗？狗想了想，断定没有。那是谁家着火了？这要在旱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一烧就是一个寨子甚至几匹山，可现在是雨季，连房顶的茅草都是湿

的，什么火也烧不了这样大的。突然，狗的心脏一阵尖锐的刺痛，如同扎入了一把利刃，利刃的搅动使得心脏成为了碎块，这疼痛几乎让狗窒息，眼前忽地冒出无数飞舞的金蝇子。狗浑身的皮肤瞬间暴起一层鸡皮疙瘩，随即，所有毛细管重又尽数贲张，汗液如开启了闸门的水，从这个几乎脱水的身体内涌出。冷汗挂满脸庞，湿了衣裳。狗眩晕了，他踉跄了一下，忙靠了一棵树，揪住胸口的衣襟，大口大口地喘息。这疼痛来得这么突如其来，这么剧烈，这么没来由，使狗的胸腔里那盛放心脏的部位一下没了内容。狗并不知晓这疼痛来自于何方，直觉告诉他，赶快回去！赶回有他骨肉亲人的小山寨。

6、

被扫断了腿的日本鬼凄厉的惨叫，将恐惧迅速地传播开来，日本鬼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森林中复仇之神的存在。过去他们也有过被夹子夹伤和被弩机发射的涂了毒药的箭头袭击的经历，但那多是一次性的报复行动。而今天，整个驮队被死死盯住了，每次袭击都是那么有效，猝不及防。日本鬼如临大敌，眼睛一刻不停地搜索着远远近近的竹木刺棵和山茅草丛，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就会变成复仇的利器，突然地刺入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身体。恐惧，恐惧压迫着他们的神经。

日本伍长打破了令人压抑的宁静，他在路的一侧看到了狗留下的痕迹，令两个日本鬼向狗躲藏的方向搜索，其他日本鬼架起了机枪，做好了掩护准备。在近在咫尺的威胁面前，日本鬼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铲除这个威胁，暴露目标也在所不惜。狗盯着那两个小心翼翼爬上坡来的日本鬼，身体轻轻地向后移动着，保持着与日本鬼的距离。忽然，狗脚下一空，身体一下被卡住了。石缝！狗真懊悔，这条横贯坡顶的石缝刚才去路边的时候他是越过了的，怎么就忘了呢？幸好是在右边，身体左边的石缝更宽更深，被山茅草和灌木刺棵掩蔽着，掉下去就可能要了命。狗一动不敢动地趴在石缝边缘，在山茅草后紧张地注视着坡下。左边的日本鬼在前，正对着狗的日本鬼在后，一步又一步地走来。近了，更近了，刷唰的脚步声中，能清晰地听见那有些颤抖的喘息。当狗看到那双翻毛皮鞋迈向他的眼前的时候，他埋下头闭上了眼睛……突然，哗啦的一声，同时有惊叫从左边传来，然后是石头叮叮哐哐的坠落，接着狗就听到了肉体翻滚下坡的钝响。片刻，狗睁开眼，慢慢抬起头，见那两个吓破了胆的日本鬼正在路旁接受那伍长的斥骂，啪啪的耳光抽得山响。

日本鬼们不派尖兵和后卫了，除了伤病者，其他人也都不骑马了，他们相互间只拉开十几步的距离，每人都靠着一匹牲口，让牲口的躯体做为他们一侧的掩护而警戒着另一侧。驮队前，牲口当了尖兵，被用来打头开路，他们战战兢兢地继续前行。

狗满是虚汗的头伏在了手臂上，他长吁了一口气，咚咚的心跳很急促，血液鼓胀得左耳部的伤口阵阵疼痛。而就在这个时候，狗没有看到那个把日本鬼带入歧途的人，被捆在马上，就在他下面几十米的地方过去了。

待狗挣出石缝，没有顾得上满身的擦伤，拼命地赶到了伐木场后的陡坡上，他又看见了前些天他勒着那日本鬼纵身一跃的老岩子和岩子下面血红的滔滔江水。喘息甫定，狗就听到了马蹄达达的动静，他赶忙匐下身来伸头向空地入口处望去。几匹牲口先出现了，接着进入空地的日本鬼环顾了四周便嚷嚷了起来，一个捆绑着双手的老者被推到了前面，那灰白的山羊胡子和插在后领口的长烟杆令狗惊呆了：老寨主？！那日本伍长气急败坏的哇啦哇啦地蹦着叫着，老寨主并不理会，他慢慢地踱向岩边，一转身，背对了江水仰天大笑了起来，翘得老高的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笑声震荡在山林中，树叶上有雨水滚落下来。突然，笑声嘎然而止，只见老寨主对着山林高喊：汉子，我晓得你在，牲口我都带到了，我们全寨子人都拜托你，一个都莫放脱！老寨主的声音在两把刺刀穿透胸腹的同时终止了，他的身体消失在悬崖边缘的时候，狗的头一下插进了草丛，双手抓起的两把腐叶被攥出了黑色的汁液……

突如其来的枪声把正在煮包谷糊糊的翠儿和她奶奶骇得一抖，激起了一片狗吠。奶奶拦住了要出去看看的翠儿，想了想，吹灭了洋油灯，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暗中，耳朵捕捉着外面的动静。有重重的脚步声传来，门外的撵山狗一声低沉的咆哮，接着就是一声惨叫，院子里立时响起扑打声和咿哩哇啦喊叫，这杂乱的声响在撵山狗的一声呜咽后停止了。翠儿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开门，就被两把枪刺逼了回来。在火塘里的火光映照下，那枪刺上还在滴落着暗红色的液体……

翠儿家那点包谷糊糊几乎在眨眼间就被你抢我夺地倒进了三个饿痨鬼的肚子，他们甚至顾不上被撵山狗撕裂的伤口，把铜吊锅舔得溜光，然后瞪着发着绿光的眼睛威逼着翠儿和奶奶再给他们做吃食。奶奶去舀包谷面了，翠儿挑起水桶刚要出门，被一把刺刀拦住。她对着铜吊锅示意，那戴眼镜的日本鬼嘟囔了一声，押着她出了门。寨子被可怕的骚动笼罩了，村路上，翠儿被绊了一个趔趄，她定睛看去，是刚才还在听她说话的小媳妇，肚子被豁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她吓呆了，就感觉到来自身体内的翻涌，她和那个四眼狗似的日本鬼都呕吐了起来。还没直起腰来，前边的茅草房里猛地暴出一声令人汗毛倒立的嚎叫，随即，那扇蔑笆门被一个捂着眼睛的日本鬼从里到外地撞倒滚了出来，紧接着门口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挥舞着剪刀的婆娘，她刚出房门，一把刺刀从身后洞穿了她的身体……接着，翠儿看见了被吊在寨口树上的老寨主和倒在血泊里的女人。翠儿挑着水桶在刺刀的押解下木木地走过，她依稀听到被吊着的老寨主发出的一声“呸！”

寨子里不要翠儿的奶奶上军粮，说她一个孤老人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奶奶不高兴，可没吭气，交粮的时候她还是背了去，人们没法阻挡她那不声不响的倔犟。其实奶奶已经接近断粮。今晚她当着那些日本鬼的面翻扑了面柜，甚至还把给狗留着的一罐老包谷酒抱了出来。她一声不吭地忙碌着，表现出来的驯良，让这几个日本鬼放心了，他们解除了身上的枪械，饿狗一般地抢食，噎得眼睛翻白。翠儿青白着脸，流着泪，对奶奶悄悄说了她挑水路上的见闻。木木的感觉过去后，内心的悲与愤使她身上打摆子似的战抖。奶奶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只是当翠儿说到老寨主好象冲她“呸”了的时候，奶奶的身体抖了一下。肚子里有了食物，酒和火塘的热量使三个日本鬼身上的衣

服腾起了白汽，吃饱喝足了的日本鬼被沉重的困意压倒了。这之前，奶奶还叫翠儿从对面的马棚里抱了很多干草给他们垫上。

夜深了，翠儿搂着狗儿和奶奶坐在火塘边，只有那个背时的带眼镜的日本鬼不得睡，他被指定盯着这家房主人。他把玩着洋油灯，比比划划地与她们说着什么，开头翠儿并没在意，她在想，就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一个古来静谧安详的山寨，怎么转眼就成了惨绝人寰的地狱的呢？一个电光石火般的提示掠过，她突然明白了：洋油灯！是她挂在院坝里的洋油灯招来的灾祸啊！一个炸雷在脑际轰然爆裂，翠儿的大脑一下就空白了。奶奶不停地往火塘里加柴火，火烧的又大又旺，被连日阴雨浸透了的茅草屋顶，被烤得冒出了浓浓的雾汽。鸡叫二遍的时候，那日本鬼终于垂下了头发出了鼾声。奶奶捏了一把翠儿的膀子，说。你走，带着狗儿去找他爹去，找寨子的男人们，叫我们的老总来，为我们寨子报仇。翠儿要奶奶一起走，奶奶说，那就一个都走不脱，寨子里的人就白死了。翠儿问，奶奶你怎么办？奶奶说：我不能还不如那些山贼。山里女人的刚烈与倔强，并不完全是表现在语言上，而是她们对认定了的事情不回头的决绝。爱是这样，恨更是这样。而就在这时，那个背时的日本鬼又被急迫的便意憋醒了，他恼怒地骂着什么，提了枪匆匆跑出了院坝。天就要亮了，不能等了。奶奶说。你要还是我们山寨的女人，你就快走！不然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在奶奶的逼视下，泪流满面的翠儿背了熟睡中的狗儿一转身没入了门外的黑暗……

奶奶把门插死了。原来的门没有闩，那门闩是狗带翠儿走的时候新做的，很扎实。奶奶返身从屋角拎出了那洋油桶，把洋油撒在房屋各处，连同那两个日本鬼的身上和他们垫着的干草。那个酒罐被倾倒了，清亮的酒液汩汩流出，空气中混合了酒香和洋油的气味。奶奶从火塘里抽出了一根燃烧得正旺的柴火……灯光能招来日本鬼，那火光就不能招来我们的人吗？何况是大火！出民伕的汉子们看见寨子着火就会知道发生了变故。

日本鬼，你们就等着吧！奶奶其实早已经想好了，今晚所做的一切都在为着这一刻。

燃烧是从流淌着的酒液开始的，那蓝色的火苗以着火点为圆心向周围呼地蔓延开去，几乎一瞬间，火在屋里蓬地爆开，两个日本鬼立刻成为了两个乱滚乱叫的火团。茅草屋顶的浓烟代替了蒸腾的白汽，随后轰地燃成了明火，火头直刺夜空。一个遍地翻滚的日本鬼把即将烧透的板壁撞破了个洞窜了出去，火老鼠一般在当地滚了两滚，却一头钻进对面装满干草的马棚，马棚熊熊燃烧了起来，这时，他腰间自杀用的手榴弹爆炸了，将燃烧着的木块草捆掀向空中。堂屋的火光中，奶奶闭着眼睛，表情安详，嘴角露一丝隐约的笑纹……

翠儿一出院门，迎头遇上了那个拉稀的日本鬼，他大声地叫嚷着，横着的枪不断地把翠儿往院坝里推搡，翠儿急了，伸手在那日本鬼的脸上一阵抓挠，便抓到了眼镜，翠儿抓住对方慌忙护眼镜的短暂松懈狠命一撞，那日本鬼一仰向后倒去，拿着步枪的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弧，重重地墩在地上。“砰！”地一声枪响，夜就被震碎了。翠儿背着被惊哭了的狗儿拼了命跟斗扑爬的奔跑，没有逃离身后追踪而来的刺刀。近了，更近了，黑暗中的刺刀急速地一闪，翠儿被一股来自背后的力量撞倒，同时感到了一阵刺痛，狗儿啼哭的声音嘎然而止。随着啼哭声的终止，狂乱

中的翠儿一下感到她的意识正在如同游丝般被抽走，剩下的只是一副躯壳了，连冲天而起的大火和那声震耳的爆炸也没能唤回她那走失了的魂魄。

呆滞的翠儿抱着血团似的狗儿重新站在被大火映照得通明的院坝的时候，那些日本鬼束手无策地望着熊熊大火，日本伍长发疯似地嚎叫着，翠儿充耳不闻。她在那舞动着的火叶子里看见了狗那阳光般灿烂的笑脸，那声“狗解手”在耳畔真切地响起……银发飘飞的奶奶出现了，她正把那玉镯头往狗的手上戴呢，“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副，只有两个人戴上了以后，才叫一对”。慈爱的音容犹在……突然，翠儿听见咯咯的笑声，是狗儿，张着圆滚滚的满是肉涡的小手在朝她扑腾，那口齿不清奶声奶气的叫妈声不绝于耳，在脑际反射出无数个回响，越来越大……翠儿打一个寒战。恢复了意识后的翠儿已经决定不活了。面对上下两辈的亡灵，面对狗，如同行尸走肉般地苟且偷生一辈子，对翠儿来说，比死还残酷。她不能离开她的心肝她的狗儿，她要带着狗儿找奶奶去。这个刚烈的山里女人一头撞倒了逼近她的伍长，一转身扑进了大火。熊熊的火焰中传来她决绝的嘶喊：狗——！不要放过这些挨千刀的！

如果说孤零零的一两声枪响在茫茫山林中可能被淹没和忽略的话，那这场大火和爆炸恐怕是难以不让人发觉的了，天一亮，那冲天而起的浓烟就会把消息传遍方圆几十里。它打消了日本鬼想在这个偏僻的山寨休整的打算。凌晨时分，日本鬼们备好了鞍驮，把全村还活着的人都捆到了大核桃树下。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寨子，经过昨夜的杀戮，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捆在树上的婆娘娃娃和老人都被塞了嘴蒙了眼睛，这些无声的身躯在恐惧与绝望中瑟瑟发抖，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老寨主被从树上放了下来，他将作为向导而带领这些日本鬼走向孤城。伍长是以要杀光这小山寨的人相威胁，逼迫老寨主答应做向导的。吊在大核桃树上一夜的老寨主是看着那场大火烧起来的。开始他看着那茅草房顶蒸腾出白色的雾汽觉得很不解，直到浓烟代替了雾汽，火舌窜出了房顶的时候，老寨主明白了奶奶的用意，他老泪纵横。那时侯，他就打定了主意。

残暴的日本伍长知道，在这片愤怒的土地上，处处都是可以致他们于死地的陷阱，连山贼都把他们视为兽类，他们的行为甚至他们存在的本身就已令天怒人怨了，任何人都会成为他们致命的威胁，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当地人。伍长暗自向充当后卫的士兵授意后，两把刺刀顶着老寨主的腰，驮队向寨子后山仓皇而去。

天没有下雨，依然阴霾，林子里十分寒冷，山路湿滑难行。爬上了寨子后山的山顶，老寨主驻足回头眺望，在天放亮前的黑暗中，那大火仍在熊熊燃烧，烟气袅袅，火光映红了半个天，位居山头的小寨轮廓在火光中时隐时现。往日这个时候正是鸡打鸣的时分，院门和挑水扁担的吱呀声引一片狗吠，寨子就醒了。随后，冲碓的咚咚声和哦哦的吆牛声就该响起来了……而今天，寨子一片死寂，没有一丝活气。老寨主额头青筋暴涨，怒目喷火，他咬着牙发狠地说了声：我给你们带路！扭头带着这伙日本鬼进入了原始森林。

心脏的那阵刺痛过后，一身冷汗的狗倍感寒冷。满眼金蝇子消散了，黑暗如磐，那夜幕中突然跳出的火光，指示着、召唤着狗，狗就是循着这团火光而来的。看到这团火光的时候，狗已经有了不祥之兆，他曾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但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惨烈的景况。

灰烬中的两支步枪已经烧没了枪托，乌黑的枪管上的刺刀扭曲着翘了起来，狗能够认得出来，这是日式步枪。门口是一具抽搐成一团的男尸，嘴唇已经烧完了，裸露着两排厉厉白牙。火塘边那依然端坐着的黑糊糊的身躯，没有了眉目，但从那庄稳的姿态中，狗还是认出了奶奶。狗的目光在继续搜寻着，搜寻着他最想找而又最不愿意在这里找到的。直到这时，狗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他脑子里还固执地转着侥幸的念头，总不会都……总有人……总……狗的目光停止了移动，那是一堆已成为木炭的椽子板壁，火星子不断地从那覆盖了一层白灰的暗红中跳起。狗颤抖着拨开了那些余烬，下面是一具俯卧着的人体，焦黑的身体青烟缭缭。不象，不是她。流水潭边那秀美窈窕的腰身，那莲藕一般白玉一样的手臂……她不是这么短的，这象个孩子。不象她！不是她！翻过那碳一样的躯体，喀嚓一声响，那躯体往身下弯着的手臂木柴似地折断了。下面一具小小的身体腾起了白白的热汽，皮肉烧灼的气味冲进了狗的肺腑。那只折断了的、因搂着那小身体而没被烧着的手腕处，一只被人油浸泡得亮汪汪的碧绿的玉镯头显露出来。狗木然地从那条断臂上褪下了玉镯，刚一起身，一下就动不了了，他清楚地听见身体内发出的碎裂声，过往的人生体验所构筑的一切，在这时轰然坍塌。狗的嗓子里一阵灼热，甜腥味涌动着冲了上喉咙，血就顺着嘴角流淌了下来。眼一黑，浑身精气在一瞬散尽，狗一头栽倒在那片焦土上。

……

7、

日本鬼们上了老寨主的当，不敢再耽搁，掉头便向来路退去。眼看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机会，狗赶忙起身直奔滚石坡而去。

老寨主的出现，实在是出乎狗的意料之外。狗想起“抢婚”讨翠儿做媳妇的时候，老寨主那死头干僵的样子，他怎么会答应给日本鬼带路呢？可他不仅带了路，还把这些日本鬼带到了死路上。这不能不让狗重新看待老寨主，他不光是倔犟刚烈，也颇有韬略。日本鬼啊，前天是祖公我把你们带到了这里，今天老寨主又把你们到了这里，天意不可违，为了你们所作的孽，拿命抵吧，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场。

候在滚石坡顶的狗，一眼就看见了打头的白蹄子。马日的犟种，驮着两倍于其他牲口的重负还要充头马。在滚石坡下狭窄的路段，白蹄子停了下来，整个驮队便都停住了，它晓得这样的地方需得要一驮一马的过，这就是头马的素质。可日本鬼在赶马人脱逃后又把驮队全都用绳子连接了起来，它是等他们来解绳子的。日本鬼们来到了驮队

前，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他们，保持着戒备，见了这险峻的地形，犹豫不决了。那个影子一样紧跟着他们的复仇者，说不定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等待着把死亡送给他们。如果兵力和时间都还够，他们应该派出搜索绕道坡顶掩护驮队安全的，可这两个条件都被这些山民在巧妙或暴烈的周旋中消耗了，丧失了。日本鬼们估计得到，追兵将至。时间紧迫，他们解开了白蹄子，紧张地看着它走过这段险路。他们还是不放心，又接连放过了几匹驮马。已走到路那头的白蹄子象发现了什么，它想仰头嘶鸣，无奈嘴被套住了，它急噪地用蹄子刨着地，吹着鼻子。闻着我的味道了？马日的，日本鬼已经管不着你了，你自家回去吧。狗为白蹄子获得自由而欣慰。狗转回头，看这些日本鬼还玩什么名堂，他不着急，他就等着他们过呢。可日本鬼们并没有一起过，却让那个断了腿的伤兵趴在一匹骡子背上过来了。这个背时鬼已经没有了嚎叫的气力，他那被惊恐扭曲了的脸扬着，无助无望地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降临的厄运。狗忧郁了，他在滚石坡的一切准备，是为了集体收拾日本鬼，为一个伤兵就太不合算了。况且这样对付一个伤兵也不太够汉子。可没等狗多想，一块滚石的自然坠落，砸断了日本鬼紧绷的神经，机枪就不分点数地扫向坡壁，巨大的声浪在山沟里激荡，震耳欲聋，狗面前堆码的石头被枪弹撞击得火星子乱迸，狗下意识地一缩，滚到了坡后，他还没有稳住身子，贴在地上的耳朵就从山肚子里听到了低沉的咆哮，抬头一看，那堆码好的石头已经不见了……

山野里安静下来，狗小心地挨到坡壁边，他在一棵树后探出头去：眼下的路和路上的伤兵已经没有了，就是一面乱石狰狞的大斜坡。不要说驮队，就是兔子也不敢穿过这名符其实的滚石坡了。驮队已经掉头，向伐木场而去。路那头过去了的牲口都吓跑了，惟独白蹄子还在，它这时正在那里窜蹦跳跃扭腰颠屁股，硬是把那驮架上的炮弹箱给掀了。狗是看着它离开路钻了林子的。

在伐木场脱身后又在雨夜的森林中跑散了的七个赶马人，没有一个跑回李家堡，他们比狗还早一天，先后都赶到了指挥部报警。此时的指挥部已越过战线前移，原驻地成为了留守处，负责战场善后和物资伤员的中转，除了军火、马匹、粮食和几个火夫警卫以外，无兵可派，而清剿残敌打扫战场的部队都在前方的山上。接到赶马人报警的长官向正在驿路上急进的部队求援，但被告之，部队必须齐装满员地在规定时间集结于孤城，军令如山，爱莫能助。一场大战正在酝酿，站在路边的赶马人看着行色匆匆的军队和马帮走过，心急如焚。一天过去，黑夜降临了，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十几个伤好归队的预二师的兵，在一个少尉排长的带领下摸黑赶到了中转站。这些兵大多与赶马人们都认识，那个排长还是马帮送回来的呢。听留守处长官和赶马人一说情况，这些预二师的兵二话没有，当即决定明天出发。那长官让他们随便补充弹药，这让这些“花子军”的兵开了眼，在敌后，子弹袋从来就没有装满过的他们，何时开过这样的洋荤啊！

深夜，哨兵报告对面山上有火光和爆炸声，这让留守处长官很忧虑。大战刚过，日本鬼溃逃方向只会是孤城，而不应该出现在这远离战线的后方。可战时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万一是真是一支小部队呢？这对于没有武装的马帮、民伕、伤员甚至他这留守处来说，都是灾难。对面山头的火光看似很近，可“见面能说话，隔山跑死马”，

爬坡下坎走起来要有大半天的工夫。在这种铜锅底一般黑的夜里没有火把是不好行动的，但无论哪一方使用火把，都会暴露自己的行踪而给对方以可乘之机。那长官和排长商议后，命哨兵加强观察与警戒，排长天亮后带人改道向山寨进发，待弄清情况后再作截击日本驮队的行动。

天亮了，夜间着火的山头在白天一直冒着浓烟，赶马人带着预二师的兵在下午赶到山寨时，村里的惨状把他们都惊呆了。开肠破肚鲜血横流的尸体横陈在寨口大核桃树下、村路上和那些茅草房内外，其状惨不忍睹，血腥味和火烟味令人窒息。出民伕的汉子们已经回到了山寨，他们是送伤员返回时看见浓烟而急速赶回来的。他们各自守在自己的亲人的尸体边，有的痴呆呆地坐着，有的在声嘶力竭地试图唤醒死去的人，而那山里汉子嚎叫一般的悲声，让每个人的神经都震颤了起来，小寨阴风惨惨。见了预二师的兵，他们都围了过来，当得知就是要剿灭这帮遭天砍的日本鬼时，这些汉子们都各自找了家什要跟了去。排长极力解释着，只挑了八个人，他指着黑云翻滚的天空说，不能让惨遭不幸的乡邻再被雨淋，他要其他人在寨子里收敛尸体。几个赶马人忙跑去了狗的媳妇家，他们看见了仍在冒烟的废墟，焦糊的枪刺和尸体仿佛在诉说着昨天夜里那惨烈的一幕。用竹蔑遮盖好了的大小尸体归顺在空地上，赶马人们知道，他们的马锅头回来过！他已经追去了！

根据留下的痕迹，排长决定兵分两路寻踪追击。为保证兵力的集中使用，排长指定一个兵带寨子里的八个人为一路，如果发现日本鬼，不作正面攻击，只要跟住他们，袭扰他们，鸣枪示警，等两处合兵再行攻击。其余士兵由排长带领随赶马人走另一条路。两拨人各自匆匆追去，很快隐入了山林之中。

滚石坡的路被引发的泥石流截断了，驮队只能回到“U”型路的底部——伐木场，重走前天来的那另一条路。这次重返旧地，日本伍长看着伐木场遮天蔽地的森林和那血浆一样的江水，心情如同这云层密布的天空一样，阴沉沉的。这是个不吉利的地方。自从撤退以来，兵员损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离开这里以后的三天中，一半的士兵殒命于这片大山之后，又回到了这里，这是不是宿命？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伍长不禁打了个寒噤。这个鬼地方！他大声诅咒了一句。这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中，从东南亚一路杀来的战胜者，军鞋踏过，对手无不望风披靡。那些黑瘦矮小的东南亚人，那些貌似强大的蠢笨的白人……除了支那军队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以外（仅仅是麻烦而已）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对手。优等民族对于劣等民族的优越感，在他心中急剧膨胀，他鄙视他们的生命，蔑视他们的存在，他居高临下践踏虫蚁般地屠戮他们，凸显着大日本皇军的不可战胜。到了这时，不仅军官的说教，他自己也认为优等的大和民族偏于狭长海岛一隅，是耻辱，是不公平。杀戮对于他来说，是建立新秩序的需要，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可踏上这片土地以来，这里的山民村夫老人妇孺甚至竹木山石泥土，都成了索命的复仇者。他们象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沼，一切徒劳的挣扎与疯狂除了加速灭顶之灾的降临之外，毫无其他效果。支那军队的反攻，如此坚韧，一改以往印象。任阵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那凄厉的军号和怒涛般的吼声却没有终止过，一直以杀戮为乐事的他也为之胆寒了。这是些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百姓啊！他不能理解这片土地对于他们的敌视、厌恶与拼死的抵抗。

伍长没有让人疲马乏的驮队停顿，直接穿过伐木场，走上了前天被赶马人带来的那条路。幽灵般飘荡在黑森森的山林里的复仇者，不会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的，更何况随时可能出现的追兵。天色不早了，必须脱离这个令他恐惧的死地，否则只能返回伐木场。在狭窄的路上宿营，他们无疑都会成为活靶子。丢失了头马，打头的牲口就要人牵着走了。伍长没了办法，除加强戒备外，路遇林木茂盛情况复杂的路段，便狂抽打头的马屁股令其负痛前奔，以期触发那些暗藏的机关。他不能再损失兵员了，现在不连伤病员只有五个人，要照应这支驮队已是捉襟见肘，还要防备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遭到的袭击。他撤消了不许开枪的命令，他已经不在乎枪声暴露目标了，毕竟消除现实的危险更迫切更重要。伍长庆幸这个暗中追踪着他们的家伙没有远距离致命的武器，譬如毒弩，否则他们活不到现在。想起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的被毒弩射中的士兵暴死的情形，心中一紧，便厉声催促着加快速度，这样的叫喊，仿佛可以减轻些许恐惧。

崎岖曲折的路上，驮队仓皇而去。

8、

滚石坡的路断了，日本鬼要逃出这里，必经三道拐。狗去三道拐走的是切线，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狗足够设置好一切了。

三道拐象一个“3”字，每道拐都是一个很急的回头弯，两个凸出的急弯象待发的箭头似的，仿佛都已支出了悬崖的边沿，悬崖边的石缝中几棵剑麻稀稀拉拉的参差着。凹进山肚子的弯道上，路的一边是悬崖，内侧是难以攀登的峭壁，竹木繁密，地上藤葛交错，两头的藤蔓越过了深涧，绿荫把路遮成了一段一段的。狗就在这里候着日本鬼。他用石头把倒地的干龙竹砸开，破成竹片，以棕绳扎住一摞竹片的两头，用棍子从这摞竹片的中间朝两边狠命撑开，棍子两头的竹片就弯成了两张弓，一只夹子就做好了。放置在地上的夹子里用几根木棍搭在中间作为机关的棍子上，踩入大夹子的猎物就会被强力夹住，这一击足以伤及筋骨。而地上的腐叶，就是这些夹子最好的伪装。以同样的原理，狗用冲担上的皮条做弦，给自己准备了一支粗糙而强劲的大弩机。在凸出的弯道上，狗设了一些夹子。同时也象滚石坡前对付日本尖兵那样设置了扫杠，就手也结了几个套子。在凹进山肚子的弯道上，狗在悬崖边找到了一根酒杯粗的藤条，他把这藤条拼命向路的内侧拉过来固定住，用绳子连接了作为机关的木桩。这是一个大弹弓，就看谁将成为射向深涧的弹丸了。狗在这里施展着一个山里人全部的狩猎手段，他不让日本鬼走出这里。老寨主说的“一个都莫放脱！”狗要用他们作为牺牲，祭奠亲人和那许多狗认识或不认识的死者，他比任何一次狩猎都做得精心。做完了这一切，狗巡视了他的杰作，没有疏漏了，他满意地拍拍手，顺着紧挨路内侧峭壁生长的几棵笔直的大树回到了壁坡顶。

天近晚，起风了，树叶竹稍沙沙响。狗耸了耸鼻子，闻到一缕随风飘来的马汗气。来了。狗双脚蹬弓，拉开牛

皮条弦，为弩机安上指头粗的竹条。他隐蔽好自己，眼睛盯住了第一道拐。驮队出现在了狗的视线里，那马突然不走了，任怎么抽打，只原地打转，恼怒的日本鬼扬起刺刀戳向马屁股，那马跳起来，竟回身向驮队撞去，狭窄的路上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枪响了，那马被打倒推到了路边。一匹憨骡子被牵过来，那日本鬼走在路外侧，把身体藏在骡子侧后试探着走过来。狗冷笑了，从那两个尖兵被扫杠打翻以后，为躲避一侧的袭击，他们就一直这样，可狗为他们准备的夹子，这次就在外侧，只盯着繁密竹木的日本鬼在劫难逃。“啪”的一声，山谷中就响起了惊惊乍乍的嚎叫。夹子有一头是栓在地上那些盘根错节的藤葛或树根上的，疼痛惊恐的日本鬼顾不上观察这些，几次起身欲逃都被拽翻。那憨骡子被叫声吓了一头，却没感觉屁股上有催促的击打，便悠闲地低头踱步寻青草啃，骡子嘴拱发了吊索，大龙竹唰啦一声弹起，骡子脑袋被猛地向上吊起，身子就在路上挣扎。憨骡子堵了路，也遮住了狗的射界，狗几次调整弩机都没法瞄住在地上拼命叨脚的日本鬼。狗放下弩机，抬眼看去，只见日本鬼的机枪已经架在路边石头上，日本伍长叫喊着，一名日本鬼手持一根长竹竿赶了过来，竹竿一路拍打，便有夹子套子啪啪地被触发弹了起来。那日本鬼一直在变动位置，没有留下足够的瞄准击发的机会，待到了那憨骡子的身后，他起身挑断了吊索，那正往后挣的骡子屁股猛地朝后一坐，竟呼隆隆翻下了悬崖。那伍长见状赶着几匹牲口就跟了过来。那日本鬼转身跑去躲到前头的毛驴身后继续前来。进入了一段树荫。狗听见设置在那里的扫杆嘣地一声，就有木棒击打肉体的闷响传出。驮队在狗的下方走出树荫时，不见了毛驴。侥幸没被扫到的日本鬼胆战心惊地与第一匹马拉开了距离，竹竿捅着马屁股向前走，狗抓起绳子，那匹马一走出标记，狗用力一拉，急速弹出的藤条扫得掩蔽的腐枝败叶纷飞，将那日本鬼弹出路面，他在空中挥舞的手吊住了岩子外悬空的葛藤。狗不怠慢，一下站起来，举起弩机便射，那指头粗的竹条噗地扎进了在悬崖外打晃的身体，那日本鬼短促地叫了一声，扭了两下便坠落了。几乎同时，机枪子弹泼水般打来，狗感到肩膀一麻，被一股力量猛力推倒，他紧着爬了两下，藏身于大树后，没顾上袭来的疼痛，咬牙拉开弩机，接连射倒两匹牲口，阻塞了道路。然后接二连三地把竹条的“箭”频频往树荫下射去。活着的牲口和日本伍长掉头窜出树荫。在机枪掩护下，那倒地的日本鬼得救了，扑趴连天地退了回去。突然，狗的侧后传来惊慌的叫喊，逃出了弩机射程的伍长寻声奔去救援。狗知道，他设在身后的套子勒住了从后面袭来的日本鬼，他一寸寸地朝后挪出身子，等他提着弩机找去时，只见到了被截断了的绳头。

……

当日本伍长惊恐地发现，这个神秘的森林复仇者突然地拥有了远距离杀伤武器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们与对手之间，只有胜者能够活着离开这片森林了。

天就要黑了，在这异国的山林里，黑夜不是入侵者的朋友，今天要闯过这一关卡的希望破灭了。驮队掉头向伐木场走去，只有在那块与森林保有足够距离的空地上，人数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他明白地知道，就是把驮队全部丢弃也没有用，那影子般的人要的是他们的命。而与这个对手的较量，如果依仗人数比对手多而进入山林搜捕，只会象猎物一样被逐一捕杀。在森林里，他们不具备与敌手抗衡的能力。伍长在心里暗自琢磨着。

那个脸上被中国兵咬掉了一块肉的日本鬼被丢弃了，潮湿、阴冷、饥饿、连日的奔波和疟疾令他的伤势迅速恶化，肿胀的头已经发黑，烂得不成样子，散发着恶臭。他奄奄一息，在渐渐浓重的暮色里，象只没有生命的麻袋被扔在了路当中。

山林一片寂静，那远去的驮队马蹄声若隐若现，成为了森林中唯一可辨的声响。躺在地上的伤兵不舍地追寻着这蛮荒的森林中这点唯一与人的活动有关的声响，被抛弃的悲凉感笼罩了他。他是作为“没有丧失作战能力”的轻伤者编入这个押运分队的，他没资格也不想留在阵地上做最后的抵抗后拉响身上的自杀弹。他觉得他能够活下去，但他期望的是随战斗部队撤往孤城，而不是留在这支行动迟缓、为躲避追击而不得不在阴寒潮湿，环境恶劣的森林里撤退的驮队。老实说，手持武器的他，脸上被徒手的中国兵用牙齿咬去一块肉，这本身就够耻辱的，为此他遭受了严厉而轻蔑的责骂。可他没法开口解释的是，那个中国士兵是迎着他射出的子弹和捅出的刺刀扑上来的，他甚至来不及抽回刺刀就被勒倒了，那具涌流着鲜血濒死躯体内的仇恨和着最后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了牙齿上。他没有选择，只有服从。来到这片土地的两年中，他已略知这亘古蛮荒瘴疠横行的大森林的厉害，许多强壮的生命都消逝在了那里面，何况他一个因饥寒和伤病而极度虚弱的人呢？恶化了的伤势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热和摆子彻底击垮了他，他不甘地沦为了不断遭受袭击的驮队的累赘。

伍长把他扶下牲口放倒在地的时候说，他们要去捕杀那个可怖的袭击者。这里是唯一出口，明天驮队再来的时候会带上他的。在求生的欲望下，尽管伍长话语中的漏洞明显，但他还是情愿相信。而现在，他浑身已经被地上的泥水浸透了，体温在慢慢消散。夜幕刚刚降临，寒冷黑暗还很漫长，还能熬到明天吗？他没有信心。想到这里，他伸手摸了摸伍长别在他腰间的自杀手榴弹，心中竟然还涌起了一阵感激，当那个袭击者出现时，或者当生命处于最后的时刻，他情愿选择帝国军人的死法。无法抑制的战抖又来了，越来越剧烈，浑身的肌肉在跳动，牙齿敲出哒哒的声响，他的意识在慢慢模糊。

不远处，一支黑洞洞的枪管伸出了路边的草丛，两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路上依稀可辨的人体。伍长伏在机枪手旁，听着驮队杂乱的蹄声逐渐远去，心里估算着那个神秘的袭击者出现的时机。按正常情况，阻击者在目的达成后，一定会观察驮队是否真的离开，以决定阻击阵地的取舍的，那么他就不会忽略路口当中的那个伤兵，他必须判断这个躺在地上的人是否真的失去了反抗能力。伍长等待着的就是这个时候。暮色加重了，树叶间隙中透进的天光虽然还亮，林中的光线却在迅速暗下去，视线越来越模糊。机枪手揉了揉眼睛，尽力分辨着目标周围的动静。

暮色苍茫中，一个黑影在路旁的山坡上出现了，他果然发现了横陈在路当中一动不动的人体，他警觉地停住，蹲下了身子。片刻后，他顺着一条岩石缝轻轻摸了下了路边，几块小石块向那躯体飞去，并没有激起任何反应。他小心地凑近了去，想看得清楚一些。突然，他不动了：那里有一双眼睛，一双倒映着残余天光的眼睛在瞪着他，那里面有恐惧、有疯狂。四目相对，都象在考量对方的神经坚强的程度。那黑影看见那只一直压在腰腹上的手在手榴

弹把那里拧动着。终于到了极限了，倒卧地上的人发一声喊，手一拉，就有火星喷射了出来。那黑影见状情知不妙，向后一倒，人就摔进了石缝当中。随着那声叫喊，爆炸与枪声几乎同时响起，森林的寂静被击碎了。

待一切都静了下来，山林的夜降临了。伍长在爆炸和枪口发出的闪光留在视网膜上的影象消失后，离开了埋伏地向目标跳跃着、躲闪着摸过去。那里一片死寂，没有了袭击者的踪影，留下的只有胸腹被炸成空洞，脑袋被机枪子弹打去一半的尸体……

伐木场。伍长支使着日本鬼把炮弹全部卸下堆码了起来，从狗他们马帮掠得的手榴弹，除了安置在了炮弹箱中间的以外，其余的都分发了。他们专门挑出八匹相对壮实的马单独栓在一处，其他牲口身上都挂了手榴弹集中到另一侧。接着，他们用上次没有烧完的那些柴火在空地上燃起了一堆火，所有干柴全部搬来了，看来，他们打算让这火一夜不灭的了。又一只毛驴遭难，那些割成块的肉堆在一件蓑衣上，他们几个今天明显是吃不了的。一阵忙乱后，除了在火边煮肉烤肉的一个人外，日本鬼们都隐没到了黑暗中。

篝火呼呼燃烧着，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细碎而清脆的响声，火光照亮的范围，占了空地的一大半。如果没有火光，眼睛在暗夜里尚能辨认个大概，因为有了火，视觉反差大了，火光照射的范围以外，更显得黑。伍长抱着机枪依着一根原木隐身于窝棚旁的黑影里，他注视着火光映照的范围，心里对他的这个部署很满意。窝棚离火堆不远，几乎处于这个空地的中央，除了在火堆边准备吃食的人以外，其他两人都隐伏在火光映照范围之外的黑暗里，在这个视界、射界都很好的范围内，弓弩的射程是够不着火堆边的人的，若想要射杀火堆边的目标，人就得靠近，而任何闯入者在这个一览无余的空地上，都将被交叉的火力打成筛子。

又回到这里了。伍长环视着伐木场已经熟悉了的景物。从撤退以来，他已经四次光顾这里。第一次在这里他损失了两名士兵，今天一天之中三次踏入这里，每次都被阴郁不安的情绪困扰着，那种黑色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浓厚。他一直在琢磨冥冥之中的这个安排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他已经明白地闻到了死神的味道。这个该死的不祥之地！这时的伍长已经没有了任务的概念，运送炮弹的任务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他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他就要把被丢弃的炮弹箱中间的和那些牲口身上的手榴弹弦拉出来做好绊，他要让尾随而来的他憎恶的劣等支那人付出代价。如果今晚能够安然度过，明天他们就将骑上快马以速度的优势摆脱这个该死的袭击者，那些烤肉足以支撑他们逃离这个令他恐惧的大森林。

一切都在今晚了，伍长知道那个人不会无所作为的，他一直在凭借山林中可资利用的一切，扮演着猎手的角色。可从刚才天擦黑的伏击开始，双方已经从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关系，更改为互为猎手与猎物了。蹲踞在窝棚阴影里的伍长，犹如一只身处绝地而又迫切地渴望噬血的狼，盼望着能给对手致命一击的机会出现。

来吧来吧，让该来的尽快来，该结束的尽快结束，决一生死的欲望刺激着他。他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暗夜中，两支队伍正穿越山林向这里赶来……

9、

当狗从树干和灌木的缝隙中看到那堆橘红的火光时，已经后半夜了。

黄昏时分的一阵机枪子弹，一直当猎人的狗差点成了别人的猎物。拿伤兵当诱饵，这帮杂种就不是人！日本鬼的伏击虽未得逞，却令狗一时难以判断他们是否会借势返回三道拐。狗的伤口很疼，他需要歇歇了。起风了，天会晴了吧，这天也该晴晴了。狗就那样坐在路口旁的山包上边想边吞咽挖到的葛根，没嚼几口，失血和疲劳使狗迷糊了过去，直到一阵山风摇落树叶上的水滴把他给激醒。

篝火将林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剪影，火光中晃动着的人就是个黑色轮廓。其他日本鬼呢？狗有些可惜被白白耗费了的时间，如果紧跟驮队，日本鬼的动向就清清楚楚，那样，他就还是猎手。烤肉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狗的肠胃痉挛起来，几天来就没装过正经吃食的肚子里尽是些根根草草。这些在县城里当山珍卖的东西一旦成为主食，还真抵不得包谷粑粑洋芋坨坨。狗咽了口水，掏出葛根接着嚼起来，他得积蓄能量。隐伏在树后的狗仔细地观察着，那未遂的伏击告诉他，不想成为猎物就必须十分在意。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他想在黎明前最黑暗、人最疲乏的时候动手。狗翻转身子仰面朝天躺着，竟在树缝里看见一丝星光。天晴了。狗想象着明天那日头的炽热。有了日头，炮火也消停了，那些生灵们该回来了吧？山林又会变得喧闹了。……阳光下舒展着叶片的花草竹木，或笨拙、或乖巧、或调皮的野物在林间窜蹦腾挪，还有山鸡、老阳雀和那无数歌唱吵闹的雀鸟……阳光下，奶奶在搓棕绳，翠儿给狗儿把尿，红扑扑的脸上纤细的绒毛被阳光照得透明发亮，狗儿圆滚滚的腿间小肉虫虫反射着日头的颜色，嘎嘎的笑声空谷回声般地荡漾在山寨上方湛蓝的天际……锥心的刺痛撕肝裂肺般地又一次地穿透了狗的胸腔，狗醒过来，他攥起拳头，圆睁双目，牙关咬紧地说：还债吧，日本鬼！

狗朝那堆码在半坡上的原木摸去。后背上那又大又笨的弩象翅膀一样张着，要保证行动不发出一点声响，在灌木丛生的林中实在不容易，狗的行走很吃力。原木堆在火光照射的边缘，随篝火的跳跃时隐时现。那里有没有藏匿有日本鬼，狗不知道，但能够看到的目标就是那火堆旁的人影，他不想放过。狗的每一步都轻如山猫，无声无息地潜行着。每一丛灌木山草后，他都停下来仔细观察，选择好下一个藏身之地再往前行。到了，背光的原木堆后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以听觉判断四周的动静，可激烈的心跳和包扎着的左耳影响了狗的听力。狗靠着原木堆，尽力地平缓呼吸。待心跳平复，狗解开了包扎在左耳部的布条，血把伤口和布粘住了，他轻轻揭着，可最后那一点粘死了。狗把土布褂子下摆撩起来塞进嘴里紧紧咬住，猛地一拽……疼痛过后，有热流顺着脖子往下流。森林中的寂静真切地传到了他耳中，他甚至能隐隐分辨出空地那边篝火燃烧发出的劈啪声。狗悄无声息地爬到原木堆

顶，抬头一看，他停住了取弩机的手。距离太远了！即使射去，到了那里也没劲道了，怕连布都射不穿。还得靠近！狗下了原木堆伏下身子向前爬去。在那明与暗的交界处，狗停下了。原木堆前的空地中央是码好的炮弹箱，侧边是窝棚，再往前是火堆，火堆的那头就是老岩子下的滔滔大江。伐木人老财迷聪明，他把伐好的原木拦在这陡坡上堆码起来，原木堆前下部以下细上粗的长楔子塞了，一矣买卖成交，只要一人一边把套了绳子的楔子一拉，原木堆就会崩塌，在窝棚前滚过空地掉入江中。那被反复碾压的空地上平平整整寸草不生，在火光照射下，任何活物出现在那里都无从藏身而变成狩猎对象。狗把头埋到地上，他得仔细想想。狗是见过老财迷放滚木的，父子两人吆喝着号子，保持相同的力量，使楔子同时向两边歪倒，这样才能使原木挤挨着顺序滚去，否则就会横七竖八地滚满空地，连自己的窝棚都毁了。可狗要的却正是让原木乱滚到空地上，不仅想把火堆边的日本鬼撞下江，还要把他认为住有日本鬼的窝棚也平了。要是把杂种们的炮弹也碰炸了才过瘾，那他们都莫想有全尸！狗不知道，炮弹是要引信才能爆炸的。狗把已经派不上用场而又影响行动的弩从背上取下，悄悄朝原木堆前爬去。狗选的是原木堆靠窝棚一侧的楔子，他在楔子上套上棕索后，就向原木堆侧后那棵斜卧在地的原木爬去。狗想得周到，拉动楔子避免不了声响，一旦被发现，那棵大原木便可以抵挡射来的子弹，可那时对于日本鬼来说，一切都晚了。

起身刚要爬过大原木的狗突然停住，浑身上下象弩机上的弦一下绷紧了。他听见，就在这大原木的那边，有因紧张而粗重急促的呼吸声传来。日本杂种，藏在这里呀。狗后怕起来，那日本鬼要是早一些发现他，他就成猎物了。双方就隔着这大原木等待着，他们心存侥幸，都希望对方没有发觉自己，都等着后发制人。日本鬼没喊叫，这一路他领教了这个森林复仇者一招致命的厉害，喊叫只会暴露自己的具体位置而招致杀身之祸。僵持。时间在流逝，狗侧头看了看老岩子方向，透过黑暗，已经能隐约看到前方流淌过来的大江的轮廓，江水反射着暗淡的天光。天就要亮了。天一亮，在这开阔地边沿的狗，就真的会象条狗一样被猎杀了。没了退路，只能拼死一博。决心一下，狗用冲担向原木猛地一击，这响声在安静而又充满紧张气氛的黑暗里，足以令人的神经失控。原木那边呼地站起个人来，狗双腿一用劲，纵上了原木，挥起了手中的冲担。啪！枪响了，子弹擦身而过。狗心里刚闪过“臭枪法”的同时，斧子劈开木头的感觉就顺着冲担传来，惯性令他向前一扑，对方的刺刀噗地戳进了狗的肚子……。倒在原木后的狗，听到几声喊，枪声就响起了，子弹击打在原木上，咚咚的钝响。狗一阵眩晕，腹部疼痛难忍。这不同于臂膀和耳朵的伤口火辣辣的锐痛，而是搅动着五脏六腑的钝痛。他拼命挣扎着靠坐起来，双手握住刀把，慢慢将刺刀拔了出来，血水紧接着喷涌而出。他赶忙解了包头布使劲捆扎住肚子。做完这一切，浑身冷汗的狗，已近虚脱，他喃喃地说：狗儿，爹替你做掉了一个，是爹亲手做掉的。狗的意识慢慢模糊了……

枪声一响，伍长便知道，开始了。他终于来了。他喊叫埋伏在原木堆旁的那日本鬼的名字，没有回答，他知道，他又少了一个人。目标既已明确，他赶忙呼叫另一个潜伏在路口的日本鬼向他靠拢，他不想再被那神秘的杀手零敲碎打地把本钱折光。篝火旁瘸了脚的日本鬼和伍长开了枪，掩护路口那戴眼镜的日本鬼跑了回来后，停止了射击。伍长不知道，如果他现在过去，那一直让他又恨又怕的人就被生擒了。伍长不敢，那人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惨

痛，他现在只要监视住那里，天一亮就不怕了。

毕竟是这片山里的人。小山寨的八条汉子和那个预二师的兵几乎就没有被日本鬼的伪装所迷惑，他们紧随着日本驮队留下的痕迹快速地追踪而来。天快亮时，在滚石头坡前的山弯里，他们见到了那两个被倒吊在路中央的日本鬼，两人浑身的骨节都错位脱臼，软稀稀的，呕吐物从鼻子眼睛到头发流淌到地上，他们奄奄一息，气若游丝。山寨里的人就知道，有人跟住了日本鬼。他们正要把这两个日本鬼解下，宁静的夜里突然爆起了枪声，他们为一震，随即扔下了那两个日本鬼，朝伐木场那边匆匆奔去。他们以为排长率领的兵已经和日本鬼干上了，他们得赶快赶去，不亲手宰几个日本鬼他们无法向全寨子的冤魂交代啊！

他们抵达滚石坡时，路断了。心急如焚的人们没有片刻犹豫，返身回到滚石坡头，离开道路，翻山穿林越过了滚石坡。天亮时分，他们赶到了伐木场。

幸亏这黎明前的黑暗中暴起的枪声，赶马人带领的预二师的兵没有过三道拐，否则狗在那里设下的那些机关就整了自己人。听到枪声，排长的第一个反应是：糟了。他分辨出这是机枪和日本步枪的声音，在敌后这么长时间，随时和日本鬼交火，这步枪的声音他太熟悉了。山寨里的人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老百姓，仅凭一支步枪和那些柴刀，交火的结局只能是悲剧。他赶快询问赶马人，要求以最短的时间走最近的路赶到那里。赶马人熟悉这片山林，他们甩开了弯弯绕绕的驿道，寻了毛路，顺枪声暴起的方向走切线径直奔去……

晨曦中，伐木场里景物已清晰可辨，那堆篝火还在燃烧，四处静悄悄的，淡淡的雾气在林中飘荡，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小山寨的汉子们和那个预二师的兵犹豫着走进了伐木场。预二师的那个兵隐隐觉出了些许不对，他正要招呼大家，机枪就响了，随子弹射入人体的噗噗声，有人倒下。这些只有寨子之间开仗火打冤家经验的山里汉子，发一声喊，挥舞着手中的柴刀竟迎着子弹扑了过去。趴下！快趴下！预二师的兵声嘶力竭地喊，见没人听他的叫喊，他赶忙端枪射击，篝火旁射来的一粒灼热的弹头，高速旋转着钻进了他的脑袋……

10、

枪声与呐喊震醒了狗，他探出头去，正看见晨曦中那些挥舞柴刀扑过来的汉子，他们中不断有人被打倒。狗急了，他死命拉动棕索，可受伤的腹部使不上力，原木堆下的楔子纹丝不动。狗低头抓住冲担时，目光扫过那被劈碎了头颅的日本鬼腰部。手榴弹！他从那做诱饵伏击他的伤兵那里知道怎么用了。他把那两颗手榴弹抽出来往后腰一别，直奔那楔子而去。放置在楔子根部的手榴弹盖拧开了，狗一拉弦，身子同时向后滚去。轰——爆炸激起的巨大声浪在林中回响，原木堆雪崩似地坍塌了，呼隆隆翻滚着冲向那片空地。枪声停了，窝棚垮了，炮弹箱倒了，篝火旁的日本鬼被撞得飞了起来，坠落到了老岩下。就是一瞬间，空地里一片狼籍，遍地横七竖八的原木别着翘着支棱着。狗摇摇晃晃爬起来朝空地走去，他在想，那炮弹怎么就没被撞响呢？看着满地的原木，狗觉得也不会有人逃出

这个灾难的。狗有些遗憾，他是闭了眼捂了耳朵等着那地动山摇的爆炸发生的。

三个没被打倒的汉子被滚滚而来的原木挡住了脚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他们惊呆了。血人一样的狗趔趄着走下坡来时，他们都认出了对方。汉子们想过来帮他，刚一举步，机枪又剧烈地响起，三人被悉数打倒在地。狗看见了，就在那翘起的原木后，一支枪管喷吐着红色的光焰，狗顺坡滚了下去，贴在了那原木的侧下方。那日本伍长已经疯了，机枪不住地响，弹雨泼去，那些已经没有了动静的身体被打得血肉横飞。狗不知道自己的人来了多少，可只要这挺机枪叫嚣着，就散布着死亡。狗拼尽全力爬上了那翘起的原木，居高临下的他看清了，日本伍长跪着，扭曲的脸在抽搐，狠命扣响支在原木上的机枪。令狗感到耻辱的是，机枪一侧翻倒着的子弹箱，正是狗的马帮要送去前线的，就是这些子弹击倒了小山寨的那些汉子。怒火中烧的狗双眼血红纵身而下，冲担同时刺去，运动中，身体一歪，冲担只浅浅扎入了日本伍长的左胸，狗一点不敢松劲，脚才站稳，他就抓紧冲担用尽全力顶去，将日本伍长顶得靠住了身后的原木。日本伍长在狭窄的原木缝隙里被挤住了双腿无法站立，只得丢了机枪，双手抓住冲担死命抵抗着。力量在这一刻平衡了。突然回复宁静的山野里，只有双方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冲担在扭动，在颤抖……没有人再向这边冲过来，狗明白了，这些汉子都死了。狗在心里对他们说，这些都是发了疯的野兽，不是山里打冤家的对手啊。狗悲愤交加。受伤的左臂使不上劲了，腹部的伤口热呼呼的液体一股股地涌出，冲担在逐渐向狗的这边移动。那日本伍长竟腾出一只手伸向了机枪。狗拼力一顶，冲担在满是血与汗的手中滑动了，狗一咬牙，以右胸顶住了冲担，那尖锐的铁尖刺入了皮肉，冲担的移动停止了。重获平衡的狗飞起一脚踢开了机枪，脚下一晃，身体一下滑坐到原木上，身体的重量猛地由高向低压去，将日本伍长重新抵了回去，冲担也更深地进入了双方的身体。狗前倾着身体坐在原木上，圆瞪着的眼睛红得就象马上就要爆裂的血球，那里面熊熊燃烧着的怒火任何人看了都会胆寒。日本伍长终于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他在心中猜想过许多次的敌手了，他认出来了，马锅头！竟然是他撵着人数十几倍于自己的日本押运分队追打几十里，并把他们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这样一个山野村夫在大日本皇军的脸面上一再地甩着耳光。狗感到后腰被硌得很疼，他突然想起，后腰还别着一颗手榴弹。这一发现令他振奋。他以右手和胸暗自加力，左手飞快地抽出手榴弹啃酒瓶盖似的揭了弹盖，这动作一气呵成，当手榴弹弦在弹把上晃悠的时候，日本伍长才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这时，哗啦啦一阵响动，旁边的原木后站起一个人，他眼镜斜挎着，满脸污血和泥巴。一眼看见举着手榴弹的浑身是血的狗，极度恐惧的他呆了片刻，竟号啕了。一点不汉子！狗在心里骂，竟没有鄙夷他的感觉，反而心生怜悯。狗回过头，对那日本伍长努努嘴，日本伍长低头按他的示意看去，大惊失色：他身下是几颗撞碎的木箱中滚落的炮弹，其中一颗竟然还在他的胯下。重新抬起头来的伍长面如土色，汗珠滚滚，便松了劲，冲担噗嗤地桶进了他胸膛。狗伸出舌头把手榴弹弦慢慢舔入口中，低沉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奶奶，这个日本官算我孝敬你的！一拉弦，狗顺势翻下了大原木……

湛蓝得没有一点杂质的天空下，群山怒涛一样汹涌着铺排到天的尽头，山浪排空处，太阳升起来了。这是一轮高原的太阳，炽烈而直白，一露头便将她那灿烂的笑容袒露无余。连绵多日的雨水把她的面容浣洗的白亮清爽，明

媚的阳光在通透的空气中一无遮拦地泼洒在这片大山上。

一柱柱光束穿过林荫的缝隙落到了林中空地上，光柱中有白色的雾气在袅袅上升，那些飘动着的细密的晶体反射着太阳的颜色，流光异彩。一条光柱落在狗的脸上，他紧闭着的眼睛感受到了阳光，他看见了小山寨流水潭瀑布上空的彩虹，那莲藕般白嫩的手臂窈窕的身影和那好看的眉眼呢？狗仿佛置身于那温润的流水中了，浑身的毛孔尽数张开，真舒坦。那温润跑到了脸上，一下又一下地蹭着，哦，那是流水潭边的大竹林里那张汗湿的脸？抑或是那泚到脸上的尿……一声嘶鸣传来，把狗从昏迷的幻觉中唤醒，他极力睁开眼睛，就见白蹄子粉红的舌头又向他脸上舔来。马日的，还记得找我？狗伸手拍了拍马脸，白蹄子一曲腿，在他身边卧下了，扭头咬住狗那破破烂烂的褂子往起扯。狗艰难地翻动身子，几经周折才趴上了马背。白蹄子驮着狗走出伐木场，阳光一下撒遍全身。白蹄子停了脚步昂头嘶鸣起来，狗勉力抬起头，前面有雾气在山间飘过，隐隐约约，亦真亦幻，赶马人和许多的兵正朝他跑过来，象踩着云似的，飘飘忽忽……狗四处环顾着，红土、绿树、白雾、蓝天，还有那条环绕着大山反射着阳光的白练似的大江。这片大山里再也没有丑陋的日本鬼了！想到这里，狗激动了，他要告慰他的亲人、他的乡亲，他大声地喊着他们。他喊奶奶，喊翠儿，喊狗儿，喊老财迷，喊老寨主……

狗并没有听见自己所发出的一丝声音。可这时，山林中一声清脆的鸟叫声却清晰地传入了狗的耳朵里，在寂静的山林里是那么响亮，那么真切。狗的眼泪在这一刹那如破堤之水，汹涌而出。

2005-6-14

孙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倾听草原

——赏《内蒙古青年合唱团演唱专集》随想

人有一个肉体实在是一件尴尬事，一生中的多数精力都在为它服务。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就曾饱含屈辱地写到：“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伺候肉体的我总有一种想把肉体拉离尘世攀缘绿色的深刻冲动，也许，它源自我那一直缺少归属感的流浪的孤独的不得不生活的却一定要面对新旧天性持续中的内在冲突的内心世界——在乡下以为自己是城里人，返城了又感觉自己是乡下人。也许，我就是城市里一片穿着裤子的云吧……

其实，作为城市里的一片云，我的冲动很深远，也很平实，因为我时常想到的还有不要肉体实在可怕——除了男欢女爱的要义，最可怕的莫过于不能用眼睛看风景，或不能用耳朵听音乐。尤其是在现代都市中人充满了自己是机器的感觉时，不能倾听那种绿色音乐，不能倾听那种先让人还原为人，进而又让人的灵魂顷刻间实现美妙飘飞的音乐的时候，活着的意义锐减。

倾听。将手枕在脑后，闭上眼，身体放平伸直，预备着一切感觉的彻底激活——

是了，这就是草原了。男低音四度空阔的和声以ppp悠缓地漫漶而来，好似至今我总琢磨不透何以能在一个声带上唱出两个音来的草原上会唱“呼啦”的歌手悠然拖出的长音。绿波涌来把心的戈壁浸染，胸中绿意柔软飘飘荡荡……

是的，是草原！男低音的背景下蒙族“长调”的旋律出现了，那是独具特色的三度四度的颤音和音程距离跳跃极大而又绵长婉转自由的旋律。就这样，草原在你心灵中如海市蜃楼般出现了：无际的蓝天绿地独行的云雀结队的雁阵白云似的羊群和羊群似的白云以及象白云一样流浪的我在辽阔中做着复调般地游走……草的芬芳奶茶马奶子酒的香甜干牛粪烧出的炊烟甚至“皮得勒”的腥膻……绿毯上绚烂着的花儿散落着的毡房挤奶的女人放牧的汉子还有黑骏马和牧羊犬……一齐鲜活着蠕动着了！

来了来了，得得的马蹄声，吱呀的勒勒车，这是“短调”的音乐，是婚礼时的“好来门道”，是“好来宝”艺人的“乌力格尔”，是宴会上的“酒歌”，是“那达慕”大会狂放的舞曲……。哦，慢点，再慢点，把节奏放宽一倍吧，象晨曦初露时赤金遍布的天空，象被落日烧呈熔融状的地平线……。草原夜色里，那星光下流淌着的淙淙乐声是民间艺人“瞎子铁钢”那有着四根琴弦的胡琴还是齐"宝力高那被称做“绰尔”的马头琴？是母亲唱给孩子的催眠曲或仅仅是马背上前仰后合的醉汉信马由缰的哼唱？

辽阔！辽阔得有如在这个城市里属于我的那张床——我放飞无际倾听草原的地方。

蔓延！绿色无边，蔓延过这片水泽，图染着山川纵横。极目远眺，群山如浪……

不，那不是草原，那不过是山顶的草甸。“牛儿还在山坡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在树下，那领头的黑牛栓在老杉树上就不怕其他牛走失，只要割一堆草给它就行。大面仰天放翻自己，叼根草棍数寥廓，哼《眺望》，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喊《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山歌飘来，那是上山搂松毛的女人们。对歌？便对，不是对手，就脑羞成怒用山歌调子将粗话一堆唱将出去，随即，草甸边的树丛里骂骂咧咧冲出挥舞着蔑耙的小媳妇大姑娘。不敢迟疑，上树！树上，满眼葱绿。

是这样见识的辽阔。谁想到那撵山狗竟扑了只肥硕的兔子叼来。把手圈在嘴边“欧吼吼——”一声喊，彝家老黑就赶着他的牛来了，一堆火一只兔一壶酒，把脖筋挣得粗紫唱熏熏酒歌，醉倒草甸。朦胧中感觉有吻，回吻，睁眼却见狗脸。起身抬头，顿时目瞪口呆：岚气填平了山坳连成一片，山头有如岛屿，如血的残阳酽酽的赤红浸天透地，眼前，是广袤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滔滔血海。是那种触目惊心的赤红，是那种憾人心魄的广袤。那一刻，我胸中轰然响起的旋律，竟然是那台破旧的手摇唱机放出的交响诗深厚宽广的大提琴solo——《嘎达梅林》。

感谢那些被扔到大街上却丰富了我人生的“封、资、修”的文化“垃圾”。

便以为这就是草原了。大张双臂，闭上眼睛，任身体似自由落体扑倒，把头拱入绒绒绿地，草与泥土的气息立时沁入心脾。于是，噪音废气以及满眼满心的拥挤和浮躁在渐渐遁去，平静了，踏实了，长期紧绷的身心放松了。那个百思不得其解长期困惑我的我是谁这类蠢问题，就在这个因故意踩踏绿地而被罚款的下午找到了答案。交纳罚款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的那些早逝的知青伙伴为什么要把那里作为长眠之地，那是因为曾经生机勃勃的青春溶入了生机勃勃的绿野那绿野的基因就从此溶入了生命。不用再问“我是谁”了，我是乡下的城里人，城里的乡下人——边缘人。我比其他人更需要绿色！我为绿色而冲动！

如《小河淌水》与《森吉德玛》，如《放马山歌》与《牧歌》，如《嘎达梅林》与《云岭音画》……。这个高原满是崇山峻岭的雄浑而那个高原却是一无遮拦的坦荡。跌宕起伏的大山没有孕育出大起大落的音乐，三度四度的旋律进行却不失山的深沉；而草原音乐却动辄以七度八度的大跳，来表现她一望无际的厚重。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

表现出了明显的地理特征上的差异，但她们却是一样的高亢豪放雄浑深刻而富有激情。是一样的，一样的啊。你听：这就是烈日下江边滚烫的石滩上纤夫的“号子”，这就是月影摇曳的蕉林中缠绵的“葫芦丝”，这就是“阿细跳月”，这就是“目脑纵歌”……。同样，又何尝不是贝多芬的田园？舒伯特的夜曲？萨拉萨蒂的吉普赛？勃拉姆斯的匈牙利？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

喧哗的白昼走远了，灵魂在幽蓝的天堂里重读素朴、宁静、温暖……倾听草原，那种美竟让人把呼吸都屏住了。可以有这么美伦美奂的人声吗？是英国《牧歌》的现代版？抑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帕里斯特里那”在东方辽远的回响？

那如火如荼、如风如虹的《八骏赞》，神思飘举武性勃发中我仿佛身处鄂嫩河畔肯特山麓，怎样急驰着八匹骏马？烟沙浩瀚中分明是一代天骄铁木真在奋勇奔突。谁说海洋皇帝只识弯弓射大雕？无限自豪的旋律中告诉我的正是对神祈的膜拜对历史的尊崇对逝者的怀念对爱情的追求对英雄的赞颂对未来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倾诉不尽的大爱如同萧邦之于波兰、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之于罗马尼亚……。

在两张薄薄的光碟里，那旋律的线条和声的织体交错的复调如此完美的合唱表现的是一种境界，是魂魄，是不离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这个孕育了圣主成吉思汗的马背上的民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热爱、对草原故土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从草原汉子美丽其其格的曲谱里、从舍拉西老人的马头琴声里、从德德玛腾格尔直至一切草原上歌者包括“草原恋”知青合唱团的歌声里都可以得到诠释与体会。那是从心里流出的旋律：

“……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马背啊马背我生命的摇篮

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

你用深情的歌声为我催眠……

牧场啊牧场我智慧的源泉

马镫啊马镫我人生的起点

你用闪光的格言把我教诲

你用凶猛的风暴将我锤炼……”

用心去倾听，倾听草原，任喉头哽咽心尖颤抖泪流满面，这种美的强烈的震撼和感染，使心灵净化、情感升华。

惚兮恍兮，不知身在何处。那是我们当初那么迫切要离开的那片绿野吗？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我们付出了比其他人群要大得多的代价，我们如愿了。然而城市没有草原，没有绿野，没有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没有猎猎长风般的高原豪壮，没有能让万物自由张扬的辽阔，曾被绿野滋养过的生命在委顿，血液的热度在降低，鲜活的心在异化为坚果……但在那片新绿的起伏中，我的心告诉我，那片绿野赋予的基因始终在本能地、不甘地顽强抗争。当我终于不再问自己：你是谁的时候，我就十分地庆幸我是“边缘人”，我的心中还保有那片绿野的辽阔，我还有肉体的能力心灵的余容，去触及自然的脉搏感受造化的神功倾听人性的欢歌……

云蒸霞蔚、春风化雨，一种新的创造性的人生精神随着浓浓绿意向我吹拂……。

摄影banjin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歌曲辨析

——搜集整理知青歌曲编撰出版《青春咏叹》的思考及其演进

（2014年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论文）

2011年12月，距第一集知青歌曲集《青春咏叹》出版14年后，续集终于出版。加上出版第一集耗费的时间和之前多年的搜集整理工作，在这条路上，已然走过了二十余载。对知青歌曲多年搜集整理的积累以及伴生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虽然这些思考多出于对歌集出版的体例、构架等方面的考虑，但对大的抑或是总的知青歌曲的产生、发展的走向及其分类，以及知青歌曲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有了一个较为整体性的思考与评价；由此再将这些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对生存境遇的描摹、对心境诉求的抒发的音符以及文字，当做塑造材料有机结合于歌曲集，试图以此还原出知青一代人过往及现代的音乐群像。这与简单地收集一些相关歌曲做一本歌曲集，有质的区别。这是我做这两本知青歌集的总体考量。如果因为这些思考而能引发对知青歌曲更多的研究，善莫大焉。

采集知青歌曲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个疑问——什么是知青歌曲？继而追溯到关于知青的资格、称谓的问题。

对于知青歌曲的创作传唱的主体——知青的界定，是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温和号召前后，还是在“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运动式的发动后？这一界定，似乎关系到知青歌曲的界定。在整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歌曲时，也经常会自问：这是知青歌曲吗？然而，当知青歌集《青春咏叹》出版以后，直接的发问反而不多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歌集的结构悄然模糊了“知青歌曲”的认知与界定，使其外延扩大化了。

以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为例：歌集收入歌曲300余首，篇章结构与1998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同名第一集相一致。除去“引子”（前言）和“尾声”（编后），主部有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热情奏鸣——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有关知青题材的歌曲，充满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激情。反映了知青当年所接受的思想教育的背景，以及他们上山下乡时的主流思想状态。

第二部分：悲怆咏叹——知青自创或疑似自创的、在地下流行的歌曲。此为续集的主要部分。是狂热的理想与

真实的现实碰撞产生巨大反差后，少年人心中真实情感的反映，体现和反映了知青当年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

第三部分：生命宣叙——当年在知青中传唱的中外歌曲和港台流行曲。是处于“文化沙漠”中的少男少女们在经历了生活和心理的大跌宕后，对美、对人生及对未来的憧憬、向往、探究，使他们无意中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美育。

第四部分：青春回旋——后知青时代的歌曲作品。是业已步入人生秋季的“知青”对岁月的品味、对人生的感悟、对青春的追忆。多为创作歌曲。

这四个主部，大致反映一代人相同的身历和心历，勾勒了知青的音乐群像。大约是对这四个部分的认同，异议少了，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又红又专接班人”思想的必然延续，探寻其发展脉络并非本文的主旨；而知青身份的认定，显然与本文关系甚远。我只根据搜集的知青歌曲的内容，结合中国知青史的纵向比对，以有着显著历史阶段特征的时间点，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50年代到60年代中后期。以董家耕、侯隽、邢燕子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包括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城、云南新城农场及各地“青年垦荒队”；

——1968年12月22日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

——1978年云南因当年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后引发的“大返城”风暴终结上山下乡运动至今。

在这三个阶段中产生的与知青有关的歌曲、或知青创作的歌曲在许多方面显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这三个历史阶段有着非常明显和密切的联系。与此相关，知青歌曲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官媒与民间流播的同一；官媒与民间流播——公开与“地下”的背离和冲突；官媒与民间流播同向共存、交融的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倡导与号召的“上山下乡”。以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为佐证。既是号召，就是可以有选择的，以自愿为主。不排除会有其他情形，但非主流。当年知识青年的称谓涵盖也相当的广泛，基本囊括了城乡各行业具有中学以上甚至小学学历的青年。

当时的文化生态处于建国后较宽松的阶段，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追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具有较之以前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文艺繁荣。歌曲的创作、引进、传播与人们对歌曲的需求和选择，是相适应的。此时歌曲的创作流播，官媒与民间是同一的。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我们走在大路上……”

这洋溢着革命热情和青春活力的歌声中，回荡着祖国的召唤，高扬着理想和信念的旗帜，承载着父辈的企盼。青年垦荒队员的行列合着歌声的节拍，奔向边疆农村，去“占领山头，开发荒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社会主义新农民”，建场、办场、插场插队，为理想献身，以“唤醒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模样”的气魄去实践报效祖国的誓言。这些知识青年的先行者，是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青春偶像。他们的歌已深印在他们后继者的脑海内。

这一阶段的歌曲选入《青春咏叹》第一部份里，是以知青为对象，为知青或包括知青在内的“革命青年”所创作的歌曲。其中“革命青年”与“革命知识青年”的外延是有差异的，但那时对知识青年定义的范围宽泛，并不专指到农村的那部分。实际上诸如“高举革命的大旗”、“一代一代往下传”等，不仅是知青们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时候高歌的，也是这代人在建国后的体制内教育中刻划下的深深的痕迹，唱这类歌其实也是“主动”的选择。

这一阶段的歌曲显现的特征是：

1.来源——由我国专业词曲作家创作的歌曲、戏剧选段，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歌曲，鲜有知青自己创作的歌曲；

2.流播——广播、歌曲刊物、电影、戏剧等主流媒体与民间传播的歌曲，在内容与范围等方面都基本一致，形式上有群众性歌咏活动、歌曲刊物和手抄歌本、口口相传等；

3.情绪类别——以蓬勃向上情绪激昂的的歌曲和优美流畅的抒情歌曲为主；

4.内容——号召并激励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反映青年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歌曲，包括一些外国爱情歌曲。

曲例：

纪录片《军垦战歌》的插曲　贺敬之、郭小川、袁鹰、田歌

歌曲“高举革命的大旗” 李劫夫

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朱践耳

电影《年轻的一代》插曲“我们是年轻的一代” 陈耘、赵明、萧珩

豫剧《朝阳沟》选段　王基笑、杨兰春

（二）

第二阶段，成为了运动的“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上山下乡运动”，国务院以下各级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知青办。运动的推行是强制性的。不排除个体的自愿的行为，而大多数人的“自愿”与上一阶段的自愿已有质的差别。此时知识青年的称谓已定位于到农村、农场插队落户的城镇青年学生，“知青”成了他们既非学生也非农民的职业定位，地位也不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而跌落为中国社会最底层——被“贫下中农”教育的对象。

1968年的文化生态已非常恶化。一片肃杀凋敝，几乎所有中外文艺作品都因被打成“封资修”而被封杀；大批艺术家被打倒遭受迫害。歌曲的创作与传播，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民心相背离，已呈现出“地上”与“地下”两个时空并存的状态。具有强力组织机构、掌握公共资源的主流媒体与“地下”流播的歌曲在内容上的截然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地下”流播的歌曲遭受打压，作者、传唱者遭受迫害。以“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作者任毅所遭受的迫害最为典型。

在这一阶段，清楚地显现出两类知青歌曲的鲜明对比。对这一阶段的知青歌曲形式与类别作辨析，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

许多文革中专门为动员知青下乡而创作的歌曲，收录在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的“热情奏鸣”的章节中。这些歌曲是为了配合上山下乡运动而组织的各种“编写组”、“创作组”创作或“集体创作”的。运动初期，还来不及创作新歌曲，就选择一些在群众中传唱较广的老歌改词，以应急需。最典型的是朱践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经“集体改词”就专属知青了：“……革命的青年，无限忠于毛主席。打起背包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志不移。到广阔天地中接受锻炼，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仅歌词，旋律也因改词的原因有所变化而显得有些怪诞。这些文革意味浓厚的歌曲虽然喧嚣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但由于文革对人类社会及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反动，因此它们在那个年代歌曲流播的“地下”——人民心中是没有地位的，因此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

官媒传播的歌曲，以专业词曲作家为主；民间流播的歌曲大多是业余作者。因此，从歌曲的创作技法上来说，民间流播的知青歌曲刚开始出现时，量虽然较多，但大多都很粗糙，一方面是真正的原创并不多，且遵循创作规律

有章法的尤其少。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改编歌曲，但改编的水平不高。这和绝大多数知青词曲作者缺乏相关专业的知识与训练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类歌曲抒发的是知青内心的真情实感，描写的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音乐表达的是人类的思想感情，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知青歌曲就是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是知青思想感情的真实表达。真实，即所谓“胸有块垒以歌扬之”、“劳者歌其食”。这些产生于狂热、困顿、迷惘、苦闷之中的知青歌曲，所记载的信息、表露的情感是客观的，与文字有所不同，它不因岁月流逝而发生变化，并不受后来主观因素的影响，不会因大脑皮层接受的其他信息而改变，这使得它具有了原生态的不可变性。在这点上，它与“化石”、“文物”是一样的。抢救与发掘，于历史、于后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青歌曲，尤其是“地下”流行的那些被斥为“黄歌”、“反歌”的，是那个年代唯一实现了上述音乐社会属性的，与文革“高、强、响、硬”假大空的歌曲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知青歌曲反映的是知青一代人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剧变的真实记载，是他们历经磨难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的真情表达。在少年向青年过渡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侯遭遇的颠覆与重创，深刻且深远地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及价值观念。同时，知青歌曲也是那个年代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佐证。知青歌曲感情真挚，通俗上口，贴近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感情，为当时乏味的音乐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流，在地下传唱知青歌成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时尚，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流行音乐的先河。那些或哀惋、或怨愤、或调侃玩世不恭的歌曲，无不在置疑、反叛着那个年代。它与当时在地下涌动着的读书思考的暗流一样，成为了变革前夜的准备与铺垫，尽管它更多是出自于自身感情抒发需要而产生的。

<u>关于内容分类</u>

“最新指示下达后，马上就要别故乡，

告别亲爱的战友们，知青就要去远方。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锻炼成长。”

在文革意味浓烈的歌声中，知青们出发了。他们满以为能像铲除“封、资、修”一样，将千年积淀的贫穷落后打个落花流水，满以为只要“经风雨见世面”，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尽管后期下乡的“新知青”已明白这一运动是怎么回事，但那早已溶于血液中的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由此而生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仍是最本真、最原初的动机。为此，他们注定要承担这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危机与压力，这是他们的宿命。

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反差、曾经叱咤风云的小将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知青经历了理想、信念、追求、精

神、欲望的破碎和无所皈依，那被心如死水万念俱灰的幻灭感咬噬着的不甘幻灭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拒绝沉沦而又无法抗拒不得不沉沦。这是少年到青年转折期心理生理成长、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遭受的重创。“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胸有块垒，以歌扬之。知青歌曲就是在岁月之河的大跌大宕大起大伏大悲大喜大波大澜的落差中产生的。

思念故乡和亲人是知青歌曲的第一主题。被抛掷异乡颠沛流离倍尝人生艰辛滋味的人们，对故乡亲人产生了刻骨的思念。“南京知青之歌”、“武汉知青之歌”、“告别广州”、“山西知青”、“沈阳啊沈阳”。“……望断X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梦魂何处归，空有泪涟涟，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园家乡……”泪浸思乡曲，亦歌亦泣。“回家”这一渺茫而又固执的念头几近成为人生的唯一要求。在这一主题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自伤、自残、自杀的血泪惨剧，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忍辱含垢有幸病返、残返、困返的知青的心灵和生活，从此坠入了一个难醒的恶梦。

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知青生活及其歌曲中，是苦涩辛酸的。那时的知青恋爱属被禁之列，受教育的少男少女们一下乡几乎都要接受类似训诫：“……知哥一下车农二哥就说……第三不许谈恋爱，免得在农村走不脱。”客观上回城、就学、参加工作的政策规定前提之一就是未婚，这些青春男女的婚恋大多陷于欲爱不成，欲罢不能的境地：“知哥知妹心一条，可惜我们命不好，等到哪年能回城，那时再把朋友交……”，“不是我不爱你，实在是没法爱呀，我的小妹呀”。那个时代变态畸形的婚恋观将爱情与“黄色”绑在一起，以高涨的热情对知青的恋爱予以特别“关注”，由此引发了不少因捆绑批斗、示众游街导致的精神失常、自尽等事件。即便是已婚知青，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困窘的生活苦不堪言，有的返城时又被迫离异。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后面都有凄美、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在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中的“娜娜之歌”、“惨然的微笑”等歌曲后面，都附有相关故事的文字。“锁链”、“一封来信”的背后也有着十分纯美的故事。那个年代里知青歌曲中的那些爱情故事，真的可以单独成书。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正处于发育阶段的知青们的饭食确实淡寡量少，笔者有过把农民埋了的瘟牲连夜挖出来烤了吃的事情，探家时还曾有过上桌不用菜一气五大碗的记录，令弟妹瞠目结舌父母泪水盈眶。于是知青们便常有精神会餐，一曲“成都小吃联唱”：“钟水饺赖汤圆龙眼包子担担面……”唱得口中清水滚滚，腹内饥声隆隆；还有“稀饭是铁，干饭是钢，稀饭没有干饭香！”等等。

对于那个疯狂时代的荒唐、愚昧、丑恶，知青歌曲极尽嘲讽讥诮嬉笑怒骂，有诙谐调侃的“知哥下乡”；有反话正说的“幸福谣”；有嘲己喻世的“楼上情歌”、“知妹的丈夫”等。“……光棍子光，光棍子一天到晚忙又累啊，下工啊没有一个热地方。人家的姑娘小子白又胖啊，光棍子没有媳妇多悲伤。光棍子光，哈！”

精神的压抑和物质精神的极度贫乏，使知青对文革歌曲、样板戏、语录歌产生了排斥情绪，叛逆者们一把扯去了“黄歌”的封条，率先解放了大批中外歌曲。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偷听“敌台”——澳广，超前地“享受”了

港、澳、台的流行曲。此举各地知青是惊人的一致。

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已穷途末路，各种社会矛盾交集冲突，引发了“大返城”风暴，罢工、请愿、卧轨、绝食、集体下跪一发不可收。此间，一些情绪悲壮、控诉性质的歌曲产生了。“北上请愿歌”、“恨气歌”、“望乡曲”等等。它们的产生，表明当时知青政策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不可遏止的民心所向决然击破了文革定势思维的桎梏。还有，在惨烈的热带丛林游击战中飘扬的绝唱……（因审查原因没有收入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那些穿翻领军装戴红布五星的年轻的身影，成百上千地隐没于边境那边的热带丛林，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知青中的这一人群因其特殊经历，与 “大返城”一样，成为塑造知青音乐群像材料中“刚性”很重的元素。这些刚性元素如果完全去掉，知青的音乐群象：除了狂热躁动，就是哀怨诉说——神经质的怨妇而已。《青春咏叹》续集出版的审查经历4年，“大返城”的内容终于得到审查部门通过，但“参加世界革命”的知青内容的缺失，依然是一大遗憾。）

关于知青歌曲的创作

《青春咏叹》第二部分歌曲里，有原创或疑似原创的、有借曲填词的、有只改动个别字词原样照搬的。对于原创来说（如任毅《南京知青之歌》）称为知青歌曲不会有什么异议；采用借曲填词的歌曲的量是很大的（如几首用朝鲜歌曲“异乡寒夜曲”填词的歌曲；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插曲填词的“沈阳啊，沈阳”；民歌），因为其歌词的创作，我们也姑且称之为知青歌曲；而第三种情况如贺绿汀1936年为电影《古塔奇案》创作的歌曲“秋水伊人”。“蓉城知青歌”，只将“伊人”二字改动为“妈妈”其余皆原封不动直接“借用”。在那个年代，因了两个字的改动，使知青们在尚无能力自创歌曲的情况下，意外地有了意境贴切、抒发思乡思亲情感的载体和情感宣泄的管道。这种情调的歌曲是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绝大部分知青在文革背景下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30年代的歌曲，至今认为是知青歌曲。今天从严谨的音乐史学、著作权法、文化道德等方面来判断文革背景下的行为，显然不合适。所以无论是原创、借曲填词或“借用”的歌曲，反映的是当年知青的音乐生活，是符合归类条件的。

从曲谱方面看，值得一提的是知青们采用接触到的民歌，以及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以来创作歌曲音乐语言材料的积累，改写或创作的歌曲。一类是填词后为了协调词曲间的音韵关系而作的个别改动，譬如“邕江之歌”（南宁知青之歌），分别采用了新疆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和另一首知青歌的旋律交替出现，并无新的发展，今天来看，有把歌唱“串”了的感觉；一类是运用民歌或某创作歌曲的某一动机或乐句，发展出乐思完整，逻辑清晰，结构规范的歌曲。譬如知青歌曲“从地角到天边”就是用纪录片《红旗渠》插曲“定叫山河换新装”的第二乐段首句 5 5 | 3? 5 | 2 1 7 6 | 5 - | 发展而来的；“一封来信”虽有“秋水伊人”的旋律特征，但它的改动却很合乎旋律作法要求。据此我以为，前一类属于借曲填词，后一类应归于创作的范畴。

填词的方式在古今中外歌曲中比比皆是。也是知青歌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首借用乌克兰舞曲 3 3 2

｜1　　1｜2　2 4｜3 2　1｜……填词的“幸福谣”词很有水平：“幸福幸福真幸福，风吹我的白屁股，裤子破了无人补，凉快又舒服。”在你哂然一笑的时候，紧接着话锋一转“幸福幸福真幸福，洋芋包谷白水煮，一日三餐难果腹，越吃越迷糊。幸福幸福真幸福，思念家乡老父母，心上姑娘在何处？有泪流不出。幸福幸福真幸福，背朝苍天脸朝土，修理地球知青路，不识归乡途。”在笑着流泪的黑色幽默中，把知青生活和心理状态唱了出来。民歌中的山歌小调自古就是应景填词，许多知青歌就是这么来的，用陕北民歌“女儿曲”填词的“人家的亲娘在眼前，我家的那个亲娘在天边；上山下乡一年又一年，不知道那个何时能团圆。我问那可怜的小羊羔，是你还是我可怜？双双可怜，女儿啊”。还有“知青点夜话”、“恋歌”等等。

还有大量的以城市小调为主要特征的知青歌曲，它们“疑似原创”的意味很浓，大多都有民歌的明显痕迹，一段体、二段体较为多见，以分节歌形式，配以多段歌词来表情达意。如“知青八唱”、“知青苦”、“知哥下乡”、“昆明知青小调”，还有知青返城后出现的“沈阳知青小调”、“诙谐小曲”等等。这些歌曲里面，也有一些叙事性的歌曲，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封来信”等。

“很多原创或改编，填词的知青歌曲，显示了知青们已经有许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苦痛、自己的梦想，不再由别人的作品代为表达。这些歌曲可能粗糙，稚拙，灰暗，痞气……但那恰恰是他们当时最真实的状态。知青的觉醒，就是由正视自己的现状、自己的内心开始的。如果他们从1966年开始，一直都万众一心豪情满怀唱着那些成人们给他们写下的红色战歌一路高歌猛进到如今，那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胡发云知青歌集《青春咏叹》前言“那些难以忘怀的歌”）

关于知青歌曲流存状态

知青歌曲流传很广，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知青点听到它们，可以在劳作之余的任何场合看到这种“精神会餐”。“××知青之歌”甚至可以小到“营口知青歌”、“丰镇战歌”等。有的则干脆把别处传来的歌，用本地标志性的河流山川或建筑填进去了事，反正知青的情绪情感是一致的。“文革”是一个文艺畸形繁荣的时代，知青里很有些能歌善舞摆弄乐器的。口琴、吉他、二胡、提琴、笛子或手风琴。凡有知青聚集歌唱的地方，必有一方的“歌把子”，甚至有携一件乐器四处流浪的近乎专职的游唱歌手。也有“比歌”的时候，却是绝对友善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歌为心声，重在互通有无的交流，“比”就显得次要了。

散文《旧日旋律》生动再现了这样的场景：“……当天边的火烧云将大山染红的时候，知青从四处踅来，月兔初上，‘音乐会’就开始了。音乐会的开始通常是这样的：某乐手信手拨弄出某个旋律片段，随即就有人声跟上，那轻声哼唱的群声效果，至今也还没有听见象那时那样打动我的。一时间，乐声歌声随淡蓝色的岚气飘荡开来，又随波光粼粼的河水流淌了去……。音乐会没有演员观众之分，无论技艺如何，都能出节目，也可随意地点别人唱奏。独唱、重唱、齐唱、或器乐演奏，即使五音不全也可随声附和地哼哼。在那个场里心与心、心与音乐是没有距

离的。……记得那年的中秋之夜，回不了家的知青相约河畔。当银盘似的月亮升起时，思亲之情一下摄住了人们，一曲《知青之歌》令所有人潸然泪下哽咽唏嘘。天公似乎也受了感染，月亮躲进云层，秋雨淅沥撒下……。”

如此情形，你还可以在列车上、在城市街巷公园、码头车站、在任何有知青聚集的地方都能看到。许多人的音乐素养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的再教育，这是‘再教育’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原创或疑似原创的知青歌曲作者，在文化专制的高压态势下，他们中一些人的噩运其实是对现实的凶险不设防而遭遇的。他们太年轻了。1969年，南京批判两首“反动歌曲”，就是知青歌曲代表作任毅的“南京知青之歌”和吴庆生的“插队的人归来”。相对于任毅，吴庆生的遭遇类似于“躺着中枪”。任毅的“南京知青之歌”是词曲创作的，而吴庆生却是用流行的“流浪的人归来”的曲谱，用自己插队的感受填词，并未署名，歌单扔床上却被告发了。都因为一首知青歌，吴庆生1969年被捕，判刑10年，1978年无罪释放；任毅1970年被捕，判死刑，后改为有期徒刑10年，1979年无罪释放。他们付出了9年牢狱之苦的沉重代价。无独有偶，编“青岛知青之歌”的三名女知青，被剃了阴阳头在青岛三百惠百货商店门口接受批斗，受尽侮辱；写“从北京到延安”的那名女知青也为此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也许正是因为了他们的前车之鉴，歌曲作者们为自我保护隐姓埋名，才使得许多知青歌曲的署名成为了“佚名”或“悲泪”一类的代用名。如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中的“广州知青歌”、“望乡曲”等等。

那时候唱歌也是要担风险的，因唱歌而被捆绑批斗关禁闭的都有，兵团（农场）因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则更甚。而知青们的反击也很有意思。有个拉提琴的知青对置疑他拉“弦乐小夜曲”的大队主任说：这可是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那主任忙改口说这姓莫的对毛主席的感情深。曾有公社干部置疑“在乌克兰原野上”和“三套车”是“苏修”的要追究，知青将歌中“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一句反复大声对他吼，并将此歌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联系，说“三套车”表现旧社会劳动人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一通似是而非论述唬得那人一楞一楞的。后来知青们竟说他“阻止知青唱革命歌曲”，把那干部吓跑了。

《青春咏叹》第三部份的歌曲，多是中外歌曲作品和港台流行曲，在知青音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个歌曲贫乏而又“繁荣”的年代，人们除了“革命”和被“革命”外可干的事不多，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客观上营造了人人参与的氛围，在“红色歌曲”日显乏味单调和虚伪的时候，尤其是青年人对自己曾投身或向往的“革命”产生怀疑甚至厌恶的时候，不甘沉沦的青春和年轻躯体里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了他们对歌曲的取舍，这些歌曲作品能在当年的中国农村获得“解放”并大肆流传，不仅得益于当时农村相对封闭，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更是由于知青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近乎本能的取舍，填补了他们的精神真空，在艰难困顿、孤寂忧郁的岁月里给予知青心灵的抚慰，苦闷与压抑获得了宣泄的通道。如果说对文革歌曲的抗拒是自本能至觉醒，那么对中外优秀的歌曲作品和港台流行曲的吸纳，却使他们意外而幸运地认识并接受了人类高尚精神成果的熏陶。

庆幸那个年代没有能够封完、烧光的诸如《外国民歌200首》那样一些人类精神文化的精华，给知青们以美的启蒙；庆幸那个年代我们还能拥有半导体收音机，可以让我们在山野被窝里领略到港台时代曲，认识邓丽君；感谢那些肩挎吉他、曼陀林走村串寨，冒着被批斗拘留危险的游唱歌手在油灯下的弹唱；感谢众多知青传抄的手抄歌谱歌本，在我搜集整理知青歌曲的日子里，它们的数量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那些年，幸亏有歌。若不然，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粗鄙？

这一阶段的歌曲显现的特征是：

1.来源——主流媒体大多是根据政治需要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大量歌曲、尤其是抒情歌曲几乎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禁唱。外国歌曲仅余《国际歌》等少数几首。“地下”流行着由非专业人士或知青创作和改编、填词的歌曲，也偷偷流传着主流媒体所禁唱的中外歌曲，港台流行歌曲。

2.流播——主流媒体宣传的歌曲传播范围是全国性的；“地下”流行的歌曲，尤其是知青创作和改编、填词的歌曲，只能在非公开场合传唱，流传范围受限。其传播途经主要是口口相传、手抄歌本和手抄歌单传抄、游唱歌手传唱；而跨地域的流播则是歌单的邮寄、逢年过节各地回城的知青交流的结果。

3.情绪类别——主流媒体以口号似的铿锵进行为主，“高、强、响、硬”为其特点，少有抒情的歌曲；“地下”流行的歌曲以忧郁低沉为主，诙谐调侃为辅。

4.内容——主流媒体以宣传说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扎根农村”服务；“地下”流行的知青创作歌曲（或疑似创作歌曲）则主要以思念家乡亲人为主要内容，爱情、诙谐、自嘲、诉苦的歌曲为辅。

曲例：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朱践耳 集体改词

语录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李劫夫

歌曲“革命知识青年之歌” 关庚寅 王秀兰

歌曲“南京知青之歌” 任毅

歌曲“插队的人归来” 吴庆生

歌曲“命真苦”、“知青苦” 佚名 王意超

歌曲“幸福谣”、“知哥下乡”、“光棍子光” 佚名

（三）

第三阶段，“上山下乡”运动终结。1979年1月22日，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暴以后，在云南昆明由国务院调查团主持，召开了有北京、上海、四川（含重庆市）、云南四省市参加的知青工作“昆明会议”。以此为发端，发生在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涵盖城乡，触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千万家庭，国家为之付出巨资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1985年国务院撤销各级知青办，“知青”作为一种职业身份已褪变成一个历史符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文革的藩篱与桎梏，顺应历史潮流，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文化与经济的复苏，使得文化生态迅速改善。这时的歌曲创作虽还继续呈现着“地上”与“地下”的状况，但歌曲内容与格调都在相互靠近，尤其是歌曲“乡恋”引发的有关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的大争论大辩论后，文化政策日趋宽松，包容性增加，对抗性减少，观念冲突日渐融合，处于共生共存的状况。

《青春咏叹》的第四部分，是“后知青时代”的歌曲。均是写知青和知青写的。经历农村、农场生活磨砺的知青返城，日思夜想的“故乡”迫于经济、人口、就业等压力，对于他们的归来勉为其难，他们感受到又一次失落。此间，原有知青歌曲在继续传唱，新的知青歌曲在不断产生，汇入当时中国正在突破藩篱而兴起的流行歌曲。如:主流媒体上由陈宜坤（内蒙知青）作词吴展辉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淡蓝淡蓝的马莲花”；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主题歌“一支难忘的歌”等；地下流行的如“诙谐小曲”、“沈阳知青小调”等等。

返城知青们发现，他们以血汗获得的农村生存技能与经验，返城后几近无用，他们即使拖儿带女也必须重新进学校、工厂从头学习城市生存所必须的技能，更何况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迫使劳动者技术技能提高以适应大量引进的新技术新设备……诸多压力下，返城知青们尴尬地发现：在农村他们被认为是“异类”，到了城市后，他们的观念、年龄与技能又使得他们成了新的“异类”。没有工作、夫妻分居……。这时候的知青歌“……盼星星盼月亮/历经风雨重回故乡/如今回家又怎样？/还不是父母来把我养……”饱含无奈。

80年代到90年代，返城知青在城市有了自己新的定位，被新时代的火热生活和日渐加快的生活节奏推动，当年的知青们投入了“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争做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潮流。那是从未有过的热情与投入。从那个年代真诚走过的人们不会否认，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一时间段里，“地下”创作和流播歌曲的现象消失了，归并到了已很发达、繁荣、也比较自由的传媒中。（例：团中央推荐15首歌、校园歌曲、港台流行曲）。

改革开放后，官媒与民间流播的歌曲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相互背离和冲突的烈度，逐渐减弱。逐渐达到了同向共存，相互交融。许多曾是知青的专业词曲作家不断出现，业余词曲作者创作的歌曲水平也在提高。反观主流媒体播放的知青歌曲的走向，风格特点也经历了一个从硬到软、从追求宏大到关注基本人性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的关

节点，就是80年代针对歌曲“乡恋”所开展的大讨论。“后知青时代”的歌曲，专业与业余词曲作家创作的歌曲作品，差距在逐渐减小，渐呈融汇状况。专业词曲作家创作的歌曲，主要出现知青题材的电视剧、电视片插曲，近几年来主要有《北风那个吹》插曲“那时候”；《知青》主题歌“曾经”；《静静的白桦林》片尾曲“山里的故事”电视片《胶魂》主题歌“何必要你记住我”；主题晚会《北大荒知青之歌》选曲“雪花飘飘”等。在《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王佑贵的“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让多少歌者听者都感概唏嘘泪泗滂沱。业余词曲作家创作的有电视片《我的知青岁月》片尾曲“永远的情怀”；歌曲“兵团战友”、“遥远”、“知青故事”等等。近年，各地知青组织的专题晚会里都不乏优秀的主题歌，譬如武汉知青的《我们曾经年轻》晚会、上海知青《我和我的祖国》晚会、云南知青《青春?红土地》、《知青故事》晚会、北京知青《北大荒知青之歌》、广州知青《岁月甘泉》晚会……等等。

如今，这代人已无可避免地渐次淡出社会主流，虽是晚风夕阳枫叶金黄，但那种平和从容深沉与厚重，恰似一杯岁月酿就的老酒，甘冽醇厚余味无穷。知青歌集《青春咏叹》·续集收集的最后一首歌“那时候”，如同当初听“渴望”、“好人一生平安”一样，闻之，浮想联翩，潸然泪下。

这一阶段的歌曲显现的特点与以前两个阶段都有所不同：

1.来源——各种媒体上以知青为内容写作的歌曲数量不是很多却一直不断，主要以电视剧、电视片插曲为主，普通创作歌曲为辅。民间主要是为各种知青活动、演出和知青刊物而创作的歌曲。这两方面的词曲作者都有专业和业余的，有曾经的知青，也有其他人士。数量上，民间的创作远远超过了主流媒体。

2.流播——随着各种传媒形式的不断增多，传播方式呈多样化。有关知青的歌曲都可在广播、电视、网络、纸媒传播。民间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

3.情绪类别——这一阶段的歌曲基本都以中速、深情、缅怀的速度和情绪为主，民间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尚有调侃、自嘲风格的歌曲在街巷流行，后期已归于一致了。

4.内容——无论主流媒体和民间，这一阶段产生的与知青有关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对青春的回望、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的喧叙，更多表现的是知青经历与祖国、民族命运的关联，比前两阶段的歌曲更有深度和厚度。民间对自身命运坎坷的倾诉的歌曲，进入90年代后就已经消失了。

曲例：歌曲“诙谐小曲” 佚名

歌曲“一支难忘的歌”电视剧《蹉跎岁月》主题歌　叶辛　黄准

歌曲“淡蓝淡蓝的马莲花”　陈宜坤　吴展辉

歌曲“我们曾经年轻”武汉《我们曾经年轻》晚会主题曲　胡发云　姚峰

歌曲“共和国同龄人”电视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插曲　王佑贵

歌曲“遥远”云南上山下乡45周年《知青故事》晚会选曲　孙伟

歌曲“往日时光”　克明　乌兰托娅

（四）

人类生活在不同历史的时代都经历着不同的精神本质，人类的精神史就是这样连续构成的。这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也不是想掩没就可以掩没的。不可以想象历史的链条能缺了哪一环，历史的长河没了哪一段。对知青歌曲的研究是对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对共和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山下乡”三个历史阶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和国60多年来所经历的风雨与坎坷，作为人民的一部分的知青始终与共和国同命运。在“上山下乡”三个历史阶段中产生的知青歌曲，是与“上山下乡”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的，也经历了：官媒与民间流播的同一；官媒与民间流播背离和冲突；官媒与民间流播同向共存、交融的三个阶段。

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均以研究人类的过去，探索其发展规律，揭示其发展和未来为主旨，这对于知青歌曲来说，真是太贴切了。不是么？难道知青歌曲不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化石与文物？知青歌曲就是以音符书写的历史，那些蘸着青春血泪的曲谱就是佐证历史的文物，是一代人的精神化石。总说“历史自有后人评说”。大而化之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不得不流传于地下的知青歌曲，大多是以声音的形态存在于人们大脑皮层的，正随时间流逝而遗忘和消失，连尘封都谈不上了。在今天，逐渐淡出社会主流的知青们，许多人已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有的作者、歌曲提供者已经成为了歌曲集《青春咏叹》续集中镶着黑框的符号。那么歌呢？不可挽回地消逝了。等待后人要“评说”的时候，拿什么去佐证他们的“评说”？《青春咏叹》续集后记的题目是：《留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知青歌曲的研究是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尚有许多新的研究空间，譬如：

对知青歌曲中那些由主流媒体号召并激励青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反映青年人高扬着理想和信念的旗帜艰苦奋斗的歌曲，过往的研究关注点过于偏重于“地下”流行的歌曲，矫枉过正，忽略了正面反应那个时代青年人积极向上热爱祖国献身事业的风貌。没有了或者忽略了这一块，就说明不了这代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成因。谁能相信种的是瓜，收获的却是豆呢？但是，这类的歌曲也是和时代的不同而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也是需要区别对待的。从知青歌曲发展的三阶段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与民心的一致还是背离，决定了人民对歌曲的取舍，也就决定了这些歌曲的生命力。比如50年代到1966年以后、特别是1968年以后的歌曲，是有着显著区别与差异的。

对“后知青时代”的歌曲研究，许多的研究文章里不同程度的忽视了。对遗落在历史尘埃里的知青歌曲的搜集整理固然重要，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的“后知青时代”的歌曲，与知青一代人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延续，是秋日成熟的“果实”。恰似“因”与“果”之关系。知青歌曲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意义不仅仅是音乐学上的，更是社会学、人类学上的。所以我们不仅不能忽略1980年以后的知青歌曲，还更应该研究伴随新中国成长的知青一代人，以及60年社会变迁、时代更迭对这代人的影响，在“后知青时代”歌曲中的反映，其中积极与消极的经验和教训。不仅要关注歌曲、也要关注社会、关注人，关注人的变化发展。

不仅知青歌曲，还有知青音乐（譬如：圆号独奏“大柳树下育新人”、大提琴独奏“萨丽哈最爱毛主席”等等）有待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知青歌曲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一项繁复艰苦的基础工作，对于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或者文革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从事知青歌曲搜集整理编撰出版的漫长而艰难过程中，我得到了戴嘉枋教授、作家胡发云真诚的支持与鼓励，对编撰中的知青歌曲集《青春咏叹》续集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直接使续集在史学价值、受众面、可读性和观赏性等各个方面的质量得到整体提升。除此之外，应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批号：13BD040）“中国知青歌曲“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张娟博士的邀请，我参加了该课题组，张娟博士是个70后，这就使得知青歌曲的研究呈现出梯次配备的情形，可看出，这个领域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学科化，实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幸事。随着知青歌曲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研究领域必将大为扩宽，研究成果也必将更多地涌现。我期待着……。

<u>主要参考文献：</u>

1、革命歌曲选集《革命歌曲大家唱》音乐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2、《独唱歌曲200首》出版社不详，1957年3月；

3、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组《革命群众歌曲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10月第1版；

4、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组《革命群众歌曲选》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5年2月第1版；

5、《战地新歌》第1集，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8月第1版；

《战地新歌》第2集，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第1版；

《战地新歌》第3集，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

《战地新歌》第4、5集，《战地新歌》编选小组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年5月第1版、1976年4月第1版

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歌曲集编辑小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歌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

7、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歌曲集编辑小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歌曲集（续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第1版；

8、定宜庄著，《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9、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0、史卫民、何岚著，《知青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11、[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2、孙伟编著，《青春咏叹——知青喜爱的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3、孙伟编著，《青春咏叹——知青歌集》续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相关图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c2fc90101l6b1.html

孙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本歌集承载的知青岁月

——老知青孙伟历时20年完成了35年前的誓言

作者：徐赵全（都市时报记者）

来源：昆明《都市时报》2012-07-23　B1 4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浩浩荡荡的知青上山下乡，影响了上千万城市青年的生活和命运。

对于那段特殊的青春岁月，有不堪回首，有青春无悔，有不悲不喜。从后来的有关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来看，也大致呈现出“蹉跎岁月”与“血色浪漫”两种倾向，要么沉重悲情、伤痕累累，要么激情燃烧、豪情万丈，似乎都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知青群体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前段时间，由著名作家梁晓声编剧、张新建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知青》在央视播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近日，一部与文学作品和电视剧不同的记录知青生活的歌集《青春咏叹》及续集，受到广泛关注。

这部歌集由云南民间音乐人孙伟编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的300余首知青当年传唱、改编、创作的歌曲，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一代的生活状况和心路历程，也勾起了广大知青对那段青春往事的回忆。

35年前的誓言

在编著者孙伟看来，“知青歌曲就是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知青一代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剧变的真实记载，也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化石。”

现年55岁的孙伟当过三年知青，却一辈子摆脱不了知青的烙印以及和那段青春岁月的感情纠葛。从1993年至今，他花了近20年时间，搜集、整理了600余首知青歌曲，先后编著了两本歌集——《青春咏叹》和《青春咏叹续集》。20年，这几乎是一个人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孙伟说，做这样的事，一是为给上千万的知青留下一份青春回忆，二是为了却自己的心愿。

35年前，孙伟发过一个誓言。197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孙伟送走了一批返城知青后，回到他住的小院门口，却没有走进去的勇气。“那里再没了金黄色的煤油灯光和忧郁伤感的歌声，只有好友们走后留下的铺草、废纸、碎布……随着秋风满地打旋，一片狼藉空寂。”他独自坐在小院门口的河边，望着漆黑的夜空，突然想到了他们每天吃过晚饭后一起吟唱的那些歌曲——《知青之歌》、《我的家乡》、《走向生活》……“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

孙伟在心底发誓：“一定要把这些歌曲写下来，弄成一本集子。”

4本厚厚的手抄歌集

那时的孙伟只有20岁，到云南宣威龙场公社插队当知青已两年多。他原本是一名喜欢音乐的城市文艺青年。到了穷乡僻壤之地后，每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犁田耙地、种豆种瓜。“滚一身红土，炼一颗红星”，曾经的改造农村穷苦面貌的豪情壮志，被艰苦的现实生活消磨着。

“身体的劳累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内心的煎熬，一想到要当一辈子的农民，就感到很绝望。”孙伟说，他每天都会想念父母、城市生活，幻想朦胧的爱情。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唱歌成了知青们排解心中烦闷和忧愁的最好方式。

每天下工吃过晚饭，同住一院的20多个知青会聚在一起聊天、唱歌。“先是某个人低声吟唱，然后是陆续有人跟着，最后大家一起合唱，还把吉他、手风琴、口琴等乐器搬出来伴奏，唱到动情时，不少女生都哭了……”

回想起那艰苦岁月里的美好记忆，孙伟情不自禁地拿出他最擅长的手风琴，弹奏了一首当年他们最喜欢唱的前苏联歌曲《山楂树》。那悠扬而略带悲伤的旋律在屋中回荡，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当年所住的知青小院。孙伟说，那时的知青歌曲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首好听的歌出来后，就会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中口口相传，逐渐流行起来。

各地的知青之间还会通过手抄本、信件等交流曲谱，附近的知青也经常搞联谊，相互交流最近学会的新歌；一些外省的知青回乡探亲时，也会把他们当地的知青歌曲带回来和大家分享。

那时在知青之间流传的歌曲非常多，除了《向广阔的天地进军》、《让青春放光芒》等激情豪迈的主旋律歌曲外，知青们更喜欢唱一些“小资情调”的歌曲，比如表达思乡的《望家乡》、《在遥远的地方》等，表达男欢女爱的《知青恋歌》、《敖包相会》等，还有一些被列为“禁歌”的前苏联民歌曲也很受知青欢迎。

孙伟说，他的父母都是部队文工团的，受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尤其是对作曲和手风琴弹奏感兴

趣。在当知青之前上初中时，他就能边听歌边记谱，还自己写过几首歌。在当知青的那三年内，孙伟利用自己的乐理知识专长，把听到的每一首歌的曲谱都整理下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

1978年，孙伟返城时，他的行李包里有一本记录三年劳动成果的公分簿、一本日记本，最重的就是4本厚厚的手抄歌集，收录了近百首知青歌曲。这为他后来出版第一本知青歌集打下了基础。

搁浅15年的梦

然而，要编著一本全国性的知青歌集，单靠孙伟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1978年，结束知青生涯的孙伟到了曲靖沾益化肥厂工作。每天上班忙工作，晚上下班还要学习文化知识，“要把当知青几年落下的知识补回来。因为时间和精力不济，整理知青歌曲的事也就搁浅了，这一放就放了15年。”

1993年，孙伟被调到昆明无缝钢管厂工作。因为厂里效益不好，生产时断时续，员工经常放假。这时的孙伟有了大把的业余时间，也终于把整理歌集的事情提上了日程。他把之前的手抄歌本翻出来，重新整理每一首歌的曲谱，求证每一首歌的歌词。

此外，孙伟还通过拜访、电话、信件等方式，找全国各地的知青朋友征集歌曲。朋友们得知他的想法后，都鼎力相助，发动身边的知青搜集歌曲。一些从未谋面的知青还亲自把收集到的曲谱、歌词通过信件寄给孙伟；有的则打电话来把自己会唱的歌唱给孙伟听，孙伟一边听一边把曲谱和歌词记录下来。几年下来，孙伟收集到了300余首知青歌曲，还专门借了一台铅字打字机，花了一年多时间，把这些歌曲录成铅字。

一切准备就绪，就差出版成书了，但经费却成了问题。孙伟估算了一下，就算把自己所有积蓄都搭上，也远远不够。还好，知青朋友们纷纷解囊，凑够了出版经费。时任云南民族出版社副社长的纳文汇也当过知青，看过初稿后，亲自担任编辑，让这本歌集成功出版。

几十年前忘却的泪

1998年9月，歌集《青春咏叹》出版后，在知青群体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知青都打电话来预定。“华夏知青网”、“老三届论坛”等知青网站上也就此展开了热议。网友们纷纷给孙伟留言，“在一夜之间，你这本歌集把我几十年前忘却的眼泪全部勾出来了。”“这本歌集记录了我们的青春足迹和青春岁月。”

历时5年，呕心沥血编著的歌集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孙伟感到十分欣慰。20年前许下的誓言终于实现，原本应该如释重负的，然而，孙伟的使命却并没有结束。

第一本知青歌集出来后，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们除了争相购买新书外，还纷纷向孙伟推荐了许多没有收录到集子里的知青歌曲。这让孙伟感觉到，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还得出一本续集。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孙伟虽然经历了下岗、创业失败等生活上的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出第二本知青歌集的梦想。除了整理、佐证读者们推荐来的歌曲，他还通过网络征集到了大量的知青歌曲。为了弥补第一本的缺憾，他还加入了每首歌曲的出处、背景资料等。用他的话说："即使对于看不懂曲谱的人，这本书也很有看头。"

2007年，收录在续集里的368首知青歌曲已经整理完成，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本歌集到2012年5月才出版面市。在续集里，孙伟以"留下来，比什么都重要"为题写了一篇后记。

看到第二本歌集的新书后，孙伟感叹："20年了，我的使命终于结束了。"而对于自己真实经历的那段知青岁月，孙伟说："那是我们一代人的命运，到现在，什么怨恨、不满、控诉都已经没有意义，只希望后来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再让悲剧重演。我不想说什么青春无悔，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也谈不上后悔。我想说的是，我无愧于生活，无愧于内心。"

孙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5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大 院

1.

小学二年级时，我家住在芳草地最北面的一座大院里。从学校出来向南走不到500米，路过西边女四中那堵高墙和东边一大片菜地，便可以看到那座大院。大院由一圈比大人高出一头的红砖墙围着，里面共有24个小院。这24个小院分成4排，每排6个。每排小院之间都有一条能顺利通过一辆大卡出入的路，路两头都有大门。

当时我们住在23（号）院。院子里共有大小12间红砖结构的平房，东西各一间，剩下的都在北面。小院南面是21院那排房子的后山墙。院子四周时用普通红砖铺成的便道；中央是一块用于美化环境的土地，足有30平方米。大院里其他的小院也都是这种结构。

刚住进大院时，很少能见到有人出入，即便有，多半也是些一看便知道是上了点年纪的老婆婆。她们有些是在大院里做保姆的，有些是院里小朋友的奶奶、姥姥。出去时，她们手里都爱提个草篾编织的，染着五颜六色图案的筐子，要好长时间才回来。回来时筐里有了东西：一些肉、鸡蛋、青菜，或者酱油什么的。那些东西并不太重，因为老婆婆们提着或胳膊跨着的菜筐，没有使她们变换那特有的走像，不管下身怎么拧来拧去，上身总是相对在树直位置。她们走路总爱低着头，看着路，和人碰面时会抬起头来，用流露出善意目光的眼睛向你看看，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低下头走去。这大约是大院里老婆婆的特殊“走像”了吧。

我那“老婆婆”的概念并不单单来自那走像，那一张张布满了皱纹并夹杂着大大小小黑斑的脸，或她们身上那深色的大襟衣衫或裤脚外面的袜带。她们大都喜欢戴一顶黑色的绒面帽子。帽子的左面装饰着一朵与黑色帽子面料相同的小花；有的帽子前面镶着一块“玉”——可能是玉吧。有翠绿色的，也有白色的；有方形的也有椭圆形的。出门时她们把头后面的发髻全部掖进帽子后面，天气特别冷的时候，索性连耳朵也都捂进了帽子。不少老婆婆要把那顶帽子戴到伏天才肯摘下来，露出由满头苍发汇集到头后，再盘起来罩在一个黑丝线小网里的发髻。除了那藏在帽子里的发髻以外，老婆婆们最大的特点就要算她们脚上鞋子了，前面尖尖的，比我穿的鞋子还小。听老师说，那是旧社会过来的女人，要把脚裹起来才能塞进那双小鞋里去。我曾偷偷拭着裹自己的脚，却无论如何也尖不了。直

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让我知道那裹在里面的那双小脚是那样的丑陋，那样的残酷！

大院的叔叔伯伯们几乎清一色的打扮：平常总是笔挺的深色呢子或哔叽的中山装，左上衣兜上别一支钢笔，天冷时外面再套一件深色呢大衣；到了夏天，上身多是一件短袖衬衫，下身一条浅色西装裤，手里有时拿一把蒲扇或折扇。一年四季，这些人总是“故意”绷着自己那副冷冰冰的面孔，走路时也都像院里的老婆婆似的低着头。相互走碰面时都会像触电一样突然闪到一旁给对方的让开路，接着向对方默默点一点头，有的还要目送对方走过去后，才肯继续走自己的路。人们很少说话。父亲母亲说话总是关着门。邻居之间偶尔也会说上几句，不过，就连小孩子从跟前走过也会戒备起来，使劲盯着你，想从你脸上看出你听到了什么。小朋友之间很少有来往，如果在一起多呆了一会儿，就会被各家的大人们叫上名字。听到叫声，也不用答应，也不用互相告别，只是很顺从地转身向家里走去，没有人说你不礼貌，大家都习惯了。这就是那座大院，到处填塞着令幼小心灵难以捉摸的感觉。大人们嘴上嘀嘀咕咕，孩子们心里嘀嘀咕咕。若不是过年过节也能看到一些阿姨们的其他颜色装束，甚至和老婆婆小脚一样尖的高跟鞋，9岁之前的我，真的就只能体会到压抑了。

记得那时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我独自睡在一间小屋，那是父亲的书库。夏夜难熬。关上窗子，觉得闷热。打开窗子，立刻就可以感觉到那刺鼻的DDT、666和艾腰燃烧的混在一起的气味，时间长了，鼻子火辣辣的，喉咙也会刺痒。还经常有烧纸的熏过来的烟。那是大人们在烧自己写的稿子时冒出来的。每个小院都一样，隔几天就有人在院子中间烧一次，一次要烧掉好多好多。似乎是心照不宣，谁也不奇怪，谁也不避讳，泥土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残留的灰烬。远处的蝉似乎感觉不到这种几乎令人窒息气味，毫无顾忌地将自己产生快感时发出的噪音通过漫漫夜空播散过来，倾灌进你的耳朵。蝉在快乐，可怜的人只好绷紧被蝉鸣颤动的神经，默默地忍受着，忍受着，直到因麻痹而昏昏沉沉。我每每要好长时间才能稀里糊涂睡过去。半夜又经常被周围不紧不慢的蛙鸣唤醒。不只是蛙鸣，还有孜孜不倦的蝈蝈、蛐蛐儿和蜊蜊蛄以及野地里其他一些不知名虫子的嚣叫。要不是还能听见远处几声趿拉板儿敲响砖地的声音或几声没满月的孩子发出的啼哭，我几乎难以再次入睡了。最难熬的是冬夜，有时一觉醒来，只能听到无情的北风呼呼路过时捎带拍打窗户的声音，冷清得让我想立刻知道什么或看到什么才能安下心来似的。与其躺在那里翻来覆去，我宁可穿好衣服，出去上一次厕所，好看到一些窗帘缝隙能流露出来的昏暗灯光。那是大人们还在写稿子，每日每夜，天天如此，父亲也是这样。看到前窗、后窗的灯光，我才感到有依靠，感到安全。等到再回到屋里躺下时，却不再注意那风声，很踏实的入睡了。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夜里起来，总看不见父亲房间里的灯光，我开始忐忑不安。

那之前，父亲也学着大院里其他人一样，烧起自己的稿子来了。我在一边帮忙，保姆领着一岁的弟弟在旁边观看，弟弟很开心，拍着小手，双脚跳着，嘴里叫着：“大火，大火……”我也觉得很好玩，以前，父亲和母亲从不让我靠近火，只能背地里偷偷去玩。父亲却没有我们那样开心，他还有好几年才到40岁，可被火光映红了的那张脸，那紧锁的眉头，那紧闭双唇而产生的皱纹，却好像使他的年龄增长了20多岁，显得比东边那间单独房间里住的LK伯伯还要苍老。

一天晚上醒来，我套了件棉袄，小心翼翼开了房门，蹑手蹑脚走到父亲房门跟前。看窗户，仍然没有我熟悉的灯光。我犹豫着，想去推开父亲的门，最终还是放弃了。想走开，又不甘心，默默的站了好一阵，不知所措。房里传出了父亲的咳嗽声。他经常咳嗽，母亲对我们说过，内战的时候父亲得了肺结核，好了以后就留下经常咳嗽的毛病。突然，听到父亲说话的声音："哼，想叫我签字，我就是不签……简直是莫须有……"

"你小点声音……"原来母亲也在。

"……HF到现在也不签字……"

我紧张了。

上一年级时（那时我家在后海边上），刚认识几个字，见报上有HF就记下了，还总爱挂在嘴边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家里来客人时我总喜欢淘气，母亲叫我人来疯。一次有客人来，我又"疯"了起来，嘴里不停地说："人来疯，HF，人来疯，HF……"从那以后，家里便想尽办法封我得嘴，不准我再吐出HF两个字。渐渐有点知道为什么不要说那两个字了。

听父亲说，我有些心慌。我不想再站在那里，匆匆回到自己房里，打开手电，很容易地在一个木箱子里翻出几本书，一共是5本，作者都是HF。屋子里有20多箱书，我平时爱翻弄，只看看出版社和作者的名字，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了。拿起第一本，封面是白色的，上面的字是淡黄色的，不仔细看就难以分辨。翻开扉页，只有几行钢笔字：xx同志后生可畏，多多指正，HF。xx是父亲的名字。再翻下去，什么也看不懂了。又拿起一本，封面是红、黑图案组成的，中间大红图案似乎是太阳。扉页上也有xx同志指正之类的话。翻开里面，好像能看懂一些了，那是一本诗，什么啊啦，新中国啦，救星啦；红啊，毛泽东啊，光明黑暗啊……乱七八糟，一行才有三五个字，没什么意思。剩下的几本，除了里面有些熟悉的伯伯们的名字外，鬼才知道里面在说些什么……

2.

天渐渐暖和了，大院外东边的菜地出现了干活儿的农民，经常只有三五个人。放学后，同班的哏哏也经常去地里，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时总要拉上我。套着骡子犁地，看着小驴拉水车，拿着铁锹看着给菜畦灌水……，我还不懂什么叫"有生气"，只感到那菜地比什么地方都好玩；只盼着天不要黑，不要回到那红色的大院里去。

有几天，父亲话多了起来，尤其是吃晚饭时，总要讲一个好听的历史故事。讲完了还总自吹一下，说他肚子里有十万个故事。当时弟妹还小，孩子当中能把那些故事听得似懂非懂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了。又有几天，除了给我们讲故事以外，晚饭后，夜色完全降临时，父亲还要吹一会萧或笛子。那曲调很难听，有一两句好像和昆曲差不多，但比那要刺耳，是照着一本乐谱吹出来的。原本不知道那是乐谱，后来才懂。里面都是毛笔抄的"工"、"尺"、"上"之类的字，字的下角还斜着抄了些大写的中国数字。乐谱宽两寸，长半尺，是对折成书

的，打开后比写字台长一点，两头是几层布粘成的，布外面是摸旧了的浅灰色绸子，上面的字迹不能辨认了，只有一个印章上的图案还能看清楚。每次笛声响了，邻居老M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入神地听。一次老M忍不住跑进我家，临走时，冲父亲不住点头："嗯，这恐怕要算作是最原始的东西了，还好，总算遇到你才从书摊上捡回来，不然……"（注：后来知道那是徽班的乐谱，是父亲在杭州一个地摊上发现的。文革时被糟踏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10点钟，YB伯伯来到我家，见他热情地摇了摇父亲的手说："xx同志，你的问题搞清楚了……"父亲边请他坐下边笑着说："记得两年前在北新桥路上碰到你时，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一字不差呀！哈哈哈！"YB显得有些不自然，叹了口气，良久才无可奈何地说："身不由己呀……。这次又是TH同志关心你，告诉我们要团结好党外同志，还说30年代出了不少人，40年代就不多了……你不要……"他们说别的我听不太懂，说到TH我知道，不过当时脑子没想到"起来……"，而是一下溜到细管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去了，TH就住那里，一年级时，父亲带我去过几次。见面打招呼要叫T爷爷，还有一次Z爷爷也在，大人们叫他Z部长。我不喜欢和大人打招呼，不过还是表现得很有礼貌，这样大人们就会放心地让我离开，急于离开的原因是我知道T爷爷家里养了一只猴子，听说是什么国际友人送的，我每次愿意和父亲去那里是因为我可以和猴子玩耍好长一段时间。突然想起很久没去细管胡同了，也不知道那只可爱的却被人用链子拴起来供人玩耍的猴子怎么样了。

晚饭后，小院里有些热闹了。大人们聚在LK门前的砖路上高谈阔论。父亲说：应该把院子美化一下，中间设计个大花坛。TA立即表示赞同，说可以和机关建议一下，弄些树苗来，在四个角种上四棵树……。听说要种花种树，LK五（？）岁的小女儿高兴地向他们家跑去，边跑边高声叫道：LK!LK!我也要种花！女孩的母亲赶出来迎住说：别去烦你爸爸。大家和她母亲开玩笑：你女儿很现代呀。她不好意思地说：这孩子，连我都直呼其名。女孩毫无顾忌，仰着头口吃伶俐地大声"宣布"：我爸爸叫LK，我妈妈叫ZBX，我爸爸是HF分子……。女孩母亲一下尴尬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周围的人也一下沉默了。良久，TA走上前去伸出手，握住女孩母亲的手说：多保重，ZBX同志。周围其他人也默默向她致意，连周围的孩子们也都盯着同伴母亲的眼睛……。我正在旁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看到那情景，脑子里慢慢地把从大人那里偶然听到的零零碎碎串了起来：LK，瘸子，在延安时从崖上跳下来摔伤的……在医院里疗伤时，有人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一个好消息——LK同志，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到北京成了HF分子……；后来又随便和别人说MZD从来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在延安时，听到不同意见时脸立刻就会沉下来……

大院也逐渐热闹起来。先是各个小院都互相学着种起了花草树木，接着又有几个胸前佩戴工艺美院校徽的学生在大院围墙和院里的山墙上画了几幅漂亮的画儿，招了许多孩子聚在一起观看。记得有一幅画的是一群留着露出耳朵短发的农村妇女和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大娘手里举着识字课本结伴去读夜校；还有一幅蓝色背景的画上画了一个地球，地球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天安门，天安门顶上又一个毛泽东伸出半截身子在严肃的挥手，地球下面有几个鬼子模样的黑色小人头朝下正滚出地球。

画儿画玩了，孩子们也都熟了起来。此后，除非夜深了，不时便能听到孩子们互相走动时传过来的清脆的木跋

拉板敲打砖地的声音。女孩子们在一起无非是玩跳间（房子），踢毽子，出（chua3）拐，跳皮筋……；再不就几个人坐在一起翻看旧画报。那些画报翻不了几页就能见到CCCP的字样，不是高耸云天的高炉，就是康拜因，再不就是生活比蜜甜的苏联老大哥，真不知有什么好看的。天再热一些，便有人三一群俩一伙，或嘁嘁喳喳，或嘀嘀咕咕，议论哪个院子指甲草长得好，牵牛花颜色漂亮，或者哪个院子的赤包或咕蔫能捏了，好趁没人时去采摘。男孩儿们看见女孩子耳朵或头发上的牵牛花，倒不会说什么，可一看到她们把手指甲、脚趾甲用那种明矾调制的指甲草染成了大红大紫色时，认识不认识都要冲她喊一声“恶心！”听到喊声，她们也只是嘴一撅，用白眼球瞪你一眼算拉倒。男孩儿们大概都喜欢看女孩那不屑一顾的样子才故意去招惹她们吧？

比起女孩，男孩的游戏要危险多了。上树粘唧鸟，上房打游击，勺蜻蜓，打弹弓……。记得一次，我们几个男孩，把大院外面摞得整整齐齐的红砖玩了多米诺骨牌，捅了个大漏子。有一天最热闹。那天，来了不少记者。一大早大人们在院子里用锅碗瓢盆尽量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男孩儿们则都上了房，挑着头天晚上自己亲手赶制的五颜六色的旗帜使劲摇晃，边摇边歇斯底里般地大声叫嚷，还不时有人点燃爆竹助威。一直闹到天黑，筋疲力尽。从那儿以后，我才明白，大人们原来也和孩子们一样，是喜欢玩些无聊游戏的。无聊之中，我们也做些有意义的事，几个人凑在一起到处去搜刮废洋钉、破铁锅……，然后平均分配，第二天交到学校，为1080做贡献。我们也做些与“科学”有关的“产品”。听说科学院的伟大科学家发明了先进的 “超声波发声器”，很容易做，我们也就一窝蜂地赶制起来。用一只约半尺长的废水管，一端砸瘪，锯掉这端中间的部分，然后镶嵌进一段薄钢片，用过的刮胡子刀片就行。这样就成了超声波发声器，可以用它来烧水、淘米、洗衣服、洗菜，理发店、饭馆都用上了它，据说效率很高。可大家把这玩意儿接在大院里的自来水龙头上，却狗屁效果也看不出来，还浪费了好多自来水，没有一个大人不骂这群小猢狲的。

在大院东面的菜地里干活的人也多了起来，有时能有三、四十个，我也因此从小就懂得了“人多好干活”的含义了。这么多人，半个钟头就把活干玩了，然后就在地头戏耍打闹玩扑克，唱歌扭舞纳鞋底。那社会主义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至今都记得它的每一个细节。

过春节了，发肉票了，没有人在意，都理解过日子要有计划，况且，肉票根本用不完。尤其是孩子们，谁都没有注意到那一点点连大人们都不关心的变化。况且，那年要开第二届全军运动会，还要在新建的工人体育场开全国第一届全运会，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任务，男孩们要学会倒立，女孩子要练劈叉，都是开幕式团体操时要做的“高难动作”。不参加团体操的也要为国庆10周年做准备。一天放学后，哏哏儿跟我一起回到大院，说好一起练一会儿动作。我俩一边倒立在那儿，一边瞎扯。哏哏儿突然没立住，摔倒在地，疼得他呲牙咧嘴，我赶忙正过来扶他，发现他手腕子扭伤了。“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幕式了，怎么办呀！叫老师知道改换人了……”哏哏快哭了出来。我说：

“别跟老师说，几天就好了，这几天你就用一只手，他们看不出来。”

“还用一只手呢，两只手都快支不住了……”哏哏哭丧着脸说。

这时，女四中那边的大喇叭里传过来悠扬的歌声“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

社员心里喜洋洋啊喜洋洋。”那是初中女生在合练，也是为团体操准备的。听见那歌声，哏哏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吐沫，呸了一声。我奇怪的问他：“你怎么了？”他没有回答。最后，扶着我的肩膀边走边说：“你知道我们那儿都唱什么吗？我教你唱：“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一个窝头俩咸菜，让你吃饱饭……”他一边唱着，一边用另外一只手表演着，把我逗得止不住笑，只一遍就学会了三段歌词，最后一句是“让你饿死算” 。母亲回来了，在旁边听了好一阵才对哏哏说：“哏哏儿，吃晚饭再走。”“好吧。”看着他痛快的答应了，我很高兴，以前，我在他们家也是这么痛快答应的。母亲一边往他手腕上抹药，一边问他：“你中午吃的什么？”哏哏不满意地说：“学校练队晚了，等到了食堂人都走光了，什么都没了，只从大锅底刮了一碗菜汤喝……”母亲说：“以后晚了，就到这里来，和M一起吃。”……

全运会开幕式终于开始了，我们表现得很出色。可以回家，我那高兴劲儿一下全没了。小院里的花草无影无踪，地被翻了一遍，院里的人都在那里干活。看了半天才明白，大人们要在他们亲手设计的花园里种大白菜了……

3.

邻居TA顾了个年轻的四川保姆，个子似乎比我还矮。据说是机关介绍的。她很热情，见了男的叫x先生，见了女的叫x师母，奇怪的是她似乎认识很多人。母亲说，她刚结婚男人就被抓起来了，来北京是想告状，可谁也没有办法。

五年级暑假的一天中午，快到吃中午饭时，我突然发现四岁的弟弟不见了。急得我心里一下没了底，假期里带弟弟是我的活儿，谁知自己玩疯了，却把弟弟丢了。和大院里的小伙伴翻遍了整个大院也不见踪影。那四川保姆突然提醒我，说看到我曾带弟弟去过商店买冰棍，也许……，我也只好心怀侥幸，昏头昏脑地朝2里路外的商店走去，一路走，一路带着哭声叫喊着弟弟的名字。拐过两个弯，发现弟弟摇摇摆摆地向这边走来。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我迎了上去，一把抱住他。弟弟伸出小手张开，只见手心里有五分钱硬币，难怪母亲早晨说少了五分钱。我埋怨道：“你怎么没买冰棍？”弟弟嘟嘟囔囔地回答“商店里个个都没有。家里也个个都没有”个个（ge3 ge1）是弟弟的口头语，意思是“什么”。

星期天，母亲在火炉上熬了一大锅稀饭，还没到吃饭时，弟弟又开始嘟囔上了。爬高去看看饼干盒子，“个个都没有……”，又下来打开碗柜门，还是“个个都没有……”。母亲有些不耐烦地说：“稀饭马上就好了”，说完就打水去了。我在远处只见弟弟摇摇摆摆迈出门，向火炉走去，还没来的急喊出口，弟弟的小手已经伸进滚开的稀饭锅里，只听弟弟惨叫一声，接着那锅稀饭整个倒下来，留到他的腿上，脚上。母亲正好赶到，把一桶冷水全都浇到弟弟身上。此后好长时间，家里没有多余的交谈，没有了欢笑。全家都在和弟弟一起忍受着炎热，忍受着伤痛……。

上六年级了，一天回家，还没进院子就听见里面传出来令人毛孔悚然的哭声，是那个四川保姆的声音。我跑进院子，只见她跪在我种的那棵杨树下号啕大哭，还不时地用头撞着树干，边哭边喊：“你好没良心……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你显什么能啊……别人都不说你说个啥子咱……你说那话顶个屁用啊……”任凭周围人怎么劝都没有用。见我回来，母亲递给我一块手绢，向我示意了一下。我接过手绢走到她跟前，只见她头上磕满了血印子。我默默地将手绢向她伸去。见到是孩子，她似乎强迫自己不再哭下去，接过手绢但又忍不住呜咽起来。大家不失时机地将她扶起，慢慢将她扶回房里。留在后面的人小声议论着：“来信说，进去以后又说大跃进怎么怎么。”“不知还有什么事，反正枪毙了。”过了几天，在离哏哏家不远的一棵槐树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吊死了。

中秋节，父亲在院子里给孩子们讲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故事。TA讲了狼吃小白兔的故事，他的故事没有结果，只是不断的问大家，善良的小白兔怎么才能不让狼吃掉。孩子门想出了好多办法，可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办法。那一夜是小院的“最后的晚餐”。

此后，大院又逐渐静下来，不光是那趿拉板敲打砖底的声音逐渐少了，就连周围的蛙鸣和虫叫也很少听见了。人们又开始“敬而远之”，直到两年后，我们从大院搬走。

- 看了勾起了很多童年不快乐的回忆，可是又不想写，懒懒的。 白云鸟 2001年6月19日 00时06分47秒 (0)
- JJ好文采！ banjin 2001年6月18日 23时13分24秒 (0)
- 捏造事实，恶意攻击毛主席。 革命下一代 2001年6月18日 18时56分45秒 (2)
  - 你这孩子烦不烦呀！ 南风粤韵 2001年6月18日 22时38分26秒 (1)
    - 谁说他是孩子？！ banjin 2001年6月18日 23时07分21秒 (0)
- 性情文字，忧患人生。 J 2001年6月18日 10时54分13秒 (0)
- 冷清、压抑、无生气——热闹、宽松、生机勃勃——冷清、困惑（小兔子怎样才会不被吃掉？） 老老糊涂 2001年6月18日 09时00分20秒 (0)

- 童年的眼睛，成年的笔触！ 西里村 2001年6月18日 07时20分59秒 (0)
- 先存起来，明天仔细看，字里行间的再找找。 宇鹏 2001年6月17日 23时54分35秒 (3)
  - 又要出门，昨天赶着写完。没检查，别字太多。 延安老插 2001年6月18日 07时21分03秒 (2)
    - 延安一路平安！ 西里村 2001年6月18日 07时26分06秒 (1)
    - 谢了。 延安 2001年6月18日 07时30分37秒 (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话说春节

近有专家提议，改变我国传统的春节的“定位方法”，通过“历法改革”，将春节改在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从而使这个每年游移不定的节日相对固定在每年的2月4日。到目前为止，专家们为这一提议找出了六大原因，但是，人们心知肚明，其中的唯一原因是中国春节期间的运输业不堪重负。

这一提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拥护的人寥寥无几，反对的人大都认为春节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节日，传统春节就是正月初一，传统春节是民俗……一句话，动不得。

专家也好，民众也好，都提出了“传统春节”这一怪怪的名词。那么，什么叫做“传统春节”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先来看看与“现代”春节相关的两个传统节日。

1. 立春

自秦汉直至清末，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均把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作为一个重要节日，其名称有“立春日”，“打春”，“咬春”等等。立春的主要民俗活动除更衣，春酒，春卷（或春饼），祭祀，社火，踏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打春牛，这也是民间将立春这一节日称为“打春”的原因。据说，打春牛是周公立下的规矩。春牛乃土牛，从立春开始，地主每日鞭笞土牛，农民则往土牛身上抛掷五谷。《兼明书?唐?丘光庭)中有一段“土牛义”的描写，有助于对“打春牛”的理解：《礼记?月令》曰：“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别加彩色。今州县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弃者。明曰：“古人尚质， 任土所

宜，后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县不知本意，率意而为。今按《开元礼》 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随其方。则是王城四门，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县，即如分土之议。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坛，用五色之土。封东方诸侯则割坛东之青土，以白茅包而赐之，令至其国，先立社坛，全用青土，封南方诸侯则割赤 土，西方则割白土，北方则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效彼社坛。”或问曰： “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农 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谓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谓示农耕之早晚？” 答曰：“以立春为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后， 示其农晚也。”又问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 答曰：“季冬之月，二阳已动，土脉已兴，故用土作牛，以彰农事。今立春方出， 农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后也斯自汉朝之失，积习为常。按《汉书》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又按营缮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诸州县门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书示农之义也。”又问曰：“几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盖欲农人之遍见也。今人打后便除，又乖其理焉。”

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社会立春这一节日的重点在于“迎新”，其重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季节更换所带来的危机。民国之前，未见用“春节”这一词汇描述“立春”这个节日的。

2.过年

过年是百姓之言，这个“年”由一系列民俗活动组成。这些民俗活动从腊八开始越来越密集，主要有腊八粥、掸尘、祭灶、乞丐送财神、办年货、贴窗花、祭祖上坟、团年饭、守岁、压岁钱、爆竹、挂桃符（春联）、贴门神、拴门千儿、拜年、屠苏酒、破五（或初七人日）、……一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王安石的《元日》中，四句诗便描述了三种过年的风俗。

过年起源于“腊祭”，原意是神农氏时代的“索鬼神而祭祀”，可以说，过年是过鬼节，较多倾向于除旧（一年过去了，我们最终战胜了鬼神），以除旧的人为胜利来抚慰人生苦短的心灵创伤。人们以表面的红火来掩盖内心的恐惧。

中国古时候人如何过年？《除夕元旦词》（明?郎瑛）中录了两首《蝶恋花》对此有所描述：庠彦沈明德宣，尝赋吾杭除夕、元旦《蝶恋花》二词，道尽中人以下之家之风俗，诚足解颐。录以遗好事者。《除夕》云：“锣鼓儿童声聒耳，傍早关门，挂起新帘子。炮仗满街惊耗鬼，松柴烧在乌贫里。写就神荼并郁垒，细马送神，多著同兴

纸。分岁酒阑扶醉起，阖门一夜齐欢喜。”《元旦》云：“接得灶神天未晓，炮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有如下描述：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

“那晚（指除夕夜），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至次日五鼓，贾木等人按品上妆。.....进宫朝贺（注：见下）。.....又至宁府祭过列宗，方回来。”

“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注：屠苏酒）。……一连忙了七八天……”

想过没有，皇上怎么过年？同样在红楼梦里有这么一段描写。

“次日（注：正月初一），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

正月初一，文武百官朝贺，这就是皇上过年。这一习俗也可谓源远流长，唐代张祜就作有一首《元日仗》：“文武千官岁仗兵，万方同轨奏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真是气势不凡。皇上的过年突出的就是一个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嘛！具体到表面昌盛的背后嘛，什么鬼不鬼的，老百姓不是很高兴？！

过年的民俗活动本应到除夕达到高潮，除夕晚上有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团年饭，二是守岁。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多数人是足不出户的，所以，团年饭的意义并不在于现代人所说：合家团圆，和和美美……而在于和已经死去的列祖列宗团圆。所以，传统的年饭之前是要有仪式的，多行路边烧纸之法，呼唤祖宗回家一起吃年饭，然后在堂屋中坐北朝南摆好祖宗牌位，点燃香火，待香入炉，祖宗便到家了，这时才开始吃。

守岁之“岁”，一说“年”，一说“夕”；关于年的传说很多了，不论岁也好，夕也好，年也好，通通是危害百姓的恶鬼。所以，除夕和守岁的意图是相同的——驱鬼。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年习俗在与时俱进。拿除夕守岁来说，就大不一样了。关于除夕守岁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为“守岁”。现代社会守岁，全家人从各地在年三十前千里迢迢赶回家团聚，除了那顿令人兴趣逐年下降的年夜饭以外，还有那些日渐倒人胃口的电视“节目”，加上日渐高新的交通、通讯工具，如此不要祖宗的团圆实在意义不大了。君不闻，“哪有点过年的气氛！”

过年这一系列驱鬼活动本意虽为除旧，但终究是会迎来正月初一的，新的一年来了。新岁曰王春，而过去的一年称客岁。正月初一有不同的叫法：到百姓说大年初一，其他如：履端、元日、元旦、新正……。同样，在民国之前，没有用“春节”来描述“过年”这个节日的。

那么，什么叫做“传统春节”呢？将春节法定为农历正月初一，是孙中山时开始的；春节是孙中山创立的节日。“传统的春节”的“传统”二字仅仅只有90来年的历史。孙先生的革命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社会，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奇怪的节日。几十年过去了，从春节的效果上来看，我们不免要思考一下，孙先生是主张人鬼合一还是人鬼各半呢？另一个实实在在的效果是，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尤其是经过夫妻、家人“异地分居”那段历史，孙先生发明的春节已经着着实实演变成一个以团圆为主要功能，捎带有展示昌盛作用的节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孙先生创造的春节伴随着另外一个效果：传统的立春、腊祭的自然演变过程被革命人为阻断，因此很难演变成适应现代社会的类似万圣节、圣诞节那样的现代节日了。这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有谁会闭着眼睛否认：中国的大都市社会有了将圣诞节作为更重要节日的萌芽！！除非人为强硬阻拦，否则势不可当。

小路摄影

大槐树

现在东大桥小学里东面那座旧楼，记得当时用了好长时间，直到我六年级毕业时才建成。原来从那儿一直往南一里多都是菜地，到三年级时划给我们学校一部分，在那里盖起了两排平房，北面一排，西面一排。这个校园东面是土坡，坡下是一条由北向南流的小河。西面平房后面有一条不太宽的下坡土路，路对面往南是一道二百多米长两人高的抹了砂浆的砖墙，往北是长满了酸枣刺之类灌木的黄土岗儿。北边平房后面还是土坡，坡下面才是最早的东大桥小学。旧学校有前院和后院，中间由老师办公的地方分开。办公室的房子好大！所有的老师都在里面，每人有一张办公桌也没有显出拥挤。

记得三年级以前都在后院，那儿有六间教室。现在我还能隐隐约约地记起那些破旧得稍不注意就可以碰散成一堆柴火的桌椅；那破旧得冬天把比我还高的煤球炉子烧红了还要在里面不停使劲儿跺脚的教室；那破旧得坑坑洼洼稍不留神就会歪脚的院子……，要不是西南角落里那棵“高高的”大槐树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就连那“隐隐约约”或许都早已会从逐年模糊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

那槐树要我们三个人才能搂过来。向北伸出的一枝粗树杈骑在有我三人高的土墙上，另一枝树杈斜着伸进院子。天气逐渐变热的时候，在慢慢滋出嫩绿叶子同时，满树还吊起一小串一小串半开不开的，略微泛出淡黄色的小白花，整个院子都飘散着它那种特殊的清香。那就是和洋槐花有些相似的老槐花。由于很早就认识了这种小花，上六年级时，我们同学没有吃这种花中毒的。

在大槐树下立着一根两只手刚能握过来的长竹竿，下端埋进土里，上端用粗铁丝固定在那枝树杈上。三年级第一堂体育课老师就宣布，期末考试有一项爬杆，能爬到一半算及格，摸到树杈就是5分。此后的课间，大家除了跳绳、踢毽儿、弹球、拍洋画、煽方宝、滚铁环之外，就是和那根竹竿较劲儿了。我们班只有三、五个同学能爬上去，摸到那大树杈子。其他同学不是爬到半路坚持不住又溜了下来，就是“原地踏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跃跃欲试。一天下课，一个外号叫“哏哏儿”的男生忽然表演出“绝技”来。当他爬到竹竿上面能够到树杈时，突然向上伸出左手，用力握住粗铁丝附近的竹竿——那里已经很细了——然后夹着竹竿的腿脚用劲儿往上一努，接着像猴

一样伸出右胳膊，跨在树杈上。当他左胳膊也顺利地离开竹竿跨上树杈后，整个身子的重量就鳔在胳肢窝下了。对于当时的男生来说，再往下便是雕虫小技了，哏哏儿很快地坐在了两根树杈中间，两手揣在袖筒里，得意洋洋地承受着大家的欢呼。刚满足了一会儿他就不本分了。只见他慢慢站起来，顺着另一枝粗树杈走了两步，然后蹲下骑在墙头上，用手和屁股一点一点往墙中间挪。他停下了，歪着头往墙那边好奇地看了起来，任凭底下的人怎么嚷嚷，他就是不理。直到上课的钟声响了，他才慌忙用手钩住墙头，吊下身子，一撒手“通”的一声落到地上，连滚到爬进了教室。

那堂课时间过得好慢哪！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同学们呼拉一下把“哏哏儿”围住，七嘴八舌地向他打问墙那面有什么。他先是装傻冲愣，后来被逼急了，用力分开大家，跑到讲台上，用板擦拍了两下讲桌，大声说：“听着，墙那边……”大家立刻静了下来。这时“哏哏儿”学着老师，把手背在后面，一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大家很想知道那边是什么吧，如果真想知道，那就……”说到这儿，他突然伸出手往大槐树一指，嬉皮笑脸地说“那就自己上去看吧！”话音没落，那家伙就一下窜了出去。教室马上成了“蛤蟆坑”……

过了几天，有几个同学爬上去了。又过了几天，更多的人爬上去了。等下来后问他们，一个个都像“哏哏儿”一样卖关子：“你自己爬上去看呀！”那时，我是班里最瘦弱的，眼看有几个女生也上去了，真怕大家耻笑。再说那边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呀？我决心“加班加点”练爬杆。吃完晚饭，做完家里的分内事就跑进学校爬一会，早晨也要早去练一会儿。手掌起满了水泡，水泡破了，破的地方干裂了，干裂的地方渗出了血……一切都没有让我放弃。手掌慢慢地起了茧，能爬上去的高度也一天天增加：三分之一，一半……。

终于有一天早上，我爬到了竹竿的顶部，手能碰到树杈子了。我累得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见底下哏哏儿的声音：“别松紧！接着往上爬！”我用力鳔住身子，脸涨得通红，上起不结下气地说：“不行了……没劲儿了……”“你坚持住，等我上来……”

哏哏儿爬上来了，他“命令”道：“你手抓紧！两只脚踩在我肩膀上……慢点……”我小心翼翼地照他的话去做：手牢牢地攥住竹竿，战战兢兢地松开双腿，哆哆嗦嗦地够到了哏哏儿的肩膀。“你脚踩住了，我喊一二三，你往上倒手，咱俩一块往上爬……不许松劲，要不你就得摔死……一——二——三——”哏哏儿开始喊了……。一点，一点，也不知倒了多少次手，直到我的两只胳膊都跨到了树杈上……

几分钟后，我们俩都骑上了墙头。墙那边是个小院，东西两边是和我们教室一样的房子，只是还要破旧些。门窗已经残缺不全，房子里零七八碎堆了些杂物，还有些用红红绿绿的纸人纸马，看上去好长时间没有人碰过了。正面是一间和这边老师办公室正对着，大小与它差不多的大房子。干净的台阶上过去是高高的门槛，宽大的门敞着。里面很暗，但仍然能辨认出正中那座金黄色的弥勒佛像，佛像前是香案，上面摆着的香炉里飘出一屡清烟……一切都和小儿书上画的一模一样，因为有些颜色，看上去生动多了。香案前靠东边的一侧，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秃头盘

着腿面朝西弓着腰坐在那里，两只胳膊无力地搭在腿上，双手扶着两腿中间的一串大珠子。他闭着眼睛，上下嘴唇不停的动着……

“原来是座破庙……，那秃子是和尚。”，我凭着模模糊糊的印象揣摩着说。

“不是和尚，是姑子。”哏哏儿反驳我。

“姑子……是什么？”

“你连姑子都不知道？”哏哏而显得有些得意，“姑子就是女和尚。东岳庙那边才是和尚，是男的，早没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太相信他了——因为听别人说东岳庙原来住的是老道，老道是长头发的，老道是一种和尚吗……

“我妈告儿我的。她原来老到东岳庙磕头，后来就生了我。她说要想生女孩，就到这儿来磕头。”

“你们天天上来就看姑子？”我有点奇怪，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

“那儿啊，有时候能看见磕头的，烧香的，特逗人，就这样。”哏哏儿把两只手合住学了一下，差点没从墙上掉下去。

“你看，那姑子的嘴干吗老动呀？”

“嗯……”哏哏知道很多，除了老师，别人问他什么都能答上来。见他朝那边看了看，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可能背书呢……书背烦了就玩手上的珠子，那叫佛珠，你知道吗？……我上课时就老玩弹球。”

第一节算术课我满脑子里翻腾着“和尚”，什么孙悟空啦，如来佛啦……，想把还只知道一点点关于和尚的东西设法安到姑子身上，安来安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第二节语文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问题，我才“醒”过来。

“你别走神，应该专心听讲。”老师说。

我站在位子上，听着老师和蔼的声音，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刚要坐下，就听老师说：“好。那现在你用‘一边……一边”造个句子，好吗？”

“一边一边……”我想了老半天，突然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姑子一边背书一边玩佛珠。”……

放学了，我匆匆回家，放下书包，找到仅有的几本破小儿书——接着“研究”和尚与姑子的关系。门外隐隐约

约听见邻居在和母亲叨唠：

“你们M还挺听话，不淘气，哪像我们家的N！这不，今天从树上掉下来又把脚歪了。你说这孩子怎么管，天天都和他说别干危险的事，都答应的好好的，鬼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瞎操心……”

三年级暑假快结束时，听说那姑子吞金死了。去看看，知道大槐树也被伐倒了，正做成漂漂亮亮的苏联式课桌椅。

四年级开学我们进了前院。新教室，新桌椅，感觉很舒服。不过总还怀念那棵大槐树，替它惋惜：它见过我们淘气，它还见过很多别的事情；它以后再也见不到什么，也不能证明什么了……。

延安老插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3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指鉴为缶

奥运解说词——

序幕：

……

主持人：美丽的欢迎焰火绕场一周，在鸟巢上空花朵般绽放，激活了古老的日晷。在鸟巢上方显得格外漂亮，富有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间计时日期的日晷，由日晷发出的时间之光点亮了鸟巢，点亮了2008面缶组成的矩形缶阵。

倒计时：

主持人：一道耀眼的光环，激活了古老的日晷。独特的多媒体手段，拉开了开幕式的帷幕。日晷将光反射到场地的缶上。缶是中国古老的打击乐器，由陶土或青铜制成。早在夏、商时代，就有了“击缶而歌”的演奏。此刻它们正以光的律动向我们传递光阴的概念。和着击打声，出现巨大的数字，每次光影数字的交锋，都预示着北京奥运的每秒临近，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倒数，用震撼的节奏，激荡千年祖国的万里疆土，激荡中华民族的奔腾血脉，共同迎接奥运之光的莅临。

图1：奥运会的所谓“缶阵”

上图中敞口容器成为鉴（鑒、鑑、鍳）。

何为鉴？

鉴从金。甲骨文、大篆无此字。

鑑，大盆也，一曰鑑诸，可以取明水于月。

——《说文》

徐灏曰：“鑑，古衹作堅，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鑑，声转为镜。”

镜鉴，光可鉴人，鉴别……源于此。

鉴的形状如下图。

图2：出土文物，鉴

图3：出土文物，鉴

张艺谋攒出来那个缶阵中那些方形敞口容器，很可能源自曾侯乙冰鉴缶（青铜冰鉴、青铜冰鉴酒缶……但是，绝对不能叫做青铜冰缶）。

图4：青铜冰鉴缶

曾侯乙冰鉴缶是由现代考古者命名，它由五部分构成。外面方形的部分是一个铜鉴，里面一个小口斜肩平底圈足的方形铜缶，缶肚子的样子大致迁就于外面的鉴；另外还有两个盖子，一把“勺”。这五部分加起来，被现代出土文物工作者叫做“曾侯乙冰鉴缶”。取五部分中任何一部分或两部分，都不能叫这个名字——你把五件套中的一个盖子，或一个勺子，叫做“曾侯乙冰鉴缶”，进而省略成“缶”，敲之，谓之“击缶”？逗乐子呢吧。同样，你把五件套中的左边那件“鉴”拿过来击之，谓“击缶”，这不是搞笑嘛。

下图中，右侧那个是“缶”——小口、溜肩、大肚、平底、圈足，有穿鼻；放入左边那个“鉴”里，组成“青铜冰鉴”。单说左边那个，就叫做鉴；就像单说那个带把把的玩艺儿那样——那是“勺子”，不叫缶，右边的那个

才可叫做“缶”。

图5：青铜冰鉴五件套

缶为何物？

请自己查字典，不赘述。

缶分两类，

一类属于乐器，甲骨文、大篆、小篆中都有这个字，由小碗状陶制容器演变。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節謌。《说文解字》

秦人老谋子近水楼台，弘扬秦人文化，故采用“缶”之元素，然而，秦人自己也从很早开始就觉得击缶太土了——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因而，作为乐器的缶，是没有用金属制作的，被淘汰了。

这就是作为乐器的缶——2004无锡鸿山出土（下图）

图6 缶，乐器

另一类缶是作为容器的生活用品。这类缶的共性：大肚子（或方或圆）小口儿没脖子、腹部特定部位有穿鼻儿、平足或圈足。没有将这类缶作为乐器的记载。

图7：各种容器缶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开幕式解说词中的“缶阵”、“缶”的提法，都是毫无道理的。看见过司母戊鼎的照片吧；把老谋子鼓捣出来的那些方方正正带四条腿的玩艺儿叫做“鼎”都比较做“缶”要确切一点。

另外，任何语言都是有演变过程的，“鼓（击）缶而歌”，那个“鼓缶”已经演变成“摔盆”的近义词了，都是死了人的意思——《艺文类聚》卷三六引晋孙楚《庄周赞》：“庄周旷荡，高才英隽，本道根贞，归于大顺。妻之不哭，亦何所欢，慢吊鼓缶，放此诞言，殆矫其情，近失自然。”后即借“鼓缶”以指丧妻——新华字典（在线）。如此不吉利的词！

佞臣赵高指鹿为马换来的多数人的口是心非或者沉默。到了现代，利用奥运盛会“指鉴为缶”，多数网民却都“爱国”爱得不口是心非、不沉默了，他们由衷地将口诛笔伐的矛头一致对准了异议——对准那些抨击指鉴为缶的异端分子。

啊！毕竟，时代不同了！！？

本文写于2008年8月9日， 8月10日修改，8月11日上传天益社区杂文天地

原文地址：http://bbs.tecn.cn/thread-289619-1-1.html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谁能证明我插过队

——老了以后的故事

(一)老了以后

大概是在去年某个时候，某次回娘家，弟妹忽然把我拉到一边，搬了两把椅子对面摆好，命令我跟她一起正襟危坐，正正经经地谈一件事——抓紧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她说我对正经事总是不正经，不弄成这样我就不会真的“当事儿听”。

事出突然，我很发懵，呆呆地坐着瞪大眼睛听她论述此事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脑子里却总是跑神儿……其实道理我都是知道的：九四年我从单位辞职下海，是彻底下海，把个人档案交到人才流动中心之后，不但再没有任何工资性收入，就连医疗费用等也全部悬空了。幸亏我从来不生病（老寒腰、老头疼、老胃疼，都是不用看的）。一直就这么混着，一直还混得挺好，但是再往后呢？万一我真活一百多岁以上呢？

弟妹比我小四岁，她没插过队，但是差不多跟我同时当兵，所以工龄跟我也差不太多。那些工龄是“视同已经加入保险”的。弟妹说：“那个得要！不要白不要！咱们不能白给GCD干那么多年！”（老弟在旁边笑道：“听着就好象她替GCD干了多少事儿似的！当兵那么多年你都干了什么了？不也就成天气气指导员儿什么的……”

后来每次回去，只要碰上老弟两口子，他们必定催问我着手去办了没有。他们说他们正在办，麻烦极了——首先要办“工龄认定”——几十年来我们走南闯北乱七八糟所有的折腾，每一步都必须在档案里找到国家认可的证明，“你认为本来就是那样儿的没什么可说的事，一翻档案没有证明材料，你就完了，跑去吧你……”。弟妹当年从武汉调北京，因为实在调不进来，只好把“干部身份”转成“工人身份”办了“工人对调”，而那一段历史在她的档案中却是空白！数十年后的今天，她忽然！必须！为这一段故事找回“国家认可的”原版！可想而知。

老弟说：真是HD逻辑——个人档案是多么神秘的东西，从来也不许我们自己看一眼，现在几十年过去，凭什么来跟我们说缺这缺那，让我们自己负责？！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赶快弄去吧！让你弄上三个月五个月都说不定。但是不管多难都得去弄！放下一切事情赶快去办！

但我一直还是拖着没动，我一直都在忙着“搞摄影”、“考古”……

今天春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又提起这事被妈妈听到了，这回就完了。妈妈由此开始一天八个电话催我，而我也真的必须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天办不好，妈妈就会一天睡不着觉了，老人家会为了这件事而死不瞑目。为了让妈妈放下心，也为了让自己将来不至于成为女儿的负担，我决定正儿八经地把这件事抓紧办了。

正在这时候，原单位一姐们儿来电话，她的名字叫思丽，是北师大文学系的一位小才女。其实她比我大两岁，但长得小巧玲珑，又活泼快乐，所以我总觉得她比我小。电话中很惊讶地听她说：“哈哈！我退休了！”

一提起退休，就想起了养老保险的事。我是九四年辞职的，在九二年，国家曾经下发红头文件,强制规定所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我现在首先需要知道,我们单位那时候给我办了没有？如果办了，现在只需要“续办”；如果当时没办，现在就得一切麻烦从头开始。

思丽说："哟！你还关心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俗人的事儿，你不是特不俗人么你?!前几年我专门打过电话提醒你赶快去办保险，当时你哼哼哈哈心不在焉爱搭不理的，气死我了！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管你这事儿！"

很惶惑地赶紧反省了半天，想起她说的那个时候，正值我上网最疯狂最投入的时期，那会儿俺不是日理万机来着么，呵呵，什么养老保险，"哼哼哈哈心不在焉爱搭不理"在那会儿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不是那会儿了，现在好象忽然想起自己老了！人老了就不再自信了，开始瞻前顾后了，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了，需要抓点儿什么稻草维持平衡了……

思丽挂了电话就跑到单位去帮我查，再回话告诉我说：单位肯定没给我办！我记起当时正闹机构改革呢，人心惶惶乱七八糟的，再后来我就走了……

二月底女儿寒假结束返校了，天气渐暖，我准备开始跑这事，腰病却在这时又犯了一场。妈妈一天一天着急，我也因为妈妈的着急而一天一天着急，直至终于又能从床上爬起来。

（二）"你怎么才来呀？！"

2006年3月20日，星期一

今天下午去人才中心，是拉上老熊一起去的，因为六里堡那个鬼地方一向兵慌马乱，我不知道那些小胡同哪里让走哪里不让走，甚至记不清是哪个胡同口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停车。

路程很近，很快就到了。人才中心所在的胡同口现在立起了"机动车禁止驶入"的牌子，我们只好又转了很大的一圈，最后在旁边一条小街停了车，老熊留在那里看着两只狗狗，我自己去办事。

下了车腰又直不起来了，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痛苦。这段路要拐两道弯，穿行两条胡同，我想，反正走一步少一步吧，就是爬我也得爬到地方。好象很有象征意义——我们这一辈子，一步一步的，走，或者爬。

人才中心搬到这个地方已经好多年了，这些年里曾经来过这里好多次，都是参加"党组织活动"。这些下海的人全都异常积极地"参加党组织活动"，大家说在这里可以交流市场信息、资金信息、人才信息等等，扩大社会活动关系网。不过这些对我都没有太大意义，我一直还是参加，只不过因为这事已经很"过景儿"，甚至显得很另类，所以故意参加一下。只是从闹腰病以后就参加得少了，想了想好象已经有两年多没来这里。

今天走进那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发现空无一人！楼道正在粉刷，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门。楼道尽头有两个女工搬着梯子爬上爬下正忙着刷墙，我喊了一声向她们打听，才知道"人才中心"全部集中到三楼办公了。

三楼楼道顶头的办公大厅敞着双扇大门，直到这里才有点儿人气，而且还真有点人来人往的意味了。我进去之后放下办保险的事，先打听了一下在哪里缴"存档费"。档案放在这里是要缴钱的，两年多没来了，我觉得我不能欠着钱跟人家谈事儿。今天一口气缴了三年的钱，七百多。

办保险也在这个大厅里，一位30来岁的小姐，还有一位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先生，我听见小姐管那先生叫"秦老师"。秦老师正忙着，于是我就向小姐咨询了一下，小姐隔着高高的柜台递给我一张纸让我先看看，那是关于如何办理指定银行卡的"须知"。

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直接还到不了银行，正好这时秦老师稍有空闲，赶快就插进去问他。秦老师先问我哪年辞职的，又问我先前是否办理过保险，然后他突然怒吼一声："那你怎么才来呀？！"他这一嗓子吓得我哈哈大笑！我当即认定，这是一个热心为人办事的人，一个决不会打官腔的人，因为他会生气，他会为你着急。

秦老师还在怒气冲冲地嘀咕，说"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你们怎么能拿着自己的事这么不当事！"他告诉我，现在首先要办的是工龄认定（这个我已经听老弟他们说过了），他让我等着，他到里屋去看我的档案。

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我把自己这一辈子的折腾全部回想了一遍，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准备着听说我的档案中有一百处空白。但是秦老师终于从里屋出来的时候告诉我，我只缺一个“插队证明”，别的材料都是齐的。喜出望外！

秦老师说，八几年的时候，国家曾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一做过一次工龄认定，当时我还在国家机关，机关应该给我做了这个认定，但我的档案中没有。他让我赶快去找，赶快！他说：“你必须在这周之内把这件事完全办好！这周办好就可以赶上三月底以前统计去年的参保人数，我还可以把你加进去，算你是从去年加入保险的。再晚就不行了。记着啊，一定要在这周之内办完！”

从楼里出来去上车那一路上，我自己越想越好笑——我们在网上办什么知青网站，忽悠了N多年什么“三千万知青今安在”，到头来，我连自己曾经是一个知青还拿不出“证明”！

但在这时我满心都是乐观！闹了半天只缺这么一个东西！太简单了！把它弄来不就齐活了？！

狼狼在车上关了那么久，我很心疼，送老熊回家之后再回到大院，又让狼狼在外面玩儿了很久。进家门已经七点多，天都大黑了。进浴缸泡温泉的时候，感觉整个腰肌一带又已痉挛得有如钢板一般。但即使这样，后来还是上网疯去了，半懂不懂地跟着人家弄什么《鬲溪梅令》之类的，一直疯到夜里两点。秦老师要是知道，又该怒吼“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了。是啊，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搞的，有谁知道。

(三)渐趋绝望的皮球

2006年3月21日，星期二

今天全天没出门，但是感觉比昨天还累。

一早起来先给原单位最铁的哥们儿建人打了个电话。从单位出来十几年没回去过，我想先问问江东父老们现在都长成什么样儿了。那时最熟悉的一帮家伙可能很多都退了吧？建人比我小五岁，属于我的“狐朋狗党”或“死党”那一类，他至少还不至于“退”？很可惜他的手机没人接。

干脆直接“公对公”。但我现在连单位的电话都不知道了。上网去查，没想到时值21世纪，我们堂堂的国务院直属衙门，居然还没有一个网站！

最后是在一个电话号码查询网页上找到单位电话的，拨通以后顺藤摸瓜再摸到人事部门。这回接电话是个女的，她先问“你是谁呀？”然后大叫：“怎么是你呀？！你现在在哪儿呢？！”这是小微，原来机关人事局的一个小丫头！

光是聊十几年来的沧海桑田就聊了好半天。小微告诉我说，我走后机构改革又改了无数次，现在机关已经没有了，降格为“行业协会”，成了社会团体，人员也没留下几个，全部集中到老楼去办公了，我们那时的新楼正在装修，准备租出去赚点儿钱。她说：你要补什么证明可太难了，就算给你写了证明也没法盖章啊，机关的印章已经封存，协会的章盖了能算数么？

其实小微认为，“那帮人”也太矫情了，还要什么证明啊！她说档案里有当时的“干部任免”，是盖了国徽章的正式材料，那上面有很详细的个人简历，等于已经认定过了，那还不能作依据么？！

我觉得也有道理，电话打回人才中心去请示。秦老师今天出去办事了不在，让我有点儿遗憾。接电话是一位中年女士，她不敢拿主意，给了我电话号码让我直接去向“社保中心”咨询。

社保中心的咨询电话很好记---12333。接电话的女士显得训练有素，而且很干练，一句废话都没有，她让我先向人才中心问清楚，缺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材料，要准确的、完整的材料名称，然后再来咨询怎么办。她认为我其实也不用再问了——原单位属于国家机关的，如果在原单位找不到所需的材料，直接就去中央档案馆！

我！俺！偶！至于么，这么一个破东西，就去“中央档案馆”？！

首先，我问清楚了，能证明我插过队的那个材料，它的“准确的完整的”名称是叫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龄认定表》。那是一张表格。

我想问问小微是否对这个表格有印象，她不在办公室，一时又找不到她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闲着也是着急，我干脆真的去网上搜索“中央档案馆”，可能多少也是带着一点好奇。

电话在中央档案馆范围内又转了三、四个地方，最后让我找的是“利用部”，听这名称好象挺对路，但是电话一直拨到中午也没人接。

一边拨着中央档案馆，一边继续找小微。再次找到她的时候，提起那张表格，她顿时显得很恍然！她说刚刚见过这种表格，是在清理档案柜的时候，她觉得好几十年的东西，已经没用了，所以全部“处理”了！就在上个星期！

我心里哇塞了一下，却也没有特别晕倒，我那张要命的表格说不定是塞到哪儿了，也未必就在她那堆废纸里面。但它究竟在哪儿呢？小微想起当时人事局管文书档案的韩蓉，建议我找她问问，看她能不能想起点什么。

韩蓉已经调到国家XX委去了，还是干人事。小微只有他们处长的电话。我又不认识人家处长，很冒昧地直接打了电话过去叨扰，没想到那位女处长张口就告诉我说：他们那里没有韩蓉这个人！我坚持认为不可能，女处长想了想才说：“那你问问我们办公室吧。”电话打到办公室之后又转了四次，终于找到韩蓉。我松了一口气，也顾不上去想那位女处长是怎么回事了，连自己手底下的人头都数不清，还管着“国家XX委”的“人事”？！

韩蓉比小微大几岁，原来在机关的时候，对小微还不如对她更熟悉一些。今天终于打通电话之后，我很高兴地热情扬溢地大叫了一声“韩蓉！”电话那边却只是很矜持很客套地说了声：“哦，是你呀，有印象。”忽然感觉到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关于我的事，她说她也不太清楚，那时她是管直属单位的，不管机关这一块。她说要不然你去找找那谁谁谁吧，或者那谁谁……然后她说：“我要去开会了……”俺的热情扬溢也只好就此拉倒。

官气是很明显的，但也不完全都是官气。我很了解机关那些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象韩蓉这样的，他们把所有下了海的人全部看作暴发户，于是就有了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尊严。如果有一定的官位，这种尊严也可能跟官气混在一起。不管是什么吧，反正我觉得我全都能理解。人老了没别的好处，就这点好处——啥都能理解。

这个电话刚刚挂断，铃声又响，我拿起来一听就知道是建人，他那边傻乎乎地还“请问早上谁打我手机？”我板着脸回答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机分离，必有问题。”他说：“哈哈！怎么是你呀！没想到！我人机没分离！昨天开会调小了铃声，忘了！没听见！”我说：“别解释了，小心越描越黑！”哈哈大笑！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朋友，重逢就是这样子地。

建人比我晚几年离开机关，后来去了行业报社。这次电话里才知道，他们报社已经归到某某日报去了，跟原机关也脱离了关系。但他说因为业务上有联系，所以还是经常回去跑，有些“老人儿”还在，可以找找他们。这会儿他正在窦店那边办事，他说恐怕得明天才能回机关去帮我问了。明天下午他又出差，只能明天上午。他说：“你别着急啊，明天上午我就去帮你找人！”

我说“好的”，其实我想我可能等不到明天。时间已经临近中午了，我想了想这会儿还能做什么，最后决定给老弟打个电话——他们遇到的麻烦比我多，说不定能给我一点什么启发？

老弟两口子外出办事正在路上，老弟开着车，电话是弟妹接的，她建议我去东城区档案馆（我们学校是属于东城的），她说他们公司的老宋前不久刚刚办了社保，那家伙也是插队的，也是没有证明，后来就到区里的档案馆花二十来块钱开了张证明，社保那边认可了。弟妹说他们公司的司机张建去过东城档案馆，过一会儿她让张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那地方怎么走。

我先到网上搜了一下东城区档案馆，很奇怪的网页！找不到办公地址、乘车路线等等，倒是占着重要篇幅放了一张历史照片在上面，宣布他们的房子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好象他们的主营业务是要办旅游？定睛看那张老照片，认不出那是什么地方，我立即想到应该带着相机去，甚至开始考虑拍摄角度什么……真成了业余职业病了！我命令自己赶紧打住！吃饭都没着落呢，还忙着考什么古啊考古！

张建这会儿正好打了电话过来，据他说照片上那个地方是在外交部街。那一带是俺小时候的码头啊，但我还是想不起哪有这么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建说那地方非常难走，而且绝对不好停车，他建议我还是先打电话联系，能不跑就尽量别往那儿跑。

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小伙子接的，听声音很爽快，也很友善。我先说：“午休时间，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什么事您说？”一提插队证明，他告诉那没戏，我得回学校。我争辨说有个朋友刚刚开了这种证明，就是在区里档案馆开的。他说那一定不是东城区，各区情况不一样，东城区的插队材料统一没有上交档案馆，全部留在学校了。

没想到这大半天转来转去，最后居然要转回我的母校！而且是在我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候！顿时一种酸甜苦辣的感觉……

查到学校的电话打过去，对着电话那头儿每一个声音都规规矩矩叫“老师”。这种规矩不是刻意，是不由自主就那样子的，我觉得自己就差把手背到后面了！离开学校的时候16岁，对母校的一切情感好象永远都停留在16岁。而老师们一听说是自己学校的“老毕业生”，声音也都变得格外和蔼。她们让我找档案室的刘老师联系这件事。但是档案室的电话整整一下午都没人接。

这周必须办完，但今天是星期二眼看着也就这样过去了。

快五点了，天色已近黄昏，建人这时又打了电话过来。他说明天出差可能要提前走，他怕明天来不及，所以今天还是提前一点赶回来了，打电话这会儿就在机关。他已经帮我问了几个人，都没找到有用的线索。大家议论中只是想到了当时“机关干部处”的李虹。机关干部处当时是最直接管我们的，大家都认为李虹有可能记得点情况。李虹也调到外单位了，建人说找到了她现在的电话，但是拨到现在一直没人接。我说：“你把电话给我，你别管了，你赶快回家吧。”终于赶在下班之前找到了李虹，但是继续一无所获。李虹什么也想不起来，她又提起四、五个人的名字建议我继续再去找找，试试看。

到这时，我对“机关”这东西已经完全不再抱任何希望。晚上老弟来电话问情况的时候我对他说：明天我回学校！如果学校再不行，我就不跑了，我找秦老师去说，我坚决放弃插队这两年，我不要这两年工龄了，我也不要这段历史了。

其实昨天秦老师刚刚告诉我“只差一个插队证明”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么说来着！我说那我不要了。但是秦老师说不行！他说简历里有的就必须都得有，必须是齐的，规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想好的这最后一条退路，也还在未知之中。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当初插队是摊派，去不去都得去（当然这里要说明，俺是自己报名去的），到如今计算工龄也摊派，要不要都得要！“插队”这事儿，怎么这一辈子就算是缠上我们了……

晚上接着上网玩儿，明天的事明天再去想。

今天还是春分呢，我都没想起看一眼窗外的阳光！

(四)失踪的母校

2006年3月22日，星期三

早上七点半打开电视，接着看电视剧《乔家大院》重播，心不在焉瞎看，心里其实一直在盘算今天的事情如何进行。很严重地想到：星期三了。

捱到上班时间，先给人才中心打了电话。秦老师今天在，我报告说机关没戏，今天准备回学校。我想让他先认可一下。

秦老师说：学校可以，档案馆也可以，户口所在地也可以，这个证明不管谁开，注意两点：第一，必须注明是从哪年哪月至哪年哪月；第二，插队去了什么地方，省，县，公社，大队，一定要具体到大队！

我说：“至哪年哪月”不可能！学校只知道我什么时间去的，学校怎么能“证明”我啥时候离开的？！

秦老师说：学校证明不了也得证明！因为你后来入伍没办正式的“应征入伍”手续，看不出来你是从哪里到部队的，所以从插队到当兵，这中间你都去了哪儿，等于还是一块空白，如果不能把插队时间一直证明到你入伍那个月份，你这段工龄还是续不上。那就白证明了！

我忽然知道他为什么首先盯着我去找那个“认定表”了——那个表格的统一格式肯定是“从哪年哪月至哪年哪月”的，如果能找到那个表，事情就会简单。但是现在简单不了了，现在不管我找谁去开证明，都会遇到这个“至哪年哪月”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证明，这是一个强人所难的证明！

别人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别人后来离开插队的地方，不管是招工、是上学，都会有一个正常离开的手续。但我没有。七零年底父亲还没“解放”，试着帮我“走后门儿”恳求了一下当兵的事，大家都以为成不了，没想到居然能成！当时我以为天上掉了个馅儿饼，接到通知头也不回欢天喜地就跑了，做梦也想不到36年后，这麻烦还是自己的！福兮祸兮，河东河西。上帝，佛祖，老天爷，I服了U!

另外，插队地点要“具体到大队”也是很悬的。那会儿都是“大拨儿轰”，一天一趟专列，学校每天要送走几十上百个学生，知道我们去了原平不难，学校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被分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么？

下一个电话就准备找学校了，对着电话机先运了一下气，然后抱着“上刀山下火海”般的心情拿起话筒……

今天只拨一次就顺利接通了档案室的刘老师。电话里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声。她说开插队证明没有问题，让我下午去，因为上午要开会。

刘老师说：“证明我先给你开好，还是等你来了再开？要不等你来了再开吧，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具体怎么写？”我赶紧说“好！”在电话里我一个字儿都没敢提我的“具体要求”，因为电话这个方式不好，如果在电话里说了“不行”，事情就很容易被顶死。

七上八下地一直混到午后。出门之前又跟刘老师通了一次电话，这是约好的，因为刘老师怕我白跑，她准备抽时间先翻翻名册，确认一下有没有我的名字。这个电话直到两点钟才打通，刘老师说，在插队的名单上没找到我！她甚至告诉我说：连我们班的学生名册上都没有我！

非常哭笑不得！我说不可能吧！至少我们班得有我？！我告诉刘老师，在学校的时候偶还当过“大队长”呢！至少在我们班的范围内也得算个知名人士吧？怎么忽然就没有我了？！这是谁干的！！

小刘老师听得笑起来！她再去查，然后说“哦有了有了！”在插队的名册上后来也找到我了，原来小刘老师并不知道我们的“七年级”当时是被划入了“67届”，她一直在68届里找来着。

我迫不及待请她赶紧看一眼我们的去向是否“具体”，她说很具体啊……原平公社，桃园大队，对么？我说“对！”心里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们的学校一直把我们每一个人去了哪里这么详细地记录在学校的档案室里啊！38年了！

立即下楼上车。犹豫了一下是否拉上老熊一起去，因为担心沙滩那一带自己已经不会走，但是实在又很想“独立”。最后决定打个电话试试，打得通打不通看天意。电话没人接，那家伙肯定是睡大觉了。

这一路走长安街/甘家口/车公庄/平安大街/地安门/北河沿/沙滩……事先没看地图，中途不用找北，城西城东，一气呵成。38年城市变化翻天覆地，回学校的路好象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

过了沙滩路口，再掠过65中大门，我觉得快到了，开始放慢车速。至此才开始有点晕菜，昔日灰头土脸的小街已经变成一条宽敞美丽的大道，过去的痕迹几乎完全找不到了。特别留意到：过去经常去买“蜂窝煤”的煤厂那一带，现在盖起了洋里洋气的楼房……

在右手边看见一条极窄的小胡同，巷口有“骑河楼”的牌子，我认为就是这儿！扎进去以后却又发觉这条胡同实在太窄了，不象……开着车，抬头看见了右边围墙里我们学校的楼，虽然重新贴了磁砖，面目全非了，但我仍然认识这就是我们的楼。再往前走，前方有一座铁栅栏围起的院落，很破旧的楼房，那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妇产医院”。只是妇产医院也变得非常小，跟这条“骑河楼胡同”一样好象全都缩了水。

我应该在这里有最后一个右转弯，而那条更窄的小胡同也真的在眼前如期出现。再扎进去就应该看见我们学校的大门了，但我把这条小胡同一直走到头，只看见了唯一一座关闭的大门，牌子上写的却是“65中”！这应该是65中的一个后门。我们学校和65中是隔壁邻居，65中是在这里了，可是我们学校呢？我们学校哪去了？！

停了车把狼狼撒出去放放风，我自己点了根儿烟站在那儿犯晕。小胡同里空无一人，想问问都找不到人问。我把自己的方位来回想了一遍，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我早拐了一个巷口！也许还在前面？确实拐进来的小胡同实在太窄了，本来也不象。但是妇产医院和“我们的楼”呢？

我全都看错了？来不及再多想，我决定转回大街上，放过这个“骑河楼”，再往前找找看。

早年间的码头毕竟比较熟，我知道从北头的公安医院那里可以转回到大街上。但是回到大街上了也没用，这次一直走，不进骑河楼胡同，下一个路口眼看着就到东华门了！这中间再也没找到其它胡同。

调头转回来，把骑河楼路线重新又走了一遍。我开始怀疑刚才是不是路过了学校的大门却没看见。那么窄的小胡同，这怎么可能呢？！再次走到65中后门，再次一无所获，再次停车，继续晕菜。我们的学校好象是蒸发了！这才真叫大白天的见了鬼了！可是电话中温柔亲切的小刘老师呢？难道她也是个鬼么？

站在原地给小刘老师拨了电话，她在电话中大笑起来，连说“抱歉抱歉”，她忘了告诉我学校早就搬家了，现在搬到了灯市口，就在25中隔壁！

原来“我们的楼”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楼了，归了65中！想起当初我们曾经梦想过哪天把65中的地盘儿圈过来，看来最终还是他们把我们的地盘圈走了。TMD65中！

刘老师还准备告诉我去新校址应该怎么走，我对她说那就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我知道要从乃子府胡同穿过去，还知道车只能停在乃子府胡同东口，剩下那段路必须走着过去。我们家在这一带住过20来年啊。

路程总体很近，但是后来步行的那段路走得不顺，问路问得比较糟糕，被人支到小胡同里去了，绕了一个大圈一直绕到学校后门……反正最终还是找到了我们陌生的母校——陌生的操场，陌生的楼，小崽子们望过来的陌生的目光，还有校门外等着接孩子放学那铺天盖地一大片小汽车以及一大堆虔诚的爷爷奶奶们，所有这些全都很陌生。不陌生的只有学校的名字，还有自己的心情。

从后门儿摸进校园，东一头西一头到处乱撞，进到楼里又上上下下打听了半天，最后才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走廊尽头找到小刘老师的档案室。

(五)“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2006年3月22日，星期三(续)

进门的时候，我叫了一声“刘老师”，还企图给老师多少鞠个躬来着，但是老寒腰已经半点都鞠不下去了，试了试只得作罢。刘老师迎上来说：“别呀！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管您叫老师！”她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小巧玲珑、文文静静，很配电话里那个温柔的声音。以她的年龄推想，有可能我们离校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

房间里亮着灯，几面墙全是档案柜，桌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卷宗。刘老师拿起一张纸递给我说:“我还是提前给你写好了，想让你省点儿时间。你看看吧,不行咱们再重写。”我先扫了一眼“原平公社桃园大队”，然后就盯住了“曾于1968年12月赴”那几个字。我把人才中心的要求和我的麻烦等等全都跟刘老师说了，恳求她帮我加上“至1970年12月”那几个字。

小刘老师说这个不行啊，学校不能证明学校不可能掌握的情况。我说我也知道这个不行，但是不这样写，我插队的简历就不能跟后边儿当兵那一段接上，接不上我就不能办社保，办不了社保我再老一点就该饿死了。

小刘老师听明白了，但她很为难，她说“那我给你问问我们主任吧”。

我在旁边听着她给主任打电话。她试图用最简短的语言把我这点儿麻烦事跟主任讲清楚，但是一简短就简短得不对了——她对主任说：“……现在不仅要帮她证明去插队，还要帮她证明去当兵……”我赶快摆手打手势告诉她不是这样的！但是已经晚了。她挂了电话对我说：“主任说那不可能啊。”

我已经累得差不多算是死了心了。借刘老师的电话打回人才中心，我告诉秦老师，我现在就在学校，学校果然只能给我证明“自哪年哪月”，不能给我证明“至”！秦老师又开始给我讲为什么一定需要这样证明，我说：“道理我都知道！可是现在不是你给我讲道理啊，现在是我想问你怎么办！”

从这里开始基本上就进入吵架状态了。我的声音很大，他的声音比我还大！小刘老师在旁边看着，很着急的样子。她大概看出我的老破腰不行了，拖了把椅子过来，打着手势让我赶快坐下。

我对秦老师说：干脆我也不要证明了！我还是要求放弃插队这两年！你就从当兵那年开始给我计算工龄吧！他仍象上次一样，一口回绝说不行！我大叫：“凭什么呀？！不就是申请加入一个保险吗？！谁规定的必须从参加工作那年开始加入某一个保险？！我半截儿忽然想加入了就不行？！”

秦老师好象有点没词儿，他不说这个了，忽然一拐弯儿又说：“学校实在办不了，那你去找街道吧！”我说：“什么街道！我没街道！我们原来住的那一片儿，胡同儿早都拆成平地了，盖成宾馆了都，哪还有什么街道啊！”秦老师大叫：“街道！我说的是街道！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街道啊？！！什么胡同儿拆成平地！！”他这会儿基本上已经是咆哮了！

其实我好象知道什么是街道，“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所谓“街道”也是一级政府衙门呢，我知道！我只是把街道和居委会搞混了，拆成平地，人都没了，所以我认为街道也没了。那就算“街道”还在吧，我觉得照样也没戏！我的插队资料从来也没转过街道，恐怕他们不但证明不了“至”哪年，就连“自”哪年也证明不了！

秦老师说：“那谁都不肯给你证明，我也没办法了！你问我们处长去吧！”我知道谁是他们处长，前几年还参加“党员活动”的时候，那位女士一直是负责组织我们政治学习的……可我不想去找处长，我就想跟秦老师说！只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不知道再说什么了。

挂了电话，坐着喘气儿，抬头看看小刘老师，我忽然笑起来！——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干什么呀！

我问小刘老师:“你们主任在哪啊？能让我直接去见见主任么？我想再争取一下。”小刘老师告诉我：主任姓孙，在二楼，校长办公室。她说：“你去吧，反正要盖章的话也得去找主任。”她让我拿着已经写好的那张证明上去，争取不成的话，就在那上面直接盖章，如果主任能同意我的要求，她说“主任会另外给你再写一张的。”

在二楼校长办公室找到了孙主任。女主任四十出头，很友善，也很爽快，但是我把情况又跟她说了一遍，她一直还是摇头。她说：“其实你可以找部队给你出个证明啊？”我告诉她武汉军区已经撤了不知多少年了，我没地方再去找部队，何况那时我是自己跑到部队去的，档案扔在山西根本就没带，部队压根儿不知道我是打哪儿蹦出来的，他们什么也无法证明。主任说：“咦？对了！你让插队那地方给你出证明啊？！哪年至哪年，他们最清楚了！”我几乎要大哭！我说：“主任！就为了这么几个字，您不会让我专程再跑一趟山西吧？！”

磨矶到最后，我认认真真地说：“主任，我知道今天不是你们不想给我办，是我自己提的要求本身就不讲道理，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也不知道还能求谁，只能求自己的学校帮帮我这个忙。如果是什么弄虚作假或者违反政策的事，那我也不能来找学校，可这几个字完全都是实际情况啊！咱们学校的同学，和我同村儿的有十好几个，旁边几个村儿同一公社的还有一大堆，您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压个什么证件在您这儿，我去找同学给您写证明来，你要几份我给您弄几份来！您想想，那会儿我们16岁，把我们搁那儿我们就在那儿呆着了，确实一直就是在那儿，我不在那儿我还能跑哪儿去啊？”

主任这会儿终于点点头了。但是她说：“那小刘老师怎么说你还要学校给你证明当兵的事？”我赶快说:“没有没有！不是……”主任说：“那还是你自己没说清楚。”我说:“是！都怪我没说清楚。我不是着急嘛，一着急就说不清楚了。”

于是主任一边继续批评我办事不把事情说清楚，一边就取出纸笔重新给我写证明。我在旁边看着她一笔一划写到“自1968年12月至1970年12月赴山西……”，她忽然停下来，歪着头自己看了看说：“这个赴字用得不对。”我赶紧说：“那个没关系的，无所谓。”她说：“不行！前边有了这个至字，后边再用这个赴字就不通了！”不管我多么反对，她终究还是撕掉那张纸，又从头另写了一张。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直接下楼回家，实在没劲儿再去地下室向小刘老师告别了，我想，回头再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吧。

这时已近黄昏，眼前是一间间教室，宽敞的楼道，还有拐七拐八的内廊、外廊，到处都洒满了夕阳灿烂的余辉。我想起小刘老师的档案室，那里太阴暗、太寂静了，感觉就象能听见水滴落下来的声音。小刘老师就那样终年不见天日地守着那一柜一柜的档案，那里面有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我们班的同学中已经有辞世的了，相信他的名字也还在。多少年后，我们这些人早晚也会全部咣当，再到将来的将来，仍然记得我们的，除了我们的子女之外，也许还有我们的学校吧。

出了楼门，我习惯性地摸出一支烟，但随即就想起这是在校园里！不管多么陌生，这里仍然都是我的学校。我把那支烟握在手心里，又把手插进了口袋，规规矩矩直到走出学校大门，才赶紧把那支烟点上……

本来计划办完事就拐回学校旧址去拍照片，但这时已经五点多了，天色很快就会暗下来，街上也已经开始进入下班时段车辆涌堵的高峰，所以不敢再到处乱逛，就从南河沿拐上长安街，直接回家了。

狼狼又在车上关了一下午，回大院好好让它撒了撒欢儿。正式上楼回家已近七点。进门什么都没干，一头倒在床上立即就睡着了。

九点多妈妈来电话把我吵醒。妈妈问："办好了吗？"我说："正办着呢。"到这时仍然不敢跟妈妈说得太乐观，因为我不知道明天把证明送去人才中心，会不会再蹦出什么新的问题来，我怕再让妈妈"闪"一下。

(六)题外题——老妖精遇到新问题

2006年3月23日，星期四

早上打电话报告秦老师："证明办好了，是按你说的正规要求写的。"秦老师说："哦。好。"大家全都平平静静的，就好象昨天的大吵根本不曾发生。

秦老师让我下午再送过去，他说上午人太多了。正好还有时间，他让我先去把社保缴费的专用银行卡办好。先办卡，再去找他，今天的程序就这样了。我问他："这周之内办完，我没晚吧？"他说："来得及，不晚。"

今天一上午就赶快抓紧休息，做操，抽空还看了看盘。我把扫描仪搬出来了，用很高的CPI扫描珍藏了我的插队证明。是按"彩色照片"的规格扫描的，红色的校印，甚至可以看到纸张的轻微皱痕。

下午两点出门，绕了点儿路先去银行办卡。我以为是分分钟就能办好的事，没想到银行的小姐业务如此不熟练，办张破卡晕头转向整整弄了一个半小时，弄到三点半！照顾一下狼狼，再跑到六里堡，快四点了。

今天一进办事大厅就看见秦老师特别忙，好几个人围在他那儿，桌上还横七竖八摊着一大堆成册的表格，他正忙着往电脑里输什么东西。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三月底以前做去年的统计"了。

抽空把我的"插队证明"递给他，我嘱咐着："可别给我丢了啊，我好不容易弄来的。"他根本不理我，跑到大厅另一头去忙活了一阵，然后跑回来，递给我一张纸，是收到某某材料的正规"回执"。

接下来就是预料之中的填表了。要填很多表，那些表中有很多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办公柜台里面这时正好来了一个小伙子，在向秦老师请教什么问题，我后来就抓住他了，不明白的那些全都去问他。那是一个小帅哥儿，反应很敏捷，性格很幽默。后来才知道他姓"向"，我管他叫"小向"。

印象比较深的是要选四家"医保指定医院"，按规定是选三家比较好的大医院，外加一个社区医院。我平时不看病，对医院也没什么印象，好不容易想出几家医院的名字，小向又都告诉我"不用填"。据他说，北京市指定了12家医保定点医院，凡是列在其中的都是不用填的。关于这些事，他说报纸上都公布过，"你从来不看报的呀？"我宣布他这是挑衅，但我顾不上理他。

其实我觉得有这12家就够了，但是不行，表上的四项必须填满。非常头疼！小向抱来一个比电话号码本还厚的大本子给我，让我查，那上面

密密麻麻分城区列出了全市所有可供选择的医院。谁有功夫看那么多啊！我就胡乱想了几个填上了，只要小向说行就行。反正他说以后随时都是可以改的。

小向后来请教完他的问题准备走了，我叫住他让他别走，他说“别走干嘛？”我说：“坐着！”他说“坐着干嘛？”我说：“秦老师这么忙，以后你干脆别干别的了，专门就坐这儿给我们咨询算了！”他笑起来，后来真的就没走，坐在那里跟我们一起一直聊到下班。

其实我不是开玩笑的，社保这事确实需要有个人专门给大家作作咨询，因为这事被弄得太复杂、太深奥、太神秘了，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搞清楚的。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们搞清楚什么吧，作为老百姓，知道自己每个月必须缴给保险公司多少钱，就得了。

我刚来那天小姐给我的那张“须知”很重要，那上面有2005年的“缴费基数及月扣款明细表”，左边第一栏首先是“缴费基数”，从600、800，直至3000、7000，共分八个档次。选定基数以后，就可以在右边各栏中查到自己该缴的钱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每个险种每月各缴多少钱，还有三险的“月合计”、“年合计”。

问题在于：这些数额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经常调整的。

问题还在于：不管人家怎么调整，你都必须保证自己卡上的钱足够保险公司按月来扣缴。一个月没存够，下月必须补齐；下月再不够，保险关系就停了，你要重新再办保险申请！

我认为这太可怕了！他们变来变去的，我怎么知道每月要存多少钱进去才够啊？！小向说:“看报纸！你总是不看报纸！”秦老师说:“自己去查！自己去算！13亿人民呢，你等着谁一个一个来给你算？！”

很头大！头巨大！而且，我现在就连什么是“基数”都还搅不清。我问秦老师：“基数是否就是我将来想领回多少钱？基数600将来每个月就拿600？基数7000将来每个月就拿7000？”他说不是！他说基数只是一个档次关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至于将来领回多少钱，他让我死了心算了根本不要去打听，他说那个问题“太专业了”，而且现在任何人都无法答复我，因为那些标准和系数都是随时在变的，不到领钱那一天，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

这两天我已经在网上查看了一些资料，模模糊糊大致知道将来保险公司给我们钱，是根据四个方面动态的的标准，再乘上四个方面动态的系数，乱七八糟累加出来的。那东西确实太专业了。

秦老师说：反正在一切因素当中，决定你将来拿多拿少，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你的“账户余额”。你就盯着自己的账户余额就行了，别的你也管不了。

我又不懂“账户余额”！秦老师说：你缴给保险公司的钱，有一部分等于是上缴给国家了，剩下一部分留在你的账户里，累计起来就是你的账户余额。这是将来计算你拿多少钱的基础。

我大概齐听明白了。大概齐也就行了，我懒得琢磨太多。我决定先不管将来的事，先把眼前的事办完——首先确定我的基数，然后填完那些表……

但我仍然不知道那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基数应该怎么选，秦老师说：“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我说：“我没经济实力！那我就选最低的吧，600？”秦老师抬头看看我说：“你已经缺那么多年工龄了，如果选得太低……”

我大吃一惊：“我怎么还缺那么多年工龄啊？我不是已经补齐了么？！”秦老师说：“你九四年辞职，现在才来办保险，你说你缺不缺工龄啊？！”我说：“你指的是这段儿啊！这段儿我不是缴一笔钱就可以补上了么？人家都告诉我要先补前面的，一次性要补好几万……”秦老师说：“谁给你补啊？人才中心可给你补不了！档案放在这里是没有工龄的，除非你自己找一个单位，让他们给你补上工龄，你自己再补齐保险费，那样才行。然后你愿意把保险关系转到我们这儿的话，你还可以再转回来。”

这是我若干天以来遭受的最沉重打击！想当初辞职下海，把档案交到人才中心，就是因为人才中心可以“连续计算工龄”！当然这只是听说的，我也没去核实过，但我一直以为就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工龄是在连续计算中，只是没缴保险费，什么时候想缴，补上就行了。直至今天我才

知道，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

秦老师这时放下手中一切活计，很认真地对我说："要不然你先别办了，你还是去找个单位？"我紧急思考了一秒钟，这是非常认真的一秒钟！然后我下定决心说："不！不找了！就这么办吧。所谓多几年工龄，不也就是多缴几年钱么？不还是积累账户余额的问题么？那我现在多缴，能缴多少缴多少，缴那个最多的，我选7000！"我猜想这些年来如果我一直有个单位，由单位给我们上保险，单位也未必会把"基数"选得很高，我准备争取一年缴他们好几年的，能弥补多少补多少。即使弥补不了，也不再耗费时间精力了。办一个插队证明都折腾得我半死，再找个单位补十几年工龄，我估计就算办好，我也得死过去好几回了。钱多钱少，人不能活得太累，也没必要太累，凑合差不多就得了。

一听说我要选7000，秦老师忽然不吭声了。当时周围人还是很多，他又低头去输电脑，把我晒在那儿一直跟小向聊天。

"社保"如今已经是关系到十几亿人生存状态的大事了，我今天抓住小向，赶快向他打听一切有关社保的基本知识，而小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简直不可思议！他说："你们平时连这些都不关心，成天净关心些什么呀？"我说："我们？我们关心什么？我们关心……比方说……哈马斯怎么当选了呀，反恐斗争形势……"他哈哈大笑！切！这有什么可笑的！我们很可笑么？我还没跟他说考古呢！

小向后来又想起一件事，他说："明年六月你就该到退休年龄了，不是到了年龄就自动退休的，你还得来办退休申请，要提前至少两个月，明年四月你就得来，或者再保险一点，三月份你就来！一定记着这事，千万别忘了！要不然到时候你拿不到钱的。"

一直拖到下班时间，大厅里来办事的人全部走空,就剩下我了，秦老师这时才对我说:"你不要选7000吧。你现在缴的钱大部分都要入了统筹那一块，没有必要的，3000就可以了。我现在给你做的是从2005年1月开始补钱，这一段你就按3000的基数缴吧。七月份还要调整一次基数，到那会儿你再把基数改成7000是可以的。"

我感觉到这里面的学问很大，但也来不及问得再多，我坚信秦老师所说的一切肯定都是有利于我的，决定就按他说的办了。

告辞出来的时候，秦老师还在嘱吩我："七月份别忘了来改基数！"小向则在旁边嚷嚷着："还有明年三月份来办退休申请，一定别忘了！"今天是星期四，这周之内果然如期办完，而且，我又了解了社会上的很多事，很多人。这是非常热闹的一周！

晚上给妈妈打电话，正式报告我"办完了"。缺工龄的事省略了没说，我准备永远都不对她说，我只说一切OK！据说有一种撒谎是被允许的……

老弟刚好在电话旁边，他接过去又聊了半天。找单位补工龄这件事，他说"是可以办的啊！"他说他就可以给我办，但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折腾，非常麻烦。我说我已经决定不折腾了，也就不再去想这件事了。

我刚知道老弟实际上也缺好几年工龄，就是因为档案资料不全，存放档案的单位根本没跟他说，擅自就把他那几年工龄砍掉了。他嫌麻烦，也懒得再去找。

我很惊讶工龄原来是可以随便"砍掉"的！也就是说，我要求放弃插队那两年，本来也是可以的？秦老师说"简历里有的就必须有，必须是齐的"，也许他根本就是瞎编！为的只是逼着我去办！怪不得我跟他讲理的时候他那么没词儿呢！当然，他是好心，因为我的工龄已经损失很多了，他不想让我再少。那就算了吧！呵呵，据说有一种撒谎是被允许的……

2006年3月24日

爱辉庆典——全国第一个“知青博物馆”

今天是8月11号，吃过早饭，我们就开始向爱辉方向出发。驶离宾馆上道，才发现街上已经实行交通管制。数不清的交警在各个路口把守，一切社会车辆暂停通行。我们被堵在一个很大的圆盘边上。过了一会，从我们的右手方向驶来一个车队，警车开道，后面跟着数辆大巴，中巴，轿车，吉普，浩浩荡荡，沿东方一条路向爱辉驶去。车队过后，社会车辆开始放行。我们紧紧地追赶那个庞大的车队，幸好他们的时速保持在60-70迈，而且似乎同方向的社会车辆并不多，我们很快就跟了上去。

这是一条沿江的边防公路，不算很宽，路况还可以，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到了爱辉。一路上，每一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禁止所有车辆穿行，所有路边的村庄路口，都三三两两的停了一些农用车，等候车队通过。这种气势一直保持到爱辉区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知青也是可以如此风光荣耀的。

爱辉现在是黑河市的一个区，当然以农业为主。150多年前，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让小小的爱辉城闻名世界，如今，原来的爱辉古城已经不复存在，爱辉也失去了原有的面貌，在黑龙江将军府的原址上建起了爱辉历史陈列馆，常年对观众实行免费开放。今天，爱辉又一次重放光辉，这里修建了全国第一个“知青博物馆”。在爱辉进口的路北头，远远可以看到一座红色的高大建筑耸立在南边，那就是由许多上海，北京在黑龙江插队、兵团的知青共同捐款建立的“知青博物馆”，上午九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和黑河市的各级领导以及在北京上海从政的一些知青官员共聚一堂，在这里为“知青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

会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飘，与会的知青胸佩代表证，身穿印有“知青博物馆”字样的三色体恤衫在博物馆门前的大广场入座，分为黄区，红区，绿区。每个区都有一名美丽的女孩子手持指示牌，引导来宾。一个巨大的彩虹门飞架主席台前，上面几个大字格外醒目：“热烈祝贺知青博物馆开馆！”彩虹门旁一张红色的巨幅条案，上面是一副巨型横标，与会的各地知青用签字笔在红标上密密麻麻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晴空万里，阳光普照，烘托着热烈的喜庆气氛。

说来有意思，我进入广场时，被一名武警战士拦住，查看证件。而我因为是意外赶上，没带任何证件，有个身

份证还在老伴那里。我跟他说，我是山西插队的天津知青，来黑龙江旅游，正好碰上知青博物馆开馆，所以就来看看。那个武警孩子不理解，也不通融，禁止我入内。

这时一个会务组的戴眼镜的老知青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照实说了刚才的话，他看了看我，很快伸出一只手，“欢迎你，知青朋友，请黄区就座！”呵呵，这就是知青。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知青的DNA是写在脸上的”。四十年了，只要双方都是知青，走到哪里，都能相互认出来。要不，怎么说，天下知青是一家呢！

在这里，我还碰上了中国知青网的几位负责人：周秉和，马运昌，乔丹阳和董荃，他们都是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这次活动的。

会后，我们参观了博物馆，里面主要再现了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宁波等国内一些大城市知青四十年前来北大荒插队，兵团的生活片段。展览内容全面，详实，客观，生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据会议组人介绍，这个博物馆是面向全国的，它不仅是全国第一个知青博物馆，也可能成为第一个全国知青博物馆。

“知青博物馆”为知青书法家周京生题写

与会知青签名

我也签了一个

中国知青网负责人，知青代表周秉和与董荃

我和周秉和

中国知青网负责人马运昌和乔丹阳

“知识青年在黑龙江”

知青展览

知青当年的实物

知青返城的倡导者

知青展览

知青展览

知青展览

知青作家群

知青作家群

知青作家群

往事回忆（一）

他们的故事

1968年-1969年是中国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所以不管是08年还是09年，纪念知青下乡都叫40周年，这很有意思，混乱的年代让数字也跟着混乱。我实际上在农村仅仅呆了三年，大概还差三个月，如果加上回家看父母的时间，充其量有一千天。但是我在那里的县城工作的时间却有十年，短短的一千天加上漫长的十年，让我终生难忘。四十年过去了，我虽然痛恨那场强迫我离开父母，到很艰苦的农村去劳动的运动，但是每每回想起我插队工作的中条山区，心中却总是被牵动着一丝乡愁。

我插队的小山村共有102口人，22户人家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中条山脚下的一条浅浅的沟壑里。村里有村村通，就是县广播站在每家院子里拉的铁线小喇叭，一天广播三次，先是新闻，然后是文艺节目，大多是当地的蒲剧样板戏和眉户戏。再然后就是大队主任讲话，一般是讲生产形势和任务。开头往往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有时是“要把牛喂好”，有时是“要把棉花种好”----这要看需要。

村里没有电。全村没有一个收音机，只有生产队有一只手电筒，被赵本山戏称的家用电器。家家住的是土窑洞，外观简陋、破旧，里面很黑暗。

队长是个很英俊的庄稼汉，在我们眼里有50多岁，后来一问，才知道只有36岁，他儿子比我小一岁，17岁，刚刚读完初中，也回村参加劳动。妇女队长是个16岁的女孩，长的人高马大，像30多岁，我们不知道，管她喊大嫂，她就笑。

村东头有一口井，是全村人都饮用水源。井口用石板盘着，紧靠井北边是一个很古老的辘轳，上面缠着大拇指粗的牛皮绳，长长的绕着两层，约有40多米长。水不多，但够吃。望着井底，深深的，可以看见自己的脸。

村里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一共有6个。有存在我们去的第二年结了婚，还有一个贫协组长巷娃，正热恋着大队妇女主任的妹妹----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妹。贫协组长一米八二，身体强壮，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按现在

的话说，绝对是个帅哥，性格温柔，一说话就脸红。但因为太穷，他只好在本村找，可是与他年龄相当的只有这一个了。

另外四个：有志和志友已经说下了媳妇，而铁锁和喜发是铁定的光棍了。铁锁是放羊娃，一穷二白，一群羊属于他的只有两只。喜发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一个弟弟，只有老大娶了媳妇，老二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是个残疾，走路跛，已经注定是光棍了。家里又一贫如洗。所以对他的婚姻问题，一家人都死了心。

山西的买卖婚姻十分严重，娶个媳妇要花一两千块，最少也要千八百。那时一个劳动日分一两毛钱，玉米收购价八分五，小麦一毛三分九。一千块是个什么概念？恐怕要吓死人。农民没有钱，养几只鸡，下了蛋必须卖给供销社，五毛九一斤，供销社卖六毛五，赚五分钱。农民最多养十几只鸡，鸡蛋换点煤油和盐巴，显然，如果从鸡屁股下抠出个媳妇来，就等于做梦娶媳妇。

那时农村娃的唯一出路是当兵。到了部队，即使提不了干，复原后县里也给安排工作，一下子变成了城市户口，每月一个小秋收。但当兵除了政治条件身体条件以外要有一定的人事关系。我村里有三个当兵的，一个在湖北，提了干。一个复原后在垣曲铜矿工作。最后一个晚，赶上哪来哪去，完璧归赵了。

我参加工作很早。县城里虽比不得大城市，但比起农村来像进入了天堂。我先在工厂学徒，国营，铸造工，一个月19块。学两年，很累。好在那时工厂管理混乱，累也累不了哪去。后来进了文化系统，不累了，知道的事也多了。

我们县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县革委会主任下乡时看上了，想给自己的独生儿子找个媳妇，女孩家里觉得能和县里的领导做亲家，一定是祖坟上冒了青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女孩很小，想着自己能离开农村到县城参加工作，每个月可以给穷苦的爸爸妈妈补贴一点钱，也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很顺利，女孩到某单位当上了打字员。从交易规则上讲，这事还算公平。

因为女孩不够晚婚年龄，两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那女孩虽然很俊俏，但永远是紧锁双眉，难得一笑。我和她打过几次交道，只见过她一次笑脸。可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据说是革委会主任那娃有点智力问题，女孩终于不干了。很快传来主任病倒的消息，又很快，女孩被调到距县城50公里之外的一个公社里去了。

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后来和县城附近村的一个女孩结婚了，这女孩被安排到我单位图书馆，为主任生了一个孙子，保住了他家的香火。接着，改革开放的烈火像文革的烈火一样在偏僻的小县城燃起。已经成为图书馆正式员工的女孩果断地提出离婚，并顺利办理了手续。此时的革委会主任早已无权无势，力不从心了。但是，主任儿子的承受力显然已经大大加强，他也很快完成了第三次婚姻，可见他的智力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革委会主任如果还在，应该80多了。他女儿和我爱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个很漂亮很聪明很开朗的女孩。他

的儿子我见过一次，看不出有什么瑕疵。我觉得作为领导，他还是挺大度的，并没有斩尽杀绝。而那第二个离了婚的儿媳妇后来还当上了图书馆的馆长，算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了。我倒是常常想起那个被贬到公社去的打字员女孩，不知这曲折的人生之路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她现在还好吗？

全喜的故事

村里最能干的应该算是张全喜了。我们去时，他36，7岁，瘦瘦的，满脸皱纹，也像50多岁。张全喜哥俩，他哥哥张喜来放羊，高个子，喜欢发表议论。张全喜不，很少吭气。但是农活里的十八般手艺，他什么都会。据说农活里最叫板的手艺是摇耧，种麦子时，把式们一边吆喝真牲口，一边抖动着手里的耧，使麦种均匀地漏下去，播种到地里。而只有麦子从地里长出来时，才能看出摇耧技术的高低。好把式播种过的麦地，长出来的麦子一垄一垄的宽窄差不多，而把式孬的则是一疙瘩一块的，有地方多，有地方没有，像癞子头。

不光农活，张全喜还会木匠、泥瓦匠。村里所有的门窗，桌椅几乎都出自于他的手，不过不是很细致，但是能用。农具的修理也是他的事，他甚至会打棺材。他还是泥瓦匠，村里打窑洞，抹墙，封门口，他都是一把好手。他干活肯动脑子，不紧不慢，会使巧劲。他从不甩开膀子大干，从不气喘吁吁，从不伤痕累累，同样的活儿，往往是他先干完，而别人还在出大力流大汗。

哥哥张喜来七八个孩子，一排一溜儿，都、来、米、发、索、拉、西，数不过来。张全喜老婆不生育，他收养了一个男孩，还养着他的80多岁的老母亲。他不停地干，是村里挣工分最多的劳力。可是他分不到钱，因为欠款户太多，那些孩子多的，分口粮多，占用了村里的粮食款，而他们却无力偿还，他哥就是欠款户里的老大。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积累下去，张全喜的账上有几百元的存款，却一分钱也取不出来。

张全喜的自留地里长着全村最好的庄稼，一来他家人口少，自留地少，二来他勤劳，把块地整的像块绣花布。我们私下谈起来时，他说他希望搞包产到户，要不，他再能干也是受穷。但他仍是全村最富裕的户，过八月十五时，可以郑重其事地摆上一桌，虽然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各算一盘菜，但也能凑起八个菜。70年中秋节，他请我们几个男知青吃饭，八个菜中央还有一个砂火锅，里面有粉条豆腐，炸鸡蛋切成的丝，还有十几片带皮的五花肉，炭火很旺，烧得火锅咕嘟古代滚，冒着热气，满窑洞里喷香，让我们垂涎欲滴。

大概是74年吧，他母亲去世，八十五、六岁，称得上是高寿了，又过了一年，他媳妇害病，先是公社医院，又是县医院，治不好，后来到了三门峡医院也没看好，癌症。折腾了不到一年，走了。算是心疼他，没把他的积蓄花完。那时他也找生产队借了不少钱，彻底沦为贫下中农，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欠款户。

我04年、08年两次回村都见了张全喜，他后续了老伴，儿子也成家了，并且有了孙子。第一次他不在家，他儿

子骑摩托车把他从地里接回来，满身灰尘。第二次他正在晒山楂，我对他说，如果早些分地，他可能早就成了财主。他笑了，说啥呢，现在不是老了吗！不过，土里刨食终究靠不住，一个病人，就能把你拖累死。如今他盖了新房子，不住窑洞了，但是没有什么家具。我说：你不是木匠吗？他说，木头太贵了，我这木匠早就荒了。他笑了笑，说，凑乎吧，跟你们城里人没法比，就是落一个自由，穷自由。

来娃的故事

村里还有一个喜来，姓吴。为了区别张全喜的哥哥张喜来，大家喊吴喜来叫“来娃”。来娃大我三岁，属猪，是我村学历最高的人，读完了初中，他也应该是我村最有才的人。来娃长得很精神，大眼睛，双眼皮，鼻直口方，站直了也有一米八左右，可惜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就再没站直过。他就是我在本系列（一）中提到的喜发的二哥。

本来吴家这一辈，家谱规定中间的字是个“玉”字，老大就叫“玉生”，轮到来娃叫玉来，可是稀里糊涂竟叫成了喜来。据说，来娃生下来特别好看，他妈特别喜欢，就叫成了喜来，但人再穷，家谱是不能乱的，所以，上学时还叫玉来。后来他患病，妈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本来家里就穷，这一来，娃这一辈更完了。村里没有哪个娃读过初中，但来娃妈非让他读初中，说，娃惜嚯（方言：可怜），叫娃多读两年书，少干些活路。花点钱心安些，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来娃总是留着一个分头，见人很有礼貌，笑得很得体，虽然跛，却给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感觉。他口才很好，说点什么很有条理，而且滔滔不绝。来娃会拉板胡，还会唱曲。友存结婚时，他自拉自唱。板胡拉得有滋有味，他摇头晃脑，如醉如痴；唱的时候慷慨激昂，特有激情。村里人又是鼓掌，又是喊叫；我听不懂，觉得不是很好听。但板胡听着还不错。

听说，来娃参加过县里的残疾人曲艺队，曾经跟着他们在各个公社各个村演出，混碗饭吃。不久他不干了，说剩不下钱，翻山越岭的，有点吃不消。来娃和知青比较密切，他比我们学历还高，因为我们初中没有毕业。村里人一般人不会下象棋，因为认不全那几个字。来娃下象棋，居然下得还不错，敢跟知青俩干，偶尔还能赢。老实说，我们队六个男知青，没一个长过来娃。虽然我们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来娃肯定要打一辈子光棍，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论证了。老天真是不公平------我们都这么认为。

凭良心说，不管谁当队长对来娃还是很照顾的，当然工分不高，8分5，跟妇女队长一样，比较公平。他本来也是经常跟着妇女干的，外号叫妇女二队长。哥哥经常要出去搞副业，或者去石膏窑挖石膏，或者上煤矿挖煤，或者下山到盐池担硝，总之是凭气力换些钱回来。来娃的嫂子是从山里嫁过来的，年轻，还没有孩子。一天到晚也跟着

大家干活儿，穿得花枝招展，爱说爱笑爱热闹。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妇女只要有来娃领着干活，就拿他说笑，结过婚的女人在一块啥话都敢胡球说，来娃有时也顺势骂俏，占点小便宜，不过动真格的还没有，毕竟腿脚不利索。来娃哥哥常不在家，嫂子是女流之辈，有些事免不了让来娃帮忙。当然来娃是有求必应，自己嫂子的事不就是自己的事嘛？久而久之，那杆妇女就拿这叔嫂说笑，越说越不象话。不过这在农村是常有的事。

后来越说越玄，或是来娃半夜钻嫂子窑里去了，或是嫂子钻来娃窑里去了。甚至连来娃妈都听到了风言风语。此时的来娃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什么也不说，她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哥哥回来当然是听不到这些了，没有哪个人无聊到这份儿上。

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到我离开，什么都没有发生。来娃果然打了一辈子光棍。

我08年十月回村，见到了来娃嫂子，70多岁的人，穿戴还是很干净，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叽叽喳喳，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地说起来没完，真是秉性难移。

后来我找到来娃，印象中的小分头变成了短短的平头，灰头土脸，61岁，不显老。虽然不显老，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木讷得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住在别人家里，给人家看家。那人在外面做生意，估计是要给他一点报酬的。屋里满地都是玉米，大概是刚刚剥完皮，正准备晾晒。他让我坐，我看看没有坐的地方，就谢绝了。

过去我俩之间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见了他有点激动，我以为他也会激动。可是没有，我们握了握手，他很快就松开了，脸上的表情比我想象的要平静的多。望着那熟悉的面孔，我想起那时候村里的流言蜚语，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那事真的有过吧？我真的希望它确实曾经发生过。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往事回忆（二）

随年的故事

村西头给知青下了一个院，打了六孔窑洞。但是窑洞打成后是不能住人的，有的要放三年，坐北朝南向阳的，最起码也要放上一年，因为太潮湿。为了让知青早日住上新窑洞，队里决定让饲养员都集中在这里。牲口热量大，暖上一年半载，兴许就能住人了。随年老汉就在西头第一孔窑。随年老汉多大年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我们喊他“大爷”。他喂牲口，六条牛加一匹骡子。村里二十多条牛，只有两匹骡子，他喂着一匹，可见村里很信任他。

说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对于中条山的一个小山村来说影响不大，虽然喇叭里一天到晚喊着斗来斗去，但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当真，他们沉默地活着，每天把日头从东扛到西，晚上蹲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守着那豆粒大的煤油灯光吸溜吸溜地，喝上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中老年人不吃晚饭，他们说吃了不舒服，而且早上起来还饿；而晚饭不吃，早上肚子却是鼓胀鼓胀的，没有饿意。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至今没有搞清楚。

随年老汉不爱说话，就是迎头碰上我们，也装做没看见，自顾自走自己的路。你要是喊他，他看都不看你，就“啊”一声，再没了下文，继续走他的路。

那几年学大寨，一年一个新道道。秋后一天，公社下来通知，让我们大队的四个自然村，七个生产队每个队派一个饲养员，代表生产队到大队赛牛。以往赛牛，是几个评委评比，类似于现在的歌手大赛。这次不同，牛要上秤称，以体重为依据，比评委评分科学，防止作弊。比赛前三名有奖，第一名奖励二百斤苞谷，很诱人。随年老汉的牛大，队里决定让他去，不过谁去估计也得不了奖，比起别的队，我们队不占先。

村西头路南有个水坑，很大，锅底状。村子东高西低，每逢夏秋下雨时，东边流来的水全部流进水坑，形成一个水池，村里人叫“坡池”。池里的水黄黄的，羊屎蛋蛋飘一层，不能饮用。但妇女们在里面洗衣服和被子，也有些孩子在天热的时候，跳下去游“狗刨”。犁地的老汉收工时，干了一晌活的牛们总是下坡池美美地喝上一顿。这已经成了习惯。

秋后正是坡池水多的时候。因为赛牛，队长吩咐随年老汉，牛不出工了，净等着后晌去比赛。在家里多吃点，肚子里东西多总能增加点分量。吃罢晌午饭，随年老汉吆喝着牛，向大队走去。

走到坡池边，六条牛条件反射，呼啦啦下了水，闷头喝起来，随年老汉吆喝半天，不管用，只得任它们喝。喝得滚瓜溜圆，来到大队。牛差不多到齐了，有些称完了已经回去，还有许多看热闹的社员。那时没什么娱乐，大队有点事，看的人特别多。

轮到随年老汉，牛被吆到一块大木板上，开始过磅。没想到随年老汉的牛最重，称了五条，平均分量都暂居第一。因为比别人的牛重许多，估计随年老汉把二百斤苞谷挣到手了。最后一条牛比较犟，死活不肯上那块木板。随年老汉就拉着绳子喊："喔，喔，"他拉，牛就往后坐。一个娃从后面给了牛一鞭子，拉锯式的进退了几次，忽然牛猛地站住了，哗啦啦，尿像瀑布一样流下来，顿时地就湿了一大片，周围的人就笑着往后躲。随年老汉和在场的干部都愣了，紧接着，称过的那五条牛像受了传染，也都哗哗地尿起来。大队部门前尿流成了河。

自然，随年老汉的成绩宣布无效，冠军还是让别的队拿走了。队长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这冠军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谁知随年老汉却认了真，很长时间竟然不出门。后来，听说赛牛取消了，他才出门。打这以后，谁要是喊他，他干脆装没听见，连"啊"一声都省了。

去年我回村，和巷娃一起看我们共同住过的窑洞，路过那坡池------不过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我想起随年老汉，随口问了一句，"随年还在不在？"巷娃说，"早不在了，死了大概有十多年了"。我说，"坡池没水了，牛也没喝的了。"他笑了。一会儿，又说："你说，这年头掺水的事还少么？"

绒草的故事

前村的绒草大婶是烈属，一个儿子在太原上班，家里就她自己。儿子接她去太原，她去过一次，嫌乱，待了三天就跑回来了。她男人小麦1951年当兵走再没有回来，后来县民政局送来一块"光荣烈属"的匾和一些抚恤金，她才知道娃他爸死在朝鲜战场上了。

绒草大婶没改嫁，多少人提亲都被她推了。就这样一熬十几年，娃后来也继承他爸的遗志，当兵去了雁北，复员后组织上照顾烈属，在太原给安排了工作。

绒草大婶还是坚持参加劳动，她也不指望挣那两个不值钱的工分，主要是跟婆娘们在一起热闹，日子过得快。因为是烈属，绒草大婶没受挣，即使在大饥荒，吃食堂的年月，别人挨饿，她娘俩也没受委屈。县民政局年年都要慰问，多少都有表示。村里人说，小麦一条命换绒草一辈子不愁吃喝，值！

绒草生性善良，说话总是细声细气。有一次知青的馍馍让猫叼了，两个知青追着打猫。绒草看见，就拦住了，非常认真地，低声说：“可不敢打，那是×主席！”两个知青笑得坐在地上。她没上过学，分不出毛和猫有什么区别，但眼睛里分明闪耀着真诚善良的光芒。

大概是1991年秋，一天，前村来了几辆小汽车，径直奔绒草家的崖上。有一个很富态的男人，穿着很高档的西服在几个干部的陪同下，走到绒草家门前。那男人在“光荣烈属”的牌子前看了一会，露出一丝苦笑。这男人就是绒草的男人------小麦。

小麦在朝鲜战场上没死，而是被俘了。阴差阳错地被说成了阵亡，上报为烈士。当了战俘之后，他被遣送到台湾。后来，经商发了财。在台湾，他无时不刻地梦想回到中条山，回到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但是那时不要说打电话，连封信都发不出来。他看到回来无望，便娶妻生子，建立了新的家庭。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有了转机。蒋经国先生首开台湾老兵返大陆省亲之先河，大批台胞闻风而动，赴大陆寻找，探望久别的亲人。小麦算晚的，就是因为他的战俘身份的问题，他不知道回来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很幸运，上头好像有个精神，凡是回大陆探亲的台胞一律热烈欢迎，历史问题一概不究。

小麦回来了，绒草六十多岁了，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亲人相拥在了一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台湾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两女一男，都围绕着绒草寒暄不止，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的儿子闻讯后，第二天也从太原赶回家中。

小麦感谢乡亲们多年来对绒草的关心照顾，在村里大摆宴席，凡是能动弹的都赶来赴宴，大鱼大肉卯足劲吃，酒卯足劲喝，一醉方休。有人说，摆了四十多桌，历来村里没有谁家结婚有这么排场。还有人说：小麦给绒草和儿子留下很大一笔钱，说是美国的人民币，可以拿到美国花的，还给了绒草很多金首饰，说那套在脖子上的金链子有小拇指那么粗，可值钱呢！

县里的干部对小麦也是毕恭毕敬，待若上宾。他们和小麦商量，希望他能回来投资，造福家乡，小麦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麦为投资的事还专程回来过一趟，是一个人回来的。但是投资的事还没有落实，就传来噩耗，1993年底，小麦因肺癌死于香港。

绒草恢复了以往那种啥都不想，平平淡淡，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是门前那“光荣烈属”的牌子摘去了。村里给她换了一块牌，上面写着：“台胞”。

这个故事还是要声明一下：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二掌柜的故事

小队会计行二，官称“二掌柜”。和队长、全喜他们差不多大，是一伐人。他是我村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打一手好算盘。听说他初中毕业后就在县政府工作，搞统计。这人较真，爱抬杠，大小事非要争出个我高你低来。59年质疑亩产十万斤，在会议上和领导寸步不让，结果打了个右倾，开除公职，卷铺盖回家。

也有不少人劝他，说：管他十万斤百万斤，关你个毬事？把个恁好的差事丢了，忒不值估。可他不听，反过来说劝他的人心口不一，对党不诚实。那些人本来无恶意，一见他较真，只好回避。

他似乎对回农村无所谓，他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村人，农活又不是没干过，回去干活照样是把好手。所以让他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他很有点大义凛然。村里人说他“毒气大”，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还是“度气大”？反正就是“有股子狠劲”那个意思。他也确实能干，基本农活没有落在什么人后头，连全喜都服气他。

其实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一次，不知害了什么病，好长时间猫在家里不出来。偶然一次看见他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一脸的菜色，憔悴极了。本来秋高气爽，暑意未退，他却穿着一件棉袄，两只手还吞在袖里。

知青插队后，开始是他老婆给我们做饭，所以有时他也来坐坐。毕竟都是念过书的人，沟通比较容易些。但他也经常跟我们抬杠，而且他必须赢，否则他追着你辩论。比如“究竟是盐香还是油香？”我们坚持油香，我们一年分一斤半油，对油的渴望与对肉的渴望并列第一。但他很执着地认为盐是最香的，没有盐就没有咸味，没有咸味就没有了味道。他认为这很哲学。

二掌柜对我们并不是非常友好，比如，评工分。他10分工，他就拿他和我们比。他认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开会时，力主给我们低工分。尤其像我，体力很弱，虽然后来锻炼得一般农活都可以和其他社员差不多，但割麦子不行，我才定了个7分8，比妇女队长还低0.7分，听说就是他的提议。由于我从来不过问这些，所以也没有人给我涨，第三年我才和妇女队长平齐，给了个8分5。10分工才三毛钱，我还打个八五折。

二掌柜还有两个绝活，会做酱油，还懂修路架桥。我们村每年秋后要做两锅酱油，除了社员分一些外，其余的公社供销社全拉走，一直卖到县城。这也算是我村的副业吧，当然队里也不会委屈二掌柜，我经常看见他掏出纸烟来抽，虽说不是特别好的牌子。

至于修路架桥就更牛了，每年汛期之前，途径我县的209国道上的“八政桥”就要进行一次大修，这时，县交通局就来通知请二掌柜。此时，二掌柜就整理行装，专门等晌午社员刚吃罢饭，即将出工之前，在村里招摇一番。恰好他家在村东头，从村西头去公社，每走一步都不糟蹋，都能碰到村里人，他向乡亲们频频招手示意，微笑着，得意洋洋的样子。1971年209国道铺油，有的路段需要重新规划，二掌柜居然是副总指挥，而那正指挥是交通局

长。显然就是二掌柜指挥了。

然而，就这么一个能人，县里始终是用时就招来，不用了就踢回去，没有一个人说，给他落实一下政策，恢复他的公职。没有。我后来在县城遇到县政府的人就打听他，恰好原来的教育局长跟他一起工作过。对他的评价是：人是个能人，可以说什么工作都认真去做，一丝不苟，漂漂亮亮地完成。就是嘴不好，口冷，骄傲，目无领导，说话领导不爱听。爱提意见，那意见一般还都提得很对。可是，哪个领导愿意身边放一个爱提意见的人？

我说，他走了，不影响工作吗？局长说，唉，工作啥影响不影响？干是那样，不干，也是那样。你汇报时多说好就是了，多拣领导爱听的说，没影响。

2004年我回村也见到了二掌柜，他正挑着一担“稀茅”（掺水的人粪便）往自己的地里送，居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的，根本想象不出是70岁的人！过了一会，他从地里回来，我去了他家，见到了给我们做饭的大队妇女主任----他的老伴。

闲谈中，二掌柜拿出一沓黑乎乎的纸，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我这里有好东西，是去年翻腾出来的。我拿过来一看，是油印的1969年我们小队的分红报表。我掏出老花镜，在密密麻麻的人名中找我的名字，一看，哈哈，狗日的，我刚去时，给我的分不是7分8，是7分3！我一皱眉头，对他说，二掌柜，你们太不够意思了，6个男知青，怎么我分最低？谁知，他竟然说，你干活最不发肆，你想要多少？我笑了。接着，他也笑了。

瞧，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他还是那个样子。

大海的故事

我村有个大力士，叫赵大海。和二掌柜是本家，年龄相仿。我村东边是大山，南边是黄河，北边是盐池，距大海至少有一千公里，而我村的人坐过火车的只有一两个，最远到过太原，我保证我们村的人百分百没有见过大海。我很奇怪，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我问过赵大海，他傻呵呵地笑，什么也不说。

记得我们在公社开完欢迎知青大会，就是赵大海驾驶一辆大胶皮车拉我们回村的。那是元月二号，天气特别冷，中条山刚刚下过雪，东方远远地有一座大山，连绵起伏，高低不平，白雪皑皑，煞是好看。我们知青中叫建国的是个话痨，一个劲地问，“大叔，还有多远？”“到了没有？”那大海穿着一件很大的羊皮袄，鞭子甩得山响，憨笑着，“啊”，“啊”地应付他，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建国在说什么。

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大海是几年前从山里迁下来的，身体强壮，二百斤的口袋自己撅起来就走，进山打柴总是小二百斤，是全村最有力气的人。因为是外来户，见人就笑，很少说话。当初来的时候，队长稀罕他虎背熊腰

的身子，一把好力气，二话没说，就同意迁户口。

大海现在住的是别人家的弃窑，他自己打的窑洞在村边沟旁，还没有正式启用。那新窑一共两孔，据说是大海自己一个人用了三年时间打成的，而这三年他每年最少出工三百天。也就是说，他用的几乎完全是业余时间。从下院到两孔窑打成，所有的土，填沟垫院，至少有一千方，全靠一辆小推车和一条扁担两个厝（河北叫筐）-----他的厝好像是特制的，特别大。别人家的厝一担土八十斤，他的厝一担土得有一百六十斤。你看厉害不厉害？

1970年，我脚上长了一个鸡眼，就是两个知青按住我，请他拿刀子剜掉的，出手利索，眼睛眨都不眨。被我誉为“最心狠手毒的贫下中农”。不过，那鸡眼再没有长出来。

他媳妇叫“中看”，长得也算还行，只是名字起的有些不谦虚，而且过于直白。我只见过她几次，大海从来不让她劳动，他随便干点啥都能养活她；也不让她出门，好像生怕让别人看了去。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孩。大海很疼爱他的媳妇和女儿，张店一年四个“会”，每个会都必须要带她们去。中看穿得花枝招展，孩子也是一身新衣服，骑在大海的脖子上，一家三口逛会，一跩一跩的，兴致勃勃。在会上，全家人总要吃两碗“羊肉泡馍”，扯上一块花布什么的。

大海每年要到山下盐池担上一个月的硝，是计件的活路，非常苦累，但很挣钱，人家说大海一趟回来能挣二百多块。每当他去担硝的时候，中看就把大门一锁，很自觉地把自己关起来，绝不出门，直到大海带着钞票回来。两口子恩爱得很苛刻。

前队有几个知青原来在天津上学时练过摔跤。有个叫金洪亮的，是他们里最棒的。金洪亮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也不胖，看上去很普通。得知大海是大力士，金洪亮没事就找大海，大海一看这学生娃比自己矮将近一个脑袋，哪里把他看在眼里？

一天，两人商量好在场上比一回。聚了一大帮社员，中看也抱着孩子在一边看。若是平时，那大海早把中看赶回家里去，这一次大概想让中看高兴，就没有吭气。两个人打个抱拳，很像那么回事，然后就纠缠在一起。大海块头大，力气大，那金洪亮个子小，就像个老鹰抓小鸡。终于，金洪亮被抓住了，大海就抓着他转，想把他摔着地上，但是金洪亮也抓着他，甩不掉。转了几圈，大海只得把金洪亮放下来。谁知，就在放下的一刹那，金洪亮一伸腿，使了个巧劲，把个人高马大的赵大海放倒在地。

“这狗日的，会武功……”大海嘟囔着，拍拍身上的土，爬起来，赶忙拉着中看回家了。社员们一阵哄笑。从那起，大海不参加类似活动，金洪亮他们再勾搭他，他也不上当。“这杆学生娃会武功，狗日的……”他老是叨唠着这句话，好像明白了：光有力气，不中！

2008年我回村见他了，样子没怎么变，感觉矮小了许多，还是憨憨地笑。我问他，我是谁，他摇头说，“想不

起。”我说，“你怎么变小了？”他说，“老了么。七十岁了。”我说，“你还记得摔跤么？”他看了看我，竟然说：“哦，你是金洪亮？”一句话让我笑弯了腰。这家伙，接受了知青的一次再教育，竟然刻骨铭心，四十年了还记着。我说：“不是，我是XX。”他又笑了：“啊，你不是金洪亮啊，那狗日的，会武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往事回忆（三）

（八）玉成的故事

知青到农村，最高兴的是中小学生。村里有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知青的到来无疑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而正处在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们就是一个扒着窗口觊觎渴望的群体。

有三四个学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讲，讲什么都行，讲什么都爱听。一到麦收，我的付出就得到回报。我村地处山脚下，最大的一块地四十亩，其余都在二十亩以下，最小块的只有几分。大部分是坡地，也是一层层的梯田，只不过坡度比较缓，就没有像龙脊梯田那样壮观。每到麦子熟了，一层层麦浪翻滚，金光闪闪，也有点诗情画意。

按说这样的地割麦子是不算累的，因为还没来得及腰疼，就已经到头了。就这样我也不中，开始割还行，割着割着就被别人甩在后面，越着急越赶不上，有时弄不好还割了手。一般就在这时，几个学生就赶到了，他们割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你一把，他一把，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老实说，有这些学生，我少受了许多苦。

学生里和我最好的是玉成。他不仅在劳动上是我的坚强后盾，而且在生活中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曾经拿家里的鸡蛋煮给我吃；那时我学会了吸烟，又没有钱买，他就拿他爸的烟叶装满一个小布口袋给我拿来，抽完了，再装；还有一次，我腹泻，他把我带到他家，让他妈妈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伴了许多大蒜和熟油，他们自己是从来不舍得这样吃的。

一天，玉成给我拿来几串像葡萄一样的紫褐色小果子让我吃，我一尝，有点甜，有点酸，有点麻，还有点辣，他说这就是五味子。是一种药材，可以补肾安神。我问他从哪里得到的，他说在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野果，山杏，土梨，野葡萄，八月炸……他说找机会带我进山，他家有亲戚在山里。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1971年9月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虽说只有50里地，但是不自由了，只回去了一次看他们，心里一直很歉疚。1973年，我到了电影放映队，借放电影之机回去呆了一天，但是没见到玉成，听说他当了队长，去公社办事

了。后来，因为我一直下乡到处去放电影，也失去很多见面的机会。

1975年，我调到文化馆。冬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玉成来了。他已经是大队支部委员了。他跟我说：他当队长以后，做了几个大动作：1、扔了百十亩烂地，社员谁愿意要谁要，种了收了归自己；2、让二掌柜当酱油厂厂长，专门做酱油卖，3、有些活儿包工分包时间，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节约时间归自己。按说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事，我说，你这样干，公社大队让吗？他说，我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今年麦子分了二百三十斤，预计分红能达到四毛五六，这次开会，我是模范队长，全县表彰。他脸上不无得意，我也为他高兴。他来还给我带来一桶酱油和一麻袋土豆。

大概是79年，玉成到县城看病来了，住在我那里十几天。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不清楚。就是睡不着觉，脑袋疼。我问他怎么搞的，他也不说。我看了看医生给他开的药，有“安定”，“谷维素”“维生素B1”等药片，我说管事不？不行看看中医，调理一下。那时县医院有个北医大毕业的何医生，跟我们很熟，就找她看了一下。何医生说，没大事，操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后来我看何医生开的药里，就有“五味子”。我说，这是让你安神呢，队里的事不行就别管了。他说我已经辞了，今年分红掉下来了，一个工合四毛一。我说可以啊，不少了。他说，我定的是五毛，没达到，有一干人弄我呢。我说，你听我话，不干是对的，管他四毛五毛，挣来钱大伙分，挣不来，你自己挨骂。何苦呢！

他走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何医生跟我说，他有些抑郁症和精神官能症，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我调回河北之前，碰上大队书记来县城，我向他了解玉成的情况。书记说：这娃太刚。农村的事像个臭皮囊，不能认真，就是你来我往地对付。他搞那一套我都知道，我不管他，有人嫉妒，也有人受不了，就弄他。娃又实心眼，想不开，现在送洛阳看病去了。我说，我马上就调走了，你告诉我洛阳什么医院？书记摆摆手，说，“你不去了，”他压低了声音，“神经病院。”

2004年，我回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一打听他不在我村里住了，迁到后村二队了。我见了他，他认不出我了，也许我太沧桑了。我告诉他以后，他拉住我的手，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东家西家的转。他说，从洛阳回来之后，他就迁到这里，大队推选他当了副支书，没球事，是个闲差，他也不操心。现在种些果树，烟叶，胡球弄着些，也可以。

我想玉成这人也太实在了，别人当队长，即使捞不着什么好处，起码落一个轻闲自在不干活，可他却……。我说，记得咱们当年还要进山去弄五味子吗？他笑了。叹了一口气，老了，别说你，我都很多年没有进山了。不过，五味子可没少吃，哪副药里都有。

唉，五味子，五味子，人生就是五味子，酸甜苦辣咸要体验一辈子。

（九）玉玺的故事

1970年春，因为队长不借巷锁家粮食，我跟队长干了一场，虽然后来算是赢了，心里也很烦闷，就经常不去上工，猫在窑洞里画画。这个时候，认识了玉玺。玉玺是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在我县的曹河钢铁厂。那年夏天，他到我公社招工，从公社秘书那里知道了我，就找上门来。

我这人是很不懂接人待物的，现在想来， 就是不太懂事。那时，我正在画一张李铁梅的剧照，“仇恨入心要发芽”那张。玉玺进门的时候，我知道进来人了，但是既没有招呼人家，也没有给人家让座，连看都没看，还在不停地画。玉玺见我没有停下来，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

过了一会儿，我画够了，一回头，才发现不认识。这个人文文静静，长得很秀气，个子不高，脸色白里透红，像个姑娘。我很歉意的请他坐。他做了自我介绍和来意，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大救星来了！那时，我真是在村里干够了，甚至在公社，看见拖拉机站里满身油污的工人我都羡慕不已，心想：我要是能在这里上班该多好啊！常常站在那大门口发上半天呆。

我俩就很快聊起来，他就是玉玺，一个很高贵的名字。不过人极为和善，说话和风细雨，真的像个姑娘。记得我俩就那张画聊起了样板戏，我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他喜欢旦角，唱了一段“爹爹留下无价宝”。唱完了又唱别的，足足过了一把戏瘾，非常高兴的一个下午，正事没说。

第二天，他又来了，说，你跟我走吧，到钢铁厂当工人去。真的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他非常肯定，这事我就说了算。我喜不自禁，天啊，我终于离开这个穷山沟啦！他说，你现在跟我去公社，我要看一下你的档案。我俩就一路春风跑到公社，找到梁秘书取出我的档案。

那年月，档案这东西，领导可以看，招工的可以看，你自己不能看。我就老老实实躲在一边，看着玉玺撕开那牛皮纸袋的封口，从里面掏出几张表。谁知，玉玺拿着一张纸，看着看着，眉头就皱起来了。一会儿，他把几张表装回去，交给梁秘书，拉着我来到院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玉玺脸色很难看，沉重地说，你去不成了。我说，怎么了？“你档案里有一个海外关系，政审是通不过的。”我一下子懵了，仿佛从天上突然掉进深渊，那时的脸色有多难看是可以想象的。

好一阵脑子空白。我极力回忆着那东西是怎样进来我的档案，我想不出来。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叔叔在台湾，但是我没见过他，也不会在任何表格里填写，我还没有傻到这种地步------尽管我自认为对党和毛主席很忠诚。我俩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阵，他说，回吧，好在这事谁也不知道，你们大队，小队都不知道，你回去就像往常一样，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以后再找机会。见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跟我回家玩几天吧，我家在黄河边，可美了。我木然地点了点头。他家在县西边长乐公社，我跟他坐车到了县城，买了一些糕点，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还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他家。

他家真的很美，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村人，爸爸是生产队长，他有个弟弟，和我同年生的，比我大几个月。我还见到他的未婚妻，在公社当妇联主任。他们全家都对我十分热情。他家院子里有许多花草，还有很大一个竹子搭的架子，上面缠绕着很多藤藤蔓蔓，长长的结了许多瓜，还有豆角。他领着我在村里转，村子里很多房子，很多树，枝繁叶茂的，还有许多竹林，感觉很像江南。往南走不多远就是黄河，因为是库区，这里的水不黄，而是清亮清亮的，水面很大，碧波荡漾。玉玺指着对面的黄土坡，说，那里就是三门峡，我们这里是渡口，有摆渡可以过河的。站在宽阔的黄河边上，望着远方的水天一色，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我在玉玺家住了五天，最后我从他们村的渡口去了三门峡，在三门峡玩了一圈又从茅津渡口过河经县城回到生产队。从那以后，我和玉玺就一直通信，后来，他每个月给我寄五块钱，说是买邮票信纸信封的，一共寄了四个月，来信说，他马上要结婚，不再给我寄钱了。遗憾的是，他家太远了，我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1971年9月，我到县农机厂上班，他也从钢铁厂调到工业局，后又去了化肥厂。那时我们就经常见面了，我要还他钱，他坚决不要，他说我是给你的，不是借。1981年，我调回河北，他专程送我到运城。我到河北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化肥厂的效益不太好，他准备停薪留职搞长途贩运去。从那再没了消息。

2004年春节后，我回县里看他，他已经退休回了长乐老家。因为是冬天，当我开车到了他村里时，感觉很是冷清，树叶已经落光，枝条光秃秃的，天气阴沉，村里见不到人。我好不容易问到他家，我在路口锁车，爱人去敲门。敲了半天，才出来胖胖的一个妇女，一会儿，搀出一个瘦瘦的人，只见他一个劲摆手，我爱人喊："他说不认识你！"我远远看去，就是他，玉玺，我思念多年的朋友。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就是，就是……"

跑到门口，那妇女一眼便认出了我，"你就是那年到这里玩的知识青年吧？"我说，"是啊，我是从河北来专门看望玉玺的啊！"这妇女就是玉玺的老伴，我的大嫂，当年的妇联主任。玉玺痴痴地望着我，嘴角流着口水。我一惊，他是怎么了？大嫂说："唉，他脑溢血，险些没死，现在好多了，还能动了。"

进了屋，我拉着玉玺的手，问，"你真的不认得我了？我是XX啊！"他看着我，好像在想。大嫂说，"你忘了那一年，你带着他到咱家来玩，他后来去了文化馆，你俩唱戏，唱样板戏，你不是老说吗？"忽然，他想起来了，一下子抱住我，趴在我身上："哇，哇----"地放声大哭，我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万万没想到当年英姿勃发的玉玺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两个都没想到。

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点钱，他们坚决推辞。大嫂说，不缺钱，三个娃都上班，他还有退休金。我说留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离着远，下一回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见。

回到县城宾馆，见了县里的几个好朋友，当他们得知我去长乐看玉玺的时候，都责怪我，“你怎么不早说？早说，咱们一起去啊！”然后大家就说起玉玺。有人感叹：这个人啊……对人好，对人实在，乐于助人，没有一点点坏心眼，钱也赚了，但是没有染上一点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有人插嘴，别说嫖，谁见过他跟哪个妇女嬉皮笑脸过？谁见过她跟哪个妇女开过玩笑？没有，没有。又有人说起当年一起倒腾苹果，车过广东的时候，遭遇强买强卖，只有玉玺跟那些人讲理，因为这货都是订了合同的，不能卖给他们。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屈服了，那些人不讲理，把玉玺打了……同去的四个人都很惭愧，因为他们中间玉玺是最文静，个子最小的……

记得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玉玺就是这样的人：是正人君子，也是大丈夫。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感到幸运。祝他早日康复！

（十）裴老师的故事

我在乡下放电影时，认识了部关公社中学的裴老师。裴老师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很清瘦，待人十分和善。一般到了公社，放电影经常在学校的操场，所以我们就吃住在学校，那里有教师食堂，有接待客房，比较干净，也比较方便。晚上，放完电影，还可以和老师聊聊天。

那天晚上，裴老师、我师傅和我三人聊天，裴老师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那是68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公社门口的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打倒X主席”，用白粉笔写的，大概写了五六条。这一下不得了，公社武装部立刻报告县里，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县公安局都来人，把个小小的公社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还有许多人看热闹。

记得，那是刚过春节不久，刚开学，我是班主任，正在收同学们的寒假作业。第二天中午，我刚打饭进办公室，饭还没吃，有人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我把饭放在办公桌上，来到校长办公的房间。一进门，看见有两个穿蓝衣服的民警在和校长说什么。校长见我进来，脸色很严肃，招手说，你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我走到校长的办公桌前，才看见桌子上有五张照片，就是拍的那反动标语。我定睛一看，天啊，那不是我写的字吗？五条标语都是我的板书笔体，惟妙惟肖，难辨真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当时我的脸色非常难看，非常尴尬，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两个警察上来，把冰冷的手铐铐在我手腕上的时候，我才大叫了一声，“这不是我写的！你们搞错了！”

我害怕极了。我家里成分比较高。土改时定的上中农，谁知后来搞了一个“民主补课”，我家又补了一个富农。家里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在学校里说话都不敢大声，文革时虽然没有被抄家，我老父亲也开了好几次会，站在前头挨训。本来我中师毕业后，因为成绩好，县中学要我的，就因为成分，被分到公社中学。而且我的工资应该一年后上调一级，也因为这，没有动。我连问都不敢问。

在县看守所，我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一定是有人模仿了我的笔体！可那是谁呢？我没得罪任何人啊，甚至对每一个学生，我都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我这个样子，哪里有什么脾气啊！我想不起谁和我过不去。我哭了。我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谁这样害我啊！

但是，审问时，我坚决不承认。在任何笔录上我都不签字，我无罪，我是被陷害的，是有人在害我。可是，人家说，是省里的专家鉴定的啊，百分之百就是你的笔迹，你不承认不行啊。你说有人陷害你，你说是谁？谁和你有仇？------我却真的说不出来是谁。

很快就结案了，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刻的阶级仇恨，妄想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的富农子弟。我欲哭无泪。学校里，老师校长学生，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标语是我写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替我说一句话。

那时，写反动标语最重是要判死刑的，但是要省里批。县里就一层层往上报，我就在看守所里等，那日子难熬啊。生活上就不要说了，死硬的玉米面窝窝头，一顿饭两个，几片咸菜，稀粥几乎就是蒸锅水，那时拉的屎，一点臭味没有，一点粘性没有，干了，风一吹就飞了，地上都没有痕迹。

我始终没有承认，虽然没有拷打我，但是，推推搡搡，体罚，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你说怪不怪，真让我睡，我睡不着；审我熬我，逼我，我又睏得不行。唉，可是受挣了。但是不承认，也定罪，证据确凿啊，我又百口莫辩。

就在省里批下来的当天，看守就透给我了，说，裴老师，阴曹地府又多了一个冤死鬼。我知道，我死期到了，原来听戏唱《窦娥冤》，现在我成了窦娥。我跟审我的领导说过，你们判我死刑吧，我不想活了，但是我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们要给我平反。那时我结婚两年多，还有个女孩。妻子来看我几次，哭得像个泪人，可是束手无策，她家里也是富农成分。

我劝她也劝自己，黄泉路上屈死鬼多了。反正人总得死，不就是早死几天吗？想开了，我反而能睡着觉了。等了几天，我都等急了，不知怎么竟没了消息。谁知过了半个多月，竟然把我放了，说是逮住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公安局领导跟我宣布这个决定时，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上，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打着吊针。媳妇和孩子守着我，还有学校里一个老师。他们跟我说，就在准备枪毙我的时候，在李家沟水库工地上又出现了反动标语，字迹跟我的一模一样。公安局一个领导决定暂时停止对我的行刑，抓紧时间破案。很快逮住了写反标的人，原来是我的一个学生，叫杨幸福。

我极力回忆着杨幸福的样子，终于想起来了，前年毕业的，太普通的一个学生了。从来不说话，个子矮矮的，一说话就脸红。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他为什么要害我呢？我实在想不通。

开公审大会那天，我挤到舞台前，想仔细看看杨幸福。我看见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剃一个光头，特别瘦，他看见我，露出一丝笑容。他轻轻地说："裴老师，对不起。"声音特别小，我没听见，我是根据口型推测出来的。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知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自己。

我们都没有说话，屋子里静悄悄的。裴老师停止了讲述，静静地看着地面，此时的空气仿佛凝结了。半天，我师傅说，那娃枪毙了？裴老师说：枪毙了。我说，多大？十八岁。我师傅掐着手指算，过了一会儿，对我说，跟你一般的。如果活着，今年二十四。

关于往事回忆的十个故事

从2004年到2008年，我连续四年回到我插队的地方，见了许多当年的朋友。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交谈，我发现，他们生存的环境虽然比四十年前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们仍然贫困，特别是，他们的思想，至今还被控制在一种无形的桎梏之下。

四十年，应该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从创业到成功，开始走向辉煌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完整过程。但是这四十年的变化几乎让人感觉时光停滞，或者极其缓慢的移动，与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比，近乎一潭死水。甚至与我生活在的渤海湾的小城市相比，也有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

十个故事，除了"绒草的故事"是我听来的，其余九个都是我的亲历，而且有好几个人是我最近几年回去接触过的。他们的精神面貌依旧，思想变化不大，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

我和另外一个同样是富农成分，同样当过老师的马老师到裴老师家坐，谈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的荒唐，谈起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他们对我的言谈感到十分惊讶，马老师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裴老师居然不敢说话，而且不时地向门外张望，似乎觉得在家里说话都没有安全感，可见当年的红色恐怖对他们的伤害之深，而这两位老师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他们还很健康，但是七十岁的老人毕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蓦然回

首，你却发现，恐惧伴随了他们的一生，作为不得“乱说乱动”的后代，两位老人一生都没有做过一点对不住人的事，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大声说话过。难道他们就没有与生俱来的人的基本权利吗？

两位老师的后代都很争气，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现在混得都不错。这多少在精神上给了他们一点点补偿。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希望历史不会重演，但它的前提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才能让我们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每个人都能大声地表达，每个人都不再恐惧，每个人都不再木然，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由衷的笑容……

《往事回忆》暂告一段落，但是，为了“不忘记”，为了“新环境”，我希望大家一起写下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侃 戏

俗语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所以，大凡一个戏，总要说出一个故事，讲出一点道道来。人们看戏，从中受到教育。但它又不是说教，而是寓教于乐。有人物，有唱段，有武打，有故事，能够引人入胜，这才有了戏迷。看戏，同样是观赏，大人小孩是有区别的。大人是听戏，小孩是看戏。小孩是看热闹，有时连好人坏人都很难分清；大人听戏，能听出韵味来，有些老人听戏是闭起眼睛的，而且摇头晃脑，他在咂摸滋味。所以你看在露天舞台演戏，前头坐的大都是老人。老人是必须坐着的，否则闭着眼睛摇头不安全。小孩子一般都站着看，有打斗了瞪着眼睛叫好，感觉没意思了就不知跑哪玩去了。所以有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鲁迅先生的《社戏》也很有趣地描述了这一场景。

中国戏曲肯定是由民间小曲发展起来的，但是从什么时候有的，我不知道，也无力去考证；中国戏曲知识也十分庞杂，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一点点。今天就是瞎聊胡侃，希望能够有戏迷朋友发表更多高见，我抛砖引玉了。

一、南北戏聚天津卫

天津卫水旱码头，旧社会时，工商业，饮食业，交通业，演艺业都很发达。解放初期，云集了全国著名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戏班以及曲艺演出班子。剧场戏台比比皆是，除了三不管的小舞台、地摊以外，也不算一宫、二宫、三宫还有很多俱乐部剧场。戏园子也多，比如南市大舞台，劝业场天外天，华北剧场，黄河戏院，南市剧场，长城影剧院，人民剧场，建设礼堂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中国大戏院。不光是北方戏，即使南方的越剧、沪剧、谁也听不懂的广东粤剧到了天津来演，照样有市场，有人捧场。天津这地方很怪，凡是著名的角儿，必须在天津唱红，据说如果得不到天津观众的认可，在全国也很难红起来。

那是五几年，梅兰芳，马连良，裘胜荣，谭富英，叶盛兰，李多奎，肖长华，张君秋等名家在中国大戏院演出《铡美案》，《群英会》，两块钱一张票（很贵了，当然也值），场场爆满。可见天津人多么爱戏，多么捧场。据说因为戏班子太多，也有门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听大人们说，那年代沈金波带"建华京剧团"在天津唱没站住脚，被挤出天津，去了内蒙。后来去了上海，与周信芳先生拍了电影《四进士》，出演毛朋；再后来与童祥龄先生同台

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唱少剑波，红遍大江南北。这时天津人才大骂自己有眼不识金香玉，不容人，不是东西。

天津最大的腕是武老生厉慧良先生，传说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唱关公戏，号称活关公；还演《挑滑车》里的高宠。据说解放后他蹲了多年的监狱，这对戏迷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几乎没有人不为他鸣不平。因为分析来分析去那认干爹之举，主动权并没有掌握在厉先生手里。于是戏迷们便自我安慰，说是厉先生在监狱里享受的是高干待遇，除了不能随便出来逛劝业场以外，其他方面都比在外面强，每天服侍他的有好几个漂亮姑娘----我却觉得这是很阴险的，恐怕是想废了先生的武功。

院里长我十岁左右的男人几乎都是戏迷，还有一个儿时玩耍的伙伴长我一岁，名叫“小蛋儿”，他妈妈是唱大鼓的，人很洋气，但是唱了一辈子也没出名。小蛋儿在我上初中的头二年上了戏校，学花脸，后改了武生，跟他妈妈一样，最终没成角儿，但是躲过了上山下乡，也算是个巨大收获。他一从戏校回来，便给我们摆个架势，瞪圆了眼亮相，唱一口“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这时候，我们往往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头塞到嘴里，聚精会神，一副傻样。

评剧在天津也是深入人心。旧社会，大名鼎鼎的评剧皇后白玉霜就是红在天津，火在全国。旧时还有八大霞，五大旦，天津人居多。象白玉霜、新凤霞、赵丽蓉都是天津人。天津人大都爱听评剧，鲜灵霞、小鲜灵霞、六岁红、小俊亭、王鸿瑞等都是天津的名角。那时最著名的剧目是《秦香莲》，剧情好，角儿好，唱腔好听。小白玉霜的秦香莲，魏荣元的包拯，席宝昆的陈士美，花月仙的国太，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走在大街小巷里，到处的可以听见无线电里播放的这出戏，也到处可以听见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学唱戏里的唱段。前些天，天津的白派新秀王冠丽在戏曲频道教唱白派经典唱段“琵琶词”、“见皇姑”和“鸟入林”，遂了不少戏迷的心愿，收视率很高。

天津的河北梆子也火。当时我们门口有个名角儿。他家自己住一个院子，七间房，算我们门口的大户；据说他家别的地方还有房，我们就不太清楚了。遗憾的是从来没见过他本人，只见过他的两个儿子，非常傲，对我们从来不屑一顾。有人说他们有两个妈，也不知是真是假。我们小孩子不懂事，觉得人家比我们多一个妈，就有理由瞧不起我们。他最著名的戏是《打金枝》，名段就是那：“这一件蟒龙袍实实的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做来的……”就是相声演员经常学唱的那段.后来的名角有韩俊卿，王玉磬等。韩俊卿唱《秦香莲》、《杜十娘》，王玉磬唱《辕门斩子》等杨家将戏，都是响当当的角色。

天津戏迷票友很多，大街小巷里也可以随处看到。我从小生活在平民居住的地区，门口就有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京剧小组，锣鼓家伙俱备，生旦净末丑齐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聚在一起，你一段我一段的唱起来，周围的邻居都跑来观看，为他们助兴。不是小组里的人也可以唱，唱不好也没关系，都报以热烈掌声，决没有人笑话。这种小

组遍及天津市的各个角落，除了京剧之外，还有评剧、河北梆子小组。这些人完全是自娱自乐，没有工资，也不管饭，彼此却乐此不疲。不过，门口谁家结婚生孩子，免不了要请他们助兴。遇到稍有身份的人家，这些人还能从市里或区里勾来一两个有名的小演员，唱上两段。酒席和红包自然是少不了的。这时，他们就会更加乐此不疲。

所以戏曲老前辈也好，后起之秀也好（譬如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京剧大赛决赛），有不少出自天津的演员。这是有原因的，戏曲在天津的群众基础实在是太雄厚了。

二、传统经典《秦香莲》

小时候，我最先喜欢的还是评剧，觉得京剧听不懂。小白玉霜是我最崇拜的旦角，她唱的《秦香莲》迷倒了千千万万的听众。我是听这出戏长大的，几乎是天天听，都能背下来。小白玉霜的特点是凄楚委婉，如泣如诉。她的许多戏，如《牧羊圈》、《闹严府》、《杜十娘》，《金沙江畔》、《小女婿》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京剧叫《铡美案》，剧本从老陈上路赶考开始写到皇家招婿，由于写的面面俱到，且无耐人回味的唱段，让人感觉剧本稍嫌罗嗦。相比之下，不如评剧严谨。但包公的“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和“念状”却是难得的经典唱段。所以人们听京剧是听花脸，听评剧是听旦角。评剧《秦香莲》的剧本是从滇剧移植过来的。我曾看过滇剧剧本，剧情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在唱词上修改的更完美一些。比滇剧更老的版本是川剧，我在四川看过川剧《秦香莲》，对比之下觉得后者历史更悠久一些。

秦香莲这个人物按现在话说，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还应该算一个女强人，一个勇敢者，一个农民理论家。她携一双儿女，一路挨门讨饭从湖北走到开封寻夫，不能不说是勇敢者的行为。那时没有国道、高速公路，没有汽车、火车，又是灾荒年，又身无分文，又拖儿带女，约一千多公里的泥泞坎坷，完全靠步行，其艰难可想而知。

到了京城她又完全凭自己的讲述博得了下从客店小老板、刺客杀手上至国家政府的高级官员的同情，你不能不佩服她的演讲口才和雄辩。在庙里，她把杀手韩祺说得不仅刀下留人，赠送银两，而且舍生取义自刎而死；她甚至在紫墀宫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险些说服了老陈跟她一道回家务农；后来国太介入，包拯左右为难时，她又甩出一句“人说是包相爷居官清正，看起来他也是官官相护有牵连”，把个老包羞得面红耳赤，激得头脑发热，摘下乌纱为她两肋插刀。

川剧不是这样讲的。川剧讲：秦香莲到紫墀宫见了陈士美，给他跪下了，求他收留他们母子三人。哪怕不相认，只要留下来，秦香莲可以以佣人身份出现，给他家洗衣做饭，而老陈和他的皇姑小妹依然做夫妻,一副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形象。京剧也是这样讲，虽然看上去不舒服，觉得秦香莲太没骨气。其实这更俱合理性，也符合一个农村妇女的心理。既然斗不过人家，不如来软的，以柔克刚，从长计议，打持久战。所以我认为这些版本要早于滇

剧。

现在这事多了，解决方法也多了。一句话：拿钱来吧。小款出个十万八万，中款出个三五十万，大款出个百八十万，背景深刻的再多点，弄个几百万，皆大欢喜，各奔前程。那陈士美却也太吝啬，给人家三套衣服，一锭纹银便想打发人家走，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想如果他多出点，没准也能息事宁人，摆平此事。

但是包拯真杀陈士美吗？他会不会找个替身？从《打龙袍》来看，处理这种棘手之事，老包是很有办法的。再者杀了之后怎么办？皇家就是饶了包拯，能饶秦香莲吗？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

三、电影戏剧写春秋

文革前，我在剧场只看过四场戏，都是跟门口的大人们去的。回忆一下，可能是京剧《空城计》、《赤桑镇》、《逍遥津》和评剧《刘巧儿》。那时真的不太懂，爱上戏曲主要还是听收音机。我们院子住着六户人家，有两家有收音机。好在都爱听戏，一到播放戏曲时，收音机的主人就把音量放大，让全院的人听。

对戏曲的了解归根结底还是从电影中得到的，因为电影便宜。尽管便宜，我也没钱看，大部分靠蹭。院里有个邻居的亲戚长我三岁，是个电影迷，也是个河北梆子迷，放寒暑假的时候，他便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姐姐家，姐姐姐夫都上班，他几乎每天都请我看电影，不论内容，只要是没看过的，一个一个来。那时天津的电影院也多，复映片也多，一毛五分钱一张票。加上学校组织看，父亲单位偶尔发张票，我就成了看电影大户。只要是电影，不管是故事片，还是戏曲片，甚至纪录片，我是来者不拒，一网打尽。那时有很多传统戏曲片比如《十五贯》、《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包公三勘蝴蝶梦》、《孙安动本》、《三气周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梅兰芳舞台艺术》、《宝莲灯》、《陈三两爬堂》、《花木兰》、《铁弓缘》、《打金枝》等等，那时侯看了不少。

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繁荣了电影市场，而朝气蓬勃的电影又使许多颇具特色的地方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也因此让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戏曲名角儿随着电影的发展步伐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里。不仅是诸多的京剧名家，许多地方戏名角如俞振飞（昆曲）、常香玉（豫剧）、傅全香（越剧）、红线女（粤剧）、小白玉霜和鲜灵霞、新凤霞和赵丽蓉（评剧）、严凤英（黄梅戏），裴艳玲（河北梆子）、王爱爱（晋剧）、六龄童（绍剧）等都通过电影让群众见到了庐山真面目。

那时拍电影是有意识向人民介绍一些剧种，注重其社会意义远远超过追求经济效益。象电影《孙安动本》，是山东的柳子戏剧团出演的，很多人听不太懂。虽然京剧也上演了此剧，而且主角是当代名家李和曾、景荣庆；但是剧本是从柳子戏改编过来的，故拍电影时还是选择了柳子戏。该剧演员激情饱满，唱腔高亢有力，获得很高的赞

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部电影拍自浙江的绍剧，六龄童饰演的孙悟空不论从唱念作打哪个方面论，都应该属于大腕一级，然而如果没有电影，全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浙江有个六龄童呢？

后来普及样板戏时，我恰恰在山西放电影。有时一天跑两个大队。白天找个大窑洞把群众喊来，一连演两三场，晚上换下一个大队接着演，又是两三场。那时俩人一组，一个看发电机，一个放映。有一次我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不小心碰倒了那16毫米的放映机，周围的贫下中农忙叫我，说："不好了，那些小人人都睡倒了！"我醒来一看，那放映机还在转，不少人还在歪着脑袋看银幕。从那时起，有生以来没见过汽车的中条山里的人们却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咿咿呀呀"的京剧。

可见，电影在普及中国戏剧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四、成败得失样板戏

众所周知，文革中最令人心痛的是把一大批优秀剧目打成毒草，把所有的传统剧目打成"帝王将相封资修"；把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打入冷宫，无情地中断了他们的艺术生涯，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所以戏迷们是坚决否定文革的，因为文革毁了他们心中无数真心崇拜的偶像。

不了解戏曲的人以为现代戏是文革的产物，其实不然。文革前的十几年间，广大戏剧工作者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比如《刘巧儿》、《小女婿》、《李二嫂改嫁》是批判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豫剧《朝阳沟》是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的；眉户戏《一颗红心》,评剧《夺印》,《千万不要忘记》、《向阳商店》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评剧《金沙江畔》、京剧《白毛女》、《节振国》、《六号门》、《黛诺》等是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这些现代戏的问世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

后来的样板戏也并非完全是文革产品。比如《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都是文革前就有了原形，《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红灯记》原名《红灯志》、《自有后来人》。当然故事情节、场景、音乐、唱腔设计都做了修改。至于孰优孰劣如何评价，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文革中经过反复改编的样板戏从剧情上唱词上都左得要死，笑料百出，用现在的话说，叫"搞笑"。所以人们编出许多笑话对其冷嘲热讽。我家门口有个公厕，我亲眼见到有人进去方便，一边方便一边唱《海港》里的"进这楼房……"（天津人把厕所称之为"茅房"），不知是太痴迷了，还是有意糟蹋样板戏。

样板戏的普及活动也是史无前例的。究竟普及到什么程度？记得有一次，三门峡市的篮球队来我县，在县城一个露天体育场打友谊赛，观众特多，县委书记都去了。半场休息时，场地上忽然跑进一个女人。那女人站在球场中

线的圆圈内，向四面的观众鞠了四个躬。大家楞了一下，还没反映过来她要干什么。只见她“唰”做个亮相，喊一声：“我是李铁梅！”，又“唰”变了个亮相，“我是江水英！”，又“唰”一下，“我是阿庆嫂！”……“唰”“唰”“唰”，把个样板戏里的女主角“唰”了个遍，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县的有名的女疯子，顿时场里笑声雷动，一个个前仰后合。当时场上的气氛让美国NBA的美女表演相形见绌！县委书记觉得很没面子，暗里指使了几个人把她拖出场外。

这女人曾是县妇联的干部，后来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就神经病了。整天在街上逛，助人为乐。有时县委书记在县礼堂作报告，她在礼堂门口演讲；礼堂里面的人越来越少，都跑外面听她的来了。就这样一个人，竟然把样板戏里的人物表演得唯妙唯肖，你能不服气“普及”的力度么？

不过，我认为样板戏有三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1、唱腔优美，音乐华丽，主旋律突出；

2、汇集优秀演员，推出、培养新人；

3、利用电影进行B52地毯式轰炸般的普及活动,客观上把京剧推向全国各个角落，推向寻常百姓家。有许多普通人就是从看样板戏认识了京剧，爱上了京剧，也有不少现在很优秀的演员是从唱样板戏走进了梨园。

我的一位校友在通辽插队，后来调入通辽市京剧团，在《智取威虎山》中演李勇奇。我在中条山的一个插友，天津知青，后来进入保定市京剧团唱李玉和；另一位女插友也是天津的，调入唐山市京剧团后不幸在唐山大地震中蒙难。一个天津工作的校友在单位组织了一个小京剧班子，到处巡回慰问演出。其中两个最厉害的，一个唱少剑波，一个唱方海珍。我曾看过他们的演出，这些业余演员除了扮相和武功稍差，唱得相当棒，绝对敢与专业试比高。

样板戏面世后，许多地方戏做了移植。如川剧《红灯记》，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川剧特色。李铁梅的“听罢奶奶说红灯”，把一人唱，万人和的川剧独有的演唱模式表现的非常自然，拖腔采用了大巴山区的民歌基调，听起来虽然觉得地域性有些混乱，但还比较好听。得到广泛认可的是由河北省河北梆子跃进剧团移植的《龙江颂》。该团团长张淑敏是享誉华北地区的河北梆子艺术大家，可惜的是，她在自己的艺术高峰时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年仅46岁。她演唱的《杜十娘》，《陈三两》，在华北大地影响巨大，她亲自主持移植的《龙江颂》，其唱段至今是戏迷们参加比赛时的首选曲目。山西蒲剧移植了《杜鹃山》，在晋南、豫西、陕南一带有一定影响。

这些举措在客观上为后来的振兴戏曲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至于样板戏一花独放，在艺术上搞一言堂，模式化，当然必须否定。

五、通俗传统生死搏

随着文革的结束，被批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重新粉墨登场。而与此同时，来自港台的通俗歌曲也汹涌澎湃，潮水般涌进大陆，与中国的传统戏曲展开了一场争夺观众和钞票的大比拼。大大小小的歌星把中国的年轻人哄得晕头转向，造就了众多的虽让人觉得愚不可及却忠贞不二的追星族。

有一次，我们去同事家串门，批评了当时正在走红的台湾歌星张惠妹。后来同事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上初一的儿子提出强烈抗议，向他妈妈宣布，以后永远禁止我们两口子去他家；如果他妈妈做不到，他就离家出走。把我们逗得在电话里大笑不止。

铺天盖地的商业演出和成百上千的票价把中国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推向极致。中国的民族戏曲一夜之间陷入低谷，无数剧团解体，无数演员改行。其中最著名歌唱演员李娜就是出身于豫剧，还有出身于黄梅戏的吴琼。我市原有的京剧团、评剧团、河北梆子剧团相继土崩瓦解。我单位就分流了一个市京剧团的青衣演员，整天垂头丧气地跟我们这些苦力一起干活。通俗音乐把个民族戏曲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一蹶不振。

有的演出组织者有时也会拉一些京剧演员做陪衬，但是报酬极低。据说在一次演出中，某歌星的出场费最高达五万元，而云南京剧团的旦角艺术家关肃霜仅仅为五百元，相差百倍！

旧社会学唱戏叫打戏。一般成气候的角儿最少要科班十年左右，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象关肃霜那样的艺术大家则不仅需要十年功，还要具备一定的天赋才行。关肃霜在旧社会就已成名，蒋介石在重庆时就看过她的戏，并给予极高评价。解放后，拍过《铁弓缘》和现代戏《黛诺》，无论扮相，唱功，武打，做派都堪称绝艺！谁料到如今竟遭此难堪，老太太不禁黯然泪下。

歌唱演员肯定也要付出，但是他们的付出和知名度的提高更多的是体现在开拓市场方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暗合社会潮流。与戏曲演员相比，汗水的流向不尽相同。当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歌星李娜就说过，她感谢戏曲，戏曲是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艺术源泉。有些演唱就是用演唱者的本色嗓放开喉咙毫无顾及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姜文唱的“妹妹大胆的往前走”，臧天朔唱的“朋友”之类。他们根本不考虑听者耳朵的承受力。后来，还可以喊，还可以说，就是随便来。台上发疯，台下也发疯，“并不是他们唱的有多好，而是台下的观众需要借机发泄”（张越语）。当然也有自身条件好又唱的好的，比如邓丽君，梅艳芳，高胜美等。至于港台的一群帅哥歌星则不是以唱取胜了，高亢杂乱的出自小妹妹们喉中的尖叫声已经淹没了本来就听不清楚的歌声。但这就是无情的市场。在经济高速发展，道德世风日下的今天，这也许是再正常不过了。

在文化市场化之后，戏剧工作者付出和回报的严重不对等和大量观众的流失使很多戏曲专家大为恐慌。他们终

于呼出了“振兴戏剧”的口号。

于是，专业大赛，票友大赛，梅花奖，梨园春，戏苑乡音，戏迷乐……众多的大赛和电视栏目纷纷出笼，甚至提出“要从娃娃抓起”的奇怪口号，并且真的把一些年仅三、四岁的孩子推到前台，咿咿呀呀地唱起了他根本不知所云的戏剧。戏剧卫士们不择一切手段，似乎誓与林林总总的反传统的艺术形式拼个你死我活。

尽管做了努力，通俗娱乐还是比戏曲生命力旺盛，这是不可扭转的现实，因为它的观众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对自己喜爱的东西要比中老年人来的更执着，加上消费观念和经济条件的不同，戏剧确实处在下风。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诚如古代很多被称之为“阳春白雪”的音乐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即使拼命挖掘，恐怕也不能尽其然了。

六、见仁见智黄梅戏

在全国戏曲万马齐喑的局面下，出自安徽安庆一带乡间小调的黄梅戏却独树一帜，久演不衰，愈演愈烈。自严凤英、王少舫以后，明星一个又一个----黄新德、吴琼、马兰、吴亚玲、韩再芬……，电视剧出了一部又一部，而且净是长篇连续，让整个戏剧界拍案惊奇！

究其原因，关键是黄梅戏的群众基础雄厚。它是产自最底层的群众中间，属于民间小调，下里巴人。所表现的内容也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的爱情故事，或神话，或传说。象《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五女拜寿》等。

黄梅戏优美的音乐唱腔也是使该剧种久演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唱腔委婉舒畅，刚柔适度。不象京剧、秦腔那样高亢激烈。如果说京剧秦腔是“二锅头”的话，那么黄梅戏就是“醪糟”。所以黄梅戏不存在“振兴”问题。它是戏又是歌，随时可以交替变换，什么场合都能上。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广东粤剧，我听过一次，优美温柔，不象戏剧，象歌剧。不过北方人无福消受，觉得它太温柔了，颤颤微微的，象掉进了羊圈。

不过我个人认为黄梅戏应该冷静思考了，太热就容易昏头，滥演，演烂。比如电视连续剧，自《郑小娇》之后，拍了很多部，唱腔常常被改革的失去了黄梅戏的特色，直到最近出炉的《早春二月》，哩哩拉拉地好几十集，这就违反了戏剧本身的表现规律。戏剧就只给你那么一点时间，看故事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听唱，看是看演员的功夫。你唱段多了，必然没有精彩唱段；没有精彩唱段，戏就很难流传。著名的戏剧是靠唱段来传播的。你的戏没有让观众记住、传唱一个唱段，那么你的戏就不能流传，就是失败。

试问，黄梅戏长篇电视连续剧拍了那么多，有哪一唱段成为经典？有哪一唱段被人记住？有哪一唱段在民间传唱？而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天仙配》、《女驸马》，那“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含悲忍泪往前走”，“为救李郎

回家园”等广为传唱的段子，则成了广大群众精神上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具有非凡的亲和力，使人不得不赞叹其隽永的艺术魅力。

还有一个例子----上海京剧院拍的电视连续剧《曹操与杨修》，主演尚长荣（尚小云之子），言兴朋（言菊朋之孙），这是多大的腕？！那剧还得了奖，但是只几年时间，除了他们自己，几乎无人提及。戏剧和电视连续剧毕竟不同，如果以拍戏曲电视连续剧来振兴戏剧，把本来很精炼的东西非要象兰州拉面一样拉得又细又长，----可能有些专家认为越长赚钱越多，符合市场规律。可是，戏迷如果不买账，那看似很热闹的市场不过是虚假繁荣罢了。

七、试问出路在何方

很多人担心：迟早有一天，戏剧将被作为学者的研究课题搬到课堂上，愈加务实的票房价值观将有可能永远不允许它重登舞台。我想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戏迷永远存在。好比今天的视听传媒虽五花八门，而仍有许多爱好读书的书迷痴心不改地买书读书藏书，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只是作为戏剧界老大的，自以为是阳春白雪的京剧确实应该警钟长鸣！

一方面京剧界大喊京剧市场萎缩，票房低迷，不好维持；一方面是基层百姓、戏迷看不到剧团的踪影。虽然李瑞环同志为振兴京剧做了不少工作：象天津京剧院的成长，京剧青年演员的培养，传统剧目的抢救与挖掘，举办各种戏剧创作和表演的竞赛，组织京剧代表团的演出和出访，等等----让人看到了国家领导人保卫国粹的决心，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很多人忽视了，那就是京剧越来越远地脱离群众和作为京剧传承者的演员们的怠惰。

“艺术人生”栏目曾邀请谭元寿先生做了一期节目。谭元寿先生讲，他对现在演员过于安逸的现状很不理解。过去科班叫“打戏”，出了名，也不能懒惰，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那时，一天要演两场戏，现在呢？几天演不了一场戏。八小时，还上不满，还要休“大礼拜”，还要过“黄金周”，本来就没学什么东西，放假回来全忘了。谭先生说出了广大戏迷想说又不和意思说的话，

我听人说，号称“活猴”的李万春先生六岁学戏，七岁登台，八九岁就月挣一千块包银。没有功夫，又不演戏，这钱谁给？李万春先生会500出戏，按梨园界“十年磨一戏”的说法，李先生得活多大年纪？现在这些演员学戏不挨打，吃穿不愁，做五休二，歇黄金周，拿着高工资，又没有演出的压力----以后别唱戏了，一上台就唱《社会主义好》。

我认为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学唱戏不为演出，而是为了比赛，拿奖。有些演员，一旦拿了奖，成了腕，就几乎只参加大型综艺晚会，甚至很少化妆。一身西服革履，脸上画点淡妆，台前一站，唱一段两段，钞票到手，万

事大吉。有些本来不错的演员，由于获了奖成了腕，只顾弄钱弄社会地位，而忽视了练功，过早地倒苍，无形中缩短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好比有些地方风景不错，拼命“申遗”。“申遗”一旦成功，便迫不及待地开门卖票，而且一年一涨价。只顾赚钱不保护，最后导致再抢救。

遇到老少演员同台演出，就显出差距来了。谭元寿先生78岁高龄，唱完一段还翻一个跟头；李宗义先生生前80多岁时，在台上唱，不用话筒、音响，一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声似雷霆，音若洪钟，举座皆惊。不要说青年演员，那些中年演员，哪个能做到？演《龙江颂》的李秉淑老师，大病初愈，在纪念裘盛荣先生90诞辰的晚会上，一曲“手捧宝书满心暖”，仍是那样清脆甜美，光彩照人！梅兰芳先生之子，梅派传人梅葆久先生，荀派传人孙毓敏老师，杨春霞老师，李光老师和今年初巧遇的李崇善先生等，都是老当益壮，风姿不减当年。因为他们是“苦出身”，而且没有忘本！

其实京剧改革从技术上讲，问题好解决。比如京剧的过场是不是应该简化？场景是不是应该美化？音乐是不是应该再丰富一些？等等，这有什么可难的？关键是扭转观念。去美国、去巴黎，不是说你不能去，问题是你能培养几个老外戏迷？你就是培养了一两个外国戏迷，还不是把京剧糟蹋的不伦不类？你也不能老是去港澳台、大城市，面向贵族，画地为牢，自绝于广大人民群众。裘派传人方荣翔先生生前在花园散步时经常遇到戏迷请求，他从不推辞，常常很认真地为群众唱上一段，没有一丁点大牌的架子。现在有哪个演员还能拥有这样的风范？

要想真正振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多排戏，多演戏，并且走向普通老百姓，走向市场。稳定和巩固现有的戏迷，发展潜在的戏迷，使戏迷的队伍不断扩大。没有戏迷，何谈振兴？不演出，哪来的戏迷？不过，前些日子上海排了个《王子复仇记》，把外国的帝王将相搬上了中国舞台，虽然很新鲜，却觉得有点过。再需要振兴，也没必要让外国人帮忙吧？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要搞这些中国人不爱看，外国人看不懂东西----以振兴国粹的名义？

程派新秀张火丁初出茅庐，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本人也不欣赏她把程派憋成了女中音，让人误会----以为殷秀梅也改唱了京剧。但是，她成立了“张火丁工作室”，到处演出，不管有没有政府补贴，这样做都值得称道。组团演出赚钱，在某些人看来好像属于有悖艺德之举。而我却认为振兴京剧之路正应该由此出发，把它推向市场，让市场去锤炼它，让它自己在市场里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名演员们拿着高薪，老是沉迷在大城市里，根本不愿意到基层去演出，那么就把这些名演员养废了！如果躺在安乐窝里空喊“振兴”，如果让戏迷和票友成了振兴京剧的主力军，那么京剧的振兴之路将会变得更加狭窄，更加曲折，更加漫长。

在《小城随想》中，我曾说：“东北虎的能力之强，能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张火丁也曾是涌入我市的东北人之一。她也属于能力强，能量大的人物。凭着智慧和勇敢、执着和实干，既为自己赚了钱，又为振兴京剧作了贡献，可谓双赢。

如果张火丁能够真正地面向市场，面向老百姓而不是作秀的话，我祝她趁机发大财。

小时候的故事

前两天，和一个网友争论了几句，勾起我对四十年前一些往事的回忆和反思。首先声明，我不是理论家，不是学者，只是一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给朋友们讲讲故事。当然我肯定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企图说服任何人，信不信由您自己。

就从我记事时说起吧。1956年，忘了几月了。我6岁，还没上学。有一天，妈妈给我6毛钱，让我到南马路一个糕点铺去买一斤点心。我很奇怪，不年不节的，买点心干什么？妈妈说，以后买点心要粮票了，你去买一斤，咱留着过年吃。我就去了，到那一看，人山人海，我就往里挤，一边挤，一边举着钱喊："我要一斤，我要一斤！"6岁小孩子，跟大人挤显然有些自不量力。但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敢挤，可能出自回报妈妈信任的一种表现。长大后想想，也许这就是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大概挤了两三个小时，点心卖完了，人也散光了，我也没买到。可是，手里的钱没了！妈妈是个农村妇女，没有工作，我不知道爸爸挣多少钱，只知道6毛钱是比较多的钱，因为我手里的零花钱从来没有超出过2分钱。回到家以后，妈妈没有打我，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很沮丧，很恨自己无能。多年之后，才知道，这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似乎也有些苛求，毕竟才6岁嘛，的确还没到该长毛的时候。

7岁上学，10岁挨饿。1960年，虽然生活在大城市，好像也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以前是供应45%的细粮（白面），55%的粗粮（玉米面、小杂粮、红薯、少量籼米）。但是我家很少吃白面，因为标准粉一毛八分五一斤，而玉米面九分钱一斤，爸爸就跟别人换了，别人多吃点白面，我家多吃点玉米面。忽然间变了，粮食供应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麦麸、黄豆、豆腐渣。舅舅从乡下送来一只母鸡，以补充我们的菜篮子。老母鸡是白色的，凤头，毛腿，一嘴胡须，老是皱着眉头，像个思想者，据说是名牌儿，叫"十斤白"，也就是可以长到十斤重。

那时一切由妈妈安排。爸爸要上班，中午带饭，两个窝窝头不能少，少量玉米面加大量豆腐渣。我们上学的，一人半个窝头。那时大都一样，早上到班里，几乎人人都是窝头，哪像现在的学生，早上包子，油条，喝碗馄饨，买一套煎饼果子。一到星期日，我就带我的一对双胞胎弟弟妹妹去农村挖野菜。有一次，我们挖了一麻袋马齿菜，

往返20华里，一口饭没吃，空肚子去，空肚子回来，到家，把一麻袋马齿菜倒出来，妈妈高兴得眼里闪着泪花，一个劲地说："这么多呀，够吃几天的了！"一时间，一股成就感涌上心头，真的找到了幸福的感觉。

老母鸡非常争气，几乎每天下一个蛋。妈妈立刻小心翼翼地拿好鸡蛋，送到胡同里对面院的一个单身老婆婆手里，换回一块钱。据说老婆婆的老公原来是个资本家，已经去世，给她留了不少钱。妈妈也非常疼爱老母鸡，关爱程度远远超过对我们的关爱。不过老母鸡最终也没有长到十斤，妈妈对它再好，也不过仅仅从我们牙缝里抠出一把米，没有更多的油水。它摄入的营养可能刚刚能够维持每天贡献一个蛋的水平。

那时城里养鸡养鸭的人不少，也经常"传鸡"，也就是闹鸡瘟，现在叫禽流感。老母鸡抵抗能力极强，好几次传鸡，我们胡同的鸡都死光了，它没事，我们也不懂，也没钱给它买药吃。大概是1963年秋的一次传鸡，它终因年老体衰，未能幸免遇难。妈妈哭了，她说这只老母鸡劳苦功高，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有那么一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思。

1962年已经好转了，有一天我捡到一只小鸭子，很快也长大，它曾经和老母鸡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光。也是每天一个蛋，不过那时我们已经不卖了，而是自己吃，妈妈希望给我们补补身体。可惜为时已晚，据说10岁前营养不良是最要命的，而我们那时主要食品是豆腐渣。现在身体状况确实像豆腐渣工程，肯定是豆腐渣吃多了。

鸭子是一年后遭杀的，国情好转了，开始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胡昭衡市长下令，城区一律不准饲养家禽和小动物，要杀一个鸡犬不留。鸭子未能幸免，也没有送到乡下去，不是没有时间，而是舍不得一个来回的路费。这只鸭子和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情，关于它的故事，我曾于四年前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待我整理后贴上。

因为生活贫困，而我们又想改变，所以就要劳动。那时街道上搞副业，从别处揽活让困难家庭来干。我们最常干的一种活叫"拆线"。就是把服装厂做秋衣秋裤剪下来的碎头拆成棉纱，卖到工厂里给工人擦手。拆一斤的劳务费是两毛钱，那一斤有一大堆，我们只要放了学，就全家动手，一人一堆坐在那拆。就那样大概一天能拆一二斤，一个月能挣十多块，妈妈的眉头舒展了不少。

那时有没有生活好的？也有，一是当官的，二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演艺界），三是有家底的，四是做生意，开工厂的，后来不让干偷着干的，五是双职工，孩子少的。最穷的是农民，城市郊区除外。看一看，那时和现在的区别在哪里？

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好，要穷一块穷，要富一块富。错。这个体制的设计就注定了三大差别的长期存在。"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和一块金字招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民众分为三六九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剥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明着为人民服务，暗着为自己服务，甚至明着就为自己服务只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是人民的代表，而你不是人民。还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或者腐败少。也错。可以说，腐败

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且不说刘青山，张子善这大的，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搞那么多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一根火柴就把文革燃遍全国？回想文革初期群众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与政治无关，几乎都是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除了上层政治斗争的因素之外，能够发动起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干部利用特权腐败，积怨太深所致。

工资标准的差别

应该承认，建国初期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保持了战争年代的本色，还是能够体谅老百姓疾苦的。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生活的安逸，物欲的诱惑，人性的本能等多种因素的逐渐表露，事情悄悄然起了变化。

首先我们看看工资制度的设计：全国按经济发展不同，地域不同分为12类，类别越高工资越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能是为了以身作则，工人阶级的工资并不高。以三类地区为例：工人，由学徒出徒到一级工是17元----30元，往上2级到8级，最高8级。一般是涨一级涨5块钱，越高级差越大，但大也大不了哪去，超不过10块钱。1级到8级有两个坎，第一个坎是2级升3级，很难，那时不论哪个厂，最多的是二级工，三类区35元，六类区41元。然后熬呀熬，熬上3级工就有盼头，可以慢慢升到5级。但是只有很少的工人可以升到5级，一般是有比例的，调级了，上面就下文件了，本次调级升5级的占百分之几，一般是二、三、四、五，没几个。升到5级了，就有希望熬到8级，当然就更少了。一般要熬到50岁左右，挣多少钱呢？80-90元，我的一个邻居8级保全工，挣100多一点，天津六类区。我在山西当过工人，厂里最高级的师傅是五级，大概工资在55元左右。

工人里还有些差别，技术工种较高一点，比如，钳工、电工、模具工、修理工、司机等。另外工人有出车补助，夜班补助，职业病补助，有毒物质补助，如喷漆、电镀等。

好，我们在看看干部，最低23级，三类42元，六类46元。最高1级，据说毛主席只拿2级，400元，中国唯一的一级据说是宋庆龄。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需大概了解。据说干部也有三个坎，一个坎是17级，三类大概在90多元，我岳父17级，下一个坎是13级，就算高干了，大概在150元左右，我岳父的叔叔13级，我的中学校长是13级，插队时的县委书记是13级，所以略有了解。往上据说还有一个坎，大概在8-9级那，有几个朋友的父亲是8级，但是人家没有说过这些，咱不敢瞎说，可以类推。

企业干部和行政干部基本持平，事业单位，教育文卫部门算干部。实事求是讲，在县一级，有差别，但不是特别大。全国横向比较，差别就大了。除了边疆地区，北京上海最高，天津稍次之，各省会再次之，西南部最低。

福利：工人有劳动保护，比如要发工作服，口罩，手套，毛巾，肥皂，有些工种还要发胶鞋或皮鞋，工会每月发一张电影票，年底搞娱乐活动，发慰问品等等。有人以为干部不发，错。这些东西是从干部手中转移到你的手中的，他怎能对不起自己？反正我当工人时，厂长在这方面和我们工人保持一致。

还有，工人有加班费，但是病假要有医生开的假条，有的不扣工资，有的工厂按工龄有比例地扣；事假扣全工资。干部明确规定，没有加班费，但是病事假一律不扣工资。当然工人有生产任务，要干活，而干部没有任务，所以理所当然不参加劳动。但是那时有许多以工代干的干部，说是干部不够用，从工人中挑选一些有能力的来履行干部的职责（中国的干部永远都不够用，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够用）。于是，他们不用干活，但是，工人的福利一点都不少，把干部和工人的好处最大限度地享受完。谁能以工代干呢？当然是领导说了算。若干年后，这些人都成了国家正式干部，然后根据党的需要，分别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任职。

有些大型国有企业有职工疗养制度。假如河北的国企，工人疗养去北戴河，干部就去海南岛，反正都在大海边。干部还有数不清的重要会议，往往要不辞辛苦地走遍祖国大地。

级别低的行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差不多，高级官员当然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说白了，就是权力。权力是干什么的？就是管人财物的，那就是权力。权力意味着什么？那时的权力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一切。当然大多数的干部命运也是被主宰的，我岳父的叔叔和我岳父都还是非常耿直的老干部，他们一个37年，一个38年，都在基层。级别不算高，一辈子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踏实工作。如今人都已经去世，老百姓还是很怀念。但是看了上面的介绍，如果在那个时代让你选择，你是愿意当工人呢，还是愿意当干部？

那时不少基层干部把子女放进工厂，想让他们的生活单纯一点，但最终又都离开了工厂。我想这很容易选择，但是你往往别无选择，也许你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如果你悟性高，你就会知道怎么努力，怎么要求进步，怎么靠拢组织……那是唯一可以改变你命运的一条路，但并非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光有悟性不行，还要有天赋。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有人说，怎么觉不出那时的腐败呢？这是因为：1、由于当时生产力太落后，物质比较匮乏，经济不活跃，所以腐败受到一定的限制；2、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透明度，高级领导的事情一般人不可能知道；3、中下层干部在马不停蹄的大小运动中自顾不暇，心存顾虑，确实不敢过分腐败；4、老百姓整天为了糊口疲于奔命，公民意识淡薄，敢怒不敢言。

生活与环境

建国初，国家干部的来源大部分为部队转业和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中也有部分原政权遗留人员，主要在业务性较强的部门，比如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工程技术。而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城市贫民和农民工，我的亲属很多就是来自天津附近县的农民工。因为百业待兴，劳动力需求旺盛，于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逃难者，逃荒者，乞讨者，流浪者也加入了工人队伍。

天津市房管部门有公产房，来源一般是接手的旧社会的公产，军产，以及没收的租界地的外国资产，资本家，旧官僚的私产。租界地的办公大楼基本由政府使用，私人的小洋楼基本由政府官员使用。我有几个同学，家里是市委，区委，河北省委的干部，都住在和平区，河西区租界地的小洋楼里。那里环境幽雅，街市繁华，道路平整。享受住房福利的工人一般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绝大部分企业是不分房子的。工人一般居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或者自己盖的房子。

从战乱中来到安定环境中的人们非常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尽管还谈不上生活质量。天津西站附近，有一个叫沧德庄的地方，就是当年从沧洲、德州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农村，流浪乞讨到天津市的农民逐渐建立起来的部落。那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就像现在有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我居住在天津市老城里，那里也有许多城市贫民。离我家很近，有一条胡同，叫“周永顺胡同”，南北长约150米，宽不到两米，其中居住的几乎都是拾荒者，天津人管“拾荒”叫“拾毛兰”，那条胡同被称为“毛兰胡同”。

我家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总面积大概有一百平米，八间房，每间建筑面积十平米，剩下就是院子，没有厕所，胡同南边有个公共厕所。住六家人，两家是老天津人，各住两间，其余六间住六家人，都是从附近农村来的农民。整条胡同都是基本一样的小院子，南边隔一个门，八间房住了八户人家。

好，现在就说说我家居住的是什么环境。共用自来水，每家有一个大水缸，一副水桶，一根扁担。我放学之后，第一个动作，掀开水缸盖，看看水多不多，不多，马上去担水。因为一个自来水龙头管一片居民区，所以担水要排队，往往要等上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排到，当然远到不很远，大约四五十米吧。说来很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局面到1983年还没有解决，大概是1983年后半年自来水才入户。由于有了担水的基本功，我1968年插队后，对山区的“扁担炖肉”不是很害怕，甚至还感到很亲切。

再说下水。隔我们一条胡同，距我家大概有一百二十米，有一个下水道，一个大约两米乘以一米五左右的水泥池。方圆二百米之内的住户都到这里来倒污水。于是每家还要有一个污水桶，洗衣洗菜，淘米做饭，小便等等一切淘汰的液体，都要靠这个污水桶来周转。南边的厕所不准倒污水，那时的人比较规矩，厕所门口写了几个字，就真的没有人去倒。一放学，我们除了担水之外，第二个任务就是倒污水。最怕冬天，那时天冷，污水池周围都是冰，稍不小心，就会滑到，沾点脏东西回来。这种局面好像截止到1970年左右，记忆中，我插队走时还没有改变，那是1968年年底。

大概是1975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天津的自来水又苦又咸，和尿差不多，颜色都是黄的。爸爸妈妈说这样的水喝了好长时间了。据说根治海河以后，年年大旱，华北地区严重缺水。特别是天津，大城市，用水量大，最后不得不让居民饮用净化的海水。说是“净化”，它又不是以色列，哪里有那技术？不过是消消毒，让它别毒死人就是了。后来有个市委书记陈伟达，微服私访，发现天津市民喝的水像尿一样，他在市委机关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水！原来市委市政府和一些机关是供水专线！陈伟达立刻向中央反映，并请求北京支持，把密云水库的水借一点过来，以解天津市民饮尿之苦。

后来陈伟达走了，李瑞环来了。为了彻底解决天津市民的饮水问题，李瑞环亲自指挥了引滦入津工程。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对天津市的领导人，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陈伟达，一个是李瑞环。我最痛恨的是那些给首长安装供水专线而让几百万市民喝尿，并长期向领导隐瞒真相的干部。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些人后来仍然身居高位，操控着市民的命运。

前边提到，我家门口有一个公共厕所，这是周围五六条胡同唯一的一个厕所。估计它原本是一条胡同，在东西两条胡同中间穿过，好像“H”当中那一横。在它三分之二的地方堵上，上面加个屋顶，东边是男厕所，西边是女厕所。男厕所19个蹲位，女厕所9个。每天早上，四面八方的老少爷们提着裤子往我们胡同跑，高峰时门口排队，有点像现在排队买打折商品。一到夏天，特别是中午，我们胡同上空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我们这些小孩子每人端一碗饭，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吃----就着那臭味----身在臭中不知臭。如果赶上掏粪，胡同里的臭气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消散。这在当时的天津市并不是个别现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当时没有家庭电话。我们附近只有一个公用电话，我很奇怪那一家怎么会享受电话？他传呼一次要收五分钱，而打一次才要三分。再有就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有了，门口的副食店还有一个，但是人家不对外。好在是小孩子，没有那么多外事活动，所以对电话的渴望并不是很强烈。那时还没有电扇和沙发。我在大商场见过电扇，常常在夏天逛商场时跑到电扇底下站一会，否则就觉得没占到便宜，一天都不爽。

我第一次见到家庭电话，沙发和电扇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上中学是天津重点学校，以为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结果，班上好几个留级生，都是高干子弟。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分配来的，并不是考上的。这些同学大都穿一身军装，以区别于其他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表情严肃，都有一些爱好。他们基本上在比较封闭的干部子弟的圈子里活动，跟平民子弟一般不搭话。平民子弟一般也比较自觉，没有人去巴结这些穿军装的人。那时学校里谁的成绩好，谁就会受到尊敬，那些人也确实没有值得巴结的地方。

虽然不值得巴结，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家庭电话，家庭电扇，家庭沙发，家庭厕所，家庭自来水，却是在干部子弟家里。而从那一刻，我对干部子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文革开始后，很多干部受到冲击，这时你会发现，他们也

不是那么狂傲，也希望与人交流，特别是插队以后。文革中，我去过一些干部子弟的同学家里，才知道原来厕所也是可以放在家里的。记得那一次我想大解，我同学说去吧，但却没有告诉我是坐着完成的。我试了半天，觉得蹲在上边不是很安全，终于放弃。

看到了人家家里的沙发、电话、电扇、暖气、厕所、自来水，才知道，人间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免有些自卑。转而又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还不如我们，我们难道还不幸福吗？这是对自己唯一的安慰。因为是一派，后来又去了几个干部子弟同学的家里，家家都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前几天，和北京的朋友聊起，她说，她父亲是13级，算高干了，但是在她们班上，根本没有人跟她玩！她爸爸的官太小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四】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毛家山印象

（一）

1969年初，天津《中学红卫兵报》的朋友赵卫党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作为《红报》记者将随同天津市湾兜中学的学生步行长征到平陆县毛家山插队，完成采访任务以后到我插队的村子来看我。这让我非常高兴，天天盼着他来。

赵卫党是天津“劳二半”（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术学校）的68届高中生，大我一岁，个子不高，憨厚的脸上戴着副高度近视镜。他会写新闻报道，手极快，写一笔躺倒的字。经常看他写字，脖子就会歪到一边，以至于有时看到他人，也想把脖子歪起----好像不歪起便把他看歪了。他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时改的，原来叫赵自强，这名字本来已经很革命了，但他想更革命，便改成了赵卫党。虽然名字有点激进，但人却是极好的人。

很快我们就得知了“毛家山长征队”已经到达县城的消息。

赵卫党大概在毛家山住了三天，然后就到我们村来了，他悄悄跟我说，长征队也并非是像宣传的那样全程步行，而是边走边坐车来的。原来，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长征队员们是高举着红旗，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离开的天津市。走到了没有欢送人群的地方，就坐上汽车，快到北京时，再下来接着走。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前向毛主席宣誓。宣誓时眼含热泪，使劲让声音洪亮，因为大家希望能够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听见。就这样在快到一些城市时就下来走，参观当地的重要景观之后，再走出城，出城后再上车，这样反反复复地走了五十多天，才到运城。当然这也足以让我们感动一段时间了。在运城受到地区革委会领导的亲切接见，简单修整后，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奔赴

平陆的征程。

卫党在我们村呆了三天，临走时，给我留下一把理发推子，说是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就是这把推子，让我把村里所有老少男人的脑袋摆弄了近三年。我和卫党是步行到三门峡火车站的，大约是80里地，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小长征----但我们是因为没钱，和毛家山长征队的革命精神不能相提并论。

（二）

毛家山着实火了一气，喇叭里天天在叫，让全县的人都去那里参观。那是一个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日子，一大早我就和村里的贫协小组长巷娃向毛家山出发了。

巷娃属牛，也大我一岁，但比我壮实得多，手里永远拿着一块馍馍在吃。巷娃虽壮，却长得眉清目秀，脸上红噗噗的象个女人。大眼睛很深情，一说话有些羞涩，脸上就更加红噗噗了。那时他正在和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女人热恋。

那是我第一次进山，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我们走进了中条山。山里的路一会下到沟底，一会饶着山腰，一会跃上山梁。当我们走上一个高高的山峰时，巷娃指着远处一条蜿蜒曲折的银丝飘带对我说，那就是黄河！----啊，那就是黄河！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双臂“啊”“啊”地喊了半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山上远眺黄河，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晶莹剔透，没有一点黄色的浑浊，光闪闪亮晶晶的，象一泻千里的水银流，荡漾在天地之间。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豪迈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去毛家山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大约离毛家山十里地时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口摆放着几口大锅，热气腾腾的。一个老婆婆手里拿着中条山特有的大木勺和大海碗，给过往的人们舀那熬得溶溶的粘粘的金光闪闪的玉米糁糁喝。我和巷娃每人喝了一碗，真是浓郁香甜。巷娃说，山里的玉米生长期长，又没有电，是用石磨石碾子加工的，所以就格外香。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喝过那么香的玉米糁糁。我永远不能忘怀山里那特殊的玉米香味，山里那特殊的柴禾香味，山里那特殊的大砂锅的香味。

毛家山村处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山窝窝里，占着几座山头。半山腰上，知青们用白色石头镶嵌的巨幅标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毛山变二寨”历历在目。村里大约不到一百口人，民风极淳朴。知青的到来给了这个封闭的山村带来了很高的人气。县里专门为村子拉了电，据说是天津市革委会掏的钱，这让知青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知青们居住的大院子象个兵营，中间是个大操场，比两个篮球场还大，两边是一孔孔整齐的窑洞，窑洞的一头是伙房和饭厅。长征队大概二十几个人，由一个老师带队，还有一个领导小组。知青们一马绿军装，宽宽的武装带，头戴军帽，军事化管理，象军人，也象红卫兵。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宿舍和食堂，相比之下，他们已经进入了共

产主义，而我们还在旧社会挣扎呢。

（三）

我第二次上毛家山是1976年夏天。那时候我已在文化馆工作，知青下乡也已经接近尾声。毛家山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征队的带队老师当上了县革委会常委，集体户中的个别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有些知青也参加了工作。而长征队还在不断地增添着新鲜血液。一个75届的不知是第几批血液的孩子非常喜欢画画，一天到晚泡在文化馆里画素描，我管他叫“小毛山”。在他之前还有一个67届的毛山知青，74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天津工艺美术学校。我们搞展览时他给我们打版面----他是木匠。不过现在他已经是天津市小有名气的画家了，工工整整地步了齐白石的后尘。

那天接到王馆长的指示要我到毛家山采访，搞几块版面参加省里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展览。小毛山非要和我一起去为我带路。那时没有汽车，我们只有走路，约70华里，因为是上山，我们走了七八个小时，幸好毛家山有了招待所，到那里吃住是很方便的。

小毛山一路都在骂，骂领导，骂毛山，还咬牙切齿地说弄点炸药把集体户炸了。我听着就笑，这小子信口开河，说话没准，就象他画的素描。

毛家山集体户的现任负责人是一个把极左发展到极至的女人----来了7年了，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破军装。很黑很壮，一脸僵硬的横肉，长得很难看而且特跋扈。虽然一见面我就把介绍信给了她，可她就是不看，而且她明明知道我也是天津知青，还是板着脸翻来覆去地问我是干什么的，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好像他们这里是保密局。我费了很大劲才让她明白我是宣传他们来了，而且还要宣传到省里。不是任务在身，我真想马上回去。此时此刻，我也想帮着小毛山弄炸药了。

第二天我用了一上午，导演并拍摄了“学习毛选”、“接受再教育”、“革命大批判”、“集体出工”、“大有作为”等系列照片几十张。下午，小毛山带我看望了生产队长、正在生病的知青宋XX。宋是第一批长征队员，不善言辞，但人很忠厚。他在毛家山成了家，爱人姓毛，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姥爷长大，能够嫁给一个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幸，所以，女孩的脸上总是洒满了幸福的阳光。我们到了宋的家中，窑洞里黑黑的，宋正守着一个小火炉熬药，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县里又掀起了新一轮极左整人运动，长征队带队的老师走完了他的长征----他被打成四人帮的追随者。1977年平反后他终于向天津市委组织部提出返津的要求，并请求把长征队所有队员带回去，还给他们的父母。

当可以回天津的喜讯飞到毛家山的时候，宋面对着进退两难的抉择。抛开妻儿自己回去，他不忍心；一同回去，谈何容易？带队老师请示了天津市委，回复说可以解决妻儿户口。这一消息让宋毛夫妇喜出望外，可是毛的姥爷怎么办？那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一个亲民爱民的领导人，经请示，老人也可以带回天津！那时节毛家山欢声雷动，整个山村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然而事情又有了新的变故----毛的姥爷死也不肯离开毛家山半步！据说，他没有说不同意让宋一家回天津，而是说他们如果回去，先在毛家山上挖个坑把他埋了！于是，除了上大学的，参加工作的，还有宋毛夫妇，其他剩下的长征队员又在老师的带领下回转了天津----只是这一次是公开坐火车走的，并且路过北京时，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滞留。

大概是1980年春夏之交，宋XX因脑瘤去世，享年28岁。县里为他举行了较为隆重的追悼会，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把长征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6年1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

（1968----2008）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五】

不速风雪客

那是1969年春节前，我去公社办事。正在供销社门口蹉跎时，遇到一个买烟的年轻人。个子有一米七左右，戴着副眼睛，穿一身旧的蓝色的毛式服装，背一只黄绿色的帆布书包；黄黄的瘦瘦的，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知识青年。所以有人说，知青的DNA是写在脸上的，这话不假。大概他也看出我的身份，就笑了笑，递过一支烟来，问："北京的？天津的？"那时我还没学会抽烟，便摆摆手。当时在中条山地区插队的知青，除了天津的就是北京的，后来有了太原的，不过那是三五年后的事情了。我笑笑说："天津的。"很快就攀谈起来。

他叫苏岂之，北京知青，去年8月到临猗插队。他是66届高中生，在大队的学校里教书。准备利用放寒假的时间步行回北京，沿途对知青插队的现状做一个社会调查。我很惊奇他的计划。老实说，当我们考虑的还只是怎样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却在着手搞调查，研究知青的命运了，可见他们比我们有思想。基于此，我就邀请他随我一同回村里。

正值腊月，天气很冷，因为又在山上，所以更冷。我们两人一边聊，一边向远处的村子走去。临猗县跟平陆县不一样，地处运城盆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川，水源丰富，交通便利，农业和副业都很先进，虽然也在学大寨，却是运城地区有名的富裕县。他们的工分大约在七八毛钱---虽然他只干了几个月，却在年终分了一百多块。和他们相

比，我们这里的劳动强度很大，却挣不到钱。这让我认识到这世界确实差别大，同时又感到自己的命很不好。

我们村的知青见我领回一个北京知青，非常热情。男男女女的一见如故，在一起说说笑笑，都不见外。然后大家就把分的胡萝卜、白萝卜、大葱、土豆和为数很少的白面统统拿出来，准备招待客人。

这时阴霾的天空下起扬扬洒洒的鹅毛大雪。渐渐的，远山和大地都披上了一身美丽的银装。我们在被称做伙房的大窑洞里切菜，和面；大家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擀皮包饺子；晶莹的雪花随着山风偶尔星星点点地飘进窑洞，象是见来了客人也想要凑凑热闹；风箱拉的呼啦啦响，火苗一窜一窜地飞出灶堂，贪婪地舔着下面的添柴口；一时间，我们的知青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门口不时有老乡向我们的院里张望，充满了好奇和羡慕。那种热气腾腾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美丽图画。

忽然，院门口一阵嘈杂。紧接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高高的人，带着两个背枪的民兵，向我们的伙房走来，后面还尾随着一群看热闹的青年农民和学生娃。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三人已经走到我面前，并告诉我他们要带走那个北京人，“现在正打击流窜犯，你们谁跟着到公社走一趟？”。那人名叫陈根创，我们在欢迎知青的会上见过他。他长着一副乙肝的脸色，眼睛很大，无论何时何地，两个黄褐色的眼珠子总是在眼眶里叽里咕噜乱转；他和人说话时永远在笑，而你却永远无法从这笑容里寻找到几成好意。他好像永远不干活，却永远叼着纸烟；他穿着干净整洁的四个兜的制服，我们以为他是大队干部。可有人私底下对我们说，他其实什么都不是。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居然带来民兵，并且要带走我们的客人。

大锅里的水正在哗哗地滚，我们的饺子还没有下锅，北京客人尚未品尝到天津知青的热情，而我们就即将被以“流窜犯”的名义带去公社，这简直太莎士比亚了！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听了陈根创的话，我们村的知青都愣了，没有人说话。我想，人是我领来的，我没有理由退缩。我和陈根创商量，可不可以让人吃完饭再走。那人很球，一点都不通融。苏岂之见给我们闯了祸，心里过意不去，主动提出来跟他去公社。那时的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被人带去那里也不是很荣耀的事情。我狠狠瞪了陈根创一眼，心想，你狗日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阶级敌人！咱们誓不两立！可那狗日的居然还在

笑！日后了解到这狗日的是那种钻寡妇门，刨祖宗坟，阴损狠毒，卑鄙无耻的家伙。结果他还不到六十岁就呜呼哀哉了，只是我们没帮上忙，总觉得特别遗憾。苍天有眼啊，报应的还算及时。

雪还在不停地下，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我和苏岂之在前面走，后头跟着那三个象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村里离公社八里地，我们大概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苏岂之很坦然，一个劲对我笑，说，我没事，你别怕。其实，我并不怕，我是生气。走到一队的村子，我想起那几个干部子弟来。

一队有几个干部子弟，在平民子弟面前很政治，而且总是显示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本色。在学校时，他们和我们一般是不搭话的；到了农村，在贫下中农面前，在广阔天地里，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他们和我们的距离稍微有些缩小。我们这些人比较市民，几乎没什么思想、理想以及雄心壮志；不像他们，父辈都是领导干部，家里的每一立方厘米都弥漫着马列主义的空气，从小就受着革命的熏陶。而后来，这些人中确实有不少人当了领导干部，继承了他们父辈的遗志。

只有新生，原河北省副省长的儿子，后来做了司机，给司法部开班车----他是唯一把自己混同于平民子弟的不爱穿军装的胸无大志的干部子弟。

我找到新生他们，说明了事情原委。他们丝毫没有含糊，一下出来四个人与我同行。他们觉得，北京是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知青和他们一样是有思想很政治的，而这里的贫下中农算啥？算个球！球都不算，算个屁！更何况那陈根创狗日的是个上中农！----妈妈的，干部子弟就是厉害，他们居然知道陈根创是上中农！我们一个村，我都不知道！你平民子女就是不敏感，不服不行！遇事就显出差距来了。和他们一起走在路上，我竟然也很英雄气概，甚至觉得陈根创和那两个民兵已经被贬为我们的马弁了。

公社平常只能见到秘书。秘书姓王，穿一身黑色棉制服。崭新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缠着一圈又一圈的黄色塑料带，象个缠满了纱布的伤兵。王秘书正在办公室擦他的自行车，本来已经很干净了，他在用一根钉子往外抠塞进车轮花纹里的泥巴。屋子里一下子进来了9个人，显然有点超载了，王秘书有点愕然。陈根创首先汇报了情况，然后王秘书向苏岂之和我问话，我们各自说明情况后，王秘书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还是向临猗方面

了解一下吧。”王秘书和四个干部子弟很熟，相互说话很随便，可以看的出来。陈根创好像也没那么嚣张了。我很佩服自己的英明决策，我敢肯定如果陪苏岂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王秘书决不会这么客气。

在我的印象里，王秘书不苟言笑，对我们和农民是很严肃的。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才明白，没有哪个人总是严肃，主要看是面对哪一个。比如对上级领导他能板着脸说话吗？知识青年来到这里以后，王秘书又增加了两个微笑对象：一个是干部子弟，另一个是女知青。那年头，物资匮乏，而干部子弟往往神通广大，有的是用的着的地方；至于对女知青为什么微笑，就不得而知了。

王秘书带着苏岂之和那几个干部子弟去了电话机房，给临猗挂长途。那时中条山地区的电话机还都是手摇电话机，由一级一级的话务员接转。笨重的电话机旁，绑着两节特大号干电池。话务员坐在一个操作台前，不停地拔来插去，嘴里不停地喊叫着对方。陈根创和那两个民兵早已挣足了一天的工分，回家去了。我和新生两人在公社的门洞里避雪，聊天，等他们的消息。

那时候通信极为落后，一个地区通个话可以把你的手臂摇疼，也不见得能通，即使通了，随时有可能突然中断。那时的电话基本上是各级政府用的，主要考虑的是战备。至于老百姓，似乎从来就没有那个奢望。

天渐渐黑了，大雪依然在下，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苏岂之和那几个干部子弟一直在话房里没出来，新生跑来跑去传达着信息。但是临猗的电话始终没通。大家都没吃饭，也没有人喊饿。等到夜里约12点多的时候，新生跑来告诉我，通了！没事了！老苏是临猗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我长出了一口气，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太他妈的扯淡了！

我对新生说，既然事情清楚了，咱们回去吧。新生说他们聊兴正浓，我怎么说？这样，我再去问问，如果他们不回去，咱俩回去。一会儿，新生回来了，他说：他们不回去了，要咱俩也别回去。我想了想，说，既如此，你留在这吧，我回去。告诉苏岂之他如果不走，明天见；如果走了，我就不送了。有你们哥几个陪他就行了。新生没有挽留我，我心里也说不清什么滋味。

雪下了一天了，天空中仍有雪花不停地迎面扑来。地上的雪已经很厚了，走上去沙沙作响。天是黑黑的天，地是白白的地。在这片黑白世界里，在这茫茫的雪夜中，在通往中条山脚下一个偏僻山村的路上，走着一个小小的我。雪地上有一行弯弯曲曲的深深的脚窝。我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一个劲赶路。不管怎样，对新生他们哥几个我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毕竟分担了我许多的愤懑、迷茫和无助，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恐惧。

写于2006年3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六】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德州奇遇记

自打和苏岂之一同去公社接受调查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可新生却一口一个“老苏”如何，看样子他们一直有联系，并且走得很近乎。这不得不引起我阵阵醋意，好像刚结识的一个红颜知己瞬间便被好友勾引了去。春夏之际一次同新生上山打柴，把我气得不轻（见打柴（二）），然而我却偏偏总是和他搅在一起，躲都躲不开。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欲回天津看病，新生一行同往

1970年的夏天，我不停地闹肚子，大队卫生所跑了无数趟也治不好。经常不知道何时何地就匆匆内急，制造了许多尴尬局面。我决定回天津治病。把平时攒下的钱数数，刚够路上所用。于是便跟大队开了证明，收拾一下，于7月24日早上踏上回家的路程。

在中条山地区，较为平坦的地方叫“垣”，“垣”上都是庄稼地和路，村庄一般在沟里。沟的两侧被劈成高约10米左右的一个钝角，在立面上打窑洞住人，平面做院；再修一条通到垣上的小路。窑顶上用石碾轧得平平的晒粮食，叫做崖场；崖场边上一般都种有树，打场小憩时乘凉用。基本是家家如此。队长派活，便在崖场上敲钟，社员们就都顺着自家的小路走到崖场上。如果找人，也在崖场边上喊，基本上都能听见。还有一种直接在平地上挖的，叫做“四合套院”，那是比较浩大的工程，稍微有点钱的人家才住得起，比起沟边院落安全系数要高好多。

我走到一队时，看见新生在下边的院子里，便随便喊了一声，新生就跑了上来。“今天又没出工？”我问他。“懒得出。”他说，“你不是也没出？你上那去？”-----他们这几位公子哥经常不出工。“我回天津看病。”我脱口而出。

万万没想到，就是这随便一句话，竟惹出许多麻烦，并且让我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

新生看着我，不知在想什么。忽然他说：“你等一下。”说完，跑到下边。不一会，又上来仨人。两位是高干的公子，领袖人物绰号叫“老鬼”，另一个叫“老递”。还有一位是华北某大局高工的公子。一上来大家很高兴，“你要回天津啊？咱们一块走。”我一愣，“你们也计划今天走啊？”“计什么划呀，不就回趟天津吗？我们陪你回去！”老鬼说。口吻就象现在我们去一趟超市，轻松得象什么都没买。

回家有伴儿倒也是好事，只是哥几个什么都没带就走，这也太随意了！想起上次他们陪我去公社保苏岂之，觉得干部子弟虽然很傲，但确实有傲的理由。不象我，既没有工农子弟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的精神；又没有书香门第的子女温文尔雅，气度不凡的风范；既没有市井家庭孩子勇敢机智，豪爽义气的性格，更没有干部子弟指点江山，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所以我很难被人瞧得起，用中条山的话说，就是“不叫一些”。走就走吧，看样子他们也不象是开玩笑。

我当时面黄肌瘦，头发焦黄象一把枯草，穿的也很破，还背着一个旧书包。即使不象个乞丐，也象个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流浪者。每当谁点烟的时候，我都要退后一下，生怕一根火柴把我点着了。我跟在他们后边走，看他们四个红光满面，器宇轩昂的样子，心中充满了自卑。

我们在公社拦了一辆卡车，老递扔给司机一包“大前门”，司机师傅就把我们捎到了三门峡市。到了三门峡火车站，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开会。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要扒车回去。天哪，我这胆小如鼠之辈怎么敢扒车？我说我的路费够了，不想扒车。老鬼大眼睛一瞪，你怕什么？我们五个人呢！互相掩护，到北京17个小时，只要把查票混过去，明早我们就到家了！新生又来做我的工作，咱们试一把，万一趟出条道来，以后咱们回家不就方便了？人家古城的，枣园的，苏韩的都是扒车回去，根本不花钱！四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开车绕收费站时，就先试一把。新生这段话让我受益非浅----我所在城市周围的收费站凡收费10元以上的基本上我都能绕过去。

面对省钱的诱惑，我终于动心了。谁知买完票，我一看：他们竟买到邯郸。三门峡到北京，邯郸就一半了！我的钱如果买通票到家没问题，但是如果分开买，就不够了。万一扒车失败，我们就困半道上了。“一个人10块零8毛，交钱。”老鬼催促着。大家交了钱，都很兴奋，似乎我们已经离家门口近在咫尺了。只有我暗自嘀咕，干吗买到邯郸，买到洛阳不就完了，还少花点钱，反正是扒一回。老鬼听见了，说，买到邯郸是因为这趟车过了郑州到安阳前后查票，查完票不就安全了？再说这次咱们是探路，为的是下次。我至今还很惭愧自己缺乏团队精神，也忘不了老鬼那鄙夷的眼神。

二、集体扒车失败，老鬼邯郸撤退

火车终于来了，我们顺利地登上列车，而且还找到了座位。然而一上车，就感觉气氛异常。列车长表情严肃，带着列车员走来走去，乘警也不停地来来往往如临大敌，似乎旅客也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的心一直在砰砰地

跳。几年后我在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里找到了同样的感觉。

列车驶过郑州要晚上12点多，到安阳还得熬8个多小时。我焦急地盼望着，怎么还不赶快查票呀，我都等不及了！他们几个还在若无其事地聊天，而我想睡觉，却睡不着。车在洛阳停了10分钟，又继续向东行驶。忽然从车厢后面进来一大群人。有列车员有乘警。“都把车票拿出来！”一个声音高叫着。几个列车员和乘警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一丝不苟地察看着旅客的车票和神情。一个男列车员摆成个“大”字，匹开双腿，跨上走道两边的椅子靠背，两只手分别拽着两边的行李架，一步步随着查票的队伍向前移动，同时俯视着整个车厢，做全景扫描。

老鬼看了我一眼，那意思：要依你买到洛阳，咱全完蛋！我这才觉得自己确实是小看了老鬼，只好冲他笑了笑。并偷偷挑了一下大拇指，以赞许他的高瞻远瞩。

这事如果放在现在，我可能会认为车上在查贩毒分子或者刑事犯罪嫌疑人。而那个时候我却坚信这是针对插队知青的，列车员和乘警在如狼似虎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中间肯定有人对当年过分的冷酷无情感到悔疚，特别是在他们遭遇到分房不公，待遇下降，提拔无望甚至待业下岗等挫折的时候。

我睡着了，太累了，睡得很香。北京见吧，天塌下来有老鬼顶着。不料，刚过安阳，我就被叫醒了。“起来，马上到邯郸了，准备下车！”我迷迷瞪瞪地背上我的书包，跟他们走到车厢连接处。“怎么，不扒了？”我悄悄问。老鬼说：“扒个球，你看看这帮人多凶！咱们到邯郸老老实实下车，规规矩矩买票回去，这狗日太冒险了！”啊？我象当头挨了一棒，我的钱不够分开买票！这时新生又凑到我跟前说：“你借我6块钱吧，我还差6块。”我说，我还不够呢，你找老鬼他们借！老鬼他们也没钱了。新生可怜巴巴地说。

我知道新生没法跟老鬼他们比，他们几个人当中就数新生父亲级别高，可是只有他父亲那时还被关在牛棚里。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明明没多少钱却偏偏借给新生6块钱-----而且至今他也没还我。更而且我并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三、德州车站落难，收容所内惊魂

我姐夫是火车司机，开货车，经常跑天津至德州，大概三天一趟。我只要到了德州，就不愁回不了天津。而邯郸到德州比到北京近多了。现在想来我借给新生6块钱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分手之后，我又一次计划了我的资金，一共4块8毛钱，拿出1块钱不能动，余下的钱买张票奔德州方向，反正是没退路了，走到哪算哪。我花了3块7，买了一张到束鹿（现辛集市，距德州约50公里）的慢车票，傍晚时分到了终点站-----德州。

德州是个较大的车站，道轨很多，车辆很多，上下的旅客也很多。可是我手持的这张票是不能光明正大地走出检票口的。我就在车站里瞎转，不想转进了行李房。行李房挺大，我正在寻找出口的时候，遇到俩工人，不由分

说，把我当小偷扭到了车站派出所。谢天谢地，幸亏工人阶级没有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警察叔叔虽然态度恶劣，却也没有对我施暴。否则，就凭我当时的身子骨，今天肯定无缘跟大家胡侃神聊，这一段中条山人败走麦城落魄江湖的故事恐怕就难见天日了。

虽然我向警察叔叔出示了大队的介绍信，并且一再讲述我的情况，但我仍被关进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屋子里灯光很弱，昏暗暗阴森森，象到了阎罗殿。地上坐着十几个各种各样的人。花白胡子的老人，破衣烂衫的青年，还有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至于为什么被收容到这里不得而知。有个青年被戴上了手铐，哭天喊地地叫个不停。但是警察始终没有出现。屋里其他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地坐在水泥地上，有的低头睡觉，有的望着天花板，神情茫然，两眼无光。也许新生他们已经到家了吧，我想。可我还蹲在这个鬼地方胆战心惊地熬夜。我悄悄地哭了，没想到事情居然发展到如此地步。我向窗外看热闹的铁路工人询问认不认识我姐夫，希望他能突然出现救我出去。然而他的知名度实在太低了，所有的人都在摇头。事后我问我姐夫，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那一段时间我没跑德州。

戴手铐的旅客几乎哭叫了一夜，凄惨糁人。可在他的号叫声中居然还有人鼾声如雷！真不可思议。虽然窗户大敞四开，晚风习习，仍吹不散一阵阵臭脚汗气，满屋子的人肉味。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好不容易盼到天亮。

把我押进小屋的那个警察真叫我搞不懂。天一亮他就在门口叫我出去。我想我马上就获得自由了，因为他肯定心里明白，我的确不是小偷。谁知我出来后，他给了我一张去天津的车票。啊，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期望值！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张车票很特别，中间被撕断，又用一张白纸条粘好----摸着浆糊还是湿的，上面盖了一个什么章。“快去！第三站台！晚了车就开了！”我飞也似的往站台里跑。尽管我一天一夜没吃没睡，我仍然跑得那么快，我想那次短跑的速度一定是我一生中永远打不破的纪录。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三站台的时候，那趟列车已经于一分钟前开动。望着越来越小的列车尾部那手持小绿旗的守车员，我一屁股坐在了站台上。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出站口，又碰上那个警察。“怎么？没赶上？”我点点头，把车票递给他，说：“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字？”看着他接过车票，我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谁知他一把撕碎了那张车票，冷冷地说：“你运气不好。这本来就是一张废票！”说罢转身走了。

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出站口，走到马路上去的。然而初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新鲜感立刻驱散了两天来的梦魇。我自由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四处张望，毫无目的地欣赏着这不太繁华但很古老的城市街景。我花五分钱二两粮票买了一个很大的烤饼，二分钱一两粮票喝了一大碗小米粥。东西很便宜，我手里还有1块零三分，估计熬上四五天没问题，不至于饿死他乡。

一个上午我漫无边际地逛了大半个德州城。太阳火辣辣的，天气很热。我在街边买了一个西瓜，四分钱一斤，两毛钱买个很大的西瓜。戴草帽的卖瓜人帮我把瓜切开，我蹲在马车旁贪婪地吃起来。不一会，我身边就围上四五个衣不遮体满面污垢的流浪儿，他们看看地上的瓜，又抬头看看吃瓜的我，垂涎欲滴。我吃了两块，看看这几个孩子，心想：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啊，无非是大几岁罢了！我一挥手，来，一起吃！呼啦，几只脏兮兮的小手顷刻间

把西瓜一抢而空。

奇怪的是，这两天竟然没拉肚子！不过，肚子里空空如也，确实没什么可拉的。我回到了火车站候车室，盘算着怎样回去。我看了看列车时刻，晚上还有趟慢车，我买张几毛钱的票继续走。狗急跳墙，人急上房。反正得回家，没办法时就有办法了，这就叫置于死地而后生！

四、奇遇家乡亲人，景县柳暗花明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候车大厅走进两个女孩，一个扎两条过肩的小辫子，一个留着短发。她们蹦蹦跳跳地说着，笑着----天哪，满嘴天津话！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有句经常被两派使用的词，叫做“捞稻草”，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就琢磨，既然是捞，就肯定在水里，在水里就不会多。如果在地上，又很多，那就是抱稻草了。可是捞稻草有什么用呢？后来见了“救命稻草”一词，方明白：哦，原来是救命的希望。我想，天津人----女孩----肯定是天津知青，从穿戴举止上也能够看出来。我当即决定停止冒险，捞一回稻草试试。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两个女孩跟前，说：“你们是天津的知青吗？”扎辫子的女孩一回头----哇，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呸！什么时候了，还在想入非非！----我马上狠斗了私字一闪念。

短发女孩也回过头来，“是啊！你也是？”我赶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她们说，山西，平陆的，你是南开的？我们是女三中的！你认识***吗？----认识啊，我在四队，她在二队！----她是我们一班的！----我们队有你们学校的***、***……我一说她们都认识。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一、三、四队的女生是她们的同届校友，而二队的女生则是她们的同班同学！哎呀，遇到亲人了！真是太巧了！

实践证明，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绝望。见一根稻草也要捞，说不定那根稻草下面就栓着一个大木盆！

女三中就是原来的南开女中，和我们南开中学是手足学校，也是天津市重点学校。两个女孩热情地带我回了她们插队的村子。德州属山东，与河北景县交界。她们插队的地方是景县一个叫做八里庄的地方（好像是，但也不一定是，时间太久了）。到了她们村，好像是六个女知青，对我表示了热烈欢迎，就象我们在中条山欢迎苏岂之一样，把好东西都拿出来了，给我做好吃的。晚上她们还专门誊出一间房，支上蚊帐，铺好凉席，拿出崭新的毛巾被让我盖。我受宠若惊，使劲洗了个澡，生怕脏了他们的铺盖。

第二天上午我要走，不料又来了三个男知青，也很热情。一问是**中学的，怪不得我觉着女知青对他们有点爱答不理的。虽然我看出他们之间好像话不多，可我不能不讲礼貌，就和他们聊。谁知聊来聊去，住的都不算远，便又亲近了几分。当说到回家买票时，他们都笑了，说，我们从来就没买过票！忽然有个男知青提到他有个不错的哥们就住在我们胡同，一说姓名，我的心头一跳。他说的这个人在我们胡同是一霸，我的父亲曾遭过他家的暗算，被无理关押了32天。这时，我本能地对他们采取了应付态度。但这几个知青丝毫没有察觉我表情的变化，仍热情地非

要留我再住一天。

第三天上午，留短发的女生给了我10块钱，一再声明是她们大家凑的不需要还。三个男生非要送我到车站。我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三个男生就是神，在德州买完车票，他们请我看了一场电影《铁道卫士》----哈哈，真具有讽刺意味！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四个人，只买了两张票，而且是大摇大摆地从检票口进去的！比起他们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没用了！

中午他们请我在一个很大的饭馆吃饭，旁边还有几桌婚宴，新郎新娘正忙着给客人敬酒。快吃完时，围上来七八个小流浪儿。瞪着眼睛盯着桌上的剩饭菜。我一看跟那天吃瓜一样了，就看这仨男生。他们相互笑了笑，其中那个小个子机灵鬼就招呼那个大一点的流浪儿，悄悄对他说："我们和你们一样穷；你们看那几桌菜多多，人家有钱，结婚也不在乎。你们先过去等着，我们一站起来，你们上去就抓，我保证没人拦你们！"几个小流浪儿就乖乖地跑婚宴那边去了。我们吃完了，一站身，就见那小丐帮们"唰"的就上去了，围着婚宴桌一通乱抓，有什么抓什么，吃饭的人猝不及防，见来了一群脏乎乎的流浪儿，个个往后躲。他们三人笑着走出了饭馆。我也随着他们笑，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说什么。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虚伪。

车是下午两点多的，在候车室里又碰见了那个警察，他走过来，板着脸问我："你还没走？"我摇摇手里的票，说："在朋友家住了两天。"他狐疑地皱着眉头，看看我身边的三个人，气哼哼地走了。小个子说："妈的，有票就是横！"

后记

回到天津后，我把10块钱寄回去了，做了简短留言。我没有留真实的地址和姓名，对女生而言我不想让她们误以为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对男生而言，我觉得我们不是一类人。后来我偶然在天津遇到了那个扎小辫子的女生，她说："他们说了，你真不够意思，连封信都不写！"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也再没有见过面。

1998年我们县知青大聚会时，二队的杨姐对我说："你还记得那年你在景县见到我们同学的事吗？"我说，记得，那怎能忘啊！她说："她们向你问好！"我说，你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我要谢谢她们！她说："好吧，我来试试。不过，都很忙。"然而又过去了8年，我还没能实现我的夙愿。我想我不仅要谢她们，还要争取见到那三个男生，向他们当面道谢。虽然我们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他们于我是有恩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不与他们联系都是我的错，说句忘恩负义也不为过。今天我在这里揭开自己多年的疮疤给大家看，也是一种对往事的忏悔。

如今，我们都是奔六十岁的人了，生活的磨难让我们慢慢成熟起来。我们都不是完人，但是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身上都存留着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更多的朋友读到我这篇文章，我希望文中的她们和他们和我联系，给我一次报

恩的机会。在这里，我要向她们和他们说：朋友，我想念你们！我没有忘记你们！

（又记：2007年春节期间，在二队的杨姐的联系下，我终于和景县插队的几位在天津工作的知青欢聚一堂。他们中间有的已经结为夫妇。其中有两位因在外地，没能见面。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大家非常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回忆了当初许多故事背后的故事，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认认真真地给在座的朋友鞠了一躬，并且大声向他们说：我想念你们！我没有忘记你们！我永远感谢你们！）

（写于2006年4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七】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夜宿上马村

1970年7月我回天津治病，在天津呆了三个月，呆的不想回来。后来我发现如果回家千万别超过一个月，快去快回，那感觉是到外地出了一趟差，顺便看看父母朋友，谁都不会恋恋不舍；如果超过了，再有同学整天在一起，那肯定是越呆越不想回来。

可是，你没有户口，你是黑人，见了街道干部你都要解释半天；在家里又觉着是吃闲饭的，虽然没有人嫌你，而你自己却常常觉得心虚理亏。你说你不回来呆着不难受？回去吧，妈小心翼翼地劝我，总得回去呀。那时的心情格外不好，总想发火，妈跟我说话时声音总是压的很低，生怕我认为家里容不得我。回！一咬牙，走人！

10月底我踏上归途。当时为了省钱乘坐一趟慢车，咣当当，咣当当，每站必停。想起很快就要陷入无休止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时候，就闷闷不乐，一阵悲哀；窗外正是十月金秋，可总是让我联想到回去该干什么农活，丝毫不觉得美丽。管他的，慢车更好，路上多走一天，就躲过一天劳苦，火车晚点才好呢！

列车到达水头站时，我忽然想起我同学在离水头二十五里地的上郭公社上马大队插队，我何不前去看看他，也好散散心？于是我便收拾行李下车。那时我们回家来来去去都带好多东西，最少都要两个大旅行包，我有一次回家背一个背包，背包上摞一个旅行包，两手一手一个旅行包，怕不比一头毛驴驮的少。现在想想当时真该照张相，留着教育儿子。

水头是夏县的一个镇，因为守着铁路，比较热闹。我遇到许多知青在镇上逛，就向他们问路。热情自不必说，

他们还告诉我在哪里可以免费存包。这就是知青，只要知道，你，是知青，那就是熟人，朋友，自己人，就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最奇怪的是，知青彼此之间一眼就能看出来，别人休想假冒----不管你穿什么衣服。

我按照知青的指引走到街西边的一所大房子前，看到不少知青出出进进。我进门一看，原来这是镇上的话务站，里面一个小姑娘正坐在交换台边接插电话线。当时因为军管，公社一级只有邮政和电报对外，而话务却设在公社里，话务员编制也在公社。我看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旅行包，就问那女孩，我这包可以放这吗？她说放吧，自己记好，到时别拿错了。她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我，一直在忙自己的工作。我看别人都是放下包就走了，有的连招呼都不打，也就不好意思跟人家要个存包牌或者让人家打个条子什么的，再说人家也没收你保管费。我把包放在屋子的最里边，然后和别人一样走了。

第二天我来取包的时候，还是那姑娘上班。我的包仍然在最里边，我拿走时她仍然在忙自己的工作，看都没看我一眼。这种事现在的人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当然这种事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但是它决不会被写进历史，因为它太小了；而正因为它太小，所以我总忘不了。

我一边问路一边走，终于在中午的时候到了上马村。我的同学陈瞳见了我欣喜若狂，他万万没想到我真的能来看他。一起的子明，国强等好几个同学也正好放工，见过面都非常高兴，东南西北的问个不停。中午饭吃的是炒鸡蛋，烧茄子，炒豆角，熬南瓜，太丰盛了，上马村平坦，有水浇地，所以比较富足。陈瞳说，他们去年一个工分到七毛五，是我们的三倍还多。本来陈瞳是在公社看棉花的，今天恰巧回村办事，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陈瞳说，今天我不去了，下午陪你玩，在村里转转，咱们聊聊，晚上好好睡上一觉，明天跟我去公社。

老同学见面，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很晚了，我昏昏欲睡，陈瞳还在那说，说什么我已经听不清楚了。就在我要进入梦乡的时候，有人敲门。砰砰砰，“陈瞳，陈瞳，开门！”陈瞳一下坐起来，“谁？”“是我。”保管，陈瞳起来开门。保管进门来悄悄说：“我听见井里有人，我从那过，里面有声音，你不是今天来个同学吗？”我也一下惊醒了。我同学在这，陈瞳说。“那你看看咱学生娃人齐不齐？”我们这个屋子睡了三个人，隔壁还有三个。一听这，屋里的人都起来了。快去看！

坏了！国强不在！

大家边穿衣服，边往外跑，陈瞳一把把我拉住，你不能去，你两天没睡觉了，今天一定要睡。我们去看看，也不一定是国强。那好吧，我重新钻进被窝，开始打哈欠。一会，陈瞳回来了，说，听声音特别粗，不象国强，我回来拿手电和绳子，你睡你的。我哈欠连天，但睡不着。又过了好一会，大概有半小时吧，陈瞳又回来了，是国强，

还活着。现在我们上运城医院，估计得几天。你明早自己走，有个社员明天去水头买柴油，你跟他车走。我说好了，明早他来叫你。

陈瞳走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国强那瘦瘦的脸，大大的眼睛在黑暗中晃来晃去，我没有感觉到他不欢迎我，可这是为什么啊？今天他还跟我说话，一点预兆都没有，这人怎么回事？我睡意全无。不知为什么，我打了个冷战。现在我很后悔，直接到运城多好，偏偏在水头下车，真是多此一举。

屋子里有老鼠，忽而唧唧喳喳叫着，磕着，忽而又叽里咕噜地跑，听着渗的慌。我坐起来，点燃马灯，把灯捻拧小，想驱散一点黑暗，让老鼠也安静点。不行，这小小的亮光在这偌大的屋子里显得格外阴森，还是关掉吧。然而熄掉灯我刚一闭眼，国强那瘦瘦的脸，大大的眼睛就又出现在我面前。此时我又后悔不如跟陈瞳他们一起去运城，反正怎么都是睡不成觉！可是一想不行，我的包还在水头哪。老鼠们又猖獗起来，叫的更响，跑的更欢，我甚至觉得它们就在我的枕边跑来跑去。我把灯点着，把捻拧大，大的直冒烟，干脆不睡了。这时屋里亮多了，屋里的物件也能看清了，我提着马灯，在屋里慢慢走，老鼠见了亮便又收敛了一点。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很高。靠窗是个炕，但没睡人，摆放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睡的床靠门口，是临时搭的，里面还有两张床，陈瞳和子明睡的。再往后看，天哪，里面竟然横着一口棺材！我的头发几乎竖了起来，仿佛国强就躺在那棺材里！我快要窒息了。马灯还在手里，我扭转身奔向门口，迅速把门打开，跑到院里，当时正值阴历十几，月亮快圆了，满院子的月光。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把马灯也放在地上，半天才觉得透过气来。就这样，我披着月光，仰头望天数着星星，一直坐到天亮。

到运城后，我先去医院找到他们，国强正在输液，一脸的疲惫，看看我，说了一句：你来了，便又直瞪瞪地望着我，那脸，那眼睛分明还是黑暗中的样子。那保管也在，他对我说，没事了，没事了，开始我以为是你，不熟，不小心掉下去，唉，谁知，没事了，早上我们到这的时候，村里原先在这住院的韩老汉走了，这就没事了，他走了，他就走不了了。

陈瞳把我拉到门外，跟我说，自己跳的。他不承认，他说不知道怎么进去的，胡说八道。我问，为什么？不知道，他很孤僻，可能因为出身不好吧，来了一年多了就很少说话。在学校里还看不出来，学习也挺好，其实我们哥几个没有人歧视他。不过真是对不住你，折腾一夜恐怕也没睡好吧？我说，你屋里有口棺材，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哎哟，忘了忘了，你还怕那个？他又拍拍脑袋，真是，也是，谁也害怕！

上个月我按照学校发的通讯录和陈瞳通了个电话----我们也是好久没见面了。我问起国强的事。死了。还是自杀的。他爸爸妈妈文革中死了，他哥哥也是自杀的，他可能神经受了点刺激。陈瞳说。

怎么死的我没问。反正，这年头想死还不容易？我多少有点感伤，眼前又浮现出黑暗中那瘦瘦的脸，那直瞪瞪的一双大眼睛……

（2005年10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八】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任伍这狗日

中条山是个出人物的地方。古时候有个名叫傅说（读悦）的奴隶，德才兼备，从奴隶成为"商中兴贤相"，尊称为圣人，他出生的地方后来被称为"圣人涧"，就是现在的县城所在地。据考证"干打垒"是他发明的。全世界姓傅的华人都是他的后裔，每年四月不计其数的海外傅姓华人都到中条山来祭奠他们的祖先。虞国大夫宫子奇是春秋时期的贤士，还有百里奚，都出生在中条山，"唇亡齿寒"讲的就是他俩的故事，后来百里奚被秦国以五张羊皮换回封为上大夫。

现代人物就更多了。中条山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出去的人有的在中央都做了大官。即使是和平年代，也出了些有影响的人物。最厉害的在中央办公厅，曾给总书记做过秘书，我在那时，他是县委的通讯员；还有一位现任科技部副部长，是我校友，长我三届，同一公社下乡，关系甚好；再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下放在中条山林场的大学生，现在国务院某部办公室任主任----后来和我同在农机厂。他爱下棋，抽"上海"烟，自己抽，谁都不让；我例外，他求我下，并请我抽烟----因为他屡屡输我，又不服气。还有一位也是我农机厂的同事，后来当兵，又上大学，后来经商，现在是著名大款。

省级干部比比皆是，不一而足。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有朋友说，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呀？其实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保证这些人如果见了我，绝对还会记得我，和我寒暄握手，甚至请我吃一餐也有可能。----只是这辈子能不能再见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天我要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算不算人物，看完了由您评判。

距我村三公里的地方有个小山峰，叫四州山，据说站在山顶，可以看到四个州八个县，故此得名。四州山下有个叫凹里的小村，人口不足一百人。村里有个叫任伍的人，生的虎背熊腰，力大无比，村里人惊叹他的气力，常常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这狗日"。

日子太穷了，任伍决定去闯天下。一天半夜，任伍来到公社，这挨着公路，他想搭个便车下山，因为他身无分文。可是他来的太早了，哪有车？他就一边走一边看路边有没有可顺的东西。你说那年头都穷，谁会把东西放在外面？他看见一辆小型胶皮车靠在墙上。这种车一般是槐木打造，车轮比小拉车大许多，轮胎有十多厘米宽，带刹车；自重约 300多斤，载重可达500公斤，是牲口拉的车，即使是空车，人也拉不动，属于不怕偷的家什，市值约四五百元。任伍知道这是生产队的东西，他摇了摇车身，试了一下，然后猛一使劲，把车背了起来----这车能换点钱，他想。

走了将近30里地，他才把车放下来。你说他憨？他不憨。他怕人家发现车丢了，顺着车轮印追来。这样，即使被发现，也不知车是奔南还是奔北，总要耽误些时间。到了山下，300块钱把车卖了，就到处流浪。

晋南地区有招亲的风俗。有些人家没有男娃，女儿大了不出门，招个上门女婿,先干活，合格了办婚事，生了娃随女方姓。任伍觉着很适合他。山下的活路对任伍来说是玩着干，他身强力壮，舍得出力很受女方老人欢迎。日子过得还行，就是没钱花。

凭着一身力气，他到了盐池担硝，那活苦累，一天跟扁担玩命，从早干到黑，披星戴月。但是挣钱多，那活计件，干好了一天挣十多块钱，一月就是三四百----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相当普通工人的十倍。但这要付出代价，很多担硝的人都只是干几个月，挣点钱回家说媳妇娶亲，走了再不来。有些老油条干的时间长，并不干那么多，每天干上三四块钱，一月一百多，够吃够喝抽好烟，还可以找个相好。任伍干了一段时间，觉得太累，就开始动别的脑子。他开始四处游逛。

一天他溜达到夏县的一个小村，发现这村里有苇塘，面积还不小。盐池每年需要大批的芦苇，有多少要多少，而且价格还高，当时付现金，决不欠账。第二天，任伍身穿一件柞蚕丝的小褂，头戴一顶有一圈褐色丝带的草帽，鼻子上架着一副墨镜，手持一把折扇，看上去很象一个汉奸。小山村的农民见来了城里人，还是盐化局的干部，个

个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一听要芦苇，更是喜出望外，又是递烟，又是上茶，忙个不停。最后商定小村给盐化局送20车芦苇，明天晌午前送到。

转天上午10点钟左右，20辆装满芦苇的马车浩浩荡荡地来到盐化局门口。任伍说，先等等，我让保管来检验一下质量。说完让生产队长和会计在那里等候，他进了大门。不一会，他带着一个人出来了。那人看了看跟任伍说，拉进来吧。20车芦苇卸完过磅之后，就到饭时了。队长一行和大车们在外面等着，一会任伍出来了对队长说：出纳回家了，说下午也来不了。这样吧，我给你们打个欠条，明天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会计拿来纸，任伍说，你写吧，我盖章。会计写：今欠芦苇款贰千元整。任伍拿出名章，哈了口气，按在纸上。这事要是发生在今天，谁也不会上当。但在那时侯人们是很讲诚信的，谁也没有怀疑这是个骗局。当生产队长和会计拿着盖有任伍手章的条子去领钱时，财务科说，钱昨天已经给了你们的大队会计！

盐化局还不错，知道真相以后，答应今后永远收购这个村里的芦苇，这才救了生产队长和会计两人的性命，没让他们跳盐池自杀。此时，任伍已经到了临汾，重新又找了一个没有男娃的家当了上门女婿。

任伍的又一次行骗是在闻喜。他踩点时发现某村街上有辆崭新的大马车，纯槐木，车身所有的装饰都是铜活，皮件特宽特厚，车轮乌黑，好像没用过。他观察了很长时间，觉得有机可乘，就开始寻找买主。他终于和一个小村谈好，带着生产队干部来村里看车。村里人去干活的时候，街上的人大都是老年人。这村子交通方便，人来车往，大马车跟前站几个人指手画脚也不会引起注意。经过讨价还价，以2200元成交。

双方商定，第二天在公社的饭馆里见面。见了面，签协议任伍盖章，交1100元的定金，吃饭喝酒。酒足饭饱之后，回到大车旁，任伍说，你们在这等着，我把这钱和协议交给会计，然后我叫队长和会计来，你们拉车时，剩下的一半钱交给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任伍走了，再没回来。后来发生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这两个例子具有典型的任伍特色。细想任伍作案的特点：1、骗小村，不骗大村；2、骗集体，不骗个人；3、策划周密；4、见好就收；5、不吃窝边草；6、独往独来。任伍行骗水平现在看来不算高明，好像也不该得逞。但是当你知道这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你就不得不佩服任伍的确是个天才----他没上过一天学，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任伍作了多少案，咱们无从考证，但据我县公安局人说，他的案卷两个人要看一星期。这狗日就一条：抓住就交代，他信奉坦白从宽。他劳改过，判过，蹲过大牢。但都时间不长，因为他劳动表现好，往往提前释放。

1969年，我到那里的第二年，任伍回家了，穿着很体面，俨然是个城里人。那时任伍名气特大，认识他的人问他，和他开玩笑，他都不在意，很是随和。一天，他出现在县城某厂的厂长办公室里。任凭任伍磨破嘴皮，厂长就是笑，抽烟，一言不发。厂长心想，打死我，我也不跟你打交道！任伍是越说越激动，难道非让我把心掏出来，你才相信我？不错，我是骗过人，也坐过牢，但是我骗过乡亲们没有？我在外面浪荡够了，我想家，我得回来！我得给家乡的父老们办点事！

原来，任伍听说县里极缺焦炭，就跑来非要帮忙。那时焦炭特紧张，厂里经常断顿，不得不停产。

厂长最后将信将疑，便松了口。那好吧，你去搞，搞来我掏钱。他想，你狗日休想跟我耍！任伍长叹一口气：唉，这辈子我是完了，把自己名声搞臭了，没人信我了！好吧，你也知道，我是从牢里出来的人，身上没有钱，但是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啥也不说了，我就是把命押在那，也要先给你弄一车皮回来！

任伍果然神通广大，三四天，就告诉厂长去运城货站拉焦炭，一车皮。县里轰动，任伍这狗日是咱山里人！这钱给了，又过了三四天，又告知，去，运城，两车皮！县里工业局和厂长们不好意思了，在一块商量，咱们是不是有点过了？这两车皮拉来后，任伍说下一次三车皮，咱们一次比一次多。厂长们说，任伍啊，不是信不过你，实在是弄点钱太难！这回咱统计一下，看需要多少，你一次多搞点，钱我们一次给够！

不行不行，任伍连连摆手，这样挺好，三车两车的搞，我也好搞，你们也放心，那么多钱交给我，我老毛病犯了怎么办？厂长们说，你狗日说哪去了，别计较以前的事，这件事办完你回县里上班，专门负责跑外！任伍特感动，临走时给厂长留下一个账号，说：钱太多，我不带，你们把钱汇到这个账户，我见了钱，立即发货。

十车皮焦炭多少钱，我不知道，只知道是一笔巨款。过了十多天，杳无音信，厂长们有些心慌，悄悄派人按照任伍留下的账号去山下查询，一查，款早已被提走！县里又一次轰动，任伍这狗日跑啦！

开始我总结任伍作案的特点第五条是：不吃窝边草，看来错了。不是不吃，是嫌草少；这次，窝边草很厚，吃着又方便，他便狠狠地咬了一口！的确很狗日！

可能是1973年的四月，任伍死了，在距侯马火车站北边十几公里的铁路上，他卧轨自杀。衣服很好，身上有两

千多块钱，还有一枚他的手章。为什么？不知道。

（2005年5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九】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大侠王龙江

中条山下，北京知青谁名气最大？男的数王龙江，女的数张蓉。

先说张蓉，那叫漂亮！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大约1.65m，梳着两条大长辫子。具备美人所必须的所有要件。不粗不细两道弯眉，那鼻子端端正正不大不小，一口白牙象一串珍珠！再加上大眼睛，真双眼皮，粉酥酥的圆脸尖下颏，你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远远不够。反正这么说吧，张蓉走到哪，哪就鸦雀无声，甭管多少人，目光一致“唰”全过去了，行注目礼。你说章子怡，张柏芝，蒋勤勤，什么大小陶红沈冰冰啦，当然这些都是漂亮人，但是比起张蓉来，怎么说呢？一句话，你能挑出张蓉比她们强的地方来！

看到这，有朋友说：中条山人开始胡说八道。真不是。在我们县，不管是知青，还是贫下中农，还是大队、公社、县里的干部，连男带女都算上，只要见过张蓉的，绝对和我观点一致，只不过我属于研讨性质，比他们更文化、更学术、更理论一点。

张蓉现在在美国某大医院，是眼科专家。有不信的可以上网去查，网上有照片。我连名字都没改。美国的眼科专家不是随便当的，有数儿几个；不比中国，专家比鱼虫儿还多，一查，净是假的。又有人说，这么漂亮，怎么不进演艺圈呢？又错了，进演艺圈最重要的是胆儿大，疯疯火火，太文静不行,光漂亮也不行.现在好多想进演艺圈的小姑娘不懂，以为刺个双眼皮，垫个高鼻梁，纹个钢丝眉，就成了明星了，实在是太幼稚。

王龙江在学校时就胆大过人，为人豪爽仗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更是南征北战，曾经多次帮他同学的表弟出气坐火车跑到天津去打架。王龙江个子高，一米八多，留一个大背头。虽不算特英俊，却也风流倜傥；能说，侃大山别人插不上嘴。他喜欢张蓉，在学校时就喜欢。现在都在中条山下乡，两人相距20多里山路，他就经常往张蓉她们村跑。可是这漂亮人往往不爱笑，喜欢做冰美人，一脸红楼梦。见了张蓉，王龙江好像变得木呐，最多说今天干什么活了，挺累吧等等，张蓉或者“哼啊喳是”地应付，或者不吭气。所以王龙江有时翻山越岭地跑一趟最多也只能多看两眼红楼梦而已。

那个时候的人谈恋爱象作贼一样，即使偷偷的在一起，说话也绕好大的圈，象“我爱你”这一类的语言不到瓜熟蒂落一般不会出现，不象现在有的年轻人这仨字逮谁跟谁说，直来直去，速战速决，第一天认识，第二天结婚，第三天离婚，快的令人头晕目眩。现在看来王龙江还是属于一厢情愿的暗恋，出手无望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女人太漂亮了具有一种天然的威慑力，让人害怕，没人敢追。

所以张蓉在山里呆了大概五六年也没怎么谈恋爱。因为没有人不爱张蓉，也没有人敢爱张蓉。张蓉则后来上了大学，再后来去了美国成了人物。本来今天主要讲王龙江，跟张蓉只是沾一点边。但是因为张蓉也是我们中条山的骄傲，所以，费了点笔墨，想必大家也可以理解。

窑头村是个大村。安排了十几个知青。那时吃还是能吃饱，就是缺油星。村里一年分二斤油，这还是多的，我们队里一斤半。当时北京每月供应半斤油还不够吃，你说一年二斤油能到哪？这天晌午收工回来，一进伙房，做饭的女知青就说，又没油了，只能吃咸菜。大伙七嘴八舌地发牢骚。王龙江说你们等着。转身上了大队。大队有个油坊，雇几个外地人打油。王龙江走进油坊，四处打量，见地上有只铁桶，里面有三十来斤油，提起就走。干活的有认识他的，示意其他人别吭气。

那时，贫下中农认为知青都会武功，见王龙江人高马大便都装聋作哑以避免招来杀身之祸。谁知过了不一会，大队副主任路过，看见门前有滴的油迹，就问。那些人只好说，是那个高个学生娃。这下好，那边哥几个正兴高采烈地和面煮油馍呢，这边副主任带着俩民兵背着枪破案来了。后边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龙江！”二主任大声喊着。王龙江出门一看是他，笑笑，“着什么急，呆会把桶给你送回去！”嘿，二主任气糊涂了，我不是要桶来的！“好，你不要，我就不送了！”不行，你得跟我走！

当时，大队主任是有权抓人的。“呼啦”知青就把二主任和民兵给围住了，怎么，想抓人？有逮捕证没有？僵住了。王龙江在村里人缘很好，他尊敬老人，大爷大妈的见谁喊谁，遇到年纪大走路不方便的，他总要上去搀一

把，年轻人也喜欢他，他知道事多，又常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所以围观的人甚至连那两个民兵，都不向着主任。“不就是桶油嘛，啥了不起？学生娃是毛主席派来的，吃桶油算啥？”人群里有人说。谁说的？主任回头看，找不着是谁说的。王龙江说，“主任，你先回去，我等会吃个油馍去找你，行不行？”好样的！有人又喊。主任悻悻地走了。

当王龙江大到了大队的时候，支书也在那。估计二主任是受了批评，耷拉着脑袋抽烟。支书说，龙江啊，有啥困难跟大队说，大队尽量解决。王龙江就怕人说软话，只好说，书记，今个我不对。这样吧，您多给我们点油，完事按高价扣我们工分还不成？后来，知青每人增加一斤油。这事还有一个版本，说王龙江把主任打了一顿，我曾经问过这主任，他说没有打，他说后来龙江跟他特哥们。

我第一次见王龙江是下乡放电影的时候。那时农民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大村一年最多放两次电影，有的小村甚至一年一次都不一定。有一次电影到了窑头，大队按顺序给我们派了饭，谁想这家婆娘十分吝啬，中午饭让我们吃特别黑的玉米面馍外加四盘咸菜----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咸韭菜、咸辣椒。这东西放在现在是好东西，去年春节我回去一趟，专门要这些咸菜吃，弄的请客的人十分为难。那时候可不一样，我们天天在农村跑，这种饭菜吃的太多了，人人都有胃病。穷地方我们不计较，可大一点富一点的村这样对待我们，确实让人受不了。而且，我们吃饭要掏钱掏粮票，更何况管饭这家的男人也在外面工作，总该体贴一下出门在外的人吧？

当时正普及样板戏，我们带的片子除了三个样板戏外，还有一部《青松岭》。我们放映队长就决定，晚饭不吃了，只放一场样板戏，住都不住，连夜赶往下个村。记得那天晚上放的是舞剧《红色娘子军》，老百姓最不爱看的。完事收拾东西就走。支书一看不对，怎么不演《青松岭》，社员都在这等着？这里有问题，就问在谁家吃的饭。主任一说，就叫支书给骂一顿，怎么派到她家？轮到了。轮到也得换！看来这婆娘吝啬的也有名。

支书跟放映队长熟，好说歹说不让走。放映队长往我身上推，说现在我主事；我就铁着脸非要走。不知是谁说，这是个知识青年，快，快去叫龙江！王龙江来了，都是知青,一说一笑，还能有什么事？结果，重新拉银幕，重新摆放映机，又放了一场《青松岭》，第二天，大队给知青点拨了三十斤白面，五斤油，三斤鸡蛋，让我们在那吃，晚上接着放。从此王龙江给他们立下一个规矩，以后电影人再来，就照这个标准到大队领东西，由知青点招待。去年回去还见到跟我一起放电影的尹师傅，提起这事就哈哈大笑，觉得有点敲诈勒索的味道。

认识了王龙江，以后到窑头就去找他。他后来看过树，再后来看果园，大队支书会用人，让他看果园没人去偷果子。一次到果园找他，他正弯着腰找鸡，他养了十几只鸡，告诉我等鸡长大了，给我炖着吃，然后又笑着说：小

声点，别让鸡听见！那天他请我吃了他自己摇的蜂蜜----还养了几箱蜂。他有时到县城，特神----要不穿一身皮衣皮裤皮鞋，要不穿一身黑色粗布衣裤方口布鞋，腰间还系上一根麻绳----大背头老是油光瓦亮，你说这什么形象？

王龙江喜欢独往独来，他不住集体户，住在大队医生家院里。院里五孔窑洞，医生用四孔，他住一孔。本来关系挺好后来出了件事，两人反目成仇。医生新婚，小媳妇娇小可人，家庭条件上乘，本来应该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但是医生有点花心，经常夜不归宿，渐渐地矛盾公开化，两口子便打架。由在窑洞里头打到院里再到街上。

这事王龙江本来是不介入的，可是有一天碰上了。那医生揪着女的头发在院里打，王龙江放工回来有点看不过去了，就劝架。劝架时可能是有点怜香惜玉，偏向了女的，这男的就不干了，“妈日妈日”就冲他来了。在中条山地区“妈日”这词挺怪，字面上它属于骂人的话，但如果关系好，妈日又表示亲热。但此时此刻显然不是亲热的表示。看来该教训一下这球人了。王龙江三下五除二，把那医生打跑了。

谁都明白，两口子吵架无所谓，千万不能动手，一动手就伤感情，一伤感情就容易出权。中条山女子既多情又义气，当晚就向王龙江寻求保护，说怕那球人打将回来性命难保。王龙江就大义凛然，义不容辞了。那医生虽有外心，却也不甘心顶个绿帽，便半夜三更悄悄潜回家中。看看窑内漆黑一团，便敲门。一会儿灯亮了，听着门闩被拉开，吱扭一声门开了，但见王龙江光着身子，只穿了一条小裤衩，笑眯眯冲着医生打了个手势，“请进！”我的妈呀！那球人竟吓的抱头鼠窜！

由此，王龙江被誉为大侠，一场英雄救美也不胫而走。

后来王龙江被捕了，关在县看守所。大约关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和妹妹从北京来看他，运城地委派了一辆“上海”轿车，那时县里只有一辆布蓬的北京吉普。我们只知道王龙江的父亲是十级上下的干部，他妈妈也是老干部，都在中央某个部门工作。那个时候虽没公开打倒，但也靠边站了。但王龙江从不提及他的家庭。他妈妈只跟他说：要好好改造，就回去了。第二天，他被释放。据说，他妈妈来时，他爸刚刚恢复了工作。

有一次在东方红饭店吃饭，我们问他是不是因为那女的，他说不是，他说人家不管那事，那女的把责任全揽自己身上去了，特义气！那为什么抓你？说是反革命罪。你怎么反革命了？不知道。其实我们经常听他说些内部事，那时我们叫他《参考消息》第五版，他也常常发表些评论，主要是说某某某不死中国好不了之类的话。他还说，咱们县有本事的人都在监狱里了！这在当时显然属于反革命言论，但是究竟是谁告的密，至今也没弄清楚。

1975年初夏，王龙江失踪了，县里恨不得挖地三尺，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是他妈妈和妹妹来整理了他

的遗物----其中竟有一套《米丘林全集》。据说他妈妈没流一滴眼泪，而他的妹妹却哭了一路。对于他的失踪，众说纷纭，有的说他跑美国去了，有的说去了加拿大，还有的说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见过他----这个我们不太相信，因为他说过他最恨日本人。也有人说他死了。但是这些都没有证据。不论怎么样，反正人是不见了，直到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惋惜。

（2005年5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中条山的日子系列【之十】

此系列文章谨献给中国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2008)

棋人，奇人？

中条山的农民玩一种推石子的游戏。两个人在地上画一个正方形，中间打一个叉，连上四角就是棋盘。然后你用两个石子，我以两个棍棍当棋子，你推我堵走起来，简单而有趣。当然也下象棋。知青的到来使村里的象棋爱好者棋艺大长。我们队六个男知青四个下棋，一个较厉害，三个水平相当；但是赢贫下中农还是绰绰有余。这多少让劳动处于下风的知青找回一点面子。

县里每年举行象棋比赛。冠军是北京知青，叫郝铁扬。他不是跟集体来的，是从内蒙转插回乡的知青，听说小时候拿过北京西城区少年亚军。郝铁扬的父亲据说十三级，县里对他也是另眼相看，所以早早安排了工作，在某厂当电工。电工本身事情不多，遛遛逛逛，他就到处访高人切磋棋艺。不知听谁说，三门公社有个刘念春，下棋挺厉害，就到处找人引见。

刘念春是北京53中的高中67届高才生，因为成分高，既不能上大学，也难以安排工作，只得天天扛着大镢头种地。听说他爸是司徒雷登的学生，你想这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拜拜的人，刘念春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那年春节，刘念春还在北京探亲未归，这郝铁扬的邀约就寄北京去了，无论如何回来时发个电报，他一定要亲自到三门峡火车站去接。果然，刘念春来的那天郝铁扬真去三门峡接了。这可真不简单，县里插队知青连北京的带天津的1400人，在县城工作的也有二、三百人，让郝铁扬如此器重的还只有刘念春一人。

那时火车从北京到三门峡需要开17个小时，火车上必须过一夜。中午1点多到，顺利的话，坐摆渡过了黄河到县城得三点以后。那时买不起卧铺，人还多，来回来去要带很多东西，坐火车是很累的。刘念春随郝铁扬昏昏沉沉地来到了他的工厂宿舍，吃了饭，就要开擂。刘念春说不行，我一夜没睡，你让我歇会行吗？好好好，你在我床上躺会儿，我给你沏杯茶，你想一屋子观擂的，刘念春能睡着吗？躺了一会，起来喝口水应战。

郝铁扬板着脸大声说："看，行，谁他妈也别说话，要是说话，别怪我不客气！"就得象铁扬这样，要不鸡一嘴鸭一嘴就乱了。一屋子人跟没人似的，裁判宣布开始，两人你来我往杀将起来。下了不到三个小时，郝铁扬连赢三局。这战绩对刘念春来说从未有过，不啻受胯下之辱，就是再有涵养，脸上也有点挂不住。就说，今天我也回不去了，你给我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咱接着练。郝铁扬欣然应允，他也知道今天多少有点乘人之危，如果不同意，会让人耻笑。

第二天，比头一天人还多,经过厂里同意擂台赛搬到了会议室。又一番昏天黑地地厮杀，下了近五个小时，刘念春力取三局，郝铁扬惜败，可见还是刘念春厉害，而那郝铁扬也非等闲之辈。两人回到宿舍，坐着喝茶聊天。

两人是惺惺相惜，好汉英雄。聊着聊着，那刘念春忽然盯住郝铁扬不动。愣了片刻，铁扬笑了：怎么，要给我相面？谁知刘念春竟说：你眉心发暗，定有一灾！郝铁扬哈哈大笑，你看咱是信这玩艺儿的人吗？刘念春说，你还是小心点，危险的活别干。郝铁扬又一阵大笑。

一天早上刚上班，有人告诉郝铁扬去厂办公室，说厂长找他有事。刚推开办公室门，就有两个穿蓝色警服的警察上来把他拷上了。你的案子犯了！怎么回事？郝铁扬一头雾水，根本都没反应过来。原来，郝铁扬在内蒙插队时交了个女朋友，后来不明不白地死了，尸体是在一口枯井里发现的。后来郝铁扬就转插回了自己的老家-- --山西。警方调查时，原先队里的有三个知青作了对郝铁扬不利的证词，于是内蒙警方与山西警方联系，最后决定逮捕郝铁扬。

事情发生后，厂里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多说铁扬狂妄，谁也不相信他会杀人。倒是刘念春名声大噪，整个县城都嚷嚷遍了：那个下棋的知识青年会算命，会看相，神啦！

我和刘念春较熟，后来县里一中聘他交初三语文，我当时已调到文化馆，仅隔一条巷子。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我那。聊天，下棋----不过我这棋就没法跟他下了，必须让子，只有让一套车马炮，我才能顺利赢他，很没劲。他天天早上起早练气功，还拉着我练，我这人干什么都是虎头蛇尾，只练几天就撤退了，可是他不，从不间断，身体也特棒，还练拳，很地道，在三门峡有一次打公用电话，遭四个小痞子袭击，他都没吃亏。

他很穷，据说北京的家被抄的一干二净，象现在销售的毛坯房。他总是见谁都很谦恭，没有多少话，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四个口兜的那种上衣，但很干净。同样，关于他的家庭情况都是听其他同学说的，他也从不提及。他留着短短的平头，已经花白，布满沧桑。我问郝铁扬的事，他只笑，不说话。

人们说郝铁扬完了，因为那年头冤假错案特多；然而事情并没有象人们预计的那样，而是忽然出现了转机。郝铁扬在看守所坐了仅二十几天，就被释放了，说是内蒙那头把案子破了，真凶已经伏法。因为郝铁扬老家是我们县的，亲戚很多，所以在看守所里也没受什么罪，只是受了一场虚惊。

郝铁扬出了看守所先找刘念春，非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这叫刘念春没法回答。你说不灵吧，郝铁扬进去了；你说灵吧，进去没几天又出来了，毫发未伤！他还是笑，不答。郝铁扬不依不饶非让他说，刘念春没办法了，最后说了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郝铁扬也笑了，说，对，我是福，不是祸！哈哈哈哈！然而一年后当郝铁扬想起刘念春这句话时，竟吓得魂飞魄散！

两人此后参加了一次地区举办的中国象棋比赛，刘念春拿了第三，郝铁扬拿了第七。

1979 年刘念春办病退回北京，检查身体时没毛病，这怎么办？他叫我给他出主意，我想了半天，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样----改体检表。我改的天衣无缝，谁知他看我改着很容易，竟在交表前又偷偷改重了一点，遗憾的是改脏了，露了马脚！又找我来了。你干吗画蛇添足？我很埋怨他。他说，唉我不是想重点好批吗？我看你挺随便就改了……，那怎么办？我也没辙。

真是当事者迷，那么聪明的人此时竟也乱了方寸。后来我俩商量找老陆（知青办主任），实话实说，争取同情。反正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老陆真是好人，非常善良的一个女人，四十多岁。听完刘念春的哀求，竟然没有任何斥责的话，甚至连批评都没有，就把表收了。过了几天，通知他办手续。我们很多知青提起几任管我们的知青办主任都是非常感激，因为他们从来不难为我们，总是尽可能帮我们，这也是我们怀念中条山的日子的原因所在吧。

刘念春走了，郝铁扬没了对手，感到很空虚，好在每年要回北京看父母，就顺便找念春下棋，两人还能见面。然而有一天晚上下大雨，厂里突然停电，一查是厂里电路短路，郝铁扬去配电房维修，起了大火，幸好还有别人在场，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有一只手不能伸直，脸部已是面目全非。县里那些多嘴多舌的人们又到处嚷嚷，说刘念春给郝铁扬相面说的是这次大火，应验啦！小县城沸沸扬扬地传播了好久。

1992 年，刘念春携夫人海燕和我好友李琨来我处看我。此时我已调回河北11年，多年不见，感慨万千。李琨说，刘念春蹲了好几年大牢，是为了西单XX墙的事。现在好了，下海经商了。我惊奇地发现，刘念春一头乌黑的头发！这是怎么回事？他露出那熟悉的微笑，憋的，他说，一进去就给玩一个大秃瓢，后来长出来的就全是黑的了！太拍案惊奇了！

念春原来的夫人屈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念春入狱后的第二年提出离婚。新夫人海燕才22岁，军人家庭，很乖巧的一个女孩，不知吃什么东西了（念春语），非要嫁给他不可，因为这事她跟家里闹的天翻地覆慨而慷。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又是金秋，又是瓜果飘香的季节。

因为小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拮据，或者成长时遭遇三年饥荒，要不就是后来下乡插队……反正俺的食欲总是出奇的好，“吃嘛嘛香”的那种。不料十年前接连患了两场大病“胰腺炎”，食欲便与生存成了冤家，餐桌上最怕来自先生和女儿的大棒“这个你就不要吃了！”，于是常常“心有戚戚焉”。所幸水果类不在禁忌之列，也恰是从小以来的最爱，因此最盼望这秋日来临。

在童年的记忆中，水果称“鲜货”，属于比较奢侈的享受。先是盛夏之后西瓜上市，有时睡梦中被母亲摇醒，是晚归的父亲手托半个西瓜回家来。那西瓜被切成一角一角的，只在瓜蒂处还连在一起，上面顶着一张荷叶。除黑籽红瓤的以外，还有紫籽黄瓤的，最是一种白皮白籽白瓤叫做“三白”的品种印象深刻，如今已然不见。随着西瓜“罢园”，泊镇鸭梨深州蜜桃之流就多起来了，那时鲜货的外包装是“蒲包”，蒲草编就，自然环保，如今想来不禁哑然。待到柿子红果（山楂）下来，冬天就到了，偶尔会买一点桔子几节紫皮或青皮甘蔗给小孩子，其余的就是青萝卜金橘青果（鲜橄榄）之类不算水果的水果了。

六零年以后的饥饿年代，连梦里都鲜见瓜果，忘记了那些东西的滋味，后来稍有缓解的时候，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叫做“金钩梨”的东西，象一段段细小弯曲的鸡肠，土黄色，根本不是“梨”，只点缀了大约两三年的秋天，便从此消声匿迹，但那一点甜味还是留在记忆里。再后来，慢慢有了一些吃的东西，让俺想起了邂逅“莱阳梨”的一段趣事。

六七年底，学校革委会派俺去校外参加一个展览会的工作，每天要去解放路的粮校。下车的汽车站头在滨江道解放路交口一间糕点水果店的门前。秋后的水果摊比较丰富，而且是摆在门外的，便吸引了俺的目光过去，但见一种深绿外皮遍布密麻麻褐色小点点的东西，好奇了起来，对之行注目之礼良久。售货员是位老大爷，手指着插在大堆中一块小牌牌“莱阳梨1角6分/斤”说“不来个尝尝？”，俺有些不忿“怕那厚皮耶！”那梨皮看起来真粗糙，想象着咬一口将是很费力气的活儿。大爷不急说“尝尝再说，好吃！”俺更加不以为然“好吃的梨是烟台梨。”“你不懂了吧？烟台苹果莱阳梨。”……这个说法钩来俺的欲望，于是买了一个，记不起花了几分钱，只记得用手绢擦了擦就是一口，结果让俺从此爱上这皮薄肉嫩又脆又甜的莱阳梨。

到了乡下，虽然又远离了水果，但因为有瓜，所以秋天的味道依然甜蜜。记得除了那种个头不大的西瓜，还有香瓜菜瓜，偶尔路过瓜地就可以敞开吃个饱，还有大车挨家挨户去分送上门，用土篮子一挎整进屋里大饱口福。只

记得香瓜的品种有淡黄皮的“羊角蜜”草绿皮的“苏联苹果脆”和绿条纹深一道浅一道的“八道眉”。最能吃得酣畅淋漓的就算“踩打瓜”的时候吃打瓜了。那打瓜种在远离村子的沙坨子里，队里套上两挂大车几十人浩浩荡荡开拔，午饭也是队里送去。踩打瓜的“设备”是柳条笆铺就围成的椭圆，于开口处挖个大坑，踩碎的瓜顺着微微倾斜的笆底滑进了大坑，瓜籽便飘在了上面。俺们大伙儿看到有好瓜就向着柳条围子棱角使劲儿一磕，从裂开处下手，一坨拳头大小的瓜芯就势剜了出来，清甜微酸，解渴解馋，屡吃不爽。但却忽略了一个大事儿，沙坨里稀有树毛子，可怜一干人为了方便不得不远远跑出人们视线，队长则愤愤唠叨“活儿没干多少，鞋底子叫你们磨漏了！”还有一点令俺大惑不解：村民们常年不刷的黄牙齿，踩过打瓜就白了许多……

在草原小城生活了十多年，除了秋天短暂的沙果亮相，就是入冬时厂里为职工谋福利分东西时偶尔得到的苹果了，品种只是东北特产的“国光”，那东西不怕磕碰耐储藏，为了两个营养不良的小女儿，这苹果俺们大人是舍不得随便吃的，不过孩子的克制力有限，往往也等不得春节，苹果也就吃光了。其余没有鲜果的时间很长，俺们后来听说了乳品厂生产唯一一种水果罐头，检验不合格的以四角一瓶价格内销，于是常常托人成箱买来这种沙果罐头，以致后来见到面都都的那种沙果就没了胃口。

八八年俺出差去西安，时近初冬，街面上水果很多，尝过一种小红灯笼一般的柿子，便上了瘾。家乡一带的柿子多为个头较大的“磨盘柿子”，小时候还吃过一种果肉脆脆的“高桩柿子”，因为被涩过几次，所以一贯不喜欢，不想陕西的柿子竟然这样漂亮诱人好吃，临走犹未尽兴，于是捎上一大兜，与第一次尝到的猕猴桃们一起，踏上回家的路。晚上抵家打开行囊，发现灯笼与猕猴都不胜旅途艰辛，软做了一团。忙把已熟睡的女儿唤起来“喝果果”，倒是那酸酸甜甜的桃汁颇受欢迎。可惜越往以后，猕猴桃是渐渐多了，可味道越来越寡淡，不知是野生与培育的演化还是品种杂乱的缘由。

近二十年适逢开放，蔬菜瓜果也热闹起来。在海南能吃到的那些热带水果，在北方也大多能吃上了，有了超市以后，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瓜果更是惹人青睐。俺也有了最津津乐道的一件相关的事情，那就是去北京参观农业博览会。名曰“参观”，本是眼睛的差事，可嘴也不得轻闲，很多东西是可以品尝的。记得在山东一个县的展台前看关于“冬枣”的介绍，但一瞧价格立马咋舌，每五百克十六元，心想这可不是咱老百姓吃的东西，尝一颗就走人算了，不料没走出这展厅又折回来“尝”了第二颗，接下来无论如何磨不开再“尝”，咬咬牙掏了三十二元买下一袋。在四十元一箱的新疆马奶子葡萄跟前，带着羊肉串味道的讲解让人驻足，“坐飞机来的，昨天一百二今天四十，明天再想吃得飞吐鲁番啦！”那一趟俺塞满了一车绿色食品，最多的就是水果：新疆葡萄山东冬枣安徽砀山酥梨还有忘记哪里的猕猴桃“套袋富士”苹果等等等等，回到家不顾劳顿分发亲朋好友尝鲜，一通穷忙。

如今呆的这个地方靠北，除草莓苹果以外鲜见当地产的水果，好在交通运输发达，市场里便也四季如秋，大多是米国南部以及墨西哥加勒比各国等南美的出产，最远还吃到南非的葡萄。若论俺感觉上的收获当数樱桃和甜瓜，前者是因为在国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品种，后者则是开始了解这个东西，不但在蛋糕上沙拉里流连，也是人们经常

消费的类别，追究一下，它们出现在俺视野里大约是近些年的事情，知道了哈密瓜白兰瓜黄河蜜等等，因为不熟悉也不知如何挑选，就疏忽了它们的存在，直到在异国他乡重逢之后，才领略了这一分生活的香甜。如此看来，真不该当初那样怠慢甜瓜，比如在呼和浩特曾经吃过的“华莱士”，当时不及细想，现在琢磨起来，这个名字背后说不定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呢……

2003、9、27秋雨绵绵中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

那天晚上5点，俺提前下班回宿舍，路过龙舌坡菜场时，买了肉馅、韭菜和啤酒，因为小刘明天启程远赴包头回家过年，他是俺公司雇用的员工。

快7点，负责业务销售的小丘回来了，告诉俺高工被两个客户用车接走，说与他们的台湾老板就安装卫星接收系统的事面谈。很正常的事情，俺就只顾包饺子了。

8点左右，两个施工小组的人员也都陆续回了宿舍，饺子包好菜也炒好了，大伙说等等高工吧。

看官，这高工不是旁人，是俺当家的那位爷。91年11月14号公司开张的时候，俺们的注册资金是借的，自己只有攒下的3000元，付了房租后就赤手空拳了，连电话都是后来才装的。公司小，事必亲躬，先生要跑业务要管技术，从形象考虑不能当如今说的CEO,这总经理的头衔俺就当仁不让了。可是俺当的可不轻松，收发、接待、会计、库管之外，还要每天早走半小时，买菜煮饭加打扫卫生，凡是能不雇人做的都是俺的活儿。最多的时候吃饭的是11个人连厨房7个房间。

大约9点左右，先生回来了，当时饺子已经上桌了，俺忙着指挥那杯盘碗盏，没有太在意先生的举止，其实那一晚，他没吃一个饺子，也没说上几句话。

转天一早送走小刘，先生才向俺吐露实情——昨晚被5个持枪和刀的歹徒绑架到海甸岛最北边的防海大堤附近，声称有兄弟在狱中被打，需要治疗费用10万，期间诸多的威胁。先生还算机智，说我们的家底既然你们都清楚，就应该知道宿舍没装电话，如果今晚我不回去，家里必定报警，我就是被你们扔进海里，你们也白忙了。在用烟盒纸打了张欠条后，约好第二天上午9点，在市中心中国银行对面的供电局营业大厅门前交钱。先生没忘从被搜去的东西中要还了打车的钱，回家了。

怎么办？

看时间已经7点，俺们迅速分析了一下，觉得知道这么多情况，包括俺女儿们都在哪里读书，上下学的时间路线，以及俺不到10万元的家底，看来是内部出了问题。匆匆向就要出工的四川达县小叶了解，他说了些可疑的情况，这个小伙子很钻研，他的一项革新曾经获俺1000港元的奖金。

找到房东阿雄，他的意见是先不要报案，因为一旦不能一网打尽会遗患无穷。他答应去派出所找同学，看能不能弄清楚对方的来路，再做定夺。约好9点在中国银行下面的免税商场见面。

去公司安排好各自的工作后，只剩俺们两个人，俺固执己见把先生反锁在办公室，嘱咐他千万不要接听电话，俺出了门，时间是8点40分。

9点的时候，俺已经在中行明亮宽敞的营业大厅里了，这是俺的开户行，绑匪们也了解，地点是他们指定的。

转了一圈，俺来到门外的走廊向马路对面的供电局眺望，许久，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对象。又连忙下楼找阿雄，想探听他去派出所的结果，又一次失望了，偌大个免税商场进进出出的人中，没有阿雄的的影子。

难道只是一场虚惊？还是绑匪们放人后又改了主意？俺不禁窃喜起来，阿弥托佛！

且慢！天哪，前面花园里正在拍照的五个人，那个看来白净的不是额头上有一道疤？他们的年纪身高胖瘦，与先生的描述相差无几，俺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涌到了头上，心也狂跳起来……

（二）

火速返回机场东路的公司，电话铃声竟然跟着我，令人心悸地响了起来。

“叫你老公听电话！”

“他不在这里……”

“他去哪里了？”

“中行……”

“你撒谎啊！是你去的中行。你搭7路中巴回公司，就是刚才的事情。……放聪明一点，你们想逃也逃不掉的！”

……俺觉得几乎快晕倒。先生在抢俺的电话，俺躲着他。

“你们听着，我们在明处你们在暗处，我们不认识你们你们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压根儿没想跑……”

“算你明白。如果报案……”

“如果想报案，昨晚就报了。”接下来就是与他们纠缠，听出对方态度有的装红脸有的装白脸。电话里传出小孩的哭闹声，估计是公用电话。

俺以诚恳的言词邀请他们“老板”出来“饮茶”，俺试探着说，俺知道是谁雇他们“做事”，俺与那“老板”无怨无仇，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如果他缺钱用，可以商量，但是俺至今没有去赴约，是俺们实在拿不出那么多，’他应该知道啊！”俺说。

电话那头频频换人，漏洞也就出来了。但是最后他们咬定了昨晚的理由：没人指使，只是要为“兄弟”治伤。

无果，俺只得拖延时间，答应他们俺们商量一下再答复。

这以后，几乎一个小时一个电话，俺坚持先生没回来。不甘心就范，要尝试一下还有没有机会。

10点多，阿雄的电话来了。说派出所的人晚上执勤都到很晚，现在找不到。心凉了半截。

向熟识的人求援！电话打到机场保卫处，找的人不在！电话打到南航部队，找的人不在！……邪门了，认为能帮上忙的熟人一个不在！心更凉了。

已经拖到了午后，电话里穷凶极恶的声音已经快让俺精神崩溃了……

冷静下来，除了投降只剩一个办法了：报警——

（三）

张主任带着两个小兵来到公司，一脸严肃，时间是下午3点左右。

主任的官衔是新成立的机场地区“军民联防办公室”委任的，张的准确头衔是海府路派出所副所长，小兵们的确是驻军部队的，很紧张的神情。

开头的谈话叫人沮丧，张主任似乎一开始就认为是经济纠纷造成的，反复追问有没有欠帐。看俺们回答的恳切，就又转移到江湖恩怨，追问俺们有没有仇家。可惜他一无所获，因为俺们真是奉公守法呆得可以的一族。

走廊里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是隔壁渔业公司的，这栋楼的三层只有我们这两个公司。

先生迅速为电话接出一部分机。俺们是“电子工程公司”，正巧近水楼台。

当绑匪的电话打过来时，依然是俺接的，俺遍搜枯肠地找话题引导对方，为在分机上接听的张头释疑。直到他用手势向俺表示“OK了！”

张主任终于明白了俺们的无辜，他说听对方的口气不象是惯犯，应该不是眼下黑社会帮派干的。他开始与我们商量对策：接受对方的条件，但要说得不露痕迹，避免对方生疑，然后在交钱过程中抓住他们。

“这回电话谁接啊？”俺。

“谁去交钱谁接。”张。

“当然我。”先生。

“不行，有个三长两短，他可是公司顶梁柱啊。我去！”俺。

“你去？真干起来，你跑都跑不出去……”杨。——前郭旗的朋友老杨来访，目瞪口呆地浏览了这打着灯笼也难找着的一幕，“比电影还电影！”他事后说。

最后的决定是俺们俩同往，张觉得既然绑匪已经认识俺，但去无妨。俺却是生死与共式的悲壮。俺实在是没办法一个人等消息。

争论。决定。4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先生终于接了电话，对方的疑虑释然许多。按照既定方针，先生不断侃价至3万，分机上的张头手势“OK”了。再谈接头地点，没费很多口舌就敲定了四海酒店大堂，那里正是机场范围，急忙“OK”！之前对方曾经提出去南航东路的一处新楼工地，先生说那里不熟悉，怕拿钱后再“撕票”，理由充分，对方信了。

接下来是张头频用对讲机联络部下将电话打到公司，向俺们解释说“对讲机会泄密.’部署很快完成，他一再强调了注意对方有枪。也一再表示俺俩是安全的，但要灵活机智一些，比如遇到熟人先装作不见，以免伤及无辜，得罪人事小，以后再解释。

穿制服的都走了。俺们怕隔壁公司的熟人关心询问，连忙把保险柜里所有的现金带上，也随后离开公司。回到宿舍，按照部署找个腰包把现金和一叠报纸装好，又向阿雄简单报告了情况。饭是两顿没吃了，也吃不下，还好，员工们去了很远的高山村作业，眼下正好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焦急中等到7点多，阿雄送俺们穿过龙舌坡的曲折小巷，到大街上打车奔四海酒店。

张头嘱咐，尽管路不远，但一定要打车，而且一定到酒店大门门童站立的位置落车，旋即进入大堂。中途无论什么情况不要下来，因为这段路最危险，提前劫持赎金对绑匪是安全的上策。

（四）

四海酒店的门童拉开大门，张头西装革履已经等候在大堂尽头。

客人不少。俺们领会了张头的眼色。这时三个年轻人若无其事地站起身，为俺们让出一组座位。漫长的等待开始了。

今晚酒店大堂里几乎座无虚席，俺们隔壁是三个个头高大的北方人，时尚的休闲穿着，俺们估计是“伏兵”。远处悠闲吸烟的张头，灰黑色西装花领带，比制服精神许多。看着这些人加上多做深呼吸，俺也定下神来，猜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已经8点半了，还没有动静。俺俩闷头坐着不敢起身，因为行动暗号是——先生站起来。

忽然，张头在大堂尽头的楼梯拐角用手势打招呼，先生遂装作寻找洗手间的样子走了过去。原来他们在马路对面发现一辆可疑的出租车，里面三人中有一个与绑匪特征相似。张头叫先生去窗前核实一下。先生向对面张望了很久，还是难以判断——距离太远路灯不太亮看不太清楚。

先生几乎是刚刚走回了座位，几个人呼拉拉风也似的闯进大堂，俺们还没回过神来，张头从身后出现：“走吧，解决了——”

马路对面是民源公司新落成还没有装修的数幢别墅，黑黝黝的房子里传出了拳打脚踢和嚎叫的声音，很糁人。不久，一串出租车无声地停靠路边，许多拽和被拽的人影鱼贯上车。和俺们同乘一辆的士的是位穿一身名牌运动装的小伙子，东北口音，温和地说着一些安慰话。

以后在派出所的见闻不说也罢，大伙就敞开想象吧。只有几点提纲备忘而留：

抓住的绑匪是三人。

所以没进酒店，因为感觉客人太多，准备俺俩出门再劫款。

招供时已经过了他们约定见面分钱的10点钟，乘摩托赶去抓捕另二人的警察扑了空。

协助破案的五六个小伙子是中国警官大学的实习学生，据说是未来的国际刑警。俩女儿曾经极力要求去一睹“星”颜。

俺把包里的钱和一面大幅锦旗，一并献给“联防办”，以真诚地尽心尽力。

以后就没了案子消息，为安全计，俺一位河南的律师朋友给报社写了稿件，敦促结果。

开春的时候，事情的原委终于逐渐浮出水面，说来蹊跷，竟然是俺们自己破的案。

（五）：瞠目结舌的结局

话说公元1993年1月13日午夜之后，绑票案子没了下文。绑匪消息杳然——牢中的三个和漏网的两个。

可俺们急啊！那个春节俺们守着八间房子的空院（阿雄也去父母家过年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听着街上的鞭炮声，琢磨着女儿开学后的日子。

当时各个渠道的信息很多，一说钱没到手属于未遂，罪过不大没人重视了；一说不开口供出幕后人，只要咬牙受些皮肉之苦，就算一般的“烂仔”滋事；一说现在撕票的案子尚且难破，这等小事哪里顾得上来。总之，小事一桩，早晚放人，俺们被“水深火热”缠身的命运已经注定。

不久，狱中“额头疤”的哥哥找上门来，凶神恶煞地要他的兄弟：“是你们把他送进去的，当然问你们要人！”随后又大闹过两场。

春天了，提心吊胆地与时俱进着，孩子的学还是要上，生意还是要做，日子还是要过。但是何以能够安稳？

终于有一天，“额头疤”的老爹带着律师来了。所幸者，那老人是一位小学校长。一番沟通后，他和俺们都恍然大悟。他请的律师也坦言说：“这没有人家一点点责任，怪只怪你家仔们！”

长话短说，原来幕后买凶绑票的不是别人，竟是俺们公司的雇员小吕。12日那天下午他向俺陈情，老家定安要盖房子，他需要提前放假，结算了两千四百多元的工资和奖金，他走了，做了晚上那幕恐怖戏的导演。

四川小叶那天一早曾经跟俺说的，就是小吕曾屡次散布“用钱找老板！”。但是真正的起因却是在小陈身上，那小陈是小吕介绍来的老乡，在试用期内就被俺依章辞退了。不料他是卖掉家里的牛给小吕上供“介绍费”的，这些俺们可全然不知啊。小吕于是向想索回牛钱的小陈打气：“是老板辞掉你的，这钱找老板要！”不用说，同村的“额头疤”等“烂仔”成了台上的小丑。

俺们都明白了，可是俺们拿不出证据。其实小吕年后没来上班，俺就已经证实了当天的猜测。

那一年是俺的多事之秋,3月15日婆母去世，三天后俺老父亲作古，6月俺自己突患急性胰腺炎，因误诊8月复发，十几天的水米不能沾，使俺将近130斤的体重减掉两位数的零头，死里逃生之后，走路扶墙……

唉，罢了罢了！

2003。1。12－13搁笔后不敢再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活过

（一）金宝屯纪行

2007年9月15日凌晨2点半钟，沈阳火车站候车室，这是我金宝屯之行的最后一次换乘。

挂在候车室半空中的电视机播放着阿杜略带忧伤的歌：“一条路有多少分岔口，走呀走就不能再回头。痛哭过因为执着，依依不舍那又如何.....”从1974年回江南，我还是第一次重返农场，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当年一起下乡到农场的朋友说，农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农场，当年的人也大多数已经走的走、调的调，有几位甚至已经不在人世，回去看什么？是啊，回去看什么呢？可是我还是执着的想回去看看。我就想去看一眼，看看那个地方，那块我们多少浙江知青为之付出青春岁月的土地。那心情大概有点像牛虻想看他的神父，就为了了却那种深深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连着心、连着肉的怀念。这么多年了，一生都快过去了，我怎么就无法忘记？看一眼，只要让我看一眼，我就走，从此我再也不想了。我一直这样想。

凌晨3点多钟，开车了。城市还在沉睡中，晨风裹挟着东北平原上秋日的寒意从车窗冲进来。对面的小姑娘很快倒在座椅上睡着了，发出了均匀的软软的鼾声。邻座壮实的东北大嫂，脱掉了鞋子，亮出了她的胖脚丫，从随身的塑料袋里捧出了大红枣和苞米花热情地让我吃。枣子很红，苞米花很香，可是我却没有一点食欲，轻轻谢绝了大嫂的好意，只顾沉浸在自己的往事中：

1969年6月5日早晨，家乡余姚出发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火车长鸣、站台上滂沱大雨中动地的哭声，悬挂在车窗外的小妹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几天后，也是这样迷惘的夜，也是这样使人有几分恐惧的黑暗，也是这样让人几分陌生几分激奋的东北平原上初夏的风；金宝屯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农场来接我们的拖拉机的嘈杂的轰鸣、辽河边上几十里隐约稀少的灯火.....。

多么漫长的岁月，多么短促的人生时光，似乎都浓缩了，象电影蒙太奇，在眼前徐徐重现。三十八年了，东北

平原的蓝天白云、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辽河边上彻骨的寒冷和满天的沙尘，成了我岁岁年年的梦幻。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这么想着，时间过得很快，车窗外晨曦慢慢降临了东北原野。以前沿途的土房几乎已经绝迹，红瓦砖房掩映在绿树林中，倒有几分象江南景色。铁道边的沥青马路取代了早年的土路，路边居然还有花团锦簇。过了四平站，早上7点多钟，火车已经停靠在平齐线上的郑家屯站。金宝屯是东北平（四平）齐（齐齐哈尔）线上的一个小站，出发前我查了时刻表，从沈阳开出的车下午才有到金宝屯站停靠的。在沈阳，我曾与打听来的几个农场老人和至今还在农场的知青打电话，可是却半天也没有联系上一位，我只好做好无处投奔的思想准备。为避免交通和住宿出现无法预料的问题，就必须在上午到达农场。郑家屯是金宝屯的后一站，按现在的一般交通情况估计，到金宝屯应该是方便的，所以我就买了到郑家屯的票。

将近仲秋的天气好极了，郑家屯沉浸在暖暖的阳光里。这是一个小县城，当年属双辽县，我们也来过几次。与当年相比当然已经面目全非，但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份久违了的亲切。在车上打听到郑家屯有去金宝屯的中巴，下车后果然很好找。

车上人不多，司机还在等人。乘客都是当地老乡，上去了我这么一个外地人，当然就比较惹眼。人们开始热情地打问，从什么地方来，到哪里去，去干啥，我一句一句应答着。我介绍自己说我是金宝屯胜利农场的浙江知青，离开农场三十多年了。有人问，你有亲属在这里吗？我说没有，我只是想回来看看。话没有说完，嗓子噎住了，一股说不清楚的情感突然在心里汹涌，是伤心？是悲切？是委屈？是感动？好像什么都不是，又好像什么都有一点。眼泪怎么也没能忍住，热热的流下来。我自己也不明白，当着这一车素不相识的东北老乡，自己的情绪竟会如此失控，以至于泣不成声。我已无法回答人们的问话，只得回过头去把脸对着窗外。身后原来满车的热闹，突然都静了下来，谁也不再吭声。等我平复了自己的情绪重新回过头去，为了自己方才的失态感到很不好意思，想向大家解释什么的时候，人们却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不再问我什么。车子上静静的，一直到开车。

清新的、亲切的东北原野上的风，从窗口迎面吹来，白云在蓝天下一团团一片片的舒卷，青纱帐轻轻摇曳着，路边笔直的林带一直通到天边。还没有到金宝屯站，司机突然大喊，原来碰到了金宝屯胜利农场的班车。于是，还没到金宝屯终点站的我就被“过驳”到了去金宝屯农场的车上。我终于踏上了几十年前那条去农场的路，踏上了金宝屯的土地。呵，这块留下我们一段年轻生命的土地呵！

这条路，当年我们来回走了多少次。那时没有公交，运气好时我们可以搭乘场部载货的大解放，有时候就搭乘马车。冬天，好心的车老板会扔给你一件老羊皮大衣。颠簸半天，中途要到庄户上给马饮水，到达金宝屯骨头都像是颠散了架。途中尘土飞扬，碰上风沙天，回去就成了一个土人儿。我至今记得车老板那身老羊皮大衣的膻味和饮马的小村庄里的辘辘。看见西辽河的水了！当年西辽河上没有桥，从农场去金宝屯，冬天结冰自然不消说，直接从

冰面过。水浅的时候，卡车或者马车来回都是直接从水上过河。现在，河上已经架起了一座简易桥梁，铺了沥青的路面在阳光下发着光亮。我坐在宽敞明净的中巴车里，感受着、欣喜着金宝屯的今天。交通的便捷是经济发达的直接标志，看来这些年金宝屯没有与外面的世界脱节。

不到10点钟，中巴车停靠在农场招待所门口。招待所门楣上赫然写着：胜利宾馆。

（二）四站纪行

阳光明媚，天特别蓝，招待所里静静的。

穿过小小的门厅，餐厅里有两个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我上前问了一下，她指给我经理办公室。经理姓李，是原农场副场长的儿子，副场长在文革期间自杀了。经理象他父亲，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脸。算起来我们在农场时他还是孩子，现在已是中年汉子了。夫妻两人承包经营着这个胜利宾馆，女服务员就是他的妻子。

听说我是浙江知青，经理马上热情地让着“先进屋，先进屋”，然后问我：“农场你还认识谁？”我报了几个前一天在沈阳没有联系上的朋友的名字，他当即非常肯定地说：“没问题，我去找。”说完立即吩咐服务员给我送水送茶，自己不见了人影。我简单环顾了一下宾馆的环境，宾馆大概有十来间房间，在走廊的南侧一字排开。我的房间在中间，门上没有号牌，按顺序应该是8号，是个套间。走廊北侧是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是一个宽敞的大院。院子中央一个圆形花坛，各色鲜花在阳光下盛开，让人赏心悦目。突然花坛后座北朝南的一排红瓦砖房十分眼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原来的场部机关办公室！旅途的困顿疲劳瞬间无影无踪，我带上相机就从宾馆后门直奔场部大院。

因为是双休日，院子里很安静，正好让我独自流连。场部门楼高大的拱形门洞还在，楼却不见了踪影了。门洞里堆着砖石水泥等，三两小工在作业，看样子是要装修。一问才知道，门已经卖给个人。买主姓刘，搭话一聊，知道他打算在门洞里开一个小卖部。他的父亲是四站的刘少全，说起来我还有点印象，可惜已经去世。

门楼旁那个小广播室也在，只是被锁在了一扇破败的小木门里。当年我调场部的时候天津知青西克华在这里当广播员。她比我大两岁，个子不高，削肩。圆圆的白白净净的脸，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一笑两酒窝，十分清秀漂亮。当时政工组搞宣传的知青就我们俩，过年的时候，她回天津探亲，我就做代理广播员。1973年，她读书走了，我就正式兼了广播员。每天早中晚三次广播，放完开始曲，第一句话就是：“金宝屯胜利农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广播内容除了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歌曲，还有就是自己采写的一些场内新闻、好人好事等。为了发音标准，记得当时还常常一句两句跟着中央台学普通话。1974年10月11日，我上学临走的前夜，窗外是飘飞的大雪，我和阿南也就在这个广播室的小炕上，抱头痛哭，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想起往事，我鼻子又酸了。

环顾四周，场部大院比早年扩大了至少3倍，院子大概刚用新鲜的黄土铺垫，洁净平整。与原先场部行政办公室相连的，是新盖的大小款式都一样的一排红砖瓦房，门面和大门口装修一新。原先的业务这一摊都在这里办公。办公室门厅墙上是介绍农场概况的文字和图片。在那明净得几乎可以照出人影来的办公室水磨石地面的走廊里，我想起了早年办公室里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和冬天取暖的铁皮火炉。原先院子东头生产和后勤办公室那排房子还在，只是卖给个人做了店面，门面向外，朝院子的一面只留下了一排窗口。院子南首我们住过的那一排宿舍小屋已经不见了，绿草丛中只一个月洞门横向立在那里，像是在凭吊过去岁月。

我与那位小刘聊了几句，说到几位我认识的农场老人的去向。正说话间，一辆黑色桑塔纳悄无声息地驶进大院，下来几位壮实的东北汉子，小刘告诉我说其中一位是场长。听说我是浙江知青，当年在场部政工组工作，场长当即就热情相邀："浙江知青？走，上我办公室！"场长姓王，很年轻，从后旗调来农场当场长不到两年。他向我简要介绍了农场的近况。说起当年知青的事情，他非常热情感慨。他吩咐办公室接待，问我有什么要求，想去哪里看看，他可以给我派车派人。那份热情豪爽，让我一扫途中的孤独和忐忑，终于又找到了当年在农场生活时的感觉。

回到招待所，经理找来的几位农场老人已在：浙江慈溪知青徐如平、原场直机修队工人后来在农场工会主席位置上退休的王克诚、原场直团总支书记、场部后勤的大老张。虽说同是浙江知青，因为以前在不同的分场，所以徐如平我还是第一次认识。看到岁月在他脸上抹下的风霜，想到在大部分知青离开农场后，他还独自坚守数十年的艰辛，感动之余，心里不禁有点酸楚。年轻时的王克诚和大老张我们常在一起搞组织活动、打蓝球等，现在也都是两鬓白发的老人了。不用寒暄，最多的感慨就是岁月匆匆。

午餐桌上，话题自然离不了当年的生活和一些熟人，他们也向我介绍一些农场的变化。农场的老人很少了，早先比较熟悉的老袁计、刘家昌已经去世多年，吕常贵、卢尔昌、屈培生、周彬、周致和、刘桂英、陈凤歧两口子等等已经调通辽或者长春，生产组还有王锋等还在，但是一时没有找到。

农场现在的体制是属于后旗的国营农场。所谓国营，其实全部土地已经分田到户，职工（农工）以分得的少则十数亩、多则数十亩土地的农业收入为生。如果年景好，每亩地每年大概可以有300元收入。全场现有管理干部100多人，他们没有土地，只是行使农资、计划生育、环保等方面管理职能。每年旗里拨款400余万元给农场，作为干部工资以及办公开销，退休的干部有劳保。农场主食基本以大米取代了高粱米饭、苞米茬、小米面窝头等。跟早年相比，现在农场的交通很方便，农场每天有十几个班次的中巴，往返于农场和金宝屯之间。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饭后徐如平为我安排行程，开车直奔四站。场部去四站的大道一路柏油路面，宽阔平直，两旁的白杨树挺拔整齐，直通天边。马车和毛驴车几乎已经绝迹，人们的代步工具以摩托车居多，个别也有小车。以前场部去四站的大

道还有一段在，车辙也在。二十多里路，当年我多少次从这条路徒步来回，晴天满天尘沙，雨天遍地泥浆，现在这段路已基本废弃不用。

小车一直开到农场西南端最远的70号地，当年我们从四站宿舍出工，要近1个小时才走到这里。这块地原来东西走向，垄长1300多米，是全场垄长最长的一块地。就在这里，那年夏锄薅谷子，天气炎热干燥，一次中午收工，我从地里直起腰来，又热又渴，两眼一黑，晕倒在大田里，人们七手八脚将我用毛驴车拉回宿舍。德芳和阿南得到消息，中午的毒日头下，两个人一前一后，老远地跑来迎我。看到她俩泪眼婆娑的样子，我心里一热，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现在我们乘坐的小车就从70号地东面的大堤上开过来，70号地的走向从原来的东西走向改为了南北走向，分给各家或两垄或三五垄，我们看见好几起农工开着拖拉机到田间地头作业。拨开青纱帐，徐如平掰开几穗玉米棒，金黄的饱满的玉米穗预示着今年的好收成。四周的防风林带还是那样葱茏茂密。是啊，十年树木，从我们离去，好几个“十年”都过去了呢。

来到四站站区，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语录塔”。那高大笨拙的身姿依然如旧，只是上面的标语口号已经残缺不全。语录塔下有一拨农人在憩息聊天，满口的东北话听起来十分亲切。四站办公室院子和北面男生住过的瓦房大炕，以及东边的马号已经不复存在，在原办公室的西面另开辟出一个办公大院。座北一排红瓦青壁房子，院子规模虽没有场部院子大，但是格式布局与场部院子相差无几。因为是公休日，院子里没有人，办公室关门落锁。

为了我执意要去寻找当年住过的地方，绕过小路，几经曲折，徐如平把我带到南边一座土房前，他说这是全场仅存的一座土房了。土房前有一群大白鹅在悠闲地踱步，看见生人一只只舒长了脖项，扑打着双翅，欢快地叫着。一边的菜园子里瓜棚豆架，蔬菜葱茏，好一派田园风光！屋边还有一个手压井，这样的手压井是当年我们生活用水的唯一水源。刚压出来的水是清澈的，可是过不了5分钟，水就变成黄色。要想洗一件浅色的衣物不至于变色，必须把水放置几天或者烧开澄清后才可以用。冬天积冰不化，我们到井台边提水一跌一滑，有时候手套也会粘在铸铁的摇把上。现在农场开挖明渠，引入了东辽河的水，不仅用于农业浇灌，而且建起了自来水塔，全场用上了自来水。虽说不能象城市里那样保证24小时足量供水，但人们的日常吃水和生活用水基本不成问题。除了个别农工菜园子浇灌，可以说农场已经告别了用手压井的时代。住在土房里的是奚姓一家，土房里生长的孩子居然如此美丽可爱，尤其是那女孩，腼腆而不失聪慧，朴实而不流于土气。主人说，他们已经造了新房，很快就要搬出土房了。

最后，终于，我找到了当年我们11位浙江女知青曾经分住过的那一栋瓦房。这些朋友中有不少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不知她们如今可好？现在的瓦房主人不在，我只能在外面看看。园子里高大的苞米几乎挡住了窗户，紧挨着我们住过的三间瓦房，右边又新造了一排三间。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当年的痕迹，三扇窗户、三个烟囱，我想象着屋子里的走廊、灶台、火墙，应该还是老样子吧。这里我们只住了半年，后来说是为了更好接受再教育，让我们从瓦

房搬出，住进土房大炕。

离开四站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座“语录塔”，这件文革的遗物，据说这是全场仅存的一座语录塔了。它象一位古稀老人，静静地见证着金宝屯胜利农场文革和知青下乡这一段历史。

回场部后，我又去场部外围和二站的田间地头转了一圈，看见了高耸的水塔，看见了东辽河水在清澈见底的明渠里静静地流，看见了现已基本废弃的从前场部通四站的大道和那上面印满的车辙印。早年二站的果园曾经是我们心向往之的一块乐土，不仅因为那里的水果的香甜，更因为那里年轻生命般的绿，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庄户人家以经济利益为重，果树已经全数拔掉，满园的沙果、葡萄、西瓜早已无处可寻……

晚上，大老张为我找来了一位“熟悉的老人”，来者是原来场部食堂卖饭菜票的郭贵贵，岁月的风霜让昔日的同伴成了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但是很快我们就回到了当年情景中。临别，她问我：“以后还来么？”我说：“说实话，这种可能性很小了。”我和她眼圈都红了。

16日早晨，我告别农场。今生今世，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来，我从农场带回来一抔土。多少年魂牵梦绕的，就是这一抔土啊！

回来后很长时间，我无法平静下来，当我终于要开始写下这次农场纪行，又想到了阿杜的歌：“走啊走，就不能再回头，痛哭过因为执着，依依不舍那又如何……”

2007年10月

江南雨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49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翠湖边长大的孩子

有一次和一位同龄的朋友聊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看客，我们的足迹在这个时代里没有遗留任何痕迹，就这样匆匆走完很平常的人生。我对她的话基本同感，尤其对“看客”的提法觉得十分准确，而且发挥的认为，我们正是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看到了时代各个时期精彩的变异，用我们的童年纯真，青春热情，中年成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演变，以至于在接近老年的闲暇里有了一些可以回味的文字，甚至还感到似乎有一种使命，如果不把过去支离破碎的记忆捡起来，就对不住自己依托的那一段历史，不把“看客”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下来，一段完整的历史也许就会留下一些空白，也许史书的雄壮就是这些小小的回忆充实着光泽呢！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倚老卖老呢？还有点像我们的父辈“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了。：）

随着我的视线再看看走过来的路，留点现代人不知道的过去时代好奇的事，就是我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怀旧文字的初衷。

（一）庭院、井、二叔

我童年的时候，历史已经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进入了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因我正是“祖国蓓蕾”的年龄，再困难，国家也在呵护祖国的花朵，父母也要疼爱幼小的孩子，因此我是在长大以后才从课本里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艰辛。

我的家20多年来就在昆明的翠湖边迁移，这使我对翠湖四周的人文地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在翠湖东面的北门街一个拥挤的小院落，就在我家的对面曾经是李公仆先生创建的北门书屋，附近有一条坡路叫“大兴坡”就是李先生殉难处。北门街的另一端则是民国云南省长唐继尧旧居。

后来我随母亲搬到继父家，继父家在翠湖东南面的“尽忠寺坡”，那是父亲祖上遗留的私房，颇有些“最后贵族”的味道，一幢三层楼的院落，坐南朝北是正厅房；院子正厅房里住着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二叔，一个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有姑妈一家。左厢房住着保姆王大嫫，是一位跟随父亲家多年的佣人，我觉得得她已经是管家的资格了。右侧是门厅，有一照壁；北面是高高的山墙，山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到开花的季节就盛开了一串串三瓣叶子的玫瑰色的叶子花，洒落在地上的花常常被我们捡起来用线穿了戴在头上，那时一定就要载歌载舞了，还要故意把花裙子旋转的飘起来，把一头黑黑的松软的发梢也旋转的飘洒起来，投入的去模仿故事里听到的仙女。

在山墙的墙脚有一口井，井的四周用粉红色的砂石铺就是为了防滑，砂石之外是碎石子，在碎石子的缝隙中央长满了绿色的青苔，这种绿在以后的岁月里已经越来越难觅到踪迹了。那口井的水很甜，很凉，我很喜欢在井旁打水玩，把栓着长线的桶倒扣着扔下去——“扑通”！桶在水里只装了半桶水，赶快左一下，右一下抖动绳索，在摇晃中，桶下沉，盛满了水，然后再左一把，右一把，把绳索收完，一桶水就提上来了。

在我5、6岁时，公私合营了，国家没收了私房，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我们居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地藏”寺庙改造的，大殿和前厅隔成两层，每层房间的高度还有4米多，左右两排厢房，同院住了9家人。院子里有四个花坛，在“大殿”前面两个花坛方方两米，右边种了桃树，左边种了银杏树，前厅前面的花坛小一点，方方一米，分别种了苹果树和棕榈树。

最奇特的是改造成右厢房的厨房里居然有俄国壁炉！原来是到云大讲学的苏联专家留下的“文物”。左厢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口枯井，被填得只剩高出地面的一节井围了。但是这口井却在我小时候读的民间故事里有记载，原来是张三丰在此处压住了一个妖精！我记得小时候当在书里居然看见我居住的“地藏寺”三个字时，我简直惊呆了！而且院子的左厢房角落果然有井！当时的惊喜使我如醉如痴，分不清传说和现实了。

后来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我们家又搬到翠湖的东面，也是一个四合院，却比“地藏寺”小，也有四个更小的花坛，却住了10户人家，且是清一色的“同一系”的老师。

我的二叔是一个终身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是一个典型的“遗老”，肚子里的典故民俗不少，，他的昆明口音极重，“学院”叫“学旺”；“盒子”叫“豪豪”；“哥哥”叫“高高”；“飞机”叫“分机”.....最为严重的则是把年轻的服务员称为“小姐”！要知道那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一概称呼都是“同志”，“小姐”绝对是资产阶级的称呼！而且这样称呼非口音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为此，我的父母常常严肃的提醒二叔改口，而他总也改不了，我那时觉得他的“习惯”称谓很有趣。

国家没收私房后，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二叔仍然留在老宅，但是身份从“老爷”变成了房客，每月需要支付房租，保姆王大嫫也回乡下去了，洗衣做饭得自己解决。

二叔老忘不掉翠湖西面有个西仓坡，坡的东端是他和我父亲小时候的旧居。坡的西段是闻一多先生被枪杀的地方，据父亲回忆，那天的罪恶枪声他是听到了。西仓坡和甫甬道成“丁”字形道路交叉，“丁”字的一横，“丁”字弯钩的地方有一个茶馆，那是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聚会的地方，那个茶馆一直保留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翠湖的北面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大学。

沿着翠湖的西堤岸走过去就是民国时候的陆军讲武堂，二叔告诉我：翠湖一带的旧名字叫“洗马河”，就是军队洗马的地方。翠湖南边有一个“劝业场”是专门买卖旧货的地方。翠湖的东面有个“逼死坡”，坡头是明朝永历皇帝殉国的地方（现在已经有块碑了），而二叔对“逼死”的解释则是说，当年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时，猖狂地低空盘旋，在坡的中央扫射死了一群躲避不及的老百姓。坡脚有一宅院，朱德委员长曾在这里居住过。

由于有个三面环水的八角亭在翠湖中央，因此。翠湖也叫“海心亭”。

（二）游戏、校园、革命

二三十米长的地藏寺巷里有14个院落，只有6号和7号院子是云大的教职工宿舍。而真正的“地藏寺”原址就是7号大院。地藏寺巷坐落在文林街，据说，这是取了“文人如林”的含义。在地藏寺巷的斜对面，有一条坡路通向翠湖，这条坡路叫“先生坡”，是因为曾经住过誊写卷子和做考务工作的“先生”们而得名。顺着文林街往东走就到了云大右侧的“贡院坡”（贡院就是旧时称之为“学院”或“考场”的地方），下坡左拐就是云大的正门，再顺云大正门东走，就到了“青云街”。这整个大道路含义就是“平步青云上贡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上了贡院平步青云。”

在如此文化浓厚的地带，我完成了我一生中最系统、最连贯、最长期的学校教育，而这段教育仅是小学水平！只有5年！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因闹革啊命而停课了，整整三年，在人生的游戏中，在孩子的游戏中，在我印象最深的地藏寺巷7号居所渡过了我的少年阶段。

除了住房外，我们的院子有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院子里9户人家，每家2－3个孩子，这个简洁的家庭结构在当时是少有的。偌大个院子只是10来个孩子玩耍，环境显得宽松多了。要“跳房子”地面方方50公分的石块就是现成的，不再需要画线条。厅房是寺庙改造，沿正厅还有木栏。二楼挑出了廊檐，恰好遮住一楼厅前3－4米的走道，即使下雨，也可以在廊檐下继续游戏。要跳“橡皮筋，在前后花坛的两株树上栓上橡皮筋，即使一个人也可以自得其乐。要玩“躲猫猫”，带点“鬼气”的地藏寺恰好有许多躲藏之处。要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门厅就可以演出.....。同院的孩子不够游戏人数还邀约6号院的小朋友一起来玩。真是“宽广庭院，大有玩场！”

居住四合院各家的隐私会缩小到最小范围。我们的房子是土木结构，木板隔音很差，稍微大的响声自然会“家

喻户晓”。我们同吃一缸水，全院只有一个水龙头，由于院子的地势高，白天还经常没有水，幸好水龙头下有原先寺庙留下的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大水缸，于是，每天晚上就放水积蓄，第二天，洗衣的，洗菜的都集中在水缸周围，各家的“衣食”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厕所在院子的东北角，不分男女，谁进去先吼一声“格有人？”然后进去插门自便。

云大的校园则是我们一群孩子的花园，在云大标识性的建筑物——大水塔的下面有一片草地，四周是整齐的灌木从，贴在地上的是一圈兰草，围住了里面盛开的各种鲜花，我们常常偷偷去摘花。有一天刚摘了花就开始下大雨，我们被淋个透心凉，回来生病了，心里突然感到了惶恐，从此摘花行为才收敛了一些。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当时为了防止美帝侵略而挖的防空战壕和防空洞，因战事迟迟不发生，下雨天就积满了水，水里居然长出了小蝌蚪，这些甩着小尾巴，有黑黑大大圆脑袋的小家伙常常使我们乐不思归。最令人愉快的还是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们拎着小凳子就往云大跑，到了门口早有一大群孩子围在那里，眼巴巴的看着进门那些高高的石阶，而我们那时就最得意了，大声叫着：“我们是（云大）家属。”人群让出一条路，我们鱼贯而入，上了石阶回头望望门口的孩子们，总是优越感就翘尾巴了。

革啊命来了，我们突然也有了莫名的冲动，少年本能的逆反心理和创新的跃跃欲试驱使我们在地藏寺巷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条具有封建色彩的巷名取缔！改为“红旗巷”。居委会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啊命行为，把我们请到会议室，要我们继续再对其他巷名提出更改方案，我们又建议：把“先生坡”改为“学生坡”，理由是“先生”有封建残余思想，而“学生”是新思想的革啊命，要“破旧立新，灭资兴无。”云大的墙壁上、报栏上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操场上再也看不到大学生们跳集体舞的情景，而是一堆一堆的人在围着进行大辩论。高音喇叭里放着《国际歌》，那是“炮兵团司令部”的部歌，后来我们又听到《歌唱麦贤德》，那是“八.二三司令部”的部歌。就在云大后门马路的对面有云南民族学院，它基本和云大一鼻孔出气，它的后侧面就是陈圆圆的半月牙儿的莲花池，莲花池侧面是“八.二三”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正是“炮兵团”的死对头！后来“革啊命”形势逐步恶化，响起了枪声，要是我们听到《抬头望见北斗星》，那就是“八.二三”来袭击了，要是听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那就是“炮兵团”的大本营转危为安了。我会唱的许多老歌就是那时天天听高音喇叭，记得滚瓜烂熟的。

停课的三年过去了，革啊命还没有到头，“复课”依然是“闹革啊命”，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也要学农，还要学军。”在可怜的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中，我断断续续的学到了各个学科里面的“辩证法”，真正各学科的知识却掌握得很少。以至于我一生羞惭，竟然只能到云大看看露天电影而不能“平步青云上贡院。”

后来，我常常忿忿的想：阿Q革啊命，是因为赵太爷不让他姓赵，小尼姑不让他摸脸，吴妈不与他困觉，而我

革啊命是为了什么呢？原来那场“文化大革啊命”是“革”了我的“文化”命了！

（三）黑崽子、嘎啦姐姐、老嘟

历史的长河静静的流着，流着，而肤浅和愚昧却使我们在改变了正常生活规律的不正常的变故里热血沸腾，当全体人民都穿上了军装，扎上皮带，戴上军帽的时候，我以为我终于迎来了《红旗飘飘》革啊命回忆录里曾经描述的战争年月；当我看到父亲伏案用一块钢板垫着，握着一支铁针笔，在一张张蜡纸上刻出“战斗报”时，我以为我看见《红岩》中成刚的身影，以为那些满天飞舞的小报都是《挺进报》；当我看到，老师们把那张刻好的蜡纸用尺子包裹了两端，一端用图钉钉在桌子上，另一端用大夹子夹住当做手柄，然后用饱沾油墨的滚筒在蜡纸上一滚、一掀蜡纸，一张散发着油墨味的新鲜小报就出炉了了，我的配合工作就是拿掉这张小报，然后老师的蜡纸再放下、再滚滚筒、再掀起蜡纸.....每当看到这种极简易的“印刷机”印刷出的小报，我都会为“老一辈革啊命家”的革啊命智慧深深感动。最快感、最自豪的事就是到街上，在人群较多的地方出其不意的散发传传单，看着人民群众争抢飘飘洒洒的传单情景，我觉得我快成《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了；在公共汽车上高声的朗读毛主席语录；在公园或街上临时围起圈子，跳一些以挥手和跺脚为主要动作的歌舞，我觉得我真是一个要革啊命到底的红小兵战士了！我们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挑剔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用批判的行动要砸碎不知怎么就对它有了深仇大恨的“旧世界”。

无知在莫名的躁动，野蛮伴随愚昧而来。当我“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又不知道“鸿鹄”从哪里来又将飞到哪里去时，我的沸腾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纯真的孩子的心灵也同时遭到了的严重的，令人丧失自尊的伤害！

一天，二叔哭丧着脸来了，说“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祖传的字画被拿走了，两把檀香木的“太师椅”充公了，一副“化学”麻将（即质地很好的石头制品）也被扫了“四旧”了！还有家里珍藏的玉石珠宝首饰也被没收了！父亲安慰他：“算了，那些都是‘四旧’，拿走就拿走吧。只是你以后不要再说以前的陈词滥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因为解放前用过使女被革命小将揪出来了！再往后，父亲又因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也被揪出来了！闹了半天，原来我们一家是“革命”的对象！原来“红卫兵”姐姐和哥哥们不准我做“红小兵”！我的革命斗志从此低落了，身份沦为了“黑崽子”，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小伙伴们不再和我玩，有一次其他班的同学要抓我去“斗”，我大哭，后来，出来几位老师和一些同学劝阻才得于幸免。以后得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这种恐怖的、野蛮的、愚昧的、人为的斗争和摧残、杀害了多少善良软弱的生命！使人性的尊严突破了耻辱的底线！

然而，在这种糊涂的局势中却不失清醒之人。

我的隔壁邻居一家四口，父母是外语系教师，大女儿叫“嘎啦”，小女儿叫“老嘟”，姐妹俩的小名怪怪的，

据说那是因为父母是在和苏联专家共事的时候给出生的女儿起的名，我们院子里的苏式壁炉就在她们家的厨房里。我们太年轻，精力太充沛，革啊命以外的时间里还有许多闲暇，于是就大玩各种游戏，还养猫、养鸡。

“老嘟”比我大一岁，“嘎啦”姐姐已经是师院附中高三的学生了。在各种游戏和经常的聊天中，老嘟总是会有比我们高明的主意和见识，而经常追寻这些明智点子或有趣话题的源头时，老嘟就很自豪的说到嘎啦姐姐，着实让我这个独生子女羡慕仰慕不已。嘎啦姐姐和老嘟直至革命结束也没有参加过”红卫兵“组织。每天她们姐妹俩的生活规律极强，停课那会儿，我和老嘟每天早上练毛笔字，嘎啦姐姐在里屋听弯把的留声机放的英语唱片，下午我们去玩，嘎啦姐姐从不参与。

后来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老嘟突然“有了先天性的心脏病”，老嘟的父亲腿部“风湿关节炎复发”只能小步、小步的移动了，老嘟的母亲披着长长的头发，一脸的憔悴，当学校工宣队来检查嘎啦姐姐为何不下乡时，老嘟母亲十分“悲惨”的哀求着，结果嘎啦姐姐终于没有下乡，后来她们班的付衍鹏在瑞丽和景颇姑娘结了婚，参加修建了水电站，在那里扎下了根。

革命过去的10年以后，老嘟一家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常住了。姐妹俩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老嘟在摩根公司，他们的父亲经常和西点军校的朋友在草地上散步聊天。有一次，嘎啦姐姐和她们的母亲回国探亲，母亲的长长头发早已剪短，人很精神，还画了淡妆。她们给我带来了老嘟和她先生在夏威夷渡新婚蜜月的照片，照片上的老嘟美极了，脖子上挂着长长的花环，依偎在一位戴眼镜，长得很秀气的先生身旁，背景有篝火，有当地的穿着草裙的土著。她的母亲告诉我，老嘟的先生是中国留学生。照片中神采奕奕的她丝毫看不出“先天的心脏病”痕迹。

历史的变革和人们对革啊命的期望，目的总是要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我想老嘟一家的生活品质是提高了，无论精神的和还是物质的，只是这个提高的机会却是在混乱的年代，父母费了苦心，用了躲藏的，无可奈何的机智储备下的。而我却和更多的人群一样，在这场荒唐的革啊命中仅仅收获了精神上的教训和启迪，物质生活的匮乏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倒退，以至于在今天还给我留下了许多定量供应的票证印象。

（四）乡下、海鸥、翠湖

地藏寺巷7号院子里的四棵树都长大了，有一年，桃树结了果，青绿的小毛桃，味道酸涩，第二年桃树又结果了，毛茸茸的，金黄色的，还是“黄金离核桃”呢！个子虽小可是味道却是甜甜的。还有一年，那棵铁树居然也开了花！还有那那棵棕榈树，长高了，高得使我们再也不能摘它的叶子，你用棕榈树编过小提篮和草蚂蚱吗？用10片棕榈树的叶子，对折、交叉、上下压抬，一会儿就可以编出一个漂亮的小背箩或者小提篮。用棕榈树的绿叶可以编

一支活灵活现的黄绿色的草蚂蚱！只有那棵苹果树没有结果，原因是培植它的花坛太小了。

我也快高中毕业了，根据云大的安排，必须“系归系”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家从地藏寺巷7号搬到了青云街29号，也是一个四合院，但是面积小了，还是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公用，院子右侧一条小巷通到翠湖的东面。

嘎啦姐姐虽然没有下乡，但是我们却通过老嘟从她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瑞丽知青的趣闻，这丰富了我们的想像，我经常盼着也很想到那个广阔的天地去，去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稻香秋熟的环境中去浪漫，在一片迷蒙的憧憬中，艰苦和颓唐是没有位置的。

没有想到在我19岁那年，我真的有了下乡的机会，我作为市教育局派遣的知青带队老师，来到呈贡七甸乡，补上了我们这一带人特有的一段知青生涯。不能忘记那段生涯，尽管由于我的身份和知青不同，我有“盼头”他们没有“盼头”；我也许是“镀金”而他们也许是缓解国家的就业问题；我不必天天做农活，他们从第二年开始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使我和他们对农村的山山水水体验大不一样，然而，因为我年轻，我又不想有其他带队老师的矜持和舒适，很乐意溶在知青们的艰苦劳作中，有意的锻炼自己的意志，最终也有和他们一样的感悟。

真有那么浪漫吗？当我一连几天凌晨3、4点起床，夜晚11、12点才收工，桃着抢收的麦子快步在田埂路上时，汗水早已把那些心中的诗情冲刷得干干净净。累极了，我躺在田埂上看着蓝天白云，却是声嘶力竭的唱“兰兰的天上白云飘.....”；挥着“二齿”，和农民们一起狡猾的斤斤计较的“干地”（即分片包干），却是想在艰苦中偷一份便宜；到猪圈里去除粪，晚上睡觉脱裤子才看见从脚趾到大腿根，密密麻麻斑斑红点，顿时浑身冒起鸡皮疙瘩，委屈得眼泪要掉；在秧田里听大嫂小媳妇说一些“荤话”，才知道黄色笑话是用来解乏的；我们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到山上乱砍乱伐，和农民一样的愚昧；坐在火塘边听着大妈把“阑尾炎”说成“苤兰炎”，那份朴素让我们大笑不已；没有菜吃了，用米汤泡饭，再烧几个红辣椒；.....我们溶进去了，溶在农民的贫困、愚昧、粗糙、落后中，也给他们带去了文明。这时我才知道，我听来的“趣闻”并不浪漫，甚至苦涩，是因为我们年轻，总把磨练化在了笑谈中。原先说好带队期限是6个月，临要“逃走”时突然又通知延长4个月！那一瞬间我才知道我怎么也不可能在贫瘠落后中扎根，心中的希望就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在超出体力的负荷下，人的思想和意志受到了强烈的考验。听说另一个队的一名知青在写电影剧本，我去看了，果然洋洋洒洒几大篇，后来他到了社科院。还有一次熊熊的山火烧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据说在昆明都可以看见火光，起因却是一位知青郁闷到极点在山上抽烟，乱扔烟头引起的，后来这位知青也上了大学。正是因为我们年轻，消沉不会没落到深谷。

20多年过去了，回忆谈谈的来，思索谈谈去，历史的长河缓缓的流，把许多探索的石子冲刷到岸边，而那些重大的题材却沉溺在了河底，我们千千万万的人类也和西伯尼亚的海鸥一样，向往着温暖。10年前西伯尼亚的海鸥探

索性的飞到了昆明，年复一年，她没有被惊扰反而受到宠爱，她把自己的待遇告诉了她的朋友，她的孩子：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有一片祥和的园池。于是，她的朋友和孩子们带着“历史经验的借鉴”成群结队的飞来了，一住就是10多年！

翠湖的东面，永历帝、朱德、李公仆的碑和旧居已经修复；西面，“洗马河”早已填平，陆军讲武堂遗址专供游人缅怀；西仓坡一段绿荫覆盖，花草茂盛的小道上，闻一多先生的墓碑静静耸立；文林街又是“文人如林”，青云街还是紧连着“贡院”.....翠湖把历史定格了，翠湖依然年轻，绿色的基调贯穿了她的整个区域，任凭人们怎样的摆布，她总是要体现青春的热情，因为只有绿色的魅力才能衬托蓝天的深远。

无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在自然环境中，我们都很渺小，很渺小，所以回忆就不想揭示什么主题，也无法揭示主题，因为历史在沿革，自然在风化，我们总是只能想像未来，摸索现实，总结过去。在记录性的文字里尚能找到和现代人对话的空间，也许就是回忆的效果，就是我的欣慰。

是的，我们的父辈曾经年轻过，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的子女正在渡过年轻的时光。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dyrs259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回南京——迁徙

小的时候就常常听我母亲说，我们是南京人。说昆明人的许多祖祖辈辈是朱元璋时代发配充军到云南来的，又说昆明话和南京话是一个体系。后来又听说，从南京迁徙过来的昆明人，小脚趾外侧还靠着一个米粒大小的指甲，前几种说法不得证实，而最后一个说法却是千真万确，于是我就半信半疑地认为自己籍贯就是南京了。

如今“籍贯”已经从履历表中逐渐隐退且逐渐被“出生地”代替。在我国辽阔的疆土上生长的我们将不再因籍贯不同而划出等级，“英雄不问出处”或将成为过去，由籍贯而产生的歧视可能也会模糊了。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嘲笑因口音暴露了籍贯的小朋友，为自己省城籍贯优越感骄傲，戏称人家“籍贯差”。即便就是成了大角儿的主，一旦看了他的籍贯也免不了会对人家的崇敬减去几分。

然而，籍贯却真能把一个人的文化摇篮真实描绘。昆明城和南京城的文化不能相比，出生在昆明的我回到南京，仿佛真是从野趣的农庄回到了舒适的家园，从蛮荒的情调回到了厚重的礼教，从朴实的民俗回到了沉淀的文化。

游览着古都的山林、树木、亭阁、溪水、小桥、碑文.....常常的，小学、中学学过的诗句、美文、美词就突然信口拈来，每一处景物都会唤起诗词的记忆。都说人杰地灵，这话一点不假，面对满目的青翠，纤巧的楼台，潺潺的小溪，轻灵的石桥，爬满藤蔓的古城墙、远处现代的高楼和近处闲亭的交融，心里总在写着一篇长长的文章，古往今来的诗句文辞竟是那么贴切，那么深入的应景而来，悠悠岁月，时空轮转，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桩桩件件动人的情景都在你的身边穿梭，稍不留神可能你就错过了一段历史的会晤。这就是古都的魅力所在！

那天去明孝陵，是踏着梅雨季节的尾声去的。脚下是落了雨水清亮的石板路，没有油纸伞，细雨纷纷，飘飘洒洒，轻轻柔柔的让我也不想撑开自己的折叠伞，任细雨漂浮中，随思绪去绵绵的怀古。

明孝陵的区域范围真大，未进门可以先到几个展览馆参观，看了云锦，明代家俱，明太祖介绍和明孝陵模型，

小时候就听我母亲说朱元璋模样长的丑，果然一进展厅就看见了丑皇帝画像，看完展览，进明孝陵大门买张门票，人家售票员想照顾我，外地老年证也通融，可惜我还没有“老人”资格，于是只好花70元买了一张门票，顺着大路走进陵园[f走不多远就是四方城碑亭是明成祖朱棣为其父朱元璋建的“大明孝陵神圣功德碑”。其顶部已毁，仅存方形四壁，内有立于龟趺座上的石碑一块，碑高8.78米。碑文由朱棣亲撰，计2746字，详述明太祖的功德。再向前走就是神道，两旁依次排列着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6种石兽，每种2对，共12对24件，每种两跪两立，夹道迎侍.神道很长，我有点累，又不想坐电瓶车，那时才下午3点左右，就觉得天色有些暗了，我想赶时间就选择从神道侧边的路前行，走着，走着，居然就走到孙权墓了，这里也正是我想看看的，好像六朝古都的说法中第一朝指的就是孙权朝政，而明孝陵就躺着两朝皇帝。

再顺着路标寻去，终于看到朱元璋陵墓入口了，走过金水桥再走一条石板路，再穿过阴阳两隔的红门，又继续沿石板路前行，这才走到了朱元璋陵墓前，高高的宝山石墙遮住了后面整座山，据史料记载，明孝陵有诸多的谜团，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我只得抓紧时间走马观花。走出享殿，我以为梅花山距离汽车站近，竟向梅花山走去，幸好遇上了一位锻炼的同龄姐妹，她真好，带着我从梅花山相反的方向出了园，走到公交车站，她告诉我，她乘坐的20路公交车已经是末班车了，我乘坐的游2路车还有。顺着她的指向，我走到游2路车站，这时感觉已快到掌灯时分，看看手表，还不到下午6点！等了一会儿，车来了，在暮色中我返回了市区。

后来我和南京网友又去了一趟紫霞湖游玩，紫霞湖是个人工湖，就在宝山后面，在紫霞湖看到的宝山的背面，在宝山的北面，一座面对紫霞湖的山据说就是蒋介石先生的预想的安息之地，蒋先生说要为孙中山先生永远守灵，而蒋先生则是有“家”难回了。

迁徙也许是离家抑或也是回家，迁徙带来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也留下了历史古迹的记录，离家的人充实了自己生命，回家的人升华了自己的灵魂。世世代代的迁徙，匆匆过客的短暂驻留曾试图揽住山水，改变山水，而山水之变比起人事之变则是微乎其微。

斗转星移的变化，沧海桑田的变化常常让我们面对自然不胜嘘吁，自感自己如何的渺小。

欣赏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8ab3a0100lo5q.html

回忆我的父亲

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我的生父，从我记事我就没和他一起生活过，后来见过几次，每次见都是让母亲哄骗着去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陌生的相望总是给我年幼的心灵带来深刻的划痕，不愿追忆又难以忘怀，也许是血缘作祟。另一个是我的养父，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母亲改嫁把他带给我的，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自然的叫过他“爸爸”，尽管我内心很想叫他，我的家教启蒙以及我一生的父爱记忆都是他给我的，我只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尽管没有血缘。

我的养父的祖辈在昆明是赫赫有名的清朝文人，秀丽的安宁鸣矣河畔就是这位陈老先生的家乡。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了我父亲，使他成了一个典型的秀才。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学位，于“七七”泸沟桥事变回到了昆明。讲到这段历史，我曾问过父亲为何不去留洋或留京？父亲回答：没钱。害怕。

我已经在幼儿园了，我才认识了父亲的，所以对“父亲”总是没有那种有生以来的亲爱，到像是叔叔伯伯的亲切。认识那会他已经40多岁，是云南大学的教师，我们就住在校外的教师宿舍。

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有170多元的工资，还有富强粉（上等面粉）指标，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我们一家三口每到星期天必然要去逛街，逛书店，上一次餐馆。父亲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每个月父亲就要买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直至我家的书柜整齐的收藏了这两大系列。他还长期订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看完以后每天就把报纸放在预约的邻居可以拿到的地方供别人阅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阅读与专业有关的书籍和报纸是可以“揩公家的油”的。

那时我们都是吃食堂，很少自己做饭，每次舀米时，他会很认真地拿那个舀米的水瓶盖容器舀起满满一筒，然后用手掌抹了又抹，十分精确的度量着用米量。在食堂吃完饭后，他一定是用筷子搅动着洗碗水把油星子集中，喝一半才会接着洗碗。洗床单就更绝了，他把床单事先折叠成长方块，浸泡后平铺在搓衣板反面，然后一层一层的刷洗。

父亲的一只脚有残疾，还有点口吃，个子偏矮，也许就是这些“外观”耽误了他的婚姻，使他的性格内向且小心翼翼，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又使他在外表的自卑后，固执的滋生着心底的傲气。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硝烟首先从大专院校燃起，那些“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革命的热情使师生们撩拨的不能静心上课，昆明工学院率先“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委”，成立了“八。二三”造反派组织，紧接着云大又成立了“炮兵团”，据说是“保皇派”，两个阵营针锋相对，都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都在赤手空拳地口诛笔伐对方的罪行。父亲坚决的稳住了自己，不敢“革命”，直到又诞生了另一个中庸一点的组织“共产党宣言公社”，他才无可奈何地做了一名“共宣”战士，而且每日兢兢业业的为“公社”刻写蜡纸，誊写小报。他以为自己做的很谨慎，却没想到这个中庸的选择和卖力的“革命”却让他成了“阶级敌人”！

他被“揪”出来了！好长时间，他看着自己的同事被一个一个的“清理”出“阶级队伍”，每天都在诚惶诚恐的数日子，后来听我母亲说，那段时间在夜里或是清晨，只要听到我们四合院大门被叩响，他就会很惊恐的说：“他们来了，他们来抓我去斗争了！”终于有一天，他确实被“清理”了出来，罪名则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母亲只好为他准备了两个棉花做的垫子，悄悄的让他垫在膝盖上，去跪着“低头认罪”，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要交代的罪行就是为“共宣”组织写过哪些小报以及旧社会为国民党作过何事？大专院校“批判资产阶级”的大会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一次亲眼目睹大学生们怎样用绳子把自己的“牛鬼蛇神”的老师捆上了主席台，从台的左端排到了右端，长长的一排早已超过主席台的长度。而且是一边开会，一边产生新的“牛鬼蛇神”，一开始，我们几个小孩还在好奇的观看，看着看着，突然我们中间的小伙伴的父亲被抓上去了，大家的脸都变了型，才知道“坏人”和“好人”的界限竟在一瞬间！我们逃离了会场，不敢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抓。

接着，“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工人阶级也走进了“革命队伍”，竟然还想起了枪声，我们居住在“炮兵团”的大本营里，是“八。二三”攻击的对象，而我们每天要去打饭的食堂又在“三家巷”附近，为何叫“三家巷”？那是因为那段丁字路的三条路段上分别是师范学院、工学院、云大，三所大专院校的校址。常常互相攻击的子弹在那个是非之地穿梭，有一次，一颗子弹竟飞到我们居住的院落屋顶，把瓦打得粉碎，碎片落在了院子里。大人们再也不让孩子们出门了，我的父亲承担了我们家打饭的任务，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晰的留着他提着搪瓷饭箍子，一陂一陂走路的身影。

10年浩劫终于过去，而父亲则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的课程越排越少，系上自己开办了食堂，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是在食堂做保管，每天十分细致的用杆秤称出大家的口粮，每月准确无误的公布节余收支，估计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长发挥吧？：（后来，由于评定职称的烦恼，他突然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毅然决然的提出了退休申请，回到了自己的“小窝”。

退休后的他，心态反而平静了，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清晨到翠湖边打太极拳，回来后就开始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午按时睡午觉，醒来后又接着写，晚上听完新闻联播后又接着写，但是从不熬夜。他坚持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澡，他是用夕阳的光辉在编织未酬的壮志。我们家有许多线装书，那是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排上了用场，我记得我当时看他的稿件有墨子、老子、庄子、孔子等等，还有唯物、唯心的议论，更多的我看不懂，而我母亲也不能做他的贤内助。后来我认为他赌气退休实在是一个失误，使他的著书立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帮助和发挥。

《中国经济思想史》终于写完了，分上、中、下三册，接下来就是联系出版社，也许是他的水平不够？也许是他已退休？也许是没有名人帮他写序？也许是他不会推销自己？反正他的书要出版太艰难了，四处碰壁之后，他对某出版社说，他自己出钱印刷，只要能出版。不知是谁对他有过承诺，他真的自己出钱印刷了，印得并不好，8开版，看着像讲义，堆了一大堆在房间里。但是仍然没有出版，后来父亲去世，我这个不肖之子又无法续写和修改，书稿就让母亲当作废纸卖了。

父亲的壮志再次难酬，父亲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父亲的退休生涯是充实的，他每日与读书写书为伴，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他只有两个极好的男性朋友，每个星期三是3位老友会面的日子，规律性极强，总是那两位老头每星期三早上9点准时到我家，聊上一会就一起出去，下午吃晚饭前父亲又准时回家。这份执着而又牢固的友谊是3位老人晚年的精神支柱，一直支撑到我父亲先离开了这个世界。

72年我高中毕业，因是独生子女免于上山下乡，在家等待了两年后，我有了两个就业机会：一是去中学做教师，二是到技工学校去做学生。父亲略一思索就决定让我去教书，他说：“人往高处走，做老师比做工人好。”于是我就有了6年的教书生涯。后来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大学，又给我带来了选择专业的机会，可是那时父亲的著作出版已遭到了连连打击，他对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产生了怀疑，他带着十分的沮丧和灰心对我说：“去学专科吧，不要学本科了，学银行也不要学政治经济学，不要做老师，做技能应用去吧。”好些年后我明白了他的话，他那时已经对自己的残生做了悲剧性的总结，一种怀才不遇以及生不逢时的感觉促使他在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时不待我的无奈又只好把一种新的理念作为礼物，赠给下一代去延续。

就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年，父亲突然因出现黄疸而住院，整个人变成了金黄色，接着就吐胆汁，便血，病情节节升级，医生只好做了“剖腹探察”，谁知打开腹腔一看，外科主任惊呆了：整个腹腔由胆囊癌变扩散已经把胰腺、肝脏结成硬硬的一块，根本不能剥离，更使外科主任震惊的是如此重症病人竟没有喊过一声疼痛！对于病人的耐受能力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没有做任何手术缝合了伤口，悄悄的告诉了我这个噩耗。然而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却兴高彩列，见到我们就说：“我胆囊里的石头取出来了，我很快就会好了。”母亲也很高兴，只有我无言.....医生

为父亲换了一个小病房，并给了我许多特权，护士们也和我说：“老先生太令人尊敬了，他什么都忍着，疼痛不哼，污染了床单他不好意思，老觉得给别人添麻烦，太客气了。”然而病魔太凶残，终于有一天从父亲不能愈合的手术创口处流出了黄黄的腹水，我只能用“腰盘”去接，当他用手捂住伤口时，从指缝流出的“信息”使他醒悟了自己的病情，我慌忙去叫医生，医生则告诉我：没有办法了，甚至连伤口缝合都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极度衰弱，恐怕已经不能承受任何搬动了。我含着泪看着医生就在病房做了一个简易的外皮缝合，又用一块胶布贴在了伤口上，医生走了，我要帮父亲换衣服，他却说：“不要换了，最后一起换吧。”从此，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灵魂离开了躯壳。他住院仅1个多月，享年73岁。

父亲的躯壳则是选择了棺葬！一个学了大半辈子唯物辨证法的学者竟然坚持要棺葬！还在父亲没有住院的时候，我们家就请了师傅在打造棺材，那是一种上等的棺木材，整快木料只在棱角处有拼接，木质疏松却笨重，而且散发着异香，听我母亲说花了600多元钱。当父亲的灵魂去见马克思的同时，他的躯壳却静静的躺在中国传统的“框框”里。也许他的灵魂和躯壳是统一的，他最终是信仰谁呢？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悼念一位坚韧不拔的学者，但同时又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看父亲的过去，我觉得父亲的后半生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忍”。他的性格表现无处不在忍，他个人精神品位的精良是他静心研读，忍耐寂寞的结果，而他辉煌不得显露也是他躲避现实，回避张扬的失败。也正是父亲性格给我了巨大启迪，我大学毕业后，性格逐步由小溪般的柔顺变成了瀑布般的性格，我在释放我的人性，我在释放我的病痛，我在释放我的潜能。尽管我可能和父亲一样没有成功，但我却认为我和父亲都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画卷中画出了不同风格的画卷。人的品位确定了人的层次，层次的高低就是自身价值的表现，只要我们都没有做行尸走肉，我想，我们对自己自身品位的提高就会不间断认识，不间断提炼。只要最后认识了自己的价值，知道了自己的品位指数，就是没有做成辉煌的事迹，我们也会欣慰。

因为我们是一群平平凡凡的人！

（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那时刚刚学会玩bbs，初发贴在腾讯四十情怀论坛。如今我母亲也去世了，过段时间再写篇“回忆我的母亲”，就让父亲和母亲的记忆永存在我的博客里吧）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dyrs2598

回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不是我的生母，这是我半懂事以后知道的，我的亲生母亲是谁？我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只是听说又黑又瘦又小，我养母说我的个子像她，这是更改不了的遗传。

幸好我对生母没有任何印象，因此我也就和大家一样只有一位母亲了。

我的母亲年轻时候是位胖美女，很美。听她的老朋友说，母亲的家里是做火腿生意的，当时在昆明拓东路一带是赫赫有名的赵火腿家。我的二舅妈是云南宣威人，我不知道我们赵家是不是也和著名的宣威火腿有着渊源？

童年时候的母亲家境宽裕，颇有些大家闺秀的环境，只是到了母亲10多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就去世了，母亲排行最小，是老六，在她之上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哥哥，母亲的大姐，我的姨妈那时已经嫁人了，嫁的是富豪的蒋家，又是女孩，自然不会继承家业，四位哥哥又太年轻，也撑不起赵氏家业，于是，不可避免家道中落，到母亲还能勉强上女子中学的时候，就只能支付学费，吃饭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了。然而童年时候培育出的奢华感和优越感却始终伴随了母亲一生，就是在经济状况窘迫的时候，她的生活开支也是不知道节省的；自己也许已经是穷人了，却还在嫌弃比自己更穷的人，这种“没落贵族”令人可笑的坏毛病被母亲遗传给了我，我又遗传给了女儿。

到了母亲谈婚论嫁的时候，或许是因为经济状况太差了，美貌的母亲只得嫁给了我的生父，当时我的生父是一国民党小官吏，但是一脸的麻子。母亲结婚以后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候的阔绰，有房子，有首饰。可是不知为什么，母亲却一直不能生育，到处寻医，依然无效。在那个重繁衍，重继承的年代，母亲带着这样的缺陷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据我生父说，征得了我母亲的同意，他和一位要报答他恩情的女子生育了我，我出生之后他和我的生母就断绝了关系，于是我被抱回了家。若干年后，我母亲告诉我，在我之前还抱回过一个漂亮的姐姐，可是那个漂亮姐姐生了一场病就死了，母亲每每说到姐姐，感情之深，常常让我妒忌。对于我生父对我身世的说法，母亲始终没有承认是经她同意的，后来我的生父被判刑劳改，我母亲说，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乱搞男女关系”。母亲太善良，她自己也曾经说过：“即便面对自己敌人的孩子，我也不会把她抛弃。”

我的生父劳教后，我母亲就和他离了婚，我的姓也从此改了，随母亲姓赵。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一直跟随母亲寸步不离，跟随着她又嫁到了我记忆最深的养父家。那时养父在云大教书，我们住在文林街，母亲在景星小学教书，我也在景星小学上学，两地相距大约5公里，每天早上母亲要带着我乘坐2路公交车去上班、上学。我们那一拨上学的孩子实在太多，学校居然是分两部上课，高年级的8点上课到10点，腾出教室后，低年纪的又从10点上到12点，下午也如法炮制，各上两小时。但是老师上班却是满满的8小时，母亲不放心我自己去上学，因此每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被母亲唤醒，匆匆洗漱，有时连小辫子都没梳，就被母亲拉着跑着去赶公交车，边等车边帮我扎小辫，来不及就只好去办公室梳头了。

母亲她们的办公室是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都在一间房办公，每人一个办公桌，桌子上整整齐齐是同学们的作业本。我随母亲到了办公室，距离我10点上课还早，就经常抬把椅子坐在母亲身边或是做我的作业，或是帮母亲剪蜡光纸折的小五角星和小三角旗，有时还把这些小五角星和小三角旗按母亲的吩咐贴在好学生的课本上，还有的时候又帮母亲把要批改的课本一本一本打开，改完了又一本一本合起来，整整齐齐放好。

那时我们两餐饭都是在学校食堂吃，中午吃完饭，母亲用三把椅子连在一起做“床”又抱一摞课本做枕头，就让我午休，我不想睡午觉，就去高年级教师的桌子上翻看作文本和语文书。晚饭以后，我们还不能回家，母亲还得参加政治学习，她们学习的时候我就做作业，看课外书，有时母亲就拿一些毛线头让我编织，等她们学习结束，她又得带着我飞快的去赶公交车，赶不到末班车我们就只好走路回家。如果哪一天晚上没有政治学习了，母亲又带着我去家访，以至于她的许多学生都认识我。

那时是多子女家庭，像我这样的独生女很少。我没有哥哥姐姐穿剩的衣服，母亲看我瘦小，又天天让我喝牛奶、吃鸡蛋，去旅行时，同学们都带冷饭咸菜，而我尽带饼干、蛋糕之类，弄得我很特殊，也很尴尬，最后逼着母亲非要在衣服的肘部和裤子的臀部打上两个补丁，出去旅行，我就用带去的饼干和蛋糕和同学换冷饭咸菜吃。可就是这样，还是会被同学取笑。

母亲胃口极好，品尝也极佳，虽然天天吃食堂，却做得一手好菜，母亲的同事曾说过，看着母亲吃东西的样子会勾起强烈的食欲。

母亲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声音老高，只是她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唱歌的技巧。我小时候，母亲的脚踏风琴还没有卖，她常常是可以边弹边唱的。她还喜欢跳交谊舞，学校教师开联欢会时，她就带着我去参加舞会，我很小就看会了那些舞步。

文化大革命来了，母亲以前雇过的侍女揭发了她，她在革命初期受到了冲击，被关在学校的食堂干活不得上课，我和母亲非亲生关系的秘密也被暴露出来让我知道了，我被小朋友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母亲不能保护我了，又

不可能转学，那是一段残酷的日子，每天我都在惶恐和惊吓中渡过，自卑感被无限的放大，在食堂看到母亲我甚至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怨恨还是心疼，唯有惶惶逃避。

革命很荒谬，不久母亲就变成被迫害的造反派被平反了，还推翻了整她的校长，不过母亲仅仅就是平反那天声泪俱下的“控诉”了校长，以后就不见她有什么革命行动了。

革命结束后，我也长大成人了，工作了，上大学了，又工作了，这期间父亲去世了，母亲又认识了一位云大的教师，他们生活在一起，相依做伴，可是老先生又在母亲之前离开了人世，母亲自己总结：她这一生就没有遭遇一个好的婚姻，终是不断的送人，不能白头到老。

母亲最后弥留世界的日子极短，仅仅就一个星期！那天她的保姆打电话给我，说她感冒了要去医院，我赶回娘家和保姆一同把她送进了医院，胸透出来，她的嘴皮都是紫的，照片子的医生催促我要立刻把片子交给主治医生，说很危险，可是主治医生连病危通知单都没有下，我们就以为也许也和以前一样，住几天院就出去了。那几天母亲似乎胃口很好，不断的要吃东西，躺在床上还大声唱那首《月圆花好》，几乎还记得全部歌词：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今朝最，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双双对对，恩恩爱爱，

这园风儿向着好花吹，

柔情蜜意满人间。”

然而病情发展迅猛，最后那一夜，主治医生查房大吃一惊，不得不告诉我，必须立马准备后事了！在母亲入院前，就诊断怀疑是宫颈癌，那时母亲已经80岁高龄，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老年病伴随，我不愿意让她去确诊，即使确诊了，医生也不敢做手术。咨询了好友医生后，我宁愿让她糊涂的走，我告诉主治医生，假如不行了也不要抢救，我把同学送我的念佛机放在她的床头，把声音调低，最后的夜晚，母亲舌头也大了，说话已经不清晰，气息越来越低，“阿弥陀佛”的声音一直伴随着她.....

天亮的时候，我看她安静了，以为又可以拖过一天，便匆匆忙忙回家拿电话号码本，准备通知亲戚，谁知才回到家就接到保姆带着哭腔的电话说：“奶奶不行了，姐姐你赶快来！”我赶快打的到医院，那天是星期一，又出了

交通状况，车子狂堵，距离医院还有一公里我实在不能等了，下了车跑步进了病房，母亲已经咽了气！享年92岁。或许是我和她无血缘关系？她和我的最后一别竟然是这样阴差阳错的过去了！

今天是清明节，我又想起了母亲，这是一位特殊的不曾生育过却又十分称职的母亲！在我为人妻、为人母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女人如果嫁不出去，生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滋味！而同时我又感到母亲也是幸福的，她一生的相遇和一世的善良终于让她寿终正寝，最后夺去她生命的并非癌症，而是心力衰竭，让她能在最后一夜还唱着她一辈子喜欢的那首“双双对对.....”

我为母亲选的公墓在昆明公墓群里最好的金宝山，而墓的位置则是在最高的幽静处，在她的墓碑上为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喜歌舞，好佳肴，春风相伴；八旬经坎坷，历沧桑，秋月扶棺。

本来是想让父亲与她合墓的，后来人家说，因为她不是一婚而终，不好合墓。母亲这一生最终就只好孤独的来，孤独的去了。

写在母亲去世的第二个清明节，愿母亲安息！

2011-04-05

笛韵如水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2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俺老娘

之一、没有你哪有俺

俺老娘（俺娘的姨）年青时，凡山东农村妇女所想拥有的东西她都拥有。容貌端庄，说美丽也不算夸张。有一个小康的家庭，丈夫忠厚勤劳，有儿又有女。女工活尤见长，绣的花、做的鞋、缝的衣不但好看，而且结实耐用。她是当地第一个用上缝纫机的人，半专业地为人加工服装，一般的衣服她可不做，专做婚丧嫁娶的礼服。最令当时人羡慕的是她所缠就的小脚，三寸金莲，绝不超过三寸。

甚至山东大汉想拥有却又很难拥有的东西她也拥有：威望。她为人聪慧、善良、爱打抱不平。村上但凡有民事纠纷就会请她出面调解，用她的话说，她能使“满天的云彩都散了”；请她主持婚丧嫁娶的大事，让人觉着“露脸”；谁有个小毛小病也会请她去瞧瞧，常常手到病除。有一家的男人在发“羊儿风”，她上前握住病人的脚脖子，猛地一口咬下去，虽然鲜血淋漓，“羊儿风”却有效地止住了……

俺老爷，俺娘的亲爹早在抗战前就参加了革命，后又随队伍上了东北，留下俺老老爷、俺娘的亲娘和俺娘在家，苦不堪言。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是老娘冒着危险常来接济俺娘的家庭。因为没有劳动力，无稳定的生活来源，难以为继的生活逼疯了老老爷，他只会每日里反反覆覆念叨这句话：“唉！怎么办？怎么办？”在饥寒的交迫下离开了人世。俺娘的亲娘也因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临终对俺娘说了半句话：“告诉你爹……”俺娘于是成了孤女。亲戚中，谁收留俺娘，还乡团就杀谁，有的是先奸后杀，就这样又毁了几个家庭。还乡团说俺娘是“扫帚星”，谁家收留她谁家就会倒霉——是诬蔑，更是对同情者的恫吓。俺娘成了叫化子，接着小小年纪又遭歹人强暴，“俺的亲爹，你在哪儿啊！”呼天抢地中便要上吊自尽……

俺老娘赶到了，一把紧紧抱住俺娘，“儿啊，俺那儿啊，咱的命咋这么苦哇！”这时老娘好不容易养大到十多岁的一双儿女，也相继得病夭折了，正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跟姨走吧，别哭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俺老娘公

然收养了俺娘，她毫不畏惧地宣称：“什么扫帚星，扫帚星俺也要，看能把俺怎么的！”老娘她夫妻俩加倍地呵护着俺娘，还乡团顾虑到俺老娘在当地的威望，终未敢对其下毒手。老娘不仅冒死救了俺娘的身，还冒死重铸俺娘的灵魂，一个痛不欲生的弱女子消失了，一个新的女强人诞生了——俺老娘送已长大了的俺娘上路，去参加队伍。俺老娘是一个不是亲娘的好亲娘。

没有俺老娘便没有俺娘，没有俺娘便没有俺家，没有俺家便没有俺……

注：“俺老娘”即“我的外祖母”

之二、屎巴巴的故事

俺爹娘于1949年渡江来到句容，在这里安了家，一年后生下我，接着又生了老二、老三和老四，老三是女，其他都是男。俺老娘得知有了外孙，喜得了不得，丢下老伴，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帮俺娘带俺们这堆孩子。她虽没念过书，但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懂得了用科学和卫生的方法护理小孩。如我们生病了，她就急着带我们去看医生，遵医嘱让我们吃药打针。俺娘同她开玩笑：“你咋不给孩子们治治，或是求个神，问个卦，喊喊魂儿什么的？”老娘笑着答道：“快别提那老皇历了，那时候是啥条件，逼得人呒法儿了才那么折腾，现如今有好医生了，你不信他，不就亏了孩子了？”又如给小孩擦屁股，要在过去的老家，她只要用小脚尖在地上蹭点儿土，然后再在孩子腚眼儿上蹭两下便完事儿了，她知道在这儿可不能那么干，南方温暖潮湿，土壤中细菌等有害的赃东西较多，那么干，小孩的屁股上会生疮，肚里会生虫的。

困难时期开始时，老四还没会说话，生活突然地艰苦了起来，有点好东西只能先给小的吃，大的只好靠边站了。有次老娘拿块糕点给老四，老四开心地一边吃，一边玩那点心，并不时地哈哈笑两声，或是说句把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语”，老娘托着他站在自己的膝上，装着能听懂他的话，在同他亲切“交谈”。我很“懂事”，站在老娘近旁看着，象久渴的禾苗盼雨露似的，直愣愣地看着老四手上的糕点，一有糕点的碎屑掉到地上，我就扑过去抓起，迅疾地塞进口中，搞不清拣了多少次，吃了多丁点，只记得最后我逮住了一块大一点儿的，塞到了嘴里，高兴地大嚼出声来，摇头晃脑地斜视着老二和老三，炫耀我的幸运，老二和老三嫉妒地盯着我的嘴巴。呃，这味儿不对啊！怎么又苦又涩，还臭烘烘的？我张大的嘴不动了，头也不晃了，眼睛瞪得楞圆，哇，我大哭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讨厌！原来老四冷不丁屙下的一块屎巴巴被我……

老娘又好笑又难受，赶紧替我洗刷口腔，说：“吃小孩儿屎巴巴啥稀罕，不哭，我给你说个古事。”老二王玉

国纠正道："故事！""古事就是故事嘛。"

某人赤贫，吃不上早饭，见老婆正在给吃奶的孩子把屎，灵机一动，上前抠了点屎巴巴抹在嘴角，雄赳赳地出门去了。熟人见了问道："某人啊，你那嘴角上黄黄的是什么啊？"某人舔舔嘴角，煞有介事地说："啊，这不刚吃完了煎鸡蛋嘛！"

我没笑，老二和老三笑了，还幸灾乐祸地唱："一个人不要脸，他就是王老大！"

老娘从里屋出来，把块什么东西迅速地塞进我口中，"好孩子，不哭，啊！"哈，麦根糖（用麦根发酵制成，黑不留秋的，砂子特多）！我高兴了，大嚼出声来，摇头晃脑地斜视着老二和老三，炫耀我的幸运。老二和老三嫉妒地盯着我的嘴巴……

之三、三寸金莲

"俺这三寸金莲，可算得上百里挑一啊！"老娘对自己小脚的自豪，简直超出了极点。

俺老娘身段较高，估计不下于1米70，不胖不瘦，但很结实，手也很大，与身段是相配的，但她的脚就不是这样了，小得出奇，真正只有三寸长，与身段很不相配。小时我喜欢同老娘睡一个被窝，老娘也喜欢我这个"脚炉子"，但既不愿与她同头睡，是因为她口中因抽旱烟有味儿，又不愿睡在她脚头，因为她的脚也有味儿，热天与她睡成十字形，冷天我的头略下降一些，呈X形。实际上，主要的不是怕她的脚臭味儿，而是怕她脚的怪模样。晚上睡觉前她解下一道又一道密匝匝的裹脚布，用热水洗完脚，便盘腿坐在床上，让被束缚了一天的脚暂获解放和休息，点起烟袋锅，一边用嘴叭嗒着，一边凝视着自己的脚，这时，她的眼睛象秋天的潭水，深不可测。哪象只脚啊，半个脚背和除了大趾以外的其余四个脚趾都成了片状，被无情地折断压在脚下，除了大脚趾能动，其他的脚趾都废了，惨不忍睹。没实际看过的人，可以这样去想象，把你自己的脚斜放在铡刀之上，刀刃的前端卡在大脚丫中，后端紧贴脚跟外侧，一刀铡下去，剩下部分的长度再缩短到三分之二，你说这还能算脚么？千真万确，这就是俺老娘的脚。我为老娘这双脚感到万分的难过，在心里、在嘴上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到底这是为什么？……"老娘说："俺那时，姑娘家长得再好看，家里再有钱，要是脚丫子是天足，门都不敢出，会让人笑死，一辈子都找不到婆家。俺家的人块头大，俺娘怕俺脚大吃亏，就硬给俺缠成了这双小脚，谁见了不夸啊，可露脸了！"老娘眼中终于放出光芒，结束了对小脚的凝视，吹灯睡觉。第二天起床时，憋足劲儿把黑色的裹脚布一道道仔细缠紧，套上白色的布袜，在鞋拔子的帮助下使劲儿将脚蹬进鞋里，脚背隆出鞋口老高老高，小脚新的一天的束缚和劳累又开始了。

老娘在老家始终"领导着"同龄妇女的"时装新潮流"，尤其在鞋上。她看到解放鞋式样新潮而大方，想穿，

但买不到合适的，于是她从自己小脚的实际出发，对解放鞋作了一番研究，很快剪出了鞋样子、做出了“小脚解放鞋”，穿在脚上，甭说她，我看了感觉上也好了许多，似乎是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穿回老家时，满村的老太都来看西洋镜、讨鞋样，老娘还送了许多制做解放鞋所必需的新材料给老伙伴们，象空心铆钉、两端包了金属皮儿的鞋带什么的。细想想，“小脚解放鞋”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丝毫没有解放俺老娘的小脚，极富讽刺意味儿，我越想越难受。

“三寸金莲”带给老娘的全都是荣耀么？老娘自己最清楚。老娘很小时号哭着哀求她娘：“娘啊，俺不缠了好不？你饶了我好不？……”她娘继续给她缠脚，“不缠，你大了会怨娘的，忍忍吧，闺女，谁叫俺是女人哪！”未缠成小脚之前，连睡觉也不许松下裹脚布。脚烂了，要换裹脚布，血、脓、烂皮烂肉同布结在一起，撕不动，让一顽童握住布的一端，突然向前跑去，裹脚布到底扯了下来，但皮肉也一同撕了下来，露出了白花花的脚骨头，蛆在脚上钻进钻出，老娘疼死了过去。日本鬼子进村了，逃吧，小脚女人落在后边，一颗子弹从老娘耳边飞过，打在墙上又反弹回来射进近旁孕妇的大肚子，大人和孩子全完了。深夜，句容县中的昙花开了，老娘蹒跚着三寸金莲汇进人海希望去一饱眼福，不留神一脚轧进阴沟洞，昙花没看着，腿先折断了……

老娘收养俺娘后，毫不犹豫地给俺娘放了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老娘心底实在是不赞同缠足那恶习！老娘自知自己的脚已经无恢复的希望，为了抵销“三寸金莲”在精神和肉体上给自己造成的无穷痛苦，她不得不麻醉自己。啊，俺可怜的老娘！

之四、蚕啊蚕

上小学时，同学给了块蚕纸，所谓蚕纸就是蚕在上面产了卵的纸，我拿回家去放在小盒子里，还盖上棉花，天天盼着蚕儿快孵化出来。一天，打开盒子一看，蚕卵由黑色变成了白色，上面出现了一个小孔，黑线头一样的幼蚕爬得到处都是，我又惊又喜，想把它们放到大一点的盒子里去，又怕会捏死它们，真不知如何是好，就喊老娘。老娘说，别急别急，她找来一个簸箩匾儿和一管鹅翎，用鹅翎毛轻轻将幼蚕扫到匾儿里，叫我去摘桑叶，要嫩一点的，我急忙到屋外的野桑树上摘来桑叶便要往匾儿中放，“慢着，会压坏它的”，老娘用剪刀将桑叶细细剪碎，然后用手指撮起在匾儿里均匀地撒上一层。“嗳，吃了，吃了”，我开心地盯着这些小家伙，老娘叭嗒着旱烟也在看，若有所思：“蚕可不好养啊！”

五分钟热度之后，我也没多大兴趣去管它了，反正有老娘呢。

蚕儿越长越大，吃的桑叶也越来越多，附近的桑树叶都摘光了，老娘要我到远处去找找，我懒得去找，就偷偷拔了些杂草来，背着老娘喂给蚕吃，蚕儿饥不择食，只管拼命把草往肚里送，我自豪地哈哈大笑起来，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你在瞎捣鼓什么？”老娘问，“喂蚕啊。”“你看你这孩子，嗨，咋，咋喂草啊？它又不是，它又不是牛……，哈哈，哈，哈哈……”老娘捧着肚子笑得更欢，“它不是在吃吗？”我强词夺理道，为自己的发明未被承认而愤愤不平。

老娘带我来到郊外采桑，她特别指出一些树告诉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它的叶子替代桑叶喂蚕，虽然比不上桑叶，要比草强得多，我一一记下了，现在还能说出来的有柞树、栗树、榆树、木棉树等，我兴趣大增，从此蚕儿再不挨饿了。

蚕“上山”之前特别能吃，声音象下雨似的，沙沙沙…，不绝于耳。夜里我呼呼大睡了，老娘要起来几次照应蚕宝宝。

我们终于收获了一簸箩蚕茧，老娘看着它犯愁：“拿它咋办呢？”我倒干脆：

“送到收购站去卖钱。”“也卖不上俩钱，这么着吧，我来教你纩丝（缫丝）好不？”“好！”老娘在钢盅锅的一只锅耳上拧上根半尺长的铁丝，铁丝的另一端穿上一颗有着几个眼儿的钮扣，铁丝弯回来拧紧，固定住扣子在锅的上方。锅里放进蚕茧，倒上开水放到煤炉上煮，老娘口中含了口凉水，便利索地用双手在热水中拣起茧子的一个个丝头，烫得受不了了，就往手上喷一些凉水，把若干个丝头合成一束，穿过纽扣儿的眼儿，让我在一旁接着，把丝线往小棍上纩绕，象收风筝线似的，挺好玩的。哦，这就是缫丝啊！我不时同老娘换换手，一边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

你老爷到了冬闲时就到烟台去打工，“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啊？”想都不敢想啊，走着去！“作什么活？”在日本人开的缫丝厂里纩丝，苦得很哪，一天干十拉个钟头，大冷的天，整天都要口含凉水，年纪轻轻满口的牙就掉光了，“装假牙没有？”唉！那时装不起啊，现在想装医生说已经没法装了。到了快过年了，才冒着风雪往回赶，晚上歇下时，脚已经冻僵了。同路的人有的不懂，急着把脚放在火上烤，烤着烤着，你猜咋样？“咋样？”脚趾头就扑楞扑楞掉下来啦，还不觉得疼，可惨啦！“真的啊？”可不是吗。你老爷一回到家，我总先脱掉他的鞋把他脚揣到我怀里，贴肉替他暖脚、搓脚，他还怪不好意思的呢，哈哈！“老娘对老爷真好！”是啊，俺和他一辈子都没红过一次脸。他的脚没落下啥毛病，我最担心他那嗓子眼儿，牙没了，吃饭还是那么快，嚼不烂也强往下吞，常噎得喘不上气来，大半辈子了，都是这样吃东西，怕会落下啥毛病的。“别担心，老爷的身体好着呢！”老天爷保佑吧。

丝纩完了，如同黄瓜大小的一轴丝线，虽没什么大用场，我们还是把它珍藏在簸箩里，老娘和我觉得并没白干。

老爷李在为比老娘晚去世，是因不治的——食道癌。在天的老娘啊，您的担心是对的！

我十分爱蚕，我十分恨蚕！

之五、蓖麻籽风波

困难时期，不堪回首，记忆中最强烈的印象是——饿。记得在一小上学时，校长顾兰生到班上来看大家，他人很好，也很风趣，说："只要大家认真学习，我们老师再苦再累也吃得消，就是备课、改作业到半夜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能有块高级饼子吃吃就吃得消了！"大人都嘴馋，更莫说孩子了。反正那时见到了什么首先会想：能吃不？今天这个得青紫病不能来上学了，明天你吃了杏仁中毒送医院了，后天他吃了生白果毒死了……常常发生这类事。

蓖麻籽有毒，不能吃，这一点大人反复交代过，但我看到蓖麻枝上串串硕果时，总有些不甘心，摘下几串，剥去皮，除去壳，将雪白晶莹的蓖麻籽仁仔细排满在一张干净的蓖麻叶上，嘿！真象赵本山主演的一部什么电影中的一道蜂王蛹"名菜"，它在向我召唤：吃吧，别客气！我心里说：就不，就不，就不……。可是，鬼使神差，我手已抓起几粒送进了嘴里，"哥哥，把我吃吃！"老四王玉鸣央求道，"等下子，先让我尝尝能吃不。"我细细地品尝着，味儿有点怪怪的，也不十分难吃，有点象生萝卜，嗯，嚼了这半会儿，有点生虾仁滋味了，啊，简直就是肥猪肉，咽下去，咽下去，咽了下去。我闭上眼，手摸着肚子，看看会有什么不良反应，过了好半会儿，啥事没有。好，再尝两颗，伸手……，咋没了，低头一看，只剩一张干干净净的蓖麻叶，举头一看，老四的嘴在动，我的脑子轰的一声，象炸开了似的，这下可闯下大祸了，我吼道："叫你等下子，你……"老四捂住眼睛呜咽起来。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老四的四肢抽搐起来，口吐白沫，两眼直往上翻，我只好大声喊老娘，老娘见状大吃一惊，问我给他吃了什么，我刚说到"蓖麻籽"三字，她一巴掌狠狠扇到了我脸上，"你想杀了他啊？"一把抱起老四，撩开小脚飞也似的向医院跑去。

我躲在远处蔬菜大队的菜地里，六神无主，祈求老天爷饶了我小弟、饶了我，太阳在渐渐西沉。腹中有些难受，放了几个大屁，拉了泡稀屎，便平安了。满天的星星向我挤眉弄眼，讨人嫌，秋虫的喧闹和蚊子的叮咬更使我心烦，小弟到底怎样了？脑子里交替出现这两种情景，小弟的肚子膨胀起来，越胀越大，嘣的一声，肚子炸开了，烂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肠子流了出来，他死了；小弟笑着、跳着从医院回来了，"哥哥，我好啦！"爬到我身上，骑

上我的脖子，“驾，得儿驾！骑大马。”想着想着我趴在地里睡着了。

“老大——，回来吧——，老四没事了！”老娘的呼喊唤醒了我，啊，没事了，我高兴极了，真想跳起来奔回去看看老四。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酸了起来，摸摸嘴巴子，还火辣辣的，摸摸身上，被蚊虫叮起了绵绵的“丘陵”，又痒又痛，感到好委屈好委屈，我就不回去！喊声近了，还有手电筒光，“老娘错怪你了，回家吃饭，啊？”提到吃饭，突然感到肚子咕咕地叫得欢，我还是不作声。喊声到了跟前，电筒的光柱罩在我脑袋上，“好啊，不睬我，长大了，本事了，用不着我了，你开始讨厌我老太婆了是不？那好，我明天就回老家山东去，这就收拾行李去！”我跳起来抱住老娘：“老娘你别走。”

“你没事儿吧？”“没事儿。”她摸着我的脸、我的身问：“还疼么？”我仰起头看着她：“不疼！”她布满皱纹古铜色的脸上——老泪纵横。

之六、难为之炊

困难时期，城镇居民每月24市斤米还是能保证平价供应的，在现在是完全够吃了，但素油每月只有2市两，猪肉只有5市两，副食品奇缺，在自由市场上一般国家干部的月工资只能买只把只鸡，所以那点计划米是完全不够吃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娘为做好全家人的饭，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

好在家里的大人们都是农民出身，把房前屋后的瓦砾地开垦出来种上了菜，因爹娘长年在农村搞“三面红旗”，平时就由俺老娘领着我照料这些菜地，累得够戗也得干啊，填满肚子要紧。

做饭当时种莴笋主要是为了吃它的叶子，老娘几乎每天都要采上一大篮子莴笋叶来煮菜饭、菜粥，吃起来又苦又涩，但可制造饱的感觉；面皮擀得极薄极薄，包上的豇豆丁极多极多，这种牛皮大蒸饺我们倒是很爱吃的；笤帚菜是最了不起的植物，除了一点立足之地，再不向我们要求什么，却向我们大量地奉献着它的绿叶，笤帚菜本地人们都不爱吃它，或是不知道它可以吃，只是在秋后用它结实又具弹性的枝干来扎笤帚，家种和野生的都有，老娘知道这种植物的价值：含水量少，营养丰富，大量采集来做着吃。她发明了两种烹调法，其一、面在菜中：在菜中拌上三合粉蒸，其二、菜在面中：菜团在面粉或米粉上滚一下再蒸，虽菜多粮少，倒也不难吃，十分当饱。三合粉（杂合面）做出来的糊拉子（面糊糊）酸不拉唧的，很难吃，老娘加上些北瓜（南瓜）味道就好多了。种出的玉米除了煮熟啃着吃，她还辛苦地用小磨子一点点磨成粉做成窝窝头给我们吃。甚至馊了的饭菜老娘也有本事加以充分利用：把三合粉加上和匀，把面盆捂在被窝里让其发酵，然后加点石碱在锅上贴饼子，很可口。为什么老娘爱买三

合粉？当时的配给是粗粮的计划不可换购细粮，细粮的计划欢迎换购粗粮，并可优惠几成，粗粮价钱也便宜，三合粉是粗粮，老娘聪明，有本事做它，所以面条、面疙瘩、粑粑、菜饼子、菜包子、菜饺子是常吃的。虽是粗茶淡饭，俺老娘变着法做它，不断地换花样，尽量让我们能吃好、吃饱。

做菜老娘常带我们去挖野菜，如马子汗、荠菜、地皮菜、马郎头等。马子汗用开水一烫，捣点蒜泥放进去一拌，吃起来打嘴巴子都不丢！地皮菜同韭菜炒很好吃。

荠菜不论是炒、做汤、包饺子都刮刮叫。老娘常在太阳快落山时到鲜鱼巷口去转悠，碰上有寸把长的小杂鱼往往能很便宜地买回来，不厌其烦地一条条掐去肚肠剔去鳞，在面粉里打个滚，然后在锅里炒干，再加醋烧，可以吃得连刺都不剩。我在塘里摸来的歪歪（河蚌）和螺蛳，老娘也乐意拾掇，常拉破了手，挑螺蛳是多麻烦的事啊。

做零食我缠着老娘给我买了块土茯苓粑粑，因为含有糖精，虽粗得拉嗓子，但还觉得很好吃，进去容易出来难，靠灌肠才得以排出。老娘可犯了愁，咋给孩子解馋呢？她把山芋削去皮切成条，晒到发软，在锅里放上沙同这薯条一块炒，炒好的薯条又甜又脆，比京果糖还好吃。煮熟的山芋晒成干，吃起来象牛皮糖。鸡下的蛋，如换火柴、盐和酱油有余的话，还可在三合粉中打上个蛋，做成菱形的一个个小块，在锅里炒熟，这是高级点心，主要用来哄老巴子。

有限的肉票要攒到过年时才用，所以我们孩子家天天都盼过年。年终于到了，大人们坐下开始包猪肉馅的饺子，我们在一边好着急啊，恨不能马上吃到口。只剩最后一张饺皮了，老娘用它在空了的馅子盆内擦了又擦，然后包了一个特殊的饺子：将饺皮一左一右交替地捏合，有点儿象编辫子，捏合处的纹路也象辫子，包好后一头是圆的，一头是尖的。我盯着它看，似曾相识，“这是什么？”老娘说是小老鼠，“不象，对了，象老娘的小脚。”“瞎说！”我下意识地用鼻子闻了闻，“干吗？”“看看有小脚的臭味儿不。”老娘用粘着面粉的手刮了我两个鼻子：“你这孩子真淘气！去照照。”一照镜子，啊，我成了二花脸了！

之七、穿着

现在到处都在经商，满街都是店铺，满铺子都是卖穿的，高档的价格令人瞠目结舌，低档的又便宜得使人狐疑不决，不过你最后总能满意而归。我小时候可没这好光景，衣着及其原料品种少、品质低，平价的少的可怜，黑市的你又买不起，凭寥寥几尺布票来“丰衣”的话，除非你是神仙！光孩子就四个，其中3个是“老小”（男孩），穿和吃一样，也使大人伤透了脑筋。

先说鞋吧，夏天穿的拖鞋是老娘做的，上面绣着花、镶着边，我穿出去，谁见了都说漂亮。弟妹大了，他们拾我的穿，我大了，做不起新的，穿啥？老娘有办法，把大人家旧鞋的后半截鞋帮剪了当拖鞋给我穿，男孩儿不讲究，穿上反觉得挺好玩的，再拿上把破蒲扇，学着剪纸片中济公的样儿，口中念念有词："走走走，游游游，天南海北我巡逻！"满世界招摇。老娘做的鞋耐穿，因为她有高招，纳鞋底用麻线，针眼又密又紧，鞋底很硬棒，她把做地毯的工艺经过改良用到做鞋帮上，两片鞋帮正面相对，之间衬一些草纸、破布和旧毡子，将其合拢在一块，然后用自染的彩色粗棉线，象纳鞋底一样地往上纳，有时只纳前端，有时连后端也纳上，纳完后，在两鞋帮间，用刀片细细将棉线割断，去尽填充物，啊，一对鞋面上出现了红花绿叶、或云龙彩凤、或老虎头……，毛茸茸的，煞是可爱！穿上这样好看又结实的鞋，别人看了好羡慕啊，问谁做的，我们总是骄傲地说：俺老娘！买来的长筒棉袜先让我们穿，穿通了，缝上袜底，又穿通了，剪掉旧底，再缝上新底和帮，如此不已，一双袜子要顶几双穿，最后实在没法再生了，也不舍得丢掉，剪下已很短了的袜筒缝在弟妹的袖子上，当护袖用。

我们年年都穿"新"棉袄，老娘把大家的棉袄拆了，一一重做，面子一般不用新布，用旧单衣充当，里子用破布拼，或用旧帐子布，关键在棉花，贴里的一半用新棉，靠外的一半用重弹过的旧棉花，然后再一一缝制好。去年大人的旧棉袄今年成了我的新棉袄，我的成了老二的，老二的成了老三的，依此类推。俺爹娘常劝俺老娘不必年年翻每人的棉袄，老娘说："不翻能暖和么？大人受得了，孩子可受不了！"单衣和夹衣穿旧了，也拆了打个翻，穿起来象新的一样。给我们做的中式裤衩不分前后面，穿的时候这次这面朝前，下次这面朝后，下下次这面再朝前……。

老娘把给我们做衣服剩下的零头布细心地保藏好，在我们的臂或腿长长了时，翻出来往袖子或裤脚上接上一块，既好又省。短袖汗衫到了秋后便被接上袖子当棉毛衫穿，夏天再到时再把袖子拆下恢复为汗衫，循环不已。即使补衣服，老娘也不马虎从事，也要讲究美观和适用，如上衣刮了个洞，她就补上，补丁绣成一朵花；一个裤管的膝头处破了，她剪两块同样大小的布，两两对称地仔细缝在两个裤管上，布头不用新的，而是用半旧的，一是为了节省，二可以减少色彩上的反差，使人看了感到不是补上去的，而是原设计所固有的。

俺老娘给我们每人做两个枕头，底子用旧布，面子用新布，绣着美丽的图案。

不辞劳苦一点一点采来老荠菜籽装进一个枕头，这是冬天用的；她向养蚕的人家讨来蚕屎装进另一个枕头，这是夏天用的，说是孩子枕着不生痱子和疖子。

除夕夜，我们小孩想守夜也没那个本事，上床睡了，老娘在我的"新"棉袄上换上了一件真正的新罩衣，一双神气的中式虎头棉鞋放到了我的床沿下。梦中我感到尿急，习惯地伸手到床下摸起来尿壶就往里撒，"你干什么！"俺娘急迫的喊声使我暂停了牛尿，睁眼一看，尿壶啥时变成了新鞋？"总比尿床好，别吓着孩子，大过年

的，老天保平安啊！”俺老娘笑着递过尿壶让我继续撒尿。

之八、游戏

我们兄妹玩“当七当八当当对”（石头剪子布），输了的要被刮鼻子，谁输谁赢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所以常请老娘来当裁判，她的“公平”裁决是这样子的：长者输了要让幼者尽情刮个够，赢了刮幼者要轻之又轻；如果老三妹妹输了，刮她的鼻子要延期执行，因为她的鼻子长得塌，如强行猛刮，将来就有嫁不出去的危险，什么时候鼻子长正常了什么时候再执行。不服裁决者罚自刮鼻子一百下。于是游戏才有条不紊地得以进行。后来老三王玉鸿的鼻子出落得很标致，这应归功于老娘的“公平”裁决，可惜，之后延期执行的事我们倒忘得一干二净了！

牙牙学语时，老娘教我们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爹爹不睬，喊娘娘不在，呲溜呲溜滑下来。过后又教我们绕口令：东关东头吊桥头上一座楼，西关西头吊桥头上一座楼，东关东头吊桥头上楼上和尚扔砖头，砸着西关西头吊桥头上楼上和尚的头。用一根棉线首尾相接，教我们“纺被单”，能玩出许多花式来。老娘剪绣花花样很拿手，也经常剪些人物花鸟、飞禽走兽什么的给俺耍，我学了点皮毛，现在还能剪点龙啊、虎啊哄孩子玩。用高粱杆做家什老娘在行，簸箩、匾子、枕头、席子、锅盖、蒸东西的箅子等等等等，都是她亲手做的，她常用高粱杆皮儿和芯给俺做玩具，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反正手边可能有的材料，如纸、布、棉花、线、面团、泥巴、豆类、秸秆、草、果核，甚至骨头鱼刺等废物，她都可信手拈来，三下两下，就因势象形巧夺天工地做出件你预想不到的玩具来。

不信，请到俺家来参观吧：老巴子，他的车车上竖着大风车，头上挂着骨头飞机，乐滋滋举着手在摇拨郎鼓；老三在抱着布娃娃踢毽子，使好大的力方能够踢到仨啊俩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是老二，他腰别匣子炮，手持红缨抢严肃地在门口值班站岗，难怪他后来险些当上军仪队员；大概是句容锡剧团古装戏的影响吧，老大我正趴在席子上“运筹帏屋，决胜千里”，把大量的兵马排成对立的方阵，“指挥”他们厮杀，还用自己的脸和嘴为其配表情和声音，“众将官，有！杀——，啊！咚咚咚咚，锵锵锵锵……”，我以为那阵势只有秦兵马俑方可与之相比。数不清的玩具基本上都是俺老娘亲手制作的。

在给我们做玩具找乐子上，老娘也有遗憾之处。老巴子正处襁褓中，老娘在他小床帐顶的左方挂上了许多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玩具，象绣球、灯笼、荷花、动物风筝之类，逗得他好开心好开心。久而久之，老四的眼睛犯下了难改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有事没事总斜视着左上方，象凝思的哲学家。老娘为此懊恼了一辈子。

老娘年青时扭秧歌、打腰鼓、踩高跷，荡秋千也会玩，荡秋千尤见长。她在门框上作了个临时秋千推着我们在上面荡，说她小时见过的一个秋千好手，是个少妇，有人怂恿她抱上自己婴孩荡荡看，是否还那么帅。结果她真的这样干了，秋千荡到最高处时，突然踏板断了，不知那来的神力，那女子一手搂紧孩子，一手死抓着一根绳子在空中荡悠了半天才停下，居然母子平安无事，好险哪！我当时就想，假如那女子是老娘，那孩儿是我，也会逢凶化吉的，一定会的。

之九、宠物

俺爹傍晚领着我到屋后不远的马皮岗去散步，给我捉到只会叫唤的蚂蚱，本地叫“叫油子”，我害怕它咬我，不敢拿，俺老娘作了一个球形的小笼子装上它，笼子上边有丝绳，下边有丝穗，我好生喜欢。大了点，敢自己抓虫子玩了，什么蝴蝶、武蜂、蛋唧唧（蟋蟀）、天牛、金金虫（金龟子）、放屁虫等等，见了就抓，有时被放屁虫灼伤了手、被马蜂蛰满了一头的泡，也无所畏惧。抓着了就回家麻烦老娘，给栓上根绳啦，给做个窝啦，编个笼啦，老娘不厌其烦。“蛋唧唧笼子，我没见过，你去找个样子来我看看。”我在邻居小孩那儿借了来，老娘用了半晌工夫做好了，一根竹管子，纵向在上面刻出一些栅栏，在同栅栏相对的那面横向等距离锯上几个口子，插上铁皮作活动门，蛋唧唧放进去，一虫一室。玩的时候打开活动门，用草杆挑逗它们争斗，发出的“唧唧”声悦耳动听。玩放屁虫简单，你用棍棍一碰它，它就“卟”放一个黄屁，一触即发，绝不偷懒，老娘看了也接过棍棍去试试，乐得她眉开眼笑，仿佛也回到了童年。

把麻雀抓来玩，她不干涉，要抓到只燕子回家，她就说：“拿来我看看！”看着，摸着，趁我不注意便撒手放了它，还装着是无意的，实际上她认为燕子是圣洁之物，不应糟蹋了它。

老娘一辈子都在养鸡，一窝小鸡又孵出来了，可爱得很，俺兄妹真想拿着玩，老娘不许，只允许每人在名义上占有几只，经过一番争执、协商和讨价还价，最后瓜分了这些小鸡，开始为自己属下的小鸡操心。小鸡一天天长大。一只我的小公鸡突然光咳嗽不吃食儿了，我及时向老娘报告，老娘马上给它动手术，一剪刀剪开它的嗉子，结果拿出一截橡皮筋来，缝上后第二天小公鸡又欢蹦乱跳起来。老三的母鸡比老二的早下蛋，老二急得了不得，一天他喜忧参半地向老娘报告他的母鸡生了第一个蛋，软壳的。老娘把破碗片砸碎，和油给鸡灌下去，以后生的蛋就正常了。

俺爹买了一只白兔回来，我非常喜欢。晚上兔子在家乱扑腾，爹就把它放到天井里去。

夜里风云突变，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半睡半醒中我看到白兔在向我作揖求救，我挣扎着想起身，就是动不了，心如刀割！第二天见白兔硬梆梆地死在天井的积水里，我的负罪感很重，一连多天象掉了魂儿似的老在说："白兔死了，白兔死了？"

是老娘买回对小长毛白兔使我恢复了正常，粉红的眼睛，可笑的豁嘴巴，厚厚的白毛，喜死个人。在老娘和我的精心喂养下，兔子终于长大了，老娘要拔它们的长毛，我就是不依，"拔了还能卖点钱，不拔他也会自个儿褪下白瞎了的。""它会疼的呀！"最后达成协议，用剪子剪毛。兔子逃生的本领是迅跑，人们圈养兔子，给了它们生的机会，同时又增加了它们受伤害的机会。一天我喂兔时发现有血迹，天哪，母兔的一条后腿被野猫吃掉了，我嚎啕大哭起来……

结果怎样？没事儿，伤治好了，这三脚兔还生出了一窝红红的小兔仔——都亏了俺老娘！

之十、在爱中永生

小院里的丝瓜被可恶的老鼠齐根咬断了几株，几日后我惊奇地发现，在枯了枝叶的藤上居然开出了鲜艳夺目的金色花朵，花儿昂首向天地喷洒芬芳，向蜂蝶奉献花粉和花蜜，向异株传递遗传因子……，我突然悟到点儿什么，又想到了俺老娘。

俺兄妹在一天天长大，生活上的需求成倍增加，那"暂时困难时期"就是老不结束，父母的收入有减无增，且长期在农村搞那些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家人要分在几处开伙，更是浪费。人家孩子放学后做作业、玩乐，俺兄妹只可以担水种菜、推车买粮买煤、割草放鹅……，邻居们都感到我们可怜："你们干部家的小把戏怎么比我们菜农家的小把戏还苦啊？"家务过重，精力消耗过多，在校成绩一落千丈。

我开始在学校里故意调皮捣蛋，希望老师放学时把我留下，可以逃脱一点繁重的劳作而稍事休息。唉，简直是饮鸩解渴啊！俺爹工作上不顺利，生活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改慈父的面目，整日郁郁寡欢，不言不语，极易发怒，常因小过对我飨以老拳。他有点时间都泡在菜地里拼命，入夜都不歇工，可怜！俺娘重蹈她爷爷的覆辙，着急得有时精神错乱，只会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我不想再在这个家待下去了。曾一度美满过的家庭，危如累卵。

老娘又伸出了扭转乾坤的巨臂："这么着吧，我带俩孩子回山东老家去，在乡下花费要小得多，替人做点针线

活俺还行，他老爷把自留地种种好还怕没吃的。”带着老二和老四去了潍县。说得轻松，其实不然，老娘和老爷年近垂暮，任劳任怨地分担起咱家的生计重任，够苦的，他们奉献出了所剩的一切，救了这个家。

离开老娘的日子我倍觉孤独，梦中经常哭醒过来。18岁上的那个春节，我去山东看她老人家，她拉我上炕坐在她身边，握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俺的儿啊，长成大小伙子了，让我好好看看！”看也看不够。我吃着她专给我做的荷包蛋，太香了，也看着她，老娘又老了许多，声音也粗哑了，但眉宇间仍透着精神劲儿。没想到这竟是见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老娘中风在床，最后的日子更加遭罪……

老娘，您渴望的好日子终于来到了，多么想与您共享啊！

您还记得给我们说过的这个古事么？有一个女人天天到烧饼铺去买一个铜钱的烧饼，老板天天发现少掉一个钱，最后一次等那女人离去后，把她付的钱放到水里，不沉，是纸钱。寻踪追去，女人到了一个坟前便不见了，隐约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挖开坟，撬开棺，里面有一具女尸和一个正在吃烧饼的婴孩。这孕妇下葬时，腹中的孩子还没死，伟大的母亲在九泉下产下自己的孩子，养育着自己的孩子。您说这是真事，我确信无疑。您在天之灵依然在关怀着我们、保佑着我们，我更确信无疑！

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让爱充满宇宙、纵贯千秋吧！

俺最敬爱的老娘，您定会在这不尽的爱中得到永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今天我讲一个我曾经历过的事给大家听一听，就权当听故事吧，让大家轻松一下。

那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们鄂西北的山区12月份的天气也是很冷的，尤其是在冬至前后小北风刮得人也冷飕飕的。

那天我坐厂班车下班，下了车我急急的往家赶，因为我的孩子刚刚8个月大，家里有些家务活还等着我干呢，妻子顾孩子还顾不过来呢。

天也慢慢暗下来了。突然我看见路边的鱼塘内有一红色物体在向鱼塘中央漂浮，仔细一看是一个女人正在水里挣扎。也怪了这时路上也没有行人，只有一个当地老乡的孩子从远处走过来。谁没有私心、谁不怕死啊，书上说的那些什么危急关头临危不乱、奋不顾身、舍己为人、不顾一切我看都是瞎扯，我那时想的就挺多，水那么凉我要下去上不来咋办，孩子还那么小以后他娘俩咋过。要是有个人过来帮个忙搭个手就好了。这时那个老乡孩子也跑过来了。

我问那孩子“这个鱼塘水深不深？”。

那孩子摇摇头说不知道。没办法，这事谁让我遇到了呢，好赖我也是条汉子不能见死不救吧。我让那孩子去找两根长点的竹竿子（因为旁边就是菜地），另外再去喊人来帮忙。

我可没象书中所说的那样什么不脱衣服呀什么奋不顾身一个勐子扎入水中呀。我可是脱下外衣、外裤并用脚试了一下水温，嘿还真冷，不是一般的冷。我慢慢试着向鱼塘中央走去，没走多远，嗨，这里一下就够不到底了。我向那个女人游去，我一边游一边想那女人啊你可得老实点别乱扑腾把我也拖下去。这时也不感觉冷了，我对那女人大声喊道：

“你别乱动，我来救你”。

还好那女人挺听话的，不乱动了。不然的话我的一顿老拳可要喂给她吃了。过去听人说水里救人要把落水者打晕才能施救，否则那是很危险的。

我游到她跟前一看原来还是个二十多岁姑娘，她用那恐惧和求助的眼光望着我，她已经冻的说不出话了。我安慰她让她别怕。也亏她穿了一件大棉袄外加滑雪衫才在水里漂了这么长时间。我拖住她的衣服往回游，很快到了岸

边，我看到那个孩子也找来了竹竿正在往我这里伸，我一手抓住竹竿一手拖起那姑娘把她往岸上拽，嘿嘿，这人离开了水也蛮重呀，还真是拖不起她来，那孩子抓住她的手，我在水里托住她的屁股往上推，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弄到岸上。

到了岸我才看到不知何时围上来了一帮人，我靠！我需要帮忙时人都TMD到哪去了？我用发抖的声音问“你们谁认得这个姑娘？”这时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对我说“她好象是我们针织厂的。”“那好我就把她交给你了，后面的事你负责了，拜托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准备走。这时那个干部问我“师傅，谢谢你救了我厂的人。你是哪个厂的？能不能留下你的姓名？”那时我心里好矛盾呀，心里巴不得说出我的姓名，可嘴里却冒出英雄们说的那话“别问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那个干部拉着我非要我说不可，我对他说“你快放手，我要赶快回家去，冻死我了”。就在这时我的一个邻居肖老师下班也路过这里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对那干部说“我来告诉你，他是二汽57XX厂的，叫杰夫。”那个干部赶快记了下来。我嘴上埋怨那个邻居，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把我想说的话替我说了，我还落个做好事不愿留姓名的好名声。我把毛衣毛裤挎包扔给我那个邻居肖老师让他替我拿回家，我要先跑回去，跑跑去寒气。

路上的人都奇怪的看着我，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呀？大冷天的穿的那么薄浑身水淋淋的光着脚还登着大皮鞋，肯定是从那地方跑出来的（我们跟前有一精神病院）。路上的人都躲开了我，这反而使我跑的更快了。

到了家我这模样吓了妻子一跳，“你这是咋搞的？”“赶快给我烧水，我要洗一洗，我刚刚在鱼塘里救了一个人”。妻子一听赶快到邻居家借了几瓶开水连同家里的几瓶一起给我用了。这时我那邻居肖老师也送衣服来了，他对我妻说“杰夫是好样的，大冷天在鱼塘里救人不简单呀。”我听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一传出去我不就是美名四扬了吗。

晚饭妻子特为我炒了几个好菜，围着火炉边喝着酒边讲着路上发生的事，妻子用钦佩的目光望着我并给我夹菜。年迈的老岳母说“好啊，古时的人说救人一命胜造那七级浮屠。”妻子没有埋怨我，因为我还活着。我抱着我的娇儿亲吻着他粉嫩的脸，这时我好幸福呀。

因为喝了一点酒，我很兴奋，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今天发生的事。我在想我的姓名和单位他们都知道了，明天他们单位肯定会送感谢信到我们厂的，那我可就会出名了。我写入党申请书也有两年了，今天我做的这件好事党支部肯定会重点培养我的，这可是很好的入党敲门砖呀。入党动机不纯吗？不、不、好多人入党前不是都要做很多好事来表现一下吗？我这可是冒死做的好事呀，不让我入党让谁入？年底到了又要写思想汇报了，我就写这件事吧，要写的生动，要把我的英雄气概写出来。腹稿都想好了什么奋不顾身了、一怕冷二不怕死了、不留单位和姓名了、作无名英雄了等等。还有年底了我们车间给了几个长工资升级的名额，这下有一个名额会是我的了，这可是我争名额的好筹码呀，说不定还会奖励我一大笔奖金呢。我美孜孜的想着，明天报社记者要来采访我我要这样回答“我是

一个青年工人，受党教育多年，碰到群众遇难我不去救谁去救？这是我应该做的”。被救姑娘的双亲也来了，他们送来一面锦旗，上书“罗盛教式的好工人，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他们拉着我得手不停的说着感谢的话，我说这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厂领导握着我的手说“杰夫同志你为我厂争了光，你是个好同志，好青年，你舍己为人的行为令我们感动，我要让全体职工向你学习，我要为你请功。”那二位老人往我手上塞着东西“你好好补养补养身体吧。”我说不要、不要可是我还是接了下来。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伸出话筒问我“杰夫同志你想对广大电视观众说些什么？”我说“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句话，大家要宏扬雷锋精神向雷锋同志学习！”掌声雷动，摄影记者的相机不停的照着，闪光灯一闪把我晃醒了。原来是个梦，妻子拉亮电灯说孩子要吃奶了去热热奶。我还在想梦中的事呢，呵呵我都没来得及看看送的啥补品。

第二天，我带着没休息好的倦意上班去了。到了厂里我望望周围的工友们看看他们有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竖起耳朵听厂广播喇叭有没有表扬我的稿件？守着班里的电话机等着厂领导来电让我去厂部找我谈话？那天我都快象丢斧子的人了，看哪个当官的都象知道这件事似的。我微笑着对每一个到我们车间的领导打招唿。连我都奇怪，那天干活特麻利，设备出现的故障没多长时间就解决完了。一天下来一切如故，什么也没发生，我失望了？我自己安慰自己，不会那么快的可能那个单位还要了解一下情况呢，你急个啥呢？过两天就会有消息了。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天天晚上打开收音机听我市的新闻，听有没有与我有关的新闻。我盼星星盼月亮，可是什么也没盼来。我有些生气了，我的单位姓名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你们怎么还不到我厂报告一下呀，我都等急了。我越想越气，阿Q的脾气也出来了，妈妈的王八蛋要你们表扬。不过那两天也听说一被别的车撞了的人让人救了反说是救的人撞的，真是好心没得好报，那救人的冤不冤啊，这是什么世道呀？

回到家里我在想，那天，那个姑娘掉进水里，周围没有人看到，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如果人家来调查你为什么要救她呀？你存有何居心呀？是不是你把她推下去的？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我的妈呀，我越想越害怕。是啊我凭什么要救她呀？我充哪门子大瓣蒜呀，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还恬不知耻的告诉了你的单位和姓名，还等着人家来报恩呢？TMD什么英雄呀、好汉呀都TMD扯蛋的。我眯眯澄澄地被人请进了保卫科。你叫杰夫吗？你为什么要把人往水里推？人家告你行为不轨，企图……那个保卫科长一句接一句的问我，我被气的大声叫道我真冤啊！我救了人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气的蹲在了地下。你喊什么？喊什么？杰夫起来！起来！我被推醒了，原来又是一梦。妻子让我起来给孩子热奶去。

日子平平静静的过去了，新的一年又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还是和以前一样。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当我的工人，干我的活。思想汇报写了，不过这件事没写，写的都是空话、套话。年底车间给我升了一级，那不是因为这件事升的，我平常工作就表现不错呀。

十好几年过去了，我坐车时常能看到那林立的高楼后面的鱼塘。那鱼塘发生的事谁还记得呢？恐怕只有我和那

被救的姑娘记得吧。我到现在也不知那姑娘姓甚名谁，为何掉进水里？她现在还好吗？那姑娘现在也应该是为人之妻、为人之母了吧。啊对了还有我的那位邻居肖老师还记得这件事，我们各自都搬家了，平常很少见面。在城里碰到了他总要拉我到他家吃饭去，他说杰夫你是好样的。唉，有他这一句话我足矣了。

如果有人问我现在你碰到这事你还干不干？我肯定的回答一个字“干！”不过我会如空水先生所说的那样量力而行，先要保护自己在去施救，不做不必要的伤亡行动（就象去年青岛什么厂出的游客落水造成施救者多人死亡的事故，原来水中有电）。不行的话我会请110来帮忙，决不做看客，休手旁观。如果说妻子和母亲同时落水你先救谁？台湾歌手张缔先生唱的那首歌就是答案。不过还有一答案那就是刘皇叔刘备刘玄德的那句名言“女人是……”嘿嘿玩笑玩笑，那我可做不出呀。

在写完这篇文章时，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武汉有一青年在长江大桥上坠江自杀，在他翻过桥栏的一瞬间他的父亲抓住了他的衣服，父亲恳请路人来帮忙伸下手施救，但是几个骑车人无动于衷做了看客。那年青人在父亲绝望、痛楚的眼神下坠落江中。这失去儿子的伤痛莫过于社会的无助更让人伤痛。中华民族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美德哪去了？人们都那么麻木不仁了吗？看了这则新闻后我心痛了，真的。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前几日大家闲着无事就聊起社会风气如何不好，现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安全感，现在当官的贪污腐化的多拉，强盗抢银行的多拉，杀人越货的多拉，卖淫嫖娼的多拉反正现在各种刑事案件越来越多，公安机关够忙的啦。都是让钱给闹的，社会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嘛“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为这话大家争论不休，因此我给他们讲了下边这真实的故事。

这是上个世纪的一九八七年秋天一个上午，这一天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北国著名的汽车城万人空巷，人们都站在宽敞的东风大道两旁翘首等待着……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 “来啦来啦……来啦”。人们听到远处的警笛长鸣声声传过来，这时由公安局的全副武装的警察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开道，一个由兰白相间的警车组成的车队闪烁着兰红警灯，空气中回响着刺耳的警笛声缓缓的开过来拉。后面十几辆解放牌大卡车上面坐着端着冲锋枪的武警战士押解着站在车厢头前面的马上就要执行死刑的囚犯。这一次被执行的死囚有十几个吧。

在第二辆车上站着一个死囚犯，个子瘦长剃着光头，头上的大牌子上写着“故意杀人罪 王白行”名字上打了大大的红叉叉。汽车缓缓的在汽车城的大道上行驶着这个死囚瞪着双眼最后一次看着他熟悉的街道、厂房、商店、公园，还有他的邻居们。他原来就是汽车厂的职工，现在他的邻居们都来为他送行了，其中我也在看着他为他送行，我与他分别也有十几年啦不知道他还能否认识我了，我悄悄的向他摆了摆手，他看了我一眼，一会他向我点了点头，可能他认出我了，毕竟我们做了上十年的邻居呢。

囚车慢慢离开了我的视线，他将踏上不归之路。警笛还在车城的上空回响……

人们在议论着、叹息着一个好好的家庭破灭啦……

在我十岁左右，我们门栋一楼搬来一户人家，男主人那时有24、5岁，我们都叫他王叔。他瘦高的个子长的很精干，喜欢在腰间扎块板带好像是个练功夫的人，早上起来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他在楼梯过道上的窗台压腿弯腰，用手砍木制扶梯“怦怦”作响。他喜欢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玩，给我们讲故事说江湖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传说。他当年还是长春市业余射击队的队员，据说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还得过名次呢。

吹牛好像是男人的天性他也很好吹牛，真真假假的让我们这些孩子摸不到头脑。然而有一次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绝技，那天他和

我们在一起唠嗑，这时有几个小伙子拿着气枪在打麻雀，王叔好像认识他们就把它们得枪要过来看看，那几个人就让他表演一个，王叔问他们打什么？真好远处的烟囱上落着一只麻雀还在叽叽喳喳的叫着，他们就让王叔打那只麻雀。王叔往上面看了一眼说我打那只麻雀的眼睛，那些人都笑他吹牛，不可能打到。王叔不吱声端起枪瞄准三点成一线“砰”随着枪响那只麻雀从烟囱上面掉了下来，我们几个孩子跑过去把麻雀捡来回来，一看果然那一枪打在麻雀的眼睛上，那帮人佩服的不得了都说王叔好枪法。过后王叔悄悄的告诉我们说那枪是他蒙上的。

王叔有很多爱好如骑车远足游泳，还有养鱼种花弄草等。他的 泳技不能令人恭维但是他喜欢玩水，记得有一次他喊我和他一起去到南湖游泳，我那时不会游泳，可是喜欢南湖那地方的风景就答应和他一起去了。他骑着他家那辆德国造的老爷车带着我晃晃悠悠的上路啦，路上他给我讲着故事，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南湖游泳区。他把车子一放脱光衣服只剩下一条大裤衩子。在可以数的过来肋巴骨的腰身上缠了一根自行车内胎感到特别好笑，我在岸上帮他看着衣服和车子。他在水里笨拙的扑腾着，象狗泡式的蛙泳手划了几下也不见往前动一米。玩了一会他让我也下水，我说不会游不敢下水，其实我也想去玩水但是看他那技术信不过他怕出意外。

他在文革前就养了很多的花草和热带观赏鱼，因为他的爱好广泛因此在社会上结交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文革初期破四旧很多养花养鱼的人都把鱼缸花盆咂啦，然而他舍不得咂掉他的鱼缸花盆，那些破四旧的队伍知道他是个不好惹的茬子因此没敢对他如何。文革时工厂关门他就在家里养鱼种花，把那花啊鱼呀伺候的非常的好。他有好几缸子燕鱼、红箭、黑玛丽等。家里还种了十几盆君子兰花，那花开的真鲜艳呀人见人爱。那时候毛主席像章是好东西，有个人用一白多枚像章和他换一盆花他都没干。就是这些君子兰花以后引出杀身之祸。这是后话。

王叔的妻子是个白白净净的东北女子，很会操持家务，家里有两个可爱漂亮的儿子，老大叫二胖肤白，老二叫二胖肤黑，都是大眼睛非常惹人喜欢的孩子。后来在七〇年代又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我没见过。别看王叔对我们这些孩子特别好，但是他对自己的孩子却是暴君似的的教育方法，孩子的门门功课必须在98分以上否则不许吃饭，其实他那两个儿子的功课已经是很好啦重是在年级前几名行列，就这样还是不能令 王叔满意，经常对那两个孩子体罚非打既骂，那两个孩子见了他就象耗子见了猫一样的害怕。王婶为了护儿子也没少挨王叔的打，因此那两个孩子就对他们的妈妈最亲近了。大胖很争气考上了北京外院，这使得王叔觉得这是他棍棒教育的结果是他的功劳。他对两个儿子凶神恶煞的，但是对他的幺姑娘却心疼百倍爱护有佳如同掌上明珠一样。这几个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其性格都变得谨小慎微啦。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城一夜之间忽然火爆起来养君子兰花的风潮，在长春市人们都像发疯了一样，只要有人群的地方谈论的保证是君子兰，坐车的谈君子兰，饭店吃饭的谈君子兰，学校老师学生共谈君子兰，但是市政府也推波助澜，把长春市的市花定为君子兰花，君子兰一时间身价百倍的上涨，一株好的品种君子兰花其价格能达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呢，因此人们以家中有君子兰为荣，出版部门还请养花专家著书立专教导大家如何养花护花，为此还出了一本君子兰杂志。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谁谁家的君子兰被什么

外商看中啦出价多少万美元买走拉，谁谁家请了保镖为这家看守君子兰，谁谁家买了几条德国黑贝狗看家护花。长春市的花鸟市场当时的每日君子兰的交易金额达到数十万元。长春市的有些市民为君子兰而疯狂，当时宣传说什么君子兰放在家里能够清新家中的空气、养人容颜，什么国家的多少科学家植物学家专家对君子兰作了专门拨款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君子兰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花卉，而且写出报告请中央在全国推广种植君子兰为出口创汇做出贡献云云。这些小道消息闹的很多人做着君子兰的发财梦，由于君子兰的火热因此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抢花偷花的案件日益增多，有的人从沈阳开车来长春偷花连夜返回，然而在追打中闹的车翻人亡的惨剧。各种由君子兰引发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那时公安机关疲于对付这类刑事案件。后来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到长春视察，听了汇报参观了君子兰花展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这种分文不值的草让你们长春人这么发狂呀”？呵呵，总理这么一句话顿时浇灭了疯狂的君子兰热潮。一夜的功夫君子兰的身价象跳水似的陡降，君子兰市场也冷了下来。

在这次君子兰热潮中有很多人发了大财，王叔也在这次热潮中发了财。前面说过他在文革前就养了很多君子兰，就靠这些花的繁殖在最火的时候他倒腾君子兰赚了不少钱。钱多拉不咬人，有了钱王叔骑上了日本三洋牌摩托车，买了双筒猎枪，休息日和节日就和那些猎友抗着枪骑着摩托车到农村打猎很是开心呀。在那些狐朋狗友的介绍下也认识了几个年轻的女子，吃喝玩乐真是舒心呀，在他心里想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四十三、四的岁数正是男人精力充沛的时期，守着如花似玉的姘儿哪还想着家中的糟糠之妻呢，看着家里的黄脸婆心里就烦因此也就夜不归宿啦。

邻里的风言风语的也就传到王婶的耳朵里拉，就此家庭大战也就没完没了的打开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干，闹的邻里三天两头的过来劝架，后来也就习惯啦也懒得来劝架啦。王婶天天唠唠叨叨更使王叔心烦因此王叔要与王婶离婚然而王婶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打。王婶吃了亏挨了打没地方诉苦就写信给上大学的儿子大胖诉苦，大胖就回信安慰妈妈也写信给他的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啊不要继续下去啦为了这个家的平安还是断绝和那个女人来往吧。王婶也请王叔的朋友劝劝，然而有句老话叫做“劝赌不劝嫖”，那些朋友也不是什么好鸟。大胖在种种压力下完成了学业，二胖也在这一年顺利的完成高考就等着录取通知书啦。二胖这几年在父母的吵架声中刻苦学习父亲的丑事使他在同学们的面前抬不起头，他只要劝劝王叔那么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或老拳。以后他只能默默的忍受着耻辱，心中慢慢的滋生出仇恨父亲的火种，也更加爱护母亲，同情母亲的遭遇。

大胖大学毕业了回到家里也在等着接受单位的用人通知书。两个儿子都在家啦，王婶的反战同盟军强大了，也有了主心骨，因此这仗又开始打了。在那一天的下午，暑假的北方天气也还是很热的，天热人的火气就大。大胖二胖和王婶又在一起给王叔做工作劝他改邪归正，回头是岸。大胖二胖诉说着这些年来他们是如何在流言蜚语中度过来的，指出王叔的不仁不义不父不子没有男人的气味等等多条罪状，这也是大胖二胖多年压抑沉默的总爆发。听到儿子的数落和指责后，脾气暴躁的王叔就象被点燃的炸药包似的暴跳如雷大骂儿子不孝竟敢反教，他觉得受到儿子的指责失去了父道尊严丢了他的面子，因此一个恶毒的念头在脑海里产生了，既然不让我好过那谁都别想过啦。他对大胖二胖他们娘三说：既然今天谈开啦，那我们就到外面大庭广众之下说去好好的把这件事解决一下。那娘仨都同意啦，然而他们疏忽啦，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命运是那么的悲惨。

王叔让他们前面先走，随后他从大立柜里拿出来双筒猎枪并且压上了子弹，把装满子弹的腰带系在身上皮带上插好自制的猎刀后就跟着那娘仨出来了。那娘仨也没有回头看看只顾低着头往院子前走，就在这时王叔端起了猎枪对准走在前面的大胖的后心喊到：大胖我要让你死！随后勾响了扳机，枪响了大胖转过身来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父亲，他真的下毒手了！这是父亲吗？大胖缓缓的倒下去了。“二胖还有你”！“砰”！铅弹打进二胖的身体，二胖瞪着仇恨的眼睛也倒了下去。王叔他疯了！当时王婶见到两个儿子被打倒后她已经傻啦，步子都迈步动了呆呆的看着血泊中的儿子。他又压上了子弹对准了王婶骂道：你这个臭娘们，然后就开枪啦。大胖当时还没有死，王叔又抽出猎刀在大胖身上噗噗的捅了几刀，看到大胖不动了他才非常冷静的把刀子上的血擦干净插进刀鞘中。他把衣服整理了一下枪里又塞上子弹端着枪坐在三具尸体旁边抽着烟。

那时孩子们都放假啦很多孩子都在院子里玩，枪声响起后很多孩子都目睹了血腥屠杀。现场这时一片寂静，人们都忽的散去躲的远远的望着血泊中的三具尸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楼上的窗户里的人们紧张的望着事态的发展，有的人打电话报了案。远处传来警车警笛刺耳的鸣叫声，还有救护车的鸣叫声。大批的警察来到杀人现场，警察端着枪却不敢靠近，远远的喊叫让王叔丢掉手中的枪举手投降，王叔举起枪对准他们吼到：你们谁都不要靠近，谁过来就打死谁。这时已经来了很多的武装警察，为首的一个警察和王叔谈判着请王叔答应用床单先把那尸体盖上他答应了。他们继续谈判着，王叔说他想见见他的女儿希望警察能帮他找回来。很快他的女儿找到了她在同学家玩呢。警察保护着那孩子怕她也遭毒手，其实王叔最心疼这个女儿，决不会对女儿下手的。女儿看到妈妈和哥哥倒在血泊中大哭，王叔不让她哭告诉她哪个柜子里有钱哪个屉子有存折，今后找哪个姑姑生活等等，交待完后事就把枪一扔举起双手，警察一拥而上把王叔拷走拉。医院的救护车把娘仨的尸体运走拉。人们渐渐的散去，只有不少的绿头苍蝇在那几滩血迹上飞舞。听到消息的人往这里赶打听着事件的经过，一堆堆的人议论着刚刚发生的血案。这就是当时轰动汽车城的灭门惨案。

血案后的第二天 ，北京清华大学的录取二胖的通知书递到二胖的班主任手上，老师和同学看着录取通知书都放声大哭起来。第三天，海军某情报部门让大胖去该单位报到的的通知书也寄来拉，然而一个优秀的人才却永远的走拉，噩耗传到北外大胖的同学老师那里都替大胖大胖扼腕惋惜。就这样一个好好的家庭灭亡啦，可惜就可惜那兄弟两个啦多么好的孩子。那个姑娘转眼也就成了孤儿。

案件经过侦查审理，检察机关公诉，人民法院很快判决王叔死刑，他没有要求上诉。

执行死刑的那一天真好赶上我出差来到汽车城。也算为王叔送行了吧。

警车呼叫着，行刑队押着王叔去了那个叫黑嘴子刑场，随着一声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路人都叹息曰：这是谁惹的祸？有人说：“钱”！“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是真的吗？

2001年3月9日

老马被俘记

与几个旧友小聚一餐厅，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忆往事说今朝好不热闹。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们这帮老家伙见到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卿卿我我在灯红酒绿下旁若无人地搂抱亲吻不仅感叹万分，我等老矣！这种好时光我们是没有赶上啊，我们年轻时如果男女青年拉拉手都会觉得大逆不道，更何况什么时候会扣你一个作风有问题的帽子结束你的政治生命，呜呼现在的年轻人真幸福啊！

旧友老何眯缝着醉眼问我们“你们还记得老马这个人吗？”“哪个老马？”“就是那个小马列,原来和我住一个单身寝室的。”“哦记得！有印象。”“那我就讲个他的故事，助助酒兴。”

老马不姓马，他姓郭，东北人68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接受再教育，71年随其兄到这里参加工作。老马人长的帅，个子高高的，体格健壮，学习特别棒如果不是文革肯定是上大学的料。他知识渊博，通古今、善哲学，因为他通读了“资本论”“列宁全集”大家都叫他马列了。他还是我们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委员呢。正是由于老马长的帅很博得厂里众多未婚女青年的青睐，是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时不时的总有人来为他说媒，然而这小子就这毛病不好，老马都给人家一一回绝了，因此很伤了不少姑娘的心。老马认为他不立业不做出一两件成功的大事就不成家，所以他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漂亮姑娘的追求。

女人们在一起也和男人一样，对厂里的小伙子也品头论足的。姑娘们在一起议论起老马那个恨呀，都说不知哪个姑娘有福气会嫁给他呢。这时有一位姑娘说了一句石破惊天的话“我要让老马不出一个星期就娶我为妻！”这是谁呀敢夸下这样的海口？姑娘们定眼一看不禁大笑起来“你？！不可能！那么多漂亮姑娘老马都没接受，就你这个样子嘻嘻嘻嘻……如果你能成功了我们大家请你吃饭”“那就一言为定！如果我不成功我就把回家探亲带回来的香肠、腊肉、筒子面都拿出来给你们吃。”那姑娘斩钉截铁的说。

这姑娘是谁？她就是我们厂的十大美人之一“阿包”，阿包姓胡湖北下江人，67届的初中毕业生，下乡后71年被我们厂招工进厂。她的长相不怎么样，面黑小眼睛脸上有很多雀屎斑，而且是地包天。啥叫地包天？就是下牙床包着上牙床。因此被好事的男青年们评为厂内十大美人之一，并给她取个外号叫“阿包”。别看阿包长相不求强，可她也是个好学习的主，肚内有货多有心计，干活也是把好手，厂里的先进，人缘关系也可以，如果不是长相差些

她绝对是一个优秀人物。

姑娘们笑归笑，也没把阿包的话当回事值当戏言。谁知阿包确认认真真地履行着她的诺言，一步一步实施着她的计划，做出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举动。有一天厂里爆出特大新闻，英俊潇洒的老马与大美人阿包准备结婚了，办结婚证的介绍信都开好了。消息一传出来厂里一片哗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尤其是那些被老马拒绝的姑娘们那个恨呀，老马呀老马你找谁不行怎么偏偏找的是阿包呢，这怎么能让众多姑娘心里平衡呢。这阿包是用什么手段迷住了老马真是不可思议？真应了那句俗话“好汉无好妻，赖汉守花枝”。（大家猜猜看阿包用的何手段让老马跪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呵呵……猜不到吧，让我慢慢的道来。先让我喝口酒……快讲别卖关子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侯正是“批林批孔”如火如荼的时期，各个团支部都要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写批判稿，要把林彪、孔老二批倒批臭肃清他们的流毒。老马是厂团委委员，阿包是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因此他们能经常见面。阿包为了能更频繁的接触到老马就耍了个心眼，有事没事都找老马讨教问题，什么“孔丘为何上台后要杀少正卯？”“什么是克己复礼呀？”天马行空出之何典故呀？马克思为什么要写《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反杜林论》的意义何在？这阿包白天问不够，晚上也缠着老马。老马这个人脸皮薄想想自己是团委委员人家来探讨问题也不好推辞，他也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就这样他们在老马的宿舍一谈就是夜里十一、二点。（什么？你们问我到哪睡呀，我还不是被赶到别人的屋里睡吗，我可不当那个电灯泡呢呵呵……）就这样到了第五天半夜里，天下起了雨，还挺大的。阿包看看手表说“都这么晚了天这么黑还下着雨路滑也没个路灯让我怎么回去呀，干脆今晚我不回去了就睡这里吧。”老马说“那怎么可以呢？”阿包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你睡你的床，我睡小何的床，反正小何到别的屋睡去了，到时把蚊帐一放下来灯一关谁也看不到谁怕什么呢。”老马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又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就同意阿包她睡在这里了。好一个阿包她的计谋正按计划一步步实现。

漆黑的屋里睡着个女人你想老马他能睡得着觉吗？有生以来除了因为家里房子小和爹妈睡在一个屋里外还从没有和另外一个女人同睡一个屋里呢，他翻来覆去的象烙大饼似的。而那个阿包可睡的好香啊，鼾声阵阵，老马想这女人睡觉也打鼾呀，老马还听到阿包还说梦话呢……这更使得老马睡不着了。突然，屋里的灯一下亮起来，原来电灯的拉线拴在床头上，睡梦中的阿包她翻身时手胳膊把灯线碰着了打开了灯。老马在蚊帐内看到对面床上的阿包好象赤裸着身体，一丝不挂，这更让老马浮想联翩了。就在这时阿包好象无意中翻身把一条大腿伸出了蚊帐外，乖乖，老马看到一条雪白的大腿而且没穿裤头，阴私暴露无疑，望着突然的变故老马把持不住了，对于从来都没见过赤裸的女人他终于迈下床到了对面的床上与阿包同眠共枕，修渡了百年之好，美人阿包的计谋终于成功了。初次尝到人生甜头的老马哪还管阿包的长相，现在，在他眼里阿包的一切都是美的。第二天老马他就向组织打申请报告要求与阿包结婚。

婚后老马与阿包相敬相爱，老马对阿包言听计从，阿包会烧一手好菜因此把老马服伺的舒舒服服的。一年后他

们的儿子出生了。７７年恢复高考他们把孩子送到外婆家就复习高中文化，报了名参加了高考，两口子双双红榜提名同时考入一名牌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了。听说他们的儿子吸取父母的优点，长的一表人才，聪明的很。后来留学到国外了，现在在美国发展，说不定也把他的父母老马、阿包接到美国去了呢。这就是老马和阿包的故事。

（一老友说“老何这事你如何知道的这么清楚？别不是你杜撰出来的故事？”“这事是真的，我和老马是一个屋的。后来听说他要跟阿包结婚，不得其解就拷问他，他才说了实话。”老马说当时看到那雪白的大腿后就嗓子发干浑身燥热，我又不是柳下惠，在那种场合下能不受诱惑吗？反正没经受住考验犯了错误。发生那事后我也很后悔，但是已经造成事实了，如果我不和阿包结婚，万一她去告我一个强奸罪，我这一辈子就全完了。

那天早上我回到宿舍看到我的床上一片狼迹床单上梅花点点，把我气坏了就把老马通骂了一顿，老马一个劲的陪不是并答应赔我一床新的床单。果然他把那年当先进时发的床单赔给了我。好象我还没舍得用压箱底呢，如果哪一天再能见到他们我就把这床单回赠给他们那该多有意思啊。）

这酒是喝不下去了，听完老何这段故事，我们都沉思了，在那个年代很多有才华的青年就是因为所谓的作风问题而一蹶不振，政治生命就这样早早的被扼杀了。老马是幸运的，由于阿包的狡猾和聪明成全了一个幸福家庭的诞生。

音乐再度响起，一首“心太软”回旋在餐厅内。年轻的小朋友们，珍惜这个好时光吧。

杰夫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天上飞过闪亮的星，网上巧遇西里村

——重发这篇很多朋友看过的旧文，纪念上网十四年

1

“最高指示！”高音喇叭里传出洪亮的声音。。。

“最高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４３９公里，远地点高度２３８４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６８．５度，绕地球一圈１１４分钟。卫星重１７３公斤，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这是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５日。中国的大地再次掀起一股欢庆的狂潮，“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与过去每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狂欢不同，这次是一颗小小的人造天体带来了欢乐。

４月２６日晚上，我们爬上屋顶。按照预报，在２０点３０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将在广州的西南方向掠过。我们等着盼着，终于，一颗闪亮的星星快速地飞过，人们一片欢腾，我大声叫到“我看见了！”。

同一时间，海南大山深处的橡胶林中，一片茅草房外的空地上，一群人围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在嚓嚓的噪音中传来断续的广播声，“下面预告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过我国各大城市的时间。。上海。。成都。。天津。。北京。。。”“哎”人群中传来了叹息，“我们就是看不到啊”。

一个清瘦的身影蓦然站起，走回了茅草房。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铺开了纸，铅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音。

求解：什么条件下最可能看到我国的人造卫星？

１，以近地点飞越农场上空附近。

２，在晚上。

３，卫星受到日照，有足够的亮度，约在晚上８－１０点为最好。

分解条件：

１，使用椭圆方程，地球在两个焦点的其中一个位置上。根据远地点、近地点推断出椭圆方程的系数。解得卫星飞越的纬度参数。椭圆轨迹的特点“单位时间里扫过的面积相等”。

２，按照地球自转速度，求出与卫星相遇点的经度，从而确定飞越坐标。

３，按照日地轨道参数，求出地球轴向倾斜度、日照角度，确定观察时间。

４，根据发布的经过几个城市的时间和夹角、运行周期，得到卫星运行和地球自转的参照点，推算卫星飞行轨迹，再根据农场的经纬度参数，看是否在可视范围。

５，根据卫星飞越的坐标，推算一下观看的视角。

……

灯光忽闪、忽闪。。。笔尖沙沙、沙沙。。。时间在分分秒秒流逝。。。

推导公式、列出联立方程组、代入参数、求解、验证。。。不对？推翻、再来。终于，他算出来了，“卫星将在后天晚上８点经过我们农场上空！”　此时东方欲晓。

那天的晚上，得知消息的人们早早的就在空地和山坡上坐满了，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看到卫星飞来。７点５０分、７点５５分、８点整。。。。卫星毫无踪影，８点３分、５分、７分。。。人们开始骚动，他的心紧张到了极点，屏住呼吸，“难道我算错了？”突然，“不要乱吵”的喊声响起，人们安静下来，头顶上一个发光的亮点忽悠忽悠的滑过天空，此刻是８点１０分。“是它吗？是它吗？”，大家急切地问到，他有点犹豫地轻声回答“应该是的”。

第二天，他在疑惑的人们簇拥下，向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出一封信，询问昨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半个多月后，紫金山天文台的回信来了，“你们看到的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欢呼声中，Ｒ君一举成为英雄式的人物。

2

１９７５年春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华南最大的铁路货运站。一伙疲惫到了极点的年轻人，躺在装满盐的麻袋堆上睡着了。“抢点了！”的呼声使他们惊醒，身体惯性地扑向车厢，死沉的货物压在肿起的肩上，双腿机械的移动着。两小时后又一个车厢卸空，小伙子们再次七倒八歪的躺下，压着的盐袋尽情地吸允着他们身上的汗水。我也在其中。

这是一支“青年突击队”。当时正是邓小平首次复出，大抓经济工作之时，铁路是有名的老大难，许多单位派性斗争不断，“心脏梗死（郑州），动脉不通（陇海、京广线）”。万里部长大刀阔斧的对铁路内部进行了整顿，运输秩序开始好转。但是，各项工作未能回到正常的轨道，指挥不动、调度不灵的事时时发生。这样，由青年人组织的、不计报酬的青年突击队就成了各级领导倚重的力量，每当出现困难时，青年突击队总是首当其冲。这次遇到了紧急疏站的任务，我作为团委书记，除了调动所有的十几支青年突击队上阵之外，还把我最信赖的这支突击队留在手头，要他们２４小时在站场待命。三天来，他们只能在空隙时偷睡一下，每人的累计负重量已经达到１００多吨。

团支书阿波和我并排躺着，他突然向我说：“我们想得到你的支持”，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想搞一个学技术的活动”，我说“好啊，现在搞大批判的人有的是，你们搞技术好啊”。在那个年龄，很多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出路，工作的辛苦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交织在一起，无情地消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在一些有眼光的年青人中，学习的渴望正在滋长。我想到这些年单位的科研经费很少有人使用，就建议组织技术革新小组，把学文化技术和搞科研结合起来。于是，一个青年突击队变成了技术革新小组。车间主任桂叔是个开明的人，给了小组一间房子；技术员刘姐开列了一批无人接手的科研项目清单，我们在中间选了“可控硅自动充电机”作为第一个项目，技革小组就悄悄的开张了。

这时Ｒ也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是闻风自荐而来的。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为有他这样有才干有知识的人加入而高兴，他也为回城一年多来终于融入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而兴奋。我和Ｒ分别担负起了为技革小组讲授电子技术和数学知识的任务。我在过去自学的基础上，一边学习项目所需的电子专业知识，一边备课讲解，实属现买现卖，相当吃力；而Ｒ这时已自学完大学的数学课程，讲起来自然是轻松自如。

这是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块难得的绿洲。大家不管工作是多么劳累和烦心，只要一想到下班后能走进这里，静心地学文化钻技术，不受干扰地进行“线路斗争”，我们的心里就总是热乎乎的。在这里，电烙铁沾着松香冒出青烟时的滋滋声是美妙的音乐，示波器的光点画出的绿色波形是赏心悦目的画图。年轻人特有的活力焕发出

来，电工原理、模拟电路、脉冲电路、可控硅工作原理、、方程、函数、解几。。。一门门的功课被以异常的速度攻下，科研项目也顺利完成。

自动充电机诞生了，它比当时的同类设备小四分之三，节约大量铜料，可以分阶段自动调整电流，延长蓄电池寿命，操作方便，当年它就被选为部科技成果展览会的项目。对于我们这个主要由老三届和知青们组成的集体来说，它具有特殊的意义，标志着我们完成了一次自身的飞跃，对大家今后的道路有极大的影响，在我们的中间日后出现了学者、高级工程师、工程师、领导干部。试机成功的时候，我和Ｒ还有小组的成员们都想起了一句直到今天还在流传的名言“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后来的日子里，技术革新小组的进步更快，“车辆直流斩波调速器”、“大容量快速充电机”等一批重要项目相继完成，屡屡获得部局各个等级的奖励。我和Ｒ看着我们培育的这个小组，心里无比欣慰。

世事轮转，７７年恢复了高考，Ｒ盼望的机遇来了。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以高分考入了大学；７８年，他又考取了中山大学数力系的研究生，Ｒ在他的事业上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此时我却受到了一次人生的嘲弄,被定为“四人帮帮派分子”，调离政工部门，接受审查。这使我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陷入了人生的低潮。在迷惘的困境中，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们那个技术革新小组不断的被人们所认识，并在７９年被授予“全国铁路新长征突击队”的称号，几个骨干人员成为部一级的劳动模范；还有就是许多朋友在事业上的进取，特别是Ｒ在学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是啊，不管怎么样不能放松自己！”我捧起了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计算机的书籍，一点点的啃起来，钻进去。８０年，当我终于被解除专案结束审查，并接到调令去组建一个计算中心的时候，命运再次发出嘲弄。一位朋友代表组织找我谈话，说过去整我象是搞错了，“现在对你的看法翻过来了”。他告诉我准备调我回政工部门，担任一个领导职务。我笑着回答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醉心于由空穴和电子筑成的宫殿里，沉浸在用０和１谱写的乐章中。

三十而立。８２年，我到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再次和Ｒ君相遇。两人促膝长谈，愉快地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也讲到自己现在的发展。Ｒ君拿出了他刚出版的新书《样条函数及其应用》，我则捧出一堆打满指令的纸卷，上面记载着我完成的首个获奖的科研项目。再过几年，Ｒ君作为交流学者去了美国，我间或之中会听到些他的消息，但是八十年代之后，却完全没有了他的音信。

也许三十岁前后是分手的年龄，而四十多岁以后是再聚的年龄，许多各奔东西的朋友们在这几年都陆续的回来相聚了，他们从湖南、北京、山东回来，从米苏里、三藩市和香港回来，每次的聚会就是一个节日。在这些快乐的日子里大家都会谈起难忘的往事，都会谈起Ｒ，我也常常想起Ｒ，在我最珍惜的书中，就有Ｒ君在七五年编写的，我用油墨印刷的《微分学》和《积分学》。

Ｒ，你在哪里呢？

3

夜很深，早已过子夜时分，是次日的凌晨了。聊天室里一片８８的声音，网友们一个个开始告别，宇鹏走了，延安走了。。。最后是小路也走了，喧闹的聊天室安静下来，只剩下警察少将帆、西里村和我三个人。我开始发困，如果不是被帆少将拉住，我也就要下了。

上网已经好几年了，而真正被网络迷住还是一年多以来的事。当我只是发发电子邮件的时候，和不上网的差别不大；当我还是用浏览器到处看看的时候，也只是把网络当做自己之外的事物；但是当我进入论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被溶入网络的不归之路。

出于一种历史的情结，我在网上寻找着自己的同代人。去年年初，当我在雅虎的搜索器上打入了“知青”两个字，结果跳出了“南加州知青协会”，我从那里进去，又看到了华夏知青的网页，更看到了在上面连接的各个知青网站。从此，我便在其中浏览徘徊。

去年的多事之春，论坛全面火爆。大仗小仗在各个社会论坛接连不断，我也深深的被吸引观战其中。一伙伙的好斗分子，就象是中国过去的武林好手，这个论坛打塌了又到另一个论坛再打。终于，在七月下旬的一天之后，能打架的论坛基本上都消失了，武林好手们也隐踪匿迹呼啸山林而去。静默中，我又打开久违了的知青网站，感到一股股的清新气息迎面而来，华夏知青、大家庭、老知青、曾经草原、山涧鹿鸣、纺织天地、火热的苍凉、白云鸟的天空。。。无一不带着感人的温情和回忆的召唤，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待下来了。因此，从未在知青网站发言的我，开始在各处信手涂鸦。在华知，人与人之间的透明度是如此的高，实为网上之罕见，我感到了真诚与坦率。在华知，身在国内和国外的网友直接交流，各种角度的意见带来了更为宽阔的视野，天涯咫尺的形容再不为过。

正象老康说的，我们在华知待着、乐着、耗着。。哈哈。。。

自今年以来，以往清净的华知聊天室特别多人。二次化妆晚会把网友的热情都调动了起来。好象每天大家不到这里聚聚就少了点什么东西。特别是老例描写聊天室的那个帖子，更是把聊天室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许多朋友闻讯而来，西里村也是其中一个。

西里的主页已经去过几次了，黄河女儿的那份真情感人至深，就连好朋友怪才左轮（陈扬）在他主持的节目里也动情地念到她主页封面上的话，“不管我在哪里，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的故乡都是这片古老的土地，我永远都是黄河的女儿。”

西里在美国，由于时差，在聊天室里我犯困的时候她却正精神，真有点吃不消啊！幸好不断被尼古丁刺激着的

帆兴致高昂，他俩人一来一往，谈笑风声，我的思绪就好象被栓了跟绳子，机械地跟着他们的话题走。只听帆问西里在那里读的博士，我就随口讲到“中大啊”，这回是西里奇怪了，我就告诉她是在她的主页看到的。然后帆又问她是学什么的，西里回答“计算机算法”，就在帆“肃然起敬”的时候，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脑子：中山大学——算法——数学——Ｒ！一串联想从思维中跳出，我毫不犹豫问西里：“认识Ｒ吗”，回答“认识，他是我的师兄”，呜呼，天哪！我的瞌睡瞬间消失，“找得到他吗？”，西里答“应该可以”。哦，谢天谢地这回总算找到Ｒ的踪迹了。我一时兴奋的不得了，拉住西里一直聊到天亮。分手时再三叮嘱再三鞠躬。此时已是２００１年的４月７日的早晨。

４月８日，西里的信来了，寄来了Ｒ的办公室电话和网页地址。我迫不及待的进到老朋友的主页，看到了他的照片，是的、是他，更清瘦了些，戴着一副过去不常戴的眼镜，笑容还是那么的熟悉，我感到我们似乎没有分开过。我浏览着Ｒ的主页，知道他于一年前由休斯敦宇航中心来到香港大学任教，也看到他在学问上更上了一层楼。我马上给Ｒ寄去了电邮。９日，Ｒ的回信来了，阔别十余载的朋友终于联络上了。

在喜悦的激动中，我想到了网络，想到了华知，想到了与西里村的网上巧遇，想到了少将帆在聊天室的极力挽留，，还有老例的文章、还有介绍西里来的老狼、还有、还有，，，我感谢带来欢乐的这一切！

后记：

在这篇拖了一个多月之久的东西终于完工的时候，我看到了虫二的文章。凑巧的是我们都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南加知青协会，又从南加来到华知，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悲的是那条路不通了。我祈祷着那路能重新开通，也相信我们还有路可走。我对自己说，我过去尽力了，我以后还将尽力，为了朋友，为了华知，为了黄河、长江和珠江……

2001-06-3016:20:21发表于<<华夏知青论坛>>

2010-08-15重贴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04756381

送知青赴海南与“水火棍”的场面

这恐怕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送知青下乡时唯一的一张怪力乱神场景照片了。

拍摄时间1968年11月9日，地点广州太古仓码头。图中的四位男孩子都是我的同班同学。

由于11月8日去海南的知青因为拍照闹出了事情，所以第二天就在码头上布置了大批工人纠察队员，他们头戴

藤帽手持红白两色的木棍（我们称之为水火辊），排成两排形成甬道，去海南的知青就在工人纠察队排成的通道里走上红卫号轮船，哪个走得慢点，工纠队员就用水火棍驱赶。就这样，他们告别了广州。那天，我们班一些不去海南的同学特地去送行，一位同学把照相机藏在衣服里，拍下这个镜头，成为永远的经典。

我们同学聚会时，“水火棍押送上船”这一幕，是经久不息的话题。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0475638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海岛 胶林 热风

（本石头声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人物介绍

蒋兰——女，广州XX中学高三学生。其父是省某厅厅长，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委会主任。

常新——男，广州XX中学高三学生，党员。父亲是中国政府驻香港某大机构负责人。肖林——男，常新同班好友,父亲是解放军工程兵上校团长,1965年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殉职。

运霞——女，广州XX中学高一学生，聪明漂亮而又深沉。父亲原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老战士。红玲——女，广州X中学高二学生，活泼，感情丰富。父亲是杂志社编辑。

海风——女，广州X中学高一学生，聪明漂亮,天分极高。父母欧洲留学归来,在科研机构工作。

涂明——男，广州XX中学高二学生，性情中人，高大威猛，风流倜傥。父母是演员。

克平——男，广州XX中学高三学生。学习尖子，性格内向。父母是银行职员，归国华侨。

金彩——女，海风同班同学。聪明漂亮，遇事高调。父亲是资本家。

志强——男，广州X中学初二学生。直爽要强，右手残疾。父亲是工人。

林雁——女，广州X中学初三学生。温柔文静，个子高挑，父亲是某大学校长。

阿巧——女，广州XX中学初一学生。面容娇好，为人随和。父母是工人。

一

1969年7月的某个傍晚。南渡江静静地向北流淌，椰树婆娑，胶林茂密，炎热的天气使人窒息。

一排茅屋外，海南生产建设兵团H师D团13连的知青们在三三两两的吃饭。蒋兰来到常新的屋前，两个人边吃边说笑。他们在文革中就好上了，下乡近一年来碍于兵团不准谈恋爱的纪律，只能在这个时候短暂的见一面，以免惹来麻烦。有几个女生走来和常新说话，蒋兰就进他的屋里，翻看他带的一大摞书。有本书里夹着封信，她抽出一看，是肖林写来的。肖林父亲四年前在一次核试验中牺牲。1968年初，部队派人接肖林入伍，他当了一名高射炮手，随军进入越南，转战在海防、宋化。半年前，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他们连击落美国飞机四架，而自己有58名战士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肖林负伤被送到广州陆军总医院治疗，他因为作战英勇已提升为排长。蒋兰看着信，对常新和肖林之间那种男子汉的情谊微微有些妒忌，突然信中的一行字使她心惊肉跳："……如果不是有赫鲁晓蚰茄　囊靶模　陕鹨　炎约盒唇　痴履兀俊　　苯　即ｅ判糯掖依肟　?br>　　第二天，一封检举信交到了团政治处，"解放军第XX军排长肖林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攻击九大的新党章"。

陆军总医院里，肖林拖着尚未痊愈的伤腿，在护士莹莹的搀扶下散步。美丽的莹莹心中，对勇士的景仰已变为热烈爱恋。一辆北京吉普快速驰来，停下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扯去肖林的领章帽徽，把手铐卡在他手上，在莹莹惊愕的眼光中，带走了肖林。军队劳改场的办公室里，一个干部向肖林宣布："你恶毒攻击林副主席，被判处有期徒刑７年。"临走，那个干部叹了口气"如果不是你父亲在核试验中的特殊贡献，这回要判你死刑。"肖林的母亲受牵连，被开除公职，遣送回湖南老家监督劳动。常新因肖林的事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莹莹拨通了在军区保卫部当部长的父亲的电话，哭着叫喊"你给我讲清楚是谁害他！"一纸命令下来，蒋兰离开连队调到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她参加工作组落实林副主席"三年内实现橡胶自给"的指示，四处监督砍烧原始森林种植橡胶树。一个多月后，新近入党的蒋兰来到常新住处，满面春风，常新只说了一个字："滚！"

二

又一年后的11月，常新第一次探家。轮船离开秀英港航行在琼州海峡，他趴在栏杆上遥望一点点没入大海的夕阳，运霞陪伴着他。常新和蒋兰"叮煲（广东话：恋人分手）"后，失恋加遭背叛的双重痛苦使他消沉。早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是党员的常新不乏女性爱慕者，运霞来到他身边。运霞的温柔和美丽抚平了常新的心灵创伤，他渐渐振作起来。常新带着一群男生在南渡江的支流上修起小水电站，连队告别黑暗，用上了电灯。水电站的设计人是克平。

和不事修饰的蒋兰不同，运霞很善于装扮自己。此刻她穿着一件合身的粉色"的确良"衬衣，丰满的胸脯高高

挺起，秀丽的脸庞在夕阳下特别动人，余辉的透射使她的“的确良”衬衣变得半透明，少女诱人的胴体轮廓清晰可见，看得常新不能自持，将她拥入怀中。

在湛江上岸后，他们临时改变主意，先到桂林游玩，再回广州。这对热恋情人不意中被红玲的弟弟看到，他告诉姐姐：运霞在和常新谈恋爱，两人“兴过辣该”（广东话：兴——热，辣该——烙铁，意思是比烙铁还热）。

一天，红玲走了十多里山路，来到13连找海风玩，讲到了运霞和常新，她们和运霞都是特别要好的姐妹。海风逗趣红玲“你和涂明怎么样了？”红玲和涂明原来都是13连的知青，来到海南不够半年就偷偷谈恋爱，两人好得如漆似胶。海风曾问红玲，“你喜欢他什么？”红玲说“他靓仔，高大威猛，又很多情”。后来他们的恋情被领导知道，处罚他们调到边远山上的14连。在那里红玲和涂明更加旁若无人，两个人就住在隔壁，随时可以见面，却几乎每日书信来往，红玲是走路也要怀揣着涂明的情书，真谓旷古未闻。海风笑话红玲说：你还说运霞和常新“兴过辣该”，我看你们是“兴过炼钢炉”。海风提起一件事，前些天一个老工人家生了孩子，知青们赶去祝贺，涂明怪声怪气的说道：“这孩子将来是要生病的。”搞得老工人满脸晦气。海风要红玲讲讲他，注意一下说话分寸。红玲说“他就是这么个人！那天走独木桥，他还说我掉下去才好呢。”天色渐黑，红玲告别海风，远处一道电筒光晃来晃去，是涂明下山来接她了。

三

天色蒙蒙发青，克平望着窗口对面黑糊糊的山，那儿有一片胶林，胶林里一点荧火时而停顿时而快速穿行，满山的游动着，克平的目光紧随着它。这荧火在他的心里是一团越烧越亮的圣火，那就是海风。

海风是连里第一批被选去割胶的知青，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荣幸。比起开荒、挖树坑、修环山珩来，割胶算是个轻活，但是割胶又是个技术活，要心细手巧的人才能胜任。海风管的胶林差不多三十亩地，正好对着克平的屋子，那里有胶树五百棵，每天要割的有三百来棵。她从半夜二点开始直割到早晨七点，平均每分钟要割一棵树，她每割完一棵就要赶紧跑到下一棵再割。这时远远看去，她头上的胶灯就成了一个很快移动的亮点。

克平喜欢海风，首先当然是为她的漂亮。说来也巧，不仅全团公认的四个美女海风、运霞、金彩、阿巧都在13连，而且连里的其他好多女生像林雁、红玲还有蒋兰什么的，都长得好模好样，真是“南渡江畔美人多”，别的连队的男知青们也常常跑过来瞄几眼。

使克平更为动心的，是海风的聪明。单调无聊的日子里，克平喜欢把过去学过的东西翻出来，和周围的人切磋一下，活动活动脑筋。他发现，只要是海风学过的知识，就没有什么能难倒她的。他特别注意到，海风的平面几何极为出色，而平面几何可以说是考验天分的学问，中学的数学成绩往往会因为平面几何的得分形成很大的差距。克

平经常会出一些刁钻的几何题来考大家，海风从不像别人那样逐步求证，而是一下子直接写出一两个关键步骤，就狡猾地笑一笑，这时克平知道又难不住她了。好在克平到底是多读了两年书，还有些东西能拿出来压一压海风。海风倒无所谓，不懂的就让克平讲解，久而久之就成了克平每天给海风上课。克平是其乐融融，海风则白拣一个老师。

在早晨的席席凉风中，海风挑着胶桶下山了，她来到克平的门前，放下担子，脱下雨靴，拍掉两只脚上沾着的几条山蚂蟥，把血迹斑斑的靴子倒了倒放下，赤着脚走进了克平的屋子，在桌子边坐下，克平把一碗绿豆汤推给她，海风接过时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克平赶快把手移开。海风喝完绿豆汤，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克平坐在旁边，呆呆的看着她漂亮的脸，海风的发香和少女的青春气息使克平热血涌动，但是他不敢越雷池半步。

克平的门口热闹起来，割胶的人都陆续回来了，他赶快站起来，迎出门去。

四

克平的屋子和其他知青不在一起，他有一个单独的房子，里面摆了很多试管烧杯还有烙铁和万能电表之类的工具，在本团的知青中绝无仅有。他有这么一个小天地，还得从秦教授说起。

秦教授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她的父亲在那里有很大的一片橡胶园，她从小在胶林中长大，熟悉胶橡种植和加工的一切工艺，她又到过英美深造。1958年她25岁的时候，怀着对祖先土地的向往和热爱，在父亲支持下和丈夫一起回国，来到海南热带植物研究院。文革中，曾为中国的橡胶事业立下功劳的秦老师和丈夫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南渡江边劳动改造。当时D团的团长是个军人，1947年东北入伍的兵，耿直、没有坏心眼。他对秦教授夫妇关照有加，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可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在一次会议上，贯彻兵团的指示要大幅度提高橡胶产量，有人提出割胶的次数要增加，团长大力支持。被团长叫去旁听会议的秦老师立即反对，说那样会造成胶树损伤，寿命减短。团长大怒，连开几次批判会来斗秦老师。谁知看上去瘦小的她居然在批判会上昂首挺胸，决不认错，还大声说“你们要对历史负责”。1970年6月的一场大台风使得很多被滥割的胶树断倒，损失惨重。团长幡然猛醒，秦老师成了上宾，她提出要重新搞科研工作，团长连连应允。

秦老师把13连作为她的基地，搞一些科学实验，她看中了克平和海风，选他们做自己的助手。连里为了秦老师工作方便，给她两间单独的房子，秦老师平时住在团部，两间房子中的一间就给克平住了。

克平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很有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他在建小电站时自己动手把电动机改造成了发电机，还

用木排的浮力控制进水口的大小，使得电站在河水涨落不定时发出的电压相当稳定还不用人看管。现在他又在秦老师指导下，研究测定胶水含胶量的问题。胶水的质量长期都是靠人工估算，很不准，而要准确的话就要把胶水烘干，又太麻烦。克平就考虑用光透射的原理，来制造一种测胶仪。经过多次试验，几个月后，他终于使测胶仪的准确率达到75 %，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成绩了，连队每天收获的胶水都要到克平这里来测一测。

团长闻讯很高兴，对秦老师说你收了个好弟子，并叫连队把克平的事迹材料报上来，作为典型报到师里。宣传干事蒋兰提醒团长“克平的材料可能通不过”，团长不以为然的挥挥手。果然，克平的材料被师里打了回来，在信封上用铅笔画了一个问号，旁边写着“唯生产力论”。

另一个人的先进事迹被师部采用，金彩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五

阿巧趴在床上捂着脑袋偷偷的哭，同住的林雁知道她又被欺负了。阿巧走过老工人的住处时，常常有一帮小孩对着她喊“国民党、反动派”。阿巧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金彩就向领导汇报说她有意隐瞒家庭历史，还在老工人里散布，教小孩子们羞辱阿巧。阿巧被搞得恍恍惚惚，林雁生怕她想不开出事，叫来海风一起陪伴开导她。性情温和的林雁忍不住，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斥责金彩：“同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金彩和海风是同班同学，两人当年在班上都挺出名，除了两人都很漂亮以外，还因为海风学习成绩拔尖，而金彩是全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文革开始的初期，金彩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整得抬不起头，她一改过去抛头露面的做法，退到一边静静观看。政治风云的激变使她目瞪口呆，但她是个聪明人，悟出了一些道理。她觉得，社会就像是一个金字塔，下层人总被上层人压着，越往上能够容纳的人就越少，越能把别人排斥掉的人，才能占据越高的地位。

到了海南后，金彩是逢大会小会都表态要扎根海南，是个坚决的扎根派。她喊出的“死在海南埋在海南”，成为全兵团最响亮的口号。各级领导对她刮目相看，觉得是个好苗子。金彩天生爱出汗，只要活动一下就会大汗淋漓，所以每次收工她都是全身湿透，领导总是表扬她“工作卖力”。金彩从连队的先进开始，上升到团的先进，再上升到师的先进典型，一时红透。

和别的女孩子一样，金彩也寻找她的意中人，她看中了克平。克平虽然没有当上师里的典型，可是在本团还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团长也挺看重他。整团建团开始后，常新调到团部的团工委工作（蒋兰也在后面出了力），克平当了连里的团支部书记，算是个小头目。还有克平的性格文弱，金彩觉得这样的男人容易控制。看着克平一门心思的只想着海风，金彩的心里酸溜溜的。

知青下到海南，时间长了以后人心开始浮动，不少人想着早日离开这里。兵团领导感到事情难办，又开始搞扎根教育。金彩和往常一样在大会上高调宣布“我一定扎根海南一辈子！”会后，她写了一份扎根决心书，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找到克平，说是准备发动大家签名表决心，克平没有多想就签了名，金彩高高兴兴的走了。

吃晚饭的时候，克平来到海风的屋前，见海风不说话，反而用怪怪的眼神看着自己，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林雁笑着指了指连部，那里围着一堆人。克平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围看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决心响应党的号召，永远在南渡江边这块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工作一辈子、生活一辈子、扎根一辈子”，签名是金彩、克平两人。围看的人都哄笑起来，克平差点晕过去，他不敢撕掉这张大字报，也不能当众把自己的名字抠下来。

六

清晨依旧是凉风习习，克平等来了割胶回来的海风。两人刚刚坐下，只听到一阵自行车声响，随即运霞闯了进来。往时运霞如果看到他们二人相对，总要酸溜溜的笑一声，这时她却火急火燎叫道：“不好了！14连出事了！”海风知道担心了好几天的事情发生了，急忙问：“是涂明吗？”运霞说：“就是他。”几天前，红玲探家回来，在海风这里住了一晚。海风见她神情忧郁，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这次回家和父母谈了她和涂明的事，父母听说涂明的父母是演员，立即就反对。红玲给他们看了涂明写给她的一封信后，她父亲勃然大怒，说：“这个人不仅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作风下流，而且思想反动，你必须立即和他断绝关系，并向组织上揭发他，不然你永远不要回家。”海风看了涂明写给红玲的那封信，除了那些一贯的儿女情长，让人肉麻心跳的艳词外，还讲到对社会的不满，对前途的失望。在信的结尾，他写到：“让我们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吧，张开翅膀，去争取小鸟一样的自由。”海风告诉红玲，如果她把这封信交给领导，涂明的下场是可以预见的。第二天红玲走的时候，海风看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心里感到涂明凶多吉少。

红玲在几天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把信交到了团部，立即引起一场轰动，涂明成为阶级斗争的新靶子，团部接连开会，布置批斗会。运霞这段时间借调到师部宣传队，昨晚回来连队看看，路过团部探望常新时，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她要常新帮帮涂明，常新也无能为力，她只好连连跺脚。

涂明的批判会是在团部召开的，全团数千职工家属和知青都来了，两名武装连的战士押着他进入会场。开始的时候，涂明并不在意，在口号声中还是嬉皮笑脸的，可是当团长拿出他写给红玲的那封信时，他楞住了，一米八几的汉子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在会场的后排，红玲咬着牙，把指甲深深的抠进海风臂膀的肉里。她追悔莫及。

以后，涂明再也没有了那种嬉笑怒骂的调侃，很少跟人说话，总是呆呆的望着天空，似乎那里有谁在召唤。海

风和运霞找过他几次，转达红玲的悔恨，涂明什么话也不说。

南渡江里却常常可以看到涂明逆流而上的身影，他一游就是几个钟头。

几个月后，涂明偷偷把行李打包运走，一去不回头。在某个地方的海岸，涂明奋力扑入大海，被落潮带到远方的海里，靠着一个篮球胆的浮力，近十个钟头后，又被涨潮推到了一个泥滩上。带着浑身被海蛎子划破的伤痕，涂明站立在了香港的土地上。

七

在克平的屋子里，一伙知青有说有笑的，林雁把一锅番薯糖水分到大家的碗里，她煮东西吃的本事近来见长。志强在门口探了探头，想进来又不敢。

志强在连队里是不受欢迎的人。志强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以特别左出名的，他的右手有残疾本来是可以不上山下乡的，但是他连写几份决心书，争取来到了海南建设兵团。到海南没几有天，他就把女知青们给得罪了，他在连部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作风”，批评有一些女知青洗澡一定要用热水。后来老工人告诉他，那是因为女孩子的特殊时期不能用冷水，把他弄了个大红脸。有些人出工晚点收工早点，他就说人家是好吃懒做，一点点小事就上纲上线。最糟糕的是他喜欢打小报告，群众里议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快通过他的嘴告诉了领导，大家都觉得他是领导盯着自己后背的一双眼睛。只要他一来，什么热闹的场面也就会冷下来。但是和金彩在领导那里很能吃得开不同，志强在领导的眼里并不讨好。他见到领导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是不分场合的顶撞。他那种梗直不通人情的脾气，领导也是看不上眼的。大家在背后叫志强“神台猫屎”（人憎鬼厌），知青们都躲着避着他，他游离于人群之外，成了个孤家寡人，对此，志强挺苦闷。

阿巧的父亲原来是个干部，在“四清”中查出他曾在解放前担任过国民党的什么职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清除出干部队伍，当了一个工人。阿巧的心里自此蒙上阴影，班主任对她冷眼相待，同学们疏远她，在文革中更不用说，总是被人指指点点。她见到人多的地方就低头绕道走开，后来她想跟大家出去串联，也没人愿意和她一起走。她变的非常的孤独，在她娇好的面容下面是一颗冰冷的心。到了海南后，她的处境开始好些了，运霞、海风、林雁还有很多知青都把阿巧当作妹妹，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阿巧被人欺负，也有人帮她出头。阿巧渐渐开朗了，也能和姐妹们说说知心话，脸上经常挂着好看的笑容。她知道被孤立的痛苦和凄凉，对志强的处境动了恻隐之心，看到志强在门外咽口水，就招呼他进来坐，林雁也没有多说什么，给志强装了一碗糖水。

日后，阿巧和志强接触的次数就多了起来，志强也感到自己唱的那些高调太不实际，生活中过的日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呆板的脸上出现了平常人的微笑，和大家的相处也就慢慢好了。阿巧经常帮助志强干些洗衣服之类的

事，不久两人就出双入对。在傍晚的时候，阿巧还挽着志强的胳膊，在河边或散步，或坐着聊天，有如广州珠江边上那些“扪草”的男女们（广东话，扪——拔；男女青年在草地上谈恋爱，常常是边谈边拔草，所以把谈恋爱也叫“扪草”），一时间使很多知青羡慕不已。海风对志强笑道：你可是“冷手拣了个热煎堆”（指运气不好的人突然中了大彩）。

在一次火灾中，阿巧不幸被烧成重伤，脸被烧的很厉害，志强在她治疗期间一直陪着她，护送她回家。后来他帮阿巧办了伤病回城手续，自己也以残疾人的身份回到广州，两人在郊区的一家五金工厂当了工人，几年后他们结了婚。

八

年的元旦刚过，通讯员送了一封密件到团政治处，蒋兰拆开一看里面一张是兵团政治部的命令，免去常新原职务，调省委组织部安排工作；另一张是通知，要常新在指定日期到“广州军区外语集训大队”报到。蒋兰看完眼睛一亮，她的哥哥就曾在那里工作过，这个外语集训大队并不属于军区管理，而是直接听命于最高领导层，担负着支援世界革命的任务，对人员的审查极为严格。蒋兰一直想把常新从运霞那里抢回来，觉得这次是个机会了。

常新的父亲回广州的机关汇报工作，组织部交给他一封“海南生产建设兵团H师D团政治处”来的信。他抽出一看，里面写着“鉴于运霞的父亲德山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常新同志与她保持恋爱关系是不合适的”。他知道儿子在谈恋爱，但是他不知道儿子的对象运霞竟然是德山的女儿。他的思绪被拉回过去的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在和日军作战中受过一次严重损失，从敌人内部得到的情报显示队伍里有人通敌，常新父亲作为东纵情报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对此事调查过多次。排查中，德山就是被怀疑的一个，限于战争环境，此事难以查清，德山等人就落了个“通敌嫌疑”的结论。在重庆谈判后东江纵队北撤山东时，德山他们就被复员回家了。常新父亲回到家里，常新母亲告诉他运霞正在广州探亲，她明天来取家里带给常新的东西。常新父亲决定亲自和她谈谈。

第二天，运霞来到常新家，接待她的是常新父亲。这是运霞第一次见到他，过去常新很少跟她谈及父亲，只知道他是在香港的中方机构工作。常新父亲和蔼地看着她，问了一些家里的情况，运霞说到父亲是宝安人时，常新父亲感慨地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生活，运霞静静地听着，只当是故事，可是当松岗、谢岗、大岭山这些父亲曾多次讲过的地名从常新父亲的口中一个个讲出时，她开始感到一种不祥的东西，她知道父亲有一段历史是不明不白的。常新父亲看着眼前的这个姑娘，心里也是隐隐作痛，以他的阅历，他一下子就认定了运霞是常新在生活和事业上最好的伴侣，特别是在运霞身上可看到过去常常孤身战斗在香港九龙、令敌人胆寒的侦察员德山的那种精明和干练。姑娘是那么的美好，常新父亲越发感到谈话的艰难，他斟字酌句，尽量委婉地讲述着当年发生的事件和对德山命运的安排，最后他很吃力的说道：“由于常新现在要去从事的工作，你们不好再恋爱了。”他等待着运霞的反应，准备她

大哭、大闹甚至是大骂，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运霞眼里满含泪水，却是非常懂事地说：“伯伯你放心，我不会影响常新的前途的。”常新父亲转过脸，他是一个肩负着国家秘密使命的人，隐姓埋名的工作了一辈子，早已是铁石心肠，但今天的运霞仍然使他动容，他对运霞说：“委屈了你，委屈了常新，”停顿了一会儿，他低声的说“也委屈了德山同志。”他没有说的是还有人也被委屈过，当年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放弃了相爱多年的恋人，那姑娘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至今使他不堪回首。

送走了运霞后，常新父亲要通了一个老战友的电话。十天以后，运霞招工的通知下到了海南。

轮船航行在琼州海峡，晚霞犹如当年那般绚丽，甲板上常新把运霞拥在怀里，三年多来，运霞给了他多少快乐和温暖，现在依旧是那么温柔顺从。今天，他们终于离开了海南，明天……明天他不敢设想，尽管他们相距并不遥远，但有情人终不能成为眷属，相见也是痛苦。

九

转眼已是1974年10月，这是知青们下到海南的第六个年头，兵团编制一年前撤消,D团恢复了文革前的名字——南江农场。

傍晚，胶林里走动着海风的身影。她轻轻的抚摸着自己割过的每一棵胶树，仔细查看割胶时留下的刀痕，那是她在它们身上造出的伤口，橡胶树从它的伤口为人类奉献出乳白色血液。海风在心里悄悄地向胶树道歉，同时作着告别。

克平站在窗前呆望着对面的胶林，他盼望着门口响起海风那熟悉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已经很有些日子没有响起了。克平和海风，在旁人看来是一对恋人，可是克平自己心里明白，他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是纱还是雾，他说不清楚。

三个多月前，团支部的一次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海风入团的事情。几年来，海风的入团讨论过好几次了，三个支部委员克平、林雁、金彩每次都要发生争执。前些年，金彩总是说海风不安心扎根海南，不能入团，现在扎根的口号不怎么吃香了，她又提到海风思想复杂。林雁和金彩争吵起来，克平心里却拿不定主意。确实，克平并不是真正的能了解海风。海风是在出生几个月的时候父母带着她回国的，迎着南海的热风，父亲满怀着对祖国的向往，给女儿起了“海风”这个名字。父亲虽然是一个技术人员但在管理上也很有研究，常常给海风讲一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有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人以“泰勒制”为例，说资本主义如何残酷剥削工人。海风在会后和大家私下的议论中就说“泰勒制”不过是提高生产率的一种劳动组织方法，也有科学之处。现在金彩把这件事拿出来，说海风“骨子里有右派思想”。林雁在和金彩争得面红耳赤时，转过来把目光投向克平，克平的心

里一阵发虚。克平很希望这次海风入团的事能解决了，因为过几天就是海风的25岁生日。但是，金彩抓住的问题也是很要害的，如果自己站在林雁一边，可能会被金彩说是徇私情，犹犹豫豫之间，他终于投了弃权票，金彩又一次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当林雁把团支部的讨论结果通知海风的时候，海风紧咬着牙齿，眼睛红红的，但是没有流泪。她去意已定。

一个月前衡阳工程学校来到南江农场招生，第13生产队有一个名额。农场采用了由生产队群众投票的方法来推荐。结果海风的得票数最高，遥遥领先于其他人，而金彩则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票。这一下原来以为很有把握的金彩坐不住了，她到处找人诉说不满，一直找到场长，哭闹着说“为什么就不能招我们这些坚决扎根的”。场长当年曾下放13生产队，对海风和金彩都很了解，他安慰了金彩几句，把她打发回了生产队。发榜的时候，海风的名字写在榜上，而金彩没有。金彩又上上下下的闹了一阵，终于不能像以前军代表在的时候那样为所欲为，最后挺没趣的收了场。

天色黑了下来，克平一直等不到海风来。在很晚的时候，克平总算下决心去找海风，明天她就要走了，有些话不说也许会成为终身的遗憾。他摸黑来到海风的屋前，轻轻的拍打门板，里面亮起了电筒光，开门的是林雁，她说：“你怎么不早点来，海风今晚住到场部的秦教授那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克平匆匆的赶到场部，秦教授告诉他，海风已经乘农场的汽车走了。面对着海风的不辞而别，克平感到一阵绝望，几年来他多少次憧憬的幸福化为泡影，克平的眼睛里终于流下了痛苦的眼泪。看着呆呆站着的克平，秦教授心痛地走过去扶住他，轻声对他说：“你真的是不懂，女人是很需要男人为自己挡挡风雨的。”热风，刮过红卫号轮船的甲板，吹得海风的头发飘散开来。她没有去和同行的人们说笑，也没有应海员们的邀请去打乒乓球，只是扶着栏杆，静静地望着大海，她是一个从海上飘来的女孩。六年前，她在广州太古仓码头登上轮船，来到海南；六年来，她把一个女孩子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海南。一个初绽的花蕾已经长成了一朵盛开的鲜花……

十、大结局

到1976年底，南江农场的知青们都陆续回到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林雁1975年回城，在大学工厂工作，1976年出差时在唐山地震中遇难，同学好友们都会在每年的清明时节祭奠她。

涂明在香港从住鸽子笼帮人打工组装电子表开始，有所积累，后在八十年代回大陆闯世界，做了一段时间的水货买卖，逐渐发达，他在东莞有一间电子厂和一家海鲜酒楼，身边美女不断。他从不提及自己的婚姻。

红玲在1995年因病去世，终身未嫁。涂明曾悄悄的坐在她的坟前，把藏在家里的当年红玲给他的情信一片片的烧掉，仰天长叹：“冤家生死两难见，情书烧来当纸钱”。

海风进工程学校两年后毕业，在一个工程队工作，走遍三湘大地，嫁给了一个救了她命的复员军人。海风后来下海经商，她在几何方面的天赋被运用到商场上，她对商机的敏感使她的事业蒸蒸日上，现在成了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在白云山下的一个湖光山色之地买了一栋别墅。

常新对蒋兰一直不屑一顾，后来和一个女同事结婚，八十年代中期他们脱离了单位去香港，在常新父亲及其朋友们的帮助下，从事房地产，在炒楼花中收入极丰，香港美国都有他的事业，有段时间经常请大家吃饭、游玩，“大把的钞票洒洒”。运霞和他匆匆见过二次。他太太在93年随移民潮去了加拿大，两人关系渐淡，最后分手。

运霞和父亲同事的儿子结婚。运霞仕途顺利，她的精明干练使她在官场上多次逢凶化吉，一路提拔，当到了厅级干部。但是她的婚姻生活却枯燥无味，她几度想离婚，却在每次下决心时都遇到职务提升，只好作罢。

金彩在回城后换了好几个单位，终于在一个国营大公司平步青云，当上了办公室主任，经常开着奔驰车到处跑，精心的打扮使她仍然光彩照人，盖过公司那些年轻的女秘书们。

蒋兰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在深圳倒卖进口批文，很快暴富，虽然手腕上的劳力士纯金表闪闪发光，人却照旧不会打扮，涂脂抹粉的显得俗气。后来卷入一宗大案逃往国外，据说现在一个岛国居住。

克平回城后先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研究所工作，现在是总工程师。他直到近四十岁才和一位大学女教师结婚。

志强和阿巧所在的五金工厂在前些年倒闭，厂长卷了所有资金逃跑。阿巧就每天包粽子和做大饼，志强上街去卖，生意倒也不错，每月有一千来块钱收入，日子虽不富裕，但是夫妻每日和睦相对，也很令人羡慕。

肖林的事情在73年就平反了，他后来和莹莹结婚，一直留在军队，现在是大校军官，他希望能升到将军。

在下乡三十周年暨农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应农场邀请，运霞、海风、克平、志强等当年南江农场的知青，以空前的规模结伴回访。芸芸众生里，不见了几个当年的知名人物，蒋兰是不可能回来了，涂明难以面对伤心地，林雁和红玲已经不在人间，金彩是悄悄的先来了又先走，阿巧因为悲于自己的容貌不想露面，常新莫名地无影无踪，倒是肖林随着大家踏上南渡江畔这块与自己的命运纠葛不清而又从未谋面的土地。

前些年橡胶在国际市场走俏，农场赚了钱，场部修的比较漂亮，招待所什么的都像样了，卫星电视也安上了。知青们在场部转了一圈，向当年各自的生产队走去。海风等一行人回到13生产队，看到生产队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只是更破了。一些相识的老工人出来迎接，谈话间知道很多老工人都去世了，一时大家感慨人生苦短。克平当年修的水电站已经没有了，剩下几个水泥墩子作为遗迹。肖林特意看了常新住的地方，他当年给常新的信就是在这里被蒋兰发现的。知青们留了一些物品给老工人，就去参加农场组织的欢迎大会了。大会的气氛热烈浓重，举杯传盏间似乎那时的豪情又再迸发，高歌不断。克平的摄象机镜头几乎一直对着海风。

半年后，运霞到深圳公干，与肖林相遇，肖林告诉她常新现在就在深圳，他的生意近来一段时间损失惨重，公司接近倒闭，他经常酗酒，不成人样。运霞问清了常新的住址，坐的士前去。她按动门铃许久，门才打开，常新望着门口的运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运霞看着眼前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他，活脱就是当年失恋时的那个常新，她忘情地扑上去搂住他，不断地亲他，尽情地闻着他身上的汗水味。常新的脸上慢慢的泛起了血色，紧抱着运霞的双手颤抖地在她的背上不停搓揉，他感到自己又活过来了。运霞拿出手机，打电话告诉秘书今晚在亲戚家过夜，随即将手机电源关掉。常新已是个自由人，她有可能向前迈出最后的一步，但她的地位使她难以逾越鸿沟。这一夜真短，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告别了。运霞恳求常新留下来，她现在有能力帮助他，而常新却走过罗湖桥，搭上美国大陆航空的班机飞向纽约，那里有他公司最后的一小块地盘。

在今年五月的一次聚会散去后，运霞、海风和克平结伴走上白云山。

晚霞中，运霞和海风凭栏相对，两人的剪影依然动人，远处的克平举起相机，把镜头拉近，对焦，按下快门。运霞问海风：“你现在最想的是什么？”海风说：“我最想留些时间给自己。”运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你说在我们身上，什么东西对自己的命运影响最大？”海风不假思索地答到：“是性格。”

（2003-06-20 于广州）

大石头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台风轶事

今天回到家，看看时间又是晚上九点了，搞技术的就是这样，上下班没什么准头。其实晚餐在单位已经吃过，看到母亲给我留着玉米粥，为讨她高兴，又喝了一大碗。

上网算是自己的世界。到处胡乱逛一圈，看看朋友们的评论，又要写回复，不觉就十点了。思绪仍在旋转，是被昨天的“灿都”给吹的，工作停下手，它就转出来了。阿灵说台风拐弯石头不见了，还真是这么回事，我非常正确地选择了向东，由珠海返回广州，而台风奔西去了！台风能吹走谁呢？石头估计是吹不走，清平肯定是要吹走，板筋也难保不被吹走，林子和老例不用说了，电风扇都能吹起来，Deer大概被吹离地然后又掉下来。。。房子，房子能被吹走吗？记忆中似乎有些东西与台风和房子相连，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究竟什么是记忆的索引呢？脑子里飞快地过着电影，渐渐想了起来，肯定和高速公路有关！对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路牌，昨天不知怎么的，有一个路牌特别吸引我，那上面有“港口”二个字，就是它了！

遥远的往事呀，四十三年了。那是1967年7月初，文革正在使社会走向混乱，武斗频频，但是还没开枪开炮。我和有避世想法的几十个同学，想到了下乡去，地点就选在中山县港口公社群众大队。我们是坐花尾渡船去的港口，花尾渡本身没有动力，要有拖船来拖。在大沙头开船后，刚开始拖船是和花尾渡紧靠在一起，拖着它走，这样在繁忙的城市水道里机动性强，不容易撞船，开出主水道后，拖船就改为用一根绳索拖着花尾渡的头走，这样拖船省力力些，而且占用的河道宽度小，可以在较窄的水道里行进。广东话里形容男女谈恋爱的“拍拖”一词，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两条船靠在一起，称为“泊”（广东话读“拍”），泊在一起，拖着走，就是“拍拖”，很是形象。

一夜行船，第二天早上到了中山县石歧镇。珠江三角洲的城镇比内地要繁华许多，内地很多县城也就是一、二条街道，而这里却是洋楼毗邻，人头涌涌、熙熙攘攘。而且听当地人说文革前石岐是有霓虹灯的，这在国内除了上海广州，就很少见了。很多偷渡香港的人，在黑夜中看到远处有霓虹灯，以为那就是香港，拼命跑过去，在石岐镇

前面的河对岸，把衣服包裹一扔，疯狂的跳下河，游过来，上岸后大喊“我到香港喽！自由喽！”于是，在旁边等候着的民兵们把他们一一捉个正着。我们下船后，就看到一群被民兵用枪押着的灰头土脸的男女，男的都只穿一条裤衩，女的上身裹着一块布，下身也是只穿裤衩，个个绑得像大虾一样，这些都是偷渡者。

我们在石岐换乘汽车，到了群众大队，大队长带我们去住的地方，那里是块空地，什么也没有，就见一伙农民在用竹子搭架子，临时给我们建房子。粗的竹子搭成房子的框架和房顶的金字架，细竹子一条条的横着绑在粗竹子上。房顶铺的是稻草。墙呢？用稻草沾上泥浆，在细竹子上搭满，干了就是墙。在地上铺上床板，就安顿下来了。后来在村子里转了转，发现农民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么起的。

我们到后干的活是割稻子。这里不象以前我们农忙去过的那些地方，一块地只有几亩、十几亩，这里的地一望无边，一块地少说也有上百亩，我们割了半天也看不到自己有多少劳动成果，这对我们是很严重的打击。还有地太远了，农民们听不到广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工，村里就树了一根很高的竿子，用升降旗的办法来通知休息、吃饭、收工。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时不时的回头看旗杆，盼望着红旗早点升起来，还把语录歌改了一下：“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红旗。。。”

收工后，农民把打好的稻谷用箩筐装住，抬到小船上。这里是水网地带，出行多数靠船，农民们不分男女，也都会划船。这时河道里热闹起来，男女农民们互相打情骂俏，唱歌取乐。我坐在船头，背对船行的方向，在我面前一个的年轻女子手撑着双桨划船。那时农村的妇女们都不兴带胸罩，那女子划船时随着她二只手臂的挥舞和身体的俯仰，胸口二座小山也扑腾扑腾的猛烈晃动，看得我眼红心跳。那些妇女们还问我们会不会咸水歌，我们直摇头，于是被她们嘲笑一番。后来我学会了广东有名的一首咸水歌，上段是：“一姐不如二姐娇，三寸金莲四寸腰，买得五六七般粉，扮成八九十分俏。”下段是：“十九月夜八分光，七姐牵衣等六郎，五更四处敲三点，二人同睡一张床。”

在那里因为离香港近，很容易收到香港电台，广播的内容使我们挺感兴趣，我记得很喜欢听广告，“炼奶、炼奶，寿星公炼奶”。还有就是新闻里不少提法和我们在国内电台听到的不一样，比如以前埃及我们这边叫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香港的电台叫做“阿拉伯联邦共和国”。后来听到港台广播关于国内文革的事情，他们那边把造反派叫做“毛派”，把我们保守派叫做“反毛派”，引得我们大怒。

中山的地盘是在珠江口，是台风经常造访的地方，防风是日常性的事情。我们到后不久，就遇到了台风警报。农民教我们用镰刀将稻草糊成的墙四面都割出一个个的大洞，这样台风来得时候就不会把整个房子吹倒了，而墙用稻草加泥浆，很快就可以修复。记得那次台风也很猛，比我们在广州感受到的猛多了，大家一夜没睡，穿着雨衣，靠在一起抵抗台风。第二天，看到加固的房顶吹掉了一些，房子的墙却没有什么破坏，房子的框架也没事，一天就修复了。这种割墙开洞法是当地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保护自己免受台风祸害常用的办法。在平时天热的时候，也

可以任意开多几个窗口，使得屋内凉快，到天冷的时候，又拿稻草给糊上，避免风吹入，是一种创造啊，非常省钱。

几十年过去，早已是今非昔比，沧海桑田，稻草房早已不见了，不是这次台风的吹动，我也想不起来了。真想再到那里去走走，看看那些农民，那个划船的女子至少也应该是奶奶或外婆一级的人物了吧。

写在台风“灿都”刮过之后

2010-07-23

来自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ae19d0100jzb2.html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大学散记之一：苏丝院“生平”

苏州丝绸工学院始建于1903年，前身是“上海私立女子蚕业学堂”，1912年迁校址于苏州浒（此处读xu）墅关，改为公立“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解放后更名为“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1960年蚕桑和丝绸分家，原蚕桑部分属农业部留在浒墅关改称苏州蚕桑专科学校，丝绸部分直属纺织工业部部迁至苏州相门外升格为“苏州丝绸工学院”，为我国第一所丝绸高等学府。蚕专的校长和丝院的院长都是我国早年留学东洋的老一代著名蚕丝教育家郑辟疆，他夫人费达生（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姐姐，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就是在费达生辅导的开弦弓丝厂做的社会调查报告）任丝院常务副院长。我进校的1978年学院只是一所仅有丝绸、染化、美术、机电四个系七个专业，不足千名在校生的袖珍大学。到1997年并入苏州大学之前，已经是拥有五个系十几个专业，三千多名在校生的中等规模的大学了。合并后的丝绸工学院一度叫“苏州大学丝绸学院”，后又改称“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我想大概是为了回避这个已经十分不景气的行业名声吧？

大学散记之二： 苏州情结

大学生活是我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人杰地灵的苏州带给我的决不仅仅是当好一个染匠所需的技术，江南人机敏活跃、精巧开阔的思维方式让人由衷地佩服“江南才子”名不虚传。学习之余，我几乎走遍了苏州城乡的每一条水巷、每一个村镇、每一处文化遗址，在学校有“苏州通”的美誉。我十分留恋苏州的粉墙小瓦、水巷小桥、园林名胜、天平红枫、甪直古镇、十里山塘、石湖串月、太湖东西山、光福香雪海……还有那苏州糕团、枇杷杨梅、洞庭红桔、阳澄湖大闸蟹和窈条小巧的苏州美女以及听起来象小夜曲一般的吴侬软语。我不大听得懂吴语，可还是喜欢抽空到苏州书场去欣赏那如泣如诉的苏州评弹和清心悦耳的江南丝竹，享受一种遥远古老的姑苏文化韵味。离开苏州之际，我失魂落魄、伤伤心心地痛哭了一场，其后虽然辗转大江南北，四处为家，可从此再没有真正喜欢过哪个地方——包括她的姊妹城市、那西子湖畔的杭州，我也只生活了不到一年就离她而去。

大学散记之三：业余爱好

在大学里，我最投入和最愉快的事情是每年的全院运动会、文艺汇演以及我参与筹办的摄影组等非“专业”工作。为了看一场科教电影，我甚至会装病请假不上课，然后翻跳出学校院墙，到几公里之外观前街人民商场旁的那

个小礼堂中，去欣赏那课本外的科技世界（当时那里常年放映科教片）。有一个冬季的下午，因第一节课十分重要，我只好坚持听完，下了课就赶快“病”了，说回寝室休息。然后是翻墙跳院一路狂奔，等跑到小礼堂，已是浑身大汗淋淋，棉衣毛衣都脱了只穿衬衫坐在那里看电影——结果我倒成了大家观看的对象。对了，我还十分迷恋晚上跑到相门外的运河里去偷偷地“借”人家一条停靠在岸边的水泥船，悄悄地推进河里过过摇橹的瘾。这些无人看守的空船多数是装运大粪的运输船，船主肯定不会想到会有人青睐这种“臭船”，所以“借”起来也很方便，当然过完瘾之后两手臭不可闻，要反复洗几遍才能安心去睡觉。苏州的橹很有特色，摇起来身子跟着一摇一摆地，有一种音乐和舞蹈美的感受；当然也很有技术性，摇的轻了重了都可能把橹摇掉下来，一把大橹重达四、五十斤，一旦掉下来，又长又重的大橹可真够你搬的，万一掉到了水里，那就更是要命。虽然这种“借”无需主人同意，但我绝大多数时间都还是自觉原路送还的。只有一次是例外，我在相门运河的小叉河里与人家的船相会，心中慌乱手忙脚乱地与对方的船撞到了一起，人家大声用苏州话喝斥，我不敢回话，跳上岸去落荒而逃。船当然也没有去“还”了。

大学散记之四：文化宫灯谜印象

上大学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苏州工人文化宫里都要举办灯谜有奖竞猜。我如果不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基本上是每周不缺地准时到场。从丝绸工学院到文化宫的路程很远，首先要从相门桥步行到干将路，然后乘2路车到饮马桥再转1路车到文化宫下来。除了节日的大型灯谜会之外，一般情况的周末灯谜都在进门左手边的那幢小楼的二楼门厅里进行。苏州的灯谜文人很多，我记得其中以费之雄的灯谜出的最为精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好象他还出过不少灯谜和对联的书籍。由于常去，连主办者都认识我了。只是我的猜谜水平有限，仅限于在拆字、隐含、离合类的字谜上略有技巧。记得当时有一个三十多岁带眼镜的中年人，也是每周末必到，而且几乎弹无虚发。奖品是一个小小的椭圆型书签，虽然微不足道，但拿在手上总是感觉到十分满足——尽管为了这个小书签我要付出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两角钱的车票（一块苏州酱肉的钱），可我总是乐此不疲……

大学散记之五：无心插柳

说实话，我能进入这个原来听也没听说过的丝绸大学，都是因为“服从分配”的结果，我不喜欢这种似乎只属于女性的工作。而且印染厂里又热又脏，蒸汽弥漫，污水遍地，工作环境实在没法让人恭唯，所以也很难热爱专业并提高学习积极性。至于考试，能考好当然高兴，遇到没有考好的情况我也根本不去管它，常常考完试连分数都不去过问。在校其间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没有人把我排行在“第一梯队”之列，最多算是“中等阶级”吧？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将近20年过去了，我陆续发表了40多篇专业论文，不谦虚地说，这在我所知道的校友中似乎并不多

见（当然，这也可能和许多校友同学早早离开了这个倒霉的行业有一定关系），所以今天的老师们几乎把很多当过三好学生的同学名字都已想不起了，可是仍然有很多专业和基础课老师至今与我保持着经常的通讯联系和节日问候，我也早就改变了不喜欢自己专业的看法，越干越有兴趣！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起

春节时母亲和往年一样，从上海来京小住，照例住在我这里。

母亲是1928年出生的。从外表看她很年轻，两年前有一次犯心脏病在医院抢救，护士一边给她插氧气管儿一边安慰她说：您没事儿！比您年纪大的，5、60岁的人都没事儿……

母亲一直很要强，据她自己说是上高中时一个人来到北京读贝满，虽然一直到生了三个孩子还不会划火柴，但是样样大事都拿得起放得下，条理清楚，逻辑分明。直到现在她也是总喜欢把我们兄妹三人当成她的部下，经常象当年搞饭店管理那样用电话遥控我们的起居小事。

可是今年春节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妙，她好象反应开始迟钝：点不着煤气灶和热水器；找不到她想看的电视节目；甚至于不会开合大门的门锁。她不想和老同学交往；越发的看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眼晕，半天过不去马路；偶然有些老同学老朋友和她交谈，她顾左右而言他，不知所云。我悲哀地发现一种不可逆的退行性老年病变正在向她悄然袭来。

母亲现在是一个人住在上海。她居住的地段被上海人称作“上之角”，那个角字在上海读成格。出家门五分钟就是地铁站，乘地铁不用买票，乘一站地就是徐家汇。徐家汇地铁站有十多个出口，其中好几个都通大型超市，母亲总是乘地铁去买东西，不用出地铁就提着大包小包又回来了。上海的街坊邻居对她好，单位老干部处对她好，医院的医生对她好，有新鲜的蔬菜，方便的交通和宽敞的住所。所以她舍不得离开上海，舍不得上海的人文、气候、饮食与环境，每次来京都是至多住一个月就匆匆回去，去照顾她那些花花草草。但是她在那里缺乏一种深些层次的与人交流，过于简单的日常生活使她有些茫然。

我和哥哥弟弟都觉得把母亲接来和我们——准确地说是和我——同住已经是迫在眼睛毛儿的事。

承

我这辈子住过的房子已经数不清了。最早的印象是天津住过日式的平房，纸拉门，上儿童车，车厢里塞着七、八个穿棉猴的孩子，去宁园里的幼儿园。再大些了住的是一种低矮的红砖楼，一层，那时候是只要有窗户就不走门的年纪，好在还没有开始流行把窗户外面都安上鸡笼子防贼。在外公家住过若干年，是老式的四合院，明三暗五那

种，院子里有扶疏的树木。抄家后有过无家可归的日子，睡过火车站的候车室和广场，还睡过路边儿商店卖菜的案子。我下乡的时间总共也不长，一直住在老乡家，中间是灶间，两口大铁锅下面的灶台通向两边房间的炕，夏天在我们这边做饭煮猪食，冬天在他们自己那边。后来到工厂就一直住集体宿舍，最多时一屋19人，最少时4人。无论多少人我都是睡门口，睡了八年。不光是不自觉地反射先人后己的教育，也是因为知足。

记忆中对居所的迫切向往有过一次。那是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一天独自去什么地方看电影，散场后正走到没处躲没处藏的地方下起了大雨，雷电交加象是谁把天撕了个大口子，雨水直着浇下来，我冰凉冰凉地在一个窄窄的宣传栏下站着，浇得和宣传栏一样湿。就是那时候想到应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屋顶了，还应该有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

有一张想像中的画儿总让我魂牵梦萦：大雪覆盖着的丘陵，无月的夜，只能感觉得到而看不见的路，远处林木掩映中有一间木屋，窗口透出些许微黄的光，给人以归宿感。板筋那张照片有点形似但它不是。

结婚以后在记忆中至少搬过七次家，现在住的这处是80年代初盖的公房，78平米，三室，一卫，没有厅，三室中的一间就当厅，多功能厅，客厅餐厅兼工作厅。要接妈妈来长住，总觉得稍微仄了点儿。

好多朋友都曾劝我买房，说都这把年纪了还不买套舒适的房子享受几年。这话对我没作用。我现在的位置在东南二环以里，如果拿二环当个大棋盘，正好就在金角银边，出行购物都很方便；觉得房子大了打扫不过来——其实小也打扫不过来，到处是东西，以书居多，随手看随手放随手放随手看，还不能有人帮我收拾一收拾我就想找的东西全找不到了；城市毕竟有它固有的许多功能，俗话说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乡下一幢房；还有马路对面新建了明城墙遗址公园，虽然曲径细长游人如鲫可毕竟是块绿地。所以，虽然车没个准地方停，虽然对面中学的孩子每隔45分钟就来一次乌鸦大合唱，虽然老式楼房底层没有阳台晾衣服始终很烦心，虽然窗户对面这些年开了两个餐馆数个小吃摊，招惹得一帮外地来京的游客经常半夜还拼命地吆三喝四……我一直安之若素，大隐隐于市嘛。

转

要接妈妈来住对我是一道买房的启动命令，先是在网上查，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问，后来干脆直接去看。

从近往远。其实也不是有计划地从近从远，而是一开始根本没想往远处去。

看房的序曲是离我最近的一个小区，90年代开发的。网上看他们还有尾房，均价6200元/平米，而原来他们卖到1万多呢。去了才知道是在6层，无电梯，复式，上层从1米4往上就全是斜坡。就这房子还死活不肯降价，其实就是降价我也不能要。对了看这第一处时心里还没个准谱，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但是基本的条件是三室二卫，几厅倒是无所谓，大早上起来赶着出门儿和老太太抢不起厕所。再就是必须要平层，楼层越低越好。人老了腿脚不宜爬楼梯，这是在说母亲也是在说我自己。

打这就开始了我买房的经历。

头一天在家门口有一搭无一搭地看了三处：第一处是东花市南里，我一眼看上了首层的那个户型：椭圆型外飘阳台，转角的小台阶通向室外的一小块私家花园。可是已经卖完了，问什么时候再有新楼说不知道。我白天晚上溜达过去往人家家里偷窥了两次，着实羡慕得紧。第二处是两栋两广大街边上的板楼，户型朝向都很好但是不能要，紧邻交通要道可以尽情享受噪音，无异于才出狼窝又入虎穴。第三处是幸福大街，虽然没有私家绿地但是从砂盘上看楼群中有一座上万平米的大园林很诱人。然而只剩下东西朝向的，应了老年间的那句话：有钱不住东南房。再者要等到06年才能入住，远水解不了近渴。

周边还有几处，外表看上去不错里边什么样不知道而且一问居然已经售罄！

我的同学，写《抒情年华》的那位老潘，好几年前就在琢磨买房的事了。她一直在电话里和我念叨各个楼盘，这里那里的，我一耳进一耳出全没记住，只记得她今天订明天退的拉了好几回抽屉。她关于买房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是如果你现在还有房住等你把全北京的楼盘都看一遍你最后的决定一定是不买了。

但是她久看成商掌握大量的信息。一听我说要买房就立刻推荐了好几处楼盘还表示可以陪我去看。我的办公室位置决定我只能在京城的东北方向作选择。我们看了翠堤春晓，从地图上看它简直就在未来的奥体森林公园里面，但是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很谦虚地说他们只是在东北方向，离公园北门（如果那个公园将来有北门的话）有一里多地，在现在的楼盘与公园之间还会有两期工程。户型不错，有一套复式居然使我可以放弃只要平层的理念，如果他们肯把那个样板间卖给我的话。视野也好，居高临下，八面来风，脚下是清河流过，举目皆是农田还能隐隐看见西山。唯一的障碍是交通，目前看不到什么希望能在指日可待的未来使这里有出行之便。还看了新街坊，在北苑一带，要说位置它在四环外五环里当不当正不正不尴不尬十三不靠地没什么优势可也谈不到劣势，说起来价格不贵，5000元/平米还带“精装修”。有一种三个居室和厅全都朝阳的户型很使我动心，但是那个户型里有一个卫生间的窗户与另一户人家的卫生间窗户在天井中咫尺相对，设想如果如厕或者沐浴时万一想开窗透气恰好那个人也想开窗透气，大家一定都会吓一大跳！我们还看了天通苑，99年建成的京城第一个经济适用房区域，据说现在已经居住了11万人口。房价一律为2650元/平米，无论是什么朝向什么户型，什么楼层。最早建在垃圾处理场上的东区早已人满为患，其中有几栋不起眼的小楼据称是给关系户盖的，复式，两层上下贯通的hall，设想在楼梯的顶端站着一位长衣曳地的美妇，和身旁的枝形吊灯交相辉映，款款地走下来，向着客厅中间的三角钢琴，那肯定不会是我。饮用水起初是地下水有污染之嫌，去年已经接通了市政的自来水。只是凡是好的朝向都没有好的户型了，硕果仅存的是200平米的一种，塔楼东南角，厅和两间卧室朝南，另一间卧室朝东。那个大厅53平米，可以安放两张乒乓球台子同时打比赛。对我来说它太大了。我们甚至去了燕郊的一处别墅区，从京通快速起点一路开过去28公里，潮白河的东岸。潮白河中线是北京与河北省的分线，过了河已经算是河北省廊坊市燕郊经济开发区的地盘儿。小四层，

才2000元出头儿/平米，一层送绿地二三层送地下室四层送阁楼，那绿地是50平米的一大块，站在那块地上我已经在想什么地方种丁香什么地方种石榴，背阴的地方是否要种一排玉簪，如果买一套一层的再买一套二层的就又有绿地又有地下室了。小区东边是一大片果园，一色儿的杏树。大门口有930路汽车，一直通到大北窑。借用王朔的一本书名儿叫做看上去很美——可我去那儿干嘛？

就这样一共看了三天就叫老潘不幸而言中：不买了。就把老妈接来了大家挤着。许多年许多人不都这么挤着来着，许多年许多人不还这么挤着来着。那天我已经开始在写这篇东西的开头，题目叫做“大隐隐于烧饼摊儿的对门儿”！

合

晚上睡得不怎么踏实。弄电脑的时候一大摞光盘从电脑背后掉下去了，稀里哗拉地发出巨大的响声。楼上的老两口临睡前又在拖动一件家具——不夸张地说他们二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拖到现在，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拖的是什么。缝纫机？

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叫《六合之声》，后来一不留神给格掉了。那也是在一个睡不着觉的夜里写的，夜越是静就越能听到各种声音：远处汽车驶过的声音，房间里钟表滴嗒滴嗒走动的声音，猫儿打架的声音，一个不知什么人孤独地从窗前走过的脚步声音。直到窗外熹光微露时鸟儿的第一声鸣啭，保洁员的大扫帚沙沙地扫过地面，对面早点摊儿的帮工大声地打着呵欠捅开煤炉。

我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绝了买房的念头。这一夜我已经对买房这件事儿进行了好几轮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思考：经济全球化京城房地产CBDWTO陈希同王歧山五环六环轻轨地铁失业人群进城民工通货膨胀苏联解体十五周年两会奥运南唐北宋经史子集李自成义和团阴阳五行四柱八卦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最后我想买房这事儿如果闹好了就是帮着政府拉动内需，花钱这事儿如果闹好了就是保值，搬家这事儿如果闹好了就是居移气养移体，装修这事儿如果闹好了就是不和自己过不去。

我知道我其实在打天通苑的主意。是的那套房太大了点儿，可是它有价格优势，只用买同样大小的商品房三分之一的钱就能拿下来，换言之用买这套房的钱去买商品房只能买三分之一的面积，还不见得能买到；而且这个价格以后不再有，天通苑正在盖最后一个楼群而且已经都预售出去，即将封盘，从今年开始动工的其他经济适用房最低价也要3300元到4830元，还不见得比这里的房子好；现在看是离市区远了点儿，可是明年地铁五号线通车以后只用半个小时就能进城。还有物业费也便宜，每平米每月才0.52元，加上卫生费治安费什么的才1元钱。好多地方都要2、3元呢。

而且不买怎么办？妈妈是迟早要接来的，那时候还有必要为她请个保姆，在现在这个屋顶下多出两口人来谁都

住不舒服，住不舒服就生事，生事就惹气，惹气就招病。我背了不孝的骂名事小，妈妈的健康事大。

我咬牙了我。（注：咬牙二字的著作权属于小路。）

于是这套位于三十二层塔楼的第七层，有着能放两张乒乓球案子的大厅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三个阳台5平米玄关12平米厨房数个储藏室，正对着楼下一个正在施工的大花园，花园下面是地下停车场的——新房子，就成了我这两天务装修之虚的对象。到目前为止我还想像不出来搬家以后我会经常在哪屋呆着，但是我知道我会十分的怀念现在的小屋，怀念这屋里的一切，怀念屋外的六合之声，还有儿子从上初中那阵天天在家练够篮摸高——他每次起跳前先要摸一手地上的灰土——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留下的那一片小手指头印儿。

2004年3月16日子时于北京东便门家中

人家装修，俺们“休装”。 作者：wenjunq(杰夫 2004/03/17 21:52，阅读：0)

不知几位领导干部要买房子装修，乐不颠儿引来许多意见和建议。本来嘛，装修是件大事，人生能几回装？只是俺们插不上嘴，因为有一肚子恼火。 去年初，“阶级敌人造谣”说俺们这一片，要拆迁。我去规划局查了，回来辟谣。因为那规划图上拆迁造路的地方离我们这至少还有百来米远。

没多久，“阶级敌人”又猖狂起来，谣言死灰复燃。这回我让一个老部下帮忙，他热心过头，自己掏了五百多元钱，帮买回一张规划红线图，以为我要采取大动作。只好把钱还给人家，这钱掏的，简直说不清多冤枉，不过只是落实了：俺们这确实要拆！再一询问，原来的拆迁规划市委书记不满意，他左手一叉腰，右手一比划，画的这一个圈，就把俺们圈进去了。于是规划作废，重新来过，这个是新方案。

俺当时就骂街了，人家说，你这算啥？那段路延长392米，投资3.72亿，不也就这么“画了一个圈”画进去了？那里边有一段，市人大做过决议，确定为市级保护旧建筑风貌的步行街，前不久刚花大钱装修过的，受保护的建筑，不能动。人家说：我不是人大主任吗？再开一次会，把这一段取消掉。于是顺理成章。

注定要拆，俺们只好未雨绸缪，到处寻房子，得买。多少年来都是卖房子，俺眼里瞧过去，凡是地就会估摸它的位置，可以建多少房子；凡是房子，就估摸着它的设计如何，能卖个啥价钱。轮到自己去买房子，就好像法官突然坐到被告席、警察突然成囚犯，怎么着也只能调整心态。

还不错，好几个地产商都说认识我，还称老前辈，看来，挨宰的机会没有了。结果，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别说什么“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房子也没有“完”的、“足”的。相当初，要结婚，没房子，哪怕是个窝也行。其实不行，连个窝都分不到，老婆那个单位，刚分完1956年参加工作的；我这个单位在山沟里，房子倒是有，没法跑120公里。最后是自己打煤渣砖，跟贫嘴张大民似的，在老爸的房子边垒了个窝。

好歹寻着个满意的地方，说的是可以按揭，最长30年。何乐而不为？平常跑银行贷款，鞍前马后不知有多麻烦，能按揭咱也按。银行的职员是房产公司联系好的，一进去就笑脸相迎，态度不错。及至知道本人就是要按揭的主，托长了声音问房产公司那位小姐："他啊——我还以为是你们老板来了呢！"虽然没有阿庆嫂那么机灵，俺的痴呆症也还不很严重，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俺明白个大概。

"老人家，您今年高寿？"银行的小姐们看来训练有素。报出年龄之后，她和蔼地告诉我："按照规定，您可能不能按揭30年的。"没瞧，人家算准了俺活不了30年了，没准人家是对的，俺也没打算活到八九十岁去。我笑道："那也没关系，能办多少就多少吧！20年？"小姐笑得跟朵花似的："也不行，我查查看。"结果出来了：10年。我把手指头一扳，俺的阳寿就六十多，得学会知足长乐了。没料到她仔细一查，说："哎呀，老人家，真对不起。我们这按揭规定只到六十五岁，您按揭十年还差一岁呢！"阿门！刚算好的阳寿立马又少了一年。 那么就按揭五年吧！两位小姐都很客气，总算办完了。只是还照顾俺，让改改年收入证明，于是我的年薪立马从20万要改成30万，否则还不够付本息。我算算不对呀，一个月一万本金两千利息，怎么着也要不了的。"我们按规定要打折，再说了，您也要吃饭花销吧？总不能都拿来按揭嘛！"小姐依旧很客气。"要是税务局跟我要所得税怎么办？""不会的，我们这个证明只是例行手续，存档了是看不见的。您自己开的公司，随便写多少，盖个章不是很容易吗？"这事就这么敲定了。老婆还没份，退休职工不办按揭。

今年1月26日，眼瞧着要过大年了，报纸上登出拆迁公告，俺们这限期2月29日搬迁完毕，就跟打仗似的。底下同病相怜的人们马上就议论纷纷，中间还夹着个大年，怎么搬？给多少补偿？八字还没一撇，说一声就限期拆迁。更有明白人立即发现问题：国务院新的拆迁规定3月1日生效，他们赶在前一天赶走我们，要讨个说法。秋菊的教导如今比毛主席的教导还吃香，于是又有威胁的：说清楚了，不给个合理价钱决不搬！哪个要当甫志高我们大伙跟他没完！如今革命群众的觉悟看来不低。 谁知，那些热心人跑去拆迁办一问，人家根本没接到任何文件，不知道拆谁留谁。又苦了老百姓了，那些开小商店的，进货不是，不进又不是；另外寻地方租房子，租金是按时要交的，这边没拆，那边退还是不退？退了，这边说一声拆怎么办？不退，它不拆还真舍不得这个生意旺地，那边却得付租金。

俺的房子得六月底才能进去装修，嘈嘈要拆迁，已经一年多了，结果是到今天也没任何动静。连商量给办拆迁手续的消息都还没有。我已经租下过渡房了，结果至今没用上租金已经付了几个月。老婆意见大了，我还得安慰她：你只当已经用上了不就得了？他来拆了，你还不是得用那边？瞧，俺还是够进步的，急组织所急谈不上，想组织所想倒是做到了。

不谈装修，只谈"休装"。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怀念妈妈

我的妈妈康彧玖于2008年3月15日在上海去世。

妈妈是2007年8月15日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她生前的最后两年，生活上一直受到上海市吴兴路消防中队武警官兵的照顾。那天傍晚，一位每天给她送饭的小战士打来电话，说送晚饭时发现妈妈开门时走路趔趔趄趄。我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了妈妈单位老干部处的同志，请他们务必送她去医院，然后我连夜乘飞机赶到上海。

我到医院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妈妈单位的同志已经送她做过脑CT，确诊是脑溢血，出血面积为48X40，出血量算是比较大的。但这还并不是她这次出血的峰值，下一次的CT报告说她的出血面积已经达50多个平方。医生说一般人发生这样的出血量就会压迫到呼吸中枢危及生命，但是因为妈妈此前就有脑萎缩，无形中倒是增加了脑容量，算是在当时救了她一命。

对脑溢血的治疗，医学界普遍认为应当首推进行手术。然而经专家会诊，发现妈妈的凝血功能很差，不适合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她的凝血功能不好，医生分析可能与她长期服用一种抗凝血药物“华法林”有关。据说，这种药在国外是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服用的，一般每周要检测一次凝血时间。但是在国内尚未能达到这样的监控。妈妈自2002年患轻度脑血栓后一直在服用这种药，加之她近年有记忆力减退的迹象，不会主动去医院检测，甚至不排除有时候会有一日内重复服用的可能性以至造成过度的抗凝，直至出现溢血。

在刚见到我的时候，妈妈的神志还基本是清楚的，会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坐飞机来的，还告诉我家里的电话费该交了。随后她就被推进ICU（重症监护室），在里面治疗了23天。那段时间我每天早晚两次到ICU门口去找她的主治医询问病情。8月19日，她入院的第四天，农历是七月初七，正好是她七十九岁生日。我买了一块小的蛋糕和生日卡送去，请护士转给她。但是这天医生告诉我，她不肯吃东西了，喂她吃粥或者汤水都不知道张嘴，用调羹塞进去她就会用舌头推出来，完全不下咽。医生建议插胃管，起初我没有同意，我知道她这次的病来得凶险，完全痊愈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对味觉的享受将是她仅剩的生活乐趣了，我不想连这都给她剥夺。但是又过了两天医生再

次劝我签字，他说妈妈因为有房颤，每天需要口服地高辛。她不能配合吃东西的话，医生就无从掌握她服药的剂量。这样说服了我签字，从此就开始了插胃管的日子，一直到她去世。

从ICU出来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她只能平卧，不能坐当然更不能站立。她的右侧肢体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知觉，如果不帮她拉直她就会把右手和右腿都蜷缩着。这时妈妈的神志似乎没有刚入院时清楚，不大认识人。有时我在床头帮她摇床，她会突然问我："您是哪位？"可有的时候又能叫我的名字，会说"你回来啦？你累了吧？我来帮你拿东西！"有几天她甚至一直说英语，比如给她翻身的时候她就会问："What do you want to do?"虽然脑子不清楚，但无论是对医护人员还是对护工，她都很友善，每次别人来为她做过事，打针、擦身、量体温或者喂鼻饲，她都会微笑着对人家说谢谢；有时候自己拔掉了氧气或者输液管，护士来帮她弄好的时候，她会很诚恳地对人家说对不起。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她总是抬起那只能动的右手，用手背很优雅地挡着嘴巴。医生们很感慨地说：健康的人也不一定有她这么懂礼貌啊。医生和护士们都很喜欢她，无论年长年幼都很亲切地管她叫"康康"。还有一次，是在十一月，已经是深秋了，她望着窗外飘过的云幽幽地说："我想出去走走。"那时她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了。

妈妈的病情开始恶化是在十一月。医院的人不断地来找我，说是她现在基本上稳定了，不需要更多的治疗，可以回家去进行康复。甚至给她停止了输液。当然，胃管、尿管、氧气管和脖子上输液用的动脉穿刺管是没有一样可以拿掉的。其实医生们心里很明白，她自从住进医院就没有好转过。专家对她的诊断是：她的心脑血管很可能是发生了 "淀粉样病变"，就是说血管壁已经变得很脆，随时会有粉状颗粒脱落堵塞血管或者破裂，出现意外。但是医院有个"病床周转率"的指标，也是他们的无奈，于是每天与长期卧床的患者周旋动员出院也成了这些高学历的医生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不过他们同时表示出去一两周还可以再住进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四处联系，给她转到另外一个民营医院去。从转院的当天就开始不好，更确切地说是在转院的救护车上，她可能是晕车，脸色变得灰黄。到了新的医院，护工也是个生手，第一次喂鼻饲就把她给呛着了，估计是呛到了肺，医生好象说是叫"吸入性肺炎"。第二天开始发烧，用了大剂量的抗菌素后虽然有所控制，但在第二周又出现反复，不但发烧，呼吸时还有"咔咔"的声音，看上去很痛苦，又说不出来。这时我觉得再也不能耽搁了，当即找到原来医院的主任，求他无论如何再次收治我妈妈。这样妈妈又回到徐中心医院住进了ICU。

徐汇区中心医院在上海是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专科医院之一。在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妈妈再次控制住了体温，三周后回到普通病房。但是这次出来她的状况明显不好，感觉很萎顿，用上海话说是"萎他了"，没有精神，眼睛也不大睁开。医生说，她就象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光会越来越弱，直到完全燃尽。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她的生命体征能够平稳就带她回北京，我甚至回北京为她找好了医院，还四处联系运她回来的各种途径：救护车、火车、飞机。

元旦的前一天，我去商场给她挑选了两件颜色鲜艳的羊绒衫，一件玫瑰红，一件宝石蓝。我想给她穿得漂漂亮亮的，好好过个年，期盼着过了新年会有好运。可是就在12月31日晚上，她忽然浑身开始剧烈地颤抖，嘴唇变成紫色，就象小孩子受了莫大的委屈那样撇着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求救般地望着我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医生说这叫寒战，是要出现高热了。果然不到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发烧，体温到了近40度，用了退烧药和冰袋，出了大量的汗。这次高热后她的体质更加虚弱了，一天不如一天。这样的高热后来又出现过几次。然而比高热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她的白细胞已经达到了两万多可是体温一点都不高，医生说是她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想尽办法买了人血球蛋白（又叫免疫球蛋白）给她注射，尽可能地让她减少痛苦。

此后，妈妈的病情就时常会发生变化。出现过因为脑血管意外引起的癫痫，出现过血尿，肠梗阻，血压低（40-60），心动过速（120多下）等等。最可怕的是无尿，要用大量的利尿剂，否则就肿得很厉害。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惊心动魄的，每一分钟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其间医生又让她进过一次ICU。ICU虽然有全套的监测仪器但是我见不到她，所以那次出来后我就决心再也不让她进去了，我想天天守在她的身边，自己给她梳头、洗脚、剪指甲，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感觉着她的温热，知道她的生命还在延续……

自从十一月转院回来以后妈妈的神智一直没清醒过。可我知道她在潜意识里还在顽强地挣扎，挣扎着要留在这个曾经属于她的世界。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不是发不出声音而是不会说，她的脑细胞已经被损害得太严重了。她开始数数，大声地，连续地。起初，可以从一数到九十九，我告诉她然后是“一百”，她就大声地说“一百！”但是渐渐地数得就不连贯了，渐渐地就数乱了，终于再也数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啊！

自从她生病那天开始，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更多地是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两次她仿佛是回到了现实世界。一次是柳肇瑞叔叔去看她的时候，她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是脸部突然抽搐，哽咽了。我知道她一定是认出了老同学。还有一次，就是在今年的三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多，距离她永远地离开人世还有6个小时，当时她朝右侧躺着，突然从深度昏睡的状态中醒来，朝四周看了看，一滴眼泪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流过鼻梁，与右眼的那滴眼泪一起，跌落在枕上，让人心碎。她又闭上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过。此情此景，连见惯了生离死别的护工都为之动容。

妈妈最后的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从发病到去世整整在医院里躺了七个月。她去世后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与父亲合葬。那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地方，我很欣慰妈妈有这样的归宿。

在妈妈告别仪式上，我们为她书写的挽联是：

生命如花一生美丽灿烂，

音容宛在慈颜永驻心间。

妈妈是个普通人，她的一生是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妈妈生前，与我们兄妹总是聚少离多。这让我们心里充满着深深的内疚，因为她总是以巨大的包容和宽容，始终不渝地关爱着我们，祝福着我们，而我们给她的回报却太少太少。但在我们的心里更为她感到深深的骄傲，她永远是一位美丽、优雅、聪慧的母亲，永远是一位坚强而且坚忍的母亲，永远是一位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麻烦子女和他人的母亲。妈妈的离去，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心中最后的依赖、最后的寄托、最后的家园。至今想起还总是心痛不已。

写于2009年3月14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七夕的怀念

又逢七夕。

今年七夕，是母亲康彧玖的八十八岁冥寿。傍晚和朋友在昆明的翠湖边漫步，看见水中映满繁星般的灯火，天边有月如钩。于是想起七夕，想起妈妈生前的点点滴滴。

妈妈是2007年8月15日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的，2008年3月15日去世。她生前的最后两年，生活上一直受到上海市吴兴路消防中队武警官兵的照顾。那天傍晚，一位每天给她送饭的小战士小徐打来电话，说送晚饭时发现妈妈开门时走路趔趔趄趄。我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了妈妈单位老干部处的同志，请他们送她去医院，然后连夜乘飞机赶到上海。

我到医院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妈妈确诊是脑溢血，出血面积为48X40，出血量算是比较大的。但这还并不是她这次出血的峰值，下一次的CT报告说她的出血面积已经达50多个平方。医生说一般人发生这样的出血量就会压迫到呼吸中枢危及生命，但是因为妈妈此前就有脑萎缩，无形中倒是增加了脑容量，算是在当时救了她一命。

对脑溢血的治疗，医学界普遍认为应当首推进行手术。然而经专家会诊，发现妈妈的凝血功能很差，不适合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

在刚见到我的时候，妈妈的神志还基本是清楚的，她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坐飞机来的，还告诉我家里的电话费该交了。随后她就被推进ICU（重症监护室），在里面治疗了23天。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医院的走廊里徘徊，不舍昼夜；还早晚两次到ICU门口去按响门铃，找她的主治医询问病情，签各种字，包括病危通知书。8月19日，她入院的第四天，农历七月初七，正好是她七十九岁生日。我买了红宝石的鲜奶小方蛋糕，写好生日卡，请护士转给她。但是这天医生告诉我，她不肯吃东西了，无论是粥或者汤水，喂进去她就会用舌头推出来，完全不下咽。医生建议插胃管。我没有同意，我知道她这次的病来得凶险，完全痊愈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味觉将是她仅剩的生活乐趣，我不想连这都给她剥夺。但是又过了两天医生再次劝我签字，他说妈妈因为有房颤，每天需要口服地高辛。她不能配合吃东西的话，医生就无从掌握她服药的剂量。权衡生存和美食享受的轻重，于是我签字。从此开始了她插胃管的日子，一直到去世。

从ICU出来后，妈妈的右侧肢体失去了大部分知觉，如果不帮她拉直她就会把右手和右腿都蜷缩着。这时妈妈已经不大认识人。有时我在床头帮她摇床，她会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之后突然问我："您是哪位？"可有的时候又能叫我的名字，会说"你回来啦？你累了吧？我来帮你拿东西！"有些天她甚至一直说英语，好像管中文的那根神经睡着了。比如给她翻身的时候她就会问："What do you want to do?"虽然脑子不清楚，但无论是对医护人员还是对护工，她都很友善，每次别人来为她做过事，打针、擦身、量体温或者喂鼻饲，她都会微笑着对人家说谢谢；有时候自己拔掉了氧气或者输液管，护士来帮她弄好的时候，她会很诚恳地对人家说对不起。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她总是抬起那只能动的左手，用手背很优雅地挡着嘴巴。医生们很感慨地说：健康的人也不一定有她这么懂礼貌啊。医生和护士们都很喜欢她，无论年长年幼都很亲切地管她叫"康康"。还有一次，是在十一月，已经是深秋了，她望着窗外飘过的云幽幽地说："我想出去走走。"那时她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了。

妈妈的籍贯是浙江奉化康岭村，属溪口镇。我的外公康辛潮在那里出生。据族谱记载，外公的祖上康经，是北宋初年的宁波太守（当时叫明州节度使），从开封来到浙东，繁衍生息。

外公八岁就离开老家去上海学徒，在洋行学习英文打字和做生意。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就在汉口定居，娶妻生子，曾任宁波同乡会汉口分会会长，民安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总经理。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是电影《和魔鬼打交道的人》的人物原型、共产党人卢绪章。1949年外公拒绝了在汉口市政府任职的邀请，举家迁到北京。

外公共有九个儿女，三儿六女。我的妈妈是老六，上面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妈妈出生在江西九江的牯岭镇，当时外公因患肺病，正举家居住在庐山上。三姨妈回忆说："因为老六是第五个女儿，爹爹就想把她送到山下的教堂去养。那天教堂的嬷嬷带着轿子上山来了，姆妈和我们几个大些的孩子都围着小妹妹哭作一团。我们10岁的哥哥站出来说，不要带走小妹妹！等我长大了，我来养她！"妈妈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九江和汉口度过。她所接触的观念和接受的教育是多元的：外公既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一面，又有革命者反传统的一面，还有在洋行从事金融保险业务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面；外婆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妈妈从小既是家里的乖乖女，性格中又埋藏着叛逆的种子。1945年，我的大姨妈康映蕖将妈妈从汉口接到北京，考入贝满女子中学。大姨妈是林巧稚的学生，协和医学院的博士，中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这次"放飞"，使妈妈的人生之路出现了关键转折。

那年的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军人和特务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和昆华工校学生荀继中，南青中学教师于再4人，史称"12.1"惨案。自此，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国民党统治区。

妈妈正是由此而投身于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她在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期间加入青年民主联盟，积极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这时妈妈结识了我的父亲，北大历史系学生，时任华北学联的负责人之一。父亲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在革命加恋爱的驱动下妈妈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和父亲一起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在华北大学教

授英语。再以后，接受组织派遣参加接管天津，在天津铁路局担任机要秘书，和父亲一起报名去兰州援建兰州铁路局，在报社做编辑，在中学做教导主任，英语和语文教师……她一直勤勤恳恳，所担任的职务却每况日下，这仿佛是一个谜。

妈妈的病情开始恶化是在十一月。医院的人不断地来找我，说是她现在基本上稳定了，不需要更多的治疗，可以回家去进行康复。甚至给她停止了输液。当然，胃管、尿管、氧气管和脖子上输液用的动脉穿刺管是没有一样可以拿掉的。其实医生们心里很明白，她自从住进医院就没有好转过。专家对她的诊断是：她的心脑血管很可能是发生了"淀粉样病变"，就是说血管壁已经变得很脆，随时会有粉状颗粒脱落堵塞血管或者破裂，出现意外。但是医院有个"病床周转率"的指标，也是他们的无奈，于是每天与长期卧床的患者周旋动员出院也成了这些高学历的医生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不过他们同时表示出去一两周还可以再住进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四处联系，给她转到另外一个民营医院去。从转院的当天就开始不好，更确切地说是在转院的救护车上，她可能是晕车，脸色变得灰黄。到了新的医院，护工也是个生手，第一次喂鼻饲就把她给呛着了，呛到了肺，医生说是叫"吸入性肺炎"。第二天开始发烧，用了大剂量的抗菌素后虽然有所控制，但在第二周又出现反复，不但发烧，呼吸时还有"咔咔"的声音，看上去很痛苦，又说不出来。这时我觉得再也不能耽搁了，当即找到原来医院的主任，求他无论如何再次收治我妈妈。这样妈妈又回到徐中心医院住进了ICU。

徐汇区中心医院在上海是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专科医院之一。在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妈妈再次控制住了体温，三周后回到普通病房。但是这次出来她的状况明显不好，用上海话说是"萎他了"，没有精神，眼睛也不大睁开。医生说，她就象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光会越来越弱，直到完全熄灭。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她的生命体征能够平稳就带她回北京，我甚至回北京为她找好了医院，还四处联系运她回来的各种途径：救护车、火车、飞机。

元旦的前一天，我去商场给她挑选了两件颜色鲜艳的羊绒开衫，一件是娇艳的玫瑰红，一件是亮丽的宝石蓝，戴安娜经常穿的那种颜色。妈妈是个爱美也长得美的人，我想给她穿得漂漂亮亮的，好好过个年，期盼着过了新年会有好运。可是就在12月31日晚上，她忽然浑身开始剧烈地颤抖，嘴唇变成紫色，就象小孩子受了莫大的委屈那样撇着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求救般地望着我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医生说这叫寒战，是要出现高热了。果然不到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发烧，体温到了近40度，用了退烧药和冰袋，出了大量的汗。这次高热后她的体质更加虚弱了，一天不如一天。这样的高热后来又出现过几次。然而比高热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她的白细胞已经达到了两万多可是体温一点都不高，医生说是她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想尽办法买了人血球蛋白（又叫免疫球蛋白）给她注射，尽可能地让她减少痛苦。

此后，妈妈的病情就时常会发生变化。出现过因为脑血管意外引起的癫痫，出现过血尿，肠梗阻，血压低

（40-60），心动过速（120多下）等等。最可怕的是无尿，要用大量的利尿剂，否则就肿得很厉害。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惊心动魄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每一分钟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其间医生又让她进过一次ICU。ICU虽然有全套的监测仪器但是我见不到她，所以那次出来后我就决心再也不让她进去了，我想天天守在她的身边，自己给她梳头、洗脚、剪指甲，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感觉着她的温热，知道她的生命还在延续……

这样的守护在许多年前就有过。

那应该是在1968年的秋天，我从万马战犹酣的帝都回到兰州。那时候我们在兰州已经没有家了，只有妈妈在教工宿舍的一间小屋。有一天，下班的时间过了很久，妈妈还没有回来，我就到学校的教学楼去找她。走近那座凋零破败的建筑，我惊恐地发现那些从三楼窗口垂到地面的大标语居然有多一半都指向我的母亲：揪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小姐某某某……某某某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某某某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狗特务……当我的记忆中又出现那个画面，那些声音，我再次出现幻觉，看到妈妈站在一堆墨迹未干的字纸中间，她面色冷峻，口齿清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晚，妈妈没有回家。一连几日。

几日后传来的消息是，和妈妈一同被揪出来的学校党支部书记荀梅莹阿姨，自杀了。

妈妈被放回来。有人对我说，要看好你的妈妈，不要让她一个人出去。我心里其实清楚我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已经翻动了她的抽屉和房间里所有的角落，包括房间门口盛着煤的木箱。在抽屉的深处有一整瓶没开封的冬眠灵。

守护一个生命，一个如同你自己一样的生命，是一种绝望。

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来到外公的老家，看到那块刻着"蒋氏太夫人"的墓碑，并且在溪口蒋家宗祠查到"某某之女适康岭某某"的记载，才明白这一切。外公的母亲，妈妈的祖母，不过是蒋先生五服之外的远房长辈同宗，妈妈苦苦地对我们保守着这个秘密，不愿我们背负这个包袱。但是，她的上级知道，无所不在的组织知道，那泛黄的档案袋知道。

自从十一月转院回来以后妈妈的神智一直没清醒过。可我知道她在潜意识里还在顽强地挣扎，挣扎着要留在这个曾经属于她的世界。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不是发不出声音而是不会说，她的脑细胞已经被损害得太严重了。她开始数数，大声地，连续地。起初，可以从一数到九十九，我告诉她然后是"一百"，她就大声地说"一百！"但是渐渐地数得就不连贯了，渐渐地就数乱了，终于再也数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啊！

自从她生病那天开始，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更多地是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灵魂已经离开了她的躯体，却还徘徊踌躇。只有两次她仿佛是回到了现实世界。一次是柳肇瑞叔叔去看她的时候，她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是脸部突然抽搐，哽咽了。我

知道她一定是认出了老同学。还有一次，就是在那年的三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多，距离她永远地离开人世还有6个小时，当时她朝右侧躺着，突然从深度昏睡的状态中醒来，朝四周看了看，一滴眼泪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流过鼻梁，与右眼的那滴眼泪一起，跌落在枕上，氤氲出一片泪痕，让人心碎。她又闭上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过。此情此景，连见惯了生离死别的护工都为之动容。

妈妈最后的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从发病到去世整整在医院里躺了七个月。她去世后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那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地方，我很欣慰妈妈有这样的归宿。

在妈妈告别仪式上，我们为她书写的挽联是：

生命如花一生美丽灿烂，音容宛在慈颜永驻心间。妈妈是个普通人，她的一生是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妈妈生前，与我们兄妹总是聚少离多。这让我们心里充满着深深的内疚，因为她总是以巨大的包容和宽容，始终不渝地关爱着我们，祝福着我们，而我们给她的回报却太少太少。但在我们的心里更为她感到深深的骄傲，她永远是一位美丽、优雅、聪慧的母亲，永远是一位坚强而且坚忍的母亲，永远是一位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连累子女和他人的母亲。妈妈的离去，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心中最后的依赖、最后的寄托、最后的家园。至今想起还总是心痛不已。

2009年3月14日第一稿 2016年8月9日第二稿

宝嘉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追忆牛汉伯伯

二、

接到牛汉伯伯离世消息的电话是在早晨，一个秋天的早晨。这让我想到他那首著名的诗篇《悼念一棵枫树》：

"湖边山丘上/那棵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了……"

牛汉，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编辑。曾用笔名谷风、牛汀。牛汉是他最常用的笔名，牛是他的母姓。

我和牛汉伯伯有许多的渊源：我们都姓史；他和夫人吴平解放前在华北大学任教时曾经和我的父母同事，甚至吴平阿姨和我母亲住在同一宿舍；他们的女儿史佳是我和我哥在铁七小的小学同学、我在师大女附中的中学同学、我表姐黄健怡的中学同班同学；他们的儿子史果也是我和我哥的小学同学、我哥在四中的中学同学；史果的夫人小曾还是我中学同学的妹妹。因为这些渊源我称牛汉先生为伯伯。

他在给别人的书上都是题"赠方家"、"赠诗友"，而送给我的书上题的是"赠贤侄"。我每次去他家，吴平阿姨都会慈爱地看着我说，越长越像妈妈了。牛汉伯伯却说，你没有你妈妈好看，你妈妈很漂亮。看我不爱听这句话，伯伯就开心地笑起来，笑得很灿烂。伯伯还多次回忆他和我父母解放前在华北大学时，吴平阿姨和我妈妈的住地距他和我父亲的住地有数十里之遥，在休息的日子，他会和我父亲一同步行去看自己的爱人。

牛汉伯伯是忧郁的（诗人总是忧郁的）。他总是皱着眉头，即使在笑的时候。久而久之他的双眉之间有两道深深的纵纹，隆起如山丘，凹陷如沟壑。他还爱叹气，看书的时候说话的时候经常会长长地出一口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口气在身体里不舒服，出来了就舒服了。

我不懂诗，更不曾静下心来好好读诗。对诗的喜爱与否全凭心在一瞬间的感应。但是对牛汉伯伯的诗我会有感应。我喜爱他那首《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人们/老远老远/一眼就望见了我/满树的枣子/一色青青/只有我一颗通红/红得刺眼/红得伤心……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很红很红/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

春。"这首诗里"红得刺眼，红得伤心"，还有《悼念一棵枫树》里的"清香，落在人的心灵上，比秋雨还要阴冷""芬芳，使人悲伤"，这种意象的冲突中，我能读出诗人内心的忧郁，也读出我自己的。

我有时也试着向伯伯请教诗。我曾问起他当代新诗的传统。他说，没有传统，只有艺术。八十年代办《中国》的时候，他为诗歌领域的苏醒和新的生机而振奋，他说北岛的冷峻、舒婷的至情、江河的浑朴都令他赞叹不已。在前辈诗人当中，牛汉伯伯给了这批年轻诗人最有力的支持和最热情的关怀。北岛、江河、顾城、芒克、林莽等诗人与他都有着忘年之交。他认为,"这是一群很有见解，很固执，很坚定，很了不起的诗人。"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第一二期的原稿他全都读过，他是这份著名文学刊物的见证人。他最欣赏北岛。早在"文革"后期，他们的来往就开始了。有一段时间，北岛几乎每周都到他家里，和他谈诗。

1994年，北岛去国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国，被阻于国门之外，扣留在机场。北岛的弟弟振先次日早晨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向我求助。那天是复活节，11月24日，星期四。接到振先的电话后我做了两件事。先是送儿子去学校，并且到哥哥那里对他说，如果发生意外，请他帮我照顾孩子。接着我去牛汉先生那里，托付他在必要时出面，请文化界的朋友们伸出援手。

我到机场见到振先时，他说北岛已经不在那扇大玻璃门里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一起去机场海关询问。一位穿便衣的人说，他已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你们不用等了。

这件事让我心里悲愤，好多天不能平静。又过了些日子，牛汉伯伯骑着一辆破旧的28型飞鸽自行车，从东八里庄出发，在寒风中骑了总有十五六公里，一路打听着道，到东便门家里来看我。车把上挂着硕大的一把香蕉。那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他说的话不多，我牢牢地记住一句：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件事过去已有二十年，但他的话，连同他那语气和口音我不曾有一日能够忘记。

2001年12月13日，北岛终于获准回京，抵达的第二天就要我陪他去看望牛汉伯伯。当我们按照约好的时间到达伯伯家楼下时，他已经在严寒中伫立等候。两个高大的男人在风中紧紧地拥抱。史果说，老人听说北岛来了，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从二楼的楼梯下来。

顺便想起的是，一次刘福春说，北京有两位一直骑车出行的七十岁以上的老诗人，都曾经骑自行车去造访过你。你何其幸也！他说的另一位老诗人是蔡其矫先生。

二、

牛汉是山西省定襄县人，1923年10月出生在一个有文化背景的农民家庭。祖父是清末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曾经办过报纸。父亲读过中专，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两年，后回乡做教员。喜爱新文学，尤其喜欢周作人和徐志摩。母

亲是当地第一批读完高小的女子，口授童年的牛汉背过几十首唐诗。牛汉是蒙古族，据说，他的远祖忙兀特儿，曾是成吉思汗帐前一员勇猛善战的骁将，当过驻守洛阳管辖豫陕晋交界地区的军事守领，元亡后冒充一位史姓汉族人的家属流亡至山西定居。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牛汉随父亲逃难到西安，卖过报，学过画。1938年徒步到甘肃天水读国立中学，开始使用"谷风"的笔名写诗。

1937年9月胡风等在上海创建《七月》杂志，胡风担任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的创立以及《七月》丛书的出版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刊载平台，形成了以艾青、田间、牛汉等诗人为代表的诗人群。因该诗人群的作品大多数在《七月》等杂志上发表，故被称为"七月派"。牛汉是"七月派"的主力成员之一。

1942年牛汉发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滚滚的黄河/在北中国/寂寞地湍流着/琥珀色的泪浪/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静静地/躺在草原上。"这首诗被认为是牛汉的第一首诗和成名作，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牛汉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牛汉说自己在创作初期受艾青影响很大。他一生都视艾青为老师。在谈到《鄂尔多斯草原》时他说过，"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骆驼的铃铎的声音。这种舒缓的情调，有意无意地带着马头琴的韵味。"他说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懂得文艺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写作手法，"我只信任艾青与田间的诗，反复吟咏他们的诗，觉得跟着他们写下去，总会写出诗来的。艾青仿佛是个拉骆驼的人，昂首阔步，沉着地走在前头，我是一匹骆驼跟着行进。"诗人郑敏曾说牛汉的诗歌已经远远超过了艾青的水平。此说或许是一家之言，但是牛汉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1946年，牛汉因参加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55年，他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第一个遭到拘捕。

"文革"一开始，牛汉即被关进"牛棚"。1969年9月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被管制劳动。成天干的是拉车运输等最繁重、最疲累的劳役。两三年之后，管制放松了些，他成天幽灵般地游荡在干校附近日渐空茫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苏醒了。他重新有了写诗的冲动。他说:"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他把自己住的屋子取名"汗血斋"，在杂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了几十首诗。在最没有诗意的日子，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诗如钟锤一样敲醒了他，提醒了他，他又开始写诗。就在这"汗血斋"里，诞生了他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诗篇。

绿原回忆道，"记得那时，他拉了一天装载千斤以上的板车，或者扛了一天每袋一百多斤的稻谷，回来总要气咻咻地告诉我，他今天又寻找了，或者发现了，或者捕捉了一首什么样什么样的诗。"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刻，牛汉写下了《鹰的诞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在《悼念一棵枫树》中，他写那棵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后，"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棵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

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枫树飘散出的浓郁的清香,"落在人的心灵上/比秋雨还要阴冷"。他为自己，也为整个一代被迫害、被侮辱的知识分子，唱出了一曲回肠荡气、悲凉慷慨的悲歌。

牛汉伯伯说:"我的诗是从我的灵魂里发出来的"；"如果没有诗，在干校那样的环境下，我就活不下去了。"他的这些诗，写得沉痛、激越、高亢，是诗人生命和人格的外化、对象化，是苦难的升华和诗化，有一种悲壮、崇高的诗美，散发出震撼人心、净化灵魂的艺术魅力。这个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

诗歌之外，牛汉伯伯在上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两件编辑工作也可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一是编《新文学史料》；二是编《中国》。他曾经很自豪地说，他编的两个刊物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前者为现代文学留下了许多当事人的珍贵回忆；后者仅仅存在了两年，但刊载了许多"先锋"派作者，譬如北岛、舒婷、杨炼、残雪等的作品。

这里重点说说《新文学史料》。1978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韦君宜在著名作家楼适夷的建议下，决定由牛汉筹备《新文学史料》。牛汉以其敏锐的历史意识、郑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探求历史真相的勇气塑造了这本刊物的品质：以史料说话，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他亲自向萧军、端木蕻良、赵清阁、骆宾基、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施蛰存等人组稿，几乎当时所有重量级作家，包括茅盾、冰心、叶圣陶、丁玲、沈从文……都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他们的回忆录。可以说，《新文学史料》在历史转折期创刊，以一刊之力，承载起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重任，为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我有时也会追问牛汉伯伯为什么不写爱情诗。他好像有些窘迫，说自己是个粗人，泥人土性子，写不出细腻的东西。话题一转，说你吴平阿姨是个精致的人儿。那时候吴平阿姨正在生病，经常卧床，伯伯有时会走到她的床前，弯下腰，用充满爱意的眼光看着她。那目光分明就是爱情诗。

吴平阿姨是美丽的。鹅蛋脸，大眼睛，高鼻梁，浑身散发着高贵的气质。只有鹅蛋形脸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高贵气质。她是安徽桐城人。桐城素以"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著称，从明清时期开始，安徽的桐城吴氏不仅人丁兴旺，宗族显贵，而且到近代还产生了清末著名文学家、桐城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吴汝纶正是吴平阿姨的祖父。他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总学监，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还创办了桐城中学。桐城至今还有吴汝纶公学，已经是省政府、市政府、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创办的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式学校。清代桐城派方苞的后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舒芜曾经在桐城中学就读，与吴平阿姨的祖父和父亲有师生之谊。也许

是因为这个缘由，在胡风案发、牛汉伯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第一个被捕入狱以及被释放之后，舒芜曾经不止一次带着女儿到位于南礼士路的铁道部第二住宅区的寓所做客，看望牛汉伯伯和家人。牛汉伯伯和吴平阿姨从未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对同乡故旧衍生仇恨冷漠。他们都宽厚而包容。

牛汉伯伯和吴平阿姨是在西北大学相识的。

这里需要说几句西北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与之同时诞生的西北联合大学，命运却大不相同。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年底南京失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次年临汾失守，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同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四个院。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文学家许寿裳、哲学家李达、政治活动家许德珩、罗章龙、翻译家曹靖华、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都曾在西北大学任教。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原因之一是学校所在地西安、汉中距延安较近，国民党政府担心大学受共产党的影响，故将其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学院分而治之。另一个原因是为使各分立的学院"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的子体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西北五校。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重要转折，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

牛汉伯伯1943年从甘肃天水五中考入西北大学的外文系学习俄文。他在《我仍在苦苦跋涉》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城固，正是文理学院的所在地。在西北大学他通过学习俄文而阅读了多种原文的诗歌。他喜欢普希金、尼古拉索夫、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和茨维塔耶娃。特别是莱蒙托夫的《童僧》，直到晚年仍能背诵。他说他每天早晨到汉江边大声地用俄语朗诵。而吴平阿姨之所以从安徽来到西北求学，是因为她的叔父吴叔侯。吴叔侯，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留学生，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当化验员，因辐射受伤，回国受聘于西北大学物理系任教。吴平1937年考取安徽大学，因为战争于1943年随叔父到西北大学插班到外文系三年级学英文。一个是来自大西北黄土高原的粗犷汉子，高粱般挺拔坚硬；一个是长江流域的水乡女子，水一样温婉清澈。两个人就这样相遇。

牛汉伯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吴平阿姨曾经作为保人营救他出狱。到1955年，牛汉伯伯因为胡风冤案再次被捕，当天晚上，单位和几个公安部的人，对牛汉的家进行了搜查。吴平阿姨当时在铁道部教育局作秘书，听到公安人员宣布丈夫已被逮捕，要进行搜查的时候，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作为一个1946年和牛汉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木然地坐在椅子里，让公安人员任意搜查。

伯伯被带走了，从此吴平阿姨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而且受他的牵连在政治上从此不能"进步"。牛汉伯伯在经历了人生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多次说到，"吴平为我受够了苦。"（《致胡风》1979年9月21日）"吴平在文革中几乎被造反派打死，打了九次，遍体鳞伤，她还是坚贞不屈，没有出卖灵魂，但因此身体弄得非常虚弱。"（《致胡风、梅志》1980年4月7日）牛汉伯伯对吴平阿姨怀着深深的挚爱和感激，也为自己不能有力地保护妻儿而痛苦。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史佳姐姐说，她曾经听到夜半时分父亲一个人在恸哭。

四、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桢牛汉伯伯的题字："谢谢我的骨头，谢谢我的诗，谢天谢地！"这是他八十二岁时为我写的。1996年8月，在日本前桥市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的发言里，牛汉曾经为加拿大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样一行诗流下热泪："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然后他说："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甚至把骨头和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称为自己的"感觉器官","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敏感去感觉世界","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他还企望，自己和诗总是不歇地向梦游中看见的美妙远景奔跑，"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我也曾为他的这篇发言流下热泪。

牛汉伯伯是一位用生命拥抱生活、拥抱诗的诗人。在他那里，人和诗，根本不能分离、割裂开来。他说过，"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同体共生。""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对于牛汉伯伯来讲，再也恰当不过了。

在这篇不成文的文章即将收尾的头一天夜里，我梦见了牛汉伯伯、吴平阿姨、蔡老，还有我不认识但又似曾相识的人，他们眉宇开朗，目光清澈，步履轻盈，带着美丽的微笑。每个人都通体透明，发着晶莹柔和的光。

那真是一个让人忘却悲伤的梦！

2013年10月28日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载于2013年11月18日财新杂志）

宝嘉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人间至痛

——写在张志新被害三十年的日子

前几天，我到香山脚下一个普通的老年公寓探望了曾真先生。他是我父亲解放前在北大时的老同学，也曾经是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热血青年。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世时，他曾到我家里来过，那时他已近70岁，是那种非常有神采的老年人。可是这次去时，他已经十分虚弱，背也驼了。所幸老先生的脑筋还非常清楚。

我们谈到张志新，我有好几个问题想问曾真叔叔。

我的其中一个问题是，象张志新这样一位喜欢音乐喜欢拉小提琴而且拉得非常好的人，应该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亲人的非常人性的“人”。我想知道在对她平反的报道中是不是有“宣传”、“教化”的成分在内。曾真叔叔说，那些话的确是她说过的，她也就是那么想的，她那个人，只要认准了一件事是不会改变的。我问：您觉得志新阿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共/产/党/员。

静默了一会儿。我又问：那，您自己呢？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也是。

根据曾真叔叔所讲的片段，参照陈锡联、宋任穷等人的回忆录以及辽宁省档案馆的部分资料，我想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66年8月以后，沈阳地区红卫兵矛头首先指向的是辽宁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斗。而宋任穷却在当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明毛在此时还是保宋的。

1967年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当时的张志新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辽联”反对沈阳军区1966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陈锡联在回忆录里提及“辽联”派主要的政治口号是“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领率机关所在地）、“打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

同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公开宣布冲击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引起了这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 “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陷于被动。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标志着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了保宋，从此，辽宁以至整个东三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

196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省革委会主任由陈锡联担任。在省革委会委员中，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了大局。

6月，中共免去宋任穷在沈阳军区的一切职务，三个月后，陈锡联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辽宁省档案馆编制的1968年《辽宁大事记》有这样的记载：

“5月10日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锡联任主任。李伯秋、扬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人任副主任。

9 月14日　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被动员上山下乡。

10月28日　原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委员会、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委员会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辽宁省“一0·五”干校。”

张志新应该在其中。在干校，当时的主要运动内容是让人们重新排队，主要对象是曾经“保”过宋任穷的那些人。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当年12月，尚留在沈阳的曾真到盘锦干校看望张志新。一进干校的大门，迎面就看见张志新。但是张连宿舍门都没有让他进，只是催他快走。这是曾真见到张志新的最后一面。当时他还不知道张志新已经被“专政”了。

12月31日，曾真再要去看望张志新时被告知，张志新是反革命，已经被抓起来了。

1969年的《辽宁大事记》记载：“11月17日　辽宁省“五·七”干校首批插队落户干部下乡。 ”曾真应该就是在这一批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去插队了。

1970年的《辽宁大事记》记载：“8月20日　盘锦地区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张志新同志无期徒刑。”

这一年发生过的事情有：辽宁省革委会组织七十二人小组到上海学习搞好工交战线“斗、批、改”和工农业组织领导方面的 “经验”；全省各地广大解众举行庆祝活动，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金仲麟、团员韩益珠及其随员，在沈阳参加了“沈阳市人民纪念朝鲜祖国解放二十周年和声讨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台湾大会”；南也门国家元首鲁巴伊主席来辽宁参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委主席凯莱齐率阿政府经济代表团来沈阳参观；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夫妇到鞍钢参观访问；大型塑像群“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在沈阳中山广场建成。

我看着“盘锦地区人保组” 那几个字发呆。后来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机构沿革介绍里看到下面的文字：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党政合一的省级地方临时权力机构，行使“文化大革命”前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负责领导全省各地“革命委员会”工作，于1968年5月8日成立，1980年2月撤销。其机构设置不断变化，成立伊始设：办事组、政工组、组织组、人保组、生产指挥组；1970年增设党的核心小组、计划组、农业组、财贸组，撤销生产指挥组，成立工交组；1971年撤党的核心小组，重建中共辽宁省委；1972年撤政工组、组织组，成立宣传组，撤计划组和工交组，成立省革委会计划委员会和基本建设委员会；1973年增设文教组；1974年将人保组改为省公安局；……”

照此说来，人保组就是公安局，张志新是被公安局判了死刑。

最早报道张志新案件的陈禹山这样说：张志新被判过两次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逐级呈报，沈阳中院和辽宁高院军管会的一致意见是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最后到了省革委会，是陈锡联说要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才改了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我问曾真叔叔，志新阿姨后来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了？他说她确实是疯了，至少在1973年11月就已经精神已失常。

辽宁省档案馆的文献里对此也有确凿的记载。

那么，张志新的确是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可她却不是因言致死。她是被迫害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以后，活活地给杀死了。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刑法，其中第十八条是这样规定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

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一规定与世界各国的刑法基本相一致。它所依据的法理是：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具备责任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自然人犯罪主体来说，达到一定的年龄即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志，但以行为人的智力、心理和生长发育正常为前提。行为人的精神发育正常与否是决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作为精神病患者，张志新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即使按照当时的“法律”她有罪，至少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是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刑法。中国的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制定的，那以前，只有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当然还有诸如惩治反革命条例一类的刑法性文件。因为没有法律，也就没有人“违法”，没有人会为张志新的死负责任。

把张志新放到当时的大背景里就能看出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悲剧。从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70年的一打三反，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政治犯”正式地被判了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给中央的报告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还有资料说，在张志新之前，在辽宁被割喉管的犯人就已经有30多名。

我已经无意去追究这些是谁之罪。但是面对衰老虚弱的曾真叔叔，听老年公寓的饮事员管他叫“曾大爷”，林林的那些回忆怎么看都是人间的至痛：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读着这段文字，我对着从未谋面的志新阿姨的照片流泪。人们总把她作为英雄在歌颂着，崇敬着，而我却情愿她就是那个喜欢波隆贝斯库的浪漫的女子。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愿将来是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因为英雄只是在不幸的时代才会出现。

2005年4月4日凌晨于北京东便门寓所

尊重生命

我坦言，我不能接受一些知青网站的朋友“不同意红河谷的思想观点但是肯定他的精神”的笼统说法。我们当初帮助红河谷，今天怀念红河谷，并不需要用他的精神或者优点来做理由。红河谷是我们的同龄人，帮助他是在帮助一个生命，尊重他就是尊重所有的生命。而且我也并不想掩饰自己对境遇不太好的同龄人有一种聂赫留朵夫式的赎罪情结，红河谷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句亘古不朽的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若干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死亡对人类具有吸引力。他也提出了为什么死亡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的一些理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原始的命题，即生命是可以而且只能由生命的载体-生命的拥有人自己而不是生命本体以外的其他人来进行处置的。这个命题尽管原始，但是人类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开始意识到。这场革命所举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旗帜，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基础，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读着这些条款让我深深地感动。这些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未予明文规定的，大概立法人认为这些应该是文中自有之义吧。是的，红河谷的政治见解和我有着泾渭之分，但是，他曾经是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权与我的完全平等，他的生命权应当受到尊重。

当年在北大法学院读研时，有一次法社会学的朱苏力教授在课堂上提问，要求从法理学的角度谈中国应不应该废除死刑。同学中好几位各部委的司局长，还有政法系统的资深人员，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中国必须保留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犯罪，改善治安。老师说他们的发言角度是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而不是法理学。后来老师看着学生名册叫“人大毕业的XXX”发言，我只好站起来，边想边说。我说凭直觉我认为应该保留死刑。我的理由是中国有这么多人，好人都嫌多，再留着那些坏人作甚？但是如果讲法理学，那就先要看生命的法律本质。于是我说起了前面

所提到的那个原始命题，最后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异的结论：从法理学的角度讲，生命权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它只属于权利人自己所有，由权利人自己来处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死刑是不合“法”的，而安乐死则是合“法”的。

手边正好有一份资料，其中一组数字载明1966-1977年的城镇下乡知青总数是16,560,600人（源于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务院安置办的历年原始档案文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下乡知青中，红河谷所在的辽宁省比例最高（具体数字暂付阙如）；另一组数字是对1974-1979六年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落户地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15,899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的61.9%。备注中说明非正常死亡人数，主要由自杀致死、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刑事犯罪伤害致死、在救灾或减灾中因公牺牲或因工殉职、劳动事故伤害致死，以及在落户地发生的意外事故致死等原因构成。在死亡人数的地域统计中，人数最多的是云南省，其次是辽宁，再次是广东。但是云南的死亡人数中包括了逃缅后被“宣告死亡”的人数，所以在实际死亡的知青中，辽宁籍仍占首位。

在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有一位我的朋友，原上海向明中学的陆华。她和她的10位同学到黄山茶场插队，在一次山洪暴发的时候，为了抢救仓库里的存粮（一说是上海市革委会存在那里的人事档案副本），全部牺牲。那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如此众多的莘莘学子正值求学的好年华被迫中断了学业，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非正常死亡"，这恰恰反映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践踏。

同绝大多数下乡知青的命运相比，红河谷算是幸运的。他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乡，未几当上了大队电工，后来又先后到公社和县广播站工作，一九七一年九月回城。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述了这些过程。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感受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你能有机会高举"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当上红卫兵，感到幸运吗？”他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是：“最有意义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一千八百万老三届学生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立即送到了农村。假如，中苏之间真的开战，把枪发给这些藏在深山老林中的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发给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那么，他们必定是敢于冲锋陷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梯队。他们必定是敢于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好儿男。他们必定会为保卫共和国而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忘记了知青们上山下乡的主要地点并不是中苏边境。“回忆录”里也有不那么慷慨激昂的地方：“七一年的夏天，解放军的一个通讯兵学校来法库县招收新兵。这是一个特种兵不是公开地大规模的征兵，军队的代表在县城里内查外调直到面对面的了解，相中我与法库县电厂的一个小伙子。当我们填完征兵登记表，准备穿上军装跟他们回部队的学校，学习通讯技术的时候，广播站的领导安排我到外地出差，当时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等我硬着头皮出差回来的时候，发现部队领兵的解放军干部已经走了。当时我那心情真是又急又恨，恨不得骂娘，真想立即卷起铺盖卷回三尖泡当我的知青去。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还是不能蛮干，这里再不好也比青年点强，这里再累也比青年点轻巧，有多少知青羡慕我的工作啊！……”红河谷到底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后来的史学家一定会感谢他的这句真话：

一个把上山下乡当成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人，同样不喜欢从事农业劳动。

红河谷对那些年的历史作了他自己的解读，他的解读会给后人带来误导，但是这不能怪他。他所经历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阶段，而文革和上山下乡应该说是特殊之尤。中国政治所特有的神秘色彩象一层烟雾挡在多数人的眼前，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解之谜，就连我们这些亲历者也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在揣测，然后争论不休。从另一个角度讲，时代的变迁一下子打碎了在过去被奉为神明的东西，而理论解释不了令人眩目的变迁，理论显得浅薄而苍白，于是有的人回过头去向“毛泽东思想”寻求答案。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热”重新泛起的原因？

悲也红河谷，喜也红河谷。悲的是他壮年早逝，留下了尚未成功立业的孩子和无助的妻子；喜的是他在思想上终于“从一而终”了，不必去经历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那种铭心刻骨的涅磐般的痛楚。因为涅不涅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权利。正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华知和老三届两个知青论坛上没有对红河谷发表的文章展开批评或者讨论，即使有个别批评的贴子也都被管理者及时删除了。对一个垂危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让他含着微笑离去更让人欣慰了。

（原文载于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第 6 期《知青》杂志）

作者简介：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初中生，下乡插队到内蒙古。现在北京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宝嘉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路上飘满红罂粟

——关于诗的回忆

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罂粟为什么开红花》，这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美的课文。丹柯举着自己的心向前走着，照亮了森林中的路。在他的身后，在他的血流过的地方，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

后来读北岛的《走吧》：“……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壮的美。这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被迫中止了学业，又被迫脱离了正常的生活模式，思想却依然惯性地沿着以往多年形成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轨迹运转。当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撞击得龟裂、扭曲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受着那种锥心刺骨的失望乃至绝望的痛苦，一面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读书、写作，并且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以文会友，形成了若干个群体，从不同的角度与途径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当时北京学生中这样的群体很有几个，互相之间也有一些多边的接触和重合。在这些群体中孕育了当今许多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和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在我的周围，比较固定的成员先后有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戎雪兰、潘青平、武嘉范、陶洛诵、张雷、孔令姚等人，男四中号称“三剑客”的赵振开（北岛）、曹一凡和史康成，还有清华附中的仲维光、宋海泉、郑光召（郑义）、甘铁生、刘满强、车宏生等。

那时有不少人写诗。由于几千年民族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上以毛主席诗词为主要教科书的诗歌教育，因此起初写旧体诗的人居多。但是尚谈不到创作的冲动，只是一种渲泻，把那种混杂着青春、理想、郁闷、茫然和反叛的情绪浓缩在字斟句酌之中。不过后来成名的大诗人当时尚未登场，想是在厚积薄发。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以弟弟养在瓶中的热带鱼为题，写了一首《临江仙》：

剑头凤尾翩翩舞，
清涟顾影婷婷。
静如秀玉动生莹，
彩鳞多婀娜，

锦腮自含情。

杯中有水乐便在，

何必逐浪平生。

龙门堪劝鲤兄明：

似我非无志，

终饰案头瓶。

一九六八年是理想主义的顶峰，夏天，我和女附中老高一的两位学长戎雪兰、潘青萍一同混入水木清华，冒名顶替住进大学生宿舍，过了一段如诗似梦的校园生活。不记得她们二位当时所读何书，我自己则是一本唐诗三百首，一套中学数学课本。每日黎明即起，洗漱已毕，便携卷踱上荷岛，开始一日的功课。那时正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一个早晨便能将字数如《长恨歌》的篇幅背得烂熟。下午骑车到体院游泳，晚上则乘着清凉的夜色，或荷塘赏月，或秉夜长谈。有一次，我们还趁着月白风清潜入颐和园，我和戎雪兰并排躺在排云殿脚下一只平底大木船的舱底，听微波拍岸，望斗转星移，推心置腹，海阔天空，人仿佛与山，与水，与风，与月溶化在一起，进入了一种宠辱皆忘的无我之境，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那是我至今难忘却绝难再有的一种感觉。

那时我十七岁。十七岁正是人的一生中的春天，是充满诗情画意的阶段。但这种诗情画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便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不久，我们被清华工宣队发现，通知女附中将我们三人“押解”回校，隔离审查，随后便被淹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作鸟兽散。

从六八年下半年起狂热的理想开始降温，对人生和社会的思索开始走向深化。贫穷，寒冷，饥饿，劳累……究其竟都还不是最深的痛楚，大环境的压抑最令人窒息。

戎雪兰在我人生中有过重要影响。一九六七年初我们相识，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她多才多艺，不仅国学造诣很深，而且游泳，滑冰，拉手风琴，样样都很漂亮。她有思想，有主见，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很杰出的。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去了内蒙，她去了白洋淀，从此便音讯渐稀以至全无。我在一九七零年曾有诗给她，其中有“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的句子，表达了我对她的思念和敬重之情；她回我曰“芳凄草迷归路断，绿绮久损恐难弹。绻纸虽感暖君意，无奈岁月易温寒。灵旗空扬赤子絷，朱帘待秀正辛酸。去载玉关一掊土，胜似秋山枫叶丹”。近日听说她在美国做社会学博士后，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甚至白宫的关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本来就是龙象之材。

一九六八年冬季我到了内蒙农村。当时经历了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又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还生了一场肺炎，精神却并没有全垮。有《满江红》词一首为证：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

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

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缨，赴蛮鞑。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

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这首词一寄出，应者甚众，大约能有三十余首。可惜绝大部分都已散失。记得闫恒有“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的句子。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大病初愈踏上归途。从内蒙经河南、甘肃、山西，辗转漂零了五个月，终于回到北京，在几个朋友家轮流栖身。这时又写了一首《满江红》，算是对朋友们的回答：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

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

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

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儒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到过著名的黄河古渡口——风陵渡。那时风陵渡铁路大桥还没有修通，行人往来都是乘摆渡。船仓很深，抬头只能看见沉沉的天色和船夫们绷紧了劲的身躯。船驶入激流，开始颠簸，那船身一倾的瞬间，只见滚滚的黄水仿佛来自天边，无涯无际，气象苍茫，使人顿生悲壮。那首不记得何时读过的《箜篌引》不觉涌上心头：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我们是在渡一条历史的河。

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

燃起的香烟里漂浮过未来的幻梦

浓厚的烟雾里挣扎过希望的黎明

可如今这烟缕仿佛是心中的愁绪

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

我的命运是辗转漂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

只希望敲倒在朋友的门下

得到一点微薄的施舍……

这些诗句在我心中一遍又一遍低吟浅唱，仿佛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溢出，仿佛是在我自己的血管中流淌，使我激动不已。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鱼群三部曲》等。这些诗我至今会背。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从那以后我便没有再写。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郭路生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启发和激励了一批出色的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郭路生，称之为当代新诗的第一人是毫不为过的。而我自觉在美觉的涵养和哲理的思辨方面都很有限，超越不了他的高度。因袭又不愿意。二是清查“五·一六”清到我头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受到监视，惹不起这个麻烦；三是不堪生活的重负，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特重体力劳动才勉强能够其力自食，纵有诗情也没有诗意了！

第一次读到赵振开的诗是在一九七二年前后：

把我的话语传向四方吧，
——长风的使者！
我是那漆黑的午夜里
一把黎明的火
我是那死样的沉默中
一首永恒的歌！

这几行诗引自赵振开于一九七一年夏季去湖北沙洋干校探望父亲返京时在江轮上所写的《在扬子江上放歌》。

那时正是我人生的低谷。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在完全陌生的人群中，如同陷入黄河险恶的漩涡，使我元气大伤。我想念北京，但北京留给我的也是痛苦的记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痛切地感到死的诱惑。

死去，
难道只为痛苦的解脱？
活着，
难道只为唱理想的凯歌？
……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为什么？

是因为世人的勒令，

还是我自己的软弱？

……

去（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吧，

尊敬的勒令者！

我不会死在您的前头，

倒担心您棺材的单薄。

我们还要亲自尝试

用纯洁与真知将人类化合；

用原子武器去征服大熊星座，

为宇宙联合国的第一届大会举杯祝贺！

……

也许是我死的决心本来就不大坚决，也许是赵振开的这些诗行将我从迷津中唤醒，我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软弱了。

七二年底到七三年初我曾回京小住，结识了北岛、多多和芒克等人。这时的北京已是新诗的盛夏，而来自白洋淀的诗歌则是其中的一支劲旅。我赞同今天的评论家们用“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称谓来界定当年的诗歌现象，它至少应当有两层含义：第一，当年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了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白洋淀作为水乡，它符合人类“逐水草而居”的天性；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水乡，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知识青年对现代文明的眷恋与追求。在当时思想交流媒介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白洋淀与北京的距离便成为不可多得的一个优势。尽管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文化的， 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和政治文化中心， 在反文化的表层下有一条巨大的思想文化之河在缓缓地流动着。唯其如此，处于这一流域的白洋淀才得天独厚， 成为人杰地灵的诗歌的风水宝地。第二， 广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自然包括当时主要生活在北京的地下诗人们，如郭路生、北岛、江河等人。但是“群落”并不是流派，它不是诗风的集合，而是诗人的集合。我喜欢郭路生深情的新格律诗，也喜欢北岛的凝重，芒克的率真。更何况即使是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品味。从这个角度理解，“群落”的提法很迷人，很原始，很自在，令人想起半

坡村，想起山顶洞，回响在山野之间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　蛮荒之地上开垦文明的劳动。

当时正值巴黎公社二百周年。生活在压抑之中的地下诗人们无不有感于这个题材，纷纷拿起笔。我一直不曾谋面的衣锡群偶露峥嵘，以一首《巴黎公社》奠定了其在诗坛的永恒地位：

奴隶的枪声汇进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象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象血滴，象花瓣
贴上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露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长青的无花果树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了孤独的剑

当年写巴黎公社的诗里，衣锡群是最好的。曾写过“我从天空慢慢地下降／梦轻盈地落在我的心上”这样好诗的方含也有作品问世。但读到衣诗后，便收起了自己那首，从此不再示人，成为“眼前有景吟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一段佳话。

多多是正宗的白洋淀诗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生得唇红齿白，眉目清秀如少女，诗却写得动荡不羁。他的诗也最多，我见到时就已有两大本，用的是当时文具店所能买到的最豪华的那种三块五一本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其中一本的扉页上题着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杜琳娜或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句。见到芒克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总象是蒙着一层薄纱，那是在七三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和赵振开相约到白洋淀去探访我的同学陶洛诵，我们乘的是夜间零点从永定门始发的慢车，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宋海泉，当时他正在白洋淀寨南生产队插队，是我们中间博大精深的杂学家和忠厚长者。我们于清晨到达保定，在站前的旅客食堂吃了一道名称很有诗意的菜叫作“桂花里脊”。从保定乘长途汽车到安新县城，再从县城走水路到陶洛诵落户的邸庄。就是这次白洋淀之行我们还到了淀头。淀头是姜世伟、栗世征和岳重落户的地方，当时只有姜世伟一人在村子里，他将我们送到端村。在那道长长的河堤上白茫茫的夜雾中，他活泼泼如顽童般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把这个印象与他诗中的忧郁统一起来。

从这年的春天起我与赵振开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因此对他或许有比别人多些的了解。赵振开

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一的学生，祖籍浙江湖州。湖州素以产毛笔、丝绸和羽毛扇而享誉天下，出过赵孟(FU)、吴昌硕等艺术大家，同时又是陈其美、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的故乡。赵在家中是长子，上有严父慈母，下有弟弟妹妹，这大概是他那执着的责任感和广博爱心的天籁。他个子高高的，有很浓的书卷气，待人真诚和善如赤子。他是上山下乡大潮中的幸免者，六九年便被分配到北京六建做建筑工人，福兮祸兮这对人生来说可以是难得的一段坦途，但对诗人来说又分明少了几多体验的机会。如果应时顺势，他可以不必做一名好工人，只要利用让人眼红的八小时工作制的业余时间读读书，到七七年去报考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学系，毕业后去当编辑，当作家，当讲师……，照样可以玩诗，玩文学。可他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硬是把自己逼上了风口浪尖！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三年，他的诗风基本是叙事的，格律的，顺时空的，二维的，可视的。当然对于一个初涉诗歌的青年来说也不免有时失之单薄、苍白。我在他的诗里时而看到一个踟躅在雨雾中的青年，嫉世愤俗的心随着头顶的乌云在驰骋，风吹乱他的头发，掀起他的一角衣襟……；时而能见到熊熊燃烧的火炬，湛蓝的大海，听到高亢的小号和咆哮的江涛。色彩是浓烈的，音调是激越的。

这个时期赵振开的作品多数未收入后来的集子，大概是认为它们的稚拙？但这些诗中已经蕴含了他的理想。且请看那时的《五色花》：“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掘回重土培在她的脚旁。我要用北斗的勺把／舀干太平洋的海水／轻轻浇在她蓝色的温床。我要收集太阳的无数金丝／编成抗寒的暖绳／缠在她那嫩绿的枝杆上。向着蓝色的未来／向着金色的阳光／向着永恒而无限的空间／你开吧／勇敢地开放！……假如有一天她也不免凋残／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希望／保持着初放时的安详。”有些诗今天读起来仍然感觉很美，但又仿佛句句都是不祥之兆：“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写于一九七二年一月的《你好，百花山》是初期中的重要作品。它把一次真实的出游写成一个梦境，诗中第一次出现了“绿色的阳光”这样超自然的表象，预示着诗人开始酝酿风格的转变。

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赵振开是写诗的天才，但他敏感，勤奋，执着。当年我所认识的赵振开不仅写诗还学美术，摄影，唱歌，从各个艺术领域和艺术形式中汲取着，感受着，丰富自己，寻找着艺术创作的最佳视角、质感和旋律。我曾见过他在这个时期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上没有人物，只有朦胧暮色中萧瑟湖畔的一条长椅，照片的背面有诗人的题字：多美啊，多静啊，我的心又快活，又忧伤。我想，这当是诗人与他的女友第一次互诉心曲的所在。

这个阶段的诗作大约有三十余首，其中写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告诉你吧，世界》就是后来那首脍炙人口的《回答》的原型：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已经发现，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哼，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也许你脚下有一千个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影子无形。

我憎恶卑鄙，也不希罕高尚，

疯狂既然不容沉静，

我会说：我不想杀人，

请记住：但我有刀柄。

曾经有北岛的关注者向我提出质疑，认为《回答》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一九七九年，理由是“冰川纪已经过去”应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此我想我无意中留存至今的诗稿是可以作答的了。

一九七四年赵振开在写诗的同时，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中篇小说《波动》，并曾以它作为生日礼物赠给他的女友。我有幸较早读到它的初稿。它行文优美、流畅，语言与其说象小说倒不如说更象诗。但不知是作品的结构、叙事方式还是其中某个人物，总让我想起《多雪的冬天》。在郭路生作品研讨会上，作家史铁生曾说：我们当年也都是从写诗开始，写诗不成才写起了小说……这当然是作家的自谦之辞。但是诗人更多的是灵气，小说家更多的是功力，能象赵振开这样写诗兼写小说的并不多见。我中学的另一个同学高红十当年是《绿原》杂志的编辑，她曾向我谈起过《波动》的发表。那是在一九七九年，她们编辑部本打算将其与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同时刊登在《绿原》创刊号上，但恰值胡耀邦主持召开“剧本座谈会”，给当时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飞天》、《在社会的档案

里》、《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泼了冷水，《绿原》创刊号也因此改了版。后来，湖北的《长江》上发表了《波动》。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是他的诗完成向自己的也就是北岛风格转变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太阳城札记》、《冷酷的希望》、《日子》、《在带血的冰河上》以及《诅咒》等诗作的问世。其中后两首未见公开发表过。在《太阳城札记》中那一节著名的一字诗（生活：网）里，他倾入了太多的内涵，自己也被这个意念困扰得透不过气来。一九七六年五一，他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三位好友一同去渤海油田海上钻井平台。在归来的船上，四人商议以海为题作诗，史康成当时的诗句是“海湾象只烟斗……”而他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望着垂悬在大海上的星空，那个无法摆脱的意念又涌了上来：“大海象一张黑色的网／星星是网结……”

的确，生活象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他。这几年，姑且不论国事，在赵振开个人生活中也是多事之秋。一九七五年，他相处几年的女友向他作别。她说自己是个俗人，她没有勇气做一名诗人的妻子。只有一件事，事隔二十年她才说，当年他让她织的那副手套，不是没有织，而是只织成了一只，第二只拆来拆去无论如何也织不成与原来一样。她实在不善针黹。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最最钟爱的妹妹珊珊在湖北下水救人不幸罹难。赵珊珊生于一九五三年，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好女孩，死时只有二十三岁。一九七三年珊珊二十岁生日时，赵振开写了《小木房的歌》送给妹妹：“为了你，春天在歌唱／草绿了，花红了／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松鼠窜，杜鹃啼／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雨珠落，水花飞／洒在如痴的小河上。为了你，风鼓云帆去远航／潮儿涌，波儿碎／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长眠的哥哥醒来了／睁开眼睛向外望。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没有一屑俗尘，这是在那个年代里最可珍贵的情感，是兄长对妹妹令人心颤的呵护和温柔。一九七五年十一是赵珊珊生前最后一次回京探亲。那首《黄昏：丁家滩》的字里行间仿佛还镶嵌着她纯情的笑脸。对于珊珊的死，朋友们震惊、悲痛，振开更是哀伤欲绝。他匆匆赶到湖北，在妹妹的遗体旁，握着她冰冷的手连连呼唤。可珊珊没有回答，宁静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来到失事的地方，把白色野花撒在河上，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她还是没有回答。她正象葬身的那条河一样明朗、宁静，她用死否定了那个恰恰相反的世界……振开在信中对我说：“如果死亡可以代替，我情愿去死，毫不犹豫，换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容不得我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能有点价值和目的。”

北岛的《界限》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痛楚和矛盾中问世：“我要到对岸去／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也涂改着我／我在流动／我的影子站在岸边／象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我要到对岸去／对岸的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向我飞来”

这已经不是诗，而是一个灵魂企图超越自己的嘶喊。

人作为一个自然物种，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无论是作为自然的人还是社会

的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但由于自我意识，人又总是在企图超越这种局限，并以此证实着人的存在，实现着人的理想。因此，从表面上看，诗以人的经验为直接对象，以审美为显在特征，但是当诗人追求超越的时候，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本身就成了一种动因，一种人自身不断进化的动因。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也创造了人。

此岸与彼岸之间本无一条明显的界限。为了显现它，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参照系——河流。同样，当以人的自我意识为参照系的时候，就可以将以白洋淀诗歌为主体的新诗与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抒情诗区别开来。这是一个诗的本质的区别。至于诗的形式，是格律的还是非格律的，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它表现的对象是人类普遍的永久的情感还是诗人片刻间乃至下意识的感觉，则是见仁见智，无关宏旨的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新诗也许有一点象佛教的禅，有缘者当下即悟，无缘者百思而终不得其解。很多新诗我自己也始终没有读懂，也常常困惑于究竟是自己资质愚钝还是那些诗本来就是皇帝的新衣？尽管如此，作为当今许多新诗泰斗的同代人，我仍然感到自豪。

附注：

1998年10月31日，在赵珊珊离开我们二十多年后的这一天，亲人和朋友将她的骨灰从湖北接回北京，安葬在小汤山下的华夏陵园。在洁白的大理石墓盖上，镌刻着诗人北岛为妹妹题写的《安魂曲》：

那一年的浪头
淹没了镜中之沙
迷途即离别
而在离别的意义上
所有语言的瞬间
如日影西斜

生命只是个诺言
别为它悲伤
花园毁灭以前
我们有过太多时间
争辩飞鸟的含义
敲开午夜之门

孤独象火柴被擦亮
当童年的坑道

导向可疑的矿层

迷途即离别

而诗在纠正生活

纠正诗的回声

宝嘉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鹪鹩巢于这一枝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庄子·逍遥游》

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是一本未曾裁开页子的旧装书，尘封在心的一隅，一直不想打开，不忍打开，也不敢打开。

一

一九七零年春节过后，我又一次来到兰州。

兰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五岁时，父母随着支援大西北的大军到兰州时我就跟着来了。我记忆中的跃进秧歌和锣鼓就是和兰州联系在一起的。九岁，即使父母是双职工、铁路局的干部，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于是我和哥哥被送回北京住在爷爷家。那是一九六零年。

而这次回来我已经十九岁。经过内蒙—河南—山西的辗转流离，纵然仍有“千秋怀，一枝笔”的豪气，也觉得该为稻粮谋了。抱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决心，我在六月中旬乘上了砖厂招临时工的大卡车。

砖厂在兰州的最西端，距城区有三十多公里。再往西是山，山那边是皋兰县，人们管那里叫北山。北山很穷，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总会有人翻过山来行乞。在西北，一切与地理有关的概念都是狭长的：甘肃的版图像一柄如意，或者一根大棒骨；兰州是两山一河绵延百里的带状城市；而我们的厂区是九公里长两公里宽的狭长一条，东西向，也是依山傍水。那山叫凤凰山，山上只有裸露的黄土和稀稀拉拉的骆驼刺；那水是黄河，缓缓地在厂区南边的坡下流淌。

我被分配在七连。那时全国上下都兴军事化的编制，七连其实就是七车间。每个车间有一座大轮窑，制砖所有的工序都是围绕着轮窑进行的，轮窑是车间的灵魂。

轮窑据说是从德国传进来的，发明人叫霍夫曼，所以轮窑又叫霍夫曼窑。俯视轮窑是个巨大的椭圆，立剖面则

是梯形，窑里那一转圈都是相通的，被二十四个窑门等分。进到窑里，一股燎人的热气扑面而来，地面上一层绵绵的热灰烫得人要把两只脚来回倒着站。

制砖的流程从掘土开始。工人们先在厚厚的土层上打眼，埋炸药，把土炸松，然后用手推车把土推到制砖机的入口，在那里按一定比例加入煤粉，用输送带运进搅拌机，和成泥，挤出来，就到了切坯台上。操控切坯台的通常是位姑娘，她照看着钢丝刀把泥条整齐地切成二十一块砖坯，一排排码在切坯台前面的板子上。七块板子为一车，由拉坯工人运到露天的坯架，让等待在那里的女工们码放。

坯架很长，很远，在蓝天下延伸，有时一直到河边。女工们两人一组，由远而近地把砖坯码成三块一层、七层一垛，让它们自然晾干。刚出机房的砖坯冒着热气，深棕色，表面光滑滑的，像新蒸出的食物一样新鲜温暖。湿坯每块重七斤，码坯子每次抱三块。一台砖机日产十万块，如果码坯子的女工有十人，那每人每天过手的重量就上吨。汗水浸透她们打着补丁的再生布工作服。没有拉坯车来的时候，她们就坐在身后的草帘子垛上，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着昨个夜里的如何如何。那些草帘子用来遮盖码好的砖坯，上面还要压一层瓦，为的是防雨。夏天码坯子会使人想起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诗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机房有时候还要组织"放高产"，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夜半时分，日产达到十几二十万块砖坯。"放高产"虽然累但是吃得好，有羊肉泡馍，酿皮子，炸油饼，有时还会炖肉。加上那时候年轻体力好，所以也没有太觉得吃不消。

干透了的砖坯由装窑工拉进窑，从下到上码好。最底下一层的砖坯像脚一样立着，那叫"打腿子"。拉坯的人像拿着两本书那样，书脊对着书脊地把砖坯抛向码窑师傅，砖坯像两只蝴蝶那样飞到师傅面前，就这样向上一直码到窑顶。码窑最要紧的是脚下要有"根"，站住一个位置就只能转身不能移动，因为码好的砖坯像搭好的积木一样是中空的，一脚不慎就有可能全窑皆塌。每装到一个窑门时有个跟班的中年女工把门用碎砖砌起来，外面用泥糊好。

烧火的人居高临下地站在窑顶，提拉风闸，从窑顶的火眼向下投煤。这是个技术活。烧窑师傅姓李，慈眉善目，天水人。我们每天从食堂买来馍馍交给他，他帮我们放到火眼上烤，烤出厚厚的脆脆的一层馍皮，那味道真能把人给香死。"打铁、烧砖、磨豆腐"是常言说的"三大苦"。砖厂的活算得上体力劳动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吃五十二斤的定量，百分之七十是细粮，还有百分之三十是粗粮。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工一般吃不了那么多，就把粗粮剩下，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去和农村来的合同工们换细粮。这个定量我一直吃到回北京，吃到取消粮票。粮食定量高，饭也就做的不那么秀气了，食堂蒸的馍馍半斤一个，沉甸甸的，椭圆形。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放着吃。"不可以张开大嘴去咬，馍馍怕哩！"同宿舍的小谢这样说。她有一种泛灵论的宗教倾向。

烧好的砖，要先打开窑门晾，再由出窑工人拉出来。所谓轮窑，就是在二十四个窑门里，一门赶一门、一圈又

一圈地向前烧，从开春一直烧到立冬。

那时候讲抓革命促生产。白天促生产，晚上抓革命。每晚车间都要在饭堂里组织开会和政治学习。人们洗去一天的劳顿和灰尘，换上干净衣服，提着马扎或者小木凳，互相招呼着朝饭堂走去。青年女工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一身簇新的再生布工作服，领口露出水红天蓝杏黄或者苹果绿，也许是衬衫，也许只是个假领头，手里拿着毛线活计，或者正在纳的布鞋底。男工们最正式的衣服是黑条绒的中山装，硬撅撅地箍在身上，领口上缝着一条已经有些发黄的白色衬领，看上去很庄重，庄重之中又有些许腼腆。

老工人都喝砖茶，茯砖。外形像砖，色泽黑褐，滋味醇厚。茯砖是产于湖广而盛行于陕甘宁青新的重要饮品，也是这粗犷高原与婉约江南的有限联系。老工人们说“一日无茶气不通，三日无茶要生病”。所以他们每天开会前必用特大号的搪瓷缸子在炉火上将茶煮沸，端着向饭堂走去。这里的男人们也会编结毛线，劳保手套是舍不得戴的，攒起来拆了结线裤。于是经常看见有人在开会的时候把已经结好的一条裤腿搭在头颈上，手里飞快地结着另一条。开会学习其实是一件快活的事，上面坐着的人读报纸，下面听着的人一边手里忙活一边说着家长里短，有时还抑制不住地发出欢快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应承读报差事的是我，因为整个连里只有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说得好，而且念起报纸来不打磕巴。也有的时候会组织讨论上面发下来的题目，比方从哪里发下来了一些案例，让我们发扬人民民主专政，讨论如何量刑。其中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大家众口一词地拖着长声喊道：“枪毙~~~！”另一个案例是叔嫂通奸，听众们就更快活了，齐声高叫：“枪毙！枪毙！枪毙！”反正大家都不认识这些人，也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专政这些人会起什么作用。

还有唱歌。一般在会前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民兵连长起头。有一次他这样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于是大家跟着唱。唱完这一句，却怎么也没办法再往下唱，又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反复几次，才恍然大悟是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这第一句给忘了，爆发出由衷的哄笑。

革命，有时候就是一场娱乐。

二

时间一长，和连里的工友们慢慢开始熟识。一个连队有百十口子人，除去干部，大致可以分成老工人，临时工，合同工和学徒工这几部分。老工人一般是在六十年代从农村来砖厂工作的，工资往往是四级，每月七十元；临时工来自兰州市区，一般女工是二级每月四十三块七，男工是三级每月四十七；合同工来自附近的榆中等贫困县，普遍是三级；学徒工则是直接从学校分配来的，现在想应该是所谓“新三届”。学徒工的工资虽然不足二级，但在工厂里相对是娇生惯养的贵族，因为他们是按国家计划招的固定工，全安排在机修、电工等技术工种。不久，厂里

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这些人几乎全数进了宣传队，再后来又几乎全数进了机关当干部。我那时候的月工资是四十三块七，我的理想是将来能够挣到七十块。

老工人中兰州本地人很少，大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按照地域形成不同的“族群”。机房的工段长（那时候叫排长）罗来福是安徽宿县人。据《宿县地区劳动人事志（一九九一年征求意见稿）》的记载：由于在黄泛区中受灾最重，加上淮海战役在宿县打了一场大仗，解放初期当地的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一九五零年当地政府先是组织生产自救，然后又在一九五三年请求兰州等地的大型企业到宿县招收了一千余名工人，安置在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兰炼、兰化等基建施工和建材行业，随之牵动了近万名宿县人前来依亲就业和依亲供养。大跃进时，宿县劳动局再次组织了数千名移民到兰州及以西地区支边，之后的大饥荒中有更多的人前来投亲靠友，终于形成了至少有三万名宿县人在兰州（以及河西走廊一线）定居的局面。我觉得罗师傅是灾荒之年来兰州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的儿子小名叫“兰州”，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后“兰州”到北京来当兵还来看过我，那时候他不到二十岁，应当是一九六零年前后出生的。

我码坯子的师傅姓杨，甘谷人。现在想起来她当时不过三十出头，生着一张俏脸，那眉眼像极了影星周迅，只是没有周迅的精灵古怪。杨师傅两口子都在厂子里上班，爱人是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像她们这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的老工人一般住在家属院。家属院大多是睡炕的，所以她和其它住家属宿舍的女工每天下班时经常捎带着挟一捆破草帘子或者其它可烧的东西回去“填炕”。“填炕”在这里不仅指动作，也指所有的可以填放在炕洞里把炕烧热的物质。冬日的黄昏，当夜落下帷幕的时候，小村农舍般的家属院就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淡淡的哀愁之中，让人无端生出对“归宿”这两个字的向往。在杨师傅她们的衣服上经常有“填炕”的气味，至今我都觉得那种气味很亲切。

和我一个宿舍的小谢是兰州人。人们议论说她的丈夫在“一打三反”中因为什么罪名被抓起来了，她才出来干这个活。她的衣着很讲究，下班后穿一件墨绿色的毛哔叽上衣和有裤线的裤子，的确良衬衫的白领子总是竖着，显得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她的两个孩子都管她叫姐姐而不叫妈妈。每当想到她的时候我都会记起那个五岁的、长着一双圆眼睛、留着娃娃头的小姑娘从远处向她飞奔而来，大声地叫着“姐姐~~！”小谢是回族，她的女儿叫索非亚。

喜儿就是那个坐在切坯台后面的姑娘。“好姑娘啊！”人们都这样说。她家在兰州城里，长着瓜子脸，单眼皮，眉毛和眼角微微向上挑着，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笑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活脱就是她的写照。喜儿自幼就有一个耳朵是聋的，所以和她说话要格外大声，她也会大声地向人问话和答话。喜儿很勤快，每天她都早早地来到机房，给机器膏油，拧钢丝。拧钢丝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两端的环套一定要拧成麻花状，这样才能有弹性，不容易断。开工了，她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戴一顶工作帽，腰肢像鼬鼠般灵活，神气活现地坐在切坯台后的高椅子上，挡泥条，踩机关，挂钢丝，眼疾手快。拉坯子的小伙子们把砖坯一车车地拉出去，又赶快拉着空车子回来，坐在架

子车的支腿上卷一颗烟，排队等着拉下一车。他们看着喜儿协调而优美的动作，有时候就忘了往前走。

有个叫老未的合同工，开始每天早早地到机房来帮着喜儿拧钢丝。起初他拧出来的钢丝两端不是麻花状，而是一根缠绕在另一根上。喜儿看了一眼，笑得一双眼睛成了月牙儿，用手在老未的背上打了一掌，叫道："错了哟，不是这样！"老未其实并不老，身材很高很健硕，头发乌黑打卷，浓眉下一双眼睛的颜色很淡。"色目人"。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喜儿，工友们都玩笑地管老未叫"大春"。

有一天午饭后喜儿老半天都没有来上工，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罗排长气急败坏地自己坐在切坯机后操作。我们码了好几车坯子时喜儿从坡底下走上来了。她走到我的坯架子旁，我看到她的脸色格外红润，眼睛格外明亮，她对我说："我们，那样，真好啊。"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说的"那样"是哪样。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饭堂学习的时候，民兵连长带人把老未从喜儿住的宿舍里绑了出来，说是当时两个人都只穿着内衣。再后来喜儿不来上班了，听说嫁了人，而老未从机房被发配到了窑上。

三

我进厂不久就被抽出来在车间脱产搞宣传。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按照连长的要求在连队的大门上挂上"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大门是用盘条焊的高大的拱门，我找了几个废弃的汽油桶盖子，用黄油漆涂成黄色，再用红油漆写上工业学大庆，下夜班的窑上师傅们帮着我把它们固定在大门上。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书，思考过许多问题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像砖厂这样的生产方式应该叫"工场"而不是"工厂"；我还想到过大庆模式在工业系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类思考在这里找不到受众，而写大标语要比码坯子轻松许多。除了写标语我还用了很多油漆刷红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墙，在上面画了两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绘画作品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厂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开一次大批判会，连里就让我写大批判稿，批判并不认识的其它车间的某个人。发言一般是连队的领导照我的稿子到会场念，他们经常会念错字，好在没有人仔细听。

终于有一天我的好日子结束了。

那天连长到厂里去开了会，回来后就召集了一些人关着门嘀嘀咕咕，再后来我看到脱产的学徒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小房关着门在写大字报，他把自己的宿舍腾空，那些大字报后来就集中张贴悬挂在他的宿舍里，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也真是很难为他写了那么多毛笔字。那间宿舍就在我的隔壁。他们先是组织工友们去看，后来连里的政工干事出面把我也叫过去看。大字报的内容很耸人听闻，严正追究我和某个组织的关联，但我反倒坦然了。因为参加一个组织恐怕是要填表的，而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组织，更没填过任何加入什么组织的表。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波及到我。因为北京不断来人到厂里找我外调，有调查清华大学徐一飞的，有调查三十五中

郝仁的，还有调查学部冯宝岁的。厂里对出了我这么个重要人物受宠若惊，也对这些外调应接不暇，索性让我停职写材料，在宿舍里关门闭窗地写，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随便会客。好在并没有熟人到那地方去找我。也许是因为文革时我年龄还比较小对许多事情没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记忆中的片断往往不干政治底事。对徐一飞，我挖空心思也没想起什么有揭发价值的线索。郝仁倒是让我想起一条，因为我听说过他想当电影演员，于是心一横揭发了。在那个年代，想当电影演员不能说不是罪过，横陈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大路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这是在对抗上山下乡运动。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监护人”，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一九六八年十月，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然后带到法学所，一共有十四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据说符浩大使的夫人焦玲就曾经交代说冯宝岁发展她参加了“五一六”，还填了表。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这四个女儿各自之间只相差一岁，宝国生于一九二六年，属虎，乳名寅官；宝万生于一九二七年，属兔，乳名毛兔；宝岁生于一九二八年，属龙，乳名小辰。这当中哪里还会有宝华和宝民呢？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宝中和宝国也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出版公司，曾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事情的发展总是很有些戏剧性的，张树柏离开瑞士后，新中国的接收大员住进了伯尔尼的这所官邸。几年之后，派驻这里的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喜获麟儿，这孩子便是后来的诗人杨炼。杨炼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将要读书才离开那所官邸。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冯家外公叫庞敦敏，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但庞冯织文并不是四姐妹的生母。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

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庞敦敏是苏州人，细菌病理学家，曾任日据时期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著有《病原细菌学》等书。庞敦敏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汪逢春、朱家溍、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我小时候在宝岁阿姨家里见到过许多有“敦敏”提款的精美折扇，后来不知都流散到何处了。

宝岁阿姨罹难后，刘钢去山西插队，刘山叔叔带着年纪尚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兰州，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秉性单纯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之可能。我曾经读到当年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竟然没有人提到她，那十四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只是在关于“五一六”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条线索：周恩来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冯宝岁是坏人”。也许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卿本无辜，年仅四十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五一六”一查经年。何时不查了我已经记不清，从记录我被批斗时群众发言的笔记本上看，至少延续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开始是为什么查，然后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为什么又不查了，我始终没闹明白。直到这两年才听广西的钱文俊说“五一六”其实是莫须有的，当时老周想借这个名堂找出点子鸟人来为文革的损失承担责任，捎带着把造反派作为一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力量加以摧毁。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陈伯达就被整肃，随后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们顶雷，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钱兄也当过“五一六”，而且是大号的，韦国清云：钱文俊要不是“五一六”，广西就没有“五一六”了。

四

如今我搜尽脑海里的词语，怎么也描述不出当年在砖厂时的色彩，那种贫穷，那种灰暗，那种在黄土蓝天下的压抑和挣扎。

我当年的宿舍在河岸，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东头的一间。宿舍的南窗对着黄河，河对岸是兰炼兰化的几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焰，灿烂辉煌，有如一幅壮美的油画。黄河在火光的辉映下缓缓地流淌，不舍昼夜。在我宿舍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那棵沙枣树常常无端地闯入我的梦中，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是在四、五月开花，花朵小小的，鹅黄色，点缀在银灰色的叶子里。最难忘是沙枣花的香，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让人神闲气定的香气。

停职写检查的日子结束以后，我又回到生产岗位，只是不再码坯子，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装窑班。那里除了我

还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坏人。在我之前有过一个叫任之良的山西老头在那里受苦，任之良是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提出要见二哥，这才从省里市里到厂里一通忙活，把任老头解放了。

我在装窑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一起搬砖坯，甚至码窑，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端出饭来一起吃，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孩子没啥，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窑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他的婆娘，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在我的班里糊窑门，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什么正在想些什么以及我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血泪斑驳，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但是在装窑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每天东方即白，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也不知它的名字，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我的砖厂，我的沙枣树，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五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她不再坐切坯台了，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目光不再灵动，面色不再红润，衣襟上

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窑上干活以后，因为是高温作业，我和其它窑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来不及想什么，昂起脸盯着她看，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什么后果，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我想说：

喜儿，对不起！

二零零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宝嘉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纪实】：

琐事

一、逼良上山，以暴易暴

上海虹口区有一条马路叫溧阳路。在溧阳路的尾段有5排共五十几幢英式独体别墅（这些别墅现在列入第四批上海市近现代优秀建筑）。别墅群后面是一片棚户区。我最初的家就在别墅群里的某幢里。1953年圣诞前夕，我出生在虹口某福音医院里。

我是1960年上小学的。在1—2年级这个阶段，我是经常被住在棚户区里的同学欺负，常常是鼻青脸肿的，根本就是是毫无还手的能力和胆量。

进入63年后的某一天的上学，我带着和了鸡蛋大煎饼（现在上海人俗称这种煎饼为裹脚布）出门，但一直不吃，直到临近学校时才开始吃，且很小口的吃。现在想想很好笑，这不是显摆自家是不吃泡饭的吗？

到了学校门口，有个右派出身的同学向我“哈夫”一点，我很慷慨地拗一半给他。于是我们2个很招摇地进了教室。

下课了，照例有几个人来欺负我，于是那个同学就过来帮我。这下好了，形成一场混战或者群架。嗨！虽然我们2个照例是脸上开“菜市场”，但居然把对方打跑了。

从那天以后，一点不夸张地说，我是几乎天天打架。在欺负我的人看来，他们一定是要打回来的，在我看来，有了第一次的胜利，觉得我并不是怂包软蛋。于是就天天打，时时打。直到最后，我成了打架王而不许加入少先队。但我心里有个标准——我从不去主动找被人麻烦，总是别人先动手而我后还手，嘿嘿，这叫后发制人吧——这个标准或者说是原则一直保持到现在。

66年文革开始了，我家被抄，整整一星期。拉走一卡车的东西。我妈每天只要出门就被那些红5类把唾沫吐在脸上或者身上。我心里很是气愤。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很会打架了，但好手难敌四拳不是？于是我想着应该有一帮人来帮我。

再接着，弄堂里成了很多红卫兵组织，天天冲击那些黑5类家庭，我直觉得总有一天会冲到我家的。于是我加紧了在社会上混，开始学抽烟，打群架，身上自然是少不了刀疤之类的。

渐渐的，我开始小有名气了，最高峰时我那一伙的势力范围南到本区水电路广中路，北到四平路头道桥，东到海论路，西到大连西路祥德路，只要一说我的绰号，是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1967年到了，哥哥以游泳达到市级体育健将（少年组）标准的身份加入了上海体院的“上体司”去干革命了。

一段时间后的某天冬夜，家里突然冲进一群红卫兵，男男女女十几个，好象是“红上司”的？他们自报家门后便开口就要被子、要收音机、要缝纫机、要电钟等。

那时的我已经不是前几年任人宰割、欺负的我了，冲上去就要拼，但给母亲死死的拦住，她害怕极了，立刻唯唯诺诺地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红卫兵抬着“战利品”呼啸而去....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哥哥也许去抄别人的家去了？可自己家呢？也许他与那些红卫兵是暗中串通的？我越想越愤怒，这几个小瘪三居然敢到我头上动土？倍感丢人。现在想想，我决心报复是因为觉得脸面无光还是维护家庭财产？我到底把哪个放在首位？

第2天，我立马纠合一帮人，好象有十几个吧？记不得了。

到了深夜，一群“暴徒”手提溜长短不一的角钢、镀锌水管行走在马路中央，金属家什在寂静路上拖着，发出“哐啷、哐啷”的碜人声响，传出老远。

一脚踹开那红卫兵总部的房门冲了进去。自然是一场混战。但这些八旗子弟哪里是我们这些“江湖好汉”的对手？除一些女红卫兵外，把他们是一顿暴打。胆敢反抗的，一律鼻青脸肿地双手抱头而蹲在墙边，现在想起来，那场景就如同当下警察令流氓那样（会心一笑）。

那场“战斗”更是把2个红卫兵的打成重伤，一个头开花，一个胳膊骨折。兄弟们临走前大肆威风，顺便把那总部给砸了。并勒令他们，天一亮，乖乖地把所有我家的东西给送回去。这些个红5类是吓得簌簌发抖，连连称是。而那时。我才14岁！

那天，母亲下班回来，看见那些东西都回来了，那叫惊奇呀，连忙问，怎么回事。弟弟告诉了母亲。这下母亲吓死了。我壮起英雄胆说，老娘，别怕，有我呢！从今天起，谁要再敢把唾沫吐到你身上，哼哼....母亲说，怪不得今天进门时怎么都给我让路。儿子，你要当心，我们是好人家，好人家不能出打架流氓的...一副逆来顺受的胆小样。

我说，老娘，你放心，我从来不主动去打别人，但从现在开始谁要惹我家，那他得掂量一下。

很多年后，我弟媳突然对我说XX（我的绰号）原来是你呀？我说怎么了？她说今天她回娘家，碰到邻居，邻居说前几天看见她和我一起在马路上，问她：你边上的那个男人是谁？弟媳说是我老公的哥哥。邻居说，啊？他就是XX（我的绰号），是你老公的哥哥啊？

列位也许要问：那么你的绰号是什么呀？在《甲方乙方》里葛优教李琦这么回答“打死我也不说！”

二、矛盾互击，孰利孰坚？

在64年前，我家是住在英式的大洋房里。四清运动中，组织发现每星期都有母亲单位里的或干部或职工到我家去吃饭，于是认为母亲是腐蚀拉拢干部职工，再查，查出我家的房子是临解放时英国领事馆给的，于是立马责令限期迁出，因此就搬到了后来的住处。

66年抄家后，寡母的工资从从195元割至60元，全家人均15元，记忆中，每月的房租水电煤等约20元，余下40元就是母亲每天上班的车费和全部的吃穿以及“复课闹革命”的学费了。那年，3兄弟分别是15岁，13岁，11岁。

由于穷困，家里买不起荤腥，但逢有人办庆，无论是生日、红白喜事、满月什么的，我们3兄弟总是轮着跟随母亲参加这种筵席。参加庆筵总得有象样的衣服，但我们没有。因此连母亲一起，都是向别人借。现在回想起来，坐在筵席上的我（们），一定是眼放绿光的。于是就记盼着下次不可知的庆筵。而弟弟还搞了个记录，以便在下次庆筵时别轮错了。

直到现在，记忆中最深刻的有2顿饭。

一是头天买一条咸鱼，母亲说，买咸鱼有2个目的，省盐；因为太咸，就可以少吃。那鱼很小，舍不得用油，就蒸着吃。全家4口人围着。饭毕，我收拾饭桌，母亲说，不要把这些鱼头、鱼刺扔了，明天继续熬汤，还可以对付一天…….有一天，弟弟问我，是不是可以杀野猫吃？杀野猫？并且吃？按理当然可以，可从来没干过屠宰，再说野猫那么灵活，你怎么抓？我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几天后的下午弟弟与他的一个姓金的同学真拎着装着一只大野猫的麻袋到了我家。他们是怎么逮到的，现在是记不得了，但把麻袋里的野猫打得七孔流血以及那惨叫声是至今都能耳闻。

那猫终于不叫唤了，打开被猫血浸润透的麻袋，倒出那猫。乖乖，好大一只，足有十几斤。但眼下放在3个孩子屠夫面前的现实是，怎么去毛？这下犯难了。

突然想起大人们杀鸡是用开水烫的，于是就试。果然可以——这事如果延后几年，我就能很老练地给猫放血、

剥皮——此乃闲话。

接下来就简单了，开膛，把头、尾、内脏全部扔了，剁巴剁巴，象烧红烧肉一样，烧了一大锅。味道那个香、鲜，是我至今不能忘记的。

在3个孩子先暴啖一顿后，弟弟的同学拿走剩下的一半，另一半上了我家的晚饭桌。母亲问，那么多的“红烧肉”是哪来的？弟弟懦懦地说了。母亲流泪了….这就是剥夺？记得母亲曾说，我家的公司不已经给充公了吗？

由于出身于“资”字头，因此从来就是受到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的歧视和排挤。因此当红卫兵是与我无缘了，所以就拼命地“壮志坚信马列”而反复读毛选。70年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届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代表了。记得当时去会议报到时，有个搞会务的大人对我说，你知道“市积极分子代表”意味着什么吗？我茫然摇头，他说，这个级别在文革前就相当于市人大代表或者市政协委员。

扪心自问，对原罪这一说发历来是困惑的。虽然那时我说是初中，其实仅小学毕业，但由于大量地读毛选，已经产生对“血统论”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所谓给出路政策产生了疑问。若以“血统论”的矛对抗“给出路”的盾，孰利孰坚？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到1978年。

终于，在1978年底，云南爆发了知青大返城运动，而正当这个时候，自18岁（1971年）就递交了入团申请的我在被团组织考验7年后终于带上团徽。

这是巧合吗？我自知决非巧合。就在这刹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对共产主义的激情，他们怎么可以把加入组织当成拉拢、分化或者收买知青的砝码？纯洁崇高的共产主义大厦在我心中轰然坍塌。这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血统论”的矛绝对利于“给出路”的盾，孰利孰坚，不言自明，而所谓“给出路”政策的本质是糖衣毒药。

那年，我25岁，按团章，应该是退团的年龄了。

现在反思起来，自己从一个坚定的毛式共产主义者，甚至在家庭以及个人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景况下，依然保持信念不变到现在一点也不相信甚至反感共产主义，这证明了什么？是不是证明了共产主义的非正义性？

三、舔犊之情，垂垂母矣

妈妈一个人单住。她三十多岁就守寡了。妈妈是个漂亮女人，现在83岁了，但在同年龄中，她依然是个美丽的极具风韵女人呢……虽然腰腿也不很挺直了。

我一直希望妈妈再婚，事实上追求她的人也很多。但妈妈不愿意。她认为，那些男人是看中她的外貌。在她的思想里她最多50岁，还是很有风韵的。因此拒绝用诸如拐杖之类的，而在妈妈眼里我就永远只是15岁。

与许多老年人一样，什么菜没洗干净啊，唠叨啊，做事拖泥带水什么的，妈妈也常有。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到妈妈所在的区公干，完事后顺道回妈妈家。她知道我不吃鱼，特别对河鱼有仇，因此特意去买鳝丝。

我到妈妈家是尽量避免在她那里吃饭的，为此她时常为这事与我吵架。其实我想：如果我留在妈妈处吃饭，她要去买、汰、烧，且吃的时候她自己不吃光看你吃。你想，一个人被别人看着吃饭的体验是很不自在的。并且吃不完的剩菜她还要吃几天，因此心里特别的不安。

我对妈妈说，“别去买了，我们娘俩去馆子里吧。”妈妈说，“怎么那么浪费，自己买来烧，可以省很多呢，我烧的一定不会比馆子里味道差。”（妈妈的烧菜水平不差——作为资本家的太太，这是必修课是不是？）于是我说，“那么我陪你去买。”妈妈很生气，“你以为我很老了吗？”说完，拉开抽屉取钱，取完钱再颤巍巍地把钱放到贴身内衣上自己缝的口袋里后她就去自由市场了。

其实我知道，不要我跟着是因为怕我抢着付钱，而我虽有这意思但更主要是怕她出门摔着。

妈妈买的菜很简单，一个番茄，一把青菜，一斤鳝丝。她有些心虚，“鳝丝、青菜外加番茄蛋汤，够了吧？多了你吃不完是不是？”说完就准备洗菜。

我见妈妈眯着眼睛洗鳝丝，总有焦距对不准的样子，于是我就说，“老娘，我来洗。”妈妈说，“你小孩子洗不干净。”我是小孩子？都50以上了。于是我端个凳子放在她腿下，“老娘，坐着洗，也洗得干净的。”妈妈看我一眼，“哎哟，儿子懂事了。”便坐在水池前洗买回的菜。而我则心安理得地去抽烟喝茶。

吃饭了，妈妈端上那鳝丝。我很吃惊。说实话，一点也不好吃，腥气很重，从菜肴的角度看，色香味全无。但我不敢说，只能尽量把筷子不伸向鳝丝。

与曾经有过的吃饭一样，她坐在边上看我吃。我说，“老娘，一起吃呀。”妈妈说，“我不饿，哎，你吃呀，别省着，我想吃还可以去买。”说着夹着一大筷子的鳝丝放到我碗里。就在夹鳝丝到我碗里的那段距离，居然还沥沥地从这一大筷子中掉下几根鳝丝在桌上。于是她自嘲，“老年痴呆症发了。”我无言。

夹起碗里的鳝丝朝嘴里送，嚼几下怎么感觉有些苦涩和嚼感不对。但还是咽下去，只是在第二筷时注意看一下。

天，筷子上夹着的那几根鳝丝根本就没洗干净，那黄鳝的肠子，凝固的鳝血统统都在。

妈妈注意到我看那鳝丝，于是紧张了，“怎么？没洗干净？不好吃？”我真是心头一酸，连连说“没有”，忙

大口把鳝丝送进嘴里，嚼也不敢嚼就咽下去。

接下来就是如俗话说的，“筷子如雨点，眼睛如闪电”，几下就把那碗鳝丝扫进胃里，说“扫”，是因为不敢嚼。

但妈妈就高兴了，那种宽慰使她脸色很是灿烂，似乎皱纹也熨平了些许。她笑眯眯地说，“慢慢吃，没人与你抢，小心鱼刺（天，鳝丝怎么会有鱼刺？），怎么样，我的手艺没退步吧，下次你再来时一定要事先告诉我，我再去那个鳝丝摊买了烧给你吃，我记得那个鳝丝摊的。”这件事给我刺激很大。不由得想起鲁迅的话“我们怎么做父亲？”其实这很难，人们总是在事后不断的后悔，当初怎么怎么就好了，如同祥林嫂。本来很多事情就不能理想化的。

比如我常与母亲发生冲突，有时还很激烈。事后总也后悔，但冲突起来又忘了前次的后悔，于是后悔复后悔。

这种情景我想大多数人都这样经历过的。俗话说，过得去就可以了。有时候近乎苛刻的要求会使自己和被孝的长辈都很累，给双方都有生分的感觉。看看红楼梦里贾政的孝顺，证明了过分的孝顺近乎虚伪。贾政--果然是假正（经）。

再说孝顺与否存乎一心，没什么客观标准。比如我家。我弟弟在国外，每天都要打国际长途来，由于时差，他从在中国时间的下午4点打。可这对他就近乎残酷了。真的，如同机械，一点也不差，准时，并且每天。而母亲也会准时坐在电话机前等，无论天大的事，一到这时间就一定放下。其实我看。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负累。但外人看来，一定会说，瞧，其乐融融，多好的母慈子孝。

由于分开了，所以显得特别孝顺，但正的出什么事了呢？还得在国内的我承担。比如去年这个时候母亲胫骨骨折。我一人伺候。那才叫个累。弟弟回来一周又走了。且走的时候很沉痛。我相信他是真的难过和不放心。这种感觉是不是因距离产生的？

弟弟常打电话给我，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时真觉得很烦，隔着大洋指手画脚。我也相信弟弟是真的孝顺，但这种话要我在国外我也会说？也许说得更好？

他的孝顺是不是因距离而加大加重了？

所以我想除了感动，似乎还有些什么。

四、六月飞雪，含冤终生

今年是父亲去世30周年。30周年了。30年的光阴足已使一个襁褓长成新夫新妇或者新父新母。

已经是为人父20年的我写下此文，以祭奠我的父亲。

父亲死于1977年，作为刑满释放而留场（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的父亲临终时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哪怕是文字。

他没床，睡在地上返潮的稻草上，没有褥子，所有的遗产只有一条据母亲说是在文革前她去探望父亲时带去的一床被子，现在这被子已经很破烂了。还有就是一席破蚊帐。

我原随父姓陈，祖籍是浙江宁波。后来在文革时，母亲实在受不了压迫，不得以才让我们兄弟改成她的姓——此乃后话。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姊下有弟，是当地小地主家的二少。父亲身为家中长子，学业优良，精通英文。听母亲说，因为祖父吸食福寿膏致使家道败落。

1943年，父亲闯上海滩。当父亲登上宁波开往上海的轮船时，只带了2只饼子和3块大洋，据母亲转述，这是祖父家全家的所有财产。

父亲在上海当过一阵子英国洋行的掮客，俗称跑街先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外资企业的客户代表；用戏谑的话就是外表小开、西装革履；内里瘪三、寒酸清苦。

1944年，经洋行外籍大班推荐，父亲考取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任三等翻译助理。

1945年二战已经胜利在望了。父亲被大英帝国派往河北唐山了解日军布防和唐山地形。这工作以现在眼光看，就是间谍或者特务，与潘汉年，戴笠等的部下一样。所不同的是，父亲隶属于盟军系统指挥。

所幸，父亲完成了任务，回沪后被升职为三等翻译。公平地说，父亲为抗战胜利是作了贡献的。

我外祖父家是城市平民，外公是一般的公司职员，外婆则在家相夫教子。夫妇俩生有2男2女，母亲排行老大。

由于母亲长得十分美貌，所以外祖父特别疼爱她，视母亲为掌上明珠，想把她培养成才貌双全的女才子。于是就把她送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玛利亚女中，既现在著名的上海市三女中前身。

母亲高二那年，外祖父因长期患肺结核，由于买不起盘尼西林，最终咯血而亡。

由此，全家生活骤然捉襟见肘，外婆开始给人做“娘姨”——沪语，意为佣人。俗称帮佣，类似现在家政终点工，以抚养4个子女。

母亲高中毕业后，因不堪外婆如此艰辛，弟妹尚幼，遂放弃升学（应该说，也无力承担大学费用）因此辍学而进入社会。

“当时的社会，一个女子能有高中学历是很了不起的，”母亲骄傲地回忆着。

辍学后母亲做过家庭教师，初中教师，最后的社会职业是基督教福音医院的护士。

1947年的某天，父亲因小恙而去医院诊治，由此认识母亲。

“他那时真的很殷勤。”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少见青春的红晕。

“那你呢？”我问。

“我当然觉得很有面子，你想，一个英国领事馆的三等翻译，带一副金丝眼镜，风度翩翩，很有教养的….你外婆也不用去做娘姨了，弟妹们又可以上学了….他给我送花，带我参加上流社会的交际…舞会啊，宴会啊…很多次了，但他从来没说求婚一事，可他的意图是明显的，双方心照不宣。”于是爱情攻势就此展开了。

1948年底，徐蚌会战进入尾声，中国的政局的天平明显倾向于中共。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开始着手准备撤离并疏散中国馆员。父亲得到一大笔遣散费和一栋英式洋房以及一辆奥斯汀轿车。父亲用这笔遣散费开了一家公司——“上海第一柴油机件有限公司”。

“为什么开柴油机配件公司？”“你阿爸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觉得战争期间运输一定特别吃重，上海的工业又很发达，很多机器都是英制的，加上我们公司的货源都是老牌英国货，所以生意很好。”母亲这么回答，说起这些她是那么的头头是道。“公司大吗？”我问。

“不算小，有一字排开的5间门面。”母亲回答，“在那时的工商界，你阿爸是有点名气的。”1949年到了，经过2年多的追逐，妈妈终于答应嫁给父亲。他们在基督教堂举行了婚礼。母亲全家也一起搬进了那别墅。

1950年，我哥哥出生了，那年，英国政府承认中国现政府为主权国家政府；1953年我出生了；1955年我弟弟出生了。在此之前的1954年6月，英国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肃反”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肃清历史反革命和外国潜伏特务。因此父亲因在1945年到唐山画过地形图而被捕。罪行是父亲受英国派遣前往唐山画军事地图，罪名是反革命特务。

消息被英国方面知道后，英国驻华代办处立刻派员向有关当局交涉：

1945年中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同为盟国，共同抗击法西斯轴心国，陈××是受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派遣，前往日占区了解日军布防和唐山地形，是为盟军对日作战之需要，不能以此定罪，应立

即无罪释放。

有关当局认为：

即使陈××并无反革命特务行为，但有可能涉及“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嫌疑，因此不能释放。

（以上的双方交涉为大意如此）

终于，父亲在1956年，还是被判刑9年，押往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罪名依然是以反革命特务。

“那么阿爸到底有没有‘五毒’罪行？”我继续问。

“说不清，应该没有吧？他们当初说你阿爸偷税漏税，结果来查帐，也不知道查出没有。”母亲喃喃地说。

我知道，“偷税漏税”的罪名一定不成立，要不怎么还是以“反革命特务”定罪呢？但当局应该明明知道这反革命特务罪是不能成立的，那还为什么要判父亲的刑？

我突然想起，文革时母亲的悲愤：“我家的公司不已经给充公了吗？”（见：琐事之二——矛盾互击，孰利孰坚）那么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不是主观上有着狭隘的、农民式的“清算”的疯狂？

是不是客观上有着有杀一儆百、实行红色恐怖的原因？就象后来的“反右”一样？

我觉得有！可谓一石数鸟！

1978年到了，一天，母亲突然得到法院书面通知，让她与某日某时到法院。母亲吓得不敢去。最后法院派人到我家，以派出庭的方式，在家里组成临时法庭，对父亲的冤案进行了平反。

但是，父亲已经去世了。走的十分凄凉。

我的问题是：

1、刑法规定，法不究既往。父亲受派遣去唐山时，还没有现政府，既然主体资格不存在，那怎么就可以追诉？

2、既然追诉了而又平反了，那么又为什么不实行国家赔偿？

3、如果父亲预先知道有后来冤案，他会不会去唐山？我不知道。

突然想起电影《小街》的几个结尾。哪一个更合适？

2007-6-29

董浩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丢失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前言：

有个上海知青从网络上娶了北京妻子，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以为，爱情是件很虚妄的事，而其中网恋更是最不可靠的，先不说两人的交流仅局限于网络，而两地文化、习惯、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更是巨大，还不说已经固定的亲友人脉圈；更别说现实中的各项社会福利怎么解决？光医保这关就过不去。人不能光靠爱情生活不是？更别说是虚拟的爱情了。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保、医保制度是妨碍人们生活的最大毒瘤。

不过，人家的确把北京妻子娶到手了，真是佩服。也不知道她们怎么解决医保问题的。愿他们长长久久。

南北水土不同，自然人文也就各异，南北女人哪种更符合我的审美？

相比南方女子，我更欣赏北方女子的洒脱和豪迈，她们敢爱，爱起来直白而缠绵悱恻，常使男人心有砰然，而这种缠绵有别于江南女子扭捏的矜持而显出一种巾帼气息。

诚然，北边的女子的粗口也很著名，但以我对北边女子，比如对北京女子的粗浅的了解，她们的粗鲁是对外的，对自己的男人却有着足够的尊重和爱恋，而不像江南的男人，基本上就是个妻管严，也不知道这些南方的妻子为什么非要把女性的优势抛弃而当猛狮？我以为这几乎是全部南方男人对南、北方女人的普遍看法。

我的性格算定型了吧，有一定的大男子主义，在审美上更欣赏悲剧。美学认为悲剧比大团圆式的喜剧更有张力，所以借用这个这个题材，写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

按常例，要加上一句——本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她，是个好女人

郑冬的冠心病又犯了，他又一次静静地躺在熟悉的监护室里看着心电监护仪上奇怪的曲线。这些曲线有尖峰，也有低谷。突然，他觉得这尖峰低谷有点象人生或者……或者像爱情。脑海里莫名其妙地出现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

很多年前，郑冬是在网络上认识娟的。

很多年了，郑冬基本上只是跟她通邮件或者发手机短信，只是偶尔通个电话，更偶尔地娟会飞来看他，陪他住上几天后又飞走。象一只北方的喜鹊。

郑冬是那年冬天的傍晚去北京的。在这之前，娟一会一个短信，一会说：别带香烟了，她买好了，一会说：茶叶也别带，也买好了，因为郑冬在动身前患上感冒而发烧，所以娟短信又说：药也准备好了。

郑东回短信说，娟子，飞机上不能带打火机，你买个打火机吧。两小时不能抽烟，可憋死我了，下了飞机我就要抽烟。

嗯，回复的短信只有一个字。

＊＊＊＊＊＊＊＊＊＊＊＊＊＊＊＊＊＊＊＊＊＊＊

航行时间虽然只有两个小时，但郑东还是觉得时间没法打发，真可谓度时如年。幸亏带着女儿的MP4，这会耳机里播放着《走西口》

哥哥了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双手我拉住了情郎哥哥的手呀　送出了就大门嗨口

送出了就大门嗨口　至死也不丢你的手

两眼的泪珠儿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突突突突突突地往下哎嗨流

正月你娶了奴　二月里你就走呀走西口

难舍难离难分个手呀　哥哥你扭头哎嗨走

哥哥你扭头哎嗨走　止不住地泪呀泪水流

两眼就望见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跺跺跺跺跺跺地往远哎嗨走

哥哥你走呀西口　小妹妹我苦呀苦心头

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哎嗨头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　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哎嗨口.

＊＊＊＊＊＊＊＊＊＊＊＊＊＊＊＊＊＊＊＊＊＊＊＊＊＊＊＊＊＊＊

郑东觉得，龚琳娜的演唱风格实在很独特，使西北民歌得到了升华和普及。以前只是听说过诸如《走西口》之类的民歌，但从没听过，原因是觉得西北实在与现实太遥远了。自己也是从《血色浪漫》里才第一次聆听到这首歌。

自《血色浪漫》由龚琳娜唱后，他相信原来知道《走西口》这歌的人肯定比现在少。现在关注西北民歌的多了起来，至少自己就是。

听着这歌郑东就想起伙伴们嘲笑他。郑东认为，秦岭在台上唱，钟跃民在台下含着热泪的听。虽然秦岭不知道钟跃民就在台下，但钟跃民知道，秦岭这是唱给他一个人听的，并且郑东相信，尽管秦岭面对的是整个剧场里的观众，但她实在是唱给心灵深处的钟跃民一个人听的。

由此，许多知青笑话他，说郑东太入戏了，就像看红楼梦把自己当成贾宝玉一样，硬充作品中的人物。想到这里，郑东嘴边流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

＊＊＊＊＊＊＊＊＊＊＊＊＊＊＊＊＊＊＊＊＊＊＊＊＊＊＊＊＊＊＊

首都机场从下飞机到出口大厅要走很长的路。

郑东远远地就看见娟挥舞着手臂，跟着就跑过来紧抱住郑冬的胳膊，也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那饱满高耸的胸部紧紧压在郑冬胳膊上，透过薄薄外套和毛衣，他能感受到里面的温软，感觉那饱满在轻摩若蹭胳膊时的传来的一阵阵温馨。

一路出机场，她就这样紧紧地抱着郑冬胳膊：“哥看，你送我的，还带着呢。”

于是郑东看见了娟左手无名指上的那个PT990，他想起这花式还是娟自己挑的。

“哥，亲亲。”娟踮脚着仰起脸。心虚地四周看看，天很黑路灯昏黄，风很大少有路人，但郑冬仍对她说：“这样别人看着不好吧？”

她说："就让人家看，我是哥的女人。"当郑冬与她的目光相遇时，他再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媚眼如丝"。

低下头嘴唇如蜻蜓点水似的在她脸颊上掠过，一种滑腻细嫩的感觉沁入郑东的心里。一直到机场外面要上她找来的车时才放手。

一直到宾馆，郑东都没有抽烟。

她，是个好女人。

（二）男人有时候也需要女人的保护

在北京的日子里，除了一般的话外，娟说的最多的话是叫他。

她真的是不停的叫着哥哥　臭哥　我哥等，郑冬记得她给他掏耳朵，故意夸张的说：这是我哥吗？好象郑冬耳屎很多似的。在他们没谈其它话题时，比如风景啊等等，她就不停的叫，让郑冬觉得心都要碎了。

她陪他旅游，作为女人，自然带着包什么的。郑冬要为她拿包，想让她空着手，别太累，但她不要，说："哥病了，拿不动。"

她陪郑冬爬香山，看她气喘吁吁的样子，郑冬问她累不？她说不累，但郑冬知道她是累的，很累。娟带郑冬去看她的单位，看她的在单位大院里的两套住房，转得他方向也没了。

在北京的那几天，他们走街穿巷，基本全靠走。走路对郑冬来说没什么，过去当知青时步行几十里路是常有的事，可对娟应该是辛苦的。他想，那几天走的路恐怕是她这辈子一次连着步行最多的吧？

为再去看前门中轴线上的大理石，娟又陪郑冬去前门，由于去的时间晚了些，保安出来驱赶他们而与保安发生口角，她"恶狠狠"地手直指保安的鼻子："你大爷的，丫找不自在是不是？瞧你那操蛋样儿，人五人六儿的……"娟象"雌老虎"似的把郑冬挡在身后，"看什么看？没见过姑奶奶训人啊？"她转眼对着围观人的人吼上了。很是"泼辣"、"凶猛"。

这个场景使郑冬觉得有些可笑，真的冲突起来，她能保护自己？然而，郑冬顿时想起自己爱上娟的原因——她很多年前的一个短信：男人有时候也需要女人的保护。

这是五十岁的他第一次听到的这样的话。不是吗？历来都是说男人要怎么怎么保护女人的，而女人则可以理所当然的享受这种保护。她不这样，可见北京女人的巾帼气概。不知道别的男人怎么看待这种巾帼气概，至少郑冬很感动。北京女人都这样吗？还是只有她是这样的？

“男人有时候也需要女人的保护”，这对郑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这被“保护”的主体一旦变化，对男人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从对女人似有时无的负担演变成一种包裹全身心的温馨。

是的，能不能是一回事，愿不愿是另一回事。

＊＊＊＊＊＊＊＊＊＊＊＊＊＊＊＊＊＊＊＊＊＊＊＊

离宾馆不远有座Sbusinessbuilding，名叫SOHO现代城，在这座大厦的C座11层有丬上岛咖啡，上午的时候咖啡店里的客人很少，郑东和她找了一个靠近玻璃幕墙的地方坐下。坐在大玻璃墙内，享受着冬日的暖阳说话是一件惬意的事。

“先生，您要点什么？”服务生很礼貌的问道。

“女士优先。”郑东点点她说。

“哥甭客气，瞧你们南方人那酸样儿。”娟明显抑损他，可嘴角噙着一丝笑意：“喝茶还是咖啡？”然后转向服务生道：“给我来杯茶吧。”

“你也喝茶？”见郑东疑惑的眼神，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在减肥。”

郑东目光落到她高挺的胸前，她身材丰腴，茁挺的裂衣欲出，但绝对不是发胖的那种类型。

“不会吧，你这么好的身材也要减肥？怎么女士折磨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呢？”

娟咯咯笑了起来：“哥，你真能来事儿，不能预防吗？我不得得为某人捯饬着身材，切！”她言笑晏晏，“你们这些男人只知道享受，什么人呐！”

郑东将目光从她身上收了回来，对服务生道：“那好，给这位女士一杯花茶，给我一杯龙井，对了，茶叶要多搁点。”又笑着对娟说：“这是我熬夜养成的习惯。”她理解的点点头。

娟正要说话，她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哦，妈——是，没事儿，不用担心，对了妈，这几天我都不回家——对，来了个外地朋友——连昨晚大约四天吧——嗨，不是一档子事儿——不是他，对……”说到这地方，娟意味深长的看了郑东一眼。

她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持着电话，目光便在有意无意间落在了郑东的脸上，“——是女的朋友——哦，我知道——您放心——什么？小毅礼拜天要带女朋友来？知道了——误不了事儿，就这样，挂了啊。”

郑东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在看自己，不过心里却总有些痒痒，便也把目光盯在她脸上。

娟确实是越来越耐看。她的皮肤很细腻，五官虽然一般，但身材不错，这些因素便决定了她是个耐看的女人。尤其在她言笑时，不经意间脸上总能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熟女人的风韵。

“怎么了？”好不容易见她挂了电话，郑东的问道。

“没事儿，我妈问是不是你来了？责问我为什么不带你去家住而在外面化冤枉钱？我说，不是一档子事儿，你没来，她又说儿子星期天要带女朋友来。”她长叹口气，“儿子都有对象了，我要当婆婆喽，我们呀，老喽。”

“才四十出头你都敢说老？真是大言不惭。”见她有些复杂的难以言状、显然不是因为“老”的苦恼，便把话题转移到了她儿子的问题上，“小毅明年毕业吧？金融危机工作可不好找。”

“哥，我想让小毅去考研，你看呢？”

“可以啊，再在学校里呆两年，也许金融危机很快过去，那时找工作兴许容易些？再不行，到我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有些机会，小毅学的是自动化控制吧。”

郑冬又向娟说了他父亲的情况，告诉她，医生说：他父亲如果不出意外，再活个五、六年或者更长都不是问题。她睁着羊一样的眼睛，很理解的看着他。

客观上的困难是，他父亲患脑溢血加脑梗，郑冬不能离开。而她家里有二个老人，她妈和她姨妈。

她姨妈居然还住她家里，真是匪夷所思，她埋怨姨妈家的人怎么还不去接她走？所以也看不到她嫁给郑冬的日期。再加上医保等。以上，的确是很大的难。

（三）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在北京的几天，郑冬觉得她是笑得很开心，但他觉得这种笑是故意的。

第二天晚上，半夜郑冬突然睡不着了，于是蹑手嗫脚地起来到卫生间去抽烟，看见卫生间里字纸篓里都是纸巾，卷筒纸几乎全用完了。是不是在他睡着时她起来哭？郑冬立时有想问她、搂她的冲动，可就着卫生间透出的微弱灯光，他见她像一只猫一样，很松弛地侧卧在床上。

睡着了。真睡着了？万一真睡着了呢？郑冬头脑里斗争着……

“……别丢下……”她轻轻梦呓着把脸扭转过来。

房间里暖气很足，他坐着，全无睡意，仔细端详着睡眠中的娟。她不但露出半个肩膀，乳胸也半露半掩的在被子外面，还把腿伸出被子外。平心而论，娟长得很普通但很耐看，除了身材，她是属于没有回头率的那种。但郑东却总觉得她很有女人味，懂男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女人之美在于什么？

早上起来郑冬问她是不是半夜哭过？娟说没有，可郑冬觉得她一定哭过，而且很伤心。

但是整个白天她一点也没有难过的样子，乐呵呵的，只是不许郑冬说感情的话，也不让郑冬牵她的手，每当他拉起她的手，她总是找借口抽走她的手。

在那几天里，娟兼着导游和记者的身份，端着相机走到哪拍到哪，郑冬的吃相、郑冬的睡相、郑冬的走路、郑冬的东张西望……总之郑冬的所有活动都记录下来了。真不明白她是怎么在郑冬不知道的情况下拍了那么多？

郑冬说：“照这些很无聊，删了吧。”

娟说：“才不呢，我愿意。”

——这些照片竟然有二千多张——这当然是事后知道的。

娟不要郑冬为她照相，唯一拍的一张是抵不住他横竖要求才在故宫护城河边用手机拍了一张，就一张。

她，是个好女人。

＊＊＊＊＊＊＊＊＊＊＊＊＊＊＊＊＊＊＊＊＊＊＊＊＊

娟第二多的话是：北京好吧？天空蓝吧？郑冬想，她说这话的意思固然有夸家乡的意思，但是不是怀着某种希望？希望郑冬到北京去定居？尽管她也觉得这个要求很渺茫。也许是潜意识里的一种期盼？从娟身上郑冬看到了从来没看到过的——没有一个城市的市民象北京人那样爱北京。

临走前一天，娟带郑冬去了万寿寺，寺内还有两株非常特殊的古树，据今已有３８９年了，被誉为“姻缘树”或“夫妻树”。

这是两棵银杏，一雄一雌相伴而生。果然，万物也是冥冥之中有安排，阳树刚劲挺拔，阴树开枝散叶。阳树下和阴树下一样，挂满了红色的许愿牌，人们求的是姻缘。

相传中，所有的庙宇都是让人求来世的，而万寿寺有三个“唯一”：一是全国唯一一家让人求今生的；二是唯一一家没有供奉香火的寺庙；三是唯一一家只能求一次，并且不用还愿。因为其唯一、且有三个“唯一”使郑冬总感觉有些神圣。

万寿寺里有不少讲解员，她们的工作目的就是让游人最后求一个祈福牌，所有的愿望都会被固定在许愿牌上，挂在寺庙的各个栏柱上。看上去讲解员似乎并不强求，其实不然，她们以充满诱惑的声音在竭力鼓励着游客。只是

在那样的环境里，不求点什么，似乎枉去一趟，特别对于郑冬这样的。

郑冬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从来不相信这些，以前也进过寺庙，但从不拜叩而只是作看客。但这次被身边的她的巾帼柔情所动，心也不由得柔软起来。或许是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又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萌动在寺庙里许愿念头，许什么愿？所以才显得有些谨慎。

“多子多福”、“步步高升”、“出入平安”、“金榜题名”、“财运亨通”、“延年益寿”、“一帆风顺”、“荣华富贵”等等。游客可以求到各种只要想得到的，没有找不到的祈福牌。郑冬不知道娟有没有别的心愿，只是互相对视一眼……

这个时候钱不钱的似乎不重要了，他们捐９９元的功德，请了一块姻缘牌，娟在牌子上从右到左地写上郑冬和她的名字后，将那红牌牌挂在了阳树边的栅栏上。她的字真的写得很好，很娟秀。郑冬端详着她的字很是惭愧。

牌牌在冬日的暖阳下泛着熠熠的红光。

＊＊＊＊＊＊＊＊＊＊＊＊＊＊＊＊＊＊＊＊＊＊＊＊＊

离开万寿寺回到宾馆，郑冬只是木坐着、搭讪着，而娟却是叽叽喳喳的象只家雀。

“哥，明儿你就要走了，真舍不得。”娟眷恋地坐在他身边搂着郑东。

郑冬说：“我们去吃顿好饭吧。”他把话题扯开。

娟说：“啊，那是不是说这几天苦着我哥了？切！”

郑冬忙说，哪的话？她才有些得意地说：“那去哪儿呢？烤鸭好不好？”

郑冬说：“路太远了，附近有什么？只是味儿要纯一点的。”

娟说：“去吃东来顺。”

（四）出入环郎臂，侍君描柳眉

服务员走过来：“二位要点什么？”

她说：“哥哥喜欢吃什么？自己点。”

郑动说：“你点吧，客随主便。”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娟叫的菜让郑东有些吃惊，竟然全是羊肉。她见郑动吃惊的神色，还以为他不吃羊

肉，忙解释道说冬天吃羊肉暖人，哥哥需要补补。说“补补”时她眼光有些“坏”。

郑东不太吃羊肉。但不想拂了她的意思。不过令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他们把羊蹄做成的菜叫羊手，郑东没来由的联想到“猪手”。是先有“羊手”还是先有“猪手”？

“齐活。”娟看了看菜，“哥，走一个！”娟子端起杯子朝郑东的杯子碰了一下。

郑东说：“我给你说个吃的段子，说的是你们北京人：

“一帮哥们姐们去撮馆子。男男女女十几个人落座后便不停的聊天，只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征求大伙儿意见：菜点好了，有没有要加的？

这种情况，北京人一般是让小姐把点过的菜名儿报一遍。于是一位北京的哥们儿说：小姐，报报。

小姐看了他一眼，没动静。

小姐，报一下！哥们儿有点儿急了。

小姐脸涨得通红，还是没动静。

怎么着？让你报一下没听见？哥们儿真急了。

一位女生赶紧打圆场：小姐，你就赶紧挨个儿报一下吧，啊？

小姐嗫嚅着问：那，那……就抱女的，不抱男的行吗？

噗！边上一位女生刚喝的一大口茶全喷前边人身上了。”

娟咯咯笑着差点笑岔了气，说：“哥，来劲了嘿，你就憋着坏吧你，我可是北京人，哎，你哪头的呀？可不许糟改北京人。”

郑东看着她娇嗔的摸样哈哈大笑，惹的她举起啤酒做泼酒样儿，说：“不许笑！再笑就惩罚你们这些笑话我们的南方人。”

郑东叫来服务生准备结账，“我来。”娟抢着道。

“不会吧，男士和女士约会，什么时候变成女士买单了？买单可是男士优先。”郑东接过服务生手里的发票，打趣她道。

＊＊＊＊＊＊＊＊＊＊＊＊＊＊＊＊＊＊＊＊＊

天色已经不早了，冬夜的寒风中，她那穿着风衣的丰满躯体显得格外婀娜，她一手插在风衣口袋里，一手挽着郑东的手臂，两人在微亮的路灯下挂成一个长长的影子。娟似乎失去了饭桌上的活泼，一路盯着影子不说话。

她说："哥，咱这叫什么？"娟的想打破这冷场。

"出入环郎臂，蹀座郎膝边。"郑东略一思索，念出北朝的《折杨柳》。他很是向往北边女子充满主动多情的幻想情感，真是纵情飞扬啊，相比南方女子的矜持，不由得郑东令人感怀起北方女子的敦厚纯情。

"行，有点意思，哥！"娟眼中流露出一丝欣赏的神色："切，我才不要'蹀座郎膝边'呢。改一句。"

"改一句？呵呵，有话道'皇帝不差饿兵'，总得赏点儿什么吧？"郑东恬着脸皮一副赖皮样。

"德行，瞧你点出息！"娟啐着踮起了脚尖。"行了吧？要是回答不对我心思，嘿嘿，哥最好把皮绷紧点儿，知道前清十大酷刑吗？我掐人下手特疼。"

"那'出入环郎臂，侍君描柳眉。'可以吗？"郑东想拉开点距离，免得挨掐。可是不行，她挽的很紧。

"侍君描柳眉？啊～～相公呀，妾身敢问相公，何典呀啊～～何意呀啊！"娟一脸无辜状的端着青衣腔调。

"回禀夫人，实乃无典啊～～啊，乃在下现炒是也，闺房之乐，专为夫人描眉，意为夫人之仆耳。锵！"郑东也就嘴里打着啰点学老生，他觉得这样很轻松。

"那还差不多！哥，你就这脑子好使。"娟又是一脸得意："哥哥，那我们算不算郎情妾意？"

"当然算，还有比我们更算的吗？"郑东又一次领略了北方女子大胆直露的表白和别有风情的温婉可人。

"你侬我侬……那什么把一块泥……用水调和；再什么一个你，再什么一个我……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娟仰脸问。

看着她在寒风中冻得通红的脸蛋，郑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包裹在这风衣里会是怎样一番火热呢？

娟抽回挽在他手臂上的胳膊，将双手放在嘴边哈着气，喷出的热气转眼便凝成了水气。郑冬搂着她，问："怎么？很冷么？"把她的手掖进自己怀里。

她似是感觉到了郑冬身体的温度，仰脸笑着说："还行。冷是冷了点儿，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在大街上遛弯儿了。"

"不是遛弯儿，是扫马路。"他纠正她。

她咯咯地笑起来："行啊，臭哥，真有眼力眼力见儿！你也知道北京人把遛弯儿叫扫马路？"

能不知道？郑东心里暗自嘀咕，戆度！话到嘴边上却变成：“不准叫臭哥！”

“就叫！就叫你臭哥！臭哥！臭哥……”娟满脸是叫了看你把我怎么着的神情。

恃宠而骄！除了摇头还能怎样？郑冬有些酒意，四杯啤酒虽然不多，但也不至于让自己沉默起来，难道是北方的啤酒太醉人？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的擦肩而过。”娟回脸看着郑东，“哥，你说咱俩能好那么多年，该有多少次的回眸啊！”她看上去有些伤感。

“那我们俩上辈子什么都没干，全回头了。”听着娟的话，郑东心里全是阴霾，像要下雨似的，揪心的疼起来，似乎被撕开一道大口子似的，开始滴滴答答的淌血。但他知道，不能任这种情绪发展下去。

“切，没情趣！你们这些南方人。”娟挽着他的手臂，头靠在郑东的肩膀撒娇。一阵寒风吹过，娟的肩头微微一抖，似乎有些不胜寒意。郑冬轻拍她肩膀，问：“冷吗？”

她转过头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她的眼中水汪汪的，就像一潭清泉，郑冬似乎能看到每一个波纹的闪动。

娟轻轻点头，身子又抖了一抖。他轻声道：“我也有些冷。”

她抬头凝望他，似乎在说那怎么办？

他自言自语道：“谁能在寒冬里给我带来温暖？”她的眼神有些迷茫起来。

“是你么？”郑冬的声音更轻了，娟的眼神温柔起来，呼吸有些急促，轻轻叫着：“哥～～”她转过脸来露出一种带着母性的爱怜交加的眼神。

“怕冷就穿XX绒，地球人都知道，谁穿谁知道。”郑冬的声音大了起来。

她张圆了嘴巴，旋即醒悟过来，咯咯笑了起来，“切”了一声就攥起拳头轻砸郑冬胸口：“讨厌，你个坏哥哥！把我带沟里了。”

郑冬也笑了起来，手在她丰臀上轻拍几下，那种温软饱满的感觉真好。女人高兴的时候，占她点便宜，大概是不会引起反感吧。

娟似乎没有注意到郑冬手上的动作，笑了一会儿，终于停下来。

她静静的站在那里，样子就像在寒风中绽放的兰花。水汪汪的的瞳仁微微凝望着他，几分娇羞，几分痴迷，眼

神就像一个简单的句号。不知是不是喝酒的缘故，娟脸上挂着的两抹晕红，似乎没了北方女子的巾帼气，隐有几分江南女子的影子。嘴唇在微弱的路灯下一张一翕，湿润的似乎可以随时滴下水来。裹紧了的风衣反而更突出了她丰满的胸部。

此时的娟展现的迷人诱惑，恐怕是任何男人都难以抗拒的。郑冬心里暗自叹着气。压制住了要吻她的冲动。

紧紧的搂着娟站了一会，郑冬脱下外套给她披上。言情片看多了吧？要不自己怎么会有这么老套的动作？

（五）妇以德事人

明天下午郑冬就要乘MU航班回去了。

临走前的晚上他们做爱了。在此前的几天里都没有做成。

娟裸着身子在郑冬面前走来走去；她的皮肤并不白皙，而是一种偏古铜色，体毛稀少；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韧性的柔软。尤其是她在走动时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温润的光泽。在茁挺而略有微垂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她主动要做。其实郑冬知道不是她想，而是她为郑冬想，想让郑冬看她的身子，想让郑冬做。但郑冬不成。

郑冬想，不能起来的原因在自己，因为感冒发烧？还是心情？而且郑冬觉得她并没有很大的性欲，他懂得娟的想做其实全都是为了自己。

“哥，你看着我！身材还行吧？”她羞涩中带点自豪的对郑东说。

郑东能够感受到她极低的声音中飘来的深情和她因羞涩而压抑的颤抖：“我在看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身体！”郑东看见了她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红潮。

娟到郑东的身后为他捏肩：“这身子是哥的，随哥怎么着。”她直白地把自己的一腔柔情地向这男人表达出来。

“无福消受美人恩呐，来，到前面来。”郑东觉得不能让娟给自己按摩。

“我才不是什么美人呢，臭哥不用奉承我，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就是个爱着哥哥的一般女人……怎么了？捏的不舒服？”停了手中的揉按，她问，泛起妩媚的红潮。

“不要太适意噢。”“适意？什么是适意？”娟边捏边问。

“哦，上海话，适意就是舒服的意思，但我不要你为我做这些。”郑东回过身去按住她的手。

“鸟语！”娟一脸不屑地撇着嘴。“才不呢！你以为是个人就可以让本姑奶奶伺候呀？我只为臭哥捏。小样儿啊，你！”

郑东心中感慨着，老祖宗真没说错，“女以色事人，以妇德事人”。他把她拉到前面，手无意中触到了她的乳房，软软的。郑东的心一下子快速了起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娟也随之一颤，“哥想摸就摸呗，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她“赌气”似的红着脸更把身体挤压过来，像啄木鸟似的使劲吻着郑东。

娟风情万种的深红而热烈的亲吻使郑东顺势把她抱起来面对面地坐在自己腿上。

搂着的身体没年初时那么柔软，她在郑冬怀里有些瑟瑟，连眼神也是凄迷了起来。空气里散布着幽幽的薄荷清香，很好闻。紧了紧胳膊，郑冬又把口鼻埋进了她的头发里大口的呼吸着，好象要把洗发膏的气味全留在记忆里。

郑冬像抱着一个久违的珍宝，一刻都不想放松，嘴在她的额头与脸不停地亲吻。

“这十个月里，你想我了吗？”郑冬说着无聊的调情话，他觉得此时自己真是卑鄙。

“嗯！想，天天想！一到晚上钻冷被窝时就更想。”她不停地点头，回过头来笑一笑，圆圆的杏眸却溢满泪水，郑冬想不明白，她怎么从一个少妇变成了一个一个可怜的小人儿？

郑东吸吮着她的泪水，感觉娟的泪水中涩多余咸。他心中有些茫然，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娟。她没有做错什么，自己也没有做错什么，也许整个事情就不应该用错与对来衡量。

那晚上，娟手口并用很是努力，郑东知道，娟今天的目的是一定要让他做成功。

她说：“哥哥，我给你唱歌吧，唱北京欢迎你。”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我就有浓情……”娟向郑东虚展着双臂，唱着唱着眼角缓慢地渗出的泪水。

＊＊＊＊＊＊＊＊＊＊＊＊＊＊＊＊＊＊＊＊＊＊＊＊

郑冬终于起来了，她酡红着脸羞涩地说：“怪臊人的……床吧……”

一把插入娟的腋窝，一把抱住她的腿弯，郑冬轻轻地把她放到洁白的床单上。

娟温存地摊开身体，轻轻掰开自己，“哥哥请进……”

她并不湿润，于是她把带着的护手霜涂抹上去……

郑冬觉得一股热浪直抵鼻腔。

唉，她，真是个好女人……

“唔～～”才悠长呻吟了一声娟就立刻自己捂住嘴，她不断地上挺，张开的唇往深处吸吮着郑东，双臂紧紧的抱住了郑冬的脊背，两腿也交缠于郑冬身后，纵意承欢……

一会儿，郑东的感觉就像是整个身体都被温水包裹了一样，觉得她身体开始无意识的向上弓起。“涨！哥……哥啊～～我要死了……”

终于释放了……

“哥哥，跟你在一起，我这心里啊有种归属感，只觉得心也被塞满了。你真该是我的天，我的男人，我的爷，可惜你不是。”娟呢喃着用手指在郑东身体上漫无目的的划动，说着说着，眼泪又开始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不断向外冒。

女人，真是水做的？看着她慢慢的恢复平静的身体红潮一点点的退去，郑东在心里叹息着。

羊祜所说的“世间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真是个真理。

＊＊＊＊＊＊＊＊＊＊＊＊＊＊＊＊＊＊＊＊＊＊＊＊＊＊＊＊＊＊＊

早上了，醒了，望着旁边熟睡的娟，裸露着的圆润手臂把她圆润的肩部带了出来，如露出水面的藕。郑冬心里有种痛楚，这就是传说中的痛定思痛？

郑冬基本上被确诊为冠心病，最终的结果是猝死。也许他带着这病可以活１００岁，可如果在很近的将来发生呢？郑冬觉得自己岂不是害人家？

当郑冬得知有个原来一起的知青离婚后在网络上又娶了北京媳妇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他很想去问的，有太多想去问，问问而已。但不熟，仅认识。于是觉得没什么可问的。

犹豫着是否伸手去捏她调皮的翘鼻子，才抖索的伸出手指，娟突然探起身子，也不管酥胸半露，一把抓住他的手娇嗔道：“臭哥！想使坏？门儿都没有。”

“等会儿哥，我要尿尿，憋不住了。”娟从卫生间出来又钻进被子。

“鬼丫头，刚才装睡！自己说，该怎么罚？”郑东装得很凶恶的样子。

“爷饶了可怜的娟子吧。”她也装出一副可怜害怕状。

“不行！惩罚是必须地，看在你当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可以选择。”郑东有点绷不住凶样了。

“那就打……屁股吧，要轻的哦！”掀开被子，郑东“啪”的一声就在她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讨厌！”娟娇嗔道：“哥，抱抱我。”她慵懒地把自己扭进郑东的怀里。他们对视片刻，然后开始静静地亲吻。清晨的吻温情脉脉，像小鱼在水里游动时的那种润滑。

“哥，我是个难看的女人吗？”她低声问拥着她的的男人。“嗯，你不难看，但算不上美女，可是……额，轻点，疼……”娟子掐他的软肉，“有哥这么说女人的吗？活该！”

“我是想说，你仗义，阳光，有巾帼气概，这点很重要，再说，美女一老，就不再是美女了，可娟子无论多老，依然让人爱，像你这样的女人哪里可以去找？”

在这宁静的早晨交股相拥依偎，抚摩着身边的女人，手感光滑细腻，他心里一阵满足。她合上眼睑，舒服地枕着郑东的胸膛，睫毛轻轻颤动着。头发柔柔地擦挠着郑东的下巴有点痒，惹得郑冬心中充满怜爱。依偎在一起闭着眼睛，他的手游走于她细滑的肌肤之间，全无半点欲望，郑东突然觉得这种依偎和抚摸很美很升华也很神圣，很期盼这一刻永不停息。

可是郑东下午要走了。

“哥，刚才你打我屁股前说看在当什么的份上？”娟趴在他怀里问。

“……娟子，为难我？”郑东心真的很痛，这种痛叫无奈。

“不！你一定要说出来！”娟扭糖似的作起来，甚至舒服地在他怀中扭了扭身子，摩挲之间只觉整个人都热了几分，“求求你啊？说出来嘛！”

郑东肘起上身：“娟子，我本想说看在你当了那么多年老婆的份上。”

“本来就是！我就是你媳妇儿！”她调皮地捻起自己的发梢挠着郑东耳朵。

＊＊＊＊＊＊＊＊＊＊＊＊＊＊＊＊＊＊＊＊＊＊＊＊＊＊＊＊＊＊＊＊

“哥哥，我心里特堵。”她仰起脸看着郑东。

“娟子，你怪我吗？”郑东心里何尝不难受？

“瞧你说的！不怪，哥，咱谁也不怪，好吗？我现在才真的知道什么是有缘无份，爱上你我一点不后悔。”娟趴着的裸肩抖动起来。

突然，她满脸充满希冀的灿烂：“哥，这篇儿没准翻不过去！也许过再几年我们就成了。”

“嗯，但愿如此吧。真有这天，我一定还要去趟万寿寺。”

（六）爱情是一张薄薄的机票

娟戴了副墨镜，似乎是在遮挡北方冬天的阳光。谈话就像是一对关系普通的朋友，似乎都已经忘了昨夜的激情澎湃和今晨的绻缱缠绵。男人和女人除了在床上达到和谐以外，在许多方面也一样可以达到和谐，只不过前者似乎更重要一些而已。

他突然想起“做爱”一词。可不是吗？“做爱”“做爱”，爱可不就是“做”出来的吗？

换登机牌，买保险，她不停的忙碌。等到手续办完，要进安检的时候，两人突然一起沉默了下来。

“马上要登机了娟子，你回去吧。”郑东有些受不了这种气氛。

“哥，你缺心眼儿啊你，着的什么急？起飞前十五分钟才关登机闸的嘛。”娟流露出一点不象四十岁的脾气，微撅的嘴唇，露出浅浅的酒窝。

他们安静地坐着，什么话都不说，也不用说了。据说，这是一种依恋和默契，一种家人才有的默契。他们手牵着手，娟不时把头靠在郑东的肩上，脖子靠酸了，换一边继续靠。

离起飞只有二十多分钟了，娟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缓缓伸出手来。郑东轻轻握住她的手，感觉她手凉凉的，软软的。望了她一眼，她朝他笑笑，尽管有些勉强。

“一路平安，记着我！有时间就来。对了，哥，给闺女带个好。”娟握紧了他的手。

“嗯。你也保重，你也会去看我的是吧？问咱妈好。对了，你怎么向妈说？”好几年了，郑东已经习惯把娟的母亲叫成妈了。

“我一定会去的，但凡哥不讨厌，我就一直去到哥哥不要我去时为止！嘻嘻！”她嫣然一笑，“妈那儿慢慢找机会吧，你放心，没事儿的。”

“嗯，别太刺激她老人家。”放开她的手掌，郑东的手心似乎沾满了汗渍，拖拉着行李箱，向安检门去。

“哥～～”背后传来她的声音。郑东不及转过头去，娟已经紧紧从后面抱住了他。她的脸颊紧紧贴在他的后背

上。

她拿出一个信封，郑重地放进郑东内胸袋。

郑东问：“是什么？有话不能说而非要写信？”

娟说：“现在别看，哥。”就头也不回的离去。须臾，她突然转身，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

跟去时一样，MU航班上的郑冬耳朵里塞着向女儿借的MP4轻轻地播放着音乐，不过这次是《天下无贼》的插曲《那一天》：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

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

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迫切地不知道何时再相见

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

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终转

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

弥漫着我再也驱赶不散

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

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

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

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

生命在故意和我周旋

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

却不能让他继续永远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再也没有出现

＊＊＊＊＊＊＊＊＊＊＊＊＊＊＊＊＊＊＊＊＊＊＊＊＊＊＊

透过舷窗，郑东看着机翼下厚重白云变幻着模样，空洞地望着前方，娟的影子不时在舷窗外的蓝天里浮现。她扬起的挥动着的手臂；回身走去又返身的那最后一眼，似乎如锤子似的敲击着郑东的心。

那一刻，一种很久没有过的疼痛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他忽然觉得一阵悲哀。那种淡淡的失落就像一个密封的玻璃容器，郑东可以看到里面自己的心被禁锢在里面，却不知道怎么才能破除这令人疯狂的禁闭，心里莫名其妙地篡改了《乡愁》诗句：爱情是一张薄薄的机票。我在这头，她在那头。

她为什么戴墨镜？郑东觉得娟想掩饰什么。掩饰什么？郑东想起那个信封，手触到信封里面一团略有弹性的东西。是那种柔软的感觉。

他相信自己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的震撼——朱红的丝带捆着的一缕棕黑色发亮的秀发，薄荷的清香似乎又在鼻腔里流淌。

杨坤唱得真是缠绵而撕心裂肺。郑冬觉得自己是饱经沧桑的了，早已是刀枪不入了，可突然觉着这歌觉得真是挺刻骨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很多的那一天，伴随着那一天，也应该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那个人！进来了，又走了……

究竟每颗心可以烙上多少个印！也许有一天，印记满满的，没有可以再烙的地方，就真的会变坚强了！

＊＊＊＊＊＊＊＊＊＊＊＊＊＊＊＊＊＊＊＊＊＊＊＊＊＊＊

郑冬埋在黑暗的沙发中，手机的微光映着他的脸庞，泪流满面的他死死的盯着手机上的短信，上面只有一个字：“哥”。

以后的日子里，他把那段“荒诞”的岁月深深埋在心底，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曾有一个风韵动人的北方女人会冲他喊：“臭哥……”

郑冬不知道那牌子现在是否还如新？以后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再去看看，看看他和她的姻缘牌还在不在。

“哥哥，我心里特堵。”

2009年12月30日修改稿

寻找林昭

周兄自京城，携妻游江南，约余姑苏见。云：3日前（4.29）乃昭殁38年之忌日，意欲寻访。遵嘱。

晨9时，抵姑苏，甫出站，即扯回程票，新空特快，15银。毕。有黑车主前来揽客。漫天开价，立地还钱。35洋。妥。

至灵岩景区，见一大牌，书：至灵岩山寺500米。遂步行前往。10时许，霍然见一巨大牌楼，上书灵岩山寺，遂见周兄伉俪。

灵岩山寺，背山而建于坡，寺前人攒动，车如织，游山或进香者众。行前，于网络见胡迪《灵岩山上祭林昭》文及附照标明路径。然，此时环境已非，重要坐标“寒山乐器厂”踪迹全无。问林冢于土著，皆曰：不知。心顿生悲凉而茫然。当斯时也，一摩的疾驰而伤周妻腿，无奈周兄急携妇就医而去。

孓然影单，踌躇前行，依稀记得胡迪文有韩世忠墓字样。故，以此为询。人曰：向西。行约500米，果见一黄墙建筑群，韩崭王祠。

茫然四顾，前途渺然，前瞻，野地葱绿依山，后顾，灵寺喧嚣尤闻，左盼，石材工地叮当，林冢何处？

入韩王祠，见一长者。即躬询。曰：知。大喜，即询之，曰：西行梭（音so）晤分钟即是。15分钟？曰，然，梭晤分钟就到，并曰，近日探林冢者众。喜，遂敬烟与老者。拒曰：偶（苏锡方言，音e ou反切）发（音fe）喫烟咯。躬辞。

西行15分，仍野地，再15分，见一加油站，隔小径为兵营，小径通山。无方向矣。见辕门立一少尉（两司马？），问讯于兵哥。曰：前（西）是有公墓。询：路途几许？曰：4公里。厥倒。抬眼向山，依稀见几处坟茔，遂意决，行油站与兵营间之小径。

行少许，见一小庙，匾书：五龙庙。山路颇陡，宽约15寸，碎石满路，脚踩其上，一步三滑。不多时，腿肚颤软。唏嘘感慨之，想余当年，穿行于滇西群岭，健步如飞，若履平地，于今老矣？尚能登否？回望山下，吴县一览

无余。可见余立处距平地已颇高矣。

至坟茔处，环视，不见林冢。无路，屡越腰深之荆棘，均不得见，且不辩东西，余迷路矣。大汗淋漓，席地胼坐。忽闻手机短信声。视，曰：苏州欢迎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中国移动。撞鬼。

其时，沮丧之意不绝，澎湃如太湖之涛，慌张之情连绵，滔滔如长江之水。不得已，乃祭翻天印：有利的形势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忽见一荷杠农妇，问道。彼作摇首状。鼓余勇，续登山，又见二摘野花小丫，询何处下山？丫遥指一小道：喏（长音2）。谢。

行少远，见一铁丝网，内有众坟隆。欣喜若狂。

胡迪文：走右边山上，大约100米你就看到一排铁丝网。

棘裂裤，夺路而行；枝挂衫，急降高度。上邪，见一山谷。再行，见一巨大馒起。边立一缠红箍之看林人。尤见尊上。急揖：此何处？林昭何在？曰：此乃韩墓。

遍顾四围，心生疑虑：崭王冢乃黄墙建筑，怎是彼等？红箍云：此真王冢，占地约2亩,封土高出地面约3米，乃世忠皆4夫人之合葬墓。道旁为韩王祠也。

如此，此为韩王祠背？曰：然。余又厥。稍甦，又询林阴宅。红箍遥指向山：南、又东、再南……梭晤分钟即是。又15分钟？红箍方操苏锡国语：非15分，乃3、5分钟是也。三厥。见余晕，箍曰：勿躁，带路便了。再揖。

果，梭晤分钟山径。即抵。百感交集，连谢、掏银、递呈，一气呵成。红箍坦然称谢受之（带路费20元），飘然。抬腕，午12时10分也。其时，余步行、翻山，已二小时多矣。

胡迪文附照字：右手的第三个墓……即林昭的墓地。

甫立定，气未匀，即遇7、8老妇鱼贯而剿银，谄笑：子欲香烛否？欲鲜花否？余性驴，最厌繁文缛节且本无此意乎？于是乎尽驱彼。然，仍有二妪靠（敲）定砖脚（苏锡俚语）。恐视其为为凡妇，遂吴侬软语告昭之生平，以彰其学识。

心烦，然妪如僧定，奈何？见林冢尚许落叶败枝。生计：烦二妪扫之，何如？妪曰：银几许？10银如何？喏。

昭与尊葬，阴宅约10平米，树二碑，昭左而尊右。昭碑右前款：生于一九三二、十二、十六；殁于一九六八、四、二九。正中：林昭之墓。左落款：苏南新专、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妹彭令范敬立。

山林蓊郁，故光线暗。因相机随周兄，是故余以手机照3幅。碑字陈旧喑喑，碑体依稀见苔。经年？然清明未远乎？

余上月，曾往天平山扫外祖母。每扫，必洗碑、描碑、除草。况昭？忖，昭无亲乎？遂记起网上纪念馆设功德簿，时有捐者。怎可使昭蓬头垢面？孟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林与尊穴、碑上有花，花旁有二A4纸，一录胡迪诗；一为昭少女之照。花分各色；包装迥异，尚鲜。断，非一拨之人，证韩祠长者语。

昭碑背镌昭小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绕墓三匝，以示敬意。默诵：余今肩负诸兄：蓉渝生兄京周兄鄂杰夫兄浙汉司兄及各位兄弟姊妹之托谒见。未焚烟，不点烛，呈心香，献灵前。子存于亿万人心。念余等凡夫，无昭之胆魄。苟延于乱，残喘于世。昭与自新，烈烈英雌；使须眉愧；令红颜扬；为主增辉。

夫曰：水可涸而不可夺其湿；火可灭而不可夺其炎；玉可碎而不可夺其坚，仕可杀而不可夺其志。安能以皓皓之躯，弃肮脏之地乎？子，圣女也！宏愿必偿。

坐林冢阶。山间空灵，树风飒飒，心怀寂寥，潸然。四顾，见林冢旁之小径，尽满落叶。忽胸生一辞：遍地黄叶为谁铺？英灵处处昭汗青。

再抬腕，午2点30分，口涎粘，喉生烟。思归。遂躬辞昭，顺径而下。径满落叶，甚滑，腿肚颤栗。民谚，上山容易下山难。

经公墓入口，见一未挂牌房，公墓管理处也。乞水，狂饮。毕。烟瘾大发。先敬己，后敬人。托彼描林碑。彼曰：10银一碑。留20洋，无发票。未知其饯诺否？

复行之灵岩寺，喧嚣依旧。叹曰：尔等知昭乎？拨周兄电话，云：妇无碍。遂道别。再赶天平山外祖母处付后年之费。

彼时，一潇洒倜傥，玉树临风之俊男，今时，破裤烂衫之一袋弟子耳。狼狈之极。路人侧目，恐腹疑：逃犯乎？

2006-08-10

庚戌三十年祭（上篇）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错误。”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引言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时侯……”记得小时侯唱这首歌时，在心里总充溢着对现今生活的庆幸感的同时充满着对旧中国的恐惧和憎恶。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忆苦思甜”的色彩，打上了重重的政治烙印，是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

对我们来说1949年以前是一个陌生的年代。就像我们当年唱着的歌一样，现在，我们的角色转换了，从听故事的转为讲故事的了——对着我们的孩子讲“过去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年代了。”女儿很惊讶地看着我。很久远吗？说是上个世纪，其实才过去几天？可我十分理解她的感受，在大学里读书时，我对教材《中共党史》的内容好象有着同样的遥远感？因为毛泽东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那个被认为“知

青运动”业已结束需要“向前看”而被人们渐渐地遗忘。正如现在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个遗忘的过程确实发生在整个民族的心理层面上。在需要遗忘它的时候，人们果然就遗忘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知青运动”？

知青。是一个很“旧”的名词了，对作为现代社会主流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再过几年，“知青”除了历史学家和当事人外，其他人对这个词的释义要到《辞海》里才能找得到了。我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不幸。但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有一个叫“摩罗”的人写道：“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

普希金说：“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社会心理学认为，当具体的伤痛消隐之后，这些曾经的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时间久了就会回去寻求。

真是这样的吗？那么怎样才是伤痛的消隐呢？倘若这些伤痛没有“消隐”呢？我一直在这些似乎是哲学的命题前徘徊；思想似乎脱离躯壳，走过千千万万个门口，总能看见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身影向我点头，认不认识在这一刻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我知道他或者她曾是知青。

中国人民高唱着主旋律，以豪迈的姿态跨进新时代。听说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种状态：一是吃不饱状态，世界对他们来说只是求温饱；二是吃得饱状态，一切在他们只是如何维持和追求更高的质量；三是吃饱了撑的，盼望着浪漫的状态。但是那些隐身在“豪迈”主体背后的介乎于第一和第二种状态之间的“边缘人”呢？

时间过得真快，30年就这样过去了。30年，使无论人生还是其他什么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想，除了我们之外，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并不是很多，也可能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已经像那些如烟的往事一样，在人们心中逐渐失去了踪影，人们又总是爱让新的经历成为一个座标。而对于过去的一切，总能够轻描淡写地擦掉。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我们曾经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原因，因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如果你不去回忆它，记录它，它就会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得谁都记不起来……

所以，哪怕是最平淡的东西都有价值被记录、被留恋，因为即使是苍白平淡的日子，也是你每分每秒地度过的。不论今后你有多大的成就，会拥有多少辉煌，你永远抹不去这一段苍白的岁月，因为它们正是未来剧目的序幕，这用生命和热情度过的时光，谁也没有权利去蔑视它，小看它……

其实自回上海后不久，我就萌发了要写一点东西以寄托自己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思绪，这种思绪我想应该归结

为“知青情结”，并且相信许多知青朋友都多少有一点这种“知青情结”。突然想到，为什么没有“右派情节”？“黑五类情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其实，“知青情结”并非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怀念，而是从人生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和心路历程作的一次慨叹。

知青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总使我牵肠挂肚。返城已20多年了，可知青生活的10年常常时隐时现地在心里盘旋并烧灼着我。扪心自问，我好象不记得自己有过很开心和很放松的日子，某种似是而无的负担总是如梦魇似的横垣在心头而挥之不去。究其根源，恐怕与知青生活有关。

10年下放，留下遍地的记忆碎片。当我们试图用情感之线将这些记忆碎片一一拼接时，却发现，风雨中的颤抖、荆棘中的煎熬、绝望中的抗争，都交付这风吹雨打中。

多年来，特别自2000年以来，我重新接触了一些同学，我们知青中大多数人的近况是大可哀痛的。这就促使我试图重新去审视和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带来当年的困苦以及现在艰难的命运的必然性，从而使原来不太清晰的思想逐渐明朗起来。同时，面对这30年来我们知青走过的道路，我十分感慨，我以为许多同学的艰难，固然有他们主观上的原因，但客观上的制约却也是实实在在的。由于经济形势的低落，人到中年的知青首当其冲地被列入极尴尬的境地。当年知青们用青春播种希望；用热血灌溉理想，可如今收获却是失望。因此，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噩梦，是一座炼狱。对知青来说，命运是一场政治性灾难。

什么是恐怖？通常的理解是“朝不知夕”，文革中的“红色恐怖”更是可与法西斯一争高下；但我的理解是，当你明知在走向深渊而又不得不走的时候或者当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是最恐怖的。我无数次问自己：“我们当年的下乡有意义吗？”尽管每次答案都是相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我还是在问。难道真的因为那种自出生以来的强大的纯粹的教育，以至我变得如此的不自信——面对显而易见的真理而宁愿视而不见。

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在知青们的整个生活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给他们留下刻骨难言的痛楚。每当我独处或者与其他同学在一起谈起当年，总要想起当年的经历。它改变了绝大多数知青的一生。虽然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然而直到现在它们仍不断在我脑海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在IT业飞速发展的今天，INTERNET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各类便利，然而，当我们偶尔小憩，泡一杯清茶，点一支香烟，摒弃所有的浮躁，静下心来想反思一些问题时，却发现当代社会多的是利欲横溢而少有一些能提供你思考或启发你思考的空间。于是我到处在寻找属于我的空间，哪怕是虚拟的。

当我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时，头脑里突然出现”遗老”这个词。这使我感到震惊，在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过去的故事了？我们的生活真的就没有什么将来而只有过去了？

女儿说："经常回首往事的人，一定是老了，因为老人才生活在往日的辉煌中。"这算什么话？我们有过辉煌么？

她们没有包袱，因此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挑战着历史。她们是不会让"过去"的悲剧重演的。但我一直认为，历史就像两扇厚重的大门，它是由"过去"向"今天"开启的。在重温列宁说过的"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名言时，我想，当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倘若让它由"今天"向"过去"开启，寻找新的生活起点时，再回头看那两扇厚重的"大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

在一个很普通的聚会上，我又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和不太熟悉的脸庞，在那里，前知青们许多真知灼见在我的胸臆中激荡。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要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旋律，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他的同志。"把伟人这语录变通一下，是不是可以说：知青只要凭着"知青"这个词，就可以在全中国找到朋友呢？我想是可以的。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时候……"今天，再听这首歌，感觉上词曲还是原来的词曲，只是少了些原来的纯朴而多了一些摇滚。就像陈年的老酒，时间愈久就愈醇。可见，打动人心的东西是不会被岁月湮灭的。它一定会以别一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我不知道知青的"故事"是不是会像这首歌那样流传，但我希望它会流传，因为，为了我们青春的纪念。

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中的涉及的人物都将真名隐去。

第1章　此去关山千万里

出路——热血在四方——光荣与梦想——万水千山——今后的命运今天注定

庚戌年2月（公元1970年3月）在原农垦系统基础上组建4个师，32个团，4个直属单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兵团属副军级单位，隶属昆明军区，接受云南省和云南省军区双重直接领导。

庚戌年3月（公元1970年4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到上海虹口区"征兵"。

庚戌年4月8日（公元1970年5月12日）中午，上海北站又一列知青专列满载着哭声沿"沪昆线"缓缓启动了。专列上1000多名的知青乘客包括76名上海市长风中学1969届的初中生，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山间的小盆地——孟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属于政治运动式的大移民、大迁移，是一种政策导向型的迁移，驱动因素是纯政治的。它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而波及整个国家，这在国际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生、发展，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

它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时期。当时先进的青年学生为了理想，从各大城市奔赴各解放区，切切实实地走进农民的生活，既向后者传播文明，加快了抗日战争的步伐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向后者学习同生存有关的技能，以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真正成为后者中的一员。因此，毛泽东在他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他们的精神。他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成了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理论。

3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由于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是胜利者。

50年代末，毛泽东对回乡知青大加赞赏："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有作为"无疑是个充满信心的热切期待，它至少确立了知识青年与工农阶级地位平行的精神地位。

6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就初露了后来知青运动的端倪。虽然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已开始从自愿转为对知青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因为涉及的对象都是出身不好的中学生，在上海，多数人的去向是新疆。

"上山下乡"由学生的自发行为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不能不提到"文化大革命"的。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的份上，老人家以他虽已垂暮而仍犀利的洞察力已痛苦地发现了自己所作决定的轻率："文革"已违背了他发起这场运动的本意，而显出它本身的丑陋。1966年以来，全国初中、高中（包括部分大学的）各届毕业生急待就业安置，而各企、事业单位又处于几乎全面瘫痪的境地。无力接受和安置变得狂妄不羁的红卫兵。因此，这些"红卫兵"的出路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是情有独衷的。如果把目空一切的他们交由他信任的农民兄弟来看管，利用他们的保守来遏制学生们的不安份，显然是个好办法。而这种"分而治之"则被冠之"一片红"的美名。

60年代末，毛泽东鉴于国内政治、经济等各种形势，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借《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而且去向必须是"老、少、边、穷"的地区。

从此，历时10年，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于是乎，一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崇高得吓人的口号，就把上千万城市青年无法就业的危机强行抹去了。这场危机真的被抹去了吗？

十几年前，领导农民翻身的他说过一句让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都忘不了的话，这就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可一眨眼，被教育者突然从"学生"成了"老师"，这万花筒似的的变化不光使城里的学生迷糊糊的，连"农村的同志"们也晕晕乎乎的。

事物的发展在这里起了质的变化。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知青运动历史性的演变，决定了知青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毛泽东曾严肃地告戒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因为一项重大的政策将影响国家人民的各个方面。有时这种影响和代价将是长远的。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到底贫下中农比青年学生的思想"先进"多少？前者的灵魂比后者又"纯洁"多少？众所周知，事实上老人家在政治方面并不信任农民，他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至此，尽管农村的天地依然广阔，但"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却注定没有"大有作为"的可能。与他们30年前的前辈相比，他们是彻底的牺牲品和失败者。倘若他们的失败仅止于此，那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人们将看到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劣势和痛苦将以更大的失败出现——他们今后的命运在今天已经被注定。

当我们回过头去审视这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会惊讶地发现，这种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更不是一段特殊的政治经历，而是知识青年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出生于癸巳年～己未年（公元1952～1954年）这个年龄段的绝大多数是当知青的，他们几乎可算共和国的同龄人。而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对比她稍后诞生的这一代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她用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呵护着培育着这代人。祖国的花朵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他们怀着"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的美好理想，背上书包，去学做共产主义的新农民……

1969届初中生是这个年龄段的集大成者，丙午年（公元1966年）他们唱着"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的《少先队队歌》读完了小学，但"文化大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他们一出小学校门，就怀着无比的赤诚，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这时，领袖又要他们"复课闹革命"。于是他们跨进了中学校门，但一般意义上的学一天也没上就又出了校门，仅学了几句应景的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英语，就美其名曰："初中毕业"，虽然没有什么毕业证书。

"初中毕业"了，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无学可上，而"知识青年"的桂冠却是必定要带的。这时，领袖的个人意志再次决定了人民的群体意识，因为他说："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虽然学生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犯错误"也要轮班排队，但想不"犯错误"就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走"一片红"的道路。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知青有可能将在农村或边疆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学生们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

领袖希望他们到“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庚戌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上海每天至少有一趟知青专列发往全国农村，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几乎每个家庭只要有庚寅年～庚子年（公元1950年～1960年）期间出生的，就一定产生一个甚至是几个下乡知青。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近9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上海的知青去向除本市郊县和市属在外地的国营农场外，大致有7个去处：向北有安徽、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向南有江西、贵州、云南等地。这些地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老、少、边、穷”的特点。由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决定了人民的群体意识，因此被上山下乡运动裹挟的绝大多数知青是被动的。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全国下放的城市学生达数以千万计之多。

当斯时也，国内各项形势持续恶化，加之1969年初中苏因珍宝岛（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事件而边境形势骤紧；3月2日，珍宝岛的枪炮声震动了全国。中央军委决定以国营农场为班底，在全国建立12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具有双重战略意图的：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而且可以消除城市的“动乱源”，暂时缓解城市的就业难。这样数以千万计的知青中产生一个特殊的群体——兵团知青。

庚戌年3月（公元1970年4月）的一天，上海市虹口区1969届的初中生被告知去坐落在海宁路的胜利电影院，听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征兵”的动员报告，1000多名的学生把电影院挤得座无虚席。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的政治处主任向他们描绘了地处北纬23。以南的云南孟定是宝地，是一个盛产热带作物的美丽的地方，生活上：“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终年四季如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逢着雨季，就是休息，学习。主要任务是：1、发动当地的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革过命的命”。2、保卫边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协助缅甸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官方并不鼓励）。3、在17年来资产阶级路线教育下，他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受了“封、资、修”的毒害，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此知识青年要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接受再教育……。

在肩负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殷切的期望后，学生们深感任重而道远而砰然心动，他们自然是热血沸腾。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

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动机作一个分析，人们会发现，除了“无知”这个共性外，“上山下乡”的中坚力

量应该主要来自两部分人——他们都是“血统论”的被影响者。

一种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看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把“上山下乡”作为“镀金”的场所，以取得今后掌权的资历。“下”是为了“上”。

倘若是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他们曾经是”当然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更有必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当时权力者的忠诚。从而含蓄地证明他们是被”冤屈”的，是能够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同样地“下”是为了“上”。

另一种是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他们要以此来改变自己的“血统”，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血统论”的荒诞，从而证明党的另一条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比之下，他们的动机似乎比前者更纯洁——仅想改变“血统”而已。

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的行列。

尤其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人，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能够有资格聆听这类报告自是党组织的信任，积极报名是义不容辞的，而且毫不顾及老母亲们的暗自垂泪，还自以为是从思想上与本阶级划清界限。何况诸如“三条长虫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黄蜂蜂窝当锅盖、吹火筒当烟袋、抱着娃娃谈恋爱……”等等的“云南十八怪”显得多么的怪异、诡秘和令人神往？何况是第一次可以脱离了父母、老师的束缚，年青人要求独立、渴望自由的理想，一旦变为现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此，终于在这年5月的某天，他们登上南行的专列向着中缅边境的孟定狂飙突进。

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

同学安，资本家的子女，自由投资者。他抽着很一般的“牡丹”牌香烟，烟瘾很大。他没什么别的爱好，不喝酒，不打牌；就好喝浓茶和抽烈烟，这嗜好还是在农场养成的。

“我喜欢外烟，过瘾！但抽不起。要不是怕丢人，我甚至想抽更便宜的，在我看来国产烟都一样。过去没烟时，树叶我们不也一样抽？现在条件好多了。”多年不见，加之股市的涨涨跌跌、牛牛熊熊和多多空空使他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言语间有着明显的自嘲。他抽烟喝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可直到现在依然觉得好茶好烟不过瘾，如果不用眼看，他不能象一些人那样区分香烟的品牌，至于让他根据茶的口味来区分种类，那就更别提了。

“5月，正是雨季的开始，出上海、进浙赣、入湘桂、上黔滇，沿沪昆线一路冒雨西去，下了火车再换军用卡车，继续西行。在这山路的颠簸5天里，吃的是又肥又酸又辣的干肉；住的则是睡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的回潮的干草上，连脚上的鞋也湿漉漉地穿了5天。对了，有个女孩因一脚踩进泥泞，拔出脚时，一只鞋没了，她就这样一脚

鞋，一脚光地在别人的扶持下才抵达目的地，娇嫩的小脚自然是血肉粘连。”我为他惊人的记忆力而诧异。“你一定感到奇怪，这么小的一件事我都记得住？”他抬眼看定我。的确，我们这30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可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总是挥之不去。话又说回来，在宏观的人生中什么是大事呢？

“一路上纷纷扬扬的雨始终追随着知青。透过雨帘，泥泞的盘山路两边，弥望的是一片红土地，寸草不生。由于雨季，山地大面积滑坡，经常的情况是卡车仅三只轮子着地，紧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时我的心开始逐渐下沉，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的荣耀与浪漫击个粉碎，突然产生象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感觉。”在连续的降雨停止时，一大批疲惫的孩子也穿越了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边境小镇——孟定街。

孟定，云南西南部山间的一个小盆地，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从山峻岭之中。这种盆地在云南叫坝子。在《中国地图册》的分省页上可以找到”孟定街”这个地名。“孟”在傣语中就是平坝的意思。它隶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耿马，《辞海》的记录：旧县名。在云南西南部、南定河流域。元属孟定路，明设耿马安抚司，清属顺宁府，仍设安抚司，1942年设耿马设治局。1952年改耿马县。居民有傣、佤、汉、拉牯、布朗、彝等族。产有稻、玉米、花生、茶叶、甘蔗、香蕉、咖啡等。森林茂密，有马鹿、野猪、孔雀等野生动物。

“望着简陋的茅草棚和挂在墙上晃来晃去的煤油灯以及地下放着几大盆毛没刮净的肥肉，还有一大帮围着肥肉淌口水的当地小孩和咽着唾液的大人，我们无言地抚摸着满脚的血泡。不是说‘楼上楼下’吗？不是说‘电灯电话’吗？不是说‘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吗？原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空中楼阁（大多数知青直到离开农场，住的仍是茅草棚，用的仍是煤油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原来价格是很贵的。

“受骗了，我们被骗了，你们怎么可以如此？从几千公里外去骗一群孩子呢？也不怕累么？脑海里始终在转着这几句话，我终于忍不住地流下眼泪，由此引来全体的号啕大哭……

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别人越是鼓吹好的东西，我就越不信，这个教训或者说经验，不知多少次帮我认识事物的本质或接近它的本质。大家边哭边把大肥肉扔在地上……唯有老农工养的瘦狗在大快朵煦。”“现在想起来，我们知青太过分了，会有报应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至少我很怀念那些大肥肉。这些肥肉是兵团老战士舍不得吃而特意留来款待我们的，听说他们都是原刘、邓所属‘二野’部队的，又听说是在追击逃向缅甸的蒋帮陆军中将李弥第 8 兵团残部，没追上后就“顺便”地留下垦荒，而且是成建制的——这种成建制的垦荒既适应了基本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再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削减军费而用于经济建设，又对当地的土司及各类头人起到震慑作用；——没准也是为了“顺便”对付残存的李弥残部的——只要一打开军火库，这就是一支现成的、而且是具有成熟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真是伟大的‘一石三鸟’的战略构想。

这夜，我躺在用竹子搭成的床上，透过稀疏的茅草屋顶，可以看得见星空。与世隔绝和绝望的念头在胸中弥漫而久久无法入睡，耳边听着连里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老人家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或者是雄壮的进行曲。

突然，广播中断了，只听得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今天发表的庄严声明’。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著名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伟大论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史称”五?二零声明”。

哦！那天是1970年5月20日。

虽然他叙述的都是我熟悉的，但仍有一种被震撼的共鸣。安同学大学毕业，有着较好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因此心气孤傲。他颇通法务；擅长策划，行政和劳动人事管理。但最终一事无成，只能寄希望于股市中赚点生活费。他虽心有不甘，然奈何？“看来，我要将自由投资进行到底了。”我无话可说，惟有默然。

“自然，投资于股市，也可以算工作，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自然，是风险更大的事业。”他有点自嘲。安同学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以平静自己的情绪。毕竟那段经历之于他而言是痛楚的。他沉浸在30年前的岁月里。

第2章 少年壮志话英雄

理想——虔诚——梦中的河——精神和物质——人生价值——群众和英雄

青年学生们怀着虔诚坚定的信念，肩负着领袖的重托，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相信自己被17年的教育制度“毒害”了，因此盼望在广阔天地里脱胎换骨、大有作为，成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同学坚，“右派”子女，职业：出租车驾驶员。他美丽的妻子雅也是长风中学76人中的一员。由于油价飞涨，他说挣不到钱。出车24小时，第2天休息。

“知青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总使我牵肠挂肚。”他在农场里把身体搞坏了，回到上海不久，因溃疡病而被医院切除了80%的胃。

“其实我报名去云南，实在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因上山下乡是个大趋势，而云南对当年只有16岁的我们来说只是个概念，到底有多远？我实在是不清楚。但兵团毕竟是每月发工资，吃大米。可结果呢？并非如我们想象的……返城已20多年了，可知青生活的10年常常时隐时现地在心里盘旋并烧灼着我。扪心自问，我好象不记得自己有过很开心和很放松的日子，某种似是而无的负担总是如梦魇似的横垣在心头而挥之不去。”坚同学苦笑着，“对

了，我们连队边上有一条河……”

假使在地图上找小黑河，是要失望的。严格地说，它不是河而是一条大山涧，名为“黑”可河水非但不黑且清冽。沿着河边走，随处可见如铁锈水似的的小水洼，居懂化学的同学讲，小黑河水含硝量特大，故水质清冽而略甘甜。其口感在我的印象里决不比现今的“农夫山泉”差。虽然它决不如黄浦江那样可考出许多典故，因此没人去考，也许也考不出。我想大约因河里到处是黑的大礁石而因此得名罢。

小黑河从原始丛林中流来，我没见过苏轼咏过的那种“乱石穿孔，惊涛掠岸”的壮景，但却领略过小黑河的威势。

沿河上溯，两岸峭壁大多刀劈斧凿般，崖上巨木参天，确如李白所叹“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小黑河水发出巨大的轰鸣，稍远点说话，便要大声喊叫。真奇怪，这样的小河居然有如此的声威。这里虽没有“惊涛掠岸”，但“卷起千堆雪”却是随处可见的。一到晚上，两岸一片寂静，只有河水拍岸的声音，喧嚣着向前，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那永无休止的步伐。唏呼，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小黑河向北流入南定河，南定河，这可是条有名的河。在1:400万的全国地图上，它也有一席位。

南定河，《辞海》的记录是：在云南西南部。源出临沧县南，北流至云县勐赖镇附近，再折向西南流，下游在缅甸境，注入萨尔温江。

南定河的流速虽然比黄浦江快得多，但比小黑河可差远了。这两条河互相提携着向西流入萨尔温江，再进入莫塔马湾。小黑河与南定河的交汇处也象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一样，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此清彼浊泾渭分明。

小黑河不但清冽，且流速很快，虽然大多数地方水深不过腰部，但人要在水中站稳也是困难的，可见它的湍急。

小黑河有的地方深一些，也就约两米左右，但极个别处却有着幽深的寒潭，知青们伴着小黑河住了十年，它究竟有多深？谁也不敢去探险。虽然湍急处通常有滑溜如碉堡的黑礁石或尖利如狼牙的小礁石。这些幽幽寒潭即使在夏天也似乎冒着丝丝寒气，它看上去水流平缓，但平缓下面却隐藏着极危险的潜流和足以淹死水牛的旋涡。

小黑河多礁石，多浅处，因此不能象澜沧江、瑞丽江那样可供些小船通航。河两岸的摆渡，是以一种颇带原始色彩，把树干掏空而成的独木舟来完成。小舟没有撑船人，两岸各栓一只，供渡河人自己撑用。倘若此岸有人撑渡而彼岸无人过来，那么再有人想从此岸到彼岸，要么淌水，要么只有等了。

小黑河虽不能通航，但仍起着交通工具的作用。假如在深山里打猎，碰巧又打到马鹿之类的大猎物，想把它从大山里扛下来是不可思议的，于是猎人们便把马鹿顺水放下来。所以当地人都充分利用小黑河的价值，一切都顺流而下。

小黑河的两岸住着傣族，山上是佤族。在知青去之前，这里的民风十分纯朴。记得知青刚到滇边时，少数民族无论“普哨”还是妇人，外出时下身自然是统裙，而上身大多仅穿“内衣”，说白了，就是稍宽点的胸罩而已。可当时的知青一见她们是多么的惊骇，男生是目瞪口呆，女生则惊叫着别过身去，而少数民族妇女更用惊诧的目光看着知青：“小汉人怎么了？”现在想起来，当初的女同学心里一定颇为眼红”她们竟敢穿裙子，竟敢穿胸罩外出。”这些当然让女战友羡而又慕的了。

小黑河使坝子富饶，盛产各种热带作物。坝子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天气酷热，而小黑河总是清凉的。因此无论什么民族，都爱下河洗澡。关于洗澡，古人白居易就赞过出浴的扬玉环，今人朱自清也有过“如出浴的美人”一句，可见洗澡给人的美感。而少数民族洗澡，男女间也不刻意避忌，嬉笑玩耍十分热闹，洗澡时也常发生在我们汉人看来是伤风败俗的事。在知青到后很久，他们才稍有改变这种风俗，但仍有残余。

现在想起来，这种民风或许应该保持下去？但感觉又不太文明。可“文明”也许正是“文明”人的遮羞布？听说东亚小国日本现在还有男女同浴的习俗，也许就是受“唐山文化”的熏陶？自然，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在“欣欣向荣”的我们，这种文化“糟粕”，我们自然是不肖继承的。

小黑河依旧，但岁月悄然的流失却使小少离家的孩子，男的愈见阳刚，女的更显阴柔。由此小黑河神秘的面纱上又抹上浪漫的色彩。河的下游是一片以细小的鹅卵石铺就的滩头。

落日，艳丽极了，炽烈的红光映红了西部天空；像漫天大火。云霞飘浮，像冒着热气的鲜红之河漫过群山向四方流淌。黄昏时男生洗澡，女生洗衣，也很热闹。自然，“文明”人恪守“文明”的戒律，白天男女是决不“同娱”的。

天一黑，小黑河就成了“爱河”，这里没有黄浦江边那种防洪堤，所以没有站的劳累，也没有黄浦江边那么挤，恋人们悠然地迎着河谷吹来的清风，顶着朗月或繁星，呢喃娇嗔，相依而拥。彼此搂着数星星，数萤火。而决无浦江畔情侣身上那种油汗腻腻的感觉，身上永远是凉爽光滑。显得悠闲浪漫（自然晚上倘若去查铺，则说不定某间宿舍的四张床上可抓到三对，剩下的一个一定挤在别的宿舍）。

这可是知青的一大发明，其意义绝对比某连杀猪要激动人心。不知从何时起，傣族的少男少女们也来此相聚，有别与知青的是，他们偶尔也会燃起篝火，边唱边跳，但与知青们，此处彼处，互不相扰。

后来听说师部也知道了小黑河，便想利用小黑河的湍急在河上建电站。按说这是好事，听说遭到许多知青和老

乡的反对，究其根源，无非是少了个“恋爱角”……电站终于没有建成。

“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太明白人们对小黑河的微妙感情，那个年代，在那片没有娱乐的地方，人们宁可不要代表文明的电，也要这种原始的‘娱乐场所’。咳，也不知现在电站建起来没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要小黑河上建电站，必先给人们精神满足，这是不是又一个奇怪现象？到底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不是说物质第一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坚同学的神态看上去有些伤感。“其实，只要是上山下乡，都一样……那管什么南方北方。”

无论白雪皑皑的北国，还是瘴疠笼罩的南疆，抑或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从盐碱满地的江淮大地到贫瘠崎岖的云贵高原，从泥泞的沼泽到深山密林，举凡大田、河滩、窑场、胶林、工地，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兵团知青们瘦弱的身影。

这些轻信和无知的少年莫名其妙地承担起社会和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他们血气方刚，认真体验着农民的贫穷和艰辛，苍白的精神世界使知青们极其虔诚地“改造”没什么可改造的世界观。他们极具使命感地毫不怜惜自己，如苦行僧似的“修炼”着向体能的极限挑战。兵团知青们披星戴月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把旺盛的青春精力发泄在无功的辛勤劳作上。

相信大多数知青都能背出这样一段话并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在这种纯真思想的支配下，他们狂热地崇拜和渴望成为英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得到巨大的自由和扩张空间。尽管领袖无数次告戒他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英雄”在成为一呼百应的英雄之前，不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吗？而且二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更对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英雄不论出身”、“豪杰出自草莽”的思想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成为兵团知青的学生。他们希望用青春塑成一座无怨无悔的纪念碑。渴望用青春和热血去触摸梦想和光荣。因为他们祖国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人生价值的指向是“无我”和“忘我”——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3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血统论——贡献——劳动的目的——孟子语录——”家”——来！为浪费干杯！

凡是当过知青的，都知道北方的黑龙江有个上海知青金训华，他怀着“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的豪言壮语式的心愿为救几根被大水冲走的木头而牺牲，被追认烈士，因此名动天下；凡是当过知青的，都知道南方的云南出个上海知青朱克家，他深入大山里的村寨而终成“正果”，官运亨通，所以华夏扬名。他们正是这种疯狂的献身精神的典型代表。（朱克家后来成了“四人帮”的爪牙，此乃后话）

当我在对女儿讲述金训华的故事后，她诧异地看着我：“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那几根木头重要？如果姓金的知青不死他就再砍不回那几根木头？他的生命竟然不及那些木头？”面对女儿问题，我无言以对。金训华们的举动也许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不可理喻，但两者价值观的差异何者更值得赞颂和弘扬？我感慨地摇头走开。

虽然我在心底里承认女儿是对的，扪心发问，倘若现在还出现金训华所处的环境，会有人象金训华一样吗？我不知道。但30年前的献身精神却是不争的事实和不容否定的。因为当初我们的行动，绝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因为祖国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虽然单一的看，人的价值是任何木头所不能比拟的，然而一旦上升到”木头也是国家财产！”的高度，个人的生命就显得“轻如鸿毛”了。再者，与之相比的是大多数知青现今的窘迫，所以金训华的举动愈加显得悲壮。

回顾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为上山下乡贡献生命，贡献青春的又岂止金训华、朱克家？更多的年轻生命和本应辉煌的青春已经在默默无闻中被湮没、被浪费、被遗忘。

云南，最艰苦的时候莫过于雨季，知青们顶淫雨、踏泥泞——插秧、收割，开荒、植胶，干得腰也直不起，直至跪在泥泞里继续到昏厥。由此在凡有知青的地方都涌现出许多“钢汉子”、“铁姑娘”。他们的虔诚使他们可以自豪地大声宣布：“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我们知青”。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始建于癸丑年（公元1973年）。

第7团是以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垦团。粮食供应由国家调拨和自产自供相结合。“农田大战指挥部”组建的原因首先在于辛亥年（公元1971年）“9.13”林彪的“沉舟折戟”。“副统帅”的“大力发展橡胶，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的口号理所当然地被批判和遭屏弃；其次是由于盲目地毁林植胶，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

由此大规模毁林植胶因此停止，但各营的人员就显得过剩。各橡胶连除了必要的胶林管理，大多数知青几乎无工可出，这对精力旺盛的知青来说，不出工或者少出工可工资并不少，这自然是好事。但无形中滋长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却更使各级领导忐忑不安。

为求粮食自给，尤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富余人员得到安置（现在想起来，”农田大战指挥部”颇有点像现在的“再就业中心”或前几年的所谓企业“三产”），以便“再教育”向纵深发展，因此报请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

完全按照南泥湾精神组建由副团长担任指挥长的“农田大战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开发南定河沿岸的芦苇荡，提出“把芦苇荡建成米粮川”的口号。

“指挥部”以第7团第5营的2个水稻连为基础，各类人员，各种机车、农业机械以及其他设备从其他各营抽调、补充。

“指挥部”下辖9个连级单位，沿南定河南岸一字摆开。各连的番号由原所属营的序列命名。比如由2营各连抽调来的，就混编为指挥部2连等等。

“指挥部”组建伊始，依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南泥湾精神传统，各项生活环境、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均异常艰苦，但艰苦的条件也确实为一些”虔诚”改造的知青提供了从普通知青成为知青干部的”崭露头角”的机会。那时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古圣贤曾有过这样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此微言大义的话可是耳熟能详的。虽然两者在当时都是被打入批判之列的。

大面积开发芦苇荡，是一项异常艰苦和近乎”残酷”的劳作。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有着近乎沼泽般浅处没膝、深处没腰的淤泥，头顶着亚热带雨林的烈日，一脚下去是热腾翻泡的水汽蒸腾，由此，手脚被锋利的芦苇切口割伤和在密不透风的芦苇荡里泡得下肢发白或浮肿或昏厥晕倒，实在不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由于毫无起码的劳动防护，使人们随时都要提防和忍受着沼泽里野蜂、蚊子、毒虫、蚂蝗、蛇螨的袭击。

开发芦苇荡初步的工作是首先把芦苇砍倒，再把砍倒的芦苇翻晒干后烧掉，然后开挖排水沟，最后再一锄一锄地翻挖出土里成片成团的芦根……由于没膝的淤泥，机车不能下去，因此，砍芦苇、翻晒芦苇、挖排水沟、翻挖芦根等工作全由人工承担。

上海女知青虹，“历史反革命”子女，原水稻连农工。她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在“文革”中她家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了不再受歧视，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为了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可以不受歧视。我是真心希望能有脱胎换骨的机会。当初北方局势吃紧，因此我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在插队、国营农场、和建设兵团之间，我选择兵团是因为它是军事化组织，更有利于我的锻炼，而并非看中兵团是拿工资的。但因出身问题没被批准，才退而求其次到云南兵团。——我们是内控对象，是被有限使用的。”（也许是那个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的内部规定帮了她的忙？）

她的脸上带着一些沧桑，但仍保持着与现在年龄不太相称的朴素的性格。

她对组织上不因为家庭出身和有机会洗脱与生俱来的“原罪”，批准她参加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激动不已。她坚信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给出路”政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她比一般知青更积极地改造自己。指望能够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籍以此证明党提出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的伟大。

劳动中，她自动抹去性别差异，把女性的柔美封存在心灵深处。与男知青并肩战斗，其劳动强度甚至让男知青自愧不如。

“你们男知青以为割谷是轻活吗？那好，我与你们一起掼稻、扛粮包，你们认为稻田里薅草是轻活吗？那好，我与你们一起去砍芦苇荡。”为了防止野蜂、蚊子、毒虫、蚂蝗、蛇螨叮咬和钻入，她就把裤脚袖口扎紧，一样光脚踩在尖利的芦根上……哪怕是例假期间，她也毫不啃声地下到有着齐膝深淤泥的芦苇荡里挥动闩刀，“实在干不动了，便跪着干……”腰酸得好象断了似的。”以至许多男知青都”忘了”她的性别。

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尽一切可能与老农工打成一片。因此她在“指挥部”范围内是比较有名的“铁姑娘”。最终被上级任命为水稻连的副连长。但当时的党组织还是以“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理由继续考验她的忠诚……直至大返城，她还是没了却自辛亥年（公元1971年）以来就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其实，由于土质的关系，芦苇荡最终还是还给了芦苇荡，恢复了原来‘湿地‘的本来面貌而并没有变成水稻田，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我真不明白，团部那些决策者不都曾经是农民吗？居然不懂什么样的土质可以种水稻。看来开发芦苇荡的意义确实在于它的政治功能。”当年的女知青虹副连长看着她那双曾经掼稻谷、握闩刀的手苦笑着，“现在讲生态保护，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沼泽的干涸引起的后果已经说明了湿地的重要。现在不是号召‘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吗？我们那时早就办到‘退耕还荡’了。”一本正经的“铁姑娘”居然也会说一些具有黑色幽默的话，我真是有点诧异。

回上海后，她被安置在街道服装厂，客观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泯灭她心中对党的追求，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一如当年。在接受了15年的考验后，”历史反革命”子女终于证明了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在丙寅年（公元1986年）的那个迟到的春天，当年的女知青虹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她站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起了拳头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只要说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人们的头脑里至少会有“橡胶+武装”这2个概念。

既然是“生产建设兵团”那么就一定要有几个武装单位。第7团有连级单位几十个，选哪个单位比较合适呢？无论从战备还是参观的角度考虑：首先要交通便利，其次要体现“云南”的特色。那么第4营5连无疑是首选。它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因此5连荣幸地成为全团唯一的武装连，军事化程度最高。

孟定坝的地形特点是东西长，南北窄，海拔在五百米左右。连接内地和边境的的公路从5连门口经过。如果从边境到内地的角度或从军事角度看，5连的是前面当地驻军的一个教导队，后面是驻军的指挥机关。因此5连与驻军遥相呼应，从而构成象征意义上的3道“防线”。同时5连还拥有全团最好、最成熟、最符合标准的样板橡胶园。一棵棵橡胶树整齐、茁壮、挺拔。

如果你是在炎热的酷暑里身处这样平坦的橡胶园时，浓重的绿荫使人顿消暑意，倍有有心旷神怡之感——当然倘若你只是去游玩或者观光——所以无论兵团、师、团、营或者兄弟师团再或者是哪个”知青慰问团”的哪级领导到第7团或者第4营参观、视察、检查或取经交流什么的，团营首长都会建议他们要去5连看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橡胶+武装”这2个要素使该连具有外人心目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特点——正是这个，吸引着城里的学生。因此5连是第7团或者第4营的样板和招牌。

由于5连的特殊性，因此在人员的组成上，领导机关还是颇动了一番心事。

首先，与第7团大多数连队的知青都来自同一学校不同的是5连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这样知青就不太容易组成“小圈子”，其次，凡是分配到5连的知青看上去相对“乖”一些——这样的知青就容易领导而不至于出乱子。

事实上，5连的知青也确实不太与别的连队知青很密切地交往。他们走到外面，也总有着一丝潜在的荣誉感和优越感。（顺便说一下，全云南农垦系统的知青中出了2个地师级的高级干部，5连的成都知青唐朝明就是其中一个。他离开农垦系统前的最终职务是临沧农垦分局副局长。最近听说唐副局长在成都开了一个上海人俗称”阿诈里”的皮包公司，现正被警方通缉）

“你看，那是我当年的照片。”坚同学的妻子雅从相册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有点发黄的用当年老式的120相机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雅同学英姿飒爽，肩挎仿苏制50式冲锋枪，一手虚扣扳机，一手遥指远方，稚气的脸上满是严肃，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状。应该说，照片上的雅同学确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个年代所具有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特点。

5连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在一次全营植胶大会战的动员大会上。会场内各连按序列坐好，会场四周则是由5连荷枪实弹的游动哨。在那个讲求人海战术的“大呼隆”年代，各种各样的“大会战”层出不穷，已经不能激起知青们的任何激情。因此这样例行公事的动员大会搞得如此夸张，实在叫人感到好笑和滑稽。无怪乎这些知青组成的游动哨在遇见熟人时难免露出尴尬的笑容。

应该说5连的知青与其他连队的知青境况从宏观还是看，大致上差不多，但他们的各项状况比起其他连队的知青，还是要好一些。门口就是公路，因此出行方便，全部住瓦房，知青宿舍完全按标准——3、4个人一间，而且伙

食条件也相对比较好，只要5连没菜了，团部或营部就会从别的连队调拨，而不象其他连队那样没瓦房就住草房，没菜吃就喝盐水。就劳动条件而言，5连的橡胶园是名副其实可以称为”园”的橡胶园——而其他各橡胶连的“橡胶园”根本就是“橡胶山”。所以5连的知青在劳动中不用很费力地爬山。这种“园”的优势特别是在雨季里的割、收胶时就更明显地凸现出来。

与其他工种相比，割胶、收胶是一项强度不太大的劳动，一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4——5个小时，它的特殊性在于橡胶产胶的高峰时间是凌晨4、5点钟——上午9、10点钟。黎明时分，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头带电石灯的胶工们已经穿梭在橡胶林中割胶了。

与其他连队的胶工在没有一丝亮光中爬山相比，5连的知青可以舒服地行走在平坦的胶园里而少了些许被绊被摔的担心。如果是雨季，这种优势就更为明显了，别人要小心翼翼，一步三滑地上下山，更何况在收胶后要挑2大桶胶水下山？因此5连的胶工是不会有这种提心吊胆的。

“你们说的不错，试想一下，在漆黑平坦的橡胶园里，踩着被露水湿润的土地，在清新的空气中只看见星星点点的电石灯在移动着，好象挺有诗意的，对不对？”曾经是5连胶工的雅同学有点愤愤不平：“可当我们频繁地在半夜里突然被紧急集合的哨声从床上叫醒，全副武装地进行战备拉练时，你们却在做着美梦……特别是下着大雨紧急奔袭芦苇荡，而且还要战战兢兢地在沼泽里趴上几小时，忍受着蚂蝗、毒虫的叮咬……再赶回来……拖着满身的泥浆，根本来不及换衣服就去割胶……就拿上山‘砍岜’（大面积毁林）挖穴（植胶）来说吧，你们只要带好个人的必需品，而我们还要带上十多斤重的枪并看管好……真是麻烦……万一枪被谁偷了，那可真是要命了。”当年的女兵团战士象冲锋枪射击似的，对着我和她丈夫坚同学说了一连串的话。“果然厉害。”我们相视一笑。

公平地说，5连的知青在生活条件、劳动强度等方面，虽然要比其他连队的知青略好一点，但他们的另一种辛苦，的确同样是其他连队的知青所没有的。

原本粗砺的锄把、刀把、斧把等一切工具与原本光滑柔润的手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前者光滑了而后者粗砺了。但两者能量互动产生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却没有出现，于是知青们开始明白：知识与这种带有惩罚性的原始劳作的价值在一开始就发生了颠倒，劳动价值在于扼杀知识和窒息人的思想而不在于创造使用价值。由此，知青们的思想和心灵怎不产生欲哭无泪的感情？并开始怀疑“接受再教育”的真正含义。

——历史在这里开了倒车。

同学铭，前国民党（起义）海军军官子女，职业：港务公司报关员。多年来生活的磨砺，使他对一些事看得比较淡薄，已经很少有使他激动的事了，但惟有知青生活恐怕是极少数的例外。

在乍浦路的小酒馆里，他有些微醺，“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山上伐木遭火灾吗？结果一根原木都没运下山……真是浪费啊！……”这是滇西南的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在这片终日幽暗、潮湿的山林中尽是葛藤荆棒，刚迈了几步，带钩刺的野藤就绊住了你的腿，丛林又浓又密，明灿的阳光竟然穿不透繁枝茂叶织成的天幕，只是偶尔从网眼里透进几粒光斑。脚下是软绵绵的淤黑积叶。除了脚下野藤荆棘外，还得提防随处可见的毒蛇和蚂蝗。

山林中有间简陋的茅草棚，那是十几个兵团战士安在人迹罕见的丛山峻林中的“家”。这个家没有墙，四周用塑料布胡乱围着，地上满是痰迹．烟蒂等，一片狼藉。屋角，一大段檀木发出幽蓝的火苗，既驱蚊，也是火种，还兼照明。一到晚上，满屋香烟袅袅，蓬壁熠熠生辉，火光把十几个身影投到各处，光陆怪离，恰似十几尊罗汉。

这环境丝毫不亚于当今任何一座庙堂。森林中决无许多童话里常见的那种小白兔。梅花鹿或者燕语莺声。周围除了满鼻子的霉味和一耳朵麂子单调、凄凉的悲鸣外，便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了。

雨季，到处笼罩在烟云中，早上起来，抬眼看去，一片湿淋淋的景象：斧子、砍刀和枪支都如龟甲“出汗”似的凝结的水珠，山是湿的，树是湿的，茅草棚是湿的，被子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因为雨季，公路塌方，给养送不上，他们自然下不去。以为天的食也日见告罄，烟抽完了，但枯树叶食之不尽，用《红旗》裹着一样咂叭，条件如斯，可兵团战士仍然胸中揣红心，手里攥大斧，砍伐那无尽的栋梁。

原木横七竖八地躺在坡上，谁也不愿想一下，这些木料怎样运下山，似乎这些树木的被伐，“凶手”决非知青。倘若谁敢提这问题，准遭一顿粗俗的恶骂。全麻木了。

“你知道放倒一棵直径60厘米左右的树，要砍多少斧？”我虽然也伐过木，可从来没计算过。

“告诉你，大约要全力挥动800次左右的斧子……那还是普通的树……科学的叫法……对了，该称乔木吧？砍那些特别硬树的就不止这个数喽。”“你们居然会去数这数？”“很无聊是吧？”他脸上带着恍如隔世的神色。

很无聊吗？好象是的，又好象不是。我都搞糊涂了。

当黑夜牵来一抹晨曦并把它涂抹在峻岭之巅时，当十几条睡眼惺松的汉子晃动着疲惫的身形，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时，他们都已等待着太阳升到头顶，等待着太阳落到山那边。在远离家的工地上，汉子们都在等待开饭信号，枪声。

墨客们常用“万山丛中一点红”来描绘他的思绪，而知青的思绪之所系，仅是草棚的颜色，褐黄。它尽管脏，遍地痰迹和烟蒂，没有床，都睡在泛潮的干草上。然而它是我们的家，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总记挂着它。哪怕翻过这座山，就算出国了。

当落日的残辉还挂在树梢时，他们披一身晚霞，嘻笑打骂着回家，人虽未到，心却已在灶前狂吞猛咽了。

命运也许是有的，要不，怎么非在这天粮食完了？他让炊事员去采竹笋，可他们的家却被毁了，烧得真干净，真痛快。人为的麽？或者是那段檀木干的。

十几个挎枪执斧的汉子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湿淋淋的山地上围着焚尽的家，恰似那一根根残留木桩。“鸣枪”，他低沉地说。“哒……”冲锋枪朝天射出的火焰，代表了他们极复杂的心理。四周死寂，与此呼应的唯有那没燃尽的檀木，依然悠闲地缭绕着香烟，酷似大雄宝殿前的信香，仿佛有谁在冥冥之中为这灰烬祝祷。超渡……。

“我们走了，两手空空地什么也没有带的走了，离开了这在我们心中留有脉脉温情的家。唯有这满山的被砍断根部，无法运走的栋梁陪伴着这留在兵团战士心中的家。山还是那些山——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也许不用多久，这些伟岸的栋梁将化为腐朽，上面将长出美味的菌种，出现化腐朽为神奇的景象，或者在这片灰烬上将腾起绚丽灿烂的凤凰。我这样想。我双手合十。”铭同学十分感慨。

“来！为浪费干杯！”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被浪费了？原木？抑或是青春？或者是桌上的残羹剩菜？他一仰脖把半杯的残酒灌进喉咙。

第4章　艰辛岁月思前事

“二劳改”的青春——向往爱情——罂粟油和罐头——疟疾和疥疮

随着知青的大批到来，同样是大批的现役军人进入兵团，担任了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生活和劳动是如此艰难，但知青们的精神却更倍受蹂躏。兵团的各级领导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在提醒着知青们：你们是“二劳改”，要生存，只有“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在兵团，干部就是党，至少是党的代言人。——能够任意地摆弄城里的学生，特别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城里的姑娘抱在怀里，“各地农村的同志”当然欢迎他们去，而且多多益善。

青春，是一个美丽的字眼，在人类的思维定势里，它是短暂的。惟其短暂，所以才愈见耀眼。它总是与“幻想、单纯、虔诚、灿烂”等词连在一起，从而构成辉煌。

看着大街上充满缤纷活力的少男少女们，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面对高楼大厦和流水一般穿行的汽车，如同电影的蒙太奇镜头，眼前豪华的景观大道和健康的少男少女们幻化成当年泥泞的山路和我那些苦难的衣衫褴褛的兵团知青们瘦弱的身影。

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还原到当年，那么对知青们来说，青春是什么？他们美丽的青春是

与血泪相伴共生的。特别是“少数女知青”，她们的青春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噩梦，是心中永远的痛。

上海女知青潘在第一声出工哨子中从睡梦中醒来，她敏捷地换好衣服，直奔胶林。今天是她从后勤班调到橡胶班的第一次割胶。由于经度的差异，这里的阳光要比上海晚几个小时。潘深深地吸了一口黎明的新鲜空气，抬眼看去，一粒粒的头灯像星星似的在胶林的道路上曲曲弯弯。她感到景色美极了。“疑是银河落九天”，潘的头脑里突然出现这样的诗句。渐渐地星光稀疏了，胶工们一个个钻进密密的胶林，四周寂静无声。

她还未满十七周岁。准确地计算，她的“军龄”只有十个月。她实在不像个知青，这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太娇小，娇小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可爱；也不仅仅是因为她长着一副甜嗓子，整天唱呀，蹦呀，唱个没完；蹦个没完；最主要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作为一名知青，特别是一名女知青，这意味着什么？

她的父母是某大学的教授。她是父母惟一的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后，面临着“一片红”，父母希望她最好不要去上山下乡，实在涯不过的话，也到江西或安徽等离上海稍近一点的地方。但她背着亲人报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为是参了军。那时，她只知道参军光荣，穿军装漂亮。而她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成为……

要是以前，作为“臭老九”家庭出身的娇小姐的她，是一定不敢在漆黑的黎明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中的。她由衷地感到自己确实得到了锻炼。昨天听了连长关于要发展新团员的动员后，就连夜写了入团报告，准备在割胶后交到连部。

潘的林段在山坡上，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的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偏鄙的西南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志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洒满红土高原。是的，这里很艰苦，但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青，尤其对女知青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悉悉梭梭”的轻微响声，她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听说附近经常有野猪出没……P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林带有一团光亮向她这里移动。她看出来了，是连长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由于她是新手，因此对连长帮她割胶，潘是十分感激的。

在连长的帮助，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连长邀她在胶林的一块空地上休息一下。他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她坐在他的身边。潘正想找机会想向连长递交入团申请书，于是驱赶了一下蚊子后，坐在连长身边……

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她从未见到过一团火。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可当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时，她顿时吓呆了……

事后，连长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潘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给出身于不好的她的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觉得如果她大声呼救，人们反而将指责她在勾引现役军人……而攻击解放军就是“毁我长城”！

不多久，潘被调离了割胶第一线，担任连部文书，再也不用天不亮就直奔胶林，但却经常被连长叫去谈工作或谈心。她从此沉默了。再后来，在大返城前夕她走“招亲”的路嫁到浙东山区而离开农场……从此，她没有了音讯。许是她故意要割断与云南的一切联系？

我希望她生活的还可以。但真我不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一章。这对于她来说，是过于残酷了。我知道，她们比男知青更怕提起那可怕的往事。

云南兵团的知青们初到边疆时，口味特别挑剔，不吃肥肉，不吃生、腥、膻味的东西。但过不多久，个个就如狼似虎地扑向任何可以进口的食物，而不管它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抑或是地下长的。他们守着肥沃的土地，却没什么可吃的。贫困的物质生活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所需的食品成反比，他们每天就着盐水下饭，食量大得惊人。

曾在4营的安同学告诉我，1972年6月10日他第一次回沪探亲，但本月的42斤定粮在短短的10天已经吃完了。平均每天吃4.2斤，怎么吃得下？怎么吃下去的？现在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当月不回沪探亲，真不知余下的日子怎么过？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什么可以果腹的东西都不能从他们嘴边溜走。又比如第7团第2营某部的知青为吃一顿粥而到十几公里的山下去背米，哪怕因此而消耗几顿干饭所转换的能量也再所不惜。在这里，吃，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而成为一种目的。为咀嚼而咀嚼！

当时的上海500克猪肋条肉价格是0.6元，但在孟定500克猪肉均价是2.4元，而且越肥越贵。知青们每月有26元的工资。他们的钱是怎么化的？安同学数着指头说：“买饭票大约8元；抽烟喝茶大约7元；每月要用半斤点灯的煤油；买自己开小灶的油盐酱醋等；还有电池等诸如此类的开销；招待来串门的知青或自我改善生活大约在8元左右，可能的话，每月大约可存银行也就是1、2元。女同学或许要多存一些。”“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可如果当生存出现危机时，那么任何限制和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则就都显得十分苍白和无力。

此时的知青正是生长发育之际，但毫无营养补充，饥饿之下，便或去掏老职工的鸡窝，或偷着宰杀连里的牲畜。这种偷杀牲畜的方法是很巧妙、很残忍、很不“畜”道的：比如想杀牛，就拼命地把牛打的飞跑，尽量朝排引水的明渠方向赶，等牛跑到沟边刹不住脚，就会跳，而那牛是必然跳不过去的，于是牛腿就摔断了，于是就回去报告连部：“连长，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牛腿摔断了……”于是可以正大光明地宰杀那条可怜的牛……（也许连长也很想吃肉？）

偷窃的现象层出不穷，对象也从老农工、公家财产，发展到少数民族的村寨、地方上的供销社、气象站……实

在没有油水，就冒险越过边境到缅甸去走私清亮并且香味四溢的罂粟油，或走私一些境外的日用品如手表、尼龙伞、尼龙高领内衣等到内地去贩卖，换得钱后买吃的。

“过境实在是很方便，翻过一座山后，越过一条小溪就算进入缅甸了，如果踩着小溪上的石头，甚至连鞋也不必湿。”坚同学如是说。

一条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小溪就是界河。根本没有想象中高大的界碑、威武的哨兵和庄严的国旗。现在大家都知道缅甸的翡翠、玉石是很有名的，当时的知青们可没有想到在境外买些诸如之类的饰品回来，原因无非是这些珠宝是很‘资产阶级’，知青们只知道如何找吃的。”安同学就曾为别人夹带过“双狮”手表，后被从上海追踪来云南的办案人员在团部拘押7天。

地处北纬23o附近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驻地的孟定有一条河，取名“南定”。南定河平时夹着泥沙缓缓西去，十分温顺。远远望去，就象一条土黄色的毛毯蜿蜒地铺在绿色的坝子里。旱季时一些河段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倘若是雨季，那么其水深、其流速、其狂暴是人见人怕的。

丙辰年6月20日（公元1976年7月16日），是雨季里的一天。农场为纪念领袖畅游长江10周年而组织知青在南定河武装泅渡，距离是10000米，犒劳品为一只猪肉罐头，知青们为这只罐头而雀跃报名。

为那次泅渡，场部特意在水流相对平缓的河段组织了2天的训练，知青们很是努力，生怕被淘汰而与猪肉罐头失之交臂。因此方阵基本保持不散，排演结果大致使垦区首长满意。

正式下水的那天，场部后面的河滩上红旗猎猎，头顶大雨如注，雨随风势，象鞭子似的抽打在身上，感觉凉凉的。湿衣服贴在身上，在风雨中不时会打个哆嗦。既然是武装泅渡，站在方队里的知青个个都背着包在油布里的3截碗口粗的竹筒（既是救生工具，又象征背包），面对咆哮的急流，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对急流的疑惧以及在此背后隐藏着对猪肉罐头渴望的表情。

知青们站在风雨中听坐在简易挡雨棚里各级领导、知青代表的动员或发言，颇为庄严肃穆，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势。

“其实，真是很危险的，你沿南定河走过吗？噢……特别是雨季里的南定河。南定河多弯道，湍急的河水把弯道处的河岸冲塌，岸上的不少大树都倒在水里，万一急流把人冲向某根被折断的树杈，那结果必定是惨不忍睹的。”30年后的今天，诚同学说道：“因此下水不多久，方阵就被冲散了。背着3截竹筒，淹死自然是不会的，但被冲走的危险是存在的——自然冲到缅甸是不大可能的。”诚同学还是那么幽默。

“别人怎么上岸，我不知道，我是默诵着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挣

扎上岸的……居然为一只罐头从而把可能被湍急的河水冲走的危险抛至脑后……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不是叫……什么来着？……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行动，对吗？”他苦笑着边摇头边向我发问。

啊，南定河，一条充满着伤痛血泪的河。我似乎听到他和我心里的叹息。

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曾在云南当过知青的人，到气候炎热潮湿的云南后，过的第一关是什么？知青经历在他们肉体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水土不服。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一定会撩起裤脚，让你看看他们腿上的大面积因水土不服而曾深烂及骨、触目惊心的深深的疤痕——而这些疤痕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艰辛。这是云南留给知青们的唯一永远刻在肉体上的纪念。

在炎热的夏天，当你看见眼前正在走过的姑娘的裙摆下那两条美腿时，你一定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都市的炎热中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的确，哪个姑娘不爱美？有哪个姑娘不愿意人们欣赏和赞美她们健美圆润的小腿？而裙子则是她们展示这种美的最好载体。可在刚回城的那几年，为了遮盖这些因热带雨林炎热潮湿所引起的水土不服产生的烂腿的疤痕，女知青们都不敢穿裙子。对了，女知青虹为了遮盖芦苇荡给她留下的“纪念”，至今不穿裙子。

云南，历来就有着瘴疠蛮荒之地一说。是热带病的高发病区。比如疟疾、麻风、疥疮等。《辞海》记录：瘴者，今西南一带俗称疟疾为瘴气。而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可见“瘴气”并非气体，而是由无数细小毒蚊组成的灰黑雾阵。瘴烟起处，远远看去如烟如霭，常麇集于水洼潮湿之地，遇有人畜惊动，便群起而攻之。

疠者，即麻风。而疥疮则更多发于炎热潮湿地区。相对以上3种疾病，知青对麻风病不怎么害怕，因为他们被告知，国家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治疗政策，传染的途径是体液和直接接触。何况麻风杆菌是厌氧菌，在空气中只能存活极短时间。在非麻风病区的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被传染的。因此疟疾和疥疮是知青们已知的十分害怕的2种疾病。

疟疾是一种致命的急恶性传染性疾病，传染的媒介是无所不在的蚊子。因此传染速度非常快，发作时的症状十分凶猛可怕。疥疮虽不至于致命，一旦染上，便使人食不知味、寝不安席。它与中越边境冲突中我军指战员患的”烂裆”症状是一样的，是极大地影响战斗力的。

烂裆这词不如烂脚丫来得具体，烂裆太笼统和含蓄，就象把烂脚丫说成烂下肢，烂运动系统。虽说用词文雅了，但在表义上却显得不太达意和直接。这么说吧，烂裆，是弥漫在阴部的溃烂，痛痒交替，要多受罪有多受罪。无论坐、卧、走，都要叉开双腿，仿佛一架合不拢的圆规。

这2种病在医疗稍微发达一点的地区已经基本消灭或得到有效控制或者根本就不会有发生的条件。但在缺医少药的热带边境地区，非但无法预防，一旦染上，其治疗之难是现今人们无法想象的。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是滇西南有名的“高疟区”，而孟定则更有“若到孟定坝，先把老婆嫁”的传统说法。据有关权威资料记载：“恶性疟疾是一种让人谈之色变的的顽症，在世界上的死亡率一直保持在30%——40%以上。”乙卯年至丙辰年（公元1975—1976年）国营孟定农场相继大规模流行这2种疾病。特别是疟疾。一时间，从场部医院到分场卫生所，所有的病房——连为临时收治病人的简易棚也全部爆满，就是在当时也是普通得不要再普通的药——“奎宁”在那时的国营孟定农场却是供不应求。

由于没有药，所以这种住院不是治疗，而是靠退热药和输液尽量维持病人生命，等待药的到来，有的病人熬不住了，走了。最后退热药和输液都用完了，只有熬大锅药来维持。“疟原虫”这个专用词也第一次进入知青们的记忆库。在那段时间，连知青们相互之间打招呼也是：“身上没‘虫’吧？”“想想真可怜，我们团种植的热带作物中有金鸡纳树，居然没想到是否可用金鸡纳树皮来熬药……不过……也许我们喝的大锅药就是？”安同学沉吟着。也许是的，要不可能死的人更多。

由于雨季，公路塌方，药也运不进来。因此整个农场人心遑遑，流言四起。一会儿传“地方上××村寨是死亡寨，政府一点也不知道，直到当地公社下去检查秋收，看见稻谷无人收割，才知道整个寨子的人已经全部死亡。”一会儿传“解放军已经封锁了整个地区，任何人员只进不出”，一会儿传“×营×连的××死于‘奎宁’到达前的一、二天……团部医院后面又添了几座死于疟疾的新坟……”等等。

安同学又递给我一支“牡丹“继续说：“疟疾真是可怕，当初那些流言谁也没有去证实，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有点可信度的。因为我也得了疟疾，确实没有药，医院也住不进，只能在宿舍里挺着。浑身发起寒来，连骨头里面都会酸疼，加几床被子都没用，发起高烧的时候，浑身的汗啊，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烧得嘴唇起泡、满口胡话，昏昏沉沉的。好象灵魂出了窍，浮游在半空中看着床上躺着的另一个自己……真可怕……除了同连队的坚同学在出工前后来探视外，平时连个端水的人也没有，烧得口渴，只有喝生井水……庆幸的是，我熬到了有药的时候。痊愈后一称体重，你猜几斤？只有30多公斤，大概就是一副骨架的重量吧……知道吗？当时我最想什么？”“什么？”“不是想病早点好，而是想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她可以来照顾我。”他的话语经常停顿，似乎在极力地回忆。真是奇怪，病到那种程度，求生的欲望仍是这样强。生命力居然如此旺盛，这种时候还在想有个女朋友！居然幻想着在女朋友面前“发嗲”！是的，其实我当时也是这么在心里默默地想的。

疥疮上海人俗称“癞疥疮”，发作时无论男女都不分场合地把手伸到裆部去抓那种深入骨髓的奇痒（女生大约要稍微文明一些？），哪怕把阴部的皮肤抓破而再感染其他皮肤病。

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癞疥疮”，仅仅听大人说起过，感觉上是很龌龊、下流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那种皮肤病。由于它的临床症状呈针头大小的丘疹和水疱，所以在不知道是什么病时，四川知青又戏称它为“国民党籽籽”，因为在过去的宣传中，只有国民党兵才生这种下三滥、见不得人的“癞疥疮”。它虽不会致命，但也使人望

而生畏。

关于疥疮，《辞海》的记录是这样的：“疥疮，传染性皮肤病，多见于手指间、手腕、肘部、腋窝、腹股沟等皱褶部位，呈针头大小的丘疹和水疱，甚痒。”当时，知青们都以为这仅仅是普通的湿症，自然药不对症。虽然人们对如此大范围的人得“湿症”也略有担心，可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概因其不致命。其实此病并不难治，但由于不知道病名，可能农场各级医疗机构仅通过速成《红医班》培训的医生也没见过这种皮肤病，因此没药。我想，大约由于并不致命，也就不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毕竟“革命”是第一位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何况区区并不致命的皮肤病？……

此病最后的治愈，全赖于某个成都知青探亲回来，带回了”疥疮”这个皮肤病的学名和治疗这种病的硫磺软膏。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疥疮”这个词。由此启发了全体知青：雷管、炸药、子弹里的火药、甚至火柴里不都有硫磺成分吗？而雷管、炸药等在当初的农场里是俯仰皆是。至少我是听说这个消息后用炸药和着罂粟油涂抹患处，于是病愈。

突然想到：如果现在孟定又流行疟疾或者其他什么恶性疾病，如果药也用完了，如果因雨季公路塌方，如果药不能及时送到，如果……，无论怎样的“如果……”政府一定会动用直升飞机运送医疗队、药物和病人！而且决不会再有什么与国与民都有害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了走进新时代。

第5章　梦断云岭家乡远

情感和理智——扎根与反扎根——久别重逢——历史揭示的真理

上山下乡开始的一、二年，知青初来乍到，以为一两年就可以离开农村。对一切都很新奇，（他们哪里知道在安排他们命运时，那个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的内部规定，已经内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在这里是一辈子的）但随着艰苦劳动的开始，理想的幻灭，加上清苦的物质生活，知青心中充满了彷徨，苦闷与痛苦。

劳累和贫困也许还可以忍受，政治上的排挤与打击，却令人抬不起头来。不少知青的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污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人常常被置于令人难堪，自尊全无的境地，其心灵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知青们没有反抗，因为”不关我的事。”第7团某连建在大山里，交通十分不便。知青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与其他连队相比要艰苦的多。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高强度的劳动，使男女知青在生活和劳动的相濡以沫中产生了感情。呜呼，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贪婪”扑向异性新鲜的肉体。

上海知青蓝和他的恋人就是这样热烈地品尝着爱情的“禁果”，不幸的是女知青意外地怀孕了，但他们不能结婚，结婚意味着取消探亲假。而回上海探亲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上海已不是作为”故乡”那个抽象的符号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的寄托和每二年就可以去取食物的大后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的结婚不是对人生的赞美，而是对生活的惩罚。无论知青与知青还是知青与农民结婚，结了婚就等於物质和精神上受了审判：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再变成单身。

所以，为了免于被取消二年一次的探亲假，他们决心把孩子打掉。女知青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带子勒腹部、拼命干重活、故意摔跤，以至到处找药吃，但那孩子仿佛铁了心似的牢牢地占据着年轻母亲的子宫……最后那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可却成了白痴，并且终身站不起来了……

男知青蓝被作为流氓而五花大绑地押送到团部，每天带着脚镣进行强制劳动。他是“流氓”吗？大家都知道：不是！但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因为“不关我的事。”只有他的那个孕妇恋人每逢星期天挺着大肚子翻山越岭地从大山里赶几十公里路往团部，为蓝送一些吃的和替换衣服。

单就环境而言，在团部劳动，无论其强度和吃住条件肯定比蓝在大山里要好得多。可见“专政”的威慑在于心理的窒梏和精神的压迫。这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旅美作家陈若曦的一篇名为《纸铐》的小说。

在这种社会价值的主导下，对生命的尊严的忽视潜移默化为一种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只要灾难不降落在我的头上，对灾难的反应就异常麻木和迟钝。然而，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集体冷漠，它会摧毁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以为灾难于己无关，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一个漠视者的头上。

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很容易想起写在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的那首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悔恨之诗：

起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可不？面对对生命价值的摧毁行为，如果我们不吭声，以为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一旦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还会有谁来为我们主持公平呢？

现在仍是漂亮雍容的上海女知青琪，直到现在仍对一些知青的恋爱投去轻视的目光，认为他们眼光短浅，意志薄弱。

“不要太吓人哦……我从来就没想过在农场一辈子……不要太吓人哦……”她有过许多追求者，但她严格地把

握住男女交往的分寸。

“是的，当时有不少人追求你，你就没有动心或者中意的？”在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她。“我有过中意的……虽然他不是上海人……其实，一个女生独自生活是很艰难的……是很想有个男生帮助的。”她显然陷入回忆之中。

“但我和他都坚持不越雷池，把彼此的好感牢牢地锁在心里，而不任其发展……不要太吓人哦……找一个人随便结婚，住在看得见天，四面漏风的破草棚里……盐水下饭……随便生几个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不要太吓人哦……”她的表情带着点夸张和自诩。

“那么，当初你就知道自己能回上海？”某同学善意地揶揄她。

“如果我能未卜先知，那我一定恋爱了……互相照应总是不错的……反正总能回上海的。”她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嘲讽。

“我只有努力地表现自己，走曲线迂回的道路，也许有一天我能离开基层连队……毛泽东不是说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万一有一天能搞到一个病退证明，营部或团部也许会看在我的要求上进的表现上，放我走……可一旦恋爱，因感情问题而走不了，或者走了也牵肠挂肚的……又何必呢？”她很认真地继续说着。

为了万一能走，而且走得省心，“不许谈恋爱！”几乎是全部的家长都这样叮嘱或告戒自己当知青的孩子的。也确实因返城而出现过诸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劳燕分飞的结局，可当初的知青呢？却是那么地想恋爱而又惧怕恋爱。究其根源，无非是害怕由城里人成了乡下人。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知青心。”在情感需要和理智现实面前，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遗憾和克制被迫接受后者，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若非亲临亲为，这种选择带来的苦痛，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倘若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更被事实所证明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是错的，为这种选择付出的代价将是“一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女知青琪的想法是许多知青共同的做法——哪怕的确是错过了好因缘。

话虽如此，但还是有个别知青出于政治上的幼稚？生活上或者一些其他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终于扎根了。他们如今生活的怎样？

2001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成都来的电话：为了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成都知青发起一次重返云南的活动。400多原知青回到了孟定农场，受到了农场热情洋溢的欢迎并举行宴会。

农场郑重地发出通知，要求“各分场和连队保证接待好这些知青。”文件中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此次知青回场人数多，在吃、住、行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各单位要克服各种困难，精心组织，热情接待。圆好知青回家梦。”字里行间透出农场在目前经济上的并不富裕的困难和浓烈的拳拳亲情以及当地人民的纯朴。

各分场挂出“热烈欢迎归来的边疆儿女”的横幅，晚上睡觉，派出所的民警为他们通宵值勤。2天的活动安排的十分饱满，显得热烈而尽可能隆重。但当那些身着式样陈旧服装的扎根知青和服饰光鲜的他们互相面对面时，久别重逢的伙伴是经受着怎样巨大冲击和百感交集？

第7团第3营某连上海女知青蕾，是一个扎根知青。她没有跟随大家一起返城而嫁给了老农工的后代。这30年她是怎样过来的是可以想见而不用一一道来，但更是一言难尽的。

蕾皮肤黝黑，额头刻着深深的皱纹，关节粗大的手掌不时驱赶着蚊子。与昔日的同伴相比，她更本谈不上保养，因此看上去要比她的那些城里的同龄人至少老上20岁。全然没有了一个曾是大上海子民的成熟妇女的风韵而恹恹然似一个边地老妇矣。她操着流利的滇西方言，向昔日的同伴诉说着别后的境遇。简单地说，蕾的丈夫上山劳动死于毒蛇咬伤，儿子参与中缅边境的贩毒而被判入狱。

我耳边似乎也响起了蕾的一声叹息：“当年我也回上海就好了。”的确，如果她当年与我们一起返城，也许遭遇不至于如此无依无靠的孑然一身？我想应该是的。毕竟在大城市里各种规章和法制要健全的多，似乎死于毒蛇咬伤和犯罪的概率毕竟要小得多。

不知道上海是不是还可以接纳她？其实按政策，现在的她仍是可以回上海的——但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蕾决定要老死云南。

因为有许多障碍阻挡了她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使我们稍有宽慰的是她已经住上了瓦房——虽然很破旧，也有一些家用电器——虽然在我们眼里这些电器已经是淘汰的了。”这是电话那头说的关于成都知青返滇内容的最后一句话。

甲寅年（公元1974年），兵团改制为农场，就像当年农场改制为兵团一样。随着现役军人的撤离，农场——兵团——农场，乱哄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场面在本来就不安心兵团的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

知青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兵团来的，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在云南农垦10年，“建设兵团”只存在了4年，但知青们仍然下意识地拒绝“国营农场”或“农场知青”这些词，直到现在，当年的知青们依然习惯于用“兵团”这个称呼，自称为“兵团知青”，就是现在，一般在相互间的交流或介绍上还是沿用兵团时期师、团、营、连的番号。如“×师×团×营×连”，而很少称“×农垦分局×农场×分场×队”。似乎“建设兵团”的“档子”要比“国营农场”高似的，这真是个奇怪的心理现象。）

“现在不算兵团了，”我们知青怎么办？”可农场认为，如果放任这种思想骚动、蔓延，整个农场势必陷于瘫痪。由此，农场中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空前地展开，各分场纷纷开展“表态”活动。

表态，是非此即彼的宣言，有时是一种虚伪的矫情和谋生的手段，它只说明你表面上的立场和以此产生的影响，与你的真实思想无关。哪怕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本质上的需求，或者你根本就是违心的。因为面对太多的不确定，你有许多既得利益要维护。

知青们分成两派。“扎根派”知青在各种大小会议上认真地宣誓，虔诚地的表态，也许他们是真心的。也许他们更明白，这不是真正的他们，而是给别人看的他们。然而这是形势的需要。但反“扎根”们则对此嗤之以鼻，始终认为，他们不属于农村，所以有理由反对“兵团”地方化，因此以沉默来抵制扎根。他们是诚实的先知先觉者。而且双方都能背诵并深刻理解老人家的语录：“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世界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决不要轻易放弃，哪怕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

随着兵团改制为农场，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亦更名为孟定农场第6分场。但因改制而引起的骚动却不象改制本身那样简单。由于该分场是新建单位，生活条件差，财产底子薄，劳动强度大，而且人员（包括指挥机关）全由全团各单位抽调组合，因此凝聚力、向心力就显得格外不足。星期天，如果谁要到6分场去玩，除非你事先预约，否则准扑空，人都回原来连队去了。在大家的思想里，6分场的连队并不是自己的家。所以人心的骚动与其他分场相比，第6分场各连显得特别动荡。因此在6分场，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尤为激烈。

其实扎根是绝望知青的无力自拔的虚妄的精神宣誓。谁都明白，越扎根就越没希望，越没希望就越扎根。因为他们本质上还不够出类拔萃，既没指望回城，那么只能寄希望在农场混得好一点。可一旦有望回城，他们的转向决不比谁慢，这些人是典型的“红皮白心”，而这类人通常以知青干部居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苦衷——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

上海知青良，银行职员子女，原水稻连农工。他身体非但不是强壮的，而且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按理，他是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可偏偏被分在水稻连当了一名农工。他勤勤恳恳地劳动，决不以身体不好为由而要求减轻劳动，尽管他确实需要照顾，甚至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他为人低调、谦虚谨慎而不张扬，也从不在领导或别人面前打任何人的小报告或说他人的不是。相反当别人在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提供恰当的帮助，自然这种帮助必须是有分寸的。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他是既不敢做，也不能做，更不肖做。因为“干好自己的事”是他为人的准则。因此在农场都是初出茅庐不谙人事的知青中，他的老练和沉着就显得格外突出（现在想想，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很佩服良知青当年就有的稳重和沉着）。知青良，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孟定农场第6分场的副场长。

知青良，虽位居第6分场副场长，想必他也不会安心农场，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身体是不适宜在农场“坚持到底”的，但他更知道，“上山下乡”是国策，“国策”是不会因为知青们的不安心而改变的，而且他身为副场长的身份，更不容许他有依附普通知青的言论，因此，每当知青们在他面前流露出不安心农场的思想时，他就抱着听天

由命的心态，总是找借口离开或者作某种“你们的牢骚是徒劳的”之类的暗示。可贵的是，在各种场合他总是尽量避免作扎根表态——除非不得已时也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知青良，他比一般知青要来得更为成熟和稳重。

良副场长最终积劳成疾，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旧病终于急性发作，由团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单，才不得不丢下他苦难的知青战友而以真正的病退回到家乡。

“……那时侯的农场实在太苦了……再会了……有空我们再聊……”这是他在30年后的一次聚会将要结束而临告别时，握着我的手淡淡地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貌似淡淡的一句话使我隐约看到良副场长当年的埋在心底的苦衷。

对不起！良副场长——为在扎根与反扎根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误会过你。

由于他的能力加上成熟和稳健，知青良，现任某银行行长。

女知青虹副连长，在营、连各级组织的各种扎根会议上，她总是以先进知青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她忠于理想，真诚地大声疾呼“横下一条心，扎根一辈子！”在戊午年（公元1978年）开始的知青们罢工期间，她顶住了种种风言风语的打击，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只是显有些得形只影单……

大返城开始了，应该说，看着昔日的同学一个个的离开，想来虹副连长的心理也是彷徨和落寞的，幸亏此时农场的态度从尽量不放行知青到动员知青离开，来了180o的转变——因为“知青是‘飞鸽牌’，总是要走的，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永久牌’！”——所以她还是得以踏上了归程。

后来她所在的某服装厂与外商合资，女知青虹，现任该合资企业人事部经理。

这里想起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但历史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当你理解了、成熟了并懂得反思时，你已经不再拥有曾经有过的某种身份。

第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红”与“黑”的较量——死亡与“升官”——魂兮归来——“画圈”

当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囤垦戍边、扛枪卫国的光荣和浪漫的憧憬击个粉碎后，任何可以离开兵团农场

的手段知青们都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生活的艰难，每天都有大量的知青流回城市，使国家铁路的有限的运能都放在运人上。

比如，上海到昆明的客运列车本来是隔天发一趟，后来不得不每天发一趟，而且不少知青因“囊中羞涩”以至坐车不买票。同时他们返城后并不及时返回而滞留，又给各自的家庭和城市社会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更有甚者，相当多的“少数女知青”被相当多的“一小撮”上司蹂躏，为了返城或生存，她们都抛下城市女孩的矜持，“心甘情愿”地伺候这些“土皇帝”，或嫁夫生育，或甘当“玩物”。凡此种种，都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癸丑年（公元1973年），福建蒲田的一个小学教师李庆霖给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种种困难。领袖阅后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寄给他，并回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由于知青境况越来越糟，于是，各种走后门的投亲靠友、“困退”、“病退”、“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五花八门的返城运动悄然兴起。

因此知青们“创造性”地挖空心思寻找离开农场的途径。如为考取大学而不惜自残肢体以换取休息而得以有时间来补习文化，又如，大量地服用“麻黄素”以引起心动过速而指望能“病退”，再如嫁、娶内地的男或女，以期离家乡近一些……

这些手段大致可用“红”与“黑”来概括。所谓“红”，就是通过自身拼命地“改造”来获得提干、参军、病退、被推荐上大学等机会，这通常是平民子弟的做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女知青虹等；所谓“黑”，就是通过后门来实现上述目的。比如第7团某部8连的昆明女知青萍，就是先在昆明打通某些关节，带回了权威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然后自己再在连队装癫痫病，仅“发病”一次就办成了“病退”。

但是，能离开农场的能有几人？大多数家庭是没有门路的，于是大多数知青只有在苦闷中度日，有些知青，为了返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实，“红”与“黑”的道路也非彼此对立的，在许多时候“红”与“黑”是以互相转化、结合的方式出现的。这通常是“知青贵族”的手段。

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名知青被分配在第2师第7团第4营。时至今日，每当同学们有机会相聚时，会谈起两位男女同学，当年他（她）们乘同一列火车，分在同一个连队。而他（她）们的命运也都是在同一年——癸丑年（公元1973年）时人生的轨迹发生相反的突变。

丁，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不能被遗忘的沉重而又黑色的名字中的一个。他风华正茂的生命在癸丑年（公元1973年）嘎然而止，把年轻身体永远留在了他决不愿意留的地方。而留下他肉体的原因恰恰是不想留下的灵魂，

这实在是一出黑色的悲剧。

丁，生于已未年（公元1954年），家住上海山阴路，是原上海市长风中学红卫兵团团部成员。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据他说，味精是他外公在日本发明的，所以味精的原名叫“味の素”。

他，1.77米的个子，背微逅，长着一张在人前总浮着微笑的十分生动的圆脸，圆圆脸的上有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和一双圆圆的耳朵，给人的影响是友好温顺、具有较强的“外交”活动能力的。有人说，他的死亡是由于他向某个美丽的女生求爱不成，而决意走“红”与“黑”相结合的路，籍此离开“伤心地”。他希冀凭借自己的活动能力和自身的“改造”，渴望成为一个“准知青贵族”，来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如果丁“甘心”扎根，那后来的悲惨就不会发生了。

癸丑年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他和平常一样，外出展开他的“外交”活动。这次的地点是营部机务排。当他得知有台机车在外抛锚时，便主动放弃休息把一根钢丝绳扔进驾驶室后，便陪一位驾驶员驾着履带式拖拉机去把故障车拖回来。

“东方红75”在宁静宽敞的橡胶园里全速地奔驰着，显得十分惬意和意气风发。机车的巨大的轰鸣和履带飞速地抖动声打破了橡胶园的静谧，连互相之间的对话也要大声喊叫。这时，丁发现由于震动，驾驶室里的那根钢丝绳已大部份被颠出去，快要缠在飞速滚动的履带上了，于是他就想用脚去把它钩上来，哪想到，就是那根他随手扔进驾驶室钢丝绳一下子把他的脚套住，并把他活活地拽出驾驶室而绑在履带上，跟随着飞速滚动的履带一轮轮地向前……钢铁的履带残酷地每转动一轮就在他身上碾一次，一轮……二轮……

当驾驶员发现丁的惨剧时，立刻慌了神，竟然忘了煞车，也想去用脚钩死套在丁脚上的钢丝绳扣，指望把它解下来，于是他也被卷入履带……无人驾驶的“东方红75”机车就这样拽着两个年青的生命一直到撞倒橡胶树后才因水箱撞破而停下。这时的丁整个人已被钢铁履带撕成残肢碎体，惨不忍睹，气息全无……殷红的鲜血在履带的压痕上汩汩地聚成小血洼……

最终在铭同学等的护送下，丁被安葬在团部医院后面的山坡上。面对一座新坟，“丁……你一定很疼……”前去送别丁的同学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知道是伤痛还是愤满？是为丁还是为自己？

“我下意识的向四周环望，太阳快落山了……”时至今日，铭同学说起那时的情景，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哀伤和缄默。是的，君不见血染夕阳红么？

丁的时间在此时此地终止，瞬间化为永恒。终年19岁！

啊，19岁！一个多么辉煌的年龄。如果说一个91岁的人的逝去，是“喜丧”，带走的仅仅是夕阳；那么一

个19岁生命的早逝，是夭折，带走的却是朝霞！

团部按”因公死亡”的有关政策，每月把他工资26元的40%按时寄回上海。至今应该没有中断。

使我们不解的是，他们竟不知道在飞驰的机车上这样做是操作规程所不允许的吗？

“谁知道，我当时吓坏了，脑子了一片空白，自己怎么被卷下去都记不得了，连疼痛和害怕都记不得了，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吧？”那个将终其一生与双拐为伴的驾驶员仰天叹息着。他比丁稍幸运，仅一条腿被碾断，造成重大残废。最终他以病退回到上海。

此次事故在第7团，特别是在原上海市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中引起极大震动。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每谈起云南，仍要想起丁。而那位婉拒丁示爱的美丽的女生直到现在仍把丁的死因归结于自己，有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心结，浓重阴影始终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当她遇到什么坎坷时，就委屈地说：“因为丁，是老天在惩罚我……虽然我根本不爱他，何况我已经有对象了……这不能怪我……”她的双眸里时有一丝抑郁和阴翳闪过，使人为之叹息。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首往事，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丁的死亡实在是整个知青命运的缩写，是因历史的倒退所造成的。面对死者和生者，我们不禁要问：丁希望通过走”红”与”黑”相结合的道路而离开基层连队，最终达到离开兵团的目的，是因为那位女生拒绝他的示爱而萌发并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吗？不！他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能力成功地离开基层连队。他一定在想：“为什么有人能籍此离开基层连队，而我就不能？我也要奋斗。”毛泽东曾经教导我们：“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便那位美丽的女生接受了丁的求爱，丁就会”甘心”在兵团扎根吗？答案是显然也是否定的，他（她）们一定会通过“红”与“黑”的道路去寻找回城之路的。因此那位美丽的女生是无须有着歉疚和自责的心理的。愿她早日卸下背了近30年的重负。而那种把丁的死因归咎于他的“失恋”，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既是对丁的污辱，更是对那位女生的伤害。

毛泽东在论述“生”与“死”的价值时，语重心长地说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那么丁的死有意义吗？有吗？我问自己，问全体同学，问全体知青。

哦，归去来兮。我那友善温顺永远19岁的同学丁，愿他灵升天国，魂归故里。

芬，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有着传奇色彩的响亮名字中的一个，她成功地通过”红”路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从而脱离基层连队进入团部机关。她与许多知青干部一样，在动荡的岁月里无数次地表示要扎根，而且宣誓决不动摇。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发誓扎根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竟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这也实在是一出具有黑色幽默的喜剧。

芬，家住上海四川北路，是工人的女儿。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很本分的女同学，她长得极普通，是那种看过一眼

后转过身就会忘记的女生。好象也没听说过她有什么惊人的表现和突出的能力。

癸丑年的有一天，某个同学自豪地告诉我，我们长风中学的“铁姑娘”芬从基层连队直接调团部任副政委，兼团党委副书记，我大吃一惊，也不知她付出了什么巨大代价。旋即跟着骄傲起来，毕竟是我们长风中学出来的，是整个第7团上海知青中职务最高的。

虽然我从未与芬讲过一句话，更无半点交情，但我对她印象不坏。因为从没见过她在大小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我听到的只是关于她的美谈，比如，有同学告诉我，芬虽身居县团级的高位，但从不以官位压人，仍然平易近人，也不怎么搞特权，依然保持着作为工人的女儿所与生俱来的本阶级的朴实无华。

在庚申年（公元1980年）前后的大返城的浪潮中，知青干部们的处境实在很尴尬，在广大知青眼里，芬们已不能算”自己人”了，但在农场干部眼里，她仍是“他们知青”。因此在知青们闹得最厉害时，她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所以聪明地回上海探亲，从而远离使她难于表态的尴尬局面。

直到大返城开始后，她刚返回农场就被推到处理知青返城工作的“第一线”。（“花瓶”副政委终于起独立作用了）在许多农场干部惟恐过去过分地压迫知青而遭痛打时，芬却安然无恙（这种“以夷制夷”的方法，果然是个高招）。这实在与她平时为人有关。突然想起：团党委看中芬作为兵团门面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她这个特点。要不，有能力的“铁姑娘”有的是，为什么选中她？

我不知道芬看到一批批的昔日同学纷纷回城了，她心里的波澜是不是壮阔的。但我确切地知道，农场领导把放行知青的大印交给了芬，让她负责给知青盖章，一拨一拨的回城知青像一波一波巨浪似的团团围住她、冲击着她的办公室，连吃饭睡觉甚至上厕所的时间也不给她，以至芬大哭起来，毫无县团级干部应有的处乱不惊的风度。这就是我们的副政委，团党委副书记。褪去头上耀眼的光环，她本质上还是一个朴实无华知青女孩。

也许人们会问：“红”与“黑”的“较量”就是这样极端的吗？当然不是！这仅仅是个别的现象。但象征意义却是十分典型，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们对前途的思考和追求。在“红”与“黑”构成的十字架前，我不由得困惑起来：怎么评价这种“较量”呢？

多年来固定模式的教育，使人们在思维定势上总是把事物分成三种形态：在政治上分左、中、右；在观念上分新、旧、半新不旧；在处事上分上、中、下三策；在判断上，分好、坏、不好不坏……可为什么一定要习惯于机械地、黑白分明地那种绝对价值方式去判断呢？其实，充实与空虚，幸福与痛苦，高尚与卑劣，勇敢与怯懦，诚信与阴谋，不就是一种观念的差异吗？先人们说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从这个角度说，丁与芬殊途同归了。哲人们说了：幸福——就是对理想的期待！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追求！

啊，副政委同志，如果让你重来一次，你还是选择这样的路么？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局部微调的。

自然，历史是不能重来一次的，但前后左右地反思一下肯定是有益的。

我回城不久，芬也终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上海，顶替进了卷烟厂，由于她是县团级的副政委和党委副书记，因此成了当然的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又后来听说她由于能力不太强和大致归入”火箭式”干部等原因，职位逐级下降，最后成了车间里的普通工人。她的经历像画了一个圆，完成了从哪来到哪去的过程。知青时期的荣耀和既得利益在一夜之间全部褪色，她与普通人一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可能面临着生存竞争。

哦，别来无恙。我那朴实无华的女副政委同学芬，愿她全家健康，孩子出色。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庚戌三十年祭（下篇）

第7章　青春做伴好还乡

“知青工作会议”——火山爆发——返城与战争有关？——赵凡的无奈和痛苦

七十年末对知青来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巨大的混乱悄悄地降临他们头上。

乙卯年（公元1975年）北越在美军撤出越南的第55天后就推翻了南越傀儡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可是，在战后越南，其领导人却醉心于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自导自演地给自己戴上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高帽子。

越南以为自己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充足，还自认为自己经过战火考验的兵员战斗素质也是第一流的，而且刚同美国交手完毕，实际的自我感觉达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这时的越南，本应利用战后和平与良好的国际及周边环境，利用可以大大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外援，大力发展经济，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长治久安。但由于1978年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歉收，使战后的越南经济萧条，负担加重。为此，一个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居然就试图拣起早在19世纪末，作为曾经是敌国，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法国为了控制东方而设计的以越南为中心的”印支联邦”的设想，加紧对印支的其他两国实行奴役。它们一方面向柬埔寨扩大生存空间和移民，一方面蛮横地掠夺大米和其他资源并大肆掠夺和没收华侨的财产，用武力驱赶华侨以解国内的危机。

越南终于在己未年（公元1979年）初攻占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这种大规模入侵邻国的军事活动的本质及其后果在后来的1989年2月，已被白发苍苍的西哈努克亲王发表的声明所证实，亲王提请国际社会注意：10年来已有100万越南移民在柬埔寨定居；冒充高棉士兵的越南军人已被安插进柬埔寨军队；洪森——韩桑林政权的各个部门、行政机关及其内外政策均受越南的严格控制与指挥。

越南，穷兵黩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因中国不支持其“印支联邦”设想，也对中国进行军事骚扰。越

南当局反华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肆驱赶华侨和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进行蚕食，制造边境冲突。自戊午年（公元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后，越南不断在中越边境沿云南到广西一线不断制造挑衅和流血事件。战争一触即发。

戊午年（公元197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到了深入人心的第10周年，这一年的10月，国人瞩目的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又一次召开了，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国内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而知青是个很敏感、牵涉到全国千家万户，可以说是事关全国是否安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此次会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全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今后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将遵从：“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老知青的去向问题。而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不仅是为了重过城市的好日子，也是为了讨回他们的社会正义。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的知青集中点之一。那里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不幸的是，云南兵团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要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文革中迫害知青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

比如：1974年，几千名知青沿着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昆明行进，徒步请愿，昆明与北京都为之震动，最后出动军队，实行逐个强行遣返。

现在想起来，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最高决策层心中就有着隐隐的不安，要不何以中央设“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直至街道层层设”知青办”，而且每年都有不少“××知青慰问团”去各地巡回？

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揭开了黑幕的一条缝。

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子女理所当然地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常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

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但四川省慰问团的材料终将这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奸污案的黑幕撕开第一道裂缝。最终在新华社有关人员经实地调查而成的内参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桌上，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者的高度关注，并迅速做出了反应。责令云南省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处理迫害知青问题，中央工作组随后就到！

而在此之前云南兵团1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副团级现役军人、战斗英雄）、1师2团4营教导员庞真权（转业军人、学毛著标兵）和连长张国良等因强奸、迫害知青，因周总理的过问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大公审终于开始了。河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的知青终于看到了“红顶土皇帝”的下场：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在一排枪口中，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在列举了这些“人形兽”的罪行后，军事法庭宣布：“第四师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第四师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在云南农垦总局临沧垦区的孟定农场，知青们比任何时候都关心报纸，他们力图从字里行间看出一点对于他们命运的消息。小喜大忧、喜忧参半的情绪始终在知青们心中挥之不去。

终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其实引起全体农场知青愤怒、也是导致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公开打出返城旗号，从而成为引发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的导火线的，只是从“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知青工作四十条》里的一句话：在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属于“农工”而不算“知青”！这句话使农场知青产生被出卖、被打入另册的感觉。

与插队知青相比，云南的农场知青虽有每月26元的收入，但却少了插队知青所享有的国家补贴，准军事化组织的生活更使他们没有了人身尊严和自由。连当年素有儒雅著称的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一些干部迫害知青和奸污女知青的法西斯行径的材料后也击案而起，勃然大怒：“这不是共产党，这是国民党！”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容忍的。

前几年的以《中国知青梦》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已经把云南农场知青的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里干最重活的是城里来的孩子，吃最大苦的是知青，就某些方面而言，生产建设兵团的确有点像“劳改营”——我们应该向这些作者致以知青的敬礼！

现在“知青工作会议”居然把农场知青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给“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现在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接受再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假的——他们终于明白了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箴言——虽然我敢说当时的知青们没人知道有马丁这样一个人，这样一首诗。但他们知道“团

结就是力量。”自1974年开始，知青们不断地为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可总以失败告终。但在1978年，幸运女神终于开始眷顾知青了。

戊午年（公元1978年），云南农场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地知青都加入抗议队伍。

在《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刺激下，于是，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开始了秘密串联，再次发动串罢工和去北京”上访”请愿的行动。

戊午年底（公元1978年），大批知青向昆明进发，这次军队没有出动堵截，知青涌入昆明，沿街声泪俱下地演讲，最后升级成集体卧轨行动。连滞留于昆明火车站的旅客也一边倒地支持悲愤的卧轨知青。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与老挝接壤的孟腊农场的知青砍倒了几百棵他们曾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橡胶树以示决绝……

“上访”知青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北京，并受到了王震等人的接见，以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先念等听说了云南农场知青境况之悲惨，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拍案而起，愤而下令枪毙了那些蹂躏知青的“红顶土皇帝”并派出中央调查组，调查云南农场知青的生活现状。平时很凶的各级领导突然都对知青”客气”和”敬而远之”起来，知青们不出工也可以拿工资，场、分场、连各级组织都纷纷尽力改善知青的生活……然而，这些都与事无补，也来得太迟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在交通如此不发达的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知青上访团到达何处；何时通过边境关卡等情况竟然如此准确地传到我们临沧垦区，传到我们孟定农场，而且决不会是官方的渠道，要知道，彼此间的车程至少4天，也无电讯可利用……知青们每天自发地集中到分场，互相打听情况。

云南农场知青的骚动，已经逐步向全国城乡扩散，而且知青的骚动也明显对边境地区紧张的形势来说无疑是潜在的隐患，或许还可能被敌方利用？并且对人民解放军对越南进行反击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也许这是后来中央派调查组深入边境农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某天，分场广播站突然广播通知：“明天，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赵凡亲临我农场，召开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届时分场有车送大家……”这当然使知青们兴奋起来，“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赵凡要来？”虽然知青们知道赵凡的到来无非是当“消防队”，但“搞大了”，“有希望了”的念头还是在胸中涌动，大家奔走相告着喜讯和疑虑。应该说，在这场”知青运动”中，冲在最前面，也最有组织的是四川知青——坦率地说，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知青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却懦的坐享其成者——至少在孟

定农场是这样！

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好象一座孤岛，又像一条小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得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低下了藐视一切的头颅，显得十分绝望和悲壮。

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已故的毛泽东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又算'知青'了？不算'农工'了？"人群中不时传出揶揄的嘲讽。居然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知青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失落已久的自尊……

赵凡在垦区和场部领导的簇拥下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时，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过去搀扶起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接下来就是说他也有子女当知青的，他是可以理解知青的，等等。以及空洞无力并无新意的说教。赵凡在台上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

他接着说："……云南各农场长期缺油缺肉缺菜，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这些党中央都知道，所以派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广大知青的情况……"最后，赵凡说道："……知青同志们，当前地区"小霸"越南在边境上不断制造摩擦，我们孟定农场虽然不与越南接壤，但我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安定团结，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的领导下，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赵凡是有他的苦衷的，他不能告诉知青们对越作战已近在眉睫，这是最高机密。他知道一旦把这个最高机密透露出来，将引起更大的骚动和混乱，局面将失控。

"对抗"升级了，前几排知青有的咬破手指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的血字，有的进入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绝食。群情激愤的知青开始骚动，满耳都是四川知青的"雄起、雄起"的吼声。人群中有人向台上扔石块，这是农场当局和"中央调查组"始料不及的，自然，主席台上的人在场部"警（卫）通（讯）排"全副武装的保护下，撤入场部。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想，这对于作为老一辈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赵凡来说，应该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以为至少赵凡是同情我们知青的……。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孟定农场的知青骚动在整个云南农垦系统中可能属于"级别"较高的那种，要不，孟定农场不处在中越边境的位置，何劳中央首长的大驾？

又一个突然想到：知青的起事带有乌合之众的先天的组织缺陷，没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必不能长久。如果赵凡

不出现，或晚一些时间出现，知青定会撑不住，必会有在作出一定程度上的暴乱后作鸟兽散，届时后果不堪设想，为首者必入狱——真所谓“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孟定农场的罢工，我就要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事、原7团2营的现在高位截瘫的成都知青周兴儒。绰号“翅膀儿”。他是孟定农场的知青领袖之一。当初他对我说，假如失败，假如他被内部知青出卖，那么，他就自杀，决不会让当局抓住，他坦言，他受不了那些酷刑。

更有女知青领袖的石勇怀着玉石俱焚的决绝：“这个时候谁敢破坏绝食斗争出卖战友我就杀了他!”一个20多岁的女生居然如此，全然没有了女性的温婉，可见当时形势的危机和严峻。

22年后的今天，我也一直忘不了”翅膀儿”对我说话时的痛苦、迷茫的眼神和决绝的表情以及石勇说话的心情。

正当此时，赵凡出现，虽他主观上并无拯救知青之意，但在客观上救了知青的颜面，使知青在今后的无数次讲述当年的故事中得以以胜者自居而沾沾自喜，真实合理的推断是：如赵凡不出现，知青那根弦必断？

时至今日，那些知青领袖也许怕为盛名所累？也许对往事不宵一顾？也没人鼓嘈石勇是谁谁，翅膀儿是谁谁，他们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人群中，甚至连头也不回一下。这是一种胸襟。但我相信知青们是记得他们的。

很多年后，有个曾是当年团部宣传干事的成都女知青在给我的MAIL里这样描述“翅膀儿”：

“周兴儒是我的中学同学，不同班。我们很熟，也是因为有共同的朋友。

78年底孟定知青大事件中，翅膀儿乃举足轻重之人。他读的书、他的脑子、他的经验帮助乱哄哄人们找到了纪律和办法。我那时正在团部，头头脑脑们都到边防团避难去了。参加绝食的我的朋友们……跑到招待所院子里躺下，后来有人呕吐，有人便血。我大痛。要去找那些头头将实情告之。可我出不了团部，团部被“造反”的队伍封锁了，说是必须有翅膀儿的纸条方能通行。

我去找到他。初冬季节，他身上披了一床军用毛毯，胡子八岔，神色严峻，一副列宁在1918的作派。见我，立即不好意思，我递上写好的出行条子，他说小嘉你也是，哪个不让出去也不得拦你噻。然后龙飞凤舞。握着他的签名，我于是畅行。

今年春节，他请我和另几人吃饭，我谈及此事，他的记忆极好，大家都笑了。”

俗话说，成事者必占天时、地利、人和。我以为从知青1978年的大抗争看，中越之间冲突加剧，此天时也；云南知青恰处中越边境，此地利也；知青们的“同仇敌忾”与中央政府派赵凡到云南又恰好赵凡也有子女当知青而他个人也刚被起用，受迫害的阴影尤在，此人和也——知青们死里逃生，真是幸运。

过不多久，从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传来好消息，孟定农场的知青开始逐渐返城了。据说这是邓小平在顶住了”两个凡是”后，替知青及其知青家庭作的好事，这又是一件顺应民心、深得人心的事。而云南农场知青的行动更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

己未年（公元1979年）到了，我也终于收到了”顶替”母亲回沪的调令。这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呢？从庚戌年到己未年，前后达10个年头，期间探亲4次，现在，”小少离家”的孩子，好容易”老大归”了，这次可是永远的了。

怀着“世纪末”似的“疯狂”，把任何可吃的东西统统吃完；把当初带去的全部日用品统统留给了老农工，颇有些”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这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做法有点“张狂”，其实不然，在我心深处是对10年来给过我帮助的人作最后的感谢，对自己的青春作一次“祭奠”，以面对新的人生……。

早晨，一样的天气晴朗，美丽的彩霞依旧漫天。与过去任何一天的早晨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新的一页翻开了。分场机务排的拖拉机来了，就象当年接知青一样，但今天却是专门送我们走的。

坐在拖拉机上，面对在路旁默默地目送我们走的老农工和他们的孩子，突然想起“青春无悔”这个词，我开始有点依依不舍起来，喉头仿佛哽塞了似的。想起了许多……那些？哪些是我难于忘怀的？丝毫没有“风飘飘而吹衣”的感觉。也许今后我会有机会再返回去看看？

其实，在今天看来，这许多纷繁复杂的思想岂是苍白贫乏、多少带点色厉内荏的一句“主旋律”式的“青春无悔”所能涵盖的？所谓的“青春无悔”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而已。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往日严酷的大田转换成想像中的田园风情又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

顺便说一句，当我每每听到一些时来运转的同龄人高唱着所谓“知青精神”的调子，看到他们高扬着“青春无悔”和旗帜时，在我眼前便出现动乱、失学、红海洋；疾病、饥饿、芦苇荡；蚂蝗、毒蛇、伐山林以及雨季的泥泞、旱季的酷热。

我感到困惑。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返？他们何必向那些一误再误、或者没机会没能力、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同龄人炫耀自己的“成功”？如果他们认为“无悔”，当初又何必返城？或者让子女们荒废学业去他曾经流过血汗的地方实实在在地住上几年，也”无悔”一次？我不知道……自然，旅游不在此例。

现在那些孩子们的所谓”吃苦夏令营”与知青们的当年相比，实在是”玩笑”而已。但至少我自己仅希望有机

会或者带女儿再返回去看看，凭吊青春，仅此而已。而决不会让女儿去云南孟定住上几年。因为它今日以及今后的结果是那么的沉重，沉重得让人“有悔”的无比痛心疾首。

由于中越边境的冲突，行程被终止，但也终于在2月10日与分场小学的女教师倪红一起踏上归程。到达昆明是2月17日，在昆明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最多的人群是返城的知青和越军俘虏以及在火车站广场上摆地摊的从越南逃回的华侨难民。

这天，中国政府正式向越南宣战。

第8章　魂牵梦萦念悠悠

比赛削水果——手表的故事——她把头别过去——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前面说过，为了万一能离开农场，而且走得省心。“不许谈恋爱！”几乎是全部的家长都这样叮嘱或告戒自己当知青的孩子的。在情感需要和理智现实面前，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遗憾和克制被迫接受后者，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哪怕的确是错过了好因缘。

若非亲临亲为，这种选择带来的苦痛，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倘若在今后的漫长里，更被事实所证明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是错的，为这种选择付出的代价将是”一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没有接触爱情时或当”爱情”处于”地下”状态时，知青们一定是或者是“口是心非”地满口应承他们的父母，那是他们不知道爱情的诱惑或者说是“杀伤力”。但爱情岂是理智可以控制的？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知青心。”好象有哲人说过：”爱情是盲目的，是唯心的。”可正如生命是永恒的主题一样，如万花筒似的爱情更是以不可捉摸的耀眼或缠绵而成”主题”的主题。

己卯年4月（公元1999年5月）照例的同学聚会。大家在谈到云南时，也不知谁起头，知青们又自然地谈到C同学当年的初恋。C苦笑着否认，我说，无风不起浪，大家都这么说，肯定有原因。因为只要谁一谈起他的那段往事，他就特别激动。避开其他人，“今天场合不对，过几天再谈，你有空吗？”我打燃火机为他点烟，看到他的夹烟手指有点微抖。

在那个年代能够引起知青们兴趣的只有几件事：1、谁探亲回来了或某连杀猪——这意味着至少可以解一次馋；2、熟悉的人中是谁升官或入党了——这意味着至少在需要时也许用得到；3、就是谁与谁谈恋爱了——这至少引起不少单身知青的嫉妒和顾影自怜。

关于C与Z的关系，当初在云南时我们都隐约知道一点。可C从来就不承认。因为在C看来Z太优秀了，是个近乎“完美”的女生。坦率地说，C觉得自己配不上Z。我们似乎也有这个看法？

在一间茶室里，背景音乐是著名的《My Heart Will Go On》。C同学看上去很苦恼也很激动，他不挺地喝茶、抽烟。语序有点乱。

“你确信自己仍然象过去那样……喜欢她？”我本想说“爱她”这个词，可我觉得这词有点别扭，我们毕竟不年青了，“事情都过了近30年了……”“多年来我曾也有过不少女朋友，现在看来，一些女性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不敢说自己时时都在想着她，但每当我想起她——即便是与别的女性在一起时——真是罪过——心里总要叹一口气。在我来说，Z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她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他又叹气了。

对一个人进行肖像描写，在我看来是文学创作上的难点。那么怎么描写Z同学呢？这么说吧，我们团有各地知青几千人，只有极少数的有幸入选宣传队，可见选拔之难。特别是女生，无论个子、相貌、嗓音、风度，都必须是上上之选才行。

她给人以一种古典式的端庄从容的感觉。有人用“似水晶一般的晶莹”来形容她的皮肤显得十分贴切，与”俗艳”绝不相同，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那种自然的纯真淳素的天生丽质。在平静和冷然的外表下，眼神却是透露出如若在暗处的鲜花般盛放的感情，常使人不敢与之对视。她的眼睛似乎有着魔力，能扯动你的神经，当看到这双眼睛里有喜悦时，周围有人也会觉得快乐，当眼睛告诉你要你帮助时简值没有人可以拒绝。

比起那些神态故作奇异的腻美来，她仿佛是隐身在轻云后若隐若现的明月，格外雍容高贵。使人不敢生出冒渎之意。笑如鲜花盛放，灿烂得使人目眩。在舞蹈时，柔韧的腰肢和健美的大腿织出散文般的流畅和诗的韵律。由此可见她的风姿。

不可否认，她有许多追求者，成功者寥寥，但善解人意她也不会给别人难堪，所以大多数人虽然追不到她，但也一直对她非常有好感。这种高贵与随和并存的气质，有点像荷花，生在浊世中，却又不被浊世所泄。她经常的神态是静静地歪着头，看人或听人说话。至于她的性格，就我所知——冷静、矜持、从容、落落大方，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思维敏捷、文静而非文弱；行事只要认准方向，决不顾他人说三道四……。

以下是C的叙述，也使我明白了许多在C与Z之间的故事以及一些微妙关系。出于写作的考虑，我仅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时序和语序上的调整。

“有一部名叫《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的电视剧，虽没看过，可这话却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夜里睡觉我常做梦。这么多年来，我是否梦见过她？记不清了，但昨晚梦见了她了。

风采依旧，绰约仍是当年。她盈盈来到我身侧，“抬头看看天上好吗？”她轻轻地说着：”你看夜空满天的繁

星，每颗星宿都代表着一个机缘，这些无数的机缘有些代表快乐，有些代表痛苦和黯然神伤……”我觫然梦醒而不敢继续——虽然我们从没亲热过，甚至连手也没牵过。于是在黑暗中，记忆的触角在探寻着回伸。

“Z属马，1972年她整18岁，我比她大一岁。

我家是64年与她家成为邻居的。因此，我们是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同学。那时的我们并不象现在的中学生那样，而是恪守”男女之大防”的古训。我们69届恰逢”一片红”盛世，自然在70年5月的某天，登上专列向着中缅边境的一个”坝子”高歌猛进。其实，在初上火车时，我并不知道有这个同行者的，只是在满车厢乱窜时才发现她，这对双方都是惊讶而又必须视而不见的。

“经9天颠簸，终到兵团。她分在1连，我到8连。没1年，她上调团部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人是神气的，他们住瓦房，有电灯、电话，基本上不干活，还经常吃肉，只是在我们不断举行的“大会战”时，才来慰问演出，因此在我们看来，他们是“贵族”。许多知青都以认识他们而自豪（就象现今的追星族）。当然，如我之类的，是有这份奢望而没那份指望的。

“1972年是无法忘怀的。6月，我首次回沪探亲，恰逢团直属连几位女知青同行，彼此攀谈，才知她们竟是她的熟人，由此我颇为自豪，毕竟是她的邻居加同学，自然不肯放过炫耀的机会，于是便“杜撰”一些关于她和她家的琐事逸闻，在团直属连几位女知青羡慕的眼光里，我陶醉在虚妄的荣耀中。到上海后，相互挥一挥手，各自回家。

“其后某天，突然有几位女同胞来访，一见之下，不免手足无措：竟是她带领那些团直的旅伴。令我慌乱的是她竟敢……竟敢到”素不相识”的男生家，虽然是带头的，但却走在末尾！好象彼此很熟似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

“你还记得72年那次是你陪我去她家的吗？”C看着我。摇摇头，我早已忘了。

“转眼假期将满，要返回了，苦于无伴，就想约她同行，可又却步；区区数米，犹如雄关漫道，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恐怕并非真想有个“旅伴”，而是别有所图？终于有你愿意陪我一行。鼓起余勇，敲开了邻居8年的她家的门。她不在，便向其父表明造访的目的，不料其父说她有伴了，也是宣传队的。泄气之余，告扰退出。在心境慢慢平静的同时，产生一种灰灰的感觉。第2天，正要出门，已见她站在门外，我心猛烈地跳动起来（真怪，她总让我感到意外，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猝不及防的”袭击”不断发生），她邀我同返，还说能买到“工农兵车厢”的票子（即简易卧铺，价格与普通票一样）。自然被我悻悻然地拒绝了，但她非要与我同路，想法之坚定也让人感到怪怪的。盛情之下，我很”委屈”的答应了。

“上了火车，她落落大方地为我介绍她名叫J的男伴。面对这种成熟优雅的风度，莫名的自卑在悄然滋生。几天的旅途，他们谈笑风生，我却时感孤单。她显然注意到了，便时时陪我聊天，显得很亲热。这就使她的男伴有点吃惊（事后J对我说，她居然有我这个那么亲热的同学，宣传队的人从没听说过）。而她却全然不顾同伴的惊讶，对我说她的爱好；家庭成员；别的同学的趣闻，等等。我边听边忖：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彼此还比赛削水果，我削水果，果皮总是厚薄、宽窄不一，更经常断，她就嘲笑我，但笑过之后便是尴尬的冷场，为打破冷场，她就很令我吃惊、很大方自然地手把手地教我。而我却有点畏缩。——我现在会削果皮，就是那几天学会的。

晚间，众人皆睡，唯我俩独醒，真是辜负了这卧铺。与白天截然，彼此间很少有话，多的是初相识时的沉默，偶尔对视，却又慌乱地移开眼光，我想与她坐在一起，终是不敢，因此身子如坐针毡。这种氛围有点尴尬，也更微妙，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头脑里混混耗耗，只能感到心灵的颤栗。

“在上海到昆明的火车上，水的供给从来是断档的。更何况是要命的大热天。那时我们第一次带手表，人前背后总要炫耀腕上的在当时可是件奢侈品的”上海牌”。当列车在黎明时分停靠江西某站时众旅客你争他挤地去盥洗。我刚想为她效劳而去“抢”些水来时，而她要我好生呆在车上，并摘下手表很随便地交给我，说她会带水回来，便与J挤下车去了。

好一会儿，她浑身湿漉漉地端着水回来了。同一车厢别的男生“拼命”地向女伴夸张地渲染”抢水”的艰辛，以博取对方的怜惜。而她出现在车窗下把水递给我时，仰起的脸上只露出淡淡的坦然及梢带胜利和不负重托的神态。——直到现在，一想起她被湿透的衬衫衬托着的青春美好的身材，歉疚惭愧之情仍充溢着整个胸臆。照理该把手表还她了，可我故意把这事忘了……

几千公里的路程在列车隆隆的轰鸣声和同样不平静的心境中被留在了身后，明天就到昆明了。又是在半夜别人酣然，我们”对恃”的微妙的沉默中，我故意把自己的手表给她。她优雅地用极妩媚的姿体动作把手伸到我面前，撒娇似的要我帮她带上。没说一个字，但深情全写在整个形体上。在她亲昵和直率下，我颤抖着，畏畏缩缩地还是照办了。但心象受宠若惊般地剧烈抽搐着，体验着胸臆中一种涨潮般的既“害怕”更向往的陌生情感冲击……直到快抵昆明时，我才故作恍然地把手表换回，她歪着头梢带顽皮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看到我心深处，嘴角噙着些许胜利、狡诘的微笑。

“到站了，他们要在昆明为宣传队办些事，因此她竭力动员我也留下，避开她的同伴，在车站一角，她软“硬”兼使，但我自“巍然不动”，坚持先走——虽然更想留下，与她一起在春城漫步西山，放舟滇池——她只得放弃了，可仍想第二天到车站为我送行，还是被我拒绝了。无奈的她脸上带着遗憾和疑惑陪我去旅馆介绍处，再送我上公交车。对了，这里是否要对J说一声”抱歉”？因为让他当了3000多公里的”电灯泡”——尽管是隔了这

么多年后的今天。

“翌日，我继续前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是多么想在车站看见她仪态万方的倩影啊，但终究不能——回到连队，知青们对我居然不超假而且在大热天的返回，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能对人说是为了能和她在一起而提前归队？这份情感对我来说是太神圣了,它是属于我个人的。

“大约回连一星期后，我去”赶街”，巧遇J，她托他“顺便”带话：万一见到我时，请我有空去玩。——”当然有空”！兴奋的我立刻就去。一路上心绪繁复：既受宠若惊；又忐忑不安，各种杂念分沓而至，”剪不断，理还乱”。

到团部已是中午，被视若上宾，自不待言。那时生活艰难，有肉就是过节，何况宣传队的肉烧得特别好吃些？以后也去过团部好多次，都是在饥荒了便去解馋？好象不那么单纯，应该有其他目的，但我不知道。

每当我一去，几个昆明女知青便”狡猾”地大叫：“小Z，他来了”。她们是友好、热情的，象大姐姐一样接待我，然后总是找借口离开，让我们独处。而我总是辜负她们，为了躲避又是久久的沉默，稍坐，就”落荒而逃”向J的宿舍。——虽然心里总牵挂着姑娘身上散发的淡淡芬芳、幽幽体香。”只是为了解馋，或者与她“对峙”1～2小时而甘愿经常来回步行30公里？”当时朋友们经常这样问我。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理解当初的感受。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每次来去时的心情都与第一次相仿，格外欢愉、充实。

“我去宣传队的次数并不很多，虽然想每周都去，但总是不敢，经常的情况是在憋不住思念时才去，记忆中大约每月一次左右。

“1973年刻骨铭心的。那天，我依然如过去的周末一样，早早地出工，把全天的工作用半天完成，下午就又踏上去团部的路。对了，有件事差点忘了，最近以来，她常向我提起一个成都知青，也是宣传队的，姓宋，是中共党员等等。真纳闷，为啥老对我说他？”那天的她在我心里与往常不同，大约刚洗过澡，长发散披，小憩刚醒，眉心微颦，若有所思地倚着；随着呼吸，高耸的胸脯微微起伏，似乎略有烦躁，却显得特别清纯、娇慵和风情万种。见我过去，便微欠起身，拍拍床沿让我紧靠着她坐而阻止我走向床边小凳，闲聊不多，便又开始沉默，过一会儿，大概她也受不了这种“对峙”，就去张罗晚饭，怕我寂寞，又取出她的日记和相册给我解闷。

不知道现今的女孩是否随便给男生任意翻读她们的日记和相册，那时的女孩可不这样。日记我可决不敢看，相册更是提心吊胆的翻。只见她姿态各异：边娇边嗔；或媚或颦；亦柔亦刚……想要一张，不敢；想偷一桢，更是有这“贼”心没这”贼”胆。饭后，偌大的寝室又只剩我俩，熟悉或者说期待已久的”尴尬”又再现了，久违的慌乱是何等的亲切。

良久，她终于开口了，我吁了一口气，不，似乎更紧张了。好象天边传来羞赧、幽幽的话语：”要我出去走走

吗……？”我喃喃地说：“随你”，”要带我一起出去……走走吗？”“随你”，我声音有点发颤而不知所措。”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出去……走……走……？”她的声音显得苦涩，吃力，或者说哽塞更贴切。我”害怕”极了。连着几次问，连着几次答。我心里明白，这样恐怕要糟，可怎么“糟”？“糟”什么？却是不甚了了。尽管心里无数次地愿意与她同行，尽管”出去走走”是我向往已久和梦寐以求的，甚至可以发誓与她长相厮守，但脱口而出的仍是”随你……。”“我与她紧靠着坐在床沿，寝室里静得可以听见心跳，我尽可能地把头埋下去，埋下去，我的心也在沉下去，沉下去，而不敢看她。只见一双关节略带小窝的美丽的手指神经质地把一把旅行剪刀打开，合拢，合拢，打开。我想去握这双美丽的小手，很想去拢她浑圆的肩，也许更想去一亲芳泽？朦胧中似乎有什么在萌动，但毕竟不敢，只觉得胸臆间快要爆炸了……

“是夜，挤在J的床上。听着他均匀的呼吸，我辗转不眠。半夜尿急而走到屋外，整个营区除了夏虫啾鸣外显得格外宁静。那天没有月亮，闪烁的星空下，一切都是朦胧恍惚，如同我的感觉。抬眼看去，唯有她的窗前亮着灯，屏住呼吸悄悄地过去，可又不敢太靠近，我静静地站着，生怕惊扰了心爱的她。多想敲敲窗，然而我依旧呆站着，良久，只听得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叹息直叫听的人觉得心也随之颤抖，仿佛自己的心也跟着叹息人的心一起抖碎了。你为何叹息？一种沉痛的窒息感在胸中逐渐弥漫扩散，渐渐地淹没了我，谁能帮我？然而我依旧呆站着，谁也不能救我。谁也不会救我。然而我依旧呆站着，依旧呆站着……

“次日早晨，我决定回去了，临行前看了看她的房门，锁着。心情一扫往日从她那里回去时的那种神秘的欢愉感，而产生了深重的失落和“负罪”感。回连后，倍感躁动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宣泄郁闷，下午就去”指挥部”访友。在快到”指挥部”的公路上，又是一个扑面而来的措手不及！迎面驶来的拖拉机竟载着她回团部去，原来她也是去……这犹如当头一棒，头脑里顿时”嗡”的一下，便眼冒金星地呆立当场，只见她猛地把头别过去，就在我呆若木鸡的时候，拖拉机隆隆地擦身而过。我追了几步，想喊她下来，然而终于没有出口，眼看着载着她的拖拉机渐去渐远……渐去渐远……。我又一次失去了机会，并产生了永远失去的不详之感。

“没几个月，我调入”指挥部”。某天，宣传队来”指挥部”演出，她见到我时神情是淡淡的。看着舞台上的她旋转着，但人却憔悴了许多，我的心中绞痛汹涌。这夜，宿我处，他突然说，她与一个成都知青谈”敲定”了，也是宣传队的，姓宋，是中共党员。这消息对我来说不蒂是个晴天霹雳，血猛的往头上涌，我立时就楞住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呵……，这时才明白，我是多么希望拥有她。太想，真的好想冲出去拥着心中的姑娘说：过去是个误会，是个令人心痛的误会，我愿意用毕生来补偿，真的，用毕生……J紧紧地抱住我，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余下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现在是不记得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她，心中总有着太多的追悔——“我在哪儿错过了你？”“1974年是尴尬苦涩的。那年，我又回沪探亲，得知她也在上海，便把几年来的爱慕、追悔、失落统统托付给邮筒。在以后度日如年、似坐针毡的三天后，”审判”终于到了，厚厚的。紧张如我，一口气跑上楼，关起门，哆嗦的手拆开信封，——原信退回，不，从中很随便地飘下一张小纸片：“早

知今日，何必当初”。此生难忘的8个字，并且没有称呼，没有落款。

“自然，我是决不死心的。74年假期结束，又壮着胆子主动约她共返。她竟然答应了！同行还有另一个女生，就是5连的Q同学。还是在昆明分手，我孑然前行。这次旅行当然与2年前大相径庭：没有了”工农兵车厢”，没有了生怕冷场的”闲”聊，没有了削水果的比赛，没有了微妙的沉默……总之，失去了2年前的所有旖旎和温柔。跑上跑下，抢水端饭，我真的担负起伺候女生的”责任”，而且是两个女生。现实是：她对我不卑不亢，极有分寸。回到团里，自然不再有托人请我去玩的事了，倒是我主动去走动几次，目的十分明确：决非为饥荒而去解馋。虽没被拒之门外，可彬彬有礼，客套冷淡却”残忍”地写在脸上……。突然想起这样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后来Z不是上调了吗？”我插了一句。”调那里去了？”“对，没过几年，她父亲从”9424”工程迁至铜陵，按政策可带一个子女，于是她跟去了。在这之前，宋姓党员也因”根红苗壮”而选送内地读书。从此，她就像一只闪光的气球，带着我的眷恋轻盈地飘走了，再无音讯。我只好对自己说，她永远只能是我心灵深处的蓝天白云，因为我再没有见到她的可能了。

“1979年是人生大转折。随着大返城的浪潮，我也回沪。一次去M同学家玩，在公交车上遇见她，竟是公交售票员。这是怎样的欣喜和不安？彼此攀谈几句，至少我很尴尬，拼命想装出”一笑出门去”的潇洒样子，但终于不成。

“此后就再没有见过她，尽管住一条弄堂，彼此窗对窗。再后来J告诉我，她迁到丈夫所在的成都去了。以后，偶逢她回沪，碰见仅点个头而已。如今我搬到浦东，要再见就更难了。也不知她过得好不好，孩子多大了？是男？是女？

“至于我回来后，也有过几次恋爱，甩过人，也被人甩过，最后的情人成了第一个妻子（不知是否会有第二个？），以后就有了漂亮可爱的女儿。日子过得很平淡、琐碎、无味、无趣。94年我们回母校参加校庆，其实我答应你一起去，是想也许“碰巧”可以遇见她。但没有，也许她在四川不知道？我不知道。”C同学叙述到这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原来他与Z之间竟有着如此曲折的往事。他的情态使我感到好象在读一本现代版的才子佳人的书，一段在一个人心中保持了近30年的爱情竟然是如此的缠绵，我虽不太相信；但叙述中细节是如此的清晰。因此不由得我不信。

我有点感动。”初恋十之八、九是不成功的，因此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必说这种‘初恋’从宏观上应该理解为‘初次的单恋’。”我话一出口，立即觉得自己是否过于尖刻了？C的单恋是他个人的悲剧。

C一点也不介意我的尖刻：“这段经历在我的整个知青生活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给我留下刻骨难言的痛

楚，每当我独处或者与其他同学在一起谈起当年，总要想起或者同学们会提起我的这段经历。我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一生。虽然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然而直到现在它们仍不断在我脑海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这种‘改变一生’想法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悄悄地慢慢凸现的。如果在很多年以前有人这样对我说，我一定会嘲笑他，我本以为它不过是少年时代的一种经历，仅有点遗憾而已，其实我早就”解脱”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楚”定会湮灭的。大家也都这么看，我也愿意这么想。可这实在是自欺欺人。现在明白，那种痛苦如同某种事物有着不可逆转的运行一样，顽强地、悄无声息地浸润到我的灵魂深处，是那种细微的啮噬的那种，是个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日积月累地在不断浸润下去。你想避都避不开。它今日以及今后的结果是那种猛然回首才知道的痛楚。有时甚至幻想，如果当初这么……就好了……，当初那么……现在就不必痛苦了。哪里才到头？其实我知道到哪里才算到头！”我不想劝他，这种事是不能劝也劝不来的。

“无论你在干什么，想必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在于对别人的爱胜过对别人的索求。”这是不是劝呢？我只是想说出我的想法。

“现在你知道她的情况吗？”我以很纯粹是“外交辞令”式的接着发问，而且我在等着他的叹气和说”不知道。”但没想到他是这么回答的：“她回来了！……离……婚了……”从他嘴里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我有些吃惊，“你们见过面了？”他低头点烟，但打火机被他粗重的呼吸吹灭——他又激动了，“团宣传队的J告诉我的……”“哦，是那个吹小号的J吗？”他点点头。

我打燃火机为他点烟，看到他的手有点微抖，“我能帮你——不！帮她做点什么？”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了，似乎还想弥补刚才的尖刻似地补充道。

“Z很痛苦，你能与她谈谈吗？同学之间的关心和爱护对她来说是必要的……至少我希望有机会为她做点什么……”从C的话里我体会到了点什么？我答应有机会的话一定去。

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我在想，他与Z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很难预料。头脑里忽然蹦出几句话，只好直录：

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一些“旁边”的故事，也许她就在你的旁边，然而你却一直不愿先开口对她说句话，终于有一天你想找机会与她好好说上几句，却发现她的身边已有了“他”，于是你大恸，把一个美丽得令人心痛的误会以及早就准备好的梦重又放回心里。

深情隽永的爱，也许会使人受伤，但这是使人生完整、高尚和诚实的唯一方法。不是吗？人人都希望或至少标榜自己是这样的。

女人一旦痛苦，一定比男人深切，因此就更容易解脱，她们会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开脱自己。而男人一旦痛苦，

那感觉就像影子似的缠着你。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等懂了时，往往就成了明日黄花。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这句话包含着几多追悔和思念？几多苦涩和惆怅？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因此在年少轻狂中错过了许多美好。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只因为初恋时，我们太年青了。

第9章　艰难创业百战多

返城——再“创业”——小阁楼的思绪——价值的悖律——学会反思

至此，1969届的初中生在走过了从庚戌年到庚申年的10年苦难，终于回到了家乡。想当初，青年学生打着红旗，以藐视一切的胸怀上山下乡，在伟大祖国的广阔天地里埋葬了一个浪漫瑰丽而又雄心勃勃的拓荒梦后，又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地低下曾经高昂的头颅，如高原洪水般地从天南地北泄下，散落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

知青们的返城犹如他们当年的下乡，从轰轰烈烈到“兵败如山倒”，上山下乡运动倏地飞灰烟灭了。这次返城，是知青们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他们面临着对他们来说是百废待新的又一次“创业”。

颖仪，内蒙古插队知青。在插队时，就是一个优秀的知青典范，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去破灭草原大火。后因患严重疾病而病退回沪，返城后被安置在某街道羊毛衫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街道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产品是不纳入计划渠道的，更何况羊毛是国家一类物质中的重要原料。面对这种局面，应蓓仪挺身而出，利用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重返大草原组织原料，落实车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羊毛运回厂里。然后又带领职工调查市场，设计样式；终于为厂里的产品打开了销路。她的创业史被刊登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颖仪，现任中共上海市某区区委书记。

原上海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回到了阔别10年的故乡，他们去时是76人，回来却不足这个数。除去死难、另找门路外，不少同学如“开枝散叶”似的追随农场非上海籍的恋人而散落在西南各省。为了忘却的纪念，同学们郑重相约，每年的5月一定要聚会。

同学珉，外柔内刚、妩媚脱俗。庚申年（公元1980年）回到上海，她坚信苦难中萌发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因此置亲友的劝阻于不顾，毅然为追随爱情而再次离沪远嫁西部，希望落地生根。但终因婚变而黯然。

在外滩的一家咖啡馆，我默默地听着她平静地叙述她那令人砰然心动的爱情以及后来的黯然失色。看着珉同学平静的面容，一点没有韶华凋零后的苍凉，感觉上好象她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知为什么，看着女人在自己身边讲起和其他男人的故事，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我心里没来由的疼了一下。

她看上去已经没有了表面上的那种柔肠寸断似的痛不欲生，但这种貌似平静的痛定思痛的叙述，却无言地诉说着凄凄惶。虽然没有哭泣，但我知道她的心在流泪，我不再说话，也知道不必说话。只是无言地感受着她的悲哀无奈。

我不知道命运会怎么安排，我也不想知道明天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只是心底有种深深的悲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我们注定了不能躲开。而且丝毫不能掩盖由此给她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摧残和伤害。她的一生从此改变。

我真心希望友情和亲情能给处在被伤害中的珉同学减少一些痛楚。——更希望有人能抚平这种创伤或使伤痛稍减。这不？随着桌上碗烛火光幽幽的跃动，仿佛在抚慰着什么似的，幽静的咖啡馆里轻柔地播送着萨克斯风的名曲——《Going home》。

“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却很不容易谱写成。”这句话是哪一位诗人说来的？

自庚戌年到乙亥年，她在外漂泊长达25年后依旧是形只影单地踏上返回故乡怀抱的归程——这是怎样的代价和沉痛？——正如她25年前的出发。珉同学时至今日尚不能用家乡方言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依然坚信爱情的至高无上。至今孑然一身。

毋庸违言，“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抓住了机遇或凭各自的能力，76人中的极少数获得了成功而成了佼佼者，他们之中产生了公务员、银行家、学者、企业家、小老板等等。

同学华，水稻连农工，当年的“铁姑娘”。她在兵团里虔诚地“改造”自己，开荒、插秧、收割，干得腰也直不起，直至跪在泥泞里继续到昏厥。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水稻连的副指导员。回城后进了街道工厂，又一次地与广大知青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她从头做起，凭着知青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知青干部的领导能力，才华和机遇使她逐级上升。华同学，现任上海市某区民政局长。

同学星，苗圃排农工。在丁已年（公元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录取而离开农场。23岁的“老三届”初中生在本该跨出大学校门时，才刚进入大学。天道酬勤，学业有成。勤奋使“老”大学生的他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星同学，现受聘于美国某研究所。

同学霖，橡胶连胶工。原是个本分的小个子，现是某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公司里，有不少原兵团时期本营或本团的知青战友。有人说这决非偶然。的确，当霖先生在众多应聘者中发现某人是自己在兵团时期本营或本团的知青战友甚至是76人中的一员时，他心中作何感想？“拉兄弟一把”，这必然是他的第一念头。因为不管他和他们今天的地位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名称——“知青”。

同学新，橡胶连胶工，后被选拔参军。在参加了中越边境的战争后无恙退伍，返城后用多年的积蓄和筹资，在几年前开了一家网吧，当起了老板，生意比较清淡。他想转行干别的，但这十几台电脑的出路在哪里？“总不能扔了吧……混混再说吧……”当年知青生活和战场上血与火的锤炼，并没有使在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的他沾染上多少铜臭，面对多年的同学好友，惨淡经营的网吧老板十分感慨，他以为：人总是容易忘却的，可那十年，却时时提醒并困扰着他。也许永远忘不了了，他暗自叹息着。

终于从几千里外的边陲回到人声鼎沸的故乡，已经20年了。可对他来说，故乡仍使他感到迷茫，人如流，车如流，各种声音组成嘈杂而雄浑的都市交响曲。那混浊的被称为」母亲河」的江水粘粘缓缓地淌着，带着历史的重负融入大海的怀抱。

最能体现故乡特点的莫过于夜都会喧嚣纷繁的灯光广告了，它为城市赢得“不夜城”的美誉，明明“吸烟有害健康”但Marlboro的牛仔却颇为雄健，是“男人的世界”。各国靓女：媚眼与红唇齐飞；玉腿共丰乳一色，争相邀宠，非迷死你不可，除非你买“我只用某某”的产品。

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著称的外滩依然保持着经典的美丽和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江对岸的“NEC”广告宛如红灯笼，又象渴睡人的累眼。故乡，对他而言是高节奏的，疲惫的，狭小的，浮躁的。如果让他以比喻来指称它，用什么词？他头脑里立刻出现一间站不直腰，开着老虎天窗的小阁楼。

人生是多么奇怪，遥远的往事历历在目，眼前的事情又像成了遥远的过去。

他总也忘不了那个“坝子”——边陲的山水风貌时时在半睡半醒中象云一样地飘入他的梦境，——当第一抹霞光涂亮峰巅时，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还在梦中，氤氲雾气缓缓升起。近的胶林、村寨，远的山脉、大田，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晨霭。

如同少女经常更换服饰一样，朝霞也向大地展示它奇幻的色彩，——红的热烈、紫的多情，丝丝白云恰似姑娘的头纱，而无垠的蓝天，更人使想起永远的“勿忘我”。——还有那点缀着纯净早晨的袅袅炊烟。此时越升越高的太阳正照耀着西部苍绿色的群山。

黄昏，结束了一天的劳累，伙伴们三五成群地荷锄牵牛，嘻笑打骂着收工时，弥望的是一片嫩绿，微风起处，荡起阵阵绿的涟漪。如果是秋天，遍地的金黄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山脚，沉甸甸的谷穗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羞羞地低

着头，似窃窃私语般地发出细微声响。路旁的绿草中间点缀着紫色、黄色和红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它们的花瓣展开犹如托盘，中间是粉嫩的花蕊，以欢快的姿态去承受着黄昏的阳光，芬芳和着泥土的腥味沁人肺腑，不禁使人要大口呼吸。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佩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哦，甜美的歌，流畅的曲，给人以宁静、祥和的慰籍。这是怎样的意境呢？怎么会有如此摄人心魄、令人回肠荡气的魔力？每当这类旋律在心中回荡，他胸中便升腾起迷雾般的悠思和惆怅。

脱去满是泛着白花花汗渍的工作服，打一桶井水从头淋下，冲去一天的劳累。在蹲在地上捧一大钵包谷掺红薯的饭和盐水汤稀里哗啦地飞快地吞咽后，惬意地在屋外的“马架子”（躺椅）上靠着，手上一支烟，脚边一杯茶，看着黄昏静静地流泻过来，像一条忧郁的河。

天地间充溢着一片安宁的懒散，懒散得让人发虚，使人有种空落感。不远初传来饲养员唤猪进圈的吆喝声；炊烟溶进了晚霞，山林在落日余辉中闪烁着红里透蓝的羽翎般的色彩。阳光从锯齿形的山后扇面似地向蓝色的天幕上喷射着金辉，远山被衬托成一片青紫。抬眼四望，“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头脑里忽地跳出毛泽东的名句。极目东南，那里是家乡，然而，绵绵的群山像屏障似的试图阻隔纷繁的思绪。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新同学情不能已地轻声唱着。是啊，好美的歌！

那时节，这类令人的回味眷恋、心旷神移的歌曲刚在大陆流行，可他敢说，他和同伴们在当初也有过写一支类似的歌或其他什么的原始的冲动，来寄托自己情思。

不是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么？不是在盼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吗？”他们居然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吟唱田园风光，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才知道我们当初是何等的闭塞、荒唐。居然胸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壮志，而以‘解放者、自居；居然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为了‘红旗上天，宁可卫星落地’，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居然不知‘洞中才数天，世上已千年。’这种‘宁要……不要……’论断的提出者真是自欺欺人、愚不可及。可笑，可悲，可叹。没想到现在却把人家请来当老师，教我们怎样才是市场经济！”他嘴角噙着一丝讥嘲。

如果把知青的命运以返城为界而分两个阶段，即“前知青命运”阶段和“后知青命运”阶段。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后知青命运”阶段中因机遇和能力而出类拔萃者毕竟是少数，而没机会没能力或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这些当年听从号召主动或被动地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回到城里后目前过得怎么样？

人们有理由在为那些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功者感到欢欣和骄傲的同时，更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使那些不甘平庸可又不得不平庸的绝大多数知青感到悲凉。其现状是大可哀痛的。

第10章　岁月如歌尽蹉跎

责任——浪费——“废物”的挣扎——“有悔无悔”的证明

知青们回来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城市是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有理由接受社会赞扬和安慰。但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了“废弃物”，当社会在享用他们牺牲的成果的同时更抛弃了他们。

当月台上接站的喧嚣渐渐沉寂下去，当家人团聚的喜悦也迅速归于平静。更为现实的是那些有意或无意剥夺了知青们应有权利的既得利益者面临着利益再分配，这就意味着这些既得利益者将很不情愿地归还出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人性的本源开始迫不及待地脱去温情脉脉面纱而露出“恶”的本性。

知青们回来了以后又怎样呢？一件属于2个人的东西，因为长期寄存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会觉得他才是这件东西的唯一主人。所以当另外1个人前来索取时，他就舍不得了。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就是经济、秩序、文化、语言、价值观念、专业训练，甚至生活习惯等，这些都不适合回归的知青了。

知青们的回归，也使本来紧张的住房变得更为拥挤，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在家里也成了多余的。是一群“多余的废物”。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小少离家老大归”的知青没时间稍事休息，就要面对另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正如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所描绘的那样，“知青们的回归，挤炸了母亲的宿舍、挤裂了兄弟的情义、挤破了家庭关系。”

1969届是“文化大革命”自己培养的首批初中生，当年他们能够熟练地背诵“老三篇”却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没学过地理，却敢扒火车出门“大串联”，不懂句子成分的划分，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却顶着“知识」青年的招牌。返城后他们发现事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幸福。而是面临着就业、住房、成家等诸多难关，农村里学到的生存技能，在城里毫无用处。

这些俱往矣的知青们，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或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穷困潦倒，不堪生活的重负。人们有理由知道这些知青续写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同学召，橡胶连胶工。当年是现任中共某区区委书记颖仪在街道羊毛衫厂工作时的同事。羊毛衫厂并不因为向国家输送了颖仪这样的优秀的人才而壮大，最终还是关门了。因为他没有后门，且毫无必须的技能，只得三天两头

地跑劳务市场，好容易觅得一个推销员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与业绩挂钩，很辛苦。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没有文凭。

同学素，橡胶连胶工。在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人中素有“三美人之一”的称号。返城后进入某无线电厂，姑娘因各种原因，匆忙地嫁人后，婚姻又早早破裂。她与年龄尚幼的女儿相依为命。“我们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挑选别人？只有被别人挑选的资格。”她嘴角噙着的一丝微笑折射出她某种复杂、讥嘲的心态。她因单位效益不好而下岗，现在某国际俱乐部当通宵收银员，工作时间为每周6天，每天18点到凌晨2点。严酷的生活使她屏弃了姑娘时代的浪漫，变得很坚强也很实在。

人过中年的素同学依然保持着她那使人惊讶的美丽与矜持，挑起本不应由她一个人挑的生活担子。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社会，一个女性能够自尊自强承担起生活的重压，独自面对人欲横流的世界。

对这样的女性，我们即使不用“完美”这个赞美词，至少也应该称之为“优秀”。谁说女人是弱者？望着端庄的她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达观、迷人的微笑，我不由地暗忖：在旁人看不见的时候，素同学是怎样的内心呢？我心中涌出无限的敬意。由此，在她身上，我看见了知青特有的精神。不是吗？

“我们有资格宣称‘青春无悔’吗？如此，这世上还有‘有悔’的事吗？”她说，“我们已经被浪费了，只能希望我们的后代避免这荒唐的‘青春有悔’，让他们真正喊出这时代的‘青春无悔’。”

一些社会学家总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有宗法思想，尤其在对孩子的期望和教育上，总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理想强加在孩子们身上，希望他们光宗耀祖，把孩子看成私有的而不是社会的。搞得孩子压力沉重失去个性。这实在是有些荒谬。

下一代不是上一代生命和理想的延续吗？不如此，人类社会何以进步？所以西方人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我们常听到西方人对他们的孩子说：“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为什么“骄傲”？原来下一代做了上一代做不到的事，而且上一代很有面子才骄傲。这就是人类的共性，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我们中国不也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吗？

她经常这样教育女儿：“不能事事靠别人帮忙，万事还得靠自己”。因为她已经没了青春，而婚姻的失败也使她没时间搏文凭。所以女儿很乖，很争气。

同学诚，橡胶连胶工。返城后被安置在某街道厂。他努力地学技术、学管理，希望能从有所作为到“大有作为”。果然，因他不懈的努力，被上级任命为副厂长。但他的运气就不如某书记或者某局长那么好了。因为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经济形势的低落开始了，国营大厂尚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何论技术及设备均落后的街道企业？他

明白，离开这个厂，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因此他四处奔波，拼命为厂里揽业务，但依然不能维持正常生产。于是厂子关闭，他失业了。但尚有读书的孩子，家里的日常开销全凭在国营单位的妻子的不足千元的收入。为节约开支，他戒掉烟酒，拼命地寻找工作。到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以尽男人的责任，很艰难。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没有文凭。

“自失业以来，我在外面不断地找工作，最远地地方我到过松江，到底有多远呢？这么说吧，交通方面是地铁+高速公路，而且一点不耽搁来回是4小时，车费是18元，但感觉上是被别人羞辱一番，有太多的失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社会对近50岁的失业男人来说，已经把门关上了。”坐在诚同学的家里，我四处打量着，因动迁分配的房子没怎么装修，家具仍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五件套”，现在一般人家里已是很难找到的18英寸的旧彩电时不时要击上一掌，才能发挥着“余热”，家里没什么的现代消费品，但却有台电脑！

“二手货，儿子读书要用。”他见我准备去摆弄电脑，连忙阻止我说道，“我们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了，只想下一代能好好读书，能够光宗耀祖，有个好工作。”生活是如此的严峻和困难，可他仍然达观。

他说：“现在大家都追求成功，可又有几个人达成所愿呢？那么让我来接受失败好了，成功与失败是这个社会的两面，是生态平衡。因为我努力过了，运气和努力在很多时候是不双至的，有时运气比努力更重要。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是成功者，那就没有成功者了，这岂不可怕？至少，我还有衬托成功人士的作用吧。”是的，大凡成功或准成功者，眼睛既要紧叮走在他前面的人而惟恐被拉开距离，甚至私下里还在念叨着如何取而代之；又要谨防着后面的人追上来或被彼取代，若是宵小之辈，不定还要向前发暗箭；向后设障碍。真累。

诚同学悟道了。失败与否，存乎一心。我自叹弗如。

难道知青们缺少的仅仅是文化吗？何况缺少文化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吗？我头脑里电光火石似的倏地闪过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曾是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某外资地产集团公司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后来又到了另一个外资房产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日常工作除了维持公司正常的秩序外，说白了，不过是充当‘为虎作伥’的‘刽子手’而已。前前后后的5年，我干得最多也是压力最大的是处理劳资双方的劳动争议。”

进入公司的第一天，外方总经理就对我说：‘你是公司的行政、人力资源总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是工会主席……’真是言简意骇。照理说，在处理辞退员工的事情上，应该严格地按国家的法律办事。可我面临着职务和良心的双重压力。在就业难的今天，如果我不能使老板满意，那么自己也就危险了，因为老板永远是正确的。我也是个打工的，何况‘牺牲’了自己，并不能改变某个将被辞退的员工的命运，老板是可以‘换马’的。所以我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拼命钻法律的空子，有时甚至是很‘无耻’地把老板的愿望变成现实——顺便说一句，我还从

来没有在劳动争议的官司中输过——这么做还美其名曰‘在公司，维护公司的利益……’试问，哪个公司的人事或行政主官不是这样的？也许我还不是最‘丧尽天良的’……现在好了，至少再也不用违背自己的良知了。”安同学苦笑着。

“我轻松了，不需要再每天早起去报到上班了，心里反而空荡荡的有些失落。有些怪怪的感觉，看来马克思理论说得没错，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劳动是人的乐趣而不是生存的需要。不管怎么说，整天闷在房子里心情是好不起来的。”他说这话时，语气的沉重是明显能感觉到的。

同学安，砖瓦连砖瓦工。顶替母亲进了某国营单位。从仓库保管员一直到总经理助理。他深感知识的重要，于是自学，从初中一直到大学。由于企业效益的不景气，经动员主动带头下岗，在市场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当过踌躇满志的外企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办公室主任，干过“低三下四”满街乱窜的推销员。他最大的焦虑是失业，激烈的竞争使他感到力不从心。但最终因所在的在2000年6月公司被兼并，他毕竟失业了。职务和岗位的大起大伏以及生活角色的剧烈变换使他深感悲怅和世态炎凉。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有着一大把诸如大学文凭、经济师职称、计算机证、ISO9000内审员证等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所应具备的资历，但却找不到工作。

“昨天我在某环卫公司报了名，预交了60元报名费。”在电话里他对我说，“是景观道路的保洁工，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间月薪400元……他们说，3个月之内通知我是否录用，倘若录用了而我不去，那么这60元钱不退，不录用则退款。”他接着说：“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不认识我了——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干巴’……我知道，他们预收所谓报名费是非法的，但我愿意，与其让别人作贱自己，不如自己作贱自己。何况凭力气吃饭并不丢人，是不是？”他惟恐我打断他的话：“琪同学不是说吗？我们这些人什么苦没吃过？不是说‘能上能下’吗？……至少我努力地去找工作了……对了，你在写作，如果有可能发表的话，请把我的确确实实努力地去找工作了的心情告诉大家。”他的语气有些颓唐，但是否也有些偏执？可见，C同学还没修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心气颇高的安同学居然愿意去扫马路，太可惜了。自然，从理论上说，工作并无贵贱高低之分，因为“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毛泽东早就教导过我们的。不是吗？死于非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还“平起平坐”呢！然而，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是说劳动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吗？“脑力劳动是倍加的体力劳动。」——至少教材是这么定义的。难道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提高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只能去做诸如清扫马路之类的简单劳动吗？这个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浮躁、奢侈的？

如果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是一种浪费，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只能去扫马路，不更是一种教育成果的浪费和贬值吗？西方的哲学家告诉我们：“人不能2次渡过同一条河。”那么，人力资源是不是可以2次被浪费？关于这点，那些西方的哲学家没说。但是东方的伟人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然而，最可宝贵人却被重复地浪费。

这实在是悖论。我叹息着。古人曰：大凡人者，必有四欲，谓之“食欲、利欲、色欲、名欲」。安同学现在是什么“欲”？

自此，年近50岁的安同学的人生履历大致上可以这么概括了：下放知青——仓库保管——储运结算——业务访销——国营某沪东分公司经理——国营某公司总经理助理——某外资地产公司行政、人力资源总监——某直销公司业务推销员——某外资房产公司办公室主任——某环卫公司（待录用）的马路清扫工。

（行文至此，已经3个月过去了，我得到消息，安同学最终没有被某环卫公司录用，不知道他是否去领回那60元的报名费，我没打电话去，怕触动他心中的痛苦。一个大学生，居然连扫马路的机会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不是普遍现象，不具有典型性。我不知道。但工程师当门卫可是经常见著于报端的。）而且某区政府对于再就业的的承诺是“不挑不拣，一星期就业。”可是安同学失业已经好几年了。也许他只是“偶然」被遗忘在“在一星期就业」以外的？我宁愿相信他是“偶然”被遗忘的。

安同学很想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但孩子尚幼，需要他挣钱，因此他提前“预支”了父母的“遗产”，每天暂时混迹于股市，希望赚点生活费。但从2001年6月开始到眼下近70%下跌的股灾，股市如崩盘似的，使他生活得十分落魄，进入了政府扶贫解困之列。他那同样失业的妻子曾背着他向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被他知道后，安大发脾气，认为妻子丢了他的脸。为此，夫妇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他胜利了。虽然此前妻子提出补助申请的结果是仍被政府拒绝。

他，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关怀。而且也拒绝同学之间的捐赠，比如珉同学就不止一次地想帮助他。因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矜持，也使他不准妻子进一步去向政府请求。但我想他是需要资助的，只是面子问题。这，到底对不对呢？

当我们在给“知识分子”下定义时，时常以掌握多少学问来划分。但我以为，界定一个人是否是“知识分子”除了“学问”外，是看他是否把这种“学问”转化成“良知”。可人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真的是“百无一用”吗？

安同学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优秀品质，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敢爱敢狠。他的感情一点也不麻木。但同样有着知识分子的酸腐气。他厌恶体力劳动，认为那是有辱斯文。政府承诺“不挑不拣，一周解决再就业。”但他放不下“臭老九”的架子。可撇开“臭老九”的架子不说，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他久不锻炼的体能来说是不是能够胜任呢？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经历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因此老人告戒后辈：“人生处处是青山。”安同学的青山在明天的股市。所以他拼命压缩家庭开支，祈祷着股市的回升。

“经济困难，女儿在读书，忙于养家糊口，这就是生活啊。”我默然，也许生活本该如此。哀莫大于心不死！

他与自己搏斗，心力交瘁。

安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真挚、有才华、有激情，真可谓“一分素心，三分侠气”。在一个历经磨难的老知青身上，保留这些品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第11章　谁暖渐趋渐冷心

茫然——流金岁月——岁月如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现在是市场经济，要生存就得竞争”，人们作如是说。但问题是参与竞争的起点是不是公平？当绝大多数知青从广阔天地回到城市时，已不再是当年的青春飞扬的男女学生，而是皮肤黝黑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积蓄的男人和女人。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不知道知青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会不会为虚度青春而悔恨？会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许他们现在没时间考虑，但将来有一天，他们坐在冬日的暖阳下打盹或在夏日的傍晚坐在弄堂里摇着蒲扇注视着斜阳时一定会的。也许在他们想留住最后的余辉？用心去温暖渐趋渐冷的心？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珍惜什么，可到了这个时候，能珍惜什么呢？他们有值得珍惜的吗？而我现在至少感到茫然。

我不知道谁创造了“岁月如歌”这个词组，很多文人骚客都喜欢用这个词来来形容创业的艰难和成功的喜悦。但知青们流逝的岁月是不是“如歌”呢？如果是“歌”的话，是一支怎样的歌呢？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是这样告诉我们：“一支深情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一支充满蹉跎岁月的歌”。

哲学家“居庙堂之高”而侃侃而谈，他们高瞻远瞩地把辩证法教给芸芸众生：“回顾是为了发展。”那么，“处江湖之远”的我们怀着“知青情结”，回顾上山下乡给知青们带来的戕害，是为了谁的发展？国家？民族？还是知青本身？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因为真理在宏观上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整体和局部的相对关系。毫无疑问，当整体利益发生危机时，局部

利益理所当然地让位与整体利益，并承担起有时是超负荷的牺牲。可当整体利益被满足后，“局部”们的利益呢？然而“局部”们被告知：“个人对于整体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引申开去，部分对于整体而言也是可以去牺牲和被放弃的。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错误。”

可以佐证的是《人民日报》1970年7月9日的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然而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则完全摧毁了知青们希望得到纠正期盼。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但是刘亚洲将军却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

我的问题是：当刘亚洲是个人时，他可以有许多真知灼见，如果作为政府的代表或者发言人，他还会这么说吗？这职务人和自然人的人格分裂或者差别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不幸的根源之一。

一艘满员的巨轮在风雨飘摇或惊涛骇浪中航行，为尽快到达目标港，有时在需要时要在中途动员一些乘客下船。当这些主动下船的乘客看着因轻装而迅速变小的巨轮，心中一定是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这时，航运当局会来安慰他们，或给他们一些补偿，再安排他们用别方式到达目的地。

知青不就是那些被动员“下船”的“乘客”或某项试验的“试验品”吗？当初为社会为城市乃至为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承担了上山下乡的重担，将10年最宝贵的青春埋葬在了人迹罕见的从北国雪原到南蛮荒漠的广袤的农村，为“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现在社会不需要他们了，对他们说：你们是“废弃物”，要么自生自灭，要么自寻出路。

正如任何航运当局会对那些被卸下的乘客或主试机关对某项“试验”的“试验品”作一些使他们聊以自慰的补

偿一样，可知青呢？由此，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被遗弃的酸楚在他们心中油然升腾。

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响应为国家分忧的号召。社会动荡时，国家希望我们到农村去，减轻城市的负担，口号是多么地响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好，我们去！改革开放，国家要减员增效，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有困难，‘主人’不站出来谁站出来？好，我们下岗！”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才明白：当初他们“一颗红心向着党，打起背包走天涯。”的行动是何等的愚蠢。也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

当“下放”的演变成“下岗”，对记忆深处的碎片又该如何理解？太多的偶然，构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茫和必然，惟其如此，才更显出他们心中的苦痛。

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革命到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人们常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话来褒奖一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不知道知青们是不是可以得到社会的褒奖和安慰？就像我同样不知道知青们算不算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算不算呢？可现在知青们却仍是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了无知者的笑柄。

说句心里话，我并不反对用下岗这种方式来实现企业职工的优胜劣汰，但像现在这样在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健全的情况下，就一股脑的把那些为企业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像丢垃圾一样无情的抛弃，每个月只给百元左右的生活费，实在是太无情、太残忍了，有“中国特色”也不应该是有这种特色吧？有个叫网名叫“YSN”的四川知青是这么说的，“我们8年的知青生活，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在问自己。好象除了能够承受一切磨难外，我们其实一无所有！今年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优惠：独生子女费可以领到18岁。

“我们单位干脆在‘六一’前发礼品时，通知写的是‘凡是有18岁以下子女的机关干部，请到妇联办公室领儿童节礼品’，看到这个通知，我不禁哑然失笑：今天的孩子18岁还是儿童，我们当年18岁却相当于劳改犯。时代不同，反差如此巨大！我们正是因为当年无知无识的到农村、边疆，今天才一无所有落到下岗。”虽然共和国的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国企改革的成功，是不能忘了广大下岗职工作出的巨大牺牲。但“诗圣”却大声祝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广厦千万间，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至此我突然明白了，愿望之所以是“愿望”就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性。而正是这种不可实现性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知青们用青春播种希望，收获却是苦难和失望。

“青春无悔？当初我们能够选择吗？”琪同学故作轻松。

泰戈尔说：“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天去领受谢词。”如今他们“廉颇老矣”，虽然“尚能饭”，但心中壮丽的光束却渐渐暗淡，最终势必倏然熄灭。但他们仍不得不鼓起几乎湮灭的余勇，力图找回已经逝去的青春，与更青春勃发的当代青年竞争。尽管他们经历广阔、经验丰富，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却全处劣势。因为社会告诉他们，年龄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鲜花怒放的树下，时光老人拾起溪流中的落英，轻轻放在手心。让它停留一下吧，不要这么快流逝，因为他们的肩负实在太重……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就业是生活的保障。但社会学却更在提醒着：就业不仅仅是生活的保障，它更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是社会参与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希望和责任。

自懂人事以来，便感到生命是不断的重复，每天都大致上干着同样的事，不是吗？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也必定是一样。是不是只有不断的改变环境，不断地应付新的挑战，或把自己不断陷进不同的境况内，才可感受到生命新鲜动人的一面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2个决议，第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党以来的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第二个是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1949年之后我们国家所有的歧途和失误，都做了公正客观的结论。

但这个决议对除上山下乡外的、在这些事件中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安慰或补偿，惟独上山下乡的参与者被遗漏或遗忘了。任谁也不敢妄断这种“遗漏或遗忘”是否是故意的，但绝大多数的知青们困苦的现状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突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2个“决议”在主题上是何等的相似？为什么有了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后不能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又重犯旧错？以至于再要用1981年《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去纠正这种并不“新鲜”的旧错？这就使人感到生出一种奇怪、一种担忧——是不是再过若干年后再出一个什么决议再去纠正什么错？为什么这种“决议”不能有效防止错误的重犯？

西方人说，第一次犯错是可以因为幼稚而得到原谅的，那么第二次呢？他们认为，不排除有主观故意。

第12章　与尔同消万古愁

干杯——回首——“沉痛”——难忘云南——理论与实践——朱自清说——祭

庚辰年4月（公元2000年5月），是他们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按当年的郑重约定，同学们又照例相聚。此刻，“同学”一词极具感召力，彼此间的亲密一触即发，当年的知青们完全放下了中年人应有的含蓄和城府，好象突然减去30岁似的各自释放出略显生疏的率真。哪怕过去曾经”反目”过？真所谓“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知青之间，信任是金。大家如数家珍地述说着当年的旧事及现在的境遇，勾肩搭背，自斟自酌。有道是，岁月斟满了风雨中的酒杯……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在杯盏交错、嬉闹玩笑中，早生华发的同学们很动情地在互祝平安，互致慰籍，彼此交换着1年来的变化。

无论在各自的领域里你是怎样的角色或怎样的成功或怎样的试图借助人生的余辉再创辉煌而力不从心。但在这里，在今天的这个范围内只有一种身份——同学加知青。因为，共同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回城后的同学之间因各自的境遇不同而毕竟存在着差异。30年前，我们吃一样的饭，一样踩进雨季的泥泞，一样头顶旱季的烈日，有着一样的精神会餐，帮起忙来一样的竭尽所能。现在，一些同学事业蒸蒸日上，在他们人生的锦缎上继续添织着鲜艳的花朵，自然这是他们的才华使然。但是对一些只求温饱的同学来说，恐怕不一定是能力问题。于是个别同学碍于自惭形秽而不愿赴约。我叹息，我十分理解。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想我们的，他们的心在我们中间。

30年后的今天，当他们回首往事，抹不去的是知青生活的艰难和与此相关的心路历程。也许明天各自都会为今天的话而一笑了之，或者后悔或者不把它当一回事，仍然要去尽全力为生活拼搏而无暇顾及其他，但此时确是真诚的。我在感受到当年同学间相濡以沫的温情是多么的珍贵之余，似乎聆听到了大家心底疲惫的叹息。

其实我心中满不是滋味。一直以来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的确，如今的中国物质是丰富了，商店里的商品多得你买都买不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像是进步了。但是想想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段时间，虽然物质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温饱无忧，很少有人会为生计发愁；如今倒好像过回去似的，越来越多的人要为生存而打拼，这种还要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群在如今的大城市里是越来越多了。

努力地在维持温饱中“苟延残喘”，是他们早在30年前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他们差不多没有希望和梦想了，但依然风雨兼程，重负着向前。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365里路啊，从故乡到异乡，365里路啊，从少年到白头……”

因此，“与尔同消万古愁。”万古愁。万古愁！”

来，我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举杯，请喝下这杯酒。还有你们，不愿赴约的同学；还有你们，曾经

把血水、汗水、泪水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那许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知青们，请举起杯，不管是甜是苦，是生是死，是芳是酸，是辣是和，让我们干下这杯知青的酒，祭奠的酒。有道是：“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毕竟生命中的10年有你共度。

“有的往事可能遗忘，那段情缘缠绕在心上；有的歌曲已不再会唱，那动人的音调却回荡在耳旁。春梦无痕，秋月如霜，总想追忆，更觉迷茫，可是你那俊俏的模样，时常在我心中徜徉。”

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亚平宁半岛上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已故的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安东尼奥尼。老人在30年前拍了一部名为《中国》的记录片。影片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解说词：“中国人既怀念过去，又忠于现在。”

冥冥中透过历史的沉淀，老人的话依然回响在人们的耳边：“中国人既怀念过去，又忠于现在。”这句话从本质上开掘出中国人良善温顺和深明大义的民族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怀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一些失去的东西的“痛惜”呢？这种“忠于”同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的无奈呢？

由此我坚信，在知青们的心中，无一例外淤集着人生岁月所沉淀下来的某种共同情感，这种情感纠结起来，挥之不去，如梦如屑，就像化石，化成灵魂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人把它称之为“知青情结”。可见，”知青情结”并非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眷恋，而是由人生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和心路历程以及此后的遭遇作的一次慨叹和别一种感悟。

正如有个知青作家说的：“我想，人的记忆和情感真的会死灭么？譬如火，暴风刮灭，大雪压灭，那些垂死的灰烬仍可能复燃。就算一个死囚，已经套上绞索，他的心灵还是有权利奔向自由天地的。”

知青伟，团宣传队小号演奏员。他已在一周前赴美。

“当年上山下乡，快50岁的人了，没想到今天又要抛妻别子、飘洋过海去‘洋插队’！”他神情十分复杂。

伟知青原供职于纺织系统某科研单位，因单位效益问题而下岗，后自费学习烹饪而取得厨师证书。在单位生意清淡的”三产”饭店里度日。他母亲在美国开了一间餐馆，生意不错，与其请别人帮忙，不如让当厨师的儿子来大洋彼岸一起干。临行前的中秋节，是一个薰风沉醉的晚上，在他家的阳台上，他倚着栏杆顾望着楼下小区的夜景。“我们哪……这辈子……到过许多地方，可我总忘不了农场的夜晚。”白日终于辉煌地沉下去了，黑夜像一泓温柔的潮水悄悄地涨起来。逐渐地淹没了万物。风乍起，胶林便发出一阵絮语。漆黑的天幕笼罩着大地，可今夜星光灿烂，它眨着晶亮的眼睛，仿佛在窥视什么。假使有月亮，那夜色就别有一种情趣了。

远处山脉平缓的轮廓就象远古时代巨兽的脊梁，这又引起人们多少遐思？万物象镀了一层银色，显得格外迷

蒙。路边婆娑的凤尾竹长掩着情侣们热切眷恋、也许还带点苦涩的拥吻。远近池塘里的蛙鸣彼起此伏，错落有致，宛如在演奏交响曲。

斜挂空际的明月把池塘旁的房舍投影到水面上，形成与现实并存的另一个影子世界，处处呈现出梦一般缥缈的意境，美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域。可茅屋内却是宁静的，油灯摇曳，土墙斑剥，在不显眼的地方，蜘蛛悄悄地织着它的网，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和不可知。

感受着这静谧的，但又充满着各种生命的细微声响和青春骚动的环境以及天地间明净广袤的天籁之音，使人柔柔地觉察到某种情感的升华。这些常引起他许多模糊的伤感和不明确的思想……是谁和着口琴忧伤的伴奏，轻轻地哼起了那叩击心灵的歌？哦，那是属于一代人的《知青之歌》，唱着它，有的回城了，唱着它，有的扎根了，唱着它，有的过早的走完了人生而升向永恒……

20年了，回到故乡整整20年了，可蓦然回首一切都历历在目，或许那里的山水，人们已把他们忘了，或者淡漠了，最多在饭后茶余，坐在宽大的芭蕉树叶下纳凉时，偶然会提起知青们的许多趣闻，而后打着哈欠各自钻进蚊帐，这时也许会有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可他怎能忘记那永别的充满活力的十年，怎能忘记那长眠于地下的同学和南疆独特的风貌呢？流星虽然稍显即逝，可它毕竟燃烧过的。他是多想再见到那淡淡的晨霭、绚烂的朝霞、神秘的月光和不可知的夜色以及墨水瓶做的小油灯；听到在散发着干草味的茅屋中常飘起的忧伤的歌和兵团战士都熟悉的起床号音……

“也许这听上去有点虚伪？”他看着我发问。

那已是过去的了，可时常象云一样在半睡半醒中飘洒在他的梦中。在那乡间的田埂上，林中的小路上，边境的界碑旁，毕竟留下他青春的血汗和泪水，尽管辛酸多于甜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即将赴美的伟知青喃喃地吟诵着苏轼的《江城子》。长歌当哭！是啊，长歌当哭，谁说来着？低吟浅唱，看岁月的花飘零无尽的守望；仰天长啸，看知青的泪划过当年的脸庞！

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此岸、彼岸，有什么区别？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一部分的梦一定会留给彩云之南！——如果他还有梦的话。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环顾四周，我那些善良而又纯朴的同学们，他们经历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各个时期，虽然大好的年华被浪费了，但仍然在国家需要他们时，承担起历史和社会赋予他们的各种责任，比如下岗，比如失业……等等。虽然他们偶有牢骚，但仍遵循着公民的义务，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规挣钱。他们鄙视歪门邪道；教育子女认真读书，争取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们普普通通毫无光环，但是不是也可以被誉为鲁迅曾称赞过的“中国人的脊梁”？虽然

他们并不出众。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赤子之心不泯。

在得知云南临沧地区发生地震。因为对云南高原那片红土地的复杂情感，亲切的记忆告诉他们："啊，我们临沧地震了……"同学们纷纷传递着这个消息。是啊，我们的临沧。我们曾经战斗过的云南！

同学们立刻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譬如我少出一天车……"开出租车的坚同学拿出了一天的营业额。

"譬如我今天我套牢某只股票……"安同学捐出了股市的一点"割肉"钱。

"我没什么钱，但我向居委送去了衣物和棉被。"诚同学如实说着。

"希望我们的心意不要成为『贪官』们桌上的这个……"铭同学冷冷地看着手中杯子里黄澄澄冒着气泡的啤酒。

中华民族的先贤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能他们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穷"，但根本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达"，但他们一样"兼济天下"。因为"位卑未敢望忧国"。

有个知青说："我们的沉痛，唯有在那沉痛过的那方土地上可以埋存。"的确，知青们很"沉痛"，颇有还没大干一场，就有老之将至之感。昨日的苦痛还未来得及清算，明天的新事物又扑面而来，实在太累。但他们依然鄙视平庸，渴望进取和辉煌。在自己希望快要丧失殆尽时，却大声鼓励别人不要失去信心。

也许有人会问："自己没有了希望，却鼓励别人不要失去信心，这不是二律背反吗？"不！一点也不！因为他们没时间过于沉溺在怨天尤人中，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这种借鼓励别人而达到鼓励自己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生命诚可贵"；因为他们具备了"知青"吃苦的素质，因为他们"贫贱不能移"而有自尊，因为他们失败不气馁而要争气，因为他们明白鲜花从来为成功者而开放，这不是势利，是社会准则，是千古不变的硬道理。所以他们努力着。所以他们要在借鼓励别人的时候，更要鞭策自己。

下放10年，是这一代人最沉痛的记忆，你也许无法忘却那曾经的阴暗和苦难，但生活总要继续。哪怕"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所以《周易》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种可贵的品格是在稚气与纯真、无奈与蹉跎、苦难与奋斗中磨砺出来的。所以他们是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代人，是一代为理想献身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一座他们自己竖起的无形但永不磨损的精神丰碑——尽管这被社会视为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们的理想被视为笑柄，他们的行为被嘲笑，他们的价值观被戏谑，因为社会说："现在还谈精神？都什么年代了？嗤！"面对失业和轻蔑，他们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时光可以痊愈一切，然而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愈合。

我突然感到了11届3中全会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至今还在发出耀眼的光芒和振聋发聩的巨大回响。

“经历是一种巨大的价值和财富，而不管其是幸福还是苦难。”电视里的年轻人作深沉状地在侃侃而谈。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近况比较满意。我以为至少有2种人大约可以说这种话，一种是自身有成就感的人；一种是不知什么是“经历”的人。但自身有成就感的人是不想谈、也不敢谈”经历”的，因为他们太忙或者怕一旦谈”经历”就露出自己的”无背景”的背景；而不知什么是”经历”的人却喜欢大谈“经历”。

现在的问题在于”价值”是否有价值？”价值”的实现首先在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后，“价值”才成为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们苦难的”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了吗？突然头脑里跳出一个词——“破罐子”，街角的一个那种随处可见的”破罐子”，谁愿意都可以踢上一脚的“破罐子”，踢完了，“破罐子”们还得忍着。

我偶然在INTERNET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从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为那场狂热的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人称之为“祭坛上的青春”。它耽误了一代人、至少影响了三代人。淹没了一批又一批本来聪颖有为的青年，也给他们后来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幸。然而，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也不容否定，它磨练了人，今天，你只要关注一下身边的‘知青人’，他们身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对他们不公，但他们依然执着的面对历史。这也许是当代青年需要大力培养的一种基本素质。

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农村一次最广泛的“文明”革命。青年学生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城市文明、推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这恐怕是知青上山下乡决策者当时没有料到的。”果真上山下乡给农村”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城市文明、推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恐怕未必！我们倒是希望我们曾经不是一事无成的，的确对广大的“老、少、边、穷”地区作出了贡献。那么广大知青就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失落感了，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聊以自慰历史：“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城市文明、推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可事实是知青在农村与农民争夺生存空间——抬高了当地的物价，使当地生活资料更加匮乏；到处偷窃或生事（虽然仅是少数知青的行为）——破坏了当地的民风；大量地“开荒”——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以至那些开垦了的土地又被退了耕。由此可见，”上山下乡”安排知青到农村，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评价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话，那么只要一个词就够了——“浪费”，彻底、全面地浪费！特别当知青在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地如高原洪水般地从天南地北泄下的同时，农村的”文明”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也就嘎然而止了——如果曾经有过而现在又终止的话，那么对农村则是另一种”伤害”。

时至今日，农村的现状清醒地指出：下放是他们年华的浪费，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农村。他们走后，农村恢复了其惯有的宁静，多出的却是知青同伴和战友的坟茔。

我们是否把理论太虚妄化了？当社会实践在进行时，理论反而有些是似而非了。

我曾读到过英年早逝的北京籍知青作家王小波的这么一段话：“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比如，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的确！它无论对知青、对城市、对农村、对国家，以至对整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飞来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比如，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何等的举重若轻！了不起的王小波。

2002年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部得到普遍好评的作品。曾经燃烧过的“石光荣”们为失去燃烧的环境而“愤愤不平”，那么“金训华”们的激情呢？“金训华”们还有激情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渴望热血和激情如昨天般的飞扬，但使他们的激情重新燃烧以及飞扬起来的环境在哪？我衷心地祈祷。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我突然想明白了诗人的意思：如果这些伤痛在有一天被我们的成就感所湮没或不屑一顾时，社会心理学认为的“这些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才会出现，到那时，到那时是何等的轻松自在。但是我们没有，这十字架我们仍还须背着。

知青们此时此刻都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的影片纪念仪式后引用他父亲当年的一句话，形容这些仍健在老兵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朱自清低声对知青们说。

行文至此，夜色正酣，窗外万籁俱寂。光阴倏忽，青春不再。由此，我写下以上的文字，祭奠我和我那曾经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亲爱的知青伙伴们那遥远而永逝的青春。为生者，为死者，为在一切感情和物质上得意和不得意以及贫困的知青们。为人们不要忘了散落在他们周围的许多把青春和生命埋葬从南蛮荒原到北国黑土上的知青们。为了我们青春的纪念。

是为庚戌30年祭。

此去关山千万里　少年壮志话英雄

我以我血荐轩辕　艰辛岁月思前事

梦断云岭家乡远　殊途同归人安在

青春做伴好还乡　魂牵梦萦念悠悠

艰难创业百战多　岁月如歌尽蹉跎

谁暖渐趋渐冷心　与尔同消万古愁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四川，我童年的摇篮

我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北京的第一个金色的秋天。正当人民共和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之时，1950年始料未及的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正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如同万千热血青年一样，爸爸、妈妈相继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加了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年仅23岁的妈妈在赴朝参战之前，千里迢迢从北京把襁褓中的我送回四川老家。当时北京到四川还没有火车，蜀道难，几经周折，她先乘火车到汉口，而后逆江而上，乘船过三峡，然后再从重庆乘汽车回到富顺，颇为艰辛。妈妈为了他们那代人的理想，还是把嗷嗷待哺的我送到我的外公、外婆身边。外公、外婆家在四川省自贡地区的富顺县。自贡是恐龙的故乡，自贡有上千年开井采盐的历史，有盐都之称。那里是丘陵地貌，漫山的竹林，星罗棋布的稻田，黄灿灿的油菜花，勤劳朴实的庄稼人，人杰地灵，美丽的巴山蜀水成了我童年的故乡。

我的外公胡学驹从小家境贫寒，年幼时丧母，但却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做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他很小就帮助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10岁进药店当学徒，17岁当兵走进了军阀混战各踞一方的川军队伍。凭着为人豪爽讲义气的性格和那份独有的灵气，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在川军里从大头兵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升，做到了独立团团长的位置，其间还在成都附近的中江县当过县长，在成都当过参议。

外公的军旅生涯流动性大，直到35岁才结婚。我妈妈在家中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位大她五、六岁的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妈妈和大舅舅在外公面前嘴甜，最受宠爱。外公、外婆带着他们先后出生的五个儿女，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成都，我妈妈的小学生活基本上都是在花重锦官城的成都度过的。

妈妈在外公那里受宠，而这次妈妈带着未满周岁的我回到老家四川富顺，外公、外婆及家里众多的亲戚都喜出望外。一则妈妈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又投身革命，参加华北革大，后又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阔别多年的外公、外婆见到思念以久的“二娃子”回到他们身边，怎能不百感交集，由衷欢喜。其二，带回四川的我是外公、外婆子女们中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第三代中的长孙，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居然我这个外孙在老家的五年中被改姓为胡。

外公、外婆一家住在四川富顺铁牛寨。妈妈和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如同过年一般，家里又是杀猪，又是请客。外公对她二女儿唯一不满意的是，我妈妈穿了一身列宁装，执拗的外公一定要让她换一身家乡的女儿装，还是

外婆出来打圆场，她告诉外公，现在在外面工作的干部都穿这样的衣服。那时虽然是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外公、外婆的五个儿女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姐弟五个都先后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妈妈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便匆匆忙忙告别了外公、外婆，告别了还不懂事的我，风尘仆仆赶回北京，不久便穿上了志愿军的军装，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她“最可爱的人”的军旅生涯。

我在四川生活了五年，我这个属“牛”的孩子，恰恰同老家“铁牛寨”的名字不期而合。铁牛寨城墙环抱，在我幼小心灵中，十分有气势。平常带我玩和照顾我的是妈妈的表姐李时庄，我在四川时与她朝夕相处。她对我非常好，常带我到城墙上去玩。记得高大的城墙上灌木丛生，残垣断壁之间柳暗花明。外公、外婆的宅院很大，房后有一个大花园，院子里树木参天，四季鸟语花香，有妈妈自幼就喜欢的白玉兰树、桂元树、桂花树、桔子树等。

我最喜欢的是四川的竹子，四川人常说，有人住的地方就有竹子，我想，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再贴切不过了。四川老家的竹子，在我的眼里，有的地方是竹林，有的却是真真实实的竹海。竹子无处不在，青青绿绿，节节攀升。竹笋破土而生，风声乍起，竹涛涌动，竹林竹叶遮天蔽日，美丽的竹子是四川的代表，顽强不息的竹子似乎也是四川人性格的象征。我在我亲爱的外公、外婆膝下长大也伴着我儿时的伙伴——四川的竹子长大。

富顺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在四川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而我的外公却是宁愿自己辛苦，卖田卖地，也坚持把他们的五个儿女送出上学。即便是在他辞官返乡，又遇上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家境也日渐衰落的困难时候，也没有丝毫动摇让自己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学有所成的信念。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将中央政府从南京转移到了山城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就读过的“南开中学”也从天津迁到了重庆沙平坝。妈妈和她的弟妹们在自己的大姐和外公的支持下先后考入了这家蜚声海内外的名校，并为他们有所作为的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次外公从富顺到重庆来看他的儿女们，住在廉价的客栈里，吃着红薯充饥，却把在乡下卖田得到的大洋，交到上学的孩子们手里。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既慈祥，又严厉，少言寡语的人。

外公在家乡的人缘很好，他在军队里做官时，也很照顾乡里，尤其是接济家里那些贫穷的亲戚们，以至在成都时邻里们都奇怪，胡家为什么养了那么多人。解放后，尽管外公、外婆家在乡间还算富足，但由于外公很好的人品，加之他的五个子女全都当了兵，参加了革命，做为“革命军人家属”的外公、外婆几乎没有受到当时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的冲击。1954年，外公还被县里请去当了政协委员，这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实属不易。我从小就沾了外公的光，许多人把对外公的尊重转到对我的疼爱上。我妈妈说，我降生之前，妈妈曾梦到一匹长着翅膀的天马朝她飞来，而我一生中少有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在四川渡过的。

外公没有在专门的学校读过多少年书，但他酷爱读书，并在这方面天赋颇高。在他刚满40岁时，曾有五年弃官回家闭门读书，浏览了大量书籍。他对曾国藩的思想很是推崇，经常讲给子女们听。他对旧中国的腐败，官场的黑暗有切肤之痛，对子女们为新中国的奋斗之路寄以很大的希望，而对一到五岁时顽皮的我，他却实在是无奈，加上又有外婆和众亲戚的庇护，他也奈何不了我。

在长辈中，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过我的，当属外公、外婆了。外婆是她家里最小的女儿，她有四个哥哥，外婆的父亲早丧，母亲经商，家境还过得去，可惜她的几个兄长不争气，早已破产。外婆比外公小10岁，外婆人很聪慧，家务、绣花、做衣服无所不能。但如同许多能干的四川人一样，外公、外婆的脾气都不小，吵起架来互不相让，一般情况以外公的让步作罢，但也有一次例外。听大姨讲那一次是在成都家里，两人为家里琐事争吵起来，外公气得居然拿起了枪，亏得大姨苦苦哀告，夺下了外公的枪，才使这场战斗烟消云散。而我在四川时，外公、外婆闲居乡里，相安无事，外公常独自看书，我听外婆讲些似懂非懂的故事。外公、外婆除照顾我外，更多的是惦念他们在外工作的五个儿女。当时大姨为了外公和外婆，也为了我，常往家里寄钱，以贴补家用。

1955年我五岁时，家里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的女兵，外公、外婆告诉我这是我妈妈的妹妹，我的三姨，她是专程来四川老家接我回北京，回爸爸、妈妈那里去的。那时我这个满口四川话的川娃子还太小，许多事情记不住了，只记得外公、外婆一直把我送到富顺县城，并带我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我站在一个高高的长板凳上，小平头，穿着一个半长的棉布褂子，傻傻的样子，一左一右站着我慈爱的外公、外婆。

一岁到五岁，我在外公、外婆身边成长的童年生活像涛涛的嘉陵江水一样，时而蜿蜒奔腾、时而静静流淌有着秀美自然风光，悠久人文历史的天府之国四川，是我童年的摇篮，是我亲爱的故乡。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遥远的知青岁月：

风雪雁窝岛

1968年9月，我们一千五百多北京知青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当时的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呼盟在黑龙江省的西面，境内是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前面是蜿蜒宽阔的嫩江。而我们许多师院附中同学下乡的宝清、虎林在黑龙江省的东面，那里紧邻中苏界河乌苏里江。

1970年12月，我们青年点六位知青结伴而行，去宝清雁窝岛八五三农场探望在那里下乡的同学。12月的黑龙江到处是冰天雪地，白雪皑皑，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从阿荣旗跨越嫩江，到达距我们村最近的城市齐齐哈尔有三百多里路。那时在农村插队的穷知青兜里没什么钱，我们六个人先从齐齐哈尔扒客车混到了省府所在地哈尔滨。而后在哈尔滨设法溜上去边境小城东方红的客车。

这是一列见站就停的慢车，车里人很多，既有提着大包小裹的东北老乡，也有许多一看就是城里来的知青。那时在三江平原（俗称北大荒）下乡的知青有十几万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许多城市。着装举止能够很容易区分出老乡和知青，老乡大都穿一身黑色的中式裤袄，还有一些皮毛在外的套装。知青大都是一身蓝，或一身黄的军便服，女知青再多了条鲜艳的拉毛围巾。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学生娃娃脸，那些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江浙话，很容易分辨老乡和知青。

我们混了一路免费顺风车，多次在不相识的知青伙伴掩护下躲过列车员的查票。但火车经过佳木斯后还是出事了。火车进入夜间行驶，车窗上结着厚厚的冰霜，车内灯光昏暗，折腾了十多个小时的我们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都渐渐进入了梦乡。我突然被身旁一位刚结识不久的天津知青推醒，查票的来了，我看见乘务员、乘警一组人沿车厢正在查票。顾不得想太多，也来不及叫同来的五个伙伴，我溜进了车厢另一侧的厕所，将门反锁上，然后用手紧紧压住把手。过了没多久，听到有乘务员敲厕所的门，并用钥匙开门，由于我压住门锁，门没有被打开，大概他们认为门坏了，居然走了。

那时列车质量很差，厕所里呼呼冷风，我坚持了一会，听到门外没有了动静，便开门溜了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那几位天津知青告诉我，你们那哥几个、姐几个都被乘警带到餐车去了。我沿着他们给我指示的方向寻去，在9号车厢很快找到了餐车。餐车门口聚着一堆看热闹的人，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看热闹取乐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

我挤在人群中，看到我们那哥几位兄弟姐妹正在跟列车长调侃。列车长是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大姐，，个子高高的，略有些胖，大嗓门，典型的哈尔滨人。她正在宣讲铁道部和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有关购票管理规定。铁军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却以老谋深算自居，那年他也就22岁。他开始哭穷，说北京知青在农村插队多么不容易，挣一年工分买不了一瓶醋，爹妈托我们去宝清雁窝岛看下乡的弟妹，他们都是六九届的，才十五六岁。我听得差点乐出声来，我们插队虽然穷，但东北农村哪有他说得连壶醋都挣不出来的地方？他怎么又蹦出那么多六九届的弟妹。可看坐在那里的老金、小肖、冯燕、孟小玲，人人都表情严肃，一副诚实可怜的样子。情况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刚才高声教育他们的女列车长和帮忙训斥的乘警不出声了。只见那位女列车长眼圈有些泛红，声音柔和了许多，她说，你们别给我演戏了，我弟妹都在虎林（离雁窝岛很近的一个县）下乡，我知道知青穷，在农村下乡的知青更穷。她接着说，我有我的职责，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了。离开前她嘱咐乘警到东方红站后将我们送出检票口。

火车沿着东北的林海雪原向前奔驰，蒸汽机车的轰鸣、汽笛缭绕。终于在黎明时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东方红车站，这里距离雁窝岛最近。我们谢别了列车长和乘警。在冰天雪地的站前广场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程。

东方红距离雁窝岛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正在为难之际，站前广场的情景吸引了我们。广场上那些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大孩子们大都是知青，凭借着知青相同的装束，在几位热心的哈尔滨知青帮助下，我们搭上了一辆去雁窝岛八五三农场的卡车。驾驶室已挤满了三个人，我们六个人只好站在这辆解放牌大卡车后车厢内。车厢无蓬，他们是到火车站提货的，装着半车农机具。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加上卡车行驶中带起的风，朔风吹，林涛吼，真体会到刺骨的寒冷。

北京知青办发的那一身蓝色的棉装无法抵御东北零下二、三十度严寒，更何况坐敞篷车行驶在广漠的荒原上。这时我们才体会到东北的林海雪原可不都是浪漫。亏了我那顶狐狸皮帽子，火红的毛色，柔软的底绒，威武的形状，多少给了我些温暖。

三江平原的雪景颇为壮观，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榛柴、蒿草、芦苇在寒风中摇摆。近处的松树林枝干上压满了雪，却挡不住亮眼俊俏的深绿。一片片白桦树婷婷玉立，不理会暴风雪的侵袭。时而与汽车擦肩而过的胶轮拖拉机和屯里老乡四匹马拉的大车疾驰而过。远处的村庄升起缕缕炊烟和牛羊的欢叫声。在东方雪线和

蓝天交接处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这一切构成了北大荒壮阔的冬景图，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倒觉得空气格外新鲜，举目四望都充满生机。

雁窝岛曾被人们誉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地方。还有一句难忘的话，“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雁窝岛位于完达山北麓三江平原腹地。电影《北大荒人》记述了，1956年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十万复转官兵开垦北大荒屯垦戎边的历史功迹。1967年底之后，数十万城市知青到三江平原，到雁窝岛八五三农场这块美丽富饶、充满神奇的土地谱写他们新的军垦战歌。我们学校中很多同学就是1967年下乡到这里的。1970年之后许多刚从小学六年级升入中学的学生又被安置到黑龙江各垦区，他们多数人下乡时只有十五、六岁。这里包括几位我曾熟悉现在已担任共和国省长、部长的人们。

在冰雪乡村公路上巅簸了近三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八五三农场所在地雁窝岛。下车时我们大都已经冻得不会走路了，半天才缓过劲来。在遥远的雁窝岛同学相见分外亲，农场的知青不同于我们插队，这里是知青的天下，有点像学校的集中劳动一样。在炉火正旺温暖如春的宿舍里，我们见到了北燕、张敏、刘静、罗军、援朝、国华、海丽等许多同学。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同学，而且多数人还是文革中患难与共的一个组织的伙伴。午饭时间到了，他们到食堂打来许多饭菜招待我们，女生拿出北京家里寄的香肠火腿，男生拿出舍不得喝的北京二锅头，在炊事班帮厨的还偷偷炒了几个菜带来，席间他们告诉我们盛夏和金秋的雁窝岛更加美丽。这里是三江平原湿地的缩影，蓝天旷野间水草迷人，杏黄色的野浮萍争相开放。宽阔的水面上，丹顶鹤、天鹅、灰鹤、白鹤自由飞翔。雁群排行比翼起飞碧空展翅，雁窝岛是鸟类的天堂。挠力河水静静淌过，奔向东北方的乌苏里江，两岸芦苇，小叶樟、水草风茂，草甸一望无际。这里更是粮食的高广区，盛产大豆、玉米、水稻。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夏秋雁窝岛的美景，即便在冬天，我也能感受到雁窝岛的美丽，黑土地上是圆木搭成的排房，房前房后茂盛的松树林，白杨林，白桦树。更有荒原上一望无际的白雪美不胜收，白皑皑的雪在阳光照射下泛着晶莹的光辉，呼呼的北风，将扬起的雪粉飞落在脸上。我想起了那句话，“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大姑娘叼着大烟袋。”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就是富饶美丽、充满传奇的草莽关东。

我们在雁窝岛同学相聚谈得更多的是珍宝岛。珍宝岛在雁窝岛的东北方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为了反击苏联军队的侵略，1969年3月，暴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激战九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袭击，击退苏军3次进攻，胜利的保卫了祖国的珍宝岛。而包括八五三农场及乌苏里江沿线许多农场知青都参加了那场神圣的国土保卫战。他们帮助解放军搬运弹药，抢救伤员，站岗放哨，保卫运输线。还有知青直接参战，北京的育英中学、师院附中等学校都涌现出这样的战斗支前英雄。

沙皇俄国从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起，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将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五个浙江省，领土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在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竟然厚颜无耻的

说："沙皇专制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从未同中国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据此暴发了中苏两国为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的争夺战。滔滔的乌苏里江，英雄的珍宝岛，中国军人和知青们用热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珍宝岛。历史告诉我们，"和为贵"是打了胜仗才能实现的。那时黑龙江的农场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看着《英雄儿女》、《南征北战》、《董存瑞》长大的知青，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珍宝岛保卫战虽然结束了，但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畔。

从生活上来说，在农场和兵团的知青要比插队农村知青享福不少。在那个年月农场兵团知青属于农工待遇，有几十元的工资，吃饭有食堂，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也比农村高得多。而插队知青十来个人分在一个村里，条件差的地方温饱都是问题，夏天农田里大都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但农场兵团受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深，有的地方知青受到政治迫害，有的精神上感到压抑和无望。在黑龙江兵团现役军人迫害女知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相比之下，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宽松一些，虽然生活艰辛，但受到阶级斗争冲击要缓和许多。比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知青们，那些成千上万闯关东的盲流（盲目流动人口）更不容易，许多人因为在山东、河北、辽宁吃不饱来闯关东。更有许多人不堪在家乡政治上受打击歧视来闯关东。我下乡的兴旺大队社员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是地富子弟，他们多是投亲靠友来北大荒，也有不少人被地方政府抓住收容后遗返原籍。他们中许多人扶老携幼，逃荒处境悲惨。而我们却有这么多知青同学，相比之下，命运已是不错的了。

我们来雁窝岛看望的几位女生中，北雁是我们这个同学圈里最受大家推崇的人。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重重压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共同命运将我们这伙人聚到一起。北雁是高中学生，功课好，文静、漂亮，又很有独立见解。她爸爸是北京一家部队总医院科主任，军内著名医学专家，文革中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政治迫害。我们那代人都一样，父母文革遭迫害，很快株连到子女，这样的人不能当兵，不能上大学，招工没份，返回北京更是困难。北雁苗条身材，扎着两条短小辫，常穿一身军装，骑着一辆26凤凰自行车，她稳重、富有魅力。有一次我们学校"红革会"二十多人围殴一名外校同学，北雁见状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一个柔弱女子，居然震退了那帮在动乱中良心泯灭手持凶器的人。

北雁与我们年龄相仿，但她在我们心中倍受敬重。不想在我们这次八五三农场探营后不久，北雁却匆匆嫁给了当地农场一位老职工家的农村青年。原因何在，当事人不说，终成为历史的疑团。但现在想来，在文革动乱岁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王谢堂前双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在我们那个同学圈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掀起了从东北、内蒙、山西、云南等地下乡的同学们借春节回家，赶回北京对她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她不顾我们强烈反对，毅然走上那条让人费解的婚姻之路。

伴随着文革结束，北雁父亲官复原职，北雁将她的夫婿和女儿从雁窝岛带回了北京，她在一个单位管财务，她先生在一家医院维修班当了一名修理工。北雁后来还生了一场大病，好在现在还健康。女儿下海不顺利，家境至今一直不是很好。四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这位熟读中外名著，外表秀丽、端庄优雅的才女，为什么非要走

上这条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结识了一位驻京部队医院的院长，席间谈到我的同学北雁和她的父亲，这位少将院长肃然起敬的告诉我，北雁的父亲是他的恩师，曾是他们医院著名的专家。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一千七百万知青，如同雁窝岛上的雁群，春来秋去，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村、草原、荒滩、林区、海岛、边疆书写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历史。辽阔的黑龙江、美丽的雁窝岛，波浪滔滔东去的乌苏里江，是否还记得数十万知青闯关东的年代。那个年代不同的人生境遇，也为知青的人生奠定了不一样的人生轨道。有的人在磨难中成功，有的人在磨难中消沉，有的人得到受益终身的锻炼，有的人收获了一生难以挽回的重创。但四十年过去后，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都没有忘记留住青春那些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的遥远的知青岁月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历史久远，故事情节也难免会有误差，况且往事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及，故将本文人物都做化名，权当听我在农村生产队高高谷堆下给你们讲过去的故事。

2010年11月9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林小仲，生于北京，共和国同龄人。1968年下乡内蒙呼伦贝尔盟（当时划归黑龙江）阿荣旗九年。1977年7月返城，在北京语言大学当临时工，1977年12月招工进北京羊绒衫厂，科室干部，1981年至1990年在团中央青工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干事、副处长、处长，中国青企协副秘书长。后在中央国企旗下公司任总经理十余年，现任北京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纪实】：

忆首都中学红卫兵

1967年初，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三大派。"文革"的领导者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时期，利用着不同学生组织派别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和对革命理想狂热追求的北京中学红卫兵，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

1966年6月，首都中学红卫兵中一派称之为老红卫兵，这一派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成员出身多为"红五类"，组织上带有浓厚的血统论思想，他们中有的人认为，父辈打下的江山，天经地义该他们继承，这种世袭思维终其一生。"文革"初期，他们积极追随中央文革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各个学校的当权派。他们带头冲向社会，在文化界和社会上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破四旧"，对知识分子和所谓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搞"红色恐怖"。他们中的多数人盲目、幼稚，却也有品行恶劣者在其中。北京某中学高三学生，军队干部子弟，"文革"中，他带人将校领导和部分老师打进劳改队，残酷迫害。"破四旧"时在社会上打砸抢，将几位著名民主人士家财物洗劫一空。他们伙同其他学校红卫兵，在学校私设公堂，拘押拷打所谓社会流氓，他曾沾沾自喜的讲述自己毒打一个15岁所谓女流氓的经历，听者对其变态敢怒不敢言。许多和他一个大院的干部子弟耻于同他为伍。

老红卫兵中更多人为利益驱使，被中央文革赞美为小太阳而冲昏头脑。他们自恃血统高贵，有很强的优越感，视平民为草芥，殊不知践踏法治和秩序的同时，也打开了魔鬼的大门，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打击对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也成为了革命对象。人大附中女红卫兵徐浩渊写下"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表达她们对"文革"的置疑和愤怒。1966年底，他们中的一些骨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反戈一击之路。在它成立之日，1966年12月5日，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中央文革下令逮捕联动骨干成员。由于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他们的暴力行为迫害了大量平民，人心丧尽，联动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和反对。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成员，会后将他们释放。联动宣告瓦解，老红

卫兵逐渐退出"文革"舞台。

此后在北京中学占统治地位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主要就是"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讲话命名。他们中大多数在"文革"初期受过老红卫兵的伤害，他们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居多。我在"文革"中认识一个初中女孩，雍容典雅，且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她就读北京中学知名女校，一度也成为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的风云人物。她父母都曾是解放前北京大学高材生，中共地下党员，多次参予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游行，而后夫妻投奔延安。"文革"初期，老红卫兵将这样的人都划为异类。像她这种境遇者在"四三派"中大有人在。老红卫兵将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们推到了对立面，1966年年底，他们发现自己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当然，这种对立根源还是来自"文革"的错误。

异军突起的"四三派"红卫兵强烈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他们要求平等的生存权利，反对封建特权。"四三派"本能的站在与"联动"斗争的对面。"四三派"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了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旗帜鲜明的反对血统论，他们第一次印刷3万份，被一抢而光，"四三派"更多是为生存而战。"四三派"一些人在"文革"中也表现得幼稚和激进，他们相信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成为中央文革推进文化大革命、炮打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一轮力量。"四三派"红卫兵排练了一场大型红卫兵歌舞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剧演出人员达五六百人，我们师院附中就有很多人参加演出。这场由十几岁中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1967年6月2日《路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演，剧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一炮走红，先后演出达101场。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黄埔滩头我们曾昼夜苦战，造反的吼声响彻了嘉陵江畔，武汉三镇战歌嘹亮，三司的战旗飞舞在内蒙的草原。"足以表现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当然《路线》也有："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洒热血心甘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类歌词，也反映了"四三派"对文革认识的局限性。

继江青4月3日批评老红卫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1967年4月4日，北京卫戍区政委李钟奇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又肯定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江青本人也在场。据此北京中学又出现了"四四派"红卫兵，老红卫兵感情上接近"四四派"红卫兵。由于"文革"领导者们表态"朝三暮四"，北京中学自1967年起出现"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尖锐对立。在强烈对抗情绪下，老红卫兵派编排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1967年5月29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演出，近300人的演出队伍，既有老红卫兵，也有部分"四四派"，他们精神饱满，气势悲壮，引起轰动。《红卫兵组歌》套用《长征组歌》的句式和全套唱曲，组歌14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读读这些标题就知道，他们自我歌颂，也没有跳出"文革"造反的圈子。有趣的是组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的内容。同日，在天安门内的午门广场，"四三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显示着"四三派"的广泛号召力，也将中学红卫兵各派对立推向

新的阶段。老红卫兵中许多人则慢慢淡出政治运动的视线。我也在人大附中见过三足鼎立对峙的状况，"四三派"占据主楼，南北两座侧楼分别是"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所在，各自森严壁垒，或不相让。

北京中学这三派红卫兵共同特点是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伟大领袖的权威和绝对正确深信不疑，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形成、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然而历史会告诉未来，责任和罪过并不在那些当时还只能称之为孩子的中学生们。

师院附中成立了"四三派"红卫兵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并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井冈山兵团、京工附中红旗、101中学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三派"红卫兵联合起来，成为一股颇有实力的力量。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之后中学"四三派"红卫兵已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大学红卫兵组织联成一片，我们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还成立了"三司的中学部"。我曾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混了一个多月，每天刻蜡纸，印传单忙得不亦乐乎。随后红卫兵运动的主导位置开始从中学转向大学。大学中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他们也由反抗压迫，逐步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派的马前卒，也未能逃过被利用后，被抛弃的命运。

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首都的中学红卫兵们连续多次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会。大剧场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全场齐声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一些老红卫兵中的"联动成员"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身着呢子军大衣，臂戴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高叫狂呼，很是无奈和扎眼。台上台下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一下在这座俄式殿堂中，成为互不相让的政治家，他们就"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意见。但那时双方各抒己见，尽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却极少发生暴力。我几乎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所有辩论会，挤在人群里，听着各种的争论和演说。我也能碰到师院附中各派红卫兵中的各类人物。各派别红卫兵也广泛联络外校相同观点者，这些命运共同体的人们，有的竟成为了终生的朋友。由于"文革"派别对立，思想撕裂也影响着一代人，直至很久，彼此还怒目相视。

斗争很快从北京展览馆演变到了长安街，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抓了一些联动骨干，老红卫兵纠合起来冲击公安部要求放人。华灯初放的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凝重庄严，夜色中，成百上千穿着各式军装的男女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旷的长安街呼啸飞驰而来，他们时而整齐的喊着口号，时而还放响了鞭炮，但在专政机关和众多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围攻下，他们还是落荒而去。

被中央文革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娃娃中，有一首传抄很广的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短短四句话，反映出老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文革"初期他们扮演了这场浩劫的冲锋队，半年后他们的家庭也成为"文革"斗争的对象，中央文革送沙果改成了送手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

热衷血统论的"红五类"，父辈一夜间被"文革"迫害成走资派。此时，对于他们曾经视作组织纲领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无疑是自我嘲讽。

"四四派"在东城一带颇有势力，而海淀区"四三派"的力量很强。城区一些学校的"四三派"与军训团解放军关系紧张，而师院附中，"四三派"同解放军军训团关系却很融洽。在成立中学红代会的问题上，"四三派"与"四四派"冲突不断，甚至有两个对立红代会出现。老红卫兵也不是铁板一块，事隔多年有人评论，西城区四中、八中的老红卫兵趋向理智，他们曾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试图控制混乱的局势，但他们在1966年红8月中，也有许多打、砸、抢和揪斗走资派的劣迹。而海淀区的老红卫兵中，更不乏制造红色恐怖的打手。师院附中基本分成"老红卫兵"和"井冈山兵团"（四三派）两派，"四四派"组织分散，力量有限，游离于两派之间。学校里除一些大字报相互攻击，无限上纲外，基本上势均力敌，相安无事。

我也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一天在操场几十个老红卫兵用皮带追打一个我们不相识的年轻人，"四三派"中一位女生跑过去阻拦，她爸爸是海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军内著名专家。她穿着一身灰色的海军军服，大喝一声"不许打人"，居然震住了那伙人，放走了被打者，待他们醒过味来，招呼来了百十人，手持棍棒、弹簧锁、刮刀将我们在一楼的宿舍团团围住，并有人在叫骂声中砸门，幸好在那个非常年月里，我们在宿舍的门上安了五六道插销，门没有被撞开，但随时有被撞破的可能，我们用宿舍里的上下床顶住了门窗，从床下抽出准备好的木枪、长矛、铁棍把住门窗，加上我们的援军陆续赶到，围攻者看到我们有准备才悻悻离去，这样大家才躲过了一场被血洗的灾难。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革"的组织发动者们，已经陆续完成了打倒党内有不同意见领导人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对于中学红卫兵中各派中有识之士来说，"文革"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困惑和不解。"二月逆流"后，连大家平日尊敬的老帅和副总理们都受到了批判，吴越春秋时，范蠡劝功臣文种及早隐退，免受越王勾践迫害时说过，"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看到许多为创立人民共和国奋斗一生的老干部被打倒、被批斗，看到广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都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开始有了种种疑惑。越来越多的人不来学校，不参加政治运动，开始当"逍遥派"了。我家就在学校，别处也没有地方去，与几十个一派同学住在学校，每天吃饭、打篮球、游泳打发日子。在夏日我们常深更半夜到师院附中西边京密引水河中游泳，或晚上聚在一起，听高中同学讲福尔摩斯等故事，大家越来越远离政治运动。认真反思"文革"中，北京中学的三派红卫兵轮番上阵，其实在这些十几岁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孩子后面，都有上层领导者在插手，这些红卫兵组织不过是一些政治风筝，风筝的高低起伏，兴衰荣辱，全掌握在牵线的政治家手中，各派群众组织都是"文革"中被利用的工具。

首都中学红卫兵各派人物结局殊途同归，1970年之后，当一批中学"四三派"领军人物被当作"五一六"分子审查时，首都中学的"四四派"和老红卫兵的领军人物也被当作"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或办学习班批斗。"文革"结束后，大家发现所谓"五一六"竟是莫须有的捏造，这成为"文革"历史的奇怪结局。

1976年4月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文革"中首都中学红卫兵各派精英却捐弃前嫌，空前统一的站到一起，为结束"文革"动乱，做出历史性贡献。

此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官方指定的红代会，再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了1700多万人离乡背景的上山下乡生涯。"文革"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中学红卫兵"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遥远的校园记忆

北京师院附中（现首都师大附中）是我中学的母校，也是我少年时代的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父母相继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仅23岁的妈妈，千里迢迢将襁褓中的我送回四川老家，我在外公外婆居住的自贡沱江边度过童年。

我妈妈胡文鸾1954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附中任教，先教中文，后教英文，并先后在这两个教研组任组长，三十余年，直到离休。

1955年在47军当兵的三姨将我从四川接回北京，五岁的我立刻被这座绿树成荫的校园所吸引：飞机式的建筑格局，三层的教学主楼如同飞机的双翅，大礼堂则如同机舱；紧随其后的是东西对称的两座宿舍楼如飞机的后翼，再后面是宽大的操场。现代化楼房与枝叶繁茂的乔木相衬，中西合璧，给校园凭添了几分优雅和温馨。我家住在紧邻后操场的一排平房，曾经是当年建校盖楼时民工的工棚，稍加修缮成了教师宿舍，那里曾住过十户人家。夏天的晚上，大人和孩子们围坐在葡萄架旁，能看到北京夜空中满天的星斗。

对于我这个重返都市的孩子来说，校园内的楼房、自来水、电灯、抽水马桶，乃至校园的花坛，教师休息室的麻将桌、留声机都使我好奇，成为淘气的对象，不免惹出闯祸的故事，当然这大都发生在我上小学之前。师院附中多年来都是北京市重点中学，我中学时的同学有许多来自复兴路沿线部队大院，也有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1963年，上初一时，我们还都带着红领巾。

我的两个班主任使我一生难忘。林淑珍老师教生物，她是我在初一（6）班时的班主任，那时候刚刚步入而立之年，落落大方，白皙的脸庞，端庄的神态，一位有过很好学养的大家闺秀。她待我和同学们既像大姐姐，也像妈妈。我上课经常涂鸦画小人书，招致科任老师到我的班主任林老师处告状。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到生物实验室谈话，她批评了我几句，我还没怎么样，她倒掉起眼泪。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埋怨我不争气，从学习说到了我的着装，她数落道，你的衣服弄得这么脏，哪一点像老师的孩子！我姓林，你也姓林，你就不能为我争争气?接着她让

我把打球时扯破的上衣脱下来，一针针帮我补好。她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好好念书，更多的是要做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

我的另一位班主任是我在初二（4）班的数学老师李纯熙。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数学老师。现在我们同学聚会时，还能回忆起李老师的执教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表达能力让同学们倾倒。李老师年轻时身体不是很好，脸色有些苍白，给人贫血的感觉。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使得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给他造成精神压力，但并未阻挡他尽职尽责的教书育人。

我敬重我的语文老师赵芝力，一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他的中文功底很深，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谈笑举止无不透着文人的潇洒。一些常见的词句，一段在我们看来平淡的文章，被他从文学殿堂到市井习俗娓娓道来。我后来上大学，听过不少教授讲课，像师院附中语文老师那种水平的真不多见。他从文学作品分析中，为我们讲述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方法，点评分析审美的独特视角。

我的英语老师杨时谦讲课时，双手伏在讲台上，重复着某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面部表情颇具喜剧演员特色。我喜欢优雅气质的张惠钰老师的历史课，她有闽南人的娴雅文静，讲课引人入胜。郑旦华曾是我的政治老师，那些枯燥和程式化的政治教育，学生们却被她口若悬河的热情吸引。刘子厚是一位有学养的语文老师，他没有教过我，却与我很亲，新中国十年大庆时，他将九岁的我扛在肩上，参加天安门的国庆游行。

我们尊敬的艾友兰校长15岁就成为北平地下党交通员，出生入死颇具传奇，他的家曾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站。艾校长对事业投入，对学生们关爱，他为附中的建设、发展辛劳了一辈子。艾校长，洒脱的儒雅气质，谦和博学的大家风范，才思敏捷的精神状态，都对师院附中教师团队和学生们有着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革"给艾校长和他的同事们的灾难和屈辱，是那样的残酷和深重。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艾校长在学校被长期关押，除了因为是校长外，他曾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解放前领导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艾校长的姐夫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张大中。这样一个红色的家庭背景，一夜间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他遭受了后人很难想象的非人待遇。艾校长的女儿艾亚平是69届的学生，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只有15岁。在兵团她遇到一位师院附中的女生，当那位女生知道她是艾校长的小女儿时，眼泪夺眶而出。这位部队大院出来的"老三届"女孩，曾和班里另外几个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过艾校长。她还记得艾校长脊背上被抽得伤痕累累，她不停地向艾校长的女儿道歉。事后艾亚平曾将此事告诉父亲，艾校长却宽厚地说，那时她们还都是孩子，责任不在她们。

我和"老三届"的师院附中校友们经历过"文革"前和"文革"中截然不同的两个校园。"文革"前的校园靓丽和美，校园内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篮球场外常常围满观看的师生。在李明忠老师的调教下，师院附中的男篮身手不凡，名列京城中学前三名，从这支队伍中走出过日后国家篮球队队长黄频捷。女篮队员们也可圈可点，她们大都成为校内瞩目的明星人物。清晨操场上活跃着热忱亢奋的晨练人群，白天各班课堂呈现着认真生动授课场面，中午学生食

堂热闹欢快，晚自习教学楼日光灯下坐满勤奋苦读的学子。那时同学间相互友好，即便是开国将军、部长的子女们也大都为人朴实低调，很少用门第作为炫耀的资本。

"文革"使这一切发生了逆转。1966年陷入空前浩劫的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北京的中学。错误狭隘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的灌输，"文革"现代迷信狂热的政治氛围，国家高层的的领导和发动，使师院附中同其它学校一样卷入了政治漩涡。6月7日以后，红卫兵的军用皮带抡向慈爱的师长。工作组进校后，许多教师被打进了劳改队，"红色恐怖"使善良的人们无一能够幸免于难。教导主任赵幼侠是一位执着敬业、清丽柔弱的女老师，她受到非人的摧残和凌辱，带去终生难以平复的创伤。被冤屈戴过右派帽子的喻瑞芬老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我目睹了她那衣不遮体的惨状。校园里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嚣，从校门口一直到食堂内外贴满骇人听闻无限上纲的大字报。同学反目，师生对立，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疯狂状态。而斗争的主力却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有些学生为何一夜之间变成草菅人命的打手，国家机器的纵容指使，社会环境对暴力的推波助澜，"文革"前学校教育的缺失都是成因。

"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一代。"老三届"是指"文革"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处在新中国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年代。这一代人既有理想主义的英雄情怀，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但是他们过早卷入政治，而在扭曲的社会环境中，缺少正确的真善美和道德观，不乏偏激盲从，狂热幼稚。

师院附中是部队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毛主席同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他们中间许多人最早成为"文革"造反的积极响应者。1966年8月18日，多少穿着父辈军装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簇拥在开国领袖身旁，欢呼雀跃，指点江山，为"文革"鸣锣开道，其中师院附中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就达40多人。但是他们何曾想到，"文革"专制摧毁民主法制的恶果蔓延，使得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由于是各级的领导干部，也如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一样，很快成为被"文革"残酷迫害的对象。天之骄子倾刻变成"黑五类"，他们参与抄家打砸抢，自己也遭遇被抄家打砸抢。这种命运轮换，使得一些人开始反思，从"奉旨造反"到反戈一击。1966年底，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挂出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12月26日，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集会，喊出"炮打中央文革"的口号，全场数千人沸腾。师院附中红卫兵负责大会外围保卫，会场场租费都是他们从师院附中财务借来支付。随后不久，曾经狂热宣扬血统论，为"文革"冲锋陷阵，被中央文革称为"小太阳"的老红卫兵中的联动骨干成为了阶下囚。

1966年9月，我随学校近百名同学，到群山环抱的门头沟清水涧帮助秋收，与老乡同吃住一个多月，同行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谁也不知道家中已被"文革"划成异己的父母是否会祸从天降。10月6日至10月28日，师院附中红卫兵也组织了180多名师生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劳动，他们在当地受到一致好评。1966年11月，我们二十多位同

学结伴而行，跨越河北、山西、陕西，在寒风中，历时一个月徒步长征到延安。1967年1月，北展剧场多次举办声势浩大的辩论会，中学生们在争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5月29日，北京各中学的老红卫兵近300人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红卫兵组歌》。6月2日，600多中学"四三"派红卫兵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展剧场公演。两派中学红卫兵的演出都有师院附中学生参加。在各自梦回吹角连营的悲壮之余，抗争居然成为中学生们的生存需要。从8月到9月，我们也有冒着全国武斗的枪林弹雨，扒火车南下，在郑州、武汉、长沙等地串联受困的经历。而后，北京夜幕下的长安街和烽火硝烟的清华园及许多中学，都留下我们成群结队骑自行车呼啸而过的身影。更有当"逍遥派"时，集体住校，白天在校园打篮球，晚上翻墙到昆玉河游泳，深夜聚在一起讲福尔摩斯故事打发时光的日子。

由于中央文革讲话朝三暮四，1967年，师院附中与北京各中学一样，学生中也出现"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三派鼎立，剑拔弩张、相互对峙的局面，"文革"思维和封建血统论是导致学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我们也有过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揭竿而起成立学生组织的经历，校园里数百人之众颇有声势，现在回头想来不过是抱团取暖而已，那面"北京师院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旗帜被我们带到插队的草莽关东。那时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哪里知道，所有的学生组织都难免成为"文革"中被利用后又被抛弃的工具。各派学生组织的领军人物表演落幕后，殊途同归，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当做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

军训团进入学校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他们指定的革委会和红代会。1968年之后，"老三届"的学生从暴风雨中的校园直接走向社会，除少数幸运者当兵、进厂矿外，绝大多数人开始了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老三届"与"文革"中各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人数达1700多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历经大起大落磨难的"老三届"中的多数人，他们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在反思与拼搏中成为社会的中坚，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老三届"出类拔萃之辈群星璀璨，这一代人承前启后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应该是他们对培育过自己的母校的最好回报。

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尽管当事人视角、立场不同，我们都有责任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对一个国家来说，改革开放与民主法制制度的确立是何等重要，要让"文革"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我漫步在首都师大附中的校园中，儿时的建筑格局已荡然无存，绿树丛中的蝉鸣带我穿越记忆时空，恰同学少年的身影使我又回到学生时代。学校是春华秋实的园地，教育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社会生活里人文素质堪忧，有待于中国教育的升华与改变。肩负着百年历史传承的母校，走过了跨世纪的风雨沧桑，校园里最美丽的依然是青春和希望。

作者简介：林小仲，北京师院附中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东北呼伦贝尔盟度过近十年知青岁月，1976年3月入党。1977年返城。曾在北京羊绒衫厂工作。1981年调团中央历时十年，任干事、副处长、处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1990年调交通部招商局集团直属企业，曾任十年北京华鹏大厦董事、总经理。2003年至今，任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又是一个十年。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联动历史的断忆

应同学之邀，我参加了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的《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参加聚会的有近二百多人，多数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作为同龄人和亲历者，我也曾为他们能在1966年12月贴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而感到钦佩。但他们也大都是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的始作俑者和狂热吹捧者。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的许多风云人物出席，他们中有，卜大华、牛皖平、彭晓蒙、周春英、邹建平、马晓军、贺邯生等人。参加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师院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47中、育英学校等学校。城区的四中、五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等学校也有人参加。会场内大多按学校分桌，人少的几个学校一桌。还设了来宾席，多是当年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士。师院附中有十几位同学出席。

会议由马晓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横着一面："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战旗。会议先后有几位知名人士发言，没听出什么政治内容。倒是会场内唱歌、合影照相、相互碰杯交谈，热热闹闹，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嘉年华聚会，只是少了当年穿着军装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采。有些人安静的在座位上沉思，有的人相邻攀谈，有的同熟人致意问候，有的人还是那样张扬，似乎行走在水浒传的聚义厅里。

我中学时有幸参加过1966年12月26日大会。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为纪念毛泽东诞辰73周年，在北京展览馆集会，会议打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旗号。进入会场，已感到火药味很浓。负责会议保卫的红卫兵如临大敌，在门口逐一审查。集会开始发言还正常，无非是向毛泽东表忠心之类的话。会议进行中，高高的剧场大厅飘落许多联动口号传单，一群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造中央文革的反有理！"。顿时，全场沸腾了。几千名身着各式军装的红卫兵欢呼着、雀跃着。几千顶军帽腾空而起，在空中盘旋。上百面红旗在大厅挥舞着、呼啸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那惊天动地的呼喊声，至今仍回荡在耳畔。

对于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本身，应该无可厚非，联动娃娃们曾为文革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功也好，过也

罢，那就是文革史或红卫兵史的一部分。况且会议组织者还刻意淡化政治。其实在民主社会，也大可不必，何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我想时至今日，即便与会的两百人，对联动历史的认识也未必相同，与其争论，不如开成这样一个高高兴兴聚餐见面会。这类会我参加过多次，我只想作为他们的同龄人，谈一谈我对联动历史的看法。

我们读了《联动事件始末》一文。感慨当年联动成员中的少数人，只截选1966年12月反中央文革。却忘了6、7月北京各中学红卫兵造反，矛头直指各校党委，是他们充当文革的开路先锋，将校园变劳改农场，使得学校领导、老师遭殃，同学打入成另类。忘了他们8、9、10月主导的红色恐怖，多少无辜生命被摧残。不知他们是否认知，老干部是人，平民百姓也是人，人不分贵贱，人的生命同样是宝贵的。联动们从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践踏人权，到1966年下半年，文革冲击老干部，危及自己利益，被迫举旗，反戈一击。联动中一些人文革中纳粹冲锋队的表现，多少人都记忆犹新。

多数中学生与联动之争，并非对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评价，那时各派都迷信于伟大领袖，也没有几个人对伟大领袖发动、领导的文革发生怀疑。看看联动宣言和他们的口号就知道了，将文革的责任全推给林和江两个集团岂非怪事。更何况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了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红卫兵也好，都是文革领导者的工具，利用之后便无情的抛弃。难怪几派红卫兵的头头，最后都被当做"5.16"审查。中学造反派与联动对抗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多数中学生想求生存与平等的权利，而一些八旗子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像封建社会那样世袭江山，他们将其他同龄人变成奴隶或异类。但愿我的同龄人们回顾历史时都多点反思，不要再用文革思维评价文革发生的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条封建血统论的对联，是老红卫兵和联动们的组织纲领，也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那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思想，与封建王朝的世袭思想有何差别。难怪干部子弟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反对这一理论。我们讨论联动历史，不要忘记这些历史真相，联动们从北京天安门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红海洋，到穿着父辈军装，挥舞皮带闯入社会制造红色恐怖。从文革迫害扩大，老干部被揪斗，揪斗他人的红卫兵们，自己的父母也被揪斗，他们才被逼上梁山。难怪有人读完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后感慨，那些控诉别人整他们的人，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当初，你是如何整别人的。翻开中共党史不难看到，这是一个政治怪圈。

联动四十五年前，1966年12月26日，开始炮打中央文革，说明他们迷途知返，反戈一击。文革初期，正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紧跟中央文革，冲击校党委，反工作组，迫害老师和同学，为文革鸣锣开道，将法制和人权践踏在脚下，将国人中的所谓牛鬼蛇神置于皮鞭之下。他们的代表人物，曾被中央文革捧为小太阳，他们为中央文革迫害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冲锋陷阵，直到他们中很多人父母也受到文革迫害，他们才开始与中央文革反目，这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中的联动骨干们的一段完整历史，历史不应该切割和截选，我们都还没有到对历史失忆的年龄。

我师院附中一位学兄，文革前学生党员，曾是我们学校红卫兵领军人物。他1966年8月18日上过天安门，后

来，他带着对运动疑惑逍遥。他1968年去当兵，在部队曾被当做联动骨干和"5.16分子"，受到近一年的审查。四十五年前的12.26大会，他也参加了，北京展览馆会场场租费都是他们从师院附中借来支付的，师院附中红卫兵还执行了大会外围保卫工作。他参加联动四十五年的纪念会后谈了两点想法：一是在联合行动45年纪念日时，联动骨干到底有何诉求？看不出来。时至今日，一部分人还不加节制的自恋，自以为居功至伟，使他费解。二是仍抱着文革的种种派性和观点，论道历史，点评众人，实在可悲。

我们这一代人曾深受"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思维影响。也曾相信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所谓立场逻辑。其实世界不是这样的，联动既不必被妖魔化，也不该被神化。那时候，都是中学生，一群冲动的孩子。我们希望能真实、公正评价联动的历史。联动骨干们出自老红卫兵中的部分积极分子，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联动中少数人时至今日对自己历史的评价，与历史真相差距太远。

团中央主管的2012年第一期《中国青运史辑刊》有一篇访原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汪家鏐的文章，汪家鏐文革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她回忆文革时说："挨过多少次斗我记不清了，但1966年8月19日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团市委、北京市教育局的干部在中山音乐堂召开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我和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一起被押到会场。只见台下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黑压压一片，群情激奋，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感到这次的批斗可谓声势浩大。没容我多想，立刻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也迅速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后。我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打倒黑帮头子张文松！"我们被身后的红卫兵押着面对观众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这时观众席里忽然传出整齐一致的呼喊："跪下！跪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膝弯处就被站在身后的红卫兵狠狠地踢了一下。

批斗大会进行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没头没脸地向我们这些"黑帮分子"打来，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押送他的红卫兵把他带到后台，用凉水冲洗一下，就又押回前台，孙国梁被打断了几根肋骨。我被押回时在车上一个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我大声地争辩，我话音还没落就被一脚踢下车，晕了过去，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这次中山音乐堂的批斗会开了武斗的先例。"（摘自《中国青运史辑刊》）

汪家鏐是建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她的爱人王浒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她们都曾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王浒还曾是我的母校师院附中的副校长。文革开始，他们夫妻都遭受残酷迫害，他们的儿子当时只有7岁，由外公、外婆带回上海，度过没有父母相伴的童年。汪家鏐书记的回忆对于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或者他们中的联动成员反思文革或许能有几分帮助。

对于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北京四中的各派精英出版了《暴风雨的记忆》，他们从各自立场角度回顾文革。他们中有北岛、曹一凡、秦晓、杨百朋、陈凯歌、刘东、唐晓峰、冯永光等人。其中刘辉宣的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让人看到反思者的勇敢和正直。北京师大女附中历史悠久，声名赫赫，1966年8月5日，校领导卞仲耘被自己一群女学生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罹难的校长。为了彰显她献身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仁爱，并寄托学生们的缅怀与反思，为了记录历史，抢救记忆，也为了对民族，对后代，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个交代，师大女附中500位校友捐款制作了卞校长铜像，并于2011年5月7日举行了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

回忆文革,虚构一贯正确的大有人在，他们还在梦里自我陶醉。当年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里，何止老红卫兵和联动中人梦回吹角连营。四四派几位头面人物在知情人尚健在时，就堂而皇之的编撰故事，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四三派的个别当年领军人物也步其后尘，移花接木，续写虚拟的英雄史。我更亲眼见识过有人在同学聚会席间，故作领袖状自吹自擂，对文革个人表现侃侃而谈，仿佛在文革中指挥过伟大战役一般。有位原本是文革派系中不三不四之辈，公然编造12.26登台与联动辨论等天方夜谭，所有参会者都知道，那天是老红卫兵独家会议，上台发表不同意见的，只有八中红卫兵计三猛，若不是西纠的兄弟们拼命保护，他也遭到围攻，险些挨打，何来其他人上台辩论。我想这些现象不单是某些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一代人，受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形而上学唯我独尊的影响，缺少反思，缺少包容，缺少对人性的理解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人格缺陷。

1978年，叶剑英元帅在一次讲话中说，文革使中国一亿多人受到迫害。对于文革的事要历史的去看，那是一个没有法治的黑暗年代，那是一个封建皇权思想泛滥的年代。文革的责任在于他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不应当由当时只有十多岁的首都各派中学红卫兵负责。问题是做为当年红卫兵一代回顾历史时，要有必要的反思和忏悔。显而易见，不管你当年属于哪一派，文革中那些残暴的打人凶手，那些将学校领导老师送进劳改队的组织者，那些在社会上胡作非为抄家夺命的暴徒，那些借运动落井下石，陷害别人的政客，一生何能安心？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中有过这样的人，他（她）们终生不得安宁，这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在文革当中，我们曾分属不同红卫兵组织，事过多年我早已将当年派别成见烟消云散。想想腐朽的满清王朝后期，一些八旗子弟，自恃血统高贵，已经沦落到提笼架鸟了，还招摇过市，颐指气使，不忘祖辈上马背上的功德。其实，即使文革初期，许多被打入另类的同学的父辈们，也为共和国的创立，为国家民族做过贡献。即便是普通人，或者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人也是平等的，也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年代，将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变成势不两立。用简单的红与黑，对与错解释历史，不仅站不住脚，对己对人，都无益处。如果说文革初期，扮演冲锋队角色的联动们，是因后来父母遭迫害，被中央文革逼上梁山。那么，1966年底，异军突起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是因为遭受文革迫害，为了生存的权利，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他们也和老红卫兵们一样，难免成为推进文革被利用的对象。

我想这些简单想法，应该获得包括参加联动纪念会在内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认可。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是各自

的历史话语权。

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我们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新中国初创的暴风骤雨年代，我们经历过苦难与辉煌，我们经历过挫折与希望。我们全过程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千七百万人漫长的上山下乡，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有责任将文革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附：

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实施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他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党中央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966年12月5日

作者简介：

林小仲，男，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共和国同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下乡呼伦贝尔（当时划归黑龙江）近十年知青岁月。八十年代团中央机关任职十年。九十年代央企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十余年。2003年后进入民企房地产公司，时至今日，又一个十年。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梦随风万里

我18岁到27岁，曾在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阿荣旗那个难忘的小山村，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与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伙伴的命运一样，我们像春来秋去的大雁，1968年9月我离开北京，1977年7月历尽艰辛又回到了北京。

一、谋生从临时工做起

我能搭上知青返城的末班车，应该感谢我的爸爸林诗仲。是他经过多方努力，帮助我办好了一切返城手续，1977年7月，我终于告别了插队九年的呼伦贝尔，回到了北京。

我的父亲出生在美丽的海南岛文昌，少年时随爷爷下南洋去了新加坡。1947年回到南京求学，结识了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妈妈胡文鸾。南京解放后，他们双双参加了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们先后参军赴朝作战。我爸爸在朝鲜五年并荣立战功。他担任英文翻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板门店谈判，目睹了和平到来的历史时刻。

1955年前后，我的爸爸、妈妈先后从部队转业，爸爸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影公司。文革前曾多次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妈妈被分配到师院附中教书。

十年动乱的文革中，爸爸这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那里烧茶炉和撑船放鸭子。1976年11月，爸爸终于结束了近十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了北京，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可怜天下父母心，他的情况稍有好转，就惦念因他们受牵连还在乡下插队的我。他费尽苦心把我办回了北京，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在语言大学借了一间宿舍，并在学校行政处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让我有了一个临时栖身之地。

北京语言大学是座新建的大学，学校多处在施工，因此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钢材库。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角钢、螺纹钢、圆钢、钢管从露天处用推车推到新盖好的大棚里，然后分门别类码放到多层的铁架子上。这些钢材份量很重，大多都有十米左右长。跟我干活的一共有四个人，都和我一样是返城知青，钢材库的力气活对我

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有知青经历垫底，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那些又脏又累搬运水泥的活我们也常干，特别是遇到水泥袋突然破裂那就更惨，浑身上下的水泥面和着汗水，人就像泥猴一样。辛劳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只是每月二十多元的薪水，比我插队时的收入还少，但毕竟是回了北京。

在我干临时工那段日子里，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辈--语言大学副院长邱及，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教诲。邱伯伯是我爸的老朋友，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资深的泰国华侨领袖。他为人平和坦诚，且文学功底很深。他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时常告诉我要看得远一些，要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那段难耐的日子里，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激励我后来考上首都师大政教系，并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夜大学习。

天无绝人之路，1977年12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局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这是一家有上千人的国营企业。与我同期进厂的有两百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进厂后第一课是让我们这些青工挖办公楼的地基，也许因为我是知青党员，工厂选我当了这帮人的头。二十多天基建劳动结束后，青工们陆续被分到各个车间开始了学徒生涯，我却幸运地留在了工厂劳动科。

刚到劳动科，就遇上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企业的调资工作，在大锅饭的企业体制下许多人工资很低，文革十年长期得不到调升。但是，调整工资又有名额限制，加之文革派性造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尚未完全消除，因此，调资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工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牵头，劳资、人事、工会、宣传等部门参加的调资办公室，我被留在了厂调资办公室。那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好多人为了要求涨工资到调资办大哭大闹，那种场面看了真让人心酸。我的任务是：写简报、发简报、填表格、了解车间动态，为厂领导提供准确的信息，为本次调资能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在尽我所能。

调资工作结束后，我留在厂劳动科里。劳动科是企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负责工人调配、培训、工资、考勤等工作。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追随陆士娟科长，开始了几百人的招工工作。我们拿着劳动局批准的招工指标，几乎跑遍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一家一家的商谈，看档案，与拟招聘人见面谈话。当时北京的各街道办事处都积压着数以千计返城的知青，我们经常被那些期待求职的人们团团围住。看着他们一个个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但名额有限，我确实无力帮助那么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辛劳奔波和认真筛选，我们终于完成了四百多名新工人的招工工作。

由于我办事认真负责，赢得了厂领导和师傅的好感。招工结束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陆师傅出于对我的关爱，建议我先去食堂当库工。于是，在陆师傅和厂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在羊绒衫厂当了三个月的库工，职责是分管食堂仓库。当时羊绒衫厂有一千五百多人，食堂有几十个人。原来的食堂管理员和库工把账务搞得很乱，人们对此意见非常大。

我在农村当过三年队长，统筹安排是我的所长。我接管后，没多久就把那间上百米的库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出

入库帐也记得明明白白。最让那些大师傅们开眼的是我能将近二百斤的大米袋子，背几十米给他们送到操作间里。没事时我也常去餐厅帮个厨，日子过得倒也乐陶陶。三个月后，我这个库工转正了，正式拿47元的月工资。之后，我先被调到厂行政科，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工作，开始了我企业干部的生涯。

否极泰来，1981年我的好事接踵而至：一是我报考文字校对的国家外文局《中国建设》通知我被录取；二是厂里告诉我北京市纺织局工会准备借调我去工作；三是年初时，我在报上看到《中国青年报》公开招聘记者，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团中央青工部的勾德元部长和张宝顺副部长（现安徽省委书记）在报名者的简历材料中选中了我。在我外出不在工厂时，团中央的张宝顺副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陈传书（现任民政部老龄委常务副会长）亲自跑到工厂外调看档案。厂党委和人事科为我说了不少好话。他们回去不久就通知羊绒衫厂，要调我到团中央机关工作。

1981年7月我告别了工作近四年的北京羊绒衫厂，告别了那些爱护帮助我的师傅们去团中央机关报到。

二、团中央见证辉煌

1981年7月20日，我带着调动所需的各种关系材料，到团中央机关报到。当时还是而立之年的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热情接待了我。青工部是团中央分管青年职工共青团工作的部门，下设工交处、财贸处和街道处。我被分在工交处，即分管工业、交通战线共青团的工作。

在这个有光荣传统的中央机关大楼里，我开始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工作。团中央机关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的党政干部，也有各级团委的负责人，这些人大都很年轻，工作能力强、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充满激情。

我们的部长叫勾元德，年近五十，是个工作作风严谨、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刚到机关头两年，部里让我写文件，我费了很大力气，工工整整用大稿纸抄好送去请部长审阅，待部里秘书给我送回来时，我一看都傻了，勾部长用粗粗的黑铅笔把我写的东西几乎全都划掉了，他按照文章要求的思路，将我的稿子整个重新写了一遍。记得最惨的一次是我代表团中央起草的"关于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受打击"的报告，等稿子送回来时，除了大标题外一个字都没有用。此后有段时间，凡送给勾部长审阅的稿子，我不是看为我改了什么，而是看还给我留下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磨练，使我的文字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团中央机关那种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三千多名日本青年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任秘书长，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我担任了"活动处"机场迎送组组长，负责指挥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四千多嘉宾的接机、送机工

作，以及调度车辆、协调机场相关事宜、组织广场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等。胡锦涛不止一次关照大家：一定要精心计划、精心组织，千万不能出纰漏。所以，所有工作人员都尽心竭力，作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9月29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近五千人的盛大招待会，欢迎日本青年。胡锦涛主持，赵紫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了宴会。

10月1日，国庆那天，是这次活动的高潮，三千多名日本青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有幸登上天安门广场的红色观礼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圆满结束了。当王兆国、胡锦涛在新大都饭店向参加组织工作的人员表示慰问时，全场欢呼雀跃。大家忘记了两个多月来的疲劳紧张，一拥将王兆国、胡锦涛抬了起来。那种无拘无束忘我的沸腾场面，是我在团中央工作多年第一次见到。

1985年2月4日，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年企业家管理者协会"，简称"青企协"。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希望"青企协"能成为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培养青年企业家的摇篮，成为共青团为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

1985年3月，团中央和国家经委在北京联合举办"青年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研究班"，这是"青企协"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担任该班的班主任，我担任了班长。这样的班连续办了十几期，同时还与吉林大学联合开办了研究生班。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青年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加快了共青团工作的转型。值得欣慰的是，这其中，也有我的付出和努力。

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支持和赞助下，1985年11月，保加利亚在普罗夫迪夫市举办了"世界青年发明家成果展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格时沙·菲利波夫致函赵紫阳总理，邀请中国参加。为了发展同保加利亚等国青年的友好联系，促进各国青年的科技交流，宣传中国青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成绩，团中央和国家科委在全国挑选了一批由青年人发明的科技成果，参加了"世界青年发明家展览"。我协助青工部部长李冰（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参与和组织了这一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且在国外呆了两个月。期间，还顺道走访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苏联莫斯科。

我做为团中央基层工作团江西分团永新县组长，1986年3到4月间，曾带队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工作了两个月。那段红色历史的重温和老区人民的艰辛都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1988年5月4日至5月9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会的换届大会，我被任命大会秘书处会场组组长，负责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和京丰宾馆会场的组织安排工作。这是我

最后一次为团中央会议工作。

我从1981年7月到1990年7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作为工作人员，曾参与和组织了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少工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有幸近距离接触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成员；我走访过全国各省、市上百家大型国有企业；也结识过许多团省、市委的负责人；我亲眼目睹了四位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风采：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和宋德福。李克强当时分管学校部，因青工部和学校部都在机关八楼，且常坐一辆班车回家，大家相处很熟。李克强睿智、且待人宽厚热情，他是在我离开团中央后，1993年至1998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些人大都为人平和、富有朝气，个性和能力各有千秋。

八十年代团中央机关干部有二百多人。书记处先后有刘延东、李海峰、高占祥、李源潮、刘奇葆、陈昊苏、何光暐、张宝顺、李克强、冯军、克尤木、洛桑等人。 他们中很多人确实优秀且敬业，现有五人在政治局，近四十人在省部级岗位。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我被任命为"团中央青工部工交处副处长"；宋德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我又被任命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饭店筹备处处长"。一个人的成功也要有历练的舞台，团中央为这些人扬起了风帆，使他们找到了能力与机遇的最佳结合点。各级团干部因年轻，往往都热情且重感情，我们之间不少人都成了终生的朋友。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记录下共青团对我的培养和我对共青团的热爱。虽然，这段经历使我对政坛高官失去了往日的神秘感，但团中央工作的日子让我终身难忘。

三、国企总经理的那些人和事

1988年2月，我离开了团中央机关，调团中央直属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开始筹备"21世纪饭店"的工作。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投资在北京建设的一个大型项目，地址在北京燕莎商城以东的亮马河畔。"中心"由四大部分组成：一座近四百套客房的四星级饭店；一座现代化的剧场和国际会议中心；一栋很现代化的研修楼；还有一处可供正式比赛和训练的游泳馆。

我做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21世纪饭店"总经理，1988年6月，带领五人组成的研修小组赴日本研修饭店管理。两个多月的学习为我一生的职业经理生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1990年上半年饭店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饭店开业在即，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心"的领导层在经营体制和理念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谢绝了书记处拟让我任"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助理的安排，提出调动申请。宝顺书记再三挽留我，他的真情让我至今难忘。调离之前，我坚持把21世纪饭店准备上岗的400多学员培训完，把"饭店"所需的家俱全部到位后才到招商局去报到。我的第一任总经理生涯也就此匆匆止步。

回想往事，忍一忍或许海阔天空。但遭受人际关系困境时，择木而栖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也许另一处有更辽阔的天地任你驰骋。1990年8月，我带着团中央组织部给交通部人事司的调动函，到了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

"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是一家国家级旅行社，是中国特大型企业招商局旗下的一家企业。与招商局集团的远洋船队，码头泊位、银行保险、房地产和蛇口工业区等相比，招商旅游是集团内的新兴产业。1990年8月25日，我被聘为"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由于集团总部在香港，工资也比"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高出四、五倍，这也许是我工作调动的一个动力。

"招旅"总经理张宜冰，1978年从上海调团中央筹备十大。曾任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后调团中央青旅总社任副总经理。他调到"招旅总公司"后推进激励和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使"招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度成为国旅、中旅、青旅之后的又一后起之秀。我从1990年8月进入招商局，到2002年6月离开，一干又是十二年。迄今为止，我对当年张宜冰接纳和启用我仍存感激之情。

1992年3月，应蛇口招旅公司总经理周为民、副总经理张云昆之邀，我辞去了招旅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之职，到深圳蛇口主持"海上世界"工作。

"海上世界"是一艘停靠在蛇口海湾的万吨轮，这艘上下共有九层的大客船，曾是法国的一艘豪华游轮，往返行驶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等社会名流曾乘坐过这艘游轮。中国在六十年代买下这艘退役游轮，更名"明华轮"，明华轮担负过中国援助非洲修筑坦赞铁路的援外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也曾乘坐这条船访问日本。

在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开发区初期，深圳的旅游景点很少，星级饭店短缺，住宿十分紧张。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将这条彻底退休的游轮买来，让它停泊在蛇口，作为集客房、餐饮、娱乐、购物、参观为一体的旅游设施。"海上世界"成了深圳著名的景点，接待了成千上万国内和香港的游客，一度成为蛇口工业区的景观标志。

最让"海上世界"名扬大江南北的是：它曾接待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蛇口，他登上明华轮，欣然提名："海上世界"，据说这是邓小平唯一的一例为特区企业提名。邓小平的题辞为"海上世界"赢得巨大影响力。但是随着深圳特区的快速发展，"海上世界"日渐衰落。曾用几十台老虎机（一种专供赌博用的游戏机）招揽旅客，斗殴、敲诈之事时有发生，这种方式很快被公安部门查封。我的前任经理，不得已将这艘高雅豪华的游轮变成了低档小商品市场。从我主政后，尽力进行改善，但有很多事情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也常有许多无奈："海上世界"的股东们要的是投资回报；蛇口工业区要的是保住"海上世界"的社会形象；我却要面对四百多员工的生计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海上世界"的董事长在做人、做事上都大相径庭。他成全了我离开深圳回北京的梦，我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年多在深圳特区做总经理的工作锤炼，使我明白了一个真理：盈利是企业生存的硬道理。一个不能让企业盈利的总经理注定要失败，不管亏损原因来自主观，还是客观。

1993年9月，我回到北京开始为组建写字楼公司而忙碌，当时按照招商局江波总经理和招旅总公司张宜冰的思路，先租一座旧楼通过装修改造后经营写字楼，几经考察、挑选，最后选定了位于北京东三环北路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生产楼。

我参加了同"青印厂"多轮艰苦的谈判。1993年10月21日，在首都宾馆举行了租赁协议的签字仪式。

由于要将四层生产楼加盖至六层，除承重墙保留外，陈旧的设施要拆除、新的设备要安装，从土建到装修无疑就是重建新楼。我在北京团市委老同事的帮助下，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建委取得了"先开后议"的通行证，（即可以先开工再去陆续办理十五六家主管单位的审批手续）从1994年10月开始，我们一班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座现代化写字楼在北京东三环北路拔地而起。令人啼笑的是：楼已起，有关部门的审批章还没有盖完。可见办事之难，手续之繁杂，确实让人望而生畏。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几大难题：首先是资金困难。华鹏大厦装修改造，包括又加盖了五千多平米的新楼面积，共需建设资金7000万元。当时，除了外方招商局中国基金全额投入外，招商旅游的投资始终未能足额投入，外方意见很大。在工程急缺资金的紧要关头，我在团中央青企协认识的一位银行朋友，分两笔为工程贷款1300多万元。#我们自筹资金占总投资的38%，这些资金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

第二个大难题是电。原生产楼一路供电不能适应写字楼的需要，在华鹏大厦7000万元投资中，上交用电集资款和线路安装费就多达1000万元，而临近开业两路用电还不能开通。情急之中北京团市委的朋友帮了我的忙，他把我的投诉信直接递交给北京市李副市长和北京市供电局局长，在李副市长和供电局局长的过问下，华鹏大厦供电问题在开业前得以解决。难怪有人说在：当今中国，关系也是生产力。

1995年11月华鹏大厦开业，仅一个月时间，大厦出租率便达到100%；1996年全年收入达3700万元；96、97年两年投资回报率都达到33%以上，这种经济效益在当年北京房地产行业中当属佼佼者。从1995年11月开业到2001年年底，华鹏大厦返还所有贷款和工程欠款后，累计回报股东高达5236万元，股东实际投资850万元。国企得到120%的高回报。为国家纳税一千三百多万元。这还不包括7年来免费为招旅总公司提供的价值为上千万元的办公用房。

当我离开华鹏时，我将一个设备、设施完善、财务状况良好，职工队伍稳定，既无外债，又无内债，100%出租率的华鹏大厦交给继任者。上级单位在我离任"华鹏"进行审计报告时，对我这个董事总经理兼书记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但对我和我的员工发奖金超标却提出了质疑。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的旧的思想观念，其实是对成功的国企经营者一种刁难和苛求。在国企当总经理确实有太多的无奈，尽管华鹏大厦在我经营的七

年当中盈利额占招旅总公司十多家企业的二分之一，但由于现成体制既缺少科学的约束机制，也没有合理的分配机制，主要经营者除了年年的"优秀管理者"、"优秀企业"、"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外，其他待遇与系统内众多亏损企业的经营者没有多少差别。而那些债台高筑，资不抵债的企业，往往是"穷庙富方丈"，他们把企业搞得满目疮痍自己却一夜暴富。一些国企经营者，凭借行业垄断、利用政策优势、占据国家资源、拿着数百万元年薪。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不公。在国企当总经理，我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本，以销售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而这一理念也让我在几十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中得到了成功的回报。

就在我离任"华鹏"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厦居然换了三任总经理，由于领导层处理问题失当，管理失控，相互之间对立加深，导致剑拔弩张。好好一座写字楼无可奈何花落去。

2005年底华鹏大厦腾空拆楼，"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座我们曾经使它辉煌的写字楼现已彻底烟消云散。

四、潮起潮落的人生

2001年12月在一次企业家朋友聚会时，我遇到了当年在团中央青年厂长一期研究生班学习的任建新同学。他是蓝星集团总经理，一位中国企业界的明星人物。

任建新从甘肃兰州一家研究院的团委书记靠开发工业设备清洗剂，逐步将企业做大做强。我曾是他多年不见的班长，见到我他很高兴。得知我长期经营管理写字楼，他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公司主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

当时我经营的华鹏大厦，虽规模不算太大，但每年却有六七百万元的盈利。因我的利润占总公司的半壁江山，两届总公司负责人曾邀请我去做总公司的副总，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的理念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国营企业中更是如此。

没想到蓝星集团任总却锲而不舍，他告诉我国资委正在将蓝星集团与昊华集团联合组建"中国化工集团"，而且他们刚从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了几十家军队转地方的企业，他希望我过去为他在房地产和物业方面独当一面。

一边是自己经营多年、正风调雨顺、如日中天的华鹏大厦；另一边是中央企业二级公司的总经理、正局级的待遇、全行业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的舞台、工作到65岁退休的承诺。人总会有挡不住的诱惑，经过半年时间的犹豫，2002年6月，我终于做出了一项愚蠢的决定：辞去了华鹏大厦董事总经理职务，带着十几名部门经理踏进了中国化工大厦筹建的大门。

我们着手在中关村做起了筹备工作。这期间，由于化工集团组建推迟，所有工作陷入停顿。又赶上了2003年春

天"非典"，繁华的中关村失去了昔日的喧嚣和繁荣；我除了每周一听取集团的各项宏伟计划外，几乎无所事事。我由一个被隆重推出的重量级人物渐渐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听客；由一个招商集团旗下说一不二的公司总经理，变成蓝星集团旗下局级待遇的食客。一种难以名状的、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此时，我突然理解了南唐后主李煜在丢掉江山、成为阶下囚时写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心情。但人生只是单行线，自己的选择对与错都得自己承受。

说句公道话，蓝星集团主要负责人对我曾寄予厚望，也给予了很多关照。我们离开蓝星集团半年之后，中国化工集团成立了。谈到我的走，中国化工集团任建新总经理曾对我的朋友说："他当时太着急了"。

一年之后，我开始寻找下家突出重围。2003年9月下旬，经朋友介绍，我与北京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荣戈在京广大厦见面。他曾是一位职业篮球运动员、有过很长军旅生涯的年轻民营企业家。他的大厦将要开业，正在寻找合适的经理人。我们双方谈得很投缘，我也直言相告：如需要我，也要将我带到蓝星的十多名干部都安排。这种接管式的要求是有些强人所难，但豪爽聪明的林荣戈董事长却一揽子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

我与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谈妥的次日，便向中国蓝星集团任建新总经理递交了集体辞职的请调报告。从此，命运鬼使神差的让我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国营企业，跨进了民营企业的行列。

2003年10月中旬，我带着那些不离不弃跟着我转战蓝星的旧部重新回到了熟悉的东三环北路。新接手的雨霖大厦在东三环北路呼家楼，这是一座18层高的现代化写字楼，从2004年5月开业到2011年7月，七年间房屋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雨霖大厦是个民营企业，船小经不起大的风浪。作为一名高层企业管理者，我不仅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且在关键时候更要把握不该做什么。

也许是在国有企业当家做主惯了，我在国企当总经理时，总觉得自己是这个企业的主人，常有一种报国的成就感；在民企当总经理，尽管也受到不薄的礼遇，但总有几分打工者的落差。民企没有级别和退休年龄的限制，只要股东觉得你物有所值，你自己又喜欢做，做到国家领导人退休年龄也无妨。但企业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盈利生存，亏损倒闭"，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也无法逃避。回首往事，不知不觉中，我在雨霖大厦又已度过了七个春秋。

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故事。我走遍了祖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地方，也去过亚洲、欧洲、北美洲等近二十多个国家。我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也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赞叹。这也应该感谢邓小平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改变了中国。但对于现实生活中，吏治腐败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民族精神缺失等社会问题十分担忧。中国许多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注定与政治有不解之缘。我很欣赏招商集团前任领导袁庚那句话"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国家稳定是民族的大事，人民的大事。驾驭中国这条大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在振兴

经济，改进民生，扩大民主的同时，积极有效的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众多社会矛盾的出路。显而易见，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执政党自身的力量，目前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取代这种领导。

中国是个多元社会，大相径庭的"道路之争"确实存在，观点、认识不同纯属正常。但在我看来，中国的路既不能向右转，更不能向左转。历史告诉我们，处理问题务实、理性、平稳，才能利国、利民。我赞同一位有60多年党龄的老同志的主张：他认为我们党只有从上到下，先党内后党外，真正彻底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才是当今最好的出路。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古往今来多少人感叹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在现实生活中，且不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即便是年长一些的人，能有我们这代人如此丰富人生经历的也不是很多。从北京故宫角楼阳光普照的金色学生时代，到文革中风起云涌的战火硝烟；从恰同学少年宝塔山下大串联的足迹，到插队内蒙古九年的知青岁月；从北京语言学院返城待业的临时工，到活跃在羊绒衫厂的科室骨干；从十年团中央机关的高层历练，到十余年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掌门人的奉献；从中国化工集团大舞台的诱惑，到鬼使神差民企职业经理人的挑灯看剑。六十年风风雨雨，今回首，我也多少能找回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征战归来的感觉。

作者简介：林小仲，生于北京，共和国同龄人。1968年下乡呼伦贝尔盟，1977年返城。曾先后在北京市羊绒衫厂、团中央青工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深圳海上世界、北京华鹏大厦、中国蓝星集团任职，现任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闯关东的盲流们

内蒙古的东三盟和东北三省，被人们称为东北，或者叫关东。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上山下乡时，内蒙古的东三盟划给了东三省。呼盟划归黑龙江省，这里有纵横千里的三江平原，一望无际的肥沃黑土地。

在阶级斗争肆虐，贫困饥饿频发的年代，农村扶老携幼闯关东的盲流们很多。盲流即所谓"农村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这也是所谓中国特色创造出的称谓。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饥民逃荒，因为还有许多躲避政治迫害的因素在其中。

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中国天灾人祸的年代。海内外一些学者们说，那时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而近年发表的党史专著，承认在那期间，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一千多万。尽管这两个数字有差别，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时确实有上千万人饿死的悲剧，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1962年党内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总结这一悲剧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给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此事，为民请愿，却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直至迫害致死。

在大饥荒期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为求生逃难的盲流，有的地方称作自由流动人口。为了解决盲流的问题，各地成立了收容遣送站，许多地方的收容遣送站，非法拘禁、打骂、迫害这些被称作盲流的农民。

我下乡的阿荣旗有许多村屯的农民，也大都是闯关东的盲流，他们大都从山东、河北、辽宁北部投亲靠友，一批一批到这块黑土地上拓荒生存。阻止灾荒时期饥民流动，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少有的。

文化革命十年浩劫的灾难，使这种流动带有政治避难的特质。我插队的兴旺大队，近十年中，来过的盲流总有上百人，阿荣旗接纳超过十万人，后来不得不为这些新来的盲流们组建了两个公社。

盲流中运气好的，能在村里落下户，运气差的只能乞讨和偷摸开荒种粮为生。我认识的五叔一家，就是投亲靠

友落户我们村的。他一家原来在辽宁省建平县，五叔在一中学教书，为人善良，工作勤勉，反右时因为他一句话，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一家成为运动专业户，为求生存，他带着老婆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投奔了北大荒。好在村干部中有他的远房侄子，几经磨难，在村里落下了户。五叔一家的房子离我们青年点很近，加之他一家人豁达，且又有一些文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但在内蒙整内人党运动，黑龙江整建党运动中，五叔和村中的地富们又成了专政的对象，胸前挂着牌子，到各处游斗。但是村里的农民到底还是没有弄懂，什么是右派？在阿荣旗农村中，所谓富农子弟，比例很大，我们村农民中，富农子弟足有三分之一。他们之所以离乡背井来闯关东，除了黑土地粮食丰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出身不好，逼着他们远走他乡，躲避阶级斗争的迫害。

我插了九年队，最后三年在村里当生产队长，我发现那些被称作富农子弟的，大都是农民中种田高手。因此，在我的生产队领导班子里也吸收了多位富农子弟。

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带给中国社会的重创，相信历史的迷雾会被厘清。人为的将国民划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这种情况现代人恐怕难以理解。如果按照那种标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那些种粮专业户，养殖专业户，那些发家致富的带头人，遍布城乡的个体工商户，农民企业家，岂非都是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了吗？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定位，在新中国历史上，真是一波三折。

五叔的命运在盲流中，就算不错的了，他们一家能在北大荒立住脚，盖房生存，解决了温饱。许多闯关东的盲流们，只能靠将女儿嫁给他人为妻，方才能落上户。北大荒有一段著名的民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里男女比例失调，男性光棍很多，盲流们将自己的女儿嫁到村上，然后举家迁来落户，也是常事。我当队长时，也成全过五、六家这种男婚女嫁。

但是这类婚姻，有的纯粹以生存为代价，我们村杏花的故事就是一例。一天赶大车的大老李，从旗里大车店拉回一对盲流母女。母亲拖着病体，已双目失明，女儿杏花仅有十四、五岁，白里透粉的面庞，修长的身材，花骨朵一样的年华。

杏花在山东沂蒙山原有个幸福的家。父亲曾是一位解放战争支前入党的大队干部，文革中惨遭迫害，死在县专政队手里。杏花的两个血气方刚的哥哥，气愤不已，找上门寻仇，出了人命，被关进大牢，生死不明。杏花的娘为此哭瞎了眼睛，为躲仇家复仇，乡亲们凑钱，将她们母女送上闯关东的火车。

当她们母女辗转来到阿荣旗，穷病交加，困在大车店里，被大老李拉了回来。大老李是个四十开外的光棍，五大三粗的身材，吊着一张偏长的铁青色的脸，他家境贫寒，喜欢赌博，为人格色。这次天上掉下林妹妹，大老李找了一个花季少女做媳妇，成了村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大老李的家住在村后一个马架子里，马架子是北大荒的一种简易窝棚，半截在地窖里，半截在地上，人字形的草房。他家那黑洞洞的屋子里，除了灶台、铁锅、就是一铺连着灶台的土炕。三米多长的土炕，炕头码着被褥，炕中间摆着一张小木桌，白天都需要油灯照明。

杏花的娘身体病弱，双目失明，面相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尽管常咳嗽，但还是常用一根长长的烟袋，抽着呛人的关东烟，接连失去亲人，生活已将她逼到绝境。

青年点的女生告诉我们，杏花其实还是个大孩子，她时常和村里的女孩在一起玩，踢鸡毛毽子、跳格子。但人们从她忧郁的神态中，很难看到少女天真的微笑。大老李对这些并不珍惜，他对杏花母女非打即骂，尤其在外面聚赌输了钱回来，总要寻人撒气。夜晚，邻里们时常能听到马架子中杏花凄厉的哭叫声。杏花对这个大她三十多岁凶悍的男人，很是惧怕，母女两人在人屋檐下，为了活下去，面对强暴和欺凌，只能忍气吞声。由于年龄原因，杏花和她的男人，从未办过结婚登记，这在东北农村也是见怪不怪。

大老李壮如牦牛，且性情孤僻暴躁，杏花为了母女生存，沦为他的性奴隶。有多少如同杏花这样的盲流妻女，只能靠用自己的身体换取温饱和生存，她们在屈辱中艰难度日。这种非人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大老李的蹂躏折磨下，年仅十五岁的杏花悲惨离世。杏花娘，逢人便哭诉，他的女儿杏花是被大老李搞死的。后来这位可怜的瞎妈妈离家而去，不知所踪。若干年之后，大老李患怪病暴亡，村里的人说，这是杏花娘来找大老李索命。

那些落不了户的盲流们，命运也十分悲惨。我的知青伙伴肖庆平，插队时曾任大队书记。返城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博士，才携家人返回美国定居，因为他原来就出生在那里。他从大洋彼岸为《知青记忆》一书，寄来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提到"盲流"。为了维护兴旺大队局部利益不受外来盲流（国内跨省的"非法移民"）的侵扰，他曾带着民兵，将兴旺五队自来井村几家"盲流"私盖的马架子窝棚悉数扒掉，扔出人家的瓶瓶罐罐，将他们连推带搡赶出村外。不期一位遭劫的盲流女对他哀叫："我也是江苏涟水知青！"真是罪过！当时青年点上有一女生看不下去，嘟囔责备他们："太不人道。"其实这类的事，我们许多北京知青都做过，护秋时为了盲流捡粮，或者偷粮，对人家拳脚相加，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想来，盲流们比我们这些知青还要苦的多，对当年的作为，不免愧疚自责。

《阿荣旗志》曾记载，1974年那一年阿荣旗流入人口近6.6万，而自身人口只有18万。以这个记录推算，想想在呼盟，在黑龙江，在东三省，这曾是每年几十万人庞大的逃荒队伍。闯关东的盲流们，为了生存和温饱才闯关东，他们那条路充满着艰辛和苦难。

2012年中共将召开换届的十八大，一批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将进入国家领导核心层，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回报曾为我们青春挡风遮雨的农村，回报为共和国付出太多辛劳和牺牲的农民。我们都该知道，一个懂得善待自己人民的国家，才是一个有道义、有希望的国家。

【梦随风万里】：

火烧兴安岭

我下乡当知青的呼伦贝尔，除了美丽的大草原，境内还有山峦起伏，原始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覆盖着一望无际茂密的原始森林，野生动物出没，大兴安岭中的"兴安"一词系满语，寓意极寒处。大兴安岭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林区，面积814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洲奥地利的面积。春季的大兴安岭干燥，最易发生火灾，既有人为失火，也有由于雷击等自然现象造成。

我在下乡九年的时间里，经历过三次进山打火。当时一遇严重山火，各级政府会组织四乡农民，集体乘车进山打火，紧急征调来的卡车上装满了人，知青经常成为打火的主力。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寒冷季节长，除国营林场伐木工人、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狩猎部落外，人际罕见。发生火灾后，往往要动员成千上万人进山，用打防火道等办法灭火。

火借着风势，铺天盖地，风大时，烈火灼人，很难靠近。晚上火场的场景很是壮观，在草甸子里火龙燃烧跳跃，连绵数十里的火浪，过火处一片生灵涂炭的景色。而森林里则有另一番让人震惊的场面，红松、樟子松燃烧起来，自树根沿着树干上行，松油发出清脆的响声，如同一根根巨大的蜡烛被引燃。成片的白桦林，笔直的幼松在过火后，变成漆黑的木杆，当地人唤做火燎杆，事后只能砍伐做烧柴用。

打火一般都要持续七、八天，打火的人群衣衫不整，烟熏火燎，加之疲于奔波的劳苦，很是狼狈。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后方送来发放干粮，虽然多是一些生硬的饼干，而那是充饥的必备，打火的群众最高兴的是听到发给养了的召唤。很多人跟着火的后面跑，火没打多少，干粮领了许多。打火的人往往根据指挥部的意图，在大火没烧到之前，先点燃一条宽宽的防火道，继而将火扑灭。大火燃烧到防火道时，因防火道内除焦土外，已没有其它能引燃的草木，火自然就熄灭了，防火道外的森林就得以保全。

打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打火的人置身于草木繁茂之中，一旦前面的火改变方向，打火的人顷刻就会被烈火包围。不用火烧，就是浓浓的烟，就足以致人丧命，这种事在大兴安岭和内蒙古草原的灭火中，也多次造成惨剧。

知青们往往是打火中冲锋陷阵最英勇无畏的群体，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最大。1990年，我参与了内蒙古下乡知青大型回忆录《草原启示录》的编辑。我的校友，曾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的马晓力等人是这本书的总策划人。书中收录女知青金环的《青蒙祭魂》，金环是达斡尔族，当年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她讲述了1972年5月5日，西乌珠穆沁草原大火，知青们奋力救火，69名知青英勇献身，他们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

杜恒昌，北京知青的骄傲。1967年11月，北京男四中高三学生，24岁的共产党员杜恒昌放弃了和弟弟一同到父亲所在部队当兵的机会，来到了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他在这次草原大火中抢救知青伙伴，带领十几个知青冲出火海。他转身又投入火中，左右突奔，又带出七、八个知青。当他返身再次救人时，大火在一瞬间陡然增势，形成更高更厚的火幛，杜恒昌被困火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力丁，女，蒙古族，18岁，呼和浩特市知青。力丁漂亮，同伴们说她是"安琪儿"。1969年，她报考军区文工团，1970年报考外地文艺团体，都因走资派父母在"牛棚"挨斗，而断送了前程。她是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灭火那天，力丁带病蹒跚着奔向火场，这个背着"黑帮"子女的蒙古族少女，年轻美丽的生命倒在了她珍爱的草原。

最可悲的是那场火没有被人扑灭，而是在第二天烧至一条小河旁，自动熄灭。这哪是天灾，分明是草菅人生命的年代造成的人祸。草原一场无大碍的荒火，往往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待到来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过火的土地上会长满茵茵青草。那些打火的指挥者们，由于他们误判和功利，使得69位年轻的生命永远凋谢在他们的花季年华。事隔三十多年，著名知青作家老鬼探访了69名打火牺牲的知青家庭，许多人还难掩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家庭因为丧子、丧女，家庭始终陷入贫困。人们是否还记得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草原深处那69座知青们的墓碑。

我多次参加大兴安岭救火，所幸没遇到什么险情，但是兴安岭的大火，却给我带来一次牢狱之灾。1975年5月，我到大兴安岭勃克图附近的深山里修防火之路，我们打前站的共有三个人。东山屯大队的一个车老板，人们叫他老黑，四十多岁，肤色很像农村铁锅的锅底。小张是建国大队的北京知青，他是军营里长大的孩子，从小跟父母驻军河北，上中学才随军转到北京，一口唐山话，人很内向，不爱讲话。

我们赶着马车，拉着粮草、帐篷，经历了三天时间才赶到工地。五月的大兴安岭干草中刚钻出绿芽，桃花还没开，满山的森林尚未放绿。我们按照筑路指挥部分配给我们的工段，锯树搭工棚。到了做饭时，我和老黑到甸沟里小河旁边拉水，小张负责搭灶做饭。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把几块大石头垒起了土灶，紧挨在草甸子旁架锅做饭，点燃了灶里的木柴。我们赶车拉水回来，隔着几百米，就能看到灶台的炊烟。突然一阵风袭来，灶台下的火苗忽的一下窜出，引燃了近在咫尺的草甸子里茂密的荒草。不容我们有什么反应，火浪随着风势弥漫开了，任何扑救都来不及了。火焰席卷着甸沟子里一尺多高的荒草，接着冲向对岸，火进了山坡上的森林，一发不可收拾，一场震惊中

外的大兴安岭火灾发生了。这场大火蔓延了近半个月，所幸还没有烧进原始森林，国家动员了几万军民扑火，才将这场大火熄灭。

我们三个被带进了阿荣旗的收容所接受调查，在那里关着十几位"犯罪嫌疑人"和逃荒来的"盲流"，他们都挤在房间的一铺大炕上。我将两条长椅一拼，睡在门边，老黑不停地埋怨小张如何不小心。都是知青我知道小张也很难受，狠狠的对老黑说，闭上你的嘴。我无语靠在行李上看书，顺便留意观察关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们，想想这和红岩里说的监狱还是不一样，门被反锁，门外也无人值守，听说北京知青被抓进来，他们都觉得新鲜。

经旗公安部门调查，小张主动承担了失火的责任，他后来在里面待了两年，被在部队当领导的父母到阿荣旗接走当兵去了。我在那个破收容所住了五天，青年点的伙伴为我着急，设法营救。五天后我自由了，大家像英雄凯旋般迎接我的归来，我却高兴不起来，虽然只是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取证调查。

因为失火，我有过一次短暂"坐牢"的人生体验。有知青伙伴曾问我，回忆插队时，怎么只谈当生产队长的经历，没有听说你们失火走麦城那一段。我过去不愿意提及此事，是不愿意勾起失火责任人的不快。这段插曲对我来说，说不清楚是无辜还是万幸，或许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段经历。比起那些大火中蒙难的知青伙伴，我已经是幸运者了。

作者简介：林小仲，男，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共和国同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下乡呼伦贝尔（当时划归黑龙江）近十年知青岁月。八十年代团中央机关任职十年。九十年代央企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十余年。本世纪中进入民企房地产公司，时至今日，又一个十年。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重返阿荣旗

2008年秋，恰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日子，我和刘晓明、郑鹤、纪雁等人结伴重返当年下乡的内蒙古呼伦贝尔阿荣旗。

金秋九月的阿荣旗，蓝天白云、枫叶丹丹、花团锦簇，漫山遍野大豆高粱都到了收割的季节。原阿荣旗旗委书记谭宏宇、阿荣旗副旗长梁文秋、原阿荣旗委组织部长林景章等人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三十多年故地重游，最让我们惊叹的是，阿荣旗首府那吉镇的变化。1968年9月7日，我们一千五百多北京知青，从北京火车站出发，抵达扎兰屯火车站后，换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颠簸进入阿荣旗，受到旗政府组织的群众和学生队伍夹道欢迎。我们这些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城里学生，除激动地向人群招手致谢外，更关心我们将要落户之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阿荣旗位于内蒙最东部的呼伦贝尔，背靠被浩瀚原始森林覆盖的大兴安岭，前面连接富饶美丽的黑龙江松嫩平原。从扎兰屯到阿荣旗沿途丘陵起伏，山上的红松、柞树林和白桦树郁郁葱葱、千姿百态、层林尽染。阿伦河从那吉镇旁静静流过。1.3万平方公里的阿荣旗只有十几万人口。那吉镇完全没有县城的样子，两条南北贯通的土路，大片低矮的茅草房，房前堆满柴草和木头桩子，房前房后是各家栅栏围挡着的菜园子。那吉镇内像样点的砖瓦房，大多是政府机构和公营单位。

当晚，我们住进了那吉镇的大车店。马车是阿荣旗主要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东北的马车很是气派，两个胶皮车轮的松木马车，通常驾辕的马前面还有三匹拉套的马，黑土地的马高大健壮、龙腾虎跃。赶车的老板甩着大鞭杆上挂着红穗的长鞭，更是威风八面，那年头车老板在农村也算高级技工，比现在开汽车的还牛。大车店是马车夫、马车和马们落脚住宿的地方。

阿荣旗大车店是有两个足球场大，黑土加石头筑成的围墙，二十多间草屋一溜排开。院子里是一排排架在木桩

上的马槽，马大都膘肥体壮，望着那些白马、黄马、黑马、枣红马很是新奇。它们时而嘶鸣、踏蹄、嘻斗、或津津有味吃着草料。大车店里南北两溜大炕，足有百十米长，中间是一排装马料用的大缸。空气里弥漫着马粪、豆饼和老乡们抽的关东烟、取暖烧炕松木油子的味道。真是到了林海雪原，少剑波，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东北大屯子。街上老乡带狗皮帽子，穿黑袄的人居多。所以当年我们在阿荣旗，穿一身蓝是知青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十多年后，我们熟悉的那个关东大屯不见了，阿荣旗那吉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宽敞的街道四通八达，街边的绿化、道旁的路灯都展现着边陲小镇的北国风格。现代化的居民住宅、风格各异的建筑交相辉映。气势宏大的王杰广场，成为那吉镇居民休闲、晨练的场所。人们的着装与大都市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从熟悉的东北乡音，还能辨出这是那块留下我们青春的黑土地。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年在图布新公社工作过的老同志闻讯赶来，争相前来探望，他们中大都年过七旬，有的身体还不好，但相见时亲人般热情，让我们热泪盈眶。那吉镇东山新建的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松柏常青，抗日联军的英雄们曾在，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在白山黑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侵略、捍卫民族和国家生存，这也展现阿荣旗黑土地人文历史厚重。

晚饭后，谭宏宇书记兴致勃勃，带我们驱车绕城一周观赏。霓虹灯闪烁，景观灯五光十色，夜市人群川流不息。我记忆中那个满街跑猪，房屋破旧低矮的县城，在几代人努力下，已建成环境优美、民族风情浓郁的现代化小城。我们这些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变化，真是感慨良多。

第二天一早，在旗领导陪同下，我们急不可待返回下乡的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现在已改为六合镇）。高等级黑色路面的国家级公路，取代了当年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一百多华里的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梦牵魂绕的兴旺屯，村口已经聚满了热情的乡亲。虽然历经几十年的日月风霜和人世沧桑，但熟悉的面容和声音，还是彼此很快就又相认。感人的场面让很多人不禁落泪。

刘晓明在阿荣旗下乡五年中，多是在小学教书。如今那些学生娃娃，都成了四十开外的大男大女了，刘老师的称呼声不绝于耳，她细细端详他们中的每一位，搜索着留在她脑海里孩子们童年容貌和记忆。

更让刘晓明感动的是那些大嫂、大姐们，青年点女生夏日曾在农家炕头歇晌，她们揣来香瓜、沙果给她们解渴。冬天在她们家的暖炕上，扒着炭火烤着土豆，嗑着瓜子，唠着家常。她们曾给了我们这些远在异乡的知青，带来过多少家人一样的温暖和关照。

我在人群中寻找着五婶一家人，五叔王国丰在辽宁建平县乡下教书，1957年蒙冤成了右派，一家人避难投亲来到了北大荒。她家三个孩子都相继是刘晓明的学生，王伯、王雁、王红，这么多年过去了，刘晓明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五婶家在青年点房子的前面，冬天多数知青返城，她家总惦记着知青点未回家的知青。五婶家有好吃的总揣给留守的知青。我一打听，她们一家，在文革后五叔落实政策后，已举家搬回辽宁了，没见到她们，我很失落。

村里的人见我们几个回来，前呼后拥像过年一样陪伴我们在村里转。兴旺屯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马架子（一种北大荒独有的简易窝棚）、泥草屋基本消失了，大都变成水泥勾缝石墙瓦房。土地分给了个人，家家户户大都用小四轮拖拉机取代了牛、马。图布新原来是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重灾区，老乡死于克山病的人很多，这是一种严重的地方性心脏病，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能幸免于难。现在由于食物结构和气候的变化，这种病在这个地区基本消失了，新一代的人都健健康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多数人家生活殷实。农活也没有生产队大锅饭时那么累了，剩余劳力许多人走南闯北到外面打工。当然懒人或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也还有，但由于北大荒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温饱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很多庄稼人懂得读书重要，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们出去上学，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二十几个孩子在外读中专，读大学，有的已经学有所成。在旗委欢迎我们的宴会上，旗委常委韩忠民致辞时深情的说，尊师重教、崇尚文化和科学是当年北京知青留给阿荣旗的宝贵财富。许多学有所成的人，包括县乡干部都感念，当年北京知青教书育人的往事。

当年我们知青点在村后八间红瓦房，房前有两排高高的杨树，树叶繁茂，睹物思人，如今这八间房已分隔成几家农户。在这里依稀记得知青伙伴们英姿勃发的身影和难忘的蹉跎岁月，我曾填写过一首《百字令》，记述这一场景。

"北国呼盟，长相忆，插队故地重游。红瓦八间石屋，虎虎生气曾住，檐下铁锄，炕上苇席，九年风雨未染愁。晨鸡催晓，伏垄耕耘何求?如今景色依旧，燕子归来，那堪岁月流。莫道人生无憾事，只是无心回首。炊烟茅草，黄花碧树，悠闲牧马牛，念艰辛，记否同舟战友。"我们回到刘晓明当年教书的学校，由于农村出生率降低和提高教学质量，各村学校都合并到县、乡两级，这所大队学校只剩一个老师和两个学生。这位老师恰是她教过的学生，刘晓明只记得他小名叫泉子，站在我们面前的泉子已是高高的带着憨笑的大男子汉了。如果说有缺憾的话，村前村后当年满山茂密迷人的树林消失了，生态环境倒退，人进林退的悲剧还在发展，阿荣旗森林面积在不断萎缩，农村基础设施依旧落后，靠天吃饭的状态堪忧。

我们还和旗、镇村干部去为下乡时的兴旺大队书记邱真扫墓。邱真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在文革那个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他尽其所能关照我们这些知青。在他担任大队书记期间，当年我们这个近二十人的青年点中，先后有七人当过队干部，四人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上世纪末去世后，我曾代表知青点知青为他修过墓，立过碑，墓碑落款写道：兴旺大队北京知青敬立。

我们这些北京知青三十多年后重回阿荣旗，受到阿荣旗旗委、旗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我们还参观了现代化的阿荣旗水泥厂和乳制品厂，参观了阿荣旗朝鲜族风情的度假村，他们还陪我们到大兴安岭深山老林一游。旗里有关领导自豪的告诉我们，阿荣旗已成为黑龙江齐齐哈尔和大庆等重工业城市，人们休闲度假的后花园。阿荣旗还是个农业旗，工业不发达，随着公路、铁路的开通，阿荣旗一定会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遥远的知青岁月已成为历史，但是东北黑土地，美丽的呼伦贝尔，我们的第二故乡阿荣旗，却永远在我们心中有抹不掉的特殊位置。因为我们的青春献给了黑土地，献给了阿荣旗。在离开时，我们也将最美好的祝福，留给了阿荣旗和阿荣旗人民。

百字令·重回阿荣旗http://hxzq05.d68.zgsj.net/Essay/6048.xml?id=6048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我的草原恋

2012年夏，我们和几位女生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我当知青时留下青春的地方。火车驶过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跨过宽阔嫩江的江桥，很快就进入呼伦贝尔境内。

呼伦贝尔地处中国东北部，东与黑龙江省相邻，西北和西南分别与俄罗斯和蒙古国交界，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它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发祥地。浩瀚森林覆盖着大兴安岭，由北向南，纵贯中部，成为呼伦贝尔东西部天然分界。东侧是黑土平原-嫩松平原，西侧是世界著名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拥有3000多河流，500多个湖泊，兴安岭群山耸立，逶迤南去。扎兰屯、勃克图、牙克石、海拉尔、满洲里，多么熟悉和亲切的地名，那里都曾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火车沿着大兴安岭山麓奔驰，车窗外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红松、樟子松、白桦树、柞树郁郁葱葱，偶尔还能看到熟悉的村庄和农田。

扎兰屯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县级市，有内蒙古小杭州的美誉。1968年9月，我们一千多北京知青在扎兰屯火车站下车，换乘五十多辆卡车，去与扎兰屯相邻的阿荣旗下乡。1977年，我爸爸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在他为我四处奔走下，北京语言大学为我开出一张特困证明。1977年7月，我告别了下乡九年的呼伦贝尔，在扎兰屯火车站登上返回北京的火车。

当年并没有觉得扎兰屯如何美丽，或许经过这里时，大都是冰天雪地的冬季，归心似箭的我们，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当时觉得扎兰屯镇里建筑比屯子里好不到哪去，只是规模大，人也多。我认识的一些阿荣旗北京知青，他们1975年招工到这里，被安排到扎兰屯纸浆厂等企业。我们大队有一个女知青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五年，事后她告诉我，二十五年中，苦多乐少。扎兰屯地广人稀，森林茂密，河流清澈，是远近闻名的度假避暑区。我想起曾在扎兰屯生活工作过的韩冷老师，我与韩老师很熟悉。韩冷是著名的诗人和词作家，他的那首《草原恋》，沁人心肺，充满对草原生活深刻的感触，意境深远，且有哲理。加上曲作者张立中先生为之配上悠扬的蒙古长调，珠联璧合，将我们带到梦幻般的内蒙古草原，《草原恋》写道：

草原那，草原啊，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呀，马背哟，我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

催眠。那朝霞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那白云似的绒毛为我抵挡了多少风寒。无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无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

牧场哪，牧场啊,我智慧的源泉，马蹬啊,马蹬哟,人生的起点。你用闪光的格言把我教诲，你用凶猛的风暴把我锤炼。那流沙般的岁月,给了我牧人的勤劳，那荆棘似的征程赋予我骑手的勇敢。不论我走到哪里,总看得见你在举目遥望。不论我离开你多远,也忘不了你美好的心愿。

这首歌也唱出我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理解和眷恋。歌唱家德德玛用她那浑厚悠扬的女中音，将《草原恋》演唱的如神如画，充满浓郁的草原气息，能让人领略体味马背民族的坚韧与豪迈。

我们乘火车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海拉尔河的重要支流伊敏河从城市中间穿过，海拉尔现更名呼伦贝尔市，它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座新建的城市。呼伦贝尔大草原展现给我们草肥水美、天高地广的风光。在海拉尔郊外的陈巴尔虎旗，登上著名的敖包山，望着蓝天白云下的大草原，牛群、马群、羊群在绿色的草原上游动。清澈的河水九曲十八弯在草原上静静的流淌，我不禁想起曾在这里拍过的那部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一对蒙古族青年男女对唱《敖包相会》，歌中唱到：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莫尔格勒河畔，是呼伦贝尔最乡土本色的草原，它是中外驰名的天然牧场。成吉思汗曾在这里秣马厉兵，与各部落争雄。在金顶大帐里，主人告诉我们，全帐景点布局，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帐的缩影和再现。好客的主人为我们一行，在这里设宴洗尘，手扒肉、整羊席、马奶酒、醇香的奶茶，在这风景浓郁的蒙古包中，我们感受着成吉思汗子孙们的好客、豪放、热情。蒙古族的敬酒仪式，动人的呼伦贝尔敬酒歌：

举起了欢乐的美酒，放开了动情的歌喉。杯中盛满深深的爱，美酒醉心头。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朝着奔放心中走。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天南地北总是朋友。举起了欢乐的美酒，敞开了胸怀喝个够。杯中盛满深深地爱，喝一杯喜心头。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草原的深情心中留。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我们友谊天长地久。干一杯呼伦贝尔的酒，我们友谊天长地久。

悠扬的马头琴再次响起，那是草原上的天籁之音，时而犹如万马奔腾，时而犹如百灵鸟在歌唱。蒙古族的歌舞令人终身难忘，姑娘们柔美的身段，小伙子刚毅的舞姿，多彩圣洁的蒙古袍，与蓝天白云和大草原相互衬映，美不胜收。蒙古族用敬酒的方式向客人表示敬意，一般连敬三巡。我们接过酒后，用右手中指蘸酒少许，依次向天向地向人间弹三下，表示敬天、敬地、敬神灵。主人的三巡酒，我依次喝干，以示诚意。漂亮健硕的蒙古族姑娘还向我们敬献哈达，这是蒙古族待客最高礼节。

席间从北京同来的朋友即席唱了几首草原歌曲，献给热情的主人和在座的蒙古族朋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嘎达梅林》、《草原牧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主人们见到当年下乡内蒙古的北京知青，将这些草原歌曲唱的这么纯正、悠扬，他们为之动容，一再举杯道贺。

我们还去了位于额尔古纳的原始森林公园，大兴安岭山势雄浑，原始森林茂密，我们在这里一览林海茫茫松涛阵阵的壮丽风光。除了大片红松等针叶林外，还有白桦树，柞树等其它树木，金秋时节，五彩斑斓，蔚为壮观。这里还可以领略遥远的额尔古纳河风光，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支流，上游是发源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海拉尔河，经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后，通过达兰鄂罗木河流入额尔古纳河，蒙古帝国及北元时期是中国内陆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参观了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满洲里紧邻俄罗斯，它是我国重要的边境城市。市内有很多俄式建筑，并有许多出售的俄国商品的商店和俄式小酒吧，这里完全木质的俄式建筑更吸引人们的目光。

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的呼伦湖，被人们誉为草原明珠，这是一座2600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呼伦湖中生产数十种鱼类，湖畔沼泽区是重要的水禽生息地，这里是天鹅、丹顶鹤等鸟类的天堂。湖畔的草原则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优越的牧区，著名的三河马就产与此。

位于呼伦贝尔市的北山地下军事工程遗址，是日本关东军为进攻苏联，而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最大一处军事工事。我们走进这座大型地堡地下工程，它依山而建，内部设施一应俱全，军事后勤环环相扣，工程之大，令人感叹。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仅用一个星期就粉碎了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年苏军一路大军就是由呼伦贝尔向东北推进，在苏军海拉尔战役陈列馆中，我们看到为夺取这一日军军事要塞，曾有多位苏军士兵用年轻的胸膛扑向日军地堡枪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壮烈牺牲。但遗憾的是，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不仅不肯归还沙皇俄国强占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他们还作为积极推手，以大国沙文主义损人利已的手段，将国土面积26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从此，成吉思汗的草原被分割，与呼伦贝尔有久远历史的山河天各一方。从大清王朝康乾盛世开始，为人熟悉的硕大桑叶形中国版图，在上世纪中叶，被改变成现在这样一唱雄鸡天下白。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在额尔古纳河畔，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蒙古族逐渐形成许多民族和部落。距今八百五十多年前，公元1162年，成吉思汗诞生在呼伦贝尔这片中国北方广袤的大草原上。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少年时因其父遭塔塔尔族杀害，身为长子的铁木真，携母亲和弟妹远走不峏罕山区，逃避塔塔尔族追捕长达数年，自此形成他刚毅忍辱性格。成年后，铁木真之妻被抢，而他落荒而逃至同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结盟兄弟扎木合处借兵报仇。1203年虎踞呼伦贝尔的王汗将铁木真收为义子，导致王汗之子桑昆跟铁木真的仇恨，札木合鼓动桑昆联合其它部落夹击铁木真。这是他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仗，他的军队只剩下4600余人。他逃到

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贝尔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南部边缘，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吞吐湖，与呼伦湖为姊妹湖，现在是中蒙两国共有的湖泊，面积609平方公里，乌尔逊河水从北面将其同呼伦湖连接在一起。铁木真当年秋天率军突袭王汗驻地，三天消灭克烈部。铁木真以上的故事都发生在额尔古纳河沿岸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尔后，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的众部族。1206年，铁木真在现蒙古国境内的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成吉思汗即位于此。1211年，成吉思汗的军队三次入侵西夏，逼西夏向蒙古求和，然后进攻金国，在野狐岭会战大破四十万金军。1219年成吉思汗统帅蒙古主力西征，先后消灭西辽、花剌子模及许多国家。1227年，在蒙古军围困西夏首都时，成吉思汗病逝于宁夏南部六盘山，一代天骄终年66岁。

成吉思汗从呼伦贝尔开始，成为第一个统治全蒙古的人。成吉思汗在呼伦湖东迎娶美丽的孛儿帖，成就了那段金戈铁马中一段英雄美人佳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善待部属，麾下人才济济。用战争征服天下的他，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妻妾无数，只有六人具有皇后地位，她们是孛儿帖、也速干、也遂、忽兰、古儿别速、合答安。大皇后孛儿帖生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地位最为尊贵。成吉思汗去世后，这个黄金家族也发生了为了争夺皇权骨肉相残的悲剧。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了以元大都（北京）为首都的蒙元帝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横跨欧亚，总面积达3400万平方公里的蒙元帝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忽必烈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之子。我们漫步在成吉思汗的草原上，回想着这位历史上的英雄，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文革的浩劫中，曾经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天津、上海、海拉尔知青下乡呼伦贝尔。我在阿荣旗的九年知青岁月中，曾有五年出民工，足迹遍布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静静流淌的额尔古纳河畔，辽阔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都曾有过我们青春的身影。这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大草原，留下我们那代知青人心中永远的草原恋。

克明是著名的词作家和电视主持人，他也是我们老三届的同龄人，我和克明是好朋友。克明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曾下乡黑龙江农场，后转到呼伦贝尔。克明是蒙古族人，他在文学艺术上出类拔萃，身上带有成吉思汗子孙的淳朴、潇洒、豪放，他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词作者，在这首歌里克明写道：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茫茫草原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

我的心爱在高山，高山深处是金色的兴安，巍巍兴安云海间，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云朵朵飘在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恋。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在河湾，额尔古纳河穿过那大草原，草原母亲我爱你，深深的河水深深的祝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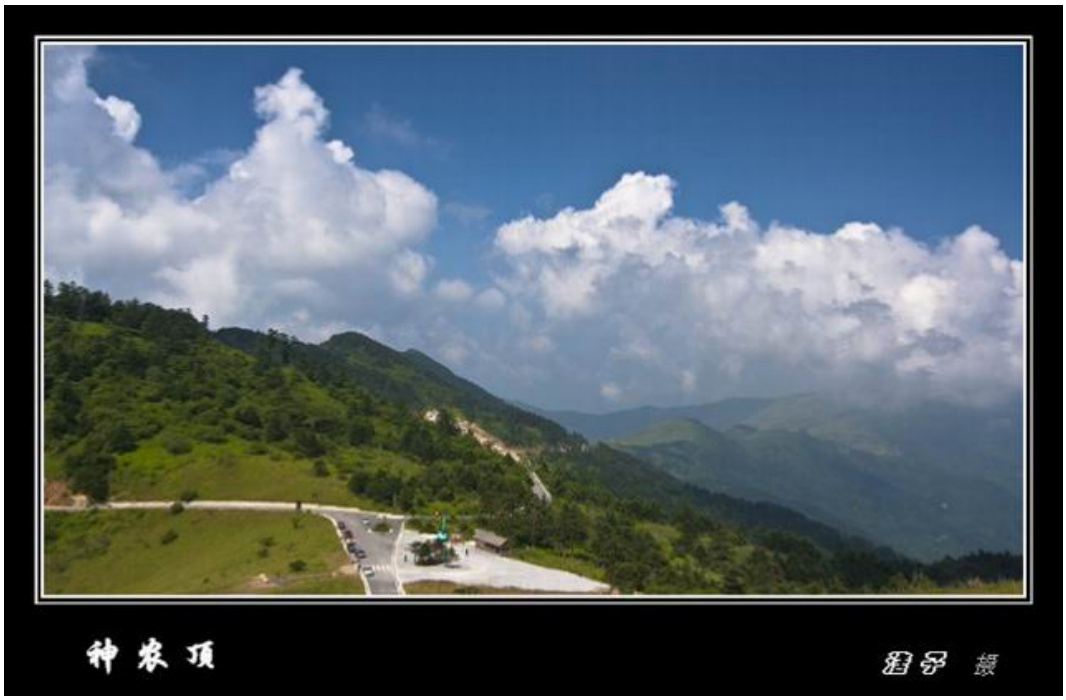
呼伦贝尔大草原，云朵朵飘在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心爱我的思恋。呼伦贝尔大草原，云朵朵飘在飘在我

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恋，我的心爱，我的思念。

九天后列车缓缓驶进北京，我们在内蒙古的马背上，悟出人生的真谛，心中有呼伦贝尔抹不去的绿色回忆。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大学的阶梯教室

我1983年至1986年在首师大（原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度过我的夜大学生涯。

我从小在师院附中长大，师范学院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夏日在游泳池里戏水，冬日在滑冰场溜冰，大礼堂周末人满为患的电影夜场，大学洗澡堂里雾气中听人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何为政教系？我记得上小学时在师院玩时，请教过一位政教系的大学生，他略微沉思片刻，告诉我政教系就是学习管理人的学科。多年之后，我也考进了政教系。没想到我这一生主要的职业真是管人。

我们的教学楼在校园花果山旁，花果山是校园中一处果木繁茂、鸟语花香的山坡。我们班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上课，同学有八十多人，很多人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业，已走上工作岗位，又到这里接受大学教育。同学中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干部，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军人从着装看，海、陆、空三军都有。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人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又纷纷用业余时间涌进大学的课堂，圆他们的大学梦。

上夜大学很是辛苦，每周四个晚上的课，机关下班后，在食堂吃点饭，匆匆挤公共汽车赶往地处西郊八里庄的学校，两个小时的课结束，回到东郊工体路的家往往都要十点之后。星期天还有半天的课，但大家上课热情不减，这些年龄不同，岗位不同，职务不同的学生，在那间被日光灯照的明亮宽敞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无论是各科教授的授课，还是学生们听讲记笔记，都让大学班主任感慨，夜大学大学生们学习比在校生还要认真勤勉。

班里同学太多，认识的大都是座位周围的同学，蔡增朝、张白鹭、梁凤英、林燕、杨建平、陆焕玲、于振永，这都是我熟悉的同学。其中于振永是北京团市委统战部部长，多年来他帮过我很多忙。陆焕玲是一位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她在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与我所在的团中央机关一路之隔，现在在国家质监总局任司长。蔡增朝来自企业，学习最认真努力，我们常抄他的课堂笔记，特别要考试了，总会有平常不用功的同学围着他团团转，他为人

热心，来者不拒，蔡增朝的哥哥蔡赴朝曾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建平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他热心张罗同学的事。张白鹭、梁凤英、林燕都是师院的家属或教工，几位花季年华的女生。

在夜大学的那几年，我在团中央青工部，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要到全国各地出差。即便在北京时，团中央组织的全国性活动也十分繁忙，所以难免缺课和请假，也许是机关门头影响大，我缺课总会被老师盯上，甚至被亮过黄牌。北京机械局团委书记张建勋，农机局的团委书记马洪利都是我的同学，他们调侃我，怎么样？团中央的领导也不好当吧？玩笑归玩笑，学校考勤、考试都十分严格。我翻开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中共党史88分、形式逻辑75分、中国近代史良、国际共运史88分、心理学70分、文学概括论优、哲学90分、科学社会主义85分、政治经济学77分、法学概论92分、美学良。这些功课的分数基本能反应我的学习状况。白天上班，晚上上大学，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学习形式产物。阶梯教室的大学生活，使我系统学习了政教系的必修课，更重要的是教会我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逻辑思维方式，大学生活的熏陶提升了我的知识境界。2000年至2002年，我在北师大就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却再也没有师院阶梯教室里那份认真投入。

我思念阶梯教室窗外树影婆娑、明月皎洁，教室内灯光通明，书香墨迹发出的淡淡芬芳，教学氛围浓郁的大学阶梯教室，聚精会神、求知若渴的年轻男女学子，那里是我们人生航船起锚的加油站和港湾。回首往事，我不由想起从阶梯教室走出的几位大学同学的经历。

孟桐曾是部委领导的秘书，九十年代后，他到河北去任县委书记。那是一个位于太行山区的农业县，老百姓的日子清苦，县财政也很拮据。孟桐充分运用了北京高层的关系，为他所在的县脱贫致富尽心竭力。县委大院的工作人员感慨，孟书记清晨起得最早，晚上办公室关灯最晚。我有一次到县里去看他，他认真的给我算了笔账，这个县刚解放时，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也就三、四个人，而现在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县团级干部就有五十多人，下面还有几十家科局级单位，各乡镇也是官满为患。在现时中国社会，官吏人数之多，政府机构之庞大，属历朝历代之最。孟桐苦笑着说，很多地方财政就是吃饭财政，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人员，中国的纳税人要养多少人？而机构却越减越多，很多机构中官多兵少。这些现象加剧了官场权力腐败，增添了干群矛盾，给纳税人和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压力。中国官场有一种普遍的躁动现象，干事想当科长，科长想当县长，县长相当市长，以此类推。很多人踏上官场的一个台阶后，马上想到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急于再上一个台阶，而我们的官员多是上级任命的，唯上是官场普遍现象，弄虚作假、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见怪不怪。因此跑官、贪腐、行贿，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孟桐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是我们的干部制度缺陷所为。至于那些官场上迎来送往，主官们的每天忙碌在应酬的酒桌上，他有切肤之痛，他有时一顿饭要客串四、五桌，这种既损害身体，也影响工作的应酬，孟桐感到很是无奈，他说，吃饭也是一把手工程，中国官场吃饭讲级别排序、接待规格，为了县里工作，我谁也不能得罪。难怪老百姓调侃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有一次省厅到县里考察项目拨款，熟人见面酒桌上热闹非凡。推杯换盏中厅长半开玩笑对县委书记说，孟书记要喝下这八杯酒，项目拨款的事就敲定了。孟桐一看，一杯高

度白酒有二两。孟桐酒量并不好，大学同学聚会时，一瓶啤酒他都会喝得满脸通红，这八杯足有一斤六两，他迟疑了一下，一口气将八杯白酒干了下去，接下来因为深度醉酒住了一周的医院。孟桐身体原本健壮，现在肝、胃都不大好，还有糖尿病。孟桐带领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多次从北京和省城为县里引进资金和项目，他们与北京农业大学合作，将蔬菜大棚和果树栽培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了太行山，将澳洲的奶牛和产羊绒的山羊引进农户，发展养殖户。因地制宜建起了石材厂、水泥厂、铁矿等企业。在国家资金帮助下，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翻新重建了全县多数中小学。难怪孟桐离任时，县里干部群众都赶到县委为他送行，感人场面催人泪下。

孟桐现在已是一位副省级干部了，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老同学，官场的阶梯，可比大学阶梯教室的阶梯难走多了。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可谁知道这里有多少利益集团的障碍。但是如果不痛下决心改革，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恐怕就会流失，官场腐败和社会矛盾会积重难返。

高安阳是我们班年龄较大的同学，他插过队、当过兵，他担任北京一家中字头国企外贸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在高安阳的打理下顺风顺水，成为国内同行业的知名企业。各种赞美和荣誉也接踵而至。高安阳有内地到香港多次往返通行证，渐渐北京公司总部少了他的身影，霓虹灯闪烁的维多利亚海湾的中环大酒店中常见他出没。公司的人开玩笑说，高总在香港的时间，比在北京多。高安阳对高尔夫球场近乎痴迷，他的豪华轿车后备箱里装满高尔夫球杆、球具及专用服装鞋帽，他的高尔夫水平在北京圈内堪称一流。

随着外贸进出口改革开放，靠批件和少数国营企业专营的外贸体制被打破，加之公司管理和经营疏于打理，高安阳的外贸公司经营开始滑坡。给人豪爽憨厚感觉的高安阳，已缺少了当年的敬业和开拓精神，置工作责任于不顾，却对官场运作颇具心计，他每逢节假日都会宴请主管领导，从海外归来总不忘给用得着的上级关系备份厚礼，自然这些也不用他破费，都打到公司公关费中去了。他还精心组织上级领导夫人们两次海外游，美其名曰是市场外贸外销考察，安排专人全程陪同，服务有嘉。深得这些眷属们的称赞，枕边风自然也吹到能决定高安阳权利命运的领导耳中，故他格外受到领导青睐。所以尽管时有公司员工向上级投诉他，他却能在上级庇护下，十几年在那个有丰厚待遇的岗位巍然不动。他在公司却越来越独断专行，有恃无恐。公司几位副手如同虚设，他待下属有失宽厚，且任人唯亲。

1994年，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的出现，使高安阳的命运出现逆转。丁蕾，南方一家报社的女记者，她和高安阳在深圳罗湖口岸不期而遇，晚上他们在深圳阳光酒店共进晚餐。高安阳为丁蕾貌美和高雅举止所心动，丁蕾白皙的脸庞，微笑中似乎已猜透这位有身份矜持男人的心思。那天他们谈得很晚，葡萄美酒也喝了许多，晚上就一起相拥下榻这家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似魂断蓝桥般奇遇，俨然如新婚般投怀送抱、相见恨晚，高安阳整整一周都同丁蕾在深圳如胶似漆打得火热。临分手前，丁蕾含情脉脉的向他提出为她一笔钢材生意提供借款，答应一周之后便将借款归还，沉迷在热恋中的高安阳欣然答应，并电话指令北京公司总部财务将500万资金打到丁蕾指定账户。事

后，待高安阳回到北京后，再也联系不到丁蕾，报社说她已不辞而别。高安阳因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经公安机关追捕，两年之后，丁蕾在香港被擒遣返，但只追回部分款项，高安阳为此在牢屋中面对铁窗度日十余年。最近有同学遇到重获自由的他，高安阳已完全没有了昔日风采。

韩秀萍是我们班一位才女，某国家级出版社编辑，曾在北京文学沙龙圈里颇有一些名气，她人漂亮，性格率直，当知青时，曾在内蒙古大草原放过羊。她曾说过，到师院上学就为了拿张学历文凭证明自己。在上美学和文学概论等课时，她还多次为一些问题与授课老师争执不下，我们都劝她要有颗平常心。韩秀萍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出版了两本小说，颇受欢迎，一本小说还被国内一位知名导演改编成了三十多集的电视剧。正当这部电视剧热播时，杜撰韩秀萍同那位导演的特殊关系，也被一些下三滥媒体描写得绘声绘色。因为这件纯系捕风捉影的传闻，导演夫人先到全国妇联告状，继而又多次到韩秀萍单位找领导上访哭闹，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韩秀萍碍于脸面，不得已到单位辞职，成为了自由撰稿人。祸不单行，韩秀萍在某单位担任领导的丈夫老杨真有了婚外恋。老杨先是在单位同办公室女秘书传出绯闻，接着又在家中被韩秀萍撞到奸情。在韩秀萍与老杨的争吵指责中，老杨却大言不惭的辩解，这一切都是因为韩秀萍的出轨在前。韩秀萍认为自己被冤枉，却又百口莫辩，情急之下毅然与老杨分手。韩秀萍曾愤然对我们说，人言可畏，现在知道阮玲玉当年是怎样被谣言逼死的了，谎言说多次，成了事实。但是人一旦豁出去，世俗烦心都会烟消云散。她悔恨自己为什么会和老杨那样的伪君子夫妻多年。事后，老杨因种种劣迹被查处，晚景凄凉。

韩秀萍经历这一磨难，对社会学却多了几分深刻。同学聚会时，她告诉我们，她正在酝酿一个大部头的现时社会问题体裁的电影剧本。韩秀萍说，她现在有时很留恋在北京师范学院那个年代，同学之间很友好，没有猜疑，大家求学努力，没有功利和陷害。她百思不得其解，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增强，人民富裕，而道德水准却大不如从前。韩秀萍和我们聊起电视节目时，她不改年轻时的直爽，她搞不明白许多低俗节目为什么那么有市场，对那些靠娘娘腔取悦人的表演，她更是愤然。她觉得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如不注重道德教育，不提倡英雄主义、强化民族责任，一旦国家有难，后果不堪设想。她留恋插队时在内蒙古草原，感受马背民族的英勇、无畏、豁达、宽厚。我很认同她的想法，这不仅仅是在愤世嫉俗，中华民族要珍惜传承自己的英雄气概和道德水准。

大学中的阶梯教室已离我们渐行渐远，我那些生动有个性的大学同学们，也在几十年后，还在书写着人生经历的故事，谱写着与时代命运相伴的篇章。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梦随风万里】：

风雪燕窝岛

1968年9月，我们一千五百多北京知青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当时的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呼盟在黑龙江省的西面，境内有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前面是蜿蜒宽阔的嫩江。而我们许多师院附中同学下乡的宝清、虎林在黑龙江省的东面，那里紧邻中苏界河乌苏里江。

1970年12月，我们青年点六位知青结伴而行，去宝清雁窝岛八五三农场探望在那里下乡的同学。12月的黑龙江到处是冰天雪地，白雪皑皑，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从阿荣旗跨越嫩江，到达距我们村最近的城市齐齐哈尔有三百多里路。那时在农村插队的穷知青兜里没什么钱，我们六个人先从齐齐哈尔扒客车，混到了省府所在地哈尔滨。而后在哈尔滨，设法溜上去边境小城东方红的客车。

这是一列见站就停的慢车，车里人很多，既有提着大包小裹的东北老乡，也有许多一看就是城里来的知青。那时在三江平原（俗称北大荒）下乡的知青有几十万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许多城市。着装举止能够很容易区分出老乡和知青，老乡大都穿一身黑色的中式裤袄，还有一些皮毛在外的套装。知青大都是一身蓝，或一身国防绿的军便服，女知青往往多了条鲜艳的拉毛围巾。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学生娃娃脸，从那些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江浙话，很容易找到相同命运的知青。

我们混了一路免费顺风车，多次在不相识的知青伙伴掩护下，躲过列车员的查票，但火车经过佳木斯后还是出事了。火车进入夜间行驶，车窗上结着厚厚的冰霜，车内灯光昏暗，折腾了十多个小时，我们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都渐渐进入了梦乡。我突然被身旁一位刚结识不久的天津知青推醒，查票的来了，我看见乘务员、乘警一组人沿车厢正在查票。顾不得想太多，也来不及叫同来的五个伙伴，我溜进了车厢另一侧的厕所，将门反锁上，然后用手紧紧压住把手。过了没多久，听到有乘务员敲厕所的门，并用钥匙开门，由于我压住门锁，门没有被打开，大概他们认为门坏了，居然走了。

那时列车条件很差，厕所里呼呼冷风，地面都结了冰。我坚持了一会，听到门外没有了动静，便开门溜了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那几位天津知青告诉我，你们那哥儿几个、姐儿几个，都被乘警带到餐车去了。我沿着他们

给我指示的方向寻去，在9号车厢很快找到了餐车。餐车门口聚集着一堆看热闹的人，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看热闹取乐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

我挤在人群中，看到我们那几位兄弟姐妹正在跟列车长调侃。列车长是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大姐，个子高高的，略有些胖，大嗓门，典型的哈尔滨人。她正在宣讲铁道部和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有关购票管理规定。傅平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却以老谋深算自居，那年他也就22岁。他开始哭穷，说北京知青在农村插队多么不容易，挣一年工分买不了一瓶醋，爹妈托我们去宝清雁窝岛看下乡的弟妹，他们都是六九届的，才十五六岁。我听得差点乐出声来，我们插队虽然穷，但东北农村哪有他说的连壶醋都挣不出来的地方？他怎么又蹦出那么多六九届的弟妹。可看坐在那里的老金、小肖、冯婕、小梁，人人都表情严肃，一副诚实可怜的样子。情况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刚才高声教育他们的女列车长，和帮忙训斥的乘警不出声了。只见那位女列车长眼圈有些泛红，声音柔和了许多，她说，你们别给我演戏了，我弟妹都在虎林（离雁窝岛很近的一个县）下乡，我知道知青穷，在农村下乡的知青更不容易。她接着说，我有我的职责，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了,离开前她嘱咐乘警到东方红站后将我们送出检票口。

火车沿着东北的林海雪原向前奔驰，蒸汽机车的轰鸣、汽笛缭绕。终于在黎明时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东方红车站，这里距离雁窝岛最近。我们谢别了列车长和乘警，在冰天雪地的站前广场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程。

东方红车站距离雁窝岛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正在为难之际，站前广场的情景吸引了我们。广场上那些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大孩子们大都是知青，凭借着知青相同的装束，在几位热心的哈尔滨知青帮助下，我们搭上了一辆去雁窝岛八五三农场的卡车。驾驶室已挤满了三个人，我们六个人只好站在这辆解放牌大卡车后车厢内。车厢无蓬，他们是到火车站提货的，装着大半车农机具。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加上卡车行驶中带起的风，朔风吹，林涛吼，真体会到刺骨的寒冷。

北京知青办发的那一身蓝色的棉装，无法抵御东北零下二、三十度严寒，更何况坐敞篷车行驶在广漠的荒原上。这时我们才体会到东北的林海雪原可不都是浪漫,亏了我那顶狐狸皮帽子，火红的毛色，柔软的底绒，威武的形状，多少给了我些温暖。

三江平原的雪景颇为壮观，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榛柴、蒿草、芦苇在寒风中摇摆。近处的松树林枝干上压满了雪，却挡不住亮眼俊俏的深绿,一片片白桦树婷婷玉立，不理会暴风雪的侵袭。时而与汽车擦肩而过的胶轮拖拉机，屯里老乡四匹马拉的大车疾驰而过。远处的村庄升起缕缕炊烟，牛羊在围栏中欢叫。在东方雪线和蓝天交接处，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这一切构成了北大荒壮阔的冬景图，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倒觉得空气格外新鲜，举目四望都充满生机。

雁窝岛曾被人们誉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地方。还有一句难忘的话，"北大荒真荒凉，又有

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雁窝岛位于完达山北麓，三江平原腹地,电影《北大荒人》记述了，1956年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十万复转官兵，开垦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创业史。1967年底之后，数十万城市知青到三江平原，到雁窝岛，这块美丽富饶、充满神奇的土地，谱写他们新的军垦战歌。我们学校中很多同学，就是1967年下乡到这里的。1970年之后，许多刚从小学六年级升入中学的学生，又被安置到黑龙江各垦区，他们多数人，下乡时只有十五、六岁,这里包括几位我曾熟悉，现在已担任共和国省长、部长的朋友。

在冰雪乡村公路上，颠簸了近三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八五三农场所在地雁窝岛。下车时，我们大都已经冻得不会走路了，半天才缓过劲来。在遥远的雁窝岛，同学相见分外亲，农场的知青不同于我们插队，这里是知青的天下，有点像学校的集中劳动一样。在炉火正旺，温暖如春的宿舍里，我们见到了北雁、张敏、刘静、罗军、援朝、国华、海丽等许多同学。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同学，而且多数人还是文革中患难与共，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伙伴。午饭时间到了，他们到食堂打来许多饭菜招待我们，女生拿出北京家里寄的香肠火腿，男生拿出舍不得喝的北京二锅头，在炊事班帮厨的，还偷偷炒了几个菜带来，席间他们告诉我们，盛夏和金秋的雁窝岛更加美丽,这里是三江平原湿地的缩影，蓝天旷野间水草迷人，杏黄色的野浮萍争相开放。宽阔的水面上，丹顶鹤、天鹅、灰鹤、白鹤自由飞翔,雁群排行比翼齐飞，碧空展翅，雁窝岛是鸟类的天堂。挠力河水静静淌过，奔向东北方的乌苏里江，两岸芦苇，小叶樟、水草风茂，草甸一望无际,这里更是粮食的高产区，盛产大豆、玉米、水稻。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夏秋雁窝岛的美景，即便在冬天，我也能感受到雁窝岛的美丽，黑土地上圆木搭成的排房，房前房后茂盛的松树林，白杨林，白桦树。更有荒原上一望无际的白雪美不胜收，白皑皑的雪在阳光照射下，泛着晶莹的光辉,呼呼的北风，将扬起的雪粉飞落在脸上。我想起了那句话，"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大姑娘叼着大烟袋。"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就是富饶美丽、充满传奇的草莽关东。

我们在雁窝岛同学相聚，谈得更多的是珍宝岛。珍宝岛在雁窝岛的东北方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为了反击苏联军队的侵略，1969年3月，暴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激战九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袭击，击退苏军3次进攻，胜利的保卫了祖国的珍宝岛。而包括八五三农场，及乌苏里江沿线许多农场知青，都参加了那场神圣的国土保卫战,他们帮助解放军搬运弹药，抢救伤员，站岗放哨，保卫运输线。还有知青直接参战，北京育英中学、师院附中等学校都涌现出许多战斗支前英雄。

沙皇俄国从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起，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将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五个浙江省，领土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在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竟然厚颜无耻的说："沙皇专制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从未同中国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据此暴发了中苏两国，为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的争夺战。滔滔的乌苏里江，英雄的珍宝岛，中国军人和知青们用热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珍宝岛。历史告诉我们，"和为贵"是打了胜仗才能实现的。那时黑龙江的农场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看着《英雄儿女》、《南征北战》、《董存瑞》长大的知青，

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珍宝岛保卫战虽然结束了，但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畔。

从生活上来说，在农场和兵团的知青，要比插队农村知青享福不少。在那个年月，农场兵团知青属于农工待遇，有几十元的工资，吃饭有食堂，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也比农村高得多。而插队知青，十来个人分在一个村里，条件差的地方，温饱都是问题，夏天农田里，大都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但农场兵团，受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深，有的地方知青受到政治迫害，有的精神上感到压抑和无望。在黑龙江兵团现役军人，迫害女知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相比之下，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宽松一些，虽然生活艰辛，但受到阶级斗争冲击，要缓和许多。比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知青们，那些成千上万闯关东的盲流（盲目流动人口）更不容易，许多人，因为在山东、河北、辽宁吃不饱，来闯关东。更有许多人，不堪在家乡政治上受打击歧视来闯关东。我下乡的兴旺大队社员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是地富子弟，他们多是投亲靠友来北大荒，也有不少人，被地方政府抓住收容后遗返原籍,他们中许多人扶老携幼，逃荒处境悲惨。而我们却有这么多知青同学，相比之下，命运已是不错的了。

我们来雁窝岛，看望的几位女生中，北雁是我们这个同学圈里，最受大家推崇的人。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重重压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共同命运，将我们这伙人聚到一起。北雁是高中学生，功课好，文静、漂亮，又很有独立见解。她爸爸是北京一家部队总医院科主任，军内著名医学专家，文革中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政治迫害。我们那代人都一样，父母文革遭迫害，很快株连到子女，这样的人不能当兵，不能上大学，招工没份，返回北京更是困难。北雁苗条身材，扎着两条短小辫，常穿一身军装，骑着一辆26凤凰自行车，她稳重、富有魅力。有一次我们学校"红革会"二十多人围殴一名外校同学，北雁见状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一个柔弱女子，居然震退了那帮在动乱中良心泯灭手持凶器的人。

北雁与我们年龄相仿，但她在我们心中倍受敬重。不想在我们这次八五三农场探营后不久，北雁却匆匆嫁给了当地农场一位老职工家的农村青年。原因何在，当事人不说，终成为历史的疑团。但现在想来，在文革动乱岁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在我们那个同学圈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掀起了从东北、内蒙、山西、云南等地下乡的同学们，借春节回家赶回北京，对她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她不顾我们强烈反对，毅然走上那条让人费解的婚姻之路。

伴随着文革结束，北雁父亲官复原职，北雁将她的夫婿和女儿从雁窝岛带回了北京，她在一个单位管财务，她先生在一家医院维修班，当了一名修理工。北雁后来还生了一场大病，好在现在还健康,女儿下海不顺利，家境至今一直不是很好。四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这位熟读中外名著，外表秀丽、端庄优雅的才女，为什么非要走上，那条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结识了一位驻京部队总医院的院长，席间谈到我的同学北雁和她的父亲，这位少将院长肃然起敬的告诉我，北雁的父亲是他的恩师，曾是他们医院著名的专家。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一千七百万知青，如同雁窝岛上的雁群，春来秋去，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村、

草原、荒滩、林区、海岛、边疆书写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历史。辽阔的黑龙江、美丽的雁窝岛，波浪滔滔东去的乌苏里江，是否还记得数十万知青闯关东的年代。那个年代，不同的人生境遇，也为知青的人生，奠定了不一样的人生轨道。有的人在磨难中成功，有的人在磨难中消沉，有的人得到受益终身的锻炼，有的人收获了一生难以挽回的重创。但四十年过去后，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都没有忘记留住青春那些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的遥远的知青岁月，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历史久远，故事情节也难免会有误差，况且往事，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及，故将本文人物都做化名，权当听我在农村生产队高高谷堆上，给你们讲过去的故事。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梦随风万里】：

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

25年前，1986年3月，我曾参加团中央下基层工组团，在井冈山的永新县工作了两个多月。2011年4月，我们一行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坐落在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九月下旬的井冈山林木葱茏，气候宜人，满山的红杜鹃含苞欲放，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相衬。井冈山的瀑布从山岩上飞流直下,溪流湍急，竹林在微风中摇摆。

井冈山曾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在永新与贺子珍走到一起，在井冈的八角楼，曾流传着一首动人的歌曲，"八角楼的灯火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六州风雨笔下倾，五湖四海红旗扬。"井冈山斗争当年异常激烈和残酷。我到过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的宁冈龙江书院。也曾站在永新三湾那棵古老的大榕树下，回忆三湾改编的历史性一刻。我几乎走遍永新县的各个乡镇，贺子珍被人们誉为永新一枝花。她们兄妹多人，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参加红军、参加革命。贺子珍的经历极富传奇，她在长征路上，为抢救遭敌机扫射的红军伤员，拼死相护，身负重伤。在延安，由于江青的介入，贺子珍愤然远走苏联治病。解放后，贺子珍一直居住在上海门庭冷落，粉碎四人帮后，贺子珍才英雄凯旋般的又回到人们的视线。永新任弼时中学前有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碑下掩埋着被肃反AB团错杀的红军将士。永新曾是将军县，共和国一批开国将军出自这块红土地。肖克、王震、王恩茂等人都曾在这里征战。可惜当年接纳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却在红军内部肃反中遭错杀。站在井冈山烈士陵园，望着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林彪、袁文才、王佐等人的照片，我久久心情难以平静。

在井冈山干部学院，我们受到学院常务副院长周金堂的热情接待。周金堂曾是吉安团地委书记，1986年，我们下基层工作团在井冈山时，我们与他朝夕相处近三个月。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我在许多历史镜头下驻足。毛泽东引兵上井冈，三湾改编与创业奠基。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红色政权与土地革命，八月失败，黄洋界保卫战。出击甘南，井冈山突围。中国革命经历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

要的历史地位，井冈山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起点。

井冈山各个景点都人头攒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则井冈山风景如画，二则仰慕井冈山的名气。据说在当今干部中还有人相信，要进步提拔，要到井冈山拜山。干部升迁前却避开同在江西的庐山，有人说，庐山是共产党干部走厄运的地方，想来也有几分道理。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为民请愿遭贬，正常党内意见之争，却被打成反党集团。1970年庐山会议，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一项提议，引出关于设立国家主席之争，演变成新一场党内斗争暴风骤雨，导致之后林副统帅出走，新的一个反党集团诞生。一些人由此得出结论，庐山是阴山，求官运要上井冈山。这当然是俗人们的玩笑，殊不知井冈山也洒满先烈的鲜血，许多人还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但我仍对井冈山怀有深深的敬意，巍巍的井冈山，涓涓流水的茅坪河，禾川河环城而过的永新县，那里留下厚重的中国革命史，也留下几代人为国家民族振兴的理想与希望。

在井冈山停留两日后，我们驱车下山去赣州，在赣州我们受到赣州海关罗晓华关长等朋友的热情接待。赣州位于赣江上游，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郁孤台、通天岩、葱云台等名胜古迹。辛弃疾在这里为国土沦丧壮怀激烈，蒋经国曾在这里为民族复兴领导新文化运动。

次日，在赣州朋友肖京副关长的陪同下，我们走访赣南瑞金。江西是个多山多丘陵的地方，所到之处绿水青山，林木广茂，花草斑斓，农田里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微风中金灿瑰丽。白墙黑瓦的赣南农舍，蜿蜒曲折的河流，现代化工业园区，高速公路沿线的通讯塔，都留给人很深的印象，江西是全国绿色生态保留最好的省之一。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它是赣、闽、粤三省接壤要冲，物产丰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随后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当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而毛泽东那时尚未在中共核心圈里。我们参观了瑞金的纪念塔、阅兵场、大礼堂。特别看了当年红色政权部委设置，那些挂着各种委员会牌子的简陋小房间。想起现在我们有的市县办公楼之高大豪华，很是感慨，诚然这两个时期，不是一个概念，然而我们的一些政府却比发达国家政府要奢侈的多。中央苏区在瑞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领导了反四次围剿的胜利，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指挥不当，加上敌我力量悬殊过大，1943年秋，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攻陷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不知是什么原因，建国后毛泽东曾意气风发重上井冈山，却没有再回过瑞金。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在中央苏区博古、周恩来处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何时成为中共的领袖，有人说是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有人说不是，遵义会议选举了张闻天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真正领导这个党是在延安。红军西征兵败祁连山，血染河西走廊，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在西征鏖战中受到重挫，张国焘被挤到政治边缘。红军东征，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将星陨落黄河岸。这里留下一个个待党史学家去考证的历史疑团。

中午稍适休息后，我们告别了瑞金，前往于都。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我们看到了悲壮的一

幕。1934年10月16日下午6时，太阳刚刚落山，在晚霞映照的秋风中，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将士，组成野战军成建制的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纪念馆内回响着十送红军的歌曲。我也想起《长征组歌》中的第一幕：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过湘江，三十昼夜急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那悲壮的历史画面又重新展现在我眼前。

由此，开始了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的红军长征。悲壮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里程碑的遵义会议，都记录着长征的苦难与辉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历时一年。从江西于都走出八万六千红军将士，经历二万五千里转战，仅剩几千人，然而就是这几千人，会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团等部，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横扫千军，逐鹿中原，问鼎北京，创立了新中国。

我站在于都河畔瑟瑟摇动的枫树下，望着脚下缓缓流淌的于都河水，望着天边夕阳西下美丽的晚霞，我似乎还能看到，夜渡于都河远征的红军将士的身影。我似乎还能看到红军父母、妻儿翘首相盼，亲人何时返故乡的离别场景。我也能想到，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时，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如何浴血奋战，为了掩护中央纵队，他们战功卓著。

我将一本中学同学李齐雨、李卫雨兄妹们签名赠书《李聚奎上将》，赠送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收存，李齐雨的父亲李聚奎是从于都出发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开国上将，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我们这次江西游最后一站是南昌，与南昌海关副关长倪藻等人相见甚欢。我们年轻时就相识，那时我在团中央青工部，倪藻在四川团省委青工部，他有事业心，且重情义，我认识的许多团干部都是这样。也许因为青年机关特点，少了衙门官场中几分势利。我想这也是团干部较为淳朴，看着都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原因。倪藻两次在江西热情接待我们，去年年底，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回成都工作。

在南昌，我们参观了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我们还登上了滕王阁，感受《滕王阁序》中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阵燕惊寒"等扬名天下的意境，俯瞰一泻千里宽阔的赣江，历史也如同这江水一样，曲折蜿蜒奔流不息。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梦随风万里】：

天津聚会话春秋

2011年6月，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陈质枫邀请，二十几位吉林大学1988级研究生班同学聚会天津。那期研究生班是团中央青工部、中国青企协和吉林大学合办的第一期研究生班。

我曾在团中央青工部分管青企协工作，我和这个班绝大多数成员，都有很深的交往，故被热情邀请参加。二十多个春秋过去，这个班的同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岁月流逝，时间推移，青春不在。

聚会的开幕式选在海河之滨天津政协俱乐部，这是一座有上百年历史的德国建筑式样的会馆，里外尽显历史沧桑感和欧陆风情。欢迎晚宴在这里举行，水晶吊灯下的宴会厅金碧辉煌，同学们和他们的家属在硕大长方台餐桌围坐。东道主陈质枫以他特有的健壮身材、洪亮声音宣布活动开始。吉大一期研究生班班长，时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李冰致辞，他简单回顾了研究生班成因的历史，自豪的历数同学们的成就，深情希望同学们各自珍重。李冰热情感谢陈质枫为同学聚会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李冰现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思维敏捷，做事干练智慧。他曾是我在团中央青工部的领导，当年他在机关下围棋、象棋也是当仁不让的佼佼者。李冰来自黑龙江大庆油田团委，从那里到中央团校，到团中央研究室，青工部工作。他也当过油田一线采油工，我们曾经共事愉快，且在他那里得到许多收益。他还是那样即席而谈，既富感情，也有哲理，他的略有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音调激昂，语速沉稳，很有鼓动性。

出席聚会的每位同学都发了言，讲话或长或短，有的回顾成长历程，有的在谈同学友情。聚会在轻歌曼舞中直至深夜。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建城历史600余年，特殊年代造就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近代百年看天津"成为世人共识。1860年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多国在天津设立租界，他们大兴土木，按照所在国建筑特点建房。因此，有人赞誉天津是百国建筑的博物馆。在五大道原租界区，有诸多当年的使领馆、外国商会、名人故居、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天津犹太会堂、银行商厦，相似的欧美建筑也在市区星罗棋布，或依海河而建，美不尽收，展现厚重的历史，也吸引了海外许多祖辈曾在天津生活的洋人之后，前来寻找祖先的足迹。

我认识陈质枫有二十五年之多。他年轻时与夫人，作为天津知青，插队内蒙古。返城后曾任企业领导人，也曾长时间担任天津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对天津的城市变化如数家珍，他带我们游览了天津五大道租界区，参观了享誉中外的滨海新区。我们戏称随他参观陈质枫工作事迹回顾展览。

海河自天津金刚桥，到大沽口入渤海湾。我们乘游轮在徐徐夜风中游览海河。海河两岸霓虹灯闪烁，景光灯将一座座建筑打扮的如童话世界一般。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聂公桥南的天塔，让人叹为观止，415.2米的高度，超过了北京的中央电视塔，耸立于碧波与云霄之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水中之塔"，享有"天塔悬云"的美称。最称奇的还是海河上，横跨两岸的上百座大桥，造型各异、巧夺天工。这些桥吸取了国内外知名大桥的建筑特色，没有一座桥的外形雷同。建筑结构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给桥赋予了文化内涵和温馨浪漫。天津的夏夜，海河上游轮如梭，两岸人头攒动，多是欢乐消夏的人群。

我们还参观了梁启超和曹禺故居。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梁启超学贯中西，他与康有为、谭嗣同齐名，要求变革。其子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作为建筑学大师，蜚声海内外。梁思成教授继承先父遗风，不仅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且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建国后，他为保护北京古城建筑，保护闻名于世的明清留下的北京古城墙，上书并奔走呼吁，可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当权者听不得这些真知灼见，北京城墙和大部分城门楼被拆了，古城遗迹被毁。但梁启超、梁思成父子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正直敢言的精神却是留给中国的财富。

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她天生具有诗人的气质。她酷爱戏剧，她学过舞台设计，她也是丈夫梁思成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的同行。林徽因一生辉煌，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设计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她更为抢救民族工艺品景泰蓝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林徽因和诗人徐志摩的友情，更是传为民国佳话，有人说林徽因独特的艺术才华里，徐志摩是她生命的诗。作为作家、诗人、女建筑师，林徽因已成为了美丽和智慧的代名词。

曹禺是伟大的剧作家、戏剧教育家。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1922年考入南开中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曹禺大学就读南开大学政治系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50年、1952年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文革中与万千知识分子一样遭受迫害。文革结束后，1988年11月，曹禺先生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先生的《雷雨》成为中国话剧艺术不朽的里程碑。他的《日出》、《北京人》、《家》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他领导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中国话剧辉煌的殿堂，上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外名著，培养了几代星光灿烂的演员。巴金先生晚年嘱咐国人，要建一座文革展览馆，将文化革命的黑暗告知警示后人。

在这次吉林大学研究生班聚会中，我有幸与许多老朋友相聚。邓川现任四川省检察长，我的四川小老乡。他在

仕途中也曾经历曲折，但他心态平和坦然。他官至高位仍不忘旧情，记得去年三月，他在北京参加两会，我们聚会时，他特意向我和杨士秋敬酒，他说，谢谢两位处长在团中央时对我的关照。当年，我和士秋在团中央青工部工交处，邓川在四川团省委青工部。现在杨士秋任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兼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共青团的人大都很讲情谊，杨士秋也是一位事业心强且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我们年轻时曾一起到大西北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出差，与曾官居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攀谈，听她讲她过去的故事。在刘家峡，在龙羊峡，在塔尔寺，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当年接待我们的青海团省委书记宋秀岩、李津成，那时也才三十而立。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现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李津成曾任青海省副省长，我们最近还在一起聚会。

这个班同学中有年龄老大之称的王晓林，作为山西省交通厅长，曾为山西公路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现在已光荣从省人大退休。我曾对他开玩笑说，现在交通厅长是高危职业，全国各省因贪腐落马的交通厅长前赴后继，王厅长能全身而退，不容易啊。辽宁朝阳市委书记陈铁新，我近三十年的朋友，他做事雷厉风行，尽心竭力为一方百姓造福。李树文和赵世伟、薛炳忱都来自吉林团省委，大家都有很深的友情渊源。卢建民、曹玲、高静、高明、郭林、官阳都是企业的掌门人，我在深圳和回到北京都时常与他们来往。这次活动也该感谢赵颖、钟明建鼎力相助。赵颖是我在团中央办一期厂长（经理）研究生班时的同学，她二十一岁便是杭州萧山七千人国棉厂副厂长。赵颖是班里小妹妹，虽然事业有成，但这位江南女子却为人肝胆，常为同学之事热心张罗，这次聚会艰难的联络工作，大都是由她完成。天津轻工技术学院钟明建也是这样一位热心人，为这次活动迎来送往跑前跑后。

班里还有些同学忙于公事未到，如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国务院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但是我知道，只要有空闲，他们也都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与郑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识，无论他在企业，还是任厦门市委书记，大家都知无不言。王家瑞在青岛任市长时，我去青岛恰逢市里人大会议闭幕，家瑞还是抽身到八大关来看我们。张伟曾是山东团省委副书记，他在国家税务总局任办公厅主任时，还热心为我做过税务咨询。班里同学中也有一些人不知所踪，如潘壮、张水兰等人，不知浪迹天涯何处。

两天的活动，在天津近郊农业示范园中的蒙古大营结束。伴着欢快的马头琴，悠扬的蒙古长调，载歌载舞的蒙古族青年男女，将蓝色哈达献给来宾，我们在蒙古大营相互道别。我有感填下一首词存念："海河画中游，繁华聚友朋。枫桥夜，历史旧楼。蒙古大营论英雄，恰端午，似中秋。同学共杯酒，主人情难酬。功业在，无愧神州。人生八十再言老，草原恋，少年游。"聚会结束后，活动组织者赠给每一位同学一本精美的《活动集锦》。卷首赠言是："忆当年长白山下，各个豪情壮志。喜相逢海河岸边，人人昼夜吉祥。"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梦随风万里】：

北京上海双城记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影响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两个都市。北京是有八百年历史的古都，而上海的城市历史仅能追溯到1843年。然而，时至今日北京以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骄傲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上海也以它工商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浦东经济开发区的神话雄视太平洋。

北京、上海都有现代化繁华林立的高楼大厦，都有纵横交错的城市环路立交，都有数不清的商贸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都有发达的工商业和高科技研发基地，都有清华、北大、北航、复旦、同济、交大这样的名校云集。但是北京与上海却也有很大的风情差别。

世人骄傲的北京古城墙和城楼，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被拆毁殆尽，支撑京味文化的胡同、四合院、在现代建筑挤压下，逐步成为城市的边缘。我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熟悉胡同中那些低矮灰暗的四合院民居。有人一说到四合院，往往会比照北京的王府的庭院格局，雕梁画栋，北屋居中，东西房相对，影壁、假山，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其实普通居民四合院与之相差甚远，房屋陈旧、黑瓦灰墙。1976年唐山地震，使北京民居四合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家各户以盖防震棚为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院内有限面积中扩大居住空间。许多四合院内建筑拥挤，进出道路狭窄，许多地方仅仅容得一个人单向通过，无序乱建造成许多屋内光线昏暗，享誉海内外的四合院，多数成了名符其实的大杂院。

我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时，办公地点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一号，那是一座很有品位的四合院，房屋规整，院内有长廊相连，这里原来与邻院相连，曾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亲王府邸。据说解放前曾是蒋介石在北京的行宫，现在其中的一个院为团中央中国青基会办公地点。北京城现存的胡同中，还有一些好房子，多是清朝遗留的王府、贝勒府，最著名的当属恭王府，也有包括民国达官富贾们的老宅。现在一些名人故居也得到保护，但多数四合院经历多场革命，已沦落成产权不明，由房管所打理的租赁房。院内租户多，各占一方，早就失去了胡同民居恬静的旧貌。其实，北京还有一种居住文化，由于全国性党、政、军机关大都在北京，形成许多机关、部队大院，还有众多科技、文教单位的大院。这种大院出来的新一代北京人，已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增添新的文化内涵，他们大都讲

普通话，发音也与胡同里的老北京人有差异。

北京近三十年中已经膨胀成一个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外来人口、北漂一族占居城市人口三分之二还多。无论是在地铁、公交，还是在商场、公园，多听到的都是带有不同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其实这种族群大融合也是社会进步。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聚合天南海北精英的国际都市。

胡同曾是北京文化的载体，也曾是最能听到北京卷舌发音、北京方言的地方。当年随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北京的旗人被称为老北京人。北京如同上海一样，真正祖辈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少之又少，要向远古寻根，那就是北京周口店的中国猿人了。北京人有背靠燕山山脉，东临渤海的豪爽和大气，也有天子脚下臣民的自恋和惰性。

坐上北京的出租车，很多司机与乘客调侃的话题，多是家国大事，这些问题拿到"两会"也不见得都能解决。在胡同口纳凉，在公园闲遛，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北京人的话题大都可以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讨论。我四下打听了一下，在开封、洛阳、西安，这些昔日古都的遗老遗少们，也有这种性格。北京人说话极具幽默，看看王朔的小说对白，那就是道地京味的幽默调侃。

而北京人中，也还能看到八旗子弟没落后的身影。眼高手低的心态与商品经济大潮格格不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居住在一座大型国有企业的宿舍楼，这家企业经营状况差，职工大都拿着低保在家。冬天月夜下的路灯旁，聚拢着居住本楼的青壮年职工，调侃着都市新闻和两伊战争，寒风中他们旁若无人，谈笑风生。我问邻居大嫂，方知他们为了省电宁愿在外面受冻，而不愿意回家开灯、开电视。而这座楼的电梯工、保安、保洁、车场均雇佣外地人。那群在夜幕下闲扯的人们说，我们北京人，国企职工那能干那些活。但是为了生活省钱，为了面子又不愿意去挣钱，天子脚下的臣民思维程式真得该改变了。

现在的北京更加开放和多元，包括老北京话都在消失，社会精神、城市风貌、价值观都经历着适者生存的变更。北京古都风貌，精英荟萃、文化沉淀、历史悠远、经济发达，尽管交通堵塞，环境堪忧，人口压力大，但是北京做为大国之都，都构成了世界一流大城市的骄傲。著名诗人闻捷在《我思念北京》一诗中这样描述北京：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

像白云眷恋着山蛐,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我思念难道仅仅因为：

知春亭畔东风吐出了第一缕柳烟?

西苑的牡丹蓦然间绽放抚媚的笑容?

蝉声催醒了钓鱼台清流里的睡莲?

谐趣园的池水绣满斑斓的浮萍?

金风枫枫染红了十八盘上下的枫叶?

陶然亭欣然沉醉于月桂的清芬?

或是傲岸的松柏覆盖了天坛的双雪?

红梅向白塔透露早春的来临?. . .

我思念北京,难道仅仅因为: 太和殿凌空翘起了描金的飞檐? 万道霞光倾泻了佛香阁琉璃的伞顶? 九龙壁上的龙尾击出了浪声? 长安街林阴下漫步着幸福的情侣? 红领巾的欢笑装满北海的游艇? 或是花市的绒花丰富了生活的情趣? 厂甸的年礼渲染着春节的气氛?..... 我对上海也十分熟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和最大的商业城市。目前，已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城市。

上世纪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中国人最早接触世界的地方之一。闪烁的霓虹灯，万国建筑的外滩，大世界的流光溢彩，南京路林立的商铺，上海滩货轮的汽笛，外国租界金发碧眼的佳丽，黄浦江上洋人的军舰，苏州河桅杆帆船，里弄小街旁的法国梧桐树，老留声机传出周旋柔美的小曲，众多工厂中工人的辛劳，十六铺码头上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一切都构成当年大上海的景观。

八十年代的上海，除了颇具西洋建筑风格的外滩外，上海的里弄与北京的胡同一样，也有浓浓江南民居的特色，里弄中多是多层的阁楼亭子间，木结构房屋多于砖石结构。从各家窗子中伸出的竹竿，像挂万国旗一样晾晒着各自的衣物。清晨临街洗涮马桶的声音形成别样的交响曲。上海女人的娇媚与北京姑娘的豪放有很大反差。

我在团中央青工部工作期间，与上海团市委有较多的接触。因为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上海团干部精明，且能总结出经验。上海团市委位于陕西南路，那是一座跑马厅老板留给女儿的独栋洋楼。院子里法国泡桐枝繁叶茂，绿茵茵的草坪里有一匹铁马，据说跑马厅老板为纪念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的宝马，特按马的原貌请人铸造于此。团市委那栋三层洋楼，每一间屋格局样式都不一样，洋楼中不同的房间格局，均根据当年老板女儿梦中神游建造装饰。

上海团市委青工部曾陪我参观宝钢、上钢、上海一百货及多处石化、纺织企业。特别上海港和江南造船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团市委青工部多位负责人，转业后都有过很好的仕途，她们有人任上海市人事厅厅长，有人掌门上海的大世界。曾任上海市团市委书记（副书记）的李源潮、陈海燕、黄跃金、韩正等都曾工作与此。

上海人比北京人精细实惠，当年上海纺织女工很多，她们许多人宁愿从饭菜中节省，也会着意梳妆打扮，以光鲜形象面世。上海人有接受外来文化的传统，八十年代末一首新民谣是："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东北人什么事都敢干，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我在日本研修时，见到的国内各省人中上海人最多，从日本

著名企业的白领，到酒吧拉面馆的杂工，从各高校的研修生，到从事商业活动的生意人，他（她）们无处不在，这让在故宫角楼下路灯下闲侃的北京人汗颜。

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问起你是哪里人，北京人会毫不犹豫脱口而出，我是北京人，哪怕他只定居北京几年，话语里透着股优越感。而问到上海人，有的人则羞于说自己是上海人，他们说，其实我也不能算是上海人。我想这种现象随着大上海的崛起，应该越来越少。很多人与我谈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上海，那里不仅有南京路、淮海路这样闻名于世的繁华商业区，还有与外滩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和浦东经济开发区。高速发展的上海，有迷人的各式建筑，有黄浦江风光，更有江南园林景色，这里是许多人投资兴业的乐园。北京上海两地相比，上海比北京多几分温馨，北京比上海多几分宏大。

我熟识一位朋友，外公是文革前中央的一位部长，他曾在京沪两地生活，小时在北京部长外公家长大，工作后回归上海父母家。我也搞不清楚他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有一次我在上海出差期间，他拉我去上海新锦江饭店，参加他的朋友生日聚会。与会的有十多人，过生日的是位漂亮的武警女中尉。席间谈笑融洽，多瓶法国红酒饮下，不知为何争起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优劣。我的朋友代表北京与几位上海男士争执起来，上海男士们仗着人多势众，张牙舞爪，连"北方佬"之类的话都骂出来。虽然他们讲的是上海话，但上海话听懂不难。我的朋友更是生猛，他居然用XXX的京骂反击，并借酒劲掀翻了桌子，满桌美酒佳肴，连同生日大蛋糕都被周到地上。我的朋友满身沾满蛋糕，手被酒瓶破碎玻璃划破，鲜血直流。见到这种真刀真枪的场面，几位上海男士吓得退缩一旁，不敢出声。过生日的女武警中尉则热泪盈眶，不无委屈，她的女伴们也看呆了。单间门外聚集着包括厨师、服务员在内的围观看热闹的人群。我简直气疯了，这时我既不愿意当当北京人，也不愿意当上海人。我觉得争斗双方无聊透了，为这南北两地长短之争，居然将那位女孩好好的生日喜庆祸害成这样。为了息事宁人，我除莫名其妙的替他向众人道歉外，赶忙扶着一副醉态神志不清的朋友往外走。到宾馆大门外马路上，他突然推开我清醒了，用非常明白的话求我，让我赶快回刚才吃饭的地方，为他拿丢下的皮包。我真是哭笑不得，他的前半场与人打斗有几分像北京犯浑的爷们儿，醉酒闯了祸还不忘自己的皮包倒有点像上海的小赤佬。我为他找回了皮包，塞在他手里后，不想听他任何解释，我真的很愤怒，随既转身汇入人群不辞而别。

有关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人的地域特征、族群性格差异，文化差异，有时还会扩延为南方人和北方人，西北人和东南沿海的人，关内人和东北人，甚至包括不同省籍的人。其实相通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在相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下长大。物种繁茂造就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多地文化相容，多民族融汇繁衍，造就中华民族博大深远。更何况现在已是高速发达的信息社会，便捷的交通也将人们的时空拉近。北京和上海的双城，会在包容竞争中，取长补短，携手创建更伟大的宜居城市。

【梦随风万里】：

遥远的皇家加勒比号

2011年8月20日，我和友人结伴，上午10时在北京工体北门集合，乘凯撒旅行社的大巴，到天津港登上皇家加勒比公司的神话号，下午7时许启航。

美国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是全世界最豪华邮轮公司之一。我们乘坐该公司的邮轮，共有十二层甲板，船上有1500多间客舱，能容纳近3000名游客，单是船员就多达1000人。船体庞大，比当年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大了许多。游客可以在邮轮上享受超五星级饭店的服务，从优雅的餐厅、舒适的水疗、缤纷的娱乐项目，到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标志性海上攀岩墙、游泳池、冲浪、老虎机游艺等活动设施应有尽有。

邮轮中央是一个露天中央公园，被热带雨林和潺潺流水装扮得温馨自然，三角钢琴摆放在舞台一侧，观众席座椅环绕周围。邮轮上还设有一个宽大的剧场，在里面可以欣赏各种艺术表演，包括船长船员与游客们热烈庄重的见面会。餐厅包括了西餐厅、自助餐厅、咖啡厅和酒吧。我对船并不陌生，我1992年，掌管过深圳海上世界，那是一艘万吨级邮轮，我也曾多次在长江三峡乘坐重庆至汉口的游轮，然而与我们这条船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觉得它很像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座六星级酒店，只不过这是增加了航海动力的酒店。

近三千多游客登船、凭借各自事先已领好的住宿卡，在船上服务员引导下，找到自己的客舱，一切都有秩序地进行。近千人的船员队伍，在洋人船长，各部门总监带领下，热情的为游客服务。船员中有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他们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既有中国人、也有马来人。我看得出来，他（她）们都受过良好的职业培训，从着装到服务都是一流的。

下午，七点左右，在邮轮汽笛长鸣声中，邮轮缓缓驶出天津港，沿着渤海湾向东破浪前进。在船的左侧是辽东半岛，在船的右侧是山东半岛。我们还能看到右侧沿岸的城市灯光及海中的航标灯。我们分别住进七层相邻的两间舒适的客舱。客舱里舷窗可看得见大海，一张很大的床，两边墙上还有两张吊床，以备不够住的一家几口享用，不用时则可以推上去，吊床就与墙合为一体，床头柜、储衣间、卫生间一应俱全。电视不大，却可以接收凤凰卫视及日、韩的卫星电视，电源插座也都应有尽有，莫说一人住，就是一家三、四口也都能容下。

船上有二十多部电梯，包括四部观光梯。乘观光梯升至邮轮的十二层，便到了顶层甲板。顶层设有遮挡的露天甲板，既可以海阔天空观赏全速行驶中邮轮四周的海景，也可以沿着露天甲板的塑胶步行道绕船漫步，绕船一周大概有500米左右，这里是锻炼和观光的好去处。船顶既有转动的多部雷达，也有为动力提供排放的烟筒。在顶层甲板，可以凭栏俯看下一层的露天游泳池和冲浪池。游泳池里已有许多穿五颜六色泳装游泳的游客，她们在尽兴嬉水，特别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蓝色的泳池中玩水兴奋异常。这里还举办了一场船员对游客的水上排球大赛，在主持人煽情下，欢乐空前。游泳池两侧摆满沙滩椅，那是为游客们享受阳光提供的。再后面一排，靠近轮船舷窗处摆放着酒吧和咖啡厅的桌椅，供人们聚会、聊天、品茶，还提供免费的冰淇淋供人们享用，在旅程中还多次在这里提供免费烧烤。

邮轮的餐厅分为两家，一家在四楼宽敞的西餐厅，所有的桌椅、餐具、装饰与大都市正式西餐厅没有两样，只是大了许多，它分上下两层，彼此由楼梯相连。食品多是免费自点，服务生西服革履，笑容可掬热情周到。船上的自助餐厅在接近顶层的船头部分，一边用餐，一边可以看到窗外，船正迎风破浪行驶。餐厅里摆放着多个自选食品台，任游客自选。中餐、韩餐、日餐风味的冷热菜都有。还有各式面包、糕点、汤类及牛奶、橙汁、水等饮料。若要点各种酒水类需要自费。

邮轮上两个餐厅每天开放时间很长，往往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九点。邮轮的四、五层还有商品购物市场，这里常举行打折促销活动，经常被游客将柜台团团围住，争先恐后的情景，如同不要钱一般。邮轮上还有只在船航行到公海才开放的赌场，形式内容与我在澳门葡京和美国拉斯维加斯看到的大同小异，只是规模小了一些，那里也经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邮轮8月20日晚离开天津港，8月21日一天都在海上航行。蓝天白云下的大海一望无际，这是我第一次乘船行走在浩瀚的大海中，远处水天一色，除了湛蓝的大海，就是变幻莫测的蓝天，时而白云飘飘，时而阴云密布，时而阳光灿烂。偶尔能遇到装载着集装箱的货轮，彼此拉响汽笛致意。船的两舷掀起快速退去白浪的海水，船尾在邮轮过后留下远去的雪浪花，形成宽宽长长的水道，向后方的大海延伸。由于邮轮吨位大，即便海上有风浪，人们在甲板上能感到海风迎面扑来，船却十分平稳，基本上感受不到海浪引起的颠簸。邮轮空间大，可选择运动休闲的地方多，几千人共一船，除上下船时外，几乎感觉不到人多的拥挤。

我们搭乘邮轮的航线是日本韩国八日游。8月22日上午，在海上经历了雷阵雨，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在白云飘浮的远处，已经可以看到陆地的山峦和海岛，那是日本列岛九州岛的一部分。下午一时许邮轮到达日本九州的福冈。

福冈县位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北部，是九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靠近朝鲜半岛和亚洲大陆，而被称

为"亚洲大门"。这里是日本通往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交通要地。福冈自然环境优美，船还没有靠岸，就看到身穿和服的日本欢迎队伍，站在码头上向我们热情招手，这是当地市政府旅游观光部门组织的，他们中也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在福冈期间，我陪保嘉去探望她定居在这里的朋友刘刚，她们从小亲如姐妹。刘刚的母亲冯宝岁和保嘉的母亲，是北京贝满中学的闺中密友。冯宝岁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保嘉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中刘刚的母亲在学部被毒打致死。刘刚的父亲刘山曾是外交部驻欧盟和比利时大使。刘刚带着她懂事的女儿来看我们，大家在福冈市一家有名的拉面馆边吃边聊，刘刚曾做为知青到山西插队。得知她们在日本生活也不尽如意，我们内心都很沉重。刘刚说她年纪大后，还要回北京去住，那里有她太多的梦。

1988年春，我曾带队在日本东京研修饭店管理，去过京都、大阪、富士山、沥木等城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眼前的景物还是我熟悉的景观和城市。城市整洁、主人礼貌、风景如画。日本的城市街道上多不设垃圾箱，日本人绝不会乱扔垃圾，他们会自觉将垃圾带回家去，按照要求分类，送到指定的垃圾存放地点，仅此一项，在中国城市恐怕很难想象。我们饶有兴致参观了福冈的太宰府天满宫和天神商业中心。幸运的是在日本九州的三市游，我们遇到一位来自台湾女导游，她语言风趣，服务周到，且很有文化修养和人情味，为我们的旅程增添了许多快乐。

我们在晚霞中告别福冈市，邮轮经过一夜的航程，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日本别府。别府是日本九州岛东北部著名温泉城市，全市有超过200个公共温泉。别府城市依山而建，在海上就能看到温泉喷出的水气，形成腾空而起的缕缕烟雾。我们在九州和谐乐园里消磨半天时间，对那些游乐设施我实在没有兴趣，但随邮轮来的孩子们却玩得十分开心。有趣的是我们在别府一处老街游逛，那些凝聚着历史沧桑的日本民居，写着汉字的各种商店招牌，却引人入胜。我和保嘉在小巷深处，找了一处日本拉面馆，掀门帘进去，也就五、六十平米。这是一家母女开的店，装饰风格淳朴，柜台操作间在一处，柜台外摆着四张桌子，店老板热情麻利，烤鳗鱼、日式小菜、两大碗拉面，不一会就端上来了，味道非常鲜美，其他桌上坐的也是我们同一邮轮的游客。我们一边用餐，一边感受日本民族那种勤劳、敬业的文化氛围。

白天在别府登陆游览，晚上返回邮轮。次日，也就是8月24日早晨，我们到达本次日本游的最后一站--鹿儿岛。鹿儿岛位于日本九州最南端，有樱岛等著名火山。岛上森林茂密，具有多姿多彩的大自然风景，还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源地。我们登上九州岛后，便看到喷发着蘑菇云状的樱岛火山，樱岛火山的烟雾直摇云霄。我们近三千人就在火山下的酒店品尝日式午餐。在鹿儿岛这个迷人的海湾城市，我们还参观了保持完好的清水氏统治时代的知觉武士宅院。欣赏着盛开的日本樱花和其它珍奇植物，观看著名武士家族和他们美丽女儿居住过的庭院。

告别了日本九州岛，邮轮又经过一夜航行，我们于8月25日上午到达韩国港口城市釜山.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

市，这里拥有著名的深水良港，它是泛太平洋物流中心。城市温泉星罗棋布，群山环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在釜山港码头，我们受到穿着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的男女组团欢迎。在釜山购物成了一大旅游内容，邮轮上的游客拥进釜山专为中国人开的免税商场，购物热情之高，让人感叹。回想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日本研修，囊中羞涩，出去参观买杯水，都要让日本人请客，从那时悟出人穷志短的道理。不管对于中国现实社会有多大争议，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普遍富裕起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要知道皇家加勒比号招徕客源对象是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而我们和船上许多人一样，只能算普通工薪阶层。在两国四市旅游观光之旅，我们见到游客购物热情，感到中国在走向富裕。当天中午在釜山集团用餐，说实话不太好吃，远不如北京的萨拉伯尔、汉拿山、三千里等韩餐。当然了，这是旅游团队餐，不能同日而语。我们都怀念日本别府的拉面，虽然是自费，但那是正宗日本私房菜。

8月25日晚，邮轮离开釜山。8月26日全天是一个航海日，船向西行，开往中国的渤海。船的右侧应该是朝鲜半岛，但船远离陆地，只能看到大海。除了游览观光外，我留意更多是周围的人。许多人是一家几口，老少三代一起出游，甚至有坐轮椅的老人。花儿朵朵，奔跑雀跃的孩子也很多，8月恰是学校暑期。三十年来，我多次出国，现在发现国内游中的多数人，从举止言谈到着装都有很大文明提升，一个人的教养与文化素质，家庭和工作环境都有很大关系。在如此高档豪华的邮轮环境中，许多人珍爱自己，也珍爱环境。

但我在邮轮游客中，也看到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有位常穿着一身名牌西服的男士，一看就是某地方长官，官位不高，权力不小。坐邮轮旅游，又不是外事谈判，大热天穿什么西服？一看就有些不合时宜。官员的夫人更是张扬，浓妆艳抹、穿金戴银有些夸张。我注意到他们走到哪里，特别购物时，总有一位脖子上挂着金链的老板式人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跑前跑后去买单，这就是国内所说官员傍老板。再看那些大庭广众旁若无人，高声喧哗的女士们，那些下船上车不排队抢行者，竟为一点小事就与他人争吵。自助餐厅中缺少起码常识和文明的人也大都见怪不怪。最可笑的是游客返回天津，为上大巴车抢座，居然两家人大打出手，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招来警方干预。而返回北京的大巴，前面十几辆人满为患，后面几辆却空空如也，这些现象在日本绝少看到。而日本当年还在我们汉唐时期，他们以中国为师，学习儒家思想及道德礼仪，很多初次迈出国门的中国人，却像诈富的土财主一样张扬，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丢脸却是中国人这个集合概念。

8月27日，在濛濛小雨中，邮轮返回天津港。任凭海风拂面，望着现代化建筑林立的天津新区，八天中享受了难得的悠闲。使人心旷神怡的航海之游，遥远的皇家加勒比号居然与我们近在咫尺。

林小仲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63

【《梦随风万里》书摘】：

我的后知青时代

我18岁到27岁，曾在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中，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遥远的额尔古纳河，在东北一望无垠的黑土地，在阿荣旗那个难忘的小山村，度过九年的知青岁月。与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伙伴的命运一样，我们像春来秋去的大雁，1968年9月我离开北京，1977年7月历尽艰辛又回到了北京。

一、谋生从临时工做起

我能搭上知青返城的末班车，应该感谢我的爸爸林诗仲。是他经过多方努力，帮助我办好了特困为由的返城手续，1977年7月，我终于告别了插队九年的呼伦贝尔回到了北京。

我的父亲出生在美丽的海南岛文昌，少年时随爷爷下南洋去了新加坡。1947年回到南京求学，结识了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妈妈胡文鸾。南京解放后，他们双双参加了革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们先后参军赴朝作战。我爸爸在朝鲜五年并荣立战功。他担任英文翻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板门店谈判，目睹了和平到来的历史时刻。

1955年前后，我的爸爸、妈妈先后从部队转业，爸爸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影公司。文革前曾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妈妈被分配到师院附中教书。

十年动乱的文革中，爸爸这位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那里烧茶炉和撑船放鸭子。1976年11月，爸爸终于结束了近十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了北京，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可怜天下父母心，他的情况稍有好转，就惦念因他们受牵连还在乡下插队的我。他费尽苦心把我办回了北京，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为我在语言大学借了一间宿舍，并在学校行政处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让我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北京语言大学是座新建的大学，学校多处在施工，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钢材库。我们的任务是把那堆得像座小山的角钢、螺纹钢、圆钢、钢管从露天处用推车推到新盖好的大棚里，然后分门别类码放到多层的铁架子上。这些钢

材份量很重，大多都有十米左右长。跟我干活的一共有四个人，都和我一样是返城知青，钢材库的力气活对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有知青经历垫底，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又脏又累搬运水泥的活我们也常干，特别是遇到水泥袋突然破裂那就更惨，浑身上下的水泥面和着汗水，人就像泥猴一样。辛劳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只是每月二十多元的薪水，比我插队时的收入还少，但毕竟是回了北京。

在我干临时工那段日子里，语言大学副校长邱及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教诲。邱伯伯是我爸的老朋友，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资深的泰国华侨领袖。他为人平和坦诚，且国学功底很深。他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时常告诉我要看得远一些，要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那段难耐的日子里，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激励我后来考上首都师大政教系，并顺利完成了四年的夜大学习。

天无绝人之路，1977年12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局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这是一家有上千人的中型国营企业。与我同期进厂的有两百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进厂后第一课是让我们这些青工挖办公楼的地基，也许因为我是知青党员，工厂选我当了这帮人的头。二十多天基建劳动结束后，青工们陆续被分到各个车间开始了学徒生涯，我却幸运地留在了工厂劳动科。

刚到劳动科，就遇上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企业的调资工作，在大锅饭的企业体制下许多人工资很低，文革十年长期得不到调升。但是，调整工资又有名额限制，加之文革派性造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尚未完全消除，调资成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工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牵头，劳资、人事、工会、宣传等部门参加的调资办公室，我被留在了厂调资办公室。那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好多人为了要求涨工资到调资办大哭大闹，那种场面看了真让人心酸。我的任务是：写简报、发简报、填表格、了解车间动态，为厂领导提供准确的信息，为本次调资能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在尽我所能。

调资工作结束后，我留在厂劳动科里。劳动科是企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负责工人调配、培训、工资、考勤等工作。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追随陆士娟科长，开始了几百人的招工工作。我们拿着劳动局批准的招工指标，几乎跑遍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一家一家的商谈，看档案，与拟招聘人见面谈话。当时北京的各街道办事处都积压着数以千计返城的知青，我们经常被那些期待求职的人们团团围住。看着他们一个个渴望的眼神，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但名额有限，我确实无力帮助那么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辛劳奔波和认真筛选，我们终于完成了四百多名新工人的招工工作。

招工结束后，由于当时规定在农村插队不算工龄，我原本只能领十几元的学徒工工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陆师傅出于对我的关爱，建议我先去食堂当库工。在陆师傅和厂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在羊绒衫厂当了三个月的库工，职责是分管食堂仓库。当时羊绒衫厂有一千五百多人，食堂有几十个人。原来的食堂管理员和库工把账务搞得很乱，人们对此意见非常大。我在农村当过三年队长，统筹安排是我的所长。我接管后，没多久就把那间上百米的

库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出入库帐也记得明明白白。最让那些大师傅们开眼的是我能将近二百斤的大米袋子，背几十米给他们送到操作间里。没事时我也常去餐厅帮个厨，日子过得倒也乐陶陶。三个月后，我这个库工转正了，正式拿47元的月工资。之后，我先被调到厂行政科，后又调到厂工会和厂党委宣传科工作，开始了我企业干部的生涯。

否极泰来，1981年我的好事接踵而至：一是我报考文字校对的国家外文局《中国建设》通知我被录取；二是厂里告诉我北京市纺织局工会准备借调我去工作；三是年初时，我在报上看到《中国青年报》公开招聘记者，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团中央青工部的勾德元部长和张宝顺副部长（现安徽省委书记）在报名者的简历材料中选中了我。在我外出不在工厂时，团中央的张宝顺副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陈传书（现任民政部老龄委常务副会长）亲自跑到工厂外调看档案。厂党委和人事科为我说了不少好话。他们回去不久就通知羊绒衫厂，要调我到团中央机关工作。

1981年7月我告别了工作近四年的北京羊绒衫厂，告别了那些爱护帮助我的师傅们去团中央机关报到。

二、团中央见证辉煌

1981年7月20日，我带着调动所需的各种关系材料，到团中央机关报到。当时还是而立之年的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热情接待了我。青工部是团中央分管青年职工共青团工作的部门，下设工交处、财贸处和街道处。我被分在工交处，即分管工业、交通战线共青团的工作。

在这个有光荣传统的中央机关大楼里，我开始了一个陌生而又全新的工作。团中央机关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年轻的党政干部，也有各级团委的负责人，这些人大都很年轻，工作能力强、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充满激情。

我们的部长叫勾元德，五十多岁，是个工作作风严谨、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刚到机关头两年，部里让我写文件，我费了很大力气，工工整整用大稿纸抄好送去请部长审阅，待部里秘书给我送回来时，我一看都傻了，勾部长用粗粗的黑铅笔把我写的东西几乎全都划掉了，他按照文章要求的思路，将我的稿子整个重新写了一遍。记得最惨的一次是我代表团中央起草的"关于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受打击"的报告，等稿子送回来时，除了大标题外一个字都没有用。此后有段时间，凡送给勾部长审阅的稿子，我不是看为我改了什么，而是看还给我留下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磨练，使我的文字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团中央机关那种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三千多名日本青年来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任秘书长，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我担任了"活动处"机场迎送组组长，负责指挥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四千多嘉宾的接机、送机工

作，以及调度车辆、协调机场相关事宜、组织广场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等。胡锦涛不止一次关照大家：一定要精心计划、精心组织，千万不能出纰漏。所以，所有工作人员都尽心竭力，作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9月29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近五千人的盛大招待会，欢迎日本青年。胡锦涛主持，赵紫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了宴会。

10月1日，国庆那天，是这次活动的高潮，三千多名日本青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有幸登上天安门广场的红色观礼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圆满结束了。当王兆国、胡锦涛在新大都饭店向参加组织工作的人员表示慰问时，全场欢呼雀跃。大家忘记了两个多月来的疲劳紧张，一拥将王兆国、胡锦涛抬了起来。那种无拘无束忘我的沸腾场面，是我在团中央工作多年第一次见到。

1985年2月4日，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年企业家管理者协会"，简称"青企协"。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希望"青企协"能成为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桥梁、培养青年企业家的摇篮，成为共青团为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

1985年3月，团中央和国家经委在北京联合举办"青年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研究班"，这是"青企协"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张宝顺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担任该班的班主任，我担任了班长。这样的班连续办了十几期，同时还与吉林大学联合开办了研究生班。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青年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使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加快了共青团工作的转型。值得欣慰的是，这其中，也有我的付出和努力。

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支持和赞助下，1985年11月，保加利亚在普罗夫迪夫市举办了"世界青年发明家成果展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格时沙·菲利波夫致函赵紫阳总理，邀请中国参加。为了发展同保加利亚等国青年的友好联系，促进各国青年的科技交流，宣传中国青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成绩，团中央和国家科委在全国挑选了一批由青年人发明的科技成果，参加了"世界青年发明家展览"。我协助青工部部长李冰（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参与和组织了这一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且在国外呆了两个月。期间，还顺道走访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苏联莫斯科。

我做为团中央基层工作团江西分团永新县组长，1986年3到4月间，曾带队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工作了两个月。那段红色历史的重温和老区人民的艰辛都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1988年5月4日至5月9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选举新的团中央委员会的换届大会，我被任命大会秘书处会场组组长，负责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和京丰宾馆会场的组织安排工作。这是我

最后一次为团中央会议工作。

我从1981年7月到1990年7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作为工作人员，曾参与和组织了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少工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有幸近距离见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成员；我考察过全国大多数省、市上百家大型国有企业；也结识过许多团省、市委的负责人；我亲眼目睹了四位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风采：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和宋德福。李克强当时分管学校部，因青工部和学校部都在机关八楼，且常坐一辆班车回家，大家相处很熟。李克强睿智、且待人宽厚热情，他是在我离开团中央后，1993年至1998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的领导和同事们大都为人平和、富有朝气，诚然个性和能力各有千秋。

八十年代团中央机关干部有二百多人。书记处先后有刘延东、李海峰、高占祥、李源潮、刘奇葆、陈昊苏、何光暐、张宝顺、李克强、冯军、克尤木、洛桑等人。他们中很多人优秀且敬业，我与之在团中央机关共事者中，近些年有五人在政治局，近四十人在省部级岗位。胡锦涛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我被任命为"团中央青工部工交处副处长"；宋德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我又被任命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饭店筹备处处长"。一个人的成功也要有历练的舞台，团中央为这些人扬起了风帆，使他们找到了能力与机遇的最佳结合点。各级团干部因年轻，往往都热情且重感情，我们之间不少人都成了终生的朋友。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记录下共青团对我的培养和我对共青团的热爱。虽然，这段经历使我对政坛高官失去了往日的神秘感，但团中央工作的日子让我终身难忘。

三、国企总经理的那些人和事1988年2月，我离开了团中央机关，调团中央直属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开始筹备"21世纪饭店"的工作。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投资在北京建设的一个大型项目，地址在北京燕莎商城以东的亮马河畔。"中心"由四大部分组成：一座近四百套客房的四星级饭店；一座现代化的剧场和国际会议中心；一栋很现代化的研修楼；还有一处可供正式比赛和训练的游泳馆。

我做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21世纪饭店"总经理，1988年6月，带领五人组成的研修小组赴日本研修饭店管理。两个多月的学习为我一生的职业经理生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1990年上半年饭店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饭店开业在即，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心"的领导层在经营体制和理念上，发生了分歧。我谢绝了书记处拟让我任"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助理的安排，提出调动申请。宝顺书记再三挽留我，他的真情让我至今难忘。调离之前，我坚持把21世纪饭店准备上岗的400多学员培训完，把"饭店"所需的家俱全部到位后才到招商局去报到。我的第一任总经理生涯也就此匆匆止步。

回想往事，忍一忍或许海阔天空。但遭受人际关系困境时，择木而栖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也许另一处有更辽阔的天地任你驰骋。1990年8月，我带着团中央组织部给交通部人事司的调动函，到了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

"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是一家国家级旅行社，是中国特大型企业招商局旗下的一家企业。与招商局集团的远洋船队，码头泊位、银行保险、房地产和蛇口工业区等相比，招商旅游是集团内的新兴产业。1990年8月25日，我被聘为"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由于集团总部在香港，工资也比"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高出四、五倍，这也许是我工作调动的一个动力。

"招旅"总经理张宜冰，1978年从上海调团中央筹备十大。曾任团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后调团中央青旅总社任副总经理。他调到"招旅总公司"后推进激励和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使"招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度成为国旅、中旅、青旅之后的又一后起之秀。我从1990年8月进入招商局，到2002年6月离开，一干又是十二年。迄今为止，我对当年张宜冰接纳和启用我仍存感激之情。

1992年3月，应蛇口招旅公司总经理周为民、副总经理张云昆之邀，我辞去了招旅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之职，到深圳蛇口主持"海上世界"工作。

"海上世界"是一艘停靠在蛇口海湾的万吨轮，这艘上下共有九层的大客船，曾是法国的一艘豪华游轮，往返行驶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等社会名流曾乘坐过这艘游轮。中国在六十年代买下这艘退役游轮，更名"明华轮"，明华轮担负过中国援助非洲修筑坦赞铁路的援外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也曾乘坐这条船访问日本。在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开发区初期，深圳的旅游景点很少，星级饭店短缺，住宿十分紧张。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将这条彻底退休的游轮买来，让它停泊在蛇口，作为集客房、餐饮、娱乐、购物、参观为一体的旅游设施。"海上世界"成了深圳著名的景点，接待了成千上万国内和香港的游客，一度成为蛇口工业区的景观标志。

最让"海上世界"名扬大江南北的是：它曾接待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蛇口，他登上明华轮，欣然提名："海上世界"，据说这是邓小平唯一的一例为特区企业提名。邓小平的题辞为"海上世界"赢得巨大影响力。但是随着深圳特区的快速发展，"海上世界"日渐衰落。曾用几十台老虎机（一种专供赌博用的游戏机）招揽旅客，斗殴、敲诈之事时有发生，这种方式很快被公安部门查封。我的前任经理，不得已将这艘高雅豪华的游轮变成了低档小商品市场。从我主政后，尽力进行改善，但有很多事情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也常有许多无奈："海上世界"的股东们要的是投资回报；蛇口工业区要的是保住"海上世界"的社会形象；我又要面对四百多员工的生计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海上世界"的董事长在做人、做事上都大相径庭。他成全了我离开深圳回北京的梦，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年多在深圳特区做总经理的工作锤炼，使我明白了一个真理：盈利是企业生存的硬道理。一个不能让企业盈利的总经理注定要失败，不管亏损原因来自主观，还是客观。

1993年9月，我回到北京开始为组建写字楼公司而忙碌，当时按照招商局江波总经理和招旅总公司张宜冰的思

路，先租一座旧楼通过装修改造后经营写字楼，几经考察、挑选，最后选定了位于北京东三环北路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生产楼。我参加了同"青印厂"多轮艰苦的谈判。1993年10月21日，在首都宾馆举行了租赁协议的签字仪式。团中央姜大明、罗志军、丁元伟、王剑参予促成此事，我由衷感谢这些机关的同事朋友们相助之情。

由于要将四层生产楼加盖至六层，除承重墙保留外，陈旧的设施要拆除、新的设备要安装，从土建到装修无疑就是重建新楼。我在北京团市委老同事的帮助下，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建委取得了"先开后议"的通行证，（即可以先开工再去陆续办理十五六家主管单位的审批手续）从1994年10月开始，我们一班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座现代化写字楼在北京东三环北路拔地而起。令人啼笑的是：楼已起，有关部门的审批章还没有盖完。可见办事之难，手续之繁杂，确实让人望而生畏。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几大难题：首先是资金困难。华鹏大厦装修改造，包括又加盖了五千多平米的新楼面积，共需建设资金7000万元。当时，除了外方招商局中国基金全额投入外，招商旅游的投资始终未能足额投入，外方意见很大。在工程急缺资金的紧要关头，我在团中央青企协认识的建行负责人田国利帮了我的忙，分两笔为工程贷款1300多万元。#我们自筹资金占总投资的38%，这些资金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开业后我们很快将贷款本息归还建行。

第二个大难题是电。原生产楼一路供电不能适应写字楼的需要，在华鹏大厦7000万元投资中，上交用电集资款和线路安装费就多达1000万元，而临近开业两路用电还不能开通。情急之中北京团市委统战部长于振永帮了我的忙，他把我的投诉信直接递交给北京市李副市长和北京市供电局局长，在李副市长和供电局局长的过问下，华鹏大厦供电问题在开业前得以解决。难怪有人说在：当今中国，关系也是生产力。

1995年11月华鹏大厦开业，仅一个月时间，大厦出租率便达到100%；1996年全年收入达3700万元；96、97年两年投资回报率都达到33%以上，这种经济效益在当年北京房地产行业中当属佼佼者。从1995年11月开业到2001年年底，华鹏大厦返还所有贷款和工程欠款后，累计回报股东高达5236万元，股东实际投资850万元。国企得到120%的高回报。为国家纳税一千三百多万元。这还不包括7年来免费为招旅总公司提供的价值为上千万元的办公用房。

当我离开华鹏时，我将一个设备、设施完善、财务状况良好，职工队伍稳定，既无外债，又无内债，100%出租率的华鹏大厦交给继任者。上级单位在我离任"华鹏"进行审计报告时，对我这个董事总经理兼书记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也对我和我的员工发奖金超标却提出了质疑。在国企当总经理确实有太多的无奈，尽管华鹏大厦在我经营的七年当中盈利额占招旅总公司十多家企业的一半以上，但由于现成体制既缺少科学的约束机制，也没有合理的分配机制，主要经营者除了年年的"优秀管理者"、"优秀企业"、"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外，其他待遇与系统内众多亏损企业的经营者没有多少差别。而那些债台高筑，资不抵债的企业，往往是"穷庙富方丈"，他们把企业搞得满目疮痍自己却一夜暴富。一些国企经营者，凭借行业垄断、利用政策优势、占据国家资源、拿着数百万元年薪。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不公。在国企当总经理，我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本，以销售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而这一理念也让我在几十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中得到了成功的回报。

就在我离任"华鹏"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厦居然换了三任总经理，由于领导层处理问题失当，管理失控，相互之间对立加深，导致剑拔弩张。好好一座写字楼无可奈何花落去。2005年底华鹏大厦腾空拆楼，"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座我们曾经使它辉煌的写字楼现已彻底烟消云散。

四、潮起潮落的人生2001年12月在一次企业家朋友聚会时，我遇到了当年在团中央青年厂长一期研究生班学习的任建新同学。他是蓝星集团总经理，一位中国企业界的明星人物。任建新从甘肃兰州一家研究院的团委书记靠开发工业设备清洗剂，逐步将企业做大做强。我曾是他多年不见的班长，见到我他很高兴。得知我长期经营管理写字楼，他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公司主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

当时我经营的华鹏大厦，虽规模不算太大，但每年却有近千万的纯利润。华鹏大厦的利润占总公司的半壁江山，两届总公司负责人曾邀请我去做总公司的副总，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的理念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国营企业中更是如此。

没想到蓝星集团任总却锲而不舍，他告诉我国资委正在将蓝星集团与昊华集团联合组建"中国化工集团"，而且他们刚从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了几十家军队转地方的企业，他希望我过去为他在房地产和物业方面独当一面。一边是自己经营多年、正风调雨顺、如日中天的华鹏大厦；另一边是中央企业二级公司的总经理、正局级的待遇、全行业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的舞台、工作到65岁退休的承诺。人总会有挡不住的诱惑，经过半年时间的犹豫，2002年6月，我终于做出了一项愚蠢的决定：辞去了华鹏大厦董事总经理职务，带着十几名部门经理踏进了中国化工大厦筹建的大门。

我们着手在中关村做起了筹备工作。这期间，由于化工集团组建推迟，所有工作陷入停顿。又赶上了2003年春天"非典"，繁华的中关村失去了昔日的喧嚣和繁荣；我除了每周一听取集团的各项宏伟计划外，几乎无所事事。我由一个被隆重推出的重量级人物渐渐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听客；由一个招商集团旗下说一不二的公司总经理，变成蓝星集团旗下局级待遇的食客。一种难以名状的、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此时，我突然读懂了南唐后主李煜在丢掉江山、成为阶下囚时写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心情。但人生只是单行线，自己的选择对与错都得自己承受。

说句公道话，蓝星集团主要负责人对我曾寄予厚望，也给予了很多关照。我们离开蓝星集团半年之后，中国化工集团成立了。谈到我的走，中国化工集团任建新总经理曾对我的朋友说："他当时太着急了"。

一年之后，我开始寻找下家突出重围。2003年9月下旬，经朋友介绍，我与北京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

荣戈在京广大厦见面。他曾是一位职业篮球运动员、有过很长军旅生涯的年轻民营企业家。他的大厦将要开业，正在寻找合适的经理人。我们双方谈得很投缘，我也直言相告：如需要我，也要将我带到蓝星的十多名干部都安排。这种接管式的要求是有些强人所难，但豪爽的林荣戈董事长一揽子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他也是我后知青时代的福星。

我与雨霖建雅房地产公司谈妥的次日，便向中国蓝星集团任建新总经理递交了集体辞职的请调报告。从此，命运鬼使神差的让我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国营企业，跨进了民营企业的行列。

2003年10月中旬，我带着那些不离不弃跟着我转战蓝星的旧部重新回到了熟悉的东三环北路。新接手的雨霖大厦在东三环北路呼家楼，这是一座18层高的现代化写字楼，从2004年5月开业到2017年7月，14年间房屋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雨霖大厦是个民营企业，船小经不起大的风浪。作为一名高层企业管理者，我不仅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且在关键时候更要把握不该做什么。

也许是在国有企业当家做主惯了，我在国企当总经理时，总觉得自己是这个企业的主人，常有一种报国的成就感；在民企当总经理，尽管也受到不薄的礼遇，但总有几分打工者的落差。民企没有级别和退休年龄的限制，只要股东觉得你物有所值，你自己又喜欢做，做到国家领导人退休年龄也无妨。但企业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盈利生存，亏损倒闭"，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谁也无法逃避。回首往事，不知不觉中，我在雨霖大厦又已度过了十四个春秋。

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故事。我走遍了祖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地方，也去过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我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也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赞叹。这也应该感谢邓小平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改变了中国。但对于现实生活中，吏治腐败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民族精神缺失等社会问题十分担忧。中国许多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注定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积极有效的推进中国民主法制是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的出路。显而易见，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执政党自身的力量，做为四十多年党龄的我仍："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2018年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也是我工作50年了，也该放下工作，真正退休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古往今来多少人感叹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在现实生活中，且不说80后，90后的孩子们，即便是年长一些的人，能有我们这代人如此丰富人生经历的也不是很多。从北京故宫角楼阳光普照的金色学生时代，到文革中风起云涌的战火硝烟；从恰同学少年宝塔山下大串联的足迹，到插队内蒙古九年的知青岁月；从北京语言学院返城待业的临时工，到活跃在羊绒衫厂的科室骨干；从十年团中央机关的高层历练，到十余年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掌门人的奉献；从中国化工集团大舞台的诱惑，到鬼使神差民企职业经理人十四年的挑灯看剑。六十

七年风风雨雨，今回首，我也多少能找回点"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征战归来的感觉。

作者的话：2013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自传体散文《梦随风万里》一书，数千册书尽赠送友人。写出的文章记述着我们那代人的经历，当然希望更多人看到。2017年，我将书稿分70篇做成微信《梦随风万里》文摘，这其中那篇文章喜欢，欢迎转发、转载，只要标明出处就好。

作者简介：林小仲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在东北呼伦贝尔度过九年知青岁月，1977年返城，先后在国企、团中央机关、央企、民企供职。现任职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本文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梦随风万里》一书。

林小仲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19365407

林小仲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63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